

當代社會研究法

質化與量化途徑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原著：W.Lawrence Neuman

譯者：王佳煌·潘中道等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當代社會研究法

質化與量化途徑

原 著◎W. Lawrence Neuman

合 譯◎王佳煌、潘中道等

 PE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 / W. Lawrence
Neuman 原著；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譯。--
初版。-- 臺北市：學富文化發行，2002 [民91]

面：公分

含參考書目及索引

譯自：Social Research Method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ISBN 986-80015-5-2 (平裝)

1. 社會學—研究方法

540.1

91004541

初版一刷2002年4月 二刷2002年12月（修正版）

當代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途徑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2 by Pro-Ed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title from Proprietor's edition of the work)
Copyright © 2000 by Allyn & Baco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Allyn & Bacon,
a Pearson Education Company."

原 著 W. Lawrence Neuman

譯 者 王佳煌·潘中道·郭俊賢·黃瑋瑩

發行人 于雪祥

發行所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台北市大安區106新生南路3段60巷9號

電 話 02-23620918

傳 真 02-23622701

E-MAIL proedp@ms34.hinet.net

法律顧問 承天國際法律事務所 廖正多 律師

電腦排版 方圓工作室

印 刷 多藝行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定 價 790元（不含運費）

ISBN：986-80015-5-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原序

一本書出到第四版，顯示這本書已經吸引一批忠誠的讀者，並持續吸引新的讀者。這也顯示重大的改變有其危險。除了全面更新某些範例與材料之外，這一版的調整比較偏向組織安排，而非實質內容。這些更動是針對舊版本讀者所做的回應，它們也提出幫學生更進一步瞭解教材的方法。

第一，本書將倫理與政治議題的討論放在研究設計、測量、資料搜集及資料分析等討論之前。倫理議題很難專置於一章，因為倫理問題影響到研究過程的每個層面。把討論移到書中比較前面的地方，學生就會提早注意到倫理議題的重要性，也能夠在他們研習社會研究的設計與資料搜集的階段的時候，思考倫理問題。

第二個改變是研究設計討論的重組。在過去的版本裡，我用分立的篇章探討質化與量化設計的議題。《社會研究方法》的第四版則在一個段落裡一併討論基本設計議題、測量、抽樣，在各章同時探討質化與量化的方式。這樣將更能向學生說明這兩種研究方式的差異何在，以及這兩種方式也能在研究時彼此互補。

還有，有關文獻分析的部分現在放在最後一章，並且併入先前附錄裡討論研究報告撰寫的部分，予以擴充。這一章也包括使用網際網路的新資訊。強調如何閱讀有關他人研究的報告，以及撰寫個人自己研究的報告，都是研究過程中重要的部分，也是學習研究的重要方法。網際網路的改變猶如電光石火，是否需要說得太詳細，我也躊躇再三，因為它們可能在幾個月內變成明日黃花。同時，網際網路對人們如何做研究，又有重大的影響，也不宜忽略。

第四版添加的研究工具在本書後面的詞彙大全裡可以找到。不僅為學生定義術語，也提供章節篇目，這樣讀者可以很容易地取得相關術語的資訊。

在第四版裡面，我仍執著於過去版本的三大關切重點。第一，學生應該知道社會研究的活動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真實的人從事

社會研究，他們做研究的社會與歷史脈絡能夠影響他們的行動。社會研究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需要思考整體的脈絡如何形塑研究活動，創造的知識如何轉而影響社會與政治關係。第二個，也是與第一個相關的重點，就是社會研究者必須提防種族中心主義的觀點，或是受限於他們自己社會的假定、價值觀與信念。我相信做社會研究的新穎、有創造力的方式在於探索觀點與研究技術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些觀點與技術有的只適用於某種文化，有的比較可以放諸四海。藉由日益全球性的溝通與接觸，學生應該更敏於社會研究的活動如何、何時進行，以及如何、何時避免越界。最後，我希望向學生說明，不僅質化與量化這兩種研究方法都有價值，更大的效益在於結合它們兩者。我認為，維持觀點與技術的多樣性，最能增進對這個社會世界的知識，不同研究方式之間的緊張是有好處的。

譯者序

一本學術書籍的好壞，可以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來看，兩者都與書的品質密切相關。在形式方面，首先要看作者的專業及其形象與聲譽。作者的專業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確保書的品質，因為作者的形象與聲譽是一種口碑，代表同行對作者的肯定，不致於荒腔走板，外行裝內行。

書的好壞也要看出版社。出版社的出書策劃、選書策略與行銷方式可以顯示他們對某一本書的定位與期望，以及對作者的瞭解。出版社在業界的形象與名聲也是書籍品質的間接保證。大型出版社挾其規模經濟、龐大的編輯群與顧問，以及豐厚的人脈關係，可以說服好的作者將書籍交給他們出版。中小型出版社以專業取勝，雖缺乏規模經濟，也無力砸錢作廣告，但因他們必須在競爭激烈的出版市場上求生存，除了掌握市場利基之外，選書、出書也必須精準，才能維持形象與聲譽。

當然，書的好壞也要看它的銷售狀況。關於這點，專業書籍要想洛陽紙貴，比通俗書籍還要難上千倍，因為通俗書籍要緊跟流行浪潮，還要看作者是否為知名人物，專業書籍或教科書以專業為導向，市場接受度遠不如通俗書籍，作者亦多非明星或政治人物，實難與通俗書籍相比。即使是教科書，也要看適不適合教師與學生使用。許多學者滿腹經綸，下筆千言，卻令讀者不知所云者，所在多有。

從上述這些形式條件來看，本書堪稱好書。作者W. Lawrence Neuman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鑽研方法論多年，本書是他的代表作，在學術界享譽甚隆。出版社Allyn and Bacon與Longman同屬Pearson Education出版集團，是知名的出版商，專營教科書、參考書、教材之出版銷售，在出版界與學術界口碑卓著。再者，本書出到第四版，也顯示其內容廣受教師與學生歡迎。

形式條件只是外在的，重要的還是看書的內容。市面上許多教

科書，尤其是談研究方法的教科書，最容易令人味同嚼蠟，難以下嚥。作者如果要撰寫一本好的教科書，或者學生要選擇一本好的教科書，最好能注意三個要件：

第一，生花妙筆，平實易懂。

第二，架構完整，面面俱到。

第三，介紹基本概念，適時搭配範例，以便學生迅速吸收，活學活用。

讀者當可發現，本書已經具備這三個內容要件。

第一，作者用平易的語句與社會生活中的實例，論述基本概念，語調輕鬆活潑。

第二，全書分為五大部分，包括基礎認定、籌劃與準備、量化資料搜集與分析、質化資料搜集與分析、社會研究與報告撰寫。從頭到尾，一氣呵成。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版的編排有兩個特色：一是討論研究設計時，兼論質化與量化，二是特別將倫理問題提到前面。第一個特色意在打破傳統研究方法將量化與質化分開來看的簡化做法。許多學者常有的誤解是質化與量化屬於不同的邏輯與思維，卻忽略兩者其實都是科學方法，以致各分畛域，彼此攻訐。第二個特色與一般研究方法的教科書不同，因為傳統或一般的教科書常將研究倫理放在最後面，聊備一格。但事實證明，研究倫理不宜放在最後一章，研究方法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自重與尊重他人的問題。即使學者成就傑出，著作等身，只要有輕忽研究倫理之處，即使是小差錯，也可能使一世英名與成就毀於一旦。在學術研究的歷史上，這種例子比比皆是，卻總有人忘記歷史的教訓，最明顯的就是抄襲剽竊，忽略同僚、研究助理與學生的貢獻，或者暴露敏感的、隱私的資料，傷害到研究對象。此外，在利益衝突中不思迴避，標榜純正血統，結幫成派，各據山頭，壟斷學術資源，也是極容易犯的毛病。作者將研究倫理的篇章提到前面，可謂用心良苦。

第三，本書每介紹一項方法原則或概念，隨即有範例、圖示緊

密搭配，讓讀者活學活用。用電腦的術語來說，本書的撰寫、編排充分達成「使用者友善」(user-friendly)的目標。

本書譯者對研究方法有濃厚的興趣，遂譯本書時受益良多，也希望與讀者分享這本好書。讀者對本書中譯本如有任何問題與意見，歡迎與譯者、出版者聯絡、交流、討論。

元智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王佳煌

草于癡愚齋

2002/1/18

目 錄

第1章 科學與研究.....	1
導論	2
社會研究之外的選擇	4
權威	4
傳統	5
常識	6
傳播媒體的迷思	6
個人的經驗	7
科學如何發生作用	10
科學	10
偽科學	13
科學界	15
科學界的規範	17
科學的方法與態度	18
科學的期刊	19
科學當作是一種轉化的過程	21
研究過程的步驟	22
步驟	22
範例	24
質化與量化的社會研究	31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研究？	33
結論	35
重要名詞	36
問題回顧	36

第2章 研究的面向	37
導論	38
研究的面向	38
研究的目的	38
研究的運用	43
研究中的時間面向	57
所使用的資料蒐集技術	63
量化資料	63
質化資料	68
結論	71
重要名詞	71
問題回顧	72
第3章 理論與研究	73
導論	74
什麼是理論?	75
社會理論VS.意識型態	76
理論的組成	79
概念	79
關係	88
範圍	89
事實VS.理論	91
理論	92
方向	93
理論的層次	94
形式理論與實質理論	96
解釋的形式	97
理論的架構	111

理論與研究：動態的組合	113
結論	116
重要名詞	116
問題回顧	116
第4章 方法論的意義	119
導論	120
三種取向	121
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124
問題	125
摘要	131
詮釋取向的社會科學	132
問題	134
摘要	142
批判社會科學	143
問題	144
摘要	154
女性主義和後現代研究	154
結論	159
重要名詞	164
問題回顧	164
第5章 社會研究的倫理和政治議題	165
導論	166
倫理問題和研究者	167
個別研究者	167
為何要信守倫理？	167
權力	169
有關研究對象之倫理議題	170

對人類受試者加以保護的起源	170
生理傷害、心理虐待、和觸法風險	171
欺騙	177
知會後的同意	178
特殊族群與新的不平等	180
隱私、匿名、和保密	182
受試者資訊是個人資產	186
對受試者的明文保障	187
倫理和科學社群	188
倫理和研究的贊助者	190
告密	190
獲得特定發現	191
如何進行研究的限制	192
隱瞞研究發現	193
隱匿真正的贊助者	195
研究的政治性	196
對社會研究者研究什麼以及如何做研究的限制	196
對研究的直接限制	196
透過控制研究經費的間接限制	202
研究發現的傳播與應用	209
關聯模式	209
在結果發表後	211
影響未來行為的研究發現	212
學術自由	213
客觀性與價值中立	214
結論	217
重要名詞	218
問題回顧	218

第6章 質化與量化的研究設計	219
導論	220
研究的質化與量化取向	220
重建邏輯以及實務中的邏輯	221
技術體制與超驗的觀點	222
線性與非線性路徑	224
三角檢核法	225
客觀與誠實	227
量化設計議題	229
變項與假設的語言	229
因果關係與假設	232
解釋的切入點	240
因果解釋上的邏輯錯誤	242
雕琢研究主題：量化研究	252
從主題到特定的研究問題	253
從研究問題到研究假設	258
理論在何處？	260
質化研究設計之議題	260
個案與脈絡的語言	260
紮根理論	262
脈絡是關鍵	263
雙手萬能	264
重視個案與過程	264
詮釋	267
雕琢研究主題：質的研究	268
研究範例：量化研究	268
實驗	269
調查研究	270

內容分析	271
研究範例：質性研究	272
實地研究	272
歷史比較研究	273
菁英研究概觀	273
結論	277
重要名詞	278
問題回顧	278
第7章 量化與質化測量	281
導論	282
為什麼要測量？	282
量化與質化的測量	283
測量過程的環節	284
量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289
質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292
信度與效度	294
量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295
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304
信度與效度之間的關係	306
可信與有效的其他用法	307
量化測量之導引	308
測量水平	309
專門化的量數：量表與指數	312
指數建構	316
目的	316
加權	319
遺失資料	320
率與標準化	320

量表	322
目的	322
量度的邏輯	324
常用量表	325
結論	340
重要名詞	342
問題回顧	343
第8章 量化與質化抽樣	345
導論	346
非機率抽樣	346
隨意的、偶然的、便利抽樣	347
限額抽樣	348
立意或判斷抽樣	349
雪球抽樣	351
異例抽樣	353
按序抽樣	353
理論抽樣	354
機率抽樣	354
母體、元素、抽樣架構	354
為什麼要隨機?	358
機率抽樣的類型	358
隱藏性母體	378
樣本應該多大?	381
推論	383
結論	385
重要名詞	386
問題回顧	386

第9章 實驗研究.....	389
導論	390
適合實驗的研究問題	391
社會研究實驗簡史	392
隨機分派	394
為什麼要隨機分派？	395
如何隨機分派	396
配對vs.隨機分派	397
實驗的設計邏輯	398
實驗的語言	398
設計記號	402
設計的類型	402
內在與外在效度	411
內在效度的邏輯	411
對內在效度的威脅	411
外在效度與場地實驗	417
實際的考量	420
籌劃與前導測試	421
給受試者的指令	421
實驗後訪談	421
實驗研究的結果：做比較	421
倫理絮語	422
結論	424
重要名詞	425
問題回顧	426
第10章 調查研究.....	427
導論	428

調查中研究問題的適切性	428
調查研究的歷史	429
調查研究的邏輯	434
何謂調查?	434
建立調查的步驟	434
建構問卷	436
撰寫問題的原則	436
增加受訪者的記憶	443
問題類型與答案類別	446
「開放式」對「封閉式問題」	451
措辭的藝術	458
問卷設計	459
調查類型：優缺點	469
郵寄與受訪者自行進行的問卷	469
電話訪問	472
面對面訪談	473
特殊情境	474
成本	474
訪談	475
訪員的角色	475
訪問的階段	479
訪員訓練	481
訪員的偏誤	482
文化意義與調查訪問	485
運用電腦協助的電話訪問	489
合乎倫理的調查	489
結論	494
重要名詞	494
問題回顧	495

第11章 非反應式研究以及次級分析	497
導論	498
非反應式的測量	498
非反應式研究的邏輯	498
非反應式的變異或非強行介入的觀察	499
記錄及文件	499
內容分析	501
何謂內容分析?	501
適合進行內容分析的主題	503
測量與編碼	504
編碼、效度、和信度	506
如何進行內容分析研究	508
推論	512
現有的統計數據 / 文獻及次級分析	515
現有統計數據研究主題的適當性	515
社會指標	517
資料所在	518
信度與效度	523
現有統計數據 / 文獻研究範例	530
推論的議題以及理論檢驗	531
非反應式資料的推論	531
倫理的考量	531
結論	532
重要名詞	533
問題回顧	533
✓ 第12章 量化資料分析	535
導論	536

資料處理	536
資料編碼	536
輸入資料	537
清除資料	539
單變項結果分析	542
次數分配	542
集中量數測量方法	544
離散趨勢測量方法	546
雙變項的結果	550
雙變項的關係	550
解讀兩者間的關係：散佈圖	553
雙變項表格	555
相關性之測量方法	563
兩個變項以上之測量	567
統計控制	567
百分比表格的設計	568
多元迴歸分析	573
推論統計	575
推論統計的目的	575
統計顯著度	576
顯著水準	577
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	578
結論	582
重要名詞	583
問題回顧	584
第13章 實地研究法	585
導論	586
適合實地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586

實地研究法簡史	588
實地研究法的邏輯	593
何謂實地研究法？	593
實地研究的計畫步驟	596
選擇研究場域而後進入	598
選擇研究場域	598
進入場域的策略	601
進入實地	604
建立關係	607
實地裡的關係	609
實地裡的角色	609
學習風俗習慣	612
維持關係	615
觀察並蒐集資料	618
觀察和傾聽	618
田野筆記	621
資料品質	629
聚焦及取樣	633
實地研究訪談	634
實地訪談	634
生命史	637
實地訪談中的問題類型	638
報導人	641
訪談脈絡	642
離開實地	643
實地研究中倫理的兩難	644
欺騙	644
保密性	644
與偏差者交涉	645

有權力者	645
出版實地報告	646
結論	646
重要名詞	647
問題回顧	647
第14章 歷史比較研究法	649
導論	650
歷史比較研究法簡史	650
適合歷史比較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652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	654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量化研究	654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詮釋研究	660
獨特的歷史比較取向	661
歷史比較研究計畫步驟	668
調查主題概念化	668
確認證據	669
評估證據之品質	670
組織證據	671
綜合資料	671
撰寫報告	673
歷史脈絡中的資料與證據	673
歷史證據的類型	673
次級資料之研究	677
初級資料之研究	681
比較研究	683
比較研究的類型	683
比較的單位	688
跨文化研究的資料	690

西方文化的偏誤	695
歷史比較研究中的同義字	698
同義字的重要性	698
同義字的種類	698
倫理	703
結論	705
重要名詞	705
問題回顧	706
第15章 質化資料分析	707
導論	708
量化和質化分析	708
相似性	708
相異性	709
解釋與質化資料	711
概念形成	712
質化研究的概念化	712
質化資料編碼	713
撰寫分析備忘錄	719
質化資料分析方法	722
連續的近似值	723
舉例法	724
分析比較	725
範疇分析	728
理想型	731
事件結構分析	733
其他技術	734
缺漏值，或負面證據的重要性	738
負面證據	738
缺漏值之限制	741

其他工具	742
質化資料應用軟體	742
圖示與質化資料	746
表面事實	746
結論	748
重要名詞	749
問題回顧	749
第16章 文獻檢閱與報告撰寫	751
導論	752
為何撰寫報告?	752
文獻檢閱	753
何處尋找研究文獻	757
學術期刊	757
書籍	765
論文	766
政府出版品	767
政策報告書及發表的文章	767
如何有系統地進行文獻檢閱	768
定義並修正主題	768
設計搜尋程序	768
尋找研究報告	768
記錄的內容	775
組織筆記	776
撰寫文獻檢閱	777
何謂好的文獻檢閱	778
在社會研究中運用網際網路	778
優點	782
缺點	783
撰寫過程	785

你的對象群	785
風格與筆調	786
組織想法	787
回到圖書館	788
過程	789
重寫	793
量化研究報告	796
摘要或執行摘要	796
呈現問題	797
方法描述	797
結果和表格	797
討論	798
提出結論	798
質化研究報告	799
實地研究	800
歷史比較研究	802
研究計畫書	805
何謂研究計畫書	805
以計畫書申請經費	805
結論	808
重要名詞	809
問題回顧	809
附錄 A 美國社會學會倫理守則	811
附錄 B 五位數隨機亂數表	835
辭彙解釋	839
參考書目	857
漢英索引	885

科學與研究

導論

社會研究之外的選擇

權威

傳統

常識

傳播媒體的迷思

個人的經驗

科學如何發生作用

科學

偽科學

科學界

科學界的規範

科學的方法與態度

科學的期刊

科學當作是一種轉化的過程

研究過程的步驟

步驟

範例

質化與量化的社會研究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研究？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社會學家這種人關心的是用一種受過訓練的方式，瞭解社會。這種學科的本質是科學的。這就是說，社會學家在社會現象中發現的，他所說的社會現象，是在某種確定的、界定相當嚴格的參考架構中進行的。

——Peter Berger, *An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p. 16.

導論

無論你是否察覺到社會研究的存在，但我們每天都被它所圍繞。教育者、行政人員、政府官員、企業的領導者、人群服務的提供者、及專業的健康照顧人員，在他們的工作中經常都會使用到社會研究的結論及原則。社會研究可被應用於兒童教養、減少犯罪、改善大眾健康、商品銷售、或僅是在瞭解一個人的生活。研究報告則可能呈現於廣播新聞節目中、雜誌裏、及報紙內。近來，在每天的報紙中，經常閱讀到一些關於學校反暴力的實務工作、反藥物濫用的方案、以及「少年犯罪矯治營」(boot camps) 等等的相關研究，其結論顯示這些工作均不具成效；另外，報紙並報導警察適當的臨檢將減少酒醉駕車的比例、31%的青少年同性戀者在學校都曾受到身體上的恐嚇或傷害、以及醫生承認透過「肯定行動方案」(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的實施，僅有測驗分數上的成功而已，並無實質效果。

一項研究該被如何進行，或者資料該如何蒐集，經常產生許多爭議。在1998年，美國的新聞報導中對於2000年的人口普查該以社會科學家所發展出的抽樣方法或傳統方法來進行，充滿了爭論及合法性的挑戰。在一本暢銷的期刊中，曾看到一篇探討支持與反對單一性別(single-sex)的不同學派的文章。每一方均提出支持自己主張的證據，而作者則說問題的關鍵在於其分別所使用研究方法論的不同。另有一篇論文則指出，美國政府對於失業及貧窮所採用的測量方法有錯誤，其將使民眾對於經濟與社會情況的瞭解產生嚴重的偏差。

本書主要在探討社會研究。簡單來說，研究乃是針對問題而尋找答案的一種方法。社會研究則是社會學家、社會科學家、以及其他對社會問題想找出解答的人，所進行研究的一種類型。而大家對於社會研究應包含的內容或許已經有了一些概念。但首先，仍須去除一些大家所可能產生的一些誤解。當詢問學生心中所認為的研究

是什麼時，最常得到的答案有如下所列：

- 只立基於事實，而沒有理論或評論
- 僅僅只有專家或大學教授會加以閱讀或使用
- 只有大學中擁有博士學位的人才能完成
- 針對一項主題，到圖書館內尋找相關文獻
- 前往一些奇特的地點，並加以觀察
- 進行一些實驗，在實驗中受試者必須根據研究者所設計的條件來做一些配合
- 從民眾中抽選一部分人做為樣本，並請他們填答一些問卷
- 從政府的相關報告或書籍中查詢一些表報資料
- 使用電腦、統計、及一些圖表

上述前三項是錯誤的，而其他項目也僅說明了社會研究的部分內容。若以單一項目而混淆了對整體的瞭解是相當不智的。就好比我們不會誤以為僅穿上鞋子就代表已經盛裝一樣，因此我們不應誤將上述的任何一項當成是社會研究的全貌。

社會研究經常牽涉到非常多的事情。比方說，一個人如何在社會環境中有新的或原始事物的發現。為了要達成上述的目標，研究者必須具備邏輯性的思考、遵循一些法則、並且不斷的重複一些步驟。研究者還要根據事實，以系統性的方式來結合理論或思考，並且使用他們的想像及創造力。研究者很快的習得如何細心的去組織及規劃，以及針對問題選擇適當的技術。身為一位研究者還必須非常審慎的使用合乎倫理及道德的方式來對待被研究的對象。另外，研究者也必須與其他的人保持良好而清晰的溝通。

社會研究是一套方法，人們很有系統的使用這些方法來追求知識。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探索過程，但在此過程中也需要具備堅持、誠實的人格、容忍意義不明的情境、與他人互動、及以高品質的研究工作為榮等等。我們將在第2章中學到更多有關社會研究的多樣性。

不要期待本書能將你轉變成為一位研究的專家。但它卻能使你成為研究結果的良好使用者，提供給你瞭解研究工作是如何進行的，並使你能自我完成一項小型的研究計畫。讀完本書之後，你將瞭解何謂研究，它的意義，其所能完成及不能達到的事有哪些，以及在整體大社會中它所扮演的角色。

社會研究之外的選擇

對於社會環境中你所知道大部分的事物都是透過社會研究以外的方式而學到的。大部分你所知道社會環境中的事物都是經由你的父母或其他人來告訴你。有些知識也可能是從個人的經驗而來。所讀過的書、報、雜誌，所看過的電視、電影，也都提供你許多資訊。對於社會環境，也可能使用常識來理解。

除了具有一套的方法，社會研究乃是一種發現社會環境知識的過程。它是比其他方法更具結構性、組織性、及系統性的過程。從其他方法所獲得的知識通常是正確的，但根據研究而得的知識則更可能為真實，並且具有較少潛在的錯誤。研究並非永遠都能發現完美的知識，這是一項重要的認知。但無論如何，與其他方法相較起來，社會研究所可能產生的錯誤相對是比較少的。在探討社會研究之前讓我們先來說明其他獲得知識的方法。

權威

我們可從父母、老師、及專家處獲得知識，也可以從電視及其他媒體中獲得。當我們接受某些事情是真實，乃是因為告訴我們的人位居此方面的權威地位，或是因為它是一份權威的媒體或出版物，我們會將權威視為知識的基礎。依靠權威者的智慧具有一些優點——因為它是一種快速、簡單、及價廉的方式讓我們學到一些事物。權威者經常花費時間及精力去學習，而我們便可從其經驗及工作中獲益。

然而，依靠權威者也有其限制。例如我們非常容易高估專家。尤其當他們發生錯誤時，我們可能依然假定他們是對的。專家也可能對其不熟悉的領域發表意見，而且可能產生明顯的錯誤。在某一個領域的專家可能試圖運用他們的權威在其他非相關的領域中。在電視的廣告中，你可能看過一位非常優秀的足球選手，試圖運用他的專業知識來說服你購買一部汽車。另外，還有一些問題：到底誰才是權威？或如果有其他的權威者，其意見不同於你所相信的權威者的意見時，你該怎麼辦？例如，以前我曾將我的高中老師當成是物理學的權威。但現在我發現他的論點與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不同。

歷史上充滿著許多過去的專家，而目前我們卻認為他們是錯的。例如，過去有一些「專家」利用計算頭蓋骨上的凸塊來測量智力；而有一些「專家」使用放血的方式試圖來治療疾病。這些方式在現今可謂是明顯的錯誤，但你是否能確定今日的專家不會成為明日的傻瓜？而且，太依賴權威對一個民主社會而言可能是非常危險的。過度依賴專家，將使專家們忽略其他人的存在，並以促銷其理念的方式來強化他們的權力及地位。當我們不瞭解專家們的知識從何而來時，我們便也喪失了一些評估自己的能力。

傳統

人們有時也根據傳統來獲得知識。傳統乃是權威的一種特殊實例——也就是昔日的權威。傳統意謂著我們將某些事物視為真實，乃由於「這些事物一向依照這種方式而存在」。例如，我岳父曾告訴我，「喝些威士忌酒可治療感冒」。當我問他是如何知道這個方法，他說在他小時候他父親就這樣告訴他，而這是從老祖先傳下來的。這種治療知識乃是立基於傳統。

此處還有一個我們經常可以聽到的例子。大多數人都相信，由母親在家中所教養的孩子比在其他情境中所教養的孩子具有比較少的問題。人們「知道」這種說法，但他們是如何知道的？大多數的

人接受這種說法，乃是因為，過去這種說法就是對的，或是這種說法一直都是這樣存在的。

有些傳統的社會知識起源於簡單的偏見。經常有一些從過去流傳下來的信念，例如，「有那種想法的人，必定一事無成」或是「那個民族的人你絕對不要相信」。即便傳統所傳達的知識原本真確，但其可能在傳承的過程中遭到扭曲，而使它不再真實。大眾可能墨守傳統知識，但對其內含並無確實的理解；因為他們認為傳統的知識在過去有效或真確，現在也必然相同。

常識

對於社會環境中的一些事物，有時我們可經由一般的推理或常識而得知。因為這些是眾所周知及合理的事。例如，沒有死刑的國家，其民眾犯下謀殺罪的比率較高，因為民眾犯下謀殺罪時並不會被處以死刑。以上的敘述頗為合理。另外有一些大家都相信的事情：貧窮的青少年比中產階級的青少年較有可能產生偏差行為；及大多數的天主教徒都不實行節育。其實以上的常識都是錯誤的。

日常生活中常識具有其價值，但它可能在你的思考中產生邏輯的謬誤。例如，有一個「賭徒經常犯的謬誤」：當連續多次未中彩券時，下一次中彩券的機會便會增加。但從機率或事實來看，便可知上述的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常識經常包含了我們未注意到的矛盾觀念，因為我們將這些觀念用於不同的時機——例如，「相異的事物經常相互吸引」及「物以類聚」。常識可源於傳統。有時它是具有價值且正確的，但同時它也可能包含了錯誤、誤傳、矛盾、及偏見。

傳播媒體的迷思

電視節目、電影、報紙、及雜誌期刊都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資訊來源。例如，對於大多數沒有接觸過犯罪事件的人來說，他們對於犯罪事件的瞭解主要是透過觀看電視、電影、及閱讀報紙。但無

論如何，電視對於犯罪事件及其他事情的描述，並無法正確的反應出社會的事實。反而，有一些作者將真實生活改編或虛構成一些電視節目或電影，由於他們的無知或僅依賴權威、傳統、或常識，因此經常扭曲了事情的真實面。他們主要的目的是想達到娛樂效果，而不是想正確的呈現事情的真相。而報紙及雜誌的記者，雖然想將社會的事實原貌告訴大眾，但是在短期間內以有限的資訊及編輯的原則，不免需要編撰出一些故事。

很不幸的，傳播媒體傾向於使這種迷思常存於社會文化之中。例如，媒體報導接受社會福利的大多數是黑人（而事實上是白人）、大多數的精神病患都具有暴力傾向且有危險性（事實上只有很小比例的精神病患是如此）、以及大多數的老人都很虛弱並住在療養院中（事實上只有一小部分的老人屬於這種情況）。並且，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大肆宣傳之下，經常能夠使民眾對一些問題產生感受，而這些問題事實上可能並不存在（見資訊箱1.1）。視覺上的印象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欺騙更容易誤導民眾；這意謂著影片或電視上所出現的刻板化概念及編撰的故事，能夠對大眾產生強而有力的影響。例如，電視不斷報導都市中低收入的非裔美國青少年使用不法藥物。最後，大多數的民眾都「知道」都市中的黑人比美國國內其他任何族群使用非法藥物的比率都來的高，即便這樣的觀念事實上是錯誤的。

個人的經驗

假如有一些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或是你看過或經歷過一些事情，你便會接受這些事情是真的。個人的經驗或是「眼見為憑」對個人具有重要的影響，並且是個人知識強而有力的來源。很不幸，個人的經驗可能會使你迷失。類似像錯覺或妄想都有可能在我們身上發生。視覺上的錯誤及判斷時的扭曲，都可能讓我們誤將某些事物視為真實。個人直接接觸時，此種經驗所產生的影響力是很大的。即便我們都瞭解這種道理，有時人們還是會因為一些錯覺而產

資訊箱 1.1

憤怒的駕駛（Road Rage）是一種媒體的迷思嗎？

美國民眾聽到很多有關於缺乏耐心或不滿而搶道的憤怒駕駛之報導。在許多城市中，新聞週刊、時代雜誌、及報紙都有許多關於這類事件的頭條報導。導致政府官員希望民眾正視此問題，聯邦政府甚至編列數百萬美金，試圖以法律的強制力及靠交通運輸部門來減少此類情形的發生。一位加州的心理學家目前正關注於這類失序的行為，並出現在幾個重要的電視節目中參與討論這個問題。

「憤怒的駕駛」這個名詞最早出現於1988年，而在1997年之前，每年總有超過4000篇文章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來探討它。除了媒體關注這些「激進的駕駛」及「對前車太慢產生憤怒的開車者」之外，並無任何對「憤怒駕駛」的科學證據。這個名詞並未有明確的定義，它可以與任何跟駕駛人有關的行為牽連在一起，如從車內開槍、駕駛人使用粗野的手勢來表達不滿、開車將騎腳踏車的人逼出道路、緊跟著前車行駛、甚至對汽車修理的帳單感到氣憤等等。然而，所有的資料都顯示，當「憤怒的駕駛」這個名詞到處流行時，這段期間的撞車及汽車意外事件並未增加，反而減少。

或許媒體的報導激起了我們對「憤怒駕駛」行為的敏感及觀察。在聽到或看到此類行為的報導後，便會對這種行為產生特定的標籤，民眾開始會去特別注意一些魯莽的駕駛行為，並做選擇性的觀察。在尚未進行適當的研究之前，我們對這類行為並無法具有正確的認識，可能其數量並未真正改變。全國對「憤怒駕駛」此種概念的廣泛探討與注意，可能是藉由大眾媒體的大肆報導，而普遍產生的一種迷思吧！

生錯誤。通常人們比較相信他們所見及所經驗到的，而較不相信經過嚴謹研究設計所發現的研究結果。

個人的經驗可能產生四種錯誤，而且這四種錯誤會相互增強，並且也會發生在其他的領域之中。這些錯誤透過宣傳、欺騙、成見、或一些廣告，而成為誤導民眾的來源。首先，我們最常見到的問題便是**過度概化**（overgeneralization）或推論。這種情形經常發生在當你擁有部分你所相信的證據時，接著你便會假定它也可以應用於許多其他的情境。因此，適當的推論可能是比較恰當的；在某些情況下，少量的證據的確可以解釋一個較大的情境。但問題是，人們的推論經常超出了他們所擁有的有限證據。有很多的人、事、情境，人們對這些事物的瞭解很有限，因此，根據他們所知的有限訊息來作推論似乎被認為是很合理的。例如，幾年前，我認識了五位盲人朋友。他們每一個人都非常親切而友善。但我是否能就此下結論說，所有的盲人都是友善的？我個人所相處的這五位盲人朋友是否就能代表所有的盲人？

第二個常見的錯誤便是選擇性的觀察。此類錯誤常發生於，當你對某些人或事件有特別的觀察時，則你會根據這些觀察結果來作推論。人們經常會將焦點或觀察放在特別的案例或情境中，特別是當這些案例或情境與自己先前的觀念相互印證時。我們時常會尋找證據來強化我們的所知及信仰，並且會忽略這些案例所涉及的範圍及矛盾的訊息。通常我們會對能強化我們信念的特徵較為敏感。例如，我相信人們是友善的。此信念可能立基於刻板化印象，可能是媽媽告訴我們的、或有其他來源。而當我在觀察人們的行為時，將會毫無警覺的將注意力特別放在他們的笑容、笑聲等方面。在尚未瞭解到此種狀況時，我大都只會注意及記憶到那些能強化我先前所知的人或事物的身上。有一些心理學家對人們去「找出」（seek out）或扭曲他們記憶的傾向作研究，而這些記憶只是想讓他們原先所想的觀念獲得更一致的看法而已。我「過度解釋」人們的特徵或笑容，而未注意到一些矛盾的證據，並且未去尋找這些人中的不友善的行為。

第三項錯誤是過早下結論。此項錯誤經常伴隨著及增強前兩項

錯誤。當你覺得你已擁有所有的答案，而不再需要去傾聽或尋找資訊，或提出任何疑問時，這種錯誤便會產生。很不幸的是，大多數人對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分析都有一些懶散。當我們得到一些證據或短暫觀察一些事件後，我們便以為我們已有了全面的瞭解。我們會尋找證據來確認或拒絕一項理念，但當得到一些證據後便停止繼續追根究底。簡言之，我們經常直接下這樣的結論：我認識三個人，他們每天都抽六包煙，並且活到80歲；因此，大量抽煙的人，都將活到80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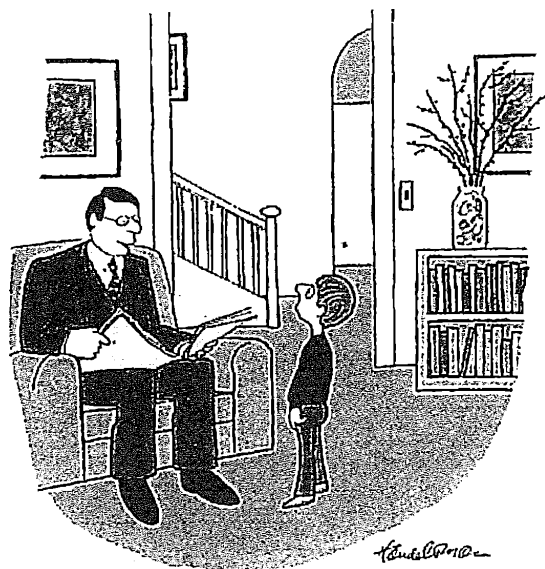
最後一個錯誤便是月暈效應（halo effect）。此項錯誤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呈現，但基本上，它是指我們從高度解釋為正向的事務或名望中作過度的推論。我們常會對事物或人物產生月暈效應或解釋其具有強烈聲望等等的傾向。我們常從其他我們所知甚少的人或事物上而推得其名望。因此，當我們看到一份從名校（如哈佛或劍橋）畢業的作者所寫的報告時，我們便會假定此位作者非常聰明、並且具有很好的天份，此份報告的內容也必定十分有見解。相反的，如果此份報告出自畢業於二流大學的作者，我們便不會有以上的假設，並且會對此報告先產生某種偏見或看法，而不會單以此報告的特點來探討。

科學如何發生作用

將社會研究從其他獲得整體社會知識的方法中分離出來的關鍵因素，在於社會研究的科學取向。社會研究不僅僅只是一種資料蒐集的方法及獲得知識的程序；並且它是運用科學的取向來產生社會世界新知的一種過程。讓我們先簡略的來說明何謂「科學」，此主題在第四章中我們還會再做深入的探討。

科學

當大部分的人聽到「科學」這個字時，心中昇起的第一個概念



「兒子啊！我是個社會科學專家，那表示我不能解釋電子或任何相關方面的事但是你若要知道關於『人』的事，找我就對了。」

便是試管、電腦、太空船、及穿著白色實驗服的科學家。這些外表的特徵都只是科學的一部分。有一些科學，如自然科學——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及動物學——其主要是在處理物理及材料的世界（如岩石、植物、化學物品、天體、血液、及電流等等）。自然科學乃是許多技術新知的基礎，並且得到大眾的支持。當大多數的人聽到科學這個字時，最先想到的便是以上這些概念了。

社會科學，如人類學、心理學、政治學、及社會學，它們都牽涉到人的研究——人的信仰、行為、互動、習俗等等。很少有人會將這些學科與科學的概念相關連在一起。有時他們會稱此為**軟性科學**（soft sciences）。此並非這些學科的內涵過於鬆散或不夠精確，而是因為它們所探討的主題內容，如人們的社會生活，是較容易產生變化、難以觀察、以及較難用實驗工具加以精確測量的。一項科學所探討的主題內容（例如：態度、原生質 [protoplasm]、或

銀河 [galaxy] 決定了所需使用的技術及工具（例如：調查、顯微鏡、或望遠鏡）。

科學是一種社會制度，並且也是發現知識的一種方法。它並不是經常環繞在我們四周；它是一種人類的發明。科學思想的發展主要是源於西歐歷史中所稱的理性時代或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 period），而此大約發生於西元1600年至1800年之間。啟蒙時代引領了一波新的思想潮流。其包括忠於邏輯推理、強調在物質世界中的經驗、對人類進步的信念、以及對傳統宗教權威的質疑。其始於自然世界的探討，而後擴及社會生活的研究。科學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及成為追求知識的基礎，其最重要的便是與社會轉型的連結，此社會轉型即所謂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科學及其它領域的進步，如社會學，並非突如其來。它是經過許多研究者的努力及成功所產生的。而它也受到許多顯著社會事件的影響，如戰爭、經濟不景氣、政府政策、及公眾支持的轉移等等。

曾經有一段時間，幾乎所有的人都用前科學（prescientific）或非科學（nonscientific）的方法在追求新知識。這些方法包括先前所討論過的方法之外，還包括一些現代社會較少使用的方法（例如：神諭、神秘主義、巫術、占星術、或聖靈）。而在科學充分發展以前，像前科學的這種體系確實已逐漸被大眾所接受，並且變得根深蒂固。當然，無庸置疑地它們都是一種追求知識的方法，並且當時人們也視其所產生的知識為真實。像這些前科學方法目前依然存在，但對於科學來說，前科學方法只能算是附屬的。而有些人也使用非科學方法來研究一些超出科學範疇的議題（如：宗教、藝術、或哲學）。但在當代先進社會中的人相信，不論是社會或自然界，其大多數的面向幾乎都包含在科學的領域之中。今天，已經很少人會去懷疑科學是一種發現有關現代社會知識的合理方法。

科學同時是指產生知識的系統，及從此系統中所產生的知識。此系統已發展多年，現正以徐緩但卻穩定的步伐在變遷。它結合了有關世界及知識本質的假定；通往知識的方向；以及一組獲得知識

的程序、技術、及工具。在社會機構中它經常被稱為**科學界** (scientific community)。

科學知識在理論方面已有良好的組織及系統。截至目前為止，社會理論可被界定為一套互相連繫的抽象概念或觀念的系統，而這些觀念濃縮並組織了有關社會世界的知識。第三章中我們將討論多種不同型態的社會理論。而社會理論就好比一張社會世界的地圖；它幫助人們看清世界上錯綜複雜的事物，並且解釋事情為什麼會發生。

科學家們使用特別的方法來蒐集資料 (data)，並且用這些資料來支持或拒絕一些理論。資料乃是指**實徵** (empirical) 的證據或資訊，而這些資訊都是根據一些法則或程序非常小心的蒐集而得。資料可以是**量化的** (quantitative) (即，以數字來呈現)，或**質化的** (qualitative) (即，以文字、圖像、或實物來呈現)。實徵的證據是指實際的觀察，而此是經由人們的感官所得到的經驗——這些感官如：觸摸、看見、聽到、聞到、及嚐過。而這也將使人們感到混淆，因為研究者並未使用他們的感官直接來觀察社會世界的許多面向，以獲取他們所尋找的答案 (例如，聰明、態度、意見、感覺、情緒、權力、及權威等等)。但研究者有許多特別的方法來觀察，並且間接來測量社會世界中的這些面向。

偽科學

我們必須注意偽科學權充自然或社會科學的問題。大眾透過電視、雜誌、影片、報紙、特別的討論會或研討會等等管道，來接受偽科學持續密集的影響。有些經營商業的人，或擁有某種信仰系統的人，編織了一個科學外表的裝飾 (例如，專業術語、外表炫麗的機器、複雜的方程式及統計、或是白色的實驗服)，以及一些帶有迷思 (myths)、幻想、或希望的科學事實，然後加上一些不合邏輯的思考。之後，他們會宣稱這是一種「神奇的治療法」、「新奇的處遇」、「革命性的學習方案」、「特別創造的科學」、「外星人訪

問地球的證據」、或是「新世紀超自然的能量」。偽科學可能包含一些擁有「函授」博士學位所謂的專家，而其學位乃是不相關的學術領域，或是具有其他曖昧不明的證書（例如，醫學博士、心理學家等等），他們僅僅具有其專業上的基本知識而已。

不幸的是，大眾傳播媒體充斥著太多的偽科學。有時企業、政府或地方學校的工作人員也被強迫接受了這些大肆促銷的「新奇治療法」或「革命性的新理論」，這些看似科學的新事物，對真實的事物而言，只是廣為流傳的「偽科學」。在偽科學中的一些想法可說完全是一種騙局，或是幾乎觸犯法律的不實廣告。而其他的想法則是當代的一種迷思，這些迷思則是由使用科學文化合法性的忠實信仰者所造成。偽科學的持續存在乃是由於對於大眾傳播媒體所標示的「科學」其規則太過於鬆散所致。當然，許多人無法分辨真實事物與粉飾科學間的差異，也是偽科學繼續存在的重要因素。

流行的社會科學書籍有時也融合了一些偽科學以吸引讀者。這些書籍中有些是正確的大眾化知識，而這些知識則是由正統的社會研究者所提出。而其他的部分對非專業人士來說似乎是正統的社會科學，但事實上它卻是扭曲或誤用的社會科學。他們通常使用社會科學的外觀來宣傳特定的政治或社會價值。這些書中的資訊品質大多非常低落，並且很少符合科學領域的標準。例如，關於女性性行為的**海蒂報告書**（**Hite Report**），便是一份嚴重錯誤的研究報告，它是由一位非科學家所進行的研究，此份報告嚴重扭曲了社會關係。而此並無法阻止它成為一本暢銷書，並且它仍舊在大眾媒體上被廣泛的討論。

很可惜地，許多人，包括政治或社團的領導者，他們決策的基礎都是根據從偽科學書中所聽到或看到的資訊。另外還有一個附加的障礙，就是美國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有些人捐獻大量的金錢來成立智庫或政策研究中心，以倡導特定的思想意識。這些組織資助一些作者，幫助他們撰寫一些有關政策議題上的大眾化書籍，而這些作者中有的也具有博士學位。接著這些智庫便廣泛促銷這些書

籍，以贏得大眾對其政治想法的大力支持。這些書籍中有的也融入了偽科學。在電視或廣播中所廣告的社會科學書籍，並無法作到品質管制，它們被引用在報紙的文章中，或在各地書店中販售。這些大多包含個人觀念或政治意識型態的書籍，被設計成看起來像「真正的」社會科學教科書。

科學界

透過科學界的經營，科學被賦予了生命，而其維持了科學的假定、態度、及技術。科學界是一群人的結合，並且有一組規範、行為、及態度，此將這群人連結在一起，以維持科學的特質。它之所以稱為一個界（community），乃是由於一群互動的人，彼此間分享著共同的倫理守則、信仰及價值、技術及訓練、及生涯規劃。科學界並非是一個地理性的社區。而是一種專業的社群，在此社群中成員們分享著對科學研究的觀點及承諾。就大體而言，科學界包括了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這兩部分。

有許多在科學界核心之外的人使用科學的研究技術。一些實務工作者及技術人員應用已被科學界發展及淬煉出的研究技術。他們應用這些源自於科學界的知識及程序。例如，許多人，他們並不具有深入的研究知識、不會發展新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增進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他們也使用科學界所創造出來的技術（如，調查）。然而，這些人所使用的科學技術或結果，如果在他們也瞭解科學界的原則及程序時，則他們將做得更好。

科學界的界限及會員資格定義的非常鬆散。並沒有所謂的會員卡或會員名冊。很多人將擁有科學領域的博士學位當做進入科學界的非正式「入會證」。博士，其僅代表哲學的博士學位，只是比碩士更高一級的學位而已，它只是訓練一個人具備獨立研究的能力。有一些研究者並未具有博士學位，而且並不是所有具有博士學位的人都從事研究工作。他們可能從事許多其他的工作（如，教學、行政、諮詢、臨床實務、顧問等工作）。事實上，大約一半擁有博士

學位的人，其並未積極從事研究的生涯。

科學界的核心是研究者，他們全職或有一半的時間都在進行研究，而且通常都有助理幫忙。許多研究助理都是研究生，另外也有一些是大學部的學生。從事研究助理的工作，是大多數科學家獲得瞭解真實研究進行細節的方法。

大學及學院聘請許多科學界核心的成員。而有一些科學家則為政府或私人企業工作，這些組織如，**貝爾實驗室（Bell Labs）**、**全國意見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等等。這些研究單位大多數由近200個研究大學及機構所設立，並且座落於大約六個主要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因此，科學界可能具有地理性的分佈，但它的成員則傾向在一些小的**群集（clusters）**中一起工作。

科學界到底有多大？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用最廣泛的定義（包括所有的科學家，及在科學相關專業中的工作者，例如，工程師），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中，有大約百分之15的勞動力人口是科學界的成員。而看待科學界較佳的方法乃是看此大範圍中的基本單位：即專業學科（即，社會學、生物學、心理學等等）。科學家都是對某一個特別學科非常熟悉的人，因為知識乃是專門化的。在美國，大約有17,000個專業社會學家、132,000個建築師、650,000個律師、及1,257,000個會計師。每年，大約有500個人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16,000個人獲得醫學學位、而有38,000個人獲得法律學位。

擁有博士學位的人大約有一半不會以研究維生。像社會學這樣的一個專門學科，大概可能只有8,000個人活躍於科學界。許多的研究者終其一生也僅只完成一項或兩項研究。只有少數的人能完成多項研究。對一些主題及一些專業學科中的特別領域（例如，離婚的研究、或是死刑的研究），能完成多項研究的人可能僅有不到100人。科學界的研究結果影響著數百萬人的生活，然而大多數正在進行的研究及某項主題上的最新知識，可能僅靠數百人的努力而已。

科學界的規範（The Norms of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在任何人類社區中的行為都會被社會規範所控制。相同的，科學界也被一組專業規範及價值所管理，而此專業規範及價值是研究者在多年的訓練中所學習及內化的。這些規範相互強化，並且對科學家的獨特角色有所貢獻。研究者所工作的環境及科學所操作的系統也強化了科學的規範。如同其他社會規範一樣，專業規範乃是專業中適當行為的典範。因為研究者也是人，他們的偏見、自我意識、野心、個人的生活，以及他們的喜好，都可能影響他們的專業行為。實際上，科學規範無法永遠完美的運作，有時也會被違反。相同的，必須記住，科學的運作也無法從真實世界中被真空的抽離出來。不同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力量也會影響科學界的發展及運作。

五項基本的科學規範條列在資訊箱 1.2 中。它們不同於其他社會機構（如，商業機構、政府部門）的規範，並且將科學家獨立出來。科學家們彼此檢視，以確定對方是否遵守規範。例如，科學家必須堅持**客觀性（universalism）**的規範，由於科學家們應該欣賞的是一個傑出、富創造力的研究者，即便此研究者具有奇怪的個人習性或是不修邊幅的外表。科學家們彼此可以激烈的爭辯，甚至「撕破」一本研究報告，而此都是依據**系統性質疑（organized skepticism）**的規範。他們通常會傾聽新的想法，不論那些想法有多奇怪。根據**公正無私（disinterestedness）**的規範，科學家將所接受的結果都視為是暫時性的，直到更好的結果出現為止。他們喜歡其他科學家閱讀並批判他們的研究，有些甚至反對匿名審查制度。這是對研究成果**共有主義（communalism）**規範的一種堅持。研究成果共有主義並無法時時生效，特別是當它與利益動機相衝突時。在香煙製造公司、藥廠、及電腦晶片廠工作的科學家，其研究成果的報告被公司主管壓置或延遲發表，因為利益動機凌駕於資源共有主義規範之上。科學家期望在進行研究及呈現研究報告時

資訊箱 1.2

科學界的規範

1. **客觀性**。不論誰進行研究（例如，老或少，男或女），以及不管研究在哪裏進行（如，美國或法國，哈佛大學或不知名的大學），研究僅以其科學特質為基礎來進行評斷。
2. **系統性質疑**。科學家不應該毫無考慮、不加判斷的接受一些新的觀念或證據。他們應該挑戰並質疑所有的證據，並且對每一個研究都仔細的審查。批判的目的並非要攻擊研究者個人，而是要確定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能夠禁得起嚴密且仔細的檢驗。
3. **公正無私**。科學家對於意外的觀察及新觀念，必須保持中立、公正、接納、及開放的態度。他們不應該僵化的投身於一個特定的觀念或看法。而應該接受，甚至於期待，能夠否定他們立場的證據，並且應該接受所有立基於高品質研究的發現。
4. **研究成果共有主義**。科學的知識必須與其他入一起分享；它是屬於每一個人。發現科學知識是一項公共的活動，而其成果乃是公共資產，可被大眾來使用。研究進行的方法必須詳細描述。新知識並無法馬上被正式地接受，直到其他研究者已審閱此新知，並且以一種特別的形式提供給社會大眾。
5. **誠實 (Honesty)**。這是一般的文化規範，但在科學界特別強調這項規範。科學家要求所有的研究都須誠實；欺騙及作假在科學研究中是一項重要的禁忌。

能夠誠實，並且對任何在研究中作弊的人感到驚訝。

科學的方法與態度

你可能聽過所謂的科學方法，也可能會感到好奇它是如何能夠適合所有的科學研究。其實科學方法並不是單一的一件事。它乃是

指科學界所共同使用的觀念、法則、技術、及趨向。此方法起源於科學界的共識。我們將在第4章中來進行社會研究基礎方法的討論。

最好是將焦點放在科學的態度，或是看世界的一種方法。那是一種評價專業資格、以創造力為榮、高品質標準、及努力工作的一種態度。誠如Grinnell（1987: 125）所說：

大多數的人學了有關「科學的方法」，但卻沒有學會科學的態度。雖然「科學的方法」是一種理想的構想，而科學的態度卻是人們觀察世界的方法。從事科學工作包括許多方法；然而是什麼使它們合乎科學的？讓它們能夠被科學團體所接受。

科學的期刊

你可能認識社會學的某些特定學術期刊或特別的雜誌。當科學界發現了新的知識，通常會將它發表於書籍或學術期刊的文章中。對於學術期刊的詳細討論，我們將留到第16章中來進行。研究發現及新知呈現的基本方式，便是透過學術期刊中的文章。它們是科學家與其他人溝通及散播科學研究發現的方法。它們也是知識被熱烈探討的一部分。每一個專業學科或領域，都有超過100種期刊，而每一種期刊中每年都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在將近200種社會學期刊中的一份居於領導地位的期刊，**美國社會學評論**（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每年刊登約65篇文章。因此，期刊文章是研究過程及科學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並非總是被適當的瞭解。

現在我們來思考，當一個研究者完成一項研究時，有哪些事情會發生。首先，研究者必須用一種特別的格式來撰寫研究及結果，以作為其研究報告或論文。通常，研究者會在一個專業協會的會議中提出其口頭報告，如**美國社會學學會**（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並且將報告寄送給一些科學家，請其提供評論及建議。接著，研究者會將報告送給學術期刊的編輯，如**社會學季刊**（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或**社會科學季刊**（th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每一位編輯，都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研究者，他被其他科學家遴選來審查期刊的品質，他會將研究報告的首頁移去（因為上面有研究者的姓名），並將報告送給數位專家做**匿名審查**（blind review）。這些審查者都是科學家，並且都是所審報告此領域或主題的專家。審查之所以稱為「匿名」（blind）乃是審查者並不知道報告的研究者是誰，相同的，研究者也不知道是誰審查其報告。此乃在加強客觀性的規範，因為審查者只能依據報告的特性來作評斷。他們根據思考的清晰、獨創性、良好研究的標準、及對知識體系的貢獻等等為基礎來評估一份研究報告。期刊都想刊登好的及先進知識的研究。審查者將研究報告的評估結果交還給編輯，編輯來決定拒絕、請作者修改、或接受發表此篇報告。

幾乎所有的學術領域都以同僚來審查研究報告或出版品，但並非所有的領域都使用匿名審查的過程。社會學、心理學、及政治科學的所有學術期刊，幾乎都使用匿名審查制度，而且一篇研究報告通常都有三位或更多位學者來審查。相對的，像生物學、歷史學、及經濟學等領域，則使用混合審查的過程；有時審查者知道作者的身份，甚至只有一位或二位學者來審查論文。匿名審查，並使用多位審查者的制度，將延緩審查的過程，而且降低了論文的接受比例（Clements et al., 1995: 446）。這是一種非常謹慎的確保品質管制的方法，如此一來並可促進系統性質疑及客觀性的規範。

有些學術期刊被廣泛的閱讀，並且有極高的評價。它們所接到的論文要比它們所能刊登出來的要超出好幾倍。例如，美國主要的社會科學期刊有：**美國經濟學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美國社會學評論**（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及**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s）等等，它們都只接受所送來的百分之10到15的論文。

甚至有些受人尊重的期刊習慣性地拒絕一半的文章。因此，研究者在文章出版前都會先對期刊文章的特質再加以甄別，而所刊出的文章也僅代表著科學界暫時性的接受。出版一本書則牽涉到不同的審查過程，包括成本、銷售的考量，而且接受率通常更低，大概只有百分之3到6的比例而已（Clemens et al., 1995: 444）。

不像在書報攤上流行雜誌中文章的作者，他們是被付予稿酬的，科學家在學術期刊中所刊登的文章是沒有任何稿費可拿。事實上，他們甚至必須付出一些出版審閱所需的費用。研究者對其研究能夠透過學術期刊而對同事們（例如，其他科學家及研究者）有所貢獻都會感到高興。同樣的，審查者審查文章亦未支領任何費用。他們都認為受邀為審查者是一項榮譽，並且是身為科學界一份子該盡的責任。科學界對在前述重要學術期刊中發表大量文章的研究者給予極高的尊重，因為這些文章確認了這些研究者乃是推進科學界主要目標的領導者，對科學知識的累積有極大的貢獻。

透過這些文章的發表，研究者在科學界中獲得了聲望及榮譽，得到同事的尊敬，並且成為一位造詣頗高的研究者。研究者希望得到同儕的尊敬——即其他獲得良好訓練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都是對研究議題具有廣博學識的人。另外，一份受人尊重的出版及發表記錄，可幫助研究者得到研究基金、獎助金、工作機會、一批追隨的學生、工作條件的改善、及薪資的增加等等。

你可能從未發表過任何一篇文章在學術期刊中，但你可能讀到這些文章。它們都是科學研究系統中的重要組成。大多數的研究成果（例如，大多數的科學新知）最先會發表在學術期刊中。研究者閱讀這些期刊，以學習其他研究者所進行研究的方法、及其所得到的研究結果。你可參與此過程，並能得到新的科學知識。

科學當作是一種轉化的過程

你可以把研究看做是使用科學方法將概念、臆測、與懷疑，有時我們稱之為假設，轉化為科學知識。本書便是在闡釋社會研究的

轉化過程。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經常從猜測或質疑開始，然後將特定的方法與技術應用於此原始資料的分析與瞭解上。過程的最後，所完成的一個價值產物便出現：即科學知識。一位多產的研究者，乃是指能夠大量產生改善人類瞭解世界新知識的人。

你可能開始感到研究過程超乎你的想像。畢竟，研究過程牽涉到許多複雜的技術性技能及強而有力的科學界。然而，進行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則對大多數人來說仍是容易理解的。透過教學及練習，你便能學會如何進行科學研究。除此之外還要能夠吸收到科學的態度或文化，並且更需要去精通如何及何時來應用研究技術。閱讀完本書之後，你應該能夠得此要領。很快的你將可以進行自己計劃的小型研究。

研究過程的步驟

步驟

研究進行的過程需要一系列的步驟。不同的趨向提出了略為不同的研究步驟，但大多數幾乎都遵照此處所探討的七個步驟。（第2章及第4章將含蓋不同型態的研究）

研究過程始於研究者選定一個研究主題——一個籠統的研究領域或議題，像是離婚、犯罪、無家可歸、或有影響力的菁英等等。一項主題對研究的進行而言，恐將失之廣泛。這就是為什麼接下來的這個步驟至關重要。研究者必須將研究主題縮小、或聚焦成一個特定的研究問題，以便能進行研究（例如，「是否越早結婚的人，有較高的離婚率？」）。當學會選擇主題並縮小焦點後，研究者通常檢閱有關此主題或問題過去的研究、或文獻。（第18章我們將探討如何做文獻檢閱。）研究者同時發展出一個對此問題可能性的答案、或假設。在第3章中我們將說明理論對此步驟的重要性。

確定研究問題之後，研究者便計劃該如何完成此特定的研究。

第三個步驟牽涉到決定有關研究進行的許多實務細節（例如，是否該在研究情境中使用調查或觀察、該使用多少研究對象、該問哪些問題等等）。現在研究者便已準備好去蒐集資料或證據（例如，問問題，記錄答案等等）。

一旦研究者完成了資料的蒐集，接下來便是運用或分析資料，以瞭解會產生什麼模式。這些模式或證據將幫助研究者賦予資料意義或解釋（例如，「城市中越早結婚的人，其離婚率越高；但在鄉村地區便不然」）。最後，研究者以撰寫研究報告來告知大眾，報告中詳述研究背景、研究者如何進行研究、以及研究者最後的發現。

這七個完整的步驟簡單呈現於圖1.1中。實際上，研究者很少完成步驟1，大多直接跳到步驟2。研究乃是步驟間需要許多相互協調互動的過程。較後續的步驟可能引發先前步驟的再思考。這個過程並非絕對嚴格的線性過程；在達到研究終點之前，都可能朝幾個不同的方向進行。研究不是突然便結束到步驟7。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而且一個研究的終點，經常會刺激新的思考並翻新研究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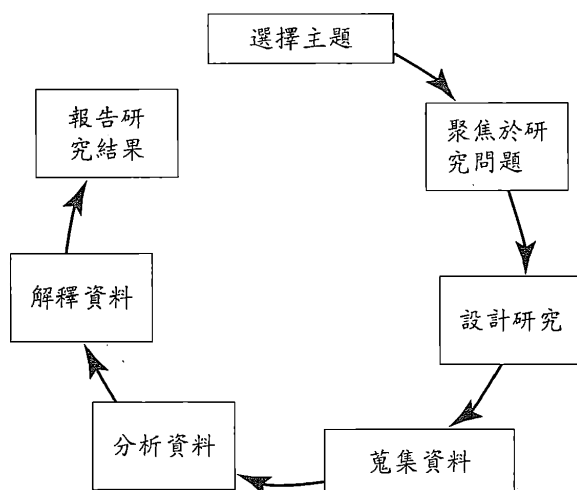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過程的步驟

一項研究必將遵循此七個步驟。研究者在一項研究計畫或特定主題研究中應用此步驟循環。每一個研究計畫乃建立於先前的研究之上，並對廣大的知識體系有所貢獻。科學發現的較大過程及新知的累積，需要許多研究者的許多研究計畫同時共同參與其中。一位研究者可能同時進行多項研究計畫，或是很多研究者可能合作共同參與一項研究。同樣的，一項研究計畫可能撰寫於一篇學術文章或數篇學術文章之中，有時幾個較小的研究計畫可能刊載於一篇文章中。在閱讀完下列所舉的範例之後，將對圖1.1中步驟的摘要更為瞭解。

範例

你可以從研究的最後報告或期刊文章中對研究過程的各個部分有更好的瞭解。研究過程的各個部分都將會於下列四個範例中一一加以說明。前兩個範例是屬於**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studies) (一個是調查研究，另一個則是實驗研究)，另兩個範例則屬**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studies) (一個是歷史研究，另外一例則是使用深度訪談)。

❖ 例1.

在1986年，Williams學院的Philip Hastings發表了一篇文章名為「1948-1984年，大學生的宗教信仰及道德態度的趨勢」。

選擇一個主題 此研究的主題乃是大學生的道德態度。研究者想瞭解從1948年到1984年學生的態度如何的改變？研究者視學生為文化改變的前導者，他們會比年紀較大的成年人容易修正其態度。

聚焦於研究問題 媒體的報導及過去對學生態度的研究指出，學生在1980年代的態度返回了1950年代的**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研究者便想問，宗教及道德信仰是否同樣也發生了轉變？研究者注意到從1920年代到1970年代對大學生所做的研

究中發現：學生宗教信仰的強度發生了轉變。在一般社會與政治議題上，這些轉變與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時期是相平行的。因此，研究者便假設：在1980年代宗教與道德信仰應該會比1970年代更為保守。這是根據其他有關研究學生非宗教議題的研究報告中所發現學生態度有更趨保守而作的推論。研究者相同的也想瞭解此研究與五年前所做的一個類似的研究是否已有不同？

設計研究 在1948年，Philip Hastings在Williams學院以205個學生為樣本，用問卷訪問他們的宗教態度。問卷提出了20個有關宗教信仰的問題。例如，其中有一個問題問到學生：是否相信科學與宗教是相互對立的？相同的也訪問了學生有關宗教教養、家庭收入、及其他背景資料因素。此研究設計乃在後續的幾年中訪問相同學院的學生相同的問題，因此便能發現態度的趨勢。

蒐集資料 1948年所設計的問卷在1967年、1974年、1979年、及1984年也分別訪問了Williams學院中隨機抽出的學生。在1974年增加了有關道德議題的問題。有一個有關道德問題的例子是「反對合法年齡成人間的同性戀法案是否該被撤銷？」

分析資料 研究者想確定在此長時間內他所比較的是相似的學生。到1970年以後，Williams學院只招收男生，因此1974年、1979年、及1984年這三次的受訪者中便沒有女性。另外，1948年那次的訪問中，幾乎有一半的學生是退伍軍人。為了要做比較，退伍軍人的問卷全部捨棄。研究者做了一個百分比的圖表，以呈現每五年一次的訪問有多少學生回答了宗教部分的問題。相同的，也做了一個百分比的圖表以呈現從1974年到1984年有多少學生回答了道德方面的問題。

解釋發現 研究者發現在1967年之前，學生保留父母信仰的百分比很高，但在1967年與1974年間下降，而到1979年與1984年又上升。在大部分的宗教問題中，於1948年與1974年之間在保守的態度上有下降的趨勢（即並不是很保守），但在1974年到1984年間卻有反轉的傾向。而在道德的問題上，問卷中的答案對於性別及

藥物使用上同樣也表現出保守的態度。在1974年到1984年間的填答者，相同的也表示學生對於社會較無道德責任感。例如，在1974年，百分之83的學生同意美國人有責任去保護資源；但到了1984年有相同看法的人卻降到百分之72。因此，研究者得到以下的結論：在1940年代到1970年代早期，Williams學院的學生在宗教態度上表現的越趨自由，但到1970年代中期以後便轉變成較傳統。另外，研究者指出，大學生的宗教及道德態度會依循著國家整體政治氣候而轉變。

報告研究成果 研究報告被撰寫並送交社會力 (Social Forces) 期刊中發表。

❖ 例2.

Matthew Mulford, John Orbell, Catherine Shatto, 及 Jean Stockard (1998) 分別來自於倫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卡內基美倫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及奧瑞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他們進行了一項實驗，並將結果於文章中發表，其標題為「肢體的吸引力、機會、與成就在每日的互動交換中」。

選擇一個主題 研究者想瞭解，是否意識到肢體的吸引力會影響每日的互動與機會在金錢上的報償。根據以往的研究及交換理論 (見第3章)，研究者認為人們經常會根據一個人的外表而相信，具吸引力的人比較有責任感且容易與人合作。

聚焦於研究問題 此研究之研究目的乃是想延伸過去研究中所發現的「月暈效應」(即相信具吸引力的人有更多其他、非相關的能力)。特別是，他們想探討吸引力對在做決定時的影響，此被廣泛使用在經濟學的理论。有一種「囚犯兩難」(prisoner's dilemma) 的遊戲便牽涉到決定與人共同合作或獨自得到報償。研究者想瞭解是否在做決定時會給具有吸引力的人較多財務上的優惠。

設計研究 在奧瑞岡大學學生報中有一則徵求受試者的廣告。

在第一次試驗中，研究受試者可得到20美元。在第二次試驗中，視遊戲結果，他們可贏得另20元或輸掉，但至少可得到5元。大部分的受試者都是大學部的學生，也有一部分市民參與。受試者中大概略超過一半（百分之58）是女性。

蒐集資料 首先，每一位受試者都有一次機會與另一位受試者共同玩遊戲。假如他們同意，他們可以共同合作，或「逃跑」(defect)，或獨自完成。玩許多遊戲表示可以得到許多酬賞。假如兩個人都不願合作，則兩個人所得到的酬賞便很低；假如兩個人一起合作，則兩個人都有一般平均的酬賞；假如一個人願意合作，而另一個人不願意，則「逃跑」(或不願合作)的這個人便可得到高額の酬賞，而願意合作的人卻只能得到很少的酬賞。受試者將自己及其他6位受試者予以評分，分數從1到11，1＝非常具有吸引力，而11＝一點都沒有吸引力。

分析資料 研究者檢視這些決定的結果、酬賞的總額、及具吸引力的排名。女性有一半的人對自己具有吸引力的給分很低(1.5)，而有另一半的人給自己很高的分數(9-11)。認為自己具有較少吸引力的受試者，期待別人與自己合作；然而，自覺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人，較少期待別人與自己合作，不論對方的性別為何。

解釋發現 研究者發現，其他的人較喜歡與具吸引力的人一起玩遊戲，一但在一起玩遊戲時，會表現的與別人更加合作。由於具吸引力的人較不願與人合作，因此他們得到較多的酬賞，因為別人高估了他們的合作態度。具吸引力的人當別人期待與其合作時，他們選擇「逃跑」或獨自進行，所以得到許多酬賞。

報告研究成果 研究者——其專長為政治科學及社會學，來自美國、德國、及英國——將其研究結果刊登於美國社會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例3.

在1991年，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的 John Sutton，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狂熱的政治節約：先進美國中擴張的收容所」。

選擇一個主題 研究的主題乃是精神病收容所中大幅成長的人數，及其與公共政策間的關係。

聚焦於研究問題 此研究的焦點乃是，在1880年代與1920年代之間，美國精神病收容所中的人數呈現戲劇性的成長。此立基於 Gerald Grob 所寫的兩本有關美國精神疾病歷史的書。此兩本書中提出若干文件指出許多犯罪學者、慈善人士、及醫師批評監獄、精神病醫院、救濟院及少年感化院極其殘忍，而在1880年代及1890年代卻將此稱之為改革。除了在刑事系統及救濟院上有一些革新外，在1880年到1923年之間精神病收容所中的人數從40,000人成長到超過260,000，而且人們都害怕「精神病的流行」。Grob認為貧民的救濟院在當時被嚴厲的批評，且大多數都已關閉。然而，在那些貧民所在的地方，卻沒有發展任何福利系統，特別是對那些在救濟院中數以千計的貧窮老人。在這樣的年代，比社會福利方案更優先的辦法，便是將精神病收容所做為唯一對他們開放的機構。在沒有其他替代方案之下，數以千計深陷貧窮之中的民眾便被歸類成精神病患，以獲得食物、庇護所、及照顧。

Sutton的研究乃是以Grob的研究發現為基礎，並在其自己的研究上運用一個理論，他認為政府試圖去擴大回應公共的各種危機，而以此方法增加政府官員的權力。Sutton注意到，在1930年代之前大部分的政府資源都落在州政府身上，因此在州政府中政黨以提供職位任命權及建立職務來擴張其權力。於是，Sutton假設精神病收容所中收容人數的成長比率各州必有很大的差異，全視各州政治權利擴張的需求及可得到的經濟資源而定。

設計研究 Sutton詳細檢視那段時間的歷史脈絡及精神病院的運作情形。同時他也確認各州的統計資料，以測量各州的經濟及政治特性。

蒐集資料 Sutton檢閱那段時期有關精神病學、精神病醫院、

及政府政策等相關的歷史研究。他同時蒐集精神病患的人數、政治的競爭、各州政府的財政、以及其他有關政府特徵等等的量化資料。

分析資料 Sutton他能夠預測到一個州精神病收容所內收容人數大量增長的數量，乃是立基於此州政府的政治與經濟特性之上。精神病人數成長最快的州，其擁有較多的資源、具有強烈的政黨間競爭、較多的老年人口、及較多的城市人口。在此期間，另外在部分州內的民眾獲得聯邦政府的幫助，因為他們或其親屬在美國內戰中為聯軍作戰。因此，Sutton發現精神病收容所成長速度較慢的州，其州內接受聯邦政府這種幫助的人數也較多。

解釋發現 Sutton指出精神病收容所擴張的發生，肇因於聯邦政府沒有解決貧窮的方案。他同意Grob的發現，即由於鬆散的初期精神病患的認定方法，因此許多貧困老人被歸納成精神病患。但Sutton超越Grob成果的則在於其發現上述情形並未在全國普遍發生。精神病人數成長最快的州，則其貧窮人口接受聯邦政府幫助的便較少；而當州政府層級的資源充足到可以建立及支付精神病收容所職員薪資時，則政黨間便彼此競爭來操縱職位的賦予。此時，精神病收容所中大部分的工作職位及建立收容所所需的經費，便由州政府中政黨的公職人員釋放出來。因此，州政府回應數以千計貧窮老人的危機，因為當老舊的救濟院關閉時，這些老人無處可去，於是建立新的精神病收容所及創造出新的職位，而這些收容所很少受到聯邦政府的幫助。這些都是政黨想要擴張其權力，及使用稅入預算來增加依賴此政黨提供工作的人數，以膨脹政黨的階級地位。精神病收容所只不過是解決貧窮人口的一種方法，主要還是在於政黨以控制提供工作職位來增強其在州政府中的權力。

報告研究成果 在刊登於美國社會學評論之前，此研究報告曾在美國社會學學會及史丹佛大學發表。

❖ 例4.

George W. Smith與Dorothy Smith（1998）進行了一項研究，其名為「『男同性戀者』的意識型態：高中同性戀學生的經驗」。

選擇一個主題 George Smith想去瞭解男高中同性戀青少年的經驗。關於同性戀此議題，研究者對其意識型態（如，信念、陳述、及感覺）比對青少年之議題更感興趣，因為它發生在每天的高中生生活中。

聚焦於研究問題 由於過去研究者曾與其他學者對高中的男同性戀及女同性戀者作過一些研究，此研究乃是從過去的研究所萌生出來的。此研究同樣的也產生自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因為研究者
在1970年代也曾是一位青少年同性戀，並在成為一位社會研究者之前他曾任教於高中。研究者的目標是想消遣1990年代高中青少年同性戀者所經歷過的反同性戀的信念及行動。

設計研究 此研究的資料來自於與青少年男同性戀者以開放式、質化的訪談，以瞭解他們的高中生活。訪談對象中，有些仍在學，其他的則要不剛剛畢業、不然便是剛被退學。研究者以四種方法來尋找受訪者：(1)一個星期一次到社區中心的青少年同性戀組織，(2)從社區的外展服務中得到「街頭同性戀青少年」，(3)由同性戀團體介紹，(4)由一位與女同性戀者一起工作的同事推薦。訪談在私下及外面進行。

蒐集資料 資料包含有一份很長且開放式的訪談，而研究者將其錄音並作成記錄。研究者同時檢閱一些同學給他看的筆記或記錄。訪問問題的焦點放在學校生活如何安排、與別人如何溝通、及被同學欺負的經驗。

分析資料 當去分析詳細的訪談記錄時，研究者重新組織受訪者對事件的說明及描述，以顯示其在學校中生活的組織。研究者重新排列關於反同性戀塗鴉（如，在學校置物櫃上的噴畫）、每天的活動（如，參加學校的舞會、同學從休息室中離開）、言語的侮

辱、肢體的欺負、與男性間的關係及男性與女性間的關係、友誼及與非威脅性女同學間的關係等等的訪談記錄轉換成研究報告。研究者並以資料證明學生感到社會的孤立及排斥。他同時記錄對於同性戀的行動及沉默、學校教師及職員對反同性戀行動或聲明處理的失敗、以及特別的身體教育方案。

解釋發現 在質化研究中，資料的分析與解釋是融合在一起的。研究者描述同性戀學生所遇到的情形，他們仍然只能私下的活動，平時他們只能參加所謂「異性的陽剛活動」，例如，參與「女孩子們的笑話」或全男性的田徑活動，而此只會增強傳統（父權式）男性權力的觀念。研究者並且注意到，幾乎所有反男同性戀的活動都來自於其他男性。在學生之中的非男同性戀者，研究者觀察到有一種類型：即在肢體騷擾之前，都會先以言語揶揄。其他的學生通常則先以言語嘲諷或塗鴉的方式來羞辱男同性戀的學生，之後再以肢體動作來加以欺侮。研究者也從學校的教職員瞭解到他們不干預的方法，他們會抓住公共傳播的系統來散發有效的訊息。教職員的立場加上學生次文化的的規範，支持了學校校園中異性戀普遍的優勢主導地位。所有的學生——雙性戀、異性戀、或同性戀——學習並扮演將「男同性戀的意識型態」當做是同學間的一種對話，此種情形實在與學校當局具有消極的共謀關係。研究者注意到男同性戀學生與其他學生互動關係的策略是被邊緣化或排除在主流之外。

報告研究成果 在研究進行後的數年，研究者於1994年死於愛滋病（AIDS），而其最後的研究報告尚未完成。此研究的共同研究者及同事完成最後的研究報告，並將其發表於社會學季刊之中。

質化與量化的社會研究

在本書中你將學到質化及量化此兩種從事社會研究的方式。在前面數章之後，這兩種研究方式將被用來幫助後續章節的整合與組織。每一個分類使用數種特別的研究技術（如，調查、訪問、及歷

史分析)，然而在資料的型態及研究形式間均有一些重疊之處。大部分質化形式研究的研究者探討質化型態的資料，反之亦然。然而有時質化形式研究的研究者也探討量化型態的資料，而反之亦然。兩種方式的研究均被廣泛的使用，但每一種均根植於極不同的社會科學邏輯及趨向（詳細請見第4章）。

很不幸的，有一些缺憾存在此兩種不同研究的遵循者之間。有些人會認為異於自己所使用形式的研究難以令人理解，或是並不適當。因此，Levine（1993: 12）曾寫到「量化的社會研究」才是真正的「社會科學」，而此為他贏得許多反面的「論戰」。而Denzin及Lincoln（1994）卻認為質化研究大量的擴張，並且已迅速取代過時的量化方式的研究。

雖然兩種形式的研究分享基本的科學原則，但兩種趨向仍有非常明顯的不同之處（見表1.1）。每一種趨向均有其長處及限制、適合的主題或議題、及可對社會生活提供顯著洞悉的典型研究。我同意King、Keohane、及Verba（1994: 5）的看法，他們認為最好的研究通常是「結合每一種研究趨向的特色」。

無論採用何種形式的研究，研究者都試圖避免本章先前所探討

表1.1 質化研究VS.量化研究

量 化 研 究	質 化 研 究
測量客觀的事實	建構社會的真實，文化的意義
將焦點放在變項	將焦點放在互動的過程、事件
信度是主要的關鍵	誠實是主要的關鍵
價值理念是中立	價值理念是當下及明確
獨立的情境脈絡	情境限制
許多個案、受試者	很少的個案、受試者
統計的分析	主題式的分析
研究者是獨立的	研究者參與其中

的那些錯誤、系統性的蒐集資料、並且廣泛地使用比較的概念。除了瞭解此兩種形式的研究之外，你將知道研究的範圍，並且以相互補充的方式來運用此兩種形式的研究。Ragin（1994: 92）曾說明兩種形式研究相互補充的方法：

當質化研究方法與量化研究方法相互對照之下，便可看見質化研究方法其共同的關鍵特徵。大部分量化資料的技術在於資料的壓縮。壓縮資料目的是想看見全貌……相反的，質化研究方法是做為資料的強化者，以便能對資料有最深入的瞭解。當資料不斷增加便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個案的主要面向。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研究？

你能夠在什麼地方找到進行社會研究的人？在大學、研究中心、還有政府，有學生、教授、專業研究者、及科學家，還有軍中的技術人員及助理，他們進行了許多社會研究。對一般人而言，研究並非顯而易見。儘管研究結果可能發表在一些特定的刊物或教科書，但專業研究者所發展出來的基本知識及研究方法卻大多成為其他社會研究的基礎（見資訊箱1.3）。

除了這些在大學中的研究人員之外，還有在報社、電視公司、市場研究機構、學校、醫院、社會服務部門、政黨、顧問公司、政府單位、人力資源部門、公益團體、保險公司、或是律師事務所等等，從事研究可能都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許多人都會利用社會研究的技術。比起猜測、直覺、洞察力、及個人經驗而言，從研究中的發現會產生較正確的資訊，比較不會產生偏差的決策。不幸的是，這些正在進行的研究議題有的可能被過度的探討及負荷。例如，在選舉期間由大眾媒體所進行的許多民意調查便會激起民眾的反彈而拒絕去投票，並且不斷去辯論這種民意調查的法律限制。

資訊箱 1.3

實務工作者與社會科學

科學無法而且也不能提供人們固定、絕對的真理。這是因為科學是一個逐步減少不真實面向的緩慢、且不完全的過程。雖然透過小心、系統、且開放心胸態度的一群研究人員，其專心投入致力想完成可能是最佳的解答，但此仍是一個難題。許多人對於必須踏著勤奮的步伐、緩慢的進步、及面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等等都感到不安。他們希望得到立即、絕對的答案。許多人因而轉向求助於宗教的解答或是政客們所提出最後、且決定性的豐富事實。

對於勤勉的實務工作者（例如，人群服務工作者、專業的健康照顧者、司法審判人員、記者、或政策分析者），他們每天必須在工作中做出立即的判斷及決定，這些現象對他們而言具有什麼意涵？他們必須充滿著科學思考，並且依賴常識、個人直覺、或政治教條嗎？並非如此。他們也能運用社會科學的思考。他們的工作雖然艱難，但仍有可能使用社會科學的思考。他們必須認真去嘗試使用目前最佳的知識、小心運用、獨立推理；避免已知的錯誤或謬誤；並且對於提供完整、且最後答案的教條都必須謹慎驗證。實務工作者必須時時接受新知，使用多種資訊來源，不斷質疑支持一項行動方針其證據的真實性。

所以，有些人誤用或濫用了社會研究——運用草率的研究技術、誤解研究發現、草草進行研究以發現先前便已決定的結果等等。但對這種誤用的敵對反應可能是直接針對研究本身，而不是誤用的人。

進行社會研究有許多原因。有些人想要解答實際的問題（例如，班級平均人數從25人減少到20人，是否就能提升學生的寫作技巧？）。另外有些人則想根據訊息來做決定（例如，公司是否該

引進彈性工時，以降低員工的離職率？)。還有一些人則想改善社會（例如，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強暴事件的發生？)。最後，在科學界的專家研究者則想建構有關社會的基礎知識（例如，為什麼黑人的離婚率高於白人？)。

結論

在本章中你學到了什麼是社會研究、研究的過程如何進行、及誰會從事研究工作。相同的你也學到了替代研究的其他方法——這些方法所獲得的是較為迅速、容易、及實用的知識，但是經常包含著誤差、錯誤的資訊、及不正確的推理。而你也可以瞭解科學界是如何運作、社會研究如何融入科學精神、以及科學規範及期刊文章對科學界是何等的重要。你也學到了研究的步驟。

社會研究乃是透過人來進行的工作。除了要注意一些原則、規定、或程序，不要忘了社會研究是一項人性的活動。研究者也是人，就如同我們一樣，他們有強烈的動機想創造及發現新的知識。許多人發現社會研究非常有趣且令人興奮。他們進行社會研究來發現新的知識，並且能夠更加瞭解這個社會世界。不論你是否成為專業的社會研究者、應用一些研究技術於工作之中、或只是運用別人的研究結果，你都將因為從學習研究的過程中得到幫助。假如你能夠開始將自己與研究過程間建立一個好的連結，相信你將使自己更豐富。

Mills在他的**社會學想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 196) 一書中，曾有以下一段非常有價值的建議：

你必須要學習使用你的生命經驗在你的智性工作之中：持續的檢證並解釋它。此種洞悉的能力乃是你自己的中心，你必須專注於自己智性的工作成果，在此之上你才可能繼續工作。

重要名詞

匿名審查	共有主義	資料
公正無私	實證的	月暈效應
系統性質疑	過度概化	提早結束
偽科學	質化資料	量化資料
學術期刊文章	科學態度	科學界
科學方法	選擇性觀察	社會理論
客觀性		

問題回顧

1. 社會研究之外的替代知識來源為何？
2. 為什麼社會研究通常會比其他替代知識來源較佳？
3. 社會研究是否總是對的？它能解答任何問題嗎？試說明之。
4. 科學及神諭如何在不同的年代提供相同目的的服務？
5. 科學界是什麼？又它扮演什麼角色？
6. 科學界的規範是什麼？它們具有什麼影響力？
7. 一項研究成果如何刊登於學術性的社會科學期刊上？
8. 進行一項研究計畫時涉及到哪些步驟？
9. 為什麼說研究步驟並非僵化固定的？
10. 哪些人會從事社會研究？為了什麼理由？

CHAPTER 2

研究的面向

導論

研究的面向

研究的目的

研究的運用

研究中的時間面向

所使用的資料蒐集技術

量化資料

質化資料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學術研究的目標，不論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還是人類學家的目標，都是設法在他們的領域內找到理論問題的答案。相對地，應用社會研究的目標是使用資料，以便做成決策。

——Herbert J. Rub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pp.6-7.

導論

在大學畢業後的三年。Time與Sharon一起共進午餐。「所以，你在社會資訊調查公司擔任研究員，對此新工作進行的如何？你們都做些什麼？」Sharon回答到「現在我們正在進行一項日間照顧的**應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計畫，此計畫中我們是以橫斷式的調查方式，以獲得評估時所需的**描述性（descriptive）**資料」。Sharon對於她們所進行有關日間照顧此主題研究計畫的描述，牽涉到研究的四個面向。本章便要來探討這些面向。

在第1章中我們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精簡的研究風貌。研究會以許多種不同的型態及大小出現。在研究者進行一項研究之前，他或她必須要決定一個特定的研究型態。好的研究者瞭解每一種型態研究的優缺點，縱然最後仍只能選定一種特定型態的研究。

本章中，你將學到有關社會研究的四個面向：(1)研究的目的，(2)為什麼要進行此研究，(3)如何探討時間的面向，(4)研究中運用了哪些研究技術。這四種面向間相互增強，也就是，一項研究目的將會伴隨一些特定的技術與用途。很少有研究是純粹的型態，但透過這些面向的分析將使研究進行的複雜度予以簡單化。

在進行一項研究計畫之前，研究者必須做許多決定。除了要瞭解研究的面向之外，最好準備好將要做那些決定。另外，對於研究型態的覺察，以及這些型態如何配合研究過程等等事項的認知，將使你更容易閱讀及瞭解已出版的研究。

研究的面向

研究的目的

假如你問一個人為什麼要進行研究，你可能會得到許多不同的回答：「我的老闆要我做的」；「這是一份課堂作業」；「我對這

個問題很好奇」；「我的室友認為這個研究是一個好的構想」。幾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進行研究的原因。然而，社會研究的目的可能可以分成三大類，此分類根據研究者想達成的目標——探索一項新的主題、描述一個社會現象、或者是解釋有些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研究可能有多種目的（例如，同時想探索及描述），但是一定有一個主要的目的。

❖ 探索

或許探索一項新的主題或議題是為了學習它。假如這項議題非常新，而且很少有研究者關於它的論述，你正開始於此萌芽階段。此便稱之為**探索性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研究者的目標是系統的說明更多明確的問題，以使未來的研究能為其尋找答案。探索性的研究可能是一系列研究中的首要階段。研究者可能需要進行一項探索性的研究，以便獲得更多訊息來設計並執行第二次、或更多次系統性及更廣泛的研究。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的研究便說明了探索性的研究。AIDS 首次的發現約在1980年，沒有人知道它是哪一種類型的疾病，或甚至它是否是一種疾病。沒有人知道它是由什麼原因所引起的、會如何傳染、或為什麼會產生。工作人員只知道有很多人陸續住進醫院，而且以前從未見過這種症狀，他們無法給予病人任何治療，因此他們很快就死亡。在研究者知道如何明確設計有關這種疾病的研究之前，已經進行了許多醫藥及社會科學的探索性研究。

探索性研究的結果通常並不會發表。而是，研究者會將數個探索性研究做系統性的整理後再將其發表。1985年 Gaither Loewenstein 在社會學季刊中曾經發表過一篇探索性的研究，「新下層階級：現代社會學的困境。」此研究的目的乃是想探討「在美國有一種新興的下層階級，包含先前流動的工作階層的公民」。作者對此在1980年代出現的「新」下層階級非常感興趣，在他進行

此研究之前對於有關新下層階級的相關概念所知甚少。Loewenstein想瞭解是否一種新下層階級正在發展。他研讀其他社會階層的相關研究及理論，檢閱勞動市場的統計資料，訪問了50位年齡從18到30歲公務助理的應徵者，花了16個月與一個年輕勞工階層的團體相處。研究者原先感到困惑的乃是，是什麼引發他們與朋友間非正式的社會互動，而在研究的過程中這些疑惑便加以澄清，且有較為清晰的發展。

探索性的研究很少產生明確的答案。它著重在問題是「什麼」：「此種社會行動的真正內含是什麼？」這種研究很難進行，因為經常缺乏指導方針可供遵循。對於一項主題的所有事情都有潛在的重要性。研究步驟沒有明確的定義，探索方向也經常做改變。對研究者而言可能對此種過程感到相當挫折，研究者可能感到漫無目的，或感覺只是像籠裏的松鼠般不斷的轉動輪子而已。

探索性研究的研究者經常是具有創造力、心胸開闊、及富有彈性的；採取調查的態度，並探索所有資訊的來源。研究者詢問一些富有想像力的問題，並且利用一些意外的發現；這些非期待中及偶然的因素經常有更大的意含。例如，研究者預期發現年紀越小的兒童移民至新國家，其上大學時的負面影響較少。但是研究者意外發現特定年齡層移民的孩子（6歲到11歲之間），相較於比他們大或小的孩子，特別容易受到移民的傷害。

探索性研究的研究者經常使用質性的資料。蒐集質性資料的技術較少與特定的理論或研究問題結合在一起。質化研究傾向於以更開放的方式來使用廣泛的證據及發現新的議題（見資訊箱2.1）。

❖ 描述

也許你對社會現象已有很多成熟的想法並且想去描述它。描述研究對於某一情境、社會環境或關係提供特別詳細的圖像。許多在學術期刊中所發表的社會研究或用於制定社會政策的研究報告大多屬於描述研究。

資訊箱 2.1

研究的目標

探索性	描述性	解釋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對於基本的事實、情境及關心的事情逐漸熟悉 ■ 對於研究情境在心中產生大致的圖像 ■ 為未來的研究形成並聚焦研究問題 ■ 產生新的想法、推測、及假設 ■ 確定研究的可行性 ■ 對未來的資料發展出測量及調查的技術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提供較詳細、清晰的圖像 ■ 探求與先前產生矛盾的資料 ■ 產生一組分類或類型 ■ 澄清一系列的步驟及階段 ■ 提供因果過程或機制的證據 ■ 描述研究情境的背景及脈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驗證一項理論的預測或原則 ■ 增進一項理論的解釋力 ■ 將一項理論延伸至新的議題或主題 ■ 支援或反駁一項解釋或預測 ■ 將某些議題或主題與某一項通則相連接 ■ 確定何種解釋是最佳的

描述研究與解釋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在實務上它們之間有些模糊不清。在描述研究中，研究者從一個有完整定義的主題開始，然後進行研究以正確的描述此主題。描述研究的結果便是賦予研究主題一個清晰的圖像。例如，研究結果可能會指出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持某種特定的觀念或某種特別的行為。例如，有百分之10的父母親對孩子有身體或性虐待。

描述研究試圖對人的類型或社會行動呈現其圖像。例如，Donald McCabe (1992) 研究美國大學生的作弊行為。他對於人們如何合理化其偏差行為感到興趣。他認為這些從事偏差行為的人發展出一些中立的或阻止道德責難的藉口，為了是要維護自我的形

象，並且轉移自我的譴責。McCabe對超過6,000位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二的學生承認他們曾經在一項主要的考試或作業中至少作弊過一次。而且有六種經常可見的作弊方式。當McCabe詢問這些學生為什麼要作弊，他發現學生經常使用四種主要的策略來合理化他們的行為。最常見的策略，一半以上的人會使用，乃是否認自己的責任。在這種策略中，他們通常聲稱他們無法控制一些力量，如沈重的工作壓力或同儕行為的壓力等等，以此來合理化自己的偏差行為。作弊學生的其他藉口包括：又沒有人在此過程中受到傷害、譴責老師、或訴諸同學之間的義氣等等。在第1章中所歸納的學生信仰態度的研究範例，也是一個描述研究，它說明學生信仰的態度如何隨時間而改變。

描述研究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如何」及「誰」的問題上（「它是如何發生的？」「誰參與其中？」）。對於描述研究者而言，其較少將焦點放在發現新的議題或解釋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例如，為什麼學生合理化其作弊行為或為什麼學生擁有特定的宗教信仰），而比較關心事情是如何發生的。

有很多的社會研究都是描述研究。描述研究者使用大部分的資料蒐集技術——調查、實地研究、內容分析、及歷史比較研究。只有實驗研究是比較沒有效用的（見資訊箱2.1）。

❖ 解釋

當面對一個眾所周知並有適當描述的議題時，你可能會對此議題為什麼是以如此的方式存在或發展感到好奇。具有想要知道「為什麼」的欲望，想解釋問題，此便是解釋性研究的目的。解釋性研究乃是建立在探索性及描述性的研究之上，並且進而確認問題發生的原因。不僅是將焦點放在一項議題或提供對事情描述的圖像上，解釋性研究主要是想尋找原因及理由。例如，描述性研究可能發現有10%的父母虐待他們的小孩，然而解釋性研究則更有興趣在瞭解為什麼父母要虐待他們的小孩（見資訊箱2.1）。

Scott South及Kim Lloyd (1995) 進行一項解釋性研究，想要說明離婚率的情形。他們嚐試驗證一項理論，此理論指出當已婚者接觸充足的潛在婚姻替代者時，離婚的機會便會增加。換句話說，人口統計上的因素（例如，可供選擇成為配偶的有效人數）對於婚姻的穩定性具有負向的影響。證據顯示，近來離婚的人數中有很大的比例在離婚前曾經和配偶之外的人有深入的交往。South及Lloyd還發現，在性別比例不平衡的地區，以及全職未婚女性眾多的地區，都具有較高的離婚率。對於這些地區會有較高的離婚率，South及Lloyd的解釋是，這些地區的已婚男性與未婚女性在工作場合中有較多社會互動的機會。這種互動發生在一種強調個人的自我實現及自我選擇，以及允許以離婚來結束不滿意婚姻的社會風氣中。

研究的運用

近一世紀以來，社會學主要發展成兩大分支。其中一派的研究者比較採超然獨立、科學、及學術的取向；而另一派的研究者則較採務實、改革、及行動的取向。這並不是非常嚴謹的分類。分處在這兩派的研究者依然合作並維持有好的關係。有些研究者在其學術生涯的不同階段從此派轉移到另一派。兩種取向的差異主要是環繞在如何使用社會研究此議題上。簡言之，有些研究者將焦點放在運用研究以增進一般知識，而其他研究者則想以研究來解決特定的問題。尋求對社會事實基本特質瞭解的研究乃稱為**基礎研究**（basic research）（也稱作學術研究或純研究）。相對的，應用研究基本上想運用及修正知識，以處理某一特定的實務問題。他們想回答一項政策問題或解決一個急迫的社會問題。

❖ 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增進社會世界的基礎知識。它將焦點放在駁斥或支援某些理論上，這些理論解釋社會世界如何運作、什麼因素使事情發

生、為什麼社會關係循著某種特定方式進行、及為什麼社會發生變遷。基礎研究是許多新科學觀念的泉源與思考世界的方法。這些基礎研究可能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或解釋性的研究；但解釋性的研究最為普遍。

許多非科學研究人員批評基礎研究，並且質疑「從事基礎研究有什麼貢獻？」這些人認為基礎研究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與金錢，因為這種研究沒有直接的功用，也無法解決急迫性的問題。的確，在短時間內，基礎研究所建構的知識經常很難看出其實用性。然而，基礎研究提供知識的基礎及認識，而這些基本原則是可推論應用到許多不同的政策、問題、或研究的領域。基礎研究是大部分研究工具——方法、理論、及觀念——的來源，而這些都是應用研究者需要使用到的。知識上真正重大的突破或超越經常來自於基礎研究。相對於應用研究者而言，因為應用研究者多希望能在下個月或明年便能對問題提出迅速的解答以供利用，然而基礎研究者，他們絞盡腦汁尋找問題的答案，而此往往對思想上的影響超過一整個世紀。

基礎研究者經常問一些似乎不切實際的問題。例如，研究不相關的主題——雞隻致癌的原因——在AIDS被發現以前此問題被研究了好幾十年，但現在卻對AIDS病毒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資訊。1975年諾貝爾獎得主Howard Temin 從事的一項基礎研究，其研究對病毒如何發生作用建立了基礎的認識，並且對許多問題提供了很多啟示，即便這些問題在多年前Howard從事此開創性研究時並不存在。但是如果沒有在超過一百年前就已進行純粹的數學研究，今日的電腦也不可能存在，而在當時這些研究者可能並不知道這些研究的實際應用。

警官、或公務員們為了試圖防止青少年犯罪，或是行為偏差青少年的諮商員，可能會閱讀此與基礎研究有些相關的研究報告——「偏差行為為什麼會發生？」基礎研究很少對實務工作者每天所關注的問題產生直接的幫助。但是，它可能對有關偏差行為的思考方

式與想法產生新的刺激，而這些新的思維方式對實務工作者處理其所面對問題時，可能發生潛在的變革或戲劇性的改變。雖然政策制定者及服務提供者經常感覺到基礎研究與其並無太大相關，但是公共政策與社會服務若未植基於事實確切原因的瞭解上，經常使這些政策或服務效果不彰，甚或誤導至錯誤的方向。

一項新的觀念或基礎知識並非只由基礎研究產生。應用研究亦能產生新的知識。但是，基礎研究卻是滋養知識不斷擴展的必要養分。在科學界中心的研究者進行大部分的基礎研究。

❖ 應用研究

應用研究試圖去解決特定的政策問題，或幫助實務工作者完成任務。對於應用研究，理論較不是中心的議題，在一個限定的情境下對特定的問題尋找解答才是其重點。應用研究經常是一種描述性的研究，而其主要的長處在於立即的使用。

受僱於企業、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健康照顧機構、及教育機構的實務工作者經常進行應用研究。應用研究時常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決定銷售某項新的產品、選擇一項政策而非其他、或是繼續亦或結束一項公共服務方案等等，可能都需要立基於應用研究。

科學界是基礎研究的主要消費者。而應用研究結論的主要消費者則是實務工作者，如教師、諮商輔導員、及個案工作者，或是決策者、如經理、委員會、或公務員。使用應用研究者的人經常是其他人，而不是研究者本身。應用研究的利用可能也會超出研究者的控制。此意謂著應用研究者有一項責任，即將研究發現從科學的專用技術語言轉化成決策者或實務工作者的語言。

應用研究的結果較少進入到公眾領域的出版物中。研究結果可能僅對少數決策者或實務工作者有實質的助益，而這些人決定是否或如何將研究結論應用在實務工作中，並且這些實務工作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明智的運用研究的結論。例如，Neuberg（1988）發現報紙對1960年代及1970年代在西雅圖及丹佛所進行的一項著

名實驗研究「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的研究結論有嚴重的誤解及扭曲。儘管這項研究有嚴重的問題，研究者也提出了警告，但政客仍運用此項研究的結論來為其不當刪除政府運算尋找合理化的藉口。

由於應用研究具有立即的意涵或暗示、或涉及一些爭議性的議題，因此經常產生一些衝突。這個問題並不新奇。例如，在1903年，Ellwood在密蘇里進行一項有關監獄及救濟院的應用研究，並且提出其嚴重不足的證明。他的研究報告引起社會大眾的憤怒，並且被指控其毀謗該州(Turner & Turner, 1991: 181)。

Whyte (1984)在其對奧克拉荷馬的工廠及芝加哥餐廳所做的應用研究中，發現其結果有相互衝突之處。在奧克拉荷馬工廠的研究中，管理部門對擊敗工會比對學習雇傭關係更感興趣。而在芝加哥餐廳所做的研究中，餐廳經營者企圖使其行業有良好的外觀，而比較不在意公開其經營的核心發現。

Merton (1973)曾提出警告說，在主要的政策議題上對應用研究的一些需要，僅僅只是政府官員意圖轉移對其怠惰的批評或延後決策直到政治熱潮退燒後的一種策略。

應用及基礎研究者採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論取向(見表2.1)。基礎研究者強調高的科學標準，並且試圖進行接近完美的研究。應用研究者做比較多的妥協。他們可能會對嚴苛的科學標準讓步，以便取得快速、可用的研究結果。但是，讓步並不是草率研究的藉口。應用研究者擠壓研究進入一個特定的應用情境，並且使科學嚴謹度及實際需要間取得平衡。這種平衡不僅需要具有深入的研究知識，並且需要察覺到妥協科學標準後所可能產生的後果。

❖ 應用研究的類型

實務工作者經常使用幾種類型的應用研究。此處我們將討論其幾種主要的類型。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乃是一種應用研究，它視知識為

表2.1 基礎及應用社會研究之比較

基礎社會研究	應用社會研究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研究的本質是令人滿意的，並且需要由其他的社會學家來評斷。 2. 研究問題與對象有很大選擇的自由。 3. 研究由嚴謹的科學規範來評斷，並且追求最高標準的學術成果。 4. 最主要的考量是研究內部的邏輯與嚴謹的研究設計。 5. 所追求的目標在於對基礎、理論的知識有所貢獻。 6. 研究的成功與否在於研究結果是否能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並且能對科學界的其他人產生影響。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研究是工作的一部分，並由資助者來評價，而其並未接受社會學專業訓練。 2. 研究問題局限於雇主或資助者的要求。 3. 學術的嚴謹性及標準在於研究結果的使用。研究可以是「速成及汗穢的」，或也可能符合高的科學標準。 4. 研究主要的考量在於能把研究發現推論到贊助者有興趣的領域。 5. 研究所追求的目標乃在於實際的效益或研究結論被運用。 6. 研究的成功與否在於研究結論是否被贊助者用於決策的過程中。

來源：摘自Freeman 及Rossi (1984: 572-573)

權力的一種形式，並且打破研究及社會行動間彼此的界線。有幾種不同型態的行動研究，但它們大多具有相同的特徵：被研究的對象參與在整個研究過程之中；研究包含一般的或大眾所瞭解的知識；研究焦點放在**爭權（empowerment）**為目標的權力探討上；研究在探索如何提高意識或增加警覺；並且將研究直接與政治行動緊密結合。

行動研究者嚐試將其本身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關係達到平等，並且反對擁有比其研究對象更多操控的權力、地位、及權威。這些研究者試圖藉由擴大公眾的知覺來提出一個目標或改善實際情況。他們有明確的政治取向，並非價值中立。因為研究主要的目標在於改善研究參與者的生活與情況，正式的研究報告、文章、或書籍便成為次要的目標。行動研究者認為知識發展來自於經驗，特別是社

會政治行動的經驗。他們同樣也認為一般民眾能夠變得對情境更有警覺，並且學會如何採取可以改善情境的行動。

行動研究與批判社會科學取向具有密切關係，批判社會學取向部分我們將在第4章中來加以探討。此種研究吸引了持特定觀點的研究者（例如，環保、激進派、非裔美人、及女性主義者等等）。舉例來說，大多數的女性主義研究都有雙重的使命：藉由改善性別關係來產生社會變遷、以及對知識的進步有所貢獻（Reinharz, 1992; 252）。一位從事性騷擾研究的女性主義研究者，必然會建議改變政策來減少性騷擾事件發生，另一方面讓潛在的受害者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及維護自身的權益。有些情況下，行動研究為保護即將被摧毀的城鎮而涉及去抵制興建水庫的計畫。行動研究者有時與工會幹部及管理者一起努力，重新設計工作，以避免裁員。在發展中的國家，行動研究者為不識字、窮困的農民工作，教導他們知識、研究當地情況、散播對情況認識的察覺、並試圖去改善這些情況。

Hoynes（1997）及Miller（1997）針對「電視第一頻道」中，一個12分鐘的教育性的新聞電視節目進行行動研究。此節目在全美12,000所高中播放給8,000,000個學生觀賞，幾乎佔全美40%的高中生。Whittle傳播公司，其製作此節目，提供學校免費的電視、架線、及衛星接收，但需要學生每天收看此節目，包括2分鐘的廣告。老師們不能預先觀看此節目。在36個研究中的一項研究中顯示，從1995年到1996年其間共播出91個新聞故事，研究者們認為這個節目的內容偏離事實、膚淺、且有偏見。他們聲稱學生正學習如何接受營利主義，而不是去學習如何具有批判性的去思考新聞內容。相同的，學生每年在課堂中收看700則廣告，比「電視第一頻道」所欲播出的教育內容具有更大的影響力。「電視第一頻道」的辯護者宣稱此節目受到學生及教師廣大的喜好，並且沒有任何煙酒及暴力電影的廣告（Honan, 1997）。此篇行動研究發表於媒體倡導的出版物中（Hoynes, 1997; Miller, 1997）。

Gamson（1992）描述在波士頓大學所舉辦的一場行動研究的

研討會，此項研討會吸引了許多社會經濟學及社會正義科系的研究生來參與：

此場研討會的參與者……都是行動主義派的學者，並且以動員民眾的集體行動來解決具體問題為取向。與會者都是曾經或現在正在參與中美洲團結運動、凍結核武運動、平等醫療照顧運動及合理居住空間、勞工運動……研討會的成員撰寫報告，舉行小組討論會，並為各類社會運動組織提供媒體運用策略的諮詢，並且進行研究工作。

第二種類型的應用研究稱為**社會影響評估**（social impact assessment）。其可能是政府部門所需大型環境影響報告的一部分。它主要的目的乃在於估計一項計劃性變遷的可能結果。這種評估可被用於計劃過程，及在替代政策中做選擇。例如，評估地區醫院對地震時的應變能力；確定興建一條主要的高速公路對居住環境的改變為何；評估假如大學生能有20年的期限，並根據其收入多寡來決定償還求學期間所提供的無息貸款，其對大學入學許可及長期貸款的影響。研究人員進行社會影響評估以探討許多結果，而且經常組成一個科際整合的研究團隊進行研究。在許多領域中的影響均可被測量或評估（見資訊箱2.2）。

各種不同型式的賭博在美國已經擴展開來。在1980年時，賭博只要在幾個州中具有合法的地位，而且只有不到一千萬美金的收益。僅僅15年後，幾乎所有的州都視賭博為合法的行為，並且有超過四千四百萬美元的收益。這個道理非常簡單。立法者無須提高稅率便能找到新的歲收來源，並且希望能夠藉此促進經濟發展。賭博業提供了新的工作機會、經濟復甦、並能從賭博的巨大錢財中竊取一部分利益。對立法者而言他們看到了賭博的一些利益：增加就業機會、加強地方經濟、並且不須增稅就能增加政府歲入等等好處。

今天，多數的希望均未實現，而且失望四起。工作機會的成長

資訊箱 2.2

使用社會影響評估研究的領域

- 社區服務（例如，學校的入學人數，警察接獲報案後處理的速率）
- 社會環境（例如，犯罪率，老人自我照顧的能力）
- 經濟影響（例如，所得水準的改變，企業倒閉的比率）
- 人口結構的影響（例如，老人與年輕人口結構的改變、人口的遷移）
- 環境（例如，空氣品質或噪音的改變）
- 健康（例如，疾病發生率的改變、或現存的有害物質）
- 心理的健康（例如，壓力、恐懼、或自尊的改變）

受到限制，而且多數與賭博有關的工作都是低薪、毫無技能的工作。高歲收的預估無法達成，同時多數地區所提供的賭博娛樂高過於需求。同時，金錢轉移自其他行業。而且民眾花錢賭博，使得他們減少對衣物、消費性物品的購買。另外，有些公務員預期將須額外花費更多的錢在法律宣導、社會服務、街道清掃。賭博對低收入者的衝擊最大，而且強迫性賭博行為的社會問題增加。強迫性的賭徒的工作產能降低，雖然只有百分之2到4的民眾拋棄他的家庭，並轉而從事犯罪。當然，也有一些好的個案，例如，有九個人在伊利諾Joliet的賭場投資了7百萬美元。七個月後，他們不僅回收了資本，而且每個月還有\$900,000的利潤。

這些結果是否可預測？任何人能預期到這些結果嗎？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政府官員事先進行高品質的社會影響評估，並且遵循研究結果，便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多數的政府官員接受產業過分的要求，並且堅持自我的幻覺，因為他們依舊忽視或不信任社會科學研究。他們認為少數的社會影響研究具有正確的預測，而且結論毫

無疑問。

評估研究 (evaluation research) 是一種被廣泛使用的應用研究，通常其所針對的問題乃是「它有效嗎？」Smith及Glass (1987: 31) 將評估定義為「立基於證據的基礎上而建立價值判斷的過程。」評估研究問題的例子如：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法是否比講演式的教學法更能增進學習？法定強制拘留方案是否會降低婚姻暴力？彈性工時方案是否會提高員工生產力？評估研究測量一項方案、政策、或做事方法的效力。它通常是一種描述性的研究，但也可以是探索性或解釋性的研究。評估研究者使用許多研究技術（例如，調查，及實地）。如果能使用的話，實驗方法的技術是最有效的。

執行政策或方案的實務工作者，可能為其自己所需要的資訊，或外部決策者的要求而進行評估研究，這些外部的決策者有時對研究者所能進行研究的範圍加以限制，並且操控他們所感興趣的結果。

研究倫理及政治考量的衝突經常在評估研究中發生，因為民眾在方案的調查結果上有著不同的利益考量。研究的結論可影響工作的取得、建立政治流行趨勢、或促進一項替代方案。不滿研究發現的民眾經常試圖打擊研究者、或稱其研究方法過於草率、有偏見、或不適當。除了引發爭議性議題或被打擊外，評估研究者有時在研究之前便已遭受壓力去操縱研究結果。

1960年代的美國許多聯邦新的社會方案不斷推出，評估研究在此同時便迅速發展。多數研究者採取實證主義取向（見第4章），並使用成本效益分析。到1970年代時，多數的聯邦社會方案均委託進行評估研究。但是評估研究亦有其限制。研究報告很少有與同事討論的過程，原始資料很少可供公眾利用，而且其所關注的焦點通常狹隘的選擇輸入及產出，而不是考量方案所可能影響民眾生活的整個過程。除此之外，決策者可以選擇性的使用或忽略研究報告。

在美國職工福利的改革便是立基於評估研究。研究的焦點在於收入總額及管理方案的費用，但並未測量家庭若未完全負起責任，或母親強迫去工作後孩子所受到的傷害等等。決策者及一些政客選擇性的使用一些對家庭收入正向的證據以合理化新制定的法律（Oliker, 1994）。

有兩個例子可說明評估研究的效果。Legge及Park（1994）探討法律對酒後駕車處罰的影響。不同於多數國家，美國州政府對酒後駕車制定公共保險的法律。法律立基於**威懾理論**（theory of deterrence），但各州對威懾的方式有三種不同強調之處：臨檢、嚴格處罰、及立即處罰。在三年期間內，研究者查看州級的保險資料及單一車種的一般情況與保險費率、及深夜時疑似酒後駕車的意外死亡事件。結果顯示嚴格處罰（如高額罰款、及拘留時間）並無成效，但臨檢（如血液中酒精含量）及立即處罰（如吊銷駕照）卻能減少死亡的意外事件。研究者解釋近來所增加的嚴罰，便是政客經常未經實證的研究或沒有配套政策就迅速提高罰責。有許多作法似乎對發現流行的議題及吸收選票較感興趣，而不是真正想要解決酒後駕車的問題。

Wysong、Aniskiewicz、與Wright（1994）評估在美國及其他42個國家的10,000所學校中所實施**反毒教育**（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D.A.R.E.）的成效。研究者注意到此方案廣泛被使用、獲得很多財務支持、並且受到警政部門、學校行政人員、家長團體等等的歡迎。透過警務人員與高年級同學的談話，D.A.R.E.試圖透過增加學生瞭解有關毒品的知識、發展拒絕毒品的技巧、及提昇自我評價，來降低青少年對毒品的使用。研究者調查在印地安那州一所高中的兩組高年級學生團體。一組在七年級時曾參加D.A.R.E.方案，而另一組則無。與過去的研究相符，研究者發現不論是第一次吸毒的年齡、毒品使用的頻率、及自我評價，在此兩組學生中均無持續性的差異。研究者認為此方案所受到的歡迎程度可能導致其在政治上的影響。此方案或許有一些潛在性的效果

(如，其可幫助政客、學校行政人員、及其他人員在道德上感到安慰，並使其有機會能參與反毒的活動)，但對於正式的目標卻不見成效(如，減少青少年吸毒)。

有兩種評估研究：**形成性 (formative)** 評估研究，及**總結性 (summative)** 評估研究。形成性評估研究是對一項方案進行監控或持續性的回饋，以便達到方案管理的目的。而總結性評估研究則檢視方案的最後成果。兩種評估研究均很重要且必需。

評估研究是許多組織(學校、政府部門、及企業等等)行政管理的一部分。在1960年代美國國防部所率先使用的計劃、執行、及預算作業系統(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 PPBS)，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PPBS是立基於研究者可以透過測量所設定目標的達成情形來評估一項方案的一種想法。評估者將方案劃分成幾個構成要素，並分析每個構成要素的成本(工作人員、支出等等)及方案目標的完成情形。例如，婦女健康中心提供一項孕婦教育方案。此項方案的構成要素包括外展服務、教育、諮商、及轉介。方案目標乃在於接觸孕婦、提供懷孕過程的相關教育、接受孕婦對於其懷孕期間所可能產生健康風險及關心事項的諮詢、並提供孕婦有關健康照顧部門及家庭計畫諮詢機構的相關資訊。而評估研究者將會探討方案中每一個部分所花費的成本，並測量目標達成的情形。研究者可能會詢問有多少工時及支出用於外展服務、有多少詢問電話是來自於這些努力、以及是否這些努力會增加目標團體中的婦女前來中心接受服務的人數。

應用研究經常使用兩種研究工具在社會影響評估研究及評估研究上，即**需求評估 (needs assessment)** 及**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在需求評估中，研究者蒐集資料以決定主要的需求有那些及其迫切性。它經常是政府部門或慈善組織在決定助人策略前的先前步驟。然而，在一個關係複雜的社區中，需求評估經常變得非常混亂。研究者可能會遇到兩難困境或一些艱難的議題。

其中有一個難題便是決定哪一個團體為被評估的目標團體。研

究者是否應該將研究的焦點放在公園中無家可歸流浪漢的需求上、因賭馬而喪失大筆金錢的上班族、或是在鄉村俱樂部中飲酒過量的白領階級？最顯而易見的需求可能並不是最嚴重的需求。研究者應該詢問或觀察什麼樣的人？研究者是否應該詢問決策者有關流浪漢的需求？

第二項難題是，民眾可能無法以一種直接與政策或長期解決方案連接的方式來表達需求。研究者可能發現無住宅者們說他們需要住宅。但經過詳細瞭解實際情況後，研究者可能會建議住宅將提供給有工作的無住宅者。因此住宅的需求引發了工作的需求。接著工作的需求可能引發了技術的需求及特定產業的需求。所以，在處理住宅的需求時，可能需要吸引特定的產業及提供職業訓練。顯而易見的一項需求可能與深層的問題或情況相連接。民眾可能不會察覺這些起因。例如，健康照顧的需求可能起因於飲用被污染的水、飲食不均衡、及缺乏運動。這是需要更多的健康照顧或是更好的水質處理、亦或是需要公共健康教育方案？

第三項難題是民眾經常擁有多種需求。假如研究者發現民眾需要環境污染減少、消除幫派、及改善公共運輸，以上哪一項需求是最重要的？一項好的需求評估不僅可以確認目標群體的表達需求、而且也能瞭解其內在需求、以及較為嚴重或普遍的需求。研究者必須探究相關需求間的關聯性，並確認其間的優先順序。

另一項難題是需求評估常會產生政治性的爭議或所建議的解決方案超越地方所能的掌握。有權力的團體可能不希望一些需求形諸於文件或被公布。發現某座城市有許多未被報導犯罪事件的研究者，可能會揭發由商界或市政府所宣傳此城市是安全、管理完善城市的假象。一項證明有種族歧視的需求評估可能使想在公眾面前表現出毫無偏見的市長蒙羞。團體的需求，可能與另一個受惠於製造出此需求的團體有密切的連結。例如賭馬人的需求，可能便與賽馬場的擁有者及員工的需求息息相關。一旦研究者證明某些需求，並對這些需求提出解決方法時，其可能會陷於相互敵對的團體之間。

社會影響研究經常包括成本效益分析。經濟學家發展出成本效益分析，透過成本效益分析研究者估計一項或數項所提出來行動方案未來可能發生的成本及產生的效益，並賦予其貨幣上的價值。簡而言之，其作法如下：研究者確認所提出的行動方案其所有結果。然後賦予每一個結果其貨幣價值。方案的結果可能包括無形的事物，如清新的空氣、低犯罪率、政治的自由、環境的優美、生活壓力低、甚至生活本身。通常，研究者指出各種不同結果發生的機率及可能性。接著，政策制定者或其他相關人士確認負向結果（成本）及正向結果（效益）。最後，成本與效益相互比較，而政策制定者裁決其是否達成平衡。

成本效益分析看來似乎顯示出其中立、理性、及技術決策的策略，但其仍具有爭議性。民眾並不必然對於什麼是正向結果及負向結果有一致的看法。例如，我可能會認為附近道路的拓寬是一項利多，因為它可使我上班時節省許多時間。但是道路兩旁的住戶可能會視此相同的行動是他們的一項成本，因為有些住戶可能需要搬離，而其他人則需忍受噪音、污染、及擁塞之苦。

有兩種方法來決定成本及效益的貨幣價值。**權變評估（contingence evaluation）**是詢問民眾一些事物對他們而言其價值為多少。例如，我想估計會對一般民眾健康造成問題的空氣污染其成本是多少。我可能會詢問民眾：由於氣喘，雖咳嗽得不十分嚴重，但使你兩天無法上班，對你而言其價值多少錢。在一個20,000人的小城中，對一般人而言均認為其價值\$150元，則健康的權變評估或主觀利益便是 $150 \times 20,000$ 每年 = \$3百萬。因此我可能會以此評估來平衡公司所獲得的高額利潤，或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交換允許其所產生的污染。此種評估方法的問題在於民眾很少給予正確的估計，而且不同的人可能賦予非常不同的價值。對一位貧窮的人而言，咳嗽及兩天無法上班可能價值\$500元，但對一個有錢人而言，其可能價值\$10,000元。在此例中，產生污染的公司可能傾向於搬至收入較低的城鎮，如此一來此城居民的生活品質

將更加惡化。

運用此相同的例子，實際成本評估應估計確實的醫療及失業所產生的損失。我會先估計對健康的影響，然後將醫療支出及雇主請臨時工作人員的費用一併加總。例如，假設每個人平均的醫療費用是\$100元，而雇用一位臨時人員需要多支出\$150元，一年中共有10,000人接受過治療，並且雇用了5,000位兩天的臨時人員，因此所支出的費用為： $\$100 \times 10,000 \text{人} = \$1,000,000 \text{元}$ ，再加上 $\$300 \times 5,000 \text{位臨時人員} = \$1,500,000 \text{元}$ ，因此總共是\$2,500,000元。這種方法忽略了痛苦及磨難、不便及間接發生的費用（例如，父親或母親在家陪伴生病的小孩、小孩由於氣喘而無法正常的參與運動）。用這種方法來平衡損益時，造成污染的工廠便需要賺取額外二百五十萬元的利潤。

對成本效益分析而言有一項非常值得注意的議題便是：成本效益分析法假設每件事物均有其價格（學習、健康、愛、快樂、人性的尊嚴、正直等等），並且民眾會賦予其相似的價值。它也引起道德及政治的嚴肅關切。成本效益的計算通常喜歡以高收入者為主，而較不以低收入者或窮人為標準。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因為成本或效益的相對價值乃端視一個人的財富或收入所致。對高收入者而言，節省15分鐘車程到辦公室所產生的價值或效益，高於對低收入者所產生的效益或價值；高收入者的15分鐘是較值錢的。同樣的，在收入較低的住宅區中開路，其所花費的成本要比在高級住宅區中開路要低的多；因為窮人較無財富。

成本效益分析傾向忽略道德政治觀點的問題。例如，拔除絕症病人的維生器具所形成生命喪失的成本與節省龐大維生器具運轉費用間的平衡問題，便是一個道德與經濟的問題。從道德的觀點來看，當決定者與被決定者間有很深的情感依附時，此問題便特別顯著。很少人在這種情境下僅考慮經濟成本及效益的問題。相反的，當被決定的人只是大團體中的一員，或決策者與被決定者間並無直接或個人的接觸時，道德問題便很容易被忽略。即便問題的焦點在

經濟的成本與效益，但道德層面的問題始終存在。

研究中的時間面向

社會研究的另一個面向便是對時間的處理。對時間面向的察覺將有助於我們閱讀或進行一項研究，因為不同的研究問題或議題會以不同的方法來結合時間面向。有些研究是關注於單一、固定的時間點上所發生的事物，並能對其做深入的分析探討。其他另一些研究則提供一個動態的圖像，可以探討一段時間中事件、人群、或社會的關係。量化研究可以被分成兩大類：單一時間點的研究：**橫斷性研究**（cross-sectional research）及複合時間點的研究：**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research）。量化研究在探討一大群個案、民眾或單位，並且測量其有限的特質。而**個案研究**（case study）與量化研究則有明顯的區別。它通常涉及質化的方法，而且在一段有限的時間中將焦點放在一個或少數的個案上。

❖ 橫斷性研究

多數社會學的研究對社會世界乃採取一種快速拍攝的取向。在橫斷性研究中，研究者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點上觀察一項焦點。橫斷性研究通常是最簡潔，而且是花費最少的可供選擇的研究方法。它的缺點在於它無法捕捉社會的過程及其變遷。橫斷性研究可以是探索性的、描述性的、或解釋性的，但它通常比較適合描述取向的研究。McCabe（1992）便曾經做了一個有關於大學生作弊描述性的橫斷研究。

❖ 縱貫性研究

研究者使用縱貫性研究來探討人或其它被研究對象在超過一個時間點上的特徵。它通常比較複雜，並且比橫斷性研究花費要多；但相對它的解釋力也較強，特別當研究者想尋找社會變遷的答案時。描述性及解釋性的研究者較常會使用縱貫性研究。現在我們就

來探討三種類型的縱貫性研究：時間序列研究（time series research）、同樣本多次研究（panel study）、及世代研究（cohort study）。

時間序列研究 時間序列研究是一種縱貫性研究，在此研究中研究者對一群人或其他被研究對象，在不同時間點上蒐集相同型態的資料。研究者可以觀察被研究對象某些特質的穩定性及變化，或能追蹤不同時間下條件的變化。在第一章中曾經提過Hastings及Hodge（1986）所做的研究便是一種時間序列的研究。Marvell及Moody（1995）也使用時間序列的方法來研究增加服刑的時間對槍擊犯罪所可能產生的影響。他們的研究同時也是一種評估研究，雖然很少國會議員以此研究做為他們立法的基礎，所以研究的發現可能對未來的法律或政策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研究者探討美國法律加重槍擊犯罪刑責其所產生的影響。這些法律對槍擊重犯通常處以加重額外服刑時間或是訂定最低服刑期限。此類立法在過去25年中已有49個州有類似的立法。其中44個有此立法的州，Marvell及Moody探討從1971年到1993年此44個州各方面的資料（如，服刑人數、犯罪率、監獄管理、是否槍枝被用於特殊的犯罪等等）。最後他們下了如此的結論「我們幾乎沒有發現證據可以支持加重持槍犯罪的立法可以達成其所想達到降低犯罪率及槍枝使用的目的」（1995: 269）。

同樣本多次研究 同樣本多次研究是一種非常有解釋力的縱貫性研究。進行同樣本多次研究比時間序列研究要困難。在同樣本多次研究中，研究者對完全相同的一群受試者、團體、或組織在不同的時間中進行觀察。同樣本多次研究是很難進行的，並且需要較大的花費。長時間對相同一群人進行研究本來就較困難，因為有的人可能死亡或無法被找到。但無論如何，一項具有良好設計的同樣本多次研究的結果，卻是具有很高的價值。即便是一項短期的同樣本多次研究，都能清楚顯示出一件特別的生活事件其所產生的影響。舉例來說，Umberson及Chen（1994）在1986年到1989年之間研究

2,867人，這些人共接受了兩次訪問。在接受訪問的這三年期間，受訪者中共有207人經歷了喪親之痛。Umberson及Chen發現此生活事件為心靈上帶來許多悲痛、增加了飲酒的數量、並且使健康狀況變壞。

另一項同樣本多次研究是Nagin等人於1995年所做，他們檢視年少時的偏差行為對長期犯罪活動及成年後所產生問題的影響。研究者從倫敦的勞工住宅區中抽選出411位男性受試者，並蒐集分析他們的資料，這些受試者在1961-1962年間，當他們約莫8歲時接受第一次的訪問，直到他們32歲為止，除了其中有8人在此期間死亡外。每兩年這些受試者會接受一次訪問。在此研究期間蒐集有關受試者的人格、背景、及偏差行為等的資料。受試者的家人、老師、及朋友也都在受訪之列。研究者根據受試者自我所陳述的青少年犯罪，而將其分成四組，從未曾有青少年犯罪到嚴重的慣犯。研究結果顯示，那些曾在青少年時有過偏差行為的受訪者，除了較可能飲酒過量及使用非法的藥物外，在其他方面與一般32歲的男子並無顯著的差異。

Orbuch及Eyster在1997年進行了一項同樣本多次研究，研究主要是想瞭解黑人夫妻與白人夫妻他們分別是如何進行家務分工的。受試者共包括199對黑人夫婦及174對白人夫婦，他們於1986年在Michigan郡都申請了結婚證明。研究者只考慮同種族夫妻第一次婚姻的家務分工，並且妻子的年齡均小於35歲。相同種族的訪員在相同種族受訪者的家中進行兩次的訪問。第一次訪問在受訪者婚後4到9個月間進行，第二次則在結婚兩年後進行。在所有的受訪夫妻中，有12%的夫妻在進行第二次訪問前便已離婚，而有16%的夫妻則已搬家或無法找到他們。最後共有264對夫妻完成兩次的訪問。研究者檢視夫妻在性別平等上的規範及不同家務的參與情形（例如，煮飯、洗碗、洗衣等等），並且考慮其教育程度、收入、及外出工作等因素。研究者最後評估性別規範、妻子的資源、及種族，對夫妻家務分工的影響。

研究者發現妻子所擁有的資源（教育及收入）與平等的規範會促進較公平的分工。妻子帶入婚姻中其婚前即具有的資源，並無太多長期的效應；但在婚後期間妻子所獲得的資源確能使家務分工較為平等。不論在規範上或分工上，黑人夫婦都比白人夫婦更為平等。一般而言，白人丈夫比黑人丈夫更抗拒從事家務工作及照顧小孩。當黑人丈夫參與家事時，夫妻會認為這是婚姻的福利；但這種情形並不會在白人夫妻間發生（Orbuch & Eyster, 1997）。

世代研究 世代研究與同樣本多次研究非常類似，但世代研究並不須觀察相同特定的一些人，而是觀察在某個特定時期共同分享相似生命經驗的同一類型的人。世代分析是一種「明確的鉅視分析」，也就是研究者探討某種類型的人，其整體的一些重要特徵（Ryder, 1992: 230）。此研究乃是將焦點放在某個世代、或類型，而不是放在特定個體的身上。一般所使用的世代類型包括在同一年出生的人（稱為出生世代）、在同一時間被雇用的人、在同一年或前後兩年間退休的人、以及在同一年畢業的人。不像同樣本多次研究，對世代研究而言研究者不須找到相同特定的一群人。研究者只須確定研究對象是經歷過相同生活事件的一群人即可。

這裏我們將舉三個例子來說明世代研究的價值。Forest及其同事（1995）發現，美國女性出生的世代影響她們第一次懷孕的時間。其中工作的影響先於婚姻及教育的影響，並且在四個世代中各不相同，此四個出生世代分別是：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二次大戰後初期、及1950年代。在大蕭條的年代，女性擁有較高學歷且工作較長者，越晚生產。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期間，雖然此時工作與否變得比教育程度來的重要。而到戰後初期時，女性較不願意繼續接受大學教育，而傾向於高中畢業後就立即結婚。1950年代比較特別，女性的教育程度及婚前是否工作變得較不具影響力，幾乎大部分的女性在婚後不久便準備懷孕生產。

Morgan（1998）想要發現是否是「女性職業升遷障礙」（glass

ceiling) 或是世代的不同而造成男女之間的薪資差異。研究者檢視了從1971或更早, 到1988至1992之間, 不同世代畢業的男女工程師其薪資資料。在過去的世代, 女性只能賺到較低的薪資; 而最近的世代, 女性與男性薪資差距已見縮小, 因為他們已有一些年資。研究者發現, 近世代中並無性別差異, 而且認為女性薪資是受到工作起始時間的影響, 而較不受到她們職業生涯時間的影響。此研究有一項主要的發現: 整體而言, 男女薪資差異受到世代因素的影響比受到「女性職業升遷障礙」因素的影響大。

Wilhelm (1998) 想瞭解不同世代的美國人其同居的型態。她調查在1947到1964年出生的美國公民共1,187位成年人, 並想探討以下三個出生世代: 1943-1950、1951-1957、及1958-1964。她發現了對同居情況的三個預測因素: 政治的激進主義者、無宗教信仰、及最近的出生世代。特定的一些因素(例如, 無宗教信仰及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對較早的世代是重要的預測因素, 但晚近世代的同居情形與上述因素較無關係。對於早期的世代, 同居依然是相對較少的行為; 但對近世代的人, 同居已成為一種生活型態的選擇。

❖ 個案研究

在橫斷研究及縱貫研究中, 研究者檢視許多被研究對象或單位的許多特徵, 要不就在一特定時間點, 要不便是在一段時間中。在此兩類研究中, 研究者精確的測量被研究對象的一組共同的特徵, 通常是以數字來說明研究成果。在個案研究中, 研究者經過一段時間, 深入探討少數幾個被研究對象的許多特徵。個案可以是個人、團體、組織、社會或政治運動、事件或地理的單位。所蒐集的資料通常較詳細、多元、及廣泛。大多是關於此少數個案的質性資料。質化研究與個案研究並不相同, 但「幾乎所有的質化研究都試圖以深入、及對個案詳細的瞭解為基礎, 來建立其代表性」(Ragin, 1994: 92)。

在個案研究中, 研究者可能集中地探討一個或兩個個案, 或是

相對較少個案的幾個要素。個案研究使用邏輯的分析來代替數量上的歸納。在個案研究中，研究者一個用或少數幾個關鍵個案來證明一個議題，並且仔細的分析研究此（些）個案。研究者考慮個案的特定背景及脈絡，並且檢視其各個部分是如何配合協調的。相對於縱貫性研究，縱貫性研究是蒐集許多單位或個案的資料，然後在眾多的個案中發現模式。研究者是在眾多單位或個案中發現平均值或共同的模式。

個案研究協助研究者將微觀的層面、或個人的活動，與鉅視層面或大規模的社會結構與過程連接在一起（Vaughan, 1992）。「個案研究的邏輯乃在於證明一個一般社會力在一些特別的社會情境中如何形塑及造成一些結果的因果論點」（Walton, 1992b: 122）。個案研究引發個案界線與特性定義等問題。這些問題有助於新的思考及理論的產生。「個案研究有可能會產生最好的理論」（Walton, 1992b: 129）。

研究者蒐集一段時間的個案研究資料。資料蒐集可能超過數月、數年、或橫跨數十年。在第一章中曾提過Sutton（1991）所做精神病收容所的研究便是一個個案研究，此研究以質性資料結合時間序列研究以探討收容所個案成長的情況。Walton（1992a）所做的「西部時代及水資源戰爭」便是以加州歐文村為背景的一個社區個案研究。Walton說到：「我嚐試……透過一個小個案來說明一個大故事」。此社區致力於一項社會抗議運動，其希望控制他們關鍵的水資源及其未來。此抗議活動透過不同的方式，起起落落，前後歷經了超過100年的時間。Walton使用不同型態的資料，包括直接觀察、正式與非正式的訪問、調查、地圖、舊相片及報紙、各種歷史文件、及官方記錄。

另有一個較小範圍個案研究的例子，Smith（1995）研究在1980年代，紐約法拉盛地區的亞洲移民。住在法拉盛（紐約市皇后區的一個社區）的亞洲人從1970年的2,571人（占社區總人口的5.6%）成長到1990年的19,508人（占社區總人口的35.8%）。Smith

探究此改變的原因，並描述其改變的過程及結果。他所蒐集的資料包括調查及官方統計資料、地圖、歷史的報導、及田野工作。

最後一個個案研究的例子是Stoeker在1993年所做有關於明尼亞波利市（美國明尼蘇達州）睦鄰運動的研究。他使用參與觀察，包括參與式的行動研究，並以訪談、口述歷史、市政資料、及書面史料等資料做為補充。在他的研究結論中，Stoeker提出警告，「就如同任何一個個案研究一樣，儘管我們能精確地說明所探討個案的因果過程，但想要推論是非常困難的」（1993: 181）。

所使用的資料蒐集技術

每一位研究者都會使用一或多種技術來蒐集資料。這一節將針對主要的一些資料蒐集的技術做一簡要的說明。在後續的章節中，你將陸續詳細地讀到這些技術，並且學到如何使用這些技術。這些技術或許可以歸為兩大類：量化方式，資料蒐集是以數字的形式呈現；及質化方式，資料蒐集是以文字或圖片的方式呈現。有些技術對某些特定的問題及主題特別有效率。要使研究問題能搭配適當的資料蒐集技術是需要技巧、練習、及創造力的。

量化資料

❖ 實驗

實驗研究使用自然科學研究的邏輯與原則。實驗可在實驗室或真實生活中來進行。實驗研究通常涉及到相對較小數目的人或致力於一個非常聚焦研究的問題上。實驗研究是最有效的解釋性研究。實驗研究經常被限定在研究者所能操縱實驗情境的研究主題。

在大多數的實驗裏，研究者將實驗對象分成兩組或多組。然後，除了研究者所感興趣的研究條件即實驗處遇（treatment）外，其他部分兩組所接受的處理完全一樣。研究者詳細測量兩組的

反應。經由對兩組實驗情境的控制，並只給一組實驗處遇，研究者便可說，組間反應的差異完全來自於不同的實驗處遇。在第一章中曾讀到身體的相互吸引力及金錢酬賞的實驗研究（Mulford et al., 1998）。

Bohm（1990）進行一項研究，想瞭解如果公開支持一個意見是否會阻止其態度的改變。在一項先前的實驗中，研究者提供一組學生對於死刑議題的詳細資料，但另一組學生則得不到任何有關此議題的資訊。研究者讓學生私下填答問卷來測量其對死刑的支持情形。開始時兩組都對死刑表達強烈的支持。但是，幾個月以後，接受詳細有關死刑資料的這組對死刑的支持度大幅滑落。而另一組則沒有改變。在第二個實驗中，研究者同樣將學生分成兩組。在實驗組中的受試者參加一種有關死刑內容的特殊課程，而控制組則參加其他的課程。這次，研究者以要求學生在每一次課程中公開陳述他們對死刑意見的方式來測量實驗組學生對死刑的意見。相對於先前研究中大多數實驗組學生意見的轉變，在此次研究中研究者在一整個學期都未發現實驗組學生意見的改變，並且與控制組也沒有差異。因此，研究者的結論是公開陳述意見抑制了人們對意見的改變，即便人們接受了真實的資訊以支持他們做改變，但仍無法奏效。

❖ 調查

調查的技術經常使用於描述性或解釋性的研究中。調查研究者以問卷詢問民眾問題（以郵寄或親訪的方式），或在訪談的過程中記錄下受訪者的答案。研究者並不操弄情境或條件；受訪者只須簡單的回答問題。在調查研究中，研究者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詢問受訪者許多問題。研究者通常將問題的答案歸納成百分比、或圖表。調查提供給研究者瞭解多數人想法或作法的圖像。調查研究者經常使用樣本或特定一群人中的一個小團體（如，150位學生）來研究，但卻從所選出的小團體的研究結果來推論大群體（如，5,000

位學生)。

調查研究的使用非常廣泛。以下便是喬治亞州所做過的一個例子，該州於1956年將南北戰爭時南方聯邦戰役徽章放在州旗上，因而引起了政治爭議。Reingold及Wike（1998）想瞭解是否誠如有些人所說的，徽章與「新南方」（New South）認同的驕傲有關；或是像其他人所聲稱的是一種種族歧視的直接表達。在1994年的秋天，喬治亞州立大學的應用研究中心從喬治亞州選舉人名冊中隨機抽取了826名居民為樣本，並以電話訪問調查。研究者準備了三個有關於「新南方」認同及二個有關種族態度的問題。同時他們也詢問一些其他的問題（如，教育、年齡、種族、居住在都市或鄉村、政黨、出生於南方等等問題）。研究者發現清楚的種族分隔；四分之三的白人希望保留州旗上的南方聯邦戰役徽章，相反的，有三分之二的非裔美人希望州旗改變。從他們的資料分析中顯示，「新南方」認同與州旗的議題並無關聯；假如有任何關係的話，也只是喜好旗幟的改變而已。年輕人及都市居民也傾向於改變旗幟。只有白人及具有反黑人態度的人強烈希望保留州旗上的南方聯邦戰役徽章。

❖ 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是用於探討文字或符號資料（例如，圖片、電影、歌詞等等）的資訊或內含的一種技術。在做內容分析時，研究者首先確認所要分析資料（例如，書籍、報紙、影片等等）的主體，然後建立一套記錄資料內容特定觀點的系統。這套系統可能包括去計算特定文字及主題出現的頻率。最後，研究者記錄在所分析資料內容中的發現。研究者經常以數字及圖表的方式來呈現他們在資料內容中所測量出來的訊息。這種技術使研究者能夠發現大量資料內容中通常被忽略掉的特徵。內容分析法可用於探索性及解釋性的研究，但最常用於描述性的研究中。

以下以三項研究為例來說明內容分析研究。Lovdal（1989）研

究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間，電視廣告中性別角色的刻板化印象是否有所改變。Lovdal在1988年時連續錄下兩個星期中晚上8點到10點間兩個頻道中的所有廣告，並且將廣告中的產品、情境、主要的演員、及旁白者的性別加以編碼登錄。研究者總共編碼登錄了353則電視廣告。從這些廣告中，研究者發現有91%的廣告具有旁白，並且其中90%是由男性來做旁白。而在1970年代所作的研究中顯示，只有69%的廣告具有旁白，而其中90%是由男性擔任旁白。在此兩個時期中，男性大多為非家庭內用品（如，汽車、旅遊、及相機）做廣告，女性則多為家庭內用品（例如，食物、洗髮精、及清潔用品）做廣告。研究的結論是，儘管十多年來不斷宣導兩性平等的觀念，但廣告的改變相當有限。研究者並指出有其他的研究發現，觀賞越多廣告的孩童，其對性別角色的觀念越傳統。

Taylor及Stern（1997）想瞭解電視廣告是否有將亞裔美人形塑成「少數族群典範」的正向刻板化印象。研究者在1994年中在一個星期的期間內，選擇ABC、CBS、FOX及NBC等頻道中晚上8點到11點間1個小時的時段。他們發現總共有1,313則廣告與人性的典範有關。有六位大學部的學生先接受十週有關廣告登錄編碼的訓練來協助此工作。研究者發現亞洲人在廣告中出現的比率是他們在美國人口中所占比率的三倍，並且在他們所出現的廣告中，幾乎有一半的廣告他們是扮演主要的角色。在有關財富及工作生活（例如，銀行業、辦公室等等）的廣告中，亞洲人似乎過度代表了美國民眾。因此，研究者的結論是：電視廣告強化對少數族群刻板化印象的模範。

Welch及Fenwick（1997）想瞭解大眾傳播媒體是如何報導及呈現犯罪事件。研究者針對1992年到1995年美國四份主要報紙中有關犯罪特別報導文章的表達方式進行內容分析。在105篇特別報導的文章中發現，研究者發現有兩種型態的專家以權威的方式陳述犯罪。實務專家（政治人物、政府的公務人員、及法務人員）做了151則陳述。而學界及非政府專家則總共做了116則陳述。在個別

型態團體中的專家，彼此十分相似，但此不同型態的兩類專家著重不同的議題及觀點。媒體則較仰賴實務專家勝過學界的專家，而基本上是忽略辯護律師。媒體關注的主要焦點乃在於街頭犯罪，而幾乎所有的專家均為男性。相較於學術界的專家，實務專家較喜歡使用「道德淪喪」的模式來強調對犯罪的恐懼、犯罪威脅一個有價值的生活方式，並且較少著墨於社會條件及犯罪之間的關係。研究者的結論在於：媒體與法律的強化具有相互回饋的關係，並且以不同方式來呈現犯罪事件時可促進政治人物對此的探討。

❖ 既存的統計資料

在既存統計資料的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需要找出先前資料蒐集的來源，而其來源通常是政府的報告或之前所做過的調查。接著研究者以新的方式重組或結合資料以適合所進行的研究問題。由於找出資料的來源需要耗費一些時間，因此研究者需要仔細考慮其所找的資料具有何種意含。通常，研究之初，研究者並不知道其有興趣的資料是否有用。有時量化的資料是由已有的調查或其他資料所組成，研究者需要使用各種統計方法來加以重新檢視。此即稱為**次級資料分析**（secondary analysis research）。既存統計資料的研究可以應用於探索性、描述性、或解釋性的目的，但較常用於描述性的研究中。

有兩個研究是使用既存的統計資料來探討產業重組（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間有大量的製造業工作從美國中心城市移出）與暴力死亡間的關係。製造業的工作提供給低技術的民眾基本的受雇機會。Shihadeh及Ousey（1998）探討1990年美國100個城市中100,000人的受雇情況。研究者使用每座城市所做的產業普查，及產業低技術工作普遍性的資料。然後，研究者將產業普查資料與聯邦調查局所出版犯罪報告中的殺人犯罪的資料相結合。研究者發現，對當地居民而言，低技術工作機會的減少與經濟的重大損失直接相關，而經濟的損失對白人及黑人而言，都會與較高的殺人犯罪

率有關。

在相同的研究議題上，Almgren及其同事（1998）研究芝加哥殺人犯罪、自殺、及意外發生的情形。他們對照1970年及1990年75個社區有關出生及死亡記錄的普查資料，並且探討社區中失業率及暴力死亡率之間的關係。同時他們也看家庭組成的改變及社區中種族融合的情形。研究者們從這個研究中學到，失業比種族隔離，與家庭解組及暴力死亡率更有相關。他們同時也瞭解到，各種形式的暴力死亡彼此間都是相關的，或具有共同發生的原因。經濟混亂及暴力死亡間的因果關係越來越強。因此從1970年代的資料中瞭解，經濟蕭條的地區比非蕭條地區具有較多的暴力死亡事件，並且隨時間的演進其關係越來越密切。

Travato（1998）使用現有的統計資料來考驗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社會整合理論。社會整合或隸屬的感覺可能在主要的運動比賽中變得較強烈。因此，在一些研究中都想檢視自殺率與主要的運動比賽（例如，超級杯美式足球）間的關聯。Travato檢視加拿大魁北克省Stanley杯冰上曲棍球賽對自殺率的影響。他預測當蒙特婁隊能打入決賽時，自殺率會下降；但若其提早被淘汰的話，則自殺率會增加。除了對單身男性的自殺率有微幅的改變外，研究者發現並無證據可證明Stanley杯冰上曲棍球賽與自殺率的改變有關。

質化資料

❖ 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

大多數的實地研究都對一小群人進行一段時間的個案研究。實地研究開始進行時通常只有一個很鬆散的研究想法或主題。接下來，研究者便會選擇一個社會群體或地點來進行研究。一旦他們開始接觸所要研究的群體或地點時，他們便在社會情境中採取一個社會角色，並開始進行觀察。研究者在實地情境中進行觀察或互動從

幾個月到幾年。他們與被研究對象逐漸瞭解，並可能進行一些非正式的晤談。研究者每天記下詳細的筆記記錄。在觀察期間，他們會考慮要觀察什麼，並且修正或將想法的焦點放在較為重要的部分。最後，研究結束後便離開所進行研究的實際地點。接下來他們便重讀他們的研究筆記記錄，並且準備撰寫研究報告。實地研究一般也使用在探索性或描述性的研究；其很少用於解釋性的研究。

Fitchen使用實地研究的方法在她〔將要消失的地區、永續發展的場所〕(Endangered Spaces, Enduring Places) (1991)的研究中。她對美國1980年代的農場危機深感興趣。她的研究乃立基於紐約州北部數個鄉鎮及在1985年到1990年之間所做的400次訪問晤談及其間的觀察資料。在許多日子中，她早上六點便離開家去做研究，並在緊接著的16個小時開車到鄉村社區或訪問民眾。她的訪談及觀察通常在村中的咖啡館、養殖場、小學、穀倉、城鎮集會、遊行、社會服務機構、市集、農家、及當地教師的研討會。除了研讀有關農場危機及農業變遷的研究報告之外，Fitch也研讀當地的報紙、統計數據、地方機構的報告、地方政府的報告、及地方團體所散發的小冊子。她訪問當地的編輯及記者、農人、公務人員、教師、倉庫管理員、獸醫師、退休人員、及其他人等。在這五年的研究過程中，有些人她訪問了數次。有些人她單獨訪問，有些人則以小團體的方式在不同的情境下進行多次的訪問——如在餐桌上、大街上、穀倉中、實地中、及辦公室內。

Fitchen安排部分的訪談，而其他的訪談經常是在她停車問路時或因午後陣雨與而被困於小咖啡屋中時偶然進行的。這些訪談均為非正式的，受訪者可自由表達其想法，而且並未預設如何結束（如，不無一組固定的問題、或答案的類型）。她並未使用錄音機，但在訪談間或訪談結束後立即記下非常詳盡的實地記錄。Fitchen探討了許多議題——鄉村居民如何看待他們自己、鄉村的貧窮問題、大型企業在小鎮設立工廠的衝擊、社會服務縮減對當地的影響等等。這本研究報告佈滿了Fitchen實地記錄的引證。此充分顯示

出她完全專注於此研究之中。她在報告中曾說道：

進行這項研究充滿了興奮及樂趣，而我真正的享受到傾聽及追求真理的快樂。而我的許多受訪者對此訪談的互動也有同樣的快樂：有許多受訪者都說到，他們非常高興能有機會說出他們自己的故事。（Fitchen, 1991: 285）

❖ 歷史比較研究

歷史比較研究檢視過去的一段歷史年代或不同文化中社會生活的各種層面。在第一章中曾談及 John Sutton 有關精神病收容所的研究，便是這種類型研究的一個例子。使用這種技術的研究者可能會將焦點放在一段或數段歷史時期，比較一個或多個文化類型，或是將歷史時期與文化類型混合來比較。此種研究將理論與資料蒐集結合在一起。就如同許多實地研究一般，研究開始時研究者通常只有一個很鬆散的研究想法或主題，而在研究過程中逐漸修正並聚焦。研究者經常使用多種證據，包括現有的統計資料、文件（例如，書籍、報紙、日記、相片、及地圖等等）、實地的觀察、及訪談。歷史比較研究可以是探索性、描述性、或解釋性的，而且可以混合這些類型，但通常是描述性的研究。

Gordon Laxer（1989）的研究「開放商業：加拿大外資的根源」（Open for Business; The Roots of Foreign Ownership in Canada）便是使用歷史比較研究。Laxer 想問為什麼身為世界八大工業國之一的加拿大其大部分企業都由外國人所掌控。他將加拿大從十九世紀開始的經驗與美國及歐洲國家加以比較。Laxer 研究許多有關幾個主要國家對工業化歷史解釋的研究報告。他得到以下的結論：加拿大的外資來自於國內的分工，而此分工減弱了國家文化的黏合、無法限制外資進入、減緩市場發展、及僵化的銀行系統。種種原因強化了工業化發展的關鍵時期過度依賴大量的外資。

結論

本章提供社會研究面向的概觀。並介紹研究可依不同的方式加以分類（例如，依據研究的目的、研究的技術等等），而這些研究面向彼此間有些重疊（見表2.2）。研究的面向提供了一份「道路圖」（road map）以瞭解社會研究的知識領域。

下一章將介紹社會理論。在第一章中曾談到社會理論，第二章又再談到。而第三章將說明理論與研究方法之間要如何結合運用，並介紹幾種不同類型的理論。

表2.2 社會研究的面向

研究目的	研究的使用	研究的時間面向	資料蒐集的技術
探索性 描述性 解釋性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 行動研究 ■ 影響研究 ■ 評估研究	橫斷性研究 縱貫性研究： ■ 同樣本多次 ■ 時間序列 ■ 世代分析 個案研究	量化資料： ■ 實驗 ■ 調查 ■ 內容分析 ■ 既有資料 質化資料： ■ 實地研究 ■ 比較歷史

重要名詞

動作取向研究

基礎研究

世代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描述性研究

既有統計資料之研究

應用研究

個案研究

內容分析

橫斷性研究

評估研究

實驗研究

解釋性研究

實地研究

歷史比較研究

需求評估

計劃、執行、及預算作業系統

意外收獲

總結評估研究

探索性研究

形成性評估研究

縱貫性研究

同樣本多次研究

次級資料分析研究

社會影響評估

調查研究

時間序列研究

問題回顧

1. 什麼時候適合使用探索性研究，而它又能完成什麼目標？
2. 描述性研究會產生何種類型的研究結果？
3. 什麼是解釋性研究？它最主要的研究目的為何？
4. 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最主要的差別為何？
5. 誰較喜歡使用基礎研究？而其研究結果較常出現在哪裏？
6. 試說明三種應用研究的差異。
7. 時間序列、同樣本多次、及世代研究有何差異？
8. 成本效益分析所存在的潛在問題有哪些？
9. 什麼是需求評估？進行此種研究有何困難？
10. 試說明質化研究及量化研究的差異。

理論與研究

導論

什麼是理論？

社會理論VS.意識型態

理論的組成

概念

關係

範圍

事實VS.理論

理論

方向

理論的層次

形式理論與實質理論

解釋的形式

理論的架構

理論與研究：動態的組合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理論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藉由概念之助，將經驗排序定位。它也在社會現象研究者面對的各類型「事實」中挑選相關的角度與資料。

——Lewis Coser, “The Uses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p.170.

導論

假設你想瞭解不同種族的民眾，其彼此之間為何有敵意。試著去瞭解它，於是去請教老師，而老師的回答如下：

許多具有種族偏見的人，他們對其他族群所擁有的負向刻板化印象，大多來自於他們的家人、朋友、及在他們周遭的其他人。假如他們缺少與其他群體成員較深入的接觸，或擁有與其刻板化印象相對立的資訊，則他們仍會保有他們的偏見。

這種解釋似乎非常合理，因為他與你所瞭解社會運作的方式相一致。這便是一種小型的社會理論，而且是當研究進行時研究者所經常使用的一種型態。

當你聽到理論這個字時你會有何想法？對學習社會科學的學生而言，理論是最難理解的名詞之一。假如我在課堂上說「今天我們將要來探討有關……的理論」，我想我的學生他們的眼皮便會開始下垂。許多學生心中對理論的圖像便是一種深不可測的東西。我的學生稱它為「使人思緒糾纏混亂莫名其妙的一些專業術語」(a tangle maze of jargon) 及「與現實世界毫不相關的一些抽象概念」。有一本社會理論的教課書 (Craib, 1984: 3)，其導論中曾有一段這樣的話：

理論這個字有時似乎很嚇人，而且毫無理由。許多當代社會理論要不是令人無法理解，要不就是平凡陳腐而毫無意義……很少人對理論感到舒服或以有效的方式使用它。

相對於這些看法，事實上，理論在研究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是研究者的一個不可或缺的伙伴。研究者在不同類型的的研究中以不同的方式來使用理論，但有些類型的理論出現在大部分的社會研究中。這種情況在應用研究及描述性研究中較不明顯，而

在基礎研究及解釋性研究中較常見。簡而言之，研究者將社會世界的運作（理論）與他們系統性觀察所得（資料）相互交織成一份報告。

什麼是理論？

在第1章中，將社會理論定義為一組系統的相關抽象概念或思想，而其濃縮並組織關於社會世界的知識。它是思考社會世界的一種簡潔方式。人們經常創造解釋社會世界運作的新理論。

許多人對社會思想的歷史感到混淆，或大思想家曾經說過什麼有關社會的理論。古典社會理論家（如，Durkheim, Weber, Marx, Tonnies）對於產生創新的思想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他們發展出原始的理論，而這些理論為後代的社會思想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人們研究古典理論，因為這些理論提供了許多立即性的啟發及相關的想法。同時這些理論完全改變了人們理解及看待社會世界的方式。我們研究它們，因為許多天才發明了這些原始的、有深刻見解的觀念，並且根本的轉變了人們如何看待社會世界，但畢竟天才是罕見的。

人們經常在未加清楚說明及歸類的情形下使用理論。例如，報紙的文章或電視報導，在關於社會的相關議題上，時常不加說明文章及報導中包含了哪些理論。一則有關學校實施廢除種族隔離政策計畫的相關困難的報導，便隱含著種族關係理論。同樣的，政治領導者在討論公共議題時，也經常使用一些社會理論。政治人物宣稱，教育的缺乏導致貧窮、或傳統道德價值觀念的式微造成高的犯罪率等等，均是以社會理論在解釋社會現象。相較於社會科學家們的理論，未經科學訓練者的理論便顯得較無系統、結構鬆散，並且難以用實證資料來驗證。

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外行者的理論相較，似乎複雜許多。幸好，所謂好理論的原則乃是簡要，它給予理論很重要的幫助。簡要意謂

著越簡單越好。一項精簡的理論具有最低的複雜性，並且沒有多餘或額外的元素。簡要也說明了一項解釋力越強的理論，其具有最少的元素，並且在兩項具有相同說服力的理論中，越不複雜的越好。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會運用到一些理論，因此問題是「該如何使用理論」，而不是「該不該使用理論」。而且清楚說明研究時所運用的有關理論，將使得閱讀別人的研究或進行自己的研究都更為容易。瞭解理論如何與研究程序相配合，將可產生較佳的研究設計、容易理解整個研究、並能使研究進行的更順利。大多數的研究者都對不具理論基礎或「草率的實證主義研究」給予較低的評價。

理論具有不同的型式及大小。本章中將提供社會理論基本的介紹。在往後的章節中也將會遇到其他的理論。

社會理論 VS. 意識型態

許多人都會發現到社會科學理論與社會政治意識型態間的關係非常具有爭議性，且令人困惑。很少科學界以外的人會去檢證社會理論，但大多數的人都會經由傳播媒體或透過擁有不同觀點的倡導者中接觸到各式各樣的意識型態。由於科學界的人認為理論是澄清或建立科學知識的重要基礎，而當其譴責意識型態是與科學對立，並產生不合邏輯的混淆時，爭議性便經常會產生。由於理論及意識型態分別都具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兩者也都解釋世界中相似的事件，彼此並有一些重疊之處，因此混淆也就容易產生。

在理論與意識型態間具有一些相似性（見資訊箱3.1）。兩者都解釋世界中的許多事件：為什麼犯罪會發生？為什麼有一些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為什麼有些地方的離婚率較高？等等事件。社會科學理論與意識型態，兩者對社會世界的本質都有一些假設。且兩者都關注在社會世界中什麼是或什麼不是重要的，兩者也都具有一套系統的想法或概念，及概念間彼此的特定關係。兩者也都對事務為何以其現存的方式而存在，及需要改變什麼來改善環境等等提出

資訊箱 3.1

社會理論及意識型態

相似性

- 包括一組假設或一個起始點
- 解釋社會世界是什麼，及其如何或為什麼會改變
- 提供系統的概念或想法
- 說明概念間的特定關係，並解釋什麼條件下會產生什麼結果
- 提供概念間一套彼此連接的系統

相異性

意識型態

- 提供絕對必然性的解釋
- 具有完整的答案
- 固定的、封閉的、最終的
- 逃避檢證、有差異的發現
- 對反面的證據視而不見
- 受特定的道德信仰所閉鎖
- 高度的偏袒
- 具有矛盾不一致的現象
- 植基於特定的立場

社會理論

- 條件式的及斟酌後的解釋
- 答案不完整，並承認具有不確定性
- 成長的、開放的、延伸的
- 歡迎受檢證、有正向及負向的證據
- 依據證據而改變
- 與強烈的道德立場分離
- 中立的考慮所有的面向
- 積極尋找邏輯的一致性
- 超然於社會的各種立場

解釋。

一項意識型態便是對社會世界的一種解釋類型。它是一種準理論，但欠缺科學理論所具備的批判特徵。許多意識型態看起來與正統的科學理論十分相似。但意識型態具有一項特點便是：意識型態通常都擁有特定的、強烈的、及毫無疑問的假定。而且意識型態充滿著無庸置疑的絕對事物與規範性的分類（像是對 / 錯、道德 / 不

道德、好 / 壞，等等。) 這些假定可能可以在某種信仰中找到，或是根植於某些特定的社會環境。許多意識型態甚至意在增進或保護社會中某些特定團體或部門的利益。

意識型態是封閉的信念或價值體系，且其很少被改變。它們封閉具有爭議性的證據，並使用循環式的推論。各種意識型態在邏輯的推演上是「不明確的」，並以此來避免不必要的曲解。這也使得它們對顯著的改變具有免疫性。它們的發展能力也極其有限，因為它們對事物已具有完整的答案。在意識型態中，對於斷言事實（理念或價值）是什麼及相信事實應該是什麼之間的界線非常模糊。

意識型態選擇性的呈現及解釋實證的證據。它們經常使用個人經驗或說服力（例如：過度概化、選擇性觀察、及太早下定論）的技巧，而這些技巧都並不符合科學的取向。這使得驗證意識型態的原則或以反向證據來與其比較對照，產生很大的困難。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型態無法承認具有對立證據的存在。即便假如已經累積了許多壓倒性的證據，意識型態也不會屈服或改變。事實上，某種意識型態堅貞的信仰者通常都會排斥或拒絕承認具有其他證據。這些信仰者將嚴格遵循意識型態中核心價值的假設及原則。這是一種「不要以一些事實來混淆我，我知道我是對的」的態度。面對那些意見不一致或謹慎提出所搜集對立資料的人等，意識型態的支持者經常表現出恐懼及敵意。

意識型態與科學理論間的區別將影響一個人如何進行研究。一位研究者永遠無法驗證及表現一項意識型態是真或偽。相反的，研究者可檢證一項科學理論或其部分，並可表現出它們是錯誤的。社會科學理論是可透過實徵驗證的，並且持續在演進發展。研究者試圖直接以證據來面質理論。他們以中立的立場來檢視所有不論是支持或反對立場的相關證據。他們並不確知是否證據將支持某項理論。但如果證據一再顯示無法支持一項理論，則此理論便須被修正或取代。

理論在邏輯上是具有一致性的。若有爭議出現，研究者便會試

圖去解決它。理論也具有開放的特性，經常朝更高的層次持續成長或發展。理論一旦停止發展，便會被與其競爭的其他理論所取代。很少有理論聲稱其具有所有問題的解答。相對的，理論反而包含一些不確定的領域或不完整的知識，而且對這些領域都只能提供部分或暫時性的答案。研究者持續檢證理論，並對其保持懷疑的態度。理論本身超然於任何特定社會團體或社會部門。大多數的理論對特定的社會關係都保有中立的立場。這使得那些利己主義者或持特定社會立場的人經常對理論感到費解。

理論的組成

概念

概念是構築理論的基石。概念就是以符號或文字所表達的一種想法。自然科學的概念經常以符號的方式來表達，像是以希臘字母（如： π ）或方程式（如： $s = d/t$; $s = \text{speed}$, $d = \text{distance}$, $t = \text{time}$ ）。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的概念則是以文字來表達。自然科學理論中奇特的符號經常使人感到緊張，但將日常用語以專門化的方式用於社會理論中，有可能會產生混淆。

我不想誇大以文字或以符號來表達概念時其間的區別。畢竟，文字也是一種符號，只是我們以語言的方式來學習這種符號。高度是你們所熟悉的一種概念。例如，我可以說高度這個字，但我也可以將它寫下來；所發出的聲音及所寫下的文字，都是英語的一部分。高度的概念即是以聲音的方式來表達字母的組合。中文或阿拉伯文的字母、法語的「hauteur」、德語的「höhe」、及西班牙語的「altura」，所有的文字符號都在表達「高度」此相同的概念。就某種意義而言，語言只是一種用聲音來表達想法，或人們在生活中某一時間點所學會而寫下符號的共同協定。學習概念及理論就像學習語言一樣。

概念在生活中無所不在，並且我們時時刻刻都在使用它們。「高度」是從我們每日生活經驗中而來的一個簡單概念。它意謂著什麼？使用高度這個概念十分容易，但描述此概念本身卻是困難的。它代表著有關物理關係的抽象概念。你會如何對一個小朋友或對從其它星球而來對此概念毫無所知的人來說明此一概念。從某一社會理論而來的一項概念，當你第一次接觸它時，對你而言它可能就像外星人一樣。高度是一個物體的特性，是物體其從底部到頂端的距離。所有的人、建築物、樹木、山巒、書等等，都有他們的高度。我們可以測量或比較它。高度可能是零，高度也可隨時增加或減少。就像許多其它字一樣，這個詞也有很多不同的用法。高度可以做以下的表達：戰爭最慘烈的時候、盛夏、流行的潮流等等。

「高度」意指一個抽象的觀念。我們將此觀念與其發聲及寫法結合在一起。原本聲音與所組成的字及概念間並無內在的關聯。此種關聯純粹是武斷的，但其仍然是有用的。人們可以對別人單獨以此符號來表達此抽象的概念。

概念基本上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符號（字或詞），及定義。我們以許多方法來學習其定義。我便是從我父母那裏學會「高度」及其定義。我學會這個概念就好像我學說話及被社會的文化所社會化一樣。我的父母並未給我字典上對此概念的定義。我是透過傳播、非語言的、及非正式的過程而學會的。我的父母告訴我許多的例子；我觀察並傾聽別人如何使用這個字；然後我可正確使用這個字，並真正瞭解它。最後，我便能精通這個概念。

這個例子顯示出人們如何從日常的語言中學會及分享概念。假如我的父母將我從電視及與別人的接觸中孤立起來，然後教我「高度」這個字的概念是「zdged」。則我與別人溝通時必然會產生困難。假如概念是具有價值的話，人們必然會分享概念的用詞及其定義。

日常的文化中充滿著各種概念，但其中有許多概念的定義並不清楚。並且，在某種文化中人們的價值觀及經驗，也可能會限制其

日常的概念。日常所使用的概念經常根植於誤解或迷思。社會科學家從日常文化中採借許多不同的概念，但他們純化這些概念，並加入一些新的概念。社會科學家最先所發展出來的許多概念，均已擴散至較大的文化體系之中，並且逐漸變得較不明確。許多概念，如性別歧視、生活型態、同儕團體、都市擴張、及社會階層，剛開始在社會理論中都是非常清晰、技術性的概念。

我們從個人經驗中發展出各種概念、想法、及觀察。古典的理論家發明出許多概念。在第1及第2章中所舉過的研究範例均包含許多社會科學的概念。其他概念的例子，如家庭系統、性別角色、社會化、自我價值、挫折、及**替代性侵略行為**（displaced aggression）。

社會科學的概念形成一種特殊的語言或專業用語。專家們以專業用語做為彼此溝通的捷徑。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水電工、及汽車修護技師等等，都有他們特別的語言。他們使用其專業術語來指涉他們工作的觀念及目標。我讀了一本有關出版的專業書籍以瞭解他們的專業用語——如字體、切割、網版、長條校樣、初版等等。對於專業人士，專業用語能達到快速、有效的溝通。但專業用語也有其負面的意涵。有些人誤用它，以致於使別人產生混淆、排斥他人、或詆毀他人。對非專業人士使用專業用語，將無法達成溝通；就好像與只會說韓語的人說英語一樣。

有一些概念，特別是簡單的、具體的概念，如書本或高度等，都可以經由一種簡單非語言的過程來定義。但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概念都較為複雜及抽象。他們則必須透過正式、辭典形式定義的方式來定義，而其通常需要建立在其他的概念之上。使用概念來定義其他概念，此可能似乎有點奇怪，但我們一直都這樣做。例如，我將高度定義成從頂端至底端的距離。頂端、底端、距離等等，全都是概念。我們經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簡單、具體的概念，來創造更多抽象的概念。高度是比頂端或底端更為抽象。抽象概念通常指涉我們無法直接經驗到世界上的某種面向。這些抽象概念組織思考，並且

擴大對事實的瞭解。

各種概念有不同抽象的層次。他們是從最具體到最抽象的連續體。非常具體的概念通常指涉日常生活中有形的物體、或熟悉的經驗（如，高度、學校、年齡、家庭收入、或住宅）。而較為抽象的概念是指一些擴散的、非直接表達的理念（例如，家庭解組、種族歧視、社會控制、政治權利、偏差行為、智力、或認知失調）。社會研究者創造許多這些概念，作為理解社會世界較佳的方法。

研究者定義科學概念比我們日常交談所使用的概念更為清晰。社會理論需要有良好的定義的概念做基礎。概念的定義幫助理論與研究做緊密的連接。一個有價值目標的探索性研究，以及所有好的研究，其目的都在澄清及淬煉概念。脆弱、矛盾、或不清晰的概念，都會限制知識進一步的發展。在注意到「幫派」這個概念具有許多不同的定義，且其間少有共識之後，Ball及Curry（1995: 239）認為：

即便有，也只有非常少的幫派研究者及理論家對他們自己定義的策略具有充份的意識，據此他們對幫派的定義具有太多潛在的言外之義，而將關係或結果當作特性或原因來處理，或產生相似的邏輯錯誤。

❖ 概念叢（concept clusters）

概念很少被獨立使用，它們形成相互關聯的集團或概念叢集。對日常語言或是對社會理論也好，都是如此。理論包含相關概念的集合，而且這些概念具有一致性，且相互補充。總而言之，這些概念形成了一個意義的網絡。舉例而言，假設我想討論一個概念像是**都市腐敗（urban decay）**，我便需要一組相關的概念（例如，都市擴張、經濟成長、都市化、郊區、中心都市、都市復興、大眾運輸、及少數民族）。

有一些概念呈現出不同範圍的價值、數量、或總數。這種概念

像是收入的總數、溫度、人口密度、受教育的年數、及暴力程度。這些便被稱做是變項，而我們將在第六章中做探討。其他還有一些概念是表達非變數形式的現象（例如，科層體制、家庭、革命、無家可歸、及寒冷）。理論通常會使用這兩種類型的概念。

❖ 假定

概念包含無法觀察或驗證事情其本質之嵌入的假定或陳述。我們接受它們，並將其視為是一個必要的起點。概念及理論建構在有關人類、社會事實、或一個特定現象其本質的假定上。假定經常是隱藏的、未明確說明的。研究者去深入瞭解一個概念的方法，便是去確認他所立基的假定為何。

例如，書的概念便是假定一套著作的系統，而人們可閱讀這個著作，並且以紙張的方式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假定，書這個概念便無多大的意義。一個社會科學的概念，像是種族偏見便是立基於幾個前題假定之上。這些假定包括，人們以種族傳統來區辨個人，且附加特定的動機及特徵在種族團體中來加以認定其身份，並對於特定動機及特徵的好壞加以評斷。假如種族變成無關的因素，人們將會停止以種族為基礎來區分個人，也不會對特定的族群附加特定的特徵，更不會對某些種特徵作價值上的評斷。果真如此，種族偏見此概念將不再是研究上有用的概念。幾乎所有的概念都包含著有關於社會關係或人類行為的某些前題假設。

❖ 分類

有一些簡單的概念；它們只有一個面向，並且只在單一連續體中變動。另外有一些複雜的概念，它們有多面向或許多從屬的部分。你可將複雜的概念分割成一組簡單、或單一面向的概念。舉例來說，Rueschemeyer及其同僚（1992: 43-44）曾指出民主此概念具有三個面向。民主意謂著(1)以普遍的選舉權來進行規律、自由的選舉；(2)一個被選出的合法政體來掌控政府；及(3)言論及結社的

自由。Rueschemeyer 他們並認為每一個面向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他們將這些面向與以分類，並創造出一組不同類型的政體。三個面向都非常低的政體即為極權主義，三個面向都非常高的政體則稱為民主，此三個面向高低程度的不同組合則稱之為獨裁的或自由的寡頭主義。

分類對許多理論而言都非常重要。它們是單一簡單概念與一項理論間的中點站。它們幫助組織整理抽象、複雜的概念。為了產生一項新的分類，研究者通常會以邏輯的方式，明確說明並結合數個簡單概念的特徵。你最好能透過一些具體的例子來理解這個觀念。

理想型 (ideal-type) 是一種眾所周知的分類方式。理想型是一種單純、抽象的模型，它定義問題中現象的本質。它們是一種心理的圖像，這些圖像定義了一個概念的中心面向。理想型並非是一種解釋，因為它並未說明事情是為何或如何發生。它們較理論小，而研究者使用它們來建立理論。它們是範圍較廣、較抽象的概念，並將範圍較窄、較具體的概念結合在一起。質化研究者經常使用理想型的模式來看所觀察的現象與所使用的理想型是如何的吻合。舉例而言，韋伯 (Max Weber) 發展出一個科層體制概念的理想型。許多人便使用韋伯的理想型 (見資訊箱 3.2)。它將科層體制與其它組織型態 (例如，社會運動、王國等等) 區分開來。它同時也澄清一種人們感到模糊、且難以想像的組織其一些關鍵的特徵。並無任一真實生活中的組織完全與理想型吻合，但此模型卻幫助我們去思考及研究科層體制。

另外一種分類方式乃是**類型學 (typology)**，或**分類學 (taxonomy)**，在這種分類方式中，研究者結合兩種或多種單向的、簡單的概念，如此這些簡單的概念彼此交互結合便形成新的概念。這些新的概念或類型便可表達簡單概念間的複雜交互關係。

類型學中的一個主要優點便是精簡。……一項建構良好的類型學對於在混亂中整理出秩序具有奇蹟般的功能。它並

資訊箱 3.2

韋伯的科層體制理想型

- 它是一個連續性的組織，並藉由一套系統的規則來管理。
- 經營的過程是受到超然的、非個人性的規則來管理。
- 體制內講求分工，不同能力的人被賦予不同的工作職務。
- 普遍的層級權威關係；意即職務層級較低的人受到職務層級較高的人所管理。
- 管理行為、規範等等，都以書面方式呈現。
- 個人並未擁有其職位，更不能買賣其職位。
- 為確保對組織的忠誠，組織中的工作人員一律由組織支付薪資，而不是向服務對象收取費用。
- 組織的財產與個人財產完全獨立分開。

來源：採自 Chafetz (1978:72)。

可將十分複雜、且顯然不相同並屬於數個不同集合的個體，轉換成數個井然有序、十分同質的類型。(Bailey, 1992: 2193)

墨頓 (Robert Merton) 其偏差行為的迷亂理論認為人們可藉由兩個主要的概念來瞭解非偏差行為、或順從行為及偏差行為，這兩個主要的概念是：目標，從文化上將其定義為值得追求的目標、及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這些目標從社會的角度便將其定義為合法性。墨頓便以兩個概念來加以分類：(1) 人們是否接受或拒絕這些目標；及(2) 人們所使用達成這些目標的方法是否合法。他的分類所確認出的偏差或順從行為的類型便是立基於這兩個概念 (見表 3.1)。

順從或非偏差行為發生在當人們接受文化目標的情況下 (例

表 3.1 墨頓的個人適應模型

適應類型	社會的目標	制度性的方法
I. 順從	接受	接受
II. 創新	接受	拒絕
III. 儀式主義	拒絕	接受
IV. 退縮	拒絕	拒絕
V. 革命	新的替代目標	新的替代目標

如，獲得較高的收入），以及使用社會的合法方法來達成文化的目標（例如，找份好工作，及努力工作）。偏差行為的發生則在人們不遵循文化目標的情況下（例如，當某人不去工作而去搶銀行）。墨頓有關個人接納文化目標及所使用達成目標方法的分類歸納了他複雜的概念，並且賦予每個次類一個名稱。舉例來說，退縮意謂著一個人同時拒絕文化目標及達成文化目標的社會合法手段——例如長期酗酒者或宗教的隱士。這種偏差行為的類型拒絕表現出受人尊敬的文化目標及取得財產（例如，房子、車子等等）。他或她同時也拒絕達成目標的合法手段（例如，表現誠實、工作等等）。

第二個例子出於英國社會學學者 Anthony Giddens (1994)，他使用兩個概念來對菁英加以分類，這兩個概念分別是：招募菁英的型態（開放式或封閉式）及在菁英間社會整合（例如，合作、團結等等）的程度（高或低）。透過這兩種概念的交叉分類，他發展出四種新的概念或菁英的類型：**團結型**（solidarity）、**一致型**（uniform）、**抽象型**（abstract）、及**制定型**（established）（見表 3.2）。他在他的菁英大型理論中探討這四種類型的特徵。例如，他認為團結型的菁英類型經常發現在社會主義國家之中，而這些國家都有非常強而有力的共產主義的政黨。

另一個類型學的例子是 Erik O. Wright 更新馬克思（Karl Marx）資本主義的社會階級理論的例子。他注意到，對馬克思而言，不平

表3.2 Giddens的菁英理論

社會 / 政治菁英的類型		招募菁英	
		開放式	封閉式
社會整合	高	團結型菁英	一致型菁英
	低	抽象型菁英	制定型菁英

等及剝削是立基於對三種型態資源的控制：投資（創造資本的財產或資本）、生產組織、及勞動力（如其他人的勞動）。Wright認為社會階級是由社會中的組織所定義的。一個階級社會的組織創造出不同的職位，而這些職位賦予職務擁有者控制此三類資源的權力（見表3.3）。控制所有這三項資源的不同職務擁有者組成了最有權力或統治的階級。在市場經濟中，這就是資本家階級。資本家階級中包括有主要的投資者、財產擁有者、及銀行或企業的總裁。資本家制定各種投資決策（例如，是否或何處建造一個新的工廠），決定如何組織生產活動（例如使用機器人或廉價勞工），以及對其他人下達命令。接近底層的階級乃是由勞工所組成。他們所佔據的職位並沒有對如何投資及組織生產活動有任何的發言權。他們對其他人缺乏權威，並且需要服從命令以保有他們的工作。管理者及督導者，

表3.3 Erik Wright的社會階級系統

社會階級	社會資源的控制		
	投 資	生 產	勞 動 力
資本家	+	+	+
管理者	-	+	+
督導者	-	-	+
勞 工	-	-	-
小資本家	+	+	-

+表示控制資源，-表示無法或較無法控制資源

他們協助資本家，是介於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人。在1800年代Marx發展他的理論時，管理者及督導者只是「準階級」，因為那時他們尚未完全出現。他們控制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社會資源。

Wright的分類也一樣指出馬克思所寫到的有關另一個階級的地位，即小資產階級，其是由小型的自雇者或農場經營者所組成。這個階級的成員擁有並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且除了家人外並未雇用其他人。馬克思認為這個階級會萎縮或消失，但直至今日其仍然存在。像墨頓及Giddens的分類一樣，Wright的分類也同樣顯示出如何將一組較簡單的概念（如，資源的擁有或缺乏）組合成一個較有力的觀念（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階級結構）。

關係

理論包含許多概念、定義、以及一些假定。更值得注意的是，理論詳細指出概念彼此間如何相關聯。理論告訴我們，是否概念間彼此相關聯，如果彼此相關聯，則它們是如何與其它概念相關聯的。另外，理論同時也說明了為什麼某種關係存在或為什麼其不存在。

Beck及Tolnay（1990）發表了一個有關私刑的理論，該理論在說明在1800年代到1930年代間，美國南方白人民眾吊死非裔美國人的行動。他們認為使用私刑與經濟不景氣具有密切關係（即，白人在種植棉花的地區僅能以低價購得棉花），而與黑人犯罪無關（即，非裔美國人的犯罪率並未增加）。他們的理論指出三個概念間的關聯——私刑、經濟不景氣、及黑人犧牲者。

許多理論都對變項間的關係作了因果的陳述，或**命題**（proposition）。「一項命題便是對兩個或更多變項間的特定關係作理論性的陳述，以使我們瞭解一個概念的變化是如何由另一個概念的變化來說明」（Turner, 1985: 25）。那是一種在理論中來表達變項間的關係，例如：白人人口中的經濟不景氣造成群眾以暴力方式來對待非裔美人。當研究者以實證的方式來測試或評估一項關係，此

被測試的關係便稱為假設。經過對一項假設的多次仔細測試後，便可確立一特定的命題，而後科學界便逐漸具有信心來陳述此命題為真。

一項社會理論包含了許多概念、概念間的關係、及一項因果機制或其特定關係的原由。一項因果機制便是對事件如何進行的一項陳述，像是：當人們害怕失敗時，他們便會對那些他們直接的競爭者及具有較少社會或政治權力的人來進行打擊。關係的原由是另一種對假定及命題的邏輯聯結。它可能是一種假定，像是：內戰後，美國南方的白人對其失去所建立的種族社會地位懷有極深的忿怒。這個假定或許與另一項命題是相結合的：對行為偏差者或外團體的人缺乏強而有力、合法、且正式的社會控制力，再加上對行為偏差者或外團體的人的行動有高度挫折感時，將導致一個內團體採取非法但傳統的方法來達成社會控制。命題無法單獨存在；它是相互關聯的概念、關係、及假定所形成的網絡中的一部分。

範圍

有些概念是非常抽象的，而有些概念其抽象程度僅是中等，另有些概念則非常具體。具有許多抽象概念的理論比那些擁有具體概念的理論更能應用到廣泛的社會現象。一個抽象理論性關係的例子：增加規模將產生集中化，而此將導致更多的形式化。規模、集中化、及形式化等都是抽象的概念。它們可以是關於團體、組織、或社會。我們可以將此應用於一個組織或團體，當一個組織或團體的規模越大後，在組織或團體中的權力關係會越形集中，並集中在少數的菁英身上。這些菁英將傾向依賴更多形諸於文字的政策、規則、或法律來控制並組織團體中其他的人。

相反的，最不抽象、最簡單、或最低層次關聯的則是經驗性的推論。其乃是一種簡單的關聯，而此種關聯是非常具體且不法複製的。當研究者歸納了一項他們所觀察出的規則，研究者便會創造出一種關聯。對於某項議題的理論，通常意味著包含有許多的推論，

而這些推論可能便是一些基本的假設。這裏有一個實證推論的例子：我所認識的大多數人中，若開日製的小車，其年齡多在30歲以下。這個推論包含有兩個概念：一為車型，另一為年齡。此推論陳述了一種關係：由車的尺寸及產地所定義出的車型，與一個年齡團體具有關係或關聯。為了使其變成一個完整的理論，則需對其為何會如此發生有更精緻及更廣泛的解釋。

當建構或延伸一項理論，並詳細說明變項間的關係時，研究者需要清楚的去思考有關理論可以應用到的單位的型態、對象、或情境：

大多數理論性的概念都是由一些一般性的名詞所形成的，而且因此可以應用到一些對象範圍。有時這些一般性的主張非常清楚（例如，一項有關族群關係的理論可以應用到所有的族群關係上），而有時這些主張被認為太籠統，因為理論的範圍條件仍未被明確的界定。（Ragin, 1992b: 219）

清楚思考有關理論的範圍將會使理論更有力，並可使研究者能與其他人在溝通此理論時更加清晰。

在一項研究非裔美人膚色與社會階層化的研究中，Keith與Herring（1991）將實證的推論與理論相結合。他們驗證一項實證的推論，他們認為非裔美人若其膚色較淺比膚色較深者擁有較高的學歷及收入。他們發現事實支持他們的推論，但是為什麼會如此？他們的理論填補了這個圖像。他們的理論認為白人比較願意將特權及好處提供給膚色較淺的黑奴，因為此意味著這些人具有部分的白人血統。經過200年來所實施的奴隸制度下，白人間盛行的種族意識型態認為具有白人血統的奴隸擁有較優秀的天分。同時，由於美學的因素，白人貴族喜歡膚色較淺的奴隸為其從事個人性的服務及與其發生性關係。這些關係使得膚色較淺的奴隸比較容易追求到他們的自由。因此，經過多年以後，膚色較淺的非裔美人便有機會獲

得技能、教育、及優勢，而這些是膚色較深的非裔美人所無法獲得的。在奴隸制度結束後，在非裔美人社區的社會菁英中，膚色較淺的非裔美人依舊較為普遍。之後，隨著具有相似教育水準及收入的人們間的結婚，使得膚色與經濟利益間的結合繼續存在下去。藉由理論與奴隸制度下的社會關係、獲得教育的差別機會、及選擇結婚伴侶類型等觀念的聯結，較大的理論使得推論更加豐富。

事實 VS. 理論

有一項討論驗證科學理論的長期性議題，便是事實與理論間的界線。有兩種極端的立場。其中一種極端的立場是未經淬煉的經驗主義論。它的觀點認為事實與理論是完全不同。理論屬於軟性、模糊的智力想像、價值、及觀念等的世界。事實是硬性、確定、未被理論或觀念污染的可觀察事物等實證世界的一部分。觀念或理論則屬於一種思想的世界，這種思想包括幻覺、夢想、想像、推測、及誤解。理論可能會流於推測、幻覺、或想像。為避免此種現象，理論必須透過經驗世界中真實的有形事物來驗證。極端的經驗主義者認為我們所看到的才是真實存在的。這個立場極力主張研究者去改善測量方法，直到研究者能以清澈、完整的洞察力去瞭解另一個人的立場，並且不會受到視覺幻影或視覺的騙術所愚弄。

另外一個相反極端的立場是相對主義論者。此種論點認為我們所認為事實是什麼，則它就是什麼。我們所認為真實的事物強烈受到我們的文化信仰、思考、及心理意像所形塑。我們無法完全逃脫思考的有力影響。我們無法違反硬性、客觀的事實去驗證理論，因為事實是由觀念及理論所形成的。有一個極端的相對主義論者曾經說過：我們的欲望、觀念、及信仰，強烈的扭曲我們的觀察，以致於我們所看到的社會世界包含了一些幻影。我們無法看到我們觀念及信仰不讓我們去看的事物。

有一些研究者採取這兩種極端立場中的一種，但大多數的研究

者多採較中間的立場。這些採中間立場的研究者認為，理論及我們思考的類型影響我們在現實世界中所認為的事實及所觀察的事物。無論如何，確實存在一個獨立於我們觀念及思考的事實。所面對的困難是，我們無法得到一個純淨、簡單、直接、及未經修改測量事實的方法。我們嚐試去獲得事實，但事實永遠被我們的文化信仰、理論、觀念所遮蔽或污染。我們只能看到被扭曲後的意象。我們對事實的觀察是模糊不清的，就好像我們透過彎曲或模糊不清的玻璃來看事物一樣。我們所觀察的事實經常都是一個不完整、非直接、及被扭曲後的表現。

在這方面更深入哲學議題的討論，將在第4章中做進一步的探討。這項討論將在兩方面影響我們如何從事社會研究。首先，此意謂著我們可以容忍某些扭曲。每一個人，除了極端的經驗主義者，都提出警告說：我們對資料的觀點都牽涉到一些扭曲。而這個議題便會變成如何去控制這些扭曲，及這些控制可能達到何種程度或希望達到何種程度。第二個方面，許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所進行的研究，其過程均欲減低或控制人為的扭曲。除了部分後現代主義者之外（見第4章），大多數的學者都相信透過多元、獨立、心胸寬大、及開放溝通的研究者們所進行的許多良好研究，將較能獲得接近真實的研究結果。

理論

理論可以使人相當困惑，因為它具有許多種不同的型式。我們可透過下列的方式來將理論加以分類：(1)推論的方向，(2)其所預解釋社會事實的層次，(3)其為形式上的或具體的，(4)其所採用解釋的形式，(5)其內含的假定及概念所構成的整體架構。幸好，推論的方向、層次、解釋、及架構的所有邏輯的可能組合並非都能發展。最終約莫僅有六個競爭者而已。

方向

研究者意欲建構及檢證理論可從兩個方向來進行。有些研究者是從抽象思考開始。他們非常邏輯的將理論中的概念與具體的證據連接在一起，然後再以證據來驗證這些概念。另一些研究者則以特定實證證據的觀察開始。以證據為基礎，他們逐漸推論，並朝向更廣大的抽象概念來建立。事實上，大多數的研究者都非常具有彈性，他們同時使用兩種趨向在研究的不同點上。

❖ 演繹 (deductive)

在演繹法的趨向上，開始於概念間的一個抽象、邏輯的關係，然後朝向具體實證的證據移動。你可能會有關於世界如何運作的一些想法，並且想以一些具體資料來驗證這些想法。Beck及Tolnay對於私刑的研究便是使用演繹法的邏輯。他們最初以一個有關私刑及經濟危機的理論作出發。此理論建議他們所需蒐集的證據。在他們蒐集並分析資料後，他們瞭解到研究發現支持了他們的理論。

❖ 歸納 (inductive)

假如你使用的是歸納的方法，你便會是以詳細的觀察為出發點，然後朝向抽象的推論及觀念移動。當你剛開始時，可能只有一個主題或一些模糊的概念。而當你開始進行觀察後，你會去修正這些概念，發展實證的推論，並確認初步的關係。你可以從這些植根的觀點上建立理論。在第2章中，曾經提到Fitchen (1991)的研究，她便是使用歸納的推理方法在她的農業危機的研究中。她開始時只有一般的農業危機的概念。逐漸地，當她訪問及觀察越多後，她將她的研究焦點從農業危機擴大到農業社區等更廣泛的議題上。她修正她的一些概念，並產生一些實證性的推論。最後，她發展出一個有關人們如何接受自己為農業社區一員的理論。

另一個例子是Schiffman (1991)的研究。她的研究是有關於

舊金山地區兩個反核團體的研究。她主要的發現是：在相類似政治運動中的不同團體，其所採取不同的策略或行動主要是立基於他們如何定義社會中的權力。研究發現只有在她詳細的觀察中才出現。此發現與其原先的目標並不相同：其原先的目標是去瞭解一個單一的運動組織是如何去解決內部的衝突。誠如她所說的，「我所蒐集的資料迫使我重新去定義這個研究計畫。」理論性的推論透過歸納的方法而產生的便被稱為**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 (見圖3.1)

理論的層次

社會理論可根據研究者想要處理的社會事實的層次而被廣泛的歸為三大類。我們大多數的人都將大部分的時間投入在思考微視的事實、或所看到及互動的個人，而這些思考都是立基於日復一日的基礎上。微視的理論在處理一小部分的時間、空間、或少數的人。而其概念通常不會太抽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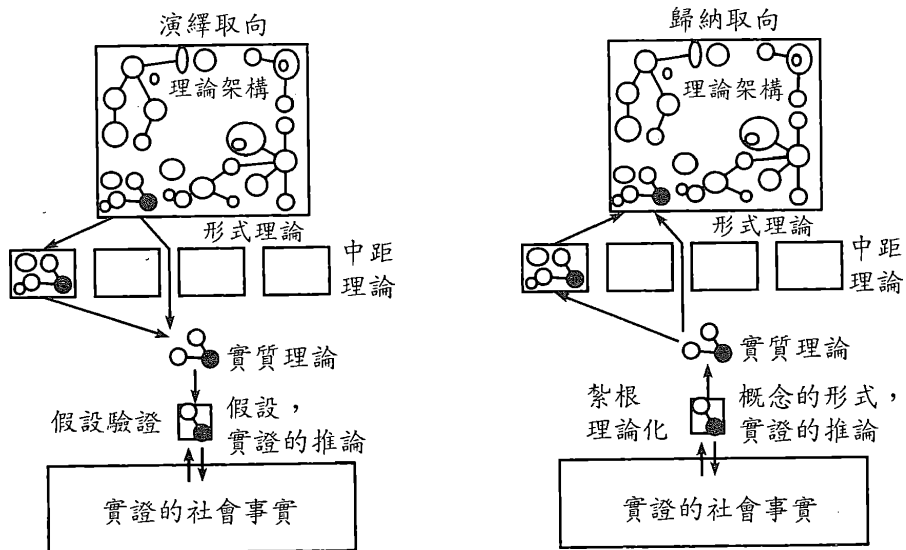


圖3.1 演繹及歸納取向的理論化過程

Erving Goffman有關「面子行為」的理論便是鉅視理論的一個例子。Goffman認為在人與人面對面的互動過程中，人們便參與在一些儀式及習慣的規矩之中。一個人若採取了一個互動的「方式」便意謂著此情境及人的型態是在這種狀況之中。舉例來說，在一個教室的情境中，我採取成為一位親切教師的方式。其他在此互動中的人——學生們——適應了我所呈現出的表情及容貌，並且遵循一種適當的行為。我使用了這些特定的行為來表現出我的容貌（例如，我打開電燈、走到教室前、並對教室中的所有人說話）。同時我也採用了一種特別的態度（例如，我微笑的站著、使用關懷的眼神、並且詢問每個人的生活情況）。在教室中的其他人都配合著這種儀式規矩。此便維持了我面子的社會建構。學生們避免一些特定的話題，表現出敬意，並且容忍一些我所表現出來的小錯誤。這就是在Goffman理論中所謂的「面子行為」。

鉅視層次的理論牽涉到社會中較大群體或集合的運作，例如社會制度、整個文化體系、及整體社會。其使用較多抽象的概念。

Lenski（1966）提出了一項有關社會階層化的鉅視層次理論。此理論解釋了人類社會經歷數千年來社會的不平等。Lenski認為社會生產出剩餘物品的量（即，超出人們最低生活需求的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增加。他進一步認為剩餘物品的成長就像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從簡單的狩獵的形態發展到農業的形態，再發展到現代工業的形態。不平等的增加在於社會中的少數群體控制了這些剩餘的物品。不平等情況在歷史上發展的顛峰是在農業社會，而在工業社會中逐漸減輕，因為現代社會的大小及複雜度將權力分散在更多的社會團體中。因為他們得到了一些權力，各種不同的團體便能得到一些剩餘物資。剩餘物資的分配到更多的團體減輕了社會的不平等。

中型層次的理論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此類理論嘗試將鉅視及微視理論連接起來，或試著扮演一個中介理論的角色。組織、社會運動、或溝通等方面的理論，大多是這種層次的理論。

Collins (1988: 451-466) 提出了一個組織控制的中型理論。此理論發現三種基本的方法來控制大型組織中的人們。此三種方法分別是：強制法（例如，以處罰來威脅他們）、獎勵法（例如，增加待遇）、及內控法（例如，社會化、升遷機會、創造出一種貢獻的次文化等等）。同樣地，組織有五種行政管理的方法來控制人們：(1)監視（例如，照管人們）；(2)檢查成果（例如，生產量）；(3)提出管理規則及操作指南；(4)控制資訊；(5)壓縮環境（例如，強迫何時及何地完成工作）。每一種控制手段及行政管理方法都有負面的影響。舉例來說，當人們感覺到被監視，便會表現出一種儀式性的態度，並且只要當他們覺得被監視便將其表現在工作表面上。以不同的工作任務來控制會比較有成效。對於需要高度創造性及判斷性並牽涉到許多不確定性的各種任務，最佳的控制方法便是內控法（例如，專業的社會化）及資訊的控制（例如，專家們是唯一知道成本的人）。相反的，從事標準化產品此種可預測任務的人們（例如，沖床作業員）最好使用獎勵法（例如，論件計酬）及驗收成果（例如，計算成品數量）的方法來控制。

形式理論與實質理論

我們可以分辨形式理論及實質理論 (Layder, 1993: 42-43)。實質理論是為特定社會事件領域，如青少年幫派、非升學班、或種族關係等等而發展出來的。形式理論是為了在一般理論中較廣的概念性領域而發展的，例如偏差行為、社會化、或權力。假如你想驗證、推論、或擴展一個實質理論，然後你應該會思考在相同實質領域中的個案。例如，你可能會去比較幾個不同的青少年幫派，但你並不需要將一般關於偏差行為的概念加以理論化。假如你想驗證、推論、或擴展一個形式理論，然後你應該會在相同形式領域中思考。例如，你可能會去檢證各種不同形式的偏差行為（醫藥、法律、社會習俗等等）。你可以這麼進行而不需去探討實質領域的細節（例如，奇特的醫療處遇、違反交通規則、公車上的奇特行為等

等)。最後，實質理論與形式理論可以被連接在一起。無須強迫將思考放入單一理論；事實上，「各種實質理論及形式理論的刺激，促進了理論的累積進展。」(Layder, 1993: 44)

解釋的形式

❖ 預測及解釋

一項理論的原始目的便是去解釋。許多人分不清楚什麼是預測什麼是解釋。解釋有兩種意義或用法。研究者將焦點放在理論性的解釋、一項邏輯性的論證，此論證說明了為何有些事情會發生。它是指一項通則。此有研究者的理論性論證或概念間的連接。第二種型態的解釋，即一般的解釋，可澄清某些事情，或以一種方法來描述某些事情，而這個方法可說明這些事情，並令這些事情清晰可理解。例如，一位好老師便是一般的解釋。此兩種型式的解釋可混合在一起。當一位研究者解釋（使清晰）他或她的解釋（例如，一項牽涉到理論的邏輯性論證）時便可能發生此種情形。

預測是對某件事情將會發生的一種陳述。預測比解釋較為容易，而且一項解釋比預測擁有較多的邏輯力量，因為好的解釋同時也能達成預測。一項解釋很少預測一個以上的結果，但相同的結果可能由相反的解釋來預測。雖然預測沒有解釋來的有力量，但許多人卻沉醉於預測的戲劇性的可見物之中。

一項賭博的例子便可說明解釋與預測間的差異。假如我進到一間賭場，持續並正確的預測出下一張所要出現的牌或是在輪盤中所要出現的下一個號碼，其將造成整場的轟動。而我也將賺進一大筆錢，至少直到賭場經理人知道我總是會贏而將我趕出賭場為止。然而，我所預測的方法比我所真的能做到的事實更令人感興趣。告訴你我所預測下一張牌是什麼，會比我如何能預測更具吸引力。

這裏還有另外一個例子。你知道太陽每天清晨升起。在清晨有些時候你能預測是否會有雲會遮蔽東昇的太陽。但是為什麼會這

樣？有一種解釋是：大烏龜背著太陽橫越過天際。另有一個解釋是：有一個天神射出一支閃耀的箭越過天際，那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太陽。現在很少人會去相信這些古老的解釋。現在你所會接受的解釋乃是包含著地球自轉、太陽位置、及太陽系中星球等的一套理論。在這個解釋中，太陽似乎從東邊升起。其實太陽並未移動；它所顯現出來的移動，其實完全是由於地球的自轉。我們生活在一個同時自轉及公轉的地球上。所有這三種解釋都能得到相同的預測：太陽每天都會升起。誠如你所見的，即便是一個不充分的解釋也能做出正確的預測。一項好的理論仰賴一個完整發展的理論，並且實證研究的確認。

現在你可能已經知道「解釋」是什麼，我們可以將討論的焦點轉換到研究者解釋的三種形式：因果、結構、及解釋。解釋的形式牽涉到一位研究者想要以什麼方式告訴別人為什麼社會事件會發生，或是為什麼各種社會關係會被認定為是一種特定的型態。

❖ 因果解釋（Causal Explanation）

因果解釋，最常見的解釋形式，其被用於當關係中其一為原因或影響因素。我們在每日的言談中經常用到它，但日常言語通常較為草率及模糊。當我們說其為原因，到底我們所指為何呢？舉例來說，你可能會說貧窮導致犯罪，或道德淪喪導致離婚率增加。這並未說明導致的過程是如何或為什麼會產生。當探討因果關係時，研究者嚐試以更明確及更清晰的方式來說明。

哲學家們對於原因此概念的爭辯以有很長一段時間了。自從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David Hume（1711-1776）的作品問世起，其便成為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觀念。有些人認為因果關係可在現實的經驗世界中發生，但其無法被證明。因果關係存在客觀的現實事物中，而研究者們只能試著去發現證據。其他人則認為，因果關係只是存在人們心中的一個的觀念，只是一個心靈的建構，而不是存在真實世界中的某些事物。持此第二種立場的人認為因果關係只是對

於所存在世界在思考上的一種較為方便的方法。許多研究者探討因果關係，而不想陷入哲學的爭論。

你需要三件事情來建立因果關係：事件發生的時間次序、關聯、及排除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見資訊箱3.3）。第四個內含的條件乃是一個假定，即此因果關係非常合理，或適合較廣泛的假定或一個理論性的架構。讓我們來檢證這三個基本的要件。

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是指原因必須發生在結果之前。此常識的假定賦予了因果關係的方向性：從原因到結果。你可能會問到：原因如何能發生在其所影響的結果之後？當然不行，但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僅是因果關係所需要件之一。時間序列僅是因果關係的必須但不是充份要件。有時人們錯誤的談到因果關係時只立基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而已。舉例來說，一位職業棒球投手，在比賽前親吻了他的妻子，而此場比賽其投出了一場無安打比賽。親吻發生在無安打比賽之前。這是否就意謂著親吻是其投球表現的原因？這是非常不可能的。再舉另一個例子，在1968年就在太陽黑子頻繁活動後的一天，分別有四個不同的城市發生了種族暴動事件。此時間序列無法將太陽黑子的活動與種族暴動之間建立起因果關係。畢竟，所有先前人類的歷史必然發生在某些特殊事件之前。時間序列的條件簡單的排除考慮一些潛在的原因，而這些原因在時間上是後來才發生的。

建立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通常並不容易。在橫斷式研究中，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是很難處理的。舉例而言，一位研究者發現教育程度高者比教育程度低者較無偏見。高教育程度能減少偏見嗎？或是偏見多的人避免接受教育或缺乏學業成就的動機、自律、及智慧？這裏還有另外一個例子。在我班上學業成績較高的學生說我是一個非常優秀的老師。是不是得到高分讓他們高興，所以說我是一個好老師呢（即高分導致高的評價）？或是我真的做得很稱職，所以學生努力用功而學到很多，而反應在學習成績上呢（即他們學習導致他們能獲得高分）？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為了要解決

資訊箱 3.3

因果關係的三要素

我讀到了有幾個政治人物去訪問了一所在芝加哥的天主教學校，而這所學校在辦學教育上比其他的公立學校都成功。隔天，這些政治人物召開了一個記者會，主張訂定新的法律及對天主教學校課稅的新方向。就一個對孩子們能獲得更好教育的人，我對這個報導非常感興趣，但以一位社會學家而言，我以非常批判的觀點來評估它。這些政治人物的理論是天主教學校比公立學效產生更好的學習效果。其具備了因果關係的兩大要素：時間序列（首先孩子們去上天主教學校，然後改善了其學習效果），及關連（這些上天主教學校的孩子其學業表現比上公立學校的孩子好）。社會研究者知道這些資訊並不充分。首先這些社會科學家們嚐試排除其他替代的解釋，然後試著去瞭解此因果關係的機轉（mechanism）（即，是什麼因素讓天主教學校能夠幫學生學習到更多）。舉例來說，這些政治人物未能排除此替代解釋，即在此兩個不同類型學校中的孩子有不同的家庭環境，而家庭環境會影響學習，而此導致了學習上的差異。假如家庭環境（例如，父母的教育程度及收入、家庭的宗教信仰及信仰的強度、雙親或單親家庭、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關心程度等等）對在此兩個不同類型學校中的孩子來說都相同的話，則這些政治人物的立論是正確的。但假如家庭環境都不一樣的話，則這些政治人物便犯了大錯。不幸的是，政治人物很少接受社會研究的訓練，並且經常做快速且高宣傳性的決定，而並未仔細的推理或耐心的做清晰的實證研究。幸運地，社會學家James S.Coleman及其他研究者已經對此議題進行深入的研究（見Coleman及Hoffer, 1987）。

這個問題，研究者需要帶入其他的資訊或設計一個研究來驗證此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

簡單的因果關係是單向性的，從原因到結果單方向的運作。多數的研究探討單向性的關係。許多複雜的理論明確的說明交互的因果關係——也就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或同時發生的因果關係。舉例來說，努力學習使得學生獲得好的成績，但獲得好的成績同樣也激勵學生繼續努力學習。許多理論經常在描述交互或反饋的關係，但其卻很難去驗證。有些研究者稱單向的關係為**非循環關係**（nonrecursive），而互惠關係為循環的關係。

研究者也需要以關聯來確立因果關係。兩個現象若以同一模式一起發生或似乎一起發生，則其具有關聯。人們有時將**關係**（correlation）及**關聯**（association）混淆了。關係具有特殊技術性的意義，而關聯卻是一個較一般性的觀念。**相關係數**（correlation coefficient）是一種統計上的測量，指的是關聯的量，但卻有許多方法來測量關聯。有時，研究者稱關聯為**共同變異**（concomitant variation），因為兩個變項同時變化。圖3.2呈現出有38個人來自於低收入地區，而另外有35個人來自於高收入地區。你能看出種族與收入之間的關聯嗎？

誤將關聯視為因果關係的人，比把關聯與時間序列混淆的人更多。舉例來說，當我還在大學念書時，在星期五所舉行的考試我得到高分，但在星期一所舉行的考試我卻得到低分。則星期幾與考試成績間便具有關聯，但其卻不意謂著星期幾導致了考試的成績。而這理由是每個週末我工作了20個小時，所以星期一時我都很疲倦。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是，直到1960年代末期印度嬰兒的出生數量持續成長，然後到1970年代時趨緩。而在美國，直到1960年代末期開美製汽車的人數持續成長，然後到1970年代時趨緩。印度嬰兒的出生數與開美製汽車的人數有關聯：他們同時變異，一起增加、一起減緩。但其卻沒有任何因果關聯。印度政府著手進行出生控制方案以減少嬰兒出生人數的時間與美國人開始增加買進口車的時間相同，其完全是巧合。

假如研究者無法發現任何關聯，則因果關係便不大可能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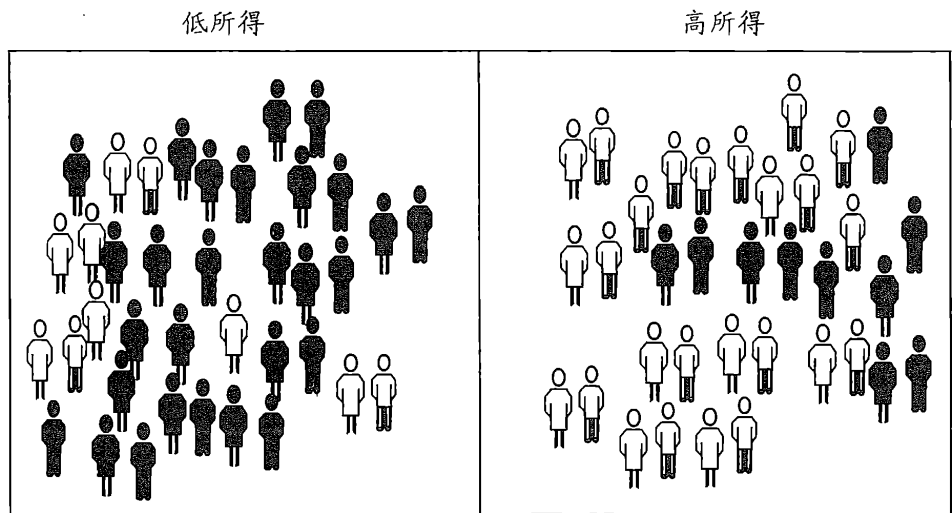


圖3.2 收入與種族間的關聯

立。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者試著去發現相關或用其他方法來測量關聯。但研究者也可能發現毫無因果關係的關聯。雖然關聯排除了潛在無關的原因，但其無法確認出一個原因。它是一個必須但不是充分的條件。換句話說，你需要關聯來確立因果關係，但只有它是不夠的。

一個關聯並不需要是完全的（即，每一次一個變項出現，另一個變項也出現）以顯現出因果關係。在星期幾舉行考試及考試成績的例子中，如果在10次的星期五考試中我得到7個A、2個B、及1個C；而在10次的星期一考試中我卻得到6個D、2個C、及2個B，其便有關聯在其中。關聯是存在的，但星期幾的次數與考試好壞的次數並不是具有完全的關聯。圖3.2中種族與收入的例子也是一個非完全關聯的例子。

排除其他可能影響因素的意思是：研究者所感興趣的因果關係需要表現出其結果確實是由原因變項所導致，而非其他因素的影響。它也被稱作**非虛假關係**（no spuriousness），因為一個未必真

實的因果關係，其確實是由其他因素所導致，但並未被確認出來，因此被稱作虛假關係，其將在第6章中來討論（見資訊箱3.4）。

研究者能注意到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及關聯。但他們無法注意到排除其他可能解釋的因素。他們僅能間接來證明它。排除其他可

資訊箱 3.4

學會辨別因果關係

有一天當我如往常般的從學校開車回家時，一則收音機中所播報出來有關在標準化測驗中性別與種族偏見的新聞報導。有一個聲稱偏見是主要問題的人，他說測驗必須被改變。由於我在教育界工作並且鄙視種族或性別偏見，因此這則報導吸引了我的注意。然而，就如一般的社會科家一樣，我以非常批判性的觀點來評估這則新聞報導。對偏見指控的證據是對高中高年級男生數學高分者與對高中高年級女生數學高分者類型的一致性，及具歐裔背景的學生與對非裔美人的學生其數學成績類型的比較。不同類型測驗成績其原因是由建立在測驗中的偏見所造成的嗎？

當設計測驗的某人提出質疑，此人指控測驗具有偏見，實缺乏重要的證據來支持測驗偏見的主張：其主要還有學生受教育經驗的因素。其證明了男生與女生在高中選了不同數目及型態的數學課。女生傾向選擇較少的數學課。那些與男生選擇完全相同數學課程的女生中，性別差異的因素便被消除了。相同地，多數的非裔美人上市內種族隔離、品質較差的高中或在貧窮偏遠的地區。對非裔美人而言，若其上高品質近郊的高中，並選完全相同的課程，種族差異的問題在測驗分數上也消失了。這些證據證明了受教育的不平等導致了測驗分數上的差異。雖然測驗有些問題，若沒改善或均等教育機會而只將確認出的真正原因應用於改變測驗上，將會是一個錯誤。

能解釋的因素是一種理想，因為排除所有其他可能解釋的因素是不可能的。研究者嚐試以兩種方法來排除其他可能解釋的因素：透過建立研究設計來控制、及測量潛在隱藏的影響原因。實驗的研究者建立控制在研究設計中來排除其他可能解釋的因素。他們建立了一個除了主要原因變項以外，排除其他影響變項的隔離實驗情境。

研究者同樣也嚐試藉著測量可能潛在的原因來排除其他可能解釋的因素。這在調查研究中非常常見，並被稱做控制其他變項。研究者使用統計分析的技術來瞭解是否原因變項或其他變項在影響結果變項。

因果解釋通常是以線性的方式或以直線的方式來陳述原因與結果：A 導致 B、B 導致 C、C 導致 D。前述膚色與私刑的研究便可說明線性的因果解釋。在兩個理論中的主要概念便是變項：即，它們具有一個範圍的值。兩者都用一個變項（例如，經濟貧困的程度或膚色的深淺）來解釋第二個變項（例如，使用私刑的次數或收入與教育程度的差異）。我們可以用簡單的因果命題來重新陳述它們：經濟貧窮的程度越高，動用私刑的次數便越多；或膚色越淺，收入及教育程度便越高。它們也是演繹取向的，因為在以數據資料驗證理論之前，便已先發展出命題了。我們可以演繹因果的形式來重新陳述每一個研究的邏輯：假如命題是真的，則在實證的證據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特定的事物。好的因果解釋在確認一個因果關係，並且詳細說明因果的機制。簡單的因果解釋是：X 導致 Y、Y 的發生是由於 X，其中 X 與 Y 均為概念（例如，早婚及離婚）。有些研究者以預測的方式來陳述因果關係：假如 X 發生，則 Y 便會發生。因果關係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式來陳述：X 導致 Y；X 產生 Y；X 影響 Y；X 與 Y 有關；X 越大則 Y 也越大。

此處有一個簡單的因果理論：失業人口越多，則導致兒童被虐待的案件也越多。所被解釋的主題是兒童被虐待案件的增加。而解釋此現象的原因是失業人口的增加。我們確認它的原因來「解釋」

兒童被虐待案件的增加。一個完整的解釋同時也需要詳細的說明因果的機轉。我有一個理論認為當人們失去他們的工作，他們會感到失去自我價值。一旦他們失去自我價值，他們就會變得非常容易挫折、沮喪、及憤怒。挫折的人經常對與他們有親密接觸的人（如，朋友、伴侶、孩子等等），以直接的暴力來表達他們的憤怒。這種現象是非常真實的，特別是在當他們不瞭解憤怒的來源或無法掌握引起憤怒的真正原因（例如，雇主、政府的政策、或經濟力）時。

失業及兒童虐待的例子說明了一個連續的原因及一個因果機轉。研究者可以驗證此連續過程的不同部分。他們可能會驗證是否失業率與兒童虐待一起發生；或是是否受到挫折的人，對與其親近的人變得比較暴力。一種典型的研究策略是將一個較大的理論分成幾個部分，然以資料來驗證這些不同部分的關係。

因果關係變項間的圖形。至少，你需要一個原因及結果來建立因果關係。思考一下這個假設：「相同信仰的夫妻越常一起參加宗教儀式的聚會，其越不可能會離婚」。這個假設將「參加宗教儀式的聚會」與「可不可能會離婚」這兩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其它還有三個要素：其所指涉的團體或範圍（相同信仰的夫妻）、因果關係的方向（從參與宗教儀式聚會到離婚）、及關係的符號（參與宗教儀式聚會越頻繁，越不容易離婚）。研究者以文字、圖片、或兩者來表達理論。他們通常畫因果關係圖來呈現一個簡化的關係圖像，並使人一目瞭然。此種象徵符號式的表現補充因果關係的言語描述，並可傳達複雜的資訊。它們是呈現理論關係的捷徑。

最簡單的關係圖是雙變項的模式，如圖3.3(a)。研究者用文字、圓圈、或圖框來表示變項。傳統上是以X來代表原因，而以Y來表示結果。箭號表示因果關係的方向（例如，從自變項到依變項）。有時，研究者用下標來表示超過一個以上的原因（例如， X_1 、 X_2 ），如圖3.3(b)。變項間的關係以帶有箭號的直線來表示因果關係用直線來呈現。關聯並非因果關係，因此用雙箭頭的曲線來表示。一個單箭號的直線表示單方向性的關係。雙箭號的直線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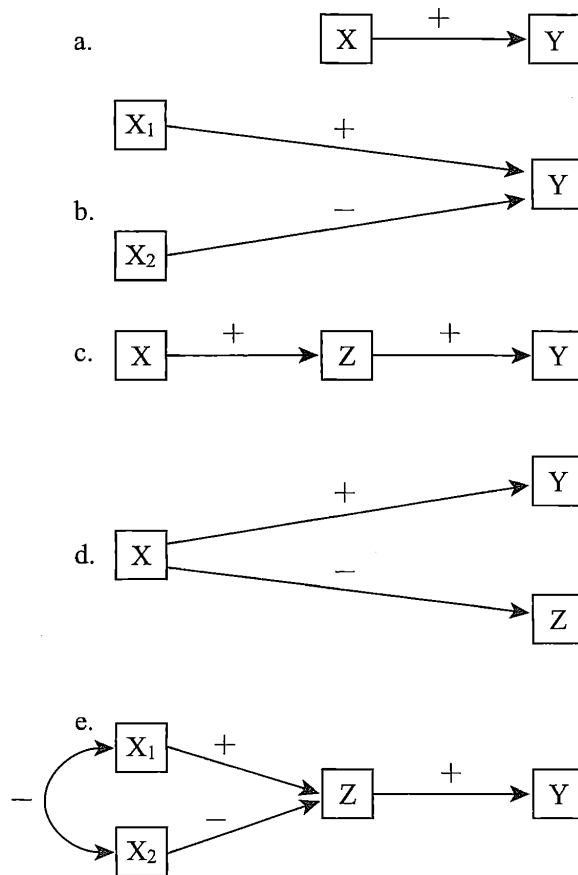


圖3.3 因果關係圖

交互關係。

變項間的關係可能是正向關係，也可能是負向關係。若研究者沒有特別說明，則表示變項間的關係為正向關係。正向關係是指原因變項的值越高，結果變項的值也會隨之增高。舉例來說，一個人具有越高的教育程度，則其預期的壽命便越長。而負向關係是指原因變項的值越高，但結果變項的值卻隨之降低。例如，夫妻越常一起參加宗教儀式的聚會，其越不可能會離婚。在圖中，(+)號表

示正向關係，而（-）號表示負向關係。

圖3.3呈現一些可用圖示法來表現關係的範例。研究者通常不會以圖示法來表達非常簡單的雙變項關係，如圖3.3(a)所示。當研究者增加變項，並提高關係的複雜度時，他們發現以圖解的方式更為有用。圖(b)顯示牽涉兩原因變項較複雜一點的關係。其可能是在說明父母花在與子女說話的時數（ X_1 ）會影響子女的幸福（ Y ），而孩子花在與同儕間打架的時數（ X_2 ）對其幸福（ Y ）具有負向的影響。圖(c)及(d)同樣的也在表示三變項間的關係。理論上此兩個圖之因果類型是各不相同的。圖(c)顯示一個簡單線性的因果關係鏈。其表示 X 影響 Z ，而後 Z 影響 Y 。舉例來說， X 代表對政治事件的知識， Z 代表參與政治集會的數目，而 Y 表示對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圖(c)所表達的理論是：一個人的政治知識影響其參與政治集會的數目，而參與政治集會的數目將會影響其對候選人的政治獻金。在圖(d)中，其理論是 X 影響 Y 與 Z ，但 Y 與 Z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變項。圖(d)所表達的理論是：政治知識增加人們參與政治集會的數目及對候選人的政治獻金，但對那些參與政治集會的人而言，其並不必然捐錢給政治人物。換句話說，捐錢及參與政治集會是兩個不同的結果，但其均受到政治知識的影響。

圖(e)說明一個含四個變項理論的模型。其中有兩個彼此間具有關聯的原因變項，但在此理論中說明其彼此並非為其彼此的原因（例如，他們可能同時發生）。此處有一個圖(e)的例子：對成績的焦慮（ X_1 ）導致讀書的時數（ Z ）增加；同時，花在聚會的時間（ X_2 ）導致讀書時間（ Z ）的減少。對成績的焦慮（ X_1 ）與聚會的時間（ X_2 ）是相關聯的。那些參與太多聚會的人會開始焦慮他們的成績，而對成績焦慮的人用參加聚會來壓抑其焦慮。讀書時間（ Z ）多，導致學業成績（ Y ）高。焦慮與參與聚會間的關係是描述性的及非因果性的。圖解式關係也幫助我們將複雜抽象的理論轉換成簡潔的圖像。我們將在第6章中再回來討論因果圖。

❖ 結構性解釋 (structural explanation)

結構性的解釋被用於功能的與模式的理論。不像因果關係鏈，其比較像是一串相互連接的球，當撞擊一個球便會引起一連串的碰撞。結構性的解釋比較像是一個具有輪輻的車輪，從中心觀念或一個網狀結構出發，而每一股線繩都構成整個網絡的一部分。研究者用相互連接的假定、概念、及關係作成結構性的解釋。他們也用隱喻或類比的方式來代替因果陳述，以使關係具有意義。在一個理論內的概念及關係形成相互強化的系統。在結構性的解釋，研究者詳細說明一系列相關聯的階段，或確認形成相互連鎖整體的各個基本部分。

有幾種結構性解釋的型態。有一種型態稱為**網絡理論 (network theory)**。一位網絡理論家曾說：當特定型態的互動發生時、社會關係的某些部分在時間或空間有所重疊時、或當某些關係遵循某種發展序列時，則某種行為或社會關係便會出現。

網絡理論家通常是以提出較廣泛的模式、一組語言法則、或結構等方式來解釋事物。他們的解釋呈現出一個特定的事件如何只是一個大型模式中的一部分、一個較大結構中的一塊磚、或是一個較大連接系統中的環節。它是推理的一種形式，像是用來解釋為何人們以特定方式來使用語言；也就是，語言中的語法，像X會與Y一起出現，或像是一個句子中需要有一個名詞及一個動詞。研究者是以確認所涵蓋事件其語法規則的方式來解釋一個事件。

Gould (1991) 其有關1871年**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的社會動員理論便是一個結構性解釋的例子。在十九世紀末巴黎公社是在法國很有名的反叛組織，透過貧窮民眾及由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及激進份子所領導的勞工群眾接管了當時的巴黎市政府，也近乎接管了整個法國政府。其是以免費教育、工人合作社、及極端社會改革的方式，所進行的一個為期兩個月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此公社最後以殘酷的戰鬥結束，其間並有25,000名巴黎民

眾喪生，而其大部分都在對國家軍隊投降後被射殺。

Gould認為民眾來自不同的社會網絡，而這些不同的社會網絡形塑其參與此集體行動。因此，在其被徵募進入巴黎公社此反叛團體之前，人們彼此便已經有了社會連結。經由瞭解這些連結，Gould預測了哪些人可能會加入此團體。他的理論認為：被孤立的人是最不可能會參加的。當其具有親密社會關係的親友加入時，這些人便可能會加入。另外，個人在社會連結網絡中的位置也很重要。位居緊密連結網中心的人（即那些具有多重強力連結的人）比那些位於邊陲位置的人（即那些僅有單一或少許微弱連結的人）會被強力的拉攏。Gould發現那些巴黎相同社區的人，在革命防衛隊中被徵募進同一隊伍中。這新的組織——防衛隊——是由先前非正式的鄰里連結——家庭連結、鄰居、同事、或朋友等等，所建立的。此連結在防衛隊中創造了強烈的忠誠度。同時，一些人來自同一社區，有些更是鄰里中的要角，被編到其他的連隊中。此又創造了跨連隊的忠誠度。Gould從人們在鄰里及自衛隊中重疊的社會網絡所位居的地位來預測連隊行為的模式。他參照人群間社會連結較廣泛的模式來解釋連隊的行為及對事件發生時他們的反應。

結構性的解釋同時也被用在功能理論。功能論的理論家通常將事件放在較大的、前進的、平衡的社會系統中來解釋。他們經常使用生物學的隱喻。這些研究者透過確認事物在較大系統中的功能或它們所能達成系統的需求來解釋這些事物。功能性的解釋通常是以這種形式來進行：「L的發生是由於它能滿足系統M的需求。」理論家們假定一個系統會運作以保持平衡，並且會持續運作。

社會變遷的功能理論認為：隨著時間的流轉，一個社會系統或社會，會朝向發展性階段移動，逐漸分化並變得更加複雜。它演化出一種專業的分工，並發展出更顯著的個人主義。這些發展為這整個系統創造出更大的效率。而專業化及個人主義也創造出暫時的分裂。傳統作事方式式微，但新的社會關係產生。系統產生了新的方式來執行其功能或滿足系統的需求。

Kalmijn (1991) 用一種功能性的解釋來說明美國人選擇結婚對象的過程是如何在轉變。他以世俗化理論為基礎，此理論認為不斷演進的工業化及都市化的歷史過程形塑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較不依賴傳統方式來做事。宗教信仰及地方社區的連結式微，家庭對年輕成人的控制也逐漸變小。人們不再只將其整體生活限制在小型的、和諧的社區之中。年輕成人變得比較獨立而不去依賴他們的父母，也不去依賴在其選擇婚姻伴侶時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組織。

社會有一種去安排人們選擇婚姻對象、及發現他們能分享基本價值伴侶方式的基本需要。在當代社會，人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在學校環境中，而不再是社區的小環境內。在這些學校環境中，特別是大學，他們與其他尚未結婚的人相遇。而在現代社會，教育是一個主要的社會化媒介。逐漸地，它會影響人們未來的收入、道德信仰及價值、及休閒的方式。這種現象解釋了為什麼生活在美國的民眾對選擇結婚對象有一種趨勢，即與具有相同教育程度的人結婚的現象逐漸增加，而人們越來越少與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結婚。在傳統的社會中，家庭與宗教組織對人們道德價值的社會化扮演了很重要的功能，並且將人們與其具有相似價值的潛在結婚對象相連接。在當代社會，教育機構大量的執行社會系統的此項功能。

❖ 詮釋性解釋 (interpretive explanation)

詮釋性解釋的目的是去培養瞭解。詮釋理論家們嚐試將事件放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中去發現事件或習慣的意義。他們試著去理解或在心靈上領會社會世界的運作，而且去獲得事物的感受或去瞭解世界之於其他人是什麼感想。因為每一個人的主觀世界觀形塑了他們如何行動，研究者企圖去分辨其他人推理及看待事物的方式。此過程與解碼文獻內容或作品極為相似。意義來自於文化符號系統的脈絡。

Lachmann (1988) 在其研究中用詮釋性的解釋來說明在紐約

市內非法壁畫的藝術型態。他注意到偏差行為者的歷程是透過被非偏差行為者如何標籤及回應他們而形塑而成的。他發現壁畫藝術家們如何招募新的藝術家們加入，並教導新的藝術家們瞭解壁畫創作是有觀眾群去欣賞的。Lachmann將壁畫創作放在低收入、及內城鄰里社區中的社會脈絡中去描述壁畫藝術家們的生涯。舉例而言，逃避警察是他們刺激生活中的一部分，並且有許多藝術家因其他犯罪行為被捕。技術純熟的藝術家在長60呎的地鐵車箱外作畫，並發展出獨立的風格。Lachmann參照文化、限制、及貧民社區的價值觀來解釋其追求生涯中的聲譽及發展。那些欣賞壁畫藝術家所呈現出來的天份的非偏差行為藝術家，也形塑了他們的生涯發展的路徑。

理論的架構

截至目前為止，你已經學到了有關理論及實證的推論。許多研究者都使用中型理論。**中距理論**（middle-range theory）是比實證的推論或特定的假設還抽象一些。如墨頓（1967:39）所說，「中距理論基本上用於社會學中，以作為實證研究的指引。」

中距理論可以是形式的理論，也可以是實質的理論。我們可以抽象化的程度將理論的專有名稱作一分類。從最具體的到最抽象的依序是：實證的推論、中距理論、及理論架構。理論架構（也稱為**典範**（paradigm）或理論的系統）是比形式理論或實質理論更抽象。圖3.1顯示其層次及它們如何被用於歸納及演繹取向的理論化過程中。

研究者並不在抽象程度間做清晰的區辨。當他們在進行一項研究時，他們基本上會使用中距理論及實證的推論。他們很少直接使用理論性的架構在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可能在某項議題上驗證一個理論的幾個部分，有時從不同的理論性架構來對照不同理論的數個部分。資訊箱3.5以Kalmijn對擇偶變遷的研究來說明抽象化的不同程度。

資訊箱 3.5

Kalmijn 在「範圍的變遷」研究中理論的層次

理論性的架構：結構功能論認為工業化及都市化的過程改變了人類社會從傳統的形式到現代的形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社會制度及習慣發生了演化。這種演化包括那些滿足社會系統的基本需求、將人們社會化以接受文化價值體系、並規範社會行為。那些在傳統社會中滿足並維持社會系統的制度，被新的現代制度所取代。

形式理論：世俗化理論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從依賴傳統宗教信仰及地方社區的連結中移轉出來。在傳統社會中，給予社會地位的制度（家庭、教會、及社區）同時也控制了社會化及規範社會生活。在現代社會，這些機構被授與成就取向地位的世俗制度（教育、政府、及媒體）所取代。

中等實質理論：一項通婚模式的理論提到：現代社會的年輕人小型、地方性的環境中，而在這些環境中家庭、宗教、及社區都具有很強大的影響性；取而代之的，年輕人花越來越多的時間在學校的環境之中。在學校環境中，特別是在大學，他們有機會去認識其他未婚的人。在現代社會，教育已經變成一項主要的社會化媒介。它影響了未來的收入、道德信仰及價值、及休閒興趣。因此，年輕人擇偶已較少立基於相同的信仰或地域的連結等基礎之上，而更多的人擇偶已是以相似的教育程度為考量的基礎。

實證的推論：美國人曾經是和與自己具有相似宗教信仰的人結婚。這種結婚習慣已正被與具有相似教育程度的人結婚所取代。

社會學有幾個主要的理論性的架構。這些架構都是些取向性的理論或是環視整個社會世界。他們提供了一些假定、概念、及解釋的形式。這些架構包括了許多形式上的或實質性的理論（例如，犯罪理論、家庭理論等等）。因此，它們會是結構功能論、交換理

論、以及家庭的衝突理論。具有相同架構的理論共同具有相同的假定、及主要的概念。有些架構的取向乃置於微觀層次，而其他的架構則多將焦點放在鉅視的現象。在第4章中你將會看到，每一種架構都與一種研究方法論的取象相關聯。資訊箱3.6會呈現四種在社會學中主要的理論架構，並簡潔的描述每一個架構其中主要的概念及假定。

理論與研究：動態的組合

你已經看到理論與研究是相互關連的。只有幼稚的、新進的研究者會誤以為理論與研究並無關係，或研究者只為蒐集資料而已。不用理論來進行研究或無法將理論說明清楚的研究者，可能都只是浪費時間在蒐集無用的資料而已。這些研究者很容易陷入迷霧、混淆的思考、錯誤的邏輯、及不清晰的概念之中。他們可能會發現，要去涵蓋一個清新的研究議題或對其研究目的產生清楚的說明都很困難。當他們在設計或進行實證研究時，經常會發現他們自己漫無目的。

理由非常簡單。理論提供我們對問題如何看待及思考的框架。理論給予我們概念、提供基本的假定、對於重要的問題給予指導、並且建議我們如何了解資料。理論讓我們能夠將單一的研究與其他研究者所共同貢獻出的廣大知識基礎予以連結在一起。使用類比的方法，理論幫助研究者能看到一整片樹林而不只是看到一棵樹而已。理論增加研究者注意到資料間的相互關連及其更廣泛的意義。

理論實際上在所有的研究中都具有一席之地，但它的顯著性便隨著不同的研究而有所不同。大體而言，理論在應用性的描述研究中就沒有在基礎性的解釋研究中來的重要。它在應用及描述性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可能較為間接。由於在這些研究中的概念通常較為具體，並且其目標並不在創造一般性的知識。然而，研究者將理論使用在描述性研究中來使概念更精確、評估理論的假定、並間接驗

資訊箱 3.6

社會學中主要的理論架構

結構功能論

主要概念：系統、均衡、失功能、分工。

主要假定：社會是由各個獨立部分所組成的系統，而這些部分均處於均衡或平衡的狀態。經過時間的轉換，社會開始有進化，從簡單到複雜的型態，在複雜的型態中更有高度專業化的部分。社會中的不同部分，分別執行社會系統中不同的需求或功能。在某些價值或價值系統上的共識，將社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

交換理論（也是理性選擇）

主要概念：機會、報償、認可、平衡、信用。

主要假定：人的互動與經濟上的交易類似。人們給予並回收資源（象徵性的、社會認可的、或物質的），並且試圖極大化他們的回報，同時避免痛苦、花費、及難堪。交換的關係傾向於平衡。假如交換的關係並不平衡的話，擁有信用的人便能掌控其他人。

符號互動論

主要概念：自我、參考團體、角色扮演、認知。

主要假定：當人們在進行社會的互動時，他們便傳達並接受符號性的溝通。人們創造彼此及社會環境的認知。人們大致上根據其認知來行動。人們根據彼此的互動來思考他們自己及互動的他人。

衝突理論

主要概念：權力、剝削、鬥爭、不平等、疏離。

主要假定：社會是由具有不同利益的團體所組成。強迫並試圖去得到權力人類關係的持續發生的面向。那些擁有權力的人試圖散佈迷思或必要時使用暴力來維持其權力。

證假設。理論並非一直固定不變；它只是暫時性的，並且開放以供修訂。以兩種方式來擴展理論，使其能夠更正確更完整的來解釋社會世界的組成及運作。在理論家辛勤清晰及邏輯性的思考下，理論也不斷進步，但這些努力仍有其限制性。使理論有顯著性進步的方法便是與研究發現有不斷的互動。

科學界以實證研究的結果來擴展並修改理論。採用較演繹取向的研究者，使用理論來指導研究設計，並解釋研究結果。他們根據研究結論來反駁、擴展、或修正理論。當研究者持續進行實證研究來檢證理論時，他們便發展出對理論某些部分為真的信心。假設有些良好研究具有負面的發現時，研究者可能也會修正理論的某些命題，或拒斥這些命題。一個理論的核心命題或中心原則是較難驗證的，而且也較少被駁斥。在一個較緩慢的過程中，當反對證據的增加，而且沒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時，研究者可能會決定去放棄或去改變一個理論（見表3.4）。

研究者採用歸納取向時在過程上會有些許的不同。歸納性的理論化過程開始於一些假定及一些廣泛方向性的概念。當研究者蒐集並分析資料後，理論便從頭開始發展。理論發展很緩慢，在一個特定領域中，概念接著概念而且命題接著命題的發展。此過程與懷孕的過程極為相似。經過一段時間後，各個概念及實證的推論逐漸浮現並成熟。很快的，各種關係也變得清晰可見，並且研究者們會將

表3.4 社會理論的面向

研究的取向	事實的層次	形式或實質	解釋的形式	抽象的程度	理論的架構
歸納	微觀	實質	解釋性的 因果性的	實證的推論 中等的	符號互動 交換的
演繹	鉅觀	形式	結構	架構	結構性 功能的 衝突

從不同研究中所得到的知識編織起來，而成為一個較抽象的理論。

結論

在本章中，你學到了有關社會的理論——它的組成部分、目的、及形式。理論與研究的二分是一個人為的作法。對進行一項好的研究，理論的價值及需要性必須非常清楚。不採用理論為基礎而進行研究的研究者，很少能做出高品質的研究，而且經常會發現他們處於困窘之中。同樣的，未將理論與研究結合或與事實連繫住的理論家，則會飄浮在無法理解猜測的困境之中。你現在已非常熟悉科學界、研究面向、及社會理論。下一章中，你將瞭解當研究者在從事社會科學時所採用的一些彼此競爭的研究取向。

重要名詞

關聯	假定	因果解釋
分類	概念組	演繹法
經驗法則	功能理論	紮根理論
理念型	歸納法	專業術語
抽象層次	鉅視理論	中型理論
微觀理論	負向關係	網絡理論
精簡	正向關係	預測
命題	時間序列	分類學

問題回顧

1. 具象概念與抽象概念有何不同？試舉例說明之。
2. 研究者如何使用理念型及分類等方法來說明各種概念？
3. 概念如何包含嵌入的假定？試舉例說明之。

4. 以歸納法及演繹法來達成理論化目的時有何差異？
5. 試說明鉅視、中型、及微觀層次的社會事實間有何不同？
6. 試討論預測及理論性解釋間有何差異？
7. 因果關係的三要件為何？其中哪一項是無法被完全證明的？為什麼？
8. 為什麼研究者使用圖表來說明因果關係？
9. 結構性說明及解釋性說明間有何不同？
10. 解釋質化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差異？

方法論的意義

導論

三種取向

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問題

摘要

詮釋取向的社會科學

問題

摘要

批判社會科學

問題

摘要

女性主義和後現代研究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社會科學中的混亂之處——現在這個混淆應該顯而易見——就纏繞在長久以來科學本質的爭議之中。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19.

導論

有很多人，包括社會科學之外的專業人士，常會問：社會學和相關的社會科學是真正的科學嗎？他們眼中只有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和生物學）。在本章，我們將檢視在社會科學中所謂「科學」的意義。我們將以前幾章所討論過的科學社群、各式各樣的社會研究和理論作為討論的基礎。本章將更關注探究方法的層次——我們怎麼知道的——而不只侷限在蒐集和檢視資料之特定方法的層次上。亦即將置焦於以下問題：當研究者執行研究時，會嘗試做什麼？研究者又是如何進行研究？

「社會科學的科學性在哪裡？」這個問題和每位想要學習社會研究方法的人都有切身關係，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裡。研究方法論就是支撐社會科學合乎科學的基礎。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長久以來就是大家爭論的焦點，自從社會科學誕生以來這個問題就不斷地被碰觸。古典的社會學家，諸如孔德（Auguste Comte）、涂爾幹（Emile Durkheim）、馬克斯（Karl Marx）、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韋伯（Max Web）都曾審思過這個問題。儘管經歷過兩個世紀的討論和爭辯，在今天這個問題依然困惑著我們，因為它的答案並不單純。

一個問題有多種可能答案並非意謂著怎麼做都行；而是意謂著社會研究者必須從各種可行取向中選擇其一以合乎科學性。每一種取向都有一套自己的哲學假設和原則，以及該如何進行研究的特有觀點。一般研究報告很少明確地宣告其所植基的取向，很多研究者對這些取向其實也只是一知半解。然而，不管在社會學或是其應用領域，這些取向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Collins（1989: 134）指出社會科學是否是科學的爭論，其實係源於對「科學」採取剛性的定義。他評論道「當代科學哲學並未摧毀社會學科；它並非意謂科學是不可能，而是對於什麼是科學為我們提供更具彈性的圖像。」本章所介紹的幾種取向在於幫讀者把哲

學上的抽象議題和具體的研究技術銜接起來。這些取向釐清好的社會研究的內涵，澄清做研究的原因，並規範合乎研究倫理的行為。研究者是在這種更寬廣的架構中進行研究。Couch (1987: 106) 將此總結如下：

這些取向在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觀點，在當代社會學裡這些研究傳統提供更激烈爭辯的基礎，每一邊都宣稱自己所主張的思想架構能夠提供一種有效途徑以從社會現象中獲取知識，也都認為其他取向的努力是徒勞無功的。他們的差異在於該參與什麼現象，如何接近現象，以及這些現象該如何分析。

在讀完本章後，對於「何謂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這個問題你將會獲得三種答案。對於每種取向所提供的答案我們都將予以討論。也許剛開始你會對這種多元取向感到困惑，不過只要你學過後，你就會發現研究和理論的其他面向將變得更加清晰。研究中所採用的特定技術其實都是植基於本章所討論的這幾種一般取向。這些技術（如實驗和參與觀察）對你都會更有意義，而且如果你已經清楚這些技術背後的邏輯和基本假設你就會學得更快。此外，本章所介紹的取向也將幫助你認識在閱讀社會研究學科時所接觸到的不同觀點。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在你選擇研究的型式時，這三種取向也會提供你非正式選擇的機會。

三種取向

首先，我們必須澄清「科學」的定義並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或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是人類的傑作，而且不斷的在演變。一直到十九世紀早期，只有哲學和宗教的學者會沈浸在搖椅中沈思，以探討或是描述人類的行為。由於古典理論學家極力主張可以用科學來研究社會世界，對現代文明產生很大的貢獻。他們主張對社會世

界進行嚴謹、系統性的觀察，並輔以謹慎邏輯地思考，對人類關係方面提供新穎有價值的知識。在現代，科學已被公認是獲得知識的最有效方法，所以當人們接受「社會也可以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的主張時，這就是一種帶有分水嶺意味的革命性觀念。

一旦「社會世界之科學」這種想法獲得接受，議題就轉為：這種科學像什麼樣子，它又是如何來進行？有些人傾向已被接受的自然科學（例如，物理、生物和化學），並複製他們的方法。他們的主張很簡單：自然科學的正當性植基於科學的方法，所以社會科學家應該採用相同的取向。

很多研究者接受這樣的答案，但它也面臨一些難題。首先，即使在自然科學界，科學所指為何大家也還有爭議。科學的方法似乎只是一套寬鬆的抽象模糊原則，所具有的引導性不是很大。研究科學歷史和哲學的學者發現科學家發展出多種途徑來進行科學研究，所用的方法更是多元化。其次，很多學者強調人類在本質上是迥異於自然科學所研究的物體（星體、岩石、植物和化合物等等）。人們會思考和學習，對自身的現在和過去也有清楚地認識，而且還具有動機和理性。這些獨特的人類特徵意味著我們需要有一門獨特的科學來研究人類的社會生活。

儘管哲學家還在爭論，但社會研究者並未停下腳步。親身力行的研究者根據他們非正式的科學信念開創出很多進行研究的方法。這當然也帶來更多的混淆。先行的研究者所用以研究的技術有些是不符合哲學家所謂好科學的理想模式。

本章所討論的三種取向根源於1960年代掀起的一股對社會科學的重新檢視與省思。社會科學的這三種替代取向是眾多相關爭論中的核心觀念。這些取向是把那些更為複雜的爭論化約後的理想模式。事實上，很少研究者會完全接受某個取向的所有論點。通常，他們會挑選並調和來自各取向的元素。儘管如此，這些取向代表著社會科學研究在表象上和背後假設上的基本差異。這些取向代表著看待世界的不同方式——包括觀察的方式、怎麼測量、和理解社會

現實。他們從迥異的觀察角度出發，即便是最終所看和所談論的事物完全相同。

為了簡化這些討論，我將這些取向的假設和理念重組成回答以下八個問題的答案。

1.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2. 社會實體的基礎本質為何？（本體論的問題）
3. 人性的本質為何？
4. 科學和常識的關係為何？
5. 社會實體的解釋和理論的構成為何？
6. 如何決定一項解釋的真假？
7. 好的證據和實際訊息的特徵為何？
8. 社會政治價值又是從哪裡滲透到科學中？

這三種取向分別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詮釋社會科學**（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和**批判社會科學**（critical social science）。大部分實施中的社會研究都是植基於前二者。實證主義是最早也是沿用最廣的取向。科學哲學研究者米勒（Miller, 1987: 4）觀察道「科學給人最一般化的哲學印象就是實證主義，但現在有三種替代取向，使科學具有更為寬廣的外觀。」詮釋取向在近一世紀以來就抱持著一種強烈的弱勢族群的觀點來立論。批判社會學在一般的學術期刊中較為罕見。它提供你對社會科學意義爭辯中的完全觀點，因為它批判其他取向，更試圖超越它們。

每一種取向都伴隨著社會理論的不同傳統以及互異的研究技術。在各種取向中科學、社會理論和技術的連結並不是那麼嚴謹。這些取向很像是一個研究方案、研究傳統、或是科學典範。典範概念的流行係由另一位科學哲學家Kuhn（1970）所促成，它意謂著一種基本的理論和研究方向。其實典範的定義是眾說紛紜。一般而言，科學典範一種思考的完整體系。它包括基本假設、有待回答的重要問題或是待解的謎、研究者所使用的技術、以及所謂好的科學

研究的範例。例如，社會科學被稱為多元典範的科學，因為沒有單一的典範是全能的；相對的，有好幾個正在彼此競爭。

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positivism social science）應用最廣，而且廣義的實證主義就是自然科學的取向。事實上，有很多人根本不曾聽聞過還有其他替代取向。他們主張實證主義的取向就是科學。實證主義有很多版本，在科學哲學中有一段長遠的演變歷史，也涉及到很多研究者。不過，對不少研究者而言，實證主義已經成了亟欲避免的負面標籤。Turner（1992: 1511）根據其觀察指出「實證主義不再是一個清晰的指稱，但很顯然地，對很多人而言，被說成是一個實證主義者並不是一件好事。」上述八個問題的答案將會讓你對現行社會科學的實證取向獲得大概的印象。各種實證主義分別稱為邏輯實徵（logical empiricism）、既有或傳統的觀點、後實證主義、自然主義、涵蓋律則模式（the covering law model）以及行為主義。

實證主義緣起於由十九世紀法國人孔德（Comte, 1798—1857）所創建的思想學派。孔德的主要思想精華全部形諸於六冊的「實證哲學的課題」（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該書架構出很多至今人然沿用的實證主義的原則。英國哲學家彌爾（1806-1873）則在「邏輯系統」（A System of Logic）一書中解釋並修正這些原則。古典的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1858-1917）則在「社會學方法的律則」一書中勾勒出實證主義的樣式，這本書成為實證主義社會研究者的重要教科書。

實證主義牽連到很多特定的社會學理論。最為大家所熟知的它和結構功能、理性選擇、以及交換理論架構的銜接。實證主義研究者偏好精確量化的資料，並且常常用到實驗、調查和統計。他們追求嚴謹、正確地測量，並且「客觀地」研究，並且謹慎地分析測量

所得的數據來考驗假設。很多應用研究者（行政學者、犯罪學家、市場研究者、政策分析家、方案評估者和規劃專家）熱情地擁抱實證主義。批評者則指責實證主義者將人化約成數字，其所關注的抽象律則及公式和真實人類的實際生活毫無關係。

1960-1970年代在英國、加拿大、斯堪地那維亞、和美國的主要社會學期刊幾乎為實證主義取向的文章所主導。到了1980-1990年代在歐洲方面有明顯地下降，但在北美的期刊這個取向仍然佔據主要的位置（Gartell nad Gratell, 1996）。

實證主義主張「科學只有一個邏輯，這是任何要頂著「科學」這個名號的知性活動都必須遵循的。」（Keat and Urry, 1975: 25）。因此，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必須使用相同的方法。基於這樣的觀點，自然和社會科學的差異就在於社會科學的未成熟（或是年輕）以及其探討的主題。最終，所有的科學（包括社會科學）都將更接近最先進的科學——物理。科學彼此之間的差異導因於它們探討的主題的不同（如，地理學所需的技術不同於天體物理學和微生物學，係因為其探討的主題之不同），但是所有的科學都共享一套原則和邏輯。

實證主義把社會科學視為一種有組織的方法，這個方法將演繹邏輯和對個人行為進行精確地實徵觀察加以結合，以發現並確認一套可以用來預測人類活動一般模式的可能因果律。

問題

1.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研究的終極目的就在於科學地解釋——發現並記載人類行為的法則。另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認識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好讓人們可以控制或預測事件。後者有時候也稱為「工具取向」（instrumental orientation）。這是一種技術效益導向，認為知識可以當成是滿足人類需求以及控制物理和社會環境的工具。一旦人們發現控制人類生活的法則，我們就可以運用它來改變社會關係，提升做事的方法，

也可以預測什麼事會發生。例如，一位實證主義者使用理論——我們怎麼知道一個教育系統的關鍵因素（諸如班級大小、學生身體特徵、教師的學歷等等）可以預測提升學生的學習。他（她）展開探討並且精確地測量各項因素以確認理論中的因果法則。之後這位實證主義者所建立的知識，受到教育官員的採用來改變學校環境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實證主義取向的護衛者 Tuner 總結這種觀點「我們可以發展抽象的法則來描繪社會世界，並且可以經由嚴謹地蒐集資料來檢證這些法則。」

實證主義者主張科學家投注在永無止盡的追尋知識。知道得更多，就會發現新的複雜，而且還有更多等待去認識。早期的實證主義堅持人類永遠無法窮究事物，因為只有上帝擁有那些知識，然而，身為此一星球最有能力獲得知識的生物，人類有義務盡其所能去發現知識。

2. 社會實體的基礎本質為何？（本體論的問題）

當代實證主義者抱持社會和物理的現實是真實的。它就在哪裡，等待被發現。這樣的觀念指出人類的知覺和智能可能是有瑕疵的，而且實在可能很難被抓住，但它真的存在。再者，社會實體也非隨機的，它是經過打樣的而且有規則可循。若無這些假設（例如這個世界是渾沌的，而且沒有規律），邏輯和預測都將不可能。科學使人類得以發現自然界的秩序和法則。「最基本的科學觀察法則被視為是真實的、主要和確定的，因為它們是建造自然世界的組織結構。發現一道法則就像發現美洲新大陸一樣，它們具有相同的意味，都是早已存在只不過等待我們去發現。」（Mulkay, 1979: 21）

另外兩個基本架設是社會實體的基本型態是穩定的，而且相關的知識是不斷累加的。社會實體的規律性並不會隨時間而改變，今天所發現的法則在未來仍然適用。我們可以一次探討實體的幾個部分，然後將這些片段彙整成一個完整的圖像。這些假設的一些早期版本甚至主張自然的規律是由上帝所創造，並且這些規律就是證實

上帝存在的證據。

3. 人性的本質為何？

在實證主義裡，人類被假設成自利的、追求歡樂的理性個體。人類在外在原因的宰制下運作，相同的原因都會引起每個人相同的反應。透過觀察人們的行為，我們在外在實體中所看到的就可以認識他們，這比內在主觀實體所發生的事要來得重要。有時候，這稱為「人之機械模式」(mechanical model for man) 或稱為行為主義取向。它意味著人對外在力量回應就如同施力於物理力量作用於物體一般。涂爾幹(1938: 27)曾這麼說：「社會現象就是事物，也應該像事物般的被研究」。外在實體建議研究者可以不去檢視個體行為背後看不見的內在動機。

實證主義者主張人類行為或社會機構並不因為個人需要而發生。人類事件可以參考描述因與果之**因果律**(causal laws)來加以解釋。他們確認作用於人的力量和硬性科學中的自然力是一樣的。這意味著自由意志的想法只是極大的虛構，而所要描述的僅止於人類的行為面向，而這也還是科學尚未征服的。

少數實證主義者信奉絕對的決定論，在這種觀念裡，人只是向外界不斷做出相同精確反應的機器人或玩偶。相反的，因果率是機率的。法則適用於大的人群和多數的情境。研究者可以估計一個預測行為的機率。在其他世界裡，法則讓我們可以正確預測出在一個大的群體裡一種社會行為發生的頻率。但因果率無法預測在某一特定情境下某人會不會出現某種特定行為。不過，他們可以說，在X、Y、Z的條件下，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機率有半數的人會出現某種特定行為。例如，研究者無法預測張三在下次選舉中會投票給誰。不過，在知道關於張三的一些事後，而且運用政治行為的法則，研究者就可以較有信心地宣稱張三在下次選舉中有85%的機率會投票給候選人C。這並非意味張三不可以自主地投票給誰。只是，他的投票行為受到外在力量的形塑。

4. 科學和常識的關係為何？

實證主義者主張在科學與非科學間有一道清楚的界線。在眾多認清真相的方法中，科學是最為獨特的——它是最佳的方法。科學性的知識比其他知識更好，也終將取代其他較差方法所獲得的知識（如魔術、宗教、占星、個人經驗和傳統）。科學從常識中借用一些觀念，但它將常識中草率的、邏輯不一的、非系統的、充滿偏差的部分置換掉。科學的社群——擁有特定的規範、科學的態度和技術——可以經常製造「真相」，相對的常識只能偶爾且不一致地做出一些貢獻。

在實證主義傳統工作下的研究者經常會創造出全新的字彙——一套科學的觀念和相關的名詞。他或她想要使用更具邏輯一致性的想法，對日常生活常識的概念加以釐清並重新定義。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在一開始應該形成新概念而不是依賴過去的想法……對正確有一種偏好，這種偏好光靠模糊且不嚴謹的日常用語是無法達成的，而是要透過以學術為基礎的語言來達成」（Blaikie, 1993: 206）。在社會學方法法則一書裡，涂爾幹警告研究者要「堅決地拒絕使用在科學之外所形成的概念」而且「要使自己遠離一般人常用的謬誤想法」（引自 Gilbert, 1992: 4）。

5. 一個社會實在的解釋或理論是由什麼所組成？

實證主義的科學解釋是單一律則的，它植基於一個一般法則所構成的系統。科學透過發現因果律來解釋為什麼社會生活會是這個型式。解釋一般採用這種型式：Y由X所引起，因為Y和X是因果律中的特定例子。換句話說，一個實證主義的解釋主張一般的因果律可以應用或涵蓋到關於社會生活中的特定觀察。這也就是為什麼實證主義會被稱為使用「涵蓋律則的解釋模式」（a covering law model of explanation）。

實證主義假設法則的操作是根據嚴謹且合乎邏輯的推理。研究者運用演繹邏輯將因果律和在社會生活中觀察到的特定事實聯結起

來。實證主義者相信社會科學最根本的法則和理論可以用正式的符號系統來呈現，包括公理、定理、基本前提和理論。終有一天，社會科學的理論也會如同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一般。

人類行為的法則應該是普遍有效的，適用於所有歷史年代和所有的文化。如先前所提及的，法則是針對人群以機率的型式來陳述。例如，實證主義在解釋1990年代多倫多市犯罪率提升時所指出的因素（如，攀升的離婚率、對傳統道德觀認同的下降等等）也適用於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時代：如1890年代的孟買、1940年代的芝加哥、或是2010年時的新加坡。這些因素合乎邏輯地遵守一般法則（如，傳統道德秩序的崩潰導致犯罪率的增加）。

6. 如何決定一項解釋的真假？

實證主義發展於西方思想的啟蒙時代。它孕育一個重要的啟蒙思想：人類運用理性就可以辨識真理並駁斥虛假，而且，最終，在經過幾世紀後，透過理性的應用以及對真理的追求人類的處境可以提升。當知識提升，無知下降，處境就會改善。這些樂觀者相信時間所累積的知識在實證哲學家如何從錯誤的解釋中篩選出真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嚴格來說，在實證主義裡，解釋必須合乎兩個條件：它們必須(1)沒有邏輯上的矛盾，以及(2)和所觀察到的事實一致。不過，這還不夠充分，還需要能夠複製（參閱Hegtvedt, 1992）。任何研究者都可以複製或是重製別人的結果。

這是對整個生產知識的系統提出一個檢驗的標準。它確保了誠實，因為它重複檢視對硬性客觀事實的解釋。在各種對立解釋中存在的公開的競爭，遵守公正的規則、精確地觀察中立的事實，並且嚴謹地遵從邏輯。

隨著時間的演進，科學知識累積，當不同的研究者進行獨立的理論檢驗並增加發現。例如，有位研究者發現在加州聖地牙哥隨著失業率上升，虐待兒童的事件也增加。不過，在失業與虐待兒童間

的因果關係無法僅由一個研究來證實。要確認因果法則，必須其他研究者在不同城市進行獨立研究，經過謹慎地測量失業率和虐待兒童事件也發現相同的關係，此一因果法則才會受到接受。

7. 好的證據或事實資訊有何特徵？

實證主義是二元論者；它假設冰冷可觀察的事實，基本上是不同的於觀念、價值或理論。實徵經驗的事實是存在於個人的觀念和想法之外的。我們可以用感官（視覺、味覺、聽覺和觸覺）或是延伸感覺的特別工具（如望遠鏡、顯微鏡或是蓋氏計算器）來觀察他們。有些研究者將此觀念說成是「實徵事實的語言」和「抽象理論的語言」。如果人們不同意事實，那必定是誤用測量工具或是觀察太少、或是不恰當。「科學性的解釋包括正確且精確地對現象加以測量」（Derksen and Gartrell, 1992: 1714）。從我們感官所獲得的可觀察實體的知識是優於其他知識（如直覺或其情緒感受）；它讓我們可以將真實與關於社會生活的錯誤想法加以分離。

實證主義者將這個實徵觀察較優越的想法，和共享對實徵世界理解的假設加以結合。事實知識不是只根據一個人的觀察和推理。它一定要可以和別人溝通和分享。只要是理性的人獨立地觀察事實都將會同意這些。這稱為「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或是關於事實的共享主觀知識。很多實證主義者接受由Karl Popper（1902-1991）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所揭示的「否證論」。波帕爾主張對於知識的宣稱「永遠無法被證實或完全檢視，他們只能被拒絕」（Phillips, 1987: 3）。一個因果律的好證據不只是支持性事實的累積，它還包括去尋找該因果律的反證。有一個經典的例子，如果我想檢驗「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個宣稱，而且我也找到1000隻白天鵝，我也並未完全確認一個因果律或型態。這一切只要有一隻黑天鵝就可以拒絕我的宣稱——只要一件負面的證據。這意味著研究者搜尋反面的證據，而且即使如此，他們能說的也只是「到目前為止，我還無法確認什麼是真的。」

8. 社會政治價值又是從哪裡滲透到科學中？

實證主義堅持價值中立的科學，也就是客觀。「客觀」這個用語有兩個意義：觀察者同意他們所看到的，而且科學並非植基於價值、意見、態度或信仰（Derksen and Gartrell, 1992: 1715）。實證主義者將科學視為是社會中特殊明顯區分的一部份，和個人的、政治的或宗教的價值無關。他獨立運作，不受影響其他人類活動的社會文化力量的影響。它涉及應用嚴謹的理性思考和有系統的觀察，以一種超越個人偏見、誤差和價值的方式。科學社群的規範與運作確保了科學的客觀性。科學家被養成接受獨特的職業規範和價值。研究者接受和內化這些規範是他們成為科學社群的一員的部分。科學社群創造並精緻一個檢驗和平衡的系統以引導阻止價值的偏差。一位研究者的適當角色就是成為一位「去掉興趣的科學家」。實證主義者對價值的觀點，對於人們如何看待倫理議題和知識有一種巨大的衝擊。

到了這種程度，科學知識的實證理論成了所有知識的標準，道德的洞見和政治的承諾都已經被貶為是非理性的或是矮化成只是主觀的偏好，倫理的判斷只當作是個人的意見。（Brown, 1989: 37）

摘要

你可能發現許多實證主義的基本假設很熟悉，因為對於實證主義的傳授就像科學一樣廣泛。但是少有人清楚知道實證主義假設的來源。在某些假設中存在著一個早期的宗教觀點，因為發展這些假設的學者成長在18和19世紀的歐洲，難免受到宗教訓練而且是生活在具有某種特定宗教信仰的文化歷史氛圍中。很多實證主義的假設在你讀到後面關於量化研究計數和測量的章節裡都會再看到。實證主義取向意味著一位研究者是從一個一般因果關係開始那是他從一個一般理論中可能因果法則邏輯地演繹出來。他或她邏輯地將抽

象的觀念和對社會世界的精確測量加以銜接聯結。研究者在測量社會生活的面向、檢視證據、複製別人的研究時都極力維持抽離、中立和客觀。這些程序使得一種對社會生活因果律實徵檢視和確認，成為一個理論的架構。

是什麼時候？又是什麼緣故促使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成為主流？這有其長久而複雜的典故。很多人將之視為自然地進展，或是純粹知識不可避免地演進。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擴展源於一個更大的政治社會脈絡。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成為領導世界的力量，實證主義就在美國取得主導權，同時在許多國家成為社會研究的模式。還更進一步推向客觀主義——更嚴苛的實證主義派別——崛起於192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界。當研究者從較不正式或較不講究精確量化技術的社會改革導向的研究，轉向以自然科學為師，講究嚴謹的技術以及價值中立時，客觀主義就在這種環境下孕育成長。他們創造出對個體外在行為進行精確測量的方式，以產生量化的資料，然後進行統計分析。客觀主義取代了行動取向和偏向質化的地域性研究。它的成長係因為研究者間為聲望和地位的競爭，以及其他的壓力，包括來自私人基金的贊助（如福特基金會和洛克斐勒基金會），想避免非傳統政治力干擾的大學行政主管，研究者想獲致嚴謹專業形象的需求，以及政府和法人機構對資訊需求的擴大等，這些力量的結合重新定義了社會研究。由社會改革者（大半是女性）執行的較不技術取向、應用性的地域性研究，常常被那些大學系所中不關心政治的男性教授所進行的精確量化研究所掩蓋。

詮釋取向的社會科學

詮釋取向的社會科學可以追溯到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以及德國哲學家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在他的鉅著中「人性科學導論」一書中，狄爾泰主張有兩種在基本型態上不同的科學：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和人

性科學 (Geisteswissenschaft)。前者是植基於抽象解釋。後者則是紮根於對生活在特定歷史環境中的人們之生活經驗同理心的理解，或稱為「體悟」(Verstehen)。韋伯主張社會科學必須研究有意義的社會行動或是有目的之社會行動。他信奉同理的理解，並覺得我們必須認識塑造一個人內在感受以及決定其特定行動方式的個人推理和動機。

我們必須討論「社會行動」，不論在哪裡，人類的行動都和我們對別人行為之意義的主觀解釋有關。例如，兩輛腳踏車不預期地碰撞，就不能稱為是社會行動。但是我們會將他們之前閃躲對方的努力看成是社會行動……，社會行動不是社會學因果解釋中唯一的重要行動，但它卻是「詮釋取向社會學」最主要的目標。

詮釋社會科學和詮釋學 (hermeneutics，或譯聖經註釋學) 有關，這是一門起源於十九世紀的意義理論。這個術語出自希臘神話中一位叫做Hermes的神，他的主要工作是把神的旨意傳達給人類。它「在字面上的意思是使模糊變清楚」(Blaikie, 1993: 28)。詮釋學大量運用於人性科學 (哲學、藝術史、宗教學科、語言學和文學批評)。它強調對文本 (包括對話、書寫文字和圖畫) 詳細地閱讀和解釋。一位研究者執行「一次閱讀」以發現蘊藏在文本中的意義。每一位讀者都將其主觀經驗帶到文本中。在閱讀文本時，研究者或讀者嘗試先從文本中吸收或取得一個完整的觀點，然後再發展出對部分與整體間關係的更深層理解。換句話說，真實的意義很少是淺顯易懂的，要抓住它只有透過對文本詳細的閱讀，細細思慮其傳達的訊息及尋找其間的關係。

詮釋社會科學 (ISS) 有幾種不同的變化：詮釋學、建構主義、俗民方法論、認知取向、觀念主義、現象學、主觀主義、以及質性社會學。還有一種詮釋取向和符號互動主義或是1920到1930年代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緊密聯結，它常被稱為質性的研究方法。

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常常使用參與式的觀察和實地研究。這些技術需要研究者花很多時間和他們的研究對象直接接觸。其他的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則分析對話的抄錄本，或是行為的錄影帶以抓住其中的細節，尋找微妙的非語言溝通，以理解在該脈絡中互動的細節。實證主義的研究者則會精確地大量測量所挑選出的量化細節，並使用統計來分析所蒐集到的資料，然而一位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則可能和一群人共同生活長達一年，並使用謹慎的方法來蒐集大量的質性資料，以進一步理解人們如何從日常生活中創造意義。

相對於實證主義者的工具取向，詮釋取向採用的務實的取向，這是一種關心一般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經營他們的生活事件，或是他們如何解決事情。詮釋取向社會科學關心人們如何和別人互動和相處。一般而言，詮釋取向是透過在自然情境中的直接深入觀察以對社會化意義行為進行系統性分析，並深入理解和詮釋人們如何創造並維繫他們的社會世界。

問題

1.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對詮釋研究者而言，社會研究的目的就是去發展對社會生活的理解以及發現人們如何在自然情境下建構意義。詮釋研究者想要知道，對研究對象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什麼是切身相關的、或是每個人如何過生活。透過去認識某個特殊的社會情境，並從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情境，研究者才能達成其目標。研究者分享研究對象的感受和解釋，並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待事物。詮釋研究者 Harper (1987: 12) 將其針對維修店鋪老板 Willie 為期 10 年之研究的研究目標摘要如下：「這個研究的目標就是要分享威利的觀點」。

詮釋研究者研究「有意義的社會行動」(meaningful social action)，而不只是人們外顯的、可觀察的行為。社會行動是人們賦予主觀意義的行動；是帶有特定目的或意圖的活動。非人類的物種缺乏文化，以及去進行計畫和為其行為賦予意義的推理；因此，

社會科學家應該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獨特之處。研究者必須將社會行動者的理由和行動的社會脈絡納入考量。例如，眨眼睛之類的身體反射也算是人類的行為，但很少是有意圖的社會行動（亦即基於某種理由或具有人性動機），但在某些情境下，它也已是某種社會行動（好比使眼色）。社會行動者的活動不只是需要具有某項目的；它還必須是社會的，而且「行動要被視為是社會的，是社會科學家所興趣的，行動者必須對行動賦予主觀的意義，更要直接回應他人的活動」（Blaikie, 1993: 37）。

詮釋取向強調人類的行為很少具有天生的意義。行動意義的獲得來自於人際互動，人們根據共享的意義體系下，將行動詮釋成具有社會性的切身符號或行動。例如，在某個情境下向他人舉起一根手指頭可能表達某種社會意義；所傳達的特定意義（例如：方向、友誼的表示、下流的手勢）則視社會行動者所共享的文化意義體系而定。

2. 什麼是社會實在的本質？

詮釋取向視人類社會生活為一種成就。是一種互動中的社會性動物有意創造出的目的性行動。相對於唯實論的觀點（實證主義和批判社會科學所共享）即社會生活就「外在於那裡」，獨立在人的共識之外，詮釋社會科學主張實體不是等待被發現。相反的，什麼是社會世界呢？大體上就是人們所知覺社會生活存在於人們的經驗中，由人們所賦予意義的。它是流動易變的。

人們透過持續不斷地溝通和協商來維持它。人們根據環繞在他們周遭一些人與事的未測試過的假設和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來運作。

詮釋取向認為社會生活是是以社會互動為基礎，而且是社會性地建構意義。人們擁有一種內在經驗的實體感。這種關於實體的主觀感受緊緊地抓住人們的社會生活。

外顯的人類行為往往是真實社會意義的一種間接的、模糊的指

標。詮釋社會科學指出「我們可以接近了解其他人，不過，只能透過間接的方式：我們最初所經驗到是姿勢、聲音和行動，而且也只有在這種理解的過程中，我們才可以從外在符號走進蘊藏的內在生活」(Bleicher, 1980: 9)。

對詮釋研究者而言，「社會實在」是以人們對它的定義為基礎。一個人對情境的定義會指引其如何在變動不居的情境中來賦予意義。例如，我的社會實在包括用什麼方式來對待一個稱為「母親」的女性。我摟抱她、在她生日時送她禮物，對她吐露心聲。從文化的角色期望以及長期在這個親密的社會關係中的經驗，我學會這麼做。然而，這個關係的社會實在並不是固定的。情境的定義可能會發生戲劇化地轉變。例如，這個社會實在可能會被砸碎，例如，如果這個女人言行變得異常，不再認識我了，被診斷為精神異常。

實證主義者假定每個人都共享相同的意義體系，我們都以相同的方式經驗這個世界。詮釋研究取向則認為每個人對社會或物理實在的經驗方式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對詮釋研究者而言，核心關鍵的問題在於：人們如何經驗這個世界？他們會創造、分享意義嗎？詮釋社會科學舉出很多例子，這些例子顯示即使是看到、聽到、甚至觸摸到相同物體的幾個人，都可能獲得不同的意義，或是做出不同的詮釋。詮釋研究者主張實證主義者逃避了重要的問題，並把經驗世界的單一方式強加在別人身上。對照之下，詮釋社會科學假定，詮釋人類經驗、或實在的方式是多元的。總之，詮釋社會科學的取向認為「社會實在」是由在日常社會互動中，建構意義與創造詮釋的人們所組成的。

3. 人類的本質為何？

一般人皆投注於一種透過社會互動來創造彈性意義體系的歷程中。然後他們運用這些意義去詮釋他們的社會世界並使他們的生活合理化。人類的行為或許有其基本型態與規則，但這並不是由事先存在而等待被發現的法則所導致。這些型態是源自於不斷演化的意

義體系或社會傳統，這些體系和傳統是人們在社會互動中所形塑的。詮釋研究者所設定的重要問題在於：人們真正信以為真的是什麼？他們認為切身相關的是什麼？他們又是如何來定義他們正在做的事？

詮釋研究者試圖發現行動中的人們如何賦予行動意義。而認為根據一些抽象的邏輯理論來演繹社會生活之作法並不具多大的意義，因為這些理論往往無關於常人的感覺與經驗。人們對自己的行動都有其見解，研究者必須去認識人們所使用的理由。個人的動機是一定要納入考量的重要因素，即使它們是非理性的、帶著濃烈的情緒、或是摻入錯誤的事實與偏見。

一些詮釋取向的研究者指出，只有在科學社群明白人們是如何創造與運用意義系統、常識又是如何發展的、以及人們如何在情境中應用他們的常識之後，實證主義者所尋找的法則才有可能建立。其他詮釋取向研究者則認為：根本沒有關於人類社會生活的法則，所以這種找尋無非是緣木求魚。Schwandt (1944: 130) 指出「當代詮釋主義者與建構主義者都不可能去抱持任何未受質疑的『基礎』以進行任何詮釋。」(原文中所強調)。換句話說，意義的創造與現實的感受都只是人心所塑造，沒有一套意義比其他意義來得更好、或更優異。例如，對於想要去發現像失業導致虐待兒童這類人類行為法則的念頭，詮釋取向的研究者的看法是：樂觀來說是時候未到，悲觀的說則是冒險躁進。相反的，他／她會想要瞭解人們在失業中的主觀經驗，以及失去工作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具有何種意義。同樣的，詮釋取向的研究者也想要知道虐待兒童的人如何解釋他們的行動、他們為施虐所提出的理由為何、以及他們對虐待小孩的感受為何。他／她探索成為失業者的意義以及虐待兒童的理由，以瞭解身在其境的當事人所遭逢的身心變化。

4. 科學與常識間之關係為何？

實證主義者認定常識不如科學。相對的，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則

主張常人皆運用常識來引導他們的日常生活；因此，研究者必須先能抓住常識。人們隨時都在運用常識。常識就是那一堆人們用以組織與解釋世上的事件的日常生活理論。弄懂常識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其中蘊藏著人們奔走於日常社會互動時所使用的意義。

有一派詮釋取向主張：常識與實證主義的法則是用來詮釋世界的兩種對立方式；亦即是說，它們是兩套截然不同的意義體系。但常識與科學法則誰也沒有全部的答案，也無孰優孰劣之分。相對的，詮釋取向的研究者認為任一種在其所屬的領域內，同樣地都有其無可取代的重要性；每一個都是因其特有之目的透過不同的方式而創造出來的。

常人若凡事只依照科學來行事，則將無法在日常生活中正常運作。例如，要煮個蛋，人們所運用的是非系統化的經驗、習慣、和猜測。若是完全遵照自然科學的作法，則一個人必須先弄懂把水加熱的物理學定律，以及控制雞蛋內部化合物變化的化學定律。即使是自然科學家，當他們放下專業領域中的「研究科學」時，在日常生活裡，他們所運用的也是常識。

詮釋取向主張：要瞭解人們，常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訊息來源。一個人的常識與對現實的感受是出自於實用取向以及他們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套假定。人們無法絕對地確定常識是真的，但為了讓一切就緒，他們必須相信常識為真。詮釋哲學家 Alfred Schutz (1899-1959) 將這種現象稱為**自然態度 (natural attitude)**。就是基於這項假定：世界在你出世以前就已存在，在你撒手離去之後仍將屹立。於是，人們根據他們在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創造的意義體系，發展方法來維繫或複製他們對現實本體的感知。

5. 一個關於社會現實的解釋或理論是由什麼所組成？

實證主義者相信社會理論應該與自然科學的理論同樣具備著演繹的公理、定理、與相互關聯的因果律。相對的，詮釋社會科學的理論則在敘述一個故事，揚棄了相互關聯的因果律及命題交錯形成

的迷宮。詮釋社會科學的理論描述並詮釋人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過活。它包含了概念與有限的推論，但並未誇張地遠離被研究者的經驗與內在現實。

詮釋取向是**表意的**（ideographic）與**歸納的**（inductive）。表意的意指這種取向係針對某些事件提供一種符號化的表徵或「豐厚」的描述。一份詮釋研究報告讀起來可能比較像在讀一本小說或是一部傳記，而不像是一段數學證明。它有很豐富的細節描述，也不是那麼抽象。一段社會情境的詮釋分析，就像對一件文學作品的詮釋，有其內在的一致性並且是忠於文本的，這裡所指涉的是對研究對象具有意義的日常經驗。

詮釋理論可以讓讀者去感受他人的社會現實。它是透過揭露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意義、價值、詮釋基模與生活規則來達成其目的。例如，它可能是描述人們在某種情境下用來確認與詮釋他們經驗的主要「**典型**」（typification）。所謂「典型」就是人們用以歸類並組織他們所經驗之成串生活事件的非正式模式、基模或是一套信念。

因此，詮釋理論像似一幅描繪社會世界輪廓的地圖，或像是介紹風俗民情的旅遊指南。例如，一篇有關職業賭徒的詮釋報告就會告訴讀者這類人一生的發展以及其日常所關切之事物。它描述所研究的特定人物、所觀察的場地和活動以及賭博所用的策略。讀者因而能認識職業賭徒的交談方式，他們怎樣看待別人，以及什麼是他們的憂懼與奢望。研究者也提出一些推論和組織過的概念。報告的主體就在於對賭界進行刻劃入微地描述。理論與證據交織以創造出一個融合的整體；概念及推論和文章的脈絡緊密結合。

6. 我們如何辨識一項解釋的對或錯？

如何評價一個理論呢？實證主義者會透過一套標準的程序來考驗假設。他們邏輯地根據理論來演繹，蒐集資料並分析事實，所用的方式是其他科學家可以照樣複製。當解釋通過複製的檢核，就視

之為真。對詮釋社會科學而言，一個理論是否為真，取決於它對研究對象而言是否有意義、能否讓別人有更深刻的瞭解、或是能否進入研究對象所感知的現實。如果研究者傳達了對他人推理、感受和觀點的深層理解，該理論或描述就是正確的。或許也能夠進行預測，不過這裡的預測僅發生在兩個非常親近的人之間，好比已經結婚很久的一對夫妻。一項詮釋取向的解釋也會註明行動者的觀點並將之轉譯成一種讀者可理解的形式。Smart (1976: 100) 稱此為「適當性假定」(the postulate of adequacy)：

適當性假定聲稱：如果將一份關於人類行動的科學解釋類比為拿給演員看的劇本，它必須讓該行動者看得懂、能夠將之轉化為行動，甚至讓其同伴只需套用生活常識就能揣摩理解。

一份詮釋取向研究者對另一個人意義體系的描述是一種**二手報告** (secondary account)。就像一位訴說外地見聞的旅行者一般，研究者也非常人。這樣的旁觀絕不等於由研究對象本身的直接報告，不過越是能夠縮近與當地人之直接報告的差距就越好。例如，要檢定一份詮釋「職業賭博」報告之真實性的方法，就是找位職業賭徒來讀這份報告，以檢視其正確性。一份好的報告會提供讀者關於職業賭博領域的豐富資訊，因此若是讀者能有所獲，則當他遇到一位職業賭徒時，由於他對賭博術語、外觀、生活型態的瞭解，有可能會導致賭徒反問讀者是否也是一位職業賭徒。

7. 好的證據或事實資訊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就實證主義而言，所謂好的證據就是可觀察的、精確的，而且無涉於理論與價值。相對的，詮釋社會科學認為脈絡與意義的獨特性是瞭解社會意義所不可或缺的。有關社會行動的證據不能從其發生的脈絡中抽離出來，也不能無視於社會行動者所賦予它的意義。誠如韋伯 (1978: 5) 所言：「當我們透過同情的參與，就能夠抓

住行動發生的情緒脈絡，此時就會獲致感同身受的正確性。」

詮釋社會科學認為事實是變動不居的，蘊藏於詮釋取向的意義體系之中；事實並非毫無偏差的、客觀的與中性的。「事實」是特定脈絡下的行動，取決於活在社會環境中當事人的解釋。對於實證主義所做的假定——由中立的局外人來觀察行為並見證清楚客觀的事實——詮釋社會科學的研究者質疑這樣的假定，將之視為如下的問題：人們如何觀察社會生活中的曖昧事物並賦予意義？詮釋取向的研究者指出：社會情境充滿著模糊與曖昧。因此就無法逕自發現客觀的事實。大部分的行為舉止或話語都可能有好幾種意義，也能從多方面來詮釋。活在曖昧不明的社會生活洪流中，人們不斷透過評估又評估、解釋再解釋情境中的線索來合理化所遇到的事，直到他們「知道發生什麼事」為止。例如，我看見一個女人伸出手來，手心向前。即使是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都能有多種不同的解釋；不知其所處情境，我就無法知道這個舉止的意義。那可能意謂她在擋開一位有竊意的扒手、或是吹乾她的指甲油、招呼一輛計程車、玩賞一枚新戒指、攔車來載她、或是在熟食專櫃前說要買五個烘餅（參閱Brown, 1989: 34）。只有將事件發生的社會情境納入考量，人們才能夠對某個舉止或話語賦予恰當的意義。

詮釋取向的研究者極少會問客觀的調查問題、累積多人的答案、宣稱使某些事物有意義。每個人對調查問題的詮釋都必須放在情境脈絡裡來考量（如，個人過去的經驗或調查晤談的情境），而且個人答案的真正意義也會隨著訪問或晤談的情境而變化。此外，由於每個人對問題與答案所賦予的意義多少會有不同，將這些答案加以結合只是製造垃圾，沒有任何意義。

當研究一個環境或資料時，俗民方法論學派的詮釋取向研究者經常使用括弧法。括弧法（bracketing）是一種心智運作，作法是研究者先辨識出一個社會情境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假設有哪些，再擺在一邊。研究者質問並檢視對牽連其中的人有「明顯」意義的日常事件。例如，在辦公室中，一位年近三十歲的男同事向一位男研

究者說，「今晚下班後，我們有個壘球聚會。你要參加嗎？」不用說研究者應該知道壘球的規則、有一個壘球手套、在比賽前會換下西裝穿上運動服。括弧法揭示出什麼是「每個人都知道的事」——哪些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這有助於研究者揭示該社會情境之所以發生某些事的關鍵特徵。它也讓行動底下潛藏的架構無所遁形。

8. 何時社會政治的價值介入科學？

實證主義研究者呼籲摒去價值立場，讓研究在無政治色彩的環境下進行。詮釋研究者的觀點與之恰成對比，主張研究者應該反省、檢視再檢視、分析自己的觀點與感受，這也是研究歷程的一部份。詮釋研究者有必要（至少暫時地）去感受與分享其研究對象所擁有的社會與政治承諾或價值。

詮釋取向的研究者並不企圖追求價值中立。事實上，詮釋社會科學質疑達成這種理想的可能性。這是因為詮釋取向的研究認為無處無事不都滲透著價值與意義。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價值中立，只不過另一種意義體系和價值——實證主義科學的價值。詮釋取向的研究者極力主張讓價值無所遁形，但不要假定有較佳或較差的一套價值。研究者的適當角色是扮演一個「熱情的參與者」（Guba and Lincoln, 1994: 115），亦即融入研究對象之中。

摘要

詮釋研究取向多年來都扮演著實證主義的忠實反對者。雖然有些實證主義社會研究者接受詮釋研究取向在探索研究中的貢獻（參見第2章），但認為它合乎科學的實證主義者則為數並不多。在稍後的章節中，在進一步認識田野研究時你會再讀到有關詮釋取向的觀點，在歷史比較研究中也會提到一些。有些社會研究技術是以詮釋取向為基礎。這些技術著眼於能敏銳反映情境脈絡，運用各種方法深入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且對如何達成感受和世界觀之同理瞭解的關心，勝於去檢定人類行為的法則。

批判社會科學

批判社會科學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CSS) 為方法論的意義提供了第三種可能性。此一取向的不同版本包括辯證唯物論、階級分析和結構主義。批判社會科學融合了「法則」與「表意」兩種取向。它接受了許多詮釋取向對實證主義的批評，但加上一些自己特有的見解，也有不同於詮釋社會科學之處。此一取向可以溯源到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 和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再經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1903-1969)、佛洛姆 (Erich Fromm, 1900-1980) 以及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等人加以精緻化。批判社會科學常會令人聯想到衝突理論、女性主義分析以及激進心理處遇學。更被視為是植基於「批判理論」，該理論係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在1930年代率先倡議。批判社會科學批評實證主義科學對「理性」的用法是狹隘的、不合乎民主的，同時也失去人性。阿多諾曾在多篇論文中點出此一觀點，包括「社會學與實徵研究」(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1976a) 與「社會科學的邏輯」(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1976b)。哈伯馬斯 (Jurgen Habermas, 1929-) 是這個學派至今健在的著名代表人物，在《知識與人類意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1971) 一書中將批判社會科學又加以精進。在教育領域中，佛列里斯 (Paulo Freire) 的《受壓迫者之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70) 也歸屬於批判社會科學取向之列。

另一個例子是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 (參閱Schwartz, 1997)。雖然其著作議題涵蓋甚廣，Bourdieu倡議一種在理論和研究上有別於以往的取向。該取向的一些特徵使其被納入批判社會科學之列。這個基本取向是既反實證主義又反詮釋取向。他一方面拒絕實證主義的客觀的、法則似的量化實徵取向，另一方面也拒斥主觀的、唯意志論的詮釋社會科學。Bourdieu極力主張社會研究應該是反省的 (亦即，對本身的探討和批判就是研究的核心要務) 而且

也必然是帶有政治意味的。他也堅信研究的目標就在於揭發和拆解日常事件。近來，一個被稱為**唯實主義**（realism）的哲學取向也被統整到批判社會科學中。

詮釋社會科學批評實證主義不能處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意義及其感知的能力。也認為實證主義忽略了社會脈絡並違反人性。批判社會科學同意這些關於實證主義的批評。它也相信實證主義對其立場的辯護，是基於其假定有一個亙古不變的社會秩序，而非將此時的社會視為只是持續不斷進程中的一個橫切面。

批判研究者批評詮釋取向太強調主觀性和相對性。批判研究者指出詮釋社會科學將所有的觀點都等同視之。詮釋取向對人們想法的重視程度要勝過對實際狀況，強調地方性、微觀層面、短期的處境，而忽視較寬廣的、長期的情境脈絡。詮釋社會科學很顯然地只關注主觀的實在。對批判研究者而言，詮釋社會科學是無關道德的與被動的。它並未選取一個堅實的價值立場或是主動地幫助人們看穿周遭謬誤的假象以提升他們的生活。一般而言，批判社會科學將社會科學界定為是一個探究的批判歷程，它穿透表層的假象以揭示物質世界的真正結構，其目的在於協助人們改變處境並為他們自己建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問題

1. 為什麼要進行社會科學研究？

批判研究者從事研究係為了批判和轉變社會關係。為了實踐這個理想，他們揭開社會關係的潛藏的源頭並提升人們的權能，特別是那些較弱勢的人。批判研究的目的就是為了改變世界。更確定地說，社會研究應該打破神話、揭穿隱藏的真相、並幫助人們為自己改變這個世界。在批判社會科學裡，其目的在於「用一種特定方式來解釋社會秩序，這種方式使其本身成為導致社會秩序轉變的催化劑」（Fay, 1987: 27）。

批判社會研究者是行動取向的。他 / 她對事物的現狀感到不

滿，追求戲劇性地改進。實證主義者通常嘗試去解決由政府或企業菁英所定義的問題，不會「晃動整艘船」。相對的，批判研究者或許會創造問題，他們「有意地掀起、挑出更多的問題，以迫使政治與行政部門的統治菁英能夠有所調整，而不僅止於去『解決』」（Offe, 1981: 34-35）。批判研究者提出令人為難的問題、拆穿偽善、調查狀況以鼓勵戲劇性地草根行動。「所有科學的重點，真正的所有學習，就在於改變和發展出我們的理解並減少假象……學習就在於減少錯覺和無知，它幫助我們掙脫至今未被覺察到的限制、教條與謬誤等的宰制」（Sayer, 1992: 252）。

例如，批判研究者執行一項凸顯出租公寓存在種族歧視的研究。白人房東拒絕出租房子給少數民族的房客。批判研究者不會只發表一篇報告，然後坐等市政府的公正主管部門採取行動。研究者會把報告提供給新聞媒體，並拜會基層組織來討論研究的結果。他／她會與社運人士合作以社會正義之名發起政治行動。當基層人士到房東的辦公室監督，申請承租公寓的少數民族人士蜂擁而至、或是組織到市政府遊行要求採取行動，批判研究者預測這將迫使房東出租房子給少數民族。研究的目標就是在提升權能。Kincheloe and McLaren（1994: 140）曾這麼說過：

要對批判研究有最佳的瞭解就必須從提升個人權能的脈絡中來著眼。想要高舉「批判」之名的研究，就必須和對抗某個特殊社會或社會中某個特殊層面內不公義之企圖加以結合。如此研究才能成為一個轉型的力道，不會因被標上「政治的」標籤而進退兩難，也才能無懼於和解放意識劃上等號（Kincheloe & McLaren, 1994: 340）。

2. 社會實體的基礎本質為何？（本體論的問題）

如同實證主義，批判社會科學採取唯實論的立場（亦即，社會實在是「外在於那裡」等待被發現）。不同於實證主義的是，它採

用的是歷史唯實論，在這種觀點裡本體實在是不斷受到社會、政治、文化等等因素所形塑。社會實在隨時間的遞嬗而演變，它可能有會迷惑誤導我們的表象，在深層裡則存在著不可觀察、歷久不衰的真實權力結構。批判社會科學假定社會實在不斷在演變，演變力量則來自社會關係或制度的緊張、衝突、或矛盾。批判社會科學把重心擺在演變與衝突，特別是組織社會關係之方式所蘊藏的弔詭與衝突。這些弔詭或內在衝突更能顯示出社會實在的真正本質。

有一個生物學方面的比擬正足以說明這種弔詭。死亡與誕生很顯然是對立的，然而死亡卻肇因於出生。我們打從出生之日起就開始邁向死亡。乍聽之下似乎有點奇怪，但只要活著身體就會老化衰敗。這裡就存在著內在矛盾。出生必然帶著其否定——死亡。因此，隨時都存在著生長與老化之間的內在緊張。活著，我們的身體必然會老化，或邁向死亡。從互相交織的演變歷程來看，死亡和出生的對立似乎不像他們表象上那麼嚴重。有時候，這種關於弔詭的內在衝突或矛盾會帶來改變的想法，被稱為**辯證 (dialectic)**。

改變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異常地極為緩慢，然後突然地加速。批判研究者會研究過去或不同的社會以更能看清變化的本質，或是發現組織社會生活的替代方式。批判社會科學的研究旨趣就在於新社會關係的發展、社會制度或社會的演化，以及重大社會變革的原成因。

有一種批判取向強調社會變遷和衝突並非總是顯而易見的。社會世界充滿著假象、迷思、與扭曲。我們對世界的初步觀察往往是零碎且讓人誤解的，因為人類的感官有其限制，於是知識也隨著受限。表層實在的外觀並不必然是起於有意的偽裝。我們對於物體、事件、或社會關係特徵的第一類接觸很難揭露一切。這些假象讓社會上的某些團體擁有權力能夠剝削他人。德國社會學家與政治思想家馬克斯極力強調：「在每一個時代都一樣，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主流的思想；……擁有供其使用的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同時也控制了心智生產的工具，於是……缺乏心智生產工具的人們的思想便

只能受其支配」(Marx & Engels, 1947: 39)。

批判科學取向主張社會實體具有多元層次。在可直接觀察的表面實在之下，有一個深層結構或看不見的機制在支撐。表層社會實在的事件和關係都是植基於偶然觀察之表象下的深層結構。只要付出心力我們就可以使這些結構現形。強而有力的直接質問、一個指引何處著眼的好理論、明確的價值立場以及歷史取向，能夠幫助批判研究者穿透表層實在並發現其下的深層結構。

詮釋社會科學與批判社會科學兩者都將社會實在視為是變動不居的而且受到社會意義的支配。但對詮釋社會科學所重視的微觀層次的人際互動及其接受任何意義體系的觀點，批判科學取向則不同意。批判社會科學說：雖然主觀意義不可忽視，但的確存在著真正的客觀關係，是它塑造了社會關係。批判研究者探究社會情境，將之置於更大的鉅觀層次之歷史脈絡中來探討。

例如，一位詮釋研究者探討男老闆與其女秘書間的互動，對他們的行為規則、詮釋機制、與意義體系提供一篇豐富精彩的報導。相反的，批判研究以某個觀點切入（如，女性主義）並強調在詮釋描述中所忽略的議題：為何老闆是男的、秘書是女的？為什麼老闆與秘書的角色會有不相等的權力？為什麼大型組織所創造的這些角色會遍布整個社會？在歷史上不對等的權力是如何形成的，秘書都是女的嗎？社會上的性別角色如何影響此一關係？為什麼老闆能夠講一些令人不悅的粗俗笑話？老闆與秘書這兩個衝突的角色各自所面對的生活處境又是如何？（老闆享有大筆的薪資、鄉村俱樂部的會員、新汽車、大型豪宅、退休規劃、股票投資等等，而秘書是低時薪、需要照顧小孩、擔心要付的帳單、電視是她唯一的娛樂等等）秘書可以聯合其他人來挑戰那些老闆們的權力嗎？

3. 人類的本質為何？

實證主義將社會力量看成好像有其自己的生命，其運作無關於人們的個人願望。這些社會力量有超越並控制人們的能量。批判科

學的途徑拒斥這種物化（reification）觀點。物化就是將你活動之產物視為是一個獨立的存在，和你無關。就是不斷將你從你所創造之物中分離或去除，直到你不再認為它是你的一部分或是你必須具備的事物。一旦你再也看不見你的貢獻，把你所創造之物看成是一個外在力量，你就失去對命運的掌控權。

例如，兩個人從相識、戀愛、結婚、到共組一個家庭。在兩年之內，男的感到無助，好像被無形的力量所擄獲。他和他的太太為了小孩教養與家庭瑣事而爭吵。這個男人的社會價值認為換尿布與洗碗筷是他不該做的事。結婚的決定，過這樣的生活都是他社會化與個人決定的產物。因此，那股發生在他身上令使他感到綁手綁腳陷於無助的無形力量就是他自己的果報，雖然他已忘了這些。如果他察覺到困住他的力量（諸如，社會價值、社會角色和他自己的決定）並採取行動來改變它們（如，修正他的生活方式），他或許就可以找到解決之道，可以感到不再那麼綁手綁腳。

批判研究者主張：人們有眾多未實現的潛能。人類是有創造力的、具有可變性及適應能力的。儘管具有創造力與改變的潛能，人們仍然會受到他人的誤導、虐待、與剝削。他們陷於由社會意義、義務和關係等交織而成的網中，他們看不見改變的可能性，因此失去其獨立性、自由及對他們生命的控制。當人們願意讓自己忍受孤立、擺脫世俗牽絆時一切才可能發生。人們的潛能只有在他們驅散假象，聯合起來改變社會時，才有可能實現。人們可以改變社會世界，但日常生活中的欺詐、孤立和受壓迫的處境往往阻止他們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例如，好幾代以來，有很多美國人都有這樣的迷思：女性不如男性，男性天生負有做重大決策的權力，還有女性無力承擔專業責任等。在1960年代以前，多數的人們相信女人的能力不如男人。但到了1980年代，只有極少數的人還保有這樣的想法。這種在信念上與社會關係上產生的戲劇化變革，是導因於一種新的覺醒以及有組織的政治行動以打破迷思，這些迷思遍存於法律、習俗和官方

政策，也存在於更不可忽視的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信念裡。

4. 科學和常識的關係為何？

批判社會科學對常識的看法是植基於「**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這個觀點——人們誤解且違逆了在客觀實在下他們擁有的真正最佳利益。客觀的實在藏在迷思與假象之後。在詮釋社會科學看來，「**錯誤意識**」的說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那意味著社會行動者使用了一個錯誤的或是與脫離客觀實在的意義體系。詮釋取向主張人們創造並且使用這些體系，研究者只能描述這些體系，而不去評判他們的價值。批判科學取向則主張社會研究者應該探討主觀的想法和常識，因為這些塑造了人們的行為。不過，他們也充滿了迷思與假象。批判社會科學假定存在著一個客觀的世界，在那裡資源與權力的分配是不均等的，而常識又是以其為基礎。

要看清批判研究者所說的結構並不容易。研究者必須先揭開其表象的神秘面紗。光是細心地觀察還不夠。因為這並未說出要觀察什麼，而且觀察一個假象也不等於是驅散它。研究者必須使用理論去鑽透表面的關係，觀察危機與劇烈衝突的時期，探查其間的聯結、回溯過去並考量未來的走向。要揭開實在的更深層是困難重重，但卻是非做不可工作，因為表面的實在充滿了意識型態、迷思、扭曲、與錯誤的外貌。「常識傾向對社會現象習以為常，甚至假定既存的就是該有的。建立在不對常識加以批判之社會科學……只會複製這些錯誤」（Sayer, 1992: 43）。

5. 社會實在的解釋或理論是由什麼所組成？

實證主義是植基於「**決定論**」（determinism）的觀念：人類的行為是由人力無法掌控的因果律所決定。而詮釋社會科學抱持著「**唯意志論**」（voluntarism）的假定：人類有很大的自由意志來創造社會意義。批判科學取向則介於其間，兼採「**決定論**」和「**唯意志論**」。批判社會科學主張人們受限於物質環境、文化脈絡和歷史

處境，但也在其中他們找到自己。人們所生活的世界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塑造了他們的信念與行為。不過，人們並未被關進一套無法遁逃的社會結構、關係或法則中。人們可以發展新的理解和觀點使自已有能力改變這些結構、關係與法則。首先，他們必須發展出對未來的願景並一起努力追求改變，則他們就能夠推翻壓迫他們的人。概括來說，命運的確是由人們自己所塑造，只是並非出於他們自己選擇的條件。

一個十足的批判科學解釋會揭開假象的神秘面紗，描述情境的深層結構，解釋如何才可以完成改變，並提供一個可能未來的願景。批判理論不只在描述用來解釋可觀察之實在的無形機制，更對人類處境加以批判並蘊藏著一個改變的計畫。

批判科學研究取向不太強調人類行為的固定法則，因為法則被視為是變動不居的。深層社會結構所設下之法則與限制並不能完全控制人類的行為。人們可以改變大部分明顯的社會法則，雖然這很困難需要長期的奮鬥。透過確認社會關係的因果機制、啟動裝置或槓桿，批判社會科學可以解釋某些行動如何以及為何會帶來改變。

6. 我們如何辨識一項解釋的對或錯？

實證主義者透過演繹假設，複製觀察來考驗假設，然後將結果結合以支持律則等程序來檢驗理論。詮釋研究者則透過檢視意義體系與行為規則對研究對象而言是否合理來支撐理論。批判理論則試圖提供給人們一種資源，以幫助他們瞭解並且改變他們的世界。研究者透過正確描述由深層結構所產生的情境，然後應用該知識去改變社會關係，來檢視批判理論。一個好的批判理論教導人們認清他們自身的經驗，幫助他們瞭解他們的歷史角色，還可以用來改善處境。

批判理論揭示實際的行動或建議該做什麼，但是理論也會根據其使用結果來修正。批判理論與其試圖解釋的世界一起成長共舞。由於批判取向試圖藉著透視不斷變遷的潛藏結構來解釋和改變這個

世界，因此對某個解釋的檢驗就不是靜態的。檢驗理論是動態的、是不斷應用理論和修正理論的持續過程。知識在以行動來消除無知並擴大洞識的持續過程裡漸次增長。

批判取向透過實踐來區辨理論的好壞。它將理論放到實務中並根據應用的結果來重塑理論。**實踐 (Praxis)** 意謂當解釋能夠幫助人們真正瞭解世界並能採取行動來改變世界，解釋才會被重視。如同 Andrew Sayer (1992: 13) 之主張：「知識主要是透過活動來獲得，可以包括企圖改變我們的環境（藉著勞動或工作）的活動，也可以是與他人互動的活動。」

批判研究嘗試去除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分立、科學與日常生活之間的歧異。例如，一位批判研究者對租屋歧視發展出一套解釋，他會以它為根據來嘗試改變現狀，再根據其成效來檢驗這套解釋。如果這套解釋認為深層的經濟關係導致歧視，房東拒絕把房子租給少數民族是因為租給非少數民族在收益上才有保障。那麼若採取政治行動使得把房子租給少數民族也同樣有利可圖，就應該能改變房東的行為。相反的，如果該解釋指出是深層的種族仇恨導致房東的歧視，那麼基於利益考量的行動就不會奏效。批判研究者將會重新透過新的研究並結合政治行動來檢視房東行為基礎的種族仇視。

7. 好的證據或事實資訊看起來像什麼樣子？

實證主義假定存在著凡有理性的人都會同意的無庸置疑的中立事實。它的二元論的核心信念主張社會事實就像物質一般，其存在與價值或理論無涉。詮釋取向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創造的意義所建造，在其中的人們不斷創造並協商其意義。它拒斥實證主義的二元論，改而強調主觀性。證據就存在於涉及其間之人的主觀理解。批判取向嘗試去銜接客體與主體間的裂縫，它主張物質狀態下的事實，其存在是獨立於主觀知覺之外，但是事實並非理論中立的。相反的，事實需要詮釋，而詮釋則是發展自一個價值、理論與意義所

組成的架構。

例如，有一項事實，即美國花健康療護方面的費用佔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高於其它任一先進工業國家，但在嬰兒死亡率上卻只排在最低的第十四位。一位批判研究者如此解釋這項事實，他指出在美國還有許多人是沒有健保的，沒有一個體系照顧到每一個人。此一事實包括健康療護的方式是透過一個複雜的體系來施行嘉惠部分人，這個體系包括商業保險公司、藥廠、醫院，以及其它因當前這種設計而獲益甚豐的人士。當社會中較弱勢或貧困的階層只能獲得低品質或甚至沒有健康療護的同時，卻有部分有力團體正愈加富裕。批判研究者關注這些事實並質問誰受益了？誰又受損了？

理論幫助批判研究者找出新的事實並加以去蕪存菁。理論也是某種型式的地圖，它告訴研究者到哪裡去尋找事實，以及當找到事實後又該如何詮釋。批判取向認為自然科學的理論也扮演同樣的角色。例如，生物學家透過顯微鏡觀察紅血球細胞，這個「事實」也是植基於有關血液與細胞的理論以及生物學家在顯微鏡現象方面所受的訓練。沒有這個理論與教育，生物學家所看到的只是無意義的一些小點。很清楚地，事實與理論因此交織在一起。

例如，在《非洲的不平等》（*Inequality in Africa*）一書中，Nafziger（1988）就採取批判觀點。他批判所謂收入不平等的「事實」，是由於在一個錢幣尚未普及的社會中，卻只去測量其錢幣收入。他也批判諸如土地分配和嬰兒猝死率等議題上的「事實」之詮釋。這些事實忽略了以某一農場為生的人數，以及忽視了一個國家中的外圍族群（南非白人），該族群的嬰兒猝死率遠低於同一國家的其它族群。取而代之的，那吉格尋找包羅更廣的多樣事實（如，出生率、城鄉差距、種族隔離、國際貿易、政治權力）並且穿透這些表面事實來建立其間的關聯性。他問道：為什麼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只有非洲變得更貧窮？他的理論幫助他辨識出一些主要的社會團體（如，政府領導者）與階級（如，農民）。那吉格也探究各式各樣的趨勢或政策是否服務到每個團體的利益。

並非所有的理論在尋找與理解關鍵事實方面都同樣有用。理論是植基於對這個世界樣式的信念與假定以及一套道德政治的價值之上。批判社會科學主張有些價值是優於其它的價值。於是，為了詮釋事實，人們必須瞭解歷史，採取一套價值並知道到那裡去找尋深層結構。不同派別的批判科學提供不同的價值立場（如，馬克斯主義對女性主義）。

8. 何時社會政治的價值介入科學？

批判取向具有行動主義者的傾向。社會研究是一種需要研究者表明價值立場的道德政治活動。批判社會科學反對實證主義價值中立的迷思。它也攻擊詮釋研究取向的相對主義（每件事都是相對的也沒有事情是絕對的）。在詮釋取向的觀點裡，天才眼中的實在與白癡眼中的实在是同樣有效和重要的。我們並沒有（就算有，也微不足道）可以用來評判對立實在或衝突觀點之立足點。例如，詮釋研究者不會指責種族主義者的觀點是錯的，因為任何觀點對相信它的人來說都是真的。批判取向則認為正確的觀點只有一個或少數一些。其它觀點要非錯得離譜就是誤導人的。所有的社會研究都必須從一個價值或道德觀點出發。對批判社會科學而言，追求客觀並不等於追求價值中立。客觀性意謂一個未受扭曲的真正實在；「它挑戰科學必須受嚴防政治干預之信念。它極力主張某些政治——追求解放的社會變革之政治——可以提升科學的客觀性」（Harding, 1986: 162）。

批判社會科學主張：否認研究者帶有某種觀點的信念其本身就是一個觀點。那是一種工匠的觀點：做研究不要去理會道德問題；滿足贊助者並服從命令。像這樣的觀點是主張科學是一種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工具器材。當納粹的科學家們執行無視人性的實驗並辯稱他們是不該受責備的，因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且「只是科學家」時，上述的觀點自然引起強烈的批判。實證主義採取這樣的研究取向，並且生產技術官僚的知識——知識的型式之一，最適合

有權力主宰或控制其他民眾的人。對批判社會科學來說「行為科學的政治用途已經使實證主義成為宰制族群的合法意識型態，……價值中立對精心設計的官方控制而言已經製造一個倫理議題」（Brown, 1989: 39）。

批判取向拒斥實證主義與詮釋社會科學，因為它們要不是置身事外，就是僅止於關心對世界的研究，卻未對世界採取行動。批判社會科學信奉知識就是力量。社會科學知識可以用來控制人們，也可以藏在象牙塔內供知識份子把玩，或是提供給人們幫助他們掌控並改善自己的生活。研究者所研究的、如何研究，以及怎麼應用結果等都有價值與道德的涉入，因為知識對人們的生活具有實質的影響。只研究零碎行為，或是無法穿透表象、或是把結果埋藏在圖書館裡的研究者都是面臨一種道德抉擇。這種抉擇是從研究對象抽取資訊而未將他們融入或解放（參閱資訊箱4.1）。批判科學質疑這種抉擇的道德性，即使它不是有意如此。研究者的適當角色是要成為「轉型的知識份子」（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Guba & Lincoln, 1994: 115）。

摘要

雖然很少全職的研究者採用批判科學取向，不過社區的工作團體、政治組織、與社會運動則經常採用這種觀點。只是它很少出現在學術期刊上。批判研究者可能使用任何一種研究技術，但他們比較偏好使用歷史—比較法。這是因為它強調改變，而且它還可以幫助研究者揭穿深層結構。批判研究者與其它取向之不同主要不在於研究技術，而在於如何切進一個研究問題、所提出問題的形式、和做研究的目的。

女性主義和後現代研究

你或許也聽過另外兩種尚在建構且不是那麼出名的研究取向。

資訊箱 4.1

擴展個案方法與批判社會科學

Michael Burawoy (1998) 的擴展個案方法就是一個批判社會科學的例子。他說它把反省科學應用到民族誌研究或實地研究。反省科學是某種型式的批判社會科學，它主張社會研究應該是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對話。因此，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不該像實證主義只存在於科學家之間；它發生在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Burawoy 指出反省科學的四項特徵：

1. 研究者和主觀的參與者互動。在互動中所產生的分裂與動亂幫助我們接觸和更瞭解社會生活。
2. 研究者採取受試者在特定情境下的世界觀，但並不停在那裡。研究者匯集很多個別受試者和特定情境的觀點，將它們融入一個更寬大的社會歷程中。
3. 研究者看待社會世界是兼採由內向外(即從被研究者的主觀觀點)和由外向內(從作用於人們身上的外在力量之觀點)。
4. 研究者持續地建立和重建它們的理論。這發生在和研究對象間的對話，以及和科學社群中其他研究者間的對話。

Burawoy 使用擴展個案方法研究尚比亞的礦工。他主張實證主義社會科學最適合於人們「無力抗拒更大的政經系統」換句話說，在人們受宰制且對生活無力控制的情境。批判社會科學則適用於人們試圖抗拒或降低權力的差異和宰制之脈絡。它強調解放的情境，在裡面的人們會質疑和挑戰生活中統治和控制的外在力量。

它們是女性主義 (feminist) 與後現代 (postmodern) 社會研究。兩者都對實證主義加以批判，並且提出植基於詮釋與批判社會科學之替代取向。它們還在孕育階段，直到1980年代後期才浮出檯

面。從事女性主義研究的人幾乎都是女性，他們抱持女性主義的自我認同，並且有意識地採取女性主義的觀點。使用多元的研究技術。女性主義的方法論企圖為女性發聲，並且改正在社會科學發展中居於掌控地位的男性觀點。這是受到諸如《女性求知的方法》（*Women's Ways of Knowing*）（Belenky, et al., 1986）等強調女性學習與表達自己的方式不同於男性之著作的激勵。

女性主義的研究植基於一個高度的覺醒，即女人的主觀經驗不同於一般的詮釋觀點（Olsen, 1994）。很多女性主義者認為實證主義其實就是男性的觀點；它是客觀的、邏輯的、任務導向的、且是工具性的。它反映出男性重視個人競爭、對環境的宰制與控制、以及作用於這個世界的硬性事實和力量。對比之下，女性則重視「調適」與逐漸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她們把社會世界看成是一張人際關係交織而成的網，佈滿著由信賴情感與彼此的義務鍊結在一起的人們。女性傾向於強調主觀、同理心、過程導向、與社會生活的融合面。女性主義研究也是行動導向的並試圖提昇女性主義的價值（參閱資訊箱4.2）。

女性主義研究者指出多數非女性主義之研究具有「性別盲」，主要是由大環境的文化信念以及男性研究者居多所導致。這類研究將男性的經驗過度推論為適用於全人類、忽視了性別這項基本社會差異、關注男性的問題、以男性為參照點、並接受傳統的性別角色。例如，一位傳統的研究者會將一個家庭的成年男性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看成是該家庭面臨了失業問題。當同一個家庭的女人在外頭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時，並不會被視同是家庭問題。同樣地，傳統研究者常用「未婚媽媽」的概念，但並沒有人用「未婚爸爸」這個平行的概念。

女性主義取向認為研究者基本上也是具有性別的。研究者當然有其性別，而這將左右其如何來經驗其所處之實在，當然也會影響到他們的研究。除了個別研究者的性別影響之外，基本的理論假定與科學社群也都顯現性別化的文化脈絡。性別在文化中的影響隨處

資訊箱 4.2

女性主義社會研究的特徵

- 對女性主義價值立場和觀點的擁護
- 反對在假設、概念和研究問題的性別主義（性別偏見）
- 重視在研究者和研究對象間同理聯結的建立
- 敏銳地關注性別關係和權力如何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 重視把研究者私人感受和經驗融入研究歷程中
- 在選擇研究技術和銜接不同學術領域上具有彈性
- 確認人類經驗的情緒和互相依賴的層面
- 是行動取向的研究，企圖促進個人和社會改變

可見，並塑造社會的基本信念和價值，而這些都是無法在科學探討的社會歷程中輕易地加以孤立與隔絕的。

女性主義研究者揚棄所謂的客觀或中立；重視與研究對象互動和合作。將個人的生活與專業的生活加以融合。例如，女性主義研究者會試圖去理解受訪者的經驗，同時也分享她們自己的感受和經驗。這樣的過程或許會孕育出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私人情誼，並可能會與時俱進。Shulamit Reinharz（1992: 263）力主「模糊正式與私人關係的份際，就如同移除研究計畫與研究者生活間……的界線，這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多數女性主義研究的一項特徵。」

甚至在生物學領域裡，也受到女性的觀點及其與研究對象建立親密關係之欲望的衝擊。女性主義研究者傾向於避開量化分析和實驗。他們甚少僵化地固守一種方法；相反地，他們使用多元的方法，通常是質化研究與個案研究。Gorelick（1991）曾對許多女性主義研究者偏好詮釋社會科學的現象加以批判。她覺得詮釋社會科學只侷限於研究對象的意識而不能揭露隱藏的結構。Gorelick希望女性主義研究者採取更具批判性的研究取向並能更堅決地鼓吹社會

變革。

後現代研究 (postmodern research) 是大環境中後現代運動風潮裡的一支，是對當代世界的不斷演化的理解，包括：藝術、音樂、文學、與文化批評。它起始於人文學科，以存在主義、虛無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等哲學、以及海德格 (Heidegger)、尼采 (Nietzsche)、沙特 (Sartre) 與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等人的思想為基礎。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 (modernism) 的一種反動。現代主義所指涉的是源起於啟蒙時代的基本假定、信念與價值。現代主義植基於邏輯推理；樂觀的相信未來會更好；篤信科技，並且信守人道主義的價值 (亦即依據對人類福祉的影響來評判思想)。現代主義相信世界上存在著大多數人所同意的真、善、美的標準 (Brannigan, 1992)。

後現代主義並不將藝術或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加以區分。它和批判社會科學具有共同的目標就是揭穿社會世界的神秘面紗。它企圖將表象解構或拆穿以顯露內部的潛藏結構。一如激進的詮釋社會科學，後現代主義不相信抽象的解釋，而認為研究所能做的頂多是描述，而且所有的描述都具有同樣的真實性。任何研究者的描述相較於其他人的描而言並無優劣可言，因為其所描述的就只是研究者個人的經驗。不同於詮釋與批判社會科學之處在於：它企圖根本地改變顛覆社會科學。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不相信我們能夠建立關於社會世界的科學。後現代主義者不信任所有系統化的實徵觀察，更質疑知識的可推論性或是能夠與時俱進。他們認為知識具有多種形式，隨人與地的不同而不同。Rosenau (1992: 77) 主張「幾乎所有的後現代主義者拒絕把真理當做一項目標或是理想，因為那正是現代性的象徵……真理必須涉及秩序、規則、與價值；有賴於邏輯、理性和推理，而這些都是後現代主義者所質疑的。」

後現代主義者反對以抽離的、中立的方式來呈現研究結果。在閱讀研究報告時，不該忽略研究者或報告的作者；他們的存在必須在報告中明確地指出。因此，後現代主義的研究報告就像是一件藝

術作品。它的目的是去帶動別人、提供歡樂、喚起回應、或是激發好奇心。後現代報告常具有劇場表演的戲劇化呈現風格。其型式可能是以一篇小說、一部電影、或是一齣戲。後現代主義者認為透過戲劇或音樂作品來呈現研究者所創造的關於社會生活的知識，其溝通效果會優於透過一篇學術期刊論文。它的價值就在於說故事可能會激起閱讀或接觸它的人的內在經驗。後現代主義者是反菁英主義論者，拒絕使用科學來預測或制訂政策。後現代主義者反對那些用實證主義科學來強化權力關係與控制人們的「科層體制」（參閱資訊箱4.3）。

結論

你在本章中學到了兩個基本事項。第一，在社會研究中存在著不同的競爭取向，它們背後的哲學基礎對科學的目的與社會實在的

資訊箱 4.3

後現代社會研究的特徵

- 拒絕所有的意識型態和有組織的信念系統，包括所有的社會理論。
- 強烈地仰賴直觀、想像、個人經驗和情緒。
- 無意義感和悲觀主義，相信世界永遠不會改進。
- 極端的主體性，在其中心智和外在世界無從區分。
- 狂熱的相對主義，在其中存在著無數的詮釋，但無一特別優越。
- 擁護歧異、渾沌、與持續變化的複雜性。
- 拒絕研究過去或別處，因為只有此時此地是切身相關的。
- 認為因果是不可能研究的，因為生命太過複雜、瞬息萬變。
- 篤信研究永遠無法真實重現社會世界所發生的事。

本質有不同的假定。第二，社會科學的這三種理想取向對研究的基本問題有不同的見解（參閱表4.1）。大多數的研究者主要是在某個

表4-1 三種研究取向間差異的摘要

	實證主義	詮釋社會科學	批判社會科學
1. 研究理由	發現自然律，如此人們可以預測和控制事件	瞭解和描述有意義的社會行動	打破神話和賦予人們權能以根本地改變社會
2. 社會實體的本質	穩定既存的型態或秩序，使可以被發現的	對情境的流動定義，透過人們的互動而創造	充滿衝突，由潛藏的結構在主導
3. 人性之本質	自利和理性的個體，由外在力量所塑造	社會性生物，會創造意義使世界合理化	有創意的、適應性的，帶有未知的潛能，會受錯覺和宣傳所惑
4. 常識的角色	和科學界線劃分清楚，比較無效	為一般人所用的強而有力的理論	錯誤的信仰，潛藏著權力和客觀的條件
5. 理論的型式	邏輯、演繹，交互相關的定義、前提和原則所構成的系統	一種描述人們如何產生和維持他們的意義系統	一種批判，揭露真實狀況，幫助人們找到往更好世界的路徑
6. 對真理的解釋	邏輯地與原則銜接，以事實為根據	是被研究對象的共鳴或感受	提供人們改變世界的工具
7. 好的證據	基於精確地觀察，別人可以複製	蘊藏於流動的社會互動的脈絡中	由能揭開錯覺面紗之理論所提供
8. 價值的地位	科學是價值中立的，除了在選擇議題時，不然價值毫無地位	價值是社會整體生活中的一部份：沒有任一群體的價值是錯的，頂多只有不同	所有科學一開始都有其價值觀，有些是對的，有些是錯的

研究取向下運作，但也有很多研究者會結合其它研究取向的元素。

記住你可以從這些取向當中的任一個出發來研究同一個主題，但是每個取向都有異於他者的進行方式。這可以用以下四個國家中少數民族受到的歧視與工作競爭的議題來說明：澳洲內地的原住民、加拿大西部的亞洲人、美國中西部的非裔美國人和以及倫敦的巴基斯坦人。

一位採行實證主義研究取向的研究者他首先會從一個關於多數與少數民族關係的一般理論演繹出一些假設。這個理論可能是因果陳述的型式或是預測的型式。例如，Stone（1985: 56）如此評述所謂的理論：「企圖以幾個關鍵的變項來解釋複雜的型態。這在嘗試預測種族與族群關係的可能發展上可能會有用。」研究者接下來從現存的官方統計中蒐集資料，或是實施一項調查對該理論所認定的因素進行精確測量，例如初次接觸的形式、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的比值，或是種族差異的能見度。最後，研究者運用統計正式檢定該理論對於歧視程度與工作競爭強度的預測。

一位詮釋研究者會和來自這四個國家中的少數民族與主流民族的特定人物進行個別的談話。透過對話與觀察來知道每一個族群中所遭逢的主要問題為何，以及族群的成員是否認為歧視或工作競爭是日常要務。研究者把人們之言談放入日常事件的脈絡當中（像是付房租、家庭紛爭、法律糾紛、與生病等等）。當其對少數或多數族群對歧視的看法、他們如何找到工作、其他族群又是如何找到工作、以及他們實際上又採取什麼行動來找到或保住工作等有所了解之後，就用別人所能理解的方式來描述其發現。

批判研究者則從較大的社會歷史脈絡著眼。這包括了諸如英國殖民主義者對澳洲的入侵和被當成監獄殖民地的歷史、導致亞洲人移民加拿大的經濟條件處境、在美國奴隸制度的遺害與在民權上的奮鬥、大英殖民帝國之興衰及來自其前殖民地的移民等等的因素。他基於一個道德／批判的立足點來探詢：主流族群歧視並剝削少數族群嗎？研究者查詢各種資料來源以論證潛藏的剝削模式，並測量

每個國家的歧視案件的數量。也可能會檢視族群間收入差異的統計資料、私下檢視生活處境，以及陪人去應徵工作、或是實施調查來知道人們正在想什麼。一旦研究者查明歧視如何造成少數族群難以找到工作，就會將研究結果提供給少數族群的組織、公開宣講研究發現、在少數族群成員閱讀的報紙上發表研究結果，以揭發真實的狀況並鼓吹政治社會行動。

就社會研究這門課來說，上述這三種取向的論點對你的意義為何呢？第一，這意味著社會科學研究沒有單一絕對的正確取向。這並不是說怎麼做都行，也不是說沒有暫時取得共事的基礎（參閱資訊箱4.4）。相反的，這意味著從事社會研究的基礎尚未穩固。換句話說，目前是三強鼎立，有機會出線的研究取向不只一個。或許這個狀況會一直持續下去。對這三種研究取向的認識將有助於對研究報告的閱讀。通常，研究者會以某種研究取向為基礎，卻甚少會告訴你他們用的是那一種。

第二，這意味著，當你從事研究時所試圖完成的（如，發現法則、確認深層結構、描述意義體系）將因你選擇的取向之不同而有差別。這三種取向和第二章所討論的研究類型之間有鬆散的對應。例如，實證主義者可能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詮釋研究者可能從事探索性研究，而批判研究者則偏好行動取向的研究。當你進行社會研究時若對這些取向有所體認，那麼對於該從事哪種類型的研究，就能做出有憑有據的決定。

第三，社會研究中所使用的各種技術（抽樣、訪談、參與觀察等等）完全是植基於不同取向的假定。通常，某個研究技術被提出來時都不會提及所發源的背景推理。認識這些取向之後，你對特定研究技術所根據的原則就會有更深的瞭解。例如，精確的測量和實驗研究流程的邏輯就是源自於實證主義，而實地研究則是植基於詮釋取向或是較為質化方法來進行社會探討。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過研究歷程的大致運作、研究與理論的不同類型，以及社會研究的三種基本取向。現在，你應該對社會

資訊箱 4.4

社會科學三種取向的共同特徵

1. 都是實徵的。每一種都是植基於可觀察的人類視野、聲音、行為、情境、討論、和行動等實在。研究絕不是只建基於堆砌和想像。
2. 都是系統化的。每一種都強調精細與謹慎的工作。都拒絕雜亂的、低劣的、或草率的思考和觀察。
3. 都是理論性的。理論的本質雖有不同，但都強調使用構想和尋找型態。無一認為社會生活是渾沌無序的；全抱持解釋或瞭解是可能的。
4. 都是公開的。都主張研究者的工作必須率直地傳遞給其他的研究者；應該盡量詳盡且彼此分享。都反對將研究過程隱匿私藏。
5. 都是自我反省的。每種取向都主張研究者必須思考他們在做什麼，而且必須了然於胸。絕不可以盲目的或未加思索的態度來進行研究。研究必須有周密的思慮和清楚的自覺。
6. 都是無止盡的過程。都主張研究是持續前進的、演進的、變化的、提出新問題和追求引領風潮。無一視其為靜態的、固定的、或封閉的。目前的知識和研究程序不是「刻在石頭上的」和妥善無瑕的。它們都包含持續的改變，並對新的思考方式和做事的方法抱持開放的心態。

因此，儘管存在著一些差異，所有取向都主張社會科學應該致力於透過自我反省與持續不斷的公開歷程，來創造系統化蒐集的、以實徵為基礎的理論性知識。

研究的基本輪廓有大致的認識。下一章，我們將討論社會研究中的倫理與政治議題。

重要名詞

因果律	詮釋社會科學	適當的假定
批判社會科學	互為主體性	實務取向
決定論	有意義的社會行動	實踐
辯證的	人性的機械模式	相對主義
女性研究	立法的	價值中立科學
詮釋學	物化	典範
體悟	表意的	實證主義社會科學
唯意志論	工具取向	後現代研究

問題回顧

1. 就各個取向而言，社會研究的目的是為何？
2. 每個取向如何界定社會實在？
3. 就各個取向而言，人類的本質為何？
4. 在每個取向裡，科學與常識有何不同？
5. 就各個取向而言，何謂社會理論？
6. 每個取向如何檢視一個社會理論？
7. 每個取向對事實的看法為何，又是如何蒐集這些事實？
8. 每個研究取向如何看待價值中立科學的可能性？請加以解釋。
9. 詮釋與批判科學取向對實證主義的批評有何相似之處？
10. 在第一章提到的科學模型與科學社群與這三種研究取向各有何關聯？

社會研究的倫理和政治議題

導論

倫理問題和研究者

個別研究者

為何要信守倫理？

權力

有關研究對象之倫理議題

對人類受試者加以保護的起源

生理傷害、心理虐待、和觸法風
險

欺騙

知會後的同意

特殊族群與新的不平等

隱私、匿名、和保密

受試者資訊是個人資產

對受試者的明文保障

倫理和科學社群

倫理和研究的贊助者

告密

獲得特定發現

如何進行研究的限制

隱瞞研究發現

隱匿真正的贊助者

研究的政治性

對社會研究者研究什麼以及如
何做研究的限制

對研究的直接限制

透過控制研究經費的間接限制

研究發現的傳播與應用

關聯模式

在結果發表後

影響未來行為的研究發現

學術自由

客觀性與價值中立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我們始終都不是生活在可以免於俗事羈絆、跳脫歷史的時空中，我們的問題因而不在於處理應該是「真理」的知識，而是在處理人們如何求知的問題，而這又與其對自己所處的時空位置有關。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p.188

導論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學過什麼是科學的基礎、不同種類的社會研究、理論的地位、社會研究的各種替代取向。在開始學習研究設計的細節之前，你有必要先審視研究歷程和道德、價值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這些都是研究過程中不可忽視的。在上一章裡，你看到不同研究取向對價值的處理極為不同，但即使是最強調價值中立的實證主義都承認，在從事有關人類的研究時仍然必須有倫理的考量。雖然在未正式做研究前很難體會到倫理的兩難困境，我們還是必須在設計研究和蒐集資料之前就考量到道德和倫理的議題。

研究者會遭遇到很多倫理上的兩難困境，而且必須抉擇該如何行動。倫理守則與其他研究者都可以提供引導，但是否確實遵照倫理信條來執行研究，則完全取決於研究者個人。研究者在道德與專業上，有義務信守倫理信條，即使研究對象對倫理問題懵懂無知或是毫不在意。事實上，很多受試者對保護他們隱私及其他權利的關切程度還不如研究者。

倫理議題指的是當我們在考量執行研究的恰當方式時所激起的擔心、兩難、與衝突。倫理界定了怎麼做是合法的或是不合法的，或是「合乎道德」的研究程序該包含哪些。但是倫理的鐵律並不多。儘管不變的規則很少，但是仍然有大家都同意的原則。這些原則在實務上可能會產生衝突。很多倫理議題涉及到兩種價值的平衡：科學知識的追求與研究對象或社會其他人的權利。我們必須權衡諸如增進我們對社會生活的瞭解、提升決策品質、或是幫助研究參與者等潛在利益，和失去尊嚴、自尊、隱私、或民主自由等潛在代價間的得失。

研究的倫理標準要比許多其它領域（例如，收款代理機構、警察部門、廣告商等等）更為嚴苛。專業的社會研究需要同時具備適當研究技術的知識（例如，抽樣），以及對研究中倫理議題的敏感度。這並不容易。誠如Reynolds（1979: 7）的觀察：「社會科學家

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兩難問題，幾世紀以來一直都受到關心道德、法律、與政治哲學之一般問題的人士之關注。」

倫理問題和研究者

個別研究者

倫理問題從研究者開始，也結束於研究者。研究者個人的道德信念是防止非倫理行為的最佳防衛。在進行一項研究的前、中、後，研究者有機會也有義務去反省該研究行動，並問問自己是否心安理得。研究是否合乎倫理取決於研究者個人的誠信和價值觀。「如果嚴正地看待價值的問題，這些價值就不會被放在一邊，反過來指引社會學家的行動。它們決定了該調查誰，為何而調查，以及是為誰服務」(Sagarin, 1973: 63)。

為何要信守倫理？

假使大部分從事社會研究的人都是真誠地關懷別人，為什麼又會有研究者出現不顧倫理的行為呢？撇開少數心懷不軌的人，多數不合乎倫理的行為是導因於不夠警覺以及研究者所遭受的壓力而去抄跳過倫理的捷徑。研究者所面對的壓力包括：建立事業、發表論文、提升知識、獲得聲望、打動家人或朋友、保住工作等等。信守倫理的研究完成的時間較長、花費較大、更為複雜、也更可能中途叫停。再者，形諸於文字的倫理標準都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原則，所以就有很多可能逾越倫理的行動空間，而被查獲的機會也很小。

合乎倫理的研究受到褒揚的機會並不多。違反倫理的研究者如果被查獲，會面對公眾的羞辱、事業終止，以及可能的法律行動等，但是信守倫理的研究者則不會獲得任何獎賞。合乎倫理的行為孕育於研究者對注重倫理的敏感度，而這種敏感度是研究者在接受專業訓練時、對專業角色的體認、以及和其他研究者的私人接觸中

內化而成。再者，科學社群的規範注重誠信與公開也強化了倫理行為。醉心專業角色、認同科學理念，以及經常與其他研究者定期互動的研究者比較可能信守倫理來行動。

❖ 科學的不當行爲

研究社群和贊助研究的機構所反對的不合倫理的行為就稱為「科學的不當行爲」，包括造假和抄襲。當研究者偽造、扭曲資料或蒐集資料的方法、或抄襲別人的著作就犯了所謂「科學的不當行爲」。也包括在進行或報告研究時嚴重違反科學社群一般接受的慣例。研究機構與大學都訂有政策與程序來偵測這些不當行爲，並告知科學社群和贊助機構、且處罰當事者（如，透過減薪或解聘）。

研究造假（research fraud）係指研究者憑空捏造資料而非實際去蒐集資料，或對研究進行的方式交代不正確。雖然很罕見，但卻要非常慎重地處理。最為人熟知的造假案例是英國教育心理學之父伯特爵士（Sir Cyril Burt）。伯特死於1971年，當時是備受尊崇的研究者，他以顯示智力的基因基礎的雙胞胎研究而建立名聲。在1976年，卻被人發現其資料和協同研究者都是捏造的。不幸的是，科學社群已經被誤導了快三十年。

抄襲（plagiarism）也是一種造假，當研究者剽竊別的想法或著作，或是未註明出處的引用都是抄襲。有一種特殊型式的抄襲就是剽竊另一位研究者、助理、或學生的著作，將其以自己的名義來發表。這些都是對倫理標準的嚴重踐踏。

❖ 不合倫理但合法

有些行為可能是不道德的，但並未違法。我們可以用一個抄襲的案例來說明合法行為和合乎倫理行為之間的差異。美國社會學會曾經證實東新墨西哥大學（Eastern New Mexico University）的一位院長在1988年所寫的一本書中大篇幅引用杜福茲大學（Tufts University）一位社會學教授1978年的論文，卻連一個附註都沒

有。這樣的複製並不算非法，它並未違反著作權，因為這位社會學家的論文並沒有美國政府所簽證的著作權。不過，依據專業行為的標準來看，很清楚地這是不道德的。（關於法律和道德行為間的關係請參閱圖 5.1。）

權力

研究者與受試者或員工助理之間的關係包括權力和信任。相對於受試者或助理，實驗者、調查主持人、或研究審查者是擁有權力的一方。這個權力是由證照、專業知能、訓練、和科學在當代社會的角色所賦予的。部分倫理爭議就是起因於對權力和信任的濫用。

專業社群與所處社會所賦予研究者執行研究的權力，但同時也要求其承擔指導、保護、與關心研究對象福祉的責任。例如，一位外科醫生被發現在未獲當事人同意下，對三十三位婦女進行一項實驗性的婦科手術。這些婦女信任這位醫生，但他濫用這些婦女、專業社群、與社會對他的信任。

尋求倫理指引的研究者並不孤單。他可以求助於很多資源：專業的同僚、倫理諮詢委員會、官方的審查委員會、或是大學或機構中的以人為受試者委員會、專業學會的倫理規章，以及探討研究倫理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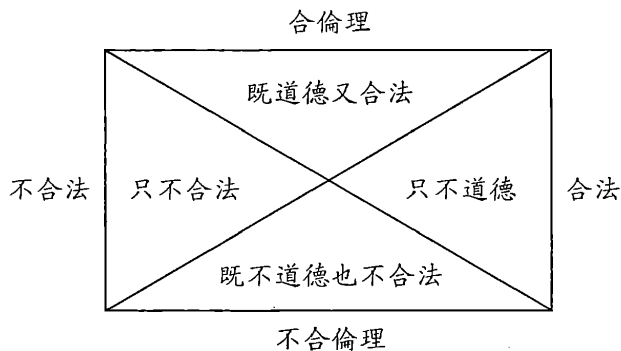


圖 5.1 法律和道德行為的研究類型

有關研究對象之倫理議題

你曾經在某項研究中擔任過受試者嗎？如果有，你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對研究可能對研究對象產生的負作用之關注遠超過其他倫理議題，這最早起源於對生物醫學研究的關切。合乎倫理的研究必須要在增進知識以及不擾亂他人生活這兩種價值間取得平衡。

如果賦予研究對象絕對不受干擾的權利可能會導致實徵研究無法進行，但是如果給予研究者絕對的探究權利則可能會剝奪受試者的基本人權。於是這個道德問題變成為：當研究可能使受試者身體受傷、感到困窘、或是受到驚嚇，研究者應該在何時提出說明與解釋？

法律與倫理規章訂出一些清楚的禁止事項：絕不能對受試者造成不必要的或不可復原的傷害；盡可能先取得安全的自願同意書；絕不將基於研究目的所蒐集之特定個人的資料，拿來羞辱、貶低、或是釋放傷害當事人的訊息。這些都是最低的要求標準，而且必須加以說明（如，就某個特定情境而言，何謂「不必要」？）。

對人類受試者加以保護的起源

在越來越多假借科學名義而危害基本人權的案例被披露之後，我們不得不正視研究對象所受到的待遇。最令人髮指的案例就是德國納粹施加在猶太人與其他人身上的「醫學實驗」。這些實驗裡，施加了很多恐怖的酷刑。例如，把人放入冰凍的水中看看要過多久人才會死、蓄意讓人餓死，以及從兒童身上截取四肢移植給其他人。

這類違反人權的案例並不只發生在德國，也不只發生在過去。有個違反倫理研究的惡例就是**陶斯克基梅毒研究**（**Tuskegee Syphilis Study**），也稱為**壞血事件**（**Bad Blood**）。直到1970年代，因為報紙的報導此一醜聞才爆發。美國公共健康服務部支助一項研究，研究對象是住在阿拉巴馬州罹患梅毒且未經治療而死的貧

困黑人，研究者研究的是該疾病末期所發生的嚴重生理失能。這個研究開始於1929年，當時還不知道盤尼西林可以治療該疾病，但在發現治療方法後它卻還持續進行。儘管他們對受試者違反倫理的對待，這些研究者還能持續發表他們的研究結果長達四十年之久。這項研究結束於1972年，但美國政府直到1997年才承認該項錯誤並對那些受試犧牲者提出正式的道歉。

不幸的是，壞血事件並非唯一的案例。在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經常基於軍事和政治目的而在研究的倫理議題上妥協。在1995年，有報導指出在1940年代後期美國政府曾授權在對不知情的人注射放射性物質。在1950年代，美國政府曾對柯達和其他軟片製造商提醒說核爆測試產生的落塵對軟片的影響，但卻未告知鄰近居民可能受到的健康危害。在1960年代，美國陸軍提供LSD（一種迷幻藥）給不知情的軍人而造成嚴重的傷害。今天，這些都已經被認定是違反了兩項最基本的倫理原則：即避免生理傷害和獲得知會後的同意。

生理傷害、心理虐待、和觸法風險

社會研究可能對受試者造成的傷害有以下幾種：生理傷害、心理傷害、法律上的風險、以及損害到個人的事業或收入。生理傷害比較罕見，即使是生物醫學這類介入較多的研究，約有百分之三到五的研究會讓受試者受到傷害。在其他不同的研究（如實驗室對田野研究）則可能出現不同型式的傷害。研究者必須清楚知道所有可能的傷害，並隨時將傷害降到最低。

❖ 生理傷害

最直接的倫理原則就是研究者不該造成任何生理傷害。一位信守倫理的研究者會在研究之前評估其風險，包括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項（安全建築物、家具與設備）。如果研究會引發壓力，並預期受試者或助理有受傷或是遭到攻擊的風險時，研究者必須篩選掉高危

險性的受試者（如心臟有問題者、精神耗弱者、或病患）。研究者對於因參與研究而造成的傷害要負起道德上和法律上的責任，如果當他已經不能確保參與者的人身安全時，就必須立即終止計畫（參閱資訊箱5.1 Zimbardo的研究）。

❖心理虐待、壓力、或失去自尊

生理傷害的風險雖然較小，但是研究者可能使人置身於具有壓力的、窘迫的、感到焦慮的、或不愉快的情境中。透過將受試者安置在令人心理不適或有壓力的真實情境，研究者認識到人們在面對真實生活中令人高度焦慮的情境中會如何反應。這種令人不適的安排合不合乎道德呢？

米爾葛蘭（S. Miligram）為人熟知的服從研究是否合乎倫理至今仍爭論不休（參閱資訊箱5.1）。有些人認為該研究已有所防範，而且所產生的知識大可抵過受試者所經驗到的壓力及可能的心理傷害。另一些人則相信極端的壓力與永久傷害的風險是吾人所無法承受的。

社會研究者曾經設計令人產生高度焦慮或不舒適之感受的安排：讓受試者目睹恐怖的照片；謊稱男學生具有強烈的女性人格特質；騙學生說他們被當掉了；製造一個令人高度恐懼的情境（如，上鎖的房間飄入煙霧）；要求受試者傷害別人；讓人置身一個受迫於社會壓力必須否定自己信念的情境；以及命令受試者去說謊、欺騙、或偷竊。研究助人行為的研究者經常使受試者置身於緊急的情境來觀察受試者是否會提供援助。例如，匹利文及其同事（1969）就曾製造有人突然倒地不起的騙人情境，來研究地鐵內的助人行為。在這個場地實驗中，地鐵的乘客都不知道這是個實驗，也都不是自願的參與。

敏銳的研究者也會知覺到對受試者自尊的可能傷害。例如，Walster（1965）想要了解女性自我價值感的改變是否會影響愛情。在她的實驗裡，先對大學女生實施人格測驗，然後給予假的回饋。

資訊箱 5.1

倫理爭論的三個案

米爾葛蘭的服從研究 (Milgram, 1963, 1965, 1974) 企圖透過檢視服從權力的社會壓力強度，來發現在納粹統治下的恐怖大屠殺是怎麼會發生。在簽署過「已獲告知之同意表」後，受試者經過作假的隨機選擇被指派為「老師」，而實驗者的同謀則擔任「學生」。老師要負責測驗學生對「生字表」的記憶，並在學生犯錯時增加電擊的強度。學生被安置在鄰近的房間，所以老師可以聽得見學生但看不見學生。電擊的儀器清楚標示著遞增的伏特值。當學生犯錯，老師就按下開關，學生也發出好像很痛苦的唉叫聲。研究者會出現並向老師提出像是「你必須繼續進行」之類的指令。米爾葛蘭如此報告「觀察到受試者會冒汗、發抖、結巴、咬唇、呻吟、甚至用指甲掐自己的肉。這些都是本實驗的特徵，不是什麼例外的反應。」(Milgram, 1963: 375)。受驚嚇程度達到危險程度之受試者的百分比遠遠超過預期。這引發了對欺騙的運用以及要受試者經驗極端情緒壓力等倫理問題的關切。

在韓福瑞 (Laud Humphreys) (1975) 的《茶坊交易研究》一書裡 (有關男同性戀在公共洗手間接觸的研究)，在韓福瑞佯裝成窺淫者與把風下，觀察了約一百位男性的性行為。受試者的汽車被跟蹤、牌照號碼被秘密地記下。他們的姓名與住址也被假扮成市場研究員的韓福瑞從警察記錄中取得。一年之後，透過喬裝，韓福瑞運用一個關於健康調查的動人說詞到家裡訪問受試者。韓福瑞小心翼翼地將名單藏在保險箱中，並將受試者的辨識註記銷毀掉。他大幅地增進我們對常在茶室出入之同性戀者的認識，扭轉了之前對他們的錯誤看法。這個研究也一直受到爭議：受試者從不曾答應、也用了欺騙、名單可能被用來勒索受試者結束婚姻、或是提出犯罪檢舉。

在辛巴度的囚犯實驗中 (Zimbardo, 1972, 1973; Zimbardo 等, 1973, 1974)，把男學生指派去扮演兩組不同的角色：守衛與囚犯。

實驗前，先對自願的學生實施人格測驗，然後只挑選出「正常」範圍內的同學。自願者簽署參加兩星期的實驗，囚犯被告知說，他們必須接受看守，而且褫奪部分的公民權，但不會有身體虐待。

在設於史丹福大學一棟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裡，囚犯被摒除個性（穿上標準制服而且只呼叫編號），守衛亦軍事化（穿著制服、攜帶夜棍、反光太陽眼鏡）。守衛被交付維持合理程度的秩序，採八小時輪班制，而囚犯則一天二十四小時都被監禁。出乎意料地，自願者變得過於投入他們的角色。囚犯變得被動狂亂，而守衛變得有攻擊性、武斷妄為、且漸失人性。來到第六天，辛巴度基於倫理的考量取消了實驗。受試者可能受到永久的心理傷害、甚至生理傷害，這樣的風險太大了。

採自Zimbardo心理學

部分受試者被告知她們缺乏想像力和創造力。然後，有位假裝成也是受試者的俊帥男研究生和這些女生展開交談。這位學生表現得好像對其中一位女生非常有意思並邀請她外出共進晚餐。研究者想要測量這個女生對該男生的浪漫吸引力。實驗之後，受試者被告知這只是一場戲；不是真的有約會，該男生並未對她有意思。雖然受試者都曾被說明，她們仍有自尊心受損的感受，還可能有心理上的創傷。

能事先對可能引起的焦慮或不舒適，擬妥防範措施，且有經驗的研究者，才可以執行會引發高度壓力或焦慮的實驗。在構思研究時，他們應該先諮詢執行過類似研究之人以及心理健康專家，篩選掉高危險群（如，有情緒困擾或心臟較弱的人），並且安排在產生危險狀況時如何採取緊急措施或叫停。在研究前，研究者都必須取得受試者「業經告知的同意」（有待討論），並在研究後立即向他們做簡報解釋。

研究者絕不能製造「非必要的」壓力，即超出產生預期效果所

需的最低量、或是與研究目的無直接關係、不合理的壓力。對最低量壓力的認識來自於經驗。最好從過小的壓力開始，寧願發現無效，也不要製造過多。如果壓力的程度可能會有長期的效果，研究者應該加以追蹤並提供免費的心理諮商。

引發壓力和焦慮的研究還有一種危險性，就是導致實驗者在對待他人的態度上可能變得冷酷無情、具有操控性。如果所執行的實驗造成受試者心理受創，研究者應該要表示愧疚與懊悔。當實驗把受試者置於引發焦慮的情境，有道德的研究者該會感到不安。

❖ 法律傷害

負責任的研究者會保護受試者免於增加被捕的風險。如果參與研究會增加被捕的風險，受試者就不再信任研究者，也不願意參與未來的研究。研究者在進行某些研究之前，或許可以先從執法機關取得豁免的保證。例如，美國司法部就提供棄權證書給探討犯罪行為的研究者。

潛在的觸法風險也是韓福瑞的研究（參閱資訊箱5.1）被批評的一點。在新澤西州「負向」所得稅實驗中，參與實驗的人接受了收入補貼，但對於他們是否也接受福利支票則沒有另外的說明。有位地區檢察官要求取得參與者的資料以查驗有無「福利詐騙」。換言之，受試者因為參與了這個實驗而面臨觸法的風險。最後這個衝突是解決了，但它正說明了研究者應該要很清楚可能面對的法律問題。

還有一個倫理議題起因於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時發覺了非法活動。研究者必須權衡是要維護研究者與受試者的關係以將來其他研究者的利益，還是力阻無辜人士受到傷害。研究者必須承擔其決策所付出的代價。例如，Van Maanen（1982: 114-115）在他以警察為對象的實地研究中這麼報導說：目睹了警察毆打民眾、非法行動，以及不當的程序，但他說：「在這些惱人事件的當時及其後續，……我遵從警察的慣例：守口如瓶。」

從事實地研究者常常得面對難以抉擇的倫理兩難。例如，在研究一家精神療養機構時，Taylor（1987）發現該機構的員工虐待其收容的患者。他有兩個選擇：放棄研究並要求調查，或是保持沈默並繼續完成後面幾個月的研究，然後發表其發現，再發動終結虐待的運動。經過權衡之後，他接受了後面的課題，因此，現在的他是一位維護精神機構病患之人權的激進份子。

還有一個類似的倫理兩難，可以用紐約一家餐館的火災案例來說明，該案例因機密爭議而更加複雜化。一位社會學研究生當時正在進行以服務生為對象的參與觀察研究。在研究計畫期間，該場地：也就是一家餐廳，被燒毀了，懷疑可能是蓄意縱火。地方司法機構要求研究者提供田野筆記，並欲審問有關餐館的活動。研究者面臨了兩難：他可以選擇配合調查，而違反了倫理研究的信任、守密和正直；或是他也可以信守保密倫理來保護其研究對象，不過得面對藐視法院與妨礙司法的處罰，包括罰款與監禁。他想要信守倫理，但又不想有牢獄之災。經過多年的法律訴訟，僵局終於得以化解，由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合作，但司法裁決也維護了田野筆記的機密性。然而，這個議題費了多年才得以化解，研究者在經濟上與精神上都已付出了相當的代價。

「觀察非法行為」可能是某些研究計畫的核心工作。研究者若是暗中觀察並記錄非法行為，然後將訊息提供給執法機構，就違反了關於研究對象的倫理標準並將不利於未來的研究。然而，對於非法行為未加以舉發的研究者，就是間接地縱容犯罪行為，可能會被當成共犯來起訴。研究者究竟是追求知識的專家？還是一個獨立的秘密告密者呢？

❖ 其它對受試者的傷害

研究的受試者可能面對其它型式的傷害。例如，一項要求受訪者回憶不快事件的調查訪問，可能造成受試者的焦慮與不安。信守倫理的研究者能警覺到任何對受試者的傷害，考慮可能的預防措

施，並權衡可能傷害與可能效益的輕重。對受試者的另一種可能傷害是：對他們事業或收入的負面影響。例如，研究者執行一項受雇員工的調查，結論是管理人員的表現不佳。這樣的結果，是這位管理人員失去工作。又如探討領取福利給付者的研究者。結果，使得這些人失去了他們的健康保險而降低他們的生活品質。研究者的責任究竟是什麼呢？守倫理的研究者會考量研究結果對研究對象的影響。但這些問題並沒有標準答案。研究者必須逐件評估，權衡可能傷害與可能效益，並為其決策負責。

欺騙

有人對你說過半真半假的事、或是騙你去做某些事嗎？當時你的感受為何？社會研究者遵守倫理上的**自願同意原則**（**principle of voluntary consent**）：絕不強迫任何人參加研究，除非基於正當的研究理由，否則也不可以欺騙。參與社會研究的人應該都是明確地同意參與。但是當研究者使用欺騙、將研究加以偽裝、或使用隱匿的研究方法時，個人不參與研究的權力就成為這類研究受到批判的議題。

不論是實地研究或是實驗研究，研究者都有機會對受試者隱瞞或說謊。研究者可能基於正當的方法論上的理由而誤導受試者的行為或歪曲其真實意圖：因為如果受試者知道真實目的，他們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行為，造成無法認清他們真實的行為，或是在告知實情後就進不了研究場地。如果研究者能夠在不欺騙下達成同樣的事，就絕不可以採用欺騙。實驗研究者常會欺騙受試者以防止他們知道真正的假設並減少了反應效果。只有在基於特定的方法論目的下，欺騙才被允許，儘管如此，其應用也不可以超越所需的最低程度。運用欺騙的研究者應該取得「知會後的同意」，絕不謊報風險性，而且在事絕對要對受試者簡報說明。他應該要告知基本程序，只能隱瞞有關假設檢定的相關訊息。

要進入並接近部分實地研究的情境，可能只能採用暗地觀察。

如果暗地觀察非必要，研究者就絕不該用它。假使並不確定是否需要隱瞞，那麼逐步透露的方法可能是最棒的。寧願犯洩漏自己真實身份與目的的錯誤。在某些情境下——諸如研究異教儀式、小而激進的政治黨派、非法的或異常的行為、或大型公共場所中的行為——如果研究者洩漏其真實目的，可能就無法進行研究。研究者已經採用暗地觀察的方式研究過撒旦膜拜、幽浮膜拜，以及公共洗手間的同性戀行為。隱瞞性質的研究仍然具有爭議性，部分研究者甚至覺得所有這類研究都是不道德的。美國人類學學會的倫理信條就譴責其為「不切實際且不受歡迎的」。即使那些有條件接受隱瞞研究的人，也認為只有在公然觀察不可行時才能用它。此外，如果可能，研究者應該在觀察之後立即通知受試者，並提供他們表達心聲的機會。

欺騙與隱瞞研究可能增加不信任與嘲諷，還會降低大眾對社會研究的敬重。實地研究中的誤導好像是極權社會裡的暗中告密者。欺騙會增加經常被研究之人的不信任。例證之一，過於頻繁的使用欺騙降低了助人的行為。在1973年，西雅圖的華盛頓大學裡有位學生被槍殺，當時經過校園的學生們沒有人伸出援手。事後發現眾多旁觀者未伸出援手的原因是他們以為這個槍擊案是某個實驗的部分戲碼。

知會後的同意

有一項社會研究的基本倫理原則就是：絕不強制任何人來參與；參與「必須」是自願的。光是取得受試者的同意還不夠；更必須讓他們知道他們所參加的是什麼，如此他們才可以做出充分理解的決定。透過閱讀和簽署「知會後同意」的文件（這是一份在受試者知道研究程序後所簽署的同意書），受試者可以更清楚他們的權利以及他們將參與什麼活動。

美國聯邦政府並未強制要求所有以人類為受試者的研究都要取得「知會後的同意」。不過，研究者最好還是取得書面的同意，除

資訊箱 5.2

知會後的同意

知會後的同意書包含以下訊息：

1. 研究目的和程序的簡介，還包括預期的研究時間。
2. 對參與研究可能附帶的風險和不適之說明。
3. 對記錄的匿名隱私與保密的保證。
4. 交代研究者的身份，以及哪裡可以取得關於受試者權力的相關資訊、或是有問題要到哪裡問。
5. 參與與否完全是出於自願並且隨時可以退出而不必受罰的說明。
6. 可能使用之替代程序的說明。
7. 提供給受試者相關報酬和補償，以及受試者人數的說明。
8. 可以要求提供研究發現摘要的承諾。

非有不用取得的充足理由（如，暗地的實地研究、使用次級資料等等），並經過**機構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參閱後續IRBS的相關討論）的許可。

知會後同意書必須提供相關特定的資訊（參閱資訊箱5.2）。包含相關的程序和問題、以及資料的運用等一般敘述，才足以取得知會後的同意。在辛格的一項研究中（Singer, 1978），其中有一組接受調查的隨機組收到一份詳細的「知會後同意」書，另一組則無。但並未發現任何顯著差異。如果有的話，就是拒絕簽署此一陳述書的人更可能以猜測或「空白」來回答問題。

Singer與其同事（1995）分析文獻發現：提出守密的保證可以略微提升受試者在較敏感議題上的反應。其它狀況下，再多的保密擔保都不會影響到受試者的回答方式或是要不要回答。

對研究者的身份做完整的說明有助於保護受試者不致誤入假的

研究，還能保障正當的研究者。「知會後的同意」可以減少騙子佯裝成研究者來欺騙或虐待受試者的機會，亦可降低他人冒用研究者身份去推銷產品或為私利來騙取資訊的可能性。

對於大部分調查研究、實地研究和次級資料研究而言，簽署知會後的同意書是自由的，但是對實驗研究而言則通常是不可規避的。在文件研究和大多數的電話訪問則不太可行。慣例是：對受試者可能造成的傷害越大，就越需要徵得書面的同意。總之，有很多理由支持去徵得告知後的同意，但反對的理由則寥寥可數。

特殊族群與新的不平等

❖ 特殊族群與脅迫

部分受試者的母群或團體並無法給與真正的、發自內心的知會後的同意。他們可能缺乏基本的能力或是半推半就。學生、囚犯、員工、軍人、遊民、支領補助者、小孩、或是心智遲緩者都可能同意參與研究。但是，他們可能沒有充分的能力來做決定，或是他們之所以同意參與，只因為「同意參與」可以得到想要的好處，例如，較高的成績、提早假釋、升遷、或是額外的服務。

除非合乎以下兩個條件，否則以「無行為能力」者（如，小孩、心智失能者）為對象的研究是不道德的：獲得法定監護人的書面同意，以及研究者恪遵所有不傷害受試者的倫理原則。例如，研究者想要調查中學生抽煙與藥物或酒精濫用的情形。如果是在校內進行，必須要有校方的許可，未成年的受試者還要加上家長的同意書。同樣地，最好也徵得每位學生的同意。

脅迫他人參與研究是不道德的，包括給予他們特殊的利益，獲此利益的方式只有同意參與研究，否則別無他途。例如，指揮官命令士兵去參與研究，教授要求學生要當研究的受試者才能及格，或是老闆要求員工參與調查做為繼續雇用的條件等都是不道德的作法。即使是研究者以外的其它人士（如老闆）脅迫別人（如員工）

參與研究都是不合不道德的。

有無涉及脅迫參與是一個複雜的議題，研究者必須評估每個案例。例如，提供一位裁定有罪的犯人：坐牢或是參與一個實驗性的矯正方案兩種選擇。這名罪犯可能不相信此一方案的益處，但是研究者則相信它可以幫助此罪犯。這是一個脅迫的例子，但是研究者必須判斷對受試者和對社會的好處是否超過倫理上對脅迫的禁止。

在社會科學的課程裡，教師有時候會要求學生參加一項研究計畫來擔任受試者。這是脅迫的一種特殊例子。用來支持這種要求參與的論點有三：(1)其它找受試者的方式不可行或是代價高昂；(2)從「學生擔任受試者」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識將有益於以後的學生和社會；(3)在實際研究情境中直接體驗，會使學生對研究有更多的認識。在這三項論點中，只有第三項足以支持有限度的脅迫。只有在以下條件成立下，有限度的脅迫才可以被接受：具有明確的教育目標下、學生對研究經驗有選擇權、以及恪遵其它倫理原則。

❖ 製造新的不平等

另一種型式的傷害是發生在當一組受試者被拒絕讓其參與可從中獲得服務或好處的研究計畫。例如，研究者可能有對罹患某種可怕疾病（如，後天免疫缺乏徵候群，AIDS）之受試者發展出新的治療方式。為了確定這種新治療方式的效果，某些受試者接受這種治療，其他人則施予安慰劑。此一設計可以顯示這種藥劑是否有效，但是控制組中接受安慰劑治療的受試者可能會死亡。當然，服用新藥的人可能也會死亡，直到我們對它是否有效有更多的認識。拒絕隨機控制組的受試者接受可能挽救性命的治療方式，這麼做合乎倫理嗎？假使有一個清楚明確可以確定新藥效果的檢定方式，那還需要有服用安慰劑的控制組嗎？

研究者可以用三種方式來降低受試者間的新不平等關係。第一，讓於沒有接受「新進」處遇方式的受試者持續接受到目前為止最佳的治療方式。換句話說，不能斷絕對控制組的各種協助，只是

他們接受的是在新方法被測試前的最好方法。如此做可以使控制組的受試者不至於處於絕對不利的位置，頂多只是暫時處於相對不利的位置。第二，研究者可以使用**交叉設計**（crossover designs），這是指讓在實驗第一階段的控制組，在第二階段擔任實驗組，反之亦然。最後，研究者必須謹慎且持續地監控結果。如果在實驗早期時即以顯示新的治療方法具有高度的效果，就該把新的治療方式提供給控制組的受試者。還有，在帶有醫學處理或可能有生理傷害的高風險實驗中，研究者可以改用動物或其它替代物來實驗。

隱私、匿名、和保密

如果你不知情下，把你個人生活的私密瑣事公告周知，你會有何感受？因為社會研究者為了研究社會行為不得不探觸受試者的隱私，所以他們必須採取防範措施來維護受試者的隱私。

❖ 隱私

調查研究者以一種能夠透視個人私密的方式來探究信念、背景、與行為時，他們就侵入了個人的隱私。實驗研究者有時候使用雙面透視鏡或隱藏式麥克風來監視受試者。即使受試者已經被告知他們正在接受研究，他們依舊對實驗者所要觀察的一無所知。實地研究者可能會去觀察他人行為極為私密的部分或竊聽對話。在實地實驗和人種誌的實地研究中，隱私可能在未事先警告下就被侵犯。當韓福瑞（1975）在同性戀邂逅的公共洗手間擔任「把風皇后」時，他並未知會受試者就去觀察極為私密的行為。

當匹利文和其同事（1969）安排人在地鐵突然跌倒以研究助人行為時，在車廂內的人其搭乘的隱私就被侵犯的。人們經常在公共場所（如，在候車室、走在街上、在教室中）被研究，但有些公共場所要比其它場所更私密（想想看，如，使用潛望鏡來偷窺自認只有一個人在公廁內的人）。

竊聽對話和在準私人領域觀察人也會引發倫理爭議。重視倫理

的研究者只會在所需的最低限度，以及正當的研究目的下，才會侵犯他人隱私。此外，他會保護受試者的資料免於公開曝光。

在一些情境下，隱私受到法律的保護。有一個侵犯隱私的案例促使一條聯邦法律通過立法。在1954年的「維奇塔陪審團研究」中，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的研究者記錄陪審團的討論，以檢視陪審團審議的團體歷程。雖然有重大發現，也採取了慎重的防範措施，但仍引來國會的調查並且在1956年通過一條法律禁止基於任何目的對任何大小陪審團的窺探，就算有陪審員的同意也不例外。

❖ 匿名

在蒐集資料之後，研究者以不洩漏受試者身份來保護其隱私。方法有二，作法都是把個人的身份及其回應分開存放：匿名與保密。

匿名意指受試者參與研究時使用匿名或不留下姓名。例如，田野研究者提供特定個人的社會背景，但名字與住址都是假的，並改掉部分特徵。受試者的身份獲得保護，沒有人會知道他是誰。調查與實驗研究者為了達到匿名，會儘速地銷毀受試者的姓名或地址，只用編號來代表受試者。如果使用郵寄調查的研究者在問卷上做暗號以斷定哪些受訪者未回覆，則受訪者的隱匿性就未受到完整的保護。在小組縱貫研究中，會持續追蹤相同的一群人，匿名就不可行。同樣的，在歷史或文件研究中研究者會使用特定的姓名。如果原始資料是來自公開的資源，他們可以這麼做；但如果來源不是可以公開取得的，研究者就必須取得文件所有人的書面同意，才能使用特定姓名。

要維護受試者的隱匿性困難重重。有個研究在探討一座經過化身的城鎮，即《大社會中的小城鎮》(*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的「春之鎮」(Springdale) (Vidich & Bensman, 1968)，人們可以很輕易地辨認出這個城鎮與住在其中的特定人物。研究者描繪的方式激怒了小鎮居民，於是發動遊行來嘲笑研究者。正如在探討印第安

那州牧曦區（Muncie）中鎮的著名研究裡，人們也常常可以辨認出被研究的小鎮。不過，如果研究者以捏造的資訊來保護個人的身份時，所研究的與所報導的之差距會引起人們去質問哪些是研究發現？哪些又是捏造的？在小樣本的研究裡，研究者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就違反了對匿名的承諾。例如，假設你調查了100位大學生，用問卷問了很多問題，包括：年齡、性別、宗教信仰和出生地。樣本中有位出生在安大略州斯特拉福，22歲大的猶太男生。根據這些訊息，你可以查出這號人物是誰，以及他在極為私密問題上的回答情形，即使問卷上並未直接寫下他的名字。

❖ 保密性

即使匿名不可行，研究者也應該要保密。匿名使特定個人的身份免於被知道；保密則指資料上雖有附上姓名，但研究者是秘密持有或絕不公開。資料公布的方式不能讓人可以將特定個人和答案聯想在一起，而是以集體形式來公布呈現（如，百分比、平均數等）。

雖然匿名和保密常搭配出現，但研究者可能只做到匿名但不保密，或是剛好相反。沒有保密的匿名意即所有關於特定個人的細節都會公開，但個人的姓名則加以保留。保密而未匿名則意指資訊不公開，但研究者私下將個人姓名及其答案加以聯結。

保護受試者的身份不被公開的努力已經發展出精細的程序：引出匿名答案、採用第三者擔任保管人來持有名單解碼的鑰匙、或是使用隨機反應的技術。過去的濫用告訴我們這類的測量是必須的。例如，Diener & Crandal（1978: 70）曾報導在1950年代，美國國務院與聯邦調查局要求索取參加著名的**金賽性學研究（Kinsey sex study）**之人士的研究記錄。金賽性學研究機構拒絕順從政府，威脅寧可破壞所有的記錄也不願做絲毫的外洩。最後，政府終於打了退堂鼓。研究者的道德責任與倫理信條支撐他們寧可銷毀記錄而不提供給政府官員。誠如Nelkin（1982b: 705）之評論「研究者保護

受試者的權力，在與政治或政策目標衝突時特別容易受傷害。」

保密也可以保護受試者免於受到身體傷害。例如，我遇過一位研究極權社會秘密警察內部工作的研究者。如果他洩漏誰是消息來源，他們將面臨處死或監禁。為了保護受試者，他用密碼寫筆記並將所有的記錄秘密藏起來。雖然他住在美國，他的生命仍受到外國政府的威脅，也發現有人試圖行竊他的辦公室。另一種狀況是，有其他的原則優於維護保密。例如，研究精神病院的患者時，研究者發現有病人正準備要殺害一位護理人員。研究者就必須衡量保密的利益是否重於護理人員可能受傷害的代價。

社會研究者為了追求倫理性可能會付出很大的個人代價。華盛頓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班的學生 Rik Scarce，雖然他從未被告或被判有罪，而且也謹守美國社會學會制訂的倫理原則，卻因藐視法院而在 Spokane 監獄待了十六週。他之所以入獄是因為他拒絕在大陪審團前作證，也不願違反維護社會研究資料機密性的原則。Scarce 持續在研究激進的動物解放組織，也出版了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著作。他訪問了一位受試者，此人被懷疑領導一個從事破壞動物器材的組織，並造成十五萬美元的損失。兩位法官拒絕接受社會研究資料保密性的說法。

在 1989 年，美國政府建置一種方法來維護私密。研究者可以透過註冊研究計畫來申請由美國國家衛生機構所核發的**保密證書** (a certificate of confidentiality)。這份證書確保了受試者資料的私密性，免受聯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刑事或民事法律行動的約束。不論研究計畫是否有聯邦政府基金的贊助，研究資料都要受到保護。不幸的是，這個證書可以保護受試者的資料，但並未保護研究者豁免於法律行動。

當以「受控制」群體（如，學生、犯人、員工、病人和士兵）為研究對象時時，更需關切隱匿性與保密性。守門人或握有權力的人可能會設限，除非他們也得到受試者的訊息。例如，有位研究中學生藥物使用和性活動的研究者。校方答應在兩個條件下合作：

(1)學生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參與，以及(2)校方要取得所有使用藥物以及有性行為的學生名單，以透過諮詢來幫助學生，並通知學生家長。重視倫理的研究者會拒絕繼續進行，而不是逢迎第二個條件。

受試者資訊是個人資產

如果你基於研究的目的把自己的資料免費提供出來，你就失去對它的所有權力嗎？它可以被用來危害你嗎？人們只要參與研究就會被人取走關於他們的知識並加以分析。然後這些資訊可能有多種用途，甚至包括危害受試者利益的行動。

事實上有那麼一個由大型機構操控的，專門蒐集關於人的資訊、並加以蒐購、販賣、分析和交易的「訊息產業」存在。一些關於購物習慣、個人口味、消費型態、信用額度、投票傾向等等的資訊都受到很多公私機構的運用。資訊也是個人的資產之一。比較類似其他「智慧」財產（著作、程式軟體、專利等等）一樣，而較不同於多數的有形資產，資訊在交易過後其價值仍然存在。

大多數的人並未把關於他們的資訊視為是他們的資產；他們免費地提供讓渡。他們無償地提供時間和資訊給研究者。不過，從對隱私的重視以及為了蒐集更多的資訊的觀點著眼，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要將個人的資訊看做是個人的資產。如果它是私人的資產，那很清楚地受試者就有權保有、販售或讓渡它。當這些資訊被用來危害受試者或是用在他們不同意的方面，這就具有嚴重的倫理爭議。

這個議題特別適用於私人企業對資訊的蒐集。例如，我填過很多表格提供我的經濟狀況、病歷、婚姻狀況、生活習慣等等。別人運用並交換這些資訊，它可以用來同意或拒絕我的貸款、健康保險、租屋、獲得工作、乃至於是否納入促銷的對象。我不再能掌控這些資訊及其使用情形。它直接影響我又成為別人的資產。例如，一群宣誓不抽煙者接受研究來了解他們的習慣和心理特徵。一家市調公司取得這些資訊，並被一家煙草公司委託設計針對不抽煙者的

推廣促銷活動。如果這些不抽煙者被告知其回應的用途，他們很可能就會拒絕參與。藉由提供受試者研究發現的複本，並載明贊助者及將來資訊的運用會徵得其同意，研究者可以提升其公正性。

關於誰掌控受試者資料的爭議也和第四章所提及的研究取向有關。對實證主義和自然科學而言，對物質世界的描述與理解是特定專家的事。專家掌控遠離人群的資訊，並用它來發明製造神奇藥物、便利器具、個人或公司的財物、或是帶給人們惡夢的武器。實證主義主張資訊的蒐集與運用是專家的事，與受試者和凡人無涉。反實證主義的另外兩種取向，也都基於其理念，對研究過程中受試者的融入與參與以及研究資料及其運用提出主張（Gustavsen, 1986）。

對受試者的明文保障

美國聯邦政府訂有明確的規定和法條來維護受試者的權益。美國健康部門和保障免於研究風險的人身服務辦公室都在規章中立下法律限制。雖然這只是一個聯邦機構，大多數的研究者和其他政府機構都以它為指引。目前美國政府的法規是從1966年起開始實施、1971年擴大適用的公共衛生服務政策而發展過來的。

國家研究行動法案（National Research Act, 1974）設立了全國保護生醫與行為研究中人類受試者委員會，此舉明顯地擴展規定，並要求大部分社會研究都要取得知會後的同意。維護倫理標準的責任明訂由研究機構與大學來承擔。衛生與身心服務部在1981年所發佈的規章，至今仍然有效。在1989年又針對科學的不當行為與資料保密的規定加以增修。

聯邦法令沿用生物醫學的模式並保護受試者免於生理傷害。其它規定則要求在所有研究機構、學院、和大學中要由「機構審查委員會」來審查所有用到人類受試者的研究。「機構審查委員會」由研究者與社群成員來組成。也有類似的委員會負責監督研究中對動物的使用。審查委員也會監督、視察、與審查所有研究程序對人類

受試者的衝擊，以及要求遵從倫理指導。該機構對於還在醞釀階段的研究程序第一次提出時也會進行審查。教育測驗、「正常教育實務」、大部分調查、多數公眾行為的觀察，以及用無法辨明個人身份的現成資料所進行的研究，則可不經機構審查委員會的審查。

倫理和科學社群

醫生、律師、諮商師以及其他專業人員都有一套倫理信條（code of ethics）以及同儕審議委員會或是證照制度。這些信條明訂專業的標準、並提供在實務上遇到問題時的指導。社會研究者不再提供有報酬的服務、所受倫理訓練有限、也很少獲得證照。他們在研究中加入倫理考量是因為這是道德的，也是一種社會責任，更為了保護社會研究不至於被指控為冷漠無情或虐待受試者。

專業的社會科學學會也有倫理信條。這些信條說明了何謂適當的與不適當的行為，代表專業人士對倫理的共識。不可能所有研究者都同意所有的倫理信條，而且倫理規則也有待人的解釋，但要專業社群裡，能堅持倫理標準也是成為會員的條件之一。

研究倫理的信條可以溯源到紐倫堡規章（Nuremberg code），這是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針對納粹戰爭罪行所舉行的紐倫堡軍事審判中所採用。這些信條，是因應集中營實驗的酷行而誕生，它架構了倫理原則和人類受試者的權力。這些包括：

- 自願同意的原則
- 避免不必要的生理與心理傷害
- 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死亡或失能傷害的任何實驗
- 如果研究的持續可能導致受傷、失能、或死亡時要終止研究
- 實驗應該由最合格的人以最高水準的技術與關注來執行
- 研究結果應該是為了社會進步，而且是任何其它方法無法達成的

紐倫堡規章的原則是用來規範如何對待人類受試者，特別是針

- 是否負起倫理責任取決於研究者個人。
- 不可為了私利來剝削受試者或學生。
- 極力建議或要求具備某種知會後的同意。
- 尊重所有對隱私、保密，以及匿名的保證。
- 不可脅迫或羞辱受試者。
- 只在必要時才使用欺騙，而且務必在隨後進行簡報說明。
- 使用與主題相稱的研究方法。
- 偵測並排除可能帶給受試者的不利後果。
- 事先設想研究本身或是結果公布可能引發的反彈。
- 確認誰是研究經費的贊助者。
- 從事比較研究時要和地主國合作。
- 研究設計的細節必須和結果一起發佈。
- 結果的解釋必須和資料一致。
- 在方法論上要採取高標準並力求精確。
- 不可從事秘密的研究。

圖5.2 合乎倫理之社會研究的基本原則

對醫學實驗，但這些原則後來變成為社會研究的倫理信條的基礎。類似的人權信條，諸如1948年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1964年的赫爾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也都給社會研究者帶來啟示。圖5.2列出合乎倫理性的社會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則。

在1960與1970年代間，很多專業社會科學學會（例如，美國心理學會、美國人類學會、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以及美國社會學學會）都開始制訂倫理信條。我們把美國社會學學會的倫理信條列在附錄A供你參考。

專業的社會科學學會都會附設有委員會負責審議倫理信條，並探查可能的違反情形，但是這些信條並不具強制力。對輕微的違規的處罰大多只是一封糾正信函。如果未違反法律，那麼最大的懲罰就是對其嚴重違反倫理之事給予舉證詳盡的負面宣告。這種宣告可能導致研究者失去工作、學術期刊拒絕刊登其研究發現，以及禁止接受研究補助——換句話說，就是從專業研究者的社群中驅逐出去。

倫理信條的作用不只在梳理思考和提供指引；還可協助大學和其它機構防止倫理研究遭到濫用。例如，有位研究者在1994年完成24位工作人員的訪問與觀察之後，證實了在密爾瓦基（Milwaukee）公設辯護律師中的工作人員嚴重地超時工作，因而無法有效地為窮人提供法律辯護。在獲知發現之後，該辦公室的高層官員和大學接觸並要求要知道哪些員工曾經和研究者談過話，似乎暗示著會有報復行動。大學的行政部門援引廣為接受的保護人類受試者的信條來為研究者辯護並拒絕提供資料。

在諸多倫理信條中，Greenwald（1992: 585-586）曾如此評論：「社會學之所以能在各種學術專業中居於執牛耳的地位，就在於它不屑於諸如政府或大型企業等沿襲已久之制度的權威」，而且也嚴以律己在其領域內「明確指陳方法論上的缺點，對發現的解釋各說各話的開放性。」

倫理和研究的贊助者

告密

你可能找到一份為贊助者進行研究的工作，贊助者可能是一位和研究者簽約進行研究的雇主、政府機構或某家私人公司。當贊助者提供經費給研究者時，就會引發一些特殊的倫理問題，特別是應用研究。研究者有可能會被要求在倫理或專業研究的標準上妥協，以當作取得合約或繼續聘用的條件。研究者需要訂下倫理界線，逾越此界線他們就會拒絕贊助者的要求。當面對來自贊助者的不當要求時，研究者有三個基本的選擇：效忠組織或大團體、離開這個情境或是提出異議。這些讓他們自己面對屈服於贊助者、離職、或是成為告密者（Whistle-Blower）。研究者必須選擇其自己的行動方針，但最好在簽合約前就斟酌倫理議題，並在事前表達關切。

告密舉發是吃力不討好且危險的事。此事涉及三方面：知悉有

違反倫理作為的研究者、外在的機構或媒體，以及聘用組織中的上級督導。研究者必須確認已經嚴重違反倫理，而且是由該機構所授意的。在耗盡解決爭議的內部管道後，轉而訴諸外力。局外人對這個問題不一定有興致，也不一定幫得上忙。局外人常常有他們自己的優先考慮的事（破壞這個組織的形象、炒作這個問題）——這些都不同於研究者的主要關切（終結違反倫理的行為）。而督導或管理者可能會設法醜化或懲戒任何洩漏問題與行動不中的人。正如 Frechette-Schrader（1994: 78）所指出的：「告密舉發是一種特殊類型的不忠於組織的行為，或是遵從於比『效忠雇主』更高之原則。」在最好的條件下，這種問題還是要耗費一段時日才能解決，也會帶來情緒上的緊張。為了忠於道德，告密者必須做好犧牲的準備——失去工作或無法晉升、減薪或是強迫調職、被同事唾棄、或是惹來法律麻煩。而且也不保證做這些對的事就可以改變違反倫理的行為或是保護研究者免於報復。

獲得贊助的應用社會研究者有必要認真思考其專業角色。他們可能想要維持某種不受委託者干擾的獨立性，重申其為獻身專業的社群成員。許多人發現抵擋贊助者壓力的方式，就是參與專業組織（如，評鑑研究學會）、持續接觸贊助組織之外的研究者，並堅守最佳的研究作法。在受贊助條件下最不能堅守倫理標準的研究者，往往是那些孤立的、對自己專業沒信心的人。不管情境為何，絕對不能以「如果我不做，也會有別人做」的說詞來合理化違反倫理的行為。

獲得特定發現

假使贊助者直接地或間接地告訴你，應該要準備好什麼樣的結果時，你該怎麼做？如果要做研究的前提是必須得到特定結果，重視倫理的研究者會拒絕參與。所有研究都該在未對研究會得到什麼發現有所設限下來進行。

例如，有個調查組織取得一份為購物中心公會進行研究的合

約。這個公會正在和一個打算在購物中心舉行示威的政治團體進行法律訴訟。調查組織中有位訪問員反對問卷上很多他相信是無效的而且是偏袒購物中心公會的問題。在他與一家報社接觸並舉發這些偏差的問題後，這位訪問員就遭到解聘。然而，幾年之後，在一個「告密者訴訟」中，這位訪員收到超過六萬美元以歸還被積欠的薪資、精神賠償，以及調查組織繳交的懲罰賠償金。

另一個施壓以取得特定研究發現的例子是在教育測驗領域裡。用標準化測驗來測量美國學童的成就一直為人所詬病。例如，在美國約有百分之九十的學區中其學童在這類測驗中得到「平均以上」的分數。這稱為「烏比岡湖效應」(Lake Wobegon effect)，以烏比岡湖這個神秘城鎮來命名，在哪裡，根據廣播節目主持人 Garrison Keillor 的說法：「是所有學童的成績都在平均數以上」。會有這種發現的最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把現在學生的成績拿去和多年前學生的測驗成績標準做比較。研究者面對來自於教師、校長、督學和學校董事會等想要得到一個可以對家長與學區的選民報告說該學區是在「平均以上」的結果的壓力。

如何進行研究的限制

不論是直接地或間接地（例如，限制經費），贊助者能否透過界定什麼可以研究或是限制研究技術的使用來限制研究嗎？贊助者可以合法地設定研究技術使用的條件（例如，調查或是實驗）和研究的成本。不過，研究者必須依循普遍被接受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應該提出一份在既有經費下所能完成事項的務實評鑑。

限制的爭議在「簽約研究」(contract research) 中屢見不鮮，當一家工廠或政府機構要委託一項特殊的研究計畫就是所謂的簽約研究。在簽約研究裡總會產生品質和成本的拉鋸。亞伯特 (Abert, 1979) 是一家大型私人社會研究公司——亞伯特學會——的總裁，他認為：要根據研究實際成本來取得合約是件難事。一旦研究著手進行，研究者可能要重新修訂計畫，或是要更多經費。合約

的簽訂使得要中途變更困難重重。研究者會發現合約迫使其採用不是那麼理想的研究程序或方法。於是研究者面臨的兩難的困境：完成合約去進行一個低品質的研究，或是不去履行合約，連帶損失金錢與未來的工作機會。

假使研究者不能堅守一般被認可的研究標準，就應該拒絕繼續做下去。如果贊助者企圖用偏差的樣本或誘導性問題，重視倫理的研究者會拒絕合作。如果正當的研究證明贊助者敝帚自珍的想法或計畫是一個不良的行動方針，研究者可以預期不是要結束聘僱關係，就是承受違反專業研究標準的壓力。長久下來，贊助者、研究者、科學社群以及整個社會終將因違反正規研究作法而遭到唾棄。研究者必須決定是要做個白手套，無條件地提供贊助者任何他想要的東西，甚至賠上倫理的錯誤；或是要做個被賦予基於更高的道德原則來教導、引領、甚至反對贊助者的的專業人士。

研究者應該要問：如果贊助者對發現或真相不感興趣的話，為什麼他們要進行社會研究呢？答案是這些贊助者將社會研究看成是可以用來使其決策或作法合理化，這是其它方法所無法辦到的。他們濫用研究者身為專家的聲望來促進他們自己狹隘的目標。他們是在行騙，出賣社會研究誠實與正直的聲望。遇到這種事，重視倫理的研究者有道德責任來揭發並阻止這種濫用。

隱瞞研究發現

如果你做了一項研究而又發現不利於贊助者，或是贊助者不想發佈結果時，你會怎麼辦？這種困境對應用研究者而言並不少見。例如，有位社會學家替威斯康辛州樂透委員會進行一份關於州政府公辦賭博之影響的研究。在報告完成後，但對大眾公布之前，委員會要求她刪掉很多指出有關賭博對社會負面影響的章節，並拿掉創辦社會服務來協助強迫性賭徒的建議。研究者面臨了艱難的處境。哪項倫理價值該優先考量呢？為付錢做研究的贊助者掩飾，或是公布真相給想知道的人但得承擔後果？有位在調查「美國主教對教廷

政策之不滿」的羅馬天主教神父，被上司命令不得公佈發現並銷毀問卷。不過，當他從二十四年的神職退休後，他公佈了他的研究結果。為了信守倫理，研究者必須付出很高的代價，包括個人的和金錢的。

政府機構也會打壓抵觸政府政策、或是令高層官員困窘的科學資訊。我們也見過受僱於政府機構但對外公開資訊的社會研究者遭到報復。例如，有位受僱於受美國普查局的社會研究者在研究1991年對抗伊拉克的波斯灣戰爭所造成的死亡，他報告說政府官員基於政治理由而隱匿了研究發現。這位政府機構想要解僱的研究者報告說，美國政府的統計部門拖延並忽視此一高死亡率的研究發現。在公佈資訊之前，得先經過官派首長的通過。她指控這位官派首長一心一意只想維護行政單位的外交政策。還有一個例子，美國國防部下令銷毀那些指陳美軍中有百分之十是男同性戀或女同性戀者，以及那些不支持禁止軍中同性戀的研究。

在受贊助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在研究開始之前先協商發表發現的條件，並且協商結果立下契約。在未獲保證以前貿然進行研究實屬不智，當然還是會有欠缺倫理顧慮的競爭研究者會這麼做。另一種選擇是，研究者吞下贊助者的批評與敵視，在贊助者的反對下仍然發表研究發現。大部分研究者偏愛第一種選擇，因為第二種作法可能會嚇跑未來的贊助者。

社會研究者有時也會進行自我審查或延後公佈其發現。如此做的原因是為了保護消息人士的身份、維繫進入研究場域的管道、或是保護他們自身或家人的安全（Adler & Adler, 1993）。這是一種比較未受干涉的審查，因為並未有外力的介入。這是由接近研究並對可能結果瞭若指掌的人所做的。研究者對他們的研究負起完全的責任。通常，他們可以接近很多不同的資源，但同樣地，他們也要面臨很多競爭的壓力（參閱資訊箱5.3）。

資訊箱 5.3

評估研究的一般誤用類型

1. 提出「錯誤的」研究問題（如，在公式化問題較適當時卻問了籠統的是否題，或是排除關鍵問題）
2. 在決策後才實施評估研究，以作為延後或合理化決策的理由。
3. 所採用的研究設計或資料蒐集技術不適用於此方案評估任務。
4. 干擾研究設計或資料蒐集程序以確保產生所要的結果。
5. 當評估結果明確地顯示方式是無效時卻持續實施，或是當評估結果明確地顯示方式是很有效時卻結束它。
6. 壓制或刪除正面結果以取消或縮小一項方案，或是壓制或刪除負面結果以持續或擴展一項方案

來源：修訂自 Stevens and Dail (1994)，同時也提供了誤用的範例。

隱匿真正的贊助者

不透露贊助者的身份是否合乎倫理呢？例如，一家墮胎診所贊助一個調查宗教團體反對墮胎之態度的研究。研究者必須在：對受試者公開贊助者的身份、違反贊助者希望保密的要求來公佈結果，以及降低受試者合作的可能性等倫理價值之間加以權衡。如果結果被發表，就明顯地觸犯禁止洩漏真實贊助者的倫理信條。至於向受試者透露真正的贊助者身份是否違反倫理則尚未有共識。Presser 及其同事（1992）發現：受試者的答案會因贊助者的身份而有不同。調查是由對該議題立場清楚的報社所實施，他就比較不會去否定報社在此議題的公開立場。如果填答者相信調查贊助者是中立的學術組織，就比較不會是個問題。

研究的政治性

倫理議題也牽涉到研究實務的道德性。它主要關心的是個人和科學社群中其他人共同承擔的責任。主要的議題在於：保護受試者、實施和發表研究時的誠信、以及研究運作時能抗拒來自贊助者破壞研究完整性的干擾。什麼問題是研究者可以研究的？以及如何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如何傳播？乃至於研究發現的應用等。最核心的議題則是表達的自由，以及免受權力團體或機構影響的科學獨立性。沒有類似倫理信條的政治信條。雖然還不是很完美，但社會研究的終極目的畢竟是在發現知識和尋找真理。因而社會研究中所存在的政治爭論即在於權力團體或機構企圖限制對真相的尋找、阻止知識的傳播、或是對發現的誤用或選擇性忽視。這些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他們追求其他非科學性的目標。

對社會研究者研究什麼以及如何做研究的限制

對研究的直接限制

政府或社會中的權力團體可能會試圖對自由的科學探究加以限制。在不民主的社會中，對社會研究進行控制或審查是常態而非例外。特別是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主題，包括民意調查。因此，在中國、東歐、南非、台灣與其它地區，社會研究研究者受到懷疑，被框限在「安全」的主題上，或者被迫支持官方政策。在一些國家（如，希臘和智利），在軍事政變後，社會學的探討本身就被當成是顛覆活動加以禁止。有一個極端的例子，百分之四十的德國科學家在納粹於1937年「淨化」大學與研究中心時因政治理由而被解聘。另一個例子是在美國，有數百位教授與研究者因為他們不願意公開宣誓反對共產主義、也不願配合1950年代的麥卡錫（McCarthy）調查而遭到解聘。當時，反對強制的效忠宣誓、支持

種族融合、或倡導性教育的人士都被懷疑有顛覆的嫌疑，並遭受解聘的威脅。例如，僅僅是加州大學，就有二十五位教授因為拒絕簽署效忠誓言而被解聘。

對社會研究的兩個可能限制是：(1)控制接近資料或受試者的守門人，以及(2)對官方統計如何蒐集的控制。守門人可以限制什麼可以研究，以保護他們自己或組織遭到批評或難堪。守門人通常只開放他們放心的受試者或領域。例如，在1997年，美國陸軍把一份要發給9,000位士兵有關性騷擾的153題問卷中刪掉了幾個問題。有6題被刪掉的理由是「高階軍官擔心作答結果會使軍方極為難堪」(Schmitt, 1997)。兩位擔任該計畫顧問的研究者被撤換，一位社會人類學者和另一位是法律教授。其中一位透露從問卷原稿所得的初步結果，蒐集了在軍事基地的性騷擾，也問了某些特定的行為(如，去脫衣夜總會、看X級影片等等)。擔任守門人的軍官不希望可能會令人難堪的資訊被蒐集。

另一種限制和由政府或其它大型組織蒐集的官方或現成的統計資料有關。我們會在第11章再次論此一主題，但不論是否蒐集資訊以及如何蒐集都會影響到研究發現。通常，政治因素會影響在官方統計中如何界定現象(如：失業、收入、教育成就、貧困階級等等)，以及資料是否被蒐集。

有成千上百的科學家必須經常仰賴美國普查局所蒐集的資料來從事人口、經濟和其他的研究。普查的最原始目的是為了分配各州郡的選舉人的比例。之後，普查局蒐集資訊是為了制訂決策、提供社會方案、以及根據各地區人口數來分配政府經費。幾年之後，它又成了社會科學資訊的主要來源以及各項主題官方統計的蒐藏室。嚴重的扭曲(如一些人或領域系統性的高估或低估)削弱了根據普查局統計所得的研究發現、妨礙了真正的民主代表性、也降低了社會方案或經費的公平分配。當研究指證系統性的扭曲，社會科學家鼓吹在2000年的普查要用經過科學設計的抽樣方法以獲取更精確的資料。

正如你在第八章會看到的，適當地進行抽樣將可避免扭曲。經過幾年的爭辯後，國會和法院抵制抽樣並認定那無疑是使用一種明知會扭曲的方法。他們抵制抽樣的理由包括：對社會研究的無知、對傳統的重視超過科學精確、狹隘的地域自利考量（目前所得超過其應得）、以及害怕無偏的選舉人分配將使政黨失去選票。

有些社會研究者，特別是依賴現成統計資料的人，必須要靠政府提供資訊或文件。在美國，1980年的**文書裁減行動**（**Paperwork Reduction Act**）中設立了**資訊與管制事務局**（**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來決定有無必要來蒐集資訊與保存記錄。這項行動導致由政府贊助的研究出版物銳減。此外，該法案已經被「用來當成約束對行政部門政策目標不支持之資訊的理由」（Shattuck & Spence, 1988: 47）。例如，在衛生領域裡，以環境為焦點而間接批判到企業或政府的研究計畫，比那些以傳統疾病為焦點而間接責備受害人的研究計畫，更容易因「文書裁減」的藉口被拒絕出版。

在縮減成本的名義下，聯邦機關停止蒐集資訊、取消開放資訊流通、並且把資訊蒐集的工作轉交給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企業。美國政府出版機關的門市數量遭到裁減，而價格則被提高。例如，一本名為「嬰兒保健」的67頁厚的小冊子，以前由公共衛生的方案支助，免費發放給母親，現在則要價4.75美元。不去蒐集資訊的官方決定有時也帶有某些政治意涵。例如，在1980年代早期，全國教育統計刪除了百分之四十的無關金錢的項目。有關教師或行政人員性別比例的資訊，在1974年被採用以偵測有無性別歧視，但在統計報告中也被刪除。因此，不蒐集該項資訊的預算決定導致更難以去證明性別歧視的存在。

由政府蒐集的資料向來都以極低價格賣給私人企業。於是私人企業變成這些資料的唯一來源，並且對研究者要價極高。例如，以前免費公開的資訊，現在變成只能透過一家私人公司才能取得，而且要繳交一年1,495元的會費。Starr & Corson（1987: 447）如此

評論：

「統計資訊的私人化」會對未來的社會科學與智慧生活帶來一些特殊的問題。無法取用掌握在私人手裡的新資訊來源，大學和其他的非營利研究中心將被拋在知識的逆流區難以前行。

總之，還存在著在實質上是自由的與獨立的社會研究。不過，同時也有一些蠢蠢欲動的政治動機，企圖限制社會研究者該研究什麼。

❖ 來自政治影響的限制

不幸地，有些不屬於科學社群的人會因為有不同的社會或政治價值來抨擊社會研究。政治人物或記者可能聽聞有個研究計畫碰觸到具有爭議的領域，或可能是誤解這個計畫，然後利用這個機會來吸引大眾的注意力。例如，南伊利諾大學的Harris Rubin教授想要探究THC（一個大麻內的活性物質）對性慾的影響。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科學證據，有的只是矛盾的迷思。他非常小心遵守所有程序與規定，並在1975年獲得國家心理衛生機構的贊助。一位保守的國會議員從報上獲知這個研究主題後，就在國會中提出修正案來禁止進一步的贊助。此外，這個計畫的全部贊助經費也都要退回給聯邦政府。儘管科學家極力抗辯政治人物不應該妨礙合法的研究，補助依舊被刪除。政治人物不敢支持這個社會研究，是因為怕競爭對手以此為例向選民說，政府顯然是拿錢給學生去「吸毒和看色情影片」。

William Proxmire參議員的「金羊毛」（Golden Fleece）獎是頒給那些科學重要性不受這位議員賞識的社會研究計畫。他揶揄人際吸引力與情感的研究、以及壓力與緊張的研究都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錢」。有一個案例，一位密西根的首席研究者遭到這位參議員的抨擊，連帶的丟掉了其位置與贊助。在美國最高法院結案的一個法

律案件中，法庭裁定參議員在美國國會範圍內對個人的攻擊具有免責權，但若以信件方式寄出，並在國會之外抨擊他人，就可以因毀謗、中傷來起訴他。另一個政治壓力的例子發生在1989年，當時政府贊助一項防治愛滋病的全國性性行為調查研究，結果被國會否決，因為議員們認為由研究者去詢問人們的性行為是不適當的。

一項由國家衛生機構以青少年性行為為題的研究計畫，在1991年因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後被刪除。這個研究原本要調查24,000名青少年的社會活動、家庭生活、與性行為，以期能夠提供瞭解愛滋病和其它性傳染病的背景。很多研究者表示他們並不想談論這個議題，因為他們唯恐成為政治團體的目標。一些表達意見的人則說：帶有極端政治意識型態的少數團體封殺重要研究的能力是「令人憤慨」且「又驚又恐」。一位社會學研究者歎道：一個計畫被刪除不是由於在科學品質或重要性上有問題；相反的，其決定是基於「我們不需要知道它」之意識型態的作祟。

大眾對社會研究的抨擊，即使是不帶爭議性，僅是誤解了研究，也傷害了所有的研究者。政治人物可能會「斲喪」科學社群認為正當的研究，也可能會推動科學價值不高的「乖乖計畫」(pet projects)。申請政府贊助的研究者有時候會以不吸引人的方式來重述其計畫。大眾對無疑研究者的揶揄或研究贊助者的拒絕，不僅鼓勵了自我審查，也同時養成對社會研究的負面公開意見。

❖ 國家安全與對社會研究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事機密與國家安全成為主要的議題。多數的關心在於製造武器的技術，但是社會研究者則侷限於有關外國研究、軍事利益的議題，以及政府本身的研究上。諸如國家安全局與中央情報局等美國的安全機構一直到1950年代的冷戰時期都還在左右社會與自然科學研究。

在1960年代有一個政府研究計畫引發極大的爭議。美國軍方贊助「卡密勒特計畫」(Project Camelot)，它涉及到有位知名的

社會研究者前往智利研究政治暴動與軍事動員。這個計畫在數個層面引發爭議。第一，這個計畫的目的是為了找出如何防止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與劣勢團體採取獨立的政治行動來對抗獨裁者。這類反暴動研究通常是由中央情報局負責。研究者被指控用他們的技術與知識來幫助軍方壓制居於劣勢的第三世界民眾。第二，有些研究者並不清楚經費的來源。第三，智利的人民與政府並未被告知有這個計畫。在他們察覺後，他們要求結束研究而且所有研究人員都必須離開。

在1960年代後期與1970年代，研究的自由度擴大了，對研究者的限制已經放鬆，政府不再動不動就把文件列入機密。美國國會在1966年通過「資訊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並於1974年加以強化。這個法案把很多官方文件對學者和民眾公開，只要他們向政府機關提出申請即可。但是走向資訊更加開放以及研究更加自由的趨勢在1980年代反轉了。基於國家安全與預算刪減的理由，美國政府限制資訊的出版、擴大機密文件的範圍、開放的資訊變少了。這阻礙了學術探究、科學進步，以及民主化的決策。

在1980年代，國家安全的定義被擴大，政府文件列入機密的系統擴編，對「敏感地帶」上的研究提出新限制，縱使並未牽涉到政府機關或經費也是如此。這使得更容易把原屬於公共領域的資訊和文件列入機密。此外，軍事與安全官員可以對國外的研究者設限，不准他們參與學術會議或參觀美國的學校教室、圖書館，以及研究中心。

在過去，中央情報局的秘密局員曾經偽裝成社會研究者以在外國取得資訊。在1986年以前，中央情報局都還禁止研究者洩漏經費來自於它的掩飾規定。

在當時，這些規定才放寬只限於那些中央情報局認為公開「將不利於美國」的案例。例如，一位哈佛教授與中央情報局簽署了不得洩漏其有關美國對外政策的學術著作的研究經費是由它支付的

合約。

跨國研究牽涉到特有的倫理議題。研究社群譴責地下工作者假冒研究者的身份以及隱瞞研究經費來源等作法。研究者已經發展出在其它國家從事研究的倫理守則，明確要求應該與當地政府官員合作、保護受試者、以及留給地主國的資訊等。不過，研究者或許會遭遇來自其政府的干擾，或是基於他對不民主社會下研究對象基本人權的尊重，可能使其隱瞞資訊不讓當地政府知道。

透過控制研究經費的間接限制

政治影響社會研究最普遍的方式是透過控制研究的經費。在部分層面上很類似贊助研究的爭議。大型研究計畫往往是昂貴的、得花費上百萬美元。這些經費一般來自於私人企業或政府部門。

在美國對研究的限制很少。大部分的官員都認識到：一個開放自主的社會科學社群就是通往無偏且有效知識的最好途徑。同儕審查的過程會推動自主性的研究，因為向政府機關申請經費來執行研究的計畫書是由研究者的同儕根據科學的價值來審查。雖然大部分的基礎研究都由聯邦政府贊助，但是研究的進行則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學院、大學、和研究中心。

相對於大企業花在研發上的經費或是聯邦政府對自然科學或軍事研究上的經費，社會研究經費的總額其實是微不足道的。在美國，大部分社會研究的經費來自於聯邦政府，因為大學與私人基金會的贊助在額度上、範圍與件數上都有所限制。因此，對於大型計畫，研究者被迫必須向聯邦政府申請經費贊助。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美國，一些富裕的家族所設立的私人基金會（卡內基、福特、洛克菲勒及山佳）是大部分社會學研究的經費來源。這些基金會在找尋工業化初期所出現的嚴重社會問題的相關資訊。他們也想要削弱激進份子與社會研究者之間的聯繫，並保護既有的社會制度。幾年之後，「社會科學研究的成果變得制式化或形式化，從大眾觀點來看，它和贊助組織間的關係變得模糊難

辦」(Seybold, 1987: 197)。私人基金會把社會研究的工作從早期集中於應用、行動取向、批判的、關心鄰近地區、以及讓受試者參與之研究方向，調整為超然、專業、實證主義、與重學術。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政府研究經費擴編。直到1960年代，私人基金會仍居於設定研究優先順序的角色，不過在那時候聯邦政府贊助的經費已經多過私人的贊助。政府對研究經費雖然有所成長，但是提供給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的經費仍舊是微不足道。在美國，贊助社會學研究的經費向來都不到基礎研究所獲得聯邦經費的百分之一(D'Antoino, 1992: 123)。

在美國，社會研究經費可以向數個聯邦機關申請，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國防部、農業部、商業部、住宅和城鄉發展部、教育部、國家人文基金、小型企業局、司法部、勞工部，以及隸屬於衛生與個人服務部的許多機構。聯邦政府本身也聘用研究者來監督知識的進步與研究的進行。大部分社會研究是在學院與大學或是獨立的研究機構內執行。

美國社會研究的主要經費來源(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在早期基於政治的理由只支助基礎的實證研究。非實證主義社會研究和應用研究被排除在外，無法獲得自然科學家的支持，在大眾知覺中社會科學是鬆散的，保守主義者則認為社會科學是左傾的。此外，國家科學基金會也避免支助涉及爭議性的研究(如性、政治力等等)。這是源於一種恐懼，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政治氣氛裡，這類議題的研究可能會引起政治問題，並會危害到為社會科學研究取得政府的經費(參閱資訊箱5.4)。

分配給各個機構來贊助社會研究的經費額度，以及用於應用與基礎研究的經費比例，每年都有所不同，因為這是政治角力下的決定。雖然「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家衛生局」轄下的科學審查委員會負責評估申請計畫的科學價值，但政治官員則決定可用經費的總額，以及經費該用在應用或基礎研究上。Useem (1976a: 159)指出：

資訊箱 5.4

美國國會議員對研究經費的質疑

在1988年，南卡羅來納的議員 Sanford 說他想要刪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對一些科學價值遭他質疑之研究的贊助。很顯然地，他以為自己對科學價值的判斷比科學社群的判斷更高明，他舉了關於自動對講機（automatic teller machines）和撞球（billiards）的研究。國家科學基金會觀察到這個國會議員所指的研究：ATM 這個縮寫其實是「非同步轉移模式」（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s），一種高速的語音資料技術，而非自動對講機（automatic teller machines）的縮寫。而且 billiards 是物理學家的術語，用在次原子物質的理論，而非國會議員以為的撞球遊戲。

Sanford 議員，以及另一位來自同州的議員，表明要懲罰國家科學基金會，因為它贊助了一些他們認為不需要且浪費公帑的研究。他們所指的研究還包括：人們在團體中為何會傾向於冒險、男女兩性社會行為的差異、可能的政治候選人如何決定要競選公職。其他國會議員為國家科學基金會辯護，並指出這些批評來自於政客錯誤淺薄的研究結果，而非基於國家科學基金會透過同儕審閱的過程之研究型式（Lederman, 1998）。

由於聯邦研究政策是導向以生產政策相關的量化研究，迎合這些政策的結果是：學術研究更趨向以對政府機構有用的議題和技術，這在無政府補助下之研究是較為少見的。在學術性社會研究中，不論在本質上或方法上的優先性都明顯地受到政府優先性的影響。

社會研究者與其他人可以為經費或方案進行遊說，但決定優先順序還是政治人物。因此，政黨間或意識型態間的衝突就會影響可

用研究經費的額度以及經費如何使用。

在1970年代，給社會研究的美國聯邦經費無法隨著通貨膨脹來調整。「國家科學基金會」在1976和1980年提供給社會科學研究的經費，換算成相同單位後實質上縮減了百分之二十四。1980年代早期，關於提供社會科學研究經費的議題上掀起了嚴重衝突。儘管發出強烈抗議，但經費在1980和1983年間又跌掉百分之十七。社會研究變成是爭辯的來源。政治領袖認為太多研究結果支持他們對手的政策。應用研究也遭到刪減。為了因應，幾個社會科學學科的專業學會聯合起來成立一個遊說組織：「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Consortium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SSA)。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的成立是為了降低經費被削減的幅度。

繼白宮與國會間爭辯的潮起潮落的戲劇性變化後，從1990年代開始，提供社會學研究經費隨通貨膨脹調整的額度比二十年前還少(D'Antonio, 1992: 122)。提供社會研究的經費在過去七十年裡幾乎沒有任何變動。在1920年代後期來自私人的「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的研究經費，曾經就通貨膨脹與學術專業的規模而做的調整，很可能比1990年代初期從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的研究經費還大。

當為了分配經費給研究時的質疑與取捨時，就牽涉到政治價值。例如，政治人物決定分配經費給應用研究以顯示大企業標準化成本有多「沈重」，但卻未提供一點經費來研究標準化對消費者的好處。他們提高研究吸毒者犯罪的經費，但卻刪除研究企業高層犯罪的經費。他們提供新的研究經費來研究如何促進企業精神，而削減了研究社會政策方案縮減對民眾影響之經費。

提供給基礎研究的贊助經費可以促進特定理論或價值觀點。例如，可以分配經費來研究個人屬性如何與不想要的社會行為間的關聯性，而不提供經費來探究結構或社區的因素。透過把焦點擺在某些研究問題並對其它替代問題加以設限，政治團體試圖塑造被執行的研究。

很多社會研究者所指陳的議題都直接承擔著社會的信仰、價值、與政治。在這些議題上，政治團體的優先研究順序迥異於科學社群的優先順序。正如Useem（1976b: 625）所指出的：「這些優先順序不太可能與學科本身的優先順序一致」。這同時兼具好處與壞處。它確保了政治人物與意見團體所關心的問題會被討論到，而且被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團體界定為重要的社會問題可以因此獲得研究。如果科學研究不支持流行的公共迷思（如：死刑具有嚇止作用、墮胎婦女深受心理創傷），就會不斷分配經費去設法發現肯定大眾信念的證據，而科學性的核心議題則不被贊助。

科學社群擁有某種程度的自由可以來定義什麼該被研究，但如果政治團體涉入較少或是未進行遊說的問題則所得的經費將極為有限。這種經費上的不平衡也造成了各種議題間知識的不平衡。最後，有力政治團體感興趣的議題上有了實質的知識，而他們的對手將因缺乏知識而變弱。

在1992年5月，美國國會議員確認三十一項由「國家科學基金會」贊助的特定研究計畫是浪費納稅人的錢。被挑出來要刪除的計畫包括：「一夫一妻制與攻擊行為」、「國會選舉的系統研究」、以及「美國人對司法的知覺」。雖然這些計畫在科學價值上都經過嚴格的審查，部分政治人物還是決定要駕馭科學社群。這些政治人物從未學過研究計畫，也不具有社會或自然科學的背景。他們也批評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支持基礎社會研究。在研究社群廣泛的遊說後，有些研究計畫不再被鎖定，但是國會仍然在總額上動手腳，來刪減國家科學基金會分配給這些研究計畫的預算。

美國在1990年代有個趨勢就給各大學的研究補助上不經同儕審查的過程，而由政客指定經費給特定大學的研究計畫。某些州（如加州）接受到龐大的補助（六千萬美元）；其他州則一毛未得。例如，政治人物在1988年的運輸法案中撥款一千兩百萬美元給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來研究運輸傷害。贊助這些錢是基於無競爭的政治偏差。指定經費在1989當1993年間成長超過兩倍，然

後下降一段時間，但直到1996年間又轉成快速成長。這些「政治恩惠」的經費並不代表研究品質就有問題或是科學家就是不道德的。不過，它跳過同儕審查的過程，同儕審查過程的決定是完全依據科學價值，而不是利用政治手段來決定由那個大學或研究團隊來執行研究（Cordes, 1998）。

為了因應由於政府或經濟壓力因素所導致的研究經費的消滅，各大學已經逐漸轉向爭取私人基金會贊助研究。不過，來自私人基金的贊助（如，富人、私立基金會、大型企業、外國政府等）有時候會有些附加條件。例如，曾有一個捐贈的外國政府撤回四十五萬美元，因為在該大學的一位研究者公開為一個該政府反對的政策背書（Golden, 1996）。有位學者指出這些捐贈者並非學術機構，而且企圖了解某些觀點。大學和研究機構企圖避開私人捐贈者的控制及所設的條件，也極力在贊助經費與研究自由和發表不受干擾間取得平衡。

❖ 傳播知識的限制

在科學運作中有個原則以及在科學社群中有個主要的規範是有關知識的公開傳播。有權勢的團體或制度可以透過限制資訊的流通、限制出版、或是使研究者閉嘴來打壓社會研究。

一則1997年的新聞報導剛好見證了研究發現所受到的箝制。一家擁有一項能治療甲狀腺問題之暢銷藥品的製藥公司，禁止一所大學的研究團隊發表其可能證實該藥無效的研究結果。為了交換研究經費，研究者簽下了同意該公司有否決出版的權力。其他研究也顯示當製藥公司贊助研究時，百分之九十八的發表都證實他們的藥物是有效的。這個數字遠高於製藥公司不是經費來源的研究。部分人相信這是因為有關公司已投入上百萬美元的新產品的負面發現都被封鎖。研究者可能因為收了股票或其他好處而去發表正面的發現或是延後釋出發現。接受製藥或生化公司的研究者有半數以上承認：私人贊助的確會影響他們如何進行工作。

藥物或生化方面的研究並非唯一會在「利益」和「發表研究發現」間產生衝突的領域。在1997年，康乃爾大學的一位教授在市民大會中作證10分鐘，說明美國最大的護理機構——貝芙利企業（擁有700個護理之家）中勞工的工作情形。這位教授的證詞不斷被引用，也記載在國會報告、法庭記錄、晤談、以及其他學者所引用。在1998年，這家公司控告這位教授要求\$225,000的名譽賠償，並索取幾年的研究文件和筆記。這稱為「掌摑訴訟」，其目的在於阻止公開作證。這種作法開始於1970年代，一些公司運用「策略訴訟」以在爭議性議題上封住對方的嘴。

在其他案例中，有關組織犯罪的研究被拖延，在研究中接受訪談的經理以訴訟威脅後研究結果也改變了；另外關於寄宿學校研究結果的發表計畫也被打住，由於可能的法律訴訟，在學校行政人員希望改變他們在訪談中所說的，還希望改變書中其他部分因為他們不同意研究者的發現；還有一本有關研究實際如何進行的書裡，在一位研究者威脅要對研究團隊在研究過程中所爆發的衝突提出訴訟後，修改了一篇文章。

另一個議題是發生在以政治標準來遴選應用研究的審查委員。如果認為社會研究者不贊同其政治目標和價值的政府官員就會先過濾研究者的政治信仰。在1980年代以前，非關政治意識型態的「科學價值」是審查唯一的標準。聯邦政府官員也有試圖修改其所贊助研究的例子。例如，在1984年「住宅和都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和哈佛大學所定的研究契約遭到研究者撕毀，因為「住宅和都市發展部」堅持政治指派的官員是可以在發表前修改資料、發現和方法。在1991年，美國聯邦法院裁定聯邦政府的機關無權限定研究者在發表之前必須取得政府官員的同意。這類要求勢必成為一種變形的審查，會傷害到學術自由。

研究發現的傳播與應用

你會怎麼處理你的研究發現？實證主義研究者認為有兩個領域是價值觀可以合法的介入。首先，研究者可以選擇一個主題領域或研究問題。雖然在各主題領域中有所謂的「邊緣」領域，研究者還是可以根據個人的偏好來選擇研究問題。其次，只要研究完成，研究者的價值可以決定在哪裡來傳播他們的發現。他們必須將研究發現向科學社群報告，贊助機構也要一份報告，但是除了這些要求，其餘的就是研究者的權限了。

關聯模式

當研究的完成牽涉到 Rule (1978a; 1978b) 稱為**關聯模式** (models of relevance) 之倫理——政治議題時，會發生什麼事？Rule 在檢視社會研究者對他們的研究及其用途所抱持的立場後，指出這些立場可以劃分為五種基本類型 (參閱圖 5.3)。

關聯模式是描繪社會科學家所持立場的理想型式。研究者是生產有關社會如何運作之真實可信的資訊然後提供別人運用的技師嗎？或是屬於一個獨立的專業社群，有權決定要問什麼研究問題以及結果如何運用呢？在一個連續尺度上，一端是對研究及其應用缺乏任何關心或控制的無關道德的研究者。其所能提供的僅止於別人所要求的知識，再多也沒有了。這是在納粹德國下工作的科學家用來為其與納粹合作辯護的立場，後來則被歸類為「反人性的罪行」。他們「只是聽命行事」和「只是做工作」，而不問「任何問題」。在另一端研究者對研究及其應用有完全的控制權。

在第四章所討論的社會科學的各種取向也分別有其對應的關聯模式，就如同有其不同的政治觀點。實證主義者傾向於遵循「直接正面的效果」或「特定對象——政府」模式。詮釋取向的研究者遵循「無淨效果」或是「弱勢」的模式。批判社會科學家遵循「特定對象——勞工階級」或是「特定選民——弱勢」的模式。

1. 無淨效果：社會科學的發現對社會並無明顯的好處。有幾位著名的社會科學家抱持這種主張，包括：William Graham Sumner、Vilfredo Pareto、Herbert Spencer、Edward Banfield以及James O. Wilson。這些保守的社會科學家認為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於追求任何人的自我利益，長遠來看，社會科學所產生的知識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並不會比好處少。
2. 直接且正面的效果：社會科學的知識促使人類生活的改善。自由派的社會科學家，如墨頓，就採取這種立場：認為關於社會關係的知識導致一個更理性的世界。社會問題的研究結果幫助我們更認識這個社會世界，使我們能夠知道如何來改善社會。舉例來說，Lindblom & Cohen, 1979極力主張把社會科學轉向為去解決社會問題。
3. 特定選民——勞動階級：社會科學應該用來增進勞動階級的利益及地位。這是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研究中最恰當的用法。據此，所有的社會科學都可劃分到三個類別：瑣碎的、有益中產階級的、以及有助於勞動階級的。呼應批判科學研究取向，認為研究發現應該被用來宣揚與防衛無產階級的利益，並透過揭發與抗爭勞工所受到的剝削、壓迫、不義、與壓榨來幫助勞工。
4. 特定對象——弱勢：社會科學應該用來幫助社會上居於劣勢或受忽視的團體。這個模式呼應Karl Mannheim以及Wright Mills的主張，比馬克斯主義的立場更一般化。它認為很多社會團體都欠缺權力（婦女、消費者、少數民族、同性戀者，以及窮人等），並主張這些團體受到社會上掌握有教育、財富和知識的有力團體的壓迫。社會研究者應該保護那些在社會上無發言權、受到掌權者擺佈民眾。有當權者可以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或購買社會科學研究。由於在社會上具有獨特的角色，更位於一個能夠瞭解所有社會領域的地位，社會研究者有義務幫助弱勢並和他們分享知識。
5. 特定對象——政府：社會科學的恰當角色是協助社會的決策者，特別是公務人員。這個模式曾由參議員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也出現在政府的全國科學基金會的政策報告中、也常見於非民主的社會。它和第二個模式（直接正面效果）很類似，不過加上一個假設：即政府居於最佳地位來使用社會研究的發現，並會全心全意致力於掃除社會問題。它也和第一個模式（無淨效果）類似，但帶有在國家忠誠的條件下，「出售」或提供研究發現給出價最高的人。它假定政府的運作是基於全民最大的利益，研究者基於愛國的義務必須將其所知提供給握有政治權力者。

圖5.3 關聯模式

這些模式只是理想的型式。特定研究者或研究計畫往往會跨越不同的模式。例如，Whyte（1986）描述員工所有權的研究就跨越

了三種對象（勞動階級、弱勢以及政府）也具有直接與正面的效果。

自從陸爾發展出關聯模式之後，在美國有一種新的模式隨著非政府與私人「智庫」的成長而浮現。這個第六種模式是「特定對象——富人與企業」。它認為社會研究可以反映研究者個人的政治價值，並增進尋求維持或擴展他們權力之財團的政治目的。智庫是富人、企業和政治團體贊助的研究與宣傳組織。例如：曼哈頓機構（Manhattan Institute）、佳多機構（Cato Institute）、文化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以及美國企業機構（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等在1980年代早期到1990年代之間戲劇化地成長。他們鼓吹某個政治觀點，並且在各種方法間夾雜運用社會研究或偽科學。智庫付費給研究人員、贊助研究報告、並吸引大眾注意以支持他們的政治觀點。

智庫研究的品質參差不齊，欠缺同儕審查，客觀證據著墨不多，但建議卻是洋洋灑灑。這些研究的訴求對象不是科學社群，其原始目的也不在於增進知識。相反的，智庫研究者執行帶有意識型態觀點的政策取向研究，以企圖塑造大眾的思想並影響政治議論。有很多人因而贏得媒體的焦點、名聲、與財富，即使他們的研究可能品質低劣也欠缺科學同儕的審查。同時間，傳統社會學家在拮据的經費下進行研究，但缺乏和大眾媒體的聯繫，這些對同樣的公共議題進行更嚴謹與謹慎的研究卻遭到漠視。社會大眾與政策官員經常被智庫研究結果的知名度所矇騙。

在結果發表後

科學社群的自治規範主張公開研究發現。一旦發現成為公共領域的一部分，研究者就不再能掌控它們。亦即其他人可以基於其各自的目的來運用這些發現。雖然研究者可能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來選擇研究主題，但是一旦結果發表後，其他人可以利用它們來推進對立的價值。例如，有位研究者想要提升某族原住民的政治權力。

他研究該族的社會實況，包括在社區中取得更大權力的社會障礙。一旦該發現發表後，族員就可以運用結果來打破障礙。然而，反對者也可以利用相同的發現來限制該族的權力並增強障礙。

影響未來行為的研究發現

你曾經在閱讀到某些研究發現後做出不同於以往的行為嗎？如果有，你並不孤單。有時候研究發現的傳播會影響到社會行為。好比政治民調結果的效應。公共意見的民調會影響選民的政治傾向；亦即，部分民眾會更改他們的意見以符合民意調查的發現。Starr (1987: 54) 如此評論：「即使方法謬誤、資料不正確，官方統計仍然有其意義……假使官方統計會影響社會知覺和認知，那麼它們也會強力地影響到社會規範。」其它社會研究發現也會影響行為。事實上，經過廣泛傳播的研究發現對行為的影響方向可能與最初研究發現的恰巧相反或有所改變。例如，一份研究發現：專業人士較可能對他們子女的學術成就施加很大的壓力。如此製造出高度焦慮、不快樂的小孩。如果專業人士讀到此一發現，他們可能會改變教養孩子的行為。然後幾年之後，另一個研究可能會發現：專業人士對孩子學業成就的要求並未高於其他群體。

對於會影響社會行為的發現研究者有以下幾項可能的回應：

1. 它們毀壞了人類社會行為的可預測性與規律性，侵蝕了複製性的基礎。
2. 只有瑣碎的行為會被改變，所以此一議題只有侷限在非常狹隘應用領域之研究者要去面對。
3. 人類行為會改變是因為人類行為中只有少數不變的定律，而且人們會使用公共領域的知識來改變他們的生活。

無論如何，社會研究還不能揭露人類關係和行為完整的複雜性。即使它做到了，而且這些知識也完整且正確地傳播給所有人，社會研究者仍然必須去探討哪些人類行為會改變以及如何改變。

學術自由

大部分的學生都聽過**學術自由** (academic freedom)，但真正了解的人很少。「學術自由」是存在著一種開放與毫不設限的氣氛，可以自由地交換觀念和訊息。在開放民主的社會裡，很多人尊重知識份子的自由，並相信應該提供學者免於干預的自由。這個觀念是奠基於以下的信念，即：基本民主制度、不偏知識的進展，以及言論自由都要仰賴觀念與資訊的自由流通。

學術自由和研究的自主性有關，研究主題的新觀念、對發現的詮釋、理論或假設的發展以及對觀念的公開討論都需要學術的自由。

在大學院校與研究機構之學術自由提供了科學研究所需要的自由討論與公開交換意見的情境。

為了促進知識的進展，研究者、教授與學生需要一種環境，在那裡他們感覺可以自由地提出意見或進行辯論，有時候即使是冷門的意見或立場——亦即在這個環境人們能無畏地在公開討論中、課堂上、公開談話時或出版品中探索觀念想法的全貌。

從一些不重視學術自由之地缺少社會研究之情況正足以見證學術自由之重要性。學術自由的最主要威脅來自那些想要壓制討論或灌輸想法的社會或政治團體。對學術自由妄加設限會阻礙社會知識的成長並將侵蝕研究過程的完整性。

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學術自由是個重要的議題，當時正是社會科學正式擠身大學之內。在最初幾年，大學教授經常因政府官員或經濟菁英不喜歡他們在課堂上、或出版品中的言論而丟掉工作。在早期美國社會科學界的一些知名學者，如Thorsten Veblen，就是因為他們在課堂上的言論或文章中的觀念而遭學校驅離。任期制的發展是基於「教職員在經過一段長試用期之後，若無正當理由不可以任意解聘」之想法，如此得以促進了學術自由，但學術自由也不會因此就能完全不受威脅。還是有些教授與研究者因為倡導非

主流的想法而被解聘了。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AAUP）持有一份被明文記載違反學術自由之大學的「譴責」（censure）名單。大多數專業學會也都設有學術自由委員會，來抨擊違反學術自由標準的院校。不過譴責名單的作用僅能使這些大學難堪而已。

對社會科學的政治攻擊並非始於今日。這說明了獨立的知識追尋與要灌輸其信仰的政治團體之立場是存在著衝突的。這些攻擊帶出一個問題：從大環境的文化價值來說，社會科學應該具有多少的自主性？社會研究的發現經常抵觸植基於非科學知識體系（如，宗教或政治意識型態）的社會信仰。約在四百年前伽利略已經面對過這方面的困擾，當時自然科學尚未被接受。他根據自由思考的科學所得到天文發現與官方的基督教教義相抵觸。在酷刑的威脅下，伽利略被迫公開收回他的發現。壓抑伽利略，使知識的進展延緩了一個世代。進化論受到的挑戰同樣也可以作為科學知識與主流信仰彼此衝突的例證。

學術自由是好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科學研究所牽涉到的不只是認識技術資訊（如，如何抽取隨機樣本）；它還需要自由的精神與開放的討論、只論科學不涉價值的批判，以及深入探究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當學術自由被限制時，這些價值就受到威脅。

客觀性與價值中立

有些人主張社會科學必須像自然科學一樣地客觀不偏；也有人認為要維持價值中立、客觀的社會科學是不可能的。這個爭論無法在此獲得解決，但你應該瞭解其中所用到的定義與術語。澄清混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認識到每個術語都至少有兩種替代的定義。有時候，一個不同的術語卻共用相同的定義（參閱資訊箱5.5）。

實證主義取向堅持科學是價值中立、不偏的且客觀的。它將這

資訊箱 5.5

客觀的、價值中立以及不偏的

1. 客觀的
 - a. 主觀性的反面；外顯的、可觀察的、事實的、精確的、量化的
 - b. 邏輯的；由明確的理性程序所產生；不帶個人的或恣意的決定；遵循特定的既成規則
2. 價值中立：
 - a. 不帶任何形而上的價值或假定；不具先驗的哲學的成分；非道德的
 - b. 不受個人偏見或文化價值的影響；不具個人意見；不容納無證據支持的觀點：中立的
3. 不偏的：
 - a. 排除非隨機的誤差；不帶系統誤差；技術上的正確
 - b. 不受個人偏見或文化價值的影響；不具個人意見；不容納無證據支持的觀點：中立的

些定義全融合在一起。價值中立由邏輯一演繹、正式理論和完全將事實與價值概念分離等來促成。科學社群沒有偏見，透過自由與公開的討論來運作。基於徹底的價值中立與客觀，科學可以揭露唯一、渾然一體的、明確的真相。

韋伯、高德納與曼漢是探討社會學家在社會中角色的三位主要的非實證主義社會思想家。韋伯（1949）主張在社會科學中事實與價值的界線並不清楚。他指出隱含的價值理論定義了社會事實或社會化的意義行動。此社會理論必然包含以價值為基礎的概念，因為任何有關社會世界的概念都是由某些特定文化中的成員所創造的。社會概念的文化內容不可能被清除，而且社會意義的行動只有在文化脈絡下才真正有意義。例如，當社會研究者研究種族團體

時，他們所興趣的並非是種族之間的生理差異。種族是一個社會概念；研究它是因為文化成員對種族現象賦予了社會意義。如果人們沒有將這種社會意義賦予在可觀察的種族差異上，那麼「種族」這個概念就毫無意義了。

有些社會研究者植基於韋伯的觀念。例如，Moore（1973）曾問道：來自多數團體（如，白人）擔任「局外人」的研究者是否能夠精確地研究少數民族呢，因為其問題、假設、與興趣是來自於主流的、非少數民族的觀點。主流白人文化的文化、價值、與信仰體系能夠妥切地提出重要的問題並真正瞭解少數民族的次文化嗎？在性別議題上也有類似的顧慮。不是說來自於不同文化就不能去研究某個團體，但研究者必須更用心、更敏銳。

韋伯（1949）也主張社會科學家不可能對自己所探討之議題上沒有立場。但在應用通用的研究技術時，他必須是不偏的（即保持中立並禁絕個人意見與未經證實觀點），將重心擺在社會世界如何運作的方法與機制，而不是放在目的、價值、或規範性目標。研究者的價值必須與研究發現分開，除了以個別身份表示意見外，不該在特定議題上鼓吹自己的立場。

高德納（1976）質疑有所謂價值中立、客觀的社會科學。他認為價值中立在過去只是用來掩飾特定的價值立場。事實上，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一種偏愛「價值中立」的價值。高德納主張：完全的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科學家與其他專業人士用這個名詞來隱藏他們自己的價值。他建議把「價值」明確化。研究者可以由某種慾望驅動來進行研究，而較不可能只是毫無情感地研究這個世界。由強烈想要促成改變的道德慾望所驅動的研究者，不必然就會和好的研究絕緣。

曼漢（1936）也質疑所謂的價值中立（value neutrality）與客觀性。他注意到社會中的知識份子，特別是那些投入社會研究的人，似乎具有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個人在社會中所處的社會位置會塑造他的想法和觀點。不過，社會研究者有別於其他人，比較不

會受到社會地位的框限，因為他們試圖知道其他人的觀點並體察社會的每個角落。社會研究者並不會被視為是權力菁英，他們也比較不會因流行意見、時尚、與風潮而改變。他們能夠也應該採取「一種關係立場」(a relational position)——一種和任何其他特定的社會團體保持距離，但又都有所接觸的立場。他們應該抽離出社會或遊走於社會邊緣，但也要和社會所有角落有所聯結，即便是經常被漠視或隱匿的角落。

結論

我想用以下的勉勵來結束本章：不論你是社會研究的消費者或是社會研究的新鮮人，都應該要對自我有所認識。我們要辨明研究者在社會中的角色，以及社會研究本身所處的社會脈絡。社會研究者，尤其是社會學家，對大環境提出一種獨特的觀點。社會研究者承擔了某種責任，必須清楚知道社會科學是如何在社會中獲得目前的地位。如果我們從社會科學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就較容易明白許多倫理與政治的議題。

在第一章，我們討論了科學對社會的特殊貢獻，以及社會研究如何成為有關社會世界之知識的來源。社會研究的觀點和技術可以是認識這個世界的強而有力的工具。然而，力量也帶來責任——一種對你自己的責任、對你的贊助者的責任、對研究社群的責任、以及對整個社會的責任。有時候，這些責任可能而且也真的會發生衝突。

最後，你個人必須決定以合乎倫理的方式來進行研究，信守與護衛你所採取的社會科學取向之原則，並以此和人互勉。社會研究所產生之知識的真實性及其正用或誤用都全看像你這樣的個別研究者，能否時時反省自己的行動以及社會研究如何適切地融入社會中。

重要名詞

學術自由	匿名	壞血事件
倫理信條	保密	密告者
契約委託研究	交叉設計	知會後的同意
機構審查委員會	米爾葛蘭的服從研究	關聯模式
紐倫堡規章	抄襲	自願同意原則
佳美樂計畫	關係立場	研究造假
科學的不當行為	茶坊交易研究	價值中立
威其塔陪審團研究	辛巴席囚犯實驗	

問題回顧

1. 避免研究產生違反倫理行為的基本防範為何？
2. 欺騙與強迫參與研究的作法與自願同意原則有何衝突？
3. 解釋米爾葛蘭、韓福瑞、辛巴度等例子中的倫理議題。
4. 什麼是知會後的同意？它如何來保護研究的受試者？
5. 匿名與保密的差異為何？
6. 社會研究倫理信條的起源為何？
7. 贊助者可能會用哪些不合法的方式來影響研究者？研究者可以如何因應呢？
8. 政治團體或政治人物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影響社會研究？
9. 如果研究的受試者把關於他們的資訊視為是私有的財產，情況會如何？
10. 學術自由和研究倫理之間的關係為何？

質化與量化的研究設計

導論

研究的質化與量化取向

重建邏輯以及實務中的邏輯
技術體制與超驗的觀點
線性與非線性路徑
三角檢核法
客觀與誠實

量化設計議題

變項與假設的語言
因果關係與假設
解釋的切入點
因果解釋上的邏輯錯誤

雕琢研究主題：量化研究

從主題到特定的研究問題
從研究問題到研究假設
理論在何處？

質化研究設計之議題

個案與脈絡的語言

紮根理論

脈絡是關鍵
雙手萬能
重視個案與過程
詮釋

雕琢研究主題：質的研究

研究範例：量化研究

實驗
調查研究
內容分析

研究範例：質性研究

實地研究
歷史比較研究
菁英研究概觀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當前學術領域的權力型態讓不同的研究典範很難結合在一起……社會學的領域存在著令人振奮的可能性，如果它能繼續對於廣泛的理論與方法論的選擇抱持開放態度的話。社會學應該變得更具冒險性，少一點門戶之見，對其他學術領域更開放。它最好不僅要了解每種研究典範的限制，也要了解其可能的好處。

——Robert R. Alford, *The Craft of Inquiry*, pp.3-4

導論

這一章進入了本書的第二部分，在此我們將探討研究的邏輯：亦即設計一項研究的方法策略、發展測量工具、以及抽樣等。我們將更清楚明確地說明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差異。量化研究者較關心的是設計、測量以及抽樣的議題，因為他們的演繹取向，強調在蒐集與分析資料之前必須有周詳的計畫。質化研究者較關心的是原始資料的豐富性、結構以及情感等議題，因為其歸納取向強調的是從所蒐集的資料發展出洞識以及推論。

研究的質化與量化取向

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不同之處甚多，但在很多方面他們也可以互補。所有的社會學家都系統地蒐集、分析實證的資料，並小心翼翼地檢視其中的型態以求瞭解和解釋社會生活。這兩種取向的差異之一是在於資料的本質。由於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技術的不同，有所謂以印象、文字、語句、照片、圖像等等形式的「軟性資料」(soft data)；以及以數字形式為主的「硬性資料」(hard data)。另外一個差異在於質化與量化的研究者對於社會生活與不同的目標經常會有不同的假設。這些差異會讓另一個方法所使用的工具變得不恰當或不切實際。這些差異往往讓學生、研究者以及研究報告的讀者感到混淆。以量化研究的標準來審視質化研究的人們通常會感到失望，反之亦然。所以最好是去欣賞這兩種取向的優點。

要能欣賞每個取向的優點，就必須去認清研究者特有的定向。幾乎所有的量化研究者都植基於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取向。他們很可能採用一個**技術體制**(technocratic)的觀點，應用「重建的邏輯」，並遵循一個線性的研究路徑。他們說的是「變項與假設」的語言。量化研究者強調精準地測量變項，並考驗有關一般因果解釋的假設。

相較之下，質化研究者往往是植基於詮釋的或批判的社會科學。他們較常採用**超驗的 (transcendent)** 觀點，應用「實務中的邏輯」，並遵循一個非線性的研究路徑。質化的研究者講的是一種「個案或脈絡」的語言。他們強調的對社會生活中自然流程裡的個案進行深入的檢視。他們經常試著去呈現貼近社會歷史脈絡的真實詮釋。值得玩味的是：採行質化研究的女性社研者要比男性多。

儘管只採用某種取向的研究者和採行另一種取向的研究者總可以溝通無誤，但是這兩種取向的語言與導向其實還可以進一步互相理解的。要認識這兩種取向並知道它們如何互補是需要花時間與努力的（見表6.1）。

重建邏輯以及實務中的邏輯

社會學家學習與討論研究的方式通常會遵循以下兩個邏輯的其

表6.1 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差異

量化	質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研究者從考驗假設開始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一旦研究者浸淫於資料中，便試圖去領略與發現意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概念是以明確的變項形式呈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概念是以主題、動機、概論與分類的形式呈現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測量工具在資料蒐集之前系統地編製並且經過標準化。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測量工具是用一種特別的方法來編製的，經常是針對個別情境或研究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資料是經由精確地測量而得的數字資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資料是以從文件、觀察與謄本而得的文字或意象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理論主要是強調因果與演繹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理論可以是因果的或非因果的，並且經常是歸納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程序是標準化的，可以複製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研究程序通常是特別的，很少能複製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藉由使用統計、圖表來分析結果並探討它們與假設間的關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透過從證據確認主題或推論，並組織資料以呈現協調一致的圖像

中之一：重建的邏輯或實務中的邏輯（Kaplan, 1964: 3-11）。大部分的研究者會融合這兩個邏輯，但其比例則是各不相同。量化研究者應用較多的重建邏輯，而質化研究者傾向應用實務中的邏輯。邏輯的差異不在於嚴格或努力的程度。它們所代表的差異是在於所學習與討論社會研究時的明確化、系統化以及標準化的程度。

重建的邏輯意指進行研究的邏輯是高度組織化的，並以一種理想的、正式的、系統化的方式來陳述。它被重新建構成合乎邏輯、前後一致的規則與術語。在好的研究該如何進行上，它是一個洗鍊的模式。這個邏輯常見於教科書以及出版的研究報告。例如，對於該如何進行簡單隨機抽樣的規則是非常簡單明瞭且步驟清楚的。

實務中的邏輯是指研究在實際上是如何執行的邏輯。相較之下，它似乎較為雜亂，不確定性也較高，而且鎖定在特定的個案上，並傾向要在實務中完成一項任務。既定的規則不多。這種邏輯是植基於有經驗的研究學者所共享的判斷標準或規範。有賴於研究者在茶餘飯後或研究中討論時所傳承的非正式智慧。

運用重建邏輯的量化研究是比較容易從書上或正式的工具中來定義和學習的。量化研究者必須描述其所用的技術研究程序（如，從電話簿有系統的隨機取樣300名；李克特氏量表）這些步驟都是共享的、明確的方法。

質化研究仰賴由研究者經驗所發展出來的非正式智慧。質化的研究報告可能不探討方法（常見於歷史比較研究），或是會針對某個特別的研究附上一個私人的自傳（常見於實地研究）。程序或名詞很少被標準化，對此質化研究者之間還有一些爭議。很多質化研究者是透過閱讀大量報告、嘗試錯誤以及跟在有經驗的研究者旁邊當學徒來學習如何做研究的。這並不意味著質化研究就比較不正確，不過對於初學者而言要抓住它的要領是比較困難的。

技術體制與超驗的觀點

另一種區分質化與量化研究的方法是透過「技術體制」

(technocratic) 與「超驗的」(transcendent) 兩種觀點的對照 (Lofland and Lofland, 1984: 118-121)。「技術體制觀點」符合實證主義，而且量化的研究者較常運用它。在這種觀點中，研究者是專家，研究問題通常來自於研究的贊助者（也就是那些提供資金者）。研究的目標是：發現並確認一些有如法律的原則以增加效率。這是一個要滿足官僚體制需求的技術人員的觀點。

相對而言，「超驗的觀點」更貼近詮釋及批判的取向。在這種觀點裡，研究問題是從被研究者的立足點來提出的，而非局外人的。它的目的是要移除被研究者的錯誤信念，並視人們為有創造力、悲天憫人的生命體，而不只是物體。它經常質疑權力或不公平，並視社會關係為有意的行動結果，而非人性的法則。它試著幫助人們成長，關照他們的生活，並致力於社會的改變；也就是說，去超越目前的社會情境。

質化研究非常仰仗社會科學的詮釋取向與批判取向。此二取向在重大方面雖彼此互異，但都是實證主義（量化研究的基礎）的替代選擇；社會科學的詮釋取向在核心假設與目標上和量化研究恰成對比（參見第四章）。相較於詮釋研究者，批判取向的研究者會運用量化的技術，不過即使這麼做，批判取向的社會學研究者還是不同於嚴謹的實證主義。他們以不同方式應用理論，賦予歷史脈絡一個重要的角色，針貶社會情境，並揭示社會關係中的深層結構。

質性資料可以提供量化研究者在特定背景下社會運作的豐富資訊。也提供批判取向的研究者突破隱含在量化取向技術為先之假設的可能性。例如，Marshall (1985) 評論說：質化的研究方法比較不可能符合教育當局之優勢典範的假設。在這種假設裡，教育議題被定義為：由以下原因所衍生出的經營問題，這些原因包括：無知、學生或其家長欠缺動機、不適當的資源、或是專業人員或行政體系缺乏熱情等。採用技術優先觀點的研究者會蒐集資料來解決由優勢典範所定義的問題。但是持超驗觀點的質化研究者則會提出切入要點的理論性或政治性的問題（如，誰獲益？）他或她把議題放

在更大的社會——歷史脈絡中，近距離的觀察日常的作息，並試圖去理解所有和學校培育有關的觀點，包括那些反對行政當局觀點的人。

線性與非線性路徑

研究者在從事研究時會有其遵循的路徑。「路徑」是一連串要做之事情的代稱：該先完成什麼或是研究者要先到哪裡，以及接下來要做什麼或是要到哪裡去——這條路可以是一條修築得很好，而且也有許多研究者走過並做了記號的路。要不然，它也可能是一條通往人跡罕至的未知領域的新路，沒有標記指示前進的方向。

一般而言，量化研究者所遵循的路徑比質化研究者更為線性。一條線性的研究路徑遵循一套順序固定的步驟——它好比是一道方向清楚的樓梯。那是一套思考與觀察議題的方法——這是一條直進、狹窄、筆直的路徑，常見於西歐與北美文化中。

質化研究的路徑比較不是那麼線性，往往是反覆循環的。相對於走在直線上，一個非線性的研究路徑所踩踏的連續步驟，有時候會往回走或是到旁邊逛逛後才繼續向前。那是一種更接近螺旋式，非直進式的緩步向前。在每一次循環或反覆中，研究者收集到新的資料並獲得新的領悟。

習慣使用直接、線性取向的人可能會對較不直接的循環路徑感到不耐。從一個嚴謹的線性觀點來看，循環的路徑看起來比較沒有效率而且鬆散。但是擴散的循環取向並非只是毫無章法的混亂而已。它可能在形成對整體的感受、抓注意義的微妙層面、將散亂的資訊聚集整合、以及轉換觀點等方面極為有效——所以它並不是劣質研究的藉口，它有自己專業訓練及嚴謹之處。它從人文學科借了一些手法（如隱喻、類比、話題、中心思想以及反諷）並以建構意義為其走向。循環的路徑是適合諸如轉譯語言的任務，在這些任務中的重點在於發現幽微的意涵、巧妙的弦外之音、或脈絡的特異之處。「循環是這種取向的優點之一，因為它迫使研究者必須長期反

思整個研究歷程，也要在其他步驟的映照下來考量特定步驟」(Flick, 1998: 43)

三角檢核法

調查員與水手會從多個方位來觀察以測量物體之間的距離。透過不同的角度或視野來觀察某物，將更能確定它的真實位置（見圖 6.1）。這種程序，稱為三角檢核法，也被量化與質化的社會學研究者所採用。在社會學的應用上，意味著在觀察事件時，多從幾個角度去觀察會比只用一個方法來得好。

三角檢核法 (Triangulation) 的類型有好幾種。最常見的一種型態是「測量的三角檢核法」。研究者對同一現象進行多次測量。透過用一種以上的方法來測量某件事，研究者更可以看到事情的全貌。例如，教師要求學生寫申論題、填寫一系列的選擇題、提出口頭報告、以及完成一份學期報告或應用的計畫。當學生在上述的所有方法中的得分都類似，而不是只有一兩種時，老師會對此評量的正確性更有信心。而測量結果的任何差異也可以成為有趣的、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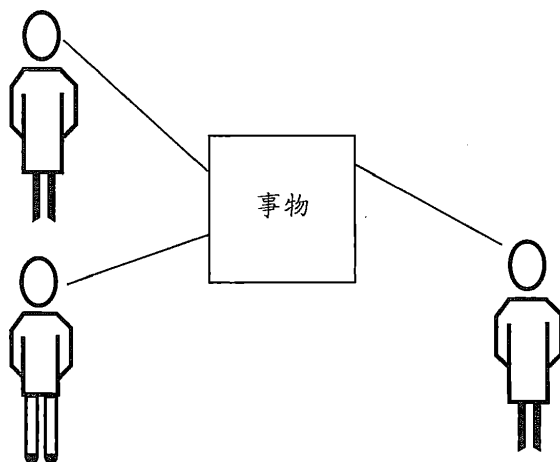


圖 6.1 三角檢核法：從不同著眼點來觀察

參考價值的資料。

另一種型態的三角檢核法是「觀測者的三角檢核法」。在許多研究中，由一位研究者來從事訪談或他就是人類行為的唯一觀察者。「一個人」意味著只有一個觀察員的限制將成為整個研究的限制。多個觀察者或研究者可以增加可選擇變通的觀點、背景與社會的特點並降低限制。例如，想像在一個研究中，由一位受過真正醫療訓練55歲男性白人來觀察病人在醫院的行為。除了這個單一觀察者的背景與觀點之外，他所注意的行為與對話或因他出現所可能發生的情況，可能不同於一位約30歲、不同種族、未受過醫療訓練的女性。整合由不同觀察者而得的資料是較能夠對背景環境形成更完整的圖像。

「理論的三角檢核法」(Triangulation of theory)是發生在研究者在研究初期的規劃階段或在闡釋資料時運用多種理論觀點時。例如，研究者設計研究時同時運用了衝突理論與交換理論的概念與假設，或是從每個理論的觀點來檢視這些資料。要同時運用一個以上的理論或許並不容易，但那將會增加形成創意整合或發展出新觀念的機會。

最後，則是「方法的三角檢核法」，指的是融合質化與量化的研究風格和資料。大部分的研究者在某一個風格中發展出一種專門技術，但是這兩種方法或風格有著不同但可互補的優點。既然只有部分重疊，那麼一個兼用兩者的研究將會更豐富或更具解讀力。融合這兩種風格的作法有好幾種方式（見Tashakkiori and Teddlie, 1998）。一種作法是接續地使用這些方法，先用一種再使用另一種。另一種作法是平行並進或同時使用這兩種方法來執行研究。例如，Dressler（1991）就是使用接續的方法，他想探討住在美國南方某一社區的非裔美國人，是否會因各種家居因素、生活型態與家庭資源而產生憂鬱。一剛開始他採用質性的作法，進行開放式的人種誌訪談，接下來再用一份量化的調查問卷來蒐集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客觀與誠實

所有的研究都有走向偏差、不誠實、或不道德的可能。所有的社會研究者都想要在他們的研究中保持公正、誠實、真實與無偏差。然而，量化與質化的風格在確保研究的誠實、真實之作法上則有不同的堅持。量化的研究者強調客觀以及較多「機械化」的技巧。他們採用可複製的原則、擁護標準化的方法程序，用數字測量，然後用統計分析資料，這是一個應用數學的領域。量化研究排除人為的因素。如同Porter（1995: 7, 74）所力陳的：

在理想上，專門技術應該是機械化與客觀化……以特定的技巧為基礎……。客觀的理想和科學化一樣都是非關政治的。客觀指的是法則，而不是方法。那意味著將公定的標準擺在個人的興趣與偏好之上。

質化研究者重視人的因素和關於研究背景的詳細第一手知識；他們避免讓自己疏遠所研究人們或事件。這並不表示可以任意介入自己的意見、怠惰對資料的蒐集、或選擇性運用證據來支持個人的偏見。它意謂著可以利用個人的領悟、感受與人文觀點以便更完整地瞭解社會生活。研究者明確指出自己的出現，並靈敏地體察其前提假設。不標榜所謂「客觀的」技術，質化研究者正視並公開其個人的參與。質化研究者強調「可信賴性」（trustworthiness）的概念，就如同量化研究設計所強調的客觀標準。這確保研究活動是可信的（dependable）且可靠的（credible）。

研究者的誠信是質化研究的關鍵課題。量化研究的誠信訴諸於其所倚賴的客觀技術——如精確的描述、標準化的技巧、數字的測量、統計與複製；質化研究則較為仰仗個別研究者的誠信，不過它還是包括了各式各樣檢視「證據如何蒐集」的方法。

❖ 檢核

質化研究者要確保他們的研究能正確地反映證據，並不斷檢視其證據。例如，一位實地研究者傾聽並錄下一位學生所說的：「史密斯教授把橡皮擦丟在瓊斯教授身上。」這位實地研究者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證據。為了強化此一說詞，研究者會考慮其他人的說法，尋找支持的證據，並檢核內部一致性。研究者會詢問學生是否有這個事件的第一手資料以及這位學生的情感上或私利上會不會使他說謊（如，這位學生可能基於某種原因而不喜歡史密斯教授）。即使這位學生做了錯誤的陳述，這還是該學生觀點的佐證。同樣地，檢視歷史證據的研究者會使用一些技術以驗證資料來源的真實性。

另一種檢核方式是質化研究者所記載的大量詳細筆記。研究者所記錄細節的量或有不同，但筆記的頁數至少也都在百頁以上。除了對證據的詳細逐字描述外，筆記也還指出資料來源、研究者的評論、有助於組織資料的關鍵詞、還有引用、照片、地圖、圖表、釋義和計數等。

還有其他交叉檢核研究的方法。雖然質化研究者一般都是獨自研究，但知悉這些證據的還是大有人在。例如，一位田野實地研究者探討存活在某一特定環境的當代人。這些被觀察的受試者可以閱讀研究的細節。此外，註明歷史的文件的出處，而其他研究者會加以檢核這些參考書目以及資料來源。

質化研究者取得讀者信任的最重要管道就是他／她呈現證據的方式。質化研究者不會把鉅細靡遺的筆記全都放到報告裡，他／她會編織一個網絡來讓細節環環相扣，提供足夠的脈絡與細節讓讀者有身歷其境的感覺。質的研究者對事件、人物與情境的第一手資料有如兩面刃，一方面可能會引起偏差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則可以提供立即的、直接接觸的以及深入的知識。

量化設計議題

變項與假設的語言

❖ 變異與變項

變項是量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簡言之，一個變項就是一個會有變化的概念。量化研究採用了一種有關變項以及變項之間關係的語言。

在第三章中，你學到了關於概念的兩種型式：一類是用來指稱固定現象的（例如，科層體制的理想型式），另一類則是在數量上、強度上或總數上可以有所變化（例如，教育的總數）。概念的第二種型式以及概念的測量就是變項。變項的可能數值至少有二。一旦你開始要尋找他們，便會發現到處都是變項。例如，性別是變項；它有兩個可能值：男性或女性。婚姻狀況也是變項；它可以分為未婚單身的、已婚的、離婚的或鰥寡的。犯罪的型式也是一種變項；它可以分為搶劫、破門竊盜、偷竊、謀殺等等。家庭收入也是一種變項；它的值可以從零到數百萬元。一個人對墮胎的態度也是一種變項；它的範圍可以從強烈贊成墮胎合法化到非常反對墮胎。

一個變項的數值或是類別就是它的**屬性 (attributes)**。變項和屬性很容易混淆。變項和屬性有關，但他們各有作用。這些混淆起因於一個變項的屬性，只要在定義上稍做改變，就可以變成一個獨立的變項。這個差別在於概念之間的變化以及概念自身內條件的變化。例如，「男性」不是一個變項；它用來描述是性別的一個種類，也是「性別」變項中的一個屬性。可是，一個相關的概念：「男性化的程度」則是一種變項。這個變項是描述在一個文化裡對男性的概念有關的態度、信念、行為的強度或力量。「已婚」不是一個變項；它是「婚姻狀況」變項中的一個屬性。相關的概念如「已婚幾年」或「對婚姻承諾的深度」就是一種變項。同樣地，

「搶劫」不是一種變項；它是「犯罪型式」變項的一個屬性。而「搶劫的總數」、「搶劫率」、「一次搶劫的數量」以及「搶劫的型式」都因為它們可變化或具有一個範圍的值而可以稱為變項。

量化研究者對自己感興趣的概念重新用「變項的語言」加以定義。正如前面所描述的變項與屬性的例子所指出的，在定義上稍加改變既可以將非變項改成變項的概念。如您在第三章所見，概念是理論的基石；他們將對社會世界的思考組織起來。清楚的概念加上謹慎的定義是理論的必備條件。

❖ 變項的類別

注意因果關係的研究者通常先從一個結果開始，然後再去尋找它的因。變項通常可根據它們在因果關係中的位置被分成三種基本的型式。原因變項或是一個可以被辨明作用於其他事物之力量或條件的變項，就是一種自變項。若一個變項是另一個變項的效果或產物，它就是一種依變項。自變項是「獨立」於先前影響事件的因子，而依變項則是「取決於」這個原因。

要決定一個變項是自變項或依變項並不總是那麼容易。有兩個問題可以幫助你決定一個變項是不是自變項。第一，它是否比其他的變項早些發生？自變項比其他型態的變項都要早出現。第二，假如這些變項都是同時發生的，作者是不是建議某一個變項對另一個變項有影響。自變項會影響或衝擊到其它的變項。研究的題目經常以依變項作為敘寫的核心，因為依變項就是要被解釋的現象。例如，假定有一位研究者要調查美國德州達拉斯犯罪率日益增加的原因，這裡的依變項就是犯罪率。

最基本的因果關係只需要自變項與依變項。變項的第三種類別——中介變項——出現在比較複雜的因果關係中。它出現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並且是它們之間的環節或調節機制。知識的進步不只在於指出因果關係，也要把解釋因果關係的機制加以確立。就某種意義來說，中介變項是自變項的依變項；也是依變項的自變項。

例如，法國的社會學家涂爾幹發展出一套自殺理論，其中指出婚姻狀況與自殺率的因果關係。涂爾幹發現已婚的人比單身的人較不可能自殺。他相信已婚的人有較高的社會統整（亦即隸屬於一個團體或家庭的感受）。他認為有關自殺的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對團體的歸屬感。所以他的理論可以用三個變項的關係來重新敘述：婚姻狀況（自變項）影響社會統整的程度（中介變項），而社會統整影響自殺行為（依變項）。具體說明這一連串的因果關係可以讓一個理論中的各個環節更清楚並幫助研究者檢驗這複雜的解釋。

簡單的理論有一個依變項與自變項，而複雜的理論可能包括許多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例如，一個犯罪行為（依變項）的理論，指定四個自變項：個人的經濟困難度、輕易犯罪的機會、為社會上未反對犯罪的異化次團體的成員、欠缺對犯罪行為的處罰。一個多重原因的解釋通常會明確指出那個自變項的效果最大。

一個複雜的理論性解釋通常包含多個環環相扣的中介變項。例如，家庭瓦解可能會導致孩子的自尊降低，進而引起憂鬱，導致在校成績不佳，也就不敢期待找到好工作，最後導致成年後的低收入。這一連串的變項分別為：家庭瓦解（自變項）、兒童自尊（中介變項）、憂鬱（中介變項）、在校成績（中介變項）、工作期待（中介變項）、成年後的收入（依變項）。

在同樣議題的兩個理論可能有不同的自變項，或對重要自變項的預測有所不同。另外，也可能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上看法一致，但在中介變項或因果機制卻不同。例如，兩個理論都說家庭瓦解導致較低的成年後收入，但原因卻不同。一個理論主張家庭瓦解會鼓勵孩子加入一些不正常的同儕團體，這些團體並不認同有關工作和節儉的社會規範。另一個理論則強調家庭瓦解對學生的憂鬱以及低學業表現，這就直接影響到工作表現。

一個簡單的研究計畫通常只檢定因果鏈中的一小部分。例如一個測試六個變項的研究計畫可能是從一個有24個變項的大型理論篩選而來的。明確地與大型理論掛勾可以加強並澄清研究計畫。這

常被應用在解釋性或基本的研究，這也是大部分量化研究的模式。

因果關係與假設

❖ 假設與因果關係

假設是一種有待檢驗的命題，或是對兩個變項之間關係的嘗試性敘述。假設是對社會世界如何運作的猜測；它們是以一種價值中立的方式來描述的。Kerlinger（1979: 35）這麼指出：

在科學研究中，假設比那些即將呈現出來的而只知道它們是什麼以及如何建構而成的更為重要。假設有其深入的重大目的——可以使人跳脫自己……對於知識的進步而言，假設是強而有力的工具，因為，雖然假設是由人構思而成，但可以在撇開個人的價值與信念下，來檢定或驗證假設的正誤。

一個因果假設有五點特徵（見資訊箱6.1）。前兩個特徵定義出一個假設所需的最少的元素。第三個重新敘述了假設。例如，參加宗教服務降低離婚率的假設可以重新敘述成為如下的預測：經常參加宗教服務的夫妻其離婚率比很少參加宗教服務的夫妻來得低。這樣的預測可以根據實徵的證據來加以考驗。假設的第四個特徵指出：假設應該合乎邏輯地呼應一個研究問題和理論。研究者考驗假設以回答研究問題或為理論尋找實證上的支持。最後一個特徵要求研究者使用實證的資料來考驗假設。由邏輯上看來必定是對的陳述，或無法透過實徵觀察來回答的問題（如，什麼是「好的生活」？真有上帝嗎？）都不能當作是科學假設。

因果假設可以用很多方法來陳述。有時候會用「導致」這個詞，但並非必要。例如，一個關於宗教參與率以及降低離婚可能性的因果假設就可以有十種以上的陳述方式（見資訊箱6.2）。

在考驗假設時，研究者會避免使用「證實」（proved）這個字

資訊箱 6.1

因果假設的五種特徵

1. 它至少有兩種變項。
2. 它表達出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
3. 它可以被描述成一種預測或是未來結果的期待。
4. 它合乎邏輯地鏈結到一個研究問題與理論。
5. 它具有可否證性：也就是說，它是可以根據實徵的證據來檢定並驗證其真假。

資訊箱 6.2

陳述因果關係的方式

- 宗教的參與**導致** (causes) 離婚可能性的降低。
- 宗教的參與**促使** (leads to) 離婚可能性的降低。
- 宗教的參與與離婚可能性的降低有關。
- 宗教的參與影響離婚可能性的降低
- 宗教的參與與離婚可能性的降低有連帶關係。
- 宗教的參與產生離婚可能性的降低。
- 宗教參與的結果就是離婚可能性的降低。
- 如果人們參加宗教的服務活動，那麼離婚的可能性將會降低。
- 宗教參與度越高，那麼離婚的可能性越低。
- 宗教的參與降低離婚的可能性。

眼。你可能在新聞媒體、法庭、或廣告業聽過證實 (proof) 這個字，但你不太可能聽見科學家這麼說。陪審團會說這個證據「證明」某人有罪，或一個電視商業廣告會說：「研究證明我們的阿斯匹靈

藥片能最快治癒頭痛」。這些都不是科學研究的語言。對科學而言，知識是暫時的，而且創造知識是一個持續前進的過程，避免做過早的斷言。

科學家不說他們已經證實了一項假設或因果關係。「證實」意涵著定局、絕對必然，或該事件已經無需進一步調查。在謹慎的科學世界裡，「證實」這個字眼太強烈了。證據可以支持或確認假設，但無法證實假設。即使是數百個研究都顯示出相同的結果，好比抽煙與肺癌的關係，科學家並不會說他們已經百分之百的證實這項關係。他們可以說有壓倒性的證據、或至今所有的研究都支持和這個假設是一致的。科學家不會想要關掉發現反駁過去結果之新證據的可能性。他們不會去切斷進一步探究，或終止去探索中介機制的機會。在歷史上充斥著許多當時以為已經證實的關係，在後來卻發現是錯誤的例子。在邏輯數學上的關係是會用「證明」這個字，一如數學上的證明，但在實徵研究的討論中則不這麼用。

❖ 檢定與精進假設

知識的演進很少是只植基於對單一假設的檢定。事實上，只專注在檢定一個假設的單一研究計畫上，很容易會對研究歷程產生扭曲的圖像。當整個科學社群的研究者檢定了許多假設，知識也會與時俱進。知識是在許多假設不斷轉變與精挑細選下而成長。每一個假設都傳達著對一個依變項的解釋。如果證據不能支持某些假設，那麼它們將慢慢地從考慮中移除。獲得支持的假設則保留在論點中。理論家與研究者不斷地提出新的假設來挑戰那些已經獲得支持的假設。

圖 6.2 所呈現的是一個假設隨時間演進的範例。在一個已知的起始點上（1960），存在八個互相競爭的假設。在這許多年裡，不同的研究者考驗這些假設，一直到 2000 年，只剩下兩個假設還留有可能性。兩者都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當研究者篩選現存的證據並發展新的理論時，就會提出其他的假設。當假設在考驗後違反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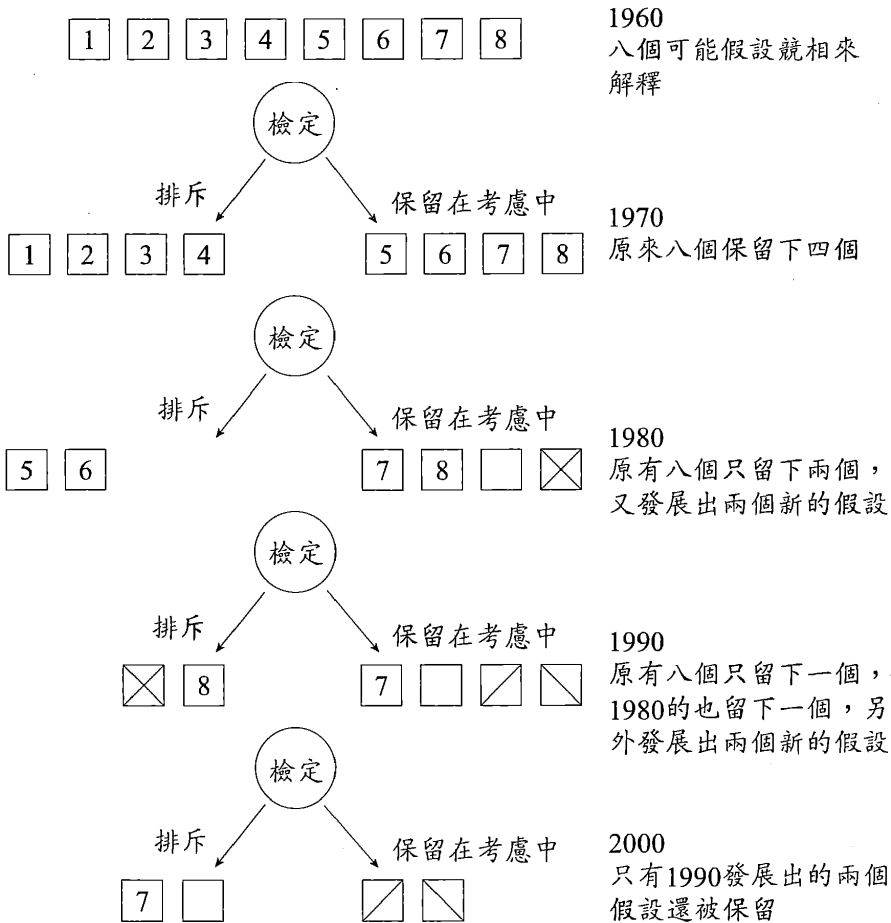


圖6.2 假設檢定隨時間運作的過程

徵的證據時，這樣的歷程會不斷持續下去。

科學家們是一個持著懷疑論的團體。在一項研究計畫中獲得支持的假設並不足以讓他們就接受它。可複製性的原則主張：一個假設必須在多次檢定後都能獲得一致且反覆的支持才會受到廣泛的接受。另一種強化對假設之信心的方法就是：考驗假設所依據之理論的相關因果聯結。

最堅強的論點或擁有最多實證支持的假設會被視為是當時最佳

的解釋。在邏輯上，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方法來考驗一個假設時，我們的信心就會越大。有些假設考驗的方式被稱為是決定性的實驗或決定性的研究。這是一個研究的典型，

在其中對於某一現象有兩個或更多可替代的解釋，每一個都有對應的實徵資料；而一個決定性實驗的設計就是其產生的結果，只有一種方案能解釋得通，因此它被公認為「最佳的解釋」。(Kaplan, 1964: 151-152)

因此，罕見的決定性實驗或研究計畫是對理論的重要考驗。來自兩個不同理論的假設在一個決定性的實驗裡對照並排，其中一個會在競爭中被淘汰。雖然這種機會實屬難得，但當它發生時，就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 假設的類型

假設是一串理論因果鍊中的環節，其型式有多種。研究者運用它們來檢定變項間關係的方向與強度。當一個假設擊敗它的對手，或對於一個因果關係提出替代性的解釋，它即間接地支持研究者的解釋。在假設檢定中有個奇怪的觀點：即研究者對於「支持假設的證據」與「反對假設的證據」有不同的對待方式。他們認為「負面的證據」更為重要。其觀念是：當要評判一個假設來自於不正確假設的邏輯時，負面證據具有決定性。此一觀念和Karl Popper的「否證論」的想法（見第四章）以及虛無假設（見本節後面的討論）關聯緊密。

回想一下我們先前對「證明」的討論。一個假設永遠無法被證實，但可以被駁斥。擁有支持證據的研究者，只能說這個假設還具有可能性或說它到目前仍然有效。負面證據則更為重要，因為如果證據不能支持假設，那麼該假設就變成「晦暗的」(tarnished) 或「殘缺的」(soiled)。這是因為一個假設應該可以做預測；負面或否定的證據顯示這個預測是錯誤的。正面或肯定的證據就不是那麼

關鍵，因為其它替代性假設也可以做出同樣的預測。發現一個肯定預測的證據，並不能讓研究者把這個解釋提升到其它替代性假設之上。

例如，一個帶著傘站在街角的人，嚷嚷說他的傘保護他不會被從天而降的大象砸到。這個「傘提供保護」的假設，的確有證據支持的；在他打開傘後，始終沒有一隻大象真的掉下來砸到他。不過，該支持證據是薄弱的；因為另外一個對立假設也說得通——根本沒有大象從天空掉下來啊。兩者都可以預測這個人很安全，不會被掉下來的大象砸到。這個假設的負面證據——一隻大象砸落在這個人和他的雨傘上，兩者也都被壓扁了——把該假設完全摧毀。

研究者考驗假設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進的方式，另一種則是虛無假設的方式。很多量化研究者，特別是實驗者，根據否定假設的邏輯，以虛無假設的語言來架構假設。他們透過尋找可以讓他們拒絕或接受虛無假設的證據來考驗假設。大部分的人認為假設是一種預測有某種關係存在的方式；虛無假設則恰巧相反，它預測沒有任何關係存在。例如，莎拉相信：校內住宿生的成績高於校外通勤生。

她的虛無假設是「居住方式和成績無關」。研究者使用虛無假設外，也使用相對應的對立假設或實驗假設。對立假設主張有關係存在。莎拉的對立假設是：學生在校內住宿對成績有正面的效果。

對大多數人而言，虛無假設的取向是假設檢定的逆向操作方式。虛無假設的思考植基於研究者嘗試去「發現關係」的假定，所以「假設檢定」應該設計成以「發現關係」為核心要務。採用虛無假設作法的研究者只會直接地檢定虛無假設。如果證據支持或引導研究者接受這個虛無假設，就會下結論說：所要檢定的關係並不存在。這意謂著該對立假設是錯的。相反的，如果研究者發現可以拒絕虛無假設的證據，則對立假設即保有成立的可能性。研究者無法直接「證實」對立假設；於是退而求其次，藉由拒斥虛無假設，讓對立假設可以繼續保留在論點中。當虛無假設檢定的結果是支持肯

定的證據，對立假設的主張就會越來越有力。

許多人對虛無假設感到困惑。要理解虛無假設還可以從以下的角度來看：科學社群是一個非常戒慎恐懼的團體。在沒有充分證據下，他們寧可認為因果關係是錯的。這很類似英裔美國人的法律觀：除非證據確鑿否則就是無罪。

一位研究者會假定（或當作）虛無假設是正確的，直到合理懷疑夠多，才會支持另一個假設。採用虛無假設作法的研究者通常也會採用對應的統計檢定方法（例如t檢定或F檢定）。因此，當一個統計檢定指出一個虛無假設有99%的機率是錯的，那麼研究者就可能聲稱：有合理的理由來懷疑虛無假設的正確性。這就是當一個研究者說統計考驗的結果讓他「在0.01的顯著水準下拒絕虛無假設」的意思了。

雙載假設（double-barreled hypothesis）是假設的另一種型式。研究者應該避免使用它；它只會凸顯思慮不周，造成混淆。雙載假設在一個假設中放進兩個關係。例如，一個研究者提出這麼一個假設：在一個區域中貧窮和青少年的高度聚集會提高財物犯罪率。這就是一種雙載假設。其涵意有以下兩種可能：貧窮或高度聚集的青少年都會導致財物的犯罪；或者是只有在「貧窮」與「青少年高度聚集」結合時才會導致財物的犯罪。如果以這個「兩者任一」的假設為檢定對象，而且只有一個自變項有效，那麼假設檢定的結果會含糊不清。例如，如果證據顯示貧窮會引起犯罪，但青少年高度聚集則不會，那是否要支持該假設呢？如果要考驗的是「兩者結合」的假設，那麼研究者的真正意思是說只有貧窮和青少年高度聚集同時發生時才會引起犯罪，而兩者之一單獨出現都不會。如果一個研究的本意就是鎖定此一兩者結合的假設，這樣就不算是雙載假設。研究者應該清楚並陳述此一組合假設，好讓這個變項相互搭配或組合的特別形式更為清晰明確。此一現象常被稱為「交互作用效果」（Interaction effect）。（交互作用效果稍後會討論，見圖6.3）

假設：貧窮和青少年高集中導致財物犯罪率增加

雙載假設：這意謂以下三種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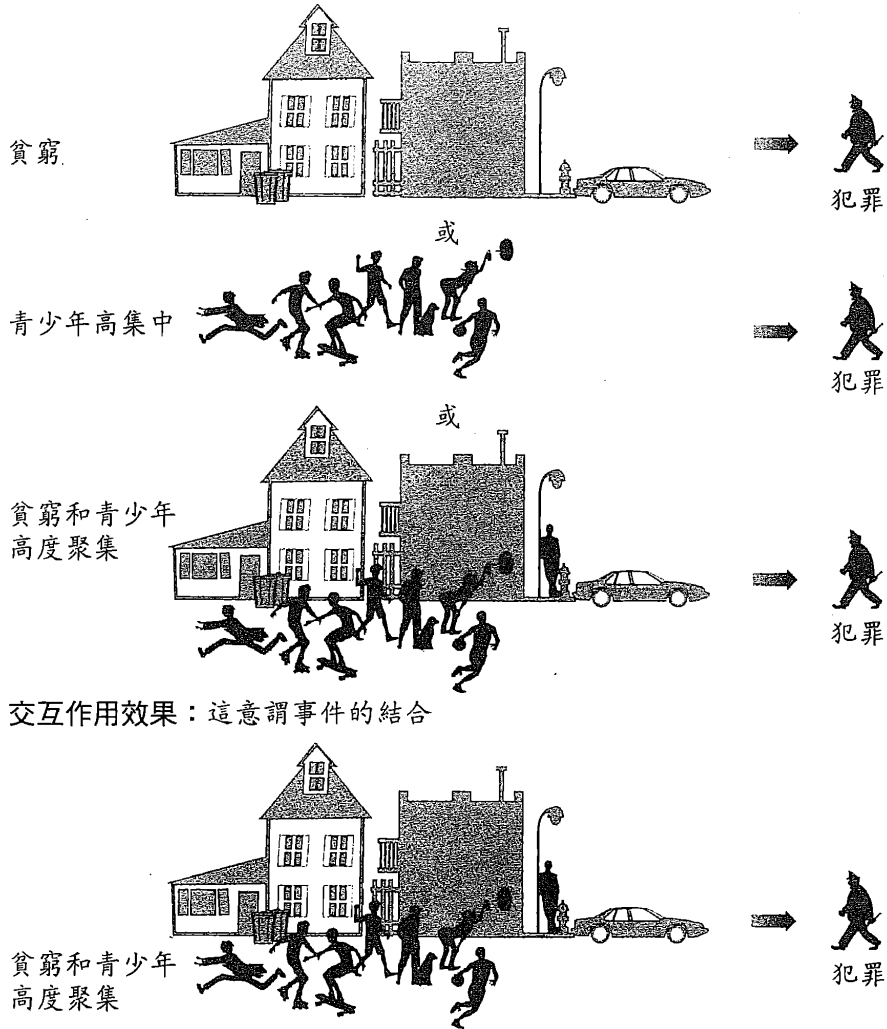


圖6.3 「雙載假設」對「交互作用效果」

解釋的切入點

❖ 關於分析單位與層次的澄清

在剛開始接觸到有關分析的單位和層次等觀念時，很容易感到一頭霧水。不過，這些觀念在構思及計畫一個研究計畫時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研究都有其分析的單位與層次，但很少有研究者會明確加以指出。分析的層次與單位決定於研究的主題與問題。換句話說，「主題或研究問題」與可用的「分析的單位或層次」之間具有粗略的對應關係。

「分析層次」是「理論解釋」所指涉的社會實在的層次。社會實在的層次是一個連續變化的尺度，從微觀層次（例如，小團體或個體的歷程）到鉅觀層次（例如，社會的文明或結構面）。層次包括人的數量、空間大小、活動範圍與時間長短等的融合體。例如，一個極小層次的分析可以是在一間小房間中兩個人幾秒鐘的互動。一個極大的層次的分析可以是貫串幾世紀，跨越數個大陸的幾十億人民。大部分的社會研究所用的分析層次通常是位於這兩個極端之間。

分析層次限定了一個研究者所使用的假定、概念以及理論。例如，我想要以大學生的約會為研究主題，我從微觀層次來分析，運用諸如人際接觸、彼此友誼以及共同興趣等概念發展出一套解釋。我猜想學生比較可能會和在課堂上接觸過、有共同朋友與共同興趣的人約會。這個主題與焦點適合微觀層次的解釋，因為它的目標鎖定在個體之間的面對面互動。再舉一例，主題是：在一個社會中，不平等如何影響暴力行為的形式。在這裡，由於主題及其所運作的社會實在的層次，我選擇較為鉅觀層次的解釋。我的興趣在於遍佈一個社會中不平等的程度（如，財富、資產、收入以及其他資源的分配）以及社會暴力的型態（例如攻擊其他團體、性侵害、或家族間的世仇）。此一主題和研究問題訴諸鉅觀層次的概念與理論。

分析單位所指的是一個研究者在測量時所使用的單位類型。在社會學上常用的單位是個人、團體（如家庭、同儕團體）、組織（如社團法人、大學）、社會類別（如社會階級、性別、人種）、社會機構（例如，宗教、教育、家族）；以及社會（例如國家、民族）。雖然個體是最常用的分析單位，但絕非是唯一的一種。不同的理論各有其著重的分析單位，不同的技術也各有其對應的特定分析單位。例如，個人通常是調查與實驗研究的分析單位。

舉例來說，在一項要求150位學生評定他們最喜歡的足球明星的調查研究中，個體是分析的單位。因為所記錄的是每一位學生的反應，所以個體就是分析的單位。相反的，如果研究是比較不同大學花在足球訓練上的費用，組織（大學）就是分析的單位，因為比較的是各個大學的花費，所記錄的是各個大學的花費。

研究者使用的分析單位不只侷限在個人、團體、組織、社會類別、社會機構、以及社會。例如，一個研究者想要決定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演講內容是否包含特定的議題。研究者可以使用內容分析並計算在候選人每次演講中的提到那些議題的次數。在這裡，演講內容就是分析單位。也可以使用地理上的分析單位。如果想要探究是否青少年比例較高的城市也有較高的破壞公物率，此時城市就是分析的單位。這是因為研究者必須測量每一個城市中青少年佔的比率以及每個城市中公物遭到破壞的總量。

分析單位決定了研究者該如何來測量變項或議題。而且在解釋上和分析的層次也有約略的對應。所以，社會心理學或微觀的分析層次適合以個人為分析單位；而鉅觀的分析層次則適合以社會類別與機構為單位。在微觀層次的理論與解釋通常是關係到個人的特徵或個體之間的互動。而鉅觀層次方面則指向操控社會運轉的力量，或是社會整體中幾個主要部分間的關係。

對於類似的主題或研究問題，研究者選擇不同的分析單位和層次。這些選擇取決於所要考驗的理論以及研究者所關心的內容。例如，一位研究者可以進行一項有關父權與暴力關係的研究計畫，以

社會為分析單位，其研究問題為「父權社會比較暴力嗎？」他／她可以去蒐集許多社會的資料，並根據其父權程度以及暴力層次來分類。另一方面，如果研究問題是「家庭中的父權程度是否和婚姻暴力有關呢？」那分析的單位就是小團體或是家庭，並且微觀層次的分析是比較合適的。研究者可以透過測量不同家庭中的父權程度以及家庭中配偶間的暴力層次來收集許多家庭的資料。相同的話題可以用不同的分析層次與單位，是因為父權可以用來描述整個社會的變項，或是用來描述一個家庭中的社會關係的變項。同樣的，暴力也可以被定義為社會中的一般行為，或是家庭中配偶之間的人際互動。

因果解釋上的邏輯錯誤

對於任何型式的理論（也就是因果、詮釋、網路）要發展出一套好的解釋都需要避免犯常見的邏輯錯誤。這些錯誤可能發生在研究開始的階段，或是在說明並分析量化資料時，或是在蒐集或分析質化資料時。要分辨表面看似合理的謬誤或錯誤解釋，其實是很容易的。

❖ 套套邏輯（Tautology）

套套邏輯是一種循環推理，看起來好像是在說一些新的事情，但事實上只是循環地再說一遍，使某個陳述在定義上看似為真。套套邏輯無法接受實徵資料的考驗。例如，我最近聽到一則有關某位國會議員的新聞報導，這位議員鼓吹一項要送更多14、15歲的罪犯到成人法庭受審的法律案。當他被問及為什麼只興趣於重罰而不去談預防時，議員回答：違法的人會因此而學到犯罪是得不償失的，並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他相信唯一一個有效的預防就是重罰。當我聽到這項說辭時覺得有一點古怪。因此，我重從新檢視這篇言論並發現它就是一種套套邏輯（也就是它犯了邏輯上的錯誤）。照這位議員的說法：處罰可以導致預防，因為他已經把「預

防」重新定義成「處罰」了。在邏輯上，他說處罰法案可以產生預防的效果，因為重罰就是預防。政客經常用循環推理來混淆或愚弄民眾，但社會研究者應該學會如何看清並避免類似的曲解。

範例：保守份子是指持有一種特定態度、信仰以及價值觀的人（要求較少的政府干預、對高收入人們的免稅、強大的軍備、公立學校開設宗教課程、廢除反歧視條例等等）。說想要較少政府干預、強大的軍備等會導致保守主義，就是一種套套邏輯。在寬鬆的日常用法中，我們可以說：「莎莉是一位保守派者，因為她相信應該不要有太多的政府干預。」這句話看起來像是一段因果陳述，但它並不是因果解釋。這套態度可以是一個把莎莉標籤為是保守派成員的理由，但並不是使她成為保守派的原因。她的態度是保守派的，所以這些敘述很明顯是對的。要提出證據去證明這些態度與保守主義沒有關係就成了不可能。

❖ 目的論（Teleology）

目的論是指某件事物由終極的目的或目標所指引，可分為幾種形式。它常讓人聯想到因為「上帝的旨意」而發生的事件。換句話說，事件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上帝、神已經決定它將會發生。這意味著當我們說某事發生是因為它是全能內在聖靈的自然開展的一部份。因此，社會往某方向發展，是肇因於「國家的精神」或「天意」。這很類似於把人性當作原因的主張一樣，如「犯罪的發生是因為那就是人性。」目的論出現在歷史的理論中，該理論主張社會是朝向「理想的社會」或烏托邦來邁進，並用此來解釋現在所發生的事件。它出現在功能方面的主張上。因此，家庭出現某種型式（如：核心家庭）是因為家庭實踐社會系統延續的需求（亦即，社會系統延續到未來的功能需求導致目前這種家庭型式的出現）。

目的論是無效的科學解釋；它們無法透過以實徵的方式來測量。它們違反因果關係中時間順序的條件，並且欠缺一個真實的自變項，因為這當中的「原因因素」是極為含糊不清。許多人把目標

動機（也就是一種對於還未發生的事情的欲望）和目的論混淆了。我可以說目標可以導致一個行動；例如，我要在一門課上得到A的目標，讓我得到一個好成績。一個人能意思到的目標或欲望可以算是一種合理的起因，而不只是目的論。首先，因為一個人的心理狀態（例如，目標、欲望、或是抱負）是可以以實徵方式來測量。其次，心理狀態是存在於此時的。這澄清了時間順序的爭議。第三，心理狀態可以和可能發生或不會發生的未來事件做比較，而且它並不是自己的直接起因。心理狀態可以引發目前的行為，而行為會增加未來事件發生的機率。有意識的人類目標不同於我們所無法實徵測量的上帝旨意、社會精神、或社會體制的的需求，它們並沒有固定存在的時刻，而且總是和所發生的事件形影不離。

範例：「核心家庭是西方工業社會中是主要的家庭型式，因為它具有使社會延續的功能。」此一陳述從結構功能理論來說是無法檢驗的目的論敘述。它的論點是說「社會的延續」導致「家庭的型式的發展」。可是，我們唯一可以觀察社會延續與否的方法是在這個事實之後，或者是在有一個家庭形式之後的結果。再來看另一個目的論的敘述：因為美國註定要成為世界主要的大國，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在19世紀初期間有成千上萬的移民進入這塊未開發的西部疆土。它所說的「成為世界的主要大國」是發生在1920到1945年，卻導致發生在1850到1890年的「向西部移民」。它使用模糊的術語「命運」，和其他類似的術語一樣（例如在上帝的計畫安排下）其因果關係是無法觀察的。

❖ 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

生態謬誤是由於分析的单位錯誤搭配所造成。當研究者所擁有實徵證據的单位與其想要說明的单位不能配合時就是所謂的生態謬誤。肇因於超越證據的不正確推理或過度推論。當一個研究者以一個較高或集合的分析单位來收集資料，卻想要以一個較低或分立的单位來結論時，就產生所謂的生態謬誤。那是謬誤的，因為在某一

分析單位會發生的事，並不見得也會在不同分析單位中發生。所以，如果一個研究者從大的集合體（例如組織、整個國家等等）收集資料，然後從這些資料中做關於個人的結論，那麼他／她就犯了生態學上的謬誤。你可以透過確認你在下結論時所用的分析單位和蒐集資料時的分析單位相同或類似，來避免犯這樣的錯誤（見資訊箱6.3）。

範例：湯姆鎮（Tomsville）和瓊恩鎮（Joansville）都大約有四萬五千人住在哪裡。湯姆鎮裡高收入者的比率很高，在這個鎮上有超過一半的住戶其家庭年收入在160000美金以上。同時這個鎮上登記的摩托車數也比類似大小之城鎮多。而瓊恩鎮則有許多貧窮的人。有半數以上的住戶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同時這個鎮上登記的摩托車數也比類似大小的城鎮少。但如果指根據上述資料就說有錢的人較喜歡擁有摩托車，或是說證明了家庭收入與買摩托車有關係，那就是一種謬論。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在這個城鎮中擁有摩托車的是哪些家庭。我們只知道就城鎮為整體單位的兩個變項：平均收入以及摩托車的總數。觀察變項的分析單位是以城鎮為整體。有可能在湯姆鎮裡的中收入與低收入家庭也是屬於摩托車俱樂部的一員，而並不只有高收入家庭才是。或者有可能瓊恩鎮裡擁有摩托車的是一個高收入家庭和五個低收入家庭。為了說明擁有摩托車與家庭收入的關係，我們應該要以家庭為單位來蒐集資料，而不是以鎮為單位。

❖ 化約論（reductionism）

分析單位不正確的搭配以及對證據不正確推理所引起的另一個問題就是「化約論」的謬誤，也稱為「未等化的謬誤」（fallacy of nonequivalence）（見資訊箱6.4）。這樣的錯誤是發生在當研究者要解釋較大層次的事件，而證據卻只是關於一些特定的個人時。錯誤發生在研究者以一個較低或分散的分析單位做觀察，卻對較大或集合的作用做解釋。它是生態謬誤中不正確搭配的鏡射影像。一個研

資訊箱 6.3

生態謬誤

高頂大學開設5班西洋史的課程，每班都有50位學生。去年，教務長發現這些課程裡有人作弊，於是他查閱以下包含男女比例的各班資料。教務長計算出作弊和性別有很高的相關。結果圖解如圖A。

班別	a	b	c	d	e
作弊人數	2	4	6	8	10
女生%	80	60	40	30	20

由於不懂生態謬誤，教務長結論說：男生較可能會作弊。並制訂一項政策來監視男學生。

你學過生態謬誤，知道教務長所擁有關於整班特性的資料，不足以作為個別作弊行為的證據。你要求知道每個作弊學生的性別，資料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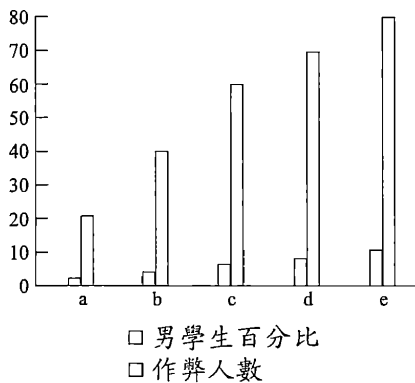
班別	a	b	c	d	e
男作弊者	1	2	3	4	5
女作弊者	<u>1</u>	<u>2</u>	<u>3</u>	<u>4</u>	<u>5</u>
全部作弊者	2	4	6	8	10

你立刻發現在所有班級裡，作弊者中女性都佔一半，各班女性所佔百分比和男作弊者百分比並沒有關聯。你把資料化成圖B。於是你向教務長解釋男女作弊的可能性是一樣的，在作弊行為上性別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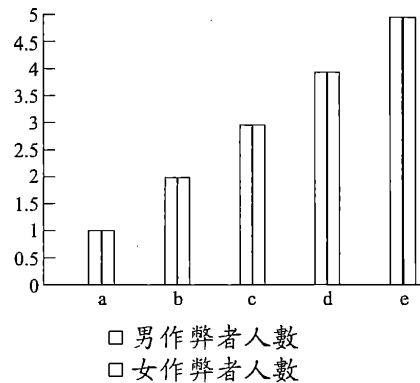
教務長的所畫的圖沒錯。問題是該圖不能當成是個別學生行為有性別差異的證據。也許另一個未測量的因素可以解釋此一型態（如，它可能是假性相關），也或許是班級中女性較少，形成一種班級氣氛支持學生作弊，對男女都一樣。這些都是有待進一步探究的

議題。

儘管在圖A看到清楚的型態，但它並不是支持男生比女生容易作弊的證據型式。我們必須擁有正確型式的證據（以個人為基礎），才能對個人作弊行為做出結論。



圖A：五班西洋史中男學生作弊人數之百分比



圖B：五班西洋史中男女作弊人數

究者如果所擁有的資料是有關個人的行為，卻要做較大層次的動力說明就是犯了化約論的錯誤。而且，較大層次的作用是比较抽象與模糊的。Liberson曾強調這項謬誤，他說這項謬誤常見於社會研究中，導致了不一致、矛盾，以及混淆。他（1985: 108, 113-114）極力強調：

較低層次的關聯來決定操作較高層次歷程的建議是不恰當的。事實上，從較低層次分析所獲得的，是無法用來理解較高層次的結構……如果我們對較高層次的歷程與事件有興趣的話，那是因為掌控對於他們的特質有清楚的理解，而不是僅由次單位推論而得的。

和生態謬誤一樣，你可以透過確認你在做一個解釋所用的分析

資訊箱 6.4

化約論的錯誤

假設你拿起一本書並閱讀到以下內容：

美國的種族關係在1960年代的民權時期（the Civil Rights Era）期間有了戲劇性的變化。當整個國家法律與法庭的裁定改變時，佔多數的白人之間的態度轉變成比較大的包容性。過去是合法且正式地只留給白人的機會——包括這個地方的房屋、工作、教育、選舉權等等——變成開放給所有的種族的人們。從1955年the 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 決策，到1964年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到1966至1968年間的the War on Poverty，一個新的、戲劇性的觀點橫掃全國。這些都是美國最先的民權領袖，一位有遠見、洞察力、以及具有行動力的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努力的結果（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這是說：依變項＝在美國大約10-13年間的種族關係的主要改變；自變項＝金恩的洞察力與行動力。

如果你對民權時期（the civil rights era）了解甚多，你會發現一個問題。把整個民權運動以及它的成功全歸功於單一個人身上。是的，一個人做了一點不同的是：幫助建立並領導一個運動，但卻忽略了這個運動。一個可以當作因果力量的社會政治運動的想法變成了因為它的主要領導者。這個可區辨的社會現象——一個運動——變得模糊不清。所忽略的是成千上萬民眾的行動（遊行、法律案例、演講、祈禱會、靜坐、暴亂、請願、打鬥等等）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邁進以及對他們的反應。這個運動的思想意識、民眾的動員、政治、組織以及策略都缺席了。可能影響這個運動的較大層次的歷史事件與趨勢（如反對越戰、約翰甘迺迪被殺身亡的心情轉移、非洲美裔分離主義政策、非洲美裔遷徙到北美城市）也都被忽

略了。

這項錯誤並非歷史解釋所獨有。許多人只從個人的行動來思考，造成個人主義的偏差，有時候被稱為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這在極端個人色彩的美國文化中更是特別真實。這是忽視分析單位或超乎個人之力量所犯下的錯誤。化約論的錯誤就是把解釋訴諸到較低的分析單位。我們還可以將個人的行為簡化於一個人的生物歷程、更低層次的神經化學活動、甚至是次原子層次。

大多數生活在「社會世界」人們，習慣把焦點集中在地方、當前的時空，以及一小撮人之間的互動，他們每天對「實在」(reality)的感受鼓勵他們把社會的趨勢或事件當作是個人的行動或是心理歷程的結果。常常會讓他們無視於更抽象、更大層次的實在——社會的力量、歷程、組織、習俗、運動或結果。「不可以把社會運動不能化約成單獨個人」此一概念是社會學的中心思想。涂爾幹在其經典著作「自殺論」中駁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並舉證那些較大的、未被辨認出的社會力量甚至可以解釋個人極為私密的行動。

單位和蒐集資料的分析單位相同或類似，以避免犯下這類的錯誤。

研究者若是不能精確地思考分析單位以及不能將資料與理論結合，很可能犯下生態謬誤或化約論的錯誤。他們犯的錯誤主要在於資料與研究問題的搭配上，或是對資料進行過度的推論。

你可以對你實際研究之外的分析單位做一些假設。因此，對個體的研究是植基於這麼一個假設：個體是在一套社會制度下活動。對社會制度的研究則是基於對個體行為的假定。我們知道鉅觀層次的單位是由許多微觀層次的單位所構成。不過危險的是：我們很容易落入以個體微觀層次的理由或行為，去解釋如社會制度等鉅觀單位的行動。在某一層次單位間所發生的，並不必然也會在另一層次的分析單位中發生。社會學是植基於以下基本信念的一門學科：認為在個體之上存在著明顯的「社會實在」層次。這個層次的解釋

需要超乎個體之外的資料與理論。存在於這些較大層次單位間的原因、力量、結構或歷程是不能化約成個體之行為的。

範例：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發生？你可能聽說的是因為在1914年，一位塞爾維亞人射殺奧匈帝國的一位皇太子而起。這就是化約論！是的，這個暗殺是一個因素，但國與國之間較大的政治事件是不能被簡化成為單一個體的特定行為的。如果這樣也算的話，我們也可以說戰爭是因為暗殺者的鬧鐘在那天早晨把他叫醒所引起。如果鬧鐘不響，就沒有那位暗殺者，所以鬧鐘引發了這場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個事件要複雜多了，而且起因於在歷史上的那一刻，許多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等力量匯聚在一起使然。那位特定人物的行動摻了一腳。但相對於那些較大的力量，那只能算是小小的一個。影響事件的個體最後會被結合到較大範圍的、能夠影響他人與國家的社會力量或組織中，但是個體獨自的行為並不是起因。因此，甚至是那個暗殺事件沒有發生，在大約那個時候還是很有可能發生戰爭的。

❖ 虛假關係（Spuriousness）

當我們說變項之間的關係是「虛假關係」時，意思是說這個關係是不真實的、妄想的。研究者如果認為他們發現一種假性相關時是很興奮的，因為他們可以凸顯出這個世界比它表面上所顯現的還要更複雜。因為任何兩個變項的結合都可能是假的，所以當研究者發現有關聯的兩個變項時都很謹慎小心；再進一步調查之後，這有可能不是一個因果關係的基礎。它可能是一個假象，就像是海市蜃樓一樣：大熱天裡出現在馬路上的大水池。

虛假關係發生在：當兩個變項的關聯卻非因果關係，而是由一個看不見的第三因素所造成（見資訊箱6.5）。這第三個變項導致了一個表面的自變項與依變項。它解釋了所觀察到的關聯性。從因果關係的狀態來看，這個看不見的第三因素代表著更強而有力的替代性解釋。

資訊箱 6.5

虛假關係

在紐曼（Neuman）與他的同事（1992）對新聞媒體的研究中，發現新聞來源的型態與知識有相關，喜歡從電視知道新聞的比喜歡從印刷品獲得新聞的人們比較不是那麼博學多聞。這個關係經常被詮釋為知識的「愚民化」（dumbing down）。換句話說，電視新聞導致人們知道的比較少。

然而，作者發現這個關係是虛假的，「我們可以指證喜歡看電視與孤陋寡聞之間的關係是虛假的」。他們發現一個最初沒被發現的第三變項，是可以同時解釋偏愛電視新聞以及對時事的知識程度。他們描述，「我們發現引起『電視是個問題』效應的真正原因是：認知技巧較低的人們偏好從電視獲知新聞」這個迷失或隱藏的變項就是「認知技巧」。

作者把認知技巧定義為一種人們運用推理與操作抽象想法的能力。換句話說，發現自己去在處理抽象、複雜訊息有困難的人們，就會打開電視收看新聞報導。其他人雖然也會使用衝擊力高、娛樂效果強的電視新聞來源，但是用得較少，而且會運用其它需要更費力、資訊更豐富的印刷品做為大部分訊息的來源。訊息處理技巧較差的人，在時事以及需要抽象思考或處理複雜訊息的其他議題上，是比較孤陋寡聞的。

現在你了解到：應該對所謂的相關或關聯要小心翼翼的，但你如何可以說一種關係是不是虛假的，以及你如何揭開這第三因素的神秘面紗呢？你需要運用到統計技術（在本書稍後會有討論）來檢定該關聯是不是假的。要運用統計技術，你必須要有一個有關第三因素的理論或至少是一個猜測，那是植基於你對這個世界如何運轉的想法。實際上，虛假關係常常是以你慣用的常識邏輯為基礎。例

如，你早知道冷氣機的使用與冰淇淋的消耗有關係。如果你測量冷氣機的數量與每天冰淇淋的銷售量，你會發現兩者有高度的相關，冰淇淋銷售越多的日子，冷氣機被開的數量也越多。但是你知道吃冰淇淋不會導致人們開冷氣。其實是另有原因，這兩個變項都是由第三因素所造成：炎熱的天氣。第三因素是看不到的，直到你符合邏輯的理解出來。你可以藉由統計檢驗同樣的事情，測量每天的氣溫、冰淇淋消耗量以及冷氣的開機數量。在社會學的研究中，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第三個因素的理論對許多議題是很有意義的（犯罪的原因、戰爭的理由、或虐待兒童的理由）。

範例：高個子的15歲青少年似乎更樂於踢足球與運動，對逛街買衣服則不是那麼熱中。這裡，身高與對足球的喜好有高度的相關。這並不表示身高導致對足球的喜好；這關係是虛假的，因為其實有一個第三因素——「性別」在操縱。十五歲的男孩比十五歲的女孩高，而且男生比較喜歡足球。所以，身高本身和喜不喜歡足球一點關係也沒有。反而是因為一個人的性別而產生了身高差異，以及因性別的社會化而影響到對足球和其他運動的偏愛。事實上，那可能是：在男孩之中，較高的男生真的比較愛打籃球或踢足球。如果研究者單單只觀察身高與足球的偏好，而忽略了性別的話，他們可能會被誤導。

圖6.4圖解呈現本節所討論的五種謬誤。

雕琢研究主題：量化研究

啟動研究計畫的第一步就是選擇主題。這個工作並沒有什麼固定的公式。不管你是專家或是生手，最佳的指南就是：研究你所感興趣的事物。主題的來源很多；（資訊箱6.6）提供給你幾個選擇的方法。這些選擇主題的技巧並不限於量化研究，也適用所有的研究領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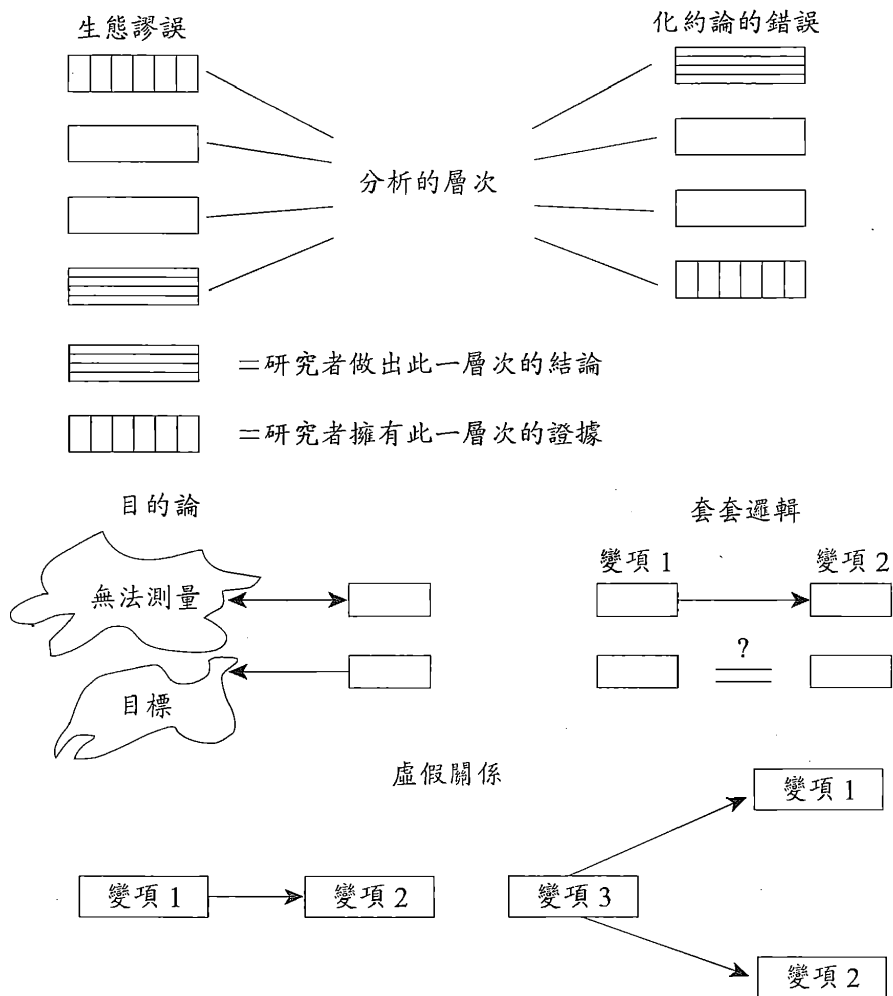


圖6.4 解釋時應該避免的五種錯誤

從主題到特定的研究問題

儘管主題是一個必要的起點，但社會研究者並不是一個主題從事研究。主題就只是：一個起點。研究者把主題精緻化並聚焦成為一個問題或疑問。新進研究者的共通錯誤就是無法有效地縮小議

資訊箱 6.6

選擇議題的方法

1. 個人經驗：你可以選擇一些發生在你身上或是你所知道的事情做為主題。例如，當你暑假在工廠打工時，剛好碰到地方工會罷工。你對兩方都沒有特殊的情感，但卻被強迫要選擇一方。你意識到逐漸上升的緊張氣氛。勞資雙方彼此敵對。這個經驗支持你以工會或勞工組織為議題。
2. 基於對媒體上某個事件的好奇心：有時候你閱讀報章雜誌或看電視節目時會在心中產生疑問。你所閱讀的燃起你心中的疑問，或暗示你去複製其他人的研究發現。例如，你閱讀新聞週刊上一篇關於流浪漢的文章，但是你對他們是誰所知不多，他們為什麼無家可歸，這是否一直是個問題等等。這可以建議你以流浪漢作為主題。
3. 某個領域的知識陳述：新的研究結果與理論驅動基本研究，並把知識的疆界向前推進。當理論解釋被精進擴展，為了使該領域往前進展，就需要去回答某些議題或疑問。當這些議題獲得確認與研究，知識就會進展。例如，你閱讀到關於對死刑的態度，發現大部分的研究指出在死刑支持者之間有一種潛藏的信念認為罪犯是天生的邪惡。你注意到尚未有人測試是不是有哪些宗教團體教育人們這樣的信念，也沒有人標示出這些宗教團體所在的地理位置。你在這領域的知識提供你一個研究計畫：關於死刑的信念，以及不同地區的宗教。
4. 解決問題：實用的研究主題經常開始於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例如，你的工作之一是擔任宿舍諮商員，你必須幫助大學新鮮人建立彼此之間的友誼。你的問題帶出一個主題：大學新鮮人之間的友誼形成。
5. 社會的酬金：這個名詞是由Singleton及其同事等人所提出(1988: 68)。意思是說有些主題是「熱門的」或是提供了一些機

- 會。例如，你獲知有一大筆經費可以用於居家看護，但有興趣去做的人不多。你對工作的需要建議你以居家看護作為研究主題。
6. 個人價值：有些人對於一套宗教、政治或社會的價值有高度的認同，例如，你對種族平等的看法有高度的認同，每當聽到有種族歧視的事情就會氣憤填膺。你堅毅的個人信仰建議你以種族歧視作為研究主題。
 7. 日常生活：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古諺、小說、歌曲、統計資料以及別人的言論（尤其是那些反對你的話）中發現潛在的主題。例如，你聽說**主場優勢**（home court advantage）對籃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這段話建議你以主場優勢作為研究主題。
-

題，或是沒有先形成研究問題就試著把廣大的議題直接放入研究計畫中。在量化研究中，你需要在設計研究計畫之前先聚焦於研究問題上。

研究計畫的設計是圍繞著研究問題的。在設計研究計畫之前，先專注在一個較大議題下的特定研究問題。例如在資訊箱6.6的個人經驗中，建議以工會為主題。「工會」是一個主題，不是一個研究問題。在任何一個大型圖書館中，你會發現由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管理官員、政治學家以及工會的其他人所寫之數百本的相關書籍和數千篇文章。這些書與文章注意的是這個議題的不同面向並採取不同的觀點。在要設計研究計畫之前，你必須對這個主題縮小範圍並集中焦點。研究問題的一個例子如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間，有多少是由美國工會藉由對需要技術的工作設立諸多障礙，導致對非裔美國人有種族不公平待遇？」當你開始研究一個主題時，問問自己：你對這議題中最感興趣的部分在哪裡？對於一個你不太熟悉的主題，你應該先閱讀有關的書籍以獲得背景知識。研究問題提到的是一小組變項之間的關係。要確認這些有限的變項並明確指出它們之間的關係。

一個研究問題有一組或一小組的因果關係。(資訊箱6.7) 條列出一些將主題集中於幾個研究問題的方法。例如,「導致離婚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並不算是一個好的研究問題,一個較好的研究問題是,「結婚的年齡與離婚是否有關?」第二個問題建議了

資訊箱 6.7

將主題聚焦成幾個研究問題的技巧

1. 檢視文獻。已出版的文獻是幫助構思研究問題的很好來源。它們通常已經是相當具體的層次,並建議將研究問題聚焦如下:
 - a. 複製一個先前的研究計畫,通盤或些微的改變。
 - b. 探索在先前研究中發現的意外結果。
 - c. 遵循某篇文章中作者所給的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 d. 將一個現有的解釋或理論延伸到一個新的議題或背景
 - e. 向已有的發現挑戰,或反駁一個既有關係。
 - f. 具體指出中介歷程並思考聯結的關係。
2. 和其他人討論你的想法
 - a. 向熟悉這個議題的人詢問他們曾經想到過的研究問題。
 - b. 找出對於該議題和你有不同意見的人,並和他們討論可能的研究問題。
3. 應用到某一個特定的脈絡
 - a. 將議題集中於某個歷史階段或時代階段。
 - b. 將議題縮小於某個特定的社會或地理上的單位。
 - c. 考慮到涉入集中的許多小團體或單位,並探討它們之間是否有差異?
4. 定義研究的目標或是想要的結果
 - a. 研究問題將是一個探索、或解釋、或描述的研究?
 - b. 這個研究涉及的是應用或基礎的研究?

兩個變項：結婚的年齡與離婚。另一個集中於研究問題的技巧就是，要明確指出回答問題的範圍是可以被概化的。所有的研究問題、假設、與研究可以應用於許多群組或類別的人們、組織或其他單位。母群是指研究所包含的所有單位，或是所要推論到的部分。例如，你的研究問題是關於新的政策對高中生學習的影響。那母群就是所有的高中學生。

當我們將一個主題提煉為一個研究問題，設計一個研究計畫，以及形成假設時，也需要考慮實務上的限制。設計一個完美的研究計畫是一個有趣的學術練習，但如果你預計要執行一個研究計畫，實務上的限制就會對研究設計有所影響。主要的限制包括時間、成本、接近資源的機會、職權的認可、道德的考量以及專門知識。如果你有五個星期，一星期有十個小時可以從事一個研究計畫，但要回答一個研究問題得花費五年的時間，那就必須重新構思範圍更小的研究問題。估算回答研究問題所需的總共時間是很困難的；明確的研究假設、所用的研究技術以及所蒐集資料的型式等在估算時間時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要進行有效的估算，有經驗的研究者就是最佳的請益對象。

成本是另一項限制。如同時間一樣，在限制下回答問題，可以有許多創意的方式，但也可能因為所涉及的費用而無法回答某些問題。例如，一個關於所有球迷對他所支持隊伍吉祥物的態度的研究，只能夠在有龐大的時間與金錢投資下才有可能回答得出來。把問題縮小範圍到研究兩所大學生對於他們球隊吉祥物的看法，會讓研究變得比較可以掌握。

接近資源的管道也是一個常見的限制。資源包括其他人的專業知識、特殊的設備或訊息。例如，一個關於在不同國家夜盜率與家庭收入之間關係的研究問題，幾乎是不可能回答的，因為關於夜盜率以及收入的訊息在大部分的國家是不可能蒐集或取得的。有些問題需要相關職權單位的同意（例如，察看醫療記錄），或涉及違反基本的道德標準（例如，為了了解一個人的反應而對他有嚴重的肢

體傷害)。研究者的專業知識或背景也是一種限制。要回答某些問題則涉及到使用資料收集技巧、統計方法、外語的知識、或是一些研究者所欠缺的技巧。除非研究者接受這些必須技能的訓練，或是有能力花錢雇用他人幫忙，否則這些研究問題將不太可能實現。

從研究問題到研究假設

從範圍廣泛的主題來形成假設是很困難的，但是要從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研究問題躍入假設就很簡單了。一個好的研究問題往往蘊藏著有關假設的暗示。此外，假設就是對於研究問題所提出的暫時性答案（見資訊箱6.8）。

讓我們來考量一個研究問題的例子：「結婚的年齡與離婚是否有關？」這個問題牽涉到兩個變項：「結婚的年齡」與「離婚」。為了發展一個假設，研究者會問，「哪一個是自變項？」自變項是「結婚的年齡」，因為邏輯上來說結婚應該在離婚之前發生。研究者也會問，「這個關係的方向為何？」這個假設應該是：「結婚的年齡愈低，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的機會愈大。」這個假設回答了研究問題並做了一個預測。注意這個研究問題可以重新闡述，並更精簡的聚焦成：「愈早婚的夫妻愈可能離婚？」

一個研究問題可以發展成許多假設。從上述的研究問題可以發展出另一個研究假設：「在結婚時夫妻之間的年齡差距愈小，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的可能性愈小？」在這個例子中，「結婚的年齡」有不同的定義。

我們所做的假設可以具體指出一個關係是存在於某些情況，而在其他一些情況。如同Lieberson（1985: 198）所評論的：「為了評鑑一個既有的因果主張的效用，清楚明確地描述它所運作的情況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個假設為：「結婚時夫妻兩人的年齡愈小，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的可能愈大，除非這段婚姻是發生在一個凝聚力高的傳統宗教社區裡，而且在哪裡早婚是一種常態。」

形成研究問題或研究假設並不需要以固定的步驟進行。研究者

資訊箱 6.8

不好與好的研究問題的例子

不好的研究問題

無法經由實證測試、或不符合科學規律的問題

- 墮胎應該合法嗎？
- 死刑是正當的嗎？

一般的主題，而不是研究問題

- 酗酒以及吸毒的處置
- 性與老化

一組變項，而不是問題

- 死刑與種族歧視
- 都市的腐敗與幫派

太模糊、含糊不清

- 警方是否會影響青少年犯罪？
- 可以做些什麼事來防止兒童遭受虐待？

需要再具體一些

- 虐待兒童的發生率是否已經升高？
- 貧窮如何影響兒童？
- 在貧窮環境長大的孩子會經驗到哪些其他人所沒有經驗到的事情？

好的研究問題

探索性的問題

- 威斯康辛州在過去10年中，虐待兒童的發生率是否已經有改變？

描述性的問題

- 不管是暴力或性虐待的兒童受虐事件中，發生在離異家庭的比率是否比在完整無缺、不曾離婚的家庭還要高？
- 生長在貧窮家的小孩是不是比非貧窮家庭的小孩較可能有健康醫療、學習與社會情緒的適應困難？

解釋性問題

- 經歷離婚而引發的情緒不穩定，會增加離婚父母對孩子肢體虐待的機率嗎？
- 缺乏足夠的預防處理基金，是不是貧窮家庭的孩子有較嚴重的醫療問題的主要原因？

可以形成一個暫時的研究問題，然後發展可能的研究假設；然後這些假設可以幫助研究者更精準地描述研究問題。這個過程是互動的，需要發揮創造力的。

理論在何處？

你可能會疑惑：從一個主題到形成可以檢定的假設這整個過程中，理論該在哪裡切入比較合適？記得第三章曾提過：理論有多種型式。研究者把一般理論性的議題或難題當作主題的來源。「理論」與「理論性架構」提供概念與想法，讓研究者得以把它們轉換成變項。「理論」提供推理的思路或機制，幫助研究者將變項融入研究問題中。假設可以是研究問題的暫時性答案，也可以是一個從理論演繹出來未經測試的命題。研究者可以在一個抽象、概念化的層次表達一個假設。或是用較具體、可測量的形式重新陳述它。

在第一章，你曾看過研究計畫的步驟。圖6.5所呈現的步驟圖有些許不同。它顯示出一些中介的步驟，以及將主題聚焦成為假設的一些過程。它也呈現出當研究者在朝向資料蒐集階段時，如何將抽象的理論層次轉化融入具體的實證層次。

質化研究設計之議題

個案與脈絡的語言

質化研究的語言就是一種詮釋。研究者在他們的社會脈絡討論個案並發展出紮根理論，這些理論強調在特定的背景追蹤事件的歷程與順序。他們解釋人們是如何在事件上賦予意義，並學習從多元觀點來看事件。很少聽說有質化的研究者在討論變項或假設。

量化研究者試著將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層面轉化成可以用數字測量的概念。很少有豐富的質性資料。相較之下，質化研究者認為社會生活的各種層面先天上就是質化的。對他們來說，質性資料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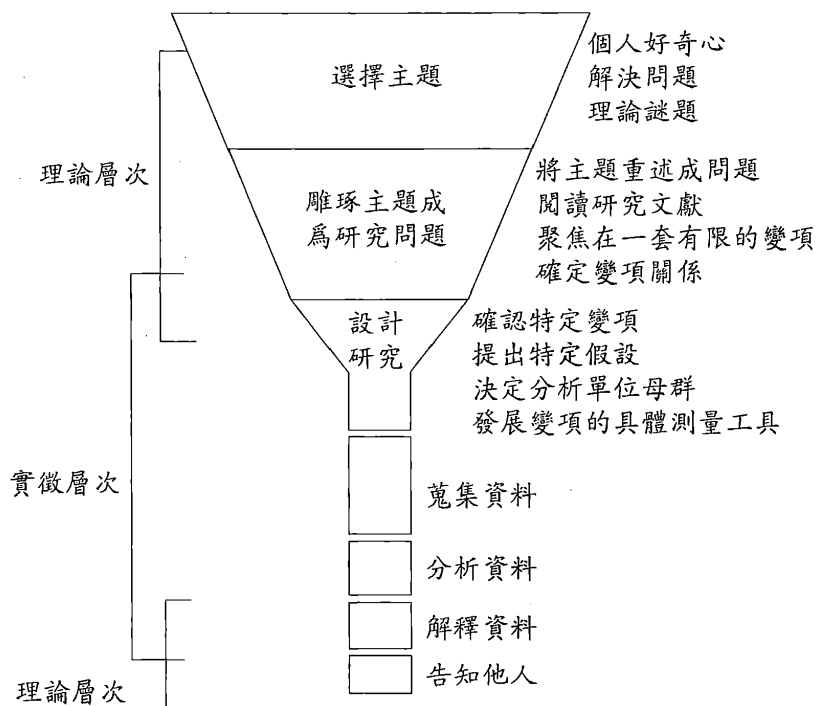


圖6.5 研究修訂版的步驟

意義的、沒有缺陷的，研究的當務之急不在於將它們轉化為可以用具體數字表達的變項；相反的，「他們所關心的事包括：接近其他文化（或次文化）的可能性、行動者對其社會世界解釋的相對性、以及社會學的描述和其行動者對其行動之概念的關聯」（Halfpenny, 1979: 803）。

有些人相信質的資料是「軟性的」、無形無體的。這樣的資料是如此令人難以捉摸，以致研究者無法真正抓住它們。事實並非全然如此；質的資料也是實徵的，它們包括：記載實際事件、記錄人們所說的（含話語、手勢和語調）、觀察特殊的行為、研究手稿、或檢視視覺影像。這些全是世界上具體的面向。例如，一些質化研究者他們拍攝並仔細察看人們或社會事件的照片或錄影帶（Ball

and Smith, 1992; Harper, 1994)。這些證據就像量化研究者在測量態度、社會壓力、智力等等一樣的「硬」且具有實體的。

質化研究者並不忙著將其對社會世界的想法或觀點，轉化成一般的變項以形成假設，質化研究者是從其所研究的人身上去借得想法，或是在特定脈絡或自然環境中檢視一個特定個案時發展新的構想。質化研究者用來理解與詮釋社會學世界的理論性類別(或範疇)經常是採用紮根理論的型式。研究者所創造的中心思想、主題、對比和構想，都是蒐集與分析質性資料歷程中的一部份。

紮根理論

質化研究者往往是從一個研究問題開始，很少例外。理論是在資料蒐集的歷程中逐漸形成。這種較重視「歸納」的方法，意味著理論是從資料中建立或紮根於資料之中。此外，「概念化」與「操作化」是和資料蒐集與初步資料分析同步進行的。許多研究者使用紮根理論。它使質的研究更有變通性，也讓資料與理論得以互動(見資訊箱 6.9)。質化研究者對非預期的事物抱持著開放的態度，樂於改變他們研究計畫的方向或焦點，並可能在計畫中途放棄他們原來的研究問題。

質的研究者透過比較來建立理論。例如，當研究者觀察一個事件(如，一位警官碰到一個超速的汽車駕駛人)，他/她馬上仔細考量問題並尋找相似或相異之處。當質的研究者在觀察一位警官攔下一位超速者時，他會問：這位警官是否總是先以無線電報告車子的牌照號碼再繼續進行？在通報車子的位置之後，警官某些情況會要求駕駛員離開車子，而在另外一些情況則是若無其事地走近車子並和車內的駕駛人交談？當資料收集與理論化交織互動，指引未來如何觀察的理論逐漸浮現，如此新的資料就會適合來回答以先前資料為根基的理論問題。

資訊箱 6.9

什麼是紮根理論？

在質的研究中，紮根理論是一個廣泛被使用的方法。它並不是唯一一種方法，並不是所有的質化研究者都採用它。紮根理論是「一個使用一套有系統的程序，去發展出對於某個現象歸納而得的理論。」(Strauss and Corbin, 1990: 24)，其目的在於形成忠於證據的理論。它是一個發現新理論的方法。在其中，研究者以一個類似學習的視野來比較不同的現象。他／她是這個較小層次的事件為較大層次解釋的基礎。紮根理論和實證傾向的理論有許多目標是一樣的，尋找可以和證據相比較、精確且嚴謹、可以複製和類推的理論。紮根理論取向藉由跨許多社會情境做比較，以尋求做歸納推論。

質化研究者使用變通的紮根理論方法。有些研究者提供一個真實呈現報導者世界觀的深度描寫。它們挖掘某一個社會情境以說明維持穩定社會互動的微縮歷程。其他研究者的目標則是在提供關於事件或某一個背景非常嚴謹的描述。它們分析特定事件或背景，以便對一個社會中較大的動態中獲得洞見。還有其他的研究者則應用已經存在的理論，去分析他們放置在較大層次的歷史脈絡的特定背景。他們呈現較小層次之間的關聯以及較小層次與較大的社會力量之間的關聯，以期重建理論並報告社會行動（關於數個替代方法的摘要，見Burawoy, 1991: 271-287 and Hammersley, 1992）。

脈絡是關鍵

質化研究者強調社會脈絡對了解社會世界的重要性。他們主張一個社會行動或陳述的意義必須視其出現的脈絡而定，脈絡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當一位研究者將一個事件、社會行動、問題的答

案、或對話從其出現的脈絡中抽離出來，或忽略脈絡，則其社會意義和重要性就會遭到扭曲。

對社會脈絡的注重，意味著一個質化研究者會注意「之前發生什麼」或「研究焦點的周遭有什麼」。同時它也意涵著同樣事件或行為在不同文化或歷史年代可以有不同的意義。例如，質化研究者不會忽視脈絡及跨越時間或文化的計算選票，質化研究者會問：在這個脈絡中投票的意義是什麼？他／她可能會對同樣的行為（例，投票給總統候選人）有不同的論述，全視所發生的社會脈絡而定（見資訊箱6.10）。質的研究者把社會生活的部分放進一個較大的整體裡。不然，這部分的意義將會失去。例如，不清楚棒球比賽，卻要了解什麼是棒球手套是很難的。這個球賽的全部（局數、打擊、曲球、安打）給與每個部分意義，而且如果沒有整體，每個部分也就無多少意義了。

雙手萬能

質化研究者都是**雙手萬能者**（*bricoleurs*）；他們要學會精通許多事，善用各種資源，並能讓手邊的事物發揮功用（Harper, 1987: 9, 74-75; Schwandt, 1997: 10-11）。質化研究風格強調發展一種當需要時能就地取材、窮則變通的能力，這些通常是沒有辦法預先計畫的。雙手萬能之技術的意思是說，靠自己雙手工作，以創新的態度善用對零零星雜物以完成特定任務。那需要對某個材料有深入的知識、密技的蒐藏、並有能力靈活地組合他們。運用不同材料、應用不同的方法並且匯集零碎東西，讓質的研究者散發出類似工匠雙手萬能的氣息。

重視個案與過程

在量化研究中，個案通常就是分析單位，或是變項所要測量的對象。量化研究者一般針對其假設中相關變項去測量多個案例。例如，有一個研究者要執行一項450人的調查，每一個人就是所要測

資訊箱 6.10

脈絡對意義的重要性之例

「在全國性選舉的投票」在不同的脈絡有不同的意義：

1. 一個沒有反對黨候選人一黨專政的政體，人們依法必須投票。沒有投票的人會被警察記下名字。沒有投票的人會被懷疑是一些反政府的破壞份子。他們這些可能因沒有投票而被罰款或丟掉工作。
2. 在叛軍與執政者發生暴力衝突的國家中。投票是危險的，因為雙方武裝士兵都可能會因為懷疑選民把票投給敵方而將他射殺。投票的結果會賦予其中一方權力，並戲劇性的重建整個社會。凡年紀超過16歲者都可以參加投票。
3. 人們可以在一打實力不相上下的政黨中選擇，這些政黨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觀與政策。每個黨都有相當大的組織，有自己的報紙、社交俱樂部與鄰里代表。選舉日是國訂假日，這時沒有人需要上班。選舉人依據自己的身份證到當地的投票所進行選舉投票。投票本身是無記名投票，而且投票人必須超過18歲才可以。
4. 必須超過21歲有固定工作的白人男性才可以參加國家的選舉投票。家庭、朋友與鄰居都可以看到彼此是如何投票的。政黨之間並沒有提出不同的政策；取而代之的，他們寄宿於種族或宗教團體，並且是個人的種族宗教認同感的一部份。種族宗教團體的認同感是非常的強烈。影響人們要住在哪裡、在哪裡工作、與誰結婚等等。緊接在由種族與宗教團體舉辦的大規模遊行與持續一星期的社區活動之後，便舉行投票。
5. 這個脈絡是由很有力的一黨獨大，面對的則是一兩個沒有什麼權力的小黨的挑戰。該黨在過去的60年透過貪污、賄賂以及恐嚇而掌握政權。他擁有社會各界領導者的支持（包括宗教組織、教育團體、企業、工會以及大眾傳播媒體）。任何人在所有政府機

關部門的工作（例如，警察局、郵局雇員、學校教師、清潔隊員等等）都得視在位的政黨而定。

6. 這個脈絡是有兩個差異很小的政黨可以選擇。人們主要是基於電視廣告來選擇候選人。候選人靠著有錢人或有力組織的捐獻來支付廣告的費用。投票是一個模糊不清的公民義務，很少人認真的看待它。選舉是在工作日中舉行。一個人為了能夠參加選舉，必須符合許多條件規定並且事先在數星期前去登記。最近才移民以及因犯罪被捕的人不可以參加選舉。

量的個案或是單位。質的研究者傾向運用一種「以個案為主的取向，放在研究舞台中央的是『個案』，而非『變項』」（Ragin, 1992a: 5）。他們檢視的是一個或少數個案的各個層面。其分析強調的是：在「紛雜的」自然環境中的連動性（亦即，許多特定因素或事件在某一時空下的併發現象）。解釋或詮釋都是錯綜複雜的，可能採用一個平鋪直敘的方式，或是以特定人或事為對象的敘述性故事；以豐富的細節與敏銳的洞察力，取代量化研究中透過大量單位或個案所做精密測量的統計分析。

時間的推移是質性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質性研究者關注事件的先後順序，重視什麼首先發生，其次為何，第三件發生的等等。因為質的研究者長時間檢視一個或一組個案，他們可以觀察一個議題的醞釀成形、衝突的迸發、或是一個社會關係的發展。研究者可以發現探測其過程以及之間的因果關係。

在歷史研究中，時間的推移可能要涉及數年或數十年。在實地研究中，所需的時間比較短一些。不過，在這兩個類型的研究中，研究者都會記下在不同時間點所出現的事物，而且確認事情發生的時間往往是重要的課題。

詮釋

「詮釋」(interpretation) 這個字眼意指：賦予重要的或貼切的意義。量化研究的報告通常包括帶有數字的圖表。量化研究是以數字來表達（例如，百分比或統計係數），研究者賦予數字意義並指出它們與假設的關係。

質性研究報告很少放進有數字的圖表。會透過視覺呈現的資料可能是地圖、照片或顯示概念間關係的圖表。研究者把資料穿插在關於其重要性的討論中。資料以文字型式呈現，包括引述或對特殊事件的描述。任何數字訊息都是本文證據的補充。

質性研究者透過對資料賦予意義、翻譯、或使資料易於解讀來詮釋資料。不過，所賦予的意義是依據被研究對象的觀點而來。研究者找出被研究者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如何定義這個情境或對他們有什麼意義，藉此來詮釋這些資料。如Geertz (1979: 228) 所說：「訣竅就在於指出究竟他們對於自己在忙什麼的看法為何」。

所以，不管研究者是要檢視歷史文件、或說話內容、或是人類行為，質性詮釋第一步就是學習瞭解對於被研究者的意義。產生這些社會行為的人們有其自己的理由或動機。這是第一級的詮釋。研究者對第一級的詮釋有所發現或重新建構是為第二級的詮釋，因為研究者從局外進入，欲發現所發生的事情。在第二級的詮釋中，研究者引出隱藏在資料中的一貫性或意義感。因為意義是在一組其它意義中發展出來，而非憑空杜撰，第二級的詮釋把所研究的人類行為放在「行為流」中，或與該行為有關的事件——它的情境脈絡之中。

採取嚴謹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可能會在第二級詮釋之後就停止，也就是說，只求瞭解行動對研究對象的重要性。許多質的研究者會進一步做推論或將第二級的詮釋與一般的論點做聯結。他們邁向更廣闊的詮釋層級或第三級詮釋，他們賦予資料在一般理論的重要性。

雕琢研究主題：質的研究

量化與質化研究者都從一個需要縮小範圍的主題開始。量的作法要求研究者迅速地把主題聚焦。將研究聚焦是一個先前、分立的階段，而且研究者必須在蒐集資料之前就知道研究問題為何。這是假設形成前的必要步驟，而假設又是引導研究設計的主要部分。

質的研究作法則較具變通性，並且鼓勵在研究中慢慢將主題聚焦。相對於量化研究，只有少部分的主題是在早期的研究計畫階段就縮小主題。這是一個較強調歸納的歷程，而且大部分的聚焦是在研究者展開資料蒐集後進行的。

質性研究者從一個一般主題以及什麼可能有關的想法下著手蒐集資料。在研究者收集部分資料並開始初步分析後，著手對議題加以聚焦和琢磨。質性研究者運用初期蒐集到的資料來引領他們如何調整與塑造研究問題。這是因為研究者要一直到完全融入資料後，才會知道最重要的議題或問題是什麼。要發展出一個聚焦清楚的研究問題不是一蹴可幾的；那是資料蒐集過程的一部份，在這段期間研究者主動反省並形成初步的闡釋。質性研究者對意料之外的資料抱持開放的態度，並持續不斷地評估研究初期的焦點。他們隨時都準備好改變研究的方向，並在新證據的線索出現時跟隨它們。

對於質性研究者來說，典型的研究問題包括：某個狀態或社會情境是如何萌芽的？這個狀態或情境在那段時間是如何維持的？這個狀態或情境的改變、發展或運作歷程為何？還有另一種問題試著去驗證既存的信念或假定。最後一種問題則試著去發現新的觀念想法（見Flick, 1998: 51）。

研究範例：量化研究

讓我們來看看本章的一些觀念：主題、研究問題、假設、自變項與依變項、母體範圍以及分析單位——在以下三種量化研究中的

運用情形。

實驗

Neapolitan (1988) 的研究主題：「不同類型之讚美與批評對表現之效果」，便是使用了正面或負面的回饋（讚美或批評）來影響行為表現。作者運用了社會心理學中的歸因與行為改變理論中的「增強」與「歸因」兩個概念。

研究問題是：在四種讚美 / 批評的類型中，哪一個對行為改善的影響最大？這四種類型包括：對特定作品的讚美（如，你的報告很棒）、對行為者的一般讚美（如，你是一個好學生）、對特定作品的批評、以及對行為者的一般批評。這種分法是取自另一個研究者發展的分類架構。

主要的假設是：對特定作品的讚美（SPP）對行為表現有正面的影響。研究設計如下：受試者包括240位選修「社會學導論」課程的七班學生。學生被要求在上課中用一段話摘要書上某節的概念。一週後，學生收到對其摘要的評價，這些評價是隨機給的。

每一種評價各有60位學生接受到。這四種評價（假設是由一位英文教授所給的）都各對應於四種類型的讚美 / 批評（例如，這段摘要組織得很好，你是一位很好的作者，這段摘要結構不好，你是一位差勁的作者）。

自變項是在這些評論中的讚美 / 批評類型。研究者對這些學生的文章給與評價，但謊稱這些評論是來自於一位英文教授。然後學生被要求寫第二篇的感想，從第一篇到第二篇的改進為依變項，或是行為改變。改進的測量是讓這兩篇文章給兩位評審從1（非常差）到10（非常棒）給分，並從兩個分數的差距來看改進的程度。

倪波力坦之研究的結果部分呈現了四組中每一組的學生分數下降、沒有改變或有所改善的百分比。作者發現接受到SPP的學生中有70%的人有了改善。這個結果比其它類型的讚美或批評都還要高。而獲得對行為者的一般讚美或對特定產品批評的學生僅有微幅

改善。出乎意料的，得到對行為者一般批評的學生中竟然有半數多一點的人有所改善。

此一結果應用的母體範圍包括所有的人。在沒有限定特定團體時，大部分的實驗研究都可以推論到每個人。分析的單位是個體，或學生，因為變項和測量的數值都是針對個人的特徵。

調查研究

Bankston and Thompson (1989) 的論文「擁槍自衛」是調查研究很好的例子。研究者探討美國地區的槍械武器，主要是在檢視槍械的擁有權。他們發展出一個集中焦點的研究問題：當出門隨身攜帶槍械的人們有多少是出自於對他人犯罪的恐懼？

研究者寄問卷給居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約4000位民眾，除了詢問他們是否攜帶槍械外，也詢問他們的態度和背景資料。最後，作者把研究對象限定在白人，約得到比1000份多一點的完整資料。所要檢定的主要假設是：是否最害怕犯罪事件的人並相信槍械可以保護其安全的人，最有可能攜帶槍械的人。研究者主要的自變項是對犯罪的恐懼，也指出一個中介變項：對槍械有用的信念。依變項則是當個人出外時攜帶槍械的頻率。研究者發現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會在某些時機攜帶槍械出門。

在結論部分，研究者檢視這些變項對於一個人攜帶槍械頻率的 effects。他們發現個人對犯罪的恐懼不會直接影響他攜帶槍械的頻率，但對槍械有用的信念則有較大的效果。認為攜帶槍械可以自我保護的人一般比較年輕、教育程度較低的鄉村男性，他們認為治安惡化並害怕受害。

作者最後指出：路易斯安那是南方的一個州，對購買以及攜帶槍械的限制最少。母群範圍可以適用於美國南方其他地區的白人。本研究的分析單位是個人。

內容分析

Barlow, Barlow, and Chiricos (1995) 在其「經濟情況與媒體中的犯罪意識型態」的著作中運用了內容分析法。研究的主題在於媒體如何描繪犯罪事件以及罪犯。假設是媒體給與犯罪一個扭曲的圖像，這種扭曲和經濟狀態的變化有關。尤其，研究者預測當失業率愈高或經濟愈衰退的時候，媒體對犯罪與罪犯的描繪會更為負面。因此，自變項是失業率，依變項是犯罪者被負面呈現的程度。研究者也從犯罪的統計與犯罪得到媒體注意程度之間的不協調，去注意整體的扭曲程度。研究問題是：新聞媒體是否基於一種價值與信念系統：在經濟情況不好時，對罪犯的譴責最嚴厲，來給予犯罪一個扭曲的形象？

研究資料取自「時代雜誌」(Time magazine)。作者抽取經濟情況不同的年份(1953, 1958, 1975, 1982)，並察看各年份所有與犯罪、犯罪審判、或罪犯的文章。他們找到了175篇。分析的單位是文章。而研究的母群則是1950年至1980年間，刊登在美國主要新聞雜誌上所有與犯罪有關的文章。

作者也觀察所挑選之年份的犯罪率、犯罪率的變化、罪犯的人格特徵、以及如暴力或非暴力的犯罪類型。他們將每篇文章中對罪犯的形象依照正面與負面呈現的程度來排序。負面形象顯示罪犯沒有悔意、缺乏犯罪的理由、無原則或說謊、或者不可能改過向善。較正面的形象則顯示出罪犯是惶恐的，而且願意改過向善、在不利的情境中盡力而為、受情勢所迫而不得已才犯罪、或是在審判體系下及時認罪。

作者發現在高失業率時較常見到負面的形象。具體而言，在高失業期間有62%是負面的，而在低失業期間則有32%是負面的。也發現了其他型式的扭曲。例如，作者發現有73%的文章集中報導在暴力犯罪上，在警方紀錄中，這些年份的暴力犯罪僅佔所知犯罪的10%。文章提及罪犯的種族時，有74%的文章描述罪犯是非

白人，然而這些年份涉及非白人的拘捕率是28%。最後，儘管經濟情況與犯罪之間有很強的關聯性，只有3%的文章有提到罪犯是否有工作或處於失業狀態的訊息。

研究範例：質性研究

特定的質性研究的範例可以示範研究者如何在實務中應用質化研究的原則，質化研究者是如何避免墨守著一個嚴格的詮釋取向，以及如何將質的方法與量的原則加以結合。

實地研究

許（1987）是一位華裔美國人，他運用「芝加哥學派」的參與觀察的方式研究華人洗衣工。他的父親是一位洗衣工，而許自己在開始實地研究之前是在為洗衣供應商工作。和中國洗衣工說同一種方言，他被當作自己的「親戚」，並且在另一個中國移民經營的——叉燒店工作。他花時間打入芝加哥地區的華人洗衣工與老闆的圈子，並對他們進行訪談。在他20年的研究中，他發展出新的概念：移民經濟（限定在少數產業之移民所形成的孤立性產業以及社群）與過客（遷移但不打算定居的移民）。

許的書中分析的部分較少，但包括許多從訪談的引文或信件的摘錄。他藉由敘述個人事件、笑話、與小故事來描繪洗衣店的日常生活。他把他的研究放入一個華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脈絡之中，並提供地圖顯示在芝加哥地區將近50年間華人洗衣店的分佈情形。他提供圖表記錄華人移民的數量，在美國華人的性別比率，以及在芝加哥中華人賭場的賭徒人數。他的書中也包括一張標準華人洗衣店的內部圖、洗衣券的樣本、洗衣店工的私人帳本，以及一家洗衣店的每月支出報表。讀者可以藉此對華人洗衣工的圈內生活有較深度的感受與洞察。

歷史比較研究

Light and Bonacich (1988) 研究在1965至1982年間居住在洛杉磯地區的韓國人。他們的研究追溯到韓國的社會如何改變，以及經濟如何導致移民美國之韓國人的數目增加。舉例來說，作者表示在韓國的韓國人所得是標準美國工資的百分之7.5到27之間。作者指出一大組因素（例如，韓國政府的角色、韓國經濟的變化，以及美國在韓國軍事干預的歷史），將之編入韓國移民的故事。

作者把住在韓國的韓國人和住在美國的韓國人加以比較，也和住在美國的其他族裔做比較。他們要問的是：為什麼在美國的韓國人有很高比率成為小企業的所有人，而且這些人當中只有很少部分的人在韓國的時候就已經是小企業的所有人了？他們想要探索的是由移民而成為小企業家要如何適應較大的美國經濟，並且基督教、韓國民族文化、與社會階層是如何在一個特定的歷史點上，形成了一個獨特的社會與經濟的次文化。

作者使用了許多不同類型的資料：調查研究、現成的統計資料、實地研究、政府文件、國際報告以及歷史紀錄。他們的書包括韓國企業機構的照片與廣告、顯示大約20年間韓國企業在洛杉磯的分佈地圖，以及韓國移民的數據資料。他們敘述某些特殊人物的故事，並仔細描述韓國社區對洛杉磯攻擊亞洲人的反應。作者所提供的歸納通則並不多，但主張一些特殊情勢促成了1960到1970年間在洛杉磯地區形成的韓國小企業家的社群。

菁英研究概觀

大部分的量化研究是以個人為研究對象（如實驗、調查、與現有的統計資料），而大部分在人類學、社會學、及教育學等等的實地研究則專注於一般人、窮人或是弱勢團體。社會學者察覺到如果他們要了解這個社會，他們也必須去研究有權力的社會菁英。然而，「探討社會菁英的社會學者很少，因為菁英的本色之一就是難

以接近。菁英們建立屏障以讓成員遠離社會的其他人」(Hertz and Imber, 1993: 3)。研究者已經發展出特殊的技巧來研究菁英們。這些技巧澄清了一般的疑慮，並且也證實質性研究設計的價值，它不同於量化研究，但卻有互補的作用。

菁英——居於正式或非正式權位的人，研究者不能透過隨機抽樣的方式去研究他們，因為他們太少了，也不可能去參與他們的生活。量化研究者研究菁英的方式包括：對菁英的演說進行內容分析(Seider, 1974)，對菁英的生涯做背景資料的研究(Freitag, 1983)，探討菁英的決策網絡(Knoke, 1993)，對菁英的調查資料做小組專題研究(Murray, 1992)。這些資訊，加上社經地位上的優勢，提供了菁英圖像的一部份。以菁英為研究對象的質性研究則顯示：菁英在私人的俱樂部中的社交情形(Domhoff, 1974)；非正式討論談話的內容(如Ostrander, 1984，對上層階級婦女的研究)。這些上層階級、菁英團體與富人都是屬於與眾不同的次文化。有些人喜歡追求名聲，但大部分則是避之唯恐不及，偏愛不受打擾的隱私生活。要辨識並鎖定菁英是不容易的，所以研究的生手並不適合來研究他們。

訪談菁英與非菁英具有一些不同之處。首先，要接近菁英通常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他們的守門人是令人畏懼的。一個研究菁英團體的研究者可能會面臨安全警衛、秘書、以及其他負責阻止他們接近的人員。Thomas(1993: 83)描述「我花了將近兩年的時間打電話、與執行助理密商、建立人際網路以獲得與執行者訪談的機會」。當然，時間壓力是非常大的。菁英是非常忙碌的或難得現身，研究者必須經過安排才得以會面，而且時間很有限。增進接近的技巧包括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吃飯、候機、旅遊等等)，並願意配合菁英的時間表。在質性研究中比量化研究更常面對如何接近菁英的課題。

其次，要接近菁英以及取得其信賴，社交的接觸與聯繫是必須的。一個研究者的個人社交背景或家世是一項重要的資源。如果該

研究者不是來自於富裕的家庭，或不在享有特權的社交圈下，那麼該研究者也許就需要結交適當的贊助者——所謂的準確的聯結關係。研究者需要表現出適當的舉止。菁英會參酌你認識的人、與你談話的人、引薦你或贊助你的人。研究者若缺乏好的贊助者或有名望者的背書或協助，即使已經接近菁英了，也很難被認真對待。Ostrander（1993）和Hunter（1993）都指出：菁英對於曾經談過話的研究者比較有興趣。在許多型式的質化研究中，私人的接觸與聯絡都是研究歷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菁英通常是受過高等教育且學識淵博的。這意謂著研究者被期許在正式接觸之前，已經廣泛蒐集並研讀過相關背景資料了。這也意謂著菁英可能也很熟知社會研究的技巧以及閱讀過研究。如此可能促進合作，也可能有反效果。菁英可能會試著去支配或操控整個研究情境。大部分的菁英可能習慣處於命令與使他人聽從的狀態。大部分的菁英都善於抓住流轉事件中微妙的轉變，並熟於控制許多社交的情境。這可能包括人們坐哪裡、談話的方向等等。而研究者需要取得充分的控制權才能完成他的目的。所以研究者要熟練社交技巧及策略，並且讓菁英摒除戒心，免除緊張與憂慮的氣氛。這只能在研究者有很好的靈敏度與熟練技巧才可以做到如此。研究者可能在從事一些正式的調查或實驗性的研究時運用他們的自信與謹慎，但對於一些質性研究而言，這些技巧才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工具。

關於菁英研究的另一項課題是：注意其台前與台下的表現。台前公開的社交背景是大眾，對外開放的環境，以及知道他人可以觀察到的情境中所展現出特定的一些社交表現。台下的社交背景是私密的，並且是摒除戒心，覺得舒適與信任的私人空間。在研究菁英的時候，台前所見的事件經常是有意的，並非常刻意去創造出來的印象。所以，研究者可能是陪同進出一個寬大豪華的辦公室，辦公室有很美的景觀，牆上掛的是藝術珍品，牆邊擺著長沙發，還有一張乾淨的大書桌。經驗老到的菁英，會面帶笑容提供研究者形式上

可以公開的事件版本。這裡的「台前」並不見得就相當於他在私人俱樂部、家庭或其他非正式的談話的「台後」了。而研究者也許看不到穿透正式公開的角色之外的一面。在台下人後，菁英可能會顯露出自己真正的偏見或情感，並可能暴露自己的價值觀或信仰。要接近他們私下的情境是非常困難的。可能需要和菁英發展出長期的關係。在質性研究中，儘管許多質性研究設計企圖超越公眾與表面的關係，但是研究者很少可以突破菁英台前公開的情境。

接下來要討論的差異是：如何獲得菁英的信任以及處理菁英的背景或談話。研究者必須精熟適當的語言與舉止。所有次文化都有其特定的言行舉止方式。這些非正式的制度或習俗也包含對關鍵事件或情境的假設與理解。使用適當的言語表達、遵從微妙的社交儀式，可以顯示研究者分享了菁英所屬次文化的表裡。使用不適當的言語表達或不適當的舉止將表示該研究者不值得信賴。例如，菁英的次文化是建立在於物質的安全感與擁有的假定上。許多菁英藉著顯露出一付沈著冷靜的外表、散發出自信以及表達社交的優雅與禮儀，建立起他們自己的橋樑而遠離他人的社會距離。許多研究者發現這樣的舉止令人生畏，且可能會覺得他們非常巧妙的「留在自己的地盤上」，用的卻是一種溫暖的、友善的與開放的態度。質的研究者發現他們必須建立信任感並且在蒐集資料時要縮短人際距離。

最後的議題是要保護研究歷程的誠實面。不只是身體的保護，某種程度的秘密或保有隱私，在菁英的環境中是很常見的。研究者必須練習謹慎思慮。必須對菁英所關心的公眾曝光或恐懼要很敏感。菁英可能是多疑的，而且要求重新檢查研究報告或私底下所揭露的事情。另外，即使對約定限制有些許的違犯他可能都會察覺，或聘專家來檢視這些研究報告。此外，如果研究者違背彼此的信任，菁英擁有付諸訴訟的資源。同時，研究者想要知道越多越好，且維持好的、未受阻的研究的原則。質性研究者發現他們必須在維護受試者的機密以及確保研究歷程本身信實之間力求平衡。

結論

在本章，你接觸到要展開研究時所需要的基礎。你也看見在社會研究中質性與量化研究風格與取向的差異，這也導致研究者在準備上的差異。所有的社會研究者都會將他們的題目聚焦成一個更為特定、焦點更集中的研究問題。不同風格的研究對於何時以及如何聚焦一個研究，各有不同的建議及一連串的判斷，乃至於不同的答案。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風格決定於他們所選擇的主題、研究者的目的、研究結果如何運用、研究者對於社會科學所採用的取向定位、以及研究者個人的假定與信仰。

量化研究者採取一個線性路徑並強調客觀性。他們較可能使用明確、標準化的程序及因果的解釋。他們使用的變項與假設的語言跨越許多科學領域，係以實證主義傳統為基礎。在蒐集資料之前經常是一連串步驟分明的演繹歷程：將主題縮小成為一個更集中焦點的問題，將模糊的理論概念轉換成更精確的變項，並發展出要檢定的一個或更多的假設。在實際的研究中，研究者來來回回移動，但是一般的歷程是遵循著一個單一、線性的方向。另外，量的研究者特別小心避免在假設發展與因果解釋上犯下邏輯上的錯誤。

質性研究者遵循著一條非線性的路徑，強調要熟悉自然環境或一個特定的文化歷史脈絡的細節。他們不講究標準化歷程或明確的步驟，經常是針對特定情境或研究而構思出「臨場」的技巧來。他們的個案與脈絡的語言，引導他們對於研究中特殊的個案與歷程做仔細的調查。很少把「規劃」和「研究設計的決定」劃分為是資料蒐集前的階段，反而在初步的資料蒐集之後還會繼續發展研究設計。事實上，歸納意味較重質性風格，鼓勵研究者進行緩慢、有彈性的演變式的聚焦，一切都是以從資料上學到的為基礎。紮根理論是從研究者對資料及脈絡不斷地反思歷程中浮現的。

質化與量化的區分經常過於誇張，淪為二分對立。司空見慣地，每個研究風格的擁護者經常會基於自己的假設與標準來判斷另

一個研究風格。量化研究者要求去了解所用的變項與所檢定的假設。質性研究者反對將人性轉化成一堆冷冷的數字。對於有經驗、審慎的社會研究者來說，挑戰在於如何以該風格或取向自身的術語去了解與欣賞它們，並且確認每個取向的優點與限制。要達成以下的終極目標：對社會世界每個事件發展出一個更佳的理解與解釋，就必須從欣賞每個風格所提供的優點做起。

重要名詞

對立假設	屬性	雙手萬能
決定性的實驗	依變項	雙載的假設
生態的誤謬	第一手的闡述	紮根理論
假設	自變項	中介變項
分析的層次	線性研究路徑	實務中的邏輯
非確認假設邏輯	非線性研究路徑	虛無假設
重建邏輯	化約論	二級詮釋
目的論	分析的單位	虛假關係
三級詮釋	普遍性	套套邏輯
超驗的觀點	變項	技術體制觀點
三角檢定法		

問題回顧

1. 當說到：質的研究中使用較多的實務中的邏輯，較少的重建的邏輯，其涵意是什麼？
2. 質的研究遵循著非線性的路徑，其意為何？非線性路徑的價值在哪裡？
3. 請描述自變項、依變項與中介變項的差異。
4. 為什麼在社會研究中我們無法「證實」結果？

5. 「分析的單位」和「分析的層次」彼此有何關係？
6. 如果研究的使用非驗證假設的邏輯，會用到哪兩種假設？為什麼負面的證據較強？
7. 重述下列敘述成為有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假設：「一個人在一年開車的哩數影響一個人曾去過之加油站的數目」，而且這兩個變項間有單向的正面關係。
8. 比較量的研究者與質的研究者處理個人偏見與信任研究者議題的方法。
9. 質的研究者與量的研究者如何運用理論？
10. 請解釋：質的研究者如何詮釋資料。參考第一級、第二級與第三級的詮釋。

量化與質化測量

導論

為什麼要測量？

量化與質化的測量

測量過程的環節

量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質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信度與效度

量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信度與效度之間的關係

可信與有效的其他用法

量化測量之導引

測量水平

專門化的量數：量表與指數

指數建構

目的

加權

遺失資料

率與標準化

量表

目的

量度的邏輯

常用量表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簡言之，測量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科學價值只能從工具論的觀點瞭解。透過這個觀點，我們問測量要為什麼目的服務，它在科學情境中要扮演什麼角色，它在研究中發揮什麼功能。

——Abraham Kapla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p. 171.

導論

社會研究者宣布測量到奇怪的、無法看見的事時，如自尊、意識型態、政治權力或疏離，許多人都會驚訝。在本章，你將學到量化與質化社會研究者進行測量的途徑，找出相似和差異之處。本章大部分投入量化研究的測量議題。這是因為測量在量化研究中獨特的步驟，有其專門的術語和程序。在量化的研究設計中，測量是發展相當完善的次領域，研究者必須做出重要的決定，這些決定影響到研究過程隨後各個步驟。相對的，許多質化研究的測量議題則與資料搜集的過程整合為一。

爲什麼要測量？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到許多測量。例如，今天早上我醒來後就先站到浴室的磅秤上，看看我的節食計畫有沒有奏效。我看溫度計一眼，決定該不該穿外套。然後，坐上車檢查油表，確定夠不夠開到校園。開車時，我注意速度表以免超速被開罰單。早上八點，我已經量過體重、看過溫度、油量和速度——所有有關這個實體世界的量數。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的這些精確的、發展完整的量數，在自然科學中都是很基本的東西。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測量非實體的世界，但用的術語沒那麼精確。我們說這家餐廳很棒，包布羅真很的很聰明，凱倫對人生的態度消極，強生偏見太深，或是昨晚的電影太暴力時，都是在測量。但是，日常所說的「偏見太深」或「太多暴力」，是不精確的、模糊的、直覺的測量。

測量也可以延伸我們的感覺。天文學家或生物學家用望遠鏡或顯微鏡延伸天然的視野。相對於我們的感官，科學的測量更靈敏，觀察者造成的變動較少，得到比較精確的資訊。你知道比起摸罐頭，看溫度計能給你更清楚、精確的溫度。同樣地，一個好的浴室

磅秤量五歲女孩的體重所得的資訊，比你把她抱起並說她「重」或「輕」的資訊還要明白、一貫、精確。社會測量提供社會現實的資訊。

另外，測量也幫助人們觀察看不到的事物。測量延伸人類的感官。它讓我們觀察到以前看不到、不知道，但理論在預測的事物。

在你測量前，你必須清楚有興趣的是什麼。例如，你無法用本能看到或感覺磁力。磁力源自物理界的理論。你間接觀察它的結果；例如，金屬微粒被磁鐵吸引。磁鐵讓你「看到」或測量磁場。自然科學家已經發明數千種量數，「看」非常微小的事物（分子或昆蟲器官）或非常大的事物（廣袤的土地或行星），這些都不能用普通的感官觀察到。此外，研究者也不斷地創造新的量數。

某些社會研究者有興趣的事是顯而易見的（如年齡、性別、膚色等等），但大多數的問題都是無法直接觀察的（如態度、意識型態、離婚率、偏差、性別角色等等）。就像自然科學家發明間接量數，測量物理世界中「看不見」的物體和力量一樣，社會研究者也設計量數，測量社會世界中難以觀察的層面。例如，假設你聽到一位校長批評老師的士氣，你就製作一個測量老師士氣的量數。

量化與質化的測量

質化和量化的研究者都用仔細的、有系統的方法搜集高品質的資料。但是，研究風格和資料類型的差異顯示他們做測量的途徑大異其趣。設計精確的方式來測量變數，是量化研究者籌劃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質化研究者在搜集資料時，採用許許多多技術，測量並製作新的量數。這兩個測量的途徑有三個差異。

這兩種風格的一個差異就是時段的安排。籌劃階段在搜集或分析資料之前進行，也與之分隔，量化研究者在籌劃階段就廣泛思考各種變項，把它們轉換成特定的行動。對質化研究者而言，測量是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進行的，只有極少數是在資料搜集之前的籌劃

或分隔的階段進行的。

第二個差異就是資料本身。量化研究者要發展能夠產生量化資料的技術（也就是以數字形態表現的資料）。因此，研究者從抽象想法或變項轉向特定資料搜集的技術，再轉向這些技術產生的精確數值資訊。這種數值資訊是抽象想法的經驗呈現。對質化研究者來說，資料有時也有數值形態；但它更常包括口語或書寫的詞彙、行動、聲音、符號、實際物體，或視覺影像（如地圖、相片、錄影帶等）。質化研究者不會把所有觀察到的資料轉變成數字等單一的、通用的媒介。相反的，她發展許多彈性的、進行中的過程來測量，資料因此展現各種輪廓、大小和形態。

研究者都是結合想法和資料，分析社會世界。在這兩種研究風格之中，資料是概念的經驗呈現，測量是連結資料和概念的過程。第三個差異是如何讓這兩種風格做這樣的連結。在量化研究者搜集任何資料之前，他們思考概念。測量技術界定資料是什麼，搜集它們的方向是什麼。

質化研究者也在搜集資料前思考概念，但他們在資料搜集的活動中盡可能發展許多概念，即使不是發展多數的概念。質化研究者同時或以交互方式，重新檢視、思考資料與概念。研究者開始搜集資料，並根據他們遇到的資料，創造測量它們的方法。他們搜集資料時，思考整個過程，發展出新的想法。這些想法給他們方向，提出新的測量方法。新的測量方法進而決定研究者如何繼續搜集資料。透過這類持續的、互動的過程，他們把想法和資料銜接起來。

測量過程的環節

研究者測量時，採取一個概念、想法或構念（construct），發展出一種量數（也就是一種技巧、一種過程、一種程序等），藉此從經驗角度觀察這個想法。量化研究者基本上遵循演繹的路徑。他們從抽象的想法開始，接著是測量程序，最後是呈現這些想法的經

驗資料。質化研究者基本上遵循歸納的路徑。他們從經驗資料開始，接著是抽象的想法，最後是想法與資料的混合。事實上，這個過程在風格與研究這兩者都是互動的。量化研究者發展量數時，構念經過精煉，越來越清楚。研究者以量數搜集資料時，用一些先前存在的想法協助搜集資料，然後把舊想法與資料中發展出的新想法混合為一。

質化和量化研究者都用到兩個過程：概念化與操作化。**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採取一個構念，給它理論或概念定義以精煉它的過程。**概念定義**（conceptual definition）是抽象的、理論術語的定義，它指涉其他的想法或構念。把一個構念轉變成精確的概念定義，沒有魔法。它牽涉到縝密的思考、直接的觀察、詢問或閱讀別人的意見，以及試提最可能的定義。

一個好的定義有一個清楚、明確、直接、特定的意義。不會模稜兩可或模糊不清。有些學術文章已經致力於將關鍵概念概念化。Melbin（1978）把夜晚概念化為邊界，Gibbs（1989）分析恐怖主義這個概念的意義，Ball與Curry（1995）探討如何將街頭幫派的意義概念化的方法。就像你在第三章談理論的部分讀到的，除了當做製作量數的先決條件之外，研究者需要清楚的、明確的概念定義，才能發展符合邏輯的解釋。

單一的構念可以有幾種定義，人們對定義的看法也可能紛歧。概念定義是跟理論架構、價值立場相連的。例如，衝突理論家可能會把**社會階級**（social class）定義為社會中一群擁有或缺乏權力和財產的人。結構功能論者則將它定義為共享一種社會地位、生活風格或主觀認同的個人。雖然人們對定義有歧見，研究者總應明確陳述她採用哪個定義。

有些構念（如疏離）是非常抽象、複雜的。它們內部包括低層次的觀念（如無力感），這可以表達得更明確（如對自己居住的環境沒有控制權的感覺）。有的構念具體、簡單（如年齡）。研究者發展定義時，需要瞭解這個概念有多複雜和抽象。例如，像年齡（如

出生後經過的年數) 這樣具體的構念，比士氣這類複雜抽象的概念還容易定義。

測量之前，你需要概念，你也需要把你有興趣的事和其他事區分開來。你要先有一個概念或構念，這個想法簡單明瞭。除非你知道要找些什麼，否則你怎麼能觀察或測量呢？例如，生物學家無法觀察細胞，除非他之前就知道細胞是什麼東西，有台顯微鏡，已經學到區分細胞和非細胞的「東西」或「垃圾」。測量過程牽涉到的，比測量工具（如顯微鏡）還多。若要測量，研究者需要三樣東西：構念、量數與認知要找什麼東西的能力。

例如，我要測量教師的士氣。我先界定教師士氣。士氣的構念是什麼意思？這個變項構念有不同的值——高的值對低的值或高昂的士氣對低落的士氣。接下來我把我的構念做成量數。量數的形態可能是調查的問題、學校記錄的檢視，或是對教師的觀察。最後，我在調查問題的答案、學校記錄或觀察中區分士氣與別的東西。

社會研究者的工作比自然科學家還要艱鉅，因為社會測量要和人們談話，或是觀察他們的行為。人們的答案及他們的行為不像行星、細胞或化學物質，可能模稜兩可。光是被人問問題或被人觀察，人們就會有反應。因此，社會研究者有雙重的負擔。第一，她必須有明確的構念、好的量數，以及能夠認知要找什麼的能力。第二，她試圖測量流動不居、撲朔迷離的社會生活，社會生活可能只因為研究者試圖測量就有改變。

我如何發展教師士氣的概念定義，或者至少發展出一個暫時可用的定義，以便開始研究？我從日常對士氣的瞭解開始——一些模糊的意思，如「人們對事物的感覺如何」。我問一些朋友怎麼定義它。我也查完整版的字典和同義字典。它們給的定義有「信心、精神、熱誠、愉悅、團隊精神、從事某事的心智條件。」我到圖書館，查閱有關士氣或教師士氣的研究文獻，看看別人是怎麼定義的。如果有人已經下了很好的定義，我或許會借用（當然要引述來源）。如果我沒找到符合我的目的的定義，我就去找團體行為、個

人心智狀態之類的理論，找出靈感。等我搜集到不同的定義、定義的部分和相關的想法，我就開始尋找核心觀念的邊界。

現在我有許多定義，需要把它們分類。許多定義說士氣就是精神、感覺或從事某事的心思條件，或是團體的感覺。我把我的構念中的兩個極端分開。這可以幫助我把概念轉換成變項。士氣高昂包括信心、樂觀、愉悅、一體的感覺，以及同舟共濟的意願。士氣低落則是另一端；它是指缺乏信心、悲觀、沮喪、孤立、自私，不願與他人齊心協力。

我對教師的士氣有興趣，我學習瞭解教師，才能用構念說明他們。一個策略是列出教師士氣高昂或低落的範列表。教師士氣高昂包括對學校有正面的評價、不抱怨額外的工作，或是喜歡與學生打成一片。士氣低落包括怨天尤人；不參加學校活動，除非規定必須參加；或是在找別的工作。

士氣包括從事某事的感覺；一個人對某事有士氣。我列出教師有感覺的某事（如學生、雙親、薪資、學校行政、其他教師、教書這一行）。這就提起發展一個定義時常有的問題。有沒有不同種類的教師士氣？或者，這些「某事」是否都是一個構念的層面？這沒有完美的答案。我必須判定士氣是否指單一的、一般的感覺，有不同的部分或向度，或者說是一些各有特色的感覺。

我的構念用於什麼分析單元：團體或個人？士氣是個人的、團體的（如學校），還是兩者都有的特質？我決定，就我的目的而言，士氣只用於人的團體。這個決定告訴我，在我的研究計畫中，分析單元是一個團體：一所學校裡所有的教師。

研究者必須區分她有興趣的構念和相關的構念。我對教師士氣的構念和相關概念有何類似或相異之處？例如，士氣和心情不一樣嗎？我判定心情比士氣更偏向個人、更短暫。同樣地，士氣跟樂觀、悲觀也不一樣，這些都是個人對未來所持的展望。士氣是團體的感覺，包括對未來正面、負面的感覺，也包括其他信念與感覺。

概念化是對構念意義思前想後的過程。現在我知道教師士氣是

心思狀態或感覺，從高（樂觀、愉悅）到低（悲觀、沮喪）都有；它是一個團體的特質；它持續數月之久。對於我要測量的事物，我心裡具有的圖像已比剛開始時更明確。如果我沒有概念化，我就可能會測量開始時的東西——「人們對事物的感覺如何」。

即使教師士氣經過概念化，還是有些模糊之處。要完成概念化的過程，我需要思考究竟要把什麼包括在裡面。例如，教師是什麼？教師包括諮商老師、校長、教練和圖書館員嗎？學生教師或兼職的、臨時的、代課教師呢？教師是否包括所有靠教書為生的人，即使他們不是學校雇用的（如企業的訓練師、現場指導學徒的監工、訓練住院醫師的醫師）？即使我把定義局限在學校裡面的人，那麼學校是什麼？學校可能包括托兒所、訓練醫院、學校的博士班課程、教人們考標準考試的營利機構、狗學校、教學生打籃球的夏令營，以及教人如何駕駛半拖式卡車的職業學校。

有些人假定「教師」是指學校裡全職、受過專業訓練的受雇人員，從1年級到12年級都有，一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教室裡陪學生。有人則想到法律或政府的官方定義，這包括有教師證書的人，即使他們不在教室裡。這也排除沒有證書的人，即使他們在教室裡陪學生。重要的是，概念化指的是在我發展量數之前，對我所說的教師與士氣，我的思維需要非常清楚。我需要非常清楚明白地陳述我是什麼意思，讓別人能夠瞭解。

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是連結概念定義與某組測量技巧或程序。這組明確的程序是構念的**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也就是研究者的行動操作所表達的定義。操作性定義可以是調查的問卷、在實地場景觀察的方法、測量大眾傳媒符號內容的一種方式，或是研究者進行的任何過程，這種過程反映、記錄或描述概念定義表達的抽象構念。

測量構念的方法通常有很多。有些比較好，比較差，或者多少比其他更實際。關鍵是你的量數要配合你所提的概念定義，配合你必須操作的實際限制（如時間、金錢、可以找到的受試者等），也

要配合你知道或能夠學習的研究技巧。你能夠從頭發展出一個新的量數，也可以是別的研究者已經用過的量數（見資訊箱7.1）。

操作化連結理論的語言和經驗量數的語言。理論滿是抽象的概念、假定、關係、定義與因果性。經驗量數描述人們如何具體測量特定的變項。它們指的是特定的操作，或是人們用來指明構念在可觀察的現實中現身何處。

量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量化研究的測量過程是直接了當的順序：首先是概念化，接下來是操作化，再來是應用操作性定義，或者用測量搜集資料。量化

資訊箱 7.1

提擬量數的五點建議

1. 記住概念定義。任何量數基本的原則，就是比對它和研究中即將使用的構念所具備的概念定義。
2. 保持開放的心靈。不要陷入單一的量數或量數類型。要有創意，繼續找尋更好的量數。避免Kaplan（1964: 28）所說的「**工具法則**」（law of the instrument），意思是用一個測量工具測量所有的問題。
3. 從他人那裡借用。別怕從其他研究者那裡借用，只要功勞是歸於他人。好的量數意念可以在其他研究中找到，或者修正別人的量數。
4. 預期窒礙難行之處。要測量有興趣的變項時，邏輯與實際的問題常常出現。有時一個問題在意料之中，可以事前仔細思考並計畫避免。
5. 不要忘記你的分析單元。你的測量應該配合研究的分析單元，並容許你概括推論到有興趣的全體。

研究者發展出不同的方法，思考將抽象觀念與測量程序嚴密連結起來，以期產生有關經驗現實的精確量化資訊。

對應規則或輔助理論把構念的概念定義和具體量數或測量構念的操作連結起來。**對應規則**（rules of correspondence）是一個指標如何與抽象構念對應的邏輯陳述。例如，一條對應規則說，一個人口頭上同意十句話，就表示這個人強烈反對女性主義的信念與價值。同樣地，**輔助理論**（auxiliary theory）是解釋指標與構念如何、為何連結。這種理論在研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Carmines與Zeller（1979: 11）指出：「輔助理論說明概念與指標之間的關係，這在社會研究中跟連結各個概念的實質理論一樣重要。」例如，研究者要測量疏離。輔助理論指出這個構念有四個部分，每個在不同的生活領域：家庭關係、工作關係、社區關係，以及朋友關係。這種理論更進一步說明每個生活領域中的某些行為或感覺表現出疏離。例如，在工作領域，一個疏離的指標是一個人對何時、何處、與誰共事，工作的項目，或者她的工作速度有多快，感到完全沒有控制力。

圖 7.1 說明一個理論和一個假設中兩個相連變項的測量過程。有三個層次要考量：概念的、操作的、經驗的。在最抽象的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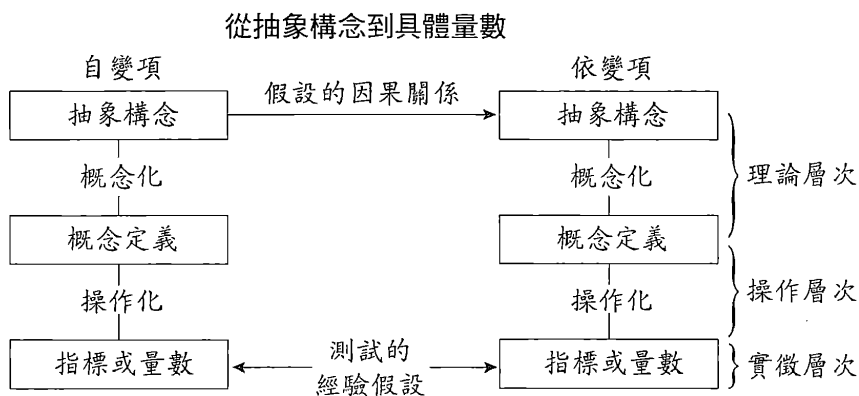


圖 7.1 概念化與操作化

研究者有興趣的是兩個構念之間的因果關係，或是**概念假設** (conceptual hypothesis)。在操作定義的層次，研究者有興趣的是**實徵假設** (empirical hypothesis)，判定指標之間的關連程度。這是相關、統計量、問卷之類使用的層次。第三個層次是具體的經驗世界。如果變項的操作型指標（如問卷）在邏輯上與構念相連（如種族歧視），它們就會掌握經驗性社會世界發生的事，把它和概念層次連結起來。

測量過程把這三個層次連結起來，透過演繹，從抽象移向具體。研究者首先把一個變項概念化，給它明確的概念定義。接下來，她發展出操作性定義或指標，把變項操作化。最後，她把指標用於經驗世界。從抽象構念連向經驗世界的連繫，讓研究者對假設做經驗測試。這些測試在邏輯上回連到理論世界中的概念假設與因果關係。

我如何給我的教師士氣構念一個操作性定義？首先，我閱讀別人的研究報告，看看是否已經有好的指標。如果沒有現存的指標，我就必須從頭發展出一個。士氣是一種心思狀態或感覺，所以我用人們的話與行動來間接測量它。我可以到學校去觀察教師休息室的教師、跟學生互動的教師，以及學校活動中的教師。我可以找學校人事記錄中記錄教師行為的部分，找出有關士氣的陳述（如缺席、要求寫推薦信找別的工作、績效報告等）。我可以調查學生、學校行政人員和其他人士，問他們對教師士氣的看法。不管我用哪個指標，我進一步在我發展概念定義時，予以修正（如寫下明確的問卷問題）。

一個假設至少有兩個變項，概念化與操作化的過程對每個變項都是必要的。在前面的例子中，士氣不是假設。它是一個變項。它可以是某個事物觸發的依變項，它也可以是觸發某個事物的自變項。它要看我的理論解釋而定。

這裡是測量另一個概念的範例。Seeman與Anderson（1983）測試疏離的人喝酒較多的假設。他們用一系列問題測量喝酒，這些

問題把「飲酒行為」這個構念的不同層面連結起來。他們為構念定出三個子向度：飲酒次數、每次飲酒的消費品質，以及因飲酒而造成的行為傷害。他們把每個向度操作化，變成幾個問卷問題，結合答案與問題，形成全面的飲酒量數。例如，研究者測量行為傷害這個子向度的方法，是問六個有關受訪者因飲酒、擔心飲酒、工作時飲酒、中午前喝酒、獨自喝酒，或是因飲酒而和家人吵架的次數問題。就這樣作者為飲酒行為製成具體的量化指標。

質化的概念化與操作化

概念是測量變項過程的一部分，質化研究者把變項概念化，並精煉概念，這是在資料搜集或分析之前做的。相對地，量化研究者形成的新概念或精煉的概念則以資料為本。概念形成是資料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資料搜集階段就開始。如此說來，概念化就是質化研究者如何組織資料，從資料中找出意義。

質化研究者分析資料的方法是根據主題、概念或類似的特質，把資料組織成範疇。她發展新的概念，有系統地陳述概念定義，檢視概念之間的關係。最後，她用順序把概念連結起來，當做相對立的組別（X是Y的相反），或者當做類似的範疇組別，再把它們編成理論陳述。質化研究者在他們閱讀時就做概念化或形成新概念的工作，並問有關資料的重要工作（如田野筆記、歷史文獻、二手來源等）。問題可以來自社會學這種學科的抽象詞彙——例如，這是階級衝突的個案嗎？這個情境中有角色衝突嗎？這是社會運動嗎？問題也可以是邏輯性的——例如，事件的順序是什麼？它在這裡發生的方式如何跟在別處發生的方式比較？這些個案是同是異？是一般的還是特殊的個案？

在質化研究中，想法與證據是互依的。這特別適用於個案的研究分析。個案不是事先既有確定的經驗單元，也不是與資料分隔的理論範疇。研究者分析情境時，同時組織資料並應用觀念，製作或說明一個個案。做出或製作一個個案叫做個案化（casing），這樣

可將資料與理論連在一起。判定什麼可以當做個案，可解決研究者觀察到的和她觀察事物的觀念之間的緊張與衝突。「把個案化視為一個方法論的步驟，這個步驟在研究過程任何階段都可能發生，但在計畫一開始與結束時特別容易。」(Ragin, 1992b: 218)

質化研究者概念化的方式是發展出清楚的、明確的構念定義。定義有點抽象，跟其他想法連在一起，但它們通常和明確的資料連成一氣，可以用被研究者的話語和具體行動表現出來。在質化研究中，資料搜集之後的概念化比資料搜集之前多；它大半是由資料決定。

❖ 操作化

質化研究的操作化過程迥異於量化研究。量化研究者把變項操作化的方式是把概念定義轉變成一組操作或程序，然後用於資料搜集。它的運作方式跟質化研究不同，因為質化研究者在她搜集資料之前或之後發展許多概念定義。

質化研究的操作化是詳盡地描述研究者如何搜集並思索那些即將成為概念基礎的資料。它比較像是事後的描述，不太像是事前計畫好的技巧。資料搜集是在充分操作化或在充分操作化之前進行的，這幾乎跟量化研究完全相反。

就像量化操作化偏離固定的演繹過程，質化研究者遵循的過程是一種相對的互動。研究者抽取的想法超越特定研究場景的資料。質化的操作化描述研究者如何搜集資料，但它包括研究者對先前已有技巧的使用及概念，這些概念和資料搜集過程中浮現的概念混合起來。

質化操作化的一個範例可在Fantasia (1988)的實地研究中找到，這個研究用**連帶文化 (cultures of solidarity)**做概念，研究勞工的抗爭行動。連帶文化與衝突性職場關係的觀念，以及非管理級員工成長的階級意識相關連。他的概念定義說，這是勞工在某個地點與時俱進的文化表達。它們是勞工發展共享感覺與一體感的過

程，這種一體感是與管理階層、企業主相對的感覺。它是互動的過程，勞工在這種過程中達成共同的想法、瞭解與行動。它「不太像是解體的心思狀態，而比較像是一整組實踐與劇目，可供經驗研究取用。」(Fantasia, 1988: 14)

Fantasia (1988) 把概念操作化的方式是描述他如何搜集資料，介紹描繪概念的資料，並解釋他對資料的思考。他描述他到底是如何搜集資料的（例如，他在一家工廠做研究，出席記者會，訪問人們），他詳細說明資料（例如，他描述某個可以做為概念證據的事件，如幾張顯示勞工和領班衝突時站在哪裡的地圖，重述事件在工廠中發生的順序，敘述管理人員的行動，複述個別勞工的說法）。在他反思並試圖瞭解他的經驗時，他也對自己的思維提供一種看法，包括發展新的想法，引用其他學者的想法。

信度與效度

信度與效度是所有測量的中心議題。兩者都關切具體的量數如何與構念相連。信度與效度之所以突出，乃因社會理論的構念經常模糊不清、散漫冗贅，不能直接觀察。完美的信度與效度幾乎是不可能達成的。它們只是研究者致力達成的理想。

所有的研究者都要他們的量數既可信，又有效。這兩個概念重要之處，在於確立發現的真實性、可靠性或可信度。這兩個詞都有多重意義。這裡它們指的是與測量相關的、值得追求的層面。

信度 (reliability) 是指可靠或一致。它的意思是在同樣或類似的條件下，同一件事可以重複或再次發生。信度的反面就是測量的過程得出不一致的、不穩定或不一貫的結果。

效度 (validity) 的意思是真實性，指的是構念或研究者在概念定義中將想法概念化的方式契合量數的程度。它是指一個有關現實的想法與實際狀況「契合」的程度有多少。如果研究者描述、理論化或分析社會世界所用的構念乖違社會世界實際發生的事，這就

沒有效度了。簡單地說，效度處理的問題，就是經過研究，受測量的社會現實和研究者瞭解它的構念之間契合的程度有多少。

質化與量化研究者要可信的、有效的測量，但除了一般層次的基本想法相同之外，每種方式看待研究過程中信度與效度的細節部分則大相逕庭。

量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 信度

剛剛說過，信度指的是可靠度。它的意思是一個指標產生的數值結果不會因為測量過程的特質，或是因為測量工具本身而改變。例如，我到浴室量體重。我一再站上磅秤，又從磅秤上下來。如果它每次量出同樣的體重，我就有可信的磅秤——當然，假定我沒有吃東西、喝酒、換衣服等。不可信的磅秤每次量出的體重都不一樣，即使我「真正的」體重並未改變。另一個例子是我車子上的速度表。如果我在平坦的路面上以慢速穩定行駛，速度表的指針卻從一端跳到另一端，我的速度表就不是可信的指標，量不出我開多快。事實上，信度有三種。

❖ 信度的三種類型

穩定信度 (Stability Reliability) 穩定信度是長期的信度。它處理這個問題：量數在不同時段的應用是否傳遞同樣的答案？剛剛說的磅秤就是這種信度的範例。你可以用**測試與再測試法 (test-retest method)** 檢視一個指標的穩定信度，你用這個方法可以為同一群人重新測試或重新整理指標。如果你測量的事物是穩定的，指標有穩定信度，那麼你每次都會得到同樣的結果。測試再測試法的一個變種是用另一種形態做測試，但替代的形態必須非常類似。例如，我有一個假設是關於性別與大學餐廳裡坐位子的模式。我測量我的依變項（坐位子的模式）的方式，是觀察男學生與女學生坐

在餐桌旁的數量，記錄在三小時內，誰是第一個坐下的，誰是第二個，誰是第三個等。如果我在三小時前的觀察，累了或分心了，或者我忘了記錄而錯過，那麼我的穩定信度指標就不算高。

代表性信度 (Representative Reliability) 代表性信度是橫跨各個次母體或人員群組的信度。它處理的問題是：指標用於不同群組時，傳回的答案是一樣的嗎？對一個構念而言，如果指標用於不同的次母體（如不同的階級、種族、性別、年齡群等）時，得到同樣的結果，那麼它的代表信度就很高。例如，我問一個人的年齡。如果二十多歲的人回答我的問題時，以少報多，五十多歲的人則以多報少，那麼指標的代表性信度就不高。要有代表性信度，量數需要報出每個年齡群的正確資訊。

次母體分析 (subpopulation analysis) 決定一個指標是否有這種信度。這種分析比較次母體或次團體的指標，運用有關次母體的獨立知識。例如，一份問卷問人們的教育程度，我要測試這份問卷的代表信度。我進行次母體的分析，看看問題是否同樣適用於男人與女人。我問這些男人與女人，並拿到獨立的資訊（如檢查學校記錄），看看男人與女人回答問題時是否有同樣的錯誤。如果男人與女人有同樣的錯誤率，這個問題就有代表信度。

等值信度 (Equivalence Reliability) 等值信度的應用時機是研究者使用**多重指標 (multiple indicators)**——也就是構念（如一份問卷中某些題目都測量同一個構念）的操作化使用多種特定指標的時候。它處理的問題是：量數是否從不同的指標中得出一致的結果？如果某些不同的指標測量同一個構念，那麼可靠的量數在所有的指標都會給出相同的結果。

研究者用**折半法 (split-half method)** 檢視考試與長篇問卷的等值信度。這是把同一個構念的指標分割成兩組，通常是用隨機的過程，並判定這兩組是否給人相同的結果。例如，我在一份問卷上有14個問題。所有的問題都是測量大學生的政治保守主義。如果我的指標（如問卷題目）有等值的信度，那麼我就能隨機將它們分

成兩組，每組各7個問題。例如，我用頭7個問題，發現一班主修商業的50名學生比一班主修教育的50名學生還要保守兩倍。我用第二組7個問題，也得到相同的答案。要判定這類信度，還有特別的統計量數（如Cronbach's alpha）。

觀察者、評判者與資訊編碼者有許多人時，**編碼者間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這種特殊的等值信度就出現了。可以說，每個觀察的人都是一個指標。如果觀察者、評判者或編碼者彼此所見略同，那麼這個量數就是可信的。它是內容分析研究常見的信度類型，但只要多名評判者或編碼者牽涉在內，就可以用它。例如，我雇用6名學生，觀察學生在餐廳中坐位子的模式。如果這6名學生都會觀察與記錄，我就能把這6名學生的結合起來，組成單一的可靠量數。但若1到2名學生偷懶、不注意或草率，那麼我的量數信度不會高。編碼者間信度的測試是要幾名編碼者測量同一件事物，然後比較量數。例如，我要三名編碼者在不同的三天中同一時段獨自將坐位子的模式編碼。我比較觀察的記錄。如果它們所見略同，我對編碼者間信度的量數就可信心十足。特殊的統計技術可測量編碼者間信度的程度。

❖ 如何增進信度

完美的信度絕無僅有。增加量數信度的方法有四種：(1)明確地將構念概念化；(2)使用精確的測量水平；(3)使用多重指標；(4)使用**前導測試**（pilot study）。

明確地將所有構念概念化 測量單一構念或構念的次向度時，信度就會增加。這是指發展明確的、清楚的理論定義。構念應該說得一清二楚，以消除其他構念的「噪音」（亦即令人分心的或干擾的資訊）。每個構念應該指明一個，也只能指明一個概念。否則就不可能判斷「指明」的是哪個概念。例如，一個純化學化合物的指標比另一個摻雜其他物質或灰塵的化合物更可信。後者很難把其他物質的「噪音」與純粹的化學物質分開。

回到教師士氣。我應該把士氣與相關的概念分開（如心情、人格、精神、工作態度）。如果我不做此圖，我就不能確定我真正測量的是什麼。我為士氣發展的指標也可能是指人格；也就是說，人格的構念污染到士氣的構念，產生比較不可信的指標。一個指標用來操作化不同的構念時（例如，用同一個問卷問題指明士氣與人格），就是不良的測量。

提昇測量水平 測量的水平後面會有討論。較高或較精確測量水平的指標比不太精確的量數還要可信，因為後者搜集的資訊比較少。如果測量到比較細部的資訊，那麼除了構念之外，其他的東西就比較不太可能掌握到。一般原則就是：盡可能在最精確的水平做測量。不過，在較高的測量水平做測量比較困難。例如，如果我可以選擇用高或低來測量士氣，或者從最低到最高10個類別來選擇，那麼用10個精煉過的範疇做測量，會比較好。

一個變項使用多重指標 第三種提昇信度的方法是用多重指標，因為同一個構念的兩個（或多個）指標比單一的指標還要好。圖7.2說明多重指標在假設測試中的運用。一個自變項構念的三個指標組合成全面性的量數A，依變項的兩個指標則組合成單一的量數B。例如，我有A的三個特定量數，A就是教師士氣：對問卷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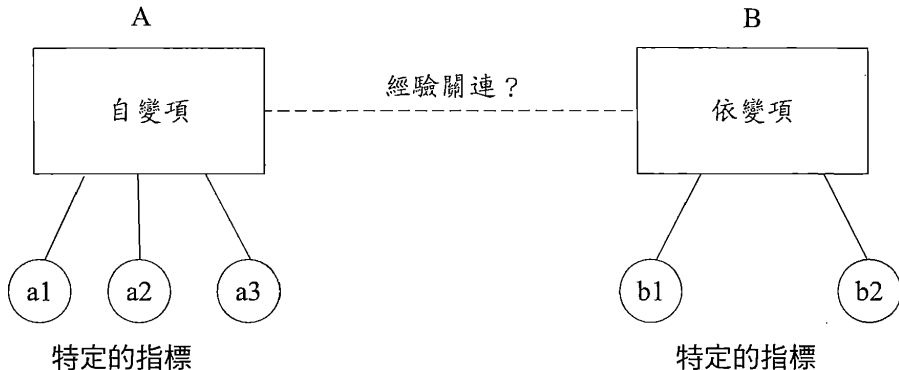


圖 7.2 使用多重指標的測量

題的答案，如對學校的態度、除病假之外的缺席次數、要求調職的數目，以及聽到教師抱怨的人數。我的依變項B也有兩個量數，B就是給學生特別的注意：教師在放學後留下約見個別學生的時數，以及教師是否經常問及學生在其他課程的進展。

多重指標讓研究者根據一個概念定義，從較廣泛的內容做測量。有些作者將此稱為從**概念領域中抽樣**（sampling from the conceptual domain）。構念的不同層面可以測量，每個層面各有其指標。再者，一個指標（如問卷上的一個問題）可能不夠完美，但是有些量數不太可能有相同的（系統性）誤差。多重指標量數總比一個問題的量數穩定。

使用預試、前導研究與複製 信度的提昇可以用預試或量數的前導研究。發展一個或多個比較粗略的、初步的量數，並在使用最終版本之前，先試用於測試假設的情境中。這需要較多時間與努力。例如，在我對教師士氣的調查中，我在問題定稿之前，反覆推敲許多初稿。我測試早期版本的方式是問人們這些問題，檢查它是否清楚明確。

使用前導測試的原則可以延展到複製其他研究者用過的量數。例如，我搜尋文獻，從過去的研究找出土氣的量數。如果先前的量數是好的量數，我可能要以它為基礎，加以運用，當然也要註明來源。此外，我可能要加上新的指標，比較它們和先前的量數。如此只要使用同樣的定義，量數的品質即可隨時間而改進。關於信度類型的摘要，見表7.1。

❖ 效度

效度是用濫的詞彙。有時它是用來指「真的」或「正確的」。效度的一般類型有幾種。我們在這裡關心的是測量的效度。測量的效度也有幾種類型。非測量型的效度不在這裡討論。

研究者說一個指標有效時，它的有效有特殊的目的與定義。同樣的指標對一個目的有效（如具有研究單元與**普遍性** [universe] 的

表 7.1 信度與效度測量類型之摘要

信度（依變項）	效度（真實量數）
穩定—長期	表面—根據他人的判斷
代表—各個次群體	內容—掌握整體的意義
等值—各個指標	效標—契合外來的根據
	■ 同時—契合先前存在的量數
	■ 預測的—契合未來的行為
	構念—多重指標彼此一致
	■ 輻合—相像的量數彼此類似
	■ 區別—相異的量數彼此不同

問卷問題），但對其他目的而言，就沒那麼有效，或是無效。例如，這裡討論的士氣量數（如對學校態度的問題），對教師士氣的測量可能有效，但測量警官的士氣就無效。

測量效度的核心是指概念與操作性定義彼此如何銜接。銜接越好，測量效度就越高。效度比信度更難達成。我們對效度沒有絕對的信心，但某些量數比其他量數更有效。我們從來無法達成絕對的效度，原因在於構念是抽象的觀念，指標則是指具體的觀察。這是我們對世界的心智圖像與我們在某時某地所做某事之間的差距。Bohrstedt（1992: 2217）認為效度不能直接判定。效度是動態過程的一部分，隨經驗長期的累積而增長。沒有效度，所有測量就沒有意義。

有些研究者用對應規則縮減抽象觀念與特定指標之間的差距（對應規則稍早曾有討論）。它們是指標與定義之間契合度的邏輯陳述。例如，有條對應規則說：「如果教師同意『五年來學校越來越差』與『沒有改善的希望』」這些話，這就表示教師的士氣低落。另一個討論測量效度的方法是**知識的相關**（epistemic correlation）。這是指某個指標與指標要測量的構念之本質之間的假設性相關。我們不能直接測量這種相關，因為量數與抽象之間的

相關是不可能的，但它們可以用先進的統計技術估計。

❖ 四種測量效度的類型

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 最容易達成的效度，也是最基本的效度，就是表面效度。它是由科學社群判斷指標是否真的測量到構念。它處理的問題是：表面上，人們相信測量的定義與方法符合嗎？它是測量效度的共識法。例如，很少人會同意用 $2 + 2 = ?$ 的問題問大學生，即可當做測量大學生數學能力的量數。從表面上看，這不是大學生數學能力的有效量數。記住科學社群中組織化懷疑論的原則是說，研究的層面由他人審視。關於測量效度的類型，見表7.1的摘要。圖7.3以插圖說明這些類型。

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內容效度是一種特殊的表面效度。它處理這個問題：定義的所有內容是否在量數中呈現出來？概念定義承載想法；它是包含想法與概念的「空間」。量數應該抽樣或呈現概念空間中所有的想法或區域。內容效度包括三個步驟。第一，說明構念定義的內容。接下來，從定義中所有的區域抽樣。最後，發展指標，這個指標要把定義的各個部分連結起來。

我定義的女性主義，是一個人全力支持男女在藝術、求知、家庭、工作、政治與權威關係的領域創造全面平等的一組觀念，這就是內容效度的一個範例。我創造一個女性主義的量數，我在量數中問兩個問題：(1)男人與女人應該同工同酬嗎？(2)男人與女人應該平分家務嗎？我的量數的內容效度偏低，因為這兩個問題只問薪資與家務。它們忽略其他領域（求知、政治、權威關係，以及其他工作與家庭的層面）。就內容效度的量數而言，我若不展開量數，就得窄化定義。

效標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 效標效度用某些標準或準則，正確地指明一個構念。指標效度的驗證是把它和同一個研究者有信心的構念具有的其他量數做比較。這種效度有兩個次類型。

同時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 要具有同時效度，指標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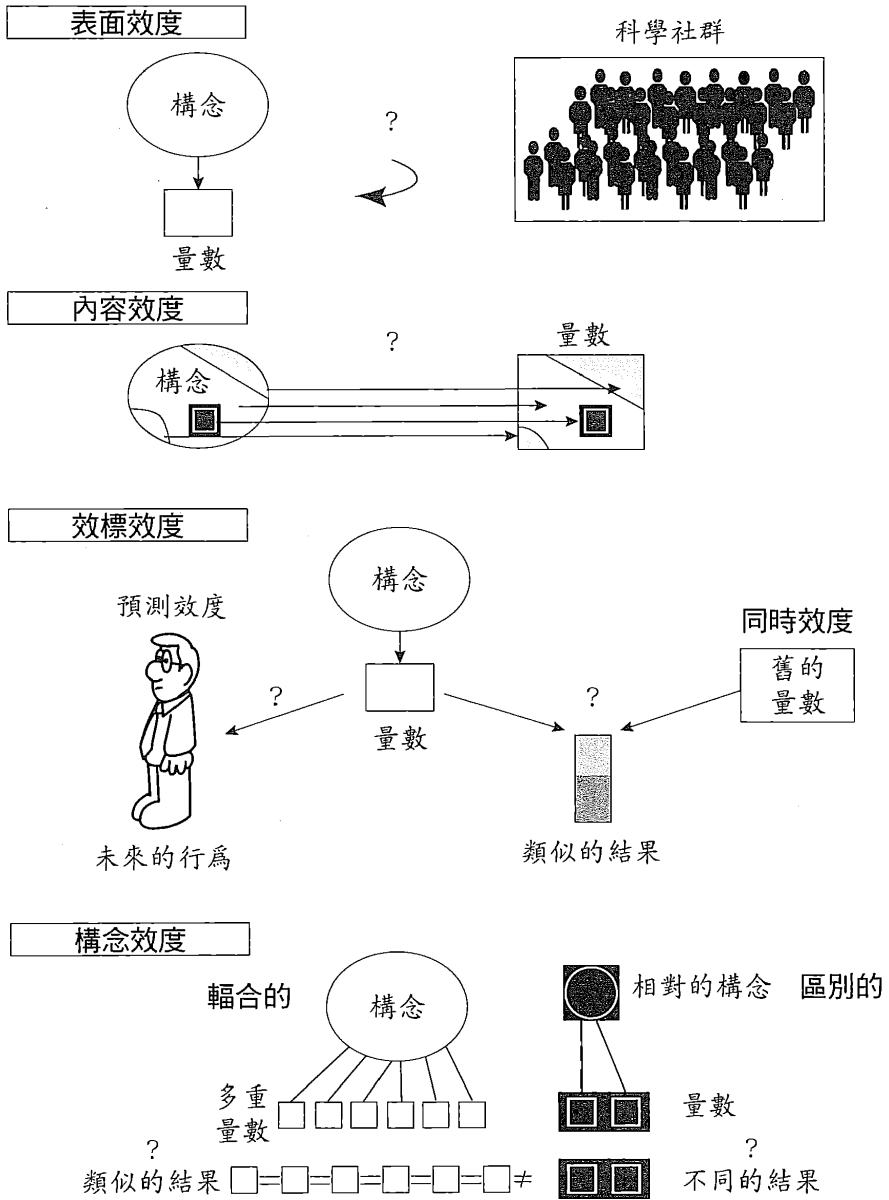


圖 7.3 效度的類型

須與既存且判定有效的指標相關連（也就是說，它有表面效度）。例如，你做一個新的測試，測量智商。這個測試若也要有同樣的效度，就必須和現有的智商測驗有相當緊密的關連（假設用的智商定義相同）。意思是多數在舊量數上拿到高分的人，應該也能在新測驗上拿到高分，反之亦同。這兩個量數的關連或許不夠完美，但若它們測量相同的或類似的構念，照理應該得到相同的結果。

預測效度 (Predictive Validity) 一個指標預測未來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在邏輯上與構念相關，那麼這種效標效度就是預測效度。它不能用於所有的量數。預測的量數與行動必須與同一個構念區分，卻又指明這個指標。預測的測量效度不應與假設測試的預測混為一談，因為假設測試是用一個變項預測一個不同的未來變項。例如，許多美國高中生考的**智力及性向測驗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所測量的是學業性向——學生在大學唸書的能力。如果SAT的預測效度很高，得到高分的學生就能在大學讀得很好。如果得到高分的學生表現與普通或低分的學生一樣，那麼SAT的預測效度就很低。

另一個測試預測效度的方法是選擇一群有某些特質的人，並預測他們相對於構念能得到多少分數（非常高或非常低）。例如，我有個政治保守主義的量數。我預測保守組的成員（如約翰柏奇會 [John Birch Society]、保守委員會 [Conservative Causus]、美國革命婦女會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道德多數 [Moral Majority]）會得到高分，自由組的成員（如民主社會黨人 [Democratic Socialists]、美國之路 [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美國民主行動會 [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得到的分數很低。我「確認」這些團體的量數——也就是說，我把它用於這些群組的成員，做前導測試。然後它就可以用來測量一般大眾的政治保守主義。

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構念效度是用於多重指標的量數。它處理的問題是：如果量數有效，各個指標運作的方式一致

嗎？它需要的定義要有明確界定的概念界線。

輻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這種效度應用的時機是多重指標輻合或彼此關連。輻合效度是指同一構念的多重量數前後呼應，或是以類似的方式運作。例如，我測量「教育」這個構念，是問人們讀完幾年書，查閱學校記錄，並要求人們完成所學測試。如果量數不合（如宣稱有大學學歷者沒有上過大學的記錄，或者有大學學歷的人在我的測試上的表現比高中畢業者好不了多少），那麼我的量數具有的輻合效度就很弱，我不應該把這三個指標結合成一個量數。

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區別效度也稱為**分歧效度 (divergent validity)**，是輻合效度的相反。它是說一個構念的指標和相對立的構念呼應或輻合，卻也與其分歧或有負面的相關。它說如果構念A與構念B迥然不同，那麼量數A與量數B就應該沒有關連。例如，我有10個測量政治保守主義的題目。人們回答這10個問題的方式類似。但我也在問卷上放了5個測試政治自由主義的問題。如果這10個保守主義的問題彼此呼應，又和那5個問題有負相關，那麼我的保守主義量數就有區別效度。

質化研究的信度與效度

多數質化研究者接受信度與效度的原則，但很少使用這些術語，因為它們跟量化測量有密切的關連。此外，質化研究者實際的運用也不一樣。

❖ 信度

信度的意思是可靠或一致。質化研究者用許多技巧（如訪問、參與、相片、文獻研究），一貫地記錄他們的觀察。對於他們如何長期做觀察，質化研究者要追求一致（也就是不要搖擺不定、反覆無常），這和穩定信度的觀念類似。有個困難是他們經常研究長期不穩定的過程，他們也強調研究者與她的研究對象之間改變中或發

展中互動的價值。質化研究者相信研究主題及其與研究者的關係應該是成長的、演進的過程。研究者與資料之間關係的隱喻是進化的關係或自然成熟的生物機體（如一棵植物）。多數質化研究者拒斥用量化途徑獲得信度，他們認為這是用冷冰冰的、僵化的機械工具，一再注射到或用於某些靜態的、沒有生命的物質上。

質化研究者考量多種資料來源，使用多重測量方法。他們質疑複製、同等與次母體信度的量化——實證觀念。他們同意不同的研究者或使用替代量數的研究者會得到獨特的結果。這是因為他們把資料蒐集視為一種互動的過程，研究者在演進的場景中操作，場景的狀況要求使用獨特的量數組合，這種組合是不能重複的。五花八門的量數，以及和不同研究者的互動是有意的，因為它們能夠彰顯研究主題不同的面貌或向度。許多質化研究者質疑量化研究者追求標準、固定量數的作法。他們怕這種量數忽略掉形形色色的研究者各有途徑的好處，也怕他們可能忽略社會世界中多樣的關鍵層面。

❖ 效度

效度的意思是真實。它是指構念與資料之間的橋樑。質化研究者對真實的興趣比對效度的興趣高。真實的意思是從置身其中者的觀點，對社會生活給予公平的、誠實的、平衡的解釋。質化研究者不太關心抽象概念與經驗資料的媒合，比較關心的是誠實描繪社會生活，這種描繪要忠於被研究者的經驗。多數質化研究者把焦點集中在掌握局內觀點的方法，並提供詳細的解釋，說明這些被研究的人對事件的感覺與瞭解。

質化研究者已經發展出一些方法，代替效度的量化途徑。實地研究者討論生態效度或自然史方法（見第13章）。這些方法強調把局內人的觀點傳達給別人。歷史研究者用內在與外在批評（見第14章），判斷他們擁有的證據是真的，還是他們認為是真的。質化研究者堅稱效度的核心原則是真實（也就是避免錯誤的或扭曲解釋）。他們試圖在他們對社會事件的瞭解、想法與陳述，以及實際

發生的事情之間創造緊密的結合。

信度與效度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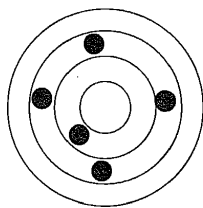
信度是效度所需，也比效度容易達成。雖然信度必須要有概念的量數才會有效，但這並不保證一個量數就會有效。它不是效度的充分條件。一個量數可以一再產生一樣的結果（也就是它有信度），但它測量的可能不符構念的定義（也就是效度）。

一個量數可能可信，卻無效。例如，我站到磅秤上面量出體重。每次上去下來，磅秤記錄的重量都一樣。然後我用其他的磅秤——量出真正體重的「權威性」磅秤——它說我的體重重兩倍。第一個磅秤得到可信的（也就是可靠的、一致的）結果，但它並未給我的體重做有效的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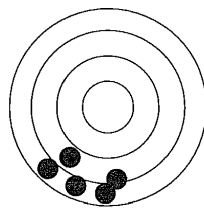
示意圖或許可幫你瞭解信度與效度之間的關係。圖7.4用標靶的類比說明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靶心代表量數與構念定義的契合。

效度與信度通常是互補的概念，但在某些特殊情境中，它們彼此衝突。有時效度增加，信度反而更難達成，反之亦同。構念的定義相當抽象，不容易觀察的時候，就會有這種情況。量數精確又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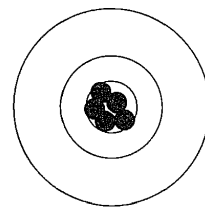
靶心 = 完美的量數



低信度與低效度



高信度與低效度



高信度與高效度

圖7.4 信度與效度之間關係的範例

資料來源：引自Babbie (1995:128)

以觀察的時候，信度是最容易達成的。因此，高度抽象構念的真正本質與具體衡量它的方式之間有緊張關係。例如，「疏離」是非常抽象、相當主觀的構念，通常定義為一個人內心深處人性的失落，這種失落擴散到這個人生活的許多層面（例如，社會關係、自我意識、對自然的方向感）。問卷上相當精密的問題給人可信的量數，但有喪失概念主觀本質之虞。

有些強硬的實證論研究者辯稱，這是說根據個人感覺與經驗的疏離與構念是不良的概念，應該避免。能夠接受用比較詮釋性或批判途徑研究科學的人則辯稱，這些概念應該保留。他們說，使用質化研究法，測量一定更有彈性，也沒那麼精確。測量的議題最後還是回到如何進行研究以及概念如何定義的假定。

可信與有效的其他用法

許多詞彙有多重定義，信度與效度也包括在內。這就造成混淆，除非我們把同一個詞彙不同的用法區分開來。

❖ 信度

我們在日常語言中使用信度。一個可信的人就是可靠的、穩定的、負責的人；一輛可信的車是可靠的、值得信任的。這就是說，這個人在不同時間與狀況中的反應類似、可以預測；同樣的話也可以說這輛車。除了測量信度之外，研究者有時候說一個研究或它的結果是可信的（如 Yin, 1988）。他們這麼說的意思是進行研究的方法或研究得到的結果可以由其他研究者再製或複製。

❖ 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

內在效度的意思是研究計畫的設計內部沒有誤差。它主要是用在實驗研究中，探討可能的誤差，或是研究結果的替代性解釋，即使想要進行控制，這些誤差與解釋還是會出現。內在效度高，表示這種誤差不多。內在效度低，表示這種誤差有可能出現。

❖ 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度主要用於實驗研究。它是從某個場景和某一小組的發現推論到各種場景與人群的能力。它處理這個問題：如果某事在實驗室中或在一個特定受試者群體（如大學生）中發生，那麼這些發現能否推論到「真實的」（非實驗室）世界或推論到一般大眾（非學生）？外在效度高的意思是結果能夠推論到許多情境和許多人群。內在效度低的意思是結果只能用於非常特定的場景。

❖ 統計效度 (statistical validity)

統計效度的意思是選擇了正確的統計程序，完全契合它的假定。不同的統計測定或程序適用於不同的條件，描述此一統計程序的教科書都有討論。

所有的統計量都是根據所用數目數學特性的假定。如果違反主要的假定，統計量就沒有效，它的結果也沒有意義。例如，要計算平均值（其實是平均數，這在後面的章節有討論），不能使用名目測量層次的資訊（即將討論）。例如，假定我測量一班學生的種族。我給每個種族一個數字：白人=1，黑人=2，亞裔=3，其他=4。說一班學生的種族「平均數」是1.9（幾乎等於黑人），毫無意義。這是統計程序的誤用，也沒有效果，即使計算正確也一樣。統計假定能夠違反或扭曲（技術用語是健全robustness）是專業統計學家非常有興趣的主題。

量化測量之導引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學到測量的原理，包括信度與效度的原理。量化研究者已經發展出觀念與專門的量數，在製作操作型定義的過程中幫助他們，這些操作型定義將是可信的、有效的量數，並且為他們的變項構念得出數值資料。本章這個部分就是這些觀念及

其他量數的簡短介紹。

測量水平

測量水平 (Levels of Measurement) 是抽象的觀念，但很重要，使用廣泛。基本上，它說研究者測量構念的某些方法是在較高的或精緻的水平，其他方法則是粗糙的或說明比較不精確的方法。測量水平取決於構念概念化的方式——也就是有關它是否有某種特質的假定。測量水平影響到所選指標的種類，也和構念定義中的基本假定相連。研究者把一個變項概念化的方式，限定她能用的測量水平，也影響到測量與統計如何進行。

❖ 連續與間斷變項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Variables)

變項不是可視為連續的，就是間斷的。連續變項有無限的數值或在連續體上展延的特性。數值能夠分成許多較小的部分；在數學理論中，小小部分的數目無窮無盡。連續變項的例子包括溫度、年齡、收入、犯罪率，以及教育年數。間斷變項有相當固定的分隔數值或變項特性。間斷變項沒有平順的數值連續體，而是包含明確的範疇。間斷變項的例子包括性別（男或女）、宗教（新教、天主教、猶太教、回教、無神論），以及婚姻狀況（單身而從未結婚、已婚、離婚或分居、鰥寡）。變項是連續的還是間斷的，影響到它的測量水平。

❖ 四種測量水平

精確與水平 測量水平的觀念在連續與間斷變項的差異上擴展，並根據變項在統計中的使用，組織它們的類型。這四個測量水平把測量的精確度分門別類。

為構念決定適當的測量水平，經常造成混淆。一個變項適當的測量水平取決於兩件事：(1)構念如何概念化，以及(2)研究者使用的指標或測量類型。

構念本身限定精確的水平。研究者把構念概念化的方式能限定它要量得多精確。例如，某些先前列為連續的變項，可以重新概念化為間斷的變項。溫度可以是連續變項（如程度、程度的小部分），或者可以用間斷變項做粗略測量（如熱或冷）。同樣地，年齡可以是連續的（一個人有多老，以年、月、日、時、分計算），或者可以視為間斷的範疇（嬰兒、兒童、青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然而，多數間斷變項卻不能概念化為連續變項。例如，性別、宗教與婚姻狀況不能概念化為連續的；不過，相關的構念是可以概念化為連續的（如女性特質、虔誠程度、對婚姻關係的投入程度等）。

測量水平限定能夠使用的統計程序。許許多多強有力的統計程序可用於較高的測量水平，但能夠用於較低水平的統計類型非常有限。

在較高層次的測量水平將變項概念化並予測量，有個實際的理由。你可以將較高層次的測量水平化解成較低的層次，反之則不可。換句話說，用非常精確的方式測量構念、搜集非常明確的資訊，並忽略某些精確處，是有可能的。但用不精確的方式、用較不明確的資訊來測量構念，然後再讓它變得更精確，是不可能的。

區分這四個水平 這四個從最低到最大或最高精確度的水平是名目的（nominal）、次序的（ordinal）、區間的（interval）、比率的（ratio）。每個水平給予不同類型的資訊（見表7.2）。名目的量數只指明範疇間的差異（如宗教：新教、天主教、猶太教、回教；種族傳承：非裔、亞裔、白種、西班牙裔、其他）。次序的量數指出差異，範疇還可以排序或排等級（如字母：A、B、C、D、F；意見量數：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區間的量數測量前兩個量數測量的東西，它還能說明範疇之間距離的量（如華氏或攝氏：5°、45°、90°；智商分數：95、110、125）。假定的零點可用於區間量數；它們只是在那裡幫助支撐分數。比率的量數測量其他三個層次測量的東西，還有一個真正的零，這樣才可

表7.2 四種測量水平的特質

水平	不同的範疇	排等級	所測範疇 之間的距離	真的零度
名目的	是			
次序的	是	是		
區間的	是	是	是	
比率的	是	是	是	是

能用比例或比率說明關係（如金錢收入：\$10、\$100、\$500；正式教育的年數：1年、10年、13年）。在多數實際情境中，區間與比率水平的區別不大。某些區間量數的假定零點可能造成混淆。例如，溫度從30度上升到60度，並非溫度真的加倍，因為儘管數字加倍，零度並不是沒有任何熱度。

間斷變項是名目與次序變項，連續變項則可在區間或比率水平測量。比率——水平的量數可以轉為區間、次序或名目水平的量數。區間水平隨時可以轉為次序或名目水平，但這個過程可不能反向進行！

一般而言，如果有必要使用次序測量，至少要用五種次序範疇，得到許多觀察。這是因為把連續構念折合成較少數的次序範疇所造成的扭曲，隨範疇數目與觀察數目的增加而減少。

比率的測量水平在社會科學中很少使用。就大多數的目的而言，它與區間測量的區別不大。唯一的差異是比率測量有「真的零點」。這可能讓人混淆，因為有些像溫度之類的量數所具有的零點不是真正的零點。溫度可能是零度或零下，但零點分到溫度時，零點就是假定的數目。這可以用攝氏與華氏零度的比較來說明——它們是不同的溫度。此外，一種系統的溫度加倍，並不會讓另一個系統的溫度加倍。同樣地，如果溫度從2度增到4度，從15度增加到30度，或是從40度增加到80度，說「溫暖兩倍」是沒有意義的，

但若比率測量就有意義。另一個假定——不真的——零點是在測量態度的時候，此時數目分派到各種陳述上（如-1=不同意，0=無意見，+1=同意）。像收入、年齡、或教育年數的變項就有真的零點。這四種測量水平的範例在表7.3有說明。

專門化的量數：量表與指數

在本章最後一段，我們要看許多專門化的量數，包括量表與指數。研究者已經創造出上千種不同的量表與指數，測量社會變項。例如，測量官僚組織正式化的程度、職業聲望、人們對婚姻的調適、團體互動的強度、社區中社會互動的水平、國家性騷擾法律反映女性主義價值的程度，以及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層次的量表與指數已經發展出來。我不能討論這上千種量表與指數。我會把焦點集中

表7.3 測量水平的範例

變項（測量水平）	變項如何測量
宗教（名目）	不同的宗教派別（猶太教、天主教、路德教派、浸信會）不分等級，只是不一樣（除非有一種信仰被概念化為比較接近天堂）。
參加（次序）	「你參加宗教儀式的次數有多少？（0）從未，（1）一年不到一次，（3）一年幾次，（4）約一個月一次，（5）一週兩、三次，或（8）一週數次？」如果問一個人的參加次數是比較仔細的，那麼或許可以在比率的水平做測量。
智商分數（區間）	多數智商測驗把100分當做平均、中間或正常分數。得分高或低是指與平均的距離。參加智商測驗而得到115分的人高於平均分數，得到90分的人則較低。得分低於65或高於140分的人很少。
年齡（比率）	年齡是由年數測量的。有真的零點（出生）。注意40歲的人活得比20歲的人久。

在量表與指數建構的原理，並探討主要的類型。

記住兩件事。第一，幾乎每種社會現象都能測量。有些構念可以直接測量，產生精確的數值（如家庭所得）。有的構念需要用到間接測量變項的替代或代表，可能沒有那麼精確（如犯罪的傾向）。第二，其他研究者所用的量數有很多可以學習。你很幸運，有上千位研究者的著作可以引用。不一定每次都要從頭開始。你可以使用過去的量表或指數，或者你可以依你自己的目的做修正。Grosf與Sardy（1985: 163）提醒過，製作評分的量表與態度的量數「是特別艱巨、細緻的事業，需要特別仔細的思考。」為構念製作量數的過程隨時在進行。測量是持續的過程，其間變動不居；新的概念發展出來，理論定義重新界定，測量舊或新構念的量表與指數也有改善。

❖ 指數與量表

你可能發現指數與量表令人困惑，因為它們常常交互使用。一位研究者的量表可能是其他研究者的指數。兩者都為一個變項產生次序或區間水平的量數。更令人不解的是，量表與指數可以在一個量數中結合使用。量表與指數給研究者更多有關變項的資訊，如此即可評估測量的品質。量表與指數提昇信度與效度，而且它們幫助化約資料；也就是說，它們濃縮並簡化搜集到的資訊（見資訊箱 7.2）。

❖ 相互排除與全容的特性

在討論量表與指數之前，回顧優質測量的特性是很重要的。所有量數的特性，包括名目水平的量數，應該是相互排除與全容的。

相互排除特性的意思是一個人或個案符合，也只符合一個變項的特性。例如，一個測量宗教類型的變項——基督教、非基督教與猶太教的特性——不是相互排除的。猶太教既是非基督教，也是猶太人的宗教，所以一個猶太人符合非基督教與猶太人的範疇。同樣

資訊箱 7.2

量表與指數：它們有差異嗎？

就大多數目的而言，你可以把量表與指數當做可交互使用的工具。社會研究者並未用統一的術語區分它們。

量表是一種量數，研究者藉此掌握一個變項構念的密度、方向、水平或潛能。它在一個連續體上安排反應或觀察。量表可用單一或多重指數。多數量表是在次序的測量水平。

指數是一種量數，研究者藉此加總或結合一個構念中幾種明確的指數，變成單一的分數。這種綜合分數通常是多種指數簡單的加總。它用於內容或輻合效度。指數經常在區間或比率水平做測量。

研究者有時用單一量數結含量表與指數的特性。在研究者有一些指數是量表（也就是測量密度或方向）的時候，這是稀鬆平常的事。然後她把這些指數綜合在一起，得出單一的分數，藉此創造指數。

地，一個測量城市類型的變項具有河港市、州首都、州際轉運點的特性，缺乏相互排除的特性。一座城市可能是兼為三者（州首都為河港市與州際轉運點），三者中任何一者，或三者都不是。

全容的特性是說所有個案符合一個變項的特性之一。測量宗教時，具備天主教、新教與猶太教特性的量數不是排除性的。一位佛教徒、回教徒或不可知論者不能歸於任何一處。特性的發展應該涵蓋每個可能的情境。例如，天主教、新教、猶太教或其他宗教是全容的、相互排除的特性組合。

❖ 單向度性（unidimensionality）

除了是相互排除與全容之外，量表與指數也應該是單向度或一個向度的。單向度性的意思是量表或指數中所有項目彼此配合，或

者測量單一的構念。單向度性在前面構念與內容效度的討論中曾經稍微提過。單向度性說：如果你把幾種明確的片段資訊結合為單一分數或量數，那麼各個片段都要測量同一件事。最先進的技術之一——因素分析——經常用於測試資料的單向度性。

用量表或指數把構念的部分或小部分結合為一個量數，這和單向度性的判準之間有明顯的矛盾。不過，它只是明顯的矛盾，因為構念是在不同的抽象層次上做理論上的定義。一般的、高層次的或較抽象的構念可以定義為包括許多小部分。每個小向度是構念所有內涵的一部分。

例如，我把「女性主義的意識型態」的構念定義為有關性別的一般意識型態。女性主義的意識型態是相當抽象的、一般的構念。它包括某些對社會、經濟、政治、家庭與性關係的觀念與態度。意識型態的五大觀念領域是單一概括構念的部分。這些部分彼此增強，構成婦女尊嚴、力量與權力的觀念體系。

如果女性主義的意識型態是單向度的，那麼就有統一的觀念體系，從非常反對女性主義的到非常支持女性主義的都有。我們可以測試包含多重指標的量數所具有的輻合效度，這些多重指標將這個構念的小部分連結在一起。如果一個觀念區（如性關係）在經驗測試中始終與其他區涇渭分明，那麼我們就要質疑它的單向度性。

這很容易混淆不清：在某個情境中，一個量數可以是一個單向度構念的指標，也可以在另一個情境中指明一個不同構念的一部分。這有可能，因為構念能夠用在不同的抽象層次上。

例如，一個人對薪資性別平等的態度，比女性主義的意識型態（也就是社會上有關性別關係的信念）還要明確，沒那麼抽象。對同工同酬的態度本身可以是單向度的構念，也可以是比較概括的、抽象的單向度構念之中一小部分，這個構念就是對性別關係的意識型態。

指數建構

目的

你隨時都會聽到指數。例如，美國報紙報導聯邦調查局（FBI）的犯罪指數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FBI的指數是警方七項所謂指數犯罪報告的總合（兇殺、重傷害、強姦、搶劫、偷竊、侵占50美元以上的財產，以及汽車竊盜）。它始於1930年的**警方犯罪報告（Uniform Crime Report）**。CPI是通貨膨脹的量數，其製作是把購買一份財貨與勞務（如食物、租金、與公用事業費率）的成本加總，並和前一年購買同一份財貨與勞務的成本做比較。從1919年開始，消費者物價指數就由美國勞動統計局使用；加薪、工會合約與社會安全給付都是以它為依據。指數是各種項目結合為單一分數值。一個構念的不同成份或小部分經由個別測量後，再結合為一個量數。

指數有很多種。例如，你考的試有25個問題，答對問題的總數就是一種指數。它是一種綜合量數，其中每個問題測量一小部分知識，所有答對或答錯的問題加總起來，產生單一的量數。

指數測量最想居住的地方（根據失業率、通勤時間、犯罪率、休閒機會、氣候等）、犯罪程度（根據各種不同犯罪發生的總數），以及一個人心智的健康（根據這個人在不同生活領域的調適程度）等。

有個方法可證明指數不是非常複雜的，那就是只用一個。下面有七個有關職業特性的問題，答是或否。根據你對下面四種職業的想法，再做答：長途卡車司機、醫生、會計師、接線生。是的答案分數為1，否的答案分數為0。

1. 薪水優厚嗎？
2. 工作不怕裁員或失業嗎？

3. 工作有趣或有挑戰嗎？
4. 工作條件（如時間、安全、通車時間）優渥嗎？
5. 有事業進展與升遷的機會嗎？
6. 它有聲望或受別人尊重嗎？
7. 它容許自我決定方向與決策的自由嗎？

把這七個問題對四種職業的答案加起來。哪種職業分數最高，哪種職業分數最低？這七個問題是我對好的職業這個構念的操作型定義。每個問題表示我的理論定義中一小部分。不同的理論定義產生不同的問題，或許超過七個問題。

製作指數非常簡單，因此要讓指數中每個項目有表面效度，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表面效度的項目應該排除掉。構念的每個部分至少要用一個指標測量。當然，用多重指標測量構念的各個部分，比較妥當。

另一個指數的範例是**大學品質指數**（college quality index，見資訊箱7.3）。我的理論定義說高品質的大學有六個突出的特質：(1)每位教師分到的學生較少，(2)教師學歷極高，(3)圖書館藏書較多，(4)退學學生較少，(5)修讀進階學位的學生較多，(6)教師出版書籍與學術文章的數量。我為100所大學打分數，然後把每個大學的分數加起來，製作大學品質的指數分數，這些分數可用於比較各大學。

指數可以彼此結合。例如，為強化我的大學品質指數，我加上教學品質的次指數。這個指數包含八個項目：(1)班級平均人數，(2)討論時間的百分比，(3)每位教師教不同班級的數量，(4)學生在課外可以找到的教師數量，(5)指定閱讀的頻率與份量，(6)作業促進學習的程度，(7)教師瞭解每個學生的程度，以及(8)學生對教學的評分。類似的次指數量數可以為大學品質指數的其他部分而製作。它們可以結合為更全面的大學品質量數。這更進一步闡釋「大學品質」這個構念的定義。

資訊箱 7.3

指數的範例

大學品質指數是根據下列六個項目：

1. 每位教師分到的學生數目
2. 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所占百分比
3. 每名學生分到的圖書館藏書
4. 入學的新鮮人未能獲得學位的百分比
5. 學生修讀進階學位的百分比
6. 教師出版書籍與學術論文的數量

符號代表：

Q = 大學品質指數

R = 每位教師分到的學生數目

F = 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所占百分比

B = 每名學生分到的圖書館藏書

D = 新鮮人退學或未完成學業的百分比

A = 學生修讀進階學位的百分比

P = 每位教師出版的數量

$$\text{未加權公式} \quad (-1)R + (1)F + (1)B + (-1)D + (1)A + (1)P = Q$$

$$\text{加權公式} \quad (-2)R + (2)F + (1)B + (-3)D + (1)A + (3)P = Q$$

老牌長春藤大學

$$\text{未加權公式} \quad (-1)13 + (1)80 + (1)334 + (-1)14 + (1)28 + (1)4 = 419$$

$$\text{加權公式} \quad (-2)13 + (2)80 + (1)334 + (-3)14 + (1)28 + (3)4 = 466$$

地區大學

$$\text{未加權公式} \quad (-1)20 + (1)82 + (1)365 + (-1)25 + (1)15 + (1)2 = 419$$

$$\text{加權公式} \quad (-2)20 + (2)82 + (1)365 + (-3)25 + (1)15 + (3)2 = 435$$

大型大學

$$\text{未加權公式} \quad (-1)38 + (1)95 + (1)380 + (-1)48 + (1)24 + (1)6 = 419$$

$$\text{加權公式} \quad (-2)38 + (2)95 + (1)380 + (-3)48 + (1)24 + (3)6 = 392$$

加權 (Weighting)

指數建構的一個重要議題，就是是否要將項目加權。除非另有說明，都要假定一個指數是沒有加權的。同樣地，加權要一致，除非你在理論上有分派不同權數的好理由。未加權指數給每個項目同樣的權數。它把項目加起來，不予修正，好像每個都乘以1（或用-1乘以負的項目）。

在加權指數中，研究者加重某些項目的價值或予以加權。權數的大小可以來自理論假定、理論定義或因素分析這類統計技術。加權改變構念的理論定義。

例如，我闡釋大學品質指數的理論定義。我決定師生比和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數量要比每名學生分到的圖書館藏書，或是比追求進階學位的百分比重要兩倍。再者，退學的新鮮人，還有每位教師出版的數量比圖書館藏書或追求進階學位的百分比重要三倍。用公式表示，比較容易看得出來。

每位教師分到的學生數量和退學的百分比有負值，這是因為它們越大，大學品質就越低。加權與未加權的指數能產生不同的結果。看看老牌長春藤大學、地區大學與大型大學。每個都有相同的未加權指數分數，但加權之後，大學的品質分數就不同了。

加權在這個範例中產生不同的指數分數，但在多數個案中，加權與未加權得到的結果差不多。研究者關切變項之間的關係，加權

與未加權的指數經常給人相同的結果。

遺失資料

建構指數的時候，遺失資料可是嚴重的問題。某些個案的資料遺失時，效度與信度就受到威脅。有四種方法嚐試解決這個問題（見資訊箱7.4），可是沒有一個能徹底解決。

例如，我為50個國家建構1975年社會發展程度的指標。這個指數包括四個項目：期望壽命、擁有室內下水管的住家百分比、識字人口的百分比，以及每100人的電話數。我找到聯合國的統計數字，做為我的資訊。比利時的數值是 $68 + 87 + 97 + 28$ ；土耳其的分數是 $55 + 36 + 49 + 3$ ；然而，我發現芬蘭的數字資料無從獲得。我檢查其他的資訊來源，但沒有一個有這種資料，因為它們不在搜集之列。

率與標準化

你聽過犯罪率、人口成長率或失業率。有些指數與單指標量數是用率來表示。率是將一個項目的值標準化，這樣才能比較。指數中的項目經常需要在它們結合之前做標準化。

標準化是選擇一個基數，再用原始量數除以基數。例如，A城市有10件謀殺案，B城市在同一年有30件謀殺案。為比較這兩座城市的謀殺案，謀殺案的原始數量需要依照城市人口做標準化。如果城市大小一樣，那麼B城市比較危險。但若B城市比較大，它或許比較安全。例如，如果A城市有100,000人，B城市有600,000人，那麼A城市每100,000人的謀殺率是10，B城市的謀殺率是5。

標準化讓人可以在共同的基數上比較不同的單元。標準化的過程也叫**規範化**（norming），把相關卻相異特質的影響移除，以便突顯重要的差異。例如，有兩班學生。藝術班的學生有12名吸煙者，生物班的學生有22名吸煙者。研究者可以用班級人數把吸煙者人數標準化，比較吸煙者發生的比率或頻率。藝術班有32名學

資訊箱 7.4

處理遺失資料的方法

1. 刪除遺失任何資訊的個案。如果把芬蘭從研究中拿掉，可獲得資訊的國家所得之指數將是可信的。如果其他國家也有遺失的資訊，這就是問題了。一份50個國家的研究可能變成20個國家的研究。再者，遺失資訊的個案可能在某些方面類似（如都在東歐或第三世界），這就限制到發現的可推論性。
2. 用平均分數取代資訊出現的個案。代入其他國家得到的平均識字分數。這個「解決方法」讓芬蘭留在研究中，卻給它不正確的值。對項目很少或非「平均」的個案，這會造成嚴重的效度問題。
3. 根據這個個案的量化資訊，插入資料。其他有關芬蘭的資訊（如13到18歲就讀高中的百分比）用來做有關識字率的推測。在這個情境中，這個「解決方法」不太能讓人接受。它測量芬蘭識字率的效果沒那麼好，而且它依賴一個沒有經過測試的假定——可以從其他國家的高中就學率預測識字率。
4. 插入隨機值。對發展指數的例子而言，這是不智之舉。如果指數有許多項目，個案數量很大，那麼它或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如果是這種狀況，那麼刪除這個個案，或許是產生較可信量數較佳的「解決方法」。

生，生物班有143名學生。有個標準化的方法，你已經知道，就是使用百分比，量數依照100的共同基數，做標準化。用百分比來看，很容易看出來藝術班的吸煙者比率（37.5%）是生物班（15.4%）的兩倍。

標準化有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決定用什麼基數。在上面的例子中，我怎麼知道要用城市人數或班級人數做基數？選擇並不一定明

顯；它要看一個構念的理論定義。

不同的基數能產生不同的率。例如，失業率可以定義為勞動力中沒有工作的人數。整個失業率就是：

$$\text{失業率} = \text{失業人數} / \text{工作者的總人數}$$

我們可以把總人口分割成次群體，得到次群體在人口中的比率，如18到28歲之間的白種男性、女性黑人、男性黑人，或是具有大學學歷的人。這些次群體的比率可能跟理論定義或研究問題比較有關聯。例如，研究者相信失業是影響到全家或家庭的經驗，基數應該是家戶，而非個人。這個比率看起來是這個樣子：

$$\text{失業率} = \text{至少有1人失業的家戶數} / \text{家戶的總數}$$

不同的概念化顯示不同的基數和不同的標準化方法。把幾個項目結合為一個指數時，最好在共同的基數上將項目標準化（見資訊箱7.5）。

量表

目的

量表（scaling）就像指數建構一樣，為一個用數值分數表達的變項製作出次序、區間或比率量數。在研究者要測量一個人對某事如何感覺，或有什麼想法時，量表是很常用的。有人將此稱為感覺的硬度或能力。

量表用來達成兩個相關的目的。第一，量表有助於概念化與操作化過程。量表顯示一組指標與單一構念之間的契合度。例如，研究者相信人們對某個政策（如住居、教育、外交事務等）的判斷立基於單一的意識型態向度。量表有助於決定是否一個構念——例如，「保守的 / 自由的意識型態」——是人們某個政策立場的基礎。

資訊箱 7.5

標準化

15個國家在1988年漢城奧運贏得的獎牌
贏得的獎牌

等級	國家	金牌	銀牌	銅牌	總數	加權總數
1	蘇聯	55	31	46	132	82
2	東德	37	35	30	102	62
3	美國	36	31	27	94	59
4	西德	11	14	15	40	22
5	南韓	12	10	11	33	20
6	匈牙利	11	6	6	23	15
7	法國	6	4	6	16	9
8	日本	4	3	7	14	8
9	紐西蘭	3	2	8	13	6
10	瑞典	0	4	7	11	4
11	加拿大	3	2	5	10	5
12	肯亞	5	2	2	9	6.5
13	巴西	1	2	3	6	3
14	挪威	2	3	0	5	3.5
15	芬蘭	1	1	2	4	2

各國排名以所得獎牌為準。注意各國排名如何因加權而有些微變動。

等級	國家	每一億人口的總獎牌數	
1	東德	60	一旦我們依據每個國家的人口數量，將獎牌總數標準化，那麼等級就有急遽的變化。例如，挪威從第14名跳升至第4名，美國從第3名掉到第12名。把國家等量齊觀，忽視有些國家的人口比別國多50倍以上，有更多人才可用，這樣分等級是公平的嗎？例如，挪威的人數跟美國威斯康辛州一樣多。哪種等級排列更能讓人瞭解一國相對的運動天分與訓練——非標準化，還是標準化的等級排列？
2	紐西蘭	405	
3	匈牙利	210	
4	挪威	165	
5	瑞典	140	
6	南韓	85	
7	芬蘭	80	
8	西德	65	
9	肯亞	55	
10	蘇聯	50	
12	美國	40	
13	加拿大	40	
14	巴西	25	
15	日本	12	

* 加權總數：金牌=1，銀牌=0.5，銅牌=0.25。

資料來源：引自Horn (1993: 45)。

第二，量度產生量化的量數，可和其他變項使用，測試假設。這個量表測量的第二個目的是我們主要的焦點，因為它把量表當做測量一個變項的技術。

量度的邏輯

就像剛剛說的，量度是立基於測量變項強度、硬度與能力的想法。圖形評分量表是量度的基本形態。人們檢查從一端到另一端線的一個點，指出一個評分。這種量表容易建構、使用。它傳達連續體的觀念，分到的數字幫助人們想像數量。量表假定有相同主觀感受的人會在圖形量表上同一個地方做記號。

圖7.5是用來發現人們對社會上不同團體（全國婦女組織、三K黨、工會、醫生等）有什麼感覺的「感覺溫度」量表。從1964年以來，這種量數就由政治學家用來做全國選舉研究（National Election Study），測量民眾對候選人、社會團體與議題的態度。

常用量表

❖ 李克特量表

你或許用過**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它們在調查研究中廣泛使用，司空見慣。它們是Rensis Likert在1930年代發展出來的，目的是為一個人的態度提供次序水平的量數。李克特量表叫做**總合評分**（summated-rating）或**加法量表**（additive scales），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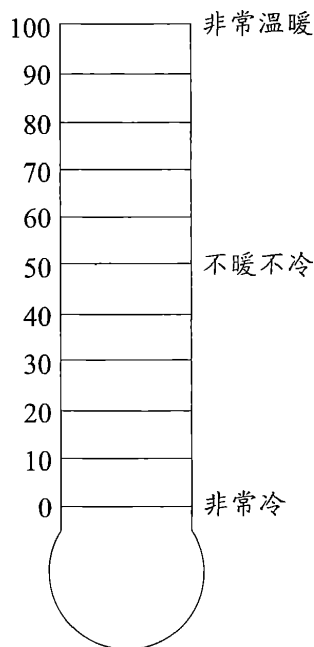


圖7.5 「感覺溫度」的圖形評分表

為一個人在量表上的分數計算是把這個人給的回應次數加起來。李克特量表通常要人們指出他們是否同意或不同意某句陳述。其他的調整也有可能；人們可能被人問到他們贊成還是不贊成，或者他們是否相信某事「幾乎永遠是真的」。資訊箱7.6展示幾個李克特量表的範例。

李克特量表最少需要兩個範疇，如「同意」與「不同意」。只用兩個選擇製作一個粗略的量數，並強加差異，區分成兩個範疇。用四個或八個範疇，通常比較妥當。研究者可以在資料搜集好之後，結合或折疊範疇，但用粗略範疇搜集的資料稍後就不能做得更精確了。

你可以在量表的終端增加範疇的數目，如加上「強烈同意」、「有點同意」、「非常強烈地同意」等。選擇的數目要保持在頂多八個或九個。比這還多的區分或許沒有意義，人們也會混淆不清。選項應該平均分配（如「強烈同意」、「同意」要和「強烈不同意」、「不同意」搭配）。Nunnally（1978: 521）說：

由於量表的階梯數是從2增加到20，信度的增加起先非常快速。它總在7左右持穩，在第11階之後，再增加階梯，也增加不了多少信度。

除了方向的範疇之外（「不同意」、「同意」），研究者也辯論過是否要提供中立的範疇（如「不知道」、「尚未決定」、「沒意見」）。加上一個中立的範疇，表示範疇的數目是奇數。

研究者可以結合幾個李克特量表的問題，變成一個綜合指數，如果它們都是測量單一的構念。看看Sniderman與Hagen（1985）為他們的研究所製作的**婦女平等機會指數**（Index of Equal Opportunity for Women）與**自尊指數**（Self-Esteem Index）（見資訊箱7.7）。在較大的研究進行到一半時，受訪者被問到三個有關婦女地位的問題。研究者後來為答案計分，把項目結合為從3到15的指數。受訪者也回答有關自尊的問題。注意在為這些項目評分時，

資訊箱 7.6

李克特量表類型範例

羅森伯自尊量表 (The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大體而言，我總覺得我是個失敗者：

- (1)幾乎永遠是真的 (4)不太真
 (2)經常是真的 (5)絕不是真的
 (3)有時候是真的

學生對教學量表的評分

整體而言，我對這門課程的教學品質所評的分數是：

非常好 好 平均 還好 差勁

漱口水評分量表的市場研究

	完全 不喜歡	不太 喜歡	有點 不喜歡	有點 喜歡	還算 喜歡	非常 喜歡
X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Y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工作組監督員量表

我的監督員：

	從來 沒有	很少	有時候	經常	總是
讓成員知道對他們有什麼期望	1	2	3	4	5
友善，可以接近	1	2	3	4	5
對所有單位成員一視同仁	1	2	3	4	5

有個項目（第2個問題）是反過來計分的。這樣轉方向計分的理由是避免回答傾向（response set）的問題。回答傾向也稱為回答風格（response style）或回答偏頗（response bias），就是有些人

資訊箱 7.7

用李克特量表製作指數的範例

Sniderman 與 Hagen (1985) 製作指數，測量有關婦女機會平等與自尊的觀念。這兩個指數都加上分數，製成沒有加權的指數。

婦女機會平等的指數

問題

1. 婦女受教育獲得最佳工作的機會比男人少。
強烈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2. 許多合格的婦女不能得到好工作；具備相同技能的男人比較沒有困難。
強烈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3. 我們的社會歧視婦女。
強烈同意 還算同意 不太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計分：所有問題答強烈同意=1，還算同意=2，不太同意=4，非常不同義=5，不知道=3。

受訪者覺得婦女機會平等的最高可能指數分數=15。

受訪者覺得機會不平等的最低可能分數=3。

自尊指數

問題

1. 整體而言，我對自己滿意。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2. 有時我覺得我一點都不優秀。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3. 我有時覺得別人不把我的意見當一回事。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計分：問題1與3：1 = 不同意，2 = 不知道，3 = 同意，問題2：
1 = 不同意，2 = 不知道，1 = 同意。

自尊高的可能最高分數 = 9。

自尊低的可能最低分數 = 3。

因為偷懶或心理傾向，總是用同一種方式回答一大堆問題。例如，如果項目的字句是說：「強烈同意」總是指自尊，我們就不會知道一個總是強烈同意的人有高度的自尊心，或只是傾向於用同意來回答問題。研究者用不同的方向提出陳述，這樣任何隨時同意的人就會有回答不一致的狀況出現，或者有矛盾的意見。

研究者經常結合許多李克特量表測量的態度指標，變成一個指數。量表與指數的特性和改善信度、效度有關。一個指數用多重指標，可以增加信度。用多重指標測量一個構念或意見的各個層面，可改善內容效度。最後，對於個人的意見，指數分數給人比較精確的量化量數。例如，每個人的意見可用10到40的數字測量，而非用四個範疇：「強烈同意」、「同意」、「不同意」、「強烈不同意」。

-2、-1、+1、+2的分數可以使用，而不是像前面的例子，以李克特項目計分。這種計分方式有個優點，就是零表示中間值或完全模糊，大的負數是指和大的正數相對立的意見。

分給各種反應範疇的數字是自行決定的。記住零的運用並不是給人比率測量水平的量表或指數。李克特量表的量數是次序的測量水平，因為反應只是指明一種等級。100、70、50和5可能會有效，1到4或-2到+2則可能無效。再者，不要笨到以為次序範疇之間的區間就是區間，只因為分配了數字。雖然數字體系有精確的

數學特性，但數字的使用只是為了方便。基本的測量只是次序的。

李克特量表的簡單易用是它真正的優點。某些項目結合起來，就更可能有廣博的多重指標測量。這種量表有兩個局限：某些量表項目不同的結合能產生相同的總分數或結果，回答傾向也是一個潛在的危險。

❖ 賽斯通量表法 (Thurstone Scaling)

研究者有時要一個有數值連續體的量數，但他們有興趣的態度變項有某些特質或層面。例如，快潔 (Quick and Clean) 這家乾洗業者想知道比起它在格林鎮的形象和主要競爭者友善清潔員 (Friendly Cleaner)，它的表現如何。為快潔工作的研究者把個人對這家業者的態度概念化，變成四個小部分或層面：對營業地點、營業時間、服務與價格的態度。咸認快潔營業時間與地點較為方便，但價格較高，服務態度不夠親切。友善清潔員則是價格較低，服務較親切，但營業時間與地點不方便。除非研究者知道這四個層面如何與核心態度相關——乾洗業者的形象——她就不能說哪一家業者比較受歡迎。在1920年代晚期，賽斯通 (Louis Thurstone) 發展出在這種狀況中分派數值的量度方法。這些方法現在稱為賽斯通量表法或等距區間 (equal-appearing intervals)。

賽斯通量表法是根據**比較判斷法則** (law of comparative judgement)。這個法則處理每個人做獨立判斷時的態度測量與比較問題。換句話說，它定置或固定一個人的態度相對於他人態度的位置，因為每個人都做個人的主觀判斷。

比較判斷法則說，對每個被判斷的物體或概念而言，有可能找出「最通常的反應」。雖然不同的人多少有不同的判斷，個人的判斷還是會圍繞一個最通常的反應，形成群集。圍繞通常反應而分布的個人判斷，是遵循一般的統計模式，這個模式稱為**常態分配** (normal distribution)。根據這條法則，如果許多人同意兩件物體不同，那麼對這兩個物體最通常的反應就是這兩者有差距。相對

地，如果許多人搞不清楚，或是不同意這兩個物體之間有差異，那麼對這兩個物體的通常反應就是這兩者彼此接近。

研究者用賽斯通量表法發展許多有關研究對象的陳述（如多過100句），然後運用許多評判員（如100人），刪除模稜兩可的陳述，把數目降到較小的組合（如20句）。每個評判員根據基本的連續體（例如，從受歡迎到不受欢迎），評定陳述的分數。研究者檢視這些評分，根據兩個因素來保留陳述：(1)評判員之間的同意，以及(2)陳述在一組可能價值上的位置。最後的陳述組合用來形成橫跨各種價值的測量量表。

賽斯通量表法從一大堆評估性陳述開始，這些陳述應該徹底詳盡，包括形形色色的意見。每句陳述應該明白精確，應該表達單一的意見。好的陳述指的是現在，不能詮釋為事實。它們不可能眾議僉同，要用簡單的句子，避免用總是（always）與絕非（never）的字彙。研究者評估文獻、大眾傳播媒介、個人經驗，並詢問他人，從中獲得想法。例如，有關乾洗業的陳述或可包括前面列出的四個層面，再加上下列陳述：

- 我認為X業者乾洗衣服的方式又快又準時。
- 依我之見，X業者把店面弄得看起來乾淨又吸引人。
- 我認為X業者沒有把髒污清得很乾淨。
- 我相信X業者乾洗外套的價格是合理的。
- 我相信X業者送回的衣服很乾淨，燙得又平整。
- 我認為X業者的交貨服務很爛。

研究者接下來找到50到300名評判人。評判人不必是這個主題的專家，但他們應該熟悉陳述中的事物與概念。每個評判人拿到一組陳述卡片與指示。每張卡片上面有一句陳述，評判人把卡片放在數疊中的一疊。疊數通常是7、9、11或13。這些卡片疊表示有關被評估的事物或各種程度的值（如從受歡迎到中立到不受欢迎）。每個評判人把卡片放在評分疊上面，不受其他評判人影響。

評判人將卡片放成數疊之後，研究者製作一分交叉分類各疊與陳述的圖表。例如，100句陳述與11疊產生 11×100 的圖表，或是 $11 \times 100 = 1100$ 方塊的表格。分派評定某句陳述的人數寫在表格中每個方塊上面。統計量數（除開現有討論的）是用來計算每句陳述的平均評分，以及評判人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

研究者保留評判人所見略同的陳述或評分者之間的信度，也保留代表所有值的陳述。例如，假設有100句陳述經過評分。研究者計算每句陳述的同意分數。接下來在11個值的連續體上，檢查同意值分數高的地點（非常不受歡迎、中立、非常受歡迎）。研究者把評判人用的範疇折合成較少的範疇，在五個範疇中選出評判人同意最多的四句陳述，共找出20句陳述。

研究者有20句陳述，價值量表上每一段有4句。陳述是隨機混合的。這20句陳述接下來展示給別人看，問他們是否同意或不同意這些陳述。（另一個例子見資訊箱7.8）

研究者用賽斯通量表法，能夠建構態度量表，或選出一大堆態度陳述。這個方法現已少用，因為它有局限：

1. 它只測量對陳述的同意與不同意，而非同意或不同意的強度。
2. 它假定評判人與別人同意陳述出現在評分體系中的位置。
3. 它耗費時間，花費又大。
4. 有可能用幾種方法得到相同的結果，因為同意或不同意不同的陳述組合，能產生相同的結果。

儘管如此，賽斯通量表法選擇的態度項目是相當清楚明白的。它可以和李克特或其他方法結合，製作次序水平的量數。

❖ 包氏社會距離量表（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

包氏社會距離量表測量分隔族裔或其他團體的社會距離。它用一個團體，判斷這個團體感覺它和目標或「外集團」（out-group）的距離有多遠。它是Emory Bogardus在1920年代發展出來的，用

資訊箱 7.8

賽斯通量表法的範例

測量的變項：有關死刑的意見。

第一步：運用個人的經驗、通俗與專業文獻，並聆聽他人說法，提出120句陳述。

陳述範例

1. 我認為死刑是殘忍的，也是不必要的處罰。
2. 沒有死刑，就會有更多暴力犯罪。
3. 我相信死刑只應該用於極少數暴力犯罪上。
4. 我認為死刑從不會因為死亡的恐怖而防止人們犯謀殺罪。
5. 我認為，如果人們犯下謀殺罪，即使他們是因為喪失心智，也不應該免除死刑。
6. 我相信聖經支持用死刑。
7. 死刑本身對我不是問題，但我相信用電椅將人處死是殘酷的方法。

第二步：把每句陳述放在不同的卡片或紙片上，把這120句陳述做成100組卡片。

第三步：找出100位同意擔任評判人的人員。給每個人一組陳述與指示，要他們放在11疊中任何一疊，從1 = 非常不支持排到11 = 非常支持的陳述。

第四步：評判人把每句陳述放進11疊中任何1疊（如1號評判人把1號陳述放進2號卡片疊；2號評判人把同樣一句陳述放進1號卡片疊；3號評判人也把它放進同2號卡片疊；4號評判人則把它放在3號卡片疊等）。

第五步：從評判人那裡收回卡片，製作一張表格，記錄他們的反

應。見下列表格範例。

評定每疊陳述的評判人數表

陳述	不支持			中立					支持			總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3	60	12	5	0	0	0	0	0	0	0	100
2	0	0	0	0	2	12	18	41	19	8	0	100
3	2	8	7	13	31	19	12	6	2	0	0	100
4	9	11	62	10	4	4	0	0	0	0	0	100

第六步：計算評判人的平均評分與同意程度。例如，1號問題的平均是2，所以同意度高；3號問題的平均接近5，同意度較低。

第七步：選出最後20句陳述，納入死刑意見量表。如果評判人意見一致，就選這句陳述（多數把一個問題放在同一疊或鄰近疊的卡片），並選出反映各種意見的問題，從支持到中立到不支持都要有。

第八步：準備一分20個問題的問卷，問研究的受訪者是否同意這些陳述。

來測量不同族群的成員彼此來往的意願。它能用來看人們對其他團體（如少數宗教團體或偏差團體）的感覺是近還是遠。

這個量表有個簡單的邏輯。人們會回應一系列排好次序的陳述；最具威脅性或社會距離最遠的團體在一端，威脅性較低或社會距離較親近的則在另一端。這個量表的邏輯假定一個人若拒絕接觸，或是不喜歡社會距離的項目，就會拒選社會親近的項目。

研究者用這個量表的方式有幾種。例如，人們接到一系列陳述：X團體的人進入你的國家，你住的市鎮裡，在你工作的地方上班，住在你家附近，成為你的朋友，和你的兄弟姐妹結婚。人們

被問到的問題是這樣的陳述是否讓他們感覺自在，或者接觸是否可以讓人接受。也可能是問他們是否對這種關係覺得不自在。人們面對的要求可能是回答所有的陳述，或者他們可以繼續讀陳述，直到他們對一種關係覺得不自在為止。陳述不需要編號；號碼通常是從五到九。

研究者可以用包氏量表看人們對一個外團體和別的外團體的感覺有多遠（見資訊箱7.9）。社會距離的量數不是當做自變項，就是當做依變項。例如，研究者相信，對具有某些特質的人來說，和一個團體的社會距離是最遠的。有個假設可能是白人對越南船民的社會距離感跟教育有負相關：也就是說，教育最差的感覺最疏遠。與船民之間的社會距離是依變項，教育多寡則是自變項。

社會距離量表是個方便的方法，可以判定受訪者對一個社會團體感覺有多親近。它有兩個局限。第一，研究者需要把範疇剪裁成一個特定的外團體與社會場景。第二，研究者不易比較對幾個不同團體的感覺，除非受訪者同時完成針對所有外團體的類似量表。當然，一位受訪者如何完成一份量表，和這個受訪者在某個社會情境中的實際行為可能有所出入。

❖ 語意差別（Semantic Differential）

語意差別是在1950年代發展出來的，為一個人對一個概念、物體或他人的感覺提供間接的量數。這個技術用形容詞測量對某事的主觀感覺。這是因為人們用溝通評估的方式是透過口語與書寫語言的形容詞。由於多數形容詞有兩極的相對語（如光明／黑暗、硬／軟、慢／快），它用兩極的相對形容詞製作評分的量數或分數。語意差別掌握任何與被評估事物相關的含意，為其提供相關的量數。

使用語意差別的目的很多。在市場研究中，它顯露消費者對一個產品的感覺；政治顧問用它發現選民對候選人或議題的看法；治療師用它判定客戶如何認知她自己。

資訊箱 7.9

包氏社會距離量表範例

研究者要知道大一新鮮人對來自兩個國家的交換學生的社會距離有多遠：奈及利亞與德國。她要知道學生對非洲國家，還是對歐洲學生的距離比較遠。她在訪問中用下面一系列問題：

你個人對哪個國家的交換學生感覺自在，請用是或否給我你的第一個反應：（國名）

- _____ 來你的學校訪問一個星期
- _____ 在你的學校註冊，成為正式學生
- _____ 選修幾門你也選修的課程
- _____ 上課時坐在你旁邊，跟你一起準備考試
- _____ 跟你住在同一棟宿舍同一層樓的隔壁房間
- _____ 跟你住在同一間寢室的同性學生
- _____ 約你出去的異性

假設的結果

	反應覺得自在的新鮮人百分比	
	奈及利亞	德國
訪問	100%	100%
註冊	98%	100%
同班	95%	98%
一起唸書	82%	88%
住在同棟宿舍	71%	83%
室友	50%	76%
約會	42%	64%

結果顯示對奈及利亞學生的距離比對德國學生還遠。幾乎所有學生對外國學生來訪、註冊與修課等覺得自在。距離的感覺在人際接觸增加時拉長，特別是如果接觸包括個人居住環境或並未直接與教室相關的活動。

研究者運用語意差別，向受試者提出一分成對的兩極形容詞，其間有7到11分的連續體。受試者在形容詞的連續體上點選表達他們感覺的形容詞。形容詞可以形形色色，應該充分混合（例如，正面的詞語不應該全放在右邊或左邊）。有關英語許多種形容詞的研究發現它們分成三種主要的意義類型：評估性（好／壞）、力量（強／弱）、活動（主動／被動）。在這三種意義當中，評估通常是最顯著的。結果的分析很困難，研究者需要用統計程序分析受試者對概念的感覺。

語意差別的結果告訴研究者一個人如何認知不同的概念，或是不同的人如何看同一個概念。例如，政治分析家可能發現年輕選民認為他們的候選人是傳統的、軟弱的、慢吞吞的，不好也不壞。在資訊箱7.10的範例中，一個人為兩個概念評分。每個概念的反應模式說明這個人對這些概念有什麼感覺。這個人對這兩個概念的觀感不同，看起來對離婚的想法是相當負面的。

有些技巧可用來製作三度空間的示意圖。這三個層面畫成三度的「語意空間」。在示意圖中，「好」在上面，「壞」在下面，「主動」在左邊，「被動」在右邊，「強」離視者較遠，「弱」離視者較近。

❖ 格特曼量表（Guttman Scaling）

格氏量表或累積量表（cumulative scaling）和先前的量表或指數不同，因為研究者在資料搜集之後，用它評估資料。這是說研究者必須用格氏量表技術設計其研究。格特曼（Louis Guttman）

資訊箱 7.10

語意差別的範例

請閱讀下列每對形容詞，然後在最接近你的第一印象感覺的空格畫記號。答案沒有對錯。

你對離婚這個想法有什麼感覺？

差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好
深刻	___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u> X </u>	淺
弱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強
公平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不公平
靜默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大聲
現代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傳統
簡單	___	___	___	___	<u> X </u>	___	___	___	複雜
快速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緩慢
骯髒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乾淨

你對婚姻這個想法有什麼感覺？

差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好
深刻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淺
弱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___	強
公平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不公平
靜默	___	___	<u> X </u>	___	___	___	___	___	大聲
現代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傳統
簡單	___	___	___	___	<u> X </u>	___	___	___	複雜
快速	___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___	緩慢
骯髒	___	___	___	___	___	<u> X </u>	___	___	乾淨

在1940年代發展出這種量表，判定一組指標或測量項目之間是否有一種關係。他用多重指標記錄潛在的單一向度，或是一個構念的累積強度。

格氏量表首先測量一組指標或項目。這些可以是問卷項目、投票或觀察到的特質。格氏量表測量許多不同的現象（如犯罪或吸毒的模式、社會或組織的特質、心理失調）。指標通常是用簡單的是／否或出現／未出現的方式測量。可以使用的指標從3到20個都有。研究者選擇項目的觀念是它們之間有一種邏輯關係。然後她把結果放在一個格氏表上，判定這些項目是否形成一種與其關係聲氣相通的模式。

一組項目測量過後，研究者隨即考量對這些項目的回應可能有組合。例如，測量的項目有三種：一名兒童是否知道她的年齡、她的電話號碼，以及三名贏得選舉的政治人物。這位小女孩可能只知道她的年齡，別的答案則一無所知，或者三個都不知道，或者只知道她的年齡與電話號碼。事實上，這三個項目的答案或回應模式的可能組合有八種，從三者都不知道到三者都知道都有。有一種數學方法可計算其組合數量（如23），但你也可以把這三個問題是或否的組合寫下來，看看這八種組合。

項目在格氏量表中的邏輯關係是等級式的。多數人與個案有較低次序的項目，或對較低次序的項目所見略同。少數具有高次序項目的個案也有較低次序的項目，但反之不同。換句話說，高次序項目立足於低次序項目之上。

格氏量表的一種應用稱為**量度圖分析**（scalogram analysis），是讓研究者測試項目之間是否有等級關係。例如，知道一名兒童的年齡比知道她的電話號碼容易，知道她的電話號碼比要她知道三名政治領袖的名字容易。如果等級模式存在，那麼這些項目就稱為可以**量度的**（scalable），或說能夠形成格氏量表。

反應的模式可以分成兩組：量度的與誤差（或非量度的）。兒童知識這個例子的量度模式如下：不知道任何一項、只知道年齡、

只知道年齡和電話號碼、三者都知道。其他的答案組合（如知道政治領袖的名字，卻不知道她的年齡）有可能，卻無法量度。如果項目之間有等級關係，那麼多數答案就符合可以量度的模式。

項目可以量度的強度或程度是用統計做測量，統計是測量反應可否根據等級模式而再製。零分表示隨機模式，或是沒有隨機模式。100分的分數顯示所有反應符合等級或量度的模式。另一種測量可量度性的統計法也有人提出。（關於使用格氏量表的範例，見資訊箱7.11）。

Clogg與Sawyer（1981）用格氏量表研究美國人對墮胎的態度，考量人們在哪些不同的環境下認為墮胎是可以接受的（如危及媽媽的健康、懷孕為強暴所致）。他們發現84.2%受訪者符合量表的反應模式。另一個用格氏量表的例子是McIver與Carmines（1981: 55-58）提出的，他們針對一條1975年建立消費者保護機構的法案，研究美國參議員的唱名投票。他們檢視該法案12條實質修正條款的投票，發現在92%的時間中，參議員投票呈現格氏量表的模式。

結論

在本章你學到量化與質化研究的原理與過程。所有的研究者都做概念化——或說是精煉或闡明他們的想法，把想法變成概念定義。所有的研究者都做操作化——或說是發展一組技術或過程，連結他們的概念定義與經驗現實。不過，質化與量化研究者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如何進行此一過程的途徑。量化研究者採取比較演繹的路徑，質化研究者則採取比較歸納的路徑。目標仍是一樣的：建立研究者的抽象觀念與經驗資料之間的連結。

你也學到所有研究者共信的信度與效度原理。信度指的是一個量數的可靠度或一致性；效度指的是它的真實性，或是它的構念與資料跟它契合的程度有多少。量化與質化風格的研究在他們如何理

資訊箱 7.11

格特曼量表範例

Crozat (1998) 檢視大眾對各種政治抗議的反應。他查看大眾對1974到1990年間英國、德國、義大利、荷蘭與美國大眾接受抗議形態程度的調查資料。他發現大眾的接受度形成一個格氏量表。接受較強烈抗議形態（如罷工與靜坐）的人士，幾乎總能接受比較溫和的形態（如請願或示威），但接受溫和形態的人士並不全然接受較強烈的形態。除了說明格氏量表的用處之外，Crozat發現不同國家的人民對抗議的看法類似，格氏量表可量度的程度隨時間而增加。由此觀之，接受抗議活動的模式在兩個時段都可以用格氏量表，但1990年的模式比1974年的模式更依循格氏量表模式。

	抗議形態				
	請願	示威	抵制	罷工	靜坐
格特曼模式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其他模式（純為範例）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是

解這些原理上大相逕庭。儘管如此，量化與質化研究者都試圖以一致的方式測量，兩者尋求他們瞭解社會世界所用之抽象觀念，以及真實的、經驗的社會世界發生諸事之間的緊密契合。此外，你看到量化研究者如何在製作指數與量表時應用測量的原理，你也讀到他們用的一些主要量表。

除了信度與效度的核心觀念之外，你現在知道優質測量的原理：為概念製作明確的定義，運用多重指標，並在適當時機，將資料加權並標準化。這些原理橫跨各種研究領域（如家庭、犯罪學、不平等、種族關係等），也橫跨許多研究技術（如實驗、調查等）。

現在你或許開始瞭解，一個健全的研究計畫是在每個研究的階段力求完善。即使研究計畫其他階段的進行方式無懈可擊，只要任何一個階段有嚴重錯誤或漫不經心，都可能對結果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重要名詞

輔助理論	外在效度	預測效度
包氏社會距離量表	表面效度	比率水平之測量
概念定義	格特曼量表	信度
概念假設	指數	代表信度
概念化	編碼者間信度	對應規則
同時效度	內在效度	量表
構念效度	區間水平之測量	語意差別
內容效度	比較判斷法則	折半法
連續變項	測量水平	穩定信度
輻合效度	李克特量表	標準化
效標效度	測量效度	統計效度
間斷變項	多重指標	次母體分析
區別效度	相互排除特性	測試與再測試法

實徵假設	名目水平之測量	賽斯通量表法
等值信度	操作性定義	單向度性
窮盡特性	操作化	效度
次序水平之測量		

問題回顧

1. 測量的三個基本環節是什麼？它們如何配合？
2. 信度與效度的差異是什麼？它們如何彼此互補？
3. 改善量數信度的方法有哪些？
4. 各種測量水平彼此有什麼差異？
5. 輻合、內容與同時效度的差異是什麼？
6. 為什麼多重指標通常比一個指標好？
7. 量表的邏輯與指數的邏輯之間的差異是什麼？
8. 為什麼單向度性是一個量表的重要特質？
9. 指數加權的優點與缺點是什麼？
10. 標準化如何使比較更容易？

CHAPTER 8

量化與質化抽樣

導論

非機率抽樣

隨意的、偶然的、便利抽樣

限額抽樣

立意或判斷抽樣

雪球抽樣

異例抽樣

按序抽樣

理論抽樣

機率抽樣

母體、元素、抽樣架構

為什麼要隨機？

機率抽樣的類型

隱藏性母體

樣本應該多大？

推論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抽樣是任何研究類型的主要問題。我們不能研究每一個我們有興趣的個案，我們也不應該如此。每個科學研究的事業都是研究幾個範例，嚐試發現某事，應用於某類事物的每件事上。就像我們所說的，研究的結果是「可以概括推論的」。

——Howard Becker, *Tricks of the Trade*, p.67.

導論

量化與質化研究者抽樣的途徑大相逕庭。多數有關抽樣的討論，多半來自量化方式的研究者。他們的根本目標是獲得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或從比較大的群體或母體中抽取一些單位或個案，如此研究者可以研究較小的群體，對較大的群體做出正確的推論。研究者將焦點集中在可以得出較具代表性樣本的技術（例如，非常類似母體的樣本）。量化研究者常用的抽樣方法是根據數學的機率理論，這叫**機率抽樣**（probability sampling）。

研究者使用機率或隨機抽樣，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時間與成本。如果執行妥當，樣本所得到的結果只耗費1%的成本與時間。例如，研究者可以抽出一分2000人的樣本，而非搜集2千萬人的資料；從這2000人的樣本所得到的資料，等於2千萬人的樣本所得的資料。使用機率抽樣的第二個目的是正確性。一個設計完善的、小心執行的機率樣本所產生的結果，即使不會比企圖接觸母體中每個人所得的資料更正確，也將不分軒輊。普查通常是試圖把每個人都算進去。在1990年，美國普查局（Census Bureau）試圖把國內每個人都算進去，但若它能使用非常專門的統計抽樣，結果會更正確。

質化研究者不太專注於一個樣本的代表性或抽取機率樣本的細部技巧。他們反而是專注於一個樣本或一小群個案、單元，或活動如何闡釋社會生活。抽樣的根本目的是搜集能夠澄清、深化瞭解的特定個案、事件或行動。質化研究者關心的是找出個案，用這些個案增進其他研究者所知道的某種社會生活過程。因此，質化研究者總是用第二種抽樣搜集資料：非機率抽樣。

非機率抽樣

質化研究者鮮少從一群個案中抽取一個代表性的樣本，再來密

集研究抽取到的樣本——這卻是量化研究的目的。對質化研究者來說，「從被研究的人當中挑選出研究對象的方式，取決於他們與研究主題的關聯性，而非他們的代表性」(Flick, 1998: 41)。質化研究者總是使用非機率或非隨機抽樣。這就是說，他們不太預先決定樣本數，對樣本的團體或母體的所知有限。量化研究者根據數學理論，使用預先計畫的研究途徑。質化研究者則是逐漸挑選個案，並根據個案的內涵，決定是否選擇個案。表8.1展示的是各種非機率抽樣技巧。

隨意的、偶然的、便利抽樣

隨意抽樣產生沒有效果的、非常沒有代表性的樣本，這裡並不推薦使用。研究者隨便抽取幾個方便選擇的個案，她就很容易得到一個嚴重錯表 (misrepresent) 母體的樣本。這種樣本既便宜，很能很快得到；然而，容易發生的系統性誤差，使它們比沒有樣本還糟糕。電視節目的街頭訪問，就是一種隨意抽樣。電視的訪問者帶攝影機和麥克風上街，跟幾個方便訪問的人說話。白天經過攝影棚的人不能代表每一個人（如家庭主婦、鄉下人）。而且，電視的訪

表8.1 非機率抽樣的類型

抽樣類型	原理
隨意	抽取任何方便抽取的個案
限額	採用隨意法，在預先決定好的類別中抽取定數的個案，個案的類別要反映出母體的多樣性。
立意	採用各種方法，抽取所有符合特定標準的個案。
雪球	根據一個或幾個個案的轉介，抽取樣本，再從轉介的個案那裡抽取轉介的個案。
異例	抽取與眾不同的個案（一種特殊的立意抽樣）。
按序	一直抽取樣本，直到沒有別的資訊或新的特質為止（通常與其他抽樣法並用）。
理論	抽取的個案有助於展現某一背景 / 主題在理論上重要的特質。

問者常常選擇他們覺得看起來「正常」的人，避開沒有吸引力的人、窮人、很老的人或結結巴巴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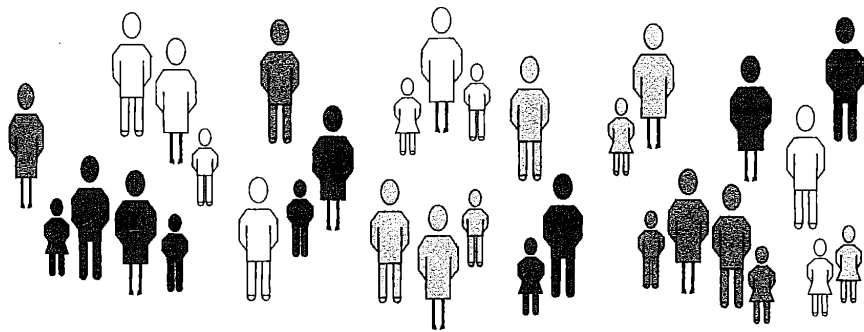
另一個隨意抽樣的例子，就是報紙請讀者把問卷從報紙上剪下寄回。並不是每個人都會讀到這分報紙，對這個主題有興趣，或是花時間把問卷剪下寄回。有些人會這麼做，人數看起來很多（如5千人），但這個樣本並不能正確地推論到母體。這種隨意樣本或許有娛樂價值，但它們給我們的是扭曲的觀點，嚴重地錯表母體。

限額抽樣（Quota Samp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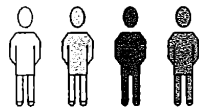
限額抽樣是隨意抽樣的改進。研究者使用限額抽樣的時候，首先找出相關的人群類別（如男性與女性，或是30歲以下、30歲到60歲、60歲以上等），然後決定每個類別要有多少人。這樣一來，樣本中不同類別的人數就固定下來。例如，研究者決定選出30歲以下的男性、女性各5名，30歲到60歲的男性與女性各10名，60歲以上的男性與女性各5名。它很難正確代表所有母體的特質（參閱圖8.1）。

限額抽樣之所以是改進，乃因研究者能夠確定樣本中有些差異。在隨意抽樣中，所有接受訪問的人可能是同齡、同性別或同種族的人。可是，一旦限額樣本固定類別與各類別中的人數，她就是使用隨意抽樣。例如，研究者訪問頭5名她遇到的30歲以下男性，即使這5個人只是剛好走出候選人的競選總部。這不但可能是一種錯表，因為隨意抽樣是用在類別之中，這也無法防止研究者選擇「行為友善」的人，或想要接受訪問的人。

另一個抽樣的歷史說明限額樣本的局限。蓋洛普（George Gallup）的美國民意調查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使用隨意抽樣，成功預測1936年、1940年與194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但在1948年，蓋洛普猜錯勝選的候選人。這個錯誤的預測有幾個原因（例如，許多投票者尚未決定，訪問結束太早），但主因是限額的類別並未正確代表所有地理區域和所有確實投票的人。



在街上30名成年人與兒童中選擇10人做樣本。



四名成年男性



四名成年女性



一名男童



一名女童

圖8.1 限額抽樣

立意或判斷抽樣（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立意抽樣是特殊情況下可以接受的一種抽樣。它是專家選擇個案時運用判斷，或者說專家選擇個案時，內心有特殊的目的。如果它是用來挑選「一般的家庭主婦」或「代表性的學校」的，這樣並不妥當。若使用立意抽樣，研究者永遠不知道挑選的個案是否代表母體。它是用於探索性研究或實地研究。

立意抽樣適用於三種情況。第一，研究者用它挑選可以提供許多資訊的獨特個案。例如，研究者要用內容分析研究雜誌，找出文化主題。她就挑選一個廣受歡迎的女性雜誌來研究，因為它引領趨勢。

第二，研究者可以用立意抽樣挑選難以接觸到的、特殊的母

體。例如，研究者要研究妓女，她不可能列出所有妓女的名單，然後從中隨機抽樣，而是運用主觀的資訊（例如，妓女拉客的地方、與妓女來往的社會團體等）和專家（例如，在刑事單位工作的警察、別的妓女等），找出一個妓女的「樣本」，收入研究計畫之中。研究者用許多不同的方法，鑑識出個案，因為她的目的是盡可能尋找最多的個案。例如，Harper（1982）在70年代對美國妓女與流浪漢所做的實地研究，就是和「專家」做朋友（如妓女），和他們住在火車和髒亂的街區上。這個特殊的母體不一定要從事非法的活動。例如，McCall（1980）在聖路易市找出31個藝術家的方法，是跟一個朋友詢問其他藝術家的訊息，並參加一個當地的藝術組織。

另一個立意抽樣的狀況，就是研究者要找出特別的個案類型，再做深入研究。這種目的不是要推論到較大的母體，而是要對對象有比較深入的瞭解。例如，Hochschild密集訪問28個人，談他們的信仰問題。她選擇某些人，是因為他們的低收入，選擇另一些人，是因為他們的高收入。她選擇某些人，因為她們是女的。選擇另一些人，因為他們是男的。

顯然我們不能從這種樣本安全地推論到全國的人口：例如，如果我要指出我的樣本中有多少百分比需要政府更多或更少的服務，這是沒有價值的……密集訪談是一種激發看法、變異與矛盾的方法，之後可以把它們形式化，變成假設，可用量化的社會科學方法測試。（1981: 23-24）

Useem（1984）研究企業菁英的政治影響力，用的是限額與立意抽樣。他訪問72位主要英國企業的董事和57位美國大企業的主管。他選擇的樣本包括美國與英國的企業，也包括一些同時擔任多家企業董事的人士。此外，他依據產業與規模比對各個企業，並且限定地點，以便減少旅行成本。

Gamson（1992）研究勞工階級對政治的想法，是用立意抽

樣，建立焦點團體（focal groups，第十章討論焦點團體）。Gamson要188名勞工參加37個焦點團體中任何一個團體。他尋找沒有完成大學學業，但年齡、族裔、宗教、政治興趣、職業類型形形色色的人。他到波士頓附近35個地區，在文化活動、野餐、展覽會和跳蚤市場等地點的公布欄張貼公告，徵求研究對象。除了解釋研究之外，受訪者可以得到報酬，藉此吸引不習慣參與研究的人。

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

社會研究者通常對人或組織之間互連的網絡有興趣。這種網絡可能是全世界研究同一個問題的科學家、一座中型城市的菁英、一群組織犯罪家族的成員、主要企業與銀行的董事會成員，或大學校園裡彼此有過性經驗的人士。重要的特質是每個人或單位之間透過直接或間接的聯繫而連結起來。這並不是說網絡中每一個人直接認識、彼此交往，或是受到彼此影響。相反地，它說的是就整體而言，透過直接與間接的連結，大多數人都在一個互聯的網絡內。

例如，Sally與Tim彼此並不認識對方，但兩人都有Susan這個好朋友，因此他們有間接的連結。三個人都是一個友誼網絡的成員。研究者呈現這種網絡的方法，就是畫一個社會測量圖（sociogram）——各個圓圈透過直線相連的圖。每個圓圈代表一個人或單位，直線代表友誼或其他連結（見圖8.2）。

雪球抽樣（也稱為網絡抽樣、連鎖轉介抽樣，或聲望抽樣 network, chain referral, or reputational sampling）是在網絡中辨識並抽樣（或選擇）個案的方法。它是以雪球做比喻，雪球剛開始小小的，但是在濕淋淋的雪上滾動，黏到更多的雪，變得越來越大。雪球抽樣是多階段的技巧。它從一個或少數的人或個案著手，然後根據開頭個案的連結而散佈開來。

例如，研究者探討一個社區中青少年之間的交友網絡。她從三個彼此不認識的青少年開始。每個青少年指名四個好友。然後研究者去找這四個朋友，要他們再指名四個好友，以此類推。這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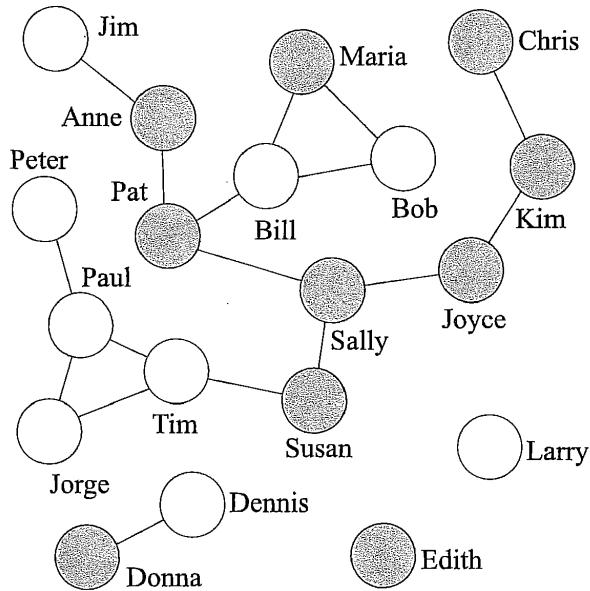


圖8.2 友誼關係的社會測量圖

來，許許多多人就牽連在一起。樣本中的每個人都直接或間接與原先的青少年相關，有些人指名的可能是同一個人。研究者最後停下來，不是因為沒有人給新的名字，從而顯示一個閉鎖的網絡，就是因為網絡太大，超過她能夠研究的範圍。這個樣本包括的人是網絡中至少有一個人指名為好友的人。Ostrander採用雪球抽樣，研究36個上層階級的婦女：

每次訪問結束的時候，我要求該婦女「在你的社交團體中指出一個背景跟你類似，而且願意跟我談談的婦女。」這種接觸受訪者的實用方式既有理論的，也有方法論的優點……轉介給我的婦女被她們的階級同儕視為這個階級的代表；因此，我沒有和迥異於上層階級生活規範的婦女談過。但我最感興趣的是「讓人可以接受的」人，因為我要知道既定的規範和什麼叫讓人可以接受。（1984: 9, 11）

異例抽樣 (Deviant Case Sampling)

研究者使用異例抽樣，也稱為**極端個案抽樣 (extreme case sampling)**，是要找出和主要模式大異其趣的個案，或者和其他個案主要特質迥然不同的個案。這種抽樣和立意抽樣類似，是由研究者使用各種技術，找出具有特定性質的個案。異例抽樣跟立意抽樣不同之處，它的目標是找出一群非比尋常的、大異其趣的，或與眾不同的個案，而這些個案並不代表整個母體。異例之所以挑選出來，是因為它們非比尋常，也因為研究者希望多瞭解社會生活，這就要考量一般模式之外的個案，或者包容主流事件之外的個案。

例如，研究者想要研究高中退學生。假定先前的研究指出，大多數退學生的家庭是低收入戶，是單親家庭或不穩定的家庭，四處搬家，而且是少數種族。家庭環境是父母與 / 或兄弟姐妹教育程度較低，或者他們本身就是退學生。此外，退學生經常參與非法行為，退學前有犯罪記錄。使用異例抽樣的研究者就會尋找多數沒有非法活動記錄的退學生，尋找父母雙全、所得中上、居家穩定、家庭教育良好的退學生。

按序抽樣 (Sequential Sampling)

按序抽樣類似立意抽樣，只有一點不同。研究者使用立意抽樣，是想盡可能找到最多相關的個案，直到時間、資金，或者她的精力耗盡為止。其原理是抽出每個可能的個案。研究者使用按序抽樣，則是繼續搜集個案，直到新的資訊量或個案的差異性充足為止。其原理是搜集個案，一直到飽和點。用經濟的術語來說，資訊要搜集到邊際效用或額外個案的增量利益持穩或大幅下降為止。它要求研究者持續評估所有搜集到的個案。例如，研究者尋找60位70歲以上，並且10年以上沒有配偶的寡婦，並計畫做深度訪談。此時再找另外20位生活經驗、社會背景、世界觀與前60位大同小異的寡婦，可能並不必要，但這要看研究者的目的而定。

理論抽樣 (Theoretical Sampling)

在理論抽樣中，研究者抽取的樣本（例如，人、狀況、事件、時間等）是研究者發展**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時，仔細挑選的。逐漸增長的理論興趣引導樣本個案的挑選。研究者根據個案可能提供的新看法而挑選個案。例如，田野研究者可以在週一到週五觀察一個地點和一群人。理論上，研究者可以問這些人在其他時間或地點的某些層面改變的時候，是否還是一如往常。然後她可以在其他時間抽樣（例如，夜晚與週末），獲得更完整的瞭解，並得知重要的環境是否一如往常。

機率抽樣

一組特殊的字彙或術語已經隨機率抽樣所使用的術語而發展起來。在探討機率抽樣之前，溫習它的語言是很重要的。

母體、元素、抽樣架構

研究者從一大群個案或元素中抽取樣本。**抽樣元素**（sampling element）是母體中的分析單元或個案。它可以是一個被測量的人、團體、組織、一份書寫的文件或符號訊息，甚至是社會行動（例如，逮捕、離婚或親吻）。這一大群個案就是母體，在抽樣中有重要的角色。有時候普遍性（universe，第六章有定義）這個術語和母體交互使用。研究者說明要抽樣的單位、所在地，以及母體的時間界限，由此界定母體。看看（資訊箱8.1）的母體範例。所有的範例包括要抽樣的元素（例如，人、事業、住院許可、廣告等）、地理與時間的界限。

研究者首先想到母體（如一座城市的人），但更精確地界定。**目標母體**（target population）一詞是指她要研究的特定個案集合。樣本數與母體數量的比率叫做**抽樣比**（sampling ratio）。例

資訊箱 8.1

母體範例

1. 所有於1989年12月2日住在澳洲的16歲以上人口，但沒有坐牢、沒有在庇護所和類似機構。
2. 1994年7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雇用員工人數超過100人的商業機構。
3. 在1988年8月1日和1993年7月31日之間，所有住進紐澤西州公立醫院的病患。
4. 1999年11月1日到25日，東部標準時間早上7點到晚上11點美國主要電視台播放的廣告。
5. 在1950年1月1日到現在之間獲得醫學學位，並且目前在美國執業的醫生。
6. 1992年間，所有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與華盛頓州西雅圖都會地區的美國男性黑人海洛因毒癮犯。

如，母體有5萬人，研究者從中抽出150人。如此抽樣比就是 $150/50,000 = 0.003$ 或0.3%。如果母體是500，研究者抽出100個樣本，那麼抽樣比就是 $100/500 = 0.20$ 或20%。

母體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某段時間既有一群人，那麼母體怎麼會是抽象的概念？除了特定的小母體之外，從沒有人能夠真的把母體凍結起來測量。例如，在一座城市，隨時都有人死亡，有些人上飛機或下飛機，有些人正駕車跨越城市界線。研究者必須決定要把誰算進去。一旦時間固定下來，她應該把剛好出城渡假的城市居民算進去嗎？時間固定的時候，剛好住在這座城市飯店裡的觀光客算不算？她應該把成人、兒童、坐牢的人、住院的人算進去嗎？一個母體，即使是1999年3月1日早上12時1分，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內所有18歲以上的人，也是抽象的概念。它在我們的心中，不

可能具體瞄準。

由於母體是抽象的概念，因而除了少數極小的專門母體之外（如教室裡所有的學生），研究者需要估計母體大小。母體這個抽象的定義需要操作型定義。這個過程就像為測量的構念發展操作型定義一樣。

研究者將母體操作化的方式，是開列一份名單，列出所有極似母體中所有元素的特性。這份名單就是**抽樣架構**（**sampling frame**）。她可以從許多抽樣架構中挑選：電話簿、報稅記錄、駕駛執照記錄等。把母體中所有的元素列出，聽起來簡單。但通常很困難，因為母體的元素可能沒有一份好名單。

好的抽樣架構對好的抽樣是很重要的。抽樣架構與概念上界定的母體搭配不當，可以是主要的誤差根源。一個變項的理論與操作型定義搭配不當會造成無效的測量，抽樣架構與母體搭配不當，也會造成無效的抽樣。研究者嚐試將搭配不當最小化。例如，你想要從美國某區域的人當中抽樣，你決定拿到一份所有持駕照者的名單。但是，有些人沒有駕照，即使持駕照者的名單經常更新，也很快就過時。接下來，你想拿到所得稅記錄。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報稅；有的人逃稅，有的人沒有收入，不必報稅；有的人死亡；有的人還沒開始報稅；還有人上次報稅之後就遷入或移出。你試用電話簿，但它們好不到哪裡去；有些人沒電話；有些人有電話，卻沒列上去；有些人剛搬走。除了少數例外（例如，所有註冊入學的大學生），抽樣架構總是不正確的。抽樣架構可能包括目標母體之外的個案（如電話簿列有已經遷出者的電話號碼），或者可能省略掉應該包括在母體中的個案（如沒有電話的人）。

母體的任何特質（城市居民抽煙的百分比、所有21歲以上婦女的平均身高、相信幽浮者的百分比）是母體的**母數**（**parameter**）。它是母體真正的特性。母體中所有元素測量之後，母數就確定了。就大的母體而言，母數永難百分之百確定（如整個國家），所以研究者必須根據樣本來推估母體。他們運用樣本的資

訊，即**統計值**（statistic），來推估母體的母數（參閱圖8.3）。

抽樣史上一個著名的個案說明這個技巧的局限。《文學精萃》（*Literary Digest*）這分主要的美國雜誌在美國1920年、1924年、1928年、1932年總統大選前寄明信片給民眾。這家雜誌從汽車登記與電話簿抽取名字做樣本——抽樣架構。人們回信說明他們要投票給誰。這家雜誌成功地預測四次大選結果。這家雜誌預測成功，也是眾所周知的。1936年，這家雜誌將樣本數擴大到1千萬人，預測藍頓（Alf Landon）會大勝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但《文學精萃》這次猜錯了；羅斯福大獲全勝。

這個預測錯誤有幾個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抽樣的錯誤。雖然這家雜誌從一大群人中抽樣，它的抽樣架構並未正確代表其目標母體（如所有投票者）。它排除了沒有電話和汽車的人，但在1936年，亦即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最糟糕的時候，這群人在母體中卻占有極高的百分比。這個架構排除的母體最高達65%，也排除可能支持羅斯福的投票人口（低收入戶）。這家雜誌稍早的選舉預測能夠正確無誤，乃因收入較高與較低的人在投票上沒什麼差別。還有，在大蕭條之前的選舉，許多低收入戶還可以負擔電話與汽車的費用。

從《文學精萃》的錯誤中，你可以學到兩個教訓。第一，抽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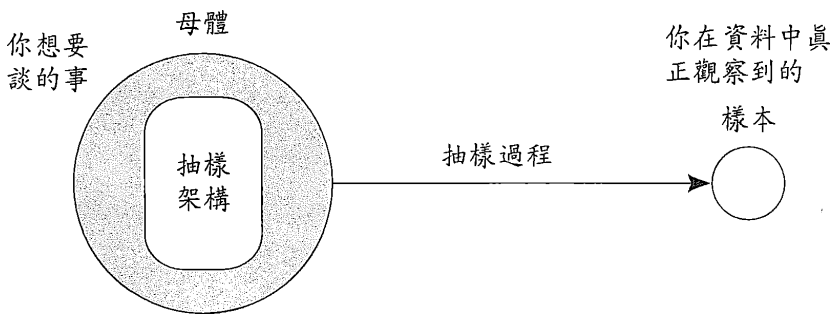


圖8.3 抽樣邏輯的模型

架構舉足輕重。第二，樣本數還沒有樣本是否正確代表母體那麼重要。比起為數1千萬或5百萬的非代表性樣本，一個為數2,500的代表性樣本更能正確預測美國人口的動向。

為什麼要隨機？

應用數學中稱為機率抽樣理論的領域是倚賴隨機抽樣。隨機這個詞在數學中有特殊的意義。它指的是促成數學上隨機結果的過程；也就是在真正隨機方法（沒有模式）中運作的選擇過程，研究者能夠計算結果出現的機率。在真正的隨機過程中，每個元素都有同等的機率被選中。

倚賴隨機過程的機率抽樣需要的工作比非隨機抽樣還多。研究者必須找出詳細的抽樣元素（例如，人），納入樣本之中。例如，如果進行電話調查，研究者需要打四到五次電話，連繫到某個抽樣到的人，才能得到正確的隨機樣本。

隨機抽樣最可能得到真正代表母體的樣本。此外，隨機抽樣讓研究者用統計計算樣本與母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抽樣誤差**（**sampling error**）的大小。抽樣誤差的非統計式定義，就是抽樣結果與母體母數之間因隨機過程而有的差異。

本章並未涵蓋隨機抽樣的技術與統計細節。相反地，它集中在抽樣如何運作的根本、好樣本與壞樣本之間的差異、如何抽取樣本，以及抽樣在社會研究中的基本原理。這不是說隨機抽樣不重要。重要的是先掌握根本。如果你計畫未來的研究生涯要做量化，你應該先具備較多的統計背景知識，這裡的空間並不允許。

機率抽樣的類型

❖ 簡單隨機（Simple Rand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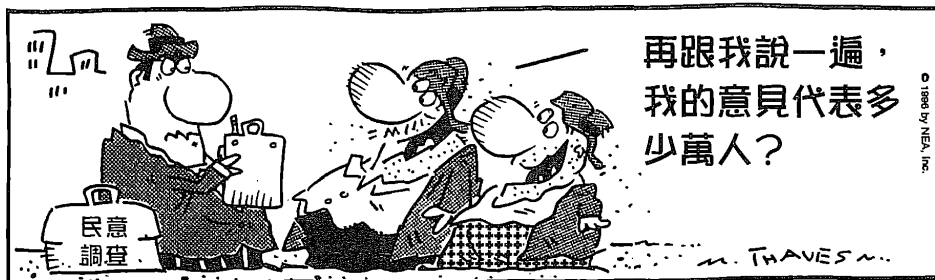
簡單隨機抽樣是最容易瞭解的隨機抽樣，也是其他隨機抽樣建構模型的根本。研究者透過簡單隨機抽樣，發展正確的抽樣架構，

根據數學的隨機程序，挑選元素，然後找出納入樣本的正確元素。

研究者把抽樣架構中所有的元素編號之後，再用一組亂數決定要挑選哪些元素。只要有多少元素，她就需要多少亂數；例如，樣本數有100個，亂數就需要100個。研究者可以從亂數表（random-number table）中挑選亂數，亂數表是用數學的隨機法選出來的。亂數表在許多有關統計與研究方法的書中都可以找到，包括本書在內（參閱附錄B）。亂數是透過隨機抽樣的過程產生的，這樣任何數字出現在任何位置的機會都是平等的。電腦程式也能產生亂數表。

你或許會問：一旦我從抽樣架構中挑出一個元素，我要把它放回抽樣架構還是放在一邊？通常答案是不要放回去。無限制的隨機抽樣是有替代的隨機抽樣——也就是說，抽出一個元素之後再放回去，這樣它才會再次被挑到。若是沒有替代的隨機抽樣，研究者就忽略已經挑入樣本的元素。

簡單隨機抽樣的邏輯可以用一個基本的例子來說明——從一個罐子裡的彈珠抽樣。我有一個裝滿5,000個彈珠的大罐子，有些是紅的，有些是白的。這5,000顆彈珠就是我的母體，我要估計的母數則是其中紅色彈珠的百分比。我要隨機選出100顆（我閉上眼睛，把罐子搖一搖，然後重複這個程序100次）。我現在有一個彈珠的隨機樣本。我數數看樣本中紅色彈珠的數目，估算紅色彈珠相



來源：Bob Thaves 授權使用。

對於白色彈珠，在母體中占多少百分比。這遠比數完5,000個彈珠要簡單多了。我的樣本有52顆白色彈珠，48顆紅色彈珠。

這是不是說母體母數就是48%的紅色彈珠？或許不是。由於隨機抽樣之故，我這個樣本也許不精確。我可以把這100顆彈珠放回罐子裡去，把彈珠混雜一番，然後再次抽出100顆彈珠，測試我的結果。第二次的結果是我的樣本裡有49顆白色彈珠與51顆紅色彈珠。問題來了。哪一個結果是正確的？如果從同樣的母體中抽取的樣本得到不同的結果，那麼這種隨機抽樣有什麼好處？我一次又一次重複這種程序，直到我抽出130個樣本，每個樣本都有100顆彈珠為止參閱（資訊箱8.2）所列的結果。多數人可能會把彈珠倒出來，把5,000顆彈珠一一數完，但我要看是怎麼回事。我的130個樣本的結果有一個明顯的模式。最普通的紅白色彈珠組合是50/50。最接近這種對比的樣本出現次數遠比不均衡對比的樣本還多。母體母數似乎是50%的白色彈珠與50%的紅色彈珠。

數學證明與經驗測試顯示資訊箱8.2的模式一直出現。許多不同樣本的組合就是我的**抽樣分配**（sampling distribution）。它是不同樣本的分配，這些樣本顯示許多分次隨機抽樣不同的抽樣結果。如果樣本數是1,000，而非100，這種模式還會出現；如果彈珠顏色有10種，而非2種；如果母體有100顆彈珠或1,000萬顆彈珠，而非5,000顆彈珠；還有，如果母體是人、汽車或大學，而非彈珠。事實上，如果在母體中所做的獨立隨機抽樣越來越多次，這種模式會越來越明顯。

抽樣分配中的模式顯示，在多次分立的樣本中，真正的母體母數（如前述範例的50/50比例）比其他任何結果更常見。有些樣本偏離母體母數，但較不常見。許多不同樣本畫成資訊箱8.2的示意圖時，抽樣分配看起來就像常態或鐘形曲線。這種曲線在理論上很重要，也是統計從頭到尾都在用的。

數學中的**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告訴我們，抽樣分配中不同隨機樣本的數目增加到無限大，樣本與母體母數的模

式就更容易預測。只要隨機樣本的數目很大，抽樣分配就會形成常態曲線，只要樣本數增加，曲線的中點就越接近母體母數。

或許你只要一個樣本，因為你沒有時間或精力抽許多樣本。你並不是少數。研究者鮮少抽許多樣本。她通常只抽一個隨機樣本，但中央極限定理讓她可以從一個樣本推論母體。這個定理跟許多樣本有關，但它讓研究者計算某一樣本偏離母體母數的機率。

隨機抽樣並不保證每個隨機樣本完全代表母體。相反地，它的意思是多數隨機樣本多半接近母體，我們可以計算某一樣本不正確

資訊箱 8.2

抽樣分配範例

紅	白	樣本數目
42	58	1
43	57	1
45	55	2
46	54	4
47	53	8
48	52	12
49	51	21
50	50	31
51	49	20
52	48	13
53	47	9
54	46	5
55	45	2
57	43	1
Total		130

從一罐5,000顆彈珠中隨機挑出的紅色彈珠與白色彈珠數目，每次抽100個，重複執行130次獨立隨機抽樣。

樣本數目

31									*										
30									*										
29									*										
28									*										
27									*										
26									*										
25									*										
24									*										
23									*										
22									*										
21								*	*										
20								*	*	*									
19								*	*	*									
18								*	*	*									
17								*	*	*									
16								*	*	*									
15								*	*	*									
14								*	*	*									
13								*	*	*	*								
12							*	*	*	*	*								
11							*	*	*	*	*								
10							*	*	*	*	*	*							
9							*	*	*	*	*	*	*						
8						*	*	*	*	*	*	*	*	*					
7						*	*	*	*	*	*	*	*	*	*				
6						*	*	*	*	*	*	*	*	*	*	*			
5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	*	*	*	*	*	*	*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樣本中的紅色彈珠

的機率。研究者估算某一樣本偏離或不代表母體（如樣本誤差）的方式，是運用樣本的資訊，估算抽樣分配。她結合這些資訊和中央極限定理的知識，建立**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

信賴區間是相當簡單，卻強而有力的觀念。電視或報紙報導民調結果的時候，你會聽到誤差為正或負2%之類的詞語。這就是一種信賴區間。信賴區間是用某個點估算母體母數的**全距**（range）。用全距是因為隨機過程的統計不容許研究者預測一個確定的點，但容許研究者說真正的母體母數落在一個固定全距時，可有相當高的信賴區間（如95%）。

抽樣誤差或信賴區間的計算不在此處討論範圍之內。抽樣分配是讓研究者計算抽樣誤差與信賴區間的主要觀念。因此，她不能說：「樣本完全測量到母體母數。」卻能說：「我可以95%肯定真正的母體母數跟我在樣本中發現的母數差距不到2%。」

例如，我不能說：「根據隨機抽樣，罐子裡有2500顆紅色彈珠。」我可以說：「我可以95%肯定母體母數落在2450與2550之間。」我可以結合樣本的各种特質（如它的大小、其中的變異）和中央極限定理，有相當的信心來預測母數的全距。

❖ 系統性抽樣

系統性抽樣（Systematic Sampling）是走隨機選擇的捷徑，做簡單隨機抽樣。第一步還是把抽樣架構中每一個元素編號。研究者不用亂數表，而是計算**抽樣間距**（sampling interval），這個間距就成為她的準隨機選擇法。抽樣間距（如 $1/k$ ， k 則是某個數目）告訴研究者如何在選擇一個元素做樣本之前，跳選抽樣架構中的元素。

例如，我要從900個名字中抽出300個名字。開始先隨機挑出一個名字，然後每隔3個就抽一個，得到一個300個名字的樣本。我的抽樣間距是3。抽樣間距很容易計算。我需要樣本數與母體數量（或是用抽樣架構做最佳估算）。你可以把抽樣架構當做抽樣比

的倒數。在900個名字中抽出300個名字的抽樣比是 $300/900 = 0.333 = 33.3\%$ 。抽樣間距則是 $900/300 = 3$ 。

簡單隨機抽樣和系統性抽樣得到的結果幾乎完全相同。只有一種重要的狀況是不能用系統性抽樣代替隨機抽樣的，那就是樣本中的元素是以週期的模式組織而成的。例如，研究者的抽樣架構是由男先女後的已婚夫妻組成的（參閱表8.2）。像這樣的模式，如果用系統性抽樣，會給研究者沒有代表性的樣本。她的系統性樣本不具有代表性，也因為個案的組織方式而只包括妻子。她的抽樣架構若是由夫妻組成，偶數的抽樣間距就會得出都是先生或都是妻子的樣本。

表8.2 系統性抽樣用在週期資料上的問題

個案	
1	丈夫
2a	妻子
3	丈夫
4	妻子
5	丈夫
6a	妻子
7	丈夫
8	妻子
9	丈夫
10a	妻子
11	丈夫
12	妻子

隨機開始的號碼=2；抽樣間距=4。

a是指選入樣本。

表8.3舉例說明簡單隨機抽樣與系統性抽樣。注意每個樣本抽出來的名字不一樣。例如，H. Adams在兩個樣本中都出現，但C. Drouillard只出現在簡單隨機樣本之中。這是因為任何兩個隨機樣本

鮮少雷同。

抽樣架構中包含20名男性與20名女性（性別在每個名字後面的括弧中）。簡單隨機抽樣得到3名男性與7名女性，系統性抽樣得到5名男性與5名女性。這是不是說系統性抽樣比較正確？不是。要檢查看正不正確，可用不同的亂數，抽出新的樣本；試挑前兩位數，從後面開始（例如，挑選11921的11，挑選43232的43）。也可以從另一個不同的隨機號碼開始，抽出新的系統性樣本。上一次隨機開頭的號碼是18。這次試試11。你發現什麼？兩性各有多少人？

❖ 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

研究者用分層抽樣，首先根據補充的資訊，把母體分成幾個次母體（subpopulations）層（strata）。把母體分成數個層次之後，

表 8.3 如何抽取簡單隨機與系統性樣本

1. 依序將抽樣架構中每個個案編號。這份40個名字的名單是依字母從1號到編到40號。
2. 決定樣本數。我們要抽出兩個25%（10個名字）的樣本。
3. 若用簡單隨機抽樣，就找出亂數表（見摘要，完整的亂數表，參閱附錄B）。使用亂數表之前，計算樣本所需的最大位數（例如，40個名字需要二位數；100到999個名字需要三位數；1000到9999個名字需要四位數）。從亂數表任何一個地方開始（我們從左上角開始），取出一組位數（我們選最後兩位數）。把抽樣架構中與選擇的亂數相對的號碼圈記為樣本的個案。如果號碼太大（超過40），放棄不要。如果號碼出現的次數超過一次（10與21在範例中出現兩次），就不要第二次。繼續下去，直到樣本的個案數目達成為止（我們的例子是10個）。
4. 若用系統性抽樣，首先隨機選一個號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閉眼隨便在亂數表上用手一指，然後挑出抽樣架構中最接近的號碼。在我們的範例中，18是被挑中的。從這個隨機號碼開始，計算抽樣間距，或用我們範例中的4，挑選第一個號碼。把它圈起來，然後依抽樣間距，挑選下一個號碼。數到名單後面。再從後面依抽樣間距數回來（像繞圈圈一樣），好像名單開頭接著名單後面一樣。如果抽樣間距剛好平分抽樣架構的總數，就繼續數下去，直到結尾接近開頭，或是回到開頭為止。

編號	姓名(性別)	簡單		編號	姓名	簡單	
		隨機	系統性			隨機	系統性
01	Abrams, J (男)			21	Hjelmhaug, N (男)	是*	
02	Adams, H. (女)	是	是(6)	22	Huang, J. (女)	是	是(1)
03	Anderson, H (男)			23	Ivono, V. (女)		
04	Arminond, L. (男)			24	Jaquees, . (男)		
05	Boorstein, A. (男)			25	Johnson, A. (女)		
06	Breitsprecher, P. (男)	是	是(7)	26	Kennedy, M. (女)		是(2)
07	Brown, D. (女)			27	Koschoreck, L. (女)		
08	Cattelino, J. (女)			28	Koykkar, J. (男)		
09	Cidoni, S. (男)			29	Kozlowski, C. (女)	是	
10	Davis, L. (女)	是*	是(8)	30	Laurent, J. (男)		是(3)
11	Drouillard, C. (男)	是		31	Lee, R. (女)		
12	Durette, R. (女)			32	Ling, C. (男)		
13	Elsnau, K. (女)	是		33	McKinnon, K. (女)		
14	Falconer, T. (男)		是(9)	34	Min, H. (女)	是	是(4)
15	Fuerstenberg, J. (男)			35	Moini, A. (女)		
16	Fulton, P. (女)			36	Navarre, H. (男)		
17	Gnewuch, S. (女)			37	O'Sullivan, C. (男)		
18	Green, C. (男)		開始 是(10)	38	Oh, J. (男)		是(5)
19	Goodwanda, T. (女)	是		39	Olson, J. (男)		
20	Harris, B. (男)			40	Ortiz Garcia, L. (女)		

亂數表摘要(簡單隨機抽樣用)

15010	18590	00102	42210	94174	22099
90122	38221	21529	00013	04734	60457
67256	13887	94119	11077	01061	27779
13761	23390	12947	21280	44506	36457
81994	66611	16597	44457	07621	51949
79180	25992	46178	23992	62108	43232
07984	47169	88094	82752	15318	11921

*在選擇的亂數中出現兩次的號碼。

研究者從每個次母體抽出一個隨機樣本。她可以用簡單隨機或系統性抽樣在各分層中隨機抽樣。研究者用分層抽樣控制每一層的相對大小，而非讓隨機過程控制它。這樣可以保證代表性，或固定樣本中不同分層的比例。當然，有關分層的必要資訊並非俯拾皆是。

一般而言，如果分層資訊正確，分層抽樣產生的結果比簡單隨機抽樣更能代表母體。一個簡單的例子可以說明其緣故。想像一個樣本有51%的女性與49%的男性；母體母數的性別比是51比49。透過分層抽樣，研究者在男性與女性中抽樣，這樣樣本中的性別比例維持在51比49的性比例。如果研究者用的是簡單隨機抽樣，樣本就可能偏離母體中真正的性別比例。這樣，她在代表母體時的錯誤比較少，用分層抽樣的抽樣誤差也較小。

研究者用分層抽樣，是在有興趣的分層占母體的比例很小，隨機過程可能偶然漏失這一層的時候。例如，研究者從2萬名大學生中抽出200名。她從學校註冊組那裡得到的資訊是這2萬名學生中有2%或400名是離婚的婦女，並且撫養的小孩在5歲以下。這個群體很重要，必須納入樣本之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要有4名這樣的學生（200名的2%），但研究者若用簡單隨機抽樣，就可能漏掉她們。她可用分層抽樣，從註冊組那裡拿到這400個人的名單，然後隨機選出4名。這樣就重要的分層而言，可以保證樣本代表母體（參閱資訊箱8.3）。

在特殊狀況下，研究者可能要某個樣本分層的比例跟它在母體中的真正比例不同。例如，母體中的愛斯基摩人只占0.5%，但研究者要特別探究愛斯基摩人。她多抽愛斯基摩人，讓愛斯基摩人占樣本的10%。用這種非比例的分層抽樣，研究者若不做特殊調整，不可以直接從樣本推論母體。例如，David與Smith（1992）指出，1987年的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第11章有解釋）抽出的非裔美國人較多。美國人口的隨機抽樣得到的非裔美國人樣本是191個。David與Smith另外做非裔美國人的樣本，把非裔美國人的總數增加到544人。191名非裔美國人受訪者大約是隨機樣本的13%，與美國人口中的黑人比例約略相等。544名黑人在非比例樣本中則占30%。要用這整個樣本，推論美國人口母體之前，研究者必須調整樣本，減少非裔美國人的數目。非比例抽樣有助於研究者將焦點集中在跟某個次母體相關的議題。用544名受訪

者的樣本，而非只有191名的隨機樣本，她就能夠更正確地推論非裔美國人。較大的樣本更容易反映非裔美國人這個次母體的多樣性。

❖ 類聚抽樣 (Cluster Sampling)

類聚抽樣處理兩個問題：對於分散的母體，研究者缺乏一個好的抽樣架構，以及接觸抽樣元素的成本太高。例如，北美沒有一份

資訊箱 8.3

分層抽樣釋例

綜合醫院100名人員的樣本，依地位分層

職位	母體		簡單隨機抽樣數量(n)	分層抽樣數量(n)	與母體比較的誤差
	母體數量(N)	百分比(%)			
行政人員	15	2.88	1	3	-2
專任醫師	25	4.81	2	5	-3
實習醫師	25	4.81	6	5	+1
正式護士	100	19.23	22	19	+3
助理護士	100	19.23	21	19	+2
醫療技術人員	75	14.42	9	14	+5
雜工	50	9.62	8	10	-2
助理	75	14.42	5	14	+1
維修人員	30	5.77	3	6	-3
清潔工	25	4.81	3	5	-2
總數	520	100.00	100	100	

隨機在15名行政人員中挑選3名，在25名專任醫師中挑選5名，諸如此類。注釋：傳統上，N代表母體中的數量，n代表樣本中的數量。

簡單隨機抽樣的樣本代表的護士、助理護士與醫療技術人員較多，代表的行政人員、專任醫師、維修人員、清潔工較少。分層抽樣保證每種職位都有正確的代表。

所有汽車技工的名單。即使我拿到一個正確的抽樣架構，要接觸到分布各地的汽車技工，成本也太高。研究者可以用多階段與類聚的抽樣設計，而不是用單一的抽樣架構。

類聚是一種包含最終抽樣元素的單元，但本身不能暫時當做抽樣元素。研究者首先抽出類聚，每個類聚都含有元素，然後從第一階段抽樣的類聚中抽出第二個樣本。換句話說，研究者隨機抽出類聚，然後從挑選的類聚中隨機抽取元素。這個方法的實際用處很大。就算製作抽樣元素是不可能的，她也可以製作一個好的類聚抽樣架構。一旦研究者得到一個類聚樣本，在每個類聚中製作一個元素的抽樣架構就比較容易了。對分散四方的母體而言，第二個好處是每個類聚中的元素比較接近彼此。這樣在尋找、接觸每個元素時，可以事半功倍。

研究者在類聚抽樣的階段中抽取數個樣本。在三階段抽樣中，第一階段是隨機抽取大的類聚樣本；第二階段是在每個抽選的大類聚中隨機抽取小的類聚；最後一個階段是從挑選的小類聚中抽取元素。例如，研究者要從楓樹市抽出一個個人的樣本。首先，她隨機抽取街道，然後抽取街道上各家戶（households），再從各家戶中抽取個人（參閱資訊箱8.4）。雖然沒有楓樹市所有居民的名單，卻有該市正確的街道名單。選擇街道的隨機樣本之後，研究者計算選擇的街道上有多少戶人家，製作每個街道的抽樣架構。然後她用家戶的名單抽取家戶的隨機樣本。最後，研究者在每個抽取的家戶中抽取個人。

類聚抽樣通常不像簡單隨機抽樣那麼昂貴，但它沒有那麼精確。類聚抽樣中每個階段都會引進抽樣誤差，所以多階段類聚抽樣的誤差比單階段的隨機樣本多。

研究者使用類聚抽樣，必須決定類聚的數目與類聚中元素的數目。例如，要用兩階段類聚抽樣從楓樹市抽出240人的樣本，研究者可以隨機挑選120個類聚，再從每個類聚中抽出2個元素，或隨機抽出2個類聚，再分別抽出120個元素。哪一個最好？一般的答

資訊箱 8.4

類聚抽樣釋例

目標：在楓樹市隨機抽樣240人。

第一階段：楓樹市有55個區。隨機抽樣6個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 = 隨機選擇的區。

第二階段：在選擇的區中分出街道。每區含有20個街道。從各區中隨機選擇4區。

第3區的範例（第一階段選出的）：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 隨機選擇的區。

第三階段：在街道中分出家戶。隨機選擇家戶。

第3區第4街道的範例（第二階段）：

第4街道包含一組單親家庭、雙拼式房屋和四間式公寓。它被橡樹街、河濱路、南方大道、綠景路圍起來。街道上有45個家戶。從這45個家戶中隨機選擇10個。

1	橡樹街1號	16	"	31*	"
2	橡樹街3號	17*	河濱路154號	32*	"
3*	橡樹街5號	18	河濱路156號	33	"
4	"	19*	河濱路158號	34	綠景路156號
5	"	20*	"	35*	"
6	"	21	南方大道13號	36	"

7	橡樹街7號	22	"	37	"
8	"	23	南方大道11號	38	"
9*	河濱路150號	24	南方大道9號	39	綠景路158號
10*	"	25	南方大道7號	40	"
11	"	26	南方大道5號	41	"
12	"	27	南方大道3號	42	"
13	河濱路152號	28	南方大道1號	43	綠景路160號
14	"	29*	"	44	"
15	"	30	綠景路152號	45	"

* = 隨機選擇的家戶。

第四階段：在每個家戶中選擇一個受訪者。

類聚抽樣摘要：

每個家戶中抽樣1人

每個街道上抽樣10個家戶

每個區中隨機選擇4個街道

在市中隨機選擇6個區

$1 \times 10 \times 4 \times 6 =$ 樣本中240人

案是類聚越多的設計越好，因為每個類聚中的元素（如住在同一條街的人）比較相似（住在同一條街的人相似之處，比住在不同街道的人多）。如果選擇的類聚較少，會選到許多類似的元素，這就不太能代表母體。例如，研究者可以選擇2條住有相當富有居民的街道，再分別抽出120人。這就不像120條不同街道上各抽取2人的樣本那麼有代表性。

研究者從一大片地區抽樣，必須找到每個元素時，類聚抽樣可大幅降低旅行成本。通常這是精確與成本之間的取舍。

例如，亞倫、李嘉度與芭芭拉各自計劃要親身訪問1,500名代

表北美所有大學生母體的學生。亞倫拿到所有學生的精確抽樣架構，使用簡單隨機抽樣。他走遍1,000個不同的地點，每次訪問1至2名學生。李嘉度從3,000所學校中隨機抽出3個學校，在這3所學校中各抽出300名學生。芭芭拉抽出300所學校的隨機樣本。她到這300所學校，每個學校訪問5名學生。如果每個地點的旅行成本平均是250美元，亞倫的帳單是25萬美元，李嘉度的是750美元，芭芭拉的是7萬5千美元。亞倫的樣本非常精確，芭芭拉的樣本精確度只差一點，成本卻只有亞倫的1/3。李嘉度的樣本是最便宜的，但一點代表性也沒有。

家戶內抽樣 (Within-Household Sampling) 如果研究者做類聚抽樣，在一個家戶或類似單位內抽樣（如家庭或住處），問題就來了：研究者應該選擇誰？如果第一個接電話、應門或收信的人用在樣本中，可能就會引入偏誤。第一個回應者的答案只有在她的答案是真正隨機過程的結果時，才能選擇進去。但這很少見。某些人很少在家，在某些家戶中，有些人比家中他人更容易接電話或應門。研究者用家戶內隨機抽樣，確保在隨機家戶抽樣之後，家戶中的個人也是隨機挑選的。

研究者可用許多方法在家戶中隨便挑選一個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知道家戶的大小與組成後（參閱表8.4），用一份選擇表，註明要選擇誰（如最年長的男性、最年輕的女性等）。這樣即可移除任何選擇第一個接電話、應門的人，或是訪問者選擇看起來較友善的受訪者所可能產生的偏誤。

數量比率機率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分出類聚的方式有兩種。剛剛說過的方法是比例式或未加權的類聚抽樣。它是比例式的，因為每個類聚的數量一樣（或是元素的號碼在每個階段都一樣）。不幸的是，最常有的狀況是每個類聚團體的數量不同。如果是這樣，研究者必須調整機率，或在不同的抽樣階段調整抽樣比。

前面所提亞倫、李嘉度、芭芭拉的抽樣範例說明未加權類聚抽

表8.4 家戶內抽樣

選擇樣本家戶中的個人。選擇的號碼是資訊箱8.4中挑選的家戶。

號碼	姓	成人 (18歲以上)	選擇的受訪者
3	艾伯	1男1女	女性
9	巴拉達	2名女性	最年輕女性
10	狄普拉茲	1男2女	最年長女性
17	伍西維	2男1女	最年輕男性
19	塞瑞	2名女性	最年輕女性
20	泰勒	1男3女	次年長女性
29	威魯	2男2女	最年長男性
31	黃	1男1女	女性
32	葛瑞	1名男性	男性
35	莫克林	1男2女	最年長女性

選擇表範例 (只計算成人)

男性	女性	選擇對象	男性	女性	選擇對象
1	0	男性	2	2	最年長男性
2	0	最年長男性	2	3	最年輕女性
3	0	最年輕男性	3	2	次年長男性
4+	0	次年長男性	3	3	次年長女性
0	1	女性	3	4	第三年長女性
0	2	最年輕女性	4	3	次年長男性
0	3	次年長女性	4	4	第三年長男性
0	4+	最年長女性	4	5+	最年輕女性
1	1	女性	5+	4	次年長男性
1	2	最年長女性	5+	5+	第四年長女性
1	3	次年長女性			
2	1	最年輕男性			
3	1	次年長男性			

+ = 或者更多

樣的問題。芭巴拉從全部3,000所學校抽出300所學校的簡單隨機樣本，但她犯了一個錯——除非每所學校的學生數目相同。她的方

法給每所學校同等被挑選的機會—— $300/3,000$ 或 10% 。但是，每所學校的學生數目不同，所以每個學生並無同等的機會選入她的樣本之中。

芭芭拉把每所大學列出來，然後從名單上抽樣。擁有4萬名學生的大學和只有400名學生的小學院都有同等機會被選中。但她選擇大型大學，那麼這所大學每個學生被選中的機會是4萬中選5個（ $5/40,000 = 0.0125\%$ ），小學院的學生被選中的機會是400個中有5個（ $5/400 = 1.25\%$ ）。小學院學生選入其樣本的機會多出100倍。大型大學學生被選中的總體機率是 0.125% （ 10×0.0125 ），小學院學生被選中的總體機率是 12.5% （ 10×1.25 ）。芭芭拉違反隨機抽樣的原理——每個元素選入樣本的機會平等。

如果芭芭拉使用隨機比例抽樣，抽樣也正確，那麼每個最後抽樣的元素或學生將有同等被選中的機率。她在抽樣的第一階段調整選擇學校的機會。她必須給大型學校學生更多被選中的機會，給小學校學生較少被選中的機會。她根據所有入學學生在母體中的比例，調整選擇學校的機率。這樣一所4萬名學校被選中的機率就比一所只有400名學生的學校高出100倍，另一個例子，參閱（資訊箱8.5）。

❖ 隨機數碼撥號（Random-Digit Dialing, RDD）

隨機數碼撥號是一種特別的抽樣技術，用電話訪問一般大眾的研究計畫都使用這種技術。它和傳統電話訪問的抽樣法不同，因為電話簿不是它的抽樣架構。

抽樣架構是電話簿時，有三種人會漏失掉：沒有電話的人、最近才搬家的人、電話號碼未登錄在電話簿上的人。沒有電話的人（如窮人、沒受過教育的人、短期旅客）在任何電話訪問中都會漏失掉，但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一般大眾擁有一支電話的比例是 95% 。大眾擁有電話的比例增加，電話未登錄的百分比也隨之增加。某些類型的人有未登錄的電話：想要避開募款組織的人；非常

資訊箱 8.5

隨機比例抽樣（PPS）之範例

亨利要和住在河谷市的人做一個小時的親身訪問。河谷市幅員廣大；亨利要減少他的旅行時間與花費，所以他使用類聚抽樣設計。最近一次普查指出，該市有49萬人。亨利只能訪問220人左右，約占該市人口0.05%。他先從該市稅捐處與消防局拿到地圖，搜尋有關該市街道的普查資訊。他得知該市有2,182條街道。起先他認為可以隨機挑選街道的10%（也就是218條），走到一條街道，計算房屋單位，然後訪問每棟房屋（房子、公寓）中的一個人，但各條街道的大小與人口多寡不同。他研究各街道的人口密度，估計每條街道的人數，然後根據街道的平均大小，提出一個五種密度分類：

密度	街道數目	平均人數
超高密度	20	2,000
高密度	200	800
中密度	800	300
低密度	1,000	50
半鄉村區	162	10

亨利明白，沒有調整，隨機選擇的城市街道不會給每個人同等被選中的機會。例如，一條超高密度街道所有的人數與40條低密度街道的人數一樣。亨利根據街道大小調整比例。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根據最小的類聚，或半鄉區的城市街道，把所有街道轉換成同等大小的單位。例如，高密度街道的人被選中的機會比半鄉區的人多出 $2,000/10$ 或200倍，所以亨利把選擇這條街道的比例增加到比半鄉區高出200倍。基本上，亨利製作依每10人調整的類聚單位（因為這是半鄉區的人數），在第一個抽樣階段用它們取代街道。這162

個半鄉區不變，但在調整後，他在超高密度街道有 $20 \times 200 = 4,000$ 個單位，高密度街道有 $200 \times 80 = 16,000$ 個單位，依此類推而有49,162個這種單位。亨利現在用調整的類聚單位，把每個街道編號，許多街道因此得到多種號碼。例如，他把1到200號編給第一個超高密度街道，依此類推如下：

- 1 1號超高密度街道
- 2 1號超高密度街道
- 3 1號超高密度街道
- ……等
- 3,999 20號超高密度街道
- 4,000 20號超高密度街道
- 4,001 1號高密度街道
- 4,002 2號高密度街道
- ……等
- 49,160 160號半鄉區街道
- 49,161 161號半鄉區街道
- 49,162 162號半鄉區街道

亨利還是要訪問220個人，也要從每個調整的類聚單位選1個人。他用簡單隨機抽樣法從49,162人當中選出220人。例如，如果亨利隨機選擇25號與184號，兩個都在1號超高密度街道，這告訴他要從該街道中選2個人。如果選中49,161這個號碼，他就從161號半鄉區街道選1個人出來。亨利現在到每個選中的街道，找出該街道所有的房屋單位，從中隨機選擇。當然，亨利選中一個房屋單位之後，可以用家戶內抽樣。

有錢的人；想要隱私與躲避騷擾電話、推銷員與惡作劇的人。在某些都市區域，未登錄電話的百分比高達50%。此外，人會搬家，

所以每年出版或出版次數較少的電話簿登錄的號碼所有人已經搬家，乃常有之事，也沒有登錄最近才搬到這個區域的人所有的號碼。使用RDD的研究者隨機選擇電話號碼，從而避開電話簿的問題。母體是電話號碼，不是有電話的人。RDD並不難，但它需要時間，也會讓打電話的人心情沮喪。

在美國，RDD的運作是這樣的。電話號碼有三個部分：一個3位數的區碼、一個3位數的交換碼或中央碼，還有一個4位數號碼。例如，威斯康辛州麥迪遜的區碼是608，該區碼內有許多交換碼（如221、993、767、455）；但並不是所有999個可能的3位數交換碼（從001到999）是啟動的。同樣地，在一個交換機中，並不是所有的4位數碼（從0000到9999）都在使用。有些號碼是留做將來擴展使用，有些是切斷的，或者是某人搬家之後暫時停用的。如此一來，一個可能接通的美國電話號碼包括一個連通的區碼、一個連通的交換碼，以及一個交換機的四位數碼。

研究者用RDD鑑別啟動的區碼和交換碼，然後隨機選擇4位數碼。這有個問題，就是研究者能夠選擇任何一個交換碼。這就是說，有些選擇的號碼沒有提供服務、是切斷的，或是商業號碼；只有一些號碼是研究者要的——連通的住家號碼。直到研究者撥號之前，不可能知道這個號碼是不是連通的住家號碼。這就是說，有許多時間是花在撥打已經切斷的號碼、商業用號碼等。例如Groves與Kahn（1979: 45）發現，撥打的號碼只有22%是連通的住家號碼。研究組織經常用電腦選擇隨機數碼，自動撥號。這可以加速訪問過程，但還是要有一個人聽電話，看看這個號碼是不是運作中的住家號碼。

記住：RDD的抽樣元素是電話號碼，不是人或家戶。有些家庭或個人可能共用一個電話號碼，有時候每個人各有一個電話號碼，或不止一個電話號碼。這就是說，在一個連通的住家號碼撥通之後，第二階段抽樣，亦即家戶抽樣是必須的，才能選到要訪問的人。

資訊箱 8.6 以範例說明許多抽樣的術語和觀念如何在一個真實生活的狀況中使用。

隱藏性母體 (Hidden Population)

比起在一般母體或可見、可觸及的人之中抽樣，從隱藏性母體（從事秘密或隱匿活動的人）抽樣，是偏差或污名化行為研究一再發生的議題。它說明抽樣原理的創造性應用，混合質化與量化的研究風格，並結合機率與非機率的技巧。三種愛滋病研究者從「隱藏性母體」抽取樣本的研究頗具啟發作用。

Watters 與 Biernacki (1989) 研究舊金山區 HIV 陽性、靜脈注射的吸毒者，想評估新的愛滋病預防計畫。他們採取的程序叫做**目標抽樣 (target sampling)**，是結合連鎖轉介（一種雪球抽樣）、分層抽樣與限額抽樣。他們也使用立意抽樣，仔細選擇吸毒者高度密集的地理區域。他們指出：「雖然他們不是隨機樣本，但要特別強調，目標抽樣不是便利抽樣。」(1989: 420)

Martin 與 Dean (1993) 要找一個紐約 700 名男同性戀的樣本。這些同志必須住在該市，超過 18 歲，診斷出沒有愛滋病，還跟其他男人有過性行為。這個樣本要代表該市所有區域，有多樣化的生活方式，還要有不同的族裔背景。作者從立意抽樣開始，用 5 個來源，徵求 291 名受訪者。他們首先連絡 150 個紐約市主要的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組織。他們接下來過濾出 90 個有合格男性可供研究的組織。他們根據組織成員的數目，從這 90 個組織中抽出 52 個組織的分層樣本。他們從每個組織中選出 5 名成員。Martin 與 Dean 的研究報告刊登在當地的報紙上。這個報導促使許多人打電話來，他們從中又得到 41 名志願者。另外 32 名是由參與小型試驗性研究轉介而來的。此外，72 名是在每年舉辦的紐約市同性戀光榮遊行中找到的。還有 15 名合格的人是在紐約市的醫院接觸到，並邀請參與的。

研究者接下來用雪球抽樣。他們給 291 名受訪者每個人一個徵

資訊箱 8.6

樣本範例

抽樣有許多術語，用來說明樣本不同的部分或樣本的類型。一個複雜的樣本說明研究者如何使用它們。看看社會學中眾所周知的美國全國性調查在1980年的樣本，這個調查就是一般社會調查（第11章有討論）。

母體的定義是所有美國人普遍性中成年的居民（18歲或以上）。目標母體包括所有住家說英語的成年人，剔除住在集體住處的人，如大學宿舍、療養院或軍營的人。研究者估計，所有住家中的成年人有97.3%，住家人口有97%能夠用英語接受訪談。

研究者使用複雜的多階段機率樣本，這個樣本既是類聚樣本，也是分層樣本。首先，他們用美國所有的郡、獨立城市和標準都會統計區域（Standard 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 SMSAs）製作全國的抽樣架構，SMSAs則是普查局用來標明較大城市及其周邊區域的。在這第一個層次，每個抽樣元素有約4,000個家戶。他們把這些元素分成階層。

這些階層是普查局界定的四大地理區域，又分成都會與非都會區。然後他們根據每個郡或SMSAs的住家單位，用隨機比例抽樣（PPS）從每一層中隨機選取。這樣他們就有84個郡或SMSAs的樣本。

在第二階段，研究者找出城市街道、普查區域，或每個郡、SMSAs相當於鄉區的地方。每個抽樣元素（如城市街道）至少有50個住家單位。為正確計數某些郡的住家單位數目，研究者計算這些區域的地址。研究者用PPS在每個郡或SMSA中挑選6個或6個以上的街道，最後得到562條街道。

在第三階段，研究者把家戶當做抽樣元素。他們從街道的地址中隨機挑選家戶。選擇一個地址之後，一位訪員就和該家戶聯絡，從中選擇一位合格的受訪者。訪員從選擇表中挑選可能的受訪者，

根據這張表訪問某類受訪者（如次年長者）。連絡訪問的人總共有1,934位，完成的訪問有75.9%。這樣最後樣本數是1,468人。我們可以計算抽樣比，用1,468除以住家成人的總數，這在1980年大約是1億5千萬人，抽樣比是0.01%。為檢驗他們的樣本代表性，研究者也比較樣本和普查結果的特質（參閱Davis and Smith, 1992: 31-44）。

求包裹，要他們交給3個同志男友。每個同意參與的男性朋友還要再把包裹交給3個人。這樣持續到超過原先291人的5個層次為止。最後徵召到746人參加這個研究。Martin與Dean把他們的樣本拿來和舊金山兩個男同志的隨機樣本檢驗，其中一個是500人的隨機數碼撥號樣本，另一個是用舊金山普查區域所得的823人類聚樣本。在種族、年齡和「出櫃」百分比上，他們的樣本和舊金山的樣本平行對等。

Heckathorn（1997）在康乃狄克州兩個小城市及其周圍地區，使用受訪者驅動抽樣（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研究277名打針吸毒的人。在1996年7月，在這些城鎮診斷出來的愛滋病患者有390名；其中約半數有打針吸毒。這個樣本是立意抽樣，因為每個樣本元素必須符合某些標準。Hackathorn使用修正的雪球抽樣，但加上「雙重報酬系統」（dual reward system）。他給每個完成訪問的人一些錢，如果他們再找到新的受訪者，另外還有酬勞。第一個人面對的要求是不要告訴研究者新的受訪者是何姓名，有時這叫做戴面具（masking）（如保護朋友）。這樣即可避開「告密」問題與「對毒品宣戰」的污名問題，這在美國的環境尤其強烈。這種修正的雪球抽樣就像按序抽樣，因為在一段時間之後，找到的新受訪者越來越少，直到研究者達到飽和或均衡點為止。

你現在已經熟悉主要類型的機率抽樣（參閱表8.5），以及它們所用的適當補充技巧（如PPS、家戶內抽樣與RDD）。此外，你已

表 8.5 機率抽樣的類型

抽樣類型	技術
簡單隨機	為所有個案製作抽樣架構，然後透過隨機過程（如亂數表或電腦程式），挑選個案。
分層	為每個個案類別製作抽樣架構，從每個類別中抽出隨機樣本，然後把這些類別的樣本結合起來。
系統性	製作抽樣架構，用 $1/k$ 計算抽樣間距，隨機選擇一個起點，然後選擇每個 $1/k$ 的個案。
類聚	為較大的類聚單位製作抽樣架構，從類聚單位中抽出類聚單位的隨機樣本，再為每個選擇的類聚單位製作抽樣架構，然後抽出個案的隨機樣本。

經明白研究者如何結合非機率與機率抽樣，處理特別的情況，如隱藏性母體。接下來，我們回到決定機率抽樣的樣本數問題。

樣本應該多大？

學生與新進研究者常問：「我的樣本應該有多大？」最佳答案是：「看情況。」這要看研究者計畫做的資料分析是什麼？要看樣本有多精確，才能達到研究者的目的，也要看母體的特質。如你所知，單單大樣本而無隨機抽樣，或抽樣架構不良，代表性還不如具備隨機抽樣與優良抽樣架構的小樣本。

樣本數的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說。一是假定母體的特質，隨機抽樣過程也應使用統計公式。用這種方法計算樣本數，需要的統計討論超出本書範圍。研究者必須假定能夠接受的信賴程度（或誤差數目），以及母體變異的程度。

第二個，也是比較常用的方法是經驗法則——傳統的或一般接受的數量。研究者用這個方法，是因為他們鮮少具備統計法需要的資訊，也因為它所給的樣本數接近統計法的樣本數。經驗法則不是

武斷的，而是根據過去符合統計法需求的抽樣經驗。

樣本數的原理之一，就是母體越小，抽樣比就得越大，才能取得精確的樣本（也就是說，結果與整個母體所得雷同的機率）。較大的母體允許較小的樣本，這樣也可以得到同樣好的樣本。這是因為母體變大時，樣本大小的精確性就縮減。

針對小的母體（少於1,000），研究者需要較大的抽樣比（約30%）。例如，要有較高的精確度，大約需要的樣本數是300。針對稍大的樣本（10,000），若要同等的精確度，只需要較小的抽樣比（約10%），或1,000左右的樣本數。針對大型母體（超過15,000），較小的抽樣比（1%）是可以的，樣本數1,500可以非常精確。要從非常大的母體抽樣（超過1千萬），用極小的抽樣比（0.025%）或2,500的樣本數，即可非常精確。一旦抽樣比非常小，母體大小就不再有關係。對2億或1千萬的母體來說，2,500的樣本數可算精確。這些是近似的數量，實際的限制（如成本）在研究者的決定中也扮演要角。

有個原理與小樣本相關，樣本數稍增，即可大幅增加精確度。同樣是增加樣本數，小樣本精確度的增加比大樣本還高。例如，樣本數從50增加到100，可將誤差從7.1%減少到2.1%，但樣本數從1,000增加到2,000，只能將誤差從1.6%降到1.1%（Sudman, 1976a: 99）。

研究者決定最佳樣本數要取決於三件事：(1)需要的精確度；(2)母體的變異度或多樣性；(3)資料分析中同時檢視的不同變項數目。若其他情況不變，如果想要得到高精確度，如果母體有很多變異或異質性，或如果我們在資料分析中要同時檢視許多變項，就需要較大的樣本。較低的精確度可以接受時，母體是同質時，或是一次只檢視少數變項時，較小的樣本即已足夠。

次團體的資料分析也影響到研究者有關樣本數的決定。如果研究者要分析母體中的次團體，她需要較大的樣本。例如，我要分析30到40歲男性的4個變項。如果這個樣本是一般大眾，那麼在這個

年齡群體中，只有一小部分的樣本個案（如10%）是男性。經驗法則之一是讓每個次團體有50個個案。這樣，如果我要分析一個只占母體10%的團體，我的樣本就應該有 10×50 或500個個案，才能確定我有足夠的數量做次團體分析。

推論

研究者抽樣，這樣她才能從樣本推論母體。事實上，在統計資料分析中有一個關注正確推論的子領域，就叫**推論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研究者用樣本中的單位直接觀察變項。樣本代表或表呈母體。研究者對樣本本身沒有興趣；他們要推論到母體。因此，研究者手上（樣本）具體所有的與實際有興趣的（母體）之間有差距（見圖8.4）。

在上一章你看到測量的邏輯如何用抽象構念與具體指標之間的差距表述出來。具體的、可觀察資料的量數是抽象構念的近似值。研究者用近似值評估真正有興趣的東西（如構念與因果法則）。就像抽樣架構、抽樣過程與推論的使用是縮小抽樣的差距，概念化與操作化是縮小測量的差距。

研究者直接觀察構念的量數與樣本中的經驗關係（見圖8.4），把抽樣與測量的邏輯連在一起。他們根據樣本中能夠從經驗觀察到的部分，推論或概括出母體的抽象法則與構念。

效度與抽樣誤差有類似的功能，這可以用抽樣邏輯與測量邏輯之間的類比說明——也就是說，觀察到的與討論的之間。研究者測量是要有效的構念指標——也就是精確代表抽象構念的具體指標。她抽樣時是要抽樣誤差小的樣本——具體的個案集合，能夠正確代表沒看到的、抽象的母體。有效的量數不會和所代表的構念偏離太多。抽樣誤差不大的樣本不容推估偏離母體母數太多。

研究者嚐試縮小抽樣誤差。這裡不談抽樣誤差的計算，但它是根據兩個要素：樣本數與樣本中差異的量。其他情況不變時，樣本量越大，抽樣誤差越小。同樣地，樣本中同質性越高，抽樣誤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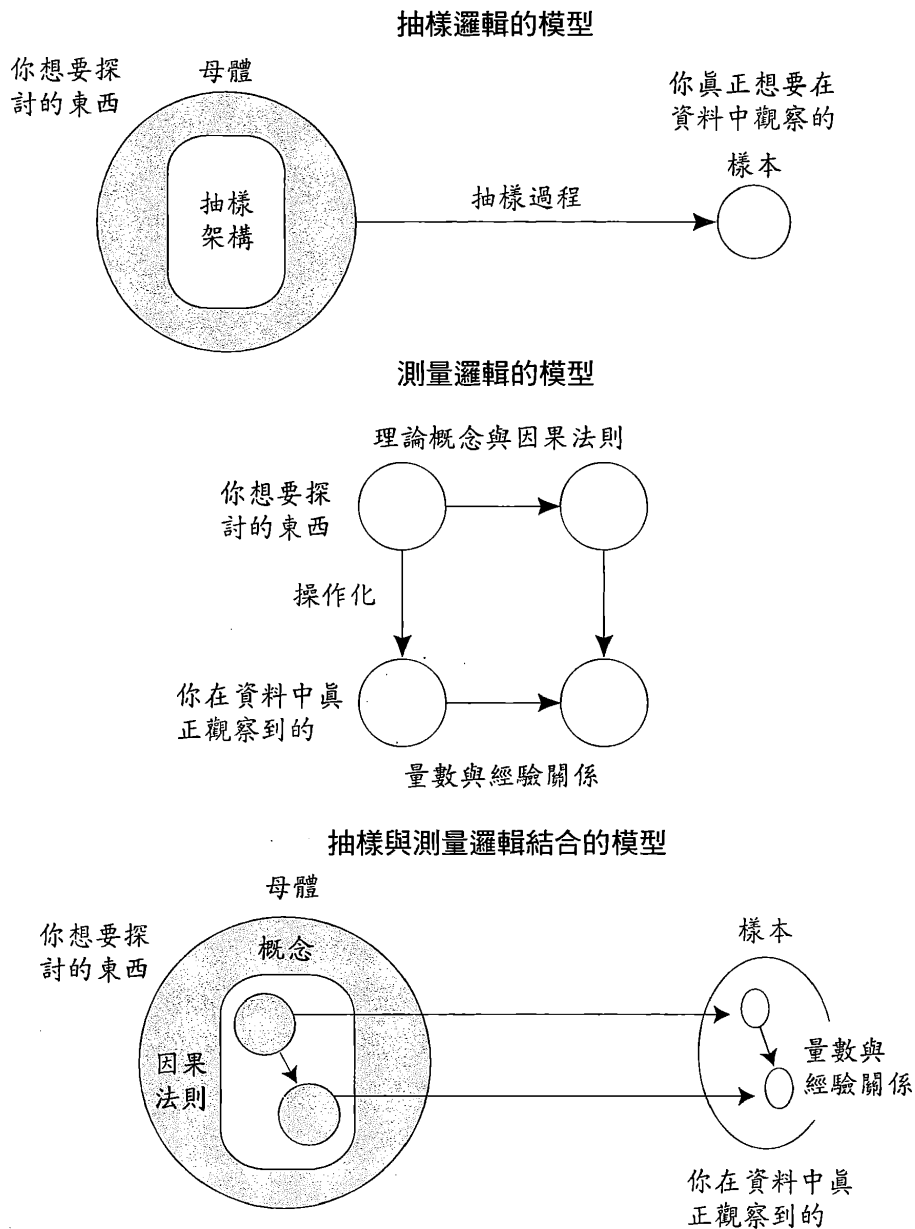


圖 8.4 抽樣與測量邏輯的模型

越小。

抽樣誤差也跟信賴區間有關。如果兩個樣本類似，只不過一個比較大，那麼數量比較多的樣本會有比較小的抽樣誤差和較窄的信賴區間。同樣地，如果兩個樣本類似，只是有一個樣本的個案彼此較像，那麼同質性較高的樣本會有較小的抽樣誤差和較窄的信賴區間。狹窄的信賴區間是指就某種信賴程度而言，母體母數的評估比較精確。例如，研究者要估算家庭平均年所得。她有兩個樣本。樣本1若以80%的信賴區間來算，那麼在母體母數為33,000美元時，信賴區間在30,000與36,000美元之間。若以95%的信賴區間來算，全距則在23,000與43,000美元之間。抽樣誤差較小的樣本（因為它比較大或同質性較高）若以95%的信賴區間來算，則全距約在30,000與36,000美元之間。

結論

你在本章學的是抽樣。抽樣在社會研究中廣為使用。你學到不是根據隨機過程的抽樣類型。只有某些是可以接受的，即使它們的運用也要看特殊情況。通常量化研究比較傾向用機率抽樣，因為它產生的樣本代表母體，讓研究者得以使用強而有力的統計技術。除了簡單隨機抽樣之外，你學到系統性、分層與類聚抽樣。雖然本書並未談到隨機抽樣使用的統計理論，但從抽樣誤差的討論、中央極限定理、樣本數來看，隨機抽樣產生的抽樣比較正確、精確，應是顯而易見的。

閱讀下一章之前，重述社會研究的一個基本原理，應該大有用處：不要把研究過程的步驟切割開來；相反地，要學習瞭解步驟之間的互聯。研究設計、測量、抽樣與特殊研究技術是唇齒相依的。不幸的是，由於教科書中說明資訊的限制，必須分別依序說明各部分。實際上，研究者設計研究，為變項發展量數時，就已想到資料的搜集。同樣地，抽樣的議題影響到研究設計、變項的測量與資料

搜集的策略。你在未來各章會看到好的社會研究要靠的是在各個不同階段同時控制品質——研究設計、概念化、測量、抽樣，以及資料搜集與處理。研究者在任何一個階段犯下重大錯誤，可能使整個計畫猶如敝屣。

重要名詞

中央極限定理	類聚抽樣	信賴區間
異例抽樣	隨意抽樣	隱藏性母體
推論統計	非隨機樣本	母數
母體	數量比率機率	立意抽樣
限額抽樣	隨機數碼撥號	亂數表
隨機樣本	樣本	抽樣分配
抽樣元素	抽樣誤差	抽樣架構
抽樣間距	抽樣比	按序抽樣
簡單隨機抽樣	雪球抽樣	社會測量圖
統計量	分層抽樣	系統性抽樣
目標母體	理論抽樣	

問題回顧

1. 何時使用立意抽樣？
2. 何時使用雪球抽樣是妥當的？
3. 什麼是抽樣架構？為什麼它很重要？
4. 母體有一些次團體，而且研究者要確定每個次團體都在樣本中時，哪一種抽樣法是最好的？
5. 你如何從抽樣比獲得抽樣間距？
6. 研究者何時應考慮使用隨機比例抽樣？

7. 隨機數碼撥號的母體為何？可以避免抽樣架構的問題嗎？請解釋。
8. 研究者如何決定樣本該有多大？
9. 抽樣的邏輯與測量的邏輯如何關連起來？
10. 何時使用隨機數碼撥號？它的優點與缺點是什麼？

實驗研究

導論

適合實驗的研究問題

社會研究實驗簡史

隨機分派

為什麼要隨機分派？

如何隨機分派

配對 vs. 隨機分派

實驗的設計邏輯

實驗的語言

設計記號

設計的類型

內在與外在效度

內在效度的邏輯

對內在效度的威脅

外在效度與場地實驗

實際的考量

籌劃與前導測試

給受試者的指令

實驗後訪談

實驗研究的結果：做比較

倫理絮語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實驗，這裡要強調的主要科學方法，是在簡單的層次上比較團體或個人，而這些團體或個人接觸環境變遷的程度不一。

——Leonard Saxe and Michelle Fine, *Social Experiments*, p. 45

導論

本章開啟本書新的部分。在前面三章，你學到質化與量化研究設計的基礎。本章及接下來三章聚焦於量化的研究技術。我們從實驗研究開始。它是最容易瞭解的，許多科學領域廣為使用，而且就實證導向的、量化風格的標準而言，它是最「純粹的」。

比起其他研究技術，實驗研究更是直接建立在實證論途徑之上的。自然科學（如化學與物理學）、相關應用領域，以及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都做實驗。引導生物學植物生長實驗或工程學測試金屬的邏輯，也用在人類社會行為的實驗上。雖然實驗在物理學的應用比較廣泛，它在教育、刑法、新聞報導、行銷、安養、政治學、社會工作與社會學中也有應用。本章首先聚焦於實驗室控制狀況下進行的實驗，然後看看這個領域進行的實驗。

實驗的基本邏輯是延伸常識的思維。常識意義的實驗比較不像以科學為基礎的實驗那麼仔細或系統化。在常識語言中，實驗的意思是調整情況中的一些東西，然後把這個結果和沒有調整的結果比較。例如，我想發動我的車。奇怪的是它發不動。我做的「實驗」是清理電池接頭，然後再試一遍。我調整了某些東西（清理接頭），比較這個結果（車子是否發動）和先前的狀況（車子沒有發動）。我起先有個隱含的「假設」——接頭上的髒東西是車子發不動的原因，一旦髒東西清理掉之後，車子就可以發動。這個例子說明研究者在實驗中做的三件事：(1)從假設開始；(2)調整情況中某些東西；(3)比較調整與沒有調整的結果。

比起其他的社會研究技術，實驗研究在測試因果關係方面是最強而有力的，因為因果性的三個條件（時間次序、關連、沒有替代的解釋）在實驗設計中完全符合。

適合實驗的研究問題

❖ 適當技術的議題

社會研究者用不同的研究技術（如實驗與調查），因為有些研究問題可以用某些技術處理，而非其他技術。新進的研究者最常問哪種研究技術最適合哪些問題。這不容易回答，因為問題與技術沒有固定的對應。答案是：做個明識（informed）的判斷。

把技術與問題套合在一起的一般指導方針所在多有。除了指導方針之外，你可以透過閱讀研究報告、瞭解不同技術的優缺點，以及協助比較有經驗的研究者做研究，獲得實務經驗，發展判斷力。

❖ 實驗研究的研究問題

實驗設計的邏輯引導實驗最能處理的研究問題。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實驗設計中，研究者改變一個情況，控制引進改變的周遭環境。只有那些能夠讓研究者操控條件的研究問題，適合做實驗研究。例如，實驗研究不能回答這類問題：完成大學教育的人是否能增加他們的平均年所得？研究者不能隨便把全國數千人分派為上過大學與未上過大學的群體。即使不是研究全國的人，許多情況也不能控制。例如，有弟妹者的領導技巧是否比獨生子或女更好？研究者不能把夫妻分成數群，然後迫使他們生育或不生育子女，藉此檢驗領導技巧。

社會科學家為研究目的而介入的局限，比自然科學家還高。他們發明方法來處理獨立變項，很有創意（如要求遵從的壓力、焦慮、合作、信心十足），但是他們不能操縱許多獨立變項（如性別、婚姻狀況、年齡、宗教信仰、所得層次、父母政治傾向或所住社區的大小）。在實務與倫理的局限下，研究者必須決定哪一種研究設計回答某一問題的效果最好。例如，研究問題是：對犯罪的恐懼是否促使老年人尋求自衛與保安？實驗研究者針對數群老年受試

者，把對犯罪的恐懼分成不同的層次。為創造對犯罪的恐懼，她要求受試者閱讀有關犯罪的書報，給他們看有關犯罪的電影，或讓他們置身於引發恐懼的狀況中（例如，在一個上鎖的房間中，有個人看起來是危險人物，還說一些威脅的話）。接下來，研究者測量受試者是否有保護自己的行為（如按下按鈕，在他們自己與危險人物之間設下障礙物），或是問一些假設狀況的問題，這些問題都牽涉到用某些方法維護安全（如打算買新鎖）。

其他的技術（如調查研究）可以處理同樣的問題。調查研究者問老年人問題，如他們恐懼犯罪的程度，以及他們做什麼來保护自己的安全。研究者測量恐懼的方式，是要求受試者根據過去的經驗，說明他們多麼害怕碰到犯罪。

有個混淆的來源，就是研究者可能用先前固定的條件（如年齡或性別）做實驗的變項。例如，Spillers（1982）問的是年齡是否影響到兒童跟一個殘障兒童玩耍的決定。她的受試者是32名幼稚園和32名小學3年級兒童。她給每名受試者看4組照片，每組照片上各有1名坐輪椅的兒童和站立的兒童。照片上兒童的體態、年齡、性別各有不同。每個受試者碰到的問題是：「你想跟哪一個小孩玩？」Spillers發現多數3年級兒童比幼稚園兒童更能接納殘障的兒童。Spillers並未修正自變項——年齡——以發現它對依變項——玩伴選擇——的影響——但她操控決定的過程，控制決定發生的環境。

社會研究實驗簡史

實驗法是社會科學家從自然科學借來用的，而且是從心理學開始。它在1900年之後才廣泛用於心理學。

德國心理學家與生理學家Wilhelm M. Wundt（1832-1920）將實驗法引進心理學。在19世紀末，德國是研究教育的中心，吸引世界各地社會科學家到德國做研究。Wundt為心理學的實驗創設一座實驗室，這座實驗室後來成為其他許多社會研究者的模範。到了

1900年，美國及其他國家的大學都建立心理學實驗室，進行實驗性社會研究。實驗取代比較哲學性的、內省的、質問的途徑，而這些途徑是比較接近詮釋性社會科學的。例如1890年代最著名的美國哲學家與心理學家 William James (1842-1910) 並未使用或接受實驗法。

從世紀之交到二次大戰時期，實驗法愈趨詳盡，在社會研究中生根茁壯。這個方法廣泛應用的號召力，在於它提供客觀的、不偏不倚的、科學的方法，研究人的心靈與社會生活，當時社會生活的科學研究才剛開始讓人接受。

四個趨勢加快此一時期實驗法的發展：行為主義的興起、量化的散佈、研究對象各式各樣的改變、實際的應用。

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是心理學的一門學派，由美國的 John B. Watson (1875-1958) 在1920年代創立，並由 B. F. Skinner (1904-1990) 發揚光大。它強調要測量可以觀察的行為或心智生活的結果，並倡導用實驗法，對假設進行嚴格的經驗測試。它即使不是美國主流的學派，也是頗有影響力的學派。

量化或用數字測量社會現象，也在1900與1940年間成長。研究者把社會構念重新概念化，這樣它們才能量化，其他構念（如精神、意識與意志）則摒除於經驗研究之外。用智商測驗測量心智能力，就是範例。智商測驗原先是由法國人 Alfred Binet (1857-1911) 發展出來的，在1916年時譯成英文，並經修正。它的使用廣泛，而且用單一分數表示智能這種主觀東西的能力，頗能吸引大眾，因為它是以客觀的方式將人們排等分類。事實上，在1921與1936年間，討論智商的出版文章就超過5000篇。許多量表與指數技術在此一階段發展出來，社會研究者也開始運用應用統計。

早期經驗性社會研究的報告使參與研究的人聲名大噪，多數早期的受試者都是專業的研究者。在20世紀前半段，研究報告隱匿受試者的姓名，只報告他們的實驗結果。受試者漸漸包括大學生與小學生。這些改變反映出研究者與受研究的人們之間的客觀與距離

關係越來越遠。

人們使用實驗法，越來越以應用目的為主。例如，智商測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獲得美國陸軍的採用，把數以千計的人分到不同的職位上。「科學管理」的領袖Frederick W. Taylor (1856-1915) 提倡在工廠使用實驗法，並與管理階層合作，調整工廠的環境，增加勞工的產能。

在1950與1960年代，研究者繼續使用實驗法。他們轉而關心可能竄進實驗設計的人為現象或替代性的解釋來源。他們發現新的人為現象，提出新的研究設計與統計程序，縮小實驗中可能有的系統性誤差。實驗在邏輯上更為嚴謹，而且到了1970年代，方法論的標準漸漸用來評估研究。1960年代開始的一個相關趨勢是欺騙越來越多，以及對倫理問題的關心。例如，1960年代中期以前，現在常用的簡報 (debrief) 尚未使用。實驗還是廣泛使用，因為它的邏輯嚴謹，簡單明瞭，符合實證論的假定，成本也很低。

隨機分派

社會研究者經常要比較。例如，研究者有兩組15名學生的群體，要根據他們之間的一個主要差異，比較這兩組（如某一組修完的課程）。或者，研究者有五個顧客群體，要根據一個特質來比較這些群體（如地區分布）。俗話說：「要比較就拿蘋果跟蘋果，不要比較蘋果和橘子。」這說的不是水果，而是比較。它是說有效的比較在於比較基本上相同的東西。隨機分派 (Random Assignment) 就是做出類似的群體，以利在實驗中比較。

做比較的時候，研究者要比較的個案是變項的差異不會提供替代性的解釋。例如，研究者比較兩組學生，判斷修完課程的影響。為了比較，這兩組在許多方面必須類似，除了修課之外。如果修完課程這一組的年齡比另一組學生大，研究者就不能斷定究竟是修完課程，還是年齡能夠解釋這兩組的差異。

為什麼要隨機分派？

隨機分派是把個案（如個人或組織等）分派到各群體的方法，目的是做比較。它是把一群個案分割成或分類成兩組或更多組的方法，以便增加研究者的信心，確定這些群體的差異不是系統性的。它是一種機械的方法；分派是自動的，研究者不能根據個人的偏好或某些個案的特質來分派。

隨機分派的隨機是統計或數學意義的，不是常識意義的隨機。在日常言語中，隨機的意思是沒有計畫的、偶然的或意外的，但它在數學中有特殊的意義。在機率理論中，隨機是形容每個個案被挑中的機會相同的過程。隨機選擇讓研究者計算某一個案被分入某一組，而非其他組別的機會。因此，挑選過程是遵循數學的定律，這樣精確的計算才有可能。例如，在隨機過程中，所有個案分入某一組或別組的機會是相等的。

隨機過程美妙之處，就是在許多隨機事件中，可預測的事會出現。雖然這整個過程要看機會，而且在某一個時間預測某一個結果是不可能的，但在許多狀況中，精確的預測是可能的。

隨機分派或隨機化沒有偏誤，因為研究者希望遵循假設，或是因為研究受試者的個人興趣並未介入挑選過程。沒有偏誤並不是說特質相同的群體在每次隨機分派的某種狀況中被挑到。它的意思比較像是：選擇一個個案的機率可以用數學決定，而且群體終究是會一模一樣的。

抽樣與隨機分派是有系統地把個案選入研究的過程。研究者隨機分派時，她用隨機過程，把一群個案分入兩個或多個群組。相對地，在隨機抽樣中，她從一大堆個案中挑選較小的個案組合（見圖9.1）。研究者可以既抽樣，又隨機分派。她可以先抽樣，獲得一小組個案（例如，從2萬人當中挑出150人），然後用隨機分派把這個組合分成群組（例如，把150人分成3個50人的小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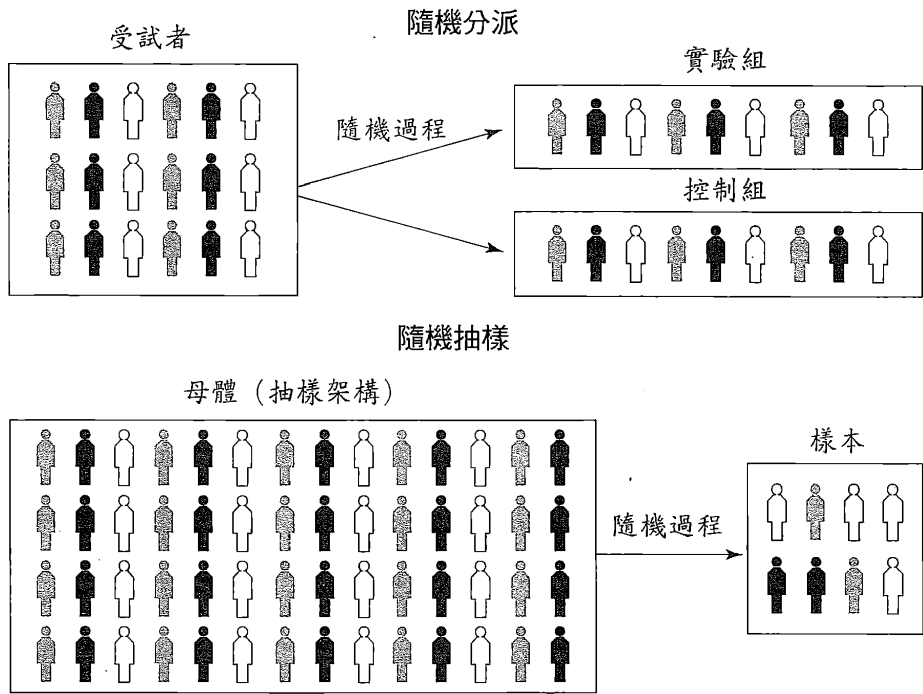


圖9.1 隨機分派與隨機抽樣

如何隨機分派

隨機分派實際上很簡單。研究者從一群個案開始（個人、組織或任何分析單元），經過隨機過程，把這個群體分成兩個或更多群體，如要求人們報數、丟銅板或擲骰子。例如，研究者要把32人分成兩個16人的組群。一個隨機法是把每個人的名字寫在一張紙片上，把紙片放在帽子裡，閉上眼睛搖一搖，然後把抽出的頭16個名字分到第一組，另外16個名字分到第二組。

由於某種情況的隨機分派只給人機率，某種情況可能非比尋常，各群組也可能千差萬別。例如，具有同一特質的所有個案可能歸類到同一群組內，雖然這是不太可能的（見圖9.2的例子）。

第一步：從一群受試者開始。



第二步：設計一個隨機化的方法，這個方法必須是純機械式的（如丟銅板）。

第三步：把丟出「人頭」的受試者分到一組，把丟出「反面」的人分到另一組。



圖9.2 如何隨機分派

配對（Matching）vs.隨機分派

如果隨機分派的目的是得到兩個或更多群組，那麼對照每個群組中個案的特質，不是比較簡單？有些研究者對照群體中每個個案的某些特質，如年齡與性別。配對是隨機分派的替代方案，但它是不常用的。

配對呈現一個問題：要配對的相關特質是什麼？能找到正確的配對嗎？每個個案差異的方式數以千計，研究者不知道哪一個是相關的。例如，研究者比較兩個15名學生的群組。每個群組有8名男性，這就是說另一組應該有8名男性。第一組的男性中只有2名獨子；一名來自離婚的家庭，另一名來自完整的家庭。一個高高瘦瘦的，是猶太人；另一個又矮又重，是衛理公會教徒。若要對照群組，研究者是否必須找一個來自離婚家庭的高瘦猶太獨子，再找一

個來自完整家庭的矮胖獨子，並且是衛理公會教徒？這名高瘦的猶太獨子年齡是22歲，正在唸書，要當醫生。矮矮的衛理公會教徒年齡是20歲，要當會計師。研究者是否也需要對照這兩名男性的年齡與事業抱負？真正的配對很快就變成不可能的任務。

實驗的設計邏輯

實驗的語言

實驗研究有它的語言或成套的術語或概念。你已經知道基本的觀念：隨機分派與自變項、依變項。在實驗研究中，研究計畫使用的個案或人們，以及在他們身上測試的變項叫做**受試者**（subjects）。

❖ 實驗的部分（Parts of the Experiment）

我們可以把實驗分成7個部分。並非所有實驗都有這些部分，有些實驗除了這7個部分之外，還有其他部分。下面要討論的這7個部分構成真正的實驗：

1. 處遇（treatment）或自變項
2. 依變項
3. 預試（pretest）
4. 後測（posttest）
5. 實驗組
6. 控制組
7. 隨機分派

在多數實驗中，研究者創造一種情況，或進入進行中的情況，加以調整。處遇（或刺激或操縱）是研究者所做的調整。處遇一詞來自醫學，醫生照料病人所施行的處遇；醫生介入一個心理或生理

的狀況，加以改變。它是自變項或一群自變項的結合。在較早的測量範例中，研究者開發測量工具或指標（如調查問題），然後應用在個人或個案上。研究者創造一種情況或情境，在實驗中「測量」自變項。例如，自變項是「恐懼或焦慮的程度」；程度分為高度恐懼與低度恐懼。實驗者不是問受試者是否恐懼，而是把受試者放在高度恐懼或低度恐懼的情境中。他們操縱情況，讓某些受試者感覺很害怕，讓另一些受試者沒那麼害怕，以此測量自變項。

研究者花很多工夫來創造處遇。有些小到給不同的受試者群體不同的指示。有些可以複雜到把受試者放到裝滿精密儀器的情境、佈置的場景，或者是設計好的社會情境中，操縱受試者的所見所覺。研究者要這種處遇對受試者有所影響，並產生特定反應、感覺或行為。

例如，一個模仿陪審團的判決是一種處遇。Johnson（1985）要受試者看虐待兒童審判的錄影帶，片中一名男子將他頭骨碎裂的兩歲兒子送到急診室。兩捲錄影帶類似，只是其中一捲的律師辯稱該父是相當虔誠的教徒，所有家事全部依循聖經所載的上帝教誨。另一捲錄影帶的律師則未做此陳述。依變項是判決有罪或無罪，以及判決有罪的建議刑期。Johnson發現，受試者較易判決虔誠信教的父親有罪，並建議較長的刑期，這跟常識推斷剛好相反。

依變項或實驗研究的結果是具體環境、社會行為、態度、感覺或受試者的信念因處遇而造成的轉變。依變項可用紙筆指標、觀察、訪問或生理反應（如心跳或手心出汗）測試。有個例子是Stephens及其同事對幫助殘障人士所做的研究（1985）。在這個實驗中，受試者是經過大學校園的40名男性與40名女性，他們不是遇到一位嚴重肢體殘障而坐輪椅的婦女，就是遇到一位沒有殘障問題的婦女。這名婦女要求他們幫她找半路上丟失的耳環。依變項是受試者幫忙找耳環所花的時間，由近處假裝看書的人測量。

通常研究者測試依變項的次數不只一次。預試是在引進處遇之前，測量依變項。後測在處遇引進情境後，測量依變項。

實驗研究者經常把受試者分成兩個或多個群組，目的是做比較。簡單的實驗有兩個群組，只有一個得到處遇。實驗組是接受處遇或有處遇的群組。沒有接受處遇的群組叫做控制組。自變項有許多不同價值時，使用的實驗組就不只一個。

❖ 進行實驗的步驟

實驗者遵循研究過程的基本步驟，決定題目，把它收縮為可以測試的研究問題，然後發展出帶有變項的假設。一旦研究者有了假設，實驗研究的步驟就水落石出了。

初期重要的一步是籌畫一個詳細的實驗設計（即將討論）。研究者決定要用的群組數目、如何及何時創造處遇的情況、測試依變項的次數，以及受試者群體從頭到尾要經歷的狀況。她也發展出依變項的量數，為實驗做小型測試（見資訊箱9.1）。

實驗本身在研究者找到受試者，並將他們分組後開始。受試者接到明確的、事先規劃好的指令。接下來，研究者在處遇之前，先用預試測量依變項。一組接受處遇。最後，研究者用後測測量依變項。她也在受試者離開之前，訪問他們對實驗的反應。研究者記錄依變項的量數，檢視每組的結果，看看假設是否得到支持。

❖ 實驗中的控制

控制在實驗中很重要。研究者要控制實驗情境的所有層面，好把處遇的效果孤立出來，去除替代的解釋。實驗情境中沒有被研究者控制的層面可能會取代處遇，促成依變項的改變，破壞她建立因果關係的企圖。

實驗研究者用欺瞞來控制實驗場景。欺瞞就是研究者用書面或口頭指示、其他人的行動或場景中某層面，故意誤導受試者。它牽涉到用**同謀（confederates）**或配角——假扮其他受試者的人或旁觀者，但實際上為研究者工作，刻意誤導受試者。研究者用欺瞞控制受試者所見所聽，以及他們信以為真的事。例如，研究者的指令

資訊箱 9.1

進行實驗的步驟

1. 首先直接提出一個適合做實驗研究的假設。
2. 在實際的範圍內，決定要用來測試假設的實驗設計。
3. 決定如何引進處遇，或創造一個引進自變項的情況。
4. 為依變項發展一個有效的、可靠的量數。
5. 設置實驗場景，進行處遇與依變項量數的小型測試。
6. 找到合適的受試者或個案。
7. 將受試者隨機分組（如果隨機分派是用在選擇的研究設計之中），給予詳細的指令。
8. 搜集所有群組依變項的量數資料（如果選擇的設計使用預試的話）。
9. 將處遇引進實驗組（或引進相關的群組，如果有多個實驗組的話），並監測所有團體。
10. 搜集依變項的量數資料。
11. 把真正的實驗目的與理由告訴受試者，向受試者簡報（debrief）。問受試者認為發生了什麼事。如果受試者在實驗的某些層面遭到欺瞞，簡報就很重要。
12. 檢視搜集到的資料，在不同的群組之間做比較。適當的話，可用統計與圖表，判斷假設是否得到支持。

假意引導受試者相信他們正參與團體合作的研究。其實實驗是有關男/女的口語互動，受試者所說的話都被偷錄下來。欺瞞讓研究者控制受試者對情境的定義。它防止他們變換他們的跨性別口語行為，因為他們不知道真正的研究主題。研究者把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錯誤的主題上，引發不知情的受試者「自然地」行動。為求欺瞞逼真，研究者可以發明錯誤的處遇與依變項量數，讓受試者不知道

真正的處遇。在實驗中用欺瞞引發倫理的問題（即將討論）。

設計記號

實驗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設計。**設計記號（Design Notation）**是把實驗設計的部分符號化的速記系統。一旦你學會設計記號，你就會發現比較容易思考、比較各種設計。例如，設計記號用兩行中5或6個符號，表示實驗中各部分的複雜的、一大段描述。它用下列記號：O = 對依變項的觀察；X = 處遇，自變項；R = 隨機分派。各個O依照時間次序，用左下方到右下方的小字標號。預試是O₁，後測是O₂。自變項超過兩個層次時，各個X用小字標明。符號依時間次序從左到右。R是第一個，後面跟著預試、處遇，然後是後測。符號依序排列，每列代表一群受試者。例如，一個三組的實驗有R（如果使用隨機分派），後面跟著三列O與X。各列彼此位居他列之上，因為預試、處遇與後測同時在各組進行。表9.1展示許多標準實驗設計的記號。

設計的類型

研究者把實驗的各部分（如預試、控制組等）組合成**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例如，有些實驗設計沒有預試，有些沒有控制組，有的則有很多實驗組。某些廣泛使用的標準設計有專名。

你應該學習標準設計的理由有二。第一，在研究報告中，研究者給標準設計一個名稱，而非描述它。如果你瞭解標準設計，那麼你在讀報告時，就能瞭解實驗的設計。第二，標準設計舉例說明結合設計各部分的常用方式。你可以用它們做你的實驗，或創造你自己的變種。

這些設計用兩個例子說明。在第一個例子中，研究者要探討的是：如果有安靜的古典音樂或萬籟俱寂，學習的速度是否會快一點。實驗是讓老鼠走迷宮。處遇是古典音樂，依變項則是走完迷宮的速度。在第二個例子中，研究者要探討的是學生看完恐怖電影之

表9.1 實驗設計記號之摘要

設計名稱	設計記號									
古典實驗設計		○		X						○
R		○								○
實驗前設計										
單次個案研究				X						○
單組預試——後測		○		X						○
靜態群組比較				X						○
										○
準實驗設計		X								○
R										○
兩組唯後測										○
間斷性時間數列		○	○	○	○	X	○	○	○	○
同等性時間數列		○	X	○	X	○	X	○	X	○
拉丁四方設計		○	X _a	○	X _b	○	X _c	○		
R		○	X _b	○	X _a	○	X _c	○		
		○	X _c	○	X _b	○	X _a	○		
		○	X _a	○	X _c	○	X _b	○		
		○	X _b	○	X _c	○	X _a	○		
		○	X _c	○	X _a	○	X _b	○		
所羅門四群組設計		○		X						○
R		○								○
				X						○
										○
多因子設計		X ₁	Z ₁							○
R		X ₁	Z ₂							○
		X ₂	Z ₁							○
		X ₂	Z ₂							○

後，是否會接受暴力。處遇是暴力血腥的電影，依變項則是受試者對暴力的態度。

◆ 古典實驗設計

所有設計都是古典實驗設計的變種，這是目前討論到的設計，它有隨機分派、預試與後測、實驗組與控制組。在第一個例子中，

研究者隨機將老鼠分成兩組，測量它們的速度。老鼠在迷宮中跑來跑去，研究者記錄速度；一組老鼠聽到音樂，另一組沒有。在第二個例子中，研究者隨機將學生分成兩組，用問卷測量他們對暴力的態度。一組觀賞一部暴力恐怖電影，另一組觀賞非恐怖電影；然後研究者再次測量態度。

❖ 實驗前設計

有些設計沒有隨機分派，是種妥協或捷徑。這些實驗前設計使用的狀況是在很難用古典實驗設計的時候。它們的缺點是讓因果關係的推論更加困難。

單次個案研究設計 (One-Shot Case Study Design) 也稱為**單組唯後測設計 (one-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單次個案研究設計只有一組、一次處遇、一次後測。由於只有一組，故無隨機分派。在第一個例子中，研究者把一群老鼠放在迷宮中，播放古典音樂，記錄它們的速度。在第二個例子中，研究者放一部恐怖電影給學生看，然後用問卷測量他們的態度。這種設計的一個弱點是它很難確信處遇導致依變項發生。如果受試者在處遇前後都一樣，研究者也不知所以。

單組預試—後測設計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這種設計有一組、一次預試、一次處遇、一次後測。在第一個例子中，研究者測量一群老鼠的速度，在他播放音樂的時候走迷宮，並再次測量它們的速度。在第二個例子中，研究者給一群學生完成一份態度問卷，放映一部恐怖片，然後要他們完成另一份問卷。這是單次個案研究的改進，因為研究者在處遇前後都測量依變項。但它沒有控制組。研究者不可能知道在預試與後測之間是否有處遇之外的事情發生，促成了結果。

靜態群組比較 也稱為**唯後測非同等群組設計 (posttest-only nonequivalent group design)**。靜態群組比較有兩組、一次後測與處遇。它沒有隨機分派與預試。在第一個例子中，研究者有兩組老

鼠。一組走迷宮時有音樂，另一組沒有。她測量每組的速度。在第二個例子中，研究者讓學生自己分成兩組。她放一部恐怖片給一組看，放非恐怖片給另一組看。兩組都完成問卷。這個設計的一個弱點是兩組之間任何後測結果的差異，可能是實驗前各組差異所致，而非處遇之故。

Shively (1992) 研究美國原住民與盎格魯人對西方電影的認知，就是靜態群組比較的實驗。她的假設是個人以族裔為基礎的文化背景，會影響到這個人在電影中看到的或享受相關的主題。Shively 製作 20 名男性原住民與 20 名男性盎格魯人（祖先為歐洲人）的對照樣本。受試者住在美國西部一處原住民保留地一座約 1200 人的鎮上。這兩組的所得、教育、就業狀況、職業與年齡均有對照。他們的年齡在 36 到 64 歲之間。兩組觀賞**搜尋者 (The Searchers)** 這部 1956 年的西部電影，這是約翰韋恩在 1950 年代主演的一部票房冠軍的電影。它演的是標準的「牛仔與印第安人」衝突。電影是在私人家裡放映，觀眾是 5 名族裔背景類似的男性朋友。

Shively 用書面問卷與團體訪問測量他們對電影的觀感（依變項）。她發現兩組都喜歡這部電影，享受它的「動作」，最認同其中主要的「牛仔」角色。沒有人喜歡美國原住民，他們在片中被描述成殘暴的野蠻人，此乃負面刻板印象所致。原住民受試者認同電影中的牛仔，把他們視為當代的美國原住民。有個差異是原住民受試者喜歡其中的荒野景象，以及牛仔生活方式理想化的刻劃，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神話或幻想。相對地，盎格魯人認為電影說的是真的歷史；他們認為這就是現實。另一個差異是美國原住民受試者認定勇敢、剛毅是西部英雄的條件。盎格魯人對此評價並不高，卻把誠實與聰明視為最重要的特質。Shively 間接地操縱自變項，自變項就是受試者的族裔和觀賞電影的結合。她用兩組，但沒有預試，並用對照取代隨機化。

❖ 準實驗與特別設計

這些設計就像古典設計一樣，比實驗前設計更能鑑別因果關係。準實驗設計幫助研究者在各種古典設計難做或不適當的情境中測試因果關係。它們稱為準，是因為它們是古典實驗設計的變種。有些有隨機化，但沒有預試。有些用的群組超過兩組，有些則以一組的長時間觀察取代控制組。一般而言，研究者對自變項的控制力不像古典設計那麼強。

雙組唯後測設計 (Two-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 這和靜態群組比較類似，只有一點例外：群組是隨機分派的。它具有所有古典設計的部分，除了預試之外。隨機分派縮減群組在處遇前有所差異的機會，但沒有預試，研究者不能確信兩組開始在依變項上是一樣的。例如，Johnson與Johnson (1985) 使用雙組唯後測設計。在該實驗中，六年級學生被隨機分派到兩種狀況之一：工作組的分數要看全班學習教材的狀況，或是每一組互相競爭分數的團體。所有群組的種族、性別與能力都是混合的。某些依變項是要測量的，如學業成就、跨種族團體的合作，以及對別人的態度。依變項在群組依指令單位工作10天後才測量。主要的結果是合作的群組比較容易促進合作與跨種族界線的友誼。

間斷性時間數列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在間斷性時間數列當中，研究者使用一個群組，在處遇前後做多重預試的量數。例如，香煙稅維持多年水平之後，於1979年跳升35%。接下來10年，稅率相當穩定。這個假設是香煙稅率增加會降低香煙的消費。研究者畫出1970年到1990年的香煙消費量。研究者指出，香煙消費量在新稅率實施前9年是平穩的，但在1979年下降，接下來10年一直不變。

同等性時間數列 同等性時間數列是另一種長時間的單組設計。它做的處遇不只一次，而是有一次預試，然後是處遇與後測，再來是處遇與後測、處遇與後測等。例如，一部要求戴安全帽的法

案於1975年通過。在此之前，騎機車的人不必戴安全帽。1981年，由於機車俱樂部的壓力，該法遭到廢除。安全帽法案於1989年恢復。研究者的假設是戴上保護的頭盔，可以降低意外中頭部受傷死亡的數目。研究者畫出長時間的頭部傷害死亡率。她發現死亡率在1975年前非常高，在1975與1981年間急劇下降，在1981年與1989年間回升到1975年前的水平，在1989年後又下降，直到現在。

拉丁方塊設計 (Latin Square Designs) 研究者對某些處遇在不同順序或時間次序如何影響依變項有興趣，可以用拉丁方塊設計。例如，地理學講師有三件教具教學生：看地圖、用羅盤、經緯(LL)系統。這些教具可以照任何順序來教，但教師要知道哪種順序最能幫助學生學習。在第一班，學生先學看地圖，然後學如何用羅盤，然後是經緯系統。在另一班，先學用羅盤，再學看地圖，然後學經緯系統。在第三班，講師先教經緯系統，然後是羅盤的使用，最後是看地圖。教師每教完一件就測驗，學期末再來大考。學生分散到各班，這樣教師就能明白是否某種順序的教具教學比別的順序更能促進學習。

所羅門四組設計 (Solomon Four-Group Design) 研究者可能相信預試測量影響到處遇或依變項。預試有時會促使受試者察覺到處遇，或改善他們在後測的表現（見下文測試效應的討論）。Richard L. Solomon發展出所羅門四組設計，處理預試效應的問題。它結合古典的實驗設計與兩組唯後測設計，並分派受試者到四組中任何一組。例如，一位精神治療師要判斷是否新的訓練法能改善病患的應變技巧。工作時用20分鐘測試壓力事件反應的應變技巧。由於病患可能從測試中學到應變技巧，所羅門四組設計就派上用場。精神治療師隨機將病患分成四組。兩組接受預試，其中一組接受新的訓練方法，另一組接受舊的方法。所有四組接受同樣的後測，並比較後測結果。如果這兩個處遇（新方法）組的結果類似，兩個控制（舊方法）組也有類似的結果，精神治療師就知道預試學

習不會是問題。如果有預試的組（一為處遇組，一位控制組）跟沒有預試的組群不一樣，那麼治療師就斷定預試對依變項可能有影響。

多因子設計 (Factorial Designs) 有時研究問題顯示，要看一個以上自變項同時的效應。多因子設計結合兩個和兩個以上的自變項，再予運用。每種變項範疇的組合（有時稱為因素 factor）都要檢驗。每種變項包括數種範疇時，結合的數量就會增加得很快。處遇或操縱的不是每個自變項，而是每種範疇的組合。例如，研究者檢視工作組的產能。研究問題是：在不同團體合作與壓力的組合中，產能是否改變？自變項是「合作層次」與「壓力程度」，依變項則是「產能」。合作層次有兩個範疇，合作與不合作；壓力程度有高、中、低三種。這兩個變項的範疇組合有六種（見資訊箱 9.2）。

多因子設計中的處遇對依變項可有兩種影響：主要效應與互動效應。只有主要效應（main effects）會在單因素或單處遇設計中出現。在多因子設計中，自變項範疇的某種組合也可能有效應。它們稱為**互動效應 (interaction effects)**，因為組合中的範疇互動而產生每個單一變項沒有產生的效應。例如，Bardack 與 McAndrew (1985) 要斷定體態吸引力與適當穿著對決定雇用某人的影響。他們有六張女性的照片，吸引力或高、或普通、或低，衣著適當或不適當。受試者面對的要求是看其中一張照片，再看同樣的履歷表，決定是否雇用此人擔任一家大企業的初階經理職位。兩個變項都影響雇用的決定；也就是說，受試者比較會雇用吸引人的、衣著適當的人。除了這些主要效應之外，實驗者發現互動效應；吸引人又穿著出色的女人，比單單衣著或外表更可能得到工作。這兩個因素組合起來，為雇用的決定多加一股推力，只是體態吸引力的效應比較強。

在合作與壓力對五人工作組產能影響的範例中，這些效應可以看出來。研究者用複雜拼圖在兩個小時內完成的百分比，測量產

能。每個組合有一個分隔的團體，這樣研究者即可把每個變項的層次或範疇數目相乘，計算團體的數目。壓力變項有三種程度，合作變項有兩種程度，所以研究者使用六個團體，每一種組合有一個（見資訊箱9.2）。

研究者付給合作組群受試者的錢，是由五個人平分。競爭組群的受試者拿到的錢，是根據每個人拼對的圖片在全圖中的百分比。在壓力低的情況中，兩小時內每完成1%的拼圖，研究者給這組1塊錢，最高付到100塊。在壓力中等的情況中，她用同樣的支付制度，但若拼圖在1小時內完成，還有50元獎金。在壓力高的情況中，她付100元給完成拼圖的群組，但若沒拼好，就一毛也不給，她也把獎金加倍到200元，如果這個群組在1小時內把圖拼好。

合作因素的主要效應是合作組（不管壓力程度是什麼）的產能比競爭組高。壓力因素的主要效應是壓力增加時，產能也增加，不管該組是不是合作組。資訊箱9.2左邊的圖顯示主要效應。它指出，在每個壓力層次，合作組的表現都優於競爭組。對兩組而言，壓力層次上升，產能也跟著水漲船高。

研究者假設互動效應——也就是說，這兩個因素的某種結合，為依變項產生某種效應，例如，她發現合作組在高壓情境中的表現最好，競爭組在低壓情境中的表現最好，兩組在中度壓力層次的表現不分軒輊（見資訊箱9.2右下的圖）。

研究者用速記法討論多因子設計。「二乘三的多因子設計」寫成 2×3 。它是指有兩次處遇，一次處遇2個範疇，另一次處遇3個範疇。 $2 \times 3 \times 3$ 的設計是指有3個自變項，一個自變項有2個範疇，另兩個自變項有3個範疇。

Valentine-French與Radtke（1989）用 $2 \times 2 \times 3$ 多因子設計，研究受害者反應對性騷擾指責的影響。受試者是卡加利大學自願參加的120名男性與120名女性大學生。研究者把自變項操作化，用錄音帶播放簡短的說明，其中教授保證給學生好成績，如果她或他願意合作，允許教授摟學生的肩膀，讓教授吻她或他的臉頰。實驗者

資訊箱 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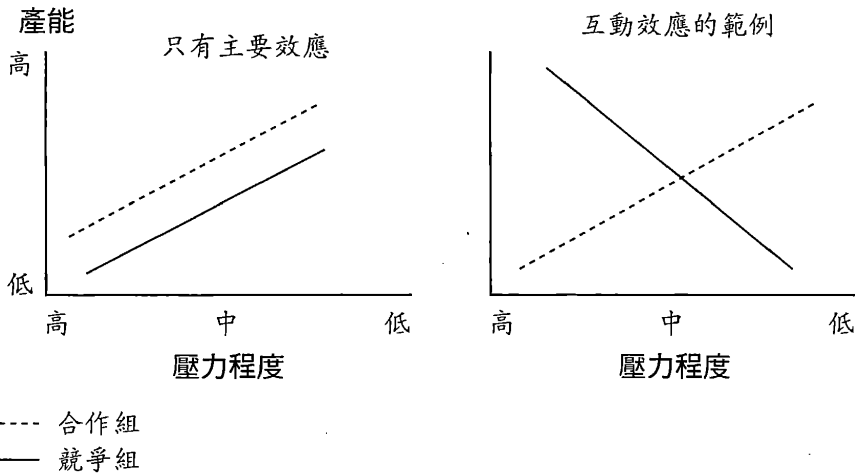
兩變項多因子設計範例

合作層次	壓力程度		
	低	中	高
競爭	1 組	2 組	3 組
合作	4 組	5 組	6 組

設計記號	組號			
1		X ₁	Z ₁	O
2		X ₁	Z ₂	O
3	R	X ₁	Z ₃	O
4		X ₂	Z ₁	O
5		X ₂	Z ₂	O
6		X ₂	Z ₃	O

表中：
 X₁ = 不合作組，X₂ = 合作組
 Z₁ = 低壓力，Z₂ = 中壓力，Z₃ = 高壓力

假設結果的線圖



變換情境，讓學生受害者或男或女，並運用三種結果中任何一種：受害者為此事責怪她或他自己的行為、責怪教授，或毫無反應。這樣受害者的性別與結果就有6種組合。

受試者不知道研究的目的，只聽過錄音帶。實驗者用問卷測量受試者不同的背景特質，也測量主要的依變項——指責的歸因或錯的是誰。他們把變項操作化，做出8項指標，用7分制李克特尺度測量。Valentine-French與Radtko發現，婦女較容易把事件視為性騷擾，責怪教授。受害者自怨自艾時，男性受試者責怪受害者的人數比女性受試者多。這是 $2 \times 2 \times 3$ 的多因子設計，因為3個自變項受到檢驗：受試者的性別、受害者的性別，以及受害者的反應。（也見資訊箱9.3）。

內在與外在效度

內在效度的邏輯

內在效度是指去除依變項替代性解釋的能力。除了處遇之外，影響到依變項的變項是對內在效度的威脅。它們威脅到研究者斷定處遇是依變項變化真正導因的能力。因此，內在效度的邏輯是控制實驗環境，並以實驗設計排除處遇之外的變項。接下來我們探討對內在效度的主要威脅。

對內在效度的威脅

下面是對內在效度的10大威脅。

❖ 選擇偏誤

選擇偏誤的威脅是受試者不會形成同等的群組。它是設計裡面沒有隨機分派所造成的問題。實驗組中受試者的特質影響到依變項時，它就會發生。例如，在肢體暴力的實驗中，處遇組無意中含有

資訊箱 9.3

「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的電視廣告做了什麼？

在1988年總統大選中播放的政治廣告中，威利霍頓惡名遠播。他被控為謀殺犯，在麻州州立監獄的週末假釋後，犯下謀殺與虐待罪。候選人喬治布希播出廣告，抨擊他的對手杜卡吉斯，亦即霍頓獲釋時的麻州州長。雖然其中有誤導的資訊，觀察者卻感覺這個廣告播放的是大眾對犯罪的恐懼。批評者宣稱其中含有種族歧視的訊息，因為觀眾看到的霍頓是美國黑人。

Mendelberg (1997) 設計一個實驗，測試白人觀眾對這樁犯罪或種族歧視的訊息是否有反應。研究的受試者是密西根大學77名白種非西班牙裔學生，年齡中數為18歲。受試者通過現代種族主義指數測試，其中有7項，使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並根據分數分類為有偏見與無偏見。學生隨機分到兩組，觀賞一部50分鐘的新聞節目。他們聽到這個研究是政治競選中「賽馬」對「重大議題」的報導。實驗組在節目中段看一段有關威利霍頓的新聞剪輯，控制組則觀賞一段有關污染，並批評杜卡吉斯的新聞。

受試者在後測時完成一份有關公共議題的問卷，包括犯罪防治與政府縮減種族不平等的計畫。完成後測後，他們接受簡報。實驗用的是兩組唯後測 2×2 多因子設計（種族偏見與否乘以放映威利霍頓廣告與否）。結果顯示廣告談種族的較多，談犯罪的較少。看過霍頓廣告的人並未因此更加支持反犯罪行動，有偏見的觀眾卻更加反對種族平等。作者的結論是：「像霍頓的報導這類隱含種族符號一旦出現，偏見將會引導出美國黑人地位已經改善的認知，以及白人的工作被黑人搶走的感覺……有偏見的人看過霍頓的新聞後，更加反對種族平等。」

足球、橄欖球、曲棍球的球員，控制組則包含音樂家、象棋玩家、畫家。另一個例子是人們躲避頻繁交通能力的實驗。同一組的受試者都來自鄉村，另一組受試者都來自大城市。檢視預試的分數，有助於研究者偵測出這個威脅，因為不應該有群組的差異。

❖ 歷史

這個威脅是一件與處遇無關的事在實驗時發生，影響到依變項。歷史效應在長期實驗中更常有。例如，一項兩星期的實驗要評估受試者對太空旅行的態度，但中途突然有一艘太空船在發射台上爆炸，太空人喪生。歷史效應在先前討論的香煙稅範例中也可能發生（見間斷性時間數列的討論）。如果大眾反煙運動或減少吸煙的廣告也在1979年開始，就很難說較高的香煙稅導致吸煙量減少。

❖ 成熟

這個威脅是受試者在實驗中有某些生理的、心理的、情緒的過程，在長期處遇中脫離。成熟在長時間的實驗中更常見。例如，在推理能力的實驗中，受試者厭倦、想睡，結果分數降低。另一個例子是1年級與6年級小學生遊戲方式之間差異的實驗。遊戲方式受到兒童成長時生理、情緒與成熟的影響，而非處遇或處遇之外的影響。含有預試與控制組的設計幫助研究者判定是否有歷史或成熟的效應出現，因為實驗組與控制組會在時間上展現類似的改變。

❖ 測試

有時預試量數本身會影響到實驗。這種測試效應威脅到內在效度，因為影響到依變項的不只是處遇。所羅門四組設計有助於研究者偵測出測試效應。例如，研究者在學生上課第一天考試。課程就是處遇。她在最後一天上課用同樣的東西考學生，測試學習效果。如果受試者記得預試的問題，影響到他們的所學（如注意到），或者他們如何在後測中答題，這就有測試效應了。如果有測試效應，

研究者就不能說只有處遇影響到依變項。

❖ 工具影響

這個威脅與**穩定信度 (stability reliability)**有關。工具或依變項量數在實驗中改變時，工具影響就發生了。例如，在減重的實驗中，磅秤上的彈簧在實驗中疲乏，造成後測的讀數降低。另一個可能受到工具影響的例子，就是Bond與Anderson所做不願傳遞壞消息的實驗。實驗者要求受試者把智商測驗的結果告訴另一個人，並塗改測試結果，或高或低於平均。依變項是告訴受試者成績所需的時間。有些受試者被告知整個過程有錄影。在實驗中，錄影設備故障，未能錄到某個受試者。如果它沒能拍到的受試者超過一人，或者在過程中只有拍到一段，實驗就有工具影響的問題。（順便一提，只有在受試者以為他們在公開告知時——也就是被錄影時，他們傳遞壞消息的時間才比較長。）

❖ 死亡率

受試者不再持續實驗時，就是死亡或磨損。死亡並不一定是說受試者死掉。如果一小組受試者半途離開實驗，研究者就不知道如果受試者留下的話，結果是否會有差異。例如，研究者的減重實驗開始有50人。實驗結束時，30人留下，每個人減5磅，沒有副作用。這20名離開的人或許和30名留下的人有所差異。或許實驗計畫對離開的人有效，他們在減掉25磅後離開。又或者實驗計畫令受試者生病而被迫離開。研究者應該注意並報出每組在預試與後測的人數，以便偵測這個對內在效度的威脅。

❖ 統計回歸

統計回歸不容易從直覺上理解。它是極端值的問題，或是隨機誤差把群組結果移向平均值的趨勢。它發生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情況是受試者在依變項上非比尋常。由於他們一開始非比

尋常或特別極端，受試者不太可能在同樣的方向上有更進一步的反應。例如，研究者要探討暴力電影是否促成人們的暴力行為。她從門禁森嚴的監獄中選出一群暴力罪犯，給他們預試，放映暴力電影，然後做後測。令研究者驚訝的是，這些罪犯看完電影後，不像先前那麼暴力，沒有看到電影的非囚犯控制組傾向暴力的程度則稍有增加。由於暴力罪犯開始已是極端，處遇不太可能讓他們更加暴力；第二次測試時，單單隨機的機遇，就會讓他們看起來沒有那麼暴力。

第二種狀況牽涉到測量工具的問題。如果許多受試者在某個變項上的分數很高（高到最高）或很低（低到最低），單單隨機的機遇就會在預試與後測之間產生改變。例如，研究者給80名受試者測驗，75名拿到很好的成績。她施予處遇，以提高分數。由於拿到好分數的受試者已經很多，隨機誤差會降低團體平均，因為拿到好分數的人只可能往一個方向移動——答錯某些題目。探討預試的分數，有助於研究者偵測這個對內在效度的威脅。

❖ 處遇擴散或污染

處遇擴散的威脅是不同組的受試者彼此連絡，知道彼此的處遇。研究者避開它的方式是把團體孤立起來，或者要受試者承諾不告知其他即將擔任受試者的人。在休息時，實驗組的受試者把新的記憶法告訴控制組的受試者，這樣控制組就可以使用。研究者需要其他資訊，如實驗後的訪談，以便偵測這個威脅。

❖ 補償行為

有些實驗提出有價之物給一組受試者，但不給另一組，這個差別也為人所知。這種不平等可能產生要求減少差異的壓力、群組之間的對立，或是憤憤不平。除了處遇之外，這些類型的補償行為也能夠影響到依變項。例如，一所學校接受處遇（中餐休息時間拉長），以期學習能有進步。一旦不平等為人所知，控制組的受試者

要求公平對待，並特別努力學習，克服不平等。Smith與Glass（1987: 136）把這種現象稱為約翰亨利效應（John Henry effect）。另一組因不平等待遇而心中不平，退出實驗。這個威脅很難偵測，除非使用外界資訊（見稍早處遇擴散的討論）。

❖ 實驗者期望

實驗者的行為也可能威脅到因果邏輯，儘管傳統上不太把它當做對內在效度的威脅。研究者可能威脅內在效度，不是故意做違反倫理的行為，而是間接把實驗者的期望傳遞給受試者。研究者可能太過投入假設之中，間接把想發現的結果傳遞給受試者。例如，研究者研究人們對殘障者的反應，深深相信女性對殘障者比男性還要敏感。透過相視、抑揚頓挫及其他非口語傳播，研究者無意中鼓勵女性受試者報出對殘障者的正面反應；研究者對男性的非口語行為則剛好相反。

這裡有個偵測實驗者期望的方式。研究者雇用助手，教他們實驗的技巧。助手訓練受試者，測試他們的學習能力。研究者給助手假的成績與記錄，上面顯示一組受試者通過，另一組失敗，但受試者的成績其實一樣。如果假通過的這一組學生表現得比假失敗的學生還好，那就有實驗者期望了。

雙重保密實驗（double-blind experiment）是為控制研究者期望而設計的。在實驗中，與受試者直接接觸的人並不知道假設或處遇的細節。它是雙重保密的，因為受試者與他們接觸的人對實驗細節茫然不知（見圖9.3）。例如，研究者要知道一種新藥是否有效。研究者用三種顏色的藥丸——綠、黃、粉紅——把新藥放在黃色藥丸中，舊藥放在粉紅藥丸中，綠色藥丸則是安慰劑——以假亂真的處遇（沒有任何實際效果的糖果）。給藥並記錄效果的助手不知道哪一種藥丸是新藥。只有另一個不處理受試者的人知道哪個藥丸是新藥，並檢查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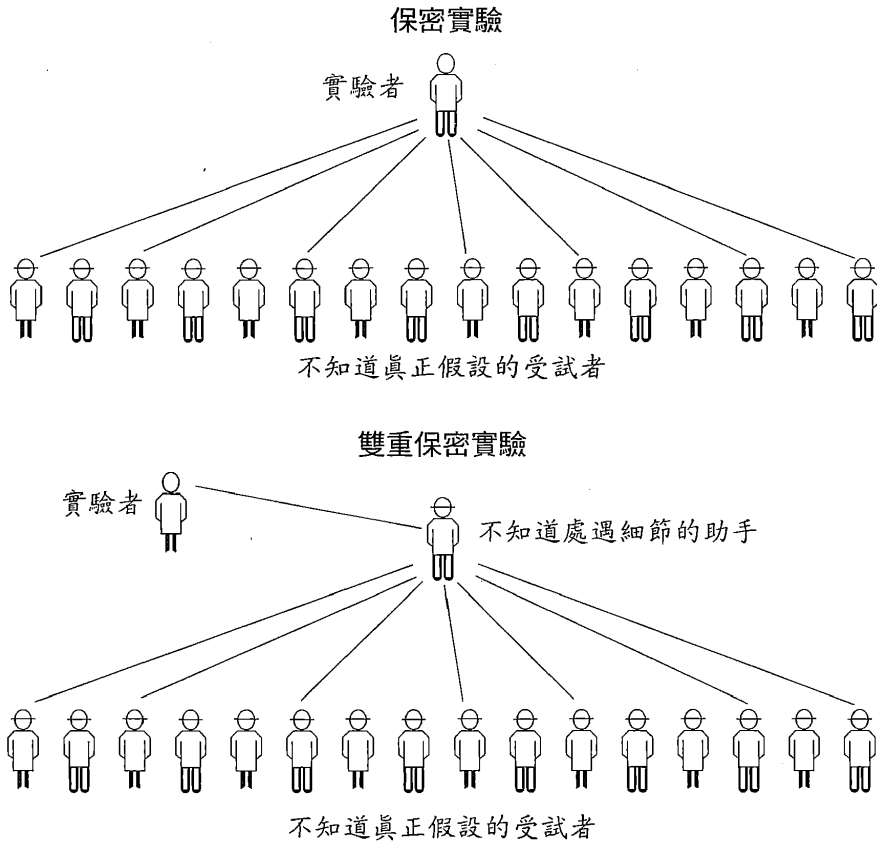


圖9.3 雙重保密實驗：保密普通及雙重保密實驗

外在效度與場地實驗

即使實驗者消除所有內在效度的利害關係，外在效度仍是潛在的問題。外在效度是把實驗發現推論到實驗外事件與環境的能力。如果一個研究缺乏外在效度，它的發現只適用於實驗，對基礎與應用科學皆毫無用武之地。

❖ 寫實

實驗切合實際嗎？有兩種寫實要考量。**實驗寫實**（experimental realism）是實驗的處遇或環境對受試者的影響；它是指受試者處於實驗之中，真的受到實驗影響。如果受試者不受處遇影響，那麼寫實就不夠強，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者花許多工夫創造真實的條件。Aronson與Carlsmith（1968: 25）指出：

所有實驗的程序都是「密謀的」，意思是它們是發明出來的。的確，可以說實驗的藝術主要在於研究者的技巧能否判斷哪種程序最能正確實現他的概念變項，對受試者有最大影響，讓受試者信以為真。

塵世寫實問的是：實驗像真實的世界嗎？例如，研究學習的研究者要受試者熟記4個字母的無意義音節。如果她要受試者學習真實生活中用的實際資訊，而非單為實驗所發明的東西，塵世寫實就會更強而有力。

塵世寫實直接影響到的，主要是外在效度——從實驗推論到現實世界的能力。實驗有兩個層面可以推論。一是從受試者推論到他人。如果受試者是大學生，研究者能把結果推論到多數不是大學生的整個母體嗎？另一層面是從人工實驗推論到日常生活。例如，我們能從在教室裡看兩小時恐怖片的受試者，推論多年來看暴力電視節目的影響嗎？

❖ 實驗反應

受試者在實驗中的反應差異，可能比現實生活中還大，因為他們知道自己處於研究之中；這叫實驗反應。**霍桑效應**（Hawthorne effect）就是一種特殊的實驗反應。此一名稱源自Elton Mayo於1920與1930年代在伊利諾州霍桑西屋電器工廠所做的一連串實驗。研究者調整許多工作條件的層面（如照明、休息時間等），測

量產能。他們發現產能在每次調整後提高，不論調整是什麼。這個有趣的反應之所以發生，乃因工人不是回應處遇，而是回應他們身為實驗一部分而受到的額外注意，他們知道自己被人觀察。後來的研究詢問是否有這樣的狀況，但此一名稱是用來稱呼研究者的注意造成的效應。一個相關的效應是某些新的東西可能隨時間流逝而耗損。Smith與Glass（1987: 148）稱此為**新異效應**（*novel effect*）。

要求特質（*demand characteristics*）是另一種實驗反應。受試者可能從假設或實驗目標中找到線索，根據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的要求而改變他們的行為（也就是支持假設），以便取悅研究者。例如，Chebat與Picard（1988）要探討人們比較容易被片面的（只展示正面特質），還是兩面的（展示正面特質與局限）的廣告說服。他們為一種新肥皂和車子製作專門的廣告，每種都有片面與兩面的廣告。他們放映這些廣告給蒙特婁魁北克大學434名學生看，要求他們填寫問卷，問卷用8分制李克特類型的問題，詢問他們對廣告訊息的接受程度。他們說（1988: 356）：「為避免研究者現身可能引進的任何潛在偏誤或實驗的『要求』……問卷是由研究生擔任的助理收發的。」

最後一種實驗反應是**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這可以在受試者服下安慰劑，卻好像得到真正處遇時看出來。例如，在禁止吸煙的實驗中，給受試者的不是減少他們對尼古丁依賴的藥，就是安慰劑。如果吃到安慰劑的受試者也不再吸煙，那麼參與實驗，並服用受試者相信有助於自己戒煙的藥就有效果。受試者相信安慰劑就是藥，就影響到依變項。

❖ 場地實驗

本章焦點集中在實驗室控制環境下進行的實驗。實驗也可以在真實生活或實地場景中進行，研究者對實驗環境的控制較低。控制量的變化高低不同。一邊是高度控制的實驗室環境，在特殊場景或實驗室中進行；相反的一端則是場地實驗，在「實地」進行——在

自然的場景中，如地下鐵、賣酒的店舖或是公眾人行道。場地實驗的受試者通常不知道他們處於實驗之中，反應的方式很自然。例如，研究者有個同謀在地下鐵車廂中假裝心臟病發作，看看旁觀者有何反應。

Harari 及其同事所做的場地實驗是個極端的例子，做這個實驗是看男性過路人是否試圖阻止意圖強暴行為。這個實驗在聖地牙哥州立大學進行，一個意圖強暴的行為在傍晚孤立的校園路徑上演。這個表演型的攻擊清晰可見，凡是獨自或三三兩兩經過的不知情男性都看得到。在這場攻擊中，一位女學生被躲在灌木後的彪形大漢抓住。那個男人把她拖走，並試圖摀住她嘴，她的書掉在地上。她掙扎叫道：「不要，不要！救命呀，救我呀！」還喊道：「強姦！」躲起來的觀察者告訴攻擊者何時表演攻擊，並記錄受試者的行動。受試者往攻擊地點移動，或是向附近停車場可見的警察求援，就算是救援。研究發現，85%的成群男性與65%的獨行男性做出可以偵測的行動來救這名婦女。

實驗者控制的量與內在、外在效度有關。實驗室的實驗總有較高的內在效度，外在效度卻較低；也就是說，它們的邏輯比較嚴謹，控制較佳。場地實驗總有較高的外在效度，內在效度卻較低；也就是說，它們可以推論的更廣，控制卻較少。準實驗設計比較常見。例如，在意圖強暴行為的演出實驗中，實驗者重新塑造非常真實的情境，具有高度的外在效度。比起把人放在實驗室場景中，問他們在假設的狀況下會怎麼做，它的外在效度比較高。但是，受試者並非隨機分派。任何剛好經過的人就是受試者。這個實驗不能精確控制受試者聽到或看到什麼。受試者反應的測量是根據躲在一旁的觀察者，觀察者可能錯過某些受試者的反應。

實際的考量

每種研究技巧都有其非正式的門路。它們上手實用，依據的是

常識，卻能解釋研究老手成功的研究計畫與研究新手面對的困難之間的差異。這裡討論三個。

籌劃與前導測試

所有的研究計畫都需要籌劃，多數量化研究者使用前導測試。在實驗研究的籌劃階段，研究者思考替代性解釋或內在效度面對的威脅，避開它們。研究者也發展出井然有序的、有條有理的系統，用來記錄資料。此外，她應該投注相當的心力，事先測試任何在處遇情境中使用的儀器（如電腦、攝影機、錄音機等），她必須訓練並事先測驗同僚。在前導測驗之後，研究者應該訪問前導測試的受試者，找出需要改善的實驗層面。

給受試者的指令

多數實驗都要給受試者指令，以便設定場景。研究者應該仔細地用言語表達指令，依照準備好的劇本，這樣所有的受試者才能聽到同樣的指令。這是確保效度。用到欺瞞的時候，指令也很重要，因為要創造寫實的封面報導。Aronson與Carlsmith（1968: 46）指出：「實驗新手最常犯的錯誤，就是指令說明太短。」

實驗後訪談

實驗結束時，研究者應該訪問受試者，這有三個原因。第一，如果用到欺瞞的話，研究者需要向受試者簡報，告訴他們實驗的真正目的，並回答問題。第二，她能夠從受試者所想的，以及她們對情境的定義如何影響她們的行為之中學到東西。最後，她能夠解釋不把實驗真實本質告訴其他潛在受試者的重要性。

實驗研究的結果：做比較

比較是所有研究的關鍵。仔細研究實驗研究的結果，研究者能

夠學到許多內在效度面臨的威脅，以及處遇是否影響到依變項。例如，前面討論過 Bond 與 Anderson（1987）傳達壞消息的實驗，在這個實驗中，私人與公開場合平均各需要 89.6 與 73.1 秒來傳達好分數的消息，傳達壞分數消息的時間則需要 72.5 或 147.2 秒。比較顯示，在公開場合中傳達壞消息所需時間最長，在私人場合中傳遞好消息的時間稍長。

這種比較在表 9.2 中有個比較複雜的範例，這個例子是五個一連串用古典實驗設計的減重實驗。在範例中，安立克瘦身診所實驗組的 30 名受試者平均減掉 50 磅，控制組的 30 名受試者則 1 磅都沒減。只有一個人中途退出實驗。蘇珊科學節食計畫也有同樣戲劇化的結果，但她的實驗組有 11 人中途退出。這表示實驗組有死亡率的問題。卡爾抗卡路里的實驗組受試者減了 11 磅，控制組則減了 2 磅，但控制組與實驗組剛開始的體重差異平均有 31 磅。這表示有選擇偏誤的問題。娜姐莉營養中心沒有實驗死亡或選擇偏誤的問題，但實驗組減掉的體重沒有比控制組多，這顯示處遇沒有效果。寶琳減磅也避開選擇偏誤與實驗死亡的問題。在她的實驗組當中，受試者減掉 32 磅，但控制組的人也減掉這麼多。這表示可能有成熟、歷史或處遇擴散的效應。由此觀之，安立克瘦身診所的處遇似乎是最有效的。

倫理絮語

在實驗研究中，倫理考量是重要的議題，因為實驗研究是侵擾性的（也就是說，它干預到人）。處遇可能把人置於設計好的社會場景之中，操縱他們的感覺或行為。依變項可能是受試者所言所行。侵擾的數量與類型受到倫理標準的限制。如果是把受試者放在危害人身，或是令人窘困、引發焦慮的情境中，研究者必須非常小心。他們必須仔細監測事件，控制發生的情況。

欺瞞在社會實驗中司空見慣，但它牽涉到誤導或對受試者說

表9.2 古典實驗設計減重實驗之結果比較

安立克瘦身診所		娜坦莉營養中心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組	190(30)	140(29)	實驗組	190(30)	188(29)
控制組	189(30)	189(30)	控制組	192(29)	189(28)
蘇珊科學節食計畫		寶琳減磅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組	190(30)	141(19)	實驗組	190(30)	158(30)
控制組	189(30)	189(28)	控制組	191(29)	159(28)
卡爾抗卡路里		比較用的符號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前測試	實驗後測試
實驗組	160(30)	152(29)	實驗組	A(A)	C(C)
控制組	191(29)	189(29)	控制組	B(B)	D(D)

比較

	A-B	C-D	A-C	B-D	(A)-(C)	(B)-(D)
安立克	1	49	-50	0	-1	0
蘇珊	1	48	-49	0	-11	0
卡爾	31	37	-8	-2	-1	0
娜坦莉	2	1	-2	-3	-1	-1
寶琳	1	1	-32	-32	0	-1

- A-B 這兩個團體開始的情況一樣嗎？如果不一樣，選擇偏誤有可能發生。
- C-D 這兩個團體的結果一樣嗎？如果不一樣，處遇可能無效，或者有強烈的歷史、成熟或擴散或處遇效應。
- A-C 實驗組是否改變？如果沒有改變，處遇可能無效。
- (A)-(C) 實驗組或控制組的受試者數量是否有變？如果很多人退出，實驗死亡率可能威脅到內在效度。
- (B)-(D)

詮釋

- 安立克 對內在效度的威脅不明顯，有處遇效果。
- 蘇珊 實驗死亡率的威脅是可能有的問題。
- 卡爾 選擇偏誤是可能的問題。
- 娜坦莉 對內在效度的威脅不明顯，沒有處遇效果。
- 寶琳 歷史、結合、擴散等對處遇的威脅是可能有的問題。

註：數字是平均磅數。括弧內的數字是每組的受試者。隨機分派用於實驗組或控制組。

謊。這樣的不誠實不能讓人原諒、接受，只有在達成目標別無他法時，才能接受。即使是有價值的目標，欺瞞也只能有限使用。欺瞞的量與類型不應該超過最低限度所需要的，而且受試者應該獲得簡報。

結論

在本章，你學到隨機分派與實驗研究的方法。隨機分派是創造兩（或更多）組的有效方法，這些群組可以等量齊觀，並做比較。一般而言，實驗研究為因果關係提供精確與相當清楚的證據。它依循實證論的途徑，產生的量化結果可用統計分析。

本章也檢視實驗的各部分，以及它們如何能結合起來，產生不同的實驗設計（見資訊箱9.4）。除了古典設計之外，你學到實驗前與準實驗設計。你也學到如何用設計記號表示它們。

你學到內在效度——實驗內在邏輯的嚴謹度——是實驗研究中的重要觀念。內在效度受到的威脅，就是取代處遇的另一種解釋。你也學到外在效度，以及場地實驗如何將外在效度極大化。

實驗研究真正的優點是它為因果確立證據的控制力及邏輯的嚴謹。一般而言，實驗總是比其他技巧容易複製，沒那麼昂貴，花的時間也比較少。實驗研究也有局限。第一，有些問題不能用實驗法處理，因為控制與實驗操控不可能用於這些問題。另一個局限是通常一次測試一個或少數假設。這樣會把知識弄得支離破碎，因而必須綜覽許多研究報告，才能綜合各種研究成果。外在效度是另一個潛在的問題，因為許多實驗依賴的是大學生的小型非隨機樣本。

你學到仔細的檢視與結果的比較如何提示你注意研究設計中潛在的問題。最後，你也知道實驗中有實際與倫理的考量。在下一章，你會看到調查研究與其他研究技巧。非實驗法的邏輯與實驗法大相逕庭。實驗只把焦點集中在少數假設上。他們通常有單一的依變項、少數的受試者群組，以及研究者引進的自變項。相對地，其

資訊箱 9.4

用實驗做評估研究

在稍早第二章你讀過的研究中，Wysong 及其同僚（1994）用實驗評估 D.A.R.E.（反毒教育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計畫的效果。既然你對實驗的瞭解更多，就來評估它的設計。

作者檢視兩組學生，這兩組學生不是隨機分組的，分組也沒有模式。D.A.R.E. 計畫的實驗組是在7年級時加入的；控制組不是。處遇就是參與 D.A.R.E.，這個計畫是由受過訓練的警察到學校報告並討論。這個計畫宣示要幫助學生抵抗同儕逼迫喝酒與吸毒的壓力，提昇學生的自尊心。依變項包括第一次吸毒時的年齡、吸毒的次數，以及學生的自尊心。作者在處遇後四年測量變項，判斷處遇對學生升上高中後的行為是否有持續的效果。作者比較這兩組的依變項時，他們發現沒有什麼差異。他們無法拒斥計畫沒有效果的虛無假設。

他社會研究者一次就測試許多假設。他們測量一大群自變項與依變項，使用一大群隨機抽樣的受試者。他們的自變項通常是受試者先前就已存在的狀況。

重要名詞

古典實驗設計	多因子設計	安慰劑
補償行為	場地實驗或實地	安慰劑效應
控制組	霍桑效應	後測
簡報	歷史效應	實驗前設計
欺瞞	互動效應	預試
要求特質	間斷性時間數列	準實驗設計

設計記號	實驗室實驗	隨機分派
處遇擴散	拉丁方塊設計	實驗反應
雙重保密實驗	成熟	選擇偏誤
同等性時間數列	死亡率	所羅門四組設計
實驗設計	塵世寫實	靜態群組比較
實驗組	新異效應	受試者
實驗寫實	單次個案研究	處遇
實驗者期望		

問題回顧

1. 實驗的七個元素或部分是什麼？
2. 實驗前設計與古典設計的差異是什麼？
3. 哪種設計允許對不同順序的處遇做測試？
4. 研究者說：「這是一個 3×2 的設計，自變項是恐懼的程度（低、中、高）與脫離的容易度（容易 / 困難），依變項則是焦慮。」這是什麼意思？假定只使用後測的隨機分派，設計記號是什麼？
5. 間斷性與同等性時間數列設計有何差異？
6. 內在效度的邏輯是什麼？控制組的使用如何嵌入這個邏輯？
7. 所羅門四組設計如何展示測試的效果？
8. 雙重保密實驗是什麼？為什麼要用它？
9. 場地或實驗室實驗是否有較高的內在效度？外在效度呢？請解釋。
10. 實驗寫實與塵世寫實的差異是什麼？

調查研究

導論

調查中研究問題的適切性

調查研究的歷史

調查研究的邏輯

何謂調查？

建立調查的步驟

建構問卷

撰寫問題的原則

增加受訪者的記憶

問題類型與答案類別

「開放式」對「封閉式問題」

措辭的藝術

問卷設計

調查類型：優缺點

郵寄與受訪者自行進行的問卷

電話訪問

面對面訪談

特殊情境

成本

訪談

訪員的角色

訪問的階段

訪員訓練

訪員的偏誤

文化意義與調查訪問

運用電腦協助的電話訪問

合乎倫理的調查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每一種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調查在內，都只是近似知識。每一種都提供了對真實不同的一瞥，在單獨使用時都有其限制。進行調查之前，研究者應該先確認這是不是研究此問題的最適當方式。調查對某些問題來說是有高度價值的，像是瞭解民意，但對某些問題則毫無意義。

——Warwick and Lininger, *The Sample Survey*, pp.5-6

導論

某人拿一張紙給你，上面列滿問題。首先這麼寫著：「我希望瞭解你對於Neuman研究法教科書的意見。」你認為這個問句是：(1)很有組織的，(2)有適度組織的，或是(3)沒有組織的？對於這個問題你或許不會太過驚訝。這就是一種調查，我們現在應該對這些調查都很習慣了。

調查是社會學中最普遍使用的資料蒐集技術，它也用在許多其他領域。事實上，似乎太過普遍了。人們有時候會在應該問：「什麼是最適當的研究設計？」時則說，「作個調查吧」以取得資訊。除了調查的普遍性外，這麼容易進行一個調查也可能導致誤導或結果根本沒有價值。好的調查需要思慮與努力。「調查，誠如其他科學工具，能被善用也能被誤用」(Bradburn and Sudman, 1988: 37)。

所有調查都立基於專業的社會研究調查。本章你將會學到一個好的調查應具備的主要成分，以及調查方法的限制。

調查中研究問題的適切性

調查研究是社會科學中一種好的方法。正如調查專家Robert Groves所言，「調查所取得的資訊是自然統計所得，調查是頭量化之獸」(1996: 389)。調查問許多人（亦即所謂的受訪者[respondents]）有關其信念、意見、特質、以及過去和現在的行為。

如果研究問題是關於信仰或行為的自陳報告，則用調查是很適當的。當受訪者給予的答案可以用變項來測量時最有利。研究者通常在一次調查中會問許多問題，測量許多變項（經常有多重選項），並檢驗數個假設。

雖然類別會有重疊，但是以下資訊還是可以在同一次調查中蒐集：

1. **行為** 你一天刷幾次牙？上一次的市長選舉你是否有投票？你最近一次拜訪親近的親戚是什麼時候？
2. **態度／信念／意見** 你認為市長的工作內容是什麼？你認為人們在你背後說你壞話嗎？你認為最近國家面臨最大的問題為何？
3. **特質** 你是已婚、從未結婚、單身、離婚、分居或是寡／鰥居？你屬於某個工會嗎？你的年齡多少？
4. **期待** 你在未來12個月打算買新車嗎？你認為你的孩子未來教育程度為何？你認為城裡的人口會增加、減少或是維持相同數量？
5. **自我歸類** 你認為自己是自由派、中間路線或是保守派？你會將自己的家庭歸在哪個社會階層？你會自稱是虔誠信仰者或是無神論者？
6. **知識** 上次選舉選出的市長是誰？本市中大約有多少百分比的人口不是白人？在我國私自擁有Karl Marx的「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是合法的嗎？

學者提出警告，認為調查中應避免問「為什麼」（例如：你認為犯罪為什麼發生？）。

調查研究的歷史

現代調查可以回溯到早期的普查形式。普查（census）包括某區域所有人口的特質資訊。普查係基於人們告訴調查官或是官員的觀察。舉例而言，Domesday Book就是英格蘭在1085至1086年間由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所主導的一項很有名的普查。早期的普查針對需要課稅的財產或是應服兵役的年輕男性人口作調查。隨著代議民主制度的發展，官員運用普查人口數來指派區域選舉代表的產生。

調查有一段很長而多變的歷史，其運用在美國及英國社會研究則始於社會改革運動和社會服務專業中，記錄了都市貧窮的狀態以

及隨之而來的工業化初期。最初，調查運用問卷及其他資料來全覽整個區域，當時還沒有科學樣本與統計。例如，1851至1864年間，Henry Mayhew出版了4卷的「倫敦勞力與倫敦貧窮」(London Labour and the London Poor)，資料來自與街頭人民的對話和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而Charles Booth的17卷「倫敦人民的勞動與生活」(Labour and Life of the People of London, 1889-1902)以及B. Seebohm Rowntree的「貧窮：城鎮生活研究」(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1906)。美國也有類似的資料，如「赫爾館地圖與報告」(Hull House Maps and Papers of 1895)和W.E.B. DuBois的「費城黑人」(Philadelphia Negro, 1899)。

社會調查 (social survey) 運用在現代量化與質化調查研究則成長於社區中。從1890年代到1930年代，在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社會研究實務中「社會調查運動」(Social Survey Movement)成了顯學。社會調查運動利用系統的實證調查來支持社會政治改革目標。時至今日，社會調查可被稱作行動導向的社區調查，從1940年代中期，現代的量化調查取而代之。

早期的社會調查是針對特定區域，並以許多量化與質化資料來源為基礎鉅細靡遺的實證研究，大多是探索性與描述性的。研究者希望告知社會大眾工業化的問題，並對社區人民民主決策過程提供資訊。早期社會調查的一些領導者（如赫爾館和睦鄰組織運動的Florence Kelly與Jane Addams以及非裔美人W.E.B. DuBois等等）因為種族和性別歧視的問題而無法安全無虞地在大學中工作。社會調查對社區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圖像。例如，1914年出版了6卷的「匹茲堡調查」(Pittsburgh Survey)就是以面對面訪談瞭解現存的衛生、犯罪和工業傷害的統計資料、以及直接觀察為基礎所撰。

在美國，自192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四股力量大大改變了社會調查，使之成為現今的量化調查研究。首先是研究者以抽樣技術和精準的測量來進行統計，特別是在「文獻摘要」(Literary Digest)氾濫之後。其二，研究者發展出量表和指標來有

系統地蒐集關於態度、意見、與社會生活有關的各個面向的資料。第三，許多人也發現將調查及其變化運用在各個不同領域的用途：市場調查的發展運用在研究顧客行為上；記者利用調查來測量輿論以及收音機的影響；宗教組織和慈善機構運用調查以確認需求；政府機關運用調查改進農業和社會問題的服務；另外，許多社會科學家也開始使用調查所得的實證資料進行基礎研究。

此外，大多數實證社會研究朝向複合式的研究方法並把焦點集中在區域性的社會問題。這種重新導向創造了繼自然科學後所謂「科學的」方法模式。社會研究變得更加專業、客觀、而不政治化。這樣的重新導向是受到下列因素刺激：(1)研究者和學術單位的情況、聲望和經費；(2)在美國大躍進時代（Progressive Era, 1895-1915）結束後，研究者從社會改革的理想轉向；和(3)一項由幾大基金會（Carnegie, Rockefeller與Sage）所贊助的量化、實證主義的社會研究計畫。

調查研究的擴張與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尤其是在美國。在華盛頓特區的社會學術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自工業聚合後即開始進行戰爭的努力。調查研究者研究士氣、消費者需求、產品用處、軍隊宣導、以及爆破的效果。戰時，企業也協助社會學術研究者和實務工作者從進行大型調查中學習經驗。學術研究者幫助實務工作者瞭解精確的測量、抽樣和統計分析，而實務工作者則針對如何進行大型調查的組織工作教導學術人員實務面的技巧。

二次大戰後，政府不再挹注大量資源在調查研究上。也就是說，將經費移轉他用。同時，部分美國議員也擔心其他人可能會將調查結果更進一步用在社會政策上，像是解決失業或對那些居住在南方種族隔離的非裔美人提倡平權。

許多研究者因此轉向大學、或是創設新的社會研究組織。剛開始，大學很猶豫是否要擴張調查研究，因為這很昂貴並涉及太多人。此外，傳統的社會調查者對於在私部門運用量化研究是很謹慎的。應用研究人員的文化和企業導向的民意調查者最大的問題在於

缺乏統計的訓練。然而，調查在運用上仍不斷成長。這樣的成長並不只限於美國。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三年，法國、挪威、德國、義大利、荷蘭、捷克、斯洛伐克和英國等國家，均成立了國立調查研究機構（Scheuch, 1990）。

除了一開始的不確定性外，調查研究在1970年代開始成長。舉例來說，在1939到1940年間，社會學期刊中大約有18%的文章運用了調查方法；1964到1965年上升至55%。美國的高等教育及社會科學領域在1960年代，調查研究的運用亦急遽成長擴張。更多人學習調查研究，此法也獲得普遍認可。以下是影響戰後調查研究成長的五大因素：

1. **電腦** 在1960年代，社會科學家開始有效運用電腦科技協助進行大規模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如今，電腦已成為大多數調查資料分析不可或缺的工具。
2. **組織** 在美國的大學中，新的社會研究中心內，有愈來愈多專家有興趣在於量化調查。1960年以降，大約有50個這樣的研究機構產生。
3. **資料庫** 1970年代，開始有資料庫的建立，用來儲存並將大型調查資料提供作為次級資料分析之用（詳見第11章）。許多受訪者在各個變項上的調查資料的蒐集、保存、及分享，造就了調查運用的擴張。
4. **資金** 大約有10年的時間（1960年代至197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大舉擴充對社會科學研究的補助。在1960到1970年代中葉開始衰退之前，聯邦政府對社會科學研究與發展，大約擴張了10倍之多。
5. **方法論** 1970年代，開始進行實質的研究以增進調查效度，在此時也開始修正調查技術中的錯誤。此外，研究者開始改善量化資料的統計分析並教給年輕學者。1980年代，新的認知心理學理論開始應用在調查研究上（Sudman等，1996）。

如今，不論是在大學內外，量化的調查研究都成為一種主流。光在美國，專業的調查工業可能就雇用了超過60,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兼職人員、助理或半專業人員。大約6,000位全職的專業人員在進行調查的設計與分析。

研究者在大學和研究中心運用調查進行基礎研究。許多領域的研究者（傳播、教育、經濟、政治、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學）進行並分析調查。許多美國的大學都設有調查研究中心。主要包括有柏克萊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芝加哥大學的全國意見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以及密西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SR）等。

許多應用領域大量依賴調查：政府、行銷、私部門的政策研究、與大眾媒體。世界各國的地區及全國性的政府組織經常經由調查來改革政策制訂。私部門的調查研究可區分為三部分：民意調查機構（如：蓋洛普）、行銷企業（如：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等）以及非營利研究組織（如：數學政策研究機構）。

主要的電視與報紙媒體都會進行固定的調查。Rossi機構發現（1983: 14）有174個民調是由大眾媒體所贊助，並指出「在媒體上民調跟漫畫以及星座討論一樣多！」此外，還有許多家戶調查。商業、學校、及其他組織針對受雇者、案主、學生等進行的小規模調查，則指向特定應用的問題。

調查研究者另外形成了專業組織。美國民意研究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成立於1947年，贊助一個針對調查研究的學術期刊，稱為「民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美國調查研究組織委員會（Council of American Survey Research Organization）則是針對商業民調公司所成立。還有國際性的調查研究組織——世界民意研究協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過去30年間，在學術界內外，量化調查已經變成社會研究上一種廣泛應用的技術。雖然關於如何進行一個好的調查這方面的知

識仍不斷成長，調查應用的探索早已超過用調查技術作為一種測量人類社會生活方法的發展。

調查研究的邏輯

何謂調查？

在實驗中，研究者將受訪者組成一個小群體然後以幾個變項檢驗一或兩個假設。對施測的反應主題是由研究者所創造。研究者透過觀察施測和依變項的關係，並控制其他影響因素來顯示施測的時機。

相反地，調查研究者選出許多樣本回答相同問題。測量許多變項、檢驗許多假設、並從過去的行為、經驗、或特質等推論出時間順序。舉例而言，受教育的時間長短或受訪者的種族便優先於目前的態度。變項間的關係則以統計方法來測量。

實驗會在物理環境上控制其他條件。調查研究者在計畫進行調查時則會去思考其他的條件，並測量代表其他條件的變項（即控制變項），然後用統計來解釋造成的效果，以排除其他條件。

調查研究經常被稱之為關聯性的研究。調查研究者運用控制變項找出近似值，這些東西是實驗研究者運用物理性的變項控制所取得的。

建立調查的步驟

調查研究者遵循演繹的法則。研究者以理論或應用研究問題為始，以實證測量和資料分析為終。當研究者決定調查是適當的方法時，研究計畫的基本步驟就可以分為幾個次步驟，詳見（圖10.1）。

在第一個階段，研究者首先要發展出研究工具——調查問卷或訪談大綱——以測量變項之用。用問卷時，受訪者自行閱讀這些問題並選出答案；訪談大綱則是一組問題，由訪問者對受訪者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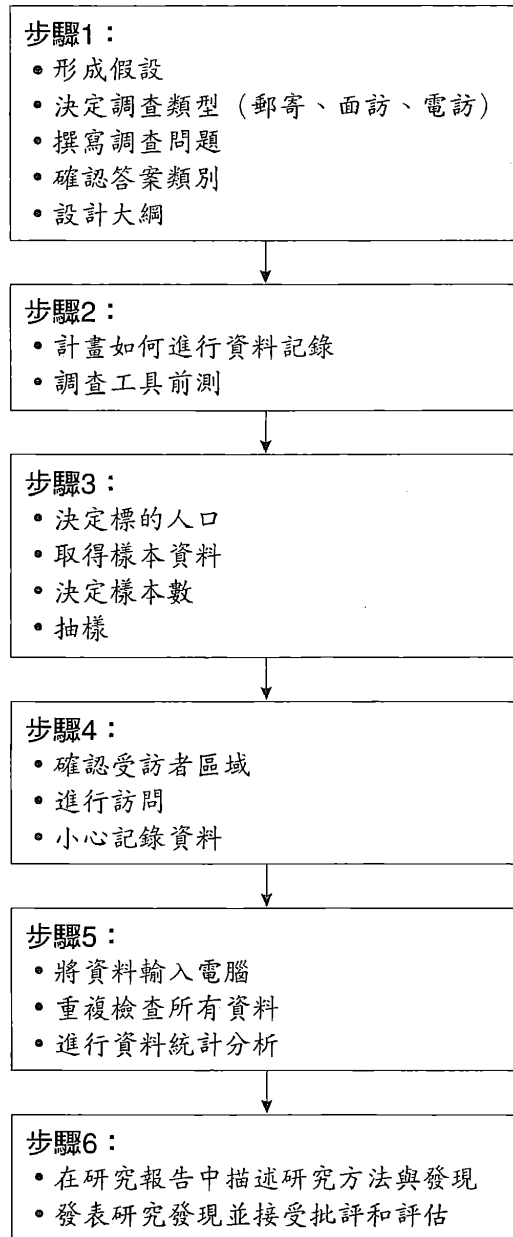


圖 10.1 調查研究過程的步驟

並由訪員記錄答案。為簡化以下的討論，本文皆以問卷代替之。

調查研究者將變項以問題的形式概念化、操作化。將問題清楚、完整地重複寫下來，並以研究問題、受訪者、以及調查的類型（此部分容後敘）為基礎，重新將問題組織在問卷上。

在準備問卷時，研究者要先思考該如何記錄、組織資料以為分析之用。要透過一小群與最終受訪者特性相仿的人進行問卷的前測。研究者還要用問卷來訓練訪員。在前測中，研究者要問受訪者問卷題目是否清楚以及試圖瞭解的意義是否清楚。在此階段研究者也要進行抽樣規劃。

計畫階段之後，研究者已經準備好要蒐集資料了。此階段通常比計畫階段短。研究者可能親自、透過電話、或透過信函接觸到受訪者，而受訪者則被交付一些如何完成問卷或訪談的指示。接著就是問題，而後是簡單的刺激／反應或問題／答案的形式。研究者要立即正確地記錄下答案。在所有受訪者都完成問卷後，就要準備將這些資料組織起來並加以統計分析。

調查研究可能相當複雜、昂貴，並牽涉到許多人和許多步驟。調查研究的行政工作需要組織並維持正確的紀錄。研究者要追蹤每個受訪者、每份問卷以及訪談。比方說，研究者給每個受訪者一個序號，這同時也要顯示在問卷上。然後透過受訪者名單再檢查完整的問卷。接下來，研究者就要檢視個別問卷中的答案，儲存原始問卷，並將問卷中的訊息轉化成特定形式以進行統計分析。必須進行所有細節的編碼以及製作標籤，否則，研究者可能會發現有用的資料和所有努力將付諸流水。

建構問卷

撰寫問題的原則

一份好的問卷形式上是完整的，研究者要使所有問題環環相扣

才能順利進行下去。包括說明如何圈選、指示要清楚、甚至是透過一個或數個問題來測量每個變項。

好的調查問題要符合兩個原則：避免混淆以及將受訪者的觀點謹記在心。優良的調查問題給研究者有效且有信度的測量，同時也幫助受訪者瞭解問題並認為自己的答案是有意義的。問題不應該混淆了受訪者的觀點，否則就不是好的測量。如果受訪者異質性很高、或是與自身生活經驗相差很多時，調查研究者要格外注意。

研究者同時也面臨一個兩難困境。他們希望每個受訪者都聽到相同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不是對所有受訪者都一樣清楚、相關且有意義呢？如果受訪者的背景與參考架構不同，相同的字眼也會有不同意義。沒錯，如果要針對受訪者量身訂作每份問卷，則無法進行比較，研究者將無法知道是不是問題寫法不一樣導致不同的答案。

撰寫研究問題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需要技術、練習、耐心以及創意。在撰寫調查問卷的問題時有10點應該避免的，舉例如下，下列清單並不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錯誤，只是比較常見的問題。

1. **避免用術語、俚語或縮寫** (Avoid jargon, slang, and abbreviations.) 專業術語可能會以許多形式出現，例如鉛管工人講「小蛇」(snakes，即鉛管通條)，心理學家常講伊底帕斯情節等。俚語則是某個次文化中使用的術語，比方說，遊民說的「雪鳥」(snowbird，即海洛因上癮者)或是滑雪者說的「熱狗」(hotdog，即在雪上賣弄技巧)。同時也要避免用縮寫，NATO通常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但對於受訪者來說，可能代表其他意義(像是全國自助旅行者組織National Auto Tourist Organization、阿拉斯加原住民貿易範圍Native Alaskan Trade Orbit或是北非茶葉公司North African Tea Office)。除非是調查對象非常特定，否則避免使用術語和俚語，而要選擇受試樣本瞭解的字彙和文法。對一般大眾而言，就是用電視或報紙上所使用的

語言（大約是八年級學童能瞭解的詞彙），調查者要知道，並不是所有受訪者都瞭解一些基本的學術用語。舉例來說，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學歷在高中以下（約為美國人口的20%），這些人在瞭解跟性有關的一些字時，像是陰道插入（vaginal intercourse），會有困難（Binson and Catania, 1998）。

2. **避免語意模糊、混淆（Avoid ambiguity, confusion, and vagueness.）** 語意模糊是許多問題撰寫者最大的苦惱。研究者建立假設時可能根本沒有考慮到受訪者，例如這個問題：「你的所得多少？」可能指週薪、月薪或年薪；家庭收入或個人收入；只算薪資或包含其他收入。混淆則使得受訪者在理解問題和作答時產生不一致性。如果研究者想知道的是「去年度全家稅前年度所得」，那就要清楚地問。

另一個不確定性的來源是使用不確定的字眼或是答案類型，像是下面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固定慢跑嗎？是……否……」，問題在於「固定」這個字。某些受訪者可能將之定義為每天，某些人則定義為每週。要減低受訪者的混淆並取得更多資訊，就要作到特定——問是否「每天慢跑一次」，「每週數次」或「一週一次」等問題（詳見資訊箱10.1，如何改善問題）。

3. **避免情緒性的字眼和聲望的偏誤（Avoid emotional language and prestige.）** 有些字彙具有暗示性意義以及精確的意思，就像是社會中某些職稱或位置（例如：總裁、專家等）代表聲望、地位，而帶有強烈情緒暗示的字眼並連接到高社經地位的人，很可能使受訪者在回答調查問題時戴上了玫瑰色的眼鏡。

使用中性的語言。避免帶有情緒性包袱的字眼，因為受訪者可能針對此情緒性字眼發言而非針對議題本身。比方說，這樣的問題「你對於付贖款給威脅要奪取愛好和平者自由的謀殺恐怖主義者，這樣的政策有何看法？」就是充滿了情緒性字眼——像是謀殺的、自由、奪取、和平等。

同時也要避免帶有聲望的偏誤——關於有名的人或組織。受訪

資訊箱 10.1

改善不清楚的問題

以下是3個由有經驗的專業研究者所撰寫的調查問題。他們在前測後發現有15%的受訪者要求澄清題目或是給了不恰當的答案(如：不知道)，而對原先的撰寫方式加以修改。如你所見，問題的撰寫實在是一門藝術，是可以透過練習、耐心和前測來改善的。

原始問句	有問題之處	修正後的問句
你固定運動嗎？	怎樣才算運動？	你是否固定做任何運動、嗜好、生理上的活動等，包括走路在內。
一週中平均幾天會吃奶油？	人造奶油算不算？	下個問題與奶油有關——不包括人造奶油。你一週中有幾天會吃奶油？
[以下問題跟蛋有關] 你普通一天中有幾餐有蛋？	一餐中有幾個蛋？何謂普通的一天？	在有吃蛋的日子裡，你通常會吃幾顆蛋？

	對問題的回答		要求澄清的百分比	
	原始	修正	原始	修正
運動的問題(答「是」的百分比)	48%	60%	5%	0%
奶油的問題(答「沒有」的百分比)	33%	55%	18%	13%
蛋的問題(答「1個」的百分比)	80%	33%	33%	0%

資料來源：改編自 Fowler (1992)

者的答案可能會指向對這些人或組織的感覺而非對議題本身。例如，當你說「大多數醫生認為香菸容易導致肺部疾病。你是否同意？」就會影響人們傾向同意醫生的說法。或是這樣的問題：「你是否贊成總統對科索沃的政策？」可能會使那些從來沒聽過科索沃的受訪者也會因為總統而左右其觀點。

4. **避免模稜兩可的問題** (Avoid double-barreled questions.) 每個題目都只針對一個主題發問。模稜兩可的問題包含了兩個或以上的問題，這會使受訪者的答案模糊不清。舉例而言，如果問「這個公司是否有年金和健康保險？」如果只有一項則受訪者可能回答有或沒有。答案語意不清，研究者就無法確知受訪者的意圖。Labaw (1980: 154) 指出，「在撰寫問題上最基本但也是最經常會被忽略的原則就是，一個問題只問一個概念。」如果想要問兩件不同的事——例如公司的健保和年金——就應該分成兩個問題來問。

此外，如果是變項關係上的實證測量，要注意不要混淆了受訪者對於變項間關係的看法。例如，研究者想知道，那些上課笑話講得比較多的老師，學生給予的評量等級是不是比較高？兩個變項分別是「老師講笑話」和「老師的評量等級」。錯誤的問法是：「如果老師講比較多笑話，你是不是把老師分數打得較高？」這樣的問法表示不論學生怎麼想，他們評分都是依據老師的笑話，而無法測量出彼此的關係。正確的問法應該是問兩個問題：「你如何評量老師的等級？」和「老師在課堂上講多少個笑話？」而後研究者可以分析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是否相關。對關係的想法和真正存在的關係間是有差異的。

5. **避免引導式問句** (Avoid leading questions.) 讓受訪者覺得所有的答案都是合理的，不要讓他們察覺到某些答案是研究者想要的。引導式問句即為在文字編排上讓受訪者選擇某個答案。引導式問句有許多種，例如這個問題：「你不抽煙，是不是？」就引導受訪者選擇不抽煙的答案。

引導式問句的陳述可以獲得正面或負面的答案。比方說，「市

長應該再花更多稅收在修理馬路嗎？」就引導受訪者傾向不同意，如果這樣問：「市長應該修理坑坑洞洞、危險的路面嗎？」則導向贊同的答案。

6. **避免問受訪者能力所無法回答的問題** (Avoid asking questions that beyond respondents capabilities.) 問一些很少人知道的問題只會讓受訪者感到很挫折而降低答案的品質，受訪者沒辦法總是記得過去的細節而且可能不知道一些特定的資訊。舉例來說，問一個成年人「當你6歲時對你的哥哥有什麼感覺？」可能沒有什麼意義。請受訪者選擇一個他根本不瞭解的答案（例如外交上的專業議題或組織內部的政策）可能還是會獲得一個答案，但那或許是不可信且無意義的。如果許多受訪者都對某個議題不熟悉時，則應該使用開放式問題來討論。

而系列的問題是要瞭解受訪者如何思考的題目。例如，很少受訪者有辦法回答「你去年一年中加了多少加侖的汽油？」受訪者或許有辦法回答每週加油的量，而研究者自行乘以52就能得到整年的加油量了（見Sudman等，1996: 197-226）。

7. **避免錯誤的前提** (Avoid false premises.) 請不要用一個受訪者可能並不同意的前提來開始一個問題，然後再來問這個問題的可能答案。受訪者如果不同意這個前提或許會覺得很挫折而不知該如何作答。例如這個問題：「郵局開放時間太長了。你希望郵局每天是延後4小時營業或提前4個小時關門？」則會讓那些不論是贊同與否的人都覺得答案沒有意義。

比較好的問題是讓受訪者假設前提為真，而後再要求其選擇。舉例來說，「假設郵局必須縮減營業時間，你認為哪樣比較方便，是延後4小時營業或提前4小時關門？」回答一個假設性的情境是不太可信賴的，但如果是比較精確的狀況則可以減低挫折。

8. **避免問未來的意圖** (Avoid asking about future intentions.) 避免問受訪者他們在假設情境下可能會做的事。受訪者對行為都不是好的預測者。像是這種問題「假如街角新開一家雜貨店，你會在

那邊買什麼？」通常是浪費時間。最好是問現在或最近的態度和行為。一般而言，受訪者在回答關於自己經驗中較特定、具體的問題時比較可信賴，而那些在他們立即經驗以外的抽象事務則相反。

9. **避免雙重否定 (Avoid double negatives.)** 雙重否定在一般的文法上是不正確且容易造成混淆的。例如，「我不會沒有工作」邏輯上表示受訪者有工作，但在此第二個否定則表強調之意。這種明顯的錯誤很少見，但是有些比較隱性的雙重否定也會混淆視聽。尤其當受訪者被問到同意或不同意某項陳述時，這種混淆更會升高。例如，受訪者不同意「學生的畢業考不需要考閱讀測驗」在邏輯上就是雙重否定，因為是「不同意」「不要」作某件事。

10. **避免重複或偏重某種答案類別 (Avoid overlapping or unbalanced response categories.)** 讓答案或選項互斥、周延、且平衡。互斥表示答案彼此間沒有重疊。如果重疊的選項是數字範圍

(像是5-10，10-20，20-30)是很容易修正的(改成5-9，10-19，20-29)，而語意上還有另一種重疊的答案——例如，「你滿意你的工作或是有不滿意之處？」這種問題。周延則表示每個受訪者都找到適當的選項。舉例來說，「你目前有工作或是失業？」就會讓那些目前未就業但並不認為自己是失業的受訪者(像是家庭主婦、在度假的人、學生、無能力就業者、退休的人等)被排除在外。研究者通常第一個會想到的是他想測量的變項然後才想到受訪者的環境。比方說，當問及受訪者的就業狀態時，研究者想知道的是第一份工作的資訊還



「我們還在討論」

是所有的工作？全職工作或是包含兼職工作？只針對有支薪的工作或是包括未支薪及志願服務等工作？

另外，還要讓答案的類別均衡。不均衡的選擇像是，「市長的表現如何：傑出、非常棒、很好或是還可以？」另一種不均衡的問題則省略了一些訊息——例如，「你比較喜歡哪一位市長候選人：Eugene Oswego或是其他人之一？」

研究者可以藉著提供相反的答案來加以均衡。我們很容易看出「誠實」和「不誠實」有不同的意涵。要求受訪者選出市長是否不是非常誠實和要求他選出市長不誠實的等級是不一樣的。除非有特定目的，否則最好提供受訪者正反均衡的選項（Ostrom and Gannon, 1996）——例如，「你認為市長：非常誠實、誠實、既非誠實也非不誠實、不誠實或是非常不誠實？」詳見（資訊箱10.2）偏誤的類型。

增加受訪者的記憶

近年來，調查研究者試著探討，當受訪者在回答問題時，能夠正確回憶過去行為以及事件的能力有多少。這在口述歷史研究中是相當具有爭議性的議題，而必須不斷重複收集資料，這對於針對新近發生事件的調查研究也是一個重要議題。要正確地回憶起發生的事件比起填答問題所花的時間要多得多。隨著時間流逝，一個人所能正確回憶的能力也降低。一項針對住院處遇的犯罪受害者之研究指出，雖然大多數受訪者可以記住過去幾週所發生的重要事件，但是一年之後有一半的人就記不真確了。

調查研究者承認記憶比我們所以為的還不可靠。它被許多因素所影響——主題（具威脅性或一般社會性的）、同時以及後續發生的事件、該事件對受訪者的重要性、情境條件（問題的用語和訪問形式）、以及受訪者內在一致性的需求。「目前為止證據顯示，對於事件和任務的記憶難度遠超過我們原先所假設的，真實世界所發生的事件迅速地被遺忘」（Turner and Martin, 1984: 296）。

資訊箱 10.2

偏誤的調查問題

以下問題採自我收到的郵寄問卷。前兩個問題來自議會。你認為這些題目是沒有偏誤的嗎？

1. 某些倡導者賦予總統職權以刪除一些大型的特定預算。他們說「否決權」可以防止國會通過浪費的政治撥款性法案。你是否相信否決權可以協助控制政府浪費性的支出？

a. 是 b. 否 c. 不確定

2. 耕作是我國最危險的工作之一，但是，在許多郊區的農業州，獲取基本健康照顧服務，包括醫療服務，仍有很大的限制。你認為威斯康辛州郊區的居民是否需要建立更好的醫療服務管道？

a. 是 b. 否 c. 不確定

以下兩個問題則取自1998年4月美國政黨的郵寄問卷，稱之為「1998調查的年度爭議性議題大選」。事實上這是一個政治宣傳和募款活動，但以問卷的形式包裝。

3. 如今4個家庭平均繳交年度所得相當大比例計24%給聯邦政府。而州和地方稅率則向上爬升至40%、50%、預計未來甚至可達80%。更糟的是，納稅人還必須面對國稅局一萬七千頁的法條——導致數以百萬的納稅人聘請專業人士代為處理，在這部分就花了20億元。我國稅制和國稅局的改革對你來說重要嗎？

a. 是 b. 否 c. 不確定

4. 備受尊崇的葛立斯委員會指出，我國稅收中有搖擺不定的35億完全浪費在糟糕的委託程序、不善的管理、混亂的簿記、有缺點的契約管理、人事浮濫、以及其他浪費的方案上。削減政治撥款

性支出和減低政府浪費對你來說重要嗎？

a. 是 b. 否 c. 不確定

上述問題包括了一些調查問題在撰寫時應該避免的偏誤：情緒性字眼。像是「浪費的政治撥款性法案」、「我國最危險的工作之一」、「相當大比例」、「搖擺不定的35億」、「完全浪費」等。

聲望的偏誤 像是「備受尊崇的葛立斯委員會」。

引導式問句 這類題目在進入問題本身之前，就先提供過多偏於某方的資訊，並傳遞出一種偏向某方的態度。試舉問題2為例：「你認為威斯康辛州郊區的居民是否需要建立更好的醫療服務管道？」，很少人會不同意這種陳述，但卻避開了政策上真正的問題：應該怎樣輸送醫療照顧？健康照顧要提供到什麼程度？服務該如何付費？

錯誤的前提 這種問題提供的資訊有限。認真質疑或不同意某些陳述的讀者，可能找不到適當的回答。就問題1來說，如果我並不認為國會「通過浪費的政治撥款性法案」那該如何？

雙重訊息 最後兩個問題是問受訪者他們是否認為重要；同時也問受訪者是否同意針對問題的某種特殊修正（即：「重大的改革」和「減少政府浪費」）。

不平衡的答案 最後兩個問題用了是/否這樣的形式來暗示你同意重要與否，或是無法決定。這種回答形式無法表現出此議題重要的程度，以及對修正案的態度是支持或反對。受訪者覺得有點重要或覺得有點問題的，在此並無適當答案可選。

受訪者回憶的複雜度並不代表調查研究者不能問過去的事件；反之，他們需要更謹慎地設計題目並解釋結果。研究者應該提供受訪者一些特殊的指示和額外思考的時間，也應該提供增強受訪者記

憶的方式，像是時間或地點的參考訊息。不要只是問：「去年冬天你多常參加體育活動？」而應該說：「我希望知道你去年冬天參與過多少體育活動。逐月來看，請回想一下十二月，你去年十二月曾花錢買門票參與任何體育活動嗎？現在，再想想一月，你一月時參加過任何體育活動嗎？」

Mooney和Gramling（1991）研究指出運用增進記憶技術的重要性。他們問學生在飲酒行為中兩種不同類型的問題，發現標準的問題，像是「平均而言，你一個月中有幾天會喝含酒精的飲料（葡萄酒、啤酒、烈酒）？」以及「你平均一次喝多少？」這樣的結果遠低於問在12個場所（例：酒吧、親戚家、兄弟會／姊妹會聚會所等）喝酒量的總合。這種增進記憶的技巧會減低遺漏的可能性而增加正確性，但不會導致過度估算。許多受訪者會壓縮回答——當問到頻率的問題時，把時間壓縮而過度報告新近發生的事件。有兩種技術可以減少這種現象：情境重組（例如：要求受訪者先回想特殊情境再問相關問題）以及重新組合（例如：分別問幾個特定問題而後加總——先問一週喝幾杯酒再計算一年的量）。調查研究者問到過去的事件或行為時，即使只是過去幾年，也要這樣小心進行。

問題類型與答案類別

❖ 「有威脅性」對不具威脅性的問題

研究者有時候會問到一些較具敏感性或是讓受訪者感到威脅的問題。許多受訪者認為關於性行為、用藥或飲酒、偏差行為、心理衛生、非法行為或有爭議性的公共議題等問題會有威脅性，因此研究者在問這些問題時要格外小心。

具有威脅性的問題範圍很廣。受訪者可能希望在訪問者或研究員面前呈現正面的形象而非回答真正的答案，他們可能覺得可恥、尷尬、或是害怕提供真實的答案，反之，提供的是受訪者認為正常或社會認可的答案。這是所謂的社會期許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這種社會壓力會導致對真實情境過高或過低的回應（詳見表10.1）。

人們經常會過度誇張自己是個好公民（例如，投票、瞭解社會議題）、資訊充分有文化教養（如，閱讀、參與文化活動）、成就道德責任（如，有工作、固定捐款）、或是家庭生活美滿（如，婚姻美滿、親子關係良好）。舉例而言，丹佛市的受訪者被問到是否捐款給慈善機構，經過核對慈善機構的紀錄發現，34%的人自陳有捐款實際上卻不然。

因為大多數人希望表現出正面的自我形象，造成自己是普通人的期待，「錯誤或誇大社會期待的行為比起不正確的細節、錯誤或縮減社會不讚許的行為要來得多」（Wentworth, 1993: 180）。當研究者想得知社會期待的行為時，他需要問比較多特定的問題，並運用

表10.1 具威脅性的問題和敏感議題

主題	不易獲得資料的百分比
手淫	56
性交	42
吸食大麻	42
吸食興奮劑和麻醉劑	31
酒醉	29
愛撫和親吻	20
收入	12
與朋友賭博	10
飲酒行為	10
快樂與福祉	4
教育	3
職業	3
社交活動	2
一般休閒	2
體育活動	1

資料來源：改寫自 Bradburn and Sudman (1980: 68)

技巧增進受訪者的記憶。

人們也會傾向隱瞞疾病或障礙（例如，癌症、精神疾病、性病）、參與非法或不正當行為（例如，漏稅、用藥、酗酒、不正當的性行為等）、或隱藏財務狀況（例如收入、存款、負債）（詳見表 10.2）。

調查研究者創造出一些技巧以增進這些具威脅性問題答案的真實性，包括問題本身的遣詞用字；研究者應該在暖身後再問具威脅性的問題，當訪員已經和受訪者建立了信任關係後，就應該告知受訪者他們希望獲得誠實的答案。可以透過說明命題、舉例的方式讓受訪者易於誠實作答。例如，以下是一個針對雙性戀男性的問題，「過去的研究中，許多男人指出他們曾經與男性有過性經驗。這可能發生在青少年期之前、青少年期、或是成人之後。你在生活中的某個時期是否有過與男性的性經驗？」反之，標準的問題可能會是：「你是否曾經與男性發生或性關係？」

訪員的性別也會影響答案。Catania和同事（1996）發現，當訪員是男性，針對一般問題有3.5%的人回答「是」，而針對說明式的問題則有8.2%的人作此回答；當訪員是女性時，百分比依次為

表 10.2 在調查中被誇大或隱瞞的行為

	扭曲或偏誤的答案百分比		
	面對面訪談	電話訪談	自陳量表
低度威脅 / 普通性			
投票行為	+15	+17	+12
提名初選	+39	+31	+36
有圖書證	+19	+21	+18
高度威脅			
破產	-32	-29	-32
酒醉駕駛	-47	-46	-54

資料來源：改寫自 Bradburn and Sudman (1980: 8)

3.2%和4.0%。作者也指出，「關於第一次性經驗、青少年期的貞操等問題，在問男性時有被誇大的情況，而問到女性則反之」（Catania等，1996: 367）。

另外，如果將具威脅性的問題包裝進入更嚴重的問題中，似乎比較不會被偏離隱瞞。例如，受訪者在第一次被問到順手牽羊的問題時，可能不太敢承認，但如果在問了一連串關於搶劫、偷竊的問題後才問，受訪者比較可能會承認，因為這顯得不那麼嚴重了。

另一種技術包括問題的形式。某些調查方法對於那些具威脅性的問題來說有最大的匿名性。因此，郵寄問卷和自陳量表所得到的答案可能比面訪或電訪來得誠實。另一種可以協助有效取得威脅性問題答案的技術是「電腦協助的自行進行問卷訪談」（computer-assisted self-administered interviews, CASAI）。這種方法中，受訪者「被訪問」的方式是坐在電腦前，透過鍵盤、螢幕（或耳機）來選取答案。某研究指出，在一般性調查中有44到66%的受訪者回答他們曾經抽過大麻，而透過CASAI則可以得到最多人承認（或最誠實）的回答。研究也發現，CASAI技術的成效會因受訪者的年齡、種族、和不信任的程度而有不同。

另一種針對面訪中威脅性問題的發明是「隨機反應技術」（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RRT）。這種技術運用本書末所附的亂數表，但基本概念是運用已知的機率去預測未知的百分比。接下來是RRT的作法：訪問者給受訪者兩個問題，其一是具威脅性的（例如「你施打海洛因嗎？」），另一個則不具威脅性（如「你出生在九月嗎？」），而後用隨機的方法（像是擲銅板）選一個問題作答。訪問者不知道被選中的問題是哪一個，而只是記錄下答案。研究者則利用隨機結果的機率理論和非威脅性行為的頻率來推測敏感行為的頻率。

❖ 知識性問題

研究指出大多數人無法回答像是地質組成或重要的政治文件

(像是獨立宣言)等問題。研究者可能想知道受訪者對此一議題的瞭解程度，但知識性的問題也可能變得具有威脅性，因為受訪者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很無知。

如果先問事實性的資訊，可能在調查態度上會好一點，因為很多人都沒有正確事實知識。舉例而言，Nadeau與其同僚（1993）發現，大多數美國人高估了少數人口的比例，美國成人中只有15%的人回答正確（正負6%），指出美國人口中非裔美人為12.1%。有一半以上的人認為非裔美人超過30%。類似的，猶太人佔美國人口3%，卻有60%的美國人以為有10%。其他研究也發現，美國人認為外交事務增加美國的支出，他們的想法立基於對一些計畫支出過度的預測。當被問到比較喜歡多少的外交事務支出，他們給的百分比事實上遠超過目前的支出比例。

再舉另一個例子。有65%的美國人指出他們最主要的考慮是希望能負擔子女念大學的費用，但是大多數人超估了公立大學的學費約6800元，是實際支出的兩倍（Archibald，1998），他們也超估了私立大學的學費高達5600元，並低估所能得到的財務補助。關於公共知識的調查能夠釐清一些錯誤認知，但是研究者要很小心地措辭。

首先，研究者要針對研究問題作前測，以確認問題的難易度適當。如果有99%的受訪者回答不出來，那就得不到什麼訊息。這種知識性的問題在措辭上要經過修飾，讓受訪者即使回答他們不知道也不會感到不舒服——例如，「如果有的話，你聽說過多少有關……」

受訪者可能高估了他們的知識或是對某人某事的瞭解。檢查的辦法之一是運用「測謊題」（sleeper question）——受訪者不可能會回答的問題。舉例而言，一項選出受訪者認為的美國民權領袖的問題中，將一位虛構的人名納入選項，結果有15%的人選擇「知道」這個人。這顯示他們真正知道的領袖中，可能有15%的人是不認識的。另一個方法是要求受訪者，針對他們所選的名單，「解

釋一下你對這個人的認識」。

❖ 跳過或是列聯式問題

研究者應避免問和受訪者無關的問題。的確，某些問題只適用於特定受訪者。**列聯式問題**（contingency question）是問題有兩個或更多部分，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決定受訪者接下來要回答哪一個問題，藉此選擇誰是第二個問題相關的受訪者。有時候也稱之為**螢幕或跳躍式問題**（screen or skip questions）。在第一個問題答案的基礎上，受訪者或訪員按照指示進到另一個問題或是跳過某些問題。

以下是例子之一，改寫自 deVaus（1986: 79）。

1. 你是否出生於澳洲？

[] 是（請回答第2題）

[] 否_____

(a) 你出生於哪一國？_____

(b) 你在澳洲居住幾年？_____

(c) 你是澳洲國民嗎？

[] 是 [] 否

現在進入第2題

「開放式」對「封閉式問題」

在調查研究中，關於開放式或封閉式問題一向有很大的爭議。「**開放式問題**」（open-ended question，或稱非結構式、自由作答的）即問一個問題，受訪者可以給予任何答案（例如：「你最喜歡的電視節目為何？」）；而「**封閉式問題**」（close-ended question，或稱結構式、有固定選項的）則是問一個問題，並提供受訪者固定的答案來選取（例如：「你認為總統的表現非常好、好、普通、或是不好？」）

每一種形式都各有優劣（詳見資訊箱 10.3），重要的不是哪一種是最好的，而是在哪種情境下用哪一種是最恰當的。研究者選擇開放式或封閉式問題取決於研究計畫的目的和實際的限制。採用開放式問題則訪員必須寫下文字性的答案，並且要花很多時間在編碼上，這對某些特殊研究計畫來說可能是不實際的。

大規模的調查多採取封閉式問題，因為這樣對受訪者和研究者來說都比較快速也比較容易。的確，要迫使人將其信念和感覺在研究者所擬出有限的選項中選出來，可能會遺漏掉一些重要的訊息。要知道受訪者的想法、發現對受訪者來說重要的價值觀、要問有許多可能回答的問題（像是年齡），開放式問題可能是最好的。此外，敏感性問題（如：性行為、飲酒量）用開放式問題所獲得答案可能比較正確。問題形式的缺點可以藉著將開放式和封閉式問題混合的作法來減緩。題型混合也能改變步調且有助訪員建立關係。階段性探詢（即：訪員的追蹤式問題）採取封閉式問題可以再提醒受訪者當初選擇的原因。

訪員每隔一段時間詢問一下受訪者的想法也是一種確認其是否瞭解研究者問題意圖的作法。然而，這種探詢並不是清楚列出的問題或是對受訪者列出一個表單來確認。除非清楚說明，否則這個動作可能會影響那些沒有定見的受訪者的答案。話說回來，在彈性或對話式的訪談中，針對複雜的議題、受訪者不那麼清楚的選項、或是在表達意見上有困難時，訪員運用此種技巧的確可以增加答案的正確度。舉例而言，像是「你上週是否用任何方法賺錢？」這種問題會讓受訪者在作答時感到遲疑，而訪員再追問：「你能否告訴我你到底作了什麼工作？」，那受訪者可能會說：「星期三和星期四，我花了幾個小時幫我的死黨搬家，他給我40塊，但我沒有作其他任何有支薪的工作。」如果研究者只想知道一般性的雇用工作，那這種追問就導致了誤解。研究者也用「部分開放式問題」（partially open questions，即，一組固定的選項，最後加上「其他」），如此一來可以讓受訪者提供原先研究者沒有涵括在內的答案。

資訊箱 10.3

封閉式VS.開放式問題

封閉式的優點

- 對受訪者而言，比較容易作答而迅速
- 不同受訪者的答案易於比較
- 答案易於編碼並作統計分析
- 容易對受訪者澄清答案選項的意義
- 受訪者會比較願意回答敏感性問題
- 對問題來說，不相關或混淆的答案比較少
- 對口語表達能力不佳的受訪者而言，比較容易作答
- 容易複製

開放式的優點

- 回答數量不限
- 受訪者可以詳細作答，並確認答案的細節
- 可能會發現未預期的答案
- 對複雜的議題也可提出適當的回答

封閉式的缺點

- 提出的意見可能是受訪者從沒有過的
- 沒有意見或不瞭解的人也可以作答
- 如果受訪者想要的答案不包括在選項內，則可能感到挫折
- 如果答案選項很多（例如：20個），則可能造成混淆
- 沒注意的話，可能會對題目產生誤解
- 受訪者的回答彼此間區隔可能不大
- 可能產生抄寫錯誤或選錯答案
- 迫使受訪者針對複雜的議題選出簡化的答案
- 迫使受訪者作出在現實世界可能不會作的選擇

開放式的缺點

- 不同的受訪者提供答案詳細的程度不同
- 受訪者可能在無關緊要的細節上大加著墨
- 比較和統計分析相當困難
- 資料的編碼困難

- 可以提供有創造性的、自我表述的答案、以及豐富的細節
- 可以呈現出受訪者的邏輯、思考過程和參考資料
- 口語表達能力佳的受訪者佔優勢
- 對沒有方向的受訪者來說，題目可能過於一般化
- 回答必須以文字記錄，對訪員來說不易
- 受訪者需付出大量的時間、思索和精力
- 受訪者可能覺得題目具威脅性
- 問卷中答案佔據大量篇幅

完全採封閉式問題可能會造成偏誤。舉例來說，一個研究開放式問題和封閉式問題的研究發現，當問到「國家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受訪者依循著所列舉答案的順序來作答，Schuman和Presser（1979: 86）指出，「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依照題目所提供的選項依序排列順序，不論那是不是真正符合受訪者本身的優先順序。」另一個研究指出，分別採用開放式和封閉式問題問受訪者在工作中哪些是重要的，開放式問題中，有一半的受訪者所提供的答案是封閉式問題中所沒有的答案。

開放式問題對於早期或探索性的研究而言尤具價值。對大規模的調查來說，研究者會用開放式問題作前測，再以這些答案發展出封閉式問題。Glock（1987: 50）指出：

調查研究中主要的資料是在研究計畫形成階段的質化訪談資料。這類訪談，樣本雖小但具代表性，是獲知變異的本質以及操作方式之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

研究者在撰寫封閉式問題時必須下許多決定。選項該有幾個？應該給予中間選項嗎？答案的排列順序為何？採什麼類型的答案？

該如何測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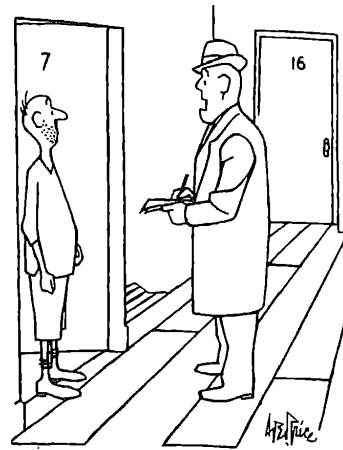
要回答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舉例而言，兩個選項顯然太少，但超過五個又不見得好。研究者想要測量有意義但不想搞砸了。愈是特定的選項就會獲得愈多資訊，但太多又造成混淆。例如將以下的問題：「你滿意你的牙醫嗎？」（用是 / 否作答）改成「你對你的牙醫滿意程度為何？非常滿意、尚可、不太滿意、或是非常不滿意？」如此一來就給了研究者比較多的訊息，也給受訪者較多選擇。

❖ 沒有意見和中間選項

調查研究者之間產生很大的爭議在於，是否要提供中性的、中間的和不可選的選項（如：「不確定」、「不知道」、或「無意見」）。這裡可能會產生兩種錯誤：當受訪者實際上有意見卻選擇了中間選項，或是當受訪者真的沒意見卻被迫選一個答案。研究者也試著避免錯誤的正向答案（不知道卻回答某一意見）以及錯誤的負向答案（有意見卻回答不知道），而又以前者更要避免（Gilljam 與 Granberg, 1993）。

許多人擔心受訪者會選擇中間選項以避免作出選擇，沒錯，但是最好還是提供中間選項，因為人們傾向會對虛構的議題、目標或事件表達意見，因此藉由提供中間選項（或無意見），讓研究者可以認出那些選中間選項或無意見的人。

無意見選項的議題可以藉由三種態度問題的區別來達成：標準形、半過濾



「下一個問題：我相信生活是在游移於道德與需要間的需求上為取得平衡而不斷掙扎且摻雜了反覆交替的快樂和悲傷的情緒並帶著這有苦有樂的回憶在人生的小徑上徐徐前進直到不小心跌了一跤而踏入死亡的境地，同意或不同意？」

資料來源：Drawing by Geo. Price;
© 1989 The New Yorker
Magazine, Inc.。

式、和全過濾式問題 (standard-format, quasi-filter, and full-filter questions)，詳見 (資訊箱 10.4)。標準形問題不提供「無意見」的選項，受訪者必須是主動提出此一回答；半過濾式問題提供受訪者「無意見」的選擇；而全過濾式問題則是一種特別的系列問題，首

資訊箱 10.4

標準形、半過濾式、和全過濾式問題

標準形問題

以下是一個針對其他國家的問題。你是否同意以下的敘述：「俄羅斯的領導人基本上希望和美國站在同一邊」？

半過濾式問題

以下是一個針對其他國家的問題：「俄羅斯的領導人基本上希望和美國站在同一邊」。你同意、不同意或是無意見？

全過濾式問題

以下是一個針對其他國家的敘述，並非每個人對此都有意見。如果你沒有意見，請照實提出。敘述如下：「俄羅斯的領導人基本上希望和美國站在同一邊」。你是否有意見？如果有的話，是同意或不同意？

不同問題形式答案的例子

	標準形 (%)	半過濾式 (%)	全過濾式 (%)
同意	48.2	27.7	22.9
不同意	38.2	29.5	20.9
無意見	13.6*	42.8	56.3

*表自動作答

資料來源：改編自 Schuman 和 Presser (1981: 116-125)。標準形資料取自 1978 年秋季；半過濾和全過濾式取自 1977 年 2 月。

先問受訪者是否有意見，然後深入問那些有意見的人。

如果沒有「無意見」這個選項時，很多受訪者還是會回答問題，但是如果有「無意見」，則可能選這個答案，或是當問到時才說沒有意見。這種受訪者被稱為**猶疑者 (floaters)**，因為他們總是在給答案到不知道之間猶疑。這些人的答案受到用字的影響，因此研究者應該用半過濾式或全過濾式問題將之篩選出來。過濾式問題無法找出所有不存在議題的答案，但可以減少問題。

中間選項的猶疑者，當有中間選項時就會作此選擇，如果沒有則另選其他答案，他們對一個議題比較沒有強烈的感覺。還有一種**晚近效應 (recency effect)**，也就是說，受訪者會傾向選擇最後一個答案，因此建議最好將選項依序排列，中間或中性的選項就放在中間位置。

研究者有兩種選擇：提供中間選項給哪些真的兩難或中間路線者，或是取消中間選項迫使受訪者做出選擇，而後問他們對此一選項強烈的程度為何。選擇後者較好，因為態度有兩個面向：方向性（贊同或反對）以及強度（強烈支持或微弱支持）。舉例而言，兩位受訪者都反對墮胎，但其一很強烈反對，另一位則只是不很贊成。

❖ 同意 / 不同意，排序或評分？

調查研究者在測量價值和態度時，對於答案有兩個爭論的議題。問卷應該作一陳述而後讓受訪者選擇同意與否，或是應該讓受訪者有特定選項？問卷應該包括一組項目而後讓受訪者評定（例：同意、不同意），或是列出所有項目而後請受訪者加以排序（如：從最喜歡到最不喜歡）。

最好的是提供受訪者精確的選項。比方說，與其說「你是否同意以下陳述：「男性比較適合……，」，不如問：「你認為男性比較適合？女性比較適合？或兩性均適合？」教育程度較低者較容易同意一項敘述，而迫使他們做出選擇是鼓勵他們思考而避免「**反應心向偏誤**」(response set bias)——某些受訪者傾向同意但這不

見得是他們真正的決定 (Narayan and Krosnick, 1996)。

如果問題的用字讓受訪者有理由選擇某個答案，那就是研究者造成的偏誤。例如，受訪者被問到他們支持或反對通過能源保護法，當受訪者聽到不同的問法答案也會隨之改變：「你贊成此法，或是因為該法窒礙難行而反對通過此法？」比起單純地問「你支持或反對此法？」當然有所不同。

與其要求受訪者在選項中評分，不如要求其排序，因為受訪者可能會給予數個選項相同分數，但如果被要求排序則會排出等級。

選項再加上數值能協助受訪者瞭解。在極端值加上正負數值（例：+5到-5），對於兩極反應的變項最佳；而一連串的數值（如：從0到10）則對變項是單一方向連續性的最好。

措辭的藝術

調查研究者面臨兩個關於遣辭用字的議題。第一是如前所述，運用簡單的文字和文法以減少混淆；第二個則牽涉到運用特殊詞彙產生的效應。這有點弔詭因為你無法事先知道這些字詞對受訪者產生的影響。

這個例子就說明了不同文字造成的問題：用「禁止」(forbid)或「不允許」(not allow)。二者意義相同，但多數人比較願意「不允許」某件事，而較少「禁止」某件事。一般而言，教育程度較低者比較容易受措辭的影響。

某些特定的字會引發一些情緒反應，而研究者就該知道這些字眼。舉例來說，Smith (1987) 發現美國研究中，關於「協助窮人」和「福利」支出的問題就有極大不同，他指出「福利」(welfare) 這個字對美國人而言有很強的負面意涵（聯想到懶惰的人、浪費和昂貴的計畫等），因此最好避免用這個字眼。

我們可以用一些不具爭議性的問題作為實例探討措辭可能的效應 (wording effects)。Peterson (1984) 說明有四種方法可以詢問年齡：「你幾歲？」、「你的年齡多少？」、「你幾年出生？」、

「你是介於18至24、25至34……哪一個年齡層？」他比對出生資料發現，因問題形式不同造成答案的正確率從98.7至95.1%不等。他同時發現，錯誤最少的答案也是最多人拒絕回答的問題，反之亦然。此例指出，這類不具爭議性的事實性問題，其誤差會隨些微措辭不同而改變，同時，增加受訪者的作答意願則可能會增加錯誤機會。

許多受訪者會被字眼或其意涵搞混。比方說，受訪者被問到他們是否認為電視新聞是公正的？研究者旋即發現，許多受訪者都跳過「公正」(impartial) 這個字——這是一個中產階級、受教育的研究者假設大家都認得的字。低於一半的受訪者能正確解釋這個字，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略過這個字或不知道其意義。研究者要很謹慎，因為一些字的效應（像是「禁止」和「不允許」之間的差異）可能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效果。

問卷設計

❖ 調查或問卷的長度

問卷篇幅應該多長或訪談時間多久才適合？研究者偏好篇幅長的問卷或訪談，因為這樣比較符合成本效益。額外問題的成本——一旦受訪者被抽出來當樣本、聯絡上了、並完成了其他問題——就會比較低。訪問沒有絕對正確的長度，端賴我們討論過的調查形式以及受訪者的特質。10分鐘的電話訪談通常不會有問題，而可能延長到20分鐘，少數研究者會嚴格限制電訪在30分鐘以內。郵寄問卷則比較多變，短的問卷（3到4頁）對一般人來說較適當，但也有研究者曾經成功針對一般人進行長達10頁（約100題）的問卷，但再長就很容易遺漏掉某些答案。對教育程度高的受訪者以及特殊主題的訪問，還是有可能採用長達15頁的問卷。面對面訪談耗時1個小時很常見，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境，3至5小時的面訪也有可能。

❖ 問題順序

調查研究者在問題順序的議題上會面臨到兩個問題。第一是如何在整份問卷中組織這些題目；第二則牽涉到答題順序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排序上應該使受訪者的不舒服或混淆減至最低。問卷會有起始、中間和結束問題。在說明調查用意之後，最好是用一些愉快的、有趣的和容易回答的開放式問題幫助受訪者對這份問卷感到舒服。避免一開始就問一些無聊的基本資料或威脅性的題目。中間的問題則是一些一般性的問題，將不同主題的問題混在一起會造成混淆。可以將相同主題的問題擺在一起並用一段短文介紹（例如：「我現在要問有關住宅的問題」）來引導受訪者方向。問題主題間的轉換要順暢、具有邏輯性，並透過題目組織來提醒受訪者的記憶或使之感到舒適。不要用高度威脅性的題目結尾，最後一定要說「謝謝您」。

研究者關心的是問題的排列順序可能會對受訪者答案產生的影響。這種「**順序效應**」(order effects)對那些立場不堅定或是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者影響最大。他們會用前面的問題作為回答後面問題的脈絡基礎（詳見資訊箱 10.5）。關於特定的問題順序效應有兩件事你可以試試看：採「**製卷順序**」(funnel sequence)排列問題——亦即，先問一般性問題再問特定問題（例：先問一般健康狀況再問特殊疾病）。或者，將受訪者分為兩群，而後給予問題順序不同，而後檢視結果是否因問題順序不同而有所改變。如果真的發現問題順序效應存在，哪一種順序才能呈現受訪者真正的想法？這就很難確定了。

舉例而言，幾年前我的學生針對兩個主題進行了電話訪問：對犯罪的意見和對於反酒後駕駛的新法令的態度。隨機抽出一半的受訪者先聽到反酒後駕駛新法令的問題，另一半則先聽到犯罪的問題。我檢視結果看是否存在有「**脈絡效應**」(context effect)——即因問題順序而有所不同。我發現先聽到酒後駕駛法令的受訪者比

資訊箱 10.5

問題順序效應

問題1

「你認為美國應該讓其他國家的共產主義報社記者來訪，並發佈他們在此所見所聞的新聞回國嗎？」

問題2

「你認為共產主義國家，像是俄羅斯，應該讓美國報社記者來訪，並發佈他們所見所聞的新聞回國嗎？」

回答是的百分比

先聽到的問題	問題1 回答是 (共產國家記者)	先聽到的問題 (美國記者)
問題1	54%	75%
問題2	64%	82%

回答第一個問題的脈絡影響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資料來源：改寫自 Schuman 與 Presser (1981: 29)

起另一群人對犯罪的恐懼較低。同樣地，這群人對酒後駕駛法令的支持較高。第一個主題建立了回答第二個主題的脈絡。在問完關於暴力性犯罪之後，酒後駕駛相形之下就比較不足為道了。反之，先問了酒後駕駛而後將之視為一種犯罪，他們可能對一般性的犯罪比較不在意。

受訪者回答所有的問題基本上是依據問題排列順序以及訪談的段落。研究者要記得：問題愈模糊，前後脈絡的影響就愈大，因為受訪者就會依賴脈絡來解釋、理解問題。前一個相同主題的問題以及剛剛聽到的問題會有最大的影響。例如，Sudman 與其同僚

(1996: 90-91) 用三種方式去問受訪者對政治涉入的程度，當單獨提出問題時，約有21%的受訪者回答他們「偶爾」或「幾乎不」參與政治；當先問受訪者他們在最近一次選舉中投給哪位候選人，則回答不參與的百分比幾乎攀升一倍，變成39%。關於哪位候選人這種知識性的問題讓受訪者覺得他們瞭解得不多。如果在兩個問題中間再插入一個問題，關於候選人的公關，則有29%的人說他們沒有參與政治。這個問題給受訪者一個無法回答第一個問題的藉口——他們可以歸因於是候選人公關做得不好。由此可知問題的脈絡的確會有所影響，而研究者要時時刻刻注意這一點：「問題的說明發揮的不僅僅是問題措辭的功能而已，受訪者也藉由提供的脈絡資訊來解釋其意圖」(Sudman等，1996: 69)。

❖ 未作答、拒答、以及答案的評分

你是否曾經拒絕接受調查訪問？人們是否同意完成問卷其實會因為接觸的形式而改變。慈善機構只要求有1%的作答率，而政府的普查就希望達到95%的人作答。作答率在調查研究中是很重要的，如果樣本中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未作答，研究者要將結果作推論就要很謹慎；如果未作答的人和答題者（例如：教育程度較低者）不同，低答題率就會造成偏差並降低其效度。

無法由樣本得到回答可能有幾種型態：聯絡不上受訪者、聯絡上了但無法完成調查（例如：語言不通、沒有時間、生病等）、拒絕填寫問卷或訪談、拒絕回答某些問題等等。

若有強制執行權利（例如說明「此為法定必須作答」）則大大增進作答率，即使只是在信封中，但加上這些字樣「煩請作答，這將會對你有所幫助」並保證保密，對作答率也有些許影響。許多小因素會影響作答或拒答，一點誘因（像是美金1元的酬勞）以及受訪者在訪談開始前的態度（例如：「我現在太忙了」或「我沒有興趣不過我還是填一填好了」）等也都和受訪者會如何回答、以及答案的完整性有關。

在美國，調查研究的公眾參與自從1950年代以來就開始衰退，特別是在都會區。研究指出，高達38%的美國人拒絕參與調查，這對調查研究者而言十分困擾。這導因於許多因素——對陌生人和犯罪的恐懼、社會疏離、過多的調查等，而最重要的因素是：

一般拒絕參與調查的人對調查的態度趨於負面，對環境更為退縮、疏離，同時更加維護自我隱私不被陌生人侵入（Sudman 與 Bradburn, 1983: 11）

除了隱私的考量，過去調查中不愉快的經驗也是不作答的主要因素之一。某些合理的調查研究卻被誤用的調查技術、不夠敏感的訪員、設計粗糙的問卷、以及對受訪者不當的解釋等所破壞。

調查研究者不同意有什麼因素必定能創造適當的作答率。「適當的」這個字是一種判斷，端賴人口群、實際上的限制、主題、以及特定的研究者感到舒服的答案等而定。大多數研究者認為50%以下是糟糕的、而90%以上是極佳的作答率。

如果作答率低於75%，則調查結果就可能會和所有人都填答的不同。舉例來說，一項調查報告指出，受訪者中大部分人贊成某種產品或新政策，但是事實上大多數人實際上是反對的。這就是作答率低，但那些未作答者所持意見和填答者不同（參考資訊箱10.6）。

研究者運用以下各種「未作答」的類別來計算作答率：

- 無法找到受訪者
- 找到受訪者，但無法接觸（沒有回答、沒有空、或無法填答）
- 找到也實際接觸到受訪者，但拒絕參與調查
- 找到也實際接觸到受訪者，並同意參與調查，但是大部分題目都未完成，或是未答完就繳交問卷

「尋獲率」（location rate）是在所有受訪者中找到受訪者的數目。比方說，要調查一所學校600名校友，但找到地址或電話的有

資訊箱 10.6

作答率問題的範例

假設受訪者中有70%的人作答，觀察的結果跟真實人口群的參數會有多大的差異？在此將一系列可能的結果羅列於下：

對問題的回答	答題的受訪者 觀察的百分比	對那些未作答 者假設的回答	所有人真正的 答案(參數) ^a
贊成	50(35) ^b	60(18)	53%
反對	50(35)	40(12)	47%
贊成	50(35)	90(27)	62%
反對	50(35)	10(3)	38%
贊成	20(14)	60(18)	32%
反對	80(56)	40(12)	68%
贊成	20(14)	90(27)	41%
反對	80(56)	10(3)	59%
贊成	45(31.5)	60(18)	49.5%
反對	55(38.5)	40(12)	50.5%
贊成	45(31.5)	90(27)	58.5%
反對	55(38.5)	10(3)	41.5%

^a 這假設是完美的樣本架構，沒有抽樣錯誤或測量上的錯誤。任何此種偏誤都可能增加或減少觀察的調查結果和人口群參數間的差異。

^b 括弧中的數字是人口群真正選此答案的百分比。舉例來說，70%的作答率中有50%選某答案，則 $50\% \times 70\% = 35\%$ 的人選擇此答案。人口參數的預估則以人口中觀察和假設的非受訪者的答案相加來計算。

300名，則尋獲率為50%；「接觸率」(contact rate)則是針對那些找到的人實際接觸到的數目，同前，如找到300名受訪者，但其中200名有回應，其餘100名則從不回電、未擲回問卷或是無法作答(如：病重)。則接觸率就是66.7%；「拒絕率」(refusal rate)則是接觸到的受訪者中拒絕參與的比例，如，接觸到200名校友，其中有20人拒絕參與，拒絕率就是10%；「完成率」(completion

rate) 則是進行調查者中，完全填答每一題的比例，比如180個同意參與並開始填答問卷者，其中150名完成所有問題，其他30名跳過某些題目或是拒絕回答一大部分的問題，因此完成率就是83.3%。研究者應該說明各種未作答的情形。

研究者可能分別指出各種不同的比率，或是將這些尋獲率、接觸率、拒絕率和完成率混在一起呈現。而「**積極填答率**」(active response rate) 是所有接觸的受訪者中完成問卷的人數。用以上的例子，剛開始接觸300名校友中，150名完成問卷，因此積極填答率為50%。未作答包括那些拒絕參與或沒有完成所有題目者。「**完全作答率**」(total response rate) 是所有可能的受訪者中，完成問卷的人數比。再以前述為例，完全作答率就是六百分之一百五十，也就是25%。

自行進行問卷調查(例如：在班上發放的問卷)或是政府普查的回答率接近百分之百，而且問題很少(參考資訊箱10.7)。面訪的回答率較高(約90%)，其次是電訪(約80%)，對郵寄問卷來說回答率永遠是一個主要的考量，這種調查方式回答率在10到50%是很常見的。

研究者可以用好幾種方法增加作答率。電話訪問調查中，即使找不到人，訪員在放棄一個受訪者之前應該打5次的電話，並記下每次的時間，以避免在相同時間去電。理想上最好每次打的時間都不一樣，但是週日到周二晚間6點到9點通常是好的時機。

即使去電好幾次，20%的未接觸率還是很常見的。一旦訪員聯絡上受訪者，就要說服此人合作。電訪的拒絕率通常在20%左右。雖然對隨機電訪來說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可以3到5天前先發函通知即將電訪，則合作程度會提高。訪員告知自己的名字、進行研究的組織、調查的主題、以及大約所需時間——舉例而言：「我叫王大華，我是代表調查研究公司打電話來，想問您幾個關於電視收看習慣的問題，這個訪問不會超過10分鐘，而且我們會將您的答案保密處理。」

資訊箱 10.7

低估的普查或未尋獲率

全美人口普查是由美國政府所主導的調查，它可能有多重目的（例如：決定區域候選人的代表人數、擬定服務預算數等）。美國政府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到目前為止，並未進行抽樣而是試著計算每一個人，這會導致計算錯誤，而且作答率依區域不同而介在93至100%之間。最嚴重一次低估的普查發生在1990年，紐約市的南布朗克斯，有40,245人並未被找到或是參與普查；其次也是發生在紐約市，估計該市有250,000人未被找到或是計算在內。舉例來說，美國每550,000人就會產生一個議員區，但在南布朗克斯的第16議員區卻少估了7.3%的人口。這種低估經常會發生在低社經人口、少數族群、偷渡客和新移民人口較多的區域。反之，一些區域的人則會被重複計算，這經常發生在高社經、許多高等知識份子、在郊區居住、擁有一棟以上房子的人口群（見Holmes, 1998）。

面訪第一要務是找到受訪者。事先發函或電話確認時間是明智的作法，在時間到之前再重複確認也有必要。即使已經事先約好，受訪者仍可能遲疑或拒絕。訪員應該掛有附照片的識別證，說明自己代表什麼組織以及來意。一旦接觸到受訪者，並事先告知，則當訪員來到門口，大多數受訪者都會合作。

要針對某些人取得調查資料可能會是一大挑戰，像是低收入戶、都市少數族群等。Pottick和Lerman（1991）運用記者的口吻寫了一封信，介紹一項調查和私人電話，提醒受訪者接受訪問。他們將此方法和正統學術信函以及追蹤信的方法作比較，發現這種方法比較快也比較多人回覆。這種方法獲得65%的參與，而標準方法只獲得39%，這種方法也接觸到比較多悲觀的人、以及那些覺得不被政府部門和社會服務機構所瞭解的受訪者。

有許多文獻都教導我們該如何提高郵寄問卷的回覆率（參考資訊箱 10.8）。Heberlein 與 Baumgartner（1978）指出有 71 個因素會影響郵寄問卷的回收率。

針對 1940 年到 1988 年間出版的 25 種期刊、115 篇文章進行的郵寄調查所作的後設分析（meta-analysis，詳見本書最後一章）顯示，說明信函、問卷少於 4 頁、回郵信封以及少量金錢報酬等，都有助於增加回收率（Yammarino 等，1991）。許多技術建議運用「完全設計方法」（Total Design Method，後敘）幫助完成這項任

資訊箱 10.8

增加郵寄問卷回收率的方法

1. 將問卷標明寄給某人，而非「收件人」，用限時信寄出。
2. 在最前面附上仔細撰寫、標明日期的說明信。在這封信中，請求受訪者的合作、保證內容保密、解釋調查的目的、並標出研究者的姓名及聯絡電話。
3. 一定要附上回郵信封。
4. 問卷的格式設計要簡潔、吸引人、長度適中。
5. 問卷要印刷精細、易於閱讀、指示清楚。
6. 對那些未回覆者寄發兩次提醒信函，第一封在問卷抵達後約一週寄達，第二封則隔週再寄。再次禮貌地要求配合，並表示願意再提供一次問卷。
7. 不要在重要假期間寄發問卷。
8. 不要將問卷題目放在背頁，而是留下足夠的空白位置讓受訪者填答意見。
9. 如果有區域性以及被視為有合法地位的贊助者（例如：政府機關、大學、大型企業等）則有助於回收率。
10. 如果可能的話，附上小額的金錢誘因（美金 1 元）。

務並增加回收率。

❖ 格式與設計

在問卷的格式和設計上有兩個相關議題：問卷本身的格式以及問題和答案的格式。

問卷格式 不論對訪員或是受訪者來說，設計是很重要的。問卷應該要清晰、簡潔、容易明瞭。在問卷上替每個問題編號和標明用以確認的資訊（像是：組織的名稱）。千萬不要將問題混在一起或採用使人混淆的形式呈現。如果想在郵費或印刷上省一點錢，最後會因為回收率低影響效度、或是訪員和受訪者的混淆導致成本更高。記得在問卷前設計封面，以作為行政作業之用。記錄訪問的日期、時間、訪員名字、受訪者的辨識號碼、訪員的意見以及觀察。專業的高品質問卷設計、在問題間留有適當的距離、以及良好的格式等都有助於正確度和完成度，並幫助問卷的進行。

此外，要在問卷上給予訪員或受訪者一些說明，記得將這些說明和問題區隔開來。像是用不同顏色、字體、或全部大寫等加以區分。這對訪談來說很重要，如此一來訪員才能區別這是針對問題的說明或是針對訪員本身。

問卷格式對郵寄問卷來說尤其重要，因為沒有親切的訪員和受訪者互動，而是靠問卷本身來說服受訪者。郵寄問卷，包括前測問卷，在最前面都要附上專業的說明信函，並標示出研究者及其電話。任何細節都很重要。如果受訪者收到的是大宗郵寄的牛皮紙袋、上頭只標明收件人、而問卷又放不進回郵信封內，那他們肯定不會寄回這封問卷。問卷最後記得說明「感謝您的參與」。訪員和問卷都應該給受訪者一個正面的印象，覺得研究者很感激他們對調查的參與。

問卷形式 調查研究者決定問題和答案的形式。受訪者是要用圈選、逐一比對、填滿空格、或是在空格中打叉？原則是不要讓受訪者混淆即可。逐一比對和圈選通常是最清楚的，此外，將所有答

案列成一行而非彼此穿插會比較容易閱讀（參考資訊箱 10.9）。視覺上的效果也有助益，舉例來說，當問到他們對某人感覺的溫暖程度時，可以畫個溫度計來表示。矩陣形的問題（或是格子狀的問題）則是用相同答案類別來呈現在一系列的問題中，可以節省空間，也讓受訪者或訪員容易記下相同答案類別的回答。

Sanchez（1992）說明了兩種問卷格式對於有經驗的訪員在問宗教問題上造成不同的影響。她發現較清楚的問卷格式使得「不確定」的答案由8.8%降至2.04%，此外，當她將問題格式變得更清晰時，訪員深究特定宗教教派則由91%增加到99%。

❖ 完全設計方法

Dillman（1978）發展出一種「完全設計方法」以改進郵寄和電話訪問。這種方法有理論和實務層面。理論指出，調查是一種社會互動，受訪者在其中預期會獲得某種交換而願意合作，當社會成本低、所預期的獲益降低成本、以及當研究者創造出一種信任感時，受訪者就願意合作。實務層面則如前述關於好的問題撰寫以及問卷設計的建議。因此，好的調查設計會有前測，減低受訪者個人成本，並以受訪者付出最少的努力和時間為原則。它創造出無形的報酬，像是做了某件重要的事，或是自覺重要。

調查類型：優缺點

郵寄與受訪者自行進行的問卷

❖ 優點

研究者將問卷直接拿給或郵寄給受訪者，由受訪者閱讀說明及問題，而後記下答案。這種調查是最經濟的，也可由一位研究者獨力完成。研究者可以將問卷發到較廣的地理區域，受訪者能在方便

資訊箱 10.9

問題格式範例

水平 vs. 垂直的答案選擇範例

你認為離婚程序過於容易、過於困難或是適中？

太容易 太困難 適中

你認為離婚程序過於容易、過於困難或是適中？

太容易

太困難

適中

矩陣問題格式範例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不知道
老師說話速度太快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我在班上學到很多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測驗很簡單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老師講很多笑話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老師很有條理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input type="radio"/>

一些答案類別的範例：

很好、好、尚可、差

同意 / 不同意

贊成 / 反對

非常同意、同意、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太多、太少、適中

較佳、較差、差不多

定期、經常、很少、從未

總是、大多數時間、有時候、很少、從不

很類似、不類似、無差別

很有興趣、有興趣、無興趣

的時間填答，如果必要的話還可以檢查自己寫的答案。郵寄問卷具有匿名性且免去訪員的偏誤。這是很有效的，如果受訪對象是高等教育程度、或對此調查主題、調查組織感興趣者，則回答率高。

❖ 缺點

既然人們並不一定都會完成並寄回問卷，郵寄問卷最大的問題就是問卷的回收率低。大多數問卷可以在兩週內回收，但有的甚至會拖到兩個月後。研究者可以透過寄發提醒信件以提高回收率，但這會增加資料蒐集的時間和成本。

研究者無法掌控問卷填答時的所有條件。可能有熱心的受訪者是在一個到處嘻笑聲的宴會上，填答完問卷；此外，無人在場澄清問卷上的疑問或是當受訪者回答不完全時，沒有人可以追問更深入的資料；其他不是抽樣出的受訪者（像是配偶、新的住戶等）也可能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打開問卷加以填答；有些受訪者可能拖了好幾個禮拜才填完問卷、或是不按照順序填答；不完整的問卷也可能是一大問題。

研究者無法親自觀察受訪者對問題的反應、生理特質或整個情境，則是另一個問題。舉例而言，一位70歲、貧苦獨居在農場的老婦人，可能填答她是一位40歲、成功的亞裔男性醫生、和3個孩子住在城裡。這樣極端的謊言當然很少見，但嚴重的錯誤還是無法得知。

郵寄問卷的形式限制了研究者可以使用的問題型態。那些需要視覺輔助的問題（例如：看這張圖告訴我你看到什麼）、開放式問題、系列問題、以及複雜的問題在郵寄問卷上就很不適合；另外，郵寄問卷也很不適合不識字或識字不多者，問卷寄給不識字的受訪者幾乎不可能回收；即使填完後寄回來了，也可能有誤解題意的狀況，那答案就無意義了（詳見表10.3）。

表 10.3 調查的類型及其特質

特性	調查的類型		
	郵寄問卷	電話訪問	面對面訪談
行政的議題			
成本	最便宜	居中	昂貴
速度	最慢	最快	慢到中等
長度（問題數）	適中	短	最長
回答率	最低	居中	最高
研究控制			
追問的可能性	否	是	是
特定受訪者	否	是	是
問題順序	否	是	是
只有一個受訪者	否	是	是
視覺觀察	否	否	是
不同問題的成功與否			
視覺輔助	有限制	無	有
開放式問題	有限制	有限制	有
系列問題	有限制	有	有
複雜的問題	有限制	有限制	有
敏感的問題	部分	部分	部分
偏誤的來源			
社會期待	無	部分	極大
訪員的偏誤	無	部分	極大
受訪者的閱讀能力	有	無	無

電話訪問

❖ 優點

電話訪問是一種普遍的調查方法，因為大約95%的人口都可以藉由電話接觸得到。訪員打電話給受訪者（通常在家），問一些

問題，然後將答案記錄下來。研究者透過某些名單或電話簿，能很快找到距離很遠的受訪者。一個訪員可以在幾天之內訪問全國上千個受訪者，加上追蹤電話，回答率可高達90%。雖然此法比郵寄問卷為貴，但可以考慮長途電話減價方案。一般來說，電訪較有彈性，且具備了面訪的大部分優點，但成本只要一半。訪員控制問題順序，而且可以追問。挑出特定的受訪者，且幾乎回答所有問題。研究者可以知道當受訪者是否回答問題，而且可以有效運用系列問題，特別是電腦輔助的電話訪問（CATI，如前述）。

❖ 缺點

成本相當高以及訪談長度的限制都是電訪的缺點。此外，沒有電話的受訪者就幾乎接觸不到，而電話也可能在不恰當的時機響起。使用訪員減低了匿名性，並導致潛在的個人偏誤。這也很難運用開放式問題，需要視覺輔助的問題更是不可能。訪員只能夠標示出嚴重的干擾（像是背景的吵雜聲）以及受訪者的語氣（如：憤怒或刻薄）或是猶疑。

面對面訪談

❖ 優點

面對面訪談的回答率最高，而且允許問卷的長度最長。這具備有電訪的優點，而訪員也可以觀察周遭環境，並運用非口語的溝通以及視覺輔助。訓練有素的訪員能夠問每種類型的問題，包括複雜的問題，並對問題深入探究。

❖ 缺點

高成本是面訪最大的缺點。訪問的訓練、到處奔波、督導、以及人事的成本都很高。訪員的偏誤在面訪中也是最高的。訪員的外貌、聲調、問題措辭等都可能影響到受訪者。除此之外，訪員的督

導成本較低，因為電訪的督導必須透過聽訪問內容。

特殊情境

有許多種特別的調查。其一是對組織的調查（如：企業體、學校等）。通常使用郵寄問卷，但也有其他可能。研究者寫下一些關於組織的問題，探詢組織中有誰能提供這些資訊，因為找到相關的負責人是很重要的。同時要清楚敘述調查問題，因為這些人每天接獲許多提供資訊的要求，他們不一定都會回覆。

調查白領菁英又需要特殊的技巧。商界有力的領袖、政府部門都很難接觸得到。助理可能會收下問卷，但面訪或電訪常常會遭遇到很大的阻礙，如果有特殊管道或有力的推薦信則能有所幫助。研究者一旦約好時間，研究者本人而非雇用的訪員，就要親自進行訪談。這類訪談較多開放式問題比都是封閉式問題要來得比較容易成功。保密是極重要的議題，對這一點一定要加以保證，因為這些菁英經常擁有某些資訊是其他人所沒有的。

焦點團體（focus group）又是另一種特殊的訪問情境，且大多無法量化。在焦點團體中，研究者將6至12位成員聚集在一個房間裡，由一人帶領在一或兩個小時內討論一個或數個議題。這可以是公共議題、某種產品、電話問題、政治候選人或是某項政策。帶領者介紹議題並保證不會有人主導意見走向。帶領者是很有彈性的，使成員專注在主題上，並鼓勵討論。這些資料將被錄下來或由助理協助錄音。團體成員同質性要夠才能減低衝突，但不要將親友納入。焦點團體在探索性研究上或要凝聚出假設的新點子、問卷題目、以及對結果的解釋上很有用。

成本

專業品質的調查如果將所有成本都計算下去可能會很昂貴。成本會隨著調查的類型而改變，一個簡單的公式是：如果郵寄問卷花1美金，那電訪的成本就是5元，面訪的成本就是15元。舉例而

言，Dillman（1983）預估，在1980年針對450個受訪者的12頁郵寄調查需花大約3,000美金。這算是低估，因為發展問卷、前測、以及資料分析的成本都不包含在內。

成本的變動很大。一般成本支出中，佔最多的是發展問卷和前測的專業人力、訓練訪員的成本、以及訪員的人力成本。剛起步的研究者和學生常會嚴重低估花費和所需的數量。在1998年，寄給300位受訪者2頁的問卷就要花費1,500美元，差不多一個人5元的成本，這還不包括付給撰寫和檢查問卷的人、準備電腦分析資料的成本、和實際分析的成本。如果回收率在70%，那實際的成本每個人就將近7.5美元。

專業調查機構完成一份15分鐘的電訪問卷，通常收取50元以上的費用。面訪的成本更高，一份專業的面訪可以收取200美金，依訪問長度及遠近而定。最極端的例子，針對1,000名分散各地的一般大眾，面訪的成本可能要到二十五萬美金，並且要花一年時間完成。另一方面，一份簡單的單頁問卷、由老師自行影印、發給學生的問卷，如果不算老師的時間和功夫的話，成本可能相當低廉，老師或許有辦法在一週內自行準備問卷、發放給學生、蒐集答案、作簡單的結果分析。

訪談

訪員的角色

可能在許多情境中，我們都會蒐集訪問資料。雇用的面談期待找到雇員、醫療人事向病患問診、心理衛生專業和案主會談、社會服務工作者和有需求的人訪談、記者訪問政治家及其他、警察問證人及受害者、脫口秀主持人訪問名人（詳見資訊箱10.10）。調查研究訪談則是一種特殊的訪問，如同大多數訪問，其目標是從他人處取得正確資訊。

資訊箱 10.10

非研究訪問的類型

1. **工作面試** 老闆問面試者一些開放式問題，以取得相關資料，並觀察面試者如何表現自我。面試者（受訪者）主動接觸並希望留下好的印象。雇主（訪問者）則試著發現面試者真正的才能和缺點。訪談的調子可能是認真的、批判的，而雇主有權接受或拒絕面試者。這通常會造成緊張和一定限度的信任感，雙方的目標可能衝突，彼此也都可能運用一些伎倆，同時，結果可能不是非常保密。
2. **協助式的訪談** 幫助專業者（如：諮商師、律師、社工員、醫師等）蒐集案主的資料，包括背景資料以及現況。助人專業者（訪問者）運用資訊以瞭解案主（受訪者）的問題，進一步尋求解決之道。訪談的調子是認真而關心的。緊張關係低而高度互賴，雙方分享解決案主問題的目標，不會用什麼伎倆，且訪談結果通常會保密。
3. **記者的訪問** 記者從名人、新聞製造者、目擊者、或背景人物處蒐集資料，以建構有新聞價值的故事。記者（訪問者）運用各種技巧試圖取得故事的資訊，有些可能不易揭露，或是從新聞來源（受訪者）取得「可引用的資料」。記者將訪問所得到的資訊選擇性地與其他資訊結合在一起，而通常都不是受訪者可以控制的。訪問的調子和信任關係差異很大。雙方的目標可能分歧且都會運用一些伎倆。訪問結果不保密而且還可能有很多公開的效果。
4. **審訊或調查式的訪問** 司法人員、稽核人員、或其他公部門的人，針對被逮捕的人或嫌疑犯，嚴肅地詢問以取得必要資訊。公務員（訪問者）會運用這些資訊做為證據以成立某個案子來對抗某人（很可能就是受訪者）。緊張關係高且互不信任。雙方的目標嚴重分歧而且會互相運用伎倆。問話內容鮮有保密，還可能成為官方公開的紀錄。

5. 娛樂式的訪問 節目主持人提出評論並針對名人或其他人問一些開放式的問題，他們可能不同意而有一番說明。基本目標是刺激觀眾的興趣、或是造成娛樂效果。通常彼此間的互動較所獲得的資訊來得重要。當名人（受訪者）試著增加個人的聲望時，主持人（訪問者）會要求觀眾立即的回應。訪問的調子是明快的、沒有緊張氣氛、且信任感相當高。彼此間的目標通常一致。他們可能會欺騙彼此，甚至一起欺騙觀眾。情境是和保密情境相反的。

人們可以將不同的訪談混合在一起，也經常交錯使用各種類型。比方說，當社工員扮演社會控制的角色而非助人的角色時，可能會進行調查式的訪談。或是當警方在協助受害者時，可能運用協助式的訪談而非審訊式的訪談。

調查訪問就是一種社會關係。如同其他社會關係一樣，它包含了社會角色、規範、和期待。訪問是兩個陌生人間短暫的、次級的社會互動，特定目標就是其中一人要從另一人身上獲取某些特定資訊。社會角色是訪問者和受訪者。而資訊是在結構的對話中取得，訪問者在此對話中詢問事先準備的問題並記錄受訪者的答案。這和一般的對話有許多不同之處（詳見表10.4）。

對訪員來說，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許多受訪者並不熟悉調查受訪者的角色，以及「受訪者對於他們被期待的角色，經常缺乏清楚的概念」（Turner and Martin, 1984: 282）。結果，他們扮演了另一種角色而可能影響答案。有些人相信訪問是一種親密的對話或是處遇性的歷程，有些人將之視為填答一些官方表格，有人認為這是測驗，有人則以為這是試圖逮到受訪者的伎倆（Turner and Martin, 1984: 262-269）。即使是在專業設計的調查中，追蹤研究發現大約只有一半的受訪者確實瞭解研究者所問題目的意思。受訪者重新解釋問題以符合自己的意識型態、個人情境或使之容易回答（Turner and Martin, 1984: 282）。

表 10.4 一般對話和有結構的調查訪問之差異

一般對話	調查訪問
1. 來自每個參與者的問題和回答都相當平均	1. 大多是訪員問問題而受訪者回答
2. 可以開放地交換感受和意見	2. 只有受訪者揭露個人的感受和意見
3. 做出評斷並試圖說服其他人的觀點	3. 訪問者不帶評斷，也不試圖改變受訪者的意見或信念
4. 可以揭露個人深沈的感受以取得同情，或是一種處遇性的抒發	4. 訪員試圖得到某特定問題直接的答案
5. 常見到儀式性的回應（像是「嗯」、搖頭、「你好嗎？」、「我很好」等）	5. 訪員避免作出儀式性的回應而影響受訪者，希望獲得的是真誠的答案而非例行性的回答
6. 參與者交換資訊並更正他們知道的錯誤	6. 受訪者幾乎提供所有資訊，訪員並不對事實性的錯誤加以更正
7. 話題來來去去，而每個人都可以變更話題。在比較不相關的議題上，焦點可以轉移到不同方向或是不同意	7. 訪員控制主題、方向，將受訪者維持在這個訪談任務上，排除不相關的話題岔出
8. 情緒的調性可以從幽默轉到歡樂、到感動、到傷心、到生氣等等	8. 訪員試著維持持續的溫暖，但仍是認真而客觀的調性
9. 人們可以迴避或忽略某個問題，或是給一個不確定的答案	9. 受訪者不應該迴避問題，而應該提供真實的、深思熟慮過的答案

資料來源：改編自 Gorden (1980: 19-25) 以及 Sudman and Bradburn (1983: 5-10)

訪問者的角色很難拿捏：他們要建立關係並取得合作，也要維持中立、客觀；他們剝奪了受訪者的時間和隱私以取得資訊，但受訪者卻可能沒有直接利益；他們試著減少尷尬、恐懼、懷疑，這樣受訪者在提供資訊時會覺得舒服一些；他們可能會解釋調查研究的本質或是對這個訪問的社會角色給予一些暗示。好的訪員還會監督這個社會互動的方向性、回答的內容和受訪者的行為。

調查訪問者是不帶評斷性也不揭露自己的觀點，不論是口語上或非口語上的（例如：露出驚訝的表情）。如果受訪者問到訪員的

觀點，他可以客氣地引導受訪者並告知這樣的探詢並不恰當。比方說，如果受訪者問：「你認為呢？」，訪員可以回答：「在此我們感興趣的是「你」怎麼想；我怎麼想並不重要。」又如受訪者給了一個相當令人驚訝的答案（像是「我因為毆打我的小嬰兒而且用香菸燙她而入獄三次」），訪員也不應該露出驚訝或鄙視的表情，而只是視之為一種事實，這樣可幫助受訪者覺得他們能夠誠實地提供答案。

你可能會問，「如果調查訪問要保持客觀中立，為何不用機器人或機器來進行？」用機器訪談還未成功是因為那缺乏訪員所創造出人的溫度、信任感、以及關係。訪員可以幫助定義情境並確保受訪者有這些資訊、瞭解他們的期待、提供相關的答案、引發合作動機、並提供一些嚴肅的回答。訪問是一種社會互動，在其間「訪問者和受訪者雙方的行為都來自其態度、動機、期待、和觀點」（Cannell and Kahn, 1968: 538）。

訪員的工作比受訪者多。舉例而言，Moser and Kalton（1972: 273）指出面訪所花的時間大約只有35%是在訪談過程，其他有40%是在接觸到正確的受訪者、15%是交通時間、以及10%研究調查資料和處理行政及記錄的細節。

訪問的階段

訪問需經過幾個階段，從簡介開始。訪問者進門、出示身份、再度保證受訪者合作的安全性，他要準備好怎樣回答「你怎會選上我？」、「這會有什麼幫助？」、「我對這些沒有概念」、「這到底是什麼？」等等這些問題。訪員要能說出他們是怎樣挑出這些特定的受訪者，而不是任何人的代替者。

訪談主要是由問問題與記錄答案所組成。訪員完全遵照問卷上的措辭——不得加以增減或重新組合。依照排定的順序問問題，不顛倒順序也不略過某些題目，除非有特殊指令。訪員要使訪談維持在一個舒服的途徑上，並給予不帶指導性的回饋以保持受訪者的

興趣。

除了問問題以外，訪員還要正確記錄下答案。如果是封閉式問題很簡單，訪員只需填答在正確的空格內。但對於開放式問題就比較困難，他必須注意聽、清楚寫下答案、而且不加修改地記錄下答案。更重要的是，訪員不可以對受訪者的答案摘要記錄，這樣會造成資訊的流失或破壞了答案。舉例而言，受訪者說：「我很擔心我女兒心臟的問題，她只有10歲，而爬樓梯已經有困難，我不知道當她再大一點時會怎樣。心臟手術風險太大成本也太高，她必須學著活下去。」如果訪員寫成「擔心女兒的健康」，那許多資訊就會流失。

訪員知道如何以及何時加以深究。「追問」(probe)是一個中性的要求，以澄清模糊的答案、完成未完成的答案、或是取得相關的回答。訪員辨識出不相關或不正確的答案，而在需要時使用追問的技術。追問有許多種，暫停3到5秒通常很有效。非語言的溝通(如：點頭、挑高眉毛、或眼神接觸)也很有用。訪員可以重述問題或答案，然後停頓一下，也可以問個中性的問題，像是「有其他原因嗎?」、「可以再多說一些嗎?」、「這是什麼意思?」、「可以再多解釋一點嗎?」等(詳見資訊箱10.11)。

最後一個階段是結束，即訪員向受訪者道謝後離開。之後他到一個安靜、隱密的地方去編寫問卷並記下其他細節，例如日期、時間、訪談地點等；簡單描述受訪者以及訪談情境；受訪者的態度(如：嚴肅、生氣、或大笑)；以及任何不尋常的狀況(例如：電話在問到第27題時響起，並持續了4分鐘才繼續訪談)；把任何打斷訪問及訪談過程中發生的事記下(如：10幾歲的兒子進入房間，坐在房間的另一頭，把電視打開，音量開得很大聲在看棒球比賽)。訪員也要將個人感覺以及懷疑的任何事情記下(像是：當問到婚姻關係時，受訪者變得很緊張而易怒)。Converse和Schuman(1974)從這些記錄中提供了面訪時會發生事件的範例。

資訊箱 10.11

追問和紀錄封閉式問題的完整答案之範例

訪問者的問題：你從事什麼工作？

受訪者的回答：我在通用汽車工作。

追問：你在通用汽車的工作是什麼？負責的是什麼樣的工作？

訪問者的問題：你失業多久了？

受訪者的回答：很久了。

追問：能不能精確一點地告訴我，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失業的？

訪問者的問題：以國家整體來考量，你認為我們國家去年的整體狀況是好的、壞的、還是什麼狀況？

受訪者的回答：可能有好有壞，看情形，誰曉得。

追問：那你希望的是什麼呢？

封閉式問題答案的紀錄

訪問者的問題：你對死刑的看法如何？評分等級從1到7，1表示非常贊成，而7表示非常反對。

(贊成) 1 __ 2 __ 3 __ 4 __ 5 __ 6 __ 7 __ (反對)

受訪者的回答：大約在4，我認為所有的謀殺、強暴和暴力犯罪都應該處以死刑，但我不贊成像一些偷車子等較輕的罪也判死刑。

訪員訓練

大型的調查需要雇用好幾位訪員。除了專業的調查研究者以外，一般人認為訪員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專業的質化調查需要慎選訪員並加以訓練，而且適當的薪資以及好的督導對維持高品質的表

現都很重要。

不幸地，專業的訪談未必都得到適當的收入或是有常態性的工作。過去，大規模的民意調查經常用那些願意接受兼職工作的中年婦女。好的訪員是親切的、誠實的、精確的、成熟的、負責的、相當機靈的、穩定的、以及有意願的。他們的外表不具威脅性、在面對不同類型的人很有經驗、而且在處事上拿捏得很好。如果調查包括在高犯罪區域進行訪問，訪員就需要額外的保護。研究者要考慮到訪員的外貌、年齡、種族、性別、口語能力、甚至是聲音。舉例來說，在一個研究中，運用到女性電訪員訪問相同社會階層的人，Oksenberg及其同僚（1986）發現，那些音調較高、聲音變化較多、以及說話聲音較大、較快、發音清楚而聽來較愉悅的訪員，被拒絕的頻率較低。

研究員需要花一至二週時間訓練專業的訪員，包括課程及閱讀、觀察專家訪談過程、在辦公室及實地模擬訪談並加以記錄、接受評鑑、以及角色扮演。訪員在過程中學習什麼是調查研究以及訪員的角色，熟悉問卷和問題的目的，雖然此時還沒有預期的答案。

訪員大多獨立工作，但如果是大型的調查研究，則必須有督導，他們要熟悉這個領域、協助解決問題、督導訪員、並掌握工作進度。對電訪來說，包括協助打電話、確認訪員到達與離開的時間、並督導訪員進行電訪；在面訪中，督導則要檢查是不是真的進行了訪談，這表示再打電話給受訪者或是寄送確認的明信片給抽出來的受訪者樣本。督導也可以檢查回答率和填答不完整的問卷，以瞭解訪員是不是取得受訪者的合作，亦可再針對一小群受訪者進行訪談、答案分析、或是觀察訪談以瞭解訪員問問題的方式是否正確並將答案記錄下來。

訪員的偏誤

調查研究者必須將訪員的一些行為摒除在外以減少偏誤。理想上，訪員的行動不會影響受訪者如何作答，其答案也不會因為不同

訪員而有所改變，如果完全依照問題的字句說明就可以達成「嚴格來說，當訪員對「真的」答案（根據研究目的而定義）有所縮減或改變並加以紀錄下來，則產生了訪員造成的破壞」（Hyman, 1975: 226）。

訪問的偏誤可歸納為以下六類：

1. 受訪者的錯誤——遺忘、不好意思、誤解或因為他人出現而說謊。
2. 不經意的錯誤或是訪員不留意——訪問了錯誤的受訪者、念錯問題、略過問題、讀問題的順序錯誤、答案記錄錯誤、或是誤解受訪者。
3. 訪員有意破壞——故意改變、省略、重組答案、或是選另一個受訪者。
4. 訪員因為受訪者的外貌、生活狀況、或其他答案而對受訪者的答案有所預期，所造成的影響。
5. 訪員欲進一步探問但失敗。
6. 由於訪員本身的外貌、音調、態度、對回答的反應、或是在訪談程序以外的評論等，對答案的影響。

調查者還在學習影響調查訪問的影響因素。他們知道訪員的期待會造成很嚴重的偏誤，一開始就預期訪談會很困難的訪員通常的確會如此，而預期得到某些特定答案的也真的會得到這些答案（詳見資訊箱 10.12）。適當的訪員行為和精確的問題陳述可能不容易，但卻是很重要的議題。

訪談時的社會情境也會影響答案，包括訪談過程中出現其他人。比方說，學生在家裡和在學校的答案就不一樣（Zane and Matsoukas, 1979）。一般而言，調查研究者不希望有其他人出現，因為他們會影響受訪者的答案。這並不一定都會造成差異，但是，當那些出現的其他人是孩子時通常會有不同。舉例來說，Aquilino（1993）發現，當配偶在場，受訪者比較會指出離婚或分居會讓他

資訊箱 10.12

訪員的特質會影響答案

訪員預期所造成的影響之範例

女性訪員本身狀況	女性受訪者指出是由她的先生買大部分家具
由先生買大部分的家具	89%
先生並沒有買大部分的家具	15%

種族外貌影響的範例

	回答「是」的比例：	
	你認為政府機構中有太多猶太人嗎？	你認為猶太人勢力太龐大嗎？
訪員		
外貌像猶太人且具有像猶太人的姓名	11.7	5.8
只有外貌像猶太人	15.4	15.6
不具備像猶太人的外貌	21.2	24.3
不具備像猶太人的外貌也沒有像猶太人的姓名	19.5	21.4

資料來源：改編自Hyman (1975: 115, 163)

注意：受訪者對種族的刻板印象可能會影響其在訪談中的回答。

們變得更糟；另外，當先生到場時，太太傾向指出先生會幫忙做家事。

訪員外顯的特質，包括種族和性別，通常也會影響訪問和受訪者的答案，特別是那些和種族、性別相關議題的問題。舉例說，非裔美國人和西班牙裔的受訪者，會因訪員的種族不同而對種族相關議題表達了不同的政策立場。甚至在電訪中，如果受訪者有某些線索可以猜出訪員的種族時，這種現象也會發生。一般而言，和受訪者相同種族的訪員比較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同樣地，性別也會影響答案，不論是在像是性行為這類明顯的議題上，或是跟性別相

關、或兩性平等的議題等都可看到。調查研究員需要注意到訪員和受訪者雙方的種族與性別。

訪問的特性在許多方面也會影響答案。舉例來說，和自行進行的問卷相比，當訪員是身心障礙者時，受訪者會將回答「快樂」這類答案的標準降低，很顯然的，他們不希望和訪員比起來，自己聽起來太過幸福；然而，當受訪者完成自己進行的問卷，即使是有身心障礙者在同一房間內，他們快樂的程度會比自己一人在受試時要高，這則是受訪者在和在場的他人有了身體狀態的比較後，覺得自己比較好，而當場並沒有立即的提醒可讓受訪者瞭解其他人的生活狀況（詳見Sudman等，1996: 74-76）。當受訪者的答案因為訪員種族、性別或生理上的狀況等因素而不同時，則這將威脅到研究的信度。

文化意義與調查訪問

研究在調查錯誤以及訪問的誤差上，會進一步考慮到人們如何創造社會意義以及達到文化理解的議題。當同樣的話在不同社會情境下、因說的人不同、說法不同、以及說者和聽者間的社會距離不平等，而有不同意義或暗示時，研究者就很麻煩。同時，受訪者不一定完全瞭解訪問的社會情境，可能將調查研究的本質解釋錯誤，而試著找尋如何回答問題的提示或是訪員微妙的動作。更甚者，「很重要的是，不要遺失了對於訪談情境和外顯態度的情境，這之間不一樣的想法，我們不需要期待在訪談中表達出來的態度會和社會脈絡中完全一致」（Turner and Martin, 1984: 276）。

話說回來，調查研究最終是立基於「天真的假設模型」（Foddy, 1993: 13）。研究者試著藉由減低調查情境下的真實經驗與理想模型的假設之間的差距來改進調查研究。模型的假設如下：

1. 研究者已經將所有測量的變項都清楚地概念化了。
2. 問卷不會有遣辭用字、問題順序或相關的效應。

3. 受訪者都很有意願回答所有問題。
4. 受訪者會提供完整的資訊，而且都可以正確回憶相關事件。
5. 受訪者對於訪員提出的問題都完全正確理解。
6. 受訪者在不知道假設的情況下，會比較誠實作答。
7. 受訪者在沒有接收任何暗示或建議下，會比較誠實作答。
8. 訪談情境和特定訪員對答案沒有影響。
9. 訪談的過程對受訪者的信念或態度沒有影響。
10. 在訪談中受訪者的行為完全符合其口語表達。

某些調查研究員會質疑這樣的假設。舉例來說，如果訪員努力表現出比較中立和制式的舉動，就會減少因訪員個人行為而導致的不可信賴程度。然而，根據激進派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觀點，這種企圖也會造成其他問題（詳見資訊箱 10.13；另見Devault, 1990）。爭論的焦點在於：意義來自社會脈絡，因此，即使是標準化的用語對於每一個受訪者也不可能產生相同的意義。比方說，某些受訪者可能透過講故事的方式而非直接選擇固定答案來表達其價值和感覺。

在複雜的人類反應中，人們常常會將簡單的問題添加上一些解釋的意義。舉例而言，我的鄰居問我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多久整理一次草坪？」我可以作以下的解釋：

- 我自己多久整理一次草坪（相對於其他人多久幫我整理一次草坪）？
- 我多常割一次草（相對於整理落葉）？
- 我多常整理整個草坪（相對於只割除那些長得快的雜草）？
- 我在一季、一個月、或一週整理幾次草坪？
- 我正常狀況下多久整理一次草坪（相對於去年我的割草機壞了幾次、而氣候乾燥、草也沒長，所以我割的次數比較少）？

在幾秒鐘之內，我就要作出解釋並給個答案，但是開放式問題以及我和鄰居持續的互動，讓我要求澄清並追問幾個問題，以達到

資訊箱 10.13

訪問：實證和女性主義取向

本章中，你已經學到實證取向的調查研究訪談。在理想的調查訪談中，訪員保留自己的感覺和想法，訪員應該要客觀中立，可能的話，甚至是換另一個訪員也能得到相同的答案。

女性主義研究取向的訪談則非常不同，這種訪談比較像質化的訪談（將在14章詳述）。Oakley（1981）批評實證調查訪談是男性典範的一部分。這是一種社會情境，當訪員在迫使人們表達自己的感受時，同時也讓訪員在其中操作控制和掌權。這是非常操弄且工具性的。訪員和受訪者只是一種為了獲取目標資料的工具。

女性主義研究的目標異質性也很高，但是兩個常見的目標是讓女性的經驗更為人所知以及增進受訪者對研究過程的參與。女性主義訪談包括以下面向：

- 偏好非結構和開放式問題的形式
- 偏好對一個人多次訪談
- 創造社會連結以及建立信任的社會關係
- 訪員本身也揭露個人經驗
- 運用女性的能力，如開放、尊敬、和理解
- 避免用不重視專業地位的方式來控制受訪者或增進平等性
- 仔細傾聽，訪員在情緒上和受訪者結合在一起
- 以受訪者導向進行，而非研究者或問卷導向
- 鼓勵受訪者以他們最舒適的方式表達自我——比方說，藉由說故事或岔出主題的方式
- 創造一種賦權感（a sense of empowerment）以及女性意識團體

雙方的瞭解。

兩難之處在於一般的對話包含了有組織的因素，用來偵測並修正誤解且建立互相的瞭解。在調查訪談情境中通常會控制這些因素，以確保每個受訪者接受到的是標準的方式。標準化問法並不會自動造成標準化的意義。弔詭的是，「調查資料的效度，可能會因為為了要確保研究信度設下的限制而受到潛在的破壞」（Suchman and Jordan, 1992: 242）。

社會意義不會獨立存在於文字之外。它存在於社會脈絡和人際互動間，以及人們生活的文化架構下（有時候會被性別、種族、區域等因素分割）。舉例而言，男性和女性在思考其健康狀態時的想法不同，而可能對於相同健康情形而提出不同答案（Groves等，1992）。這是否表示比較多男性處於健康狀態？即使是調查研究中所謂的客觀類別，像是種族，也可能因為受訪者主觀認定而有不同答案（Smith, 1984）。人們在訪談中的答案遠比天真的假設模型來得複雜。比方說，「不正確的答案並非故意不誠實，個人可能在某種情境下誠實作答，而在其他情境下或是回答特定問題時不誠實」（Wentworth, 1993: 130）。

在這種複雜及各種可能性之下，細心的調查研究者應該怎麼作呢？調查研究者至少應該針對封閉式問題輔以一些開放式問題以及深入的探問。這會花多一點時間、需要訓練良好的訪員、獲得的答案可能比較難以標準化、也較難以量化。固定答案的問卷立基於天真的假設模型，在許多情境中，它顯示一種比較簡單且機械化的方法。這種包含訪員誤差、文化意義和社會情境中的訪談，本身的情境提供了量化或質化社會研究如何互補的課題。當量化調查研究員試圖減少訪員的偏誤以及受訪者的混淆時，他們發現量化研究者，在「人們如何在許多不同的社會情境下建構意義」這方面，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洞察力。

運用電腦協助的電話訪問

電腦技術的進步以及價格下降造成專業的調查研究機構開始運用「運用電腦協助的電話訪問」(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CATI)系統。在這系統中，訪員坐在電腦前面打電話。戴著耳機與麥克風，訪員針對挑出的受訪者，打電話過去並看著電腦螢幕唸出問題，然後透過鍵盤輸入答案，當答案輸入後，下一題就會出現在電腦螢幕上。

CATI加快了訪問的速度並減少訪員的錯誤，也減少資料輸入電腦的步驟而加快資料處理程序。當然，CATI需要先投資電腦設備以及一些電腦能力。CATI對於系列的問題很有用，因為電腦可以顯示適合特定受訪者的問題，訪員就不需要翻問卷找下一題。此外，電腦可以在訪員輸入後馬上檢查答案。舉例來說，如果訪員輸入一個不可能或很明顯錯誤的答案（例如：將男性的M輸入成H），電腦就會要求輸入另一個答案。

有一些公司發展出個人電腦適用的軟體讓研究者可以設計問卷和分析資料。這些程式提供了撰寫問題、記錄、答案、分析資料、和撰寫報告的指引。這些程式可以增進調查研究中比較機械式面向的速度——像是問卷打字、版面設計和記錄答案等——但是卻無法取代對調查研究方法及其限制的瞭解。研究者仍然要清楚地將變項概念化、準備撰寫良好的問卷、設計問題和答案的順序和形式、並進行問卷的前測。和受訪者溝通模稜兩可之處並挑出最具代表性的答案以確保調查研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詳見（資訊箱 10.14）調查研究的範例。

合乎倫理的調查

誠如所有的社會調查，人們可以採用道德或不道德的方式進行調查。調查研究的主要道德議題為侵犯隱私權。調查研究者可能會

資訊箱 10.14

調查範例

Hagan (1990) 指出加拿大的律師仍存在性別歧視和所得不平等的狀態。他舉多倫多的律師為例，並以就業類型（大事務所、中小型事務所、或不屬於事務所）和性別分析。1985年，他郵寄1,609份問卷加上兩封提醒信函後，接到1,051封回函，其中有65.3%是主動回覆。問卷要求受訪者將1984年稅前淨收入填在26等級中，範圍從10,000元以下到500,000元以上。445位女性律師平均收入為44,210元，而396位男性律師平均收入則為86,756元。問卷也包括了以下控制變項的問題：工作職位的類型（如：管理部門、獨立工作者）、宗教背景、特殊資料（如：稅收、家庭、犯罪資料）、工作年資、工作史、以及在法學院的表現等。在仔細統計分析之後，Hagan指出所得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性別差異，也就是說，每年約有10,636元是因為性別歧視而減少的收入。女性律師的所得和前一年相仿，但男性律師則所得較高。男性如果具有生涯上的優勢，像是教育背景或是工作經驗，會比女性容易呈現在所得上。舉例而言，男性如果是大至中型事務所的管理者，就比在小型事務所相同職位者多賺84,000元，而女性相同狀況下只多賺24,000元。

因為問一些較私密的活動或個人信仰而侵犯了受訪者的隱私。人們有隱私權，受訪者可以決定要在何時、對何人透露個人的訊息。通常比較會在一個舒適的狀態、互信的基礎上提供資訊，同時相信這類資訊對研究目的而言是必須的、也相信答案會被保密。研究者應該對所有受訪者真誠、減低其焦慮或不舒服。也有責任確保資料的隱密性。

第二個議題則是受訪者的自願參與。受訪者同意回答問題並隨時可以拒絕參與。他們在研究中要讓參與者「正式同意」。研究者

依靠受訪者自願合作，因此研究者需要用很謹慎的方式問設計好的問題，也要謹守保密原則。

第三個倫理議題則是調查的濫用以及操弄式的調查。因為其普遍性，有些人運用調查來誤導他人。「**操弄式的調查**」(preudosurvey)是運用調查試圖說服某人去做某件事，而不是真的對調查受訪者的意見有興趣。有些騙子用調查的名義來侵犯別人的隱私權、進入別人家裡、或是名為調查，實為推銷。1994年美國競選活動中有這樣一個例子，在一種所謂的「封鎖性民調」活動中，一個不知名的調查組織打電話給潛在的投票人，問他們是否支持特定候選人，若是，訪員會問如果這位候選人品性不佳(如：曾因酒醉駕車被捕、嗑藥、曾入獄過等等)則他們是否還會支持他。這個調查的目的不在於測量候選人的支持率，而是要知道受訪者對某候選人的支持並試圖影響投票行為。筆者就接過這類電話，是一位落後之候選人試圖操弄選舉行為的方式。但不應該有任何人在競選活動中運用這類手段。

另一個倫理的議題是人們對調查結果、設計不良的問卷或有目的性的調查的不當使用(詳見資訊箱10.15)。人們可能會需要從調查得到某些答案，但調查並未呈現這些，或是不瞭解調查的限制。那些設計和準備調查的人可能缺乏足夠的訓練而不足以進行一個縝密的調查。政策決定如果是立基於草率的調查則可能導致浪費和人力。這些誤用更顯示出，研究者在進行調查研究時方法論的正確是很重要的，研究者應該要很清楚調查結果的限制並在報告中指出。

大眾傳媒在報導調查結果以及調查的品質時經常會濫用這些資料。很少人會希望直接閱讀調查結果，但是研究者應該要將調查的細節包含進來(詳見表10.5)以減少調查研究的誤用，如果調查缺乏這些資訊就要再增加題目。調查研究者呼籲媒體將這些資訊納入，但事實上媒體很少會加入這些資訊。大眾傳媒報導的調查中，有超過88%都沒有把是誰進行此項調查報導出來，只有18%指出調查進行的方式等細節(Singer, 1988)。當媒體報導許多調查而非

資訊箱 10.15

調查發現多數人反對管制香菸，是這樣的嗎？

煙草工業遊說團體釋出一項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反對擴張聯邦政府對香菸的管制」。數位來自民調組織的專家指出這是一項有偏誤的調查。資料來自煙草公司在1994年12月，針對1,000位隨機選樣的成年人進行的電話調查。受訪者被問到「增加對香菸的管制」是否是最重要的、非常重要、有些重要、或是一點也不重要。訪問者是否將此議題和其他背景資料作交叉分析，像是稅收、犯罪紀錄、或教育程度，並不清楚。另一個問題是問受訪者是否想要更多、和目前相同、或較少的管制。因為大多數人標出煙草管制是重要的，煙草工業管理者就將這結果解釋為他們反對管制(Hilts, 1995)。

表10.5 報導調查研究應該要納入的十個項目

1. 使用的抽樣架構。
2. 調查進行的日期。
3. 樣本代表的人口群（如：美國成人、澳洲大學生等）。
4. 蒐集資料樣本的大小。
5. 抽樣方法（如：隨機抽樣）。
6. 問題確切的措辭。
7. 調查方法（如：面訪、電訪）。
8. 贊助調查的組織（提供經費以及執行單位）。
9. 回答率或接觸人中真正完成問卷的百分比。
10. 任何遺漏的資訊或是報導中特定問題回答「不知道」的部分。

只有社會調查時就常發生。

近來，並沒有品質管制的標準來規範在美國媒體上報導的民調（詳見資訊箱10.16）。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研究者在試圖取得適

當的樣本、訪員訓練與督導、適當的問卷設計、取得大眾的資料、以及調查組織的控制上進行得並不順利 (Turner and Martin, 1984: 62)，結果，大眾媒體報導的是有偏差且誤導的調查結果，和專業調查結果混為一談。媒體報導「一般常見的錯誤引用……導致對調查預估的過度信任。這些數據通常只有計算抽樣的變異而未將其他的變異來源計算進來」(Turner and Martin, 1984: 107)。造成這樣公眾的混淆和對調查的不信任並不令人驚訝。

資訊箱 10.16

錢雜誌中關於「最適合居住地」民調的問題

從1980年代後期，錢雜誌每年都會出版「美國最適合居住地」，將全美300個大都會區排名。結果會加以公開。當我住的城市經常名列前茅時，造成我對Gutterbock (1997)的研究很感興趣，他指出這本雜誌「對調查研究的可信度造成一種錯誤的引導」(第355頁)。錢雜誌的資料是基於每年針對250位雜誌訂戶的電話調查，但其中新訂戶抽樣過多。受訪者被要求針對40項特質去排列順序(例如：犯罪率、氣候、所得稅等)，從1排到10。對方法的細節透露得很少，且Gutterbock從雜誌所得的資料也很有限。在電訪中，只有很少人回電回答訪問，並且在樣本中並未包含家庭主婦。抽樣架構不明，很明顯地是由訂戶提供的電話號碼抽出。估計作答率低於36%。雜誌也未固定問卷用詞，每年都有些許改變。排序的索引是由答案拼湊而來，但加權的比例並未公佈。在40項特質中，有一大部分(10項)都跟經濟有關；有些則很少(如：教育僅有3項，居住僅有4項)。Gutterbock認為所謂的「美國最適合居住地」的民調是基於一個不恰當的調查方法、不專業的標準，而其調查發現「實際上並不能真正代表民意」(第535頁)。

結論

本章中你學到了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是在社會研究技巧中最被普遍運用的。其歷史悠久，在過去30年來，也有很大的發展。你也學到一些關於如何撰寫好調查問題的方法，其中有很多要避免的事項以及要納入的。此外，也學到了關於郵寄問卷、電訪以及面訪等三種調查研究的優缺點，讓我們明白訪問，尤其是面訪，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雖然本章焦點在調查研究，而在其他量化研究中（如：實證研究），研究者也用問卷來測量變項，但調查研究經常被稱為樣本調查，因為通常會採用隨機抽樣這種技術。在這個過程中去問很多人相同的問題，而後對答案做出解釋。

調查是一個過程，在其中研究者將研究問題透過問卷傳達，而後透過受訪者來創造資料。調查研究者包含了其他人——受訪者——也就是回答問題的人。從答案中，研究者創造出量化的資料來分析以解答研究問題。調查研究者試著將錯誤減到最少，但是調查資料還是常常有錯，偏誤在調查中可能會越滾越多。舉例而言，偏誤可能在抽樣中架構中就發生，從受訪者未作答、從問題措辭或順序、以及訪員的偏誤都有可能。但是，請不要讓偏誤的存在阻礙你去運用調查。反之，應該學習在設計調查研究以即將調查結果概化時就要十分謹慎。

重要名詞

封閉式問題	運用電腦協助的電訪	脈絡效應
列聯式問題	猶疑者	焦點團體
全過濾式問題	製卷順序	訪談大綱
矩陣式問題	開放式問題	順序效應
部分開放式問題	聲望上的偏誤	追問

半過濾式問題	問卷	隨機受試技術
時近效應	反應心向	測謊題
社會期待的偏誤	標準形問題	壓縮回答
威脅性問題	完全設計方法	措辭可能的效應

問題回顧

1. 調查經常問的問題是哪六大類？請針對每一類舉例說明。
2. 為何調查稱之為有相關性的？其與實證研究有何差異？
3. 1960年代和1970年代間有哪五項改變，嚴重地影響了調查研究？
4. 在問卷措辭中應避免的事項有十項，請列出五項。
5. 有哪些主題會威脅到受訪者？研究者應該怎樣問這類問題？
6. 開放式問題和封閉式問題各有何利弊？
7. 什麼是全過濾式、半過濾式、和標準形問題？和猶疑的受訪者又有何關連？
8. 普通的對話和調查訪問有何不同？
9. 郵寄問卷、電訪和面訪在哪些條件下最佳？
10. 何謂CATI？運用的時機為何？

非反應式研究以及次級分析

導論

非反應式的測量

非反應式研究的邏輯

非反應式的變異或非強行介入的

觀察

記錄及文件

內容分析

何謂內容分析？

適合進行內容分析的主題

測量與編碼

編碼、效度、和信度

如何進行內容分析研究

推論

現有的統計數據 / 文獻及次級分析

現有統計數據研究主題的適當性

社會指標

資料所在

信度與效度

現有統計數據 / 文獻研究範例

推論的議題以及理論檢驗

非反應式資料的推論

倫理的考量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在許多研究條件下，單獨使用訪談或問卷無法提供有效的答案。那些較不普遍的測量，其目的強調的是支撐這些弱點而提供長處以評估對效度的威脅。運用這些測量的花費很高，但這種途徑對調查者來說是很必要的。

——Eugene Webbet al., Nonreactive Measur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p.315-316

導論

實證與調查研究都是「反應式的」(reactive)，也就是說，被研究的對象瞭解調查的事實。本章所提的技術則指出了反應式測量的限制。你會學到四種質化研究技術是「非反應式的」(nonreactive)，亦即，被研究者不知道他們是研究計畫的一部份。非反應式的技術大多立基於實證主義原則，但也被詮釋及批判研究者所使用。

你會學到的第一種技術並不純然是一種技術，而可以說是對介入的非反應式測量一種鬆散的資料蒐集。伴隨而來的是內容分析，這建立了質化研究設計的基礎，而且是社會科學中設計良好的一種研究技術。現存的統計數據和次級分析，指向從政府文件或先前的調查資料蒐集，研究者用許多新方法來解釋以說明新的問題，雖然資料在第一次蒐集時可能是反應式的，但研究者可以無需用到其反應式效果來回答新問題。

非反應式的測量

非反應式研究的邏輯

當研究者注意到某件事指向有趣的變項時，非反應式的測量就此開始。非反應式或非強行介入的測量重點在於人們並不知道他們被研究，而是自然地留下社會性行為，或善於觀察的研究者直接從證據解釋行為或態度，而不需打擾到被研究者。未被注意到的觀察也是一種非反應式的測量。舉例而言，McKelvie和Schamer(1988)非介入式地觀察駕駛人是否在停止標誌前停車，他們在白天和晚上都進行觀察，觀察者注意的包括有駕駛是男性或女性，單獨駕駛或有乘客，交通狀況如何，是否有來車而完全停止、慢慢停車或根本不停車等現象。

非反應式的變異或非強行介入的觀察

非反應式的測量常常很多變，且研究者在發明間接測量社會行為上很有創意（詳見資訊箱11.1之範例），因為這類測量除了非反應式以外很少有共通點，所以透過範例來學習是最好的方式。有些是「侵蝕性測量」（erosion measures），以選擇性的耗損作為測量，有些則是「增生性測量」（accretion measures），測量是某些背後意涵的累積。

研究者透過歷史資料呈現的家庭圖像，來瞭解家庭中性別與座位類型的關係；都市人類學家透過丟棄的垃圾瞭解人們的生活形態（例如：酒瓶呈現出酒的消費狀況），透過垃圾發現，人們對酒類消費的報告少了40至60%（Rathje and Murphy, 1992: 71）；研究者也透過檢查車子送修時收音機在哪個頻道來瞭解駕駛人的收聽習慣；也有研究者透過在博物館不同樓層磁磚的磨損程度來瞭解其對不同展覽的興趣多寡；還有透過在高中男女廁所的塗鴉瞭解性別對不同議題的興趣；有些人則透過高中畢業紀念冊，比較那些畢業後患有精神疾病與沒有的人在高中時期的活動；研究者透過支持不同政治候選人其貼在保險桿上的小貼紙，來了解某位候選人的支持者是否較另一位的支持者更常違反交通規則；甚至有人透過測量水壓的變化來研究電視收視行為，因為廣告時段使用洗手間頻率增加（參考資訊箱11.2）。

記錄及文件

要進行非反應式的測量需依循量化測量的邏輯，雖然質化研究者也運用非反應式的觀察。研究者首先將建構概念化，而後將此架構連結到非反應式的實證證據上，也就是測量本身。變項的操作化定義，包括研究者如何進行系統化的註解和觀察記錄。

因為非反應式的測量間接地指向研究架構，研究者需要指出除了研究利益之外所觀察的理由。舉例而言，研究者希望測量消費者

資訊箱 11.1

非反應式測量的範例

物理證據推論

侵蝕性：外包裝顯示使用程度。

範例：研究者提出，小朋友在托兒所的玩具是在同一時間購買的。

包裝脫落的玩具顯示孩子對玩具的高度興趣。

增生性：累積足夠的物理證據來解釋行為。

範例：研究者透過在男女生宿舍的垃圾桶或回收桶找到的鋁罐標籤提出解釋。這些資料顯示不同性別對不同品牌飲料的愛好。

文獻資料

定期更新的記錄：定期出刊的公共刊物可以揭露更多訊息。

範例：研究者透過婚姻記錄來討論新郎新娘的年齡。區域差異顯示，在某些區域男性特別偏好與年輕女性結婚。

其他記錄：不定期或私人文件也可透露一些訊息。

範例：研究者發現某一所大學學務長辦公室採購的紙張數量十年來跟隨著學生註冊人數改變，學生數量有規模地增加，則文書作業也增加。

觀察

外在表現：人們的外表可以揭露一些社會因素。

範例：研究者觀察學生在校際活動輸或贏後，他們是否還喜歡穿著制服。

計算行為次數：計算多少人去進行某件事也透露一些訊息。

範例：研究者計算男性與女性在停止標誌前完全停止和慢慢滑行的人次。這顯示兩性在駕駛行為上的差異。

時間長短：人們花多少時間去作某件事則指出其專注程度。

範例：研究者測量男女兩性在裸男和裸女海報前停留的時間長短。時間長短可以解釋兩性對裸體害羞或感興趣的程度。

資訊箱 11.2

在墓碑上發現資料

Foster 與其同僚（1998）在伊利諾州某區尋找1830年至1989年間10處墓園裡的墓碑。他們從2,028個埋葬者中找到超過2,000位的生日、祭日、年齡等資料。研究者發現該區域和全國資料相比有些許不同，發現死亡有兩個高峰期（春冬兩季），年齡10至64歲的女性較男性死亡率高，而年輕人在夏末死亡率較高、老人卻是在冬末較高。

在店內的動線，其測量是落塵量和磁磚的磨損程度，研究者首先確認何謂消費者動線（例：該樓層是通往其他部門的路徑嗎？這是作商品展示的好場所嗎？）；其次，研究者有系統地測量落塵量或磁磚的磨損程度，和其他展示場所相比較，並定期作記錄（如每月記錄一次）；最後，研究者對觀察提出其他原因（如，該樓層磁磚質地較薄且容易磨損，或是該展示區鄰近出口）。

內容分析

何謂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是一種蒐集資料以及分析文本內容的技術。「內容」（content）指的是文字、意義、圖片、符號、想法、標題、或是其他可以溝通的訊息。「文本」（text）則是任何寫下來的、視覺上的、或語言上作為溝通的媒介物，包括書本、報紙或雜誌上的文章、廣告、演說、官方文件、電影或錄影帶、音樂中的歌詞、照片、布料、或藝術品。舉例來說，Cerulo（1989）研究的是國歌。

內容分析可以追溯至一個世紀以前，並且運用在很多領域——

文學、史學、新聞學、政治學、教育、心理學等等。在1910年德國社會學會（the German Sociological Society）第一次聚會時，Max Weber就提出用此法進行報紙的研究。

在內容分析上，研究者運用客觀、系統化的計數和紀錄程序來生產文本中符號內容量化的描述。事實上，Markoff和其同僚（1974）就提出「文本的編碼」（textual coding）可能是比內容分析更貼切的名字。還有質化或敘事性的內容分析。這裡強調的是文本內容的量化資料。

內容分析是非反應式的，因為分析內容的研究者進行文字、訊息或符號等文本的溝通，並不會對讀者或接收者造成任何影響。舉例來說，我，作為本書的作者，寫下文字或對話試圖傳遞研究方法的內容給學生瞭解，而本書的寫作方式以及你們閱讀的方式並不會因為是否進行內容分析而產生任何知識或意圖。

內容分析讓研究者透過溝通來源（即，書本、文章、電影等）揭露內容（即，訊息、意義、符號等）。讓研究者用不同方式，從最基本的閱讀書籍到觀看電視等方法來深入探索或發現內容。

在內容分析上，研究者可以透過量化的技術（如圖表），進行許多文本的比較分析，此外，研究者也可以揭露一些不易被看到的文本內容。舉例而言，你可能看電視廣告時發現白人以外的人種很少出現在昂貴消費商品（如，高級汽車、皮草、珠寶、香水等）的廣告中，內容分析可以記錄下——透過客觀、量化的方式——你基於非系統性的觀察產生的模糊感受是否真實。同時，產出的是文本可重複、精確的結果。

內容分析包括隨機抽樣、非強行介入的測量、以及抽象建構的操作化定義。編碼將內容轉換成數字的變項。在進行內容分析之後，研究者蒐集的資料，就可以輸入電腦並用統計方法分析，而其他實證或調查研究者也可以這麼做。

適合進行內容分析的主題

研究者將內容分析用在多種用途上：研究流行音樂的旋律、聖歌的宗教符號、報紙報導主題的趨勢以及報紙社論的意識型態論調、教科書或電影中的刻板性別角色、不同種族的人在電視廣告和節目中出現的頻率、開放式調查問題的答案、戰時的作戰教育宣導、流行雜誌的封面、自殺者的人格特質、廣告訊息的主題、對話中的性別差異等等。Seider（1974）進行美國企業執行長公開演說的內容分析發現，這些執行長強調的不脫五個主題，多少都與企業的工業化有關，Woodrum（1984: 1）指出：

內容分析仍是一種被低度利用的研究方法，但對於信仰、組織、態度、與人群關係等的研究都有很大的潛力。內容分析有限的應用與發展導因於對研究方法的不熟悉，以及其歷史上在主流社會科學中被孤立的狀態所造成的。

研究者對內容分析的概化基礎也受限於文化傳播本身。內容分析不能夠決定文獻美學品質的評估真實性有多少，它揭露文本內容但不能對內容的重要性加以詮釋。研究者應該直接解釋文本。Holsti（1968: 602）提出警告，「內容分析只可以被視為一種對文件之補充性、但不是替代性的主觀解釋。」

內容分析對於三種研究問題來說很有用。第一，涉及大量文本的問題（例如：許多年的報紙文章）且涉及抽樣和眾多編碼者的研究很有助益。其次，當研究主題必須「保持一段距離」來研究時很有用，舉例來說，內容分析可用來研究歷史文件、已經逝世的人的手稿、或是外國廣播節目等。最後，內容分析還可以揭露文本中以一般觀察很難看到的訊息，文本的創造者或讀者都未必察覺到這些主題、偏誤、或特質。舉例而言，學齡前兒童繪本的作者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用刻板的性別角色在描繪兒童，但透過內容分析則可以揭發這類高度性別刻板印象的內容；另一個實例是在單一性別的團

體對話，雖然人們可能並未覺知到這一點，但在單一性別團體中，女性會談論比較多人際間和社會關係的事務，而男性則多談論成就和侵略性事務。

測量與編碼

❖ 一般性議題

在內容分析中謹慎的測量是很重要的，因為研究者要將冗長且模糊的符號轉變成精確、客觀、量化的資料。研究者仔細設計並記錄編碼的程序，以便他人可以複製。舉例而言，研究者想瞭解電視戲劇節目出現老年人負面的刻板印象頻率有多高，研究者就針對「老年人的負面刻板印象」這個架構進行測量，概念化的結果會發現一串對於老人的刻板或負面印象（如：衰老、健忘、暴躁、脆弱、重聽、遲緩、生病、住在安養院、被動、保守等等），但不一定代表老年人的特質。比方說，如果65歲以上的老人有5%住在安養院，在電視上就被描繪成有50%住在安養院，這就是負面刻板印象的事證。

內容分析的結構是以「編碼系統」(coding system)在運作的，這是一組指示或規則指導該如何有系統地從文本中觀察並紀錄其內容。研究者回溯被研究的文本類型或傳媒（如，電視劇、小說、雜誌廣告的照片等），這也端賴研究者的分析單位。

❖ 單位

在內容分析上的分析單位變化很多，可以是一個字、一個段落、一個主題、一段情節、一篇新聞報導、一個角色等等。除了分析單位以外，研究者在內容分析上還運用其他可能與分析單位相同或不同的單位：記錄單位、內容單位、以及計算單位。彼此之間差異不大，很容易混淆，但各自有各自的角色，在簡單的計畫中，這三者可能是相同的。

❖ 測量什麼？

內容分析的測量運用「**結構式的觀察**」(structured observation)：基於撰寫規則有系統地、謹慎地觀察，此一規則說明了如何將觀察加以分類。在其他的測量中，類別應該要周延且互斥。而撰寫規則使得複製成為可能，並增加信度。雖然研究者從初步的編碼規則開始，通常進行一個前導研究而後再據此改進編碼的方式。

編碼系統確認了文本內容的四種特質：頻率、方向、密度、以及空間。研究者在內容分析的研究計畫從一個到四個特質都可能加以測量。

頻率 (Frequency) 頻率簡單來說是某件事是否發生的計算，如果發生了，有多常發生。比方說，一星期中有多少老年人出現在電視節目中？他們的各項特質佔多少百分比？或是他們出現的節目有多少百分比？

方向 (Direction) 方向是指某些訊息在內容中的方向性（例如，正向或負向，支持或反對）。舉例來說，研究者列出老年人在電視節目中可以表現的行為清單，有些是正向的（如：友善、智慧、關心），而有些是負向的（如：討厭、遲鈍、自私）。

密度 (Intensity) 密度是指在某個向度上訊息的力度。舉例而言，健忘這個特質可以是很輕微的（如：出門時不記得帶鑰匙、回想一個許久不見的朋友名字要花很長時間），也可能是很嚴重的（如：不記得自己的名字，或認不得自己的孩子）。

空間 (Space) 研究者可以記錄下文本訊息的大小或是所佔空間多寡。在書寫文本中，空間可以透過計算字數、句子、段落、或是一頁的大小（如幾吋見方）；對錄影帶等文本，空間可以透過時間長短來測量。舉例來說，一個電視角色可能出現幾秒鐘或是在兩小時的節目中每一場都出現。

編碼、效度、和信度

❖ 顯性的編碼 (manifest coding)

針對文本中可見的、表面的內容加以編碼稱之為「顯性的編碼」。舉例而言，研究者計算一個句子或一個字（如：紅色）在書寫文本中出現了幾次，或是某種特定動作（如：親吻）在照片或錄影帶中是否出現。編碼系統將這些詞或動作在文本中出現的位置列出來，研究者可以用電腦程式來搜尋文本中的字或詞，並用電腦加以計算。要如此做，研究者要先學會電腦程式、發展出相關字詞的完整清單、而後將文本轉化成電腦可以閱讀的形式。

顯性編碼信度很高是因為詞或字有沒有出現十分明確。不幸地，顯性編碼並不能將暗示性字眼加以計算。相同的字在不同脈絡下可能有不同的意義，一個字有多重意義的可能性限制了測量其顯性編碼的效度（見圖 11.1）。

舉例而言，我最近讀了一本紅色封面的書，這本書現在可說是紅得發燙。故事內容大致說一位貨車司機開著一輛火紅色的貨車不停地跑，只有到落葉轉紅的季節遇到紅燈才會停下；書中又提到一些紅人帶了一些紅旗子到一所古老的紅磚學校前，他們面紅耳赤地反對食用紅肉，因為紅、白、藍三色是值得紀念的。書中有一位主角是一位有著紅色酒糟鼻的鬥牛士，專門帶著紅色巾子卻鬥紅狐狸而不鬥牛；他只要一吃紅辣椒就面紅耳赤、雙眼發紅。（譯註：本段經譯者略微改寫，請勿深究故事不合理之處，作者乃強調同為「紅色」一詞，但意義各有不同。）

❖ 隱性的編碼 (latent coding)

研究者用「隱性的編碼」（也稱之為「語意學分析」[semantic analysis]）尋找文本內容中隱藏的、暗示性的意涵。舉例來說，研究者讀完一整篇文章且決定哪些是色情的內容、哪些是浪漫愛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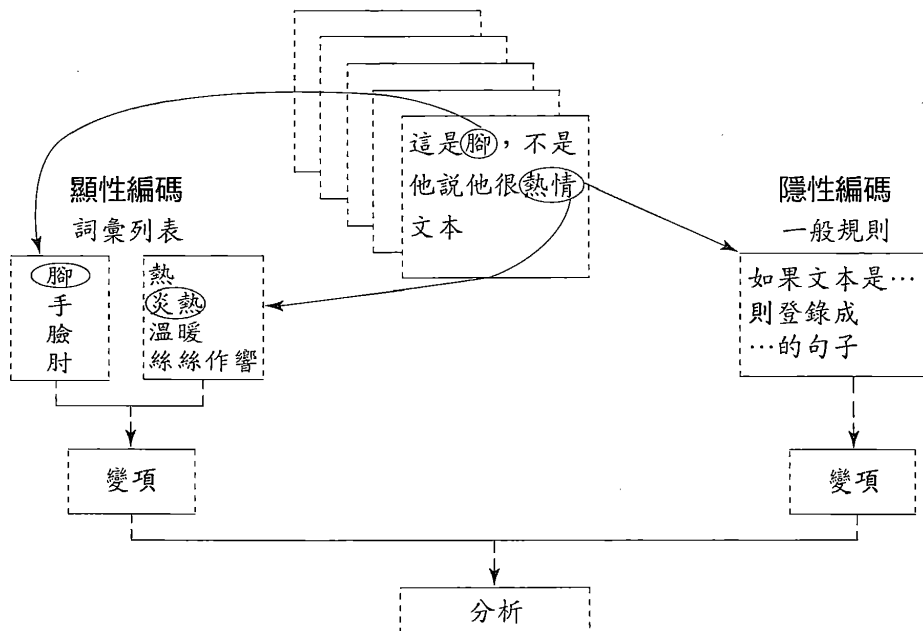


圖 11.1 顯性和隱性編碼

分，研究者的編碼系統有一套規則來指導他／她對文本的解釋，並決定要呈現哪些主題（見圖 11.1）。

隱性編碼比顯性編碼信度低。它所依賴的是編碼者對語言及社會意義的知識。訓練、練習和撰寫規則都可增進信度，但要維持確認主題的一致性仍很不容易。沒錯。隱性編碼的效度可能大於顯性編碼，因為許多人用暗示的方式溝通，並隨著脈絡不同，而不單單靠特定文字來溝通。

研究者可以同時使用顯性和隱性的編碼。如果二者得到相同結果，最後結果是很有力的；如果不同，研究者可能要重新解釋操作性和理論上的定義。

❖ 編碼者間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

內容分析經常包含許多單位的編碼資料。研究計畫可能必須觀

察許多書本、觀看上百小時的電視、甚至是上千篇新聞報導的內容，除了由研究者本人進行編碼外，也可能聘請研究助理協助進行資料編碼，研究者要教導編碼員編碼的規則以及如何在紙上編碼資料，編碼者應該要瞭解變項、遵循編碼規則、遇到模糊不清時提出問題。開始進行編碼之後，如果有任何特殊狀況，研究者應將之記錄下，如此以後才能維持一致性。

研究者如果雇用數個編碼員時，一定要檢查編碼員彼此之間的一致性。研究者可以請不同編碼員進行相同文本的編碼以檢查其一致性。研究者檢測「編碼者間的信度」，這是一種當量信度，以統計係數告知編碼者之間一致的程度。而這個係數一定要附在內容分析的報告當中。

當編碼的程序拖延一段相當的時間（如超過三個月），研究者也要檢查信度的穩定度，可以個別給編碼者一些已經預先編碼的文本樣本，請之重新編碼一次，然後看編碼者編碼的資料是一致的或有所變動。舉例而言，六個小時的電視劇在四個月時編碼一次，在七月時由原編碼者不看原始編碼資料再編碼一次。編碼中如果有大量的偏差就有必要針對文本進行第二次的編碼。

如何進行內容分析研究

❖ 形成問題

如同大多數研究，內容分析的研究者從研究問題著手。當問題包含的變項是訊息或符號時，就很適合進行內容分析。舉例而言，我希望知道報紙是怎樣報導一個政治活動，我的架構中，「報導」包括了版面數、版面的明顯程度、以及版上報導是否偏向某位候選人。我可以調查人們對版面報導的看法，但是較好的方法是直接用內容分析去檢視報紙的內容。

❖ 分析的單位

研究者要決定分析單位（即，一次編碼所要涵蓋的文本數量）。比方說，就一個政治活動而言，可用報紙的每個議題（或每一天）為單位來分析。

❖ 取樣

內容分析研究者經常採用隨機抽樣。首先，要先定義母群體和抽樣單元。比方說，母群體可能是在某段時間某一特定文件中所有字、所有句子、所有圖片、或所有文章；類似的則可以包括某時段某電視節目的所有對話、情境、場景、或橋段。舉例來說，我想瞭解在美國新聞性週刊中如何描繪女性和少數民族，分析單位是文章，母群體包括1979至1998年間，所有在時代雜誌、新聞週刊、及美國新聞雜誌世界報導中出現的文章。我首先確認這三本雜誌都是在這段期間出刊的，並對文章的意義加以精確定義，比方說，影評算不算文章？文章有沒有字數限制（如：兩個句子）？分為上下兩集的文章算一篇或兩篇？

在研究中發現三種雜誌平均每年出刊52期，每期有45篇文章，以20年來看，本研究的母群體就包括140,000篇文章（ $3 \times 45 \times 52 \times 20 = 140,000$ ），而抽樣架構就是這所有文章的清單；接下來要決定樣本大小和抽樣設計，在檢視過研究預算和時間後，我決定將樣本縮減至1,400篇文章，因此，抽樣率為1%。我也要選擇一種抽樣設計，不採用系統抽樣是因為雜誌的議題會隨著年曆而循環（如，每隔52個議題就會輪回類似的議題）。因為每份雜誌每個議題都很重要，我採用分層抽樣。我將雜誌分為幾層，每種雜誌抽取 $1,400/3 = 467$ 篇文章，我要確保這些文章能代表20年來的文章，因此我也將每年分層。結果每份雜誌每年大約為23篇文章。

最後，我透過亂數表選取23個數字代表每份雜誌每年的23篇文章。我發展出抽樣架構工作表，由140,401篇文章隨機選出1,398

篇作為樣本（見表11.1）。

❖ 變項和建構的編碼類別

在我舉的實例中，我有興趣的是非裔美人和西班牙裔女性形塑出的重要領導角色。我必須將「重要領導角色」賦予操作型定義，

表 11.1 從工作清單中摘錄樣本

雜誌	議題	文章	數目	抽樣中的文章 ^a	作為樣本文章的編號
時代	1月1-7, 1979	第2-3頁	000001	否	
時代	同上	第4頁底	000002	否	
時代	同上	第4頁首	000003	是—1	0001
.					
.					
時代	3月1-7, 1998	第2-5頁	002101	是—10	0454
時代	同上	第6頁右欄	002102	否	
時代	同上	第6頁左欄	002103	否	
時代	同上	第7頁	002104	否	
.					
.					
時代	12月24-31, 1998	第4-5頁	002201	是—22	0467
時代	同上	第5頁底	002202	否	
時代	同上	第5頁首	002203	是—23	0468
新聞週刊	1月1-7, 1979	第1-2頁	010030	否	
新聞週刊	同上	第3頁	010031	是—1	0469
.					
.					
美國新聞	12月25-31, 1998	第62頁	140401	是—23	1389

^a 「是」表示此數字從亂數表中被選中。後面的數字表示這篇文章為該年選中的第幾篇。

並用文字表達來確認文中哪類的人符合此定義。舉例而言，如果一篇文章討論某位已逝者的成就，則這位逝者是否算重要角色？怎樣才算重要角色——地區女童軍領袖或企業總裁？

我也要決定文中所舉之人的種族和性別。如果文章或圖片中的人，其種族和性別不清楚的話怎麼辦？我要怎樣決定其種族和性別？

因為我感興趣的是正向的領導角色，測量就要指出這個角色是正向或負向。我可以用顯性或隱性的編碼來進行，在顯性編碼中，我列出一串形容詞和片語，如果在抽樣文章中某人有此一形容詞出現，那就可以確認其方向。比方說，「聰明的」和「表現傑出」是正向的，而「犯罪頭子」和「缺乏創見的」是負向的。就隱性編碼來說，我創出一套規則來判斷，比方說，我將一個外交官拯救世界危機、一位企業執行長無法挽救企業、或一位律師打贏官司等故事區分為正向和負向的詞（相關的編碼問題見資訊箱 11.3）。

除了將編碼規則寫下來以外，內容分析研究者還創造出一種

資訊箱 11.3

隱性編碼問題的範例，雜誌文章中的領導角色研究

1. 文章的屬性。哪份雜誌？文章刊登的日期？文章篇幅多大？文章主題為何？主題在哪邊出現？是否使用照片？
2. 文章中的人物。文章中具名的人物有多少位？在這些當中，有多少在文章中是重要的？這些人的種族和性別為何？
3. 領導角色。針對文章中每個重要角色，哪些具有領導角色？其領導或專業的領域為何？
4. 正向或負向角色。每個領導或專業角色，標示出其正向或負向的程度。比方說，5 = 非常正向，4 = 正向，3 = 中性，2 = 負向，1 = 非常負向，0 = 不確定。

「記錄表」(recording sheet, 也稱之為編碼表 [coding form] 或計算表 [tally sheet]) 以便將資料編碼在上面 (參考資訊箱 11.4)。每個單元應有一張獨立的記錄表, 這張表格不一定要是一張紙, 也可以是資料卡, 或是電腦檔案記錄。在進行研究計畫階段, 研究者計算所需工作有多少, 比方說, 在前測階段, 我發現閱讀並編碼一篇文章平均花費 15 分鐘, 這不包括抽樣或選取雜誌上的文章。有大約 1,400 篇文章, 編碼就需要 350 個小時, 還不包括確認編碼正確性的時間在內。因為 350 個小時大約等於每週工作 40 小時、連續工作 9 週, 因此我必須考慮聘請助理進行編碼。

每份記錄表都有記錄序號以及每個變項資料的欄位, 我也將此計畫的確認資訊放入記錄表中, 以避免放錯地方或和其他表格搞混。最後, 如果我用很多人進行編碼, 記錄表上也要記下編碼者的名字以檢查編碼者間的信度, 有需要的話, 也要將編碼錯誤的資料重新輸入。在比較後所有記錄表並檢查其正確性後, 就可以開始進行資料分析了。

推論

研究者是否有辦法針對資料進行推論, 在內容分析來說十分重要。內容分析描述了文本中有什麼, 但無法揭露文本創造人的意圖或是對接收者傳達出的訊息。舉例而言, 內容分析顯示童書中顯現的性別刻板印象, 但並不表示孩子的想法或行為就被這些刻板印象所影響, 這些影響還需要另外對兒童認知的研究才能得知。

在此有一個內容分析研究的範例 (參考資訊箱 11.5 見另一範例)。Marshall (1986) 研究在二十世紀初, 女性在美國倡導女性應有權投票的反對運動。「反對參政權運動」(countermovements) 是一種反對社會變革的保守運動, 有些人認為反對參政權運動是立基於對現況和生活形態的衝突點之上, 有些人則認為那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形式。過去的研究記載女性並不支持婦女參政權運動, 而 Marshall 的研究問題是: 這些反對婦女參政的爭議是立基於階級還

資訊箱 11.4

編碼表的範例

空白範例

Neuman 教授，社會系

編碼者：_____

在新聞性雜誌研究計畫中少數 / 多數群體的形象

文章# _____ 雜誌：_____ 日期：_____ 篇幅：_____

所有具名的人物數目 _____ 照片數目 _____

重要角色人物數目：_____ 文章標題：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一篇已完成編碼的範例

Neuman 教授，社會系

編碼者：SusanJ.

在新聞性雜誌研究計畫中少數 / 多數群體的形象

文章# 0454 雜誌：時代 日期：3月1-7, 1995 篇幅：14行所有具名的人物數目5 照片數目0重要角色人物數目：4 文章標題：外交人物1： 種族：白 性別：男 領導角色？：是 領域？：銀行業 等級：5人物2： 種族：白 性別：男 領導角色？：否 領域？：政府 等級：無人物3： 種族：黑 性別：女 領導角色？：是 領域？：人權 等級：2人物4： 種族：白 性別：女 領導角色？：是 領域？：政府 等級：0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人物 _____： 種族：_____ 性別：_____ 領導角色？：_____ 領域？：_____ 等級：_____

資訊箱 11.5

新聞中的社會科學

Evans 及其同僚 (1990) 針對平面媒體對科學研究的報導進行一項內容分析研究。他們檢視了1987年9月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費城調查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全國調查」(National Enquirer) 以及「星球報」(Star) 所有的討論議題。前二者是聲譽卓著的每日都會報紙，另兩份是全國性的八卦性週報。作者將其運用或研究發現鎖定在行為科學、生物學、化學、物理或社會研究等領域，只把那些將研究發現當作主要報導焦點的文章納入。因此，單獨提到科學家的名字並不重要。研究者編碼以下項目：研究領域、研究者的職業類型（例如：大學、政府、私人企業）、研究者姓名、研究報告的原始形式（如：書籍、文章、會議手冊）、研究方法、研究脈絡（即：前置研究的範圍、研究發現的限制）以及文章長度。他們編碼了291篇科學性研究文章，每篇文章都由接受過訓練的編碼員加以編碼。此外，文章中隨機選出10%再由全部編碼員加以編碼，編碼員間的信度為82%。

研究者發現報紙比八卦性雜誌刊出較多的研究（前者登185篇，後者登106篇）；兩種刊物都刊載了較多的社會科學研究（39%比44%）；正派報紙報導比較多政府部門所作的研究，而小報登比較多大學進行的研究——正派報紙的90%比小報的62%；兩種媒體都著重在研究發現；而只有略高於三分之一的文章指出研究進行的方法。兩種刊物都很少提到與其他研究發現的比較分析；而幾乎沒有報導提到研究限制（例如：研究概化程度的限制）。

是生活狀況的差異？

Marshall 首先從文獻和歷史資料來瞭解反對參政權運動。反對參政權運動的全盛時期在1911至1916年間，是由上層與中產階級

白人女性主導。她也進行了「女性的抗議」(The Women's Protest)這本期刊中68個議題的內容分析，而此期刊是「全國反對女性參政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pposed to Woman Suffrage)於1912至1918年間每月出版的刊物。每篇文章、每封信、或每篇報導(記錄或主題單元)都被編碼下來。所有主題單元中大約57%包含有反對女性投票的理由。在所有內容中，Marshall分析了2,078個單元且發現21個不同的「語意學上的主題」是反對女性參政的，她將這些分為四大類：對社會、對女性、對男性負面的結果、以及女性不需參政的理由。

Marshall發現，證據顯示反對參政權是基於害怕喪失地位以及階級衝突，而且兩個因素是相輔相成的。在一些主題中顯示，因為女性投票會破壞家庭文化、改變在社會中女性以家庭及兒童為中心的定位，而造成地位下降。反對參政權運動者希望將女性留在家裡，和骯髒、粗鄙的男性政治世界區分開來。階級衝突則表現在對窮人、移民者、及必須出外工作之工作階級的女性的攻擊。上層和中產階級的女性害怕女性選舉人可能希望促成勞工立法、社會福利方案、非白人或移民者權利以及社會平等。

Marshall的研究讓文本的意義可以進行分析，但她無法全盤總結文章的思考議題，即使是那些讀者也會有自己的想法。她的研究只是顯示某特定政治活動團體在這議題上所出版的內容，可以將之和其他資料合併在一起，以瞭解更大的研究問題。

現有的統計數據 / 文獻及次級分析

現有統計數據研究主題的適當性

社會上許多資料都曾被蒐集過而且是研究者可以取得的。某些資訊是以統計文件(如：書籍、報告等)的形式呈現數字；有些則是以集刊的形式保存在圖書館，或是存成電腦檔案。不論是哪一

種，研究者都可以從既存的資料中搜尋與研究問題及變項相關的資料，然後用新的方式達到研究問題的解答。

要區別現有統計資料中哪些特定主題是恰當的並不容易，因為資料變化很大。蒐集來的這些資料中任何主題都是可以公開研究的。事實上，現有的統計分析未必完全符合研究設計所需的文件形式，因此，研究者要將這些資料重新組織成其研究問題想要瞭解的研究變項資料。

實驗法是對於那些研究者要控制某種情境、操弄變項的主題時最好的方法。調查研究則是對於研究者問問題並得知其態度或行為這類主題最佳；內容分析則針對文化傳播等訊息內容的主題為最佳。

現有的統計研究則對那些由大型科層組織所蒐集的資料這種主題最有用。公共或私人組織有系統地蒐集許多類型的資訊，這類資訊是用來作政策決定或公共服務，很少是直接為某一研究計畫所蒐集的。因此，當研究者想要測試變項的假設與官方文件中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相符時，則原有的統計資料就可以運用，這包括了對組織的描述資料和其中的人口變項。而這些資料的蒐集經常歷時很長。比方說，研究者想要瞭解150個城市、在20年間的失業和犯罪率有無相關，就可以運用現有的統計資料。

現有的統計資料對長時間或跨國的研究非常有用。Firebaugh和Chen（1995）研究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這賦予了女性投票權。研究者希望知道在投票行為上長期的性別差異是否有世代效應（詳見第二章）。檢視投票結果和性別交叉分析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後發現，在1952至1988年間，在修正案上一代成長的女性比較不常投票。也就是說，在十九條修正案出現前成長的女性，其投票頻率不如之後成長的女性。

Brinton和其同事（1995）運用跨國政府統計數據檢視在急速工業化國家中，已婚女性進入受薪勞動市場的情形。檢視南韓與台灣發現許多類似的現象，二者都有很強的父權社會文化價值，且女

性受教育的層次差不多。然而，他們在女性投入勞動的比率卻不同，韓國女性比台灣女性較少離家工作。作者發現是因為政府工業化政策的差異以及每個國家工業成長的不同所造成。

社會指標

在6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對於那些政策決定者所取得的資訊感到不滿意，因此發起了「社會指標運動」(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來發展社會福祉的指標。許多人希望社會福祉的資訊可以和經濟成就(如國民生產總值，GNP)所廣泛運用的指標相結合，以使政府及其他官方決策部門更清楚運用這些資訊，因此，研究者想要測量社會生活的品質，並運用這些資訊來影響公共政策。

今日，關於社會指標有許多書籍、文章及研究報告，甚至是學術期刊，像是「社會指標研究」(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致力於社會指標的創造及評估。美國普查局(the U.S. Census Bureau)推出一份報告即「社會指標」(Social Indicators)，而聯合國也在許多國家進行各種社會福祉的測量。

所謂社會指標是任何用在政策制訂上，對社會福祉的測量。在福祉的操作化上有許多特定的指標。舉例來說，社會指標會用在下列領域：人口、家庭、住宅、社會安全與社會福利、衛生和營養、公共安全、教育訓練、工作、所得、文化休閒、社會流動和社會參與等。

一個比較特別的是美國聯邦調查局統一的犯罪指標，指出在美國社會的犯罪數。社會指標可以測量社會生活的負面資料，像是嬰兒死亡率(嬰兒在第一年死亡的機率)或酗酒人數；也可以指出正面的資料，像是工作滿意度或是家庭供水系統等。社會指標經常隱含有價值判斷(例如：哪些犯罪行為是嚴重的，或是哪些因素造成良好的生活品質)。

紐約Fordham大學社會政策創始研究所的研究員創造出一種社會指標，稱之為美國的「社會福祉索引」(Index of Social Well-Being)。這項指標結合了美國政府現有關於16個社會問題範圍的統計(如：兒童虐待率、青少年自殺率、高中輟學率、酒後駕車肇事率、無健保之人口比率等)。每年的紀錄會和自1970年開始實施以來最佳的紀錄相比較。範圍從0到100，100為最佳。美國社會福祉在1973年達到最好，分數是77.5，到1990年代一路下滑，只剩下38分。顯示美國社會福祉與不久前相比急遽下降(Ravo, 1996)。

資料所在

❖ 現有統計資料之所在

現有統計資料主要來自政府或國際性組織及私人來源。有各種不同資料。如果你計畫針對現有統計資料進行研究，最好的方法是和資訊專家討論——在這個例子中，可以和圖書館員討論，他可以指出哪裡有可能的資料來源。

許多現有的資料是免費的——也就是說，在圖書館可以讓大眾取得的——但是可能要花許多時間精神去搜尋特定資訊。研究者要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或上網搜尋。在找到資料之後，要記錄在卡片上或記錄紙上以便分析。而這些資料經常已經存入電腦或以某種格式儲存。比方說，研究者與其從書上記錄投票資料，不如到密西根大學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找資料(後續討論)。

資料種類有許多，在此僅以一例討論。關於美國統計資料最有效的單一資料庫為「美國統計摘要」(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自1878年起每年出版(僅有少數幾年例外)。「美國統計摘要」在全美各公共圖書館以及網路上都可看到，也可以透過美國檔案管理局購買。這是由美國政府機關所進行諸多統計及官方報告中所挑選出來的資料。你可能會想針對政府部門的特定文件加以分析(政府部門有哪些資料可以使用，其詳細程度是相當驚人

的。比方說，你可以得知在1980年，新墨西哥州的Tucumcari市有兩位黑人女性年齡超過75歲)。

「美國統計摘要」包含由超過200個政府及私人部門取得的1,400個統計圖表、清單。除非你全部瀏覽過一次，否則很難從中找到你要的資料（詳見圖11.2）另外有個兩行的摘要資訊與此很類似，也行之有年，稱之為「美國歷史統計：殖民時期至1970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每年各州離婚率	不同州各種族的死亡率
竊盜罪遭判決的人數	每年每州各族群被處刑人數
機車意外死亡人數	電視節目每年營收
州政府用在污水處理上的經費	任何一州豬隻數目
超過50,000人之城市每月平均溫度	每年一打蛋的平均成本
各州政治候選人的投票人數	法國或其他國家擁有的潛水艇數量
各州鹽礦噸數	匈牙利或其他國家的供電量
農機工業聘用人數	每年每千人中少年犯罪數目
聯邦政府用在法律宣導的支出	各種大小的企業之平均淨收入
全國外籍人士數目	市政府來自酒類專賣店稅收的收入
每年銀行倒閉家數	煙草專賣店的收入
每州教師平均薪資及支出	每州的儲水量
每年合法進口的手槍數量	每州聯邦政府所擁有的土地面積
不同種族其住宅無內部供水系統的戶數	依家庭收入所擁有彩色電視的比率
每年三夾板進出口數量	每州農地面積和市價
每年170大企業獲利數	每年刊載在報紙上的售屋廣告數
每年出版的新書數量	平均每年每天市內電話通數
任何州所核發的狩獵執照數量	每年真空吸塵器的銷售數量
美國每年每州合法的政黨數	大都會地區平均房租金額
機車公司每年每位員工平均銷售金額	各國每千人擁有的內科醫生數目
優勝美地國家公園露營人數	每年由加拿大進口到美國的電池數量
每年不同性別的社會學碩士人數	從1957年起，每年美國和俄羅斯成功與不成功的太空船發射數目
每年官兵開刀醫療費用金額	

圖11.2 「美國統計摘要」中所得資訊種類例舉（此僅代表一小部分資料）

大多數政府的統計都年報形式出版。澳洲統計局出版「澳洲年報」(Yearbook Australia)、加拿大統計局出版「加拿大年報」(Canada Yearbook)、紐西蘭的統計部印行「紐西蘭官方年報」(New Zealand Official Yearbook)、而英國中央統計局則出版「年度統計摘要」(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此外還有許多國家都出版歷史統計資料。

要如何安置這些政府統計資料本身就是一門藝術。某些出版品本身只為研究者而蒐集，舉例來說，「美國統計索引」(the American Statistics Index: A Comprehensive Guide)以及「美國政府及其統計來源」(the U.S. Government and Statistics Sources: A Subject Guide to Data on Industrial, Business, Social Education, Financial and Other Topics for the U.S. and Internationally)就是兩本美國很有用的指南。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像是世界銀行也都有自己的出版品，涵蓋世界各國的統計數據（如：識字率、農業勞動人口比率、生育率等）——比方說，「人口年報」(the Demographic Yearbook)、**「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年報」(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以及**「聯合國統計年報」(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除了政府統計文獻，還有其他出版品。許多是為了商業用途而出版，僅能以很高的價格取得，包括消費者行為、高所得住宅區分佈、經濟趨勢等資訊。

還有一些出版品羅列了企業或其執行者的特質，這可以在大型圖書館找到。以下列出三種為例：

「Dnu and Bradstreet Principal Industrial Businesses」這本指南涵蓋了大約135個國家的51,000個企業，蒐集有其銷售、員工人數、主管、及產品等資訊。

「Who Owns Whom」則分為各國或各地區（如北美、英國、愛爾蘭和澳洲）等數卷，列出家族企業、分公司、及連鎖企業等。

「Standard and Poor's Register of Corporations, Directors and Executives」則羅列出美國與加拿大約37,000間公司。所蒐集的資訊有公司、產品、管理者及銷售數字等。

許多傳記式的資料會列出名人和他們的背景資料。當研究者想瞭解這些人的社會背景、生涯或其他特質時很有用。這些出版社會送出一些問卷給這些被選中的名人。這些資料是公開的，但資料正確性則有賴這些人的合作。

資訊箱 11.6 的出版品包括少數美國名人，但和許多國家所有的

資訊箱 11.6

傳記式資料來源

「美國名人錄」(Who's Who in America) 是一本通用的傳記式資料，從1908年出版至今。它列出人名、生日、職業、獲獎記錄、出版品、參與組織會員、教育程度、職位、配偶以及孩子的姓名等。另外有根據區域分佈的版本(如：美東名人錄)、有根據職業區分(如：財經企業名人錄)、以及特殊次團體的類別(如：女性、猶太人、非裔美人等)。

「美國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 比起「美國名人錄」收錄的人少但更詳細。本書由1928年起開始編印且不斷更新。比方說，補充版7列舉了572位名人，每人約有一頁的介紹，內容包括職業生涯、旅遊、出版品的名稱、以及和其他名人的關係等細節。

「傳記字典索引」(Biographical Dictionaries Master Index) 則將各類名人錄及其他傳記式資料做成索引。如果研究者知道研究對象的姓名，透過索引就可以知道在哪一本傳記資料可以找到此人的其他資訊。

傳記式資料很類似。舉例而言，當研究者對英國的銀行家很感興趣時，他可以查閱「企業傳記指南」(Dictionary of Business Biography)和「英國財經名人錄」(Who's Who in British Finance)；而加拿大名人的資料就可以在「加拿大名人名錄」(Canadian Who's Who, Who's Who in Canada)及「加拿大傳記字典」(Dictionary of Canadian Biography)中找到。

政治類則有其特別的出版品，主要有兩本。其一為當代政治人物的傳記資訊；另一本則是關於投票行為、法律等等資訊。在此舉三個例子關於美國政治資訊的出版品：

「Almanac of American Politics」是一本雙年刊，包括美國政府官員的照片、簡短介紹、出席委員會的記錄、投票記錄、以及國會議員和各分部執行長這些方面的相關資訊。

「America Votes: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lection Statistics」包含了全國各州官方的投票資訊。資料詳細到包含各郡的初選結果。

「Vital Statistics on American Politics」則提供了許多政治行為的表格，像是美國眾議員競選活動的支出、各種政治組織其政治意識型態的比率、以及各州選民註冊的狀況。

另一個政治資訊的來源包括組織（如：企業、教育等團體）的一般性資料。研究者有時候可以拿到這些組織的會員名單，還有名人公開演講的實錄出版品等。

❖ 次級調查資料

次級分析是現有統計的一種特殊案例，這是將其他人之前蒐集的調查資料重新加以分析。與初級研究（如：實驗、調查、內容分析等）相反，其焦點在於分析勝於蒐集資料。研究者愈來愈常應用次級分析，相對來講比較便宜；也可以針對不同團體、國家、或時

間進行比較；它可以再製；也可以去問一些原先研究者沒有想到的問題。對次級研究有興趣的研究者應該會對以下這些問題感興趣（Dale, Arber and Procter, 1988:27-31; Parcel, 1992）：次級資料對研究問題來說是否合適？研究者在用這些資料時可以引用哪些理論和假設？研究者是否熟悉該領域？研究者是否知道這些資料最初是如何蒐集、如何編碼的？

大規模的資料蒐集相當昂貴而且困難，需要運用精確技術的全國性調查所需的成本和時間對許多研究者來說都很難做到。很幸運的是，進行這些大型調查資料的組織、保存方式、傳播方式等都大有改進。現今，有許多資料館蒐藏有過去的調查資料都對研究者開放。

密西根大學的「校際政治社會研究資料庫」（the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ICPSR）是世界上社會科學最重要的資料庫之一。該館儲藏有超過17,000種調查研究極其相關資料，並以一般價格提供給研究者使用。也有其他資料中心蒐藏有美國與世界各國的調查資料。

美國最常使用的調查資料來源為「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這是由芝加哥大學的全國意見調查中心幾乎每年都進行的調查。近幾年來，這項調查也涵蓋了其他國家，其資料以很低的價格提供給研究者進行次級分析使用（詳見資訊箱11.7）。

信度與效度

現有的統計數據和次級資料大多是免費的，因為是由政府機關或其他來源進行原始資料的蒐集。研究者必須注意的是其效度和信度，以及與此種研究技術相關的特殊問題（Maier, 1991）。

一種常見的錯誤是「錯置組合的推論謬誤」（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這會發生在當某人想要給人一種錯誤的印象，而過度強調統計資料的細節（Horn, 1993: 18）。比方說，為了

資訊箱 11.7

一般社會調查

一般社會調查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 是最為社會研究者所熟知的次級分析調查資料。GSS 的宗旨為「取得具時效性、高品質、科學的相關資料以便社會科學研究團體所使用」(Davis and Smith, 1992: 1)。它以許多電腦可以讀取的格式儲存，並用很低的價格提供。原始資料或是編碼資料都不具版權，使用者不需取得授權就可以使用這些資料。你可以發現有超過2,000份研究文章與報告是引用GSS的資料而來。

全國意見研究中心 (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NORC) 從1972年以來幾乎每年都進行GSS。每年典型的調查包含大約隨機抽出1,500位美國成人樣本，由研究群選出一些問題，其他研究者也可以建議一些問題，每年重複某些主題和問題，有些是4到6年出現一次的題目，某些特定時間會增加一些主題。舉例而言，1988年的特殊主題是宗教；而1990年時則為族群關係。

訪員透過面訪蒐集資料。NORC的工作人員謹慎地選擇訪員並施以社會科學研究法和調查訪談技巧的訓練。GSS每年大約有120到140位訪員，其中約95%為女性，且大部分是中年人。NORC招募雙語和少數族裔的訪員，訪員與受訪者的種族要相符合。訪談通常為90分鐘，大約包含500個問題，回答率則在71到79%之間，而未作答的原因主要是拒絕參與訪談。

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 則在其他國家進行類似的調查。一開始只有德國的ALLBUS和英國的社會態度調查，現在有愈來愈多國家，如澳洲、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荷蘭、瑞士和波蘭也加入此一調查。目標是在這些國家，定期進行大規模的全國性調查。

讓觀眾對個人的政治評論印象深刻，政客可能在應該說南非的人口是3千6百萬人時，故意說成36,075,861人。

❖ 分析單位和變項屬性

現有統計數據中一項常見的問題在於發現適當的分析單位。許多統計是以總數而非個別形式呈現。舉例來說，某種政府文獻資料的表格是以州為單位（如：失業率、犯罪率等），但是研究者的分析單位是個人（如：「失業人口是否較可能犯下財物性犯罪？」）。在這種情況下，生態的謬誤就很可能發生。這在專門針對次級資料分析的問題較少發生，因為研究者可以將每個受訪者的原始資料收納進來。

有一個相關的問題為現有統計資料或調查問題變項的屬性類別。如果是在許多高度精確類別所蒐集的原始資料就不會有這個問題。當原始資料有各種類別或是當這些資料不符合研究者所需時，就會產生問題。比方說，研究者的興趣在於亞裔人群，而如果某文獻中的種族資料為「白人」、「黑人」和「其他」，則就會產生問題了，因為「其他」的類別包括亞裔和其他人種。有時候資料蒐集時是採用很精確的類別，但呈現出來的是較廣泛的類別，這時就要花一番功夫去找出是否有比較精確的資訊。

❖ 效度

當研究者的理論定義和政府機關或組織所蒐集資料時不同，就會產生效度的問題。官方政策和程序都是為了官方所需統計資料而定。舉例而言，研究者定義「工作傷害」包括了在工作中發生的輕微割傷、瘀血、扭傷，但政府報告中的定義可能只包括需要上醫院就醫的傷害，則研究者定義的許多工作傷害就不會涵蓋在官方統計資料當中。另一個例子是，研究者定義的「失業」人口是那些如果有好工作他們願意工作、如果他們想要全時工作但只能找到兼職工作、和那些已經放棄找工作者，然而，官方定義則只包括那些現在

並未主動找工作（不論全時或兼職）的人為失業人口。官方統計排除了那些停止找工作、那些只能兼差工作、或是那些因為相信找不到工作而不再工作者。在這些案例中，研究者的定義都和官方統計的定義不同（詳見資訊箱 11.8）。

當官方統計作為研究者真正感興趣研究資料的替代品時，也會產生效度的問題。這是必要的，因為有時候研究者無法蒐集到原始資料。舉例來說，研究者想知道有多少人曾被搶過，因此使用警方逮捕的搶案統計數作為研究的代表。但是這數據並非完全有效，因為有許多搶案並未報案，而報案數也不等於逮捕的搶案數。

研究者想測量有多少婚姻是因為婚前懷孕被迫結婚，則是另一個例子。研究者可以使用結婚日期以及孩子出生日期來預測這樁婚姻是不是奉子之命成婚，但這並不能告訴研究者懷孕是不是其結婚動機。這對配偶可能原先就打算結婚，與懷孕無關，或是結婚當時並不知道已經懷孕。類似的，也可能有些人結婚是因為以為懷孕或流產、墮胎，但婚後並未生產。此外，也可能在婚後懷孕但早產。如果研究者光測量婚後懷孕不滿九個月就生產的數量，可能有些會被錯誤標籤，導致效度降低。

第三個效度的問題是產生在研究者並未控制蒐集資料的方式。所有資訊，即使是官方的統計資料，都是科層體系內的人所蒐集而來，研究者有賴這些人正確地蒐集、組織、報告並出版資料。蒐集原始資料時系統的錯誤（如：普查員避開貧民區並假造資料，或是人們在駕照上捏造年齡）、組織報告資料時的錯誤（如：警方偷懶少填犯罪報告而漏掉案數）、以及出版時發生的錯誤（如：表格打字錯誤）等都會減低測量的效度。

這類的錯誤會發生在美國統計被永久裁員的人口數上。大學的研究員重新解釋美國勞工局蒐集資料的方式而後發現錯誤。這些資料來自對 50,000 人的調查，但政府機關並未針對未作答率進行修正。正確的數據為 1993 到 1996 年間裁員率下降 7%，而非第一次報告中指出的沒有改變（Stevenson, 1996）。

資訊箱 11.8

官方失業率 vs. 未就業人口

在許多國家，官方失業率的統計只包括在所有勞動人口中未被雇用人口的百分比，如果其他兩類未被雇用者也包含進來就會高於50%：非志願兼職工作者和被迫放棄工作者。在某些國家（如瑞典和美國），如果把這些人算進來可能失業率會加倍。這並未考慮其他未就業人口、過渡時期的自雇業者、以及低度就業者（詳見以下說明）。國家所測量的都是根據理論和概念的定義：失業率應依循何種架構測量以及為何要得知此資訊？

經濟政策或勞動市場觀點認為失業率要測量的是那些已經準備馬上進入勞動市場的人，並認為那些非勞動人口為高品質勞工的補充，是對勞動者可用的一種輸入。反之，社會政策或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那些現在未工作者應視為有潛力者，失業率應將那些未能完全發揮其能力、技術或時間的人都算進來，這將未工作者定義為一種社會問題，是個人無法瞭解其生產能力並貢獻給社會。

未就業 / 完全就業的類別

未就業人口	符合以下三種條件者：沒有在家戶外的有薪工作、主動謀職者、如果有工作可以馬上從事者。
非志願兼職工作者	有工作之人，但是工時不規則或比其能力和意願所能付出還低的工作者
被迫放棄工作者	有能力且有意願工作者，但無法找到工作而放棄謀職
其他未就業人口	那些因為退休、度假、暫時性被裁員、能力不足、家管、全時學生或在搬遷狀態之人
過渡時期的自雇業者	未全時工作的自雇業者，因為正在發展自己的事業或瀕臨破產
低度就業者	有暫時性的全時工作，但能力超出其工作所需。尋找長久的工作而能完全運用其技能和經驗者

資料來源：改編自「經濟學人」，1995年7月22日，頁74。

❖ 信度

信度的問題對現存的統計研究來說很惱人。當官方定義或蒐集資料的方式隨時間而改變時便會產生穩定信度的問題。官方對工作傷害、失能、失業等等的定義會隨時代變遷，即使研究者獲知這些改變，要隨時間保持一致的測量是不可能的。舉例而言，1980年代早期，計算美國失業率的方法就有所改變。早先，失業率的計算是以未就業人口數除以公民勞動力人口數；新的方法則是除以公民勞動力人口數和軍人的總和。類似的，當警方將記錄電腦化後，犯罪率明顯上升，這不是因為犯罪增加，而是因為記錄保存的方式改善了。

相對等的信度也可能是個問題。比方說，整個國家犯罪率的測量有賴每個地區警方都能提供正確的資料。如果某一地區的警方在記錄上不夠確實，測量就會喪失相對等的信度。類似的，對警方的研究指出，政治壓力和逮捕人數有很高的相關性，舉例來說，在某市的政治壓力可能增加該市的逮捕率（如：犯罪減少），而在另一個城市的壓力則會減少逮捕率（如：在選舉前犯罪數下降以使得官方數字好看一些）。

在官方統計數字上，表面信度可能是個嚴重的問題。這會出現認定上的問題，像是警方盤查衣衫襤褸的人多過衣著得體的人，因此衣著較差、低所得的人在被逮捕數字上就偏高。舉例來說，美國勞工局統計發現在運用中性的測量程序後，女性失業率增加了0.6%。直到1990年代中期，訪員仍問女性是否「擔任家管或其他？」，回答「擔任家管」的女性就被歸類為家庭主婦，而非失業人口。因為這樣問，因此那些待業中的女性仍可能被算成家庭主婦。當女人被問到和男人一樣的問題：「你是否就業或其他？」時，許多女性回答其並未工作而是「做其他事」，像是謀職中。這顯示政府部門運用統計方法論的重要性。

研究者通常運用官方統計數據進行跨國比較，但是每個國家蒐

集資料方法不同，資料的品質也不一樣。舉例而言，1994年美國官方統計的失業率為7%，日本為2.9%，法國為12%。如果每個國家定義和測量的方式相同，包括被迫放棄工作者和非志願兼職工作者，則美國為9.3%，日本為9.6%，法國為13.7%。為了評估官方統計資料的品質，「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聘請20位頂尖的統計學家組成團隊，來評估13個國家其受政治干預、信度、統計方法及涵蓋的主題等。前5個國家依序為加拿大、澳洲、荷蘭、法國和瑞典。美國和英國、德國並列第6。美國花在蒐集資料上的經費高於澳洲以外的其他國家，而發表數據的速度最快。美國統計數據的品質因為高度分散而較差，較其他國家所聘用的統計人員也最少，且政治動機也導致資料蒐集範圍的縮減。

國際蒐集的資料可能有很大的爭議。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在1998年指出，許多國家所發表的經濟活動都不正確，因為排除了性工業。在某些國家（特別是泰國和菲律賓），數百萬的勞工（基本上是年輕女性）被雇用，而數十億的國家歲收來自性產業。這對經濟有很大影響，但卻不包含在任何官方統計資料之內。

❖ 遺失的資料

另一個讓使用現有統計文獻的研究者苦惱的問題是遺失的資料。有時候，資料有蒐集卻遺失了。更常見的是，這些資料根本沒蒐集到。蒐集資料的決定是在政府部門內所下的，而在調查中間問題並將資料公開則是一群研究者下的決定。對兩方來說，那些決定哪些資料該蒐集的可能並不是符合研究者所需要的。政府機關或許會因為政治、預算或其他因素開始或停止蒐集資料。比方說，在1980年代早期，美國聯邦政府停止蒐集社會研究者認為有價值的資料。當研究期間很長時，這些缺漏的資料就成為問題。舉例而言，研究者的興趣在美國的停工和罷工狀況，可以獲得1890年以降，但排除1911年之後5年的資料，因為這段期間聯邦政府並未蒐集這方面資料。

現有統計數據 / 文獻研究範例

以下是一個實例，告訴我們在性別不平等的理論上，如何運用現有的統計數據並達到研究目的。

Tickamyer (1981) 比較兩個性別不平等的理論，並提出美國在財富及權力上的確有性別差異存在。她的研究是非反應式的並運用公開的資料進行。過去的研究發現美國有不平等的財富分配現象，有錢人在社會中也形成一個獨特的社群並享有權力。某一理論指出，1920年代以降，新科技和社會組織已經減低男性取得對財富和權力的控制，女性的權力與時俱增，其社會階級，而非性別，成為今日不平等的主要來源。另一種理論指出，性別是凌駕其他的因素。父權的規範和結構更超越了階級的不平等。和男性比較之下，有較少女性是富有的，其擁有財富的形式不同，也比較不容易運用財富取得權力。Tickamyer的假設認為比較少富有的女性，就算有也多是繼承或贈與而來，比較無法控制自己的財富（通常是由銀行代管），而且運用財富的方式也不同（較多花費在藝術、市民活動、及非商業性的活動上）。

Tickamyer運用兩種研究方式。第一，她透過美國國稅局中超過60,000美元資產的統計資料，用某種程式來預測現有人口的財產。其次，她也透過有錢人的傳記資料發現，在1920到1970年代，財富金字塔尖端有超過半數是男性，女性隨時間增加的幅度很小。女性的財富比較多是信託基金和私有財產（如珠寶、車子），男性的財富多是房地產和擔保品。她的結論是女性擁有「被動的」財富，比較不需要作理財決策，而男性擁有的為「主動的」財富，包括有商業的移轉在內。

她的第二個方法是透過檢視商業出版品（如：「財富雜誌」）以找出那些擁有至少一億以上財產的人。她找出18位女性和20位男性樣本，然後透過六種傳記式文獻（如：「美國名人錄」）找出每位的名字，這18位女性中有6位以及全部的男性都至少列名其中

之一種文獻資料。和富有的男性相較，女性的教育程度較低，且在政府部門、商界、和慈善組織擔任職務的人數也較少。此外，Tickamyer檢視了25種美國大企業董事會成員名錄也發現，這些董事中93%為男性。

Tickamyer因此提出結論認為，雖然女性慢慢地隨時間漸漸富有，但男性仍為主導。更甚者，和女性相反的是，男性主動運用其財富影響政府、商界和社會其他團體的決策。

推論的議題以及理論檢驗

非反應式資料的推論

研究者要透過非反應式資料來進行推論或檢視理論有許多限制。要運用非強行介入的測量以建立時間順序和提出另一種解釋相當困難。在內容分析上，研究者無法從內容概化出閱讀者的效應，但只可以運用調查研究的相關邏輯顯示出變項間的關係。不像調查研究這樣簡單，研究者並未直接問受訪者問題以測量變項，而是依靠文本中所找到的資料。

倫理的考量

倫理的考量對大多數非反應式的研究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被研究者並未直接參與研究。基本的倫理考量在於運用他人所蒐集之資料的隱私和保密性。另一個倫理議題是官方統計數據是一種政治和社會產物，隱含的理論和價值觀都會主導資料蒐集的方向和類別。在一般狀況下，官方定義並蒐集的測量或統計數據是政治衝突下的產物，並且作為政策的導引。透過將某種測量定義為官方的，形塑出來的公共政策會與其他一樣有效的測量引導出不同的結果。舉例而言，在某種社會條件下（如：在公立精神病院死亡的病患人數）所蒐集的資料會受到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政治活動刺

激。之前，這種條件不被視為是保證能引起公眾注意的重要因素。類似的是，美國各種年齡層非白種學生入學人數的統計要到1953年以後才有，而各種不同非白人族裔的統計則到1970年代以後才有。早期，並不凸顯這些資料對公共政策的重要性。

官方統計資料的蒐集刺激了對問題新的注意力，而公眾對問題的關注則刺激新的官方統計資料的蒐集。比方說，當開始蒐集交通意外事故案件以及酒精是否是造成意外的因素這樣的統計數據後，酒醉駕車就成為一個研究議題。

政治和社會價值會影響蒐集哪些資料的決策。大多數官方統計的設計是由上往下的官僚決策或有其行政計畫的目的，未必符合研究者或反對官僚決策之人的研究目的。舉例來說，政府機關測量鋼製品的噸數、高速公路里程數、家戶平均人口數，而其他資訊像是飲用水的品質、通車所需時間、工作壓力、或有托育需求的兒童數等可能並未蒐集，因為官員說這不重要。在許多國家，國民生產總值（GNP）被視為是社會進步的一種重要測量，但GNP忽略了社會生活中非經濟面向（如：和孩子玩耍的時間）和無薪的工作（如家務）。可得的資料反映出政治辯護的結果和那些決定蒐集哪些資料的官員之價值。

結論

在本章中，你學到了幾種非反應式研究技術。這是一些測量或觀察社會生活但不影響到被研究者的方法。結果客觀、量化的資料也可以進行分析以達到研究目的。這些技術可以用在其他量化或質化社會研究以解答許多研究問題。

任何量化資料，研究者都需要考慮到測量的問題。要拿現有的調查資料或政府檔案很容易，但不代表這些測量就符合研究者的研究興趣。

在非反應式研究中，你應該要察覺到兩個潛在的問題。首先，

現有資料的有效性限制了研究者所能解答的問題；其次，非反應式的變項通常效度較低，因為並未直接測量研究本身所需的資料。雖然現有的統計數據和次級資料分析是低成本的研究技術，但研究者缺乏對蒐集資料過程的控制和背後的理論基礎。潛在資料的錯誤表示研究者需要特別謹慎小心。

下一章，我們將從研究設計和蒐集資料轉向分析資料。分析技術將會應用在前幾章你所學習的量化資料上。到目前為止，你已經見到從研究主題到研究設計和測量，再到蒐集資料，接下來，你將會學到如何檢視資料，並找出在研究假設或研究問題上，這些資料會告訴你哪些訊息。

重要名詞

增生性測量	編碼	編碼系統
侵蝕性測量	錯置組合的推論謬誤	一般社會調查
隱性的編碼	顯性的編碼	非反應式的
記錄表	美國統計摘要	結構式觀察
文本	非強行介入的測量	

問題回顧

1. 哪種研究問題適合運用內容分析？
2. 文本內容的哪四種特質要被保留並記錄在編碼系統中？
3. 研究者運用現有的統計資料時，要注意哪些信度上的問題？
4. 次級資料分析有哪些優缺點？
5. 為何內容分析研究者要運用數位編碼員，而這麼做可能會有什麼問題？
6. 內容分析的推論上有何問題？
7. 內容分析的分析單位為何？

8. 現有統計資料有哪些問題？
9. 內容分析有哪三種效度的問題？
10. 研究者運用現有的統計資料應該要注意哪些限制？

量化資料分析

導論

資料處理

資料編碼

輸入資料

清除資料

單變項結果分析

次數分配

集中量數測量方法

離散趨勢測量方法

雙變項的結果

雙變項的關係

解讀兩者間的關係：散佈圖

雙變項表格

相關性之測量方法

兩個變項以上之測量

統計控制

百分比表格的設計

多元迴歸分析

推論統計

推論統計的目的

統計顯著度

顯著水準

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統計可能被視為一種處理資料的方法，這樣的定義所強調觀點在於：統計是一種工具，僅關心資料中許多數據之收集、組織、和分析或是觀察，其主要的關心是描述如何呈現資料中的方便性、可用的和能被了解的形式。

——Richard Runyon and Audry Haber, *Fundamentals of Behavior Statistics*, p.6

導論

若你現在所閱讀的一份研究報告或文章是以量化的資料來呈現，則你將有可能發現它會有許多數據的圖表、曲線圖和表格。別被它們所嚇著了，一份研究提供這些圖表、曲線圖、或是表格時，讀者當視這些圖畫為一種資料，這些圖與表乃是讓你自己去印證在這份報告中你所了解的有多少，當你收集這些量化資料時，你將必須使用相同的技巧，去幫助你自己了解在資料中所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你需要去組織且操作這些量化資料，並能夠將她們成為與社會世界有相關的事物。在這章中，你將學到一些組織和分析量化資料的基本方法，這些量化資料的分析是一個複雜領域的知識。這章不能替代社會統計的課程，它包含的只有基礎的統計概念，和必須了解社會研究的資料處理技巧。

資料收集所使用的技巧在過去幾章中可看見不同的形式，所呈現的有變異數、測量目標的特色、反應與其他的案例。而這些的數據是原始的數據、問卷上、紀錄的表格。研究者做一些事情將這些原始資料，變成能夠看到它們在假設上所陳述的為何。並將一些適當的格式輸入電腦，且呈現出圖形或表格的摘要有其特色，最後能夠解釋或是給予理論一些有意義的結果。

資料處理

資料編碼

以前的研究者在檢視量化資料時要去測驗其假設，研究者必須將她們自己置於不同的形式中，你可以在最後一章資料報告撰寫時思考一些想法。在此資料的編碼乃是指你可以將原始資料有系統的認知為格式化形式，以利電腦程式可以閱讀（如：讓電腦很容易的了解）。當編碼一些內容分析時，研究者可以創造和一些既定的原

則，且資料由一個形式轉化為另一個形式。

資料編碼可以是簡單的書記工作，當這些資料是一些數字且有組織在一個系統的表格中，而研究者想將一些調查資料轉化成為有系統的內容分析。

研究者會使用一個編碼簿或是編碼程序，這個編碼程序使一個設定的規則，能夠確定哪些號碼所設的變項類屬為何。舉例來說，一位研究者將男性編為1、女性編為2，每一個類屬所應對的變項和一類的資料都必須要設定編碼。編碼是指一份文件（一頁或是好幾頁），它描述編碼程序和變項所在的資料，而這是電腦可以辨識的。

當你在編碼資料時，很重要的是去創造一個有組織、能夠處理與複製多元的編碼簿，假如你沒有辦法寫下來這些處理的編碼流程，或是你將編碼放錯位置，你將會失去一些資料的關鍵並且有可能要再重新編碼一次。研究者開始會思考有關編碼的程序，和編碼前他們如何收集資料。例如，一位調查研究者會在收集資料時創造一份問卷，創造過程意謂編碼類屬的放置，假如研究者不事先做編碼，則在蒐集資料後的第一步即是製作編碼簿，研究者必須給每一個個案定義號碼以便能夠追蹤此個案，下一步研究者就必須轉換每一份的問卷資料，由問卷中所得的訊息到所設定的電腦形式中以便電腦可以閱讀。

輸入資料

對大部分的資料分析電腦都有設計好的資料形式，在這些形式中每一個列都是每一個回答者的呈現、主題與個案，所以電腦中都有其運用的專業術語，這些被稱為「資料登記」，每一筆所登錄的資料都是單一的個案。每一欄或是許多欄所呈現的是特別的變項，每一個位置之數字有可能標示出它的欄與列（如7列、5欄）來回應原始資料（一份問卷題目中第八位受訪者所呈現的是夫妻的狀況），每一欄或所設定的許多欄位乃是假設這個變項稱為田野資

料或是實地勘察。

舉例來說，研究者由三位受訪者所得的調查資料，在電腦中可能會呈現出如圖 12.1 的形式。一般人若沒有編碼簿很難容易讀得懂它其中的訊息，所以它有可能是無價值的表格，它濃縮了三個受訪者在 50 份調查問卷的回答為三項欄或列。每項資料看起來都像是許多研究者的計劃，期待這些可以成為 1,000 列且這些線也有可能為 100 長欄。一份 15 分鐘有 250 個學生生產的電話訪問，其所可能產生的資料形式可為 250 列 240 欄的格式。

在編碼簿中如圖 12.1 所說的，前兩個數字是定義數字，因此這些舉例如第一以 (01) 表示、第二以 (02) 表示第三以 (03) 來表示所訪問的受訪者，注意研究所使用 0 來記錄保持，減低在 01 與 1 之間的混淆。由編碼簿中可見順位 1 通常在欄位 2 的位置；第 10 順位通常通常在 1 的位置。這個編碼簿稱第 5 欄為「性別變項」，個案 1 與 2 為男性、個案 3 是女性。欄位 4 告訴我們 Carlos 訪問個案 1 與 2 而 Sophia 訪問個案 3。

一位研究者將由問卷將訊息加以轉換，或是由電腦中四種形式來呈現每一項資料：編碼、建表格、直接輸入、選擇掃描表格以及由電話來協助電腦訪問（簡稱 CATI）。首先，研究者可以使用圖表報告或是電腦中特別的表格形式（稱做轉換或是登錄表）將編碼號碼寫入所對應的列與欄之所在位置中，然後輸入電腦中。再來，研究者可以設定電腦直接打字將資料輸入，這直接輸入的方法在早期已設定好相似的形式，這會伴隨著內容分析紀錄格式而來。第三，研究者將資料至於可選擇的掃描器——由電腦中的表格來讀這些資訊。你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掃描器，他們能夠有多元化的選擇測試。他們特別是針對個人所使用的圓尺或是筆標示，研究者可以使用最小的計劃來完成電話訪問，電腦輔助之電話訪問已於第十章說明。受訪者帶著電話裝置在電腦的鍵盤上，且在訪問期間當受訪者回答時直接輸入問題的資料。

資料編碼摘要

Column

000000000111111111222222222333333333444...etc. (tens)
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etc. (ones)
 01 212736302 182738274 10239 18.82 3947461...etc.
 02 213334821 124988154 21242 18.21 3984123...etc.
 03 420123982 113727263 12345 17.36 1487645...etc.
 etc.
 Raw data for first three cases, cases, columns 1 through 42.

由編碼簿來的摘要

欄位	變項名稱	定義描述
1-2	ID	回答受訪者之定義
3	BLANK	
4	Interviewer	所收集到的受訪資料 1 = Susan 2 = Carlos 3 = Juan 4 = Sophia 5 = Clarence
5	Sex	受訪者的性別 1 = 男性，2 = 女性
6	PresJob	美國總統做了偉大的工作 1 = 極度同意 2 = 同意 3 = 沒意見 4 = 不同意 5 = 極不同意 Blank = 遺漏值

圖 12.1 三個個案的資料編碼簿

清除資料

編碼資料時準確是很重要的（請參閱資訊箱 12.1 中的例子），當輸入或是編碼資料進入電腦時有誤，則會威脅到所測量的效度且

資訊箱 12.1

資料處理的例子

當你手邊的資料不是很完善時，並沒有一個好的替代方式來處理這些資料。這裡有一個我與學生建構的資料研究例子，在我的大學中調查近三分之一的學生，思考他們在校園中經驗性騷擾的經驗。研究小組找了一組隨機樣本，然後讓他們分散到行政單位去填寫相關的問卷。回答者寫下答案，並在可見的答案中輸入一些相同的例子成為複選題的測驗，這個實驗即有超過3,000個可見的掃描表格傳輸資料。

在收到這些表格之後，我們可以看見所輸入的觀察值中的錯誤，不管回答適用鉛筆以及每一個都以塗滿深色的圓圈來呈現，我們會發現有200個回答者用筆畫出範圍，我們會發現有25個是沒有有效的表格，這些是沒有被發現或是不完全的（如在70個問題中只有前面2題有回答）。

下一步，我們會透過電腦讀到一些有用且可見的表格資料，我們能夠透過電腦來產生一些數字、次數分配、每個變項的態度。檢視他們時我們會發現有些錯誤，有些回答同時出現兩項在一個問題中產生，有些卻產生不可能的回答編碼（如有性別編為4，但性別變項它僅限定是1為男性、2為女性。）且有些回答每一個答案都是相同的，可看出此乃不是很嚴謹的研究調查。每一個個案都會產生錯誤，我們要回來看看這些可見的表格中，是否我們可再發現一些訊息。我們可以將個案區分為：沒有回答者或是編碼受訪者為遺漏的訊息。

在問卷中有兩個列聯的問題，當受訪者他回答「不」將會跳答至下五題，因此可以對每一個問題來創造一個表格，我們會發現有近35個個案他們回答「不」但卻跳答至下五題。所以我們回到每一個表格，去檢查每一個受訪者實際真實的回答為何？幾乎每一個個案他們所顯示出來的回答都是「不」，但是卻錯看了指示而跳答

錯誤的題目。

最後，我們檢視每個變項的態度，看看是否她們是有意義。我們很驚訝的由600個個案中，在回答種族祖先遺產的問題是標記「傳統美國人」，對傳統而言，幾乎有一半以上大一新鮮人是這樣的身分，再檢視有關這些美國原住民的親戚關係有20位是印地安血統，超過90%的白人學生非西班牙高加索的受訪者是如此的身分，這樣的百分比也反應在一些非裔美國黑人、或是西班牙墨西哥裔他們在紀錄上也是相似的。我們可以下個結論是有些白人高加索受訪者並非熟悉「傳統美國人」、「美國印地安人」這樣的用詞。可明顯看見的，他們在標記身分時犯了一個錯誤使以「白人、高加索」來取代。所以在樣本中我們期待有7個傳統美國人，我們編碼了「傳統美國人」其受訪後的答案如「白人、高加索」，這也意指我們在一些高加索的樣本中可以再分類，由這點出發時我們也準備好對資料分析了。

造成結果上的不正確。所以一位研究者必須要有完美的樣本，完美的測量且沒有錯誤的收集資料。歷經相當謹慎的編碼後，研究需核對編碼的準確度或是清除資料，假如沒有編碼上的錯誤則資料會呈現較完整，但若有發現一些錯誤則研究者必須重新檢視所有的編碼值。

當資料在電腦編輯完成後，研究者須朝兩個方向來確證。第一個方法是指可能的編碼值清除（虛無編碼檢定）：包含對一些不可能的編碼的變項類屬。例如受訪者的變項中1為男性、2為女性。當你發現在這個變項欄位中有4的數字，在一個個案中代表性別變項指標時，則是明顯的編碼錯誤。第二個方法是指偶發性的清除（一致性檢定）：包含兩個變項跨類別中出現不合邏輯的組合，例如：教育變項中由職業來區分類別，假如受訪者的紀錄是沒有通過第八年的教育，但在職業欄中卻是屬於醫生；則研究者必須重新檢

視編碼是否有錯誤。

研究者須修正輸入在電腦中的資料，他使用較多原始資料的收集較少使用的分類後的資料，但有可能合併或是以團體訊息為主。舉例來說，研究者能是以比率尺度來區分資料為五個順序類別，因此研究者就必須整合一些指標創新為新的變項，或是在問卷中加入新的題目與指引分數。

單變項結果分析

次數分配

此統計量數有許多的意義，它可能意味著是一組收集到的資料（如這些數字告訴大眾有多少人住在這城市中），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兩種形式的統計。在此我們焦點重於第二種——描述統計來說明。描述統計是指描述一些數字的資料，他們可能是由一些變項所構成：包含**單變項**（univariate）、**雙變項**（bivariate）、**多變項**（multivariate）（只單一、兩個、三個、或多個），單一變項描述的是一個變項中每一個數字資料所呈現的**次數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s）狀況。它可以使用名義變項、等距變項、比率變項來操作。例如：現今有400位受訪者，則可以摘要這些資料以性別來區分的百分比次數分配圖（見圖12.2），我們可以見到一些圖表所呈現出的訊息，如直方圖、條形圖、圓形圖。長條圖通常是描述變項所使用，他們以垂直或水平的取向來呈現出線條。

對等距或是比率變項的資料而言，研究者通常是以團體的方式來進行區分，這些資料多半以多樣次數的集合來呈現，在一些個案數字中所呈現的圖形為**次數分配多邊圖**（Frequency Polygon），在多邊圖中X軸座標是個案數目、而Y軸則是其分數的價值為何。在這樣的多元圖形中會有一些點來輔助加以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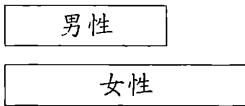
數量次數分配

性別	次數
男性	100
女性	<u>300</u>
總人數	400

百分比次數分配

性別	百分比
男性	25%
女性	<u>75%</u>
總人數	100%

相同資訊的條形圖



團體資料次數分配之例子

第一份工作的年收入	次數
5,000元以下	25
5,000至9,999之間	50
10,000至15,999之間	100
16,000至19,999之間	150
20,000至29,999之間	50
30,000與30,000之上	<u>25</u>
總計	400

多邊圖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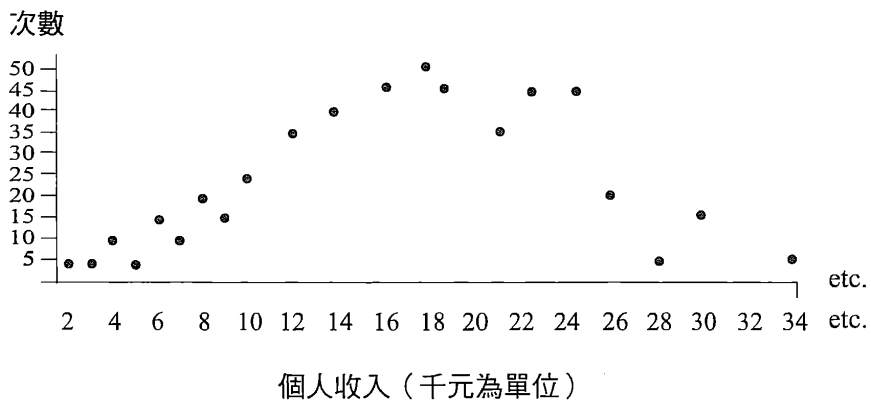


圖 12.2 單變項統計例子

集中量數測量方法

研究者時常摘要在單一變項中所收集到的資料呈現出的意義，他們使用三種集中量數測量方式或是集中次數分配來呈現，如：平均數、中位數、眾數，這些測量方式多半統稱為**算術平均數** (averages)。

所謂**眾數** (mode) 最早使用在名義變項、順序變項、等距變項或是比率變項中，他是最簡單也最常用的算術平均數，舉例來說，下面的數字中5, 6, 5, 7, 10, 9, 5, 3, 5有一個數字出現超過2次以上即是眾數。再舉個例子，在上述的數列中介於5和7之間的數字有：5、6、1、2、5、7、4、7，則很容易在這中間看到一個平均分數的分散情形，一般來說所得的分數與眾數值會相近。

所謂**中位數** (median) 是指中間的那個數，也就是介於數列值中的50%的上下之間。順序變項、等距變項、或是比率變項的資料多半會使用這個計算方法 (名義變項不包含在其中)，在電腦中處理這類的計算方法是需要一些工作時間，所以第一步驟是要找最高分與最低分，兩者相減後找中間值。假如是奇數就很簡單，如下面的例子的7個等公車的年齡：12、17、20、27、30、55、80中位數是27。注意中位數是不能夠輕易更動的。假如是屬於偶數數列則中位數的算法較為複雜，例如有六個人他們的年齡是：17、20、26、30、50、70，則中位數是介於26與30之間。即使沒有人呈現28這樣的年齡，電腦的中位數計算是會將兩個數字加起來再除以2，所以中位數是28。

所謂**平均數** (mean) 又稱為算數平均數，它可說是集中量數最常被運用的一個測量方法，只有等距變項、比率變項會使用這樣的測量方式，電腦在測量這些平均數是將所有的數字加總，再除以多少個個案。舉例來說，先前的例子中的數列平均數為： $17 + 20 + 26 + 30 + 50 + 70 = 213$ ； $213/6 = 35.5$ (算數平均)，雖然在數列中沒有35.5的值。所以平均數與中位數是不同的。而極端值會影

響平均數的值（最大與最小值）。如50與70是落在各自左右邊，介於中間的值為31，所以分散情形看起來就成為：17 20 26 30 31 31，而中位數仍不變為28，平均數為 $17 + 20 + 26 + 30 + 31 + 31 = 155$ ； $155/6 = 25.8$ 。因此這樣的方式是最好處理極端值可移動的情形。

假如次數分配形式是常態化分配或是鐘形曲線的情形，則上述的這三種集中量數是相同的情形，假如分配情形是不對稱的分配（很多次數是太低或太高的分數），則這三個量數值就會不均等。若在其中有少數極高的分數與一些低分數的情形，則平均數會很高、中位數趨中間、眾數則是最小。假如大多數的次數都有很高的分數而少數極低的分數同時存在，則所算出來的平均數會很小、中位數位中間、眾數呈現最高。一般來說，中位數是最適合用在不對稱的分散情形之計算方法，雖然平均數是所有統計中常被運用的（見圖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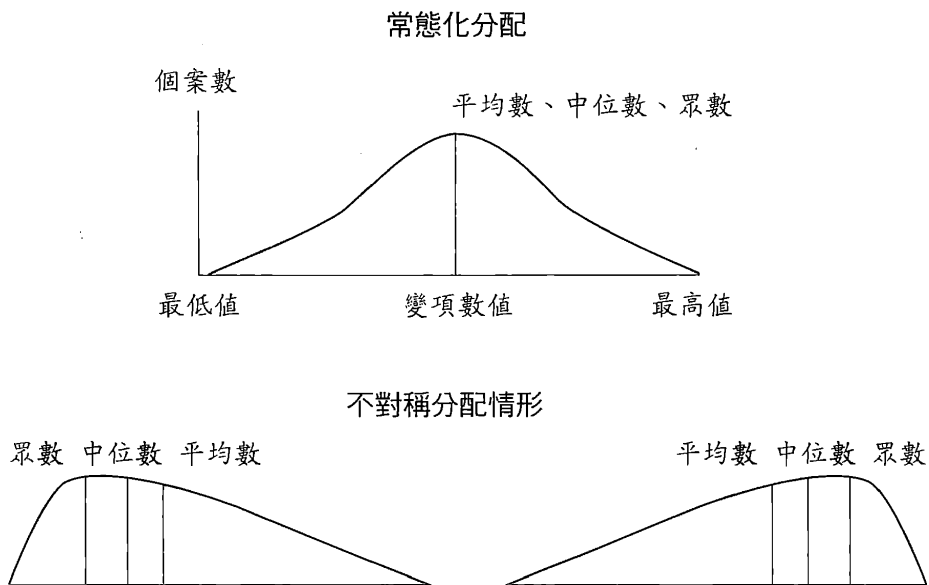


圖12.3 集中量數測量方法圖示

離散趨勢測量方法

中央極限的測量是許多分散方法中的其中一項，然而這樣的方法能夠告訴我們數列集中的情形。但有另一個分散的特色是擴張與離散的特質，且是環繞在中心數字的變異情形。兩種分散能夠辨認中央極限的測量，與可能呈現出環繞在中心的分散擴張是不同的。

另一個測量方式的特色是以分離、散佈或是環繞中心的變異情形來討論，變異數是社會隱喻中很重要的一項，舉例而言，在X城市中其家庭收入的中位數和平均數為每年25,600元，且已是所得的標準Z分數。所謂Z分數分配是指每個家庭收入中以25,600為中心。對Y城市而言，所得到的家庭中位數和平均數是相同的，但卻有95%的家庭每年收入是在8,000元以及5%的家庭每年收入是在300,00元。對X城市而言每個家庭所得收入是相同的，但在Y城市則看起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位研究者無法比較兩個城市在收入上的差異，而有可能遺漏掉一些很重要的訊息。

研究者可運用三種方法來測量變異數：全距（range）、百分位數（percentile）、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全距是最簡單的，它包含最大和最小值的數值。但全距仍有其限制，下列兩個數列中都呈現出全距為35，如30、30、30、30、65，（全距是 $65 - 30 = 35$ ）和20、45、46、48、50、55（全距是 $55 - 20 = 35$ ）。

百分位數告訴我們在一個分散數列中一個數字所在的特別的位子，百分位數也在告訴大家你已學會了中位數的算法，有些時候會以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十來描述一個分散的數列。舉例而言，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數它所在的位子可能在這個分數或是更低，電腦在計算百分位數時會依照中位數的邏輯來計算，假如我有一百個人且想找到那佔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我可以由最低的分數往上計算，一個達到第二十五位的人停止。假如所有數目不是100，則只能簡單的由分散的情況來思考百分誤差為何。

標準差是在分散測量方法中最難計算的，它也是最廣泛且包含性最廣的一種方式。全距和百分位數多半用在一些名義、等距或是比率等變項資料，但是標準差則多半用在比率與等距的測量方式，所以它主要是基於每個數與平均數的平等距離，多數人多半用電腦來計算標準差的值，因為電腦的速度很快。

見圖 12.4 可以查看有關所求得到累積標準差，假如你將每個數和標準差相減你會得到 0 這個數字，這是因為平均數是由所有數字所求得的平等距離。標準差本身會運用在一些有限的數字上，如多半適用來比較的目的時，舉例來說，在 A 班的學童父母求學年限是 3.317 年、B 班是 0.812 年、C 班是 6.239 年，而標準差告訴研究者 B 班所求得到父母求學年限是較符合；即使 C 班所求得到的是與其他兩者不大相同。實際上，在 B 班中父母親的平均就學年限是低於一年或是所有平均父母年限，反應出這些父母親彼此間的同質性，在 C 班級中父母親的平均年限是多於六年以上或是在平均數之下，則反應出父母親彼此成員間的異質性是很高的。

標準差和平均數一起使用後可以求得所謂 Z 分數，而 Z 分數可以讓研究者比較兩個或多個團體數字間的分散情形，這個 Z 分數被稱之為標準化 Z 分數，其表達的情形多半是在標準化常態分配的形下。舉例來說，Katy 是電影 A 名目的銷售員，每年的電影收入高達 50,000 美元，Mike 則是電影 B 名目的的銷售員每年的電影收入為 38,000 美元，先不看兩者之間所得到淨收入差異，兩位管理者花了相同的時間在相同的片子中，而且 Katy 多花了 $\frac{2}{3}$ 的時間在其他的員工身上，Mike 則花了相同的心力。在這裡要看另一個例子是如何運用 z 分數來看待所花的心力。Hans 和 Heidi 是雙胞胎但是 Hans 比 Heidi 來的矮；與另一位比較時在 z 分數的轉化之下，Heidi 則是在同年齡女孩之平均高度之上。相同的，Hans 在所有同年齡男孩中則是屬於比較高的，因此在團體中 z 分數的比較下，這對雙胞胎 z 分數是相同的，他們有相等高度。

z 分數由平均數和標準差來計算相當容易求得（可見資訊箱

12.2)，舉例來說在國王學院和皇后學院中，一位職員要面試學生的情形。她則需學會在學院中要有相似與兩者都有的尺度維持在

(一) 在電腦中計算標準差的步驟

1. 先計算平均數。
2. 減去所求得之平均數。
3. 算出每個分數不同結果的平方和。
4. 每個所求得到的平方和總加起來。
5. 總加起來的平方和再除以個數即得到變異數。
6. 所得到的變異數再開根號即得到標準差。

(二) 電腦算標準差之範例

[8位受訪者，變項為在學校的年限]

分數	每個分數－平均數	平方
15	$15 - 12.5 = 2.5$	6.25
12	$12 - 12.5 = -0.5$	0.25
12	$12 - 12.5 = -0.5$	0.25
10	$10 - 12.5 = -2.5$	6.25
16	$16 - 12.5 = 3.5$	12.25
18	$18 - 12.5 = 5.5$	30.25
8	$8 - 12.5 = -4.5$	20.25
9	$9 - 12.5 = -3.5$	12.25

平均數 = $15 + 12 + 12 + 10 + 16 + 18 + 8 + 9 = 100, 100/8 = 12.5$

平方和 = $6.25 + 0.25 + 0.25 + 6.25 + 12.25 + 30.25 + 20.25 + 12.25 = 88$

變異數 = 平方和除以個案數 = $88/8 = 11$

標準差 = 變異數開根號 = $\sqrt{11} = 3.317$ 年。

所求得到變異數在可以用公式符號來表示。

符號：

\bar{X} = 每個個案所得之分數 Σ = sigma (希臘字母) 表示所有的總加

\bar{X} = 平均數 N = 表示所有個案的數目

公式：
$$\text{標準差} = \sqrt{\frac{\Sigma (X - \bar{X})^2}{N}}$$

圖 12.4 標準差

資訊箱 12.2

計算Z分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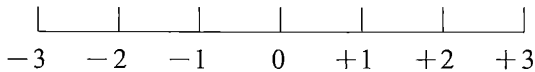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是很喜歡Z分數的公式。Z分數的公式如下所示：

z分數 = (原始分數 - 平均數) / 標準差，或是以下面的符號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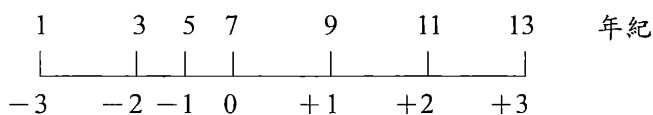
$$z = \frac{X - \bar{X}}{\delta}$$

X = 原始分數， \bar{X} = 平均數， δ = 標準差

我通常會思考並依賴一個概念模型它是可以呈現z分數可實際做到的，如思考一項資料如下：孩童的在學平均年級是7年且它的標準差是2年。我如何計算五年級Miguel的z分數呢，或是否我知道Yashohda的z分數是2時，我須要知道她現在的年紀是多少？首先我要劃一條-3到+3的數線且有0是當中的中位數，我將平均數置於0這樣的數值中，因為平均數中的0乃是所求得的z值會在這個值的上下。我將最高值置於3，乃是所有的標準差之平均數大多數的狀況。這條數線看起來像下列這樣：



現在，我要標記平均數的價值並且由了解其中摘記或實際的標準差。當平均數是7時其標準差是在平均數+1之上，而當標準差是+2時則正好其原始值是7或9。當出現負值的z分數時，所看見的原始值是在顯示出3年級，這是因為標準差的值是在2或是每個個案所呈現的年級多半是在2這樣的值，是低於平均數7的數值。在我的概念模型中將原始分數與z分數整合起來的數線如下：



這樣的方式很容易可以看見Miguel所在的z分數是屬於-1，再者，Yashoda的z分數是在+2回應了11歲的年紀，我可以由z分數讀到年紀也可由年紀讀到z分數，就分數來看若是z分數是在-1.5的時候，則可看出其所對應的年紀是在4歲，以此類推則可發現年紀在12時其所在的z分數是在+2.5。

4.0，再者，在國王學院中的平均數是2.62、標準差是0.50，相同的在皇后學院中平均數是3.24、標準差是0.40，所以這位職員略微知道在皇后學院中的分數是略微高，Suzette來自國王學院且他得到的成績落點在3.62，同時Jorge來自皇后學院她的成績落點在3.64。兩位學生都選修相同的課程，對這位職員來說她想拉平兩間學校在成績上的單位算法（如此她須求標準差分數），她在計算z分數時是要讓每位學生與平均數的差距，並且能夠看見每個數與標準差的分散距離。舉例來看，Suzette的z分數是 $3.62 - 2.62 = 1.00/0.5 = 2$ ，同時Jorge的z分數則是 $3.64 - 3.24 = 0.40/0.40 = 1$ ，因此這位職員看見Suzette的成績在兩個標準差之上，而Jorge只有在標準差平均數之中，雖然Suzette所得到的分數完全低於Jorge，但對Suzette而言在其所屬的學院中學生所得到的每個分數都高於Jorge。

雙變項的結果

雙變項的關係

單變項的統計分析是描述一個單一變項的獨立性，而雙變項統

計多半是用在多個變項的情形，他們讓研究者可以去思考兩個變項在一起時的關係，並描述兩個變項間的關係，即使是在簡單的假設中只有兩個變項。

雙變項統計分析呈現出兩個變項間的統計關係，且事情如何呈現出彼此間的關係，這些事情放在一起時所呈現出的現象為何。舉例來說，一條被污染的河川可能會存在的兩件事實關係是：人們喝了這水會生病，因此在統計上兩個變項關係是受污染的河川以及那些喝這水而生病的人。

在統計關係上基於兩個觀念：共變與依賴。所謂共變意指：事情在一起及其相關聯性。由共變到變異的過程是，個案會隨著一個變項中心而另一個變項有明顯的不同。舉例來說，高收入的人對生活有較高的期待，反之那些低收入的人則對生活的期待較低。所以收入會與生活期待或其他因素兩者之間有所共變，我們可以視一個人的收入得知這個人可能有的生活期待，或是生活期待因收入而有所不同。

獨立性是與共變相反的意思，它是指兩個變項之間是獨立且沒有關係的，假如有兩個獨立的變項存在則是指：一個變項沒有特別因另一個變項而有所改變。舉例來說，Rita想知道兄弟之姊妹之間與生活期待的相關性，假如變項之間是各自獨立的，則當一個人有很多兄弟姊妹時，他對生活的期待就會和只有一個小孩子的人是一樣的，換句話說，知道一個人有多少兄弟姐妹，並沒有辦法告訴Rita一個人可能有的生活期待。

多數的研究者所提出的假設是有因果關係或是期待兩者間有共變的特性，假如他們使用虛無假設則這個假設在這裡是獨立的，它多數是以正式假設來檢測並在一些推論統計中較常被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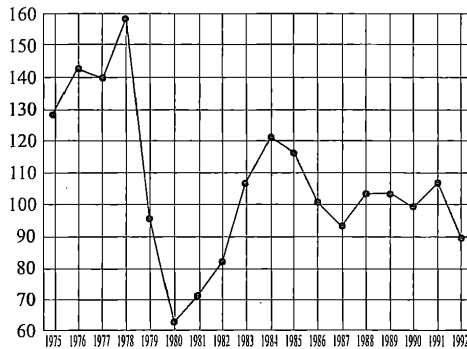
有三個技巧可以來幫助研究者決定兩個變項之間是否存在著關係：(1)由散佈圖中的分散情形來看。(2)由交叉表或百分比表。(3)由測量的關係或是統計測量諸所表達出有多少是因單一變項而共變的。這些情形可見資訊箱12.3中的圖形資料來解讀。

資訊箱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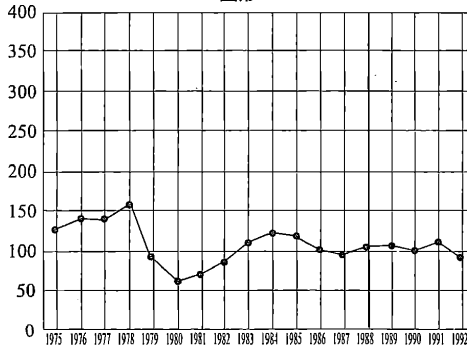
圖形的精確性

在圖形組A中所呈現的是較劇烈的轉變圖形，坡度開始下降是在1980年且又很迅速的復原，並呈現不穩定的狀態。而在圖形組B中則呈現較為穩定的情形。在1979年與1980年之間很溫和的下降，在其他幾年也是在相同的水準之間。兩個圖所使用的是同一份資料——美國經濟在1975-1992年間的趨勢。底線X軸是使用相同的年份，而Y軸呈現在A圖中則是以60-160之間；在B圖則是0-400之間。所以在A圖形組中看起來較戲劇性是因為Y軸的關係，在讀圖形時要小心去檢視所使用的刻度距離，有些人在資料中選擇刻度很小、或是很戲劇性所呈現的圖也就有所差異。

圖形 A



圖形 B



解讀兩者間的關係：散佈圖

❖ 何謂散佈圖？

所謂散佈圖是指研究者將每一個值與觀察的個案將它們呈現在圖形中，通常等距變項或比率變項或使用散佈圖來表示，而順序變項很少使用在名義變項中更是不可能出現。沒有固定的規則來看待x軸與y軸的變項值，但是一般而言，x軸以自變項為主，y軸以依變項為主，最小值多半是在左邊而最大值則在右邊或是頂端。

❖ 如何去建構散佈圖

開始時以找到兩個變項的全距為主，畫出每一個變項的值並且寫上數字，接下來是標上每個軸所在的名稱，且在圖的最上端寫上標題（title）。你已準備好自己的資料，每一個變項的值你都可以標示在所設定的位置。舉個例來說，研究者可以標示孩子在學年齡於散佈圖上，如第一位在學年齡為12年的婦女是屬於擁有3個孩子的個案，則在圖形中我們就可標示出黑點。如在圖12.5的散佈圖中，有一系列的資料來說明33位女性中，其所受的教育年限以及生育孩子的數目。

❖ 你由散佈圖中學到什麼？

研究者能由散佈圖中看見三個雙變項間的特色：形狀、方向性、精密性。

形狀 關係呈現出三種形狀：獨立性、直線、曲線。獨立或沒有關係的變項的關係圖很容易發現，其呈現的是隨機性的散佈沒有路徑，所呈現出來是一條直線（有可能是完全垂直或是完全水平）。直線形狀所呈現的意思是在個案所散佈出的各點迷宮中，可以找出合適的點而加以連接出一條直線。一條曲線關係是指在點所呈現出的迷宮中可以形成U行曲線，由左到右類似一個S曲線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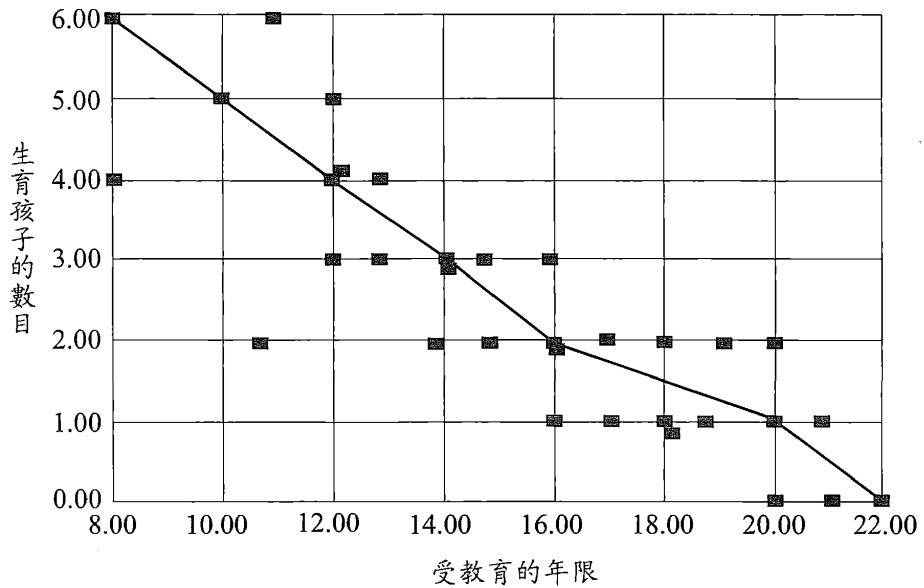


圖 12.5 散佈圖例子：33 位婦女受教育年限以及生育孩子的數目

方向性 是指線條關係間的正向與負向的關係方向，若是屬於正向關係則線條會由左到右不斷爬升，x 軸的最大值與 y 軸的最大值將會相互對應，如前述的收入與生活期待兩者之間的描述即屬於正向的直線關係。若是負向的關係看起來的形式則會由左到右逐漸下降，它是指最大值所對應的另一個是最低值，舉個例來說，受較高的教育人們則較少會有遭受犯罪逮捕的機會，假如在散佈圖中的 x 軸是在學的年齡、y 軸是指受逮捕的年數，則我們可以看見多數的男性所呈現的多半在右邊，因為大多數的男性很少完成學業年限，大多數的個案多呈現在左邊，因為它們多半有較多學業年限。想像這條線的關係是呈現出較淺意義，而在高級統計中就提供了數字性的線性測量。

精密性 雙變項關係不同的是他們的精密程度，精密性是找一個圖形中的分散趨勢，一個高度精密性的散佈圖，會在線中密集的摘要出點與點之間彼此的關係。低精密性的散佈圖則分散得較開，

研究者可以用肉眼一下子就看出精密性間的關係，它們也可以用高級統計來發掘之間的關係，或是由雙變項統計的標準差來診斷。

雙變項表格

❖ 何謂雙變項表格

雙變項的列聯關係表運用相當的廣泛，它所呈現的訊息與散佈圖是相同的且有可能是較散佈圖濃縮的摘要表格，即使等距或是比率資料可能以團體的方式來呈現許多不同的價值，但仍可以被測量出其差異性。這個表格是以交叉表格來呈現，也就是同時去組織兩個變項間的資料。而一個列聯表格的形式有可能是要看兩個或是多個以上的變項，也就是在這樣的表格中，同時可以分散出不同的複雜類別。

如何建構出百分比表格？建構百分比表格是很容易的，但是有一些方法可以使其看其來更為專業，我們首先可以回想起一些手算時如何建構的步驟，相同的原則可以運用在電腦製作表格中。我們可以由原始資料來看，可由資訊箱12.4中的假想性調查來看。在用手算的創造性表格中有一個步驟是「次數分配的調和」(簡稱CFD)，再下一個步驟，則是合併兩個變項的每一個值。舉例來說，研究者想要去看年齡和態度之間的關係，假如年齡是順序變項時，則要將其組成以比率團體資料呈現。但在製作百分比表格時，比率或是等距變項的資料要被視為順序變項來看。除此之外，一個變項分類超過50類的情形下，讀者不可能去讀取表格中的意義。所以CFD是一個中間的步驟，可以在建構表格之前提早運算。電腦程式中會立刻給你一個完整的表格。所以CFD可以整合每一個類別向度，如年齡有四個類別、態度有三個類別；所以共有 $3 \times 4 = 12$ 個列，創造CFD的步驟如下：

1. 算出所有類別的整合值。

資訊箱 12.4

原始資料和次數分配表範例

原始資料

個案	年齡	性別	學校年級	態度	政黨傾向……
01	21	F	14	1	民主黨
02	36	M	8	1	共和黨
03	77	F	12	2	共和黨
04	41	F	20	2	獨立
05	29	M	22	3	民主社會黨
06	45	F	12	3	民主黨
07	19	M	13	2	遺漏資料
08	64	M	12	3	民主黨
09	53	F	10	3	民主黨
10	44	M	21	1	保守主義

(態度分數：1 表示同意、2 表示沒意見、3 表示不同意)

兩個變項之次數分配

年齡和態度隨著准許喝酒的年齡來分配

年齡組	個案數	態度組	個案數
30 以下	26		
30-45 歲之間	30	同意	38
46-60 歲之間	35	沒意見	26
61 歲與以上	15	不同意	40
遺漏值	3	遺漏值	5
加總	109	加總	109

調和次數分配

年齡組與態度組隨著准許飲酒之年紀而改變

年齡	態度	個案數
30歲以下	同意	20
30歲以下	沒意見	3
30歲以下	不同意	3
30-45歲之間	同意	10
30-45歲之間	沒意見	10
30-45歲之間	不同意	5
46-60歲之間	同意	4
46-60歲之間	沒意見	10
46-60歲之間	不同意	21
61歲及以上	同意	3
61歲及以上	沒意見	2
61歲及以上	不同意	10
	小計	101
遺漏值		8
加總		109

2. 標示出整合後的類別每個個案所落下的所在位置。
3. 在整合的類別個案中加入標記。

假如沒有在訊息中沒有遺漏值的問題，加入類別的數目（如所有年齡中年齡、或是61與更老的表示方式），在例子中遺漏值是一個議題值得討論，因為四個年齡類別在次數分配調和後加入37（ $20 + 10 + 4 + 3$ ）而非38，正如在雙變項次數分配中的值，因為對年齡來說38個個案已經有遺漏值。

下一個步驟是由標示列與欄來所設立的表格（見圖12.6），通

常自變項是放在欄的位置，但並不是時時照這樣的規則依循。下一步則是每一個數字的CFD值能夠放到每一格的位置中，來反應合併後的變項類別。可見圖12.6中最左邊的小格中，所呈現出20與低於30年齡之間的CFD值。

圖12.6中的原始計算次數表格中，每個細格中會計算出個案數，這是很簡單可以算出來的，但是在詮釋原始資料表格就顯得很困難，因為這些欄與列很難總加，且與每個細格中相關的值比較才是真正有意思的。研究者在轉換原始資料在百分比表格進入雙變項關係時，有三個方法可以來製作百分比表格：依照列、依照欄、或是照著所有的總和，但首先要看的是兩個變項間的使用情形與呈現的關係圖。

原始計算表格(a)

態度(b)	年齡組(b)				總和(c)
	30歲以下	30-45歲	46-60歲	61和更老者	
同意	20	10	4	3	37
沒意見	3(d)	10	10	2	25
不同意	<u>3</u>	<u>5</u>	<u>21</u>	<u>10</u>	<u>39</u>
總和	26	25	35	15	101
遺漏值(f)=8			(e)		

表格部分說明

- (a) 給每一個表格一個標題，這個標題是可以提供變項和訊息一些背景資料。
- (b) 標示列與欄的變項，且能夠給予每一個變項類別名稱。
- (c) 可以包含所有的列與欄，這些被稱為極大性因為可以平等的對每一個變項做到雙變項次數分配。
- (d) 每一個數字或是回答者都在每一個類別細格中有交叉值。
- (e) 所有的數字是標示出變項的類別，且所有的表格被稱為主幹。
- (f) 假如有遺漏值(如個案拒答、回答不知道等情形)，則在報告所有的遺漏值被須在原始個案計算中呈現出來。

圖12.6 准許飲酒之態度隨著年齡而改變

原始計算表格

依照欄或列來製作百分比表格是最好的嗎？沒有一個完全合適的，讓我們首先來回顧有關百分比表格的製作過程，當累積百分比中欄算出來之後，則要去計算每一個細格中欄的值，這個包含所有的欄與極大值的欄位變項，例如在第一欄中的總合是26（有26個人在30歲以下），且第一個細格中是20（因有20個人在30歲以下且是選擇同意的態度），所以百分比值即為 $20/26 = 0.769$ 或是76.9%。或是每一個數值中的極大化表示方式： $37/101 = 0.366 = 36.6%$ （見表12.1），最圓滿的計算是加總應該為百分之100。

由列百分比來計算時亦是相同的情形，計算每一個細格的百分

表12.1 以態度為自變項看年齡在准許飲酒年齡上的分佈情形，百分比表格

欄——百分比表格

態度	年齡組				加總
	30歲以下	30—45歲	46—60歲	61歲及以上	
同意	76.9%	40%	11.4%	20%	36.6%
沒意見	11.5	40	28.6	13.3	24.8
不同意	<u>11.5</u>	<u>20</u>	<u>60</u>	<u>66.7</u>	<u>38.6</u>
加總	99.9	100	100	100	100
(個數)	(26)*	(25)*	(35)*	(15)*	(101)*

遺漏值=8

列——百分比表格

態度	年齡組				加總	個案數
	30歲以下	30—45歲	46—60歲	61歲及以上		
同	54.1%	27%	10.8%	8.1%	100%	(37)*
沒意見	12	40	40	8	100	(25)*
不同意	<u>7.7</u>	<u>12.8</u>	<u>53.8</u>	<u>25.6</u>	<u>99.9</u>	<u>(39)*</u>
加總	25.7	24.8	34.7	14.9	100.1	(101)*

遺漏值=8

*在這個百分比表格中所提出的個案數N在電腦中所得算出來的會接近100%，一般可以回到以欄為方式所製作的表格再檢查印證之。

比是以列來看，舉例來說，運用上述20的例子我們現在想知道相同的那一列總加是37，則百分比是 $20/37 = 0.541 = 54.1\%$ ，除非細格中的極端值是相同的，則計算方式百分比因列與欄的不同，所求得到的百分比也有所差異。列與欄的百分比讓研究者可以加諸更多不同的問題，列百分比回答的問題所環繞的是在：有關受訪者的態度上，每一個年齡組中都有其百分比。受訪者回答同意的有54.1%在30歲以下的年齡組群。依欄所製作的百分比表格其所環繞的問題是在：每一個年齡組中有哪些不同的態度？在這例子中告訴我們在30歲以下的有76.9%回答「同意」，由列的百分比中，研究者學到一些有一半的人他們是在30歲以下選擇「同意」，這是由欄來計算而得知的。

一個研究者可能假定讀者看待研究結果，是以列或欄的百分比來讀取，所以當累計每一項百分比時，在實務上的解釋或是計算出來的每一項都可以陳述。例如，我假設年齡對態度有所影響，所以以欄呈現的百分比是最有效的，然而若是感興趣的面向在於依這不同的年齡組別，來區分所持有的態度有所出入時列的百分比則較為適當。正如Zeisel（1985: 34）所提出的在交叉分配表中任何一個因素，都必須要考量是每一個結果的原因。百分比將是最有力的方法，來間接計算結果所形成的因素。

❖ 閱讀百分比表格

當你了解如何製作表格後，閱讀並且能夠說出其中的意義將顯得極為簡單。閱讀一個表格時首先要先能夠閱讀它的標題、變項標示、以及訊息中所呈現出的背景資料。接下來能夠看出表格的方向性的計算方式——以列或式欄的方向來計算。要注意表12.1的百分比表格當中有相同的標題，這是因為使用相同的變項，它能夠幫助讀者去注意如何在百分比表格中運用標題，但是這是很少的情形。有時候，研究者所呈現出的是縮寫的標題，而且有些時候會遺漏100%的加總數，或是所存在的極端值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混淆情

形。它最好的能夠包含在表格中，以及清楚的變項標示呈現出來。

研究者閱讀百分比表格時可以時有比較，比較乃由不同的方向來看百分比的計算方式，若是以列的方向來看所謂欄所呈現的百分比其方向是往下走，若是以欄為方向則會形成百分比跨欄的方式來呈現。以表格12.1的方式來看以列或是年齡組群來比較。大多數的成員中最年輕的族群多半採取同意，其比率是隨著年齡的增加而百分比遞減，多數表示沒意見的人們，其年齡分布多半在中年的組群中，而表示不同意者多半是在老人階段的人，特別是在46-60歲這一組的人口群中。當以欄為百分比閱讀基準時，大多數的最年輕族群多半是表示同意的態度，而這也是唯一一組表最同意的組群。只有11.5%的比率是表示不同意，比較兩個最年長的組群時會呈現許多的差異。

閱讀百分比表格之間的關係是需要時時練習的，假如在表格中呈現出沒有任何關係；則顯示出不論是欄與列是相等的。而一條直線關係可看見百分比之間的最大相關在每一個細部的對話中，假如所呈現的是一個曲線關係，則最大的百分比形式是伴隨著每一個細部來走。舉個例來說，在內部小格中的最大值有可能其對應的是在最右邊、中間底部或是在最左邊之處。在先前曾看到一個修正過後形式關係，所以大多數的細格中和每一個關係間的個案，都存在著很強烈的關係與預測連結。

閱讀百分比表格與曲線能夠幫助你去看百分比表格之圖與彼此間的關係，想像一個曲線圖中它可區分為12個區域，其中的個案都分散在每個區域中反應每個表格中的細部的組成狀況，這個表格是由曲線圖所濃縮成的形式，在雙變項的關係曲線中，每一個百分比的細格中都可以與曲線中的點彼此對話。因此，用很簡單的方式可看到很有利的關係呈現，由每一列的最大值的百分比，到它是否可以呈現出直線的形式都可以一覽無疑。

在百分比類別中表格的變項必須是名義變項或是等距變項來呈現出它的曲線圖，在曲線圖中的最低值的變項類別通常是在開頭的

左邊，假如在表格中的類別不是順序相同的時候，則就沒有工作規則可循了。

如在表 12.2a 的例子中所呈現出來的是正相關，而表 12.2b 所呈現出來的是負相關，但兩者都是使用相同的資料和以列為基準的百分比方式，但在實際的情形下是負項關係的，在仔細看一點——表 12.2b 中有年齡類別變項被視為曲線圖的順序，當有重複的現象時，在回到最基準的正向與負向關係來思考，一個正向的關係意味著一個變項增加時另一個變項也是如此，而負向關係則是指一個變項增加時，另一個變項是隨之遞減的情形。

❖ 無百分比之雙變項表格

研究者在摘要另一個雙變項表格時，是用一些集中量數的測量方式來思考（多半是用平均數來看）。當一個變項是名義變項或是

表 12.2a 在校年級與年齡變項來區別

年齡	在校年級				總和
	0 - 11	12	13 - 14	16 +	
30 歲以下	5%	25	30	40	100
30 - 45 歲	15	25	40	20	100
46 - 60 歲	35	45	12	8	100
61 歲以上	45	35	15	5	100

表 12.2b 在校年級與年齡變項來區別

年齡	0 - 11	12	13 - 14	16 +	總和
60 歲以上	45%	35	15	5	100
46 - 60 歲	35	45	12	8	100
30 - 45 歲	15	25	40	20	100
30 歲以下	5	25	30	40	100

順序變項時，則另一個測量的用法會是以等距或是等比尺度來測量。等距或等比的平均數是就每個名義或是順序變項，來呈現出每一個類別的。在表 12.3 中我們可看出年齡的平均數在每一個態度類別中所顯示出來的，在結果中建議出那些回答不同意者的平均數，將高於那些回答同意或是沒意見的人。

相關性之測量方法

相關性之測量方法是一個單一的數字，所表達的是一個強烈且時常有方向性的關係，所獲得到的資訊多半是由雙變項關係到單一數字的呈現。有許多的方式來測量關係，每個正確的測量有賴於測量方式的程度的不同，測量符號多半由希臘字母來呈現，如 α 、 β 、 γ 、 χ 、 G 等文字來加以表示之。在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如何詮釋測量的內容，而非他們如何被計算的過程。為了能夠了解每一個測量，一開始時，你將需要完整的了解統計課程，可參見資訊箱 12.5 中的相關係數說明。

多數的基本測量方法中會討論有關「消滅誤差比例」邏輯（簡稱 PRE），在這個邏輯之下會問的一個問題是：當所猜測的變項與其他的變項有所相關時，有多少的變項所得之錯誤會隨之遞減？自變項乃是指所得的變項，並不會因為另一個變項而減少錯誤發生的機會。測量方法相關是對稱的關係時，乃在於假設這個變項是獨立性的變項。

假如在這個強烈的關係中有一些的錯誤，是因為另一個變項而

表 12.3 飲酒之態度隨著受訪者年齡之平均數而改變

飲酒年齡之態度	平均年齡	(個數)
同意	26.2	(37)
沒意見	44.5	(25)
不同意	61.9	(39)
遺漏個案數 = 8		

資訊箱 12.5

相 關

相關係數的表現方式為 r 是多數統計計算者皆知的，可以用手算但在特別的資料中，則有可能變成一個很冗長或是複雜繁瑣的工作。而今有電腦可以幫忙計算。然而依賴電腦計算時仍有一些的問題，因為研究者在作業的過程中，可能無法了解相關係數的意義，在此有一些簡短且簡單的例子可以了解如何處理的做法。相關係數的目的是要呈現兩個變項如何在一起或是共變，照理想的情形來看，當變項是屬於比率尺度的測量變項時（有些是變項是使用等距變項），在計算相關係數時我們會確認每個分數所轉換後的 z 分數，這標準化的過程中乃是根基於平均數與標準差，下一步則是我們多數化的將每一個個案，所求得到的 z 分數整合在一起。這也告訴我們每個個案有多少變項會相似整合在一起，個案中有較高的 z 分數時會變化較大，而一些低的 z 分數也會變得較小。最後，我們將所求得到的 z 分數總合依個案數加以區分，且它依已經標準化的共變平均數形式來呈現。簡單來說，相關係數它所產生的 z 分數是整合在一起的，且會依個案數的多寡來加以區分。相關係數是介於 $+1$ 與 -1 之間，且能以散佈圖來加以摘要所得到的資訊，且將有關的單一數據納入關係中。

讓我們來看看在年齡與價格與最低五瓶紅酒之間的關係，首先，每個人要有勇氣且缺少對數學符號的恐懼，並能夠看得懂在相關係數中，次數分配所使用的公式：

$$\left(\sum [z\text{-原始分數}1] [z\text{-原始分數}2] \right) / \text{個案數}$$

在此： Σ 是指總數，

z -原始分數1是指以第一個變項（見資訊箱12.2）

z -原始分數2是指以第二個變項

N 是指個案數。

若沒有直接使用公式的情形時，以下有一個例子來告訴我們如何計算相關係數：

酒的種類	酒的年齡	酒的價格	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價格	差異後的平方年齡	差異後的平方價格	年齡的 z 分數	價格的 z 分數	產出的 z 分數
A	2	10	-2	-5	4	25	-1.43	-0.70	1.0
B	3	5	-1	-10	1	100	-0.71	-1.41	1.0
C	5	20	+1	+5	1	25	0.71	+0.70	0.50
D	6	25	+2	+10	4	100	+1.43	+1.41	2.0
E	4	15	0	0	0	0	0	0	0
總計	20	75			10	250			4.50

平均數：年齡=4，價格=15

變異數：年齡=10/5=2，價格=250/5=50

標準差：年齡=2的開根號=1.4，價格=50的開根號=7.1

相關係數：4.50/5=0.90

運算步驟：

1. 先算每個變項的平均數和標準差。（計算標準差、摘要每一個分數的平均數、每個數加以平方、加總平方後的總合、除以每一個個案的變異數，然後求得變異數的開根號。）
2. 確認每個變項的分數皆轉換成了z分數。
3. 整合每個個案的z分數在一起。
4. 加總所產生的z分數，然後依據個案數再加以平均。

可以預測到錯誤的機率，或是其所產生的消滅誤差比率是很大的情形下，可預測兩個關係是非對稱，且當兩個消滅誤差所佔的比例越大時，表示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越強。在表12.4中即描述了雙變項之間的關係如何測量。注意兩者之間最大的全距是在-1到+1之間，若是數字呈現負數，則可預測是兩變項之間是負相關。若是正

表格 12.4 五種測量相關的方法

Lambda：這一類的運算通常以名義尺度的資料為主，在消減誤差比率上有固定的模式值。其數值算出來是介於0與1之間（可能最高的相關數值）。

Gamma：這一類的運算通常以順序尺度的資料為主，主要在比較類別和在個案數中，看看是否有相同的個案在同一列中。Gamma值的範圍通常是在-1.0到+1.0之間，有0值的存在意謂著兩個變項沒有相關。

Tau：這一類的運算通常以順序尺度的資料為主，多半是在運算Gamma值之後發現有一些問題，事實上，有一些的統計命名這個值為 τ ，且是指Kendall's tau，其值所呈現出來的數值範圍在-1.0到+1.0之間，有0值的存在意謂著兩個變項沒有相關。

Rho：是指皮爾森R值（主要是由Karl Pearson這個人的名字來命名這個統計名稱），這是在檢視相關時常運用的一個數學運算。運用這個符號可以幫助相關統計研究者在未來認定上沒有困難，通常這類的運算測量是運用在等距或是等比尺度。計算相關值時須要使用到平均數與標準差，且透過散佈圖的點分散情形來告訴我們個案的分散情形，R值多半介於-1.0到+1.0之間，0值意謂著兩個變項沒有關係。若是r值加平方之後有時候我們會稱之為R²，是指消減誤差比率的意義。

R²也告訴讀者一個變項中的百分比（指依變項而言）由其他多元的變項（自變項）計算值為多少，r相關的測量只有直線關係，它沒有辦法呈現曲線或是非直線的關係，舉個例來說，r值為0時是意指零相關或是一個曲線的關係。（見資訊箱12.5）。

Chi-square：這一類的運算有兩種不同的使用，它可運用在描述統計或是推論統計，在推論統計的基礎來自於描述統計。視為一個測量相關時，卡方檢定能夠使用在名義與順序尺度的資料，其所檢定出來的最高有限定、最低值則為0意指變項兩者沒有相關性。（見資訊箱12.8）

所有相關測量摘要

測量方法	希臘符號	資料尺度	最高相關	相依性
Lambda	λ	名義尺度	1.0	0.0
Gamma	γ	順序尺度	+1.0 至 -1.0	0.0
Tau(Kendall's)	τ	順序尺度	+1.0 至 -1.0	0.0
Rho	ρ	等距與等比尺度	+1.0 至 -1.0	0.0
Chi-square	χ^2	名義與順序尺度	無限大 ∞	0.0

向的數字則所呈現的關係則為正相關。若是出現1.0的數字則是指100%的消滅誤差值，或是百分之百的預測完全。

兩個變項以上之測量

統計控制

僅由兩個變項間的關係很難有效的看見自變項影響依變項，根據變項關聯來看一位研究者必須計算選擇性的解釋，而解釋的過程中能使假設性的關係獲得檢證。經驗論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乃在選擇研究設計的過程中建立某一個有潛質變項可能影響結果與假設。在非經驗性的研究中，研究者所做的是統計中控制性變項，他在測量這個控制變項時，是可預測到他的可能性。當所檢視的控制變項是屬於多元變項時，則有助於研究者來決定是否這個雙變項關係是可驗證假設，他們也可以呈現出自變項如何去影響依變項的效力。

研究者在多元的變項中選擇第三變項（有可能第四或第五變項），來控制所欲解釋的變項。舉個例來說，一個棒球選手的雙變項中，呈現出身高較高的青少年較身高矮的青少年表現較佳，但是若在高度與態度上加入性別的變項時，也許假設男的青少年較女青少年更傾向喜愛棒球。為了檢視性別是否為實際影響的因素，研究者必須控制性別此一變項，換句話說，性別的效力是統計的影響力。透過這樣的做法，研究者能夠看出性別對棒球態度與熱誠的維持是否產生影響力。

一位研究者可以透過在雙變項中，將所存在的一些類別來成為第三控制變項。例如一位研究者控制性別時，是在身高與對棒球的態度中成為的第三控制變項；這也是意謂著身高較高的男性與身高較高的女性，會較身高矮的男性與女性有較高的興趣。換句話說，性別這個控制變項是無效的。當這樣做時雙變項的關係是不對稱的假設關係。

假如在雙變項關係中彼此關係很微弱或是在控制變項後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則是意指著身高較高的男性並沒有較身高較矮的人更喜愛棒球，或是身高較高的女性並沒有較身高較矮的女性更喜愛棒球，這也意指出雙變項關係中研究者所假設的控制變項如：性別而非身高，會對棒球的態度有形成明顯的差異原因。

統計控制是在高級統計中的一項關鍵技巧，測量關係時的相關係數是這過程的唯一考量點。研究者在思考控制變項、或是雙變項的關係中，彼此之間其是虛無假設的關係。研究者在解釋雙變項的關係上必須很謹慎，必須思考他們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著控制變項。在他們介紹控制變項後，研究者將討論有關依變項在控制網絡中的影響效力，或是這個影響效力是不受控制變項所影響的。有兩個方式來介紹控制變項：(1)控制第三個變項之百分比表格。(2)多元迴歸分析。以下將會分述說明之。

百分比表格的設計

❖ 建構第三變項之表格 (Constructing Trivariate Tables)

為了能夠去了解每個結果的原因條件，研究者想要去控制或是看見是否有其他選擇性的解釋因素來解釋因果關係？進而了解雙變項關係的假設性為何？選擇解釋性的過程是一個操作性的定義，並且被視為第三個變項。這些都被稱為控制變項因為這些選擇性的變項。

有一個方法能夠了解第三變項，如何被視為他們對雙變項關係之間是有影響力的。第三變項的百分比表格與先前的雙變項之間的製作是有些許的不同，它所維持的是多元雙變項的百分比表格關係。

第三變項的表格它存在的有每個類別的依變項與自變項，其中皆具有控制變項。這些新的表格被稱為部分表格，而這些部分表格的數字則依賴著這些類別中的控制變項而呈現出來，部份表格看起

來是雙變項的表格呈現，但是它們所運用的是一組案例的呈現。只有在部分特殊的控制變項中才得以呈現出來。因此，有可能會打破雙變項表格的既定形式，或是整合部分的數字來重建初期的雙變項關係。

第三變項的表格有三個主要的限制：首先，控制變項有四個類別以上之時，在解釋三變項的表格上的即有很大的困難，再者；控制變項能夠運用於任何的測量層次，但是在等距或是等比的控制變項上，則必須限制是群組的呈現方式，並且案例如何以族群的方式來影響解釋力也是要考量的。最後，所有的個案數是在一個有限定的因素下來呈現，並被區分為許多個部分來呈現出來。而在控制變項下，多元的雙變項關係之個案數，會隨這類別的多寡而有相等的細部數目來加以呈現。舉個例而言，一個控制變項有三個類別，而雙變項表格有12個細格，所以部分細格所呈現出來的的總數則有 $3 \times 12 = 36$ 個細格，平均每個細格有五個個案數，所以研究者將需要 $5 \times 36 = 180$ 個表格細格。

在來看看雙變項表格的結構，一個三變項的開始的組成在於調和次數分配（CFD），但是這在三個取向的變項中則由兩個取向的方式來取代了，有一個例子是以性別為控制變項，來思考三變項如何成為雙變項的表格。可以見圖12.4並呈現在12.5的表格中。在雙變項表格中，每一個組成的CFD所呈現出來的細格中，都屬於最後的表格內容。

在三個變項中，三個變項的表格是可能存在有邏輯的。在一些例子中其組成有下列幾個變項：(1)性別決定態度。(2)年齡組決定態度。(3)性別決定年齡組。在部分相關的呈現上是以最初的雙變項關係來設定其基準線，在自變項上是屬於年齡組別，而依變項上則是指態度，所以性別就是屬於控制變項。因此，在三變項的表格中就會存在一組部份的現象，而每一個也可看見年齡、態度與性別控制後的關係。一位研究者的理論在最初的假設雙變項關係上，必須告訴讀者所提供的變項是可以有選擇性的解釋力（如在控制變項

表 12.5 CFD 和三變項表格分析

三變項表格中的調和次數分配

男性			女性		
年齡	態度	個案數	年齡	態度	個案數
30歲以下	同意	10	30歲以下	同意	10
30歲以下	沒意見	1	30歲以下	沒意見	2
30歲以下	不同意	2	30歲以下	不同意	1
30-45歲	同意	5	30-45歲	同意	5
30-45歲	沒意見	5	30-45歲	沒意見	5
30-45歲	不同意	2	30-45歲	不同意	3
46-60歲	同意	2	46-60歲	同意	2
46-60歲	沒意見	5	46-60歲	沒意見	5
46-60歲	不同意	11	46-60歲	不同意	10
61歲以上	同意	3	61歲以上	同意	0
61歲以上	不同意	0	61歲以上	不同意	2
61歲以上	沒意見	5	61歲以上	沒意見	5
	總合	51	總合		50
	遺漏的變項與個案數	4	遺漏的變項與個案數		4
	總個案數	55	總個案數		54

以男性組群的部分表格呈現：

態度	年齡組群				總加
	30歲以下	30-45歲	46-60歲	61歲以上	
同意	10	5	2	3	20
沒意見	1	5	5	0	11
不同意	2	2	11	5	20
全部	13	12	18	8	51
遺漏個案數=4					

以女性為組群的部分表格呈現：

態度	年齡組群				總加
	30歲以下	30-45歲	46-60歲	61歲以上	
同意	10	5	2	0	17
沒意見	2	5	5	2	14
不同意	1	3	10	5	19
全部	13	13	17	7	50
遺漏個案數=4					

上)，因此研究者選擇控制變項須要有理論為基礎。

所以在雙變項的表格中，調和次數分配提供了欄給每一個細格的數字，一位研究者改變了這些的數字，成為百分比以雙變項來呈現（即區分為欄與列的形式），舉個例來說，以女性為主的細部呈現中在左邊的數字是10。而在列的百分比中所呈現的細格中的百分比是 $10/17 = 58\%$ 。

在精心設計的典範中乃是將三變項的百分比視為一個閱讀系統，它描述一組組群的顯現乃是在控制變項是在被介紹的情形下。有五個題組中是在描述如何比較細部表格的內容，或是如何改變在控制變項後時組織雙變項間的關係（見資訊箱12.6），在組群例子中所呈現出來的是較明顯的個案，當有些沒有觀察到的差異存在時，則運用高深的統計是需要的。

複證的類型（replication pattern）最需要早些了解的，因為當存在著部份相關時，則會在控制變項存在雙變項之間看出關係的消滅與增加，它也意謂著控制變項是沒有效用影響力的。

標明的類型（specification pattern）是另一個存在的典範，當控制變項在最初的兩個變項間發生，但卻沒有影響力時則可看見其產生的現象。舉個例而言，你會發現一個很強烈的負相關在「學院成績」與「主動」的事件產生時雙變項關係，你會以控制性別為變項而沒有發現它的效應只有在男性才發生，這個特別的情形只因為研究者所控制的類別中影響力最大的。若所設定的雙變項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探索性與解釋性的變項之間，則在雙變項的表格中所呈現的則是看不見部份相關的存在。換句話說，彼此之間關係必須是相互依賴的情形下，才有可能產生部分相關。理論上而言，一個控制變項能夠在兩個地方產生，不是在自變項就是依變項之中，或在原始的依變項之中。

解釋性的類型（interpretation pattern）是在描述依個狀況是，在原始資料中的依變項與自變項間加入控制變項，舉個例而言，你會檢視在宗教態度與墮胎態度之間的關係，而政治的意識形

資訊箱 12.6

詳析控制模式之分析

模型名稱	在兩個變項之間的比較性模式淨相關摘要表
複證類型	兩個變項之間是完全相等淨相關
標明類型	兩個變項關係只有其中一個看出部份相關
辨明類型	雙變項之間的關係很弱或是變項介入後部份相關消失
解釋類型	雙變項之間關係很弱而且是在自變項之前加入控制變項後兩者相關消失
抑制類型	不是在雙變項關係之間，在分表中的關係會呈現出來

詳析模式範例

(1) 複證類型 (replication)

	雙變項表格			控制變項後分表			
	低	高		控制變項=低		控制變項=高	
				低	高	低	高
低	85%	15%	低	84%	16%	86%	14%
高	15%	85%	高	16%	84%	14%	86%

(2) 辨明或解釋類型 (interpretation or explanation)

	雙變項表格			控制變項後分表			
	低	高		控制變項=低		控制變項=高	
				低	高	低	高
低	85%	15%	低	45%	55%	55%	45%
高	15%	85%	高	55%	45%	45%	55%

(3) 標明類型 (specification)

	雙變項表格			控制變項後分表			
	低	高		控制變項=低		控制變項=高	
				低	高	低	高
低	85%	85%	低	95%	5%	50%	50%
高	15%	15%	高	5%	95%	50%	50%

(4) 抑制類型 (suppressor)

	雙變項表格		控制變項後分表			
	低	高	控制變項 = 低		控制變項 =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54%	46%	低 84%	高 16%	低 14%	高 86%
高	46%	54%	低 16%	高 84%	低 86%	高 14%

態即是所謂的控制變項，你的理由是宗教的教養背景影響著現今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對墮胎的態度。你將理論或一些政治的意識形態為先前的特殊議題態度取向如：墮胎，因此在邏輯上教養影響政治取向，控制變項乃視為一個干預變項，它能夠幫助你來詮釋完整關係的意義。

辨明性的類型 (explanation pattern) 則是與解釋模型有相同之處，是與暫時性的安排之控制變項是有所差異的，所以在這個典範中我們可以看到控制變項，在雙變項關係中是屬於依變項，舉個例而言，在原始資料中的關係是存在於宗教撫養觀點與墮胎態度，但是現在性別為控制變項，性別又因出生別與宗教撫養有很大的差異，所以在解釋模型中改變研究者如何解釋研究的結果，他也暗喻著雙變項最初的關係是**虛假性 (spurious)** 的假設（可參考第六章所討論的虛假性關係。）

在抑制變項模型中乃是發生在當兩個變項是在相依變項關係，但關係所顯現出的是兩個間的部份相關。舉個例來說，宗教撫養方式和墮胎的態度，在雙變項關係上都是屬於依變項。當控制變項是宗教的領域被介紹時，則宗教的撫養方式和墮胎態度就會形成一個分表。而控制變項是屬於抑制變項因為壓抑了真實的關係，而真實的關係只有在控制部分變項時才會呈現出來。

多元迴歸分析

本書的最後有介紹多元迴歸之計算技巧，雖然它可以透過統計

軟體很快的獲得近似值，但在統計的背後須要了解的是計算可能產生的錯誤以及詮釋。這樣的統計技巧多半以等距或是等比尺度的資料為主。在此所要討論的有個理由：首先，它同時控制許多選擇性的變項，再者，它可以廣泛的運用社會學的知識，且當你在閱讀研究或是文章時，你將會遇見這樣的統計技巧。

多元迴歸的結果告訴讀者兩件事情：首先，測量結果的符號稱之為： R^2 這是告訴我們如何去解釋一組依變項的測量方法，解釋是指當由預測依變項中得到有關的自變項，檢視其分數的錯誤率降到最低，一個好的模型是有幾個自變項能夠計算或是解釋，且在依變項中有個很大的百分比變項值。舉個例而言，一個 R^2 若為0.5是意指現知的自變項和控制變項能夠預測到的依變項精準率有50%，或是在沒有辦法知道變項的情形下，可能會發生一半的錯誤率。再者，迴歸分析所獲得的結果其方向，和每個依變項影響大小必須有所了解。測量的預測效果都會給予一個數字值，舉個例子來說，研究者能看見五個自變項或控制變項同時影響一個依變項，對所有的變項而言，控制結果是會對每個變項結果都產生效應。這對檢測理論而言很有特別的價值，他所陳述的是在多元的自變項中，依變項所形成的原因（參見第三章中的因果範例）。

在依變項中的影響測量方法上是以標準化迴歸係數，或是以希臘字母 β 來表示。它與相關係數有相似之處，事實上 β 係數是以兩個變項所算出來的相關係數 r^2 為其值。研究者使用 β 迴歸係數是要決定控制變項是否有其效果，舉個例而言，在雙變項X與Y之間的關係其係數為0.75，再者，研究者統計的思考有四個控制變項，假若 β 依然維持在0.75，則顯示出這四個變項沒有影響力。然而，假如在X與Y之間的相關係數很小（小至0.2）則它指示出控制變項有其效果。

思考另一個迴歸的例子是以年齡、收入、教育、宗教等自變項為分析的變項，在依變項上則是思考其政治意識形態與取向，因此在多元迴歸上，它的結果就顯示出收入與宗教參與有很大的影響

力，而教育和地區的影響力較小，年齡更是沒有影響效力。所有的自變項中整合起來有38%的預測效力在思考一個人的政治意識上（見資訊箱12.7），在這個例子上得到的建議是高收入、宗教參與的頻率、居住於南方的人其政治觀點傾向在保守的政治觀點，另外發現較高的教育程度則傾向自由派觀點，收入的影響是較高的，尤其是以居住在南方的人其收入在兩倍以上者影響更大。

推論統計

推論統計的目的

本章先前曾討論過描述統計的內容，但是研究者時常想做更多描述以外的分析，們想檢驗假設知道是否在所選的樣本結果，能夠支持在現實生活中的人口並且決定在結果中較大的分數，足以顯示出兩者關係間存在的差異性（尤其是在兩個組群間的平均分數）。推論統計多半使用機率理論來正式性的檢測假設，允許參考值是來自樣本抽樣，並檢視是否其描述的結果與隨機抽樣因素之間是否有真實的相關性存在。

資訊箱 12.7

多元迴歸結果分析例子

政治意識形態是屬於依變項指示：（高分數意指較傾向自由派）

自變項	標準化迴歸係數
居住 = 南方	-0.19
年齡	0.01
收入	-0.44
教育年限	0.23
宗教參與傾向	-0.39

$$R^2 = 0.38$$

在這個部份將解釋推論統計的基本觀念，但不是處理推論統計的細部內容，在這個領域中有很多是較描述統計來得複雜的，且需要有一些統計的背景來加以支持。推論統計依賴一些抽樣機率的原則，而研究者運用隨機抽樣的過程（如：亂數表）在整體性的母數中來選樣，推論統計是研究者以正確的方法，來討論如何有信度的由樣本中的結果來推論母體的現象。

也許你已經遇到或聽見一些推論統計的名詞：「統計顯著度」、或是「結果中的顯著度在0.05的水準」。研究者使用他們來建構各樣的統計檢測（如t-test或是F-test），統計顯著度是運用在正式性的假設檢定中，它屬於較為精確的方式，來描述拒絕虛無假設時的各種檢測方法。

統計顯著度

統計顯著度是指結果不是由機率因素發生的，它意指的抽樣樣本發現的機率與母體間的相關性，當母體是未知的情形下。因為抽樣樣本包含了隨機取樣的過程，他可能的樣本結果差異是由於母體。一位研究者想估計樣本的機率與真實母全體間的機率時，隨機樣本抽樣是很好的方式。統計顯著度使用機率理論和統計特殊方法來檢視，告訴研究者研究的結果如何（如列聯相關、兩個平均數的差異、迴歸係數）。這些都是在隨機抽樣中可能產生的誤差而做的檢視方法。

統計顯著度只有告訴研究者是什麼結果，它沒有辦法提供每一件檢測完全且確定的結果。它的結果陳述是對特別的結果，或多或少有些的可能性。統計顯著度並非指示一個實際的、獨立性的、或是理論性的顯著度，其結果有統計考驗力，但在理論上的意義是很少的或是微不足道的。舉個例來說，兩個變項能有統計相關性的連結在於兩者是同時發生的，彼此之間並沒有邏輯關係在其中。（如指甲的長度和說法語的能力兩者之間並沒有關係。）

顯著水準

研究者通常表達統計顯著度會透過一些標準程度來反應（如統計考驗力有特別的標準），更勝於所給予特別的機率。顯著度的程度（通常以0.05，0.01或0.001）是一個對話的方式，顯示結果可能有的發生因素——因為這些可以看出樣本所呈現的關係，有時在不知道母數的情形下最適用。假如研究者說結果的顯著度是在0.05的水準，這有下列幾項的意義：

1. 這個結果顯示在100次的機率中只有可能出現5次的機會。
2. 有95%的百分比的樣本結果所產生的機率是單獨的發生，也反應出母數的精確度。
3. 在錯誤結果的機率下是以0.05或5%為機率的。
4. 有一個95%的信心水準其與真實的母群體之間是相關的，而非機率因素造成的。

這是用不同的方法在陳述相同的事情，聽起來像是在討論樣本的分配、以及抽樣過程中所遵循的中央極限定理原則。這些並非是意外發生的。都有機率理論為基礎並且能夠由樣本資料來推論理論，機率理論是讓我們知道在隨機抽樣的過程中，在許多事件的過程中多久可以抽取樣本。換句話說，它是允許在長久的運作過程中能夠有精準的預測，但並非是針對特殊的情形。因此我們有一個樣本時，我們便想推論母群體，機率理論可以幫助我們減少在特別樣本呈現時，推估母體的錯誤的可能，除非我們知道母體總數否則我們很難確實知道母數為何，但是機率理論讓我們有信心的陳述出——由樣本所呈現出來的一件事，而這些事是母體可能會發生的。舉個例來說，樣本所呈現出大學的男性與女性在學習的時間上有些差異，是否這些的結果告訴我們一個非常態的結果，並且這些有可能在母體中的差異並不明顯？或是這反應了母群體中的性別真正的差異？（見資訊箱12.8中的 χ^2 ）。

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

統計的邏輯乃是根基於產生的結果時的機率因素，為什麼我們會使用0.5的顯著水準？它是否意指5%的機會是有可能引起結果的隨機過程，為什麼不使用更確定的標準——舉個例來說，在1到1,000之間的隨機抽樣機率有多少？而且是在抽樣機率很小的情形，與真實實際之間可能產生的結果。

針對這個思考方式有兩個答案可以解釋，簡單的回答這個科學性的溝通性問題，所獲得的資訊多數都是以0.05為經驗性的水準，以95%為結果的信賴區間將可接受社會環境所解釋的標準。

另一方面較複雜的答案則是指，在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中找到平衡。一位研究者可能會面對兩種類型的邏輯錯誤，所謂第一類型錯誤的發生是指當研究者陳述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也意指出拒絕了虛無假設的謬誤，第二類型是指當研究者陳述的假設之關係是不存在的，在現實生活上卻是有極大的關係。所以他意指錯誤的接受一個虛無的假設（見表12.6）。當然，研究者想避免雙重的錯誤，但也會面臨到兩難的狀況：當第一類型錯誤發生時的錯誤減低而相對的第二類型錯誤增加的情形。

第一類型與第二類型錯誤可能會遇到的兩難想法，要給予一個明確的指引是困難的。但有相同的邏輯可以看得見的是研究者的架構，舉例來說，當受刑人事實上是無罪的時候，陪審團要決定寬恕他所被控告的罪，或是陪審團能夠決定他或她是有罪的。但事實上他是有罪的，陪審團並不想製造雙重的錯誤，不要把無罪的送入監獄卻把有罪的縱容法外，所以陪審團必須使用有限的資訊中來做出判斷。相同的例子，藥廠在決定要賣一項新藥時，公司會去評估這個藥同時會產生的副作用，事實上這個藥所產生的副作用原因是被掩蓋的，或是當她事實上並沒有副作用，但卻恐懼他有可能產生的反向效果，因此公司並不想製作雙重的錯誤。假如公司製造了第一類型錯誤，則公司將會面對訴訟以及傷害人的罪名。若產生第二類

資訊箱 12.8

卡方檢定

所謂卡方檢定 (χ^2) 通常有兩種使用方法，有時候會有所混淆。若在描述統計中它會告訴我們兩個變項間的關聯性，但若當事運用在推論統計時，則它告訴我們的是任何變項關聯之間因素的可能性，所以 χ^2 的運用是很廣泛的且它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方法來檢視順序尺度的變項，它在幫助我們思考雙變項百分比表格時提供了一個更精確的方法。

邏輯上來說，我們會先發現一個預期中的價值變項在表格中，我們在表格的邊緣中會發現這個訊息，所以每個數的次數分配，都會在邊緣表格中再次被叫出來，所以期望中的數值會被視為最好的猜測，而不思考表格本身架構為何。接下來我們會思考，在資料中實際的觀察到的資料與期望值差異有多少。假如差異很大則可能在變項之間可能有相關。假如表格中的資料和我們看到的期望值之間的差異很小，這顯示出變項之間並沒有關係，它們彼此之間的是獨立的。換句話說，獨立意謂著什麼是表格中所顯示出來且正在進行的。假如所顯示的資料是獨立且相關連彼此之間慢慢增強時， χ^2 會呈現是 0。若表格所獲得到的資料與期望中的資料差距很大時，則我們可以知道由邊緣的值所得到的資料、和期望值間正在進行一些關係（變項間的相關性）。可以看看下面的例子了解分數之間彼此的相關：

列或是觀察資料表格

研究方法上的分級

最高的學生	C	B	A	總計
最高	30	10	10	50
中位數	10	30	10	50
最低	30	20	50	100
總計	70	60	70	200

期望中的表格

期望值 = (所有欄 × 所有列) / 所有總計。如：(70 × 50) / 200 = 17.5

研究方法上的分級

最高的學生	C	B	A	總計
最高	17.5	15	17.5	50
中位數	17.5	15	17.5	50
最低	<u>35</u>	<u>30</u>	<u>35</u>	<u>100</u>
總計	70	60	70	200

差異的表格

差異 = (觀察值 - 期望值)。如：(30 - 17.5) = 12.5

研究方法上的分級

最高的學生	C	B	A	總計
最高	12.5	-5	-7.5	0
中位數	-7.5	15	-7.5	0
最低	<u>-5</u>	<u>-10</u>	<u>15</u>	<u>0</u>
總計	0	0	0	0

所以 χ^2 值 = 每一個差異值的平方加總，讓後除以每一細格中的期望值，舉個例來說：12.5 的平方 = 156.25 / 17.5 = 8.93

χ^2 值 = 第一列 (8.93 + 1.67 + 3.21) + 第二列 (3.21 + 15 + 3.21) + 第三列 (0.71 + 3.33 + 6.43) = 45.7

當 χ^2 值不是 0 時則資料所顯示出來的相依的，也就是彼此之間是相關的。所以 χ^2 係數沒有辦法直接告訴我們關聯的方向性（負向的），對推論統計而言，我們需要使用卡方表或是統計程式來評估其相聯性（如去看看所得到的卡方值與發生機率如何），沒有持續處理卡方表格時這樣的相關性是很難看見，而發生的機率也少於 1/1,000，所以在這個例子中九個細格表格中，統計水準在 0.001 時期所得到的卡方值是 45.7。

型錯誤時，則阻止公司在銷售藥物時對於需要此藥物的人在治療上的限制和產品的利潤。

表 12.6 第一類與第二類型錯誤

研究者的陳述	在現實世界的真實情形	
	沒有關係	因果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錯誤	第二類型錯誤
因果關係	第一類型錯誤	沒有錯誤

讓我們將統計的顯著度與兩個類型的錯誤整合來思考，一個過於謹慎的研究者會設定較高的顯著水準、且只可能犯一種的錯誤。舉個例來說，研究者可能使用0.0001的水準，他或她對於結果的態度的機率將只有1/10,000的機率，因此在一個高標準顯著度中乃指，研究者多數會去寬恕結果所產生的機率，但實際上卻不是這樣的事實。所以當有因果關係存在時，研究者有可能錯誤的接受虛無假設（一種第二類型錯誤），相反的研究者也會有一個風險是設定太低的顯著水準時，如0.10。研究者的結果指標就有可能產生一個關係是1/10次的機率，研究者會喜歡去較寬容的陳述一個因果關係的存在性，當隨機抽樣的因素在事實的關係上對結果實際產生影響性時，研究者較傾向去錯誤的拒絕虛無假設（第一類型錯誤）。整體而言，0.05的顯著水準是介於第一類與第二類型錯誤的折衷方法。

最後我們可以對推論統計的基礎有一大綱式的說明，統計技巧是精準的且有賴於抽樣錯誤、樣本大小以及中央極限定理等彼此間的關係。因此推論統計的力量乃在於，研究者有能力去陳述他所得到的結果的確定性，且這個特別的樣本所得到的結果能夠趨近真實的母體樣本。舉個例來說，研究者建構統計考驗並且發現統計顯著度在0.05時的相關性，研究者陳述的樣本結果，將有可能沒有與機率因素相關。實際上，有95%的機會與真實存在的世界有相關性。

檢視對推論統計是最有用的但非受限，其資料上必須是隨機抽取的樣本，因此檢視是將隨機抽樣錯誤納入其中來思考。非隨機抽樣的錯誤(如一個不是很完善的抽樣架構，或是不完整的設計測量)

皆是沒有思考完整，不要太愚昧的認為檢視一定能夠提供一個簡單且最後的答案。

結論

你學習了如何組織量的資料乃是為了分析作準備，並且分析資料（用圖或表的形式來組織呈現，或是用統計測量的方式來描述）。研究者使用統計分析是為了能夠檢視假設並且能回答研究問題，你可以看見資料必須被編碼然後使用單變項或是雙變項來分析，雙變項關係有可能是虛假性的，所以控制變項與多變項分析就時常是必須使用的統計技巧，你也可以學習一些推論統計的基本原理。

開始時，如果研究者所獲得的結果不支持原本所設定的假設時，他們會覺得他們做錯很多事情，沒有什麼錯誤可以讓我們拒絕假設。科學研究的目標在於能夠去創造知識，且對於社會世界的真理有所反應，而非去定義喜愛的想法或是假設。假設有時是理論性的猜測基於有限的知識，他們必須要被檢視過。優秀的研究品質能夠發現假設有時是錯的，而較低的研究則較能夠支持假設。好的研究仰賴於高品質的研究方法，而非支持特殊性的假設罷了！

好的研究乃是指能夠指出可能性的錯誤，或是減緩來自資料所獲得的真實推論間的障礙。錯誤是須在整個研究過程中被考慮的，其有可能影響一些結果的地方有：研究設計、測量方法、資料蒐集、編碼、統計計算與表格建構、結果的解釋等都是。即使研究者可以設計、測量、編碼、與計算的過程中都沒有錯誤的情形下，以下的步驟仍是研究過程中須維持的。即去解釋表格、圖表、統計格式以及一些問題：所有的平均數為何？在設計這些事實的統計表格、圖、表或是統計其使用的理論為何？

資料、表格或是電腦的報表沒有辦法回答所有研究者的問題，所有得到的資料並沒辦法來回應他們所有假設問題的答案。因此，

身為一個研究者你必須回到你所選擇的理論（如：概念、概念間的關係、假定、理論定義）以及給結果的定義。不要欠缺了開始時你進入此研究的概念，有空間去創造、並有新的想法來透過圖畫的方式來說明真實結果的發展。要小心的是研究的設計與建構是很重要的，以便你能夠去看到結果所反應出來社會的真實事實，不要擔心是否這些的結果所產生的錯誤，或是研究過程中可能有些人為的因素。

在我們結束量化資料分析時，有一個持續性的議題可以思考。如記者、政治人物、或是其他有機會增加統計運用的人都會設定界點或是支持這樣的辯論，她們所使用的統計結果並不一定較精準，但所獲得訊息可以在公開的場合中討論。多數時候，只是增加一些混淆和製作了更多訊息，讓我們知道統計能做與不能做的有哪些。有時一些陳腔濫調的說法會增加任何你對統計錯誤的發現，然而；人們能或是做出一些錯誤統計的運用。透過人們的無知或是混淆的欺騙方式，有一些人會運用統計來操控別人。所以有一個的方法是保護你自己在統計錯誤產生時，不會無知的隱藏在數字中，且能夠發現的事實。再者，可以了解整個研究過程、統計並思考本身你所聽到的資訊並且對於資訊能夠訊問的問題。

當我們在下一章的質化研究中，質化研究的邏輯與目的與這些量化的邏輯都是不同的，有些是較屬於實證經驗取向的思考層面，而較少關心數字、假設和因果關係，較多的關係文字、規範與價值或是其中所隱藏的意義。

重要名詞

條形圖	探索典範	雙變項統計
解釋性類型	表格骨架	次數分配
表格的內格	次數分配多邊圖	編碼表格
自變項（獨立變項）	編碼簿	編碼結果

統計顯著水準	列聯性清楚	直線關係
列連表格	邊緣標格數值	控制變項
平均數	共變數	中位數
交叉表	眾數	曲線關係
網絡效應	資料領域	常態分配
資料紀錄	選擇的掃描表格	描述統計
部分淨相關	直接輸入方法	百分比
圓餅圖	清楚可能的編碼	全距
複證類型	散佈圖	偏態分配
辨明類型	標準差	統計關係
統計顯著	抑制變性組型	第一類型錯誤
單變項統計	第二類型錯誤	Z分數

問題回顧

1. 什麼是編碼簿且如何運用在研究中？
2. 研究者如何清楚資料並且檢視所製作的編碼簿？
3. 研究者如何描述所使用的IBM卡來分析資料。
4. 用什麼方法研究者可以呈現出次數分配的訊息？
5. 描述平均數、中位數、眾數三者之間的差異。
6. 在散佈圖中我們可以看見關係上的哪三種特徵？
7. 什麼是共變？如何使用？
8. 當研究者由散佈圖概念來畫一個百分比表格時，可以在變項中發現什麼關係？
9. 請討論使用第三變項為控制變項時的概念？
10. 什麼是統計水準設定在0.001時的意思？又什麼樣的錯誤像第一類型或第二類型錯誤？

實地研究法

導論

適合實地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實地研究法簡史

實地研究法的邏輯

何謂實地研究法？

實地研究的計畫步驟

選擇研究場域而後進入

選擇研究場域

進入場域的策略

進入實地

建立關係

實地裡的關係

實地裡的角色

學習風俗習慣

維持關係

觀察並蒐集資料

觀察和傾聽

田野筆記

資料品質

聚焦及取樣

實地研究訪談

實地訪談

生命史

實地訪談中的問題類型

報導人

訪談脈絡

離開實地

實地研究中倫理的兩難

欺騙

保密性

與偏差者交涉

有權力者

出版實地報告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實地研究是針對人們在日常生活正常的狀態下所進行的研究。實地工作者進入他人的世界以學習他們如何生活、他們的說話方式和行為、什麼使之迷惑和沮喪...等的第一手資料。這也可以視為一種研究方法，那些實務工作者試圖瞭解參與其中所觀察到的行為之意義。

——Robert Emerso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p.1

導論

本章及以下兩章開始從之前的量化研究轉變到質化研究型態。你可以回想第六章中指出，質化和量化是很不同的，而從第四章開始也指出，社會科學中非實證主義的研究取向也和量化研究大不相同。本章說明了實地研究，或稱之為「民族誌」(ethnography)或「參與觀察研究」(participant-observation research)。這是一種質化研究，研究者在當時以自身的文化直接參與並觀察一個小的社會群落。第十四章將會說明歷史比較研究法，其焦點可能是鉅視也可能是微視的，研究者檢視的是不同時間以及 / 或不同文化。第十五章將討論質化資料的分析。

許多學生對於實地研究感到很興奮，因為這包括了和一群異質的人相處在一起，沒有冰冷的數學、沒有複雜的統計、沒有抽象的假設歸納，取而代之的是，在自然的場域中和「真人」直接的、面對面的社會互動。

實地研究吸引那些喜歡觀察人群或運用較鬆散的方式進行研究的人。此外，實地研究報告因為揭露了不熟悉的社會世界而很迷人：天體營、遊民、職業賭徒、角頭幫派、警察巡邏隊、急診室、藝術家特區等。

在實地研究中，獨立研究者直接和被研究者對話、觀察。透過數個月或幾年的互動，研究者瞭解了被研究對象、他們的生活史、其嗜好興趣、習慣、希望、恐懼和夢想。遇見新的人群、發展友誼、發現新的社會世界是很有趣的。這也是很花時間、消耗情緒、有時候甚至有身體上的危險。

適合實地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何時你應該運用實地研究法？當研究問題牽涉到學習、瞭解或描述一群互動的人群時，就很適合用實地研究法。以下問題尤為適合：人們怎樣在社會中進行Y這件事？或是X這個社會是怎樣一個

世界？當其他方法（如調查法、實驗法）不實用時，則可以運用此法，像是在研究角頭幫派時。Douglas（1976: xii）指出，大多數社會研究者真正想知道的，只能夠透過研究者在實地的直接參與來研究。

實地研究者研究那些在某區域或某場所的人，通常是研究整個區域。實地研究的初學者應該從比較小的群體（30人或更少）開始，可以在相對固定的場所（如街角、教堂、酒吧、理髮廳、棒球場等）和每個人互動。實地研究者也研究一些不定型的社會經驗，不固定在某個地方，但其密集的訪談和觀察是唯一可以進入此種經驗的途徑——舉例來說，那些被搶劫的人、或是那些先生自殺身亡的寡婦心裡的感受。

為了要使用一致的用語，我們可以稱那些在實地裡被研究者為「成員」（members）。他們是實地裡的人，屬於這個群體、這個次文化、或是身為「局外人」（outsider）的實地研究者想要深入瞭解的社會場域。

實地研究者探索了許多不同的社會場域、次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面向，如下列之場域和次文化：自助洗衣店（Kenen, 1982）、相機俱樂部（Schwartz, 1986）、洗手間（Gross, 1986; Goodsell, 1983; Lofland, 1972）、受暴婦女庇護所（Wharton, 1987）、社會運動（Downey, 1986; Snow等, 1986b）、社福機構（G. Miller, 1983）、電視站（Altheide, 1976）、候機旅客（Zurcher, 1979）、以及酒吧（Byrne, 1978; LeMasters, 1975）。此外，實地研究者也研究比較大的區域，像是一個小鎮（Vidich and Bensman, 1968）、退休社區（Hochschild, 1978; Jacobs, 1974; Marshall, 1975）、工人階級社區（Kornblum, 1974）、和都市族裔社區（Whyte, 1955）等。其他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兩本專門的實地研究學術期刊找到：「當代民族誌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原名「都會生活」[*Urban Life*]）以及「質化社會學」（*Qualitative Sociology*）。

實地研究在解釋兒童的社會世界上很有價值。曾有學者研究過

少棒聯盟 (Fine, 1979, 1987)、兒童遊樂場 (Lever, 1978) 以及學童 (Corsaro, 1988; Eder, 1981, 1985; Maynard, 1985; Thorne and Luria, 1986)。實地研究者也研究過許多行業，包括醫學系學生 (Becker等, 1961)、計程車司機 (Davis, 1959)、酒吧女侍 (Hearn and Stoll, 1976; Spradley and Mann, 1975)、捕狗人 (Palmer, 1978)、警察 (Hunt, 1984; Pepinsky, 1980; Van Maanen, 1973; Waegel, 1984)、登門推銷員 (Bogdan and Taylor, 1975: 174-186)、社工員 (Johnson, 1975)、爵士樂手 (Sudnow, 1978)、工廠作業員 (Burawoy, 1979; Burawoy and Lukacs, 1985)、送牛奶的人 (Bigus, 1972)、空服員 (Hochschild, 1983)、以及藝術家 (Basirico, 1986; McCall, 1980; Sharon, 1979; Sinha, 1979)。

實地研究者藉著研究醫療小組 (Coombs and Goldman, 1973)、急診室 (Kurz, 1987)、以及生命事件像是懷孕 / 生產 (Annandale, 1988; Danziger, 1979; Weitz and Sullivan, 1986)、人工流產 (Ball, 1967) 與死亡 (Glaser and Strauss, 1968) 等而對醫療社會學有所貢獻；實地研究者對於非常態的行為研究尤有價值，研究過天體營 (Douglas and Rasmussen, 1977)、賭博 (Hayano, 1982; Lesiuer and Sheley, 1987)、大筆的毒品交易 (Adler and Klockars, 1987)、染有毒癮者 (Faupel and Klockars, 1987)、街頭幫派 (Moore等, 1983)、遊民 (Liebow, 1967; Polsky, 1967; Snow等, 1986a; Spradley, 1970)、妓女 (Bryan, 1965; Prus and Vassilakopoulos, 1979)、嬉皮 (Cavan, 1974)、色情書店 (Karp, 1973; Sudholm, 1973)、玄學 (Jorgensen and Jorgensen, 1982) 以及宗教信仰徒 (Bromley and Shupe, 1979; Gordon, 1987; Lofland, 1966)。

實地研究法簡史

❖ 發展初期

實地研究可以追溯到旅人到外地的旅遊報告。在1200年代，

歐洲的探險家及傳教士寫下那些他們遇到的奇特的人和文化，其他人讀了這些而學習到外國文化，之後，在十九世紀，當歐洲貿易及帝國急遽擴張，而有更多文人、受過教育的旅行家出現，遊記也就更多了。

學術性質的實地研究則是在十九世紀末與人類學一同興起。第一位人類學家僅讀了探險家、政府官員、或傳教士的報告，但缺乏和這些被研究者直接接觸。報告著重於異國風情、是高度種族歧視且種族中心主義的。旅人很少說當地語言而必須仰賴翻譯。直到1890年代歐洲的人類學家才開始到其他國家學習當地的文化。

英國的社會人類學家Bronislaw Malinowski (1844-1942) 是第一位長期和被研究對象住在一起蒐集資料的研究者。1920年代，提出密集的實地工作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並指出直接觀察、報導人的論述有別於觀察者的推論。他認為社會研究者應該直接住在被研究對象群中、與之互動、學習其風俗、信仰以及社會歷程。

研究者也運用實地研究來瞭解自己的社會。Charles Booth與Beatrice Webb在1890年代開始觀察倫敦的窮人，同時也進行人類學以外的調查研究和實地研究。Booth和Webb直接在自然的場域下觀察人，並歸納資料蒐集方式。參與觀察則是在1890年源自德國，Paul Gohre和工廠學徒工作並住在一起三個月，每晚在家記下詳細的筆記，以便研究工廠生活。他出版的資料影響了大學裡的學者，包括社會學家Max Weber。

❖ 芝加哥社會學派

美國社會學的實地研究始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也就是聞名的芝加哥社會學派。芝加哥學派對實地研究的影響包括兩階段，第一，從1910年代到1930年代，學校開始運用以個案研究或生命史為基礎的各種研究方法，包括直接觀察、非正式訪談以及閱讀官方資料。重要的影響來自Booker T. Washington, William James以及John Dewey。1916年，Robert E. Park (1864-1944) 擬了一個對芝

芝加哥市的社會調查研究計畫，因其記者的背景，他認為社會研究者應該離開實驗室，藉由直接觀察和在街角、酒吧、豪華旅館大廳的對話去「弄髒他們的手」。早期的研究像是「遊民」(The Hobo, Anderson, 1923)、以及「幫派」(The Gang, Thrasher, 1927)都是芝加哥學派所建構，是一種對街頭生活描述性的研究，分析不多。

在第一階段記者和人類學家的研究模式結合在一起，記者的模式是進到前線，運用報導人，尋找衝突點，探究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在人類學家的模式中，研究者將自己和一個小團體結合在一起一段時間，再以那些人的觀點看世界。

在第二階段，從1940年代到1960年代，芝加哥學派發展出另一種技術為參與觀察，應用在更廣的人類學模型上，瞭解研究者所處社會的團體和場域。這包括了三個原則：

1. 研究人們身處在其自然的場域或情境中。
2. 透過直接與這些人互動來進行研究。
3. 以這些成員的觀點得到對社會世界的瞭解並建立理論論述。

經過一段時間，研究方法從直接描述到理論的分析，都是立基於研究者在實地裡的參與。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地研究者面臨到調查和量化研究愈來愈多的競爭。從二次大戰到1970年代，實地研究便降低為所有社會研究方法的一部分。然而，在1970和1980年代，實地研究產生了一些改變，首先，研究者從認知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和語言學等借用了一些概念和技術；其次，研究者重新解釋社會科學認識論的根基和哲學假設（詳見第四章），以修正其方法；最後，實地研究者對於技術和方法變得比較謹慎。研究者開始寫下方法論，而且更有系統地使用其研究技術。

今日，實地研究者發展出一套自己的方法論。實地研究者在自然的情境直接觀察並和成員互動，以得到內在觀點。他們將行動主義或社會建構的觀點納入社會生活中。他們不將人們視為社會力操

作的媒介，也不將社會意義視為某種「在那邊」等著被觀察的事物。反之，他們透過互動將人們當作創造及定義社會世界者。人類經驗穿透了對現實的主觀感受，這種感受是人們如何看待以及對事件的反應。因此，他們將實證的假設重新放在「客觀的事實上」，焦點在於每天的生活、面對面協商、討論、討價還價的社會過程所建構出來的社會意義。

實地研究者將研究視為既是社會世界的一種描述，也是其中一部分。作為社會創造場域的一部分，研究者在實地裡的表現不可能只是中立的資料蒐集。

❖ 民族誌和俗民方法論

兩種實地研究的延伸，民族誌和俗民方法論，建立在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上。二者皆重新定義實地研究該如何進行，他們不是實地研究的核心，因此在此僅簡短說明。

民族誌來自文化人類學。Ethno表示人或民俗，而graphy為描述某件事。因此民族誌就是描述某種文化以及從原始的觀點去瞭解另一種生活方式。正如Franke（1983: 61）所言：「文化，我們所描述的物體，存在於自然的思考當中。」民族誌假設人們會進行推論——也就是說，除了表面所言所見之外，背後仍有隱含的意義。人們在特殊的社會脈絡當中，透過行為（如：演說和行動）表現其文化（人們的想法、深思、信念）。行為的展現不代表任何意義，意義是推論出來的，或是由某人發現意義。從所聽聞所觀察推演到真實意義就是民族誌的中心。舉例而言，當一個學生被邀請參加啤酒派對，這位學生推論這是一個非正式的派對，會有一些學長，同時派對上會有啤酒，而這些推論是源自其文化知識。文化知識包括符號、歌曲、傳說、事實、行為方式、以及物體（如電話、報紙等）。我們從觀看電視、聽父母的話、觀察他人等方式學到這些。

文化知識包括顯性的知識，如我們所知和所討論的，以及隱性的知識，是那些我們很少察覺的。比方說，**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 包括社會事件 (如啤酒派對), 大多數人能夠很容易描述一件事怎樣發生。**隱性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則包括那些為了和他人有所區隔而沒有說出來的文化規範。人們通常不會察覺到他們遵循這種規範, 當這些規範被侵犯時, 他們會覺得不舒服, 但很難說出不舒服的是什麼。民族誌學家描述成員們所使用的顯性和隱性的文化知識。其詳細的描述和仔細的分析把每部分分開來描述, 而後再組合在一起。

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認為民族誌中很重要的部分是「**詳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 是很豐富的、充滿細節的描述 (和摘要、標準化、概化或變項相反)。三分鐘的事件轉換成詳實描述可能有好幾頁, 要捕捉到事件的氛圍、事件過程, 因此要有多重翻譯。這將事件放在脈絡中, 則民族誌報告的讀者可以追尋其文化意義。

俗民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 是另一種在 1960 年代發展出來的方法, 有其專有名詞。結合了理論、哲學、及方法。有些人不將這視為社會學的一部分。Mehan 和 Wood (1975: 3, 5) 指出:

俗民方法論不是發現的本體, 也不是一種方法, 更不是一種看世界的觀點。我將俗民方法論視為一種生活形式……俗民方法論是一種企圖展現某種層次的真實, 有別於社會學層次……這和社會學的差異就像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差異一樣。

俗民方法論一種簡單的定義是對常識的研究。俗民方法論透過觀察其創造和運用在自然情境中持續的社會互動來研究常識。俗民方法論是一種激進或極端的實地研究, 立基於現象學觀點和社會建構主義方法。包括了對微視情境 (如: 簡短對話或社會互動錄影帶的逐字稿) 特定的、高度細節的分析。和芝加哥學派的實地研究相比較, 關心的比較是方法本身, 並認為研究發現來自於方法本身和來自被研究的社會生活一樣多。

俗民方法論假設社會意義是脆弱且容易改變，不是固定的、穩定的、或一成不變的。意義是在持續的過程中不斷被創造和再造，因此，俗民方法論學者分析語言，包括演講的掌聲和情境。他們假設人們透過運用隱性社會文化規則來「完成」(accomplish)對常識的瞭解，而社會互動是真實建構的過程。人們透過運用來自社會脈絡的文化知識和線索來解讀每天的事件，俗民方法論者解釋一般人在日常情境中如何應用隱性規則來解釋社會生活（例如：知道某人是不是在開玩笑）。

俗民方法學家有時候用「破壞」(breaching)實驗來證明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賴以創造現實感的簡單隱性規則（亦見後續討論之「障礙」）。研究者有目的地破壞社會規範，破壞通常創造有力的社會回應，確認規則是存在的，顯示社會現實的脆弱，並證實這類隱性規則對於日常生活的進行是很重要的。舉例來說，俗民方法論的發明者Harold Garfinkel把學生送去商店當店員，並叫他們要「誤會」顧客的意思，起先，顧客會很困惑並試圖解釋，但當學生堅持其意時，迷惑的顧客不是勉強接受情境的新定義並笨拙地遵循店員的規則，就是大發脾氣。這種破壞顯示了社會現實的運作有賴隱性的知識（如店員和顧客的區分）。導演運用類似的情境作喜劇效果，當人們來自不同的文化，所遵循的隱性規則不同，或是不知道合宜行為中未言喻的規則時，看起來就很有趣。

實地研究法的邏輯

何謂實地研究法？

要對「實地研究」(field research)下一個定義相當困難，因為它比較是一種研究取向，而非一些可以應用的技術。實地研究者運用各種方法取得資訊。如Schatzman與Strauss（1973: 14）所言，「實地研究法比較像是一些活動的集合傘，在這把傘底下的任

何技術都可以用來獲得想要的知識，以及關於此資訊思考的過程。」所謂的「實地研究者」(field researcher)則是「方法論的實用主義者」(Schatzman and Strauss, 1973: 7)，是一位充滿資源、有能力、有創造力、在實地裡有辦法獨立思考的個人。

實地研究的基礎是自然主義，這也是用來研究其他現象（如：海洋、動物、植物等）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包含了在自然情境中觀察一般事物，而非在設計的、發明的、或研究者創造出的情境。研究發生在實地裡，是在安全的辦公室、實驗室或教室以外的場域。Reiss (1992)曾說，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對事件的直接觀察，是社會學作為一種科學最重要的狀態，如果社會學悖離了自然主義，就會威脅到這種狀態。

實地研究者解釋社會意義並且在自然的社會場域中攫取多重觀點。他們進到成員的意義系統內部，然後再回到外在或研究者的觀點。正如Van Maanen (1982: 139)指出，「實地工作代表涉入以及分離，既是忠誠也是背叛，既是開放也是秘密，甚至是愛恨交織。」研究者轉換觀點，從多重觀點同時看待事情：「研究者在所研究的團體文化中建立並維持了成員關係；他們也被另一個文化社會化。」(Burgess, 1982a: 1)

讓我們來看實務的實地研究者如何進行（詳見資訊箱13.1）。研究通常是一個人單獨進行，雖然有時候小組研究是很有趣的。研究者直接進入所研究的社會世界，成為其中一份子，這樣他／她個人的特質在研究中也會發生影響。Wax (1979: 509)指出：

在非正式和量化的方法中，個人的特色傾向不被注意。選擇性的資料處理不去管研究者的年齡、性別或種族。但是，在實地工作中，這些個人認同的基本面向變得很明顯；會強烈地影響實地研究的過程。

在實地裡的直接參與會對研究者產生情緒上的影響。實地研究可能很好玩很刺激，但是也可能打擾了個人生活、人身安全、或心

資訊箱 13.1

實地研究者做些什麼？

實地研究者從事以下事項：

1. 觀察在自然情境中所發生的一般事件和日常活動，除了不尋常的情境外。
2. 直接參與被研究對象的生活，並在實地裡經歷每天的過程。
3. 在維持分析觀點或保持局外人的處境時，仍可獲得圈內人的觀點。
4. 當情境需要時，保持彈性的態度並運用各種技術和社會技巧。
5. 用完整的田野筆記蒐集資料，並以圖表、地圖、或照片提供詳細的描述。
6. 在社會脈絡下，全盤（以完整的單位，而非片片斷斷）且獨立來看待事件。
7. 從實地裡發展出對成員的同理心，而非只是記錄下「冰冷的」客觀事實。
8. 注意文化中外顯的（被承認的、有意識的、說出來的）和內在的（比較不被察覺的、隱含的、不明說的）的面向。
9. 觀察持續的社會過程，但不以局外的觀點打斷或強加其上。
10. 調適高度的個人壓力、不確定性、道德的兩難以及模糊地帶。

理健康。和其他社會研究相比，這種方式更可能重新塑造友誼、家庭生活、自我認同或個人價值：

進行實地工作的代價非常高昂，並非金錢（實地工作比起其他研究要便宜得多），而是在生、心理的影響。這是很重的工作，同時過著兩種生活是很累人的（Bogdan and Taylo, 1975: vi）。

實地研究的計畫步驟

自然主義和直接涉入表示，和量化研究比起來，實地工作是比較有彈性或比較沒有結構的。這讓研究者更要針對實地有組織有準備。這也表示計畫步驟無法完全事先決定，只能提供一個約略的指導（見圖13.1）。

❖ 彈性

實地研究者很少有固定的步驟。事實上，有彈性正是實地研究主要的優點，這可以讓研究者跟著領導人變換方向。好的實地研究者能認出並抓住機會，「跟著聽到的起舞」，並很快地跟著社會情境的流動而調整。Douglas（1976: 14-16）認為實地研究的技術和記者的調查或偵察工作有很多共同點。

實地研究者並不從一組應用或檢驗假設的方法開始，而是選擇一種符合其價值觀的技術來提供資料。在一開始，研究者預期對資料只有一點控制和焦點，當進入情境之後，才集中於調查並控制所

1. 自我準備，閱讀文獻，去除觀點。
2. 選擇實地並接近之。
3. 進入實地，和成員建立社會關係。
4. 選擇一種社會角色，學習風俗習慣，和成員相處。
5. 觀看，傾聽，並蒐集質化資料。
6. 開始分析資料，並概化、評估工作假設。
7. 著重在情境中的特殊面向，並運用理論取樣。
8. 和報導人進行實地訪談。
9. 慢慢脫離並離開該場域。
10. 完成分析並撰寫研究報告。

註：每個步驟所花的時間並沒有一定比例。大約估計，Junker（1960: 12）認為一旦進入實地，研究者應該預期時間分配上約花六分之一觀察，三分之一記錄資料，三分之一分析資料，六分之一報告結果。亦見Denzin（1989: 176）提出的實地研究八步驟。

圖 13.1 實地研究的步驟

要的資料。

❖ 開始組織

在任何研究計畫中，人的因素可能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這在實地研究中尤為重要。實地計畫經常始於某些機會或個人興趣，實地研究者可能因個人經驗而開始研究，像是工作、嗜好、成為病患或行動者。

實地研究者運用仔細觀察、傾聽、短期記憶、和規律的書寫等技巧。在進入實地之前，新的研究者要練習觀察情境中的一般細節並寫下來，注意細節和短期記憶能夠透過練習增強，還有，每天寫日記對於寫田野筆記也是一種很好的練習。

和所有的社會研究一樣，閱讀文獻有助於研究者學習到概念、陷阱、資料蒐集的方法、以及解決衝突的技術。此外，實地研究者也發現透過日記、小說、報導和自傳等，有助於熟悉實地並加強心理準備。

實地研究開始於一般性的主題，而非特定的假設。研究者並不被任何一開始錯誤的概念所綑綁，他／她需要熟悉此主題但也對新的觀念保持開放的態度。要找到在實地裡怎樣問適當的問題需要一點時間。

研究者一開始要掏空自己的心理，去除原有的觀點想法。有兩種「去除焦點」(defocusing)的方法，第一種是把實地拉大以看到更多的情境、人群和場域——在決定哪些要包納進來哪些要排除在外之前，先獲得各種場域的感覺。第二種去除焦點是不將焦點單獨放在研究者的角色上。誠如Douglas (1976: 122)所言，在專業角色之外擴展個人的經驗是很重要的。研究者應該要盡可能離開舒服的研究空間去體驗實地，但前提是不違反作為研究者的承諾。

實地研究另一項準備是對自我的瞭解。實地研究者需要認識自我並反映個人經驗。他／她可以預期在實地中會有焦慮、自我懷疑、挫折和不確定，特別是在一開始，研究者可能會覺得自己蒐集

的資料錯誤、情緒波動、孤立且迷惑。他／她常常在邊緣覺得疑惑：在實地場域中的局外人，但又遠離朋友、家人、及其他的研究者。研究人員相關情緒上的偽裝、個人傳記、和文化經驗，都有助其察覺個人承諾及內在衝突（詳見後續談壓力的部分；亦見資訊箱 13.2）。

實地工作可能對研究者的認同和視野有極大的影響。研究者甚至可能被實地經驗所改造。有些人採用新的觀點、興趣和道德觀，甚至改變其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識型態。Hayano（1982: 148）從其對賭博的研究中指出：

這一次我覺得坐在牌桌前比在會議桌或課堂上感到自在。我大多數的社交生活都集中在玩撲克牌，特別是在大贏一場之後，我經常感到想放棄大學教授的工作，因為想花更多時間在打牌上。

選擇研究場域而後進入

雖然實地研究計畫不依循固定步驟進行，但在早期還是有一些相同要注意之處。包括選擇場域、接近該場域、進入實地、以及和實地裡的成員發展友好關係。

選擇研究場域

❖ 到哪裡去觀察

實地研究者會說到某地或某「實地場域」（field site）去進行研究，但是這個詞經常會有所誤導。所謂場域是事件或活動發生的脈絡，在社會定義下是一種界線會移動的領域。社會團體可能會跨越數個物理上的場域而互動。舉例而言，大學足球隊可能在足球場上互動，也會在儲物間、宿舍、訓練營、或是學校附近學生閒晃的

資訊箱 13.2

在鄉間和西部酒吧的實地研究

Eliasoph (1998) 在加州數個社區進行實地研究，以瞭解美國人是怎樣避免表達政治立場。其一在社會俱樂部，Eliasoph 形容自己是個「都市的、在東西岸活躍的、戴眼鏡的、猶太裔博士候選人，是長期的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自由派、書蟲、空想家、和爭辯者。」。社會俱樂部對她來說是很陌生的。在水牛城的 Silverado 這個俱樂部，是以鄉村和西部音樂為主：

Silverado 在一個巨大的、凹凸不平的停車場中擠成一團，這裡過去曾經是濕地，而現在變成卡車休息站，距離 Amargo (小鎮名) 核子戰艦站一哩半的距離。有時候海水還會蔓延到附近的購物中心和加油站。四輪大卡車停滿停車場，使我的小 Honda 看起來像玩具一樣……在沒有窗戶的 Silverado 裡面，一進門的黑暗讓你只見到南部邦聯的旗子掛在吧台後面，以及啤酒的霓虹燈和啤酒的鏡子閃爍，男人戴著牛仔帽、穿牛仔褲和T恤，女人頭髮燙得捲捲的，穿著蕾絲荷葉邊的裙子或牛仔裙、牛仔褲，皮帶上嵌著她們的名字閃閃發光。(1998: 92)

Eliasoph 自我介紹是一位學生。在她兩年的研究期間，她忍受煙霧瀰漫的房間、昂貴的啤酒和瓶裝水的價格；參加了一場婚禮和許多堂舞蹈課程；並參與無數的對話、聽了許多充滿性別/種族歧視的笑話。她傾聽、問問題、觀察並且在洗手間記筆記。當她在和俱樂部的人相處幾小時候回到家後，雖然戴上學術的桂冠但卻對所研究的世界一無所知。對 Eliasoph 這些人來說，機敏有趣的對話是最重要的，想盡辦法避免無聊。俱樂部裡的人運用大量非語言的溝通更甚過語言，坐在那邊無所事事也沒關係。這個研究逼使 Eliasoph 重新檢視自己以往視為理所當然的觀點和品味。

地方。因此這個隊伍的實地就包括上述五個地點。

實地和研究問題是相關連的，但選擇實地和研究中選定某個「個案」(case)則是不一樣的。個案是社會關係或活動，可以超出實地的界線之外，而和其他社會場域相連結。研究者選擇場域，然後確認在其中所要研究的個案——比方說，足球隊成員和學校的權威圖像有何相關。

選擇實地是很重要的決定，研究者也要記錄下選擇實地過程的筆記。在選擇實地時有三個相關因素：資料的豐富性、不熟悉程度、和適合度。有些實地可以提供比較豐富的資料。場域呈現了社會關係、各種活動的網絡，而與時俱增的各種活動則提供了更豐富有趣的資料。實地研究的初學者應該選擇一個不熟悉的場域，因為在新的場域中比較容易看到文化事件和社會關係。Bodgan和Taylor (1975: 28) 指出，「我們會建議研究者選擇的場域是：其中的主題陌生，是他們並無特別專業知識或長才的」(強調在開始時)。當選擇可能的實地作個案時，必須考慮這些實際的議題，像是研究者的時間和技巧、在場域中嚴重的人際衝突、研究者個人特質和感覺、以及如何接近該場域。

研究者歸因的特質可能會限制了和實地的親近。舉例來說，黑人研究者就不要寄望去研究三K黨或新納粹主義，即使有些研究者曾經成功地跨越藩籬。有時候「圈內人」和「局外人」也可以攜手合作。比方說，局外人Douglas和圈內人Flanagan組成一個研究小組，進行天體營的研究(Douglas and Rasmussen, 1977)；而白人(Rainwater)和黑人(Yancey)也曾合作研究黑人住宅方案(Yancey and Rainwater, 1970)。

物理上接近一個場域可能會是個議題。場域是個連續體，一邊有著開放和公共領域(如餐廳、機場的候機室等)，另一邊則是私人的場域(如私人企業、俱樂部、私人家中的活動等)。研究者可能不受歡迎，甚至有些法令或政治的限制。某些機構(如公立學校、醫院、監獄等)的法令規範也限制進入。此外，機構的審查委

員會可能會因為倫理考量而限制研究者進入。

❖ 守門員

守門員是有著正式或非正式權力足以控制人們進入某個場域的人。可能是角頭老大、醫院警衛、或是企業老闆。非正式的公共領域（像是人行道、公共廁所等）很少有守門人；正式組織則會有正式授權。

實地研究者會預期要和守門員進行協商以便進入。守門員可能根本不在乎你所謂的在距離之外或倫理的考量。研究者則必須有底線以保護研究的完整性。如果一開始就有很多限制，研究者可以之後再重開協商大門，當信任關係建立之後，守門員可能會忘記一開始的要求。在倫理上和政治上有些提醒守門員的技巧。研究者並不期待他們會聽研究者所關心的或研究發現是什麼，除非這些會提供證據讓別人指責他們。

研究者進入一個新的層次或領域時，和守門員打交道是個持續發生的議題。此外，守門員還可以引導研究的方向：

即使是最友善最合作的守門員或贊助者，都會對研究的進行或發展造成影響。某種程度上而言。俗民方法論會和現存的朋友、敵人、領域、裝備的界線交織成一個網絡（Hammersley and Atkinson, 1983: 73）。

在某些場域中，守門員的同意可能會造成一種烙印而抑制了成員的合作。舉例來說，如果監獄內的囚犯知道獄卒同意研究者進來，那他們可能不願意合作。正如West（1980: 35）在其有名的少年犯罪研究指出，「我同意這種接近的途徑幾乎是一種阻礙——在某些例子上是防止——和非行少年關係的建立。」

進入場域的策略

要進入實地場域需要有一些有彈性的策略或行動計畫，協商

進入並和成員建立關係，且決定要透露多少給實地成員以及守門員知道。

❖ 計畫

進入並接近實地是一個過程，端賴常識判斷和社會技巧。實地場域通常有不同層次或領域，每個入口都是一個問題。進入場域比較像是剝洋蔥而非開門，更甚者，就算被同意進入也未必能一直保持如此。研究者需要有腹案或是重新協商，因為研究者特定的焦點可能在研究過程中稍晚才會出現，也可能會改變，最好不要被守門員限定在某個地方活動。

進入的程序可以畫成「接近梯」(access ladder，見圖 13.2)。研究者從最底下一階開始，這時候要接近很容易，而且是以局外人來看一些一般性的公開資訊。下一階需要更接近，開始進行場內觀察時，研究員要變成一個被動的觀察者，不要質疑成員的說法。隨著在實地裡的時間拉長，研究者觀察某些敏感性的特定活動或對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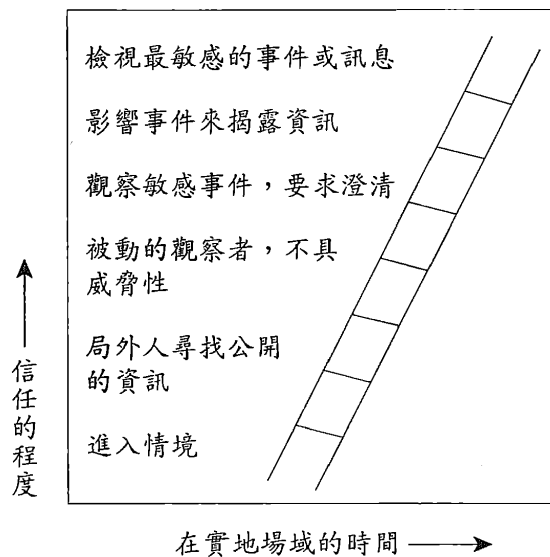


圖 13.2 接近梯

所見所聞提出澄清，要進到這一階比較困難；最後，研究者試圖形成互動以便得到特定資訊，或是想得到高度敏感的資料，這接近梯的最高一階很難達到，而且需要高度的信任關係。

❖ 協商

社會關係是在實地工作過程中協商形成的。協商發生在每個新的成員身上，直到發展出穩定的關係並進入研究場域、發展信任關係、取得資訊、降低敵意反應。研究者期待協商，並在實地裡不斷解釋他／她在做什麼（詳見以下將社會研究一般化的討論）。

要打入邊緣人和菁英份子的群體通常需要特殊的協商過程。要進入邊緣人的次文化，實地研究者通常用研究者的私人身份接近這群人有接觸的社會福利或法律諮詢機構，自願當志工提供服務（例如諮商），以換取進入的機會，或是有機會到這些人出沒的場所，並加入該群體。舉例來說，Harper（1982）藉由住在收留身無分文但深知街頭生活的遊民的教會，以進入該領域。Bart（1987）則認為以她一個女性運動者的背景和其非專業的態度，在進入非法女性主義墮胎診所時是很重要的。

要打進菁英和專業人士的生活圈則需要運氣或私人關係（見Lofland and Lofland, 1995: 12）。Hoffman-Lange（1980）透過家族關係以及私人推薦信取得訪問董事會成員的機會。Ostrander（1984）進入上層社會女性的網絡，是透過學術同僚才有機會和著名的上層社會女性碰面。Danziger（1979）則因為其父親為醫生，所以有機會參加內科醫生的活動。Johnson（1975）提及機構中某人是他太太的朋友，才得以進入社工機構。

❖ 揭露身份

研究者必須決定，關於自己以及研究計畫要透露多少。說出私人生活、嗜好、興趣和背景可能有助於建立信任和親近的關係，但也可能因此失去隱私，而且必須要確保焦點是維持在實地的事

件上。

研究者也要決定研究計畫可以透露多少。從完全保密、實地裡無一人知道這個進行中的研究，到全盤說出、實地裡每個人都知道研究計畫的細節。揭露的程度和時機端賴研究者的判斷和場域的特殊性。也可能隨著時間讓研究者覺得比較安全之後才予以透露。

除非有好的理由，像是守門員因非法理由(如隱藏資料或貪污)會嚴重限制或阻撓計畫，否則研究者會向守門員等透露研究計畫。即使是在這類案例中，研究者可能透露他/她的身份是研究者，但會以看來較不具傷害的角色去探究一些不具威脅性的議題。

進入實地

在選定實地並有機會接近之後，研究者必須學習其風俗習慣、和成員發展關係、在場域中選定一種角色、並維持社會關係。在面對這些議題之前，研究者要問的是：我要怎樣呈現我自己？對我而言，成為「測量工具」有什麼意義？我會遇到何種「不友善的態度」？

❖ 呈現自我

人們會有意無意將自己呈現在他人面前。我們表現出我是誰——我是哪種人或我希望是哪種人——透過生理表現、我們所言、與我們的動作。自我的呈現傳遞出符號訊息，可能是：「我是個嚴肅認真的學生」、「我是個溫暖、關心別人的人」、「我是個很酷的騎師」、或「我是叛逆份子和喜歡參加宴會的傢伙」。可能有多重自我，而在不同場合則表現出不同的自我。

實地研究者對自我在實地裡的呈現要很清楚。舉例而言，他/她在實地裡該如何穿著？最好的是尊重自己也尊重被研究者。不要過度盛裝而侵犯別人或被排除在外，但也不一定要模仿被研究者的衣著打扮。研究遊民的教授不需要打扮成遊民的樣子，衣著和舉止不要太正式就夠了。而如果研究對象是企業總裁或高級官員，則比

較正式的服裝和專業態度就有必要。

研究者要知道自我呈現某種程度上會影響實地關係。要完全改變原來的自己是很困難的。

呈現自我並坦承自己是猶太女性幫助Myerhoff（1989）進入猶太養老院這個實地，而且和院內老人發展出良好關係。同時，她對自我的認同也改變了她在實地裡的互動情形。Stack（1989）則從局外人開始——白人女性研究低收入的黑人加工區，最後，她被所研究的女性接納如同親戚，她的小名「白色卡洛琳」則成為一種被接納的象徵。她幫了很多小忙，像是載人去醫院或福利機構、購物、探視生病的小孩等。她是透過和人互動的方式達成的——她的開放和願意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雖然Anderson（1989）在黑人酒吧中是個黑人男性，他發現社會階級會是一個障礙。他研究的實地是芝加哥市南區一個貧窮黑人社區街角的酒吧和賣酒的小店，Anderson發展出一種信任的社會關係，而被幫忙，他和Herman這位機智、外向、在該場域中關係良好的人成為朋友。Anderson成功的因素是「低調、不堅持我所扮演的角色……在這種實地裡，以不打擾大家同意的社會秩序為原則。」（Anderson, 1989: 19）。

❖ 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

研究者是測量實地資料的工具。這有兩個意涵：第一，研究者有壓力要機敏地察覺在實地裡發生的事，而且要受過記錄資料的訓練；第二，實地工作包含了社會關係和個人感受，實地研究者對於要把哪些納入作為資料並承認主觀洞察和感受，哪些是「實證資料」，要很有彈性。私人的、主觀經驗都是實地資料的一部分，對研究者和解釋實地裡的事件都很有價值。與其試著要客觀並摒除私人反應，實地研究者不如將自己對實地事件的感受轉換成資料。比方說，Karp（1973, 1980）自己對到色情書店的緊張感也是資料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實地裡不舒服的感覺也傳達了該場域的動力過程。「如果不寫自己的反應，我們就無法解釋這些感受，而無法

在不將自己主觀性納進來的狀況下得到融合。」(Kleinman and Copp, 1993: 19)。

實地研究可以提高研究者對自我感受的瞭解，舉例來說，研究者可能並不完全瞭解自己對裸體的感覺，直到他／她進入裸體者的世界，或不瞭解自己所有的東西直到他／她進入一個他人會跟你「借」東西的實地。研究者自己的驚喜、憤怒或疑問，都可能成為反應或自我洞察的契機。

❖ 陌生的態度

要認出我們每天經歷的細節相當困難。我們每天經歷的世界充滿了許多細節，如果隨時要注意這些細節，一定會被淹沒的資訊搞得焦頭爛額。我們處理的方式是忽略周遭許多訊息採用慣性的思考。不幸的是，我們常把許多事視為理所當然，而且假設其他人所經歷的事實也是一樣，我們傾向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自然或正常的。

實地研究在熟悉的環境中比較困難，因為在熟悉的環境中比較盲目。事實上，「和某個文化的親密接觸可能創造出等量的盲目與洞悉」(McCracken, 1988: 12)。藉由研究其他文化，研究者可以在看待事情的重要性以及事情如何進行上有不同的假設。這種對文化的質疑，或稱之為文化震撼，有兩方面的好處：可以比較容易見到文化內涵並引發自我覺知。研究者採取一種陌生的態度可以得到上述好處。所謂「陌生的態度」(attitude of strangeness)表示對一般性的細節以外人的眼光加以質疑、注意。這有助於研究者克服在觀察一般細節時的乏味，也幫助研究者用一種新的方式看待普通的事，而可以揭露出某些在實地裡成員並未意識到的面向。

人們很少承認他們視為理所當然的風俗。舉例而言，當某人給我們禮物，我們會說謝謝並讚美禮物；但相反的，在許多文化中，給禮物的風俗常包括抱怨禮物不適合。陌生的態度有助於讓隱性的文化顯現出來——比方說，給禮物者預期會聽到「謝謝」和「這東

西真棒」，而因此感到很生氣。實地研究者要同時採取外人和圈內人的觀點，外人將事件視為特殊的社會過程，而圈內人則認為理所當然。Davis（1973）稱之為火星人及其他：火星人認為每件事都很奇怪並對假設提出質疑，反之則接受每件事並相信之。研究者需要兩方的觀點，並要有轉換觀點的能力。

陌生觀點也鼓勵研究者重新思考他們自己的社會。處在不同的場域中打破了舊有的思考和行動習慣。他／她發現遇見不熟悉的事物時，只要是用陌生觀點來看，不論是不是熟悉的文化，都會比較容易也比較有密集的反應和自省。

建立關係

實地研究者透過在實地裡和成員相處來建立關係，他／她慢慢形成友善的關係、用同樣的語言、和成員一起哭一起笑。這是朝向獲得成員瞭解、再從瞭解進到同理的一步——也就是說，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來感受事情。

要建立良好關係不一定很容易。社會世界並非總是充滿和諧、溫暖、友善的人，在實地裡可能有恐懼、緊張和衝突。實地裡的成員可能會不高興、不信任、或不真誠，他們可能做了一些干擾或讓研究者很討厭的事情。有經驗的研究者對於事件和關係都會有所準備，然而他／她可能會發現要深入實地或和成員很親近是不可能的。充滿合作、同情很困難，且需要不同的技巧。同時，研究者接受他／她表面上所聽到的，但並非容易被騙。如Schatzman和Strauss（1973: 69）的名言：「研究者同時相信也不相信每件事。」

❖ 魅力和信任

實地研究者需要運用社會技巧和個人魅力以建立關係。信任關係、友善的感覺、和被喜歡可以引發溝通，並協助研究者瞭解他人內心的感受。並沒有什麼神奇的辦法可以做到，表現出對他人慷慨的關心和興趣、誠實以對、分享自己的感覺都是很好的方法，但這

並不簡單，而有賴於特殊的場景和成員。

許多因素會影響信任及和諧關係——研究者如何表現自我；他／她在實地裡選擇的角色；以及鼓勵、限制或讓信任關係無法建立的事件。信任關係不是取得就永遠存在，它是個發展中的過程，因為許多社會的細微差異（如：個人經驗分享、說故事、姿勢的隱喻、面部表情等）會隨著時間建立，是一個持續重新創造的過程，而且要失去比要建立容易。

建立信任關係是很重要的，但並不保證就可取得所有的資訊。某些特定領域可能會受限。比方說，信任關係在財務方面可以建立，但在親密的約會行為就很困難。信任關係在調查的每個領域都需要重新建立，需要不斷地確認。

❖ 出局者（Freeze Outs）

有些成員可能不願開放合作。所謂「出局者」就是那些表達不願合作的態度或明白表示不願參與的人。實地研究者可能沒辦法取得每一個人的合作，溫暖關係也可能只有在長期的堅持下才有辦法發展。

❖ 瞭解

和諧關係能幫助實地研究者瞭解成員，但是瞭解是更進一步的先決條件，而非最後階段。當研究者克服了使用新的或不熟悉的語言和社會意義系統所產生的迷惑之後，才會慢慢發展下去。一旦研究者開始瞭解成員的觀點，下一步就是學習如何以其觀點來思考和行動。這就是「同理心」（empathy），或是採用他人的觀點。同理並不一定表示同情、同意或讚許，代表的是和他人的感受相同。

和諧關係有助於創造瞭解和最終的同理，而同理心的發展則引發了更好的關係。小說《梅崗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在下面的章節中點出了和諧關係和同理之間的連結：

「首先，」他說，「史考特，如果你可以學會簡單的技巧，你就可以和各種人處得來。除非你用其他人的觀點去思考，否則你無法真地瞭解他們。」

「先生？」

「——直到你跟他們變成同樣的人才行。」(Lee, 1960: 34)

實地裡的關係

你在每天生活中扮演許多社會角色——女兒 / 兒子、學生、顧客、球迷——並和他人維持社會關係，你選擇某些角色而其他人在這個結構之中。有些人沒什麼選擇只能扮演兒子或女兒的角色。有些角色是正式的（如：銀行發言人、警長等），有些是非正式的（如長者、好伙伴等）。你可以變換角色，扮演多重角色，用特定方式扮演某種角色。實地研究者在實地裡也扮演某些角色，此外，也學習該場域的風俗並和其他成員維持關係。

實地裡的角色

❖ 現有的 vs. 創新的角色

有時候，研究者套用了現有的角色，某些現存的角色提供了接近該場域各種生活面向的途徑、觀察和與所有成員互動的能力、到處遊走的自由、以及一種可以平衡研究者和成員間要求的方式。而有時候，研究者會創造出新的角色或修正原有的角色。舉例來說，Fine（1987）在研究前青春期男孩時，他創造出一種「成人朋友」的角色，並用一種稍有點權威的方式來扮演，他可以因此觀察到他們那些不為成人所見的文化、行為。要套用實地裡的角色需要時間，而研究者可能隨著時間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實地角色。

❖ 選擇角色的限制

開放給研究者的實地角色會被某些因素和物理條件影響。研究者可以改變某些外在形象，像是衣著或髮型，但無法改變某些因素如年齡、種族、性別和吸引力。這些因素在親近實地時可能很重要，而限制了某些角色。比方說，Gurney (1985) 指出在男性主導的場域中，身為女性需要額外的協商技術以及「激烈的爭吵」(hassles)。然而，這種性別帶來的洞察力以及創造出的情境，在男性研究者身上可能付之闕如。

既然許多角色都是伴隨性別而來，性別就成了一個重要的考量。女性研究者經常在某些危險、卑鄙以及男性主導的場域中（如警界、消防人員等）比較困難。他們可能被排除或被推到有限的性別刻板印象當中（例如：「甜心」、「幸運之星」、「大嘴巴」等）。男性研究者則在男性主導的場域（如法庭、大公司等）中的行政或例行事務部門會有問題，他們可能不被這些傳統上由女性主導的領域所接受。在那些男女兩性共同參與的領域中，則兩性都可以進入且被接納。

❖ 參與的層次

實地角色可以依研究者和成員旁觀或參與的程度而排成一直線。在一端是無關的局外人角色，另一端則是密切參與的圈內人角色。實地角色的範圍可用 Junker, Gans 和 Adlers 發展出的三種系統來說明。

Junker (1960, 亦見 Denzin, 1989, Gold, 1969, 及 Roy, 1970) 描述了四種角色的範圍。從「完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 意即研究者在單面鏡後面，或是扮演一種看不到的角色，像是偷聽者)，到「觀察者一如參與者」(observer as participant, 意即研究者在一開始就表明身份，但接觸有限)，到「參與者一如觀察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 意即研究者是隱性的，且和參與者是朋友

關係)，最後到「**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即研究者就像成員一樣，並和圈內人分享私密的資訊)。這個分類和 Gans (1982) 所提出的很類似，他將中間兩類合併為「**研究參與者**」(researcher participant)。他強調研究每個階段中的依附 / 情緒涉入或解離的程度。

Adler和Adler (1987) 則建議三種角色。「**外圍成員關係**」(peripheral membership) 表示在自我和被研究者之間維持距離，或是因為研究者的信念或不舒服而和成員的活動設立界線。「**主動成員關係**」(active membership) 是當研究者設定某種成員角色並進入類似的誘導，而像一個成員般參與其中。研究者維持高度信任，但在一段時間後也可以撤出實地。「**完全成員關係**」(complete membership) 則是研究者轉變角色並表現得很自然。作為完全承諾的成員，研究者和其他人經歷相同的情緒，必須離開實地後才能轉變回研究者。

實地研究者參與的層次有賴和成員的協商、實地的特性、研究者個人舒服與否、以及在實地裡套用的特定角色。許多人從局外人變成圈內人需要花很多時間。每個層次都有優缺點，不同的實地研究者提倡不同層次的參與，舉例來說，Adlers的完全成員角色就被某些人批評為過度涉入而失去研究者的觀點。有些人則認為這是唯一可以真正瞭解成員之社會世界的方法。

在局外人那一端的角色減低被接納、視過度和諧的關係為一種議題、但有時候也能幫助成員開放心胸。他們引發疏離並保護研究者的自我認同，研究者覺得像是邊緣人，雖然這樣比較不會有視為理所當然的風險，但研究者比較無法得知圈內人的經驗，也可能詮釋錯誤。

要真正瞭解被研究者的社會意義，實地研究者必須像其他人一樣參與在實地當中。Holy (1984: 29-30) 觀察提出：

研究者並不是觀察研究主體的生活，而是融入其生活中觀

察……透過和被研究對象一起生活……研究者在主動參與社會生活的過程中分享相同的意義……這樣的研究表示在所研究文化中的社會化。

相反的，在圈內人那一端的角色則引發同理和成員經驗的分享。有些可以達成完全體驗成員的社會世界這個目標，然而，有的也可能缺乏距離、過度同情、或過份涉入成員生活。研究者的報告可能會被質疑、資料蒐集困難、對研究者本身可能有戲劇性的影響、也可能難以獲得進行分析所需要的距離。

❖ 其他考量

幾乎每種角色都有限制而只能接觸到實地的某些面向，比方說，酒吧中調酒師的角色對於其他地方顧客的行為或表現所知就有限。實地研究者要小心選擇角色，也要知道每個角色都有其交換條件。

大多數社會場域都包含有派系、非正式的團體、社會階層和敵對。角色可以幫助研究者被接納或被排除在派系之外，被當作權威人士或扯後腿的人，也可能變成某些成員的朋友或敵人，研究者以所套用的角色出現，他／她可能會形成聯盟和敵人，對研究有所助益或阻礙。

學習風俗習慣

研究者在實地裡學習風俗習慣的同時，就是在學習如何因應個人壓力、如何使社會研究正常化、以及如何表現得像個「可接受的無能」。

❖ 壓力

實地工作可能是高度報酬的、興奮的、有成就感的，但也可能是很困難的：

實地工作總可以列舉出一些不被同意的活動。通常是不方便的，至少可以說有時候是生理上的不舒服，常常很尷尬，而且總是很緊張（Shaffir 等，1980: 3）。

新的研究者要面臨尷尬、經歷不舒服的感覺、而且被實地裡的細節所淹沒。舉例而言，備受尊崇的實地研究者 Rosalie Wax（1971），在針對美國二次世界大戰間對日裔美國人所設的集中營之研究指出，她經歷過華氏 120 度的高溫、骯髒破舊的生活環境、痢疾和蚊子，她覺得孤立無援、經常哭泣、因為暴飲暴食而胖了 30 磅。在實地裡待了幾個月，她覺得自己完全失敗；不被其他人所信任，而且和集中營的管理者吵架。

要維持「邊緣人」的狀態是很有壓力的，要作一個不完全參與的局外人很困難，特別是當研究情境充滿張力（如：政治活動、宗教對話等）時。實地工作的孤立可能和想發展關係和同理結合在一起，導致過度涉入。研究者可能會不自覺地失去了專業研究人員的角色，而完全變成被研究對象的一份子。研究者也可能對於被研究者不再防衛，使研究者得以學習他們一些私密的細節而感到罪惡，因而過度認同被研究的成員。

在實地研究中情緒壓力的產生是無可避免的，研究者與其壓抑這些情緒反應，不如敏感到這些情緒反應。研究者在可以藉由寫日記、寫下自己的內在情緒記錄、或是和實地以外的人聊聊來因應這些壓力。

❖ 將社會研究正常化

實地研究者不只在實地裡觀察成員，也被成員所觀察：「當實地研究者在進行對他人的研究時，其他人也正在研究這位研究者」（Van Maanen, 1982: 110）。正如 Max 所言，實地工作不是由單獨個體所完成，而是由在實地裡的每個人共同創造。

在公開的實地研究中，成員在一開始通常都對研究者的出現感

到不舒服，大多數人不知道實地研究是怎麼一回事，搞不清楚和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諮商師、以及社工員的差別在哪。他們可能會視研究者為外來的批評者或間諜、救世主或無所不知的專家。

公開的實地研究者必須要將「社會研究正常化」(normalize social research)——也就是說，幫助成員重新定義社會研究，從某種不知道且具威脅性的東西變成某種正常且可預測之事物。研究者可以透過呈現自己的傳記、一次解釋一點實地研究的意思、表現出不具威脅性、或接受在實地裡細微偏差(如官方規則有點違法)等來幫助成員統整這個研究。舉例來說，在針對社工員的研究中，Johnson (1975: 99-104) 在社工員瞭解他能接受他們的細微偏差(如：提早下班去游泳)，並且在Johnson說他認為其他人也這麼做之後，就能接受研究者了。

另一種使研究正常化的方式是將之用成員能理解的方式來解釋。有時候，成員對於會被寫進某本有用的書感到很興奮，如Fine和Glassner (1979) 以及LeMasters (1975) 的發現，在其針對威斯康辛酒店鄰里的研究中，LeMasters在五年間變成一個一般人，每個禮拜到酒吧幾次。他(1975: 7) 說明如何對成員解釋他在做的事：

我一開始設定一個顧客的角色——只是另一個喜歡喝上幾杯、射射飛鏢的人。這卻愈來愈困難，因為我花在酒吧的時間開始讓人感到有問題。稍後我知道有些常客認定我一定是州烈酒管理委員會的人來此探聽……當我在酒吧中開始被質疑時，我就採用了這個角色：為了成為老師必須擁有各種關於美國社會知識的社會學家，而我發現這些在沙漠中的人，對於瞭解藍領階層的人對美國社會的感受很有幫助，甚至，我開始對一直以來和白領階級的人合作感到厭煩，而這種在酒吧中的接觸令人耳目一新。上述所言均為事實。

❖ 可被接受的無能

研究者在實地裡是來學習，而非一個專家。因為場域的不同，研究者表現出友善而天真的局外人姿態，是一種可被接受的無能狀態，來此的興趣在於學習實地裡的社會生活。所謂「**可被接受的無能**」(acceptable incompetent)就是某人在實地裡只有部分能力(技術或知識)，但他/她不具威脅性、需要被教導，因而被接受。正如Schatzman與Strauss(1973: 25)指出，「研究者應該放低專家的身段，或任何對此主題所擁有的知識；研究者也必須表現出像個學習者，讓人沒有意願想去評量此人的行為。」

實地研究者在一開始可能對實地或次文化所知不多，他/她看起來可能像個傻瓜，容易被騙，也可能因為他/她對實地的缺乏知識而被取笑。即使研究者有足夠的知識，他/她也要表現出缺乏資訊而需要攫取成員的知識。當然，研究者可能會做得太過火，表現出的無知讓人們不把他/她當一回事。

維持關係

❖ 社會關係

隨著時間過去，實地研究者會發展並修正其社會關係。一開始很冷淡的成員也可能會慢慢熟絡起來，也可能一開始很友善，但恐懼和懷疑則慢慢浮上表面。研究者處在一種如履薄冰的位置上。在計畫早期，當對實地還不那麼熟悉時，因為環境會改變，所以研究者沒辦法形成很親密的關係。然而，一旦他/她發展出親密的友誼，這些人可能成為研究者的聯盟，助其親近實地。

實地研究者要監看自己的行動是如何影響實地成員。舉例而言，外表很有吸引力的研究者與異性的實地成員互動可能會引發一見鍾情、調情、或嫉妒。研究者要有所察覺這些實地關係並加以安排。

除了發展社會關係以外，實地研究者必須有辦法突破心防或從關係中撤回。要打破和特定成員間的連結才能和他人建立關係，或探索場域中的其他面向。如同在友善關係的這一端，社會退縮所帶來情緒上的痛苦可能對研究者及成員都有影響。研究者必須在社會敏感及研究目標間取得平衡。

❖ 舉手之勞

在實地裡會有交換關係的產生，會有些舉手之勞、挑戰或尊敬在此交換。研究者可能藉由幫了一些小忙而被接納。這種交換在有敏感性議題而不易接近的實地裡會有幫助。研究者可以提供小惠，但不要求成員回報而造成其負擔。當研究者和成員分享經驗，在下次見到對方時，會回想起接受幫助而願意接受研究者。比方說，Fine (1987: 242) 在他扮演成人朋友的角色中，幫點小忙（如：開車帶小孩看電影）後就獲得很多。

❖ 實地裡的衝突

爭吵、衝突、不同意等都可能在實地裡發生，研究者研究的對象可能是位置對立的群體。在這種情境下，研究者會感受到選邊的壓力，而且會被測試是否可信賴。在這些地方，研究者通常保持中立，在兩方間戰戰兢兢。這是因為一旦他／她被一方劃為同黨，就無法接近另一方的人。此外，研究者也可能因此只從一方觀點來看事情。然而，有些人（如 Van Maanen, 1982: 115）認為真正的中立並不存在，當研究者被當成一份子，並捲入關係和承諾的網中，要維持中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 表面上的興趣

實地研究者在實地裡維持一種「表面上的興趣」(appearance of interest)。有經驗的研究者會透過口語和行為（如面部表情、參加聚會等）表現出對實地裡事件的興趣並參與其中，即使他／她未

必真的有興趣。這是因為如果研究者表現出很無聊不感興趣的樣子，實地關係可能會因此而中斷。這種短期的參與是一種涉入日常生活的小手段，也是藉此表示禮貌。

當然，選擇性不注意（即：不直視或出席但不注意）也是某種禮貌的表現。如果某人犯了社交上的錯誤（例如不小心措辭有誤、放屁等），有禮貌的方法就是加以忽略。選擇性的不注意也會用在實地工作中。這給機警的研究者一個機會學習怎樣偷聽或私底下觀察事情的發生。

❖ 社會障礙

社會障礙會發生在兩個文化傳統或社會的假設無法融合在一起時。「障礙」(breakdowns) 強調的是社會意義，因為隱藏的例行性期待和假設在這種障礙中變得很明顯。當某些可以依循的社會規則是隱性的，就可能會產生誤解或混淆。舉例來說，我進去某間餐廳、坐下、等待服務人員出現，經過20分鐘還沒有人來服務，我開始生氣。環顧四周都沒看到有人在服務，而我看到有人帶著自己的食物進來，才瞭解是我誤會了。我隱性的期待是該餐廳有人來服務；但事實上，這是個自助式小館。一旦瞭解這種脈絡中的規則，我就可以解決這種障礙。

這種障礙會產生尷尬，因為文化意義的錯誤配對常常會讓一個人看起來很愚蠢、無知或搞不清楚狀況。比方說，你受邀參加一個八點開始的宴會，你穿著平常的牛仔褲、皺皺的襯衫，在通常八點的宴會開始的時間——八點半到達。門開了，你進入會場，很驚訝地發現，其他人都衣著正式，坐在正式的餐桌前，大概30分鐘前就開始用餐了，所有人瞪著你，你覺得無地自容。你的文化期待（這是個非正式的學生宴會，音樂很大聲、跳舞、啤酒和非正式的打扮）和情境無法配合（這是個正式的晚宴，大家期待用餐、參與有禮貌的對話、表現出很專業的樣子）。這個障礙讓那些沒有說出來但期待「大家都知道」的社會規則或假設變得很明顯。

這種障礙可能是未預期的，也可能是有意創造出來測試研究假設的。在俗民方法論者的經驗中，研究者可能破壞社會規則以證明隱性規則的存在與其重要性。研究者觀察不在計畫中的障礙，或是創造某種障礙，然後觀察反應，以強調隱性的社會期待。

觀察並蒐集資料

這一節要討論的是如何得到好的質化實地資料。實地資料是研究者所經歷、記得、以田野筆記記錄下來、而後可以進行系統性分析的資料。

觀察和傾聽

❖ 觀察

大多數研究者做的就是實地裡注意、觀看、並仔細傾聽。他們運用所有的感官，注意所看到、聽到、聞到、嚐到或摸到的。研究者變成一種吸收所有資訊來源的工具。

實地研究者小心地審視物理情境以攫取其氣氛。他／她會問：地板、牆壁、天花板是什麼顏色？房間有多大？門窗在哪邊？家具怎樣擺設，狀況怎樣（新的或舊的，骯髒或乾淨等）？房間用哪種燈？有任何標示、圖畫或植物嗎？聽起來聞起來怎樣？

為什麼要專注在這些細節上？你或許注意到商店和餐廳經常用某種燈光、顏色和音樂來塑造某種氣氛，或許你知道二手車銷售員把一種新車的味道灑在車內，或大賣場內經常可以聞到新鮮餅乾的味道。這些潛藏的、無意識的符號都會影響人類行為。

在實地研究中的觀察通常是很細緻的工作。Silverman (1993: 30) 指出，「如果你到戲院看一部動作片，你會發現自己是個很好的觀察家。」取代快速閃過的畫面，想要瞭解細節的動機油然而生。好的實地研究者會被細節所吸引，然後透過仔細傾聽和觀察，

揭露出「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實地研究者相信社會生活的核心是透過世俗的、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來溝通。這是人們經常看得太嚴重、但實地研究者需要學習怎樣去注意的部分。

除了物理性的環境，實地研究者也觀察人和動作，注意每個人的物理特質：年齡、性別、種族、身材。人們會因為對方是18歲、40歲或70歲、男性或女性、白人或其他種族、高矮胖瘦等而有不同的社會互動。當注意到這些特質，研究者就被算在內了。舉例來說，陌生的態度會升高某個團體種族組成的敏感性，研究者在一個多種族的社會中，如果因為自己是白人而忽略了團體中種族的組成，那就是他／她的族群敏感性不夠。類似的還有「當在研究過程中參與者的性別被忽略，就是研究者性別敏感度不夠。」（Eichler, 1988: 51）

研究者記錄這些細節因為有些重要的事情可能因此被發現。與其忽略掉某些隱藏的重要訊息，寧可將每件事都記錄下來。舉例來說，「一位19歲、高大健壯的白人男孩，進入一個明亮的房間，看見一位60幾歲、矮矮胖胖的黑人女性坐在一張搖椅上。」這樣比「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坐著。」透露更多訊息。

實地研究者記錄下物理特徵像是乾不乾淨、衣著和髮型，因為這些都透露出一些會影響社會互動的訊息。人們花很多時間和金錢在選擇衣服、適合的髮型、化妝、刮鬍子、熨衣服、以及噴灑香水，這都是自我表現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些不梳洗打扮的人也由外表傳遞出一些符號訊息。沒有人的衣著打扮是「平常的」。這句話告訴我們研究者如果不是以外人的眼光來看事情，就是對社會記號太過遲鈍。

人們所做的事也很重要。實地研究者注意人們是坐是站、他們行經的路線、和他們的非語言溝通。人們透過非語言的溝通，包括姿勢、臉上的表情、以及坐姿或站姿（站得直挺挺的、彎腰駝背地坐著等）來表達社會訊息、感覺和態度。人們也藉著在群體中的位置和眼神的接觸來表達關係。研究者則可以藉由注意人們站立的距

離、看來放鬆的態度、和眼神的接觸來瞭解人們的社會性溝通。

實地研究者也要注意事件發生的脈絡：誰在場？誰當時正抵達或離開？房間是否又熱又擁擠？這些細節能幫助研究者斷定意義並瞭解事件發生的原因。如果沒有注意到，想要全盤瞭解事件時，就會遺漏掉這些細節。

❖ 傾聽

實地研究者要對句子、語氣、錯誤的文法仔細聽，要聽說話的內容和說的方式，或者暗示性的內容。舉例而言，人們常用一些詞像是「你知道的」、「當然」或「等等」，實地研究者必須知道這些詞背後的意義。他／她試著聽到所有細節，但是當很多人一起說話或是偷聽時要聽清楚就很困難。所幸，重要事件通常會重複發生。

❖ 行話 (argot)

互動的人們在一段時間之後會發展出彼此共享的符號和專有名詞。他們創造新的字眼或賦予一般字眼新的意義。新的字眼在重要事件、假設或關係發展出來。知道並使用這些語言可以區分出某種次文化的成員。實地研究者學習這種特殊的語言，或行話。

研究者必須從前提開始，認識到實地裡使用的字眼或符號可能有其特殊意義。他們也必須調和這些新的字彙，並瞭解這些研究者原先熟悉的字在脈絡中的意義。(Bogdan and Taylor, 1975: 53)

實地研究者找出這些行話怎樣套用在社會關係或意義中。這些術語給研究者一些線索瞭解哪些對成員是重要的、以及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舉例來說，Douglas (1976: 125) 發現在天體營的研究中「虎視眈眈」這個字，在成員中表示某些男人故意坐在漂亮的裸體女人附近。

Katovich與Diamond (1986) 關於度假小屋的銷售研究中，當

研究員之一被雇用而其他人還在受訓時，他們在六個月期間觀察並進行非正式的訪談。他們分析認為接待室是個舞台，在此呈現一系列活動以刺激顧客並以專業術語來討論。舉例而言，當財務經理進來銷售員時就會「降價」(drops)，而銷售員和潛在的買主在討論時也會「洩漏」(drops) 相關資訊。這種在特殊場合發生的事件其目的在刺激買氣。一般的內線交易有：公司買了20個某樣東西，但公司只需要15個，其他就可以用便宜價錢賣出；顧客財務困難，則其財產被降價拍賣；或只有少數人可以用優惠價格買到某產品。

實地研究者必須在實地術語和局外人的觀點間來回穿梭。Spradley (1970: 80) 提供一個例子，是他在引用所研究的「都市遊民」時說的話，「如果一個人沒有和警察打過交道，那他就不算是流浪漢。」這個意思是：一個人如果不曾因為在公共場所喝醉被捕，而在看守所過夜過（即「和警察打過交道」），都不算是這個次文化的一份子（即「流浪漢」）。研究者在實地裡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她可能會覺得用這些行話很自在，但要注意的是不要太快就開始用這些話以免看來很愚蠢。

田野筆記

大多數實地研究的資料都來自田野筆記。好的田野筆記是實地研究的基礎 (Fetterman, 1989)。完整的田野筆記可能包含有地圖、圖片、照片、訪談、錄音帶、錄影帶、手記、來自實地的東西、在實地裡隨手寫的文字、以及離開實地後詳細記錄的資料等。實地研究者可能會預期寫滿好幾本筆記本或佔去電腦不少的記憶體。他／她花在記筆記的時間可能比待在實地還多。有些研究者在3個小時的觀察中就可以生產出40頁寫得滿滿的筆記。透過練習，即使是實地研究的新手，在實地裡的每個小時都可以寫出好幾頁的筆記。

記筆記常常是很無聊的、冗長的工作，需要很多自我訓練。筆

記中要包括記憶中詳實的細節描述，研究者要在一離開實地就趕緊記錄筆記，並將之變成每天的習慣。筆記要很整齊、有組織，因為研究者會一再重複閱讀。一旦寫下來了，這些記錄就是私人而有價值的。研究者要小心對待這些資料並維護其保密性。成員有權利保持匿名，研究者經常在筆記中使用「假名」(pseudonyms，偽造的名字)，田野筆記可能用來與政黨敵對、用來勒索、或提供官方合法使用，因此一些研究者都用代碼記錄田野筆記。

研究者的心理狀態、關注的層面、以及實地的條件都會影響田野筆記。他／她在寫田野筆記之前可能會花短短的一到三小時在實地裡。Johnson (1975: 187) 明白指出：

觀察記錄的量和質隨著實地工作者放鬆或疲累的感覺、對特定事件的反應、和其他人的關係、喝的酒量、仔細觀察的數量等而改變。

❖ 田野筆記的類型

實地研究者用很多種方法記筆記。在此推薦的只是（亦參考資訊箱 13.3）建議。完整的田野筆記有很多形式或層次。以下描述五種層次。最好是將同一段時間所觀察的筆記記錄在一起，但不同類型的記錄寫在不同頁。有些研究者會將觀察的推論用不同顏色或框框標示出來。各種不同類型的筆記品質也不一樣。比方說，在實地裡 6 個小時可能會產生 1 頁隨手寫下的筆記、40 頁的直接觀察記錄、5 頁研究者的推論、以及 2 頁有關方法學、理論以及個人的想法。

隨手筆記 在實地裡幾乎不可能好好地作筆記。即使是大家都知道的觀察者在公共場合猛抄筆記看來也很奇怪。更重要的是，低下頭寫字時，研究者就無法觀察注意發生的事情。要分給記筆記的注意力事實上是來自實地的觀察，特別的場域決定有沒有辦法在現場記筆記。研究者可能有辦法書寫，而成員也對此有所期待，或者

資訊箱 13.3

對記錄田野筆記的建議

1. 在每一段實地之後盡快記錄筆記，在還未將觀察記錄下來之前不要和其他人說話。
2. 每一段田野筆記都從新的一頁開始記錄，上面標明日期、時間。
3. 只有很短時間可記錄時，記錄下一些關鍵字詞、最先或最後發生的事。
4. 留白處多留一些，以便隨時可以增加東西上去。如果事後記起任何事情，再回去加入筆記中。
5. 把筆記有計畫地分類，並把不同層次的筆記分開來，這樣未來易於回頭檢視。
6. 以事件發生的順序加以記錄，並記下發生的時間長短（如：等待15分鐘、騎車1小時）。
7. 筆記盡量具體、完整、清楚。
8. 清楚分段、運用引號。能精確記憶的句子用雙引號，而解釋意義的用單引號。
9. 把當時看來不重要的對話或例行公事記錄下來，以後可能會很重要。
10. 「筆隨意走」，想到什麼很快記錄下來，不要擔心寫錯字或想法天馬行空。假設沒有人會看到你的筆記，但記得要用假名。
11. 不要完全以錄音帶取代田野筆記。
12. 將實地的圖片或地圖放進來，並指出在觀察期間你和其他人的動作。
13. 在筆記中加入研究者自己說的話和行為。並將感覺和自己的想法另外寫下來。
14. 避免評價性的摘要字眼。與其說「水槽看起來好噁心」，不如說「水槽都生鏽了，看起來好像很久沒清理了。裡面的晚盤、殘渣

看起來好像堆好幾天了。」

15. 過一段時間就重新閱讀一次田野筆記，並將重新得到的想法記錄下來。
16. 一定要有備份，放在其他安全的地方、上鎖，以避免火災發生。

他／她必須秘密進行（例如到洗手間去記錄）。

「**隨手筆記**」(jotted notes)是在實地裡隨手寫下來的。內容都很短、是短期記憶攫取的一些字、段落、或不經意的素描，經常是寫在任何隨手抓到的東西上（如餐巾紙、火柴盒等），可以和直接觀察的筆記相結合，但不能取而代之。

直接觀察的筆記 實地資料基本來源是研究者在離開實地後所寫下的筆記，是事後可以增加的。這些筆記要依照每次進入實地的日期、時間、地方來排列。是很詳細的描述，將研究者所聽所見具體地寫下來。盡最大的可能將所有字、句或動作記錄下來。

研究者的記憶會隨著練習而增進。新的研究者很快就可以記得實地裡所說的話。口頭的字眼要用雙引號和釋義加以區分。對話的附加（非語言的溝通、介係詞、音調、速度、音量、姿勢）也要記錄下來。研究者要將說的話照實記下來，不要加以改寫；包括不符文法的用語、俚語、和錯誤（如：寫下「我要肥家了，小莎」，而非「我要回家了，莎莉」）。

研究者要將具體的細節寫入筆記中，不可加以摘要。舉例來說，與其說「我們在談運動」，研究者不如寫「Anthony在和Sam及Jason爭論，他認為Cubs隊會贏得下禮拜的比賽，因為他們多了個短跑健將，Chiappetta。他也認為這一隊比大都會隊要好，因為大都會隊的內野手比較差。他舉上個禮拜的比賽為例，Cubs以8比3贏了波士頓隊。」研究者在此寫出當時有誰在場、發生了什麼事、在哪裡、什麼時候、在哪種情境下發生的。新的研究者可能認

為「沒什麼重要的」而不會記下這些，有經驗的研究者則可以在「沒什麼重要的」情境中知道，這也可以透露很多訊息。舉例而言，成員可以在瑣碎的對話中將感覺和經驗歸類為風俗民情。

研究者的推論筆記 實地研究者聽成員的話是為了要「感同身受」(climb into their skin) 或「設身處地」(walk in their shoes)，這包括三個步驟。研究者先傾聽，不加以分類；他／她將所聽到的和其他時間所聽到的、別人所說的加以比較；然後研究者才將自己的詮釋或推論套用進來解釋其意義。在一般的互動上，我們同時作這三個步驟，然後很快就進入推論。實地研究者要學習不加推論和詮釋地觀察和傾聽，這些不帶推論的觀察就是「**直接觀察的筆記**」(direct observation notes)。

研究者在另一頁將推論記錄下來，這對直接觀察是很重要的。人們是看不見社會關係、情緒或意義。他們會看到特定的物理動作、聽到人們說的話，然後會用文化背景知識、來自脈絡的線索、以及所做所言來賦予其社會意義。舉例而言，我們無法看到「愛」或「憤怒」，可以看到聽到的是特定的動作（臉紅、大聲、不雅的姿勢、討厭的動作），從而得到推論（這個人在生氣）。

人們通常以自己所見所聞為推論社會意義的基礎，但不一定總是正確。比方說，我的姪女邀請我一起去買風箏，在收銀台的店員微笑問她，她和「老爸」（看著我）今天想要放怎樣的風箏。店員觀察我們間的互動，推論是父／女關係，而非叔／姪關係。店員看到聽到的是男性成人和女孩子，但是她對這種社會意義的推論是錯誤的。

研究者持續在直接觀察之外進行社會意義的推論，因為行動並非總是表現出意義。有時候，人們會試圖欺騙他人。比方說，一對沒結婚的男女進去汽車旅館，登記為Smith先生和太太。更常見的是，社會行為很模糊或有多重意義。舉例來說，我看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都是二十幾將近三十歲，從一輛車出來，然後一起進入一家餐廳。他們坐下來，點餐，用急促的聲音嚴肅地討論著，有時候身

體往前傾以便聽清楚對方的話，當他們起身要離開時，女人臉上看來很難過，幾乎要哭出來，男人很快地抱她一下，然後他們一起出去。我見到的是一對夫妻要分手、兩個朋友在討論第三人的問題、兩個人在討論其配偶的外遇、或是兄妹在討論剛過世的父親？「**獨立推論**」(separation of inference)可以讓我們重讀直接觀察的筆記時找出多重意義。如果研究者並未單獨記錄下推論的意義，則可能會喪失其他存在的意義。

分析筆記 研究者在實地裡要決定怎樣繼續進行下去。有些行動是有計畫的(如：進行訪談、觀察特定活動等)，而有些則是臨時發生的。實地研究者在分析筆記時要時時記住方法論的想法，用來記錄其計畫、技巧、倫理和過程中的決策、以及對自己技術的評價。

實地研究在資料蒐集的階段就要納入理論，當研究者檢視實地資料時也要加以澄清。分析筆記對研究者試圖賦予實地裡的事件社會意義是有價值的。他/她藉由將概念、建立假設、建立連結、和發展新的概念間的結合去思考這些筆記的意義。

「**分析備忘錄**」(analytic memos)是理論筆記的一部分。這是理論的系統跳脫，研究者可以藉由重新閱讀、思考這些摘要來深入地詳盡說明，在實地裡拓展想法，修正或發展更複雜的理論。

個人筆記 如前所述，個人感受和情緒反應會變成資料的一部分，並讓研究者在實地裡更清楚。研究者將這些筆記像日記一樣記錄下來，他/她將自己的生活事件和感覺記下來(「我今天很緊張，我想是不是因為我昨天和XX吵架」；「今天這種陰沈的天氣讓我頭痛了一整天」。)

個人的筆記有三種功能：可以提供研究者一個出口，抒解壓力；是一種個人反應的資料來源；事後重讀這些筆記時，可以讓研究者評估其直接觀察或推論。比方說，如果研究者在觀察時心情很好，可能會以正面方式解讀所觀察到的事情(詳見圖 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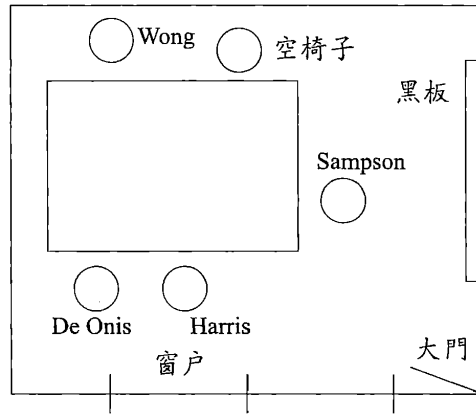
直接觀察	推論	分析	個人筆記
<p>10月4日，星期天 Kay的咖啡店，下午 3點。 高大過胖的白人男性 ，約40幾歲，進來店 裡。他穿著暖和的咖 啡色套裝。他一個人 ，坐在第二桌。Kay 過去問他，「要啥？ 」那人說，「先給我 黑咖啡」。Kay走開 然後他點了一支煙， 開始看菜單。3點15 分時，Kay打開收音 機。</p>	<p>Kay今天原本 似乎很友善， 活潑，但變得 嚴肅而機警。 我認為她很緊 張時就會開收 音機。</p>	<p>自從搶案發生 後，女性在男 性單獨進來時 就會開始緊張 。</p>	<p>今天下雨，我 覺得和Kay在 一起很舒服， 不過今天蠻無 聊的。</p>

圖13.3 田野筆記的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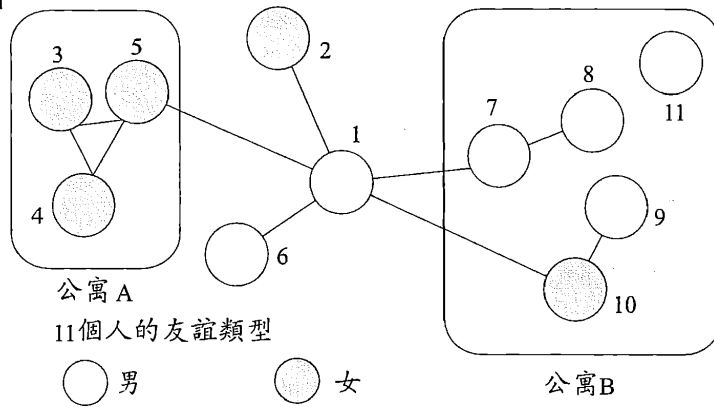
❖ 地圖和圖畫

實地研究者經常會製作地圖或對實地裡的情境畫一些圖。這有兩個目的：幫助研究者組織在實地裡發生的事件，並有助於對其他人瞭解實地。舉例而言，研究者觀察一個酒吧有15個圓板凳，可能畫15個圓圈來簡單記錄一下（如：「Yosuke進來坐在第12個凳子上；Phoebe已經坐在第10個凳子上」）。實地研究者發現有三種地圖很有用：空間的、社會的、以及時間的地圖。第一種有助於資料定位；後兩種則是資料分析的初步形式。「空間地圖」（spatial map）指出有哪些人、設備等等地理上的物理空間，以顯示事件發生的地方（圖13.4A）；「社會地圖」（social map）顯示有哪些人、多少人，他們之間的權力、影響力、友誼、職業等等的狀態（圖13.4B）；「時間地圖」（temporal map）則顯示人、事物、服務、溝通或程序的來來往往（圖13.4C）。

A. 地理地圖



B. 社會地圖



C. 時間地圖

Buzz的酒吧每天的狀況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開門10:00	老酒鬼	老酒鬼	老酒鬼	老酒鬼	缺席 或 早退	去釣魚
5:00	足球 觀眾	鄰居和 橋牌之 夜	壘球隊 (男性之夜)	年輕 客人	音樂大 聲, 各 種客人	沒有約 會的客 人
關門1:00						

圖 13.4 實地研究中所運用的地圖類型

❖ 增進記憶的機器錄音

錄音機和錄影帶在實地研究中有補充性的幫助。但他們不能取代田野筆記或研究者在實地裡的出現，也不能被介紹給實地裡的成員，只能在研究者已經建立良好關係之後使用。錄音機和錄影帶對於所發生的事可以提供幾近相同的記錄，而且可以保存給其他人檢視。也幫助研究者回想和觀察哪些事件曾經發生哪些沒有，或是沒有反應，這就很容易被漏掉。然而，這些項目造成中斷並增加被觀察者的覺知。依賴這些工具的研究者必須注意相關問題（如：確定電池有電而且有足夠的空白帶）。此外，重聽或重看這些帶子可能很花時間。舉例來說，可能要花超過100小時去聽實地裡50小時的錄音。錄音帶的逐字稿謄寫則很昂貴又不一定正確；沒辦法完全涵蓋一些隱藏的意義或喃喃自語。

❖ 訪談筆記

如果研究者進行實地訪談（後續討論），他／她就要將訪談筆記另外記錄。除了記錄問題和答案外，他／她還可以用「首頁」（face sheet）放在筆記的第一頁，包含有日期、訪談地點、受訪者特質、訪談內容等等資訊。這能幫助訪問者再重新閱讀和解釋這些筆記。

資料品質

❖ 品質的意義

在實地研究中，「高品質的資料」（high-quality data）是什麼意思？研究者又要怎樣才能取得這些資料。對量化研究者來說，高品質的資料是信效度高的；可以給所有研究者精確、一致、客觀的測量事實。而詮釋的方法則提出不同的資料品質說。與其假設有單一、客觀的事實，實地研究者在社會脈絡中採用成員的主觀來詮釋

經驗。成員認為的真實都是來自社會互動和詮釋。因此，高品質的實地資料抓住這個過程並提供對成員觀點的瞭解。

實地研究者並不是從主觀觀點來抓取質化資料，而是質化資料包含了研究者主觀的回應和經驗。質化的實地資料是研究者在成員的社會中所融合和真實經驗的詳細描述。

❖ 實地研究的信度

實地資料的信度是為了回答以下問題：研究者在觀察成員或實地事件時，是不是有內外在一致性？「**內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指的是資料對所有知道的人或事件是不是真實的，去除掉一般欺騙的形式。也就是說，這些片段是不是可以湊成完整的圖像？舉例來說，某人的行動在不同時間、不同社會脈絡下是否一致？

「**外在一致性**」(external consistency) 要透過確認或交叉分析他人的觀察和不同來源的資料以達到。也就是說，這是不是在任何脈絡下都符合？舉例而言，其他人是不是能辨認研究者對某人的觀察？是否有其他資料可以證實研究者的觀察？

實地研究中的信度也包括那些有所預期但沒有說沒有做的事，這些遺漏或無意義的資料可能很重要但很難偵測到。舉例來說，當觀察收銀員結束工作時，研究者發現在某個抽屜的錢他沒有算到，他／她可能只有在其他收銀員會作這個動作下，才會注意到這個遺漏。

實地研究的信度有賴研究者的洞察力、覺知、懷疑和問題。他／她從不同角度看成員或事件(合法性、經濟的、政治的、個人的)以及在心裡問這些問題：那些錢是哪來的？那些人一整天都在做什麼？

實地研究者必須依賴成員告訴他們的資料。這使得成員的信用和他們的說法都成為信度的一部分。要檢查成員的信用，研究者會問：這個人有理由說謊嗎？他在這個位置上是不是知道這件事？他

的價值觀會不會形塑他所說的內容？他說這些是不是為了要取悅我？有沒有什麼會限制他說實話？

實地研究者在評估可信度時會將主觀性和脈絡情境納進來考慮。他們知道人們的說法和行動會被主觀觀點所影響，各種說法都是由特定觀點所形成，並且會依個人經驗而染上不同色彩。與其評估每個說法是否為真，實地研究者不如去找出這些說法本身是不是有用。即使是不正確的陳述和動作，從研究者的觀點都可以發現一些事情。

如前所述，行動和說法都是在出現的脈絡下形成的。在某個場合說的在另一個情境下可能不一樣。比方說，當問到「你跳舞嗎？」某人在充滿頂尖舞者的公共場所可能會說不會，在另一個會跳舞的人比較少、不同音樂的半公開場合下，他可能回答自己會跳舞。這並非該成員在說謊，而是答案是由情境應運而生。

其他對信度的阻礙包括誤導研究者的行為：錯誤的資訊、遁詞、掩護。「**錯誤的資訊**」(misinformation)是因為生活的不確定性和複雜度而造成不經意的錯誤。舉例來說，醫院的護士說出「醫院的官方政策」，但實際上並沒有這種行諸於文的政策。

「**遁詞**」(evasions)是有意避免或不提供訊息。一般的遁詞包括不回答問題、答非所問、轉移話題、或故意模糊焦點。舉例而言，當話題談到用電話女郎來吸引消費者參加說明會時，推銷員感到很不自在，他說，「嗯，很多人都用這一招。」但事後當他一個人時，經過仔細的詢問，這位推銷員可能會卸下武裝，承認他的確用過這種策略。

「**謊言**」(lies)就是故意誤導或提供假的觀點。比方說，一個黑幫份子告訴研究者假名、假的地址、或教會的牧師提供新進會眾的曲線圖以顯示其成功。Douglas (1976, 73)指出，「在我所知的所有研究情境中，說謊是很普遍的，不論在成員或研究者間，特別是對成員來說非常重要的事情。」

「**掩護**」(fronts)是學習而來的謊言和欺瞞。他們包括運用

靠山和勾結者。舉例而言，酒吧常常是非法聚賭之處，酒吧表面上是合法地賣酒，但真正的生意只有在小心調查之後才會知道。常見的例子是聖誕老公公——這是對小朋友們的一種說詞。

❖ 實地研究的效度

實地研究中的效度是研究者分析資料後，是不是可以真實呈現實地裡的社會世界。信度並不是一種標準，因為實地研究實際上不可能複製。實地裡的必要面向會改變：社會事件和脈絡會改變、成員會增減、研究者本身會改變。研究正確性有四種效度或檢驗：生態效度、自然歷史、成員效力、以及夠格的圈內人表現。

「生態效度」(ecological validity) 是研究者所描述的社會世界和成員的世界符合的程度。所描述的自然場景有沒有受到研究者的出現或研究程序所打擾？如果事件未受研究者出現所影響，就是此研究計畫有生態效度。

「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 是詳細描述研究如何進行。完整並公平地說明研究者的行動、假設、和其他人評估的程序。一個研究計畫在自然歷史上要有效，就是一個不相關的人來看也能接受實地的情境以及研究者的行動。

「成員效力」(member validation) 是研究者將實地結果帶回去給成員檢視，由他們來評斷適當與否。如果成員認可並瞭解研究者的描述能夠反映其私密的社會世界，那此研究的成員有效性就存在。成員有效性有其限制，因為在場域中衝突的觀點會導致不同意研究者的觀察，而如果不偏袒某一方，這方的成員可能會反對研究結果。此外，成員也可能因為研究描述不是站在成員的觀點或不符合其目的，而不贊同研究論述。

「夠格的圈內人表現」(competent insider performance) 則是一個非成員能夠如同成員般有效地互動或是通過某些情境。這包括能夠說也能瞭解圈內人的笑話。一個有效的實地計畫能夠提供足夠的實地裡社會生活的氣味和充分的細節，讓局外人的舉止也可以像

成員一樣。這個的限制是你不可能知道所有情境的社會規則，同時，也可能因為成員比較客氣不願意指出錯誤，使局外人容易過關。

聚焦及取樣

❖ 聚焦

實地研究者一開始先取得一般的圖像，然後才集中焦點在某些特殊問題或議題上（見圖13.5）。研究者只有在進入實地、開始有第一手經驗後，才決定特殊的研究問題並發展假設。首先，每件事好像都相關，然後，選擇性的注意力就會集中在特定問題上。

❖ 抽樣

實地研究的抽樣和調查研究不同，雖然有時都用滾雪球法（詳見第八章）。實地研究者透過從所有可能的觀察中，選取一些比較小的、有選擇性的場景來觀察，這被稱為「理論取樣」(theoretical sampling)，因為是透過研究者發展的理论指導來抽樣。實地研究者選取時間、情境、事件類型、場地、人的類型、或有興趣的脈絡。

舉例來說，研究者透過在不同時間觀察同一場景來挑選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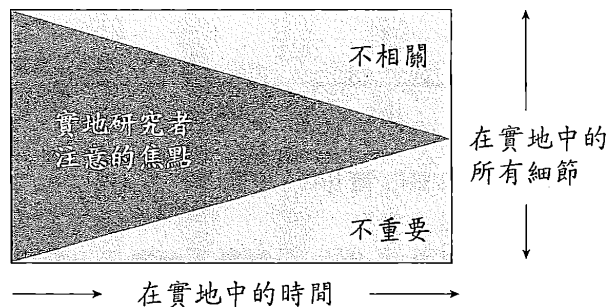


圖13.5 實地研究中的聚焦過程

他／她對某場景觀察一整天、整個星期、整季，以瞭解其全貌，是維持一致或有改變。在抽樣時最好有重疊的時間（如：抽取上午7點到9點、上午8點到10點、上午9點到11點等）。

研究者要抽取不同地點的樣本是因為某個定點可能可以得到深入但狹隘的觀點。處在不同地點能幫助研究者得到該場域的全貌。舉例來說，學校教師同儕間的行為常常發生在教師休息室，但也可能在酒吧的聚會或在教室中開會。此外，研究者要追蹤成員在各個不同地點的路徑。

實地研究者透過集中注意力或是和不同人（老成員和新來的人、年長和年輕的、男性女性、領導者和追隨者）互動來進行人的抽樣。當研究者確認了有哪幾種人之後，他／她會試著和各種人互動並瞭解他們的模式。

舉例來說，研究者抽取三種實地事件：例行性的、特殊的、以及不在預期中的。例行性事件（如：商店開門做生意）是每天發生，但不應該因為他們是例行性的不被重視。特殊事件（如：辦公室年度宴會）則是事先宣布並計畫的，他們會使會員注意力集中，並顯示出一些平常不易見到的事件。非預期的事件是那些只有在研究者出現時才會發生的事（如：當經理生病沒上班，一整天不能在店裡，而出現不被監督的員工）。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會看到某些不尋常、不在計畫內、或巧合碰到的事。

實地研究訪談

到目前為止，你已經學到實地研究者如何觀察和記錄筆記。他們也會和成員進行訪談，但實地訪談和調查研究的訪談不同。以下章節就將介紹實地訪談。

實地訪談

實地研究者運用非結構性、非指導性的深度訪談，這在許多方

面是和正式調查研究訪問不一樣的（見表 13.1）。實地訪談包含問問題、傾聽、表現出有興趣的樣子、以及記錄下所說的內容。

實地研究是研究者和成員共同生產的產物。成員主動提供其內在洞察、感覺、和合作，在揭露主觀意義的討論過程中是很重要的部分。「訪員的出現和涉入的形式——他／她傾聽、參與、鼓勵、打斷、離題、開始一個話題、結束反應的方式——對回應者的反應是完整的。」（Mishler, 1986: 82）

表 13.1 調查訪談 vs. 實地研究訪談

典型的調查訪談	典型的實地訪談
1. 有很清楚的開始和結束。	1. 開始和結束並不清楚，訪談可以過一陣子再重拾話題。
2. 以同樣順序問所有受訪者相同的問題。	2. 所問的問題和順序都可為某人或情境量身訂做。
3. 訪問者一直保持中立。	3. 訪員表現出對答案有興趣的樣子，以鼓勵更深入的答案。
4. 訪員問問題，受訪者回答。	4. 像是友善的對話，交換資訊，但是有比較多的訪問問題在內。
5. 訪問幾乎都是一對一單獨進行。	5. 可以是在團體或在某個區域，隨情境改變。
6. 有專業的語調以及公事化的焦點；如有岔題則予以忽視。	6. 訪談穿插了笑話、離題、故事、逸事等，也都記錄下來。
7. 常見封閉式問題，極少追問下去。	7. 常見開放式問題，也常有追問的動作。
8. 訪員獨自控制訪問的方向。	8. 訪員和成員共同控制訪談的方向。
9. 忽視訪問發生的社會脈絡，並假設這所造成的差異不大。	9. 訪談的社會脈絡會被記錄下來，在解釋答案的意義時被視為是很重要的。
10. 訪員試圖將溝通型態放入標準的架構中。	10. 訪員會調整自己，習慣成員的規則和笑聲。

資料來源：改編自 Briggs (1986), Denzin (1989), Mishler (1986), Spradley (1979a)。

實地訪談有很多其他說法：非結構式、深度、民族誌、開放式、非正式以及很長的訪談。一般而言，這種訪談有很多人參與其中、是在實地發生的、是非正式且非指導式的（即：受訪者可以將訪談導向很多方向）（見Fontana與Frey, 1994）

實地訪談包含了相互的經驗分享。研究者可能會分享自己的背景以建立信任感，並鼓勵報導人開放心胸，但不會強迫回答或引導問題。研究者鼓勵並指導這個互相發現的過程。

在實地訪談中，成員用他們平常說話、思考、和組織現實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研究者以自然的形式保留成員的笑話和敘述的故事，而不會用標準的形式重述一遍。焦點是在成員的觀點和經驗。為了要貼近成員的經驗，研究者用具體的實例或情境來問問題——比方說，「你能不能告訴我導致你六月辭職的原因是什麼？」，而不是「你為什麼要辭職？」

實地研究在一段時間內發生許多次。研究者從建立關係開始，先避開評論或高度敏感的主題。他／她在親密關係建立之前避免深入探究內在感覺，在關係建立之後，研究者才會期待有所瞭解。在幾次聚會後，他／她才可能深入比較敏感的議題，之後的訪談，研究者可能會回到先前的話題，用一種不帶批評的語氣，要求澄清以前的答案——舉例來說，「上一次你告訴我，自從他們減薪之後，你開始從店裡帶東西回家，是這樣嗎？」

實地調查是一種「演說事件」，比起刺激／反應這種在調查研究訪問中常見的模式（詳見第十章）要更接近朋友間的對話。你很熟悉朋友間的對話，有非正式的規則和以下元素：(1)打招呼（「嗨，很高興看到你」）；(2)並沒有很明顯的主題或目的（我們不會說：「讓我們來討論我們上禮拜做的事」）；(3)不會一直重複（我們不會說：「你能不能再澄清有關……」）；(4)問問題（「你有看昨天那場比賽嗎？」）；(5)表現興趣（「真的？我真希望當時我在那裡！」）；(6)表示忽略（「不，我錯過了，發生了什麼事？」）；(7)輪流，以平衡相互的對話（不會是都由某人問問題，

由另一個人回答問題)；(8)簡化(「我錯過了Derby那場，但是我會去Indy那兒」，而不是說「我錯過了Kentucky Derby競賽，但是我會去參加Indianapolis 500哩汽車賽」)；(9)當沒有人贊同時，會出現短暫的沈默；(10)結束(我們不會說「讓我們結束對話吧」，而是在離開前會有些口頭上的表示——「我得回去工作了，明天見」)。

實地訪談也別於朋友間的對話，它有明確的目的——瞭解報導人和該場域。研究者會提出解釋或要求，這和朋友間的對話不同。舉例而言，他/她可能會說，「我想問你有關……，」或是「你能不能看一遍這個，確定我寫的對不對？」實地訪談是比較不那麼平衡的，大部分的問題是研究者在問，他/她會選擇哪些有興趣哪些略過。同時，也包含重述，或是請成員詳述口頭上不太清楚的簡化。

實地研究訪談者會注意標記。所謂「標記」(marker)在實地訪談中指的是「受訪者對重要事件或感覺陳述時提及過去的參考資料」(Weiss, 1994: 77)。舉例而言，在和一位45歲的醫生訪談時，受訪者不經意地提到高中時有學習障礙，「大概是我姊姊發生嚴重車禍的那段期間」，他以前可能從未提及他姊姊或車禍的事。用這種方式提出來，受訪者指出這是那段期間的重要事件。研究者應該要緊記這種標記，之後還要提出來問，「你先前提到你的姊姊發生一場嚴重車禍，你能不能再多解釋一些？」更重要的是訪員要仔細聽。他/她不要一直打斷、重述而要結束受訪者的談話、提供協助(如：「噢，就好像某人一樣」)、堅持要結束某個受訪者才剛開始回答的問題、在訪談期間堅持搶回主控權、或是堅持朝某個方向而忽略了新的發展(見Weiss, 1994: 78)。

生命史

生命史、生命故事、或傳記式訪問都是實地訪談中一種特別的類型。這和口述歷史有重疊之處(詳見第十四章)。這些過去的故事

事有多重目的，可能形塑訪談的形式（見Smith, 1994）。在生命史的訪談中，研究者訪問並蒐集某人生活的資料，通常是那些很老的人。「『生命故事』（life story）的概念用來標明那些回溯的資料本身，而不需要像『生命史』（life history）通常需要明確的證據」（Tagg, 1985: 163）。研究者問開放式問題來瞭解人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往。故事的正確度不如故事本身來得重要。研究者知道受訪者可能會對過去重新建構或增添一些解釋；人們可能會「重寫」（rewrite）自己的故事。主要目的是得到受訪者如何看待／記憶過去，而不只是某些客觀的事實（詳見資訊箱13.4）。

研究者有時候會在問到不同時間地點所發生的事情時，用到生命故事方塊，這由各種類別所組成，像是遷徙、職業、教育、或家庭事件，以每12年為單位。研究者經常會在訪談外輔以實物（例如老照片），而在訪談過程中出示這些東西以刺激討論或蒐集更多資訊。「生命史的撰寫可當成一種實證的練習，要充實許多資料：信件、文件、訪談等。」（Smith, 1994: 290）。McCracken（1988: 20）舉一個例子說明在訪談中輔以實物可以幫助他瞭解人們在訪談時看到這些東西會有何反應。面對一位75歲的老婦人，在她的客廳進行訪問時，McCracken一開始想到客廳中有很多具有文化意義的東西，在老婦人解釋了每件東西的意義之後，就很清楚得知她視這些東西為紀念品。這個房間是其重要生命事件的博物館，只有在作者用新的方式來看待這些東西，他才開始不將這些家具、物件視為沒有生命的，而是散發出重要意義的東西。

有時候，研究者發現在某個資料館中存有某人的資料；有時候則必須大肆搜尋文件甚至自創一個資料館。保存這些文獻資料是件巨大的工程，是在謹慎的訪談、分類、並組織那些資料之後要做的事。訪談和文獻資料共同形成生命史的基礎。

實地訪談中的問題類型

實地研究者在實地訪談中會問三種問題：描述性的、結構式

資訊箱 13.4

生命史或生命故事訪談

生命史或生命故事訪談通常包含二至六個開放式的訪問，通常記錄60至90分鐘。這些訪談有幾個目的，第一，可以幫助報導人在訪談中重新建構其生命的記憶。用口述的故事重新述說和記憶一個人的生命事件能有處遇性的意義以及傳遞個人智慧給下一代；其二，這些訪談能夠在生命週期、自我發展、以及人們經歷的事件中創造出新的質化資料，加以保存而增添類似資料（例如在南邁阿密大學的生命故事中心就是這種資料館）；第三，生命故事訪談能夠提供訪員對另一個人的生命有一種深入的看法，這通常會豐富經驗、創造親密的個人關係、並鼓勵增加個人統整的自我反映。過程中步驟如下：

1. 研究者準備背景資料的閱讀、加強訪談技巧、和報導人聯絡、得到許可進行訪談、並保證匿名性。
2. 研究者進行一系列的訪談，加以錄音或錄影。訪員支持報導人任何過去的歷史、給予完全的尊重、總是對他人所說的話表現出真誠的興趣。他/她提出開放式問題，但很有彈性而且不強迫要回答哪個問題。訪員表現像是個引導者，知道何時該問什麼問題就會引出某個故事；表現出高度專注、完全不加以批判而予以支持。訪員經常要提供照片或東西以幫助引發過去的記憶和感受。
3. 研究者用四個步驟將所錄音的訪談謄寫下來：(a)準備每卷錄音帶的摘要；(b)謄寫逐字稿，盡量不加以編輯（例如：添加句子、分段落等）以及標明方向（如笑聲、咳嗽等）；(c)檢查整篇逐字稿確定意義無誤後，開始進一步編輯和小幅度重組；以及(d)讓報導人閱讀逐字稿，加以更正和修改。
4. 研究者送一封感謝信給報導人，準備對主要議題加註，並且/或者將此資料送到資料館。

的、以及對照的問題。這些會一起問，但是每種類型會在研究過程中不同階段而有不同的出現頻率（詳見圖 13.6）。在初期，研究者基本上問一些描述性的問題，他／她慢慢增加一些結構式的問題，直到中期開始進行分析之後，就開始大量地問問題。對照式的問題在實地研究中開始出現，到整個訪談結束前會越來越多。

研究者問「**描述性問題**」(descriptive question) 以探索該實地並對成員有所瞭解。描述性問題可以是關於時間空間的——舉例來說，「浴室在哪裡？」、「貨運車什麼時候會到？」、「禮拜一晚上發生什麼事情？」、「開幕式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是關於事物：「你什麼時候用了軍刀鋸？」、「你在從事緊急排水工作時會帶什麼工具？」這些問例子或經驗的問題都是描述性問題——比方說，「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說明你所謂的大日子是什麼？」、「你過去擔任郵務士的工作經驗怎樣？」描述性問題可以問假設的情境：「如果一個學生在考試時打開書本，你會怎麼處理？」。另一種描述性問題問的是成員對某情境的特殊用語：「你會怎麼稱呼副警長？」(答案是「副座」)。

研究者花了一些時間在實地、並開始分析資料之後，就會運用「**結構式問題**」(structural question)，特別是用範疇分析（詳見第十五章）。這在研究者將特殊的實地事件、情境、對話組織入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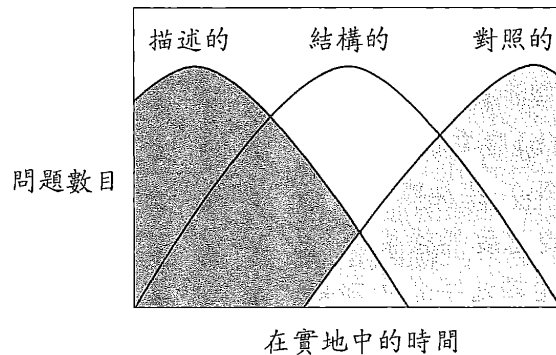


圖 13.6 實地研究訪談的問題類型

的類別時就會開始進行。舉例而言，研究者對於高速公路休息站餐廳的觀察發現，餐廳員工會非正式地將在休息站用餐的顧客加以分類，在初步分析中，他／她創造了各種不同顧客的類別，並記得以結構式的問題來確認這些類別。

一種安置結構式問題的方法是，去問成員某種類別是否涵蓋了那些研究者已經確認以外的元素——比方說，「除了常客、老油條、蜻蜓點水者、以及賴著不走者以外，還有其他種類的顧客嗎？」除此之外，研究者也會問些確認性的問題：「老油條是你所服務的顧客中的一種嗎？」、「你會不會稱某個很……的顧客為老油條？」、「蜻蜓點水者這種顧客會點全餐嗎？」

「**對照性問題**」(contrast question)是建立在以結構式問題來確認的基礎上。問題的焦點在於區別不同類別元素的相似、相異性：「你似乎有一些不同型的顧客，我有聽到你稱呼一些人是「常客」，一些人是「蜻蜓點水者」，這兩者之間有哪裡一樣？」、「賴著不走者和老油條之間的差別是不是老油條不給小費？」或是「有兩種顧客只是進來上洗手間的——全家人和一個男的。兩種你都稱之為蜻蜓點水者嗎？」

報導人

實地研究中的報導人或主要行動者是那些實地研究者與之發展出關係以及那些在實地裡談話、提供訊息的人。哪些人是好的報導人？理想的報導人有四個特質：

1. 報導人完全熟悉該文化，並處在某個可以全盤見證重要事件的位置，才會是好的報導人。他／她身處於該文化，不需思考就能參與其中之例行公事。個人在此文化中有許多年的親密經驗，而不是一個新手。
2. 目前正參與實地之中的報導人。舊的成員或許能夠反映實地，提供有用的洞察，但他們離開直接的參與愈久，他們就愈需要重新

建構其蒐集的資訊。

3. 可以花時間和研究者在一起的人。訪談可能要花好幾個小時，有些成員就是沒辦法接受密集的訪問。
4. 非分析式的人可能是比較好的報導人。非分析式的報導人熟悉並運用自然的民俗理論或實際的常識。這和分析式的成員是相反的，他們會事先分析場域、運用來自媒體或教育的分類。即使是經過社會科學研究教育者可以學到非分析的態度，但只有在他們把所受到的教育擺到一邊，而採用成員的觀點才成。

實地研究者可能對報導人做了數卷錄音帶的訪問。對照那些提供有用觀點的報導人的錄音帶，不論是新手或老手、事件核心人物或邊緣人物、最近改變狀態（例如升遷）和維持原狀的人、挫折或有希望的人、快樂或懷疑的人、負責的領導人或追隨者。實地研究者在他／她訪問了許多報導人之後，預期會出現各種混合的訊息。

訪談脈絡

實地研究者也承認，在辦公室的對話可能不會在鬧烘烘的餐廳出現。通常，訪問是在成員的家裡進行，這樣他們會感覺比較舒服，但這並非總是最好的。如果成員會分心或沒有隱私，研究者會移師到另一個場域（如餐廳或大學研究室）進行。

訪談的意義是由其**完形**（Gestalt）或研究者及成員在特殊脈絡下的互動所形成的。舉例而言，研究者記錄下非語言的溝通形式（如：聳肩、姿勢等）是會增添意義的：

調查者應該要記錄下那些不會在訪談錄音帶本身出現但很重要的事實，另外錄音、錄影或寫下筆記。在場域中詳細的筆記、參與者、時間、持續的社會或儀式事件等，應該要以研究者對互動的觀點來加以補充（Briggs, 1986: 104）。

離開實地

在實地裡的工作可能持續數星期到數年不等。不論是哪一種，在實地裡某種程度的工作終會結束。有些研究者（如Schatzman和Strauss）認為，當理論建構完成或到達終點時，結束的時間自然會來臨；其他人（如Bogdan和Taylor）則認為實地工作可以無休無止繼續下去，因此堅定地終止關係是有必要的。

有經驗的實地研究者會預備抽離實地的過程。依著參與的密集度和在實地裡的時間長短，這個過程對研究者和成員雙方都可能是很痛苦的。研究者在離開實地時可能會經歷到打破親密友誼的痛苦，他／她在離開前後或許會有罪惡感並感到沮喪。他／她可能會因為個人或情緒上的糾葛而發現不容易釋懷，如果在實地裡的涉入是很密集而長期的，且實地場域異於研究者原本的文化時，他／她可能需要花好幾個月來調適，才會置身自己的文化而感到自在。

一旦研究者決定離開——因為研究計畫自然結束、缺乏更多的學習、或是外在因素迫使結束（如工作結束、守門人命令研究者離開等）——他／她就會選擇一種方式離開。研究者可以很快速地離開（某一天就不再出現）或是慢慢撤出，在數個星期間慢慢減少其參與。他／她也需要決定如何告訴成員還有要提出多少進一步的忠告。

撤出的過程依據實地場域以及發展的關係而不同。一般而言，研究者並不預留很多時間讓成員知道，他／她完成過程中的討價還價或承諾以留下一個乾淨的結束。有時候，像是告別晚會或和每一個人握手這種儀式，能成為告知成員分離的符號。有時也可能繼續維持與成員的關係，這多被女性主義研究者所採用。

實地研究者很清楚離開會對成員造成影響。有些成員可能會因為一段親近的社會關係結束而感到受傷或被拒絕。他們可能會藉著試圖將研究者拉回實地、讓他／她更加成為成員中的一份子，也可能表現出憤怒憎恨的反應。他們可能會真正感覺到研究者是局外人

而變得冷淡且有距離。不論是哪一種，實地工作在未完全離開實地之前都不算結束。

實地研究中倫理的兩難

實地研究者在社會生活中，與他人的直接交涉會引發許多倫理的兩難。當研究者單獨置身實地，沒有很多時間去作道德的決策時，這種兩難就會出現。雖然他／她可能在進入實地之前就清楚一般的倫理議題，但這些兩難會在觀察以及互動過程中不經意地出現。我們將會檢視實地研究中的五個倫理議題：欺騙、保密性、與偏差者交涉、有權力者和出版實地報告。

欺騙

在實地研究中，欺騙會以多種形式出現：可能隱瞞研究的進行；以假身份、姓名、認同等出現；或在某些方面誤導成員。在欺騙中最受爭議的倫理議題是隱瞞或公開實地研究。某些學者（Douglas, 1976; Johnson, 1975）支持並認為這是要為了進入社會生活的某些領域並取得豐富的資料所必須採取的手段。其他人（Erikson, 1970）則反對，認為這是摧毀研究者和社會間的信任。雖然其道德狀態有所存疑，但有些實地或活動卻只能秘密進行研究。

研究者並不偏好秘密的研究，也不比公開研究來得容易，因為要一直待在最前線以及持續面對被發現的恐懼並不容易。正如 Lofland 與 Lofland（1995: 35）指出，「在面對自然研究的倫理兩難時，我們相信具有道德敏感性、深思熟慮以及有知識的調查者，會對於隱瞞研究是否合理有最佳的判斷。」

保密性

研究者都知道，最親近的知識來自信任關係。他／她有道德義務要維持資料的保密性。這包括不將資料透露給實地裡其他人知

道，以及不在田野筆記中顯示出成員的姓名。

與偏差者交涉

研究者進行的實地研究對象是參與非法行為的偏差者時，更會面對額外的兩難。他們知道，甚至有時候也涉入非法活動。Fetterman (1989) 稱之為「罪惡的知識」(guilty knowledge)。這些知識不僅對警方有利也對其他偏差者有利。研究者面對和偏差者建立信任與關係的兩難，因此不會過度涉入以避免破獲自我的道德標準。通常，研究者會和偏差者有些明確的協議。West (1980: 38) 明白指出：

我指出我並不希望主動參與有被害人的犯罪活動（如偷竊、傷害），認為這些行為並不值得我去冒險或是我自己感到厭惡：我拒絕了這些機會。雖然有時候我會意外陷入這些有被害人的犯罪事件，也獲得相當珍貴的資料，我還是尊重自己的意願，同時也會提醒自己，那種不舒服的感受可能會引起我的主觀性。

有權力者

實地研究者傾向研究那些在社會中沒有權力的人（例如：街友、窮人、兒童、以及科層體系中的低階工作者等）。有權力的菁英能拒絕被接近並且具備有力的守門員。研究者可能因為忽略了有權力者而被批評，但他們也被有權力者批評為總是偏向無權力者。Becker (1970c) 用「可信度的階層」(hierarchy of credibility) 來說明，說的是那些研究偏差者或組織內低階層的人常被視為是一種偏差，而有權勢的人就被視為是可靠的。在階級化的團體或組織中，大多數人假設在頂端或接近頂端的人有權去定義事情進行的方式，有比較寬廣的視野，處在可以做事情的位置上。因此，「偏好公務員的社會學家就會被指控有所偏差」(Becker, 1970c: 20)。當

實地研究者融合在較沒有權力者的世界，並瞭解其觀點，他們就表達了鮮為人聽到的觀點。他們或許會被指為偏差，因為他們發出一種這個社會不易聽到的聲音。

出版實地報告

研究者所取得以及報告出來的私密的知識，會在隱私權和知的權利間造成一種兩難。研究者不可以出版成員的秘密、破壞其隱私、或傷害其名譽。但是，如果研究者完全無法出版任何可能會侵犯或傷害某人的資訊時，某些研究者取得的知識可能永不見天日，而如果隱瞞一些細節，則研究報告也很難取信於人。

有些研究者建議，要求成員檢視報告的正確性，並取得印行的同意。對邊緣族群（如用藥者、妓女、成癮者）來說，這可能沒辦法做到，但研究者一定要尊重成員的隱私。另一方面來說，檢查制度或自我檢查也可能有危險。真實但不公平的資料只能在從研究者的觀點來看是非常重要時，才能出版，這是在研究位置上的一種妥協。

結論

在本章你學到了實地研究及其過程（選擇實地場域、進入、在實地裡的關係、觀察並蒐集資料、實地訪談等）。實地研究者在資料蒐集階段就開始進行分析及理論化。

你現在可以說，實地研究者在開始研究就直接涉入實地，並融入自然情境中。進行實地研究通常比其他種研究對研究者的情緒、個人生活、自我感受有更大的影響。實地研究不易進行，但這是一種研究社會世界的方式，否則並不易獲得瞭解。

當研究者是研究一小群人在當下的互動時，實地研究是最強而有力的。對微視或小群體面對面的互動很有價值，而當關注的是鉅視面或社會結構時較不具效用。對發生在過去的事件來說幾乎是無

用的。下一章要談的歷史比較研究，在調查這些關注的焦點時較佳。

重要名詞

可被接受的無能	接近梯	分析摘要
表面上的興趣	行話	陌生的態度
障礙	夠格的圈內人表現	對照性問題
去除焦點	描述性問題	直接觀察筆記
生態效度	民族誌	俗民方法論
外在一致性	首頁	實地場域
出局者	掩護	守門員
自然化	罪惡的知識	可信度的階層
隨手筆記	生命史訪談	標記
成員效力	自然歷史	自然主義
社會研究正常化	假名	獨立推論
結構式問題	詳實的描述	

問題回顧

1. 芝加哥學派發展的兩個主要階段為何？又何謂記者和人類學家的研究模式？
2. 請列舉出實地研究者要作十項工作中的五項。
3. 為何對實地研究者來說，在開始進行實地工作之前先閱讀相關文獻是很重要的？
4. 指出實地場域的特質，以確定這對實地研究初學者是個好的場域。
5. 「自我呈現」會怎樣影響實地研究者的工作？
6. 何謂陌生的態度？有何重要性？

7. 在選擇實地裡的角色時有何考量？研究者涉入實地的程度能有怎樣的改變？
8. 指出三種確認質化實地研究資料的方式。
9. 比較實地研究與調查研究訪談間的差異，以及實地訪談和朋友間的對話有何不同？
10. 田野筆記有哪些不同種類、不同層次？每一種的目的為何？

歷史比較研究法

導論

歷史比較研究法簡史

適合歷史比較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量化研究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詮釋研究

獨特的歷史比較取向

歷史比較研究計畫步驟

調查主題概念化

確認證據

評估證據之品質

組織證據

綜合資料

撰寫報告

歷史脈絡中的資料與證據

歷史證據的類型

次級資料之研究

初級資料之研究

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的類型

比較的單位

跨文化研究的資料

西方文化的偏誤

歷史比較研究中的同義字

同義字的重要性

同義字的種類

倫理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社會學的解釋有必要以歷史觀之。因此歷史的社會學不是某種特殊的社會學，而是訓練中所必須學習的。

——Philip Abrams，歷史社會學，第2頁

不具比較觀點的思考如同未曾思考。對所有科學思索及科學研究而言亦然。比較這回事，隱性或顯性地滲透在社會科學家的工作中，而且從一開始即是如此，我們不應感到訝異。

——Guy Swanson, “Framework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p.145

導論

十九世紀的古典社會思想家，像是Emile Durkheim、馬克斯、以及韋伯等，這些人建立了社會科學的基礎，運用的是歷史和比較的方法。這種方法在社會學某些領域中很常被使用（如：社會變遷、政治社會學、社會運動、與社會層級等），也在許多其他領域被應用（如：宗教、犯罪學、性別角色、族群關係、家庭等）。雖然許多社會研究著重於國家中當下的社會生活，近年來歷史以及／或比較研究亦愈來愈常見。在Randall Collins（1986: 1346）的文章「1980年代是社會學的停滯期嗎？」中指出，「毫無疑問地，過去幾十年是歷史與比較社會學的黃金時期。」

歷史比較社會研究是一種技術和方法的集合。有些來自傳統的歷史，有些則從量化社會研究延伸而來。正如Calhoun（1996: 310）所言，「歷史的社會學家可能會運用各種技術來蒐集、分析資料。本章的重點是各種將歷史時間以及／或跨文化的變異視為中心的社會研究——也就是說，將所研究的對象當成歷史洪流的一部分，並放在文化脈絡的情境中來看。

歷史比較研究法簡史

在十九世紀社會學的先驅開始進行歷史比較研究（Historical-comparative, H-C research）。早期的歷史比較是社會學、史學、政治科學、以及經濟學的分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歷史比較研究開始和社會學分家。比較的研究愈來愈多是由人類學家進行，而歷史研究則由史學家進行。當其他人朝向實地研究時，實證主義形塑了大多數社會學家的思考。社會學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50年代間，開始進行小型的歷史比較研究，然而還是有少數例外。Marc Bloch, George Homans與Robert Merton，以及Karl Polanyi都在這時期進行歷史比較研究而有廣泛的影響。

二次大戰後，學者在比較研究上的興趣，隨著國際間的互動日增、殖民帝國的摧毀、以及美國獲得世界領袖的角色而有所增進。有些運用結構功能學派重要的研究出現在1950年代；包括有Robert Bellah的「德川的宗教」(Tokugawa Religion, 1957)以及Neil Smelser的「工業革命的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959)。Reinhard Bendix的「企業中的勞動與權力」(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1956)是一份特別的四國間歷史變遷的比較，也出現在這個時期。

1960年代有一些因素刺激歷史比較研究的再度出現。首先，某些歷史學家（如：Lee Benson，Robert W. Fogel, Richard Jensen以及Stephen Thernstrom）從社會科學中引進量化的技術，增加了歷史和社會科學彼此間的交流。流動率的統計研究、鐵路擴充、投票賦予歷史學家量化資料的權力，並提供量化研究者一些新的問題以運用其技術。其次，調查技術從美國傳出，並運用在不同國家的研究，像是Almond和Verba的「市民文化」(The Civil Culture, 1963)。許多新的方法論的議題和問題都從試圖運用量化技術進行跨國概化中產生。

第三，韋伯和馬克斯的歷史比較研究首度被翻譯為英文。「韋伯的研究被翻譯成英文，對1960年代歷史書寫的影響可能比其他社會科學要來得深遠」(Stone, 1987: 13)。第四，很重要的是如同書一樣長篇幅的研究出現，造成重要的理論發展。三份這種研究像是Charles Tilly的「買家」(The Vendee, 1964)、Barrington Moore Jr.的「獨裁與民主的社會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以及E. P. 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963)。Tilly研究的是1790年代的法國，結合了量化的邏輯和新的歷史資料。Moore的研究針對英國、印度、日本、德國和美國，並回溯蘇聯的形成，瞭解事件和社會群體如何結合導致某些國家發展出民主，而一些國家則形成非民主的政府。Thompson針對英國1840年以前進行研

究，藉由解釋一般人的生活、用語和行動，顯示了新的研究階級意識和階級的方法。「一種新的社會歷史的啟發來自E.P. Thompson (1963)之「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從未有歐洲的歷史研究如此深刻，並對美國史學家有這麼深遠的影響」(Novick, 1988: 440)。

對歷史比較研究的興趣興起於1970年代，許多本書變成如何進行歷史比較研究的範本。有三個因素造成這種擴張。第一，研究者批評結構功能主義，認為其對社會的觀點是靜態的，也批評經濟決定論是正統的馬克斯主義。他們建構了新的理論對歷史和文化脈絡很敏感，並尋求新的理論方法。第二，在許多西方國家劇烈的政治衝突之下，研究者開始對社會和社會變遷的本質這種基本問題感到有興趣。歷史比較研究用在這些問題是很恰當的（如：工業主義的基本過程為何？什麼導致革命政治？集體意識如何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如何改變？）第三，許多研究者看到只依賴實證取向的限制，覺得光靠量化技術是不夠的。

在1970年代的擴張之後，歷史比較在1980年代開始成為一種主要勢力。1983年，歷史比較社會學成為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SA)的一部分，在Melvin Kohn (1987)對ASA的演說中指出，跨國研究在1930年代經歷了幾乎被放棄的狀況後，又重新被重視。Hunt (1989: 1)也說，「歷史社會學變成社會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次領域，可能是成長最快速的。」運用歷史比較研究法的文章也出現在具領導性地位學術期刊之上。舉例而言，1990年後，出版在美國重要社會學期刊中，大約40%的文章某種程度上是歷史或比較研究。這比起前期(1985-1989)大約只有28%來說是很大的成長。反之，歷史或比較研究在1976和1978年只有大約18%。

適合歷史比較研究法的研究問題

歷史比較研究要回答一些大問題是很有用的：主要的社會變遷是如何發生的？大多數社會的基本面向為何？為何現有的社會安排

在某些社會中以特定形式出現，而在其他社會卻未見到？舉例來說，歷史比較研究者會說明什麼因素導致中國、法國、和蘇聯的社會革命（Skocpol, 1979）；某些重要的社會制度，如醫療保險，在過去兩個世紀是如何發展、變遷（Starr, 1982）；基本社會關係，如對兒童價值的感受其變遷情形（Zelizer, 1985）；美國對老人的公共政策為何朝某個方向發展（Quadagno, 1988）；在美國種族隔離的程度和階級比較起來是否下降（Wilson, 1978）；為何南非在美國朝向種族融合發展的同時，卻形成種族隔離制度（Fredrickson, 1981）；以及何種原因造成美國倡導平等和民主運動的民眾政治運動失敗（McNall, 1988）。

歷史比較研究適合用來解釋社會因素的合併造成特殊的結果（如：內戰）。也很適合比較整個社會體系以瞭解什麼是不同社會間普遍或獨特的現象，並研究長期的社會變遷。歷史比較學者可能會將理論運用在特別的案例上以證明其用處。他／她揭露出不同的社會因素或團體間的連結。並且比較在不同文化或歷史脈絡下相同的社會歷程和概念。舉例而言，如果法國是高度中央集權而且在政治上有高度的不滿，那美國是不是在中央集權和政治不滿意上是很低的，研究者開始建構中央集權和不滿意之間的因果關係。一個國家在中央集權和不滿意程度上可能因為時間的流逝使內部改變因果連結。

研究者也運用歷史比較方法重新解釋資料或是挑戰舊的解釋。透過提出不同的問題，發現新的證據或用不同方法重組事證，歷史比較學者對舊有的解釋提出新問題，並藉由在文化歷史脈絡中解釋以找到新的支持。

歷史比較研究可以加強概念化和理論建構。藉由檢視歷史事件或不同的文化脈絡，研究者可以概化出新的概念且擴充其觀點。概念比較不會受限於單一歷史時間或單一文化中；可以是深植於生活在某一特殊文化及歷史脈絡下人們的經驗。

在進行歷史比較研究時困難之一在於需要具備對過去或其他文

化全盤的知識（見Tuchman, 1994: 307-308）。通常對其他時空條件有完備知識的學者可以發展出宏觀的理論。只熟知自己文化或時空的讀者會發現很難理解歷史比較研究或古典理論。比方說，如果沒有對歐洲封建時代和馬克斯寫作時的世界有所瞭解的話，要瞭解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很難。在那個時間空間，農奴是活在嚴重的壓迫之下。封建社會涵蓋了城市中以階級區分的生活區域，而勞役償債制度迫使農奴繳交大量農產品給地主。唯一的教會有大量的土地，貴族、地主和教會間存有緊密的連結。現在的讀者可能會問，如果生活狀況如此之差，農奴為何不逃走？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對那個年代的狀況有所瞭解。農奴瞭解他們要依靠植物、漿果和打獵是很難在森林中生存，同時，因為傳統社會並不接納陌生人，因此沒有人會幫助逃跑的農奴，而是害怕他們。如果一個人想要瞭解古典理論，「就必須去理解那些在某個時空背景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並瞭解過去的解釋為何」（Tuchman, 1994: 310）。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

歷史比較開始有產生一些混淆。研究者自稱是進行歷史的、比較的、或歷史比較的研究，但指的可能是不一樣的東西。關鍵問題在於：有特定的歷史比較方法和邏輯，或者只是運用社會研究來解釋過去的社會生活和一些不同的社會？「長久以來一直有此爭論：『比較的』研究是否應該獨立成一種研究類別？」（Nowak, 1989: 37）。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量化研究

❖ 量化 vs. 歷史比較研究

混淆的來源是一些研究者運用實證的、量化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或比較的議題。其他則依賴質化的、詮釋學的、或批判的取向。根

據Ragin和Zaret（1983）指出，Durkheim（或實證主義）的方法和韋伯（或詮釋學）的方法之於歷史比較研究是應用不同的邏輯。Ragin（1987: 2）說，「比較社會科學的區別就如同質化和量化之間的區別那麼巨大。」

實證主義研究者不承認有所謂的歷史比較方法。他們測量變項、檢驗假設、分析量化資料、重複研究以發現歷經時間和不同社會間概化的規則。他們認為量化社會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間沒有根本的差異。他們將量化研究技術作些微修正後，用來研究過去或其他文化。

yen將此一混淆做一摘要（1990: 7）：

不同的比較研究之間區別的字眼是多餘而不精確的。像是跨國、跨社會、國家間、社會間、文化間這些概念以及鉅視層面的比較等，都可用在一般性的比較研究也用在特定的比較研究上。

大多數社會研究解釋的是當下、單一國家的社會生活——也就是研究者所在的時空。所有可能的歷史比較研究都依循三個面向來加以組織：第一，研究者是否著重在某一國家或一小群國家發生的事？還是試圖研究許多國家？第二，研究者如何處理時間或歷史？他／她處理的是過去的一段時間、解釋跨越許多年的事件、或者研究的是現在或最近的時間？最後，研究者的分析是基於量化或質化資料？如果我們交叉澄清這三個面向，則在邏輯上可以得到18種歷史比較研究（詳見表14.1）。難怪在討論歷史比較研究的組成時會有這麼多混淆產生。

新近產生的歷史比較研究並不完全跨越各種可能的類型。大多數研究是第1、4、5、7、8、10、11、13、14、15和16類。這包括了所有單國的研究。研究者在解釋一小群國家歷經一段時間上，傾向運用質化資料。那些檢視現在趨勢的研究則運用量化資料。這包括對許多國家的研究。相當少的質化研究是針對許多國家

表 14.1 邏輯上歷史比較研究可能的種類

比較的面向	時間面向與資料種類		
	單一國家*	數個國家	許多國家
過去一段時間			
量化	1	2	3
質化	4	5	6
跨時間			
量化	7	8	9
質化	10	11	12
現在			
量化	13	14	15
質化	16	17	18

* 所研究的國家和研究者及現在的報告讀者分屬於不同國家。

進行的，而 Immanuel Wallerstein 和其他依循世界體系取向的研究者之研究算是例外。

以下是 11 類最常見的研究之摘要。

類型 1：單一國家、過去的時間、量化資料 Brown 和 Warner (1992) 研究 1900 年美國一些大都市中，移民人口和警方行為的關係。其量化資料分析包括警力人數、逮捕率、和在國外出生人口的百分比等變項。Sutton (1991) 研究精神病院的成長（詳見第一章）也是此種歷史比較研究。

類型 4：單一國家、過去的時間、質化資料 Beisel (1990) 針對 1880 年代末期，美國 3 個大城市反罪惡運動的質化研究，正是此種歷史比較研究很好的例子。Blee (1991) 三 K 黨女性（見資訊箱 14.1）的研究亦是此種歷史比較研究。

類型 5：數個國家、過去的時間、質化資料 Barkey (1991) 運用質化資料研究十七世紀法國及奧圖曼帝國農民革命的狀況。而前述 Skocpol (1979) 針對 3 個國家革命的研究也是此種類型的歷

資訊箱 14.1

三K黨的女性

在「三K黨的女性」(Women of the Klan) 研究中，Kathleen Blee (1991) 指出，在她先前的研究，從未有人研究過美國這群大約有五十萬人、種族主義、右翼運動者。她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假設女性比較政治冷感且被動。她歷經六年的研究，以秘密身份進入一個六十年前就存在的組織，顯示出歷史比較研究所需要的智慧。

Blee 著重在印第安那州，那兒的白人女性在1920年代的高峰期，有32%是三K黨的成員。除了檢閱已出版關於三K黨的研究報告外，其文獻調查包括報紙、小冊子、以及未出版的報告等。她運用超過六所大學、政府單位和歷史圖書館的初級與次級資料進行研究，書中的歷史照片、素描和地圖提供讀者對此主題的感覺。

要找到相關訊息是很困難的。Blee 並未取得成員名單。她拼湊一些殘留的名簿、報紙上的訃聞、仔細查閱公開文獻或反三K黨的文獻、以及訪問三K黨還活著的女性來指認出三K黨的女性名單。

要在三K黨活躍的60年後指出這些存活者，Blee 必須夠堅持也夠機警。她對印第安那當地每家報社、教會布告欄、廣告商、歷史學會、和公共圖書館都發出將要進行此研究的通知，她取得3份手寫的紀錄、3份未被紀錄的訪談內容、以及15份已記錄的訪談。大多數的報導人都已經超過80歲，他們回想起來，三K黨是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Blee 透過報紙和其他文獻證據來確認這些人的記憶是否正確。

三K黨的成員至今仍具爭議性。在訪談中，Blee 並未揭露自己對三K黨的觀點。雖然有人會試探她，Blee 仍維持中立而不指責三K黨。她說，「我自己在印第安那的背景（這是我從小學到大學居住的地方）以及我白種人的身份讓報導人假設——雖然沒有明白說出來——我和他們的世界觀是一致的」。她並未發現三K黨女性是

殘暴的、是不關心或憎恨他人的。Blee 在問到為何加入三K黨這個問題時，得到不在預期中的答案。大多數人對這問題有些困惑，對他們來說這是毋須解釋的——這就是「一種成長的方式」以及「和同伴在一起的活動。」

史比較研究。

類型7：單一國家、跨時間、量化資料 Tolnay和Beck(1992)研究在1910到1930年間，美國南方黑人遷徙的情形。其量化資料檢視在不同時期導致遷徙的因素。本書第三章引述他們對私刑的研究(Beck and Tolnay, 1990)則是此類歷史比較研究的另一實例。

類型8：數個國家、跨時間、量化資料 Brinton及其同僚(1995)檢視在韓國和台灣女性角色的變遷(第301頁)，此研究涵蓋兩個國家、期間包含20年。他們分析了許多教育和勞動力與年齡和性別的量化測量。

類型10：單一國家、跨時間、質化資料 Prechel(1990)檢視過去50年間，美國鋼鐵業和政府政策的關係，基本上用的是質化資料。

類型11：數個國家、跨時間、質化資料 Stephens(1989)研究轉移至民主制度與西歐國家在1870到1939年間民主制度的衰頹，研究者檢視了13個歐洲國家，但著重在其中7個國家。

類型13：單一國家、現在時間、量化資料 一項針對阿拉伯和東方猶太人在以色列的教育體系之研究，Shavit(1990)運用了單一國家的量化資料。他們運用先前在美國和北愛爾蘭曾經檢驗過的少數民族在教育上的理論，作為本研究之假設基礎。

類型14：數個國家、現在時間、量化資料 Wright和Cho(1992)檢視在美國、加拿大、瑞典、挪威等國家之不同社會階級的友誼型態。其量化分析是基於調查的資料。

類型15：許多國家、現在時間、量化資料 Wimberly(1990)

研究63個第三世界國家，以瞭解其依賴外國援助及跨國企業的投資對嬰兒死亡率的影響。其量化資料來自最近20年的資料。

類型16：單一國家、現在時間、質化資料 Broadbent (1989a, 1989b) 進行一項日本的地方政府、企業和中央政府如何形成經濟成長政策的研究。他的研究是以來自實地研究、開放式訪談和文獻研究的質化資料為基礎。亦見資訊箱14.4之Fowler的日本研究。

❖ 實例上的辯論

Burawoy (1977) 和 Treiman (1977) 之間的辯論舉出歷史比較研究之間的歧異。Treiman 針對職業聲望的排名和社會流動，運用實證方法進行一連串的量化跨國研究。Burawoy 則在一些國家進行工廠的參與觀察研究，也運用批判社會理論針對南非和加州進行移民勞工的質化歷史比較。

Burawoy 攻擊 Treiman 在進行美國和英國之社會流動這種一般性的跨國量化比較的研究。他認為標準的量化測量（如調查問題）需要分析單位間的基本相似性，如果研究者用量化技術（如：隨機抽樣、標準測量、和統計分析）跨越了基本上不同的社會現實或文化，就會造成錯誤和扭曲的結果。Burawoy 認為不提到某個社會特定的歷史脈絡而下論斷是不可能的。他也指出教育體系、文化傳統、對工作的價值觀等這些特殊的歷史本質，在每個社會都有其解釋。最後，他反對用隱藏的價值觀來推論理論架構，反之，他認為權力關係和社會變遷必須要被批判，找出其有意義的解釋。Burawoy (1977: 1040) 就說，「關於英國和美國大多有趣而在社會上也很重要的事物，都脫離了線性統計和標準量表這種同質性。」

Treiman 重新說明實證社會科學的原則來替自己的研究辯護。他認為研究者必須從個案研究轉移到以社會為單位來分析的研究。他相信比較研究的目標是發現對所有社會而言何者為真、哪些則會

隨社會不同而改變、又有哪些是在某個社會單獨存在的現象。他（1977: 1044）說，「標準化測量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在各自存在的社會中，只有用這種程序才可以比較不同單位的結果。」Treiman認為Burawoy關心的遠超過實證主義——更多變項更精確的測量以及更多社會的更多資料。他認為實證研究最終會把跨社會間生活的複雜性簡化成像法律一樣的概化。

這此爭辯中，Burawoy和Treiman「談論彼此的過往。」各自採取不同的社會科學取向（批判vs.實證），並且在進行歷史比較研究上運用了不同的基本假設和目標。

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與詮釋研究

社會科學中獨特的、質化歷史比較的類型是和實證取向不同的。也和極端詮釋取向不同，這是某些實地研究者、文化人類學家以及史學家所倡導的。

歷史比較研究者運用個案研究和質化資料可能違反了實證原則。他們的研究是對有限個案一種密集的解釋，而社會意義和脈絡在這些個案中十分重要。個案研究，即使只在單一國家，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沒有了個案研究，學者「可能會繼續那些不恰當的、過時的或對某地方來說完全無關的理論爭辯」（Bradshaw and Wallace, 1991: 155）。個案研究能詳細說明歷史過程和標示出具體的歷史細節。

採用實證取向的社會科學學者（如：Goldthorpe, 1991，與Lieberson, 1991）批評歷史比較取向用的是少量的個案。這些學者認為歷史比較研究並不恰當，因為它不能生產出可能的因果概化的類型，而那些則是他們視為「真正」科學（也就是實證科學）的指標。

就如同詮釋的實地研究，歷史比較研究的焦點在文化，試著由被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重新建構他們的生活、並解釋特定的個體或團體。極端的詮釋位置會希望從他人的眼光來看世界。認為同理被

研究對象是社會研究的基本目標。採取的是嚴格的符號、描述取向，或理論模型。極端的詮釋取向假設每個社會情境都是獨特的，要全盤理解根本不可能。正如Stone（1987: 31）指出，傳統歷史「處理的是特定問題和特定區域。」而Gadamer（1979: 116）也對這個位置提出意見，他說道：

歷史意識的興趣在於瞭解，要瞭解的並非人群、國家如何概括性的發展，而是在某個國家，這個人、這群人或這個組織怎麼變成現在的樣貌：這些特殊性是怎樣變遷，又是怎樣固定成這種樣子（強調的是原始性）。

某種歷史比較取向借自人種誌和文化人類學，而某些則和那些試圖重新創造出另一個時空的現實之「詳實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十分接近。然而，借自人種誌的力量並不需要採用極端詮釋學取向。

獨特的歷史比較取向

獨特的歷史比較研究方法避免成為實證主義和詮釋學取向的延伸。它結合了一種特殊的歷史敏感度或具有理論概化的文化脈絡。歷史比較研究者可以運用量化資料以補充質化的資料和分析。歷史比較研究的邏輯和目標，和傳統的實證取向相比，是比較接近實地研究的。以下的討論說明了歷史比較研究和實地研究六種相似性，以及歷史比較研究中六種比較獨特的特質（見表14.2）。

❖ 與實地研究的相似性

首先，歷史比較研究和實地研究都承認研究者的觀點是研究中無可避免的一部分。兩者都加入詮釋，也說明詮釋者所具的時間、區域、和世界觀。歷史比較研究並不試著產生一個單一的、意義明確的客觀事實，而是以新的或不同的世界觀去挑戰舊有的觀點。承認研究者對歷史或比較證據的研讀是受到過去覺知和當下生活的影

表 14.2 研究取向比較摘要：質化與量化之區別

主題	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	量化研究
研究者的觀點	在研究過程中已包含在內，整合為一部分	從研究過程中移出
資料取向	融合多種以取得對事物的瞭解	精確的操作變項
理論和資料	紮根理論，資料和概念對話	推演理論和實證資料比較
發現的呈現	轉換意義體系	檢驗假設
行動 / 結構	人們在結構中建構意義	社會力形成行為
規則 / 概化	有賴脈絡中有限的概化	無脈絡的規則

獨特的歷史比較研究取向特質

主題	歷史比較研究的取向
證據	從片段和不完整的證據中重新建構
曲解	反對只用社會或歷史脈絡以外的覺知因素來引導
人類角色	包括在脈絡中對人的覺知以及運用其動機為成因
原因	將原因視為條件的連續體，在表面之下，是各種因素的結合
微視 / 鉅視	比較整體案例，連結鉅視和微視層面或社會現實的各面向
跨脈絡	在脈絡間的具體面向移動，且跨越抽象比較的脈絡

響。「我們對歷史的現實感基本上是不同於過去人們所表現出來的態度」(Gadamer, 1979: 109-110)。

其次，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都解釋資料的歧異性。兩種研究者都將資料融合以取得對事件和人們的同情理解。二者都攫取主觀感受，並指出日常生活、一般性活動是怎樣表現出重要的社會意義。

研究者從大量的事件、活動、符號和字詞中調查、選擇，並著重於社會生活的特殊面向。歷史比較研究者組織資料，而且將注意

力集中在所涉及概念的基礎。他／她解釋那些使文化更具戲劇性的儀式和符號（如：遊行、衣著、東西的擺放等），及調查動機、原因、和行為的正當性。舉例而言，Burrage和Corry（1981）運用工會主要公共事件（遊行、展覽、盛會、盛大的參訪等）在官方記錄中出現的先後順序，作為測量倫敦在14和17世紀職業狀態的改變。

第三，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都經常運用「紮根理論」。理論通常會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加進來。兩者都不在研究一開始就產生固定的假設，而是在和資料產生對話的過程中，發展、修正概念及理論，而後再將理論應用在對證據的證實上。Zaret（1978: 118）指出，「歷史的紮根主義意指概念是從歷史的分析問題所融合進來的：將過去進行結構、局面和事件的排序。歷史和理論因而同時加以建構。」因此，資料蒐集和理論建立有所互動。Thompson（1978: 39）稱此為「一方面進行概念和證據間的對話，連續性假設進行的對話，另一方面則是實證研究。」

接下來，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都有某種轉換。研究者的意義體系通常和被研究者不同，但是研究者試著洞察其觀點。當被研究者的生活、語言、和觀點被測量，研究者就將之「轉換」（translate）給研讀報告者瞭解。

第五，實地研究和歷史研究者的焦點都集中在行動、過程和順序，並將時間和過程視為必要。二者皆認為，人透過時間歷程中所發生的行動創造出社會現實感，也都對於機構間曾經有的張力、不固定的社會行動、社會現實、社會結構的改變、固定的規則和形成社會行動與觀點的類型很敏感。二者皆將社會現實同時視為某種人們創造和改變的東西，也是對人類選擇的限制。

第六，概化和理論在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中都有其限制。歷史和跨文化的知識，基於選擇的事實和有限的問題，都是不完整且臨時的。既非由推論也非由假設的檢驗來發現固定的規則，另外，取代是不實際的，因為每位研究者都有獨特的觀點以及獨到的

證據。反之，研究者提供的是很多的事證和很少的理論概化。

❖ 歷史比較研究的獨到面向

除了和實地研究有許多相似性外，歷史比較還有一些重要的不同之處。正如David Lowenthal的文章標題「過往如同異域」(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1985)提到，對過去和對異文化的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而其相異之處者在於研究取向。

第一，歷史比較研究的證據通常有限而間接。研究者的直接觀察或參與通常是不可能的。歷史比較研究者從證據中重新建構發生過的事，但是他／她對自己的重新建構卻沒有絕對的信心。歷史證據特別依賴從過去留存下來的資料，通常是以文件的形式(如：信件和報紙)。研究者受限於那些未被摧毀的，遺留下來的一些軌跡、記錄或其他證據。

歷史比較研究者詮釋證據。不同人來看相同的證據經常會賦予不同的意義，因此研究者必須反映證據。對事證的瞭解要從第一印象得到通常很難，研究者開始融入其中並抽取脈絡的細節。舉例而言，研究者解釋過去或不同國家的家庭，需要對整個社會脈絡(例如：工作的本質、溝通的型態、運輸科技等)有所瞭解，他／她檢視地圖並得到有效的規則、醫療照護的條件、和一般社會操作的感覺。比方說，「家庭成員造訪」的意義就被道路的泥濘狀況、無法事先電話通知、以及住在農場有必須時時看顧的動物等條件所影響。

另一個事實是，當研究者重新建構過去或其他文化時，很容易會有所扭曲。和被研究者相比較，歷史比較研究者通常比較知道研究時間之前發生的事件、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件、以及之後發生的事件。這種察覺的能力給研究者很好的感受力去瞭解過去或孤立的社會情境發生的事。「簡而言之，歷史的解釋超越對當下正在發生的事件的理解，我們重新建構的過去是比過去發生的當下更一致的」(Lowenthal, 1985: 234)。研究者更寬廣的覺知能夠創造出事情發生

的幻覺，這是必須的，或是這樣才能精準地扣合在一起。

研究者沒辦法輕易地透過被研究者的眼光看世界。現在的知識和時間的變遷會曲解了事件、人、規則、甚至是物理環境。舉例來說，留存到現在的老建築物比那些沒有留下來的要堅固，然而，留存的建築會因為其出現時的脈絡不同，因此在2000年看起來和在1800年不一樣。當1800年建築物新落成，且座落在類似的建築之間時，當時的人們所見所為都和21世紀初不同。他們經歷了多種不同建物的風格，而這建築物並不像某些在經歷200年的過程，到現在以復古風格保存下來的。

歷史比較研究者承認人們有學習、做決策的能力，並能以所學來修正事件發生的原因。當比較有洞察力的人涉入時，跨社會這種概化就比較受限。比方說，如果一群人知道或得知其過去歷史的意識，並避免過去的錯誤，他們可能有意識地改變事件發生的原因。當然，人們不必然會以過去學習作為行動的基礎，即使如此，行動也未必會成功。否則，人們的學習能力就會造成歷史比較解釋的不確定性。

歷史比較研究者想要發現，是否各種行動成因都會被涉入的人們視為真。因此，那些人的世界觀和知識是影響的因素，形成被研究者認為可能或不可能達到目標的方式。研究者問人們是否意識到某些事情。舉例來說，如果軍隊得知敵人將發動攻擊，因此決定在午夜時分渡河，這個「渡河行動」就和當軍隊不知道敵軍將至時有不同的意義。

歷史比較研究的取向多認為事件成因是偶發而非決定論的。歷史比較學者經常運用複合的解釋。很像是化學反應，將一些化學元素（化學物質、氧氣）在特定條件下（溫度、壓力）下加在一起，而會造成某種結果（爆炸）。這和線性因果的解釋不同。這個邏輯比較是「A、B和C在特定時間地點相遇，然後D就產生了」，而不是「A造成B，B造成C，而後C造成D」。Ragin（1987: 13）摘要說明如下：

大多數比較學者，特別是那些質化取向的，對特定的歷史結果及其跨越不同個案的成因感到有興趣。歷史結果通常需要複雜的、複合的解釋，這是很難以一種和主流量化社會科學一致的態度加以證實。

舉例而言，社會學家Max Weber在其歷史比較研究中運用多重因果取向，其解釋給經濟、人口或社會結構等每個文化因素相同的比重，其研究取向透過理想型結合了多重因素，既非對檢驗所推論出的正式理論，亦非歸納出特定問題的理論（見Kalberg, 1994）。

歷史比較研究著重在整個案例，並比較個案間整體和個別變項的複雜性。研究者將整體視為許多層面，他／她攫取表象，也揭露一般的、隱藏的結構、不為人知的機制、或導因的過程。

歷史比較研究者將微視（小規模、面對面互動）和鉅視（大規模社會結構）層次整合在一起。研究者並不單獨描述微視或鉅視層面的過程，而是描述現實的兩個層面並將之連結在一起。舉例來說，歷史比較研究者透過閱讀日記或書信得到對個體的感覺，解釋個人傳記的細節：他們吃的食物、他們追求的目標、他們的衣著、他們的疾病、他們和朋友的關係等等。研究者將對個體微視觀點連結到鉅視層面：移民增加、生產機械化、無產階級、緊縮的勞動市場等。

歷史比較研究的第六個面向是從特定脈絡和一般性比較的移動。研究者解釋數個特殊脈絡，舉出相似相異之處，而後加以概化。他／她再一次檢視用來概化的特殊脈絡。

比較的研究者會進行跨文化—地理單位（如；都會區、國家、社會等）的比較。歷史研究者則調查過去的脈絡，通常在某一文化（如：某段時間、紀元、年齡層、年代等），進行連續性的比較。當然，研究者可以將兩者結合，在單一或多重歷史脈絡中調查多樣文化脈絡。是的，每一時代或社會都有其獨特的因果過程、意義體系、和社會關係，這些可能在不同單位間缺乏相同的因素。這在脈

絡的具體特殊性和研究者運用來連結脈絡的抽象概念間產生了創造出的緊張。

比較分析中跨文化的概念和歷史比較中跨歷史的運用是類似的。在比較研究中，研究者將脈絡的特殊性轉譯成一般的、理論的語言；在歷史研究中，理論概念的應用則跨越時空。「因此比較調查者可視為是在特殊體系類別的『文化界線』持續的困境中，和概括體系類別的『缺乏內容』間抗爭」（Smelser, 1976: 178）。

❖ 安娜學派

討論歷史比較研究時通常會提到「安娜學派」，這是和一群法國歷史學家（如：Marc Bloch, Fernand Braudel, Lucien Febvre，以及Emmanuel Le Roy Ladurie）有關的研究方法，並以在1929年創刊的學術期刊*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一些歷史比較研究者摘要出此學派的取向之四種相關的特質。

特質之一是該學派綜合的、整體的、跨學科的取向。安娜學派的研究者將地理學、生態學、經濟學、和人口學等與文化因素合併在一起，以賦予過去一個完整的圖像。他們將物質生活和集體信念或文化等不同條件加以混合，將過去的文明建立出一個新的建構。

第二個特質是從法文字舉例來的，「時代的智能」（the mentalities of an era）。這個詞其實無法直接翻成英文，意思是特殊的世界觀，或是一套對生活的假設——思考組織的方式、或在某個時代盛行的意識和潛意識中認知、信念、價值觀的整體型態。因此，研究者試著發現，在某個歷史時期，形成現實基本面向的主觀經驗的整體思想：時間的本質、人類和物理環境的關係、真實的創造等等。

安娜學派的研究取向融合了具體的歷史特殊性和抽象的理論。理論採取了模式或結構的深層瞭解，這些是解釋日常生活的原由或組織的原則：「有地理的、經濟的和社會的潮流，可以解釋長期結構過程和對歷史觀察事件持續的瞭解」（Lloyd, 1986: 241）。安娜學

派的歷史學家尋找那些形成表面事件底層的趨勢，以及傳統歷史學家所說的個別行動。

最後一個特質是對長期結構或型態的興趣。和傳統歷史著重在特定對象或從幾年到幾十年的短期事件相反，安娜學派的歷史學家所檢視的是超過一世紀的、長期的變化，處理的是社會生活組織的基本方式。要描述他們研究的長期變化，用的是「長期」(*longue durée*) 這個詞，意思是在歷史空間（如：西歐的封建制度，或15到18世紀的地中海地區）中的一段時期或歷史年代。要這麼做，研究者必須對歷史採取某種獨特的導向。正如Braudel (1980: 33) 指出，「對歷史學家來說，接受*longue durée* 意味著改變其風格、其態度、整體翻轉思考、採取一種全新的方式來想像社會事件。」

安娜學派在許多方面都對歷史比較研究有所影響，它挑戰了短期研究的焦點，並將事件放在較大的脈絡下來檢視。也建立了關於根本結構的理論，並強調對過去不同主觀意識的敏感度。最後，此學派鼓勵對不同歷史資料的整合。

歷史比較研究計畫步驟

前述篇章，你看到歷史比較研究和其他社會研究的比較。本節中，我們將重點轉向如何進行歷史比較研究。進行歷史比較研究並沒有固定的步驟，除了一些例外，大多並不使用複雜或特殊的技術。

調查主題概念化

歷史比較研究者始於熟悉場景和將研究對象概念化。他／她可能從鬆散的模式或基本概念開始，然後應用到特定場景。暫時性的概念包含隱性的假設或研究者用來看世界的組織類別，「包裹」觀察 (*package observation*) 以及透過證據搜尋。

如果研究者還不熟悉歷史年代或比較的場景，他／她應該先進

行文獻檢閱（閱讀一些基本文章），這將有助於研究者掌握特定的場景、組織概念、將主要議題集中在一起、並發展出要問的問題。概念和證據互動得以刺激研究。舉例而言，Skocpol（1979）開始其對革命的研究，只有些鉅視社會學理論和部分特定革命的歷史。在歷史和革命間缺乏連結以及現有的理論刺激了她的研究。

要開始一個正式的研究而沒有假設架構、概念和理論是不可能的。不論研究者是否清楚覺察到這一點，他／她會將特定的細節放進分析項目中。研究者發現最好是清楚知道這個過程而避免「貝肯的謬誤」（Baconian fallacy）。以Francis Bacon（1561-1626）命名，這是假設研究者沒有任何預設的問題、假設、概念、理論、典範、條件、偏見、或推測。

確認證據

接下來，研究者透過密集的文獻檢閱來蒐集、確認證據。研究者運用許多圖書館所蒐藏的索引、類別、和文獻。對比較研究而言，這表示焦點集中在特定國家或單位以及尋找特殊證據。研究者經常花好幾個星期在搜尋圖書館中的資料、到各個不同的特定主題圖書館、閱讀許多書和文章。比較研究通常包括學習一種甚至多種外國語言。

當研究者研讀文獻並記下筆記時，他／她完成許多特定工作：完成參考書目清單（寫在書卡或電腦中）、記下既不太簡陋也不太瑣碎的筆記（即：多於一行但少於好幾頁的引言）、在筆記卡留邊以便日後加註、所以筆記都以同樣形式記錄（如：寫在卡片上、紙上等）、並且準備一個資料夾專門記下發展出的主題或工作假設。

研究者必須依照在證據中的發現來調整最初的概念、問題、或焦點。當他／她閱讀一些不同分析層次（如：一般的內容和特定主題詳細的敘事）的研究報告以及某個跨越主題界線的諸多報告後，就會產生新的議題和問題。舉例來說，Quadagno（1988）針對老人福利的研究，最初的興趣在於美國老人福利的歷史，她從政府老

人福利服務方案開始，很快地，她發現南方政治壓力的重要性，因此花了數個月在研究美國南方歷史。當此議題開展後，她開始檢視社福方案的文獻，再來展開調查，她開始研讀理論和實證研究顯示和其他社會福利方案的關連性，而認為有必要和西歐福利方案進行比較。在西歐，社會民主黨中有組織的勞工代表塑造了該國大多數的社會方案，因此，Quadagno的研究轉向美國勞工歷史。勞工的官方記錄和勞工歷史帶著她檢視雇主的行動和私部門的權力，她說，「我在理論和文獻資料間來來去去，每組新的實證觀察都帶領我形成研究福利政策因素的概化」（1988: x）。

評估證據之品質

歷史比較研究者在蒐集證據時會問兩個問題：證據和研究問題及研究概念間的關係為何？以及證據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多大？

相關性的問題很難回答。正如Tilly（1981: 13）所說，「所有文獻再重新建構歷史並不一定有相等的價值。」當研究焦點轉向時，原先不相關的資料可能會變得相關，類似的，有些證據會刺激新的調查方向而再找尋其他事證。

接下來要討論的是證據的正確性。歷史比較研究者在證據中找尋三件事：隱含的概念架構、特定的細節、以及實證的概化（大家都同意的事實陳述）。他／她評估證據的其他解釋尋找「沈默」（silences），或證據無法解釋的事件、主題或議題等。比方說，在討論一群大企業家時，研究者可能發現文獻並未提及其妻子和僕人。

研究者盡量避免證據可能的謬誤。Fischer（1970）提供了此類謬誤的清單，舉例來說，「偽證據的謬誤」（the fallacy of pseudo-proof）是將某事擴大到全部脈絡裡的錯誤。證據可能指出所得稅增加50%，但是在脈絡之外其影響並沒有意義。研究者必須問：其他稅收是否減少？所得是否增加？稅收增加是否適用於各種所得？這對每個人的影響都均等嗎？另一個要避免的謬誤是歷史

證據已經「過時」(anachronism)，某個事件必須是在某個時間點之前或之後出現，研究者要很精確地瞭解事件前後順序並指出證據時間的矛盾之處。

組織證據

當研究者蒐集了證據並找到新的資料來源，他／她就開始組織資料。很明顯地，瘋狂地記筆記而後讓他們堆成一疊是不明智的。研究者通常透過記下低度的概化或主題來開始其初級的分析。舉例來說，在針對革命的研究中，研究者發展出一個主題：地主支持舊有的制度。他／她將此主題記在筆記中，之後再賦予其重要性。

下一步，研究者進行證據的組織，運用理論的洞察來刺激新的組織資料的方法，並找出新的問題來質疑這些證據。舉例而言，Staples (1987) 將Burawoy的「工廠制度」(factory regime) 概念運用在針對1791年到1891年間英國家庭五金公司的勞資關係研究。在檢視完證據後，他發現兩種制度——**父權主義**(patriarchy)，將此概念引伸後又引出另一個，**家長制度**(paternalism)。

資料和理論間的互動表示研究者跨過了證據表面的解釋，而以理論為基礎進行證據的批判評估而發展出新的概念。Keat和Urry (1975: 113) 提出此過程：「任何基於社會自我呈現之概念形成的過程都是不恰當的、誤導而帶有意識型態的。」舉例而言，研究者閱讀大量關於抗爭運動的證據，最初的分析將之歸納出一個主題：那些活躍於抗爭運動的人會彼此互動並發展出共享的文化意義。他／她檢視文化和運動的理論，而後形成新的概念：「反對運動次文化」。研究者再以此概念重新解釋證據。

綜合資料

下一個步驟是綜合證據的過程。研究者將概念精簡化，並在大多數證據確認之後形成一般的解釋模型。先前的主題或概念經過討論或修正，而後創造出新的概念。具體的事件用來賦予概念意義。

研究者在不同時空或單位間尋找類型，並標出相似和相異之處。他／她將不同事件加以組織成為序列，分門別類而得到更大的圖像。當研究者將證據組織成一個整體時，納入概念和證據，而後發展出合理的解釋。研究者一再閱讀筆記並不斷加以分類。當他／她用不同的方式檢視證據時，尋找並記錄下彼此之間的關連性。

綜合性的資料用彼此間的關係或因果機制之抽象模型來連結特定的證據。研究者經常運用暗喻來發展模型。舉例而言，許多挫折讓革命被形容成「正如情緒的摩天輪從天而降」，事情似乎有轉機，忽然很快又急轉直下。這模型很敏感地被分割開來。

研究者經常找尋新的證據來確認那些在解釋模型發展出來之後所產生的特殊連結。他／她評估模型和證據符合的程度並加以修正，在抽象與具體間來來回回。在每個階段，研究者都會問：如果此模型為真，它是否能產生我所發現證據的全貌？

歷史比較研究者的主要任務是組織證據並賦予其新的意義。Skocpol (1979: xiv) 認為：

比較歷史學家的任務——以及潛在的特殊學術貢獻——並非來自對所調查的某時空某一特殊面向揭露新的資料，而是來自在各個不同歷史案例之間建立因果規則和基本的有效性。

歷史比較研究者亦確認出重要的指標以及對主題或解釋支持性的證據。「重要的指標」(critical indicator) 是非常明確的證據，通常在指向某特定理論關係上是很足夠的。研究者尋求這些指標作為解釋模型的主要部分。指標確認了理論關係，而且在許多細節都指向某一清楚的解釋時產生。舉例來說，兩個國家間敵對狀態的重要指標是來自一群人確認其存在所形成的正式組織。「支持性的證據」(supporting evidence) 則是模型中次要的證據。它可以是建構整體背景或脈絡的證據，較次要或較弱的證據、以及清楚的理論詮釋所缺乏的證據。

撰寫報告

最後一個步驟是將證據、概念和綜合資料整合成一份研究報告。研究報告的撰寫是歷史比較研究的關鍵。將證據、論述和結論組合成一份報告總是很重要的步驟；但是比量化取向更甚者，證據的組織和解釋可能完成或摧毀一個歷史比較研究。研究者將許許多多證據淬煉、加以解釋並準備完整的註釋，研究者將證據和論述放在一起，藉以提供讀者一個完整的時代圖像。

歷史脈絡中的資料與證據

歷史證據的類型

首先，有些名詞需要澄清。「歷史」(history)有幾個意思：代表過去發生的事件（例如：法國從越南撤軍是「歷史」）；過去的紀錄（如：法國在越南參戰是「歷史」）；和研究過去的訓練（如：「歷史」系）。「史學」(historiography)是進行歷史研究或蒐集分析歷史證據的方法。歷史社會學是歷史比較研究的一部分。它

是一種歷史資料的研究取向，歷史學的風格、尋求以社會學模型和理論來解釋並瞭解過去……另外，歷史資料可能用來例舉和測試社會學的概念、原則和理論的效度。
(Mariampolski and Hughes, 1978: 104-105)

研究者舉出歷史證據或資料的四種類型：初級資料 (primary sources)、次級資料 (secondary sources)、持續進行之紀錄 (running records) 和重新蒐集的資料 (recollections)。傳統歷史學家大量倚賴初級資料，歷史比較研究者則經常運用次級資料或不同資料的組合。比方說，Quadagno (1984) 檢視美國社會安全法

案以評估政治權力的理論，在47種她所引用的資料來源中，有23種是初級資料（當初的信件、筆記、官方報告、報紙或雜誌文章）、3種是重新蒐集的資料（回憶錄或口述歷史）、而21種是次級資料（史學家和其他研究者之著述）。Griffin等人（1986）針對1930年以前反工會運動的研究，則結合了初級資料（雇主的陳述）和次級資料（歷史脈絡），再加以現有記錄（經濟狀況的政府資料）的分析。

❖ 初級資料

過去的信件、日記、報紙、電影、小說、衣物、照片等保留至今的都是「初級資料」。這些可以在文史館（儲存文件的地方）、私人蒐藏、家裡的櫃子中、或在博物館中找到（詳見資訊箱14.2）。今日的文件和物件（我們的信函、電視節目、廣告、衣服、汽車等）都是未來史學家的初級資料。古典初級資料的例子之一為研究者在閣樓發現一捆發黃的信件，是戰時一位離家的先生所寫給太太的。Aminzade（1984）在研究1800年代中期三個法國城市抗議的形式時也運用了初級資料，他檢視法國政府資料館中警察、法官等手寫的文件。

出版和未出版的書面文件是最重要的初級資料。研究者看到的可能是他們原本的形式或以微縮膠片儲存的形式。這經常是過去的人的文字、想法和感覺現今僅存的紀錄。書面資料對研究文字時代的社會和歷史很有助益。而對書面資料最常見的批評是這些資料經常是由社會菁英或官方組織所記錄，因此，那些無法書寫的、貧窮的或非官方的社會組織的觀點可能會被忽略。舉例來說，過去美國奴隸閱讀或書寫是非法的，因此對農奴經驗的書面文件都是間接的或難以取得。

紙張上的文字是在運用電子傳媒、電腦、錄影技術記錄下事件或想法之前最主要的溝通媒介。事實上，溝通媒介的普及並無法留下永遠的物理記錄（如：電話中的對話、電腦記錄、和電視或廣播

資訊箱 14.2

運用館藏資料

文史館是初級歷史資料的主要來源。文史館包括了在私人收藏、博物館、圖書館或正式資料館等所累積的文件資料（紙、照片、信函等）。

儲存所在地以及如何接近

在許多信件、電話和指引下，要找到某個主題、組織、或個人的資料是否有被蒐藏常是一件很花時間而又挫折的任務。如果關於某人或某個主題的資料真的存在，也可能分藏在許多不同地方。要進到這些地方可能有賴私人蒐藏中某家族成員的善意，或長途跋涉到圖書館去說明自己在佈滿灰塵的書信中翻找的原因何在。同時，研究者或許會發現時間有限（如文史館開放時間一週僅有4天，從早上10點到下午5點，但研究者需要花40個小時來檢閱這些資料）。

分類組織

文史館中的資料很可能並未以特定方式加以分類或組織，即使有組織也可能是以和研究者興趣不相關的分類標準為之。舉例來說，信件和書面文件可能會依年代順序分類，但是研究者只對過去30年間4位專家的信函有興趣，而不包括每天的帳單、家書等資料。

技術和控制

館藏資料可能是以原本的形式、微縮膠片或比較少見的電子檔案形式所存放。研究者可能只許做筆記，而不能影印，或是只能閱讀某些部分，不能全部閱讀。研究者受限只能在某個特定的房間閱讀這些髒兮兮的資料、只可以在文史館對外開放的幾個小時之內記筆記，這些都可能使研究者感到很挫折。

回溯

文獻研究中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就是從資料中回溯某些事件和人

物。即使所有資料都可以在同一個地方找到，相同的事件或關係也可能在許多地方以不同形式呈現。研究者透過一大堆紙張的搜尋，試圖在那裡找到蛛絲馬跡。

沈悶、幸運和意外的發現

文獻研究通常很緩慢地令人痛苦。花了許多時間在文件間細讀是很瑣碎的事。同時，研究者經常會發現蒐藏品、文件破了個洞或被毀壞，然而，仔細地閱讀和調查未被查閱過的資料還是可能引發新的連結或想法。研究者或許會發現預期外的證據而對調查展開新的方向（詳見Elder等，1993，以及Hill, 1993）。

節目)，而這些大量取代了信件、書面帳冊、及報紙，可能會使未來的史學家有更多挑戰。

❖ 次級資料

初級資料是真實確切的，但是時間上的限制可能會使得運用初級資料的研究只能限定在短暫時期或地區。要得到比較廣泛的圖像，歷史比較研究者運用「次級資料」，這是專業的史學家花了數年時間研究初級資料後寫的東西。比方說，Lachmann（1989）對法國及英國在1600年代的菁英研究，全數是基於次級資料：大多數於1955年至1988年間出版的法國和英國史學家之書籍與文章。

❖ 持續進行之紀錄

「持續進行之紀錄」是和組織所保存的現有檔案或統計文件一致。實例之一是某鄉村教會的檔案存有許多從1910到現在的婚姻及死亡記錄。Roy（1983）在研究美國1886年至1905年間大企業的董事會時運用了現有的紀錄，他的證據來自150份初級資料、官方報告和統計、以及商業年報，其中有些仍持續出版中。

❖ 重新蒐集的資料

個人基於記憶將自身過去生活或經驗所書寫下來的文字稱為「重新蒐集的資料」。這可能以記憶、自傳、或訪談的形式呈現。因為記憶的不盡完美，重新蒐集的資料通常會有些初級資料所沒有的缺漏。舉例而言，Blee（1991）訪問一位80幾歲的女性關於其參與三K黨的歷史（詳見資訊箱14.1）。

在蒐集「口述歷史」（oral history）這種重新蒐集的資料時，研究者會進行非結構式的訪談，瞭解過去的生活或事件。這種取向對非菁英群體或不諳文字者特別有價值。口述歷史的技術從1930年代開始，至今已有專業協會和學術期刊的發行。艾瑞克森（1978）運用此並結合其他資料來研究某個社區被洪水破壞的情形；Terkel（1970）運用此法得到在1930年代大恐慌時期對日常生活親眼目睹的觀點；而Wigginton（1972）則將此種方法運用在他有名的「火狐狸」系列。

次級資料之研究

❖ 運用與限制

社會研究者經常運用次級資料，那些專業史學家所寫的書和文章，來作為過去情況的證據。正如Skocpol（1984: 382）所言，這些資料的運用是不系統化的，而「比較歷史社會學家在有效運用次級資料做為證據時，也沒有非常清楚明確的規則。」次級資料是有限制的，在運用時也要十分謹慎。

次級歷史證據的限制包括不正確的歷史記載和某個領域乏人問津。這些資料不能用來檢驗假設。事實後設的解釋不算實證主義對記錄變造的標準，因為只有少數統計控制能使用，而且是不可代替的。而且，其他人的歷史研究在發展一般性的解釋及其他用途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這類研究證實了過去的演化趨勢。

❖ 潛在的問題

次級資料會帶給歷史比較研究者許多細節和互動。研究者必須將大量特殊描述性的研究轉譯成容易理解的樣子。這種形式必須和證據一致並反映其豐富的內涵，也必須將許多不同時期和地點串連在一起。研究者要面對次級資料潛在的問題。

問題之一是閱讀史學家的文獻。史學家呈現出來的並不是理論中立、客觀的「事實」(fact)。他們將原始資料加以組織、分類、用概念來型塑證據。史學家的概念是從期刊、歷史行動者的語言、意識型態、哲學、現在的日常用語和社會科學混合起來的，大多缺乏清楚的定義、是模糊的、在應用上是不一致的、也非周延互斥的。舉例而言，史學家描述十九世紀住在城鎮的一群人為上層階級，但並未精確定義這個名詞，也未將之與理論或社會階級連結在一起。這個詞幫助他組織原始證據，但也使歷史比較研究者的工作相當困難。方法論的問題在於史學家隱藏的理論對證據有所限制。社會研究者藉著閱讀未加以組織的證據，試圖發現哪些可能是史學家之次級資料反證的解釋。

第二個問題是史學家的選擇程序並不透明。史學家從所有可能的事實中選擇某些訊息。如同Carr (1961: 138) 所言，「因此歷史是在歷史重要性中的選擇過程……從浩瀚大海中，史學家選出對他而言重要的訊息。」是的，歷史比較研究者不知道這是如何形成的，在不曉得選擇過程之下，歷史比較研究者必須依賴史學家的判斷，這其中也可能有偏誤存在。舉例來說，史學家閱讀了10,000頁的報紙、信函、和日記，然後將這些訊息摘要成100頁的書籍，歷史比較研究者無法得知那些史學家沒有選擇的訊息與其研究目的是否相關。

典型的史學家研究實務上也會說明個人的偏誤。大量倚賴初級資料結合了非理論的導向造成對特定人類活動狹隘的觀點。這種獨特的、微視觀點將注意力遠離主題或類型的整合。除了典型史學家

對理論或模型的厭惡之外，這種強調重點在於特殊個體有記載的活動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取向。

第三個問題是證據的組織。史學家在寫下歷史作品時將證據組織起來，他們寫的經常是「敘事歷史」(narrative history) (見資訊箱 14.3)。這造成未經定義的概念以及事證選擇的問題。Jones (1976) 認為史學家是從過去的剩餘重新建構事件，並賦予這些事件重要性。

在歷史的敘事中，作者將所有資料依時間順序組織成單一的「故事」(story)，邏輯是這些未組織活動的序列，因此，故事中每個部分都依其在事件發生順序的位置上而和其他部分有所連結。這些加在一起，所有部分就形成了整體。連結和序列是敘事形式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如果 X (或 X + Z) 發生了，Y 就會發生，而如果 X (或 X + Z) 沒有發生，那可能會產生另外的結果。序列造成先後事件在邏輯上的互相依賴。

在這種時間邏輯之下，敘事的組織不同於社會學家提出的解釋；和研究者在確認統計類型以指出因果的量化解釋不同；也和大部分質化資料分析有所差異 (詳見第 15 章)，在質化分析中，研究者比較特殊案例 (理論型分析或舉證方法) 的模型，比較所蒐集案例 (分析比較) 的相似和相異之處，或從一組案例中摘要出理論的陳述 (連續的近似值)。

敘事的主要困難在組織的工具——時間序列或事件發生的地點順序——無法獨自創造理論或歷史因果關係。換言之，這種敘事只符合建立因果關係的三個條件之一 (詳見第三章)——就是依據時間順序。更甚者，敘事的撰寫模糊了重要的因果模型或過程。這在史學家將那些沒有因果重要性的事件納入時就會發生。他 / 她加入這些資料讓背景或脈絡更豐富，增添色彩。還有，研究者將那些沒有立即因果影響但之後的過程中可能會有影響的事件呈現出來。也就是說，敘事應包括那些延後發生因果影響的事件。

另外，少數敘事史學家明確地說明這些效果之間如何彼此結合

資訊箱 14.3

歷史的敘事

許多史學家以傳統敘事型態撰寫，這些可能是歷史比較研究者的次級資料。

敘事型態的特質

1. 講述的是一個故事，有情節、分水嶺和高潮。
2. 追隨的是時間序列和事件的順序。
3. 焦點在特殊的個體，不是在結構或抽象概念。
4. 基本上是特殊而描述性的，並非分析和一般性的。
5. 事件的呈現是獨特的、不可預期的、偶發的。

敘事型態的優點

1. 很多采多姿、有趣、引人入勝。
2. 提供不同時代生活全盤的感受，使讀者覺得身歷其境。
3. 讓人瞭解過去人們生活的主觀經驗事實，並幫助讀者瞭解過去人們的情緒感受。
4. 圍繞的是個體和特殊事件，混合了社會現實的各個層面。

敘事型態的缺點

1. 隱藏因果理論和概念，或是使之不明顯。
2. 運用修辭的、一般的語言、以及常識來說服，因此是主觀的，可能有邏輯上的謬誤，造成扭曲和修辭學上的誤差。
3. 對獨特的、戲劇性、不尋常的事件傾向忽略其共通性。
4. 很少建立在先前的知識之上，也很少創造概化的知識。
5. 傾向過度個別化，過份陳述特殊人物的角色及其引發事件的能力。

或互動。舉例來說，史學家討論某個事件的三個條件，然而，很少有讀者知道這三個條件必須同時產生才會造成因果影響，只有兩個或一個條件時並不會造成相同的影響。

敘事的組織對運用次級資料的研究者造成一些難題，也產生一些矛盾的發現。歷史比較研究者必須閱讀這些微弱的概念、不清楚的選擇標準、以及模糊的因果邏輯。這些敘事背後可能有史學家的社會理論存在，但通常是隱匿不清楚的。Burke (1980: 35) 指出，「傳統史學家通常否認有什麼模型存在……在沒有意識到邏輯條件下運用模型，有時候會造成史學家不必要的困難。」

最後一個問題是史學家會被學派、個人信念、社會理論以及研究進行時發生的事件所影響。

史學家在今日對初級資料的解釋和1920年代不同，歷史學也有許多學派（如：外交的、人口學的、經濟的、心理學的、馬克斯主義的等等），在尋找證據和提出問題上都有自己的規則。Carr (1961: 54) 警告：「在你研究歷史之前，先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歷史學家之前，先研究其歷史和社會環境。」

初級資料之研究

當研究者運用次級資料時，史學家是主要議題。當運用的是初級資料時，關鍵議題則是那些過去寫下來並留存到現在的片段。尤有甚者，所遺留下來的並非現存資料隨機留下的。Lowenthal (1985: 191-192) 觀察得知，「過去의思想和事物殘留下來的，代表的只是前人當代資產的一小部分而已。」

歷史比較研究者試圖用人們在過去的眼光和假設來閱讀初級資料，這表示「分類」、或是將之後的事件和現在的價值分開來看待。Cantor和Schneider (1967: 46) 曾寫道，「如果你不用開放的心並注意所獲得的內在洞察來閱讀初級資料，而只以一般人的眼光來看，那麼你只是浪費時間。」

舉例來說，當閱讀一份奴隸主人所寫的資料時，道德上譴責蓄

奴或認為作者沒能看出這個罪惡是毫無價值的。歷史比較研究者克制道德的判斷並在閱讀初級資料時成為道德中立者。他／她必須「思考並相信主觀事情，用他們的眼光來發掘事物表現的樣貌」（Shafer, 1980: 165）。

另一個問題是，安置這些初級資料是很花費時間的工作。研究者必須從特別的索引間搜尋、在各個資料館和特定的圖書館之間遊走。初級資料通常放在陰暗的、髒兮兮的角落，旁邊堆滿一堆卡片盒子，充塞許多檔案。這些可能並不完整、未經組織、並且在被毀損之中。當文件或其他初級資料被找到時，研究者會以內外鑑定將之分類（見圖 14.1）。

「**外在鑑定**」（external criticism）意指文件本身的真實性，確定其並未偽造的資料。此評鑑法則包括去問：這份文件是被宣稱所創的時間、地點、以及該作者所創造出來的嗎？這份文件的起因為何？為何會留存至今？

當文件被鑑定為真的，研究者接著則運用「**內在鑑定**」（internal criticism），也就是對文件內容的解釋，來建立其可信度。研究者評估該資料是否基於作者直接目擊或是二手資料？這需要對所記錄的東西解釋字面上的意義和其隱藏的涵意、意圖。研究者記下文件中提及的其他事件、資料來源、人，並去瞭解這些怎樣確認。他／她解釋隱藏的假設或價值觀，和在文件創造時提及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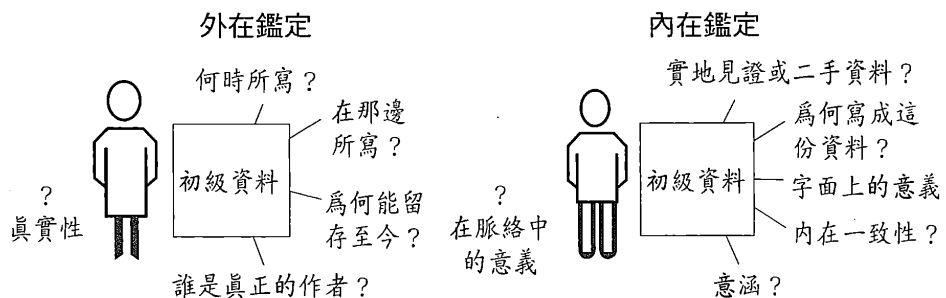


圖 14.1 內在和外在鑑定

關條件（如：是在戰時或極權年代）。他／她也要考慮在那個時代和文化脈絡中語言的運用，以精鍊出其意義。

初級資料可能有許多種曲解產生。其一是「刪去不雅文字」（bowdlerization）（Shafer, 1980: 163）——有意扭曲設計以保護道德標準或造成某種特殊意象。譬如一張在某建築物前照的相片。建物四週都是垃圾和啤酒罐，牆上的漆斑駁不堪。然而，照片只照出建築物一角，看不到垃圾，暗房技術讓牆上的漆看來像是新的。另一個例子是，一些名人實際上並未參加某個宴會，但報紙社交版則報導許多名人出席。

除了初級和次級資料，歷史比較研究者還運用Topolski（1976）所謂的「不可考的資料」（nonsource-based knowledge）。這是研究者可以取得過去的資料，但已經無法得知其初級文獻或次級資料之出處。可能是來自邏輯推演，比方說，A和B是在異性戀社會中的一對夫妻，認同的是性的忠誠，而當B有了外遇，A便會感到嫉妒。前述的重要事件所形成研究的脈絡也是一種知識。又如，研究1920年代晚期法國的研究者，就知道法國有許多18至40歲的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死亡。而現有的知識也可以幫助瞭解過去的歷史，舉個例子，研究者知道黑人清教徒因為衛生條件不佳，造成由老鼠身上的跳蚤傳染疾病，但過去的人並不知道這種疾病的原因。

比較研究

比較研究的類型

❖ 比較方法

其他研究類型的問題在比較研究中被誇大了。Holt和Turner（1970: 6）說，「原則上，跨文化比較研究和在單一社會進行的研

究並無不同，然而，差異在於某些特定問題上。」比較研究和單獨的研究技術來說是比較主觀、有方向性的。本節我們將討論其強度。

比較的觀點呈現了研究設計的弱點並幫助研究者加強研究的品質。比較研究的焦點在於不同單位間的相似與相異性，而「比較是瞭解和覺察訊息主要的動作。」(Warwick and Osherson, 1973: 7)

比較研究幫助研究者確認社會生活的面向是有跨越單位的一般性(例如文化)，並非限於單一單位。所有研究者某種程度上都想概化。實證主義研究者對於發現通則或跨社會間的社會行為模式大有興趣。但多數實證主義研究者並不具比較觀點。Ragin (1994: 107) 觀察得知：

比較研究者解釋不同案例類型的相似和相異性，試圖找出他們的歧異……量化研究者也解釋個案間的差異，但出於不同的假設，目標是解釋變項之間的共變性……量化研究者對個案通常只有廣泛的熟悉而已。

比較取向改善了測量和概念化。研究者橫跨數個社會單位或情境發展出一些概念，是比較不能套用在特殊文化或情境中的。研究者要偵察潛在的偏誤、假設和價值很困難，除非他/她將此概念應用在不同的文化或情境中。不同的社會情境有比較多樣的社會事件或行為，人類的一般行為在單一文化中這範圍通常很有限，因此，研究單一文化或情境的學者著重在所有可能的社會活動中的範圍。舉例來說，兩位研究者，Hsi-Ping 和 Abdul 檢視兒童斷奶的年齡和情緒問題之間的關係。Hsi-Ping 只看美國的資料，顯示從5到15個月開始斷奶，指出當年紀愈大斷奶，情緒問題愈多。她認為較晚斷奶導致情緒問題。Abdul 則檢視了10個不同文化的資料，斷奶年齡從5到36個月，他發現在18個月以前斷奶的孩子，情緒問題隨著愈晚斷奶愈多，之後就開始下降，Abdul 的結論就比較正確：情緒問題在6到24個月間跟斷奶有關，但之前或之後斷奶則會減低產生

情緒問題的機會。Hsi-Ping 因為只檢視美國的小範圍資料而導致錯誤歸因。

比較研究會除去或對因果關係提供另一種解釋。比方說，Weil (1985) 檢視求學期間長短和容忍度的關係。過去的研究發現在美國這兩者間的確有關係存在，大多數研究認為教育大致上會開拓視野而增加容忍度。Weil 則檢視其他國家的這種關係 (1985: 470)，認為此種關係「較弱或不存在，在非民主國家或早期還不是民主國家中甚至是相反的。」換言之，某種政權的存在是此種關係的必要條件。教育在增進容忍力上並不具有全球性的影響；而是教育使人們對國家官方的價值有所社會化。當官方價值認同容忍，教育就會增加容忍度；否則，並不會有此種效果。

比較研究提出新的問題和刺激理論建構的方式是其主要優點之一。舉例來說，Kohn (1987) 一篇針對日本、波蘭、和美國的比較研究中發現，有某種三國共通的模式存在：人的社會階級愈高，則愈有彈性，在心理上也愈有自主性。然而，研究也發現矛盾之處。在美國，較高的社會階級和較低壓力相關；在波蘭，則和高壓力相關；而在日本，在壓力水準上並無相關。這種不一致之處便刺激研究者尋求新的解釋，並發展出新的研究問題。

比較研究也有限制。和不進行比較的研究比起來，它較為困難、成本較高、也花更多時間。所能蒐集的資料和同義字 (equivalence) 的議題 (後續會討論) 也是經常出現的問題。

另一個限制是個案數。比較研究者很少用隨機抽樣。對世界上大約 150 個國家，像是一些無法隨機接近的單位 (如某些貧窮國家、非民主國家等) 是無法取得資訊的。此外，研究者能將一個十億人口和十萬人口的國家視為同等的單位嗎？少量的個案數造成研究者特殊化的趨勢，將每個個案都視為獨特的，因而限制了概化的程度。舉例而言，研究者檢視 5 個個案 (如：國家)，但每個個案和其他的都有 20 點差異。當不同的特質比所用來比較的單位還多時，要檢驗理論或決定關係就有困難。

第三個限制是比較研究者能夠應用但無法檢驗假設，而且概化有限。在歷史比較研究中，除了運用合併理論之能力和將個案視為一體外，強而有力的理論檢驗或實證研究幾乎無法達成。比方說，研究者的興趣在於：如果其他團體都沒有衰退的話，經濟衰退並不會造成同一國家中某個團體的衰退。反之，研究者等到衰退發生，再檢視國家或某單位中其他特質的變化。

❖ 四種類型

Kohn (1987) 曾討論過比較研究的四種類型。前兩種符合歷史比較研究，第三種是實證主義取向的延伸，最後一種則是獨特的取向。

最初對「個案研究的比較研究」(case-study comparative research) 之焦點是去進行特殊社會或單位間的比較，並不進行廣泛的概化。這種類型研究的問題如下列例子：加拿大和美國有何不同？東德和西德的老年生活有何不同？美國和俄羅斯的教育體制有何相同相異之處？研究者意圖瞭解有限的個案，這所謂的「個案」是文化定義下的團體。藉由深入解釋少量的個案，甚至只有一個，就比較不需要考慮到單位間的同義（詳見資訊箱 14.4）。這個方法對要確認在幾個個案之間的影响因素是一致或不同的很有助益 (Ragin, 1987: 49-50)。

研究者運用「文化脈絡研究」(culture-context research) 來研究代表某些類型的社會或單位的個案。舉例而言，Burawoy 和 Lukacs (1985) 針對美國和匈牙利的五金店進行比較研究，並不是檢視兩個國家，而是比較在先進資產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脈絡下工作情境的相似性。美國和匈牙利代表不同社會類型。類似的研究有 Skocpol (1979) 對法國、俄羅斯、中國革命的比較，將每個國家作為解釋一般社會過程的背景。

在第三種比較研究中，國家是分析的單位。在「跨國研究」(cross-national research) 中，研究者橫跨許多國家來測量變項。

資訊箱 14.4

東京貧民區的研究

古典人類學研究經常包含對另一個文化的實地研究。我最近讀到一個這種研究，所描述的是東京的勞工區（Fowler，1996）。就一個以乾淨、安全的街道、高生活費和繁忙的生活形態著稱的城市而言，這是一個被觀光客和大多數日本人所忽略的區域。在此區域人口大多是男性，幾乎都是低工資、工作狀況不穩定的勞工。作者是一位美國男性，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並和一位日本女性結婚。他偶然經過該區域，而運用古典實地研究的技術進行了16個月的研究。除了一個晚上以外，他住在別的區域，晚上搭火車回家。他這個有一本書厚的報告包含了許多情境、對話、引言、地圖和照片。這是比較性的，不僅因為作者是外國人、以不同語言寫給外國讀者看，也是因為他解釋社會關係、習俗和這個生活圈時，涵蓋了該區域（某種程度上也和其他區域有所區隔）多采多姿的細節，以及該文化更大的脈絡。作者藉由舉出許多具體描述而表達了對這個區域男性和他們的次文化一種同理，但是他將這些描述納入更大的日本文化和東京都會文化。他呈現歷史和其他脈絡的訊息，並提供其他國家，像是美國，一些相似地區的文獻。

並不指出國家的名字，但研究者跨國進行變項測量，將國家獨特的面向轉變為變項。對統計分析來說，跨國研究者至少需要50個國家的資訊。雖然世界上幾乎有150個獨立國家，但資料取得大概不會超過50國。

「**多國研究**」（transnational research）則是比較研究的一種，在此研究者運用多國單位（如：全球的區域，像是第三世界），焦點在將國家間的集團當作分析單位。他／她並不將國家視為孤立的個體，而是國際系統的一部分。Wallerstein（1974）針對

從1400年代的「世界體系」(world system)長期發展的研究就是此種研究的實例。其著述孕育了一種新的思想學派，世界體系理論，也刺激了其他歷史比較研究。

比較的單位

❖ 文化 vs. 國家

為了方便，比較研究者通常用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現今，國家是在思考全球人類差異的主要單位。雖然這種單位在今日具有支配地位，但卻並非無可避免也非恆久的單位；事實上，這樣的發展大約只有300年。

國家是個社會和政治定義的單位。在此，政府在所屬領域上有統治權（意即：控制軍隊和政治權威）。經濟關係（如貨幣、貿易）、交通運輸、和溝通體制都整合在國界之內。領土內的人民通常採行相同的語言和習俗，通常有一樣的教育制度、法律體制、以及政治符號（如：國旗、國歌等）。政府宣稱代表所控制領土中全民的利益。

國家不是比較研究的唯一單位。它經常取代文化，後者比較難以具體定義為可觀察的單位。「文化」(culture)指的是在一群共享社會關係、信念、和技術的人之中一致的認同。文化中語言、習俗、傳統和規範的差異通常伴隨國家間的界線而來。事實上，分享相同的文化是主要導致國家間的區別之主要因素。

國家的界線不一定和文化相符。在某些情況下，單一文化可能分割成好幾個國家，反之，一個國家也可能包含幾種不同文化。在過去幾世紀以來，不同文化間的界線已經被戰爭、征服所分割出的殖民地或國家而摧毀、重組或融合。舉例而言，歐洲帝國使那些曾為殖民地的國家都承襲其文化；另外，新移民或少數族群並不一定融入國家的主流文化。國家中某個地區可能會有一群不同種族背景、語言、風俗、信仰、社會機制和認同的人（例如加拿大的魁北

克)。既然種族和文化認同是國族主義的根本，則這種國內的文化會造成區域的衝突。

國家並不是比較研究最佳的單位。研究者會問：什麼是和我研究相關的比較單位——國家、文化、小區域或次文化呢？比方說，研究問題是：所得水準和離婚率是否相關（即高所得者比較不會離婚）？國家中某區有一群人，有他們自己的文化、語言和信仰，在這些人中，所得和離婚並無相關；然而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文化下，所得和離婚確有相關。如果研究者運用國家作為研究的單位，研究發現可能會有所矛盾而解釋力很弱。與其假設每個國家有相同文化，不如找一個比國家小的單位會更適合。

然而，文化或次文化間的界線很難操作。文化難以定義，是持續的，而且界線彼此融合。除了較具爭議的個案外，國家間的界線是比較清楚的，但仍會隨時間而改變。在這個議題上沒有清楚的答案。如何運用適當的單位還是個嚴重的議題。

❖ 蓋頓的問題（Galton's problem）

比較單位的議題和另一個以Francis Galton（1822-1911）命名的問題有關。他1889年在皇家人類學院（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提出一個E.B. Taylor之研究中的議題。當研究者比較不同單位或特質時，他們希望比較單位是各自獨立的。但如果比較單位是大單位下的一小部分，研究者會發現令人驚訝的關係。舉例而言，比較單位是加拿大、法國和美國的州和省，研究者發現說英語和用元作為幣制，以及說法語和用法郎作幣制都是有關係的。很明顯的，分析單位（即州或省）間存在的關連性，是大單位（即國家）下的次單位。單位的特質是來自作為大單位的一部分，而非來自特質本身的關係。社會地理學家也面對這個議題，因為許多社會和文化面向會跨越地理空間而融合。

「蓋頓的問題」在比較研究中是一個重要議題，因為文化很少有固定的界線。很難說哪邊是某文化的終點、或另一個文化的起

點，文化的特質也會隨時間而融合在一起。當兩個變項在兩個不同單位間的關係事實上是來自同一起源，並非完全分開的單位時，蓋頓的問題就會產生（見圖14.2）。

蓋頓的問題緣起於跨文化的比較，但也可以應用在歷史比較上。當研究者問到在歷史階段中，比較的單位是相同或不同時，就會產生此問題。比方說，古巴在1875年和在1975年還是同一個國家嗎？從西班牙殖民結束後一百年、美國的影響出現、獨立、獨裁政權、共產革命等是否改變了這個單位的基礎？

跨文化研究的資料

❖ 比較實地研究

比較研究者也運用在其他文化的實地研究和參與觀察。人類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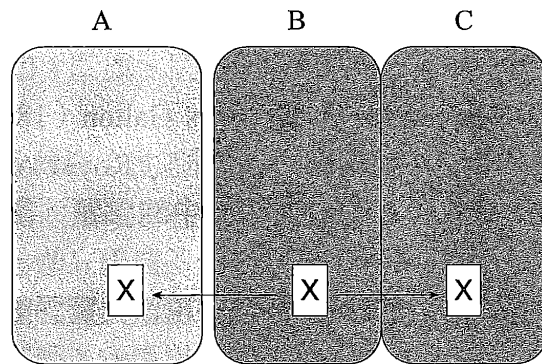


圖14.2 蓋頓的問題。當研究者在不同的情境或社會（用A、B、C代表）中，觀察相同的社會關係（用X表示），並且錯認社會關係是在不同地方產生時，蓋頓的問題就會出現。研究者可能相信自己在三個不同個案中發現相關，但社會關係發生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因為其出處相同而在情境中產生融合。這會是一個問題，因為研究者在不同的情境或分析單位（如社會）所發現的關係（例如婚姻型態），可能會相信這是在不同單位間各自獨自產生的。這種想法會推演出人類的共通性。研究者可能沒有察覺到，事實上這種關係的存在是因為人們共享跨單位間的關係。

家受過特別的訓練並準備好進行此種研究。人類學和實地研究認為，在自己和其他文化的實地研究還是有些許差異。不同文化的實地研究通常比較困難，而且對研究者有較多要求。

❖ 現有的質化資料

比較研究者可以運用次級資料。比方說，針對巴西、加拿大和日本教育制度所進行的比較研究，研究者可以閱讀其他國家，包括巴西、加拿大和日本的研究，這些研究都會描述3個國家的教育制度。

在人類歷史中可能有超過5,000個文化；其中約1,000個曾被社會研究者所研究過。針對不同文化之有價值的民族誌資料有「人類關係地區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HRAF)，以及相關的「民族誌地圖集」(Ethnographic Atlas)。HRAF是人類學家George Murdock於1938年開始蒐集組織的實地研究報告合集，將許多文化的民族誌研究資料蒐集在一起，這些文化大多是原始或小的部落族群，其中將近300個文化的延伸資料則以其社會特質或實際情形(如嬰兒的餵食、自殺、兒童出生等)加以整合。針對特殊文化的研究則分開來，將不同研究中相關特質的資料集合在一起，如此就容易進行不同文化間相同特質的比較。舉例來說，對繼承有興趣的研究者可以從159個曾被研究的文化中取得資料，其中119個是父系繼承，27個是母系繼承，而13個是混合制。

研究者可以運用HRAF來研究不同文化中幾個特質的關係。舉例而言，研究對女性的性騷擾或強暴是否和父權(即權力和權威的掌握者是男性)有關，研究者可以檢視在許多文化中，性騷擾的出現和父權的強度以決定之間是否有關連性。

然而，運用HRAF也有其限制。首先，原始研究報告的品質不一。原始資料的品質有賴研究者在田野所花的時間、對該語言的熟悉程度、先前的經驗、以及研究報告的精確度。此外，最初研究者所觀察行為的範圍和調查的深度也不一樣。比方說，研究者觀察認

為在X文化中，兒童不會被處罰，但孩子可能是在私底下被罰，因為公開處罰孩子是該文化的禁忌。另外，在HRAF中特質的分類也很粗略，舉例來說，在文化中巫術的重要性可能只被分成十分重要到不太重要的程度。另一個限制包括了被研究的文化本身。西方研究者對外界進行實地研究的學者接觸有限，所研究的文化並非所有現存人類文化的代表。還有，蓋頓的問題（如前述）也會是個議題。

❖ 跨國調查研究

調查研究已經在前面章節討論過。在此討論的是當研究者在其他文化中運用調查技術所引發的議題。跨文化調查的問題或限制原則上和在單一文化中進行調查並無不同，然而，通常在範圍及嚴謹度上要大得多，研究者要謹慎考慮調查是不是在此種情況下最佳的方法。

在不同文化進行調查的主要先決條件是研究者必須對其規範、實際狀況、和風俗有深入的瞭解。如果沒有深入瞭解，則在程序和解釋上很容易出現嚴重的錯誤。會講另一種語言並不夠，研究者還必須要全盤瞭解其文化並熟知調查方法。對另一個文化的知識是進入該文化前或計畫進行調查所必須具備的。和當地人密切的合作也很重要。

研究者在選擇哪些要包含在跨文化調查中的文化或國家應該要考慮到本質（如：理論上、研究問題）和實務的層面。調查研究的每個步驟（撰寫問題、資料蒐集、抽樣、訪談等）必須在要研究的文化中設計出來。一個重要的議題是，來自另一個文化的人如何經歷此調查。在某些文化中，調查和訪問本身可能是很奇怪、令人害怕的經驗，類似警方的訊問。

調查抽樣也會受文化脈絡的影響。比較調查研究者必須考量正確的抽樣架構是否可行、信件或電話服務的品質、以及到郊區的交通狀況。他們也必須知道人們遷徙的頻率如何、人們的居住條件、

住戶的人數、電話遍及的範圍、或通常的拒訪率等因素。研究者必須設計出該文化的抽樣單位，並考慮像家庭這樣的基本單位，在該文化中如何定義。另外可能需要一些特殊的樣本或方法。舉例來說，Elder（1973）在印度進行的研究指出，他低估了在中高收入家庭的幫傭人口。

在研究不同文化時，研究者要大幅修正在自己文化中問卷撰寫的方式。研究者要對問卷的用字、問卷長度、開場白、以及涵蓋的主題等特別敏感。他／她必須要知道當地的規範以及調查中可以 and 不可進行的主題。舉例而言，對政治議題的公開討論在某些社會中可能會對生命有所威脅；此外，討論宗教或性則可能是禁忌。除了其他文化議題，翻譯和語言上的同義字也可能造成問題（見以下同義字的討論）。另外如往返翻譯（後敘）的技術和運用雙語者都有幫助，但還是有些情境沒辦法用另一種語言來提出感興趣的問題。

訪談需要對跨文化的情境特別注意。訪員的選擇和訓練端賴其教育、規範和對其他文化的規則。訪談情境會產生像是隱私的規範、取得信任的方式、對保密性的想法、以及不同方言等議題。比方說，在某些文化中，訪員為了取得很短的正式訪問，必須花一整天的時間進行非正式的討論以建立關係。

比較研究者還必須注意到一種社會期待的偏誤——即「**禮貌上的偏誤**」（*courtesy bias*）。在文化規範很強的社會，導致受訪者必須隱藏自己的不高興或是提供訪員他想要的答案。受訪者可能因為文化規範而隱藏或誇大某些特質（例如：所得、成就、教育），此外，在提供答案的態度上（如聲調、情境等）也會改變其意義（見資訊箱14.5）。

在一個文化規範是限制開放性或保護隱私的社會中，要接近受訪者會是個嚴重的議題。除此之外，研究者來自另一個國家或文化也會是一大阻礙。在知道哪些機構或個人可以接觸、接觸的適當管道（如正式的介紹信）、怎樣維持良好關係（如：致贈小禮物）、以及這樣的安排對研究品質的影響等都牽涉到一些特殊的問題。在某

資訊箱 14.5

調查問題的跨文化回答

某個問題的陳述是否會回答端賴文化習俗、社會情境和回答時的態度而不同。回答的態度可能使原來的答案意義相反。

問題的回答

回答時的態度	是	否
客氣的	否	是
強調的	是	否

資料來源：改編自Hymes (1970: 329)

些文化中，賄賂、家庭關係、或地方政府的允許在接近樣本架構、某個城鎮的特定部分、或特殊的受訪者時是必要的。另外，研究者可能要先聲明會保密，並保護資料不外洩。

❖ 現有的量化資料

許多國家都可以取得很多變項的量化資料。比方說，Weil (1985，如前述)的學校教育和容忍度的研究就運用許多國家的調查資料。還有，大量量化資料的蒐集已經建立，從其他來源(如：報紙文章、官方統計、聯合國報告等)蒐集許多變項的資料。

其中一種資料來源，「世界政治社會指標手冊」(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Taylor and Jodice, 1983)建立過去35年來156個國家的許多指標。例如識字率、醫生的數量、都市化的程度、示威抗議的次數等等。並指出資料蒐集和分類的方式，因為要使用這些來自各國的資料相當複雜。

現存的跨國資料有很大的限制，許多是和其他統計一起使用的。變項的理論定義以及資料蒐集的信度可能因國家而有很大的差異。缺漏的資料是最常見的限制；某些政府有意誤導的官方資料則

是另一個問題；資料蒐集的國家也會有問題。舉例來說，在35年間，新的國家成立，而有些改名或國土有所變更。

現有的資料在主要國家資料館都有蒐藏，並以電腦格式儲存，研究者能進行國際統計資料的次級分析。舉例而言，Peacock等（1988）運用現有53個國家在1950到1980年間的統計資料，進行經濟不平等的次級資料分析，他們根據世界體系理論將所有國家分為三類，發現在三類中不平等漸增，在第一類（核心國家）中是下降的，但在另兩類則增加。

西方文化的偏誤

大多數社會研究都由接受西方文化為主流的教育、在此居住或工作的人所進行。這造成西方文化偏誤或種族中心主義的危險性。正如Myrdal（1973: 89）所言，「西方的取向可能會被視為是有所偏誤的取向。」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假設、思考模式、時代的導向、以及人類生活的基本價值。所有這些都會影響思考和社會關係。如果社會研究者能完全自外於文化或能以專業獨立於自身文化之外，則文化的偏誤可能就不會產生。但這是不切實際的，研究者太容易相信其假設、概念、發現和價值——這些都染上西方文化的色彩——可以應用在世界每個人身上。

大多數社會研究都存有文化偏誤。我們雖然不希望如此，但這並不代表社會科學研究就是錯的或沒辦法進行。這表示研究者需要覺知這些偏誤並持續與之戰鬥。有兩種方法可行：要覺察自己的文化對思考的影響，以及熟知其他不同的文化。

比較取向鼓勵研究者提出那些挑戰自己文化傳統的問題，此外，比較觀點也刺激研究者看到表面底下的真實。這些可能是深層信念、價值、和關係的象徵。研究者將自己變成多元文化的，則在進行社會研究時對問題和西方的偏誤更能察覺，而能改善社會研究。亦見資訊箱14.6之女性主義比較研究。

資訊箱 14.6

女性主義比較研究

女性主義經常比較研究者檢視跨文化的性別不平等和女性的一般經驗。密集的、質化個案研究是最常見的。理想上，研究者對特殊文化脈絡很敏感，而其結果會對政策有所影響。女性主義研究者質疑其他文化中男性導向的假設和關於女性的資料。舉例而言，他們質疑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的研究，認為這些研究經常忽略了其他文化中勞動力的性別歧異。結果是鼓勵強化女性的次等化。

女性主義比較研究很具爭議性。有些人批評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者是種族中心主義，具有西方文化的偏誤。他們認為女性主義的計畫是將自身經驗，通常是西方社會的白種中產階級，套在不同的文化上。其他人認為女性主義者假設這種全球的將女性次等化並未實際檢視某些特殊社會的條件。

文化相對主義是種族中心主義的相反，強調自身的價值。簡單的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人們應該在某個文化脈絡下去評斷其社會現實——也就是說，先以其語言來瞭解之。相反的，女性主義研究者依賴的是價值地位——偏好進一步的人類尊嚴和性別平等。因此，當女性主義研究者研究的是性別不平等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文化時，其價值就會和文化相對主義相衝突。研究性別奴隸的女性主義者會感到憤怒，中立和客觀抵觸其社會研究的基本取向。只指出其文化脈絡下可怕的情境可能會使這種女性次等化的經驗被孤立出來。Reinharz (1992: 123) 指出，「女性主義學者的挑戰在於，進行研究時避免種族中心主義及文化相對主義，並建立跨文化的團結。」

美國以外的一些社會研究者批評美國的社會研究太「本末倒置」(inverted) 或太自我中心。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的理論和

進行社會研究的方式變成世界的主流，許多美國人自大地假設這很自然，因為他們的方法和理論是最好的。這個問題和美國全球經濟、武力、政治主導、以及美國在國際商業和人口上的力量等結合在一起。

不幸的是，許多美國研究者從美國文化價值觀和信念出發，只引用在美國進行的研究。我們經常看到，他們忽略了對世界其他地方的關注，忽視美國以外學者所從事的研究（Connell, 1990），這是可預期的。所有的人，包括社會科學家，朝向成為其文化的產物，而研究資金和公眾利益就在如何定義「相關的」研究主題上造成一種窄化的壓力。

這種「本末倒置」的焦點是個問題，原因有二。第一，在美國建立的大量研究造成社會科學研究的帝國，而本末倒置的焦點會摧毀對這個星球之社會關係的瞭解。它只會透過美國文化的鏡頭呈現出狀態或事件，這樣很容易造成對廣大全球性議題以及對不同文化情境下人們的關心一些誤解。第二，許多研究者，特別是那些採用實證取向者，相信他們正在發掘人類的通則。如果他們只是基於單一文化而形成研究問題，只從單一文化來研究人，只引用在某一文化下的研究，他們的結果將不會是全球共通的。他們建構的是國家而非全球的社會科學。美國研究者在替比較研究找出合理性時，不能只在國家脈絡之下概化其研究，他們需要反對可能發生的種族中心主義（亦見Bradshaw and Wallace, 1991）。

特定的議題、方法或理論在應用到一個或幾個國家時可能有其限制，而其他的議題、方法和理論則可能通用全世界。因此，以國家和全球的社會科學來思考是有益處的（見Hiller, 1979）。宣稱社會學和其他領域是全球共通的科學並發現所有人類的通則通常是過度誇大的。這種宣稱只有在研究者運用跨國方法和概念並進行跨文化比較，並將之整合在研究設計中才可能為真。

歷史比較研究中的同義字

同義字的重要性

在所有研究中，同義字都是個重要的議題。在進行橫跨不同脈絡的比較時，以及當研究者身處的時代和文化與其所欲理解、蒐集資料的時空、文化不同時，都會產生這個議題。如果沒有同義字，則研究者就無法在不同文化或歷史時空進行相同概念的測量，就算能夠進行比較，也會使其相當困難。這和量化研究中測量效度的問題相當類似。

同義字的問題有程度上的差異。某種極端程度上，研究者會發現對其而言完全陌生的經驗（例如嬰兒被父母虐待致死），或是在某段時間或文化中非常獨特。另一極端，則是很細微的差異，很容易被忽視但又會比較造成影響。舉例來說，Elder（1973: 127）指出在用三種歐洲語言翻譯「朋友」（friend）時就會產生問題：

英文中的 friend，德文的 Freund 和西班牙文的 amigo 都是朋友。技術上，他們是一樣的翻譯。然而德文的 Freund 意思比較深刻，是和個人比較有關係的；英文中的 friend 則強度比較弱、泛指認識的人；而西班牙文的 amigo 範圍就更廣了，當天才見過面的都可如此稱呼。因此，「你有多少朋友？」這種問題在三種語言來說是不一樣的意義。

同義字的種類

同義字的議題對歷史比較研究來說很重要。研究者可能會誤會或解讀錯誤另一個時空或文化的事件。假設詮釋是正確的，研究者要對不同時空進行事件概念化或組織的比較也相當困難。如果他／她能完全掌握另一個文化，研究者仍會發現要從自身的時空、文化來呈現是有困難的。同義字的議題又可分為四種次類型：字彙上的

同義字、脈絡的同義字、概念的同義字、和測量的同義字。

❖ 字彙上的同義字 (lexicon equivalence)

「字彙上的同義字」是字、詞的正確翻譯，或是找出意義完全相同的字。這在兩種語言間最為清楚。舉例而言，在許多語言和文化中，那些高社經地位者對親密的人（如密友和家人）和比較次等者（如年輕人和低社經者），在私下或公共場合，有許多不同的稱呼和代名詞。雖然親密關係和公開關係這種概念是存在英文口語文化中的，但在英文中並沒有直接對等的修辭形式。在此種語言中，當提及「你好嗎？」如果改變代名詞可能指的是狀態或社會關係的改變。說英文的人甚至可能用其他非語言的方式來表達這一點。在視年齡為重要條件的文化中（如日本），就會有許多跟此相關的字是英文中所沒有的。比方說，沒辦法只說「我的兄弟」(my brother)，一定要指出是「弟弟」(my younger brother) 或「哥哥」(my older brother)。

比較研究者經常用一種技術叫做「往返翻譯」(back translation) 以達到字彙上的同義字。在往返翻譯中，句子或問題被翻成另一種語言，再翻回原來的語言。舉例來說，英文中的詞翻成韓文，而後再獨立從韓文翻成英文。研究者再比較第一個和第二個英文版本，例如在美國和日本大學生的比較研究中，研究者用英文設計問卷，之後由日本大學的工作同仁將問卷翻成日文。這時問卷可能會有些改變。在運用往返翻譯時發現了「30個翻譯上的錯誤，有些甚至是很重要的」(Cogan et al., 1988: 285)。

當概念中的某些字並不存在於另一個語言中（如：在北印度語中並無「信任」(trust) 這個字存在，土耳其語沒有「忠誠」(loyalty) 這個字）時，往返翻譯就沒有用。因此，翻譯就需要複雜的解釋，或者研究者就沒辦法運用某些特定的概念。

字彙上的同義字在歷史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字的意義會隨時間改變，即使是同一種語言。時空距離愈大，表達的意義改變的

可能性愈大。比方說，今天「雜草」(weed) 這個字表示不要的植物或大麻，但在莎士比亞時代，這個字表示布料。

當研究者試圖瞭解其他人的觀點時，對語言運用上細微變化的敏感度就很重要。舉例而言，Sewell (1980) 發現在一個半世紀以前，人們用一些特定的字來幫助他們瞭解其意識和社會經驗是有所不同的。然而，Jones (1983: 24) 指出，「從理論或語言到實際歷史詮釋，其共同因素造成的洞察之問題是在……相當原始的陳述之中。」

❖ 脈絡的同義字

「脈絡的同義字」是名詞或概念在不同社會或歷史脈絡下正確的應用。其試圖在特殊脈絡下找到同義字。舉例而言，在有不同強勢宗教的文化中，宗教領袖（如：教士、牧師、或猶太教牧師）會有不同的角色、訓練和權威。在某些脈絡下，教士是全職的男性專業人員，且必須是有錢、高自尊、高教育程度的社區領導者，還具備政治權力。在另一個脈絡下，教士可能是在暫時的集會時舉手的人，不具備權力。在這種脈絡下的教士可能是教育程度較低、低所得、被視為有點笨但無害的人。研究者如果問到「教士」卻沒有註明脈絡，則在詮釋上可能會造成很嚴重的錯誤。

脈絡也應用在跨歷史的年代上。舉例而言，「上大學」(attending college) 在今日和過去那種只有1%的有錢人能上大學有不同的意義。過去大多數學校人數不超過500人，全部都是私人的男性機構，並不需要高中文憑就可入學，而且大學的課程被認為是古典語言和道德的訓練。在100年前上大學和今天不同，歷史脈絡上大學的意義已經改變。

❖ 概念同義字

跨越不同文化或歷史時代而運用相同概念的能力即是「概念的同義字」。研究者身處在特定的文化和歷史年代中，其概念是基於

自身的文化和時代的經驗及知識而來。研究者可能會透過學習其他文化或年代而扭轉自己的概念，但他們對其他文化或年代的觀念會因現在的生活狀況而不同，這會造成一種持續的緊張，並產生一個問題：研究者是否能夠創造出一種概念，可以同時反映不同文化或年代的真實生活經驗，並且對研究者來說也很合理？

研究者的概念這個議題是更廣大議題中的一個特殊案例，因為概念在不同時代或文化可能是不相容的。那麼是否有可能創造出一些概念是在兩個或更多非常不同的文化或歷史情境中，都能真實、正確，並有效地代表其社會生活？舉例來說，Thomson（1967）指出在前工業時期，對時間和測量的主觀經驗有相當大的差異，守時或工作天的概念意義很不一樣，甚至根本不存在。若研究者有興趣進行20世紀末期和16世紀初期的比較，那就像是比較蘋果和橘子一樣。比方說，Hazelrigg（1973）討論在不同社會測量階級意義。雖然「階級」（class）這個字存在於許多社會，但階級體系（即：收入的角色、財富、工作、教育、與生產手段的關係）、階級的數量、在某個特定階級的意涵、以及階級類別或界限，在不同社會都不一樣，而使得跨社會的階級研究相當困難。

有時候，相同或類似的概念在不同的文化都存在，但是型式或強度不同。舉例來說，在許多亞洲社會，對外在、公共的表現和自我的定義以及私人、個人的表現和自我定義有很明顯的差異。一個人外在所揭露、表現出來的，經常和真實的、內在的感覺是分開的。有些語言甚至將此標示出來。面對公眾、家庭以外和私人以外的自我概念在西方文化也存在，但在社會上比較不重要。此外，許多西方文化假設內在自我是「真實的」，應該顯露出來，但這種假設並非在各個文化都成立。

也有時候，並沒有直接的文化同義字。舉例而言，日文的「ie」並沒有直接的西方概念的同義字。這翻譯為家族系統，但如Hendry（1987: 22）所解釋，「『家族系統』的整體概念是在比較的脈絡下，以外界對其影響的面向而來解釋日本人的行為。」「ie」

包括一條家庭線，可回溯前幾代，也延續到未來，它的意義比較接近歐洲封建時的「家族」，而非現代的家戶或折衷家庭。包含了過去幾代的祖先，以及未來非直系後裔的男性後代（或養子）。也可能包括宗教認同和財產持有的意涵（如傳給後代的土地或事業）；也可包括對祖先的責任感和承諾。「ie」也涵蓋了其他「ie」所形成階層關係的網，與社區中的社會地位。就很多理由來談，在二次大戰後，美國投入日本的勞動力合法地廢除了ie，並試圖引進一種非常不同的，外來的文化概念，那就是核心家庭。

概念上的同義也可以應用在不同歷史年代的研究。舉例而言，在尚未使用金錢的社會中，大多數人都自給自足，自己製作家具和衣物，或在以物易物的歷史年代中，要測量所得是大不相同的事，當很少使用金錢時，就沒理由從所賺得錢多寡來測量所得。計算豬隻、土地面積、幾雙鞋、奴隸、馬匹等可能還比較合適。另外，今天的窮人可能只完成8年的學校教育；家裡的電視是黑白的；住在小而破舊的房子；有的只是15年的、生鏽的破車。而在過去，貧窮代表的是睡在畜欄、在街上乞討、處於飢餓狀態、從未上學、有的只是人家不要的衣服。是的，除了物質的差異外，在特定社會和貧窮的概念上，現在和過去的貧窮可能是同義字。

❖ 測量的同義字

「測量的同義字」表示在不同情境下測量相同的概念。如果研究者發展出可適用在不同脈絡的概念，還是有這個問題：相同概念在不同的脈絡下，是否需要不同的測量？Armer（1973: 52）為此想法定義如下：「牽涉到測量的概念的同義字時，指的是測量工具是否在不同社會測量相同概念，不管其內容或程序是否明確。」他指出在不同脈絡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指標。研究者可能在某一文化中用態度調查來測量某概念，但在另一個文化則用實地研究。則議題就變成：研究者是否能以不同指標來比較其結果？

測量同義字的議題指出，歷史比較研究者必須檢視許多部分證

據的資料，以測量或確認理論架構。當證據以片段的型式存在時，研究者就必須檢視更多的直接證據以確認其架構。Sewll (1980: 9) 在其針對19世紀早期法國工作的研究中，指出此種類型的過程：

我們追求的概念是片段而部分的陳述，以行動的熱度所書寫，通常是不知名的人或一群人所寫，而且以非常異質的型式存在——會議上爭辯的紀錄、郵件、諷刺文學、小手冊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同時代的思想不依賴特定文本……而是依賴許多個別的片段、不完整的陳述、姿態、意象和行動所組成的整體意識型態的論述。

倫理

比起其他社會研究，倫理的問題在歷史比較研究中較不嚴重，因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較少直接接觸。但歷史比較研究和其他非反應式的研究技術仍共享一些倫理的考量。

初級歷史資料的運用有時會造成一些特殊的倫理議題。首先，用初級資料很難重製研究，研究者對所運用資料的選擇標準和對文件的外在批評造成個別研究者整合時的負擔。Novick (1988: 220) 指出：

史學家一開始會看到許多證據，通常是未出版的，他們以多年浸淫在資料中的經驗發展出對此證據的解釋——當然是將其覺察和假設結合在一起。史學家運用策略，最明顯的例子是詮釋，來讓其工作內容是「可替代的」，但副本並不十分類似。

文件或初級資料中的錯誤可能會造成對史學家欺騙的指控，特別是來自反對的歷史學派。

其次，保護個人隱私權可能會干擾取得證據的權利。某人的後

代子孫可能想要摧毀或隱藏私人文件或醜聞的證據。甚至是主要的政治圖像（如：歷任總統）也會想隱藏令人感到不好意思的官方文件。

比較研究者必須要對跨文化互動的文化和政治議題有敏感性。他們需要學習在某種文化內哪些是冒犯的行為。敏感度意味著對研究對象的傳統、習俗和隱私的意義表示尊重。舉例來說，男性在已婚婦女先生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訪談可能是種禁忌。

一般而言，拜訪另一個文化的研究者會希望和當地政府建立良好關係，他／她不會在沒有任何回報（如：研究結果）的情況下帶走資料。研究者本國或個人對軍事或政治的興趣可能與研究國家的官方政策有所衝突。研究者可能被懷疑是間諜，或承受來自自己國家、希望取得隱密資料的壓力。

有時候，研究者的發現也會造成外交的問題。譬如研究者檢視的是某個國家的墮胎現況，而後宣稱官方政策促使許多女性選擇墮胎，這可預期地會引起很大的爭議。另外，研究者若同情某個反政府組織的立場，則可能會因此入獄或被遣送出境。在其他國家進行研究的社會研究者應該要察覺這些議題及其行為的潛在後果。

來自「富有的」、高度工業化國家的研究者，若其進行的是在低度工業化國家之社經發展的應用研究，強調的是運用參與行動研究（見第二章）。這在實務和理論議題都是很重要的。發展研究者學到除非他們和當地居民緊密地一起工作、融入其一般的信念、並取得其合作與支持，應用研究計畫是不可能成功地持續下去（見 Mikkelsen, 1995）。除了應用研究的一般議題以及學習尊重當地文化，研究者身為整體研究計畫的一部分，還必須教導當地人該研究設計的因素。研究者要以很基本、視覺上的邏輯來示範研究的進行及其計畫對當地生活條件的影響（例如：運用新的食物儲存方法、去除寄生蟲、淨化飲用水等）。

結論

本章中，你學到將調查資料組織入歷史和比較資料的方法原則。近幾十年來，歷史比較取向重新受到重視。這在問大範圍變化的問題、或是瞭解跨越年代或不同社會間的社會過程很適合。歷史比較研究可以用幾種方式進行，但某種程度上，特定的歷史比較取向和實地研究很類似。

歷史比較研究常牽涉到研究的不同導向多於所應用的特殊技術。運用到某些特殊的技術，像是初級資料的外在鑑定。然而，歷史比較研究最主要的面向是研究者要如何建立問題、蒐集資料、並進行解釋。

歷史比較研究比起那些非歷史也非比較的研究要來得難以進行，其困難度在其他社會研究較為少見。舉例而言，同義字的議題在所有社會研究中都存在，而在歷史比較研究中，這個問題不能等閒視之，這對研究的進行很重要，並決定是否能夠回答研究問題。

重要名詞

過時	安娜學派	往返翻譯
貝肯的謬誤	刪去不雅文字	個案研究的比較研究
概念的同義字	脈絡的同義字	禮貌上的偏誤
批判的指標	跨國研究	文化脈絡研究
外在鑑定	蓋頓的問題	史學
人類關係地區檔案	內在鑑定	字彙上的同義字
長期	測量的同義字	智能
敘事歷史	不可考的資料	口述歷史
初級資料	重新蒐集的資料	持續進行之紀錄
次級資料	多國研究	

問題回顧

1. 歷史比較研究有哪些獨特的面向？
2. 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有哪些相似性？
3. 何謂安娜學派？其在研究過去時的取向有哪三種特質？
4. 批判性指標和支持性證據有何差異？
5. 研究者運用外在鑑定時會有什麼問題？
6. 運用次級資料有何限制？
7. 何謂蓋頓的問題？在比較研究中有何重要性？
8. 在社會研究中運用比較方法有何優點？
9. 跨國比較研究和在自身文化中進行的調查研究有何不同？
10. 同義字在歷史比較研究中有何重要性？有哪四種同義字？

質化資料分析

導論

量化和質化分析

相似性

相異性

解釋與質化資料

概念形成

質化研究的概念化

質化資料編碼

撰寫分析備忘錄

質化資料分析方法

連續的近似值

舉例法

分析比較

範疇分析

理想型

事件結構分析

其他技術

缺漏值，或負面證據的重要性

負面證據

缺漏值之限制

其他工具

質化資料應用軟體

圖示與質化資料

表面事實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社會學中許多很棒的研究都是以質化方法來進行的，沒有統計的假設。這對從組織和社區的研究領域、到面對面訪談的激視研究、和針對世界體系的鉅視研究而言都成立。這些不應該被視為是較弱的，或某些主題初始的「探索性」取向。

——Randall Collins, “Statistics versus Words,” p.340

導論

質化資料是以文本、書寫的文字、詞句或符號的型式來描述或呈現在社會生活中的人、行動和事件。除了偶爾的內容分析研究外，質化研究者很少運用統計分析。這並不表示質化資料分析是基於推測或模糊的印象，它可以是很系統化而邏輯清楚的，雖然和量化或統計分析的方法不同。

在過去，很少有質化研究者會說明他們如何進行資料分析。事實上，對質化研究最常見的批評是資料分析不夠明確或無法分開檢視。質化資料分析已朝向更精確且系統化的步驟取向發展。然而，沒有單一的質化資料分析取向是廣為接受的。在本章中，你會學到幾種質化分析的技術，有些較常用在歷史比較研究，而有些則用在實地研究。

量化和質化分析

質化和量化的資料分析形式有其相似性和相異性。

相似性

首先，兩種資料的分析形式都包含推論。研究者從社會生活的實證細節加以推論。所謂「推論」(infer)表示以證據為基礎，透過判斷、運用合理化、而後導致結論。這是找出原因並將資料的複雜性簡化後所得。這和進行原始資料的摘要有些不同，但也因研究的風格而改變。兩種資料分析的形式都確定社會世界的調查陳述是適當的(即，資料是可信的)。「在質化研究中，『適當性』(adequacy)指的是所蒐集資料的量，而不是像量化研究中的主題數目。當蒐集了足夠的資料並達飽和後，就能獲得其適當性。」(Morse, 1994: 230)

第二個相似性是兩種分析形式都包含了公開的方法或過程。研

究者有系統地紀錄或蒐集資料，這樣方可接近其他人的所作所為。兩種研究者都蒐集大量的資料，描述資料如何蒐集並加以解釋，其方法標準化和可見的程度可能會有所改變，但所有研究者某種程度上都會呈現其研究設計。「質化研究的研究設計並不總是很精確，但他們至少會在研究的每個環節都顯現出來。」(King et al., 1994: 118)

接著，所有資料分析的中心是比較，包括質化和量化資料。所以社會研究者都將蒐集到的或相關資料加以比較。研究者確認證據本身多重的過程、原因、特質、或機制。然後找尋類型——相似性和相異性，相同與不同的面向：

[質化] 研究者檢視個案間的相似性和相異性，試圖找出歧異性……量化研究者也檢視個案間的差異，但是以不同的假設、解釋不同變項之間的共變程度、通常是檢視很多個案……量化研究者典型上只對個案有很廣泛的熟悉度。(Ragin, 1994: 107)

第四，在質化和量化資料分析中，研究者都努力避免錯誤、有問題的結論、及誤導的推論。研究者也留意可能的謬誤。他們將各種解釋、討論、和描述加以分類，並評估各不同研究的價值，從中找出比較真實、有效或有價值者。

相異性

質化資料分析在四方面和量化分析不同。第一，量化研究者從一些特殊的、標準化的資料分析技術中加以選擇。在不同的社會研究計畫或跨國、跨社會科學之間，假設檢定和統計方法的變化不多。量化分析已經發展得很完備，其基礎是應用數學。相反的，質化資料分析就比較不標準化。質化研究各種可能的取向就和各種資料分析的取向相配對。質化研究通常是歸納的，研究者在開始一個計畫時很少知道資料分析的特性。Schatzman和Strauss (1973: 108)

指出，「研究者對於量化研究可以預測分析過程這一種操作上的優點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們無法透過一開始的操作將原始資料淬煉並納入研究設計之中。」

第二個差異是量化研究者會等到所有資料都蒐集完成並轉換成數字後才開始進行資料分析，並將數字排出順序以求其類型或關係。質化研究者會尋找類型或關係，但他們在研究計畫中比較早開始進行分析，當還在蒐集資料的階段即開始。早期的資料分析工作會引導接下來資料蒐集的工作，因此，分析比較不是獨立的一個階段，而是遍佈在研究過程中的每個階段。

另一個差異是和社會理論的關係。量化研究者操作那些代表實證事實的數據，以檢驗變項建構間抽象的假設。相反的，質化研究者藉由將實證證據和抽象概念混合在一起而創造出新的概念。質化分析舉出實證而不以檢驗假設的方式來顯示理論、概化或詮釋是可信的。

第四個差異是抽象化的程度，或者說是和社會生活細節的距離。在所有資料分析中，研究者將原始資料放進那些他們為了要確認類型或概化的類別中。在量化分析，這個過程的外衣就是統計、假設和變項。量化研究者運用變項間統計關係的符號語言來討論因果關係。他們假設社會生活是可以用數字來測量的。當根據統計法則來操作這些數字時，數字就揭露了社會生活的特質。

質化分析比起統計分析則不那麼抽象，而更接近原始資料。質化分析並不從大型的、建構完整的數學和統計的正式知識來著墨，資料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現，相對是比較不精確、模糊、以脈絡為基礎、而有較多意義的：

文字並不只是基本知識；在社會結構中他們甚至是高於數學的。文字是高度開放性的表達模式，比較有辦法連結各種論述和表達的主題，也比較能夠打動聰明的讀者（Collins, 1984: 353）。

解釋與質化資料

量化的解釋有許多形式。量化研究者並不需要在僵化的文字／一般規律的二分法中選擇——也就是說，在描述特殊性和確認通則之間選擇。而是由研究者發展出接近具體資料和脈絡的解釋或概化，但是更簡單的描述。他／她通常用比較低階、比較不抽象的理論，是紮根於具體的細節。研究者可能建立新的理論來創造社會生活的真實圖像，並刺激更多的瞭解，而不只是進行因果假設的檢定。這些解釋傾向於豐富的細節、對脈絡很敏感、而有辦法顯現社會生活複雜的過程或序列。這些解釋可能是有因果關係的，但並不一定如此。研究者的目標是將大量特殊的細節組織入當代的圖像、模型或一組彼此相關的概念間。

質化研究者很少試著記錄下共通的規則，而是將解釋分成兩大類：高度不同與真實合理的。研究者因為組織一個案例或補充一些支持性證據而感到滿足。他／她在增進其他可能性時，從思考中淘汰掉某些理論的解釋，因為只有少數解釋會和資料的類型一致。質化分析能夠透過顯示各種證據的反證來淘汰某些解釋。資料可以支持好幾個解釋，但不是所有的解釋都是一致的。除了淘汰掉比較不可能的解釋外，質化資料分析有助於確認事件序列或過程的步驟。這種時間順序是發現變項間關係的基礎，但在支持因果論述上很有幫助。

質化研究的分析形式和理論化有時候很難看到概化的狀況。某些質化研究者是完全描述性而避免理論分析。一般而言，最好是讓理論和概念明確。沒有研究者的分析詮釋或理論，質化研究報告的讀者會用其日常生活、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來理解。他們的常識性架構比較容易以主流文化價值而產生隱藏的假設、謬誤、種族中心主義以及定義不清的概念。

概念形成

在本節中，你將會學到主題或概念、編碼質化資料、並進行分析筆記的撰寫。質化研究者有時候會運用變項，但是大多運用一般性想法、主題、或概念作為分析工具以形成概化。質化分析通常運用非變項式的概念或簡單的名義變項。

質化研究的概念化

質化研究者在資料蒐集或分析之前即將變項概念化並將之轉化成測量變項過程的一部分。相反的，質化研究者形成新的概念或淬取紮根在資料中的概念。概念形成是資料分析的一部分，從資料蒐集的階段就開始進行。因此，概念化是質化研究者組織和使資料合理的方法之一。

質化研究者在主題、概念或類似的面向之基本上，藉由納入類別來分析資料。他／她發展出新的概念、形成概念的定義、並檢視概念間的關係。然後，研究者以序列將概念彼此連結，呈現反向組合（X和Y相反），或一組類似概念與理論交織在一起。質化研究者在閱讀資料（如田野筆記、歷史文件、次級資料等）或提出批判性問題時將之概念化。問題來自某學科訓練的抽象字彙，如社會學——舉例來說：這是古典衝突的案例嗎？角色衝突會呈現在情境中嗎？這是社會運動嗎？這些問題也可以是有邏輯的——譬如：事件的順序為何？這裡發生的方式和那裡比起來有何差別？這是一樣或不同的，一般或特殊案例？研究者經常在進行質化資料編碼時加以概念化。

在質化研究中，想法和證據是相互依賴的。這尤其被應用在個案分析研究中。個案並未賦予資料以外預先建立的實證單元或理論類別；他們是由資料和理論所定義。透過分析情境，研究者組織資料並同時應用以創造或點出個案特殊之處。創造一個個案，稱之為「形成個案」（casing），也就是將資料和理論放在一起。決定選擇

何者為個案解決了研究者所觀察的現象和概念間的一種緊張關係。「形成個案被視為是方法學上的步驟，能夠在研究過程中的任何階段產生，但特別會發生在計畫開始和結束的階段」（Ragin, 1992b: 218）。

質化資料編碼

質化資料研究者在所有資料都蒐集齊全後開始進行資料編碼。他／她安排變項的測量，以數字的形式納入機器可辨讀的統計分析當中。

編碼資料在質化研究中有不同的意義和角色。研究者將原始資料放進概念的類別並創造新的主題或概念，這是之後要用來分析資料的。與其用簡單的書寫任務，質化編碼可說是資料分析的統整部分。這是由研究問題所引導，並牽引出新的問題。它使研究者從原始資料糾纏不清的細節中解放出來，並鼓勵更高層次的思考。並使研究者朝向理論和概化的方向前進：

編碼是賦予單位意義的標籤，以便在研究中進行資訊的描述或推論。編碼通常有各種不同大小——字、詞、句子或整段，連接或未連接到某個特殊場景（Miles and Huberman, 1994: 56）。

編碼是兩個同時發生的動作：機械式地將資料減少、以及將資料放入分析類別的項目中。研究者賦予資料順序（見資訊箱 15.1）。「和日復一日機械式過程相反，真正的分析時刻可能會一瞬間產生內在洞察或形成模式出來」（Wolcott, 1994: 24）。資料編碼是將成堆的原始資料縮減為有意義的幾疊資料之辛苦工作。除了讓一大堆資料易於管理外，編碼也讓研究者能夠很快找到相關的部分。在費思量及獲得啟發的時刻之間，大量質化資料或田野工作的編碼，可能會是很累人而瑣碎的。Plath（1990: 375）指出，這擁有「所有一切看著一件褲子變乾所會有的戲劇張力」。她還說：

資訊箱 15.1

主題和質化資料編碼

「一個好的主題式編碼是抓取到現象中質化的豐富性。這在分析、詮釋、和研究的呈現是有用的」(Boyatzis, 1998: 31)。要將資料編碼成相關主題，研究者首先需要學習如何在資料中「看見」或認出主題。要看見主題有賴四種能力：(1)認出資料中的型態；(2)有系統而概念化地思考；(3)有技術性的知識或深度背景知識（如：知道希臘神話有助於瞭解莎士比亞的戲劇）；以及(4)掌握相關資訊（如：一個人要編碼搖滾樂音樂會，就必須要知道很多關於搖滾樂手和搖滾樂的知識）（見Boyatzis, 1998: 7-8）。編碼有5個部分：1到3個字的標籤或名字、主要特質的定義、如何在資料中認出編碼的描述「旗幟」、任何獨特性或資格、以及範例。如下所述：

標籤。性別角色爭論是一個例子。

定義。人際間口語的爭論是一實例，以及針對身為男性或女性在互動或獨處時，何為適當或可接受的兩性行為之間的衝突或爭辯。

旗幟。範例可能是伴隨兩性因其性別應有的舉止，而有的諷刺的語言、笑話、或不贊同（從很輕微到很嚴重的爭論）。

資格。只在同性間的爭論值得注意。任何行為（口語或非口語）都可以成為爭論的標的。明顯的同性戀或雙性戀者之間的互動則不包含在內。

範例。在教室外，16歲的Sara和Jessica在討論她們昨晚的約會。Sara說，「我們出去吃披薩——當然是他付錢囉。」Jessica則說，「當然？你是說你「期望」男生付帳？」Sara回答道，「噢，算了。」

在編碼時要避免3個錯誤（見Schwandt, 1997: 17），那就是只停留在描述的層面（而沒有分析）、將編碼當成一個機械式的過程、以及很固定而沒有彈性的編碼。

從許多資料轉移的任務會變得很嚇人。幾週，甚至幾個月，你沒有任何成果可以拿出來作為諸多努力的證據……這些歸檔工作是促使我們繼續努力瞭解某個特定的人之內在保證的外在顯示。

Strauss (1987) 對三種質化資料編碼下了定義，詳述如下。研究者在三種情況下檢閱資料，每次用不同的編碼，並在三階段編碼相同的原始資料。Strauss (1987: 55) 提出警告，「對沒有經驗的研究者來說，編碼是最難瞭解且最難操作的步驟。」

❖ 開放式編碼 (open coding)

「開放式編碼」是在剛開始蒐集資料的第一階段形成的。研究者擺放主題並給予初始碼或標籤，這是企圖將大量資料濃縮成幾類的第一步驟。他/她慢慢閱讀這些田野筆記、歷史資料、或其他資料，找尋重要議題、關鍵事件、或主題，再加以記錄。接下來，研究者在筆記卡的留白處或電腦記錄中，用不同顏色標示出初步的概念。研究者要開放心胸來創造新的議題，並在接下來的分析中更改此初始碼。如果以比較有彈性的態度來運用，則理論架構會有助益。

開放式編碼讓資料內部的主題浮現出來。這些主題是在低度抽象化的階段，並來自研究者最初的研究問題、文獻中的概念、在社會場域中人們使用的詞彙、或是在資料融合之後刺激出來的新想法。正如Schatzman和Strauss (1973: 121) 所說，對研究者來說，能在具體資料中看到抽象概念，並且在抽象概念和特定細節間往返是很重要的：

新手有時候會陷入企圖運用大量手段（即該學科的概念）的泥沼中，因為他們將之視為真的形式。有經驗的研究者和學者比較會將這些抽象的手段視為無物、或是他們呈現出來的現實；因此他們能夠在概念間自由移動。所以我們

促使新手將沒有生命的抽象概念轉換成故事——即使有一些故事情節在內。

實例之一可參考LeMasters（1975）針對勞工階級小酒館的實地研究，他發現在這些酒館中，婚姻常被拿出來討論。如果他進行田野筆記的開放編碼，他可能會編到一大堆關於「婚姻」的田野筆記。以下是一個例子，這是假設的田野筆記，可以用「婚姻」這個主題進行開放式編碼：

我星期四晚上打著領帶到酒吧，因為我的會面已經遲到了。Sam馬上注意到並說，「該死，博士啊，我只這樣穿過一次——就是我結婚的時候——你看看結果怎樣！看在老天爺的份上，葬儀社的人都已經等在路上了。」我叫了一瓶啤酒，然後問他，「你當初為什麼要結婚？」他笑著對我眨眨眼說，「不然你還能怎樣？總不能一輩子挑挑揀揀吧——我還單身時也的確這麼做過好多次了。」他停下來又點了一瓶啤酒，點一根煙，然後又說，「一個男人啊，早晚都想要有個自己的家、幾個小孩，要這些你就得結婚啊。沒辦法逃脫的——他們總會把你套牢。」我說，「Helen（他的太太）應該不錯啊。」他回答道，「唉，她不壞啦，但是她就好像綁在我身邊，這讓我很受不了。每次參加一個聚會，正開始好玩時，她就說，『我們回家吧』。」（改編自LeMasters, 1975: 36-37）

歷史比較研究者也運用開放式編碼。舉例而言，研究者研究勞工武士，這是美國19世紀的經濟和政治改革運動，閱讀在某個小鎮該運動的地區性分會之次級資料。在閱讀和記筆記的過程中，研究者注意到禁酒黨在地區選舉有很大的勢力，而禁酒令在地方分會有很大爭議。研究者最初的興趣在於內在結構、意識型態、以及武士運動的成長。禁酒令是新的、未期待的議題。研究者將這些筆記

標籤為「禁酒令」，並將之納為一個可能的議題。

雖然有些研究者（如Miles and Huberman, 1994: 58）認為研究者會有一張所有概念的清單，而後開始進行編碼，研究者也在閱讀資料筆記時就進行大多數編碼議題的概化。不管研究者是否從議題清單開始進行編碼，他／她在開放式編碼「之後」就會產生議題的清單。這樣的清單有3大目標：

1. 能幫助研究者一下子就看出主題間的結合。
2. 刺激研究者在未來的開放式編碼時發現新的議題。
3. 研究者用這的清單建立研究中所有議題的共通性，未來他／她在分析時可以重新組織、分類、合併、放棄或延伸。

質化研究者在編碼多完整、編碼多少細節上有所不同。有些人編碼每一行或每幾個字；有些人進行大段落的編碼，認為其他未編碼的資料是無用的。編碼到多細的程度視研究問題、資料的「豐富性」、即研究目的而定。

開放式編碼延伸到研究者在蒐集資料時所寫的分析筆記或備忘錄這部分。研究者在編碼時也應該寫備忘錄（詳見後續關於如何撰寫分析備忘錄的討論）。

❖ 主軸式編碼（axial coding）

這是資料的「第二層過濾」。在開放式編碼時，研究者著重在實際的資料，並賦予每個主題編碼的標籤。此時並不試圖找出主題間的連結或濃縮出主題所呈現的概念。相反的，在「主軸式編碼」時，研究者從一些有組織的最初編碼或初級概念開始。在這第二層過濾中，研究者焦點在先前的編碼主題多過資料本身。在此階段可能會產生其他編碼或新的概念，研究者就將之記錄下來；但基本任務是檢視最初的編碼。他／她朝向概念或主題的組織以及確認分析的主要概念這個主軸來移動。

Miles和Huberman（1994: 62）曾提出警告：

不論這些編碼是早是晚所創造或修正的，基本上都沒有其概念或結構的順序來得重要。編碼在研究的重要性中要彼此之間有相關；那應該是結構的一部分。

在主軸式編碼中，研究者會問關於原因和結果、條件和互動、策略和過程、並尋找群集的類別或概念。他／她提出以下這些問題：我能將現有的概念分成次類別或次面向嗎？我能將幾個密切相關的概念合併成比較一般性的嗎？我能將類別依序（即，A則B則C）、依地理區域劃分（即在哪邊發生的）、或是依其和主要感興趣的主題關係加以組織嗎？比方說，實地研究者研究工人階級的生活，將婚姻的一般性議題分成幾個次部分（如：訂婚、結婚典禮）。他／她將所有跟婚姻有關的筆記都納進來，而後將婚姻和性、家務分工、對孩子的看法等串連在一起。當某些主題在不同地方重複出現時，研究者就加以比較而看到新的主題（例如：男性和女性對婚姻的態度不同）。

在勞工武士這個歷史比較研究的例子中，研究者尋找和禁酒令相關的主題。他／她找關於酒館、飲酒或酒醉、此運動和贊成或反對禁酒令的政黨之間的關係等相關討論。圍繞在禁酒令的主題也包括了喝酒是一種休閒活動的形式、飲酒是種族文化的一部分、以及兩性間關於飲酒的差異等。

主軸式編碼不僅刺激關於概念或主題間關係的思考，也提出新的問題。這可以讓一些主題或檢視比較深入，此外，也可以增加證據和概念之間的關連性。當研究者將編碼以及證據合併在一起時，他／她會發現許多地方都有核心主題的證據，並建立緊密的網支持這些質化資料。這和信度以及測量變項的多重指標的概念很類似。主題和資料間的關係會被實證證據間多樣的例子所增強。

❖ 選擇性編碼（selective coding）

在研究者準備好進行資料最後一次的過濾時，他／她確認研究

計畫的主要議題。「選擇性編碼」包括了再一次掃描資料和之前的編碼。研究者有選擇性的檢視能反映主題的個案，並在大多數或所有資料完成編碼後進行比較或對照。這是在概念發展完成並開始組織幾個核心概化或概念間的全面分析之後開始進行。舉例而言，研究者研究在小酒館的勞工階級的生活，決定將性別關係變成一個主要議題。在選擇性編碼，研究者掃描過田野筆記、找尋男人和女人在談論約會、訂婚、婚禮、離婚、婚外情或夫妻關係時的差異。然後他／她比較男性和女性在婚姻中每個主題每一部分態度上的差異。

類似的，研究勞工武士的研究者決定將運動失敗的原因和其他政治團體的結盟形成主要議題。研究者從筆記中找尋武士和其他政黨間的比較和衝突，包括禁酒團體以及禁酒黨。和主軸式編碼的禁酒令相關的大量概念和主題有助其發現禁酒令議題是如何引發或抑制結盟。

在選擇性編碼時，主要的概念或主題最終會引導研究者的探索。他／她再一次組織先前編碼中所確認的特定主題並將之變成多個主題。舉例來說，在工人階級小酒館的研究中，研究者檢視對婚姻的意見以瞭解性別關係和不同生命週期這兩個主題。他／她這麼做是因為婚姻可以用這兩種方式來看待。還有，在勞工武士的研究中，研究者用禁酒令來瞭解失敗的聯盟之主要議題，也瞭解其他主題，像是該運動中的成員基於種族或宗教差異的其他資料來源。

撰寫分析備忘錄

質化研究者常常在寫筆記。他們的資料以筆記的方式來記錄，他們在筆記中寫下對方法或研究策略的看法等等。這些人是強迫性的記筆記者、將其筆記有組織地加以歸檔、常常有許多不同種類筆記的檔案：方法論議題的檔案（如：資料來源或倫理的議題）、地圖或圖表的檔案、最終報告可能大綱的檔案、特定的人或事件的檔案等等。

「分析備忘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筆記。這是在編碼過程中研究者寫給自己，有關於想法和概念的討論的備忘錄。每個編碼主題或概念形成每個備忘錄的基礎，而備忘錄包含對概念或主題的討論。初步的理論筆記形成了分析備忘錄的起始。

分析備忘錄建立了具體資料或原始證據以及比較抽象的、理論思考之間的連結（見圖 15.1）。包括研究者對資料和編碼思考的反映。研究者加在備忘錄中並用以檢視每一種編碼的資料。備忘錄形成在研究報告中分析資料的基礎。事實上，從品質好的分析備忘錄再重寫的部分可以成為最終報告的章節。

撰寫分析備忘錄所牽涉到的技術很簡單：筆和紙、一些筆記本、一些檔案夾、以及筆記的影印備份。有些研究者也用電腦，但不一定需要。有許多撰寫分析備忘錄的方法，每個研究者會發展出自己的風格或方法。有些人依其他研究者的經驗提出一些建議（見資訊箱 15.2）；某些研究者把備忘錄印好幾份，然後剪下來並分別放入分析備忘錄的檔案中。如果檔案夠大而分析備忘錄可以分門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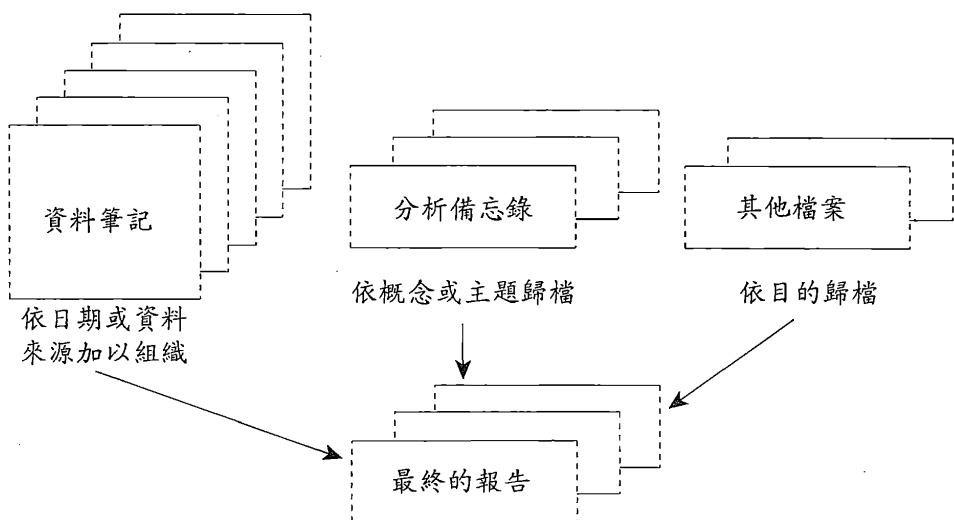


圖 15.1 分析備忘錄及其他檔案

資訊箱 15.2

撰寫分析備忘錄的建議

1. 在你開始蒐集資料後，馬上進行備忘錄的撰寫，並持續到最後的研究報告完成前才停止。
2. 在備忘錄上寫下日期，這樣你才能看到進度以及思考的發展過程。因為你必須每隔一陣子就修正備忘錄並納入研究的發展過程中，因此這樣在重新閱讀比較長的、複雜的備忘錄時會很有幫助。
3. 中斷編碼或資料的記錄以撰寫備忘錄。不要讓創造性的火花或新的洞察飄走了——馬上就寫下來。
4. 定期閱讀這些備忘錄並針對類似的編碼進行比較，來看是否可以合併，或是之間的差異可以怎樣澄清。
5. 把每個概念或主題的備忘錄分開歸檔。相同主題的備忘錄放在同一個檔案或筆記本中，加上概念名稱的標籤則可以清楚儲存。在分析過程中將備忘錄分門別類是很重要的。
6. 將分析備忘錄和資料筆記分開，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同。資料是證據，分析備忘錄則具備概念的、建構理論的意圖。他們並不是資料的報告，而是對資料如何結合在一起的評論或一般的主題、概念如何聚集在一起的實例。
7. 在分析備忘錄中指出其他概念。在撰寫備忘錄時，想想其相似性、相異性、或和其他概念的因果關係。在分析備忘錄中寫下來，以引發後續的整合和分析。
8. 如果兩個概念同時產生，將之寫在不同的備忘錄中。試著將每個不同的主題或概念放在不同的備忘錄和檔案中。
9. 如果備忘錄已經沒有要加入什麼新的資料，在此概念或主題上已達飽和，則在備忘錄中指出來。
10. 將編碼或備忘錄的標籤製作出清單，如此只要看清單就知道所有的備忘錄。當你定期將備忘錄重新分類時，記得重新組織此

清單以符合其分類。

資料來源：改寫自Miles和Huberman（1994: 72-76），Lofland與Lofland（1995: 193-194）以及Strauss（1987: 127-129）。亦參考Lester及Hadden（1980）。

類時（如：用不同顏色的紙標出來），這麼做很有用。其他研究者則在分析備忘錄的檔案中列出某個主題是在哪邊出現的，如此就很容易在分析備忘錄和資料間游移。因為資料筆記包含了特別標示出來的主題，就很容易發現資料中特殊的部分。一種折衷的策略則是持續記錄資料中主要主題的出現，但也包含筆記中一些關鍵的章節作為簡單的參考資料。

當研究者再次檢查並修正分析備忘錄時，他／她會和同僚討論並回顧文獻找尋新的想法。分析備忘錄可幫助概化潛在的假設，這在有需要時可以加入或捨棄，也可以發展出新的主題或編碼系統。

質化資料分析方法

編碼和撰寫備忘錄的技術在前面章節已討論過，這是很一般性而可以運用在大多數分析當中的。在質化資料分析中也有許多特殊方法。本節中，你會學到6種可能的方法：連續的近似值、舉例法、分析比較、範疇分析、理想型以及事件結構分析。質化研究者有時候會和量化研究方法合併運用。

一般而言，「資料分析」（data analysis）表示在資料中尋找類型——重複發生的行為、目標、或知識的本體。一旦確認了某種類型，就會用社會學理論或發生的場景來加以詮釋。質化研究者從歷史事件或社會情境的描述，到對其意義的一般性詮釋。

一種潛在可能發生的混淆是質化研究中各個不同階段資料的多重形式。比方說，實地研究資料是研究者所體驗、田野筆記中記錄下的資料、以及在最終研究報告所選擇或處理的原始資料（見圖

15.2)。資料分析包括了檢視、分類、評估、比較、綜合、思考編碼的資料並再度檢閱原始和記錄下來的資料。

連續的近似值

此種方法不斷循環或重複步驟，直到最後的分析。經過一段時間或幾次重複，研究者從資料中模糊的概念和具體的細節邁向概化的完整分析。這有點類似前述的三種編碼方式。

研究者從研究問題以及假設的架構和概念開始。他／她繼續深入探究資料，提出問題以瞭解概念和證據間符合的程度，並揭露資料的特質。研究者也藉由從證據抽象化創造新的概念，並修正概念使之更符合證據。而後研究者蒐集其他證據來面對第一階段所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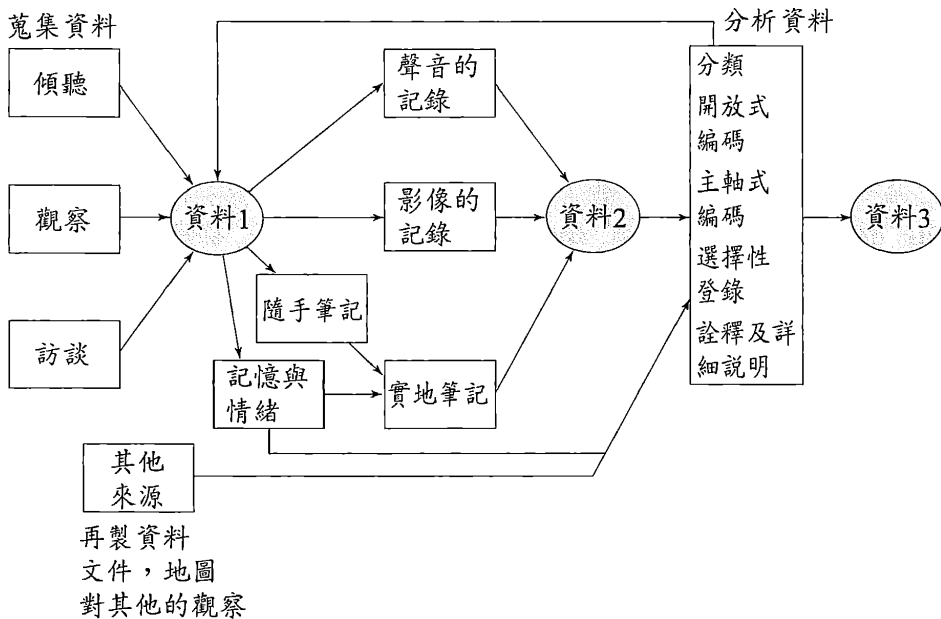


圖 15.2 實地研究的資料 (資料1 = 原始資料、研究者的經驗；資料2 = 記錄的資料、經驗的記錄；資料3 = 最終報告中所選擇的、處理的資料)

資料來源：改編自 Ellen (1984a: 214)。

未解決的議題，再重複這個過程。在每個階段，證據和理論彼此塑造，這稱之為「連續的近似值」(successive approximation)，因為修正的概念和模型越來越接近全部證據，而連續不斷地修正也使其更正確。

每次對證據的過濾都是暫時或不完整的。概念是抽象的、但是根植於具體的證據並反映了當時的脈絡。當分析朝向概化時對狀況條件都是主觀的，研究者再使概化及連結更能反映證據。舉例而言，歷史比較研究者相信歷史現實不是平均或線性的，而是間斷的階段或步驟。他／她可能將一百年的歷史區分成幾個時期，將連續的時間劃分為幾段並賦予其理論的定義。理論幫助研究者確認何者在該時期或不同期間是重要的，哪些又是很普遍的。如同Carr (1961: 76) 所言，「將歷史分割成幾個時期並非事實，而是必要的假設。」時間的中斷是人為的，不是歷史中自然的，但也不可隨意為之。

研究者在檢視證據之前無法決定要將時間分割成幾段。他／她可能會從較一般性的區分方式為之，但在檢閱過證據之後，會再針對這些劃分進行調整。研究者在新加入資料時會再度檢視證據、重新調整期間區分等。經過幾次循環，他／她在一百年中大約估計出期間作為連續的理論，並依此檢閱證據。

舉例法

另一種分析的方法則運用實證證據來舉例或支撐理論。在「舉例法」(illustrative method) 中，研究者將理論應用在具體的歷史情境或社會情境中，或是以前述理論為基礎來組織資料。先前存在的理論提供了所謂的「空盒子」(empty boxes)，研究者則看所蒐集到的證據是否能將之填滿。在盒子中的證據可能支持或反駁理論，這理論是研究者用來詮釋社會世界的有用手段。理論可以是一般模型、類推、或一系列步驟的形式。

舉例法有兩種變化。其一是顯示理論模型以指出特殊個案或單

一情境。第二種是研究者將多重個案（即單位或時間區間）並置的模式平行示範，以顯示某理論可以應用在多重案例上。在其他案例中，研究者從多重案例中舉出有各項特質的理論。平行示範的範例之一是來自Paige（1975）對農人階級衝突的研究。Paige首先發展出造成階級衝突的條件之複雜模型，然後從秘魯、安哥拉、越南等國提供證據來舉例。這例舉在許多個案中都顯示其模型的可應用性。

分析比較

英國的哲學家 and 社會思想家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發展出邏輯的方法來進行比較並沿用至今。其「一致法」（method of agreement）與「差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成為質化資料分析中「分析比較」（analytic comparison）的基礎。此種邏輯的面向也可以用在經驗研究中的比較。這和舉例法不同，研究者並不從將空盒子填滿細節開始，而是從先前存在的理論或歸納發展出規律或模式關係的想法。然後研究者將焦點集中在一些規則性，並和其他解釋相對照，然後尋找不受限於該特定情境（時間、地點、團體等）的規則。他／她並不是尋找通則，而是在社會脈絡下的規則。舉例來說，研究者在20世紀晚期的美國都會公立學校中尋找模式，而非應用在所有教育組織或行政體系中的因果法則。

❖ 一致法

一致法著重於研究者去注意什麼是個案間所共通的。研究者建立起所有共通結果的案例，然後試著將共通的因素放進來，雖然這些個案其他的面向可能並不同。這種方法透過淘汰的過程持續進行。研究者將那些有共同結果但並沒有共同原因之個案刪除。比方說，研究者檢視4個個案，不是小的社會團體或根本就是整個社會，這4個都有兩個共通點，但在其他面向則不同。他／她尋找一個或更多個共通的原因來解釋這所有個案共通的結果。同時，其他

可能性則被刪除，並確認少數幾個基本因素。研究者可以不管那些差異，而相似性依然存在。

❖ 差異法

研究者可以單獨運用差異法或結合一致法一起運用。差異法通常比較強，而且是一致法的「雙重運用」。研究者先找出在許多方面類似，但在一些關鍵部分有差異的個案，他／她突顯出那些結果和原因類似的一組個案，以及有差異的一組個案。這種差異法從正向個案（例如：有共通因果的個案）和負面個案（如缺乏因果關係的個案）來增強資訊，因此，研究者尋找的是：含有許多因果因素但缺乏少數關鍵面向造成結果不同的正向個案。

❖ 範例

一致法和差異法很難舉例。Ragin（1987）提供一種運用一致法和差異法的系統。見資訊箱 15.3 的實例。在一致法的例子中，a 和 b 在 4 個案例中是很普遍的，而在許多差異（c-q）以外則有很重要的相似性。假設案例 1 到 4 代表 4 個國家，而字母表示該國的特質，因此，a 是民主型態的政府，b 是具有相當強的社會階級之社會結構，c 表示軍隊很弱，d 是具有大型專業的軍隊，e 是大型徵兵制的軍隊，f 是大型免費公立教育體系等等。在運用一致法時，研究者的興趣在於橫跨這 4 個有發展民主政府型態案例來從 a 結果（民主政府）解釋 b（數個相當強的社會階級）的規則，他／她假設 b 是發展 a 的主要因素。

接著考慮資訊箱 15.3 後半的差異法。注意個案 1 和個案 2 有 5 個特質是類似的，他們和個案 5、6 的其他特質則不相同，除了特質 f 以外。研究者要如果沒有個案 5 或 6，在解釋造成 a（民主政府形式）的條件時會有困難，他／她無法將 b、c、e、f 和形成政府的重要性分開來。運用差異法並將像個案 4、5 等囊括進來，研究者要注意 x（獨裁政府）的發展排除了民主國家中普遍出現的特

資訊箱 15.3

一致法和差異法的範例

一致法

個案1	個案2	個案3	個案4
a	a	a	a
b	b	b	b
c	c	d	e
f	f	g	h
i	j	k	k
l	m	l	n
o	o	p	q

差異法

個案1	個案2	個案5	個案6
a	a	x	x
b	b	z	q
c	c	d	c
f	f	f	f
i	j	k	k
l	m	l	n
o	o	o	q

關鍵：每個字母代表社會中的一種特質

a= 該社會是民主型態的政府

b= 該社會具有相當強的社會階級之社會結構

c= 該社會的軍隊很弱

d= 該社會具有大型專業的軍隊

e= 該社會具有大型徵兵制的軍隊

f= 該社會有大型免費公立教育體系

g= 該社會有小型的私立教育體系

h= 該社會有極小的、菁英式的教育體系

i= 該社會具有單一全國性的宗教

j= 該社會有兩個相當強的宗教

k= 該社會有數個較弱的宗教

l= 該社會是熱帶氣候

m= 該社會是寒帶氣候

n= 該社會是溫帶氣候

o= 該社會有單一全國性的語言

p= 該社會有兩種相當強的語言

q= 該社會有一種主要語言及數種較少使用的語言

x= 該社會是獨裁政府

質。因此，研究的結論認為某些特質像是c（軍隊很弱）、o（單一全國性語言）和f（免費公立教育體系）可能不是造成a最重要的因素；另外，顯現出來b是關鍵的影響因素，這是在個案1和個案2這組以及個案5、6這組之間主要的差異（亦見資訊箱15.4的另一個範例）。

範疇分析

民族誌學家 James Spradley（1979a, 1979b）發展出「範疇分析」（domain analysis），這是分析質化資料一種創新而完整的方法。這種質化資料分析的組織結構之關鍵在以下詳述。

Spradley 將文化情境中基本的單位定義為一個「範疇」

資訊箱 15.4

遊民組織之成敗分析比較研究

Cress 和 Snow（1996）運用分析比較來分析從全美8個城市中15個協助遊民的社會運動組織之實地研究資料（1500頁的田野筆記）。他們確認4種運動所需要的資源——精神、物質、資訊和人力。他們藉由是否具有14種特定資源來測量運動組織的資源，至少要有這4類中的2類。舉例而言，特殊的精神支持是外界組織能公開宣稱支持，物質支持包括書面或電話的補充性服務，資訊支持包括曾參與會議的人，人力支持包括固定付出時間並遵從規則的志願參與者。

研究者確認運動組織是否可行（其中7個可行而8個則否），意指組織存活超過1年而至少每2個月開會一次。他們發現有9種特定資源是必須的，否則組織就會瓦解，並結合其他5種資源。這15個組織的發展是基於此9種必要及5種其他資源的結合其路線之一。

(domain)，是有組織的想法或概念。他的系統建立在分析範疇之上。範疇稍後會和分類以及更多主題合併在一起，以提供對文化或社會情境全面的詮釋。範疇有3部分：表面名稱、語意上的關係、以及實質名稱。表面名稱簡單說就是範疇的名稱；實質名稱是範疇的次類型或一部分；語意上的關係則告訴我們實質名稱在邏輯上是怎樣和範疇連結在一起的。舉例來說，在司法情境中證人這個範疇，表面名稱是「證人」；兩個次類別或實質名稱是「辯方證人」和「專業證人」；語意上的關係則是「某種的」。因此，專業證人和辯方證人都是某種證人。其他語意學上的關係如（表15.1）所列。

Spradley的系統是藉由分析民族誌實地研究者的術語所發展出來的，但可以延伸到其他質化研究。舉例來說，Zelizer（1985）藉由檢視19世紀末期對兒童死亡態度和行為的文件，來研究對兒童

表15.1 範疇關係中的類型

語意學的關係	運用的範例
是某種的	公車是某種的交通工具（某種交通工具）
是某部分 / 是某一塊	輪胎是車子的一部分（車子的一部分）
是某種方法	作弊是在學校獲得高分的方法之一（學生取得高分的方法）
是用於	火車是用於運送貨物的（運送貨物的方法）
是某種原因	高失業率是公眾不安的原因之一（公眾不安的原因）
是某階段	進攻是作戰的階段之一（作戰的階段）
是某種結果 / 是某種原因	燃煤工廠是造成酸雨的原因之一（酸雨的原因）
是做……的 地方	城中廣場是民眾聚集的地方（民眾聚集之處）
是某種特質	帶有金屬物、染髮是龐克的特色之一（龐克的特質）

社會價值的變遷。她可以將「對兒童死亡的態度」作為研究領域進行範疇分析，而她在文件中所發現的各種態度的說法都包含在內。態度可以用「是某種的」此類語意上的關係來加以組織。

Spradley 確認了3種範疇：通俗的範疇、混合的範疇以及分析範疇。「**通俗的範疇**」(folk domain) 包括在社會情境中成員的用語，要運用這些，研究者要很注意語言及其運用。此一範疇運用次文化術語中的關係或歷史行動者的語言來確認文化意義。

「**混合範疇**」(mixed domain) 則包含通俗範疇，但研究者再加上自己的概念。譬如某些跑者有其專業術語的稱呼（如：長跑者、田徑跑者），但是研究者觀察其他未被賦予專業術語的人，他／她則給那些人標籤（例如：偶然造訪者、新人、業餘者等）。

「**分析範疇**」(analytic domain) 則包括研究者和社會理論的詞彙。當這些意義在情境中是不被參與者所覺察、所承認、或隱密的時候最有用。研究者從觀察及文件中推論意義類別並確認類型，然後賦予其適當的詞彙。

範疇是從資料筆記建構而來，並嵌在筆記當中。研究者閱讀其筆記，尋找普遍的語意學關係（例如：是某種地方、是某種人、是某種感覺等）加以發現。他／她透過建立表面詞彙的清單來確認之。在例子中，司法證人或對兒童死亡態度是該範疇的表面詞彙，研究者接下來要從筆記的資訊中組織內涵的詞彙。他／她準備一張工作清單寫下表面詞彙、內含詞彙的清單以及語意學的關係。工作清單的範例詳見資訊箱15.5。

接下來，研究者從其筆記中找出範疇關係的範例。分析一直進行到所有相關的範疇都確認為止。他／她再透過比較相似及相異之處來組織這些範疇。最後，研究者將範疇重新組織入類型之中，並重新檢視這些範疇以創造出新的、更廣的範疇，將其他範疇納入內涵的詞彙當中。

Spradley 的範疇分析使大多數質化資料分析固定成6個步驟。研究者(1)重新閱讀有許多細節的資料筆記；(2)將這些細節在腦海

資訊箱 15.5

範疇分析工作清單的範例

1. 語意學關係：完全包含
2. 形式：X (是某種) Y
3. 範例：橡樹 (是某種) 樹

內涵的詞彙	語意學關係	表面詞彙
附有自助洗衣的旅館大廳		
果樹園	是某種的 →	棲身之處
橋下的廉價旅社		
僅容小車通過的小巷子		
公用廁所蒸汽柵欄		
結構問題： <u>你會稱小巷子為棲身之處嗎？</u>		

內涵的詞彙	語意學關係	表面詞彙
監獄巡警		
把食物掃光光的人	是某種的 →	監獄牢友
模範犯人拘留所		
清潔工		
監獄的理髮師		
結構問題： <u>你會稱模範犯人是某種監獄中的牢友嗎？</u>		

裡組織成一些概念；(3)從主觀意義的筆記或研究者的組織概念中再建構出新的想法；(4)從概念間尋求關係並將之納入一組組邏輯相似性的基礎上；(5)透過概念的比較和對照來將之組織成更大的群體；以及(6)用更廣的整合主題將這些群體重新組織和連結在一起。這個過程是從筆記的特點到全盤的邏輯關係而建立起來。

理想型

韋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被許多質化研究者所運用。理想型是社會關係或過程的模型或心智的抽象化。那是和能夠進行比較的資料或「現實」相反的純粹標準。理想型是用來比較的標準，

因為沒有任何現實能真正符合理想型。舉例而言，研究者發展出理想的民主之心智模型或理想的大學啤酒晚會。這些具有許多特質的抽象化並無法描述任何特定民主體制或啤酒晚會，然而，他們在運用到許多特定案例來瞭解每個案例符合理想的程度有多少時很有幫助。這個階段可以用前述之舉例法。

韋伯的理想型方法也可以補充Mills的一致法。回想前述的一致法，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何者是個案間普遍的現象，他／她在有共同結果的個案間尋找共通的原因。一致法本身暗示反對真正案例的比較，這種個案間的比較也可能是反對理想的模型。研究者可以發展出社會過程或關係的理想型，然後與特殊個案相比較。

質化研究者在兩方面運用理想型：對照脈絡的影響以及類比。

❖ 對照脈絡

採用強烈詮釋取向的研究者可以用理想型來詮釋那些成員對脈絡和文化意義很敏感的資料。他們不檢驗假設或創造概化的理論，而是運用理想型帶來每個個案的特殊性，並強調對獨特脈絡的影響。

在脈絡間對照的研究者經常選擇有戲劇性對比或差異特質的個案。譬如Reinhard Bendix（1956）在「工業時代的勞動與權威」（*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中進行許多不同脈絡下管理關係的比較，專制的蘇聯和工業化的英國。

在比較脈絡時，研究者不使用理想型在不同個案間作理論的舉證或用以發現規則，而是強調其特殊性和獨特性。其他分析方法著重在一般性而忽略了特性，相反的，運用理想型的研究者可以顯示出這些獨特的面向是如何型塑一般過程的操作。如同Skocpol及Somers（1980: 178）所說：

對照是從個別案例中提出來的。通常這種對照會隨著文獻資料對更廣泛主題、導向性問題或理想型概念的增加而發

展。主題和問題可以作為指出個案間差異性的架構，理想型可以作為使之敏感化的方法——每個個案要如何建立特殊性的基準點。

因此，理想型的運用方法之一是顯示環境、文化意義及特殊個案的觀點之特殊性，這對瞭解社會情境或過程而言是很重要的。理想型變成一種陪襯，如此一來，獨特的脈絡特質才容易顯現出來。

❖ 類比

理想型也用來類比以組織質化資料。「類比」是針對兩個相似的物體、過程、或事件。研究者用其表達想法並刺激邏輯的比較。類比透過指出讀者已知或熟悉的某事物來傳達資料類型的訊息。類比也可以描述深藏在許多細節下的關係，並且是在許多特殊事件中觀察出類型的快速法。這使得跨個案或情境的社會過程比較變得容易些。譬如研究者提出，當X開始說話時房間中安靜了下來，像是「有一陣冷風吹過」，這不表示房間中溫度下降或真的有一陣風，而是一種情緒上簡潔地表達有急遽的改變。還有，研究者指出在Y社會的性別關係是「女人被視為財產並當成奴隸一般」，這並不表示合法的性別社會關係被認定為主人與奴隸。它暗示奴隸與主人關係的理想型顯示出應用在Y社會中男性與女性關係主要的相似性。

運用類比法來進行質化資料分析就像是一種啟發式的方法（即：一種幫助人們學習或看見的手段），這可以表現出某些不知道的事情，而當研究者試著藉由指出深層的結構或機制來解釋資料時特別有用。理想型並不提供對解釋定義上的測試，而是指導將大量細節進行概念上的重新建構，重新納入系統的形式中。

事件結構分析

許多質化研究者依時序組織資料成敘事的形式以講述事件。「事件結構分析」（event-structure analysis, ESA）是一種資料分析方

法的新形式，能幫助研究者組織事件的發生順序，促使我們看到因果關係。此方法和電腦程式（稱之為ETHNO）首先用在實地研究資料，但是也可以運用在歷史資料上。在ESA中，研究者首先將資料以事件加以組織，然後在將事件納入時間序列中。

ESA和敘事方法的不同在於研究者並不只是重複故事，而且還把事件間的關係指出來。他／她將那些一定發生在前的事件和可能發生的區隔開來。電腦程式幫助研究者回答事件間邏輯關係的問題。比方說，某情境有事件A、B、C、X和Y。有人問研究者：X造成Y之前一定要有A嗎（也就是說：A是X對Y之因果關係的先決條件嗎？），或者X能在沒有A的狀況下影響Y嗎？如果這是必要的，A必須在X再度影響Y之前發生。這個過程促使研究者去解釋兩個事件間的因果關係是否是特有的，是單一關係或是會重複發生。

事件結構分析亦有其限制。它無法提供理論或因果邏輯，研究者必須補充這部分。它只能創造出地圖或圖像（藉助電腦程式）讓我們比較容易看出關係。當研究者決定可能的邏輯關係時，ESA確認一連串的事件並指出哪些可能有所不同。ESA並無法造成社會結構來組織事件的順序：研究者要加入其他傳統的分析。

Griffin（1993）對私刑的分析是ESA的例證。以許多口述歷史、書籍和新聞報導為基礎，他重新建構出在1930年4月密西西比州Bolivar郡對David Harris處以私刑的事件順序。在回答了許多關於事件序列可能連結的是非題並加以分析後，Griffin的結論認為主要因素是當地執法者應該可以阻止該事件發生，但卻怠忽職守。ESA濃縮圖示摘要如圖15.3。

其他技術

質化研究者還運用許多其他分析技術。在此，我們簡單地檢視其中4種技術，來說明其多樣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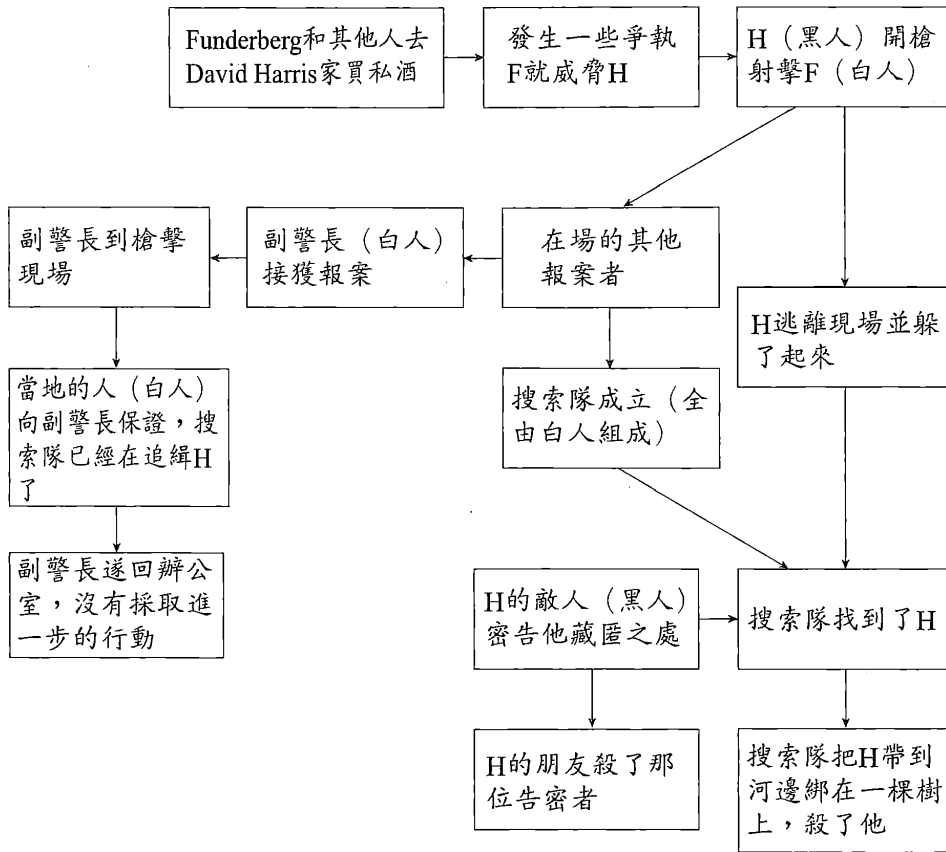


圖 15.3 David Harris 私刑事件之事件結構分析範例

資料來源：改編自 Griffin (1993)。

❖ 網絡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的概念在第三章的網絡理論以及第八章的滾雪球抽樣中皆已討論過。質化研究者經常「定位」一些人、組織、事件或地點之間的關係。運用社會地圖和類似的定位技術，可以發現、分析和呈現整組的關係。比方說，在某公司，Harry 給 Sue 下了一些命令，Sue 和 Sam 彼此諮詢並互相幫助。Sam 又從 Sandra 處得到

一些資料，Sandra和Mary的社交關係不錯。研究者發現網絡幫助他們看到並瞭解此一複雜社會關係的結構。

❖ 時間分佈分析

時間是一個重要的資源。研究者檢視人們或組織在時間上的運用或投資，以發現其隱性的規則或優先順序。研究者記錄花在各種活動上的時間長短。人們通常不很明確知道他們花時間進行的活動有多重要。舉例來說，研究者指出有些人要見某人時必須等待，但有些人卻不需要。研究者會分析時間長短、哪些人需要等待、等待時做些什麼、以及他們對等待的感受等。或是研究者記錄下人們認為公司中某些慶祝儀式並不重要，然而，大家卻都出席並且花兩個小時在這些活動中。這種在忙碌的工作中，集體式的兩個小時慶祝活動標示其在該文化或公司中隱含的重要性。

❖ 流程圖和時間序列

除了花在各種活動的時間以外，研究者還分析活動或決策的順序。歷史研究者傳統上焦點都在於記錄事件的順序，但是比較研究和實地研究者則亦檢視其流程。除了事件發生的時間，研究者也運用決策樹或流程圖標示出決策的順序，以瞭解事件或決策彼此間的關係。舉例而言，一個烤蛋糕這麼簡單的活動都可以標示出來（見圖15.4）。標示出步驟、決策或事件的想法、尋求其彼此間的關係可以應用到許多情境中。譬如Brown和Canter（1985）針對買房子發展出詳細的流程圖，他們將之分為50個步驟，標示出時間和許多角色（例如：找到買方、財主、調查員、買方的律師、廣告公司／房地產經紀人、賣方、賣方律師等）。

❖ 多重分類程序

多重分類是一種和範疇分析類似的技術，研究者可以用在實地研究或口述歷史上。目的是發現人們如何將其經驗歸類或將詞彙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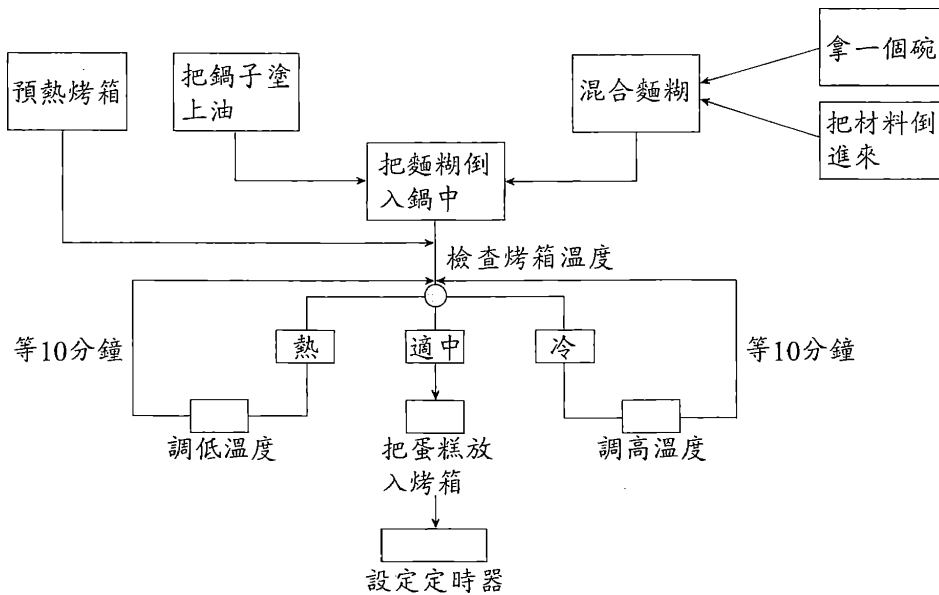


圖15.4 製作蛋糕的部分流程圖

入相似或相異的體系中。多重分類程序被認知人類學家以及心理學家所採用，可以用來蒐集、確認或分析資料。以下是其運作的方式：研究者將所研究的詞彙、照片、地點、人名等等列出一張清單，然後將之加以分門別類。這些主題或成員運用自己的分類。一旦開始歸類，研究者會問所用的標準。會再給這些主題一個詞彙，然後要求用另一種可能的方式分類。這有點像賽氏量表分類，但在這兒，分類的數量和項目的種類不同。更重要的是，此種分類的目的並不是創造出統一的量度，而是發現人們瞭解世界的各種方法。比方說（見Canter等，1985: 90），一位賭徒可以將8種賭博方式加以分類並歸納出5個主題，每一大類又有3到4小類。大類是以「賭場的等級」（高到低）來分，其他類則以「華麗的裝飾」、「賭注大小」、「能讓我賺錢」、以及「個人偏好」來分類。透過對這些分類的解釋，研究者可以看出其他人組織世界的方式。

缺漏值，或負面證據的重要性

你已經瞭解一些質化研究者分析資料的方法。強調的重點在於找出類型、分析事件、並運用模型來呈現資料的發現。本節中我們要檢視的是，那些「沒有」在其中的資料也可能有其分析上的重要性。

負面證據

要去瞭解沒有發生的事件可能很奇怪，但某些沒有發生的事可能有其意義，能提供有價值的內在洞察。許多研究者強調正向資料而忽略了那些資料中不顯著的，但對這些缺漏資料的敏感度也是很重要的。舉例而言，實地研究者注意到某些人在某情境中都沒有出現（如老人、男性），或是預期的事件未發生（如在酒吧中沒人抽煙）。歷史比較研究者會問為什麼某些事情不在證據之中（例如：沒有兒童虐待事件的通報），或是為何某些社會條件被忽略了（例如：美國的工業社會有高嬰兒死亡率，但卻未成為主要的公共議題）。

在閱讀筆記和進行資料編碼時，很容易忘記沒有出現的事件，而要記得那些在資料中不顯著但很重要的事情很困難。技術之一是進行心智實驗。舉例而言，如果當初南方打贏了美國內戰，現在事情會有什麼不同？另一個技術是在分析資料時去思考沒有發生的事件。比方說，為什麼那個人在沒有其他人的狀況下，不撿起地上的百元大鈔？比較也會有所幫助。譬如許多低社經的年輕人因為某種罪被逮捕，這表示中產階級的年輕人沒有涉入這些嗎？如果沒有，為什麼？

Lewis 和 Lewis（1980）提供了 7 種「負面證據」（negative evidence）以供思考。

❖ 未曾發生的事件

依過去經驗會有某些事件被期待發生，但並未發生。舉例來說，研究美國歷史的進步黨時代發現，許多大企業並未否決適度的勞工革命立法，在他們多年以來顯示出對勞工的敵意後，我們會預期否決的產生，然而，他們卻鼓勵改革，因為會平息漸增的勞工動亂。

類似的還有，當有力的團體未直接參與事件時，某些未曾發生的決策則出現其影響力，因為其權力位置可以造成哪些議題引起討論。舉例來說，某城市空氣污染嚴重，但卻沒有針對此問題的公共行動，因為「每個人」心裡都承認造成污染的工業在工作上、稅收上、以及社區經濟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污染工業不需要反對針對污染的法規，因為根本沒有這類法規。

❖ 人口群所未察覺的事件

某些事件或活動並未被在情境中的人或研究者所察覺。舉例來說，某段時間雇主認為只有受高等教育的女士才能從事神職工作並不是個議題，直到社會認知開始注意到性別歧視與平權的議題時，少數人才視之為對女性機會的限制。另一個實例是西部鄉村歌曲的作者否認有譜曲的慣例，在其缺乏察覺之外，透過旋律的內容分析發現，這種慣例其實很明顯可見。在某情境中的成員或參與者沒有覺察到議題的存在，並不表示研究者就應該加以忽視或不去挖掘其影響。

❖ 對象群想掩蓋的事件

人們可能會故意扭曲一些事件以保護自己或他人。比方說，菁英份子通常拒絕討論不道德的行為，而且可能長期以來都扭曲文件或公眾的認知。還有許多年以來，亂倫的個案有時候會被掩蓋，因為他們嚴重侵犯了社會禁忌。

❖ 忽略司空見慣的事件

每天，例行公事造成一種視為理所當然的態度。譬如電視節目中的對白這麼多，以致於常常不被注意。因為大多數人都有電視也都看電視，只有那種很少看電視的人或仔細分析的人會注意到某題材。或是研究者觀察某段歷史時期中抽煙是很普通的事，只有在他／她自己不抽煙或抽煙是他們那個時代的公共健康議題時才會注意到這個現象。

❖ 研究者先入為主觀念的影響

研究者必須小心不要讓先前的理論架構或先入為主的觀念，蒙蔽了自己在社會情境中對相反事件的觀察。先前有些強烈的觀念主導要觀察哪些、哪些資料才有相關，都可能阻撓研究者去觀察其他相關性或不確定的證據。舉例來說，研究者預期毒癮者和孩子之間會有暴力衝突，就馬上注意觀察這點，但卻沒看到他們之間也試著要形成一種愛的關係。

❖ 沒有意識地不加以報導

某些事件在研究者看來是不重要也不值得一提的，然而，如果記錄下詳細的觀察，批判式地重複閱讀筆記以找出負面案例則可能會發現一些被忽略的事件。比方說，一開始研究者並不認為公司野餐是重要的事件，然而在重新閱讀資料筆記並仔細思考之後，他／她瞭解這些事件在建立公司一體感上扮演了很重要的符號角色。

❖ 有意識地不加以報導

研究者可能會刪除情境或事件的某些面向以保護個人或在情境中的關係。舉例而言，研究者發現某個重要人物的婚外情關係，但想要保護其名聲與形象而不指出來。更嚴重的問題是倫理議題之一。當研究者將那些不支持其論點或詮釋的資料隱藏起來，就會產

生這個問題。研究者應該要呈現正反雙方的證據以確認其詮釋，則讀者可以權衡雙方證據以評斷是否支持研究者的詮釋。

缺漏值之限制

質化研究者需要對種族、性別、年齡和其他社會差異的區別很敏感。舉例來說，一位白人實地或歷史比較研究者，在一個多族群的社會中只將白人納入研究，就必須承認其分析是有限制的。如果研究者將所有面向涵蓋進來，則詮釋又可能有所不同。在進行資料分析時，研究者要問：哪些觀點沒被納入？這些事件是否已經從社會的全部角度加以考量過了？

還有，性別在大多數社會情境中是個顯著的社會類別。比方說，對過去的歷史工作研究來說，「領袖」全都是男性是相當普遍的，因此以其為一般社會生活加以論述。相同的事件（如婚姻、休閒、或工作）對不同性別則可能有差異很大的意義和暗示。Eichler（1988: 160）指出：「在資料詮釋中對性別的遲鈍有兩種基本形式：忽略性別是社會重要變項之一，以及忽略有關性別差異的社會脈絡。」這並不是暗示單一性別或單一種族的研究就沒有價值，而是當研究者在詮釋資料時，他們需要覺察到其他的觀點，不要讓他們所屬群體或所研究群體的特殊性，遮蔽了自己更寬廣的視野。

跟負面證據有很密切相關的是「反面個案方法」（negative case method）（Becker and Geer, 1982; Emigh, 1997）。這混合了特殊的個案分析和分析比較。在實地研究中，強調的是情境的複雜性，並顯示出其他的意義體系是如何在某個情境中運作的。在歷史比較研究中，研究者的焦點在於那些不符合廣泛實證類型或理論預測的單一（或少數）個案，這促使他／她重新解釋為何此個案不符合，並得以擴充對理論的瞭解。反面個案方法從分析比較加上了差異的方法，其焦點在於注意個案間的差異。透過注意為何這個或少數個案和其他不同有助於確認那些可能會被忽略的重要影響因素。譬如義大利並未和其他西歐國家同時邁向工業化，雖然他們的前提

條件都一樣。針對義大利特殊因素造成差異的仔細檢視幫助反面個案的解釋（即：未同時工業化）。這使得研究者更加瞭解一般的因果過程。

其他工具

1880年代末期，現在電腦的前身是很巨大的機器，將資料卡分類是在卡片上打洞。這樣的機器的確比較快而正確，很快就取代了紙筆作業。比方說，在1890年代，新科技讓美國普查局將資料回傳的時間從9年縮短到6個星期！1950和1960年代，美國陸軍和空間科技的附帶利益造成電腦科技戲劇性的進步。量化社會研究者很快地採用電腦，在1960年代末期，電腦就用在統計分析上了。更急遽的進步在1970年代，而1980年代微電腦的革命大大減少了電腦的體積和成本。在1960年代充斥一整間建物並花費百萬美元的東西，到今天只需一個盒子以及1,000美元。

質化資料應用軟體

量化研究者運用電腦來繪製圖表、分析並呈現數字資料已經超過30年。相反的，質化研究者邁向電腦化及圖表僅僅5到10年。研究者將文字輸入文字處理程式則可以很快搜尋某些字句作為編碼的資料，並將這些編碼連結到分析備忘錄中。文字處理也幫助研究者修正、並將編碼及片段移到田野筆記中。

在此，我們會想到那些特別為質化資料分析所設計的軟體。許多是很新的，而且時時在變。Weitzman及Miles（1995: 4）指出，「事情發生地如此快速，以致於許多質化研究者感到很困惑而不確定。」以下對軟體的瀏覽只包含了現在一些主要的取向。

❖ 文本復原

某些程式可以執行對文件檔案的搜尋。所能執行的和大多數文

字處理軟體所執行的搜尋功能類似。特殊的文本復原程式速度比較快而且可以發現相近的、拼錯字的、發音接近的字或同義字。譬如當研究者搜尋的關鍵字是「小船」(boat)，該程式也可以告訴你以下這些字是否出現：船 (ship)、戰艦 (battleship)、護衛艦 (frigate)、划艇 (rowboat)、縱帆船 (schooner)、船艦 (vessel)、遊艇 (yacht)、輪船 (steamer)、拖船 (tug)、獨木舟 (canoe)、小艇 (skiff)、單桅快速帆船 (cutter)、航空母艦 (aircraft carrier)、救生艇 (dinghy)、平底駁船 (scow)、單層甲板大帆船 (galley)、平底船 (ark)、巡洋艦 (cruiser)、驅逐艦 (destroyer)、旗艦 (flagship) 以及潛艇 (submarine)。此外，某些程式還能用邏輯字彙 (and, or, not) 來搜尋複合的字或詞，這稱之為「布爾搜尋」(Boolean searches)。舉例而言，研究者可能會在很長的文件中搜尋出現「大學生」、「喝酒」、「抽煙」的段落，但該段必須沒有出現「兄弟會」，布爾搜尋可以用「或」(or) 發現「大學生」和其他兩種行為的連結，再用「以及」(and) 將在同一段落中有這些的找出來，同時用「沒有」(not) 排除有「兄弟會」字眼的部分。

大多數程式可以顯示關鍵字或片語以及存在這些字的段落文本。該程式也可讓研究者在文本旁另外寫下備忘錄或添加一些短的註解。有些程式能計算所搜尋出的關鍵字數並指出其位置。大多數程式都有一套特殊的索引方式，是以研究者感興趣的詞來檢索。這類程式像是 Metamorph 和 ZyIndex。

❖ 以文本為基礎的管理程式

以文本為基礎的管理程式和文本復原程式很類似。主要的差別在於對搜尋結果組織或分類的能力。許多程式把文本資料分成一群一群以方便研究者作比較和對照。他們讓研究者用關鍵概念來將筆記加以分類，或增加一些真實的資訊。舉例來說，在訪談中有很詳細筆記的資料，研究者可以加上日期和訪談的長度、受訪者的性別、訪談地點等等，研究者可以運用合併關鍵字即增加訊息來將每

個訪談或訪談筆記的部分內容加以分類和組織。

除此之外，某些程式還有「超文件」(Hypertext)的能力。超文件是一種將詞彙連結到其他資訊的方式，你可以在該名詞上按滑鼠就可以開啟一個新的視窗(顯示相關資訊)。研究者可以確認關鍵字或主題然後在文本中加以連結。舉例而言，實地研究者想要檢視Susan和頭髮這個主題(包括剪髮、髮型、髮色、帽子等)，研究者用超文件連結到所有出現Susan的名字來討論其頭髮。透過在Susan名字的地方按下滑鼠，一個視窗很快就會跳出來，讓我們看到所有Susan和頭髮這個主題一起出現的部分。

有些以文本為基礎的管理軟體能從文件中的資訊製造出交叉分類的表格。舉例來說，學生在某堂課上持續寫日誌，他們用四種類別(無聊、刺激、有挑戰性、或有創造性)來紀錄每天的感覺，學生也描述每天主要的活動(如：團體活動、討論、看錄影帶、上課、或上台示範)。研究者就可以從學生的感覺和活動進行交叉分類。再加上一些其他資訊(如男性或女性)研究者則可以看出不同特質的學生對各種不同活動的感覺，並檢視感覺是否隨呈現的主題或學年時間而改變。這種程式例如askSam和Folio VIEWS。

❖ 編碼 / 復原程式

研究者經常會賦予質化資料(文字的田野筆記、訪談記錄、和錄影帶或錄音帶的逐字稿)編碼或抽象的詞彙。編碼 / 復原程式可以讓研究者在文件的每一行、句子、段落、或一大塊中附加編碼。該程式可以讓同一資料有多個編碼。除了附加編碼之外，大多數程式也可以讓研究者組織這些編碼。比方說，某程式可協助研究者抓出編碼的大綱或畫出關係之間的樹狀圖，並標出資料中哪些碼所指為何。質化資料在程式中可以依研究者的編碼和其所指定的的關係重新組合。這類程式像是Kwalitan和Ethnograph。

❖ 以編碼為基礎的理論建構程式

質化研究者通常對評估和理論的概化有興趣。以編碼為基礎的理論建構程式需要研究者首先賦予資料編碼。該程式提供在編碼間進行對照和比較的方法。編碼間的關係則成為研究者測試或概化理論的基礎。

編碼間所創造出關係的類型可能會因為程式而改變。程式可能會採取「如果—則便」(if-then)的邏輯關係或在事件——結構分析中運用。舉例而言，Corsaro和Heise(1990)描述他們如何將小孩子的實地研究資料編碼成不同事件。然後他們在事件中檢視其邏輯序列和關係以搜尋原則或隱性規則的文法。他們尋找造成事件間先後順序、合併、或獨立性的規則。電腦軟體ETHNO要求的是事件間的邏輯關連性(例如：時間順序、需要的前提、共同發生等)，而後顯示出事件的類型。

和其他質化程式相反，以編碼為基礎的理論建構程式在操作編碼以顯示出類型或不是很明確的資料關係上很有用。這讓研究者更容易進行資料的比較和分類。QCA這個程式(質化比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運用布爾邏輯或代數來幫助研究者分析數個案例的特質，並運用差異法和一致法。它用代數法確認整組個案資料的普遍和獨特的特質。和程式相比，代數並不困難，但可能很花時間，而且會產生人為的誤差。NUD*IST是這類的程式之一。

❖ 概念網絡建構程式

這類程式藉由圖表或網絡來幫助研究者建立並驗證理論。這些顯示出來的比圖表資料還多，可以協助研究者組織對於資料的概念或想法。該程式運用研究者在資料中確認的電腦節點或關鍵概念。然後顯示出節點間的連結或關係。大多數程式顯示方塊或圓圈的圖形，然後用箭頭來連接。其結果和流程圖看來有點像，在概念間顯

現出網絡連結。比方說，資料可能是好幾代家庭成員的家庭樹。家庭成員間的關係（X是Y的兄弟，Z和Y結婚，G則是X的孩子）可以用來討論且分析網絡間的特質。這類程式包括有MetaDesign和SemNet。

圖示與質化資料

質化研究者開始朝向以圖表的形式來呈現資料分析的摘要。他們有許多呈現資料的方式，圖表可以助其組織想法、並有系統地瞭解資料間的關係、也將結果傳達給讀者。研究者首先運用空間或時間地圖（詳見第十三章）、類型學（見第三章）、或社會性地圖。譬如在Fine（1987）針對少棒聯盟的研究，運用了社會性地圖來呈現球員間的社會關係。類似的還有Spradley（1979a, 1979b）的範疇分析中大量運用分類學。

量化研究者發展出許多圖表來呈現資料，事件結構分析正是實例之一。Miles和Huberman（1994）也提出資料呈現是質化分析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除了分類學、地圖、和清單外，他們建議可以用流程圖、組織圖、因素分佈圖、以及各種清單和表格來作分析的例舉（見圖15.5）。用圖來協助質化分析的例子之一是Broadbent（1989a, 1989b）對日本環境政治的研究。他在表中用了24個小格來分析並呈現其發現結果，6個不同的政治團體（如：政黨、工會、商業利益團體、立法委員）在最上端標示出來，4種程度的政治衝突（全國性、地方政府的、鄉鎮的、鄰里的）則由上而下排列形成24個格子。因此，每一格代表政治團體行動的層級。Broadbent在格子間畫出箭頭標示出結盟、政治衝突、或在團體間因特殊事件或政治行動所產生不同層級的政治影響。

表面事實

許多質化研究者有一種假設就是他們所蒐集的實證資料和所觀察事實背後的理論概念及結構有關。這種關係如圖15.6的模型指

範例1

人	上大學前有工作經驗	在大學中有打工經驗	現已懷孕	有自己的車子
John	是	是	不適用	否
Mary	是	不知道	否	是
Martin	否	是	不適用	是
Yoshi	是	否	是	是

範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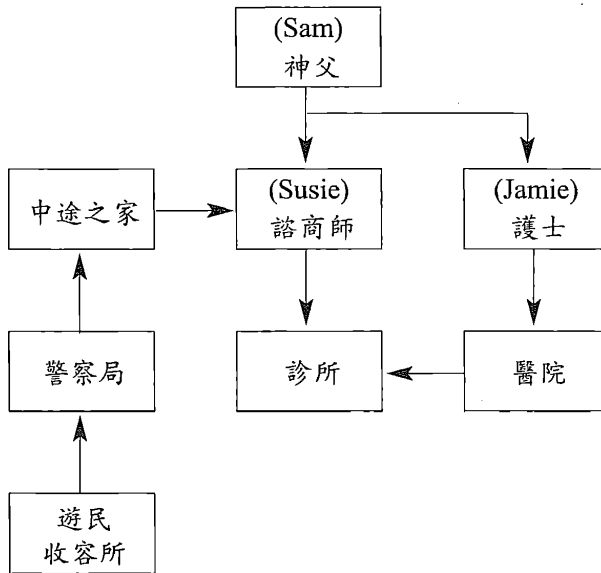


圖 15.5 質化分析中運用圖表的範例

出，研究者從觀察得來的表面現實資料只是在視覺、表面層次所發生的例子。研究者用資料來進行理論的概化和評估。同時，他／她假設現實表面之下還存在著更深的社會結構或關係。

我們所看到的表面現實只是部分反映了那些表象下的事情。表面上的事件我們稱之為「表面事實」(outcropping)，這是借用地質學的名詞「礦脈」(見Fetterman, 1989: 68)。在地質學上，礦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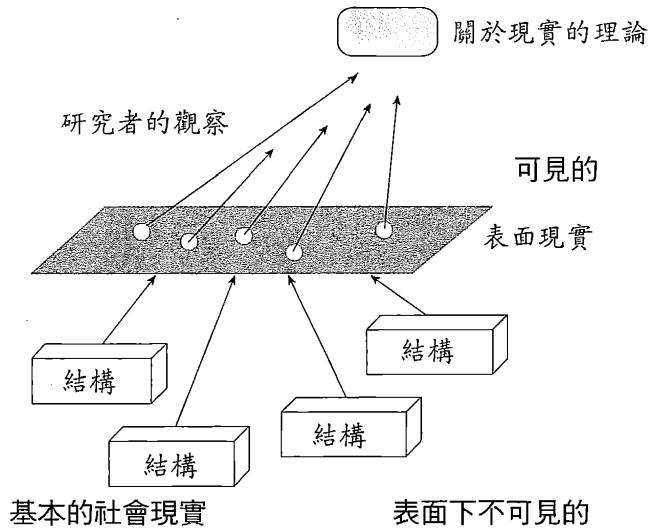


圖 15.6 理論，表面現實與基本結構

是岩床的一部分，露出表面讓人們看到。它是土地中間、堅硬特徵外在的表象。地質學家研究礦脈以得到表面下到底有些什麼線索。

在社會世界中有很多是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的。我們無法看到兩個人間深愛的關係；我們能看到的是外在的行為像是親吻、特別的行為、以及善意的舉止；類似的像是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社會結構比如社會階級。我們可以看到外顯徵兆的差異，像是人們的行為、其生涯規劃、其婚姻關係等。研究者運用質化資料分析來檢視並組織這些觀察到的資料，如此其對於社會世界的概念和理論才能不僅反映現實的表面層次，更重要的是反映那些我們無法看到的、表面之下的深層結構和運作的力量。

結論

在本章中，你學到了研究者如何分析質化資料。在許多面向上，質化資料比數字的資料難以處理。數字具備數學的特質可以讓

研究者用統計程序加以處理。質化分析則需要個別研究者更努力重複閱讀資料筆記，反映出他們所讀到的，並基於邏輯和判斷來進行比較。

大多數質化資料分析的形式都包括編碼和撰寫分析備忘錄。這兩者都很費力，因為研究者要不斷重複仔細閱讀資料並嚴加思索。此外，你學到了研究者用以分析質化資料的方法，有許多質化資料分析方法的實例；你也學習到思考負面證據以及那些未在資料中呈現出來的事件之重要性。

本章作為本書研究設計、資料蒐集和資料分析的結束。社會研究亦涵蓋了準備研究計畫的報告，我們將在下一章加以討論。

重要名詞

分析比較	分析範疇	主軸式編碼
範疇	範疇分析	空盒子
事件結構分析	通俗的範疇	舉例法
一致法	差異法	混合範疇
負面證據	開放式編碼	表面事實
選擇式編碼	連續的近似值	

問題回顧

1. 確認量化和質化資料分析的四種差異。
2. 概念化的過程在量化和質化研究中有何不同？
3. 資料編碼在量化和質化研究中有何不同？而質化研究運用了哪三種編碼方式？
4. 在質化資料分析中分析備忘錄的撰寫目的為何？
5. 請描述何謂連續的近似值？
6. 在舉例法中的空盒子所指為何？如何運用？

7. 一致法和差異法有何差別？研究者可以將兩者合併運用嗎？
8. 範疇有哪些部分？如何運用在範疇分析中？
9. 表面事實提供研究者哪方面的協助？
10. 檢視「負面證據」，或那些進行全盤分析時沒有出現在資料的部分有何重要性？

文獻檢閱與報告撰寫

導論

為何撰寫報告？

文獻檢閱

何處尋找研究文獻

學術期刊

書籍

論文

政府出版品

政策報告書及發表的文章

如何有系統地進行文獻檢閱

定義並修正主題

設計搜尋程序

尋找研究報告

記錄的內容

組織筆記

撰寫文獻檢閱

何謂好的文獻檢閱

在社會研究中運用網際網路

優點

缺點

撰寫過程

你的對象群

風格與筆調

組織想法

回到圖書館

過程

重寫

量化研究報告

摘要或執行摘要

呈現問題

方法描述

結果和表格

討論

提出結論

質化研究報告

實地研究

歷史比較研究

研究計畫書

何謂研究計畫書

以計畫書申請經費

結論

重要名詞

問題回顧

但那是我們的志業：合理地將想法加以排出順序，好讓其他人瞭解。我們必須在兩個層次上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用理論或敘事來排列一些想法，描述是哪些原因和條件造成我們所欲解釋的影響，並在邏輯、實證正確下進行……最後，我們希望建構出來的說明順序之文體是清晰的。我們不希望因為文章的不完美而誤導了讀者。這兩項任務需加以整合，無法獨立存在。

導論

社會研究是一個相互的活動。它包含了和他人的溝通，通常是以書寫的形式來溝通。如同你在第一章所學，共有主義的規範強調的是研究者有義務將進行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發現或結果加以公開。研究計畫在未曾和他人分享之前都不算完成。在本章你將學到研究報告的格式以及對他人研究報告的儲藏、修改和引用的系統。

雖然這是本書的最後一章，但不要等到研究計畫完成才來讀其他人的研究報告，或思考怎樣撰寫報告。好的研究在進行研究之前就需要閱讀許多其他人的報告，那些報告可以提供你對研究主題或議題的想法，是無價的概念和理論來源，會指導你怎樣將焦點集中在研究計畫上，也會提供你可能想要採行的資料蒐集或分析技術。研究初學者在研究進行前和過程中，應該要大量閱讀研究報告，以學習很多主題、發現他／她可能會用到的技術、並參考研究報告的形式。本章討論的就是研究報告、如何找出並閱讀研究文獻及相關資料、運用網際網路達成研究目的、以及如何撰寫研究報告。

爲何撰寫報告？

在研究者完成計畫或大型計畫的重要階段後，就是透過研究報告將發現呈現在他人面前的時候了。我們可以透過閱讀報告、參與科學且技巧式的撰寫課程等方式來學習如何撰寫研究報告。

「研究報告」(research report)是經由書面文件(或基於書面資料的口述呈現)，將研究計畫的方法和發現告訴他人。它比發現摘要要完整；也是研究過程的紀錄。研究者不能等到研究完成才開始思考這份報告；他／她必須及早開始思索，並在研究進行中就仔細記錄下來。除了發現以外，報告還包括開始此一計畫的原因、研究步驟的描述、資料呈現、以及資料和研究問題或主題間相關性的討論。

這份報告告訴他人，你，也就是研究者，做了什麼、有何發現。也就是說，研究報告是一種傳播知識的途徑。正如你在第一章所見，研究報告在將科學社群結合在一起這一點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他需要撰寫研究報告的理由還有完成課堂或工作上的要求、完成對出資贊助研究組織的義務、說服專業團體某個特殊面向或問題、或是告訴一般大眾你的發現。和社會大眾溝通很少是將科學結果傳播出去的基本方法，而通常是次級的傳播。

在研究過程中，不論你所採取的社會科學取向為何，檢閱在某個問題上前人所累積的知識都是早期重要的步驟。正如在生活中其他領域，試著自己找出答案之前，最好先找找看是否已經有解決方法存在。關於浪費時間在發明輪子的陳腔濫調是個很好的提醒，告訴我們在投注時間精力之前先作功課。這對研究讀者和專業研究者在開始進行一個研究來說都是事實。

我們先從文獻檢閱的諸多目的開始，也會討論何謂「文獻」(literature)，在哪裡可以找到文獻，內容為何。接著，我們將會探索有系統地進行檢閱的技術有哪些。最後，再來看怎樣撰寫文獻檢閱及其在研究報告中的位置。

文獻檢閱

文獻檢閱是基於以下假設：知識會累積，而我們可以從他人所完成的來學習。科學研究是一種由許多研究者，分享其發現並追求知識社群一種集體式的努力。雖然有些研究可能特別重要而使個別研究者出名，這畢竟是創造知識的過程中極小的一部分。今日的研究建立在昨日的研究之上。研究者閱讀報告並經過比較、再製、或批評其缺點。

文獻檢閱在廣度和深度都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回顧在完成4種目標（見資訊箱16.1）是很有力的。如果是個很廣的題目，可能花研究者1整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所有文獻的回顧摘要。相同研究者

資訊箱 16.1

文獻檢閱的目標

1. 顯示出知識本體的相似性並建立可信度。文獻檢閱告訴讀者，研究者知道此研究的領域及主要的議題。好的文獻檢閱增加讀者對研究者專業競爭力、能力、及背景的信心。
2. 顯示先前研究者所走的路徑，以及現在的計畫與其相關性。文獻檢閱標示出對問題研究的方向性及其知識的發展。好的文獻檢閱將研究計畫放在脈絡之中，並藉由與知識本體的連結顯示其相關性。
3. 整合並摘要該領域已知的知識。文獻檢閱將不同的結果拉在一起，加以綜合。好的文獻回顧指出該領域先前的研究者所認同、所不同意之處，以及主要問題何在。蒐集至今所有的知識，並指出未來研究的方向。
4. 從他處學習並刺激新的概念。文獻檢閱告訴我們他人的發現，則研究者可以從他人的努力中獲利。好的文獻檢閱指出盲點並建議另起爐灶的假設。顯露出值得複製的程序、技術、和研究設計，則研究者比較能集中在假設上，並獲得新的內在洞察。

在某個特定領域或許只用幾週的時間就完成非常集中焦點的文獻回顧。當開始進行文獻檢閱時，研究者決定要檢視資料的主題或領域，要進行到多深入，以及文獻檢閱要採用的形式。資訊箱 16.2 的 6 種形式是理想類型。特定的檢閱經常結合許多種類的不同面向。

所有的文獻檢閱都遵從第 1 個目標——顯示出知識本體的相似性並建立可信度——某種程度上而言。這是老師要求學生寫圖書館研究的報告原因之一。文獻檢閱如果只顯示出某領域的相似性很少會被出版，但卻經常是教育計畫的一部分。當此目標和第 4 個目標合併時，就成了「自我研究的回顧」(self-study review)。除了透過

資訊箱 16.2

六種文獻檢閱的類型

1. 自我研究的回顧，以增加讀者的信心。
2. 脈絡回顧，將特定計畫安置在大的圖像中。
3. 歷史回顧，回溯某一議題的發展。
4. 理論回顧，比較不同理論如何看待某個議題。
5. 整合式的回顧，將某一點過去所知的加以摘要。
6. 方法論的回顧，指出研究間方法論的差異。

研究者對同領域其他研究的評價而增進他人的信心外，還具有增進研究者自信心的附加效應。

撰寫文獻回顧最常見的原因是第2個目標：創造出和知識本體的關連性。這是背景或「脈絡回顧」(context review)。這通常出現在研究報告或文章的開端，介紹研究報告的其他部分，並建立其重要性和與研究問題的相關性。這告訴讀者研究計畫和大的圖像間怎樣彼此契合以及某知識領域的意涵。文獻回顧強調現在的研究如何持續發展思索的脈絡，或可以指向先前研究中某個問題或未解決的衝突。

另一種文獻檢閱結合了第2和第3個目標。「歷史回顧」(historical review)追溯某個概念的發展，或顯現出某個議題、理論如何隨著時間進化。研究者只有在田野中產生最重要的想法時才會進行歷史回顧。這種檢閱也用在研究思想史上。這種方式有時候會有助益，當學生剛進入某個領域，如此可以顯現出我們是怎樣走到現在的研究過程。他們可以在進階的知識中顯現過去簡單的概念是如何分裂成不同的概念，而又合併成更廣大的想法。

「理論回顧」(theoretical review)基本上是遵循第3個目標。它呈現不同的理論但目的是解釋同一件事，而後評估每個理論發現

的價值。除了檢視研究發現之預測的一致性外，理論回顧也進行其假設、邏輯一致性和解釋範圍的比較。研究者也整合兩種理論或將理論延伸出新的議題，有時候會造成混合——即歷史理論回顧。

「整合回顧」(integrative review) 呈現知識現在的狀態，並將發展迅速的領域其不同的研究報告拉在一起。研究者可以將這些有價值的回顧以文章的形式出版，嘉惠其他研究者。

「方法論的回顧」(methodological review) 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整合回顧。在此，研究者評估過去研究在方法論上的優勢，描述衝突的結果，並顯示不同的研究設計、樣本、測量等會造成怎樣不同的結果。舉例而言，研究者或許會發現如果都以男性作實驗，可能會和以兩性作實驗的結果不同。

「後設分析」(meta-analysis) 則是一種研究者運用在整合回顧，更多用在方法論回顧上的特殊技術。研究者將大量研究計畫的細節蒐集在一起（例如：樣本大小、出版時間、變項影響範圍等），然後針對這些資訊加以統計分析。比方說，Armstrong 和 Lusk (1987) 針對那些被擲回的郵件中所附的明信片進行後設分析。他們廣泛搜尋文獻，發現 34 篇研究檢視了這種問卷內附回擲明信片、高級或商業回函明信片、以及紀念或標準郵票等的影響。他們檢視明信片的類型，看哪些最容易被寄回。他們去看每個研究寄出去的問卷數、回覆的百分比、以及用的明信片種類，研究者發現當用的是高級的明信片而非商業回函，問卷回收率就高出大約 9%。

Cox 及 Davidson (1995) 則運用後設分析來檢視另類教育方案對少年犯的協助之研究發現。此種非傳統的教育計畫是特別為少年犯所設計，師生比很高、非結構式的環境、以及個別化學習。作者首先用電腦搜尋 3 種資料來源：ER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ircuit, 教育資源資訊聯盟)、PSYCHLIT 以及 NCJRS (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Reference Service, 全國犯罪司法參考資料服務)，從 1966 到 1993 年間的資料。他們尋找所有有提及對青少

年的另類教育方案的引用文獻，並發現有241篇被引用。接下來閱讀每篇文章以瞭解其是否符合3個標準：(1)提到獨特的課程；(2)是在單獨的地方或建築物中實施；(3)包括對方案結果的量化測量。在這241篇研究中，只有87篇全部符合這3個指標，研究者再檢查該研究是否採用特殊的統計測量或檢定；他們發現57份研究有進行統計。經過再次統計分析這57份研究的結果，作者提出這種方案對學校表現和自尊有些微進步，但並未直接減少犯罪行為。

何處尋找研究文獻

研究者用數種書寫形式來呈現其研究計畫的報告，大多數你可以在大學圖書館找到。研究者將其研究出版為書籍、學術期刊文章、研究論文、政府出版品、或政策報告書。他們也在專業會議上提出報告。這一節簡單討論每種類型，並告訴你在何處可以發現這些資料。

你可以在教科書中、報紙、通俗雜誌（如時代雜誌、經濟學人等）、以及廣播或電視新聞中發現研究的結果，但是這些並非科學研究的真正報告，而是報告的濃縮摘要。作家或記者擇其作為一般性的發表或教學的資料，為一般讀者而加以重寫。這種一般化缺乏科學社群在進行研究評估以及建立知識基礎時所需要的重要細節。

學術期刊

研究者進行完整的文獻檢閱會先檢視所有文章的出處。不同類型的報告需要不同的搜尋策略，讓我們從學術期刊開始，因為這是最多報告出現的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出處。正如你在第一章所見，他們是科學溝通體系的核心。

社會學因為學術期刊大量激增而被詬病。批評家指出許多期刊大量出現，允許刊載任何研究，不論是有多多少缺點或多麼的瑣碎也加以出版，卻沒有人會去閱讀。但證據並不支持此一論點。

Hargens (1988) 發現社會科學的退稿率比自然科學來得高，現在的退稿率又比20年前高。他 (Hargens, 1991) 也發現大約有200多本期刊刊行社會學研究，此數據自1970年代以來都很穩定，期刊和文章的數量大致維持和社會學博士的數目平行。至於說沒人閱讀那些文章，以379篇文章為樣本，其中43%在出版後第1年被其他文章所引用，83%則在出版後6年間曾被引用。

大學圖書館中一定會有學術期刊的專區，只有少數會和其他書籍混雜在一起。看一下圖書館位置圖或向圖書館員洽詢即可找到此區域。最新的一期通常會另外放在「當期刊刊」區。這麼做是暫時擺放以供查詢，直到圖書館收到該卷的每一期。更常見的是圖書館員會在將這些期刊納入永久收藏之前，即將同一卷的每一期裝訂成冊。

許多不同領域的學術期刊也和一般性期刊放在一起。所有都是期刊，或者在圖書館學的術語中都是「同一系列的」(serials)。因此，你會發現一般性期刊(如時代雜誌、道路雜誌、四海一家、亞特蘭大月刊等)會和天文學、化學、數學、文學、和物理學，以及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工作、與教育等學術期刊擺在一起。有些領域的學術期刊較多，「純」學術領域的期刊通常比「應用」或實務領域，像是行銷或社工為多。期刊會以名稱序列製作書目表或電腦分類系統。圖書館會提供你該館所訂閱期刊的目錄(見表16.1之期刊清單)。

許多圖書館並不保存書面的過期期刊。為了節省空間和開支，他們只保存微縮膠片。許多學術領域都有上百本期刊，每本每年約花費50到1,500美元，只有大型研究圖書館能訂閱所有的期刊，因此你可能必須要透過「館際借閱服務」(interlibrary loan service)，這是圖書館彼此間借調書籍資料的一種制度，來向其他圖書館調閱某份期刊或某篇文章。很少有圖書館允許最新一期的期刊外借，你必須要在圖書館內使用。而有些學術期刊有電子版本可以透過電腦或網際網路閱讀。

表 16.1 社會科學之英文學術期刊

一般社會科學	Criminology (American Society of Crimin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Evaluation Practice (American Evaluation Association)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Criminology
Evaluation Review	Law and Social Inquiry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Human Relation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Social Justice: A Journal of Crime, Conflict and World Order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Social Science Journal (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族群關係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Southwester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Ethnic Forum
Theory and Society	Ethnic Group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人類學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American Ethnologist (American Ethnological Society)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Negro Educational Review
Ethnology	Phylon: The Atlanta University Review of Race and Culture
Human Organization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Race and Class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Mankind Quarterl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Review of Black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犯罪學 / 法律	
Contemporary Crisis	比較——歷史研究
Crime and Delinquency (National Council on Crime and Delinquen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rrectional Psychologists)	Cross-Cultural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hang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 Cha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Social Science History
- 政治科學 / 政治社會學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Canad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有法文版)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ociology
 Journal of Politics (South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olitical Methodolog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Politics and Socie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Union for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 社會學
 Acta Sociological (Scandinav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ociology (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Canadian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Association)
 Critical Sociology
 Current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Humanity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for Humanist Sociology)
 Rural Sociology (Rural Sociological Society)
 Social Forces
 Social Problems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s)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Focus (North Centr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Forum (Eastern Sociological Society)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Wisconsi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Alpha Kappa Delta, Sociology Honor Socie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Practice (Sociological Practice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Practice Review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Midwest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量化研究方法
Sociological Review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Spectrum (Mid-Sout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ociolog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Sociology (British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教育 / 青少年社會學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社會工作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 Welfare (American Public Welfare Association)	Urban Education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社會心理學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Social Service Re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實地研究 (亦參考人類學)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Qualitative Inquiry	Small Group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性別議題	家庭和青少年
Feminist Issues	Adolescence
Feminist Review	Family Process
Feminist Stud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Gender and Society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NWSA Journal (National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Sex Roles	Marriage and Family Review
Women and Politics	Youth and Society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一旦你找到期刊區，先在走道間走一趟，瀏覽一下架上有哪
些期刊。你會看到每一卷都有許多研究報告。每份期刊都有一個
編號，就像一般圖書館中的書籍一樣。圖書館通常以期刊名的字
母順

序加以編號。有時候因為期刊會改名，則會因為放在原標題的位置而造成混淆。

學術期刊因領域和類型而不同。大多數包含在學術領域中研究報告的文章。因此，大多數學期刊包括新的數學研究或證據的文章，文學期刊包含當代文學及文學作品評論，而社會學期刊包括社會學研究報告。有些期刊涵蓋的領域較廣（如：社會學、心理學、教育、政治科學），並包含這所有領域的研究報告。有些則鎖定在某些次領域（像是家庭、犯罪學、兒童學前教育、比較政治等）。也有一些混合的出版刊物試圖想搭起學術期刊和一般雜誌的橋樑（例如「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和「社會」（Society）等期刊）。另一種混合式的期刊焦點則在某領域的知識如何運用或教學（如「社會學教學」（Teaching Sociology）和「心理學教學」（Teaching Psychology）等）。某些期刊內混合了研究報告、書評等，有些則只有研究報告。某些期刊特別針對書評、文獻檢閱、政策分析和理論文章。

學術期刊很少是每年或每星期出版一期，大多數是一年出版4或6期。譬如「社會學季刊」（Sociological Quarterly）就是一年出刊4期。為了幫忙找到需要的文章，圖書館員和學者發展出一套搜尋學術期刊文章的系統。每一期都有日期、卷期以及期數，這些資料有助於找尋文章。這些訊息——細節像是作者、標題、和頁數——這稱之為文章的「引用」（citation），並運用在文後的參考書目中。當某種期刊開始發行時，它會從第1卷第1期開始，而後逐漸增加。雖然大多數期刊都依循這套系統，但還有不少例外，因此你在引用時要注意。對大部分期刊而言，1卷即代表1年，如果你看到某本期刊已經有52卷，這可能表示此一期刊已經存在52年了。大多數但並非全部的期刊，都會從1月開始印行。

大多數期刊的頁數會以卷來計算，而非以期計算。也就是說，某卷第1期從第1頁開始，而頁數一直累積到整卷完畢。舉例來說，第52卷第4期的第1頁，在期刊上可的頁碼能是第547頁。大

多期刊有每一卷內容目錄的索引，並有文章標題、作者以及該文章起始的頁數。每一期少則1、2篇文章，多則50篇，大多數是介在8到18篇之間，每篇可能5到50頁的長度。文章通常會有「摘要」(abstracts)，有的在文章的第1頁加以簡短敘述，有的則是將所有摘要集中放在當期的最前面。

文章的引用是最容易找到該文章的資訊。假設你想要找關於黑人間膚色和階級的文章，如果你翻到本書的書目，你會發現以下的引用：

Keith, Verna M., 以及 Cedric Herring (1991)。黑人社群中的膚色和階級。「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 760-778。

這告訴你你可以在「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年出刊的某期找到這篇文章。引言並沒有指出出版月或期刊數，但提供了卷期97以及頁數760-778。

引用文獻的方法很多。在教科書中引用的格式就各有不同，在文章中插入作者的姓和出版年份是一種很普遍的作法。而完整的引用則單獨放在參考書目的地方，這也有很多形式，引用書籍或文章又各有不同。在引用文章時，最好查一下教授、期刊等要求的格式是什麼，幾乎所有都包含作者姓名、文章標題、期刊名、以及卷數和頁碼。在這些基本資訊之外，還有很多變化。有些包括作者的名字，有些只用姓氏；有些包括所有作者，有的只列出第1作者；有些包括該期的出版月份，有的則沒有（見表16.2）。

引用的格式可能很複雜。在社會科學中兩種主要格式的工具是：「芝加哥格式手冊」(Chicago Manual of Style)，其中大約有80頁談論如何引用的格式，以及「美國心理學協會出版手冊」(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 Manual)，整本手冊大約有60頁厚。在社會學也有「美國社會學瀏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格式，大約有2頁針對格式加以說明，被廣

表 16.2 期刊文章不同的文獻引用

美國年代最久的社會學期刊「美國社會學學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之中有一篇Bill McCarthy和John Hagan所寫，關於多倫多青少年遊民的研究報告。這篇文章出現在1992年11月(第3期)的第597至627頁，這期刊每年是從3月出刊。本文在第98卷，即第98年。以下是引用此篇文章的幾種方法。兩種很普遍的格式是「美國社會學瀏覽」(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SR)以及「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格式。

ASR格式

McCarthy, Bill and John Hagan.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597-627.

APA格式

McCarthy, B., & Hagan, J.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597-627.

其他格式

McCarthy, B., and J. Hagan.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992), 597-627.

McCarthy, Bill and John Hagan,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 J. of Sociol.* 98:597-627.

McCarthy, B. and Hagan, J.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November):597-627.

McCarthy, Bill and John Hagan,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3): 597-627.

McCarthy, B. and J. Hagan. (1992).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597-627.

Bill McCarthy and John Hagan, "Mean Street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Situational Delinquency among Homeless Youth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no. 3 (1992): 597-627.

泛運用。

書籍

書籍可以提供許多資訊、引發思考以及娛樂。書的種類很多：圖畫書、教科書、短篇故事集、小說、通俗文學或非文學、宗教書、童書等等。在此我們關心的是那些含有原始研究報告或蒐集有研究文章的書籍。圖書館有書架專門擺放這些書，並加以編號，就像其他書一樣。你可以在圖書館分類系統中發現其引用資訊（如標題、作者、出版社）。

Hargens（1991）指出社會學研究引用書籍跟引用文章一樣頻繁，他視社會學的文獻是介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自然科學比較依賴文章，而人文科學比較依賴書籍。

要區辨出某書中的研究報告是來自另一本書並不容易，你比較可能在大學圖書館中發現這些書籍。像是大學出版社這類出版社，特別會出版這些書籍。然而，在未加閱讀之前，誰也不敢斷言。

某些類型的社會研究比較會以書籍方式呈現。舉例而言，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報告，通常都像一本書那麼厚，而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則不然。沒錯，仍有人類學家及史學家的研究是以文章呈現，而某些經濟學家與心理學家的研究則以書來呈現。在教育、社工、社會學和政治科學，長篇而複雜的研究結果可能同時以2、3篇的研究報告和書籍同時呈現。包含詳細的臨床或人類學的描述，以及複雜的理論或哲學討論則多以書本的方式出現。最後，那些想要和學術同僚溝通以及想教育大眾者，通常會將學術的文章寫成通俗的書籍，例如James Hunter的「文化戰役」（Culture Wars, 1991）。

要在書中找一篇文章可能很困難，因為並沒有哪種清單可供比對。有3種書籍包含有研究報告的文章，第1種是教學用書，像是「讀者」（readers）這本書，就有原始的研究報告在內。在學術期刊中某個主題的文章通常會蒐集在一起，重新加以編輯，以便非專業

的讀者閱讀。

第2種蒐集是為了學者，可能將某個主題的期刊論文、原始研究或理論報告收納在一起。有些包含了不容易找的期刊文章。可能包括了特定主題的原始研究報告。內容目錄將標題和作者列出。圖書館的書架將這些書和其他書擺在一起，有些圖書館的分類系統中也包括了這一類。

最後，有些每年出刊的研究書籍包括了無法在其他地方取得的研究報告。這些是學術期刊和文章集刊的混合：他們每年出刊，每年都有卷期，但並不是期刊。例如「政治社會學研究回顧」(Review of 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 以及「比較社會研究」(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也和書本放在同樣的架上。某些每年出版的書其目的特別是在進行文獻檢閱(如：「社會學年度回顧」(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以及「人類學年度回顧」(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這些書籍並沒有像學術期刊一般有完整的清單，剛進入某一領域想找到這些書籍的唯一辦法就是花許多時間在圖書館，或是向某位已經熟知該主題的學者請益。

對書本的引用或參考書目比文章的引用要來的簡短。包括了作者、書名、出版年和出版地、以及出版社的名字。

論文

所有取得博士學位的研究生都需要完成一份研究，也就是其論文。論文通常會放在大學圖書館的架上，表示認可其博士學位。大約有一半的博士論文後續會以書籍或文章的方式發表，因為博士論文是新的研究，而可能是很有價值的資料。某些碩士生也寫論文，但很少碩士的研究是很嚴謹的，而如果未加出版，就比較難找到這些論文。

某些公認的大學中有學生論文的特殊索引。譬如「國際論文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就將論文的作者、標題和大學列出來。這份索引以標題加以排列，並包含有論文摘要。如果

學校允許的話，你可以透過圖書館際合作借到大部分的論文。另一種方法是向全國論文微縮中心購買一份影本，例如在密西根大學 Ann Arbor 分校，你可以找到美國大學的論文。有些大型研究圖書館，如果有事先提出要求，則收藏有其他圖書館所有的論文。

政府出版品

美國聯邦政府、其他國家的政府、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聯合國、及其他國際機構，像是世界銀行，都出資贊助研究並出版研究報告。許多大學圖書館的館藏中亦有這些出版品，通常放在「政府出版品」區。這些報告很少在分類系統中發現，你必須透過特殊的出版品索引，經由圖書館員的協助，才有辦法找到這些報告。大多數大學圖書館只收藏那些最常被查詢的官方出版品。

政策報告書及發表的文章

研究者進行完整的文獻檢閱將會閱讀到這兩類文章，並不容易找到，但受過訓練的專家還是有辦法取得。研究機構和政策中心也會出版一些報告。有些主要的研究圖書館會購買這些報告，並將之和其他書籍放在架上。要確定有哪些出版品的唯一辦法就是直接寫信給該機構或中心，要一份出版品書單。

每一年，學術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的專業協會都會舉辦年會。數以百計的研究者會在此發表、傾聽或討論其最新的研究。這些口頭報告大部分都有書面報告，與會者可以索取，而未參與會議但若是該組織的會員也會收到會議議程，上面列有發表論文的標題、作者和作者的機構。可以直接寫信給論文作者，索取研究報告。大多數報告之後都會出版文章。而這些報告可能會列在索引或摘要中（如前所述）。

如何有系統地進行文獻檢閱

定義並修正主題

如同研究者在研究一開始就必須要計畫並清楚定義研究主題和問題一樣，你需要在清楚定義、研究問題和計畫焦點集中的情況下開始進行文獻檢閱。好的檢閱主題應該跟研究問題的焦點一樣集中。舉例來說，「離婚」或「犯罪」就太廣泛。比較適當的檢閱主題像是「繼親家庭的穩定性」或「跨國間經濟不平等和犯罪率問題」。如果你的研究計畫進行脈絡回顧，則可以比檢驗的問題範圍稍微廣泛一點。研究者經常會在文獻檢閱結束之後才確定最後的研究問題。文獻檢閱幫助研究問題更為清楚。

設計搜尋程序

在選定清楚的研究問題來加以檢閱之後，下一個步驟就是設計搜尋策略。文獻檢閱者需要決定檢閱的類型、範圍、以及涵蓋進來的資料類型。關鍵在於謹慎、有系統、有組織。對你的搜尋設下界線：你要花多少時間來搜尋、最少要檢閱多少篇研究報告、你要走訪幾間圖書館查詢等等。

另外，決定用什麼格式進行參考書目的引用，以及怎樣記筆記（例如：寫在筆記本上、記在3乘5的卡片上、記在電腦檔案裡等）。擬定時間表，因為通常需要走很多趟圖書館。你應該開啟一個新的檔案夾或電腦檔，可以不斷將新的想法或資料加進去。當文獻檢閱進行中，焦點要越來越清楚。

尋找研究報告

尋找研究報告有賴報告的類型或搜尋研究的出處。一般來說，運用多重搜尋策略才能免除單一搜尋方法的限制。

❖ 學術期刊的文章

如前所述，大多數社會研究比較會以刊登在學術期刊上。這些期刊是科學溝通的工具。在開始搜尋之前，選一本這個領域中你還算熟悉的期刊，大概瀏覽其內容。期刊有很多，有些是時日久遠的，每一本都有許多文章。搜尋文章的任務是很龐大的。如果幸運的話，特定的出版品會讓這份任務比較易於進行。

你可能很習慣用一般出版品的索引，像是「期刊文獻讀者導引」(Reader's Guide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許多學術領域針對其學術文獻都有「摘要」或「索引」(例如「心理學摘要」(Psychological Abstracts)、「社會科學索引」(Social Sciences Index)、「社會學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和「老年學摘要」(Gerontological Abstracts)等)。就教育相關的主題來說，教育資源資訊中心(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 ERIC)的系統特別有用。這裡有超過100種出版品，你可以在圖書館期刊室找到這些資料。許多摘要或索引都和ERIC一樣有用，可以透過電腦檢索，而加快搜尋的速度。

這些摘要或索引通常定期出刊(如每月、或1年6次等)，讓讀者可以用文章標題或作者加以檢索。有些期刊封面上就列出摘要或索引。例如「社會科學索引」(Social Sciences Index)，其索引只列出引用資料，而摘要像是「社會學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除了引用資料以外，還印有文章摘要。摘要並不提供研究計畫的所有發現和細節，研究者運用摘要掃描相關的文章，然後找出比較相關的文章。摘要也包括在專業會議上發表的報告。(表16.3)舉出一個在「社會理論與實務」(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中發表的報告，在「社會學摘要」(Sociological Abstracts)和「社會科學索引」(Social Sciences Index)所呈現的樣子。另一個每週發行相關的刊物是「當前內容」(Current Contents)，則有許多學術期刊和書籍中的目錄，也包括了以標題和作者作為關鍵字的索引。

表 16.3 節錄自「社會學摘要」和「社會科學索引」

如果你感興趣的文章是關於色情這個主題，則你在社會學摘要中以此搜尋會找到下列資料（引自社會學摘要，1986，第13卷，主題索引，1316頁）^a

民粹論（Populism）

新政治文化，美國城市：戰後——1960年代；Q7952

色情書刊（Pornography）

反色情行動主義，加拿大，暴力色情化vs.權力、政治經濟觀點；Q9033

兒童的性被害，商業色情；Q8577

女性主義反色情論點，破壞名譽vs.支持墮落；Q7916

猥褻／色情法律，性權力議題；Q9139

性／侵略的內容，主流vs.限制級成人錄影帶；內容分析；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Q7911

實證主義（Positivism）

社會科學，新的真實哲學，實證主義者的限制；Q7220

如果你注意到「女性主義反色情論點」這篇文章，然後檢視Q7916的摘要資料，你會找到：

86Q7916

Soble, Alan (聖約翰大學學報, MN 56321)。色情：破壞名譽以及對墮落的支持，UM社會理論和實務，1985，11，1，春季號，61-87

兩個最近的女性主義反色情論點，二者都在學術著述和政治活動中出現，都被發現有所缺陷。第1個論點，色情破壞女性的名譽，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假設色情工業提出對女性的要求，但並不被支持，因為這對色情的本質抱有太多幻想。第2個論點，色情支持女性的墮落，也不成立，因為並未顯示色情支持了什麼、或以何種方式支持。結論是色情工業並未真正支持任何特定行動。

如果你在社會科學索引中找尋相同的標題和文章，你會發現以下資料（引自社會科學索引，4月1985-3月1986，第12卷，1182頁）^b

Porket, J. L.

勞動力浪費中的失業。調查29：19-18春季85年

色情書刊

亦見猥褻（法律）

東西美學；生命赤裸的事實（香港成人雜誌）I. Buruma. 遠東經濟回顧

126：51-310月份第4期84年

- Minneapolis 禁令：「珍愛的、保護的演說」D.M. Fraser. 人權12：27 春季號85年
- 不法色情：我們所得，我們所失。E. Chemerinsky; P.J. McGeady。人權12：24-6 + 春季號85年
- 色情：破壞名譽以及支持墮落。A.Soble. 社會理論與實務11：61-87 春季號85年
- 對色情刊物的宣戰。（中國大陸）北京回顧28：8-98 月5號85年
- Pornstein, Marc H. and Krinsky, Sharon J.
嬰幼兒期對稱的覺知能力：垂直對稱的特質和完整類型的覺知。兒童心理學39：1-192 月號85年

^a 版權為社會學摘要公司所有。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本引用取得授權。

^b 社會科學索引，4月號1985-3月號1986，第12卷，頁1182。版權為1986年H.W. Wilson公司所有。本資料重製取得原出版社授權。

聽起來好像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圖書館參考室找到索引，然後開始檢查標題。不幸的是，事情要來得更複雜一些。為了要涵蓋過去多年的研究，你可能要看很多的摘要和索引；另外，在摘要或索引中所列的主題或標題很廣泛，你所感興趣的特定研究問題可能存在好幾個領域當中，則每個領域你都要加以檢視。以高中濫用禁藥的主題為例，你要檢查的主題可能涵蓋這些：藥物成癮、藥物濫用、藥物法、禁藥、高中、和國中等。在這範圍內的許多文章可能和你的文獻檢閱並無相關。此外，研究文章的出版和摘要、檢索的出刊時間又差了3到12個月，除非在大型研究圖書館，否則最有用的文章在你的圖書館可能找不到。只有透過館際合作才能借到，不然就是那些文章是以你無法閱讀的外文所寫。

有許多研究導向的圖書館會向科學資訊機構（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訂「社會科學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SSCI），這是涵蓋超越1400種期刊的有用資料。它和其他摘要或索引類似，但需要花點時間學習如何使用這套系統。SSCI每次出版就是4本書，1本是來源索引，其中有期刊文章完整的引用資訊；其他3本則指出在來源索引中的文章，以標題、進行

該研究的大學或研究中心、或被其他文章引用的作者等資料加以組織。

你可以用以下3種方式之一進行SSCI的查詢工作：(1)主題式查詢（如：兒童的酗酒行為）；(2)以知名的研究中心來查詢（如紐澤西州立大學Rutgers的酒精研究中心）；或是(3)以先前的文章標題查詢（例如Kandel在1980年出版的「社會學年度回顧」(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中所發表之「青少年藥物和飲酒行為」）。第1種搜尋導向去找當前研究報告的作者；第2種搜尋找出同一研究中心所出版的所有作者；第3種搜尋則包含所有先前文章所引用的參考書目。當研究者想瞭解該研究是被哪些研究所影響時，最後一種方法很重要。比方說，你發現有一篇1980年的相關文章，SSCI告訴你1980年以後在參考書目中出版的所有文章。即使你的圖書館沒有SSCI，一個好的搜尋原則是檢視文章的參考書目以發現該主題其他相關的文章或書籍。

另一個找尋文章的方式是電腦化的文獻搜尋，這和摘要及索引的原則相同。研究者用幾種方法來組織電腦化的搜尋——用作者、用文章標題、用主題、或用關鍵字。「關鍵字」(keyword)是主題中重要的詞彙，很有可能在標題中出現。你可能會在電腦搜尋的過程中用到6至8個關鍵字，並想想可能的同義字。電腦搜尋方式可能有很多種，大多數電腦可能只在標題或摘要中找尋關鍵字，如果你設定的字太少或範圍太小，則可能會遺漏一些相關文章。如果你選定太多字或範圍太廣泛，又會找到許多不相關的文章。要找到最適當的關鍵字和範圍，最好的辦法就是從做中學了。

在筆者進行的一篇針對大學生如何定義「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的研究中(Neuman, 1992)，我用了以下的關鍵字：「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性侵害」(sexual assault)、「騷擾」(harassment)、「性別平等」(gender equity)、「性別公平」(gender fairness)以及「性別歧視」(sex discrimination)。稍後我發現一些重要的研究，但其標題中並沒有這些關鍵字。我也試著用

「大學生」(college student) 和「強暴」(rape) 作為關鍵字，但出現一大堆不相關的文章，我甚至無法加以瀏覽。

有許多文獻也可透過電腦搜尋的資料庫或查詢系統。有些可以在你的圖書館上線查詢，有些則是光碟片的形式，還有的可以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遠距連結的方式取得（見後續討論）有電腦而且可以連線者，就能夠搜尋某些索引資料、圖書館目錄、以及全球其他資料，只要那些資料已經上網。

所有電腦搜尋系統都有相同的邏輯，但各自的方法或操作不同。在筆者的研究中，我搜尋前7年的資料，並運用5種學術文獻的資料庫：「社會科學索引」(Social Science Index)、CARL（科羅拉多區域研究圖書館，Colorado Area Research Library）、「社會檔案」(Sociofile)、「社會科學引用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以及「心理學指引」(PsychLit)。

相同的文章常常會出現在許多學術文獻資料庫中，但每種資料庫都會找到一些新的、其他資料庫所沒有收錄的文章。這給我們一個重要的教訓：「不要只依賴單一電腦文獻、單一摘要服務、單一領域的文獻、或定義狹隘範圍的時間來進行搜尋」(Bausell, 1994: 24)。比方說，我發現好幾筆很棒的資料，但並未列在任何一個電腦搜尋資料庫中，而是透過閱讀文章參考書目所找到前幾年的相關文章。

筆者進行研究的過程是很典型的。用關鍵字搜尋，我很快地瀏覽過超過200篇資料的標題或摘要，從中選出80篇文章、報告以及書籍來閱讀，在這80篇中我找到49篇是很有用的，而這些就成為我最後出版文章的參考書目。

❖ 學術性書籍

要找到某個主題學術性的書籍可能很困難。圖書館目錄系統中的標題通常並不完整，而且也太廣泛，更甚者，在某些特定的圖書館系統中，只列出書籍，雖然你可以透過館際合作搜尋其他圖書館

的資料。圖書館將書編目主要是依據其類別，而分類可能並不符合你的興趣或是並未反映書中所有類別。一旦你習得你常使用的圖書館系統，你會發現該主題大部分的書籍都有相同的分類號。此外，圖書館員可以協助你從其他圖書館找到你要的書。譬如「國會圖書館全國聯合目錄」(Library of Congress National Union Catalog)就列出所有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籍。圖書館員可以進入其他圖書館的書目資料，或是你也可以運用網路。沒有人可以擔保一定有辦法找到相關書籍，建議運用多種搜尋方法，甚至包括查閱刊登有書評的期刊以及文章所附的參考書目。

❖ 論文

有一出版品稱為「國際論文摘要」(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列出大多數的論文。就像期刊文章的索引和摘要一樣，這也以廣泛的主題類別、作者、和日期將論文加以組織。研究者檢視該主題領域的所有標題。不幸的是，在你找到論文的標題和摘要之後，你會發現要找到這本論文還要花很多時間及額外支出。

❖ 政府出版品

圖書館的「政府出版品」區收藏有特定的政府出版品清單。美國聯邦政府出版了一份有用的索引是「政府出版品月目錄」(Monthly Catalog of Government Documents)，透過電腦通常可以找到。這份索引從1885年創刊，但其他可以用在研究上的補充資料是近十幾年才有。這本目錄有年度索引，而每月的期刊都有主題、標題、作者的索引。「國會聽證會索引」(Indexes to Congressional Hearings)則是另一份有用的資料，列出從1930年代的委員會和主題。「國會記錄」(Congressional Record)包含了美國法案、投票記錄、以及修法記錄的一覽表。「聯邦登錄」(Federal Register)則是美國政府的每日刊物，包含了聯邦機構的所有條款、規定和公告，有每月和年度索引。還有其他索引涵蓋了其他資料。其他政府

也有類似的清單，比方說，英國政府的「政府出版品索引」(Government Publication Index)列出整年度的政府出版品。「議會報」(Parliamentary Papers)列出過去200年官方的社會經濟研究。要使用這些索引，最好是依賴圖書館專家的協助。要注意的是，索引所用的主題並不一定完全符合你的研究問題。

❖ 政策報告書和發表的文章

最難找的資料就是政策報告書和發表的文章。他們可能會列在某些出版的研究之參考書目中；有些列在摘要或索引中。要找出這些研究，你可以試試幾個方法：寫信給研究中心索取出品清單；取得專業研討會中發表論文的一覽表等。一旦你找到這些研究報告，試著再寫給相關的作者或機構索取。

記錄的內容

在找到資料之後，你應該要寫下文獻的所有細節（作者的全名、標題、卷期、期數、頁數等）。最好是紀錄下比引用這種最低要求還完整的資料。大多數研究者用一些卡片或電腦檔案記錄完整的文獻資料，用另外的檔案來記錄研究報告的筆記。創造出一組符號或指標以清楚連結每一筆記錄或檔案的文獻或筆記來源。舉例而言，把第一作者的姓和出版年記在筆記卡片或記錄之前，透過作者的姓和日期加以組織，這樣你可以在一些卡片或檔案中很快地找到你要的完整文獻。你會發現如果用一樣大小的紙張或卡片來記筆記比較容易，而不是有些記在紙上、有些寫在卡片上。研究者要決定需記錄什麼內容，寧可多記下一些不需要的資料，也不要少記。一般而言，記下要檢驗的假設、主要概念要怎樣測量、主要發現、研究的基本設計、運用的群體或樣本、以及未來研究的想法（見資訊箱 16.3）。聰明的作法是檢視報告的參考書目，並記下那些你可以增加的資料。

影印下相關的文章或報告可以節省記筆記的時間，而且確保你

資訊箱 16.3

如何閱讀期刊文章

1. 閱讀時在心裡有清楚的目的或目標。你希望得到的是一般性的知識，或是想應用在特定問題上？
2. 在完整閱讀前先瀏覽一遍。你可以從標題、摘要、結論以及題目中得到什麼資訊？主題、主要發現、方法和主要結論為何？
3. 思考你自己的導向。你對該主題、方法、出版品等存有會誤導你的偏誤？
4. 整理額外的知識。關於該主題或方法哪些是你已經知道的？出版品的信譽如何？
5. 閱讀文章的同時也進行評估。其中出現哪些錯誤？研究發現是從資料而來的嗎？文章和研究取向的假設是否一致？
6. 進行主題、使用的方法、以及發現等相關資訊的摘要。評估研究發現的正確性，並指出問題之所在。

資料來源：改編自Katzer, Cook, 以及Crouch (1991: 199-207)。

有整份報告。你可以在影印資料上記筆記，不過要注意幾件事情。第一，對大型文獻搜尋來說，影印會很昂貴；第二，注意不要觸犯著作權法，美國著作權法允許影印僅供私人研究之用；第三，記住要影印整篇文章，包括參考書目；第四，組織整篇文章可能很麻煩，特別是當一篇文章中引用了許多章節；最後，除非你的筆記作得很好，否則之後你需要再重新閱讀整篇文章。

組織筆記

在蒐集大量文獻和筆記之後，你就需要加以組織。一種方法是在瀏覽過筆記之後，加以分類，並製作一種地圖指出彼此間怎樣連結。在決定組織模式之前，多試試幾種不同方式。組織是一種可以

透過練習而有所進步的技術。舉例來說，將筆記納入成疊的主題資料中、或是畫圖來比較對同一問題不同的報告陳述，指出同意和不同意的論點。

在組織筆記的過程中，你會發現有些文獻和筆記並不符合，此時就要放棄它。同時，你也會發現一些相關的主題或領域，但當初並未加以檢視，這時就需要再回到圖書館查詢。

組織的機制有很多。最好的是依賴文獻檢閱的目的而定。脈絡回顧暗示圍繞著某一特定研究問題將最近的報告加以整理；歷史回顧則以出版品的主題和日期加以組織；整合式的回顧則是以某一領域和主要檢定假設的核心發現加以整理；方法論的回顧則是透過主題和所運用的方法加以組織；理論回顧則是透過理論和所檢視的主要思想家來予以組織。

撰寫文獻檢閱

文獻檢閱需要有計畫、清楚地加以撰寫，而且要不斷修改。這個階段通常和組織筆記交織在一起。所有優秀撰寫的規則（如：清楚的組織結構、引言和結論、起承轉合等）都可以應用在文獻檢閱上。當你在撰寫時謹記你的目的，並清楚而有效地表達。

要準備好的文獻檢閱，則要以批判的眼光來閱讀文章和其他文獻。想到懷疑主義是所有科學的基礎，那表示你不應該因為作者的權威而全盤接受文獻的內容。對你的閱讀提出質疑和評估。第一個要克服的障礙是，我們通常會認為能夠出版的就是好的。

批判性地閱讀研究報告需要一些技巧，而這是要花時間和練習才能發展出來的。除了同儕的檢閱程序和高退稿率外，錯誤和馬虎的邏輯也是考量重點。當閱讀文章時，仔細看看文章的標題和導論是否和其他部分相符合，有時候，標題、摘要和引言是彼此不相符的。也可能並未完全解釋清楚研究計畫的方法和結果。一篇文章必須邏輯嚴謹，每部分都要環環相扣，都要用邏輯來加以連結。不好的文章可能就是在邏輯上不清楚或忽略了章節間的轉折；還有，文

章並非都把理論和研究取向說明清楚。要有心理準備，通常要多讀幾遍才能清楚知道其理論或取向（見資訊箱16.4）。

閱讀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方法和結果的章節。很少有完美的研究。研究者對研究方法的描述常常不夠完整，有時候，在表格或圖中呈現的結果並不符合研究者所說的。比方說，研究者可能輕忽了表格中某個重要的結果，反倒給了不重要的結果太多篇幅。細心的讀者評估研究計畫是怎樣進行，以及資料呈現的方式。經常可見的是，作者下了一重要的詮釋，卻忽略了其他可能的詮釋。在閱讀結論時也要小心，不要假設它們一定和資料完全吻合，你必須自己再檢查資料一遍。

何謂好的文獻檢閱

研究者要將文獻檢閱的目的透過資料的組織傳遞給讀者。「錯誤的」撰寫文獻檢閱方法是將每一篇研究報告的發現摘要羅列出來。這樣無法把目的清楚傳達。讀起來只像是把一堆筆記擺在一起。有時候瀏覽者在撰寫文獻檢閱時會草率為之而跳過重要的組織步驟。「正確的」方法是將發現或論點加以整理。一種廣為接納的方法是先提出最重要的想法，依邏輯和陳述或發現加以連結，然後指出研究不一致或缺點（見資訊箱16.5的範例）。

在社會研究中運用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見資訊箱16.6）為社會研究者的工作帶來革命性的改變。僅僅在5年前，這還很少被用到；現在，大多數社會研究者運用網際網路幫忙文獻檢閱的工作、和其他研究者聯絡、以及搜尋資料。網路是以爆炸性的速度持續在改變和發展中。

網路對社會研究來說是一大福音，但這並不被視為是萬靈丹。它可以提供新而重要的方式找到相關資訊，但終究只是工具之一。

資訊箱 16.4

文章筆記的範例

參考書目卡的完整引用

Pierce, John C., M.A.E. Steger, N.P. Lovrich, B.S. Steel, 1988.
 “Public Information on Acid Rain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9: 193-202.

筆記卡

Pierce et al. 1988

主題 形塑人類關於公共議題知識的因素。酸雨。自我利益。美國和加拿大。

依據先前的研究，研究者指出，只有教育並不能造成對公共政策議題的知識。知識可能是基於個人特質（如：性別、所得、教育程度）、那些無涉特定政策的一般規則、或是和個人自我利益相關政策引發的動機。他們想知道知識對公共議題的影響是否來自個人想取得資訊的動機。他們檢視某政策，酸雨，並提出問題：人們的動機在不同情境下會影響知識嗎——加拿大的文化，比較是集體主義，則其人民是美國政策和美國個人主義文化的受害者嗎？

假設 人們在察覺到自我利益受到影響時，才會獲得關於公共議題的知識。

方法 作者寄問卷給1000位住在Michigan以及1000位住在Ontario的抽樣受試者，約有一半的人完成問卷並回覆。他們用4種方式來測量關於這個議題的知識，也檢視動機變項，包括一般特質和對此議題的個人敏感度和關聯性等。

發現 運用統計和百分比，發現動機因素（例如個人敏感度和關聯性）比起一般性的特質，比較是導致獲得酸雨知識的因素，雖然二者都有影響。動機或個人關聯性在加拿大顯出比較強的影響，因為加拿大全國比較有這方面的敏感度。

資訊箱 16.5

不佳和優秀文獻檢閱的範例

不佳文獻檢閱的範例

性騷擾有很多後果。Adams, Kottke, 和 Padgitt (1983) 發現有些女學生會避免選某些課或是和某幾位教授工作，因為可能有被騷擾的危險。他們也發現男生和女生的反應方式不同。其研究是針對1000位男女研究生和大學生所進行的調查。而Benson和Thomson刊登在「社會問題」(Social Problem)的研究(1982)則列出許多性騷擾帶來的問題。在Dziech和Weiner(1990)的佳作「好色教授」(Lecherous Professor)中，則提出許多受害者艱難的處境。

研究者以許多不同方式來進行此一主題的研究。Hunter與McClelland(1990)在一所小型自由藝術學院中針對大學生進行研究，樣本有300位學生，研究者給每位學生一些畫有受害者反應和情境的圖卡。Jaschik和Fretz(1991)在美國東部的大學，在課堂上針對90位女學生，由助教播放典型性騷擾的錄影帶，沒有說明這是「性騷擾」之前，很少有學生會這麼定義錄影帶的內容，但當被問到這是否是性騷擾時，有98%的學生同意。Weber-Burdin和Rossi(1982)重複一個先前的性騷擾研究，只是對象改成麻州大學的學生，有59個學生評定40種假設的情境。Reilley、Carpenter、Dull、以及Bartlett(1982)針對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250位女性和150位男性大學生進行研究，樣本中還有52位職員，每位都完成問卷，受試者在問卷中去評定性騷擾的等級。Popovich等(1986)則將性騷擾分為9種，針對一所中型大學的209位學生，將之15至20人分成一組，發現學生間有很多不確定和混淆的情況。

優秀文獻檢閱的範例

性騷擾的受害者在很多方面都很痛苦，從低自尊、喪失自信到從社會互動中退縮、改變生涯目標以及沮喪 (Adams, Kottke, and Padgitt, 1983; Benson and Thomson, 1982; Dziech and Weiner, 1990)。舉例而言，Adams、Kottke、和Padgitt指出有13%的女學生都宣稱，因為可能有被性騷擾的風險，因此她們避不選修某些課程或和某些教授工作。

在校園中的性騷擾研究有幾種不同進行方式。除了調查研究外，許多則以圖卡或假設的情境來呈現 (Hunter and McClelland, 1991; Jaschik and Fretz, 1991; Popovich et al., 1987; Reilley, Carpenter, Dull, and Barlett, 1982; Rossi and Anderson, 1982; Valentine-French and Radtke, 1989; Weber-Burdin and Rossi, 1982)。受害人的口語反應及情境因素都會影響觀察者是否將之定義為性騷擾行為。在性騷擾和不當行為間仍有些混淆，舉例而言，Jaschik和Fretz (1991)發現只有3%的女學生，在看過助教播放典型性騷擾的錄影帶之後，立即指出這就是「性騷擾」；反之，他們稱之為「性別歧視者」、「粗魯的」、「不專業的」、或「沒有人格的」。當被問到這是否是性騷擾時，則有98%同意。Roscoe等 (1987)的研究也指出類似指認困難的問題。

它可以很快找到某些資料的片段，比方說，從我的家用電腦，就能夠進入美國聯邦監獄管理局，在3分鐘之內，就可以查出在1970年，有16.3%的受刑人是因為藥物問題入獄，到1997年（目前可得的最新資料），升高至60.3%。網際網路是我們所能想到傳統圖書館研究最佳的補充工具，但無法完全替代。運用網際網路進行社會研究也有優缺點如下：

資訊箱 16.6

網際網路

網際網路不是在某個地方的單一物品，而是在世界各地的電腦彼此連結的系統。它變化的速度很快，我在此無法詳述網路的所有特質，許多書有這方面的說明，更何況即使我試著說明，6個月以後這些資料又過時了。網際網路隨時在變，許多人透過它來溝通、傳遞訊息，因此是很有力量的。在過去幾年中，使用網路的人每半年就會增加一倍。

網路提供了人與人之間或人和機構（如大學、政府機關、企業等）間的資訊，透過電腦的一種低成本（通常是免費的）、世界性的、快速的溝通。有一些特殊的軟硬體需求，但網路基本上能傳遞文本資料的電子檔，甚至是整本書，以及照片、音樂、影像和其他資訊。

要運用網路，人們需要在電腦取得一個帳號以便連上網路。大多數大學的主機、許多企業和政府的電腦都連線後，個人就可以向網路公司購買帳號，透過電腦、數據機和電話線連線上網。除了微電腦外，人們只需要知道一些使用電腦的知識即可。愈多人學習上網，電腦愈有用，而網路愈加普及，就愈增加全球各種資訊交換的重要性。

優點

1. 網路的使用容易、迅速而廉價。範圍廣大，在許多地方都可以使用。這種近乎免費的資源讓人們幾乎可以從任何地方找到資料——地區性的公共圖書館、家裡、實驗室或教室、或任何有電腦可以連接上網的地方；此外，網路不會關閉，它1個禮拜7天、1天24小時都可運作。只要有最少的訓練，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地從他

的電腦螢幕搜尋到想要的資料，而這在幾年前，可能需要花一趟路途到大型研究圖書館才能辦到的。運用電腦系統搜尋大量的資料一定比人工搜尋來得簡單而快速，而且網路正急遽擴充所能找到的各種資料。越來越多的資料（例如：「美國統計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也開始可以在網路上取得。此外，一旦找到這些資料，研究者可以用電子檔的形式加以儲存，或列印出來。

2. 網路透過「連結」提供找到並連上其他資料的方式。許多網頁有「熱門連結」，簡單點兩下就可以從其他網頁得到資料。這讓人們得到更多資訊並提供「立即的」可取得資料的方式。這種連結讓相關資料的彼此涵蓋變得更加容易。

3. 網路加速了全球資訊的流通，並且有「民主化」的效果。它提供了遠距離、跨國間資訊（如文本、新聞、資料、照片等）的快速流通。過去需要等上1個禮拜的報告，如果是國外出版品甚至可能需要等1個月，現在這些資料常常只需幾秒鐘就可取得而不需花費。也沒有限制哪些人的資料或哪些資料才可以上網，所以那些以往難以出版或宣傳的資料現在很輕易就可以做到。

4. 網路所提供的資訊範圍非常廣泛，有些形式比較動態而有趣，它的傳輸超越了過去傳統學術期刊和資料這種黑白的文本。它傳輸資料的形式會以彩色的、圖形的、動作式的圖像、影音（如音樂、音效等）、照片、甚至是錄影的片段形式。資訊的作者在呈現上可能是很有創意的。

缺點

1. 對於呈現在網路上的資料並沒有品質保證。不像標準的學術出版品，這沒有同儕間的檢閱過程或任何形式的檢閱，幾乎是任何人都可以把任何資料上網，可能是品質很差的、未著名出處的、錯誤百出的、全盤捏造的、或完全是騙人的。在網路上有很多真正的「垃圾」！一旦找到資料，所要作的就是區別垃圾和有用的資訊。

我們要以在路上拿到一張傳單後謹慎考量真實性的態度來看待網頁內容，有可能是一堆垃圾或是真正有用的資訊。另一個比較不嚴重的問題是那些「炫目的」色彩、音樂、動畫，可能會分散使用者的注意力。這些五花八門的東西可能比內容更吸引使用者，而認為這樣就是高水準的資訊。比較好的網頁設計是可以迅速瀏覽、很快找到所要的資料，而不是需要慢慢的、仔細閱讀其內容。

2. 社會研究中仍然有許多很棒、很重要的資料還未上網（例如「社會檔案」Sociofile、GSS資料檔案以及最新的期刊論文）。許多則要透過特殊的訂閱服務，而有可能很昂貴。和我們一般想像的相反，網路並非所有資料都是免費提供給任何人的，通常，免費資料是有限的，而只有付費才能取得完整資料。事實上，因為一些圖書館必須要調整資金的運用，將一些買書和出版品的錢挪作購買電腦上網之用，因此網路的影響也可能反而使某些使用者無法取得想要的資料。

3. 透過網路找資料有可能很困難而很花時間，要找到特定資料並不容易，還有，不同的「搜尋引擎」(search engine)可能會找到不同的資料。最好是多用幾種搜尋引擎（如Yahoo、Excite、和Alta Vista）。大多數搜尋引擎只在網頁上簡單的描述搜尋一些特定的字，而這些描述並不一定指出資料完整的內容，可能只有標題而沒有內文。除此之外，搜尋引擎可能顯現出數以百計的資料，我們根本無法一一加以檢視，放在最上端的可能是新近加入的資料或是有好幾個字符合你的搜尋，而最佳或最相關的資料卻可能埋在150筆搜尋結果當中。另外，在搜尋過程中還必須瀏覽過很多廣告才能找到真正的資料。

4. 網路資料可能是「不穩定的」而不能作為文獻。一旦在網路上找到相關網站，很重要的是把「網址」(通常是以http://開始)記下來。這個網址代表在某處的電腦中有此電子檔存在。如果此電腦檔被移除，則6個月後可能就不是相同的網址了。不像期刊文章會被儲存在許多圖書館的架上或以微縮影片收藏幾十年，讓那些有

需要者來閱讀，網頁要消失是很快的。這表示要檢視某人的網頁資料、確認文件中的引言、或回去閱讀原始資料尋找點子並不容易。另外，網路很容易作備份、修正或破壞，而後重製。比方說，某人可以竄改文件或照片而做出一個新的網頁，來散播不實消息。這就引發了著作權保護和資料真實性的議題。

要瞭解網際網路、其術語、以及確認其內容是否有價值，需要花時間並多加練習。要找到最佳網頁有一些規則——也就是那些擁有有用而真實資料的網站。來自大學、研究機構或政府機關的資料，比起那些出自未標示出處的個人網頁、或是商業組織、政治社會議題遊說團體等而言，可信度通常比較高。除了會被移除或消失，許多網頁或資料可能提不出完整的資訊，而無法輕易引用。較佳的資料是提供包括作者、日期、出處等完整資訊。

撰寫過程

你的對象群

專業作家說：永遠都要搞清楚你為誰而寫。這是因為如果清楚知道特定的讀者，則你的溝通會比較有效。你的研究計畫也要看對象是指導教授、學生、專業社會學家、實務工作者或一般民眾而有所不同。不消說，文章的撰寫要清楚、正確而有組織。

教授會因為許多理由而叫學生寫一篇報告，並指定格式。一般而言，教授希望看到的是能夠反映清晰的邏輯思考之文章和組織。學生報告應該要呈現清楚的方法學概念，好的方法是「適時」運用正確的專業術語，不應該過度或錯誤使用。

在為學生而寫時，最好是將專業術語定義清楚並標示出報告的每一部分。討論要以邏輯的、步驟的態度呈現，並舉很多實例。明白地解釋你如何以及為何進行研究計畫中的各種步驟。策略之一是從研究問題開始，然後將報告加以組織形成答案。

學者就不需要對專業術語下定義，或在運用的過程中解釋標準程序（如隨機抽樣）。他們感興趣的是研究和抽象的理論或之前文獻中的研究發現之間的連結。他們要的是對研究設計詳細的描述。他們的注意力在變項的測量以及資料蒐集的方法。學者喜歡的是精實的撰寫風格，但對資料分析多所著墨，以及對結果仔細地討論。

實務工作者偏好簡要說明研究進行的方式以及用簡單的圖表來呈現結果，他們希望看到結果所導出各種行動途徑的大要，以及每種方式實務上的結果。實務研究者會注意到不要將研究結果過度概化。最好將研究設計和結果的細節放在附錄中。

當對象是一般大眾時，運用簡單的語言、提供具體實例、並著重在對社會問題之發現的實務意涵。不要談研究設計或發現的細節，並注意在寫給一般民眾看時，不要寫一些不被支持的宣言。對大眾提供資訊是很重要的，這可以幫助那些不特定者對公共議題作出比較好的判斷。

風格與筆調

研究報告的書寫風格和筆調相當特定，目的就是將研究方法和發現清楚地傳達。

「風格」(style) 指的是撰寫者所選用的字彙和句子或段落的長度和格式。「筆調」(tone) 則是撰寫者對主題的態度或關係。舉例來說，非正式、對話式的風格（如口語的字詞、俚語、陳腔濫調和不完整的句子）加上個人的語調（如：這是我的感覺）在寫信給好朋友時是恰當的，但研究報告則不然。研究報告有正式而簡潔的風格。筆調是和主觀保持距離的，是專業而嚴肅的。實地研究者有時候會運用非正式的風格和個人的筆調，但這是例外。避免說教和過度華麗的詞藻。目標是傳遞訊息，不是倡導某一立場或娛樂他人。

一份研究報告應該是客觀、正確而清楚的。一再檢查細節（例如引用文章的頁數），並完全顯現你如何進行該研究計畫。如果讀

者在書寫中找到疏忽之處，他們可能會質疑研究本身。研究計畫的細節可能是複雜的，而此複雜性則會造成混淆，因此清晰的撰寫就格外重要。透過重複思索研究問題和設計、明確定義名詞、用簡短的句子陳述、以及將結論限制在有證據支持的部分，則可以讓你的書寫清楚。

組織想法

書寫並不會在當一個人將手拿紙筆（或把手放在鍵盤上）時就會神奇或流暢地出現。反之，這是一項辛苦的工作，包括許多步驟和個別的活動才會造成最後的產出。撰寫研究報告和其他型式的書寫並沒有太極端的差異。雖然有些步驟不同，而複雜度比較高，但大多數好作家在寫一封長信、一首詩、一些教材或一篇短篇故事所做的事，都可以應用在撰寫研究報告上。

首先，撰寫者需要書寫的題材。研究報告中的「題材」包括了主題、研究問題、設計和測量、資料蒐集技術、結果及其意義。有這麼多部分要寫，加以組織就很重要。在組織書寫時最基本的工具是大綱，大綱能協助書寫者確定所有細節都被涵蓋進來，而彼此間的關係也很清楚。大綱可以是主題（幾個字或片語）或句子。我們大多很熟悉大綱的基本形式（見表16.4）

大綱能幫助書寫者，但是如果運用不當也可能變成阻礙。大綱只是一種工具以協助作者將想法組織起來。它有助於(1)有順序地放置想法（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是什麼）；(2)將相關的想法擺在一起（這些是類似的，但和其他不同）；(3)將比較一般性或較高層次的想法，和特定概念以及特定的細節區分開來。

有些學生覺得他們在撰寫前需要完整的大綱，而且一旦大綱出來之後，就不能加以修改。事實上很少有人能有很完整的大綱，一開始的大綱都是比較粗略的，因為直到你把所有東西都寫下來之前，你無法把所有概念依序排列、分類、或把特殊性區分出來。對大多數書寫者而言，新概念會在撰寫的過程中發展或愈形清晰。

表 16.4 大綱的形式

I. 第一主題	最重要的之一
A. 標題I的次標題	第二重要的
1. A的次標題	第三重要的
a. 1的次標題	第四重要的
b. 1的次標題	同上
(1) b的次標題	第五重要的
(2) b的次標題	同上
(a) (2)的次標題	第六重要的
(b) (2)的次標題	同上
i. (b)的次標題	第七重要的
ii. (b)的次標題	同上
2. A的次標題	第三重要的
B. 標題I的次標題	第二重要的
II. 第二主題	最重要的之一

最初的大綱和最後的大綱可能因為完整程度而有所不同。撰寫的過程對作者來說可能不只是表達或澄清想法，也會刺激新的想法、想法間的連結、不同順序、或一般性與特殊性之間新的關係。此外，書寫過程也會刺激新的分析或重新檢閱文獻或發現。這並不是重頭再來一遍，而是保持心胸開放讓新的洞察發生，而公平面對研究計畫。

回到圖書館

很少有研究者可以在完成研究計畫以前結束文獻檢閱的工作。研究者要在研究開始之前就熟悉這些文獻，但卻在完成資料蒐集和分析之後又回到圖書館，這可能有幾個原因。首先，研究計畫從開始到結束經過一段時間，這中間又有一些研究出版；其次，在完成研究計畫之後，研究者比較知道哪些是比較重要的資料，而在閱讀文獻過程中又有一些新的問題出現；最後，在撰寫報告時，研究者會發現所做的筆記不夠完整或引用的文獻漏失掉一些資訊（見資訊

箱 16.7)。比起研究進行的初期，在資料蒐集完之後再度造訪圖書館就比較不那麼密集，也比較有選擇性。

在撰寫研究報告時，研究者經常會拋棄一些先前蒐集的資料或筆記，這並不表示在完成研究計畫之前，曾在圖書館的努力或文獻檢閱是浪費時間和白費力氣。研究者會預期在完成研究計畫之前所做的筆記有部分（例如25%）是不相關的。他們不會將不相關的筆記或文獻納入，因為這樣會分散想法而模糊不清。

回到圖書館補充資料可以讓研究焦點更集中，也可以避免抄襲。「抄襲」(plagiarism)是一種很嚴重的欺騙行為，許多大學會將有此類行為的學生退學。如果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被發現抄襲，則是很嚴重的過錯。因此在引用時要註明確實的出處、段落或想法，以避免無意間造成抄襲。不論是整段直接引用或引用其概念，都要註明資料來源。若是直接引用，則要註明出處與頁數。

用他人的文字而沒有給予該有的功勞是錯誤的，但改寫則比較不清楚。「改寫」(paraphrasing)不是完全用其他人的文字，而是將他人的概念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加以敘述，同時予以濃縮。研究者經常改寫文章，而好的改寫需要對所寫的內容有很清楚的認識，絕不只是改成同義字而已。改寫是借用他人的想法，去蕪存菁，並給原作者適度的功績。

過程

撰寫是一個過程。學習撰寫的方法就是書寫。這需要花時間和功夫，而透過練習會有所進步。撰寫沒有單一正確的方式，但有一些方法可以得到好的書寫品質。這個過程有3個步驟：

1. 事前準備工作。將文獻筆記加以整理、把想法列出來、理出大綱、完成參考書目的引用、對資料分析加以組織評析。
2. 組成文章。很自由地將你的想法寫成初稿、寫出參考書目和註釋、準備要呈現的資料、並形成引言和結論。
3. 重寫文章。透過增強連貫性、讀取證據在細節上的錯誤、檢

資訊箱 16.7

文獻使用的形式，運用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類型（1997）

書籍

第1版的書

Eliasoph, Nina. 198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lynn, Carroll J., Susan Herbst, Garrett J. O'Keefe and Robert Y. Shapiro. 1999. *Public Opinio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再版的書

Portes, Alejandro and Ruben G. Rumbaut. 1996.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2d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縮寫像是第2版（2d ed.）、第3版（3d ed.）、修訂版（Rev. ed.）等）

很多卷書的其中一卷

Marx, Karl. [1887] 1967. *Capital: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1, The Proces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Engels. Repri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翻譯書

Durkheim, Emile. 1933.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ated by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Free Press.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編輯的書（合著）

Danziger, Sheldon and Peter Gottschalk, eds. 1993. *Uneven Tides: Rising Inequality in America*.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重新發行的書

Mason, Edward S. [1957] 1964. *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the Monopoly Problem*. Reprint. New York: Atheneum.

書中或學術期刊中的文章

Wright, Erik Olin. 1997. "Rethinking, Once Again, the Concept of Class Structure." pp. 41-72 in *Reworking Class*, edited by J. Ha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attillo-McCoy, Mary. 1998. "Church Culture as a Strategy of Ac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767-784.

（除非同1卷每1期都從第1頁開始編頁碼，否則省略期數，然後標出卷數（期數）：頁數——比方說，

45(1):22-33。)

一般雜誌和報紙的文章

Janofsky, Michael. "Shortage of Housing for Poor Grows in the U.S."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98), p. A14.

Nichols, John. 1998. "How Al Gore Has It Wired" *Nation* 267 (July 20, 1998):11-16.

(報紙不一定需要列出版面頁數)

書評

學術期刊

Bergen, Raquel Kennedy. 1998. Review of *A Woman Scorned: Acquaintance Rape on Trial*, by Peggy Reeves Sanda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7:98-99.

一般雜誌

Wolfe, Alan. 1980. Review of *Free to Choose*, by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Saturday Review*, 2(February): 35.

政府出版品

U.S. Bureau of Census. 199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14th ed.*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博碩士論文

King, Andrew J. 1976. "Law and Land Use in Chicago: A Pre-History of Modern Zoning."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WI.

未出版的文章、政策報告書和發表的文章

Haines, Herbert H. 1980. "Ideological Distribution and Racial Flank Effects in Social Movement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ugust, New York City.

網路資料

(注意：在此標示的修訂日期為讀者連上網站閱讀資料的日期)

告示或個人網頁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Journals and Newsletters. Retrieved January 16, 1999. <http://www.asanet.org/Pubs/publicat.html>

上線的期刊文章

Sosteric, Mike, Mike Gismondi and Gina Ratkovic. 1998. "The University, Accountability, and Market Discipline in the Late 1990s." *Electronic Journal of Sociology* April 1988, Vol. 3. Retrieved January 16, 1999. <http://www.sociology.org/content/vol003.003/sosteric.html>

報紙的文章

Lee, Don. 1999. "State's Job Growth His Unexpected Cold Spell."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6). Retrieved January 16, 1999. <http://www.latimes.com/HOME/BUSINESS/topstory.html>

期刊摘要或書評

Grills, Steven. 1999. Review of *Missing Persons: A Critique of Personhood in the Social Science* by Mary Douglas and Steven

Ney.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on line*. Retrieved January 16, 1999. <http://www.alberta.ca/~cjscopy/reviews/persons.html>

查所引用的資料、並重新檢閱文字筆調和用法等來評估改善這份報告。

許多人發現一開始下筆是最難的。許多新手常常從第2個步驟開始，然後就停在那兒，結果就是品質不好的書寫文章。「事前準備工作」(Prewriting) 意味著從一堆筆記的檔案夾、大綱和清單開始，你必須要思考報告的形式以及你的對象群。思考時間也是很重要的。在開始寫之後、大量文字組合開始之前，常常會忽然文思泉湧。

有些人在坐下來準備要進行文章組成時就感到不舒服，這是眾所周知的「**寫作者的障礙**」(writer's block) ——一種暫時性的無法寫作。當心裡一片空白、手指僵硬、開始驚慌，這種症狀就出現了。從新手到老手都可能會遇到這種情形。如果你也面臨這個情境，冷靜下來，努力克服它(見表16.5)。

很多人從「**自由寫作**」(freewriting) 的方式開始進行組合文章的工作，這就是你坐下來，把所有想到的東西天馬行空寫下來的過程。自由寫作法可以在快速流動的思路和書寫之間建立一種連結，當你盡情書寫時，你並不會停下來檢視所寫的東西、不去沈思你的遣辭用字、不管正確的文法、拼字或標點符號。你就是盡快把腦中的點子寫下來，讓創意或想法流洩，可以稍後再加以整理。

書寫和思考是交織在一起，你無法區隔那邊結束後才開始另一個階段。這表示如果你計畫坐下來盯著牆壁、電腦螢幕、天空或任何東西，直到所有思緒完全釐清才要開始寫，則可能什麼也寫不出來，思考的過程可能在寫作時被激發出來。

表 16.5 去除寫作者障礙的建議

1. 及早開始。不要拖拖拉拉或等到最後一刻才動手。這樣不僅可以把你拉回任務上，還可以減低緊張，因為如果第1版寫得不好，你還有時間可以修改。Shafer (1980: 205) 責備道，「書寫是很困難的工作，而作者到處找拖延的藉口也到處可見。」給自己訂下寫出初稿的期限，要訂在完稿最後期限的1星期前，並且確實遵守。
2. 休息一下再出發。有些作家發現，當他們去散散步、吃點東西、看一下報紙、半個小時之後再回到寫作工作上，原先的障礙就消失了。稍微轉移一下注意力，有時候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3. 從中間開始。你不一定要從頭開始。從中間開始，反正就是去寫，即使看來不是很相關的東西。當你書寫/思考的過程在進行中時，會比較容易進入主題。
4. 寫作前的個人儀式行為。有些人在寫作之前有些很奇特的習慣或儀式（例如：洗盤子、把桌子整理乾淨、削鉛筆等）。這些可能都是啟動的關鍵。作任何可以讓你開始寫作的事情。
5. 分成幾個小部分。不要覺得你必須坐下來一氣呵成。從比較容易的部分著手，之後再把幾部分拼湊起來。
6. 不要期待完美的作品。寫草稿，表示你可以把它丟掉、修改、以及改變你寫的內容。修改初稿總比第一次就要寫出完美作品來得容易。

重寫

或許在數百萬人之中有一位是創造性的天才，第一次寫出來的東西就可以絲毫無誤地清楚傳達其訊息。至於我們其他平庸之輩，書寫代表的就是不斷重寫——一再重複——是有必要的。舉例而言，據稱Ernest Hemingway重寫了39次「戰地春夢」(Farewell to Arms)的結局。對專業研究者來說，報告重寫12遍都不足為奇，不要因此而感到沮喪。如果有的話，重寫可能會帶來壓力。這表示你能夠很快開始寫、得到初稿、然後再加以潤飾。計畫至少3到4次修改你的草稿。稿件就是完整的報告，從頭到尾，而不再是一些粗略的筆記或大綱了。

重寫幫助書寫者越來越清楚、流暢、精確而措辭精簡地表達自

我。再重寫時，焦點在清楚的溝通，而非華麗或複雜的語彙。如同 Leggett 及其同僚（1965: 330）所言，「不要覺得用簡單的字表達簡單的意思是可恥的。記住，運用複雜的語言本身並不代表聰明。」

重寫意味著慢慢閱讀你所寫的東西，必要的話大聲念出來，聽聽看是否順暢。給別人看你寫的東西是一個不錯的點子，專業寫作者會找其他人來閱讀其作品並加以批評。新的作者很快會學到友善的、結構式的批評是很有價值的。要把自己的作品與人分享一開始可能很難，這表示把自己寫作的想法攤在他人面前並歡迎批評指教，但是如果這批評是讓作品更清楚，則這就是有助益的批評。

重寫包括2個過程：修改和編輯。「修改」（revising）是插入一些新的想法、增加支持性的證據、去除或改變一些想法、調整句子結構使其意義更清楚、或加強概念之間的連結。「編輯」（editing）則是使寫作的技術層面更清楚或更紮實，例如拼字、文法、用法、動詞時態、句子長度、和段落的組織等。當你再重寫時，回到初稿並嚴厲地批判改進。如果初稿離重寫有段時間則比較容易做到。在初稿中看來滿意的句子在一、兩個禮拜後來看，可能很模糊或是邏輯不清（見表 16.6）。

即便你並沒有打字技術，如果你用文字處理機最好還是打出來或列印出來，最少在定稿前一版要這麼做。因為在乾淨的、打字的稿子上，比較容易看見錯誤和組織的問題。請自在地剪貼、劃掉某些字、或是插入一些句子。

在寫報告和其他文件時，好的打字技術和運用文字處理機的能力是很有用的。嚴肅的專業者發現他們投資在練習打字和學習運用文字處理機的時間上，終究會得到報酬。文字處理機不只比較容易編輯，還可以檢查拼字和提供同義字，此外，有些程式可以進行文法的檢查。你不能依賴電腦程式作所有的事情，但這會使寫作變得容易些。文字處理機的速度和操作容易度是很戲劇性的，因此很少有已經熟悉這類工具的人願意再回復用手書寫的狀態。

表 16.6 對重寫的建議

1. 技術層面。在每次重寫時都檢查文法、拼字、標點符號、動詞時態、和主詞動詞等。記住每次增加了一些新的文本，也可能會有新的錯誤。錯誤不僅會分散注意力，而且也會削弱讀者對你所表達意見的信心。
2. 使用。重新檢視用的詞，特別是關鍵詞，在重寫時看看你是不是用了最精確得以表達意義的字彙。不必要的話，不要用太技術性或太長的字。用簡單但最可以表達意思的字。找本辭典來用，「辭典」(thesaurus)是很有用的參考工具，像是字典，包括意義類似的字，可以幫你找到最精準的字彙。精確的思考和表達需要精確的語言。如果你算「中數」(mean)，就不要說「平均而言」(average)。如果你的意思是「人類」(people)，就不要說「男人」(mankind)。
3. 語態。研究報告的作者通常犯一個錯誤，就是用被動語態取代主動語態。這樣顯得比較權威，但是被動語態會模糊掉動作的主動性。比方說，被動的，「在校的年級和比較明確的生涯規劃之間的關係被資料所證實」，最好寫成主動式的「資料證實在校年級和比較明確的生涯規劃之間有關係」。被動的「受試者對墮胎的態度被訪員記錄下來」，如果用主動式讀來比較通順：「訪員記錄下受訪者對墮胎的態度」。避免不必要的修飾語言，像是「似乎是」(seems to)或「看來像是」(appears to)。
4. 連貫性。順序、步驟和銜接之間應該要邏輯緊密。試著一次一段地念整篇報告。這一段是否有統一的概念？主題句？在報告中段落間是否能銜接？
5. 重複。把重複的概念、冗言或不需要的片語去掉。概念最好說一次，而不是用模糊的方式一再重複。在修改時，去掉贅言和拐彎抹角的話。對付廢話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了當。贅言的句子例如：「總結以上所說，從資料我們獲得的結論是X對Y的發生，有正向而極為重大的影響，儘管事實上Y發生的機率很低」，最好改成「總之，我們結論認為X對Y有大量而正向的影響，但Y不常發生」。正如Selvin和Wilson(1984)指出，冗言或修飾字讓文章更難以理解。
6. 結構。研究報告應該要有清楚的組織。如果需要的話，將段落調整一下，使之更符合組織架構，並運用大小標題。讀者應該要能夠瞭解報告的邏輯結構。
7. 抽象化。好的研究報告混合了抽象的想法和具體的範例。一堆抽象概念而沒有特點則難以閱讀，還有，一大堆具體細節但沒有完整的概化也讓人讀不下去。
8. 隱喻。許多作者用隱喻來表達概念。像是「最前線」(the cutting edge)、「底限」(the bottom line)等都是借自其他脈絡的意象。隱喻會是一種很有效的溝通方式，但是要很小心使用。少數選得很好的、一致的、新穎的隱喻可以很快傳遞一些概念，然而，過度運用隱喻也是一種草率的、無趣的表達方式。

最後的建議是：完成初稿後再重寫前言和標題，這樣可以正確地反映該報告的內容。標題要簡短而且是描述性的，要傳遞主題和主要變項給讀者知道。也可以描述研究的類型（如，「對……的實驗」），但不要包含不必要的字或詞（例如，「對於……的投資」）。

量化研究報告

優良撰寫的原則可以應用到所有報告上，但是量化或質化的報告還是會造成差異。在撰寫任何報告時，先閱讀相同研究模式的研究報告。

我們從量化研究報告開始。報告的章節大致上是和研究計畫的步驟順序一致。

摘要或執行摘要

量化研究報告通常從簡短的摘要開始。摘要的篇幅長短不一；可能少於50個字或長達整頁。大多數學術期刊文章的摘要都印在文章的第1頁，摘要包含有關標題、研究問題、基本發現以及任何不尋常的研究設計或資料蒐集特色。

專為實務工作者所寫的應用研究報告，摘要就比較長，稱為「**執行摘要**」(executive summary)。這包含了比文章摘要更多的細節，也包括報告中指出的研究意涵和建議。這雖然比摘要長，執行摘要還是很少超過4到5頁。

摘要有幾種功能：對比較沒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告知報告的內容；對尋找特定資訊的讀者，則助其決定這整份報告是否含有重要資訊。讀者可運用摘要來瀏覽資訊並決定是否要讀整份報告。這可以給那些想讀整份報告的認真讀者，很快有一個對報告的快取圖像，並有助於更快也更容易閱讀。

呈現問題

報告的第1部份定義了研究問題。這可以放在一個或幾節中，標題可能叫做「導論」、「問題定義」、「文獻檢閱」、「假設」或「背景假設」。雖然次標題有很多，但內容都包括對研究問題的陳述以及所檢視問題的理性基礎。在此，研究者解釋重要性並提供研究問題的背景。他們藉著顯示問題的不同解決途徑導致不同的應用或理論結論來顯示研究的重要性。導論通常包括脈絡的文獻回顧以及將問題與理論加以連結。導論也定義關鍵概念並呈現概念的假設。

方法描述

報告的下一節則描述了研究者如何進行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的工作。這有很多名稱（例如「方法」、「研究設計」或「資料」），也可能被區分成幾部分（如：「測量」、「取樣」、或「操弄」）。這是在評估研究計畫方法論最重要的部分，這部分回答了幾個重要的問題：

1. 進行的是哪一種研究（實驗的、調查的）。
2. 資料蒐集的確實方法（例如研究設計、研究的種類、資料蒐集的時間地點、所用的實驗設計等）？
3. 變項如何測量？測量是可信而有效的嗎？
4. 誰是樣本？研究中牽涉到多少受試者？是怎樣選出來的？
5. 研究設計怎樣處理倫理議題或特殊的關懷？

結果和表格

在描述過如何蒐集資料、抽樣方法、以及測量方法之後，接著就要呈現資料。本節談的是——這不是資料的討論、分析或詮釋。研究者有時候將「結果」這部分，和下一部分「討論」或「發現」合併在一起。

研究者在呈現資料的方法上有幾個選擇。在分析資料時，研究者檢視許多單變量、雙變量和多變量的表格以及統計，以獲得對資料的感覺。這不表示所有統計或表格都會納入最後的報告之中。研究者選擇用最少量的圖表來呈現原始資料讓讀者完全瞭解。資料分析技術應該是將資料和檢定的假設（例如：次數分配、平均數和標準差的表格、相關係數以及其他統計）加以摘要。

研究者想要將資料完整地呈現但又不至於過度困擾讀者——不呈現太詳細或不相關的資料。研究者可以自行加以詮釋。詳細的摘要統計應該放在附錄中。

討論

在討論的章節，研究者將資料的意義提供給讀者一個簡明的、清楚的詮釋。討論並非選擇性的重點或偏袒某觀點的詮釋，而是將結果提出公平的討論。討論和結果區分開來這樣讀者才能夠自行檢視資料並獲致不同的詮釋。Grosof和Sardy（1985: 386）提出，「你所呈現資料的安排應該一方面要反映資料（你觀察所得的紀錄）和摘要與分析間清楚的分野，另一方面則是你的詮釋、結論和評語。」

研究新手常常會發現要組織討論的章節很困難。一種方法是根據假設來加以組織，討論資料和假設之間的相關。此外，研究者也要討論預期外的發現、可能的其他解釋或缺點與限制。

提出結論

研究者在結論中重述一次研究問題並總結發現，其目的是將報告予以摘要，這部分的標題有時候就稱之為「摘要」。

在結論之後唯一的部分就剩下參考書目和附錄。參考書目部分只包括報告文本中所引用的資料以及註釋。附錄則通常包含有在資料蒐集方法上的其他資訊（如：問卷）或結果（如：描述的統計）。質化研究報告中的腳註或文後的註釋則詳細說明文本中的資

訊。研究者特別用這些來提供澄清文本的次級資訊，但也可能會分散整體閱讀的流暢性。

質化研究報告

和量化研究比起來，要撰寫質化社會研究是更困難的，因為規則與結構比較少見。然而，目的是相同的：清楚地傳達研究過程，並透過此過程呈現所蒐集的資料。Bogdan與Taylor（1975: 142）曾說過：「基於質化研究的報告、文章或專題論文不是，也不應該是個人對情境狹隘的觀點，而是對那些透過努力地、有系統地蒐集及詮釋的資料，予以描述性、分析式的呈現。」

量化報告用緊密的邏輯和紮實的風格來呈現假設和證據。相反的，質化報告通常較長，像一本書般長度的報告也時有所見。這種長度基於5個原因：

1. 質化報告的資料比較難以濃縮。資料的形式是文字、圖畫或句子，而且包含許多引述及範例。
2. 質化研究者除了呈現事實證據和分析詮釋之外，也想在讀者間創造出一種同理的主觀感受。對特殊場景或情境鉅細靡遺地描述有助於讀者更清楚的瞭解，並對該情境產生一種感覺。研究者試圖將讀者帶到該社會情境的主觀世界觀點和意義體系中。
3. 質化研究者用較少標準化的技術來蒐集資料、創造分析的類別、以及組織證據。所應用的技術可能是相當針對個別研究者或獨特的情境。因此，研究者必須解釋他們如何進行及其原因，因為過去可能未曾有研究者如此做過。
4. 在質化研究中，探索新的情境或建構新的理論是很普遍的。新概念的發展以及其間關係的解釋會增加報告的篇幅。理論來自證據，而詳細的描述則證實了研究者的詮釋。
5. 質化研究者可以用各種不同的文獻撰寫風格，如此也增加了報告

的篇幅。講故事的方式有很大自由揮灑的空間。

實地研究

實地研究報告很少會有固定的形式和標準章節，理論概化和資料是獨立出來的篇章。概化和證據交錯在一起，而形式常常是詳實的描述並加以許多引述。

研究者會將資料和分析的呈現加以平衡，以避免二者過度分開，稱之為「隔離的錯誤」(error of segregation)，這會發生在當研究者將資料和分析分得太開，而使得讀者無法看到之間的連結。

實地研究報告的筆調比較不客觀、正式，而是比較個人化的。實地研究報告可能會以第一人稱（用「我」這個代名詞），因為研究者是直接參與在情境中、與被研究對象互動、本身就是測量的「工具」。研究者本身的決斷或遲疑、感受、反應、和個人經驗都是實地研究過程中的一部分。

實地研究報告經常會面對比量化研究報告更多的質疑。因此評估觀眾對證據的需求並建立公信力就很重要。關鍵在於提供讀者足夠的證據，使之相信並接受這些事件和詮釋是真的。實地研究中選擇性的觀察某種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因此重要的議題就是，如果其他研究者檢視相同資料時是否也會獲致相同的結論。Schatzman 及 Strauss (1973: 133) 強調建立公信力這個議題的重要性：

建立觀眾的信任首要條件是研究者堅信自己所言所述。這種堅定的信念有賴研究者表現出這是必須而可靠的過程，以及對所言即所觀察的確信。

實地研究者在呈現證據時會面對資料減少的兩難。許多資料是以很大量田野筆記的形式出現，但研究者無法與讀者直接分享所有的觀察和對話。舉例來說，在 Becker 和 Geer 針對醫學院學生的研究「白衣男孩」(Boys in White) 中，有大約 5,000 頁的田野筆記，

實地研究者只在報告中涵蓋了大約5%作為引述。其他95%的資料並沒有浪費，只是沒有辦法容納進去。因此，研究者選擇某些引言而間接地將其他的資料傳達出去。

實地研究報告沒有固定的組織，雖然文獻檢閱通常放在很前面。有許多組織方式都是可接受的。Lofland（1976）建議：

1. 導論
 - a. 情境中最普遍的面向
 - b. 一般情境的主要輪廓
 - c. 資料蒐集方式
 - d. 場域中的細節
 - e. 報告組織的方式
2. 情境
 - a. 分析類別
 - b. 情境之間的對照
 - c. 情境經過時間之後的發展
3. 策略
4. 摘要和意涵

組織證據和分析策略也有很多變化。比方說，作者可以用「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的方式來組織報告，也就是一發現證據就展示出來；或是「編年法」（chronology），依照發展週期或場域中某一面向的發展程序；另一種組織報告的可能方法是「變焦鏡頭法」（zoom lens），即針對某一特定主題從廣泛慢慢集中討論範圍。可以從各種文化的共通性，進到某種文化的通則，到某種文化的單一面向，到某文化中某一面向的某種特質，再到某特殊事件的陳述。

實地研究者也依主題來組織報告。作者從選擇運用抽象分析主題到運用從被研究者所用的類別。後者提供讀者對場域的鮮明描述以及對所寫的語言、概念、類別和信念的知識。

實地研究者也討論報告中所用的方法，但形式各異。一種方式是將對場域的描述、進入田野的手段、研究者的角色、和客體 / 研究者的關係，以及對證據的討論、分析交織在一起。這當作者採用 Van Maanen (1988: 73) 所謂的「自白」(confessional) 風格來撰寫時，則有強化的作用。編年的、變焦的或主題式的組織方式允許將資料蒐集方法放在報告的前面或後面。在像書一樣的報告中，方法論的議題通常是用獨立的附錄來討論。

實地研究報告可以包括錄音帶的逐字稿、地圖、相片或用來顯示分析類別的圖表。這些資料補充了討論並放在討論的章節附近。質化實地研究可以運用有創意的形式，有別於一般來自田野筆記範例的書寫文本。Harper (1982) 的書在文本中納入許多照片。照片給予我們對文本所描述的場景一種視覺的印象，而呈現出意義。舉例而言，實地研究文章可能以全部照片來呈現 (Jackson, 1978) 或以劇本來呈現 (Becker et al., 1989)；紀錄片則是資料呈現的另一種形式。

在社會場域中直接的、個人參與的私密細節增加了倫理的考量。倫理考量可以和方法論一起討論或成為一個獨立的議題。研究者書寫時採取一種保護被研究者隱私的態度，並避免報告的出版傷害了被研究者。通常在實地報告中會將名字以及確實地點改掉。個人在實地研究中的參與會導致研究者納入簡短的自傳。比方說，William Foote Whyte 在其著作「街角社會」(Street Corner Society) 的附錄中，詳述其父親和祖父的職業、其嗜好和興趣、他的工作、他的研究生涯、以及其研究如何受到婚姻的影響等等。

歷史比較研究

在撰寫歷史比較研究上沒有單一方法，最常見的是研究者「說一個故事」或在一般的分析類別中詳述細節。這種書寫通常超越描述，包含了有限的概化和抽象概念。

歷史比較研究者很少仔細描述其方法。在報告中用單獨篇章或

附錄來描述研究方法是很少見的。有時候，如書般長的報告其中之參考書目才會討論所用的主要資料。比較常見的是，用很多註釋來描述資料來源。比方說，20頁的量化或實地研究通常有5到10個註釋，而相同長度的歷史比較研究報告則可能有40到60個註釋。

歷史比較報告也可能有照片、地圖、圖表或統計表格貫穿整份報告，而在其間討論證據的關連性。這些圖表可作為討論的補充，或給讀者對所描述的地方、對象有更真實的感覺。這在常用引述之間作為連接，成為各種不同的證據形式。歷史比較報告很少像量化研究一樣，進行資料的摘錄以檢定特定假設。而是研究者建立意義的網絡或描述的細節並組織證據本身來傳達詮釋和概化。

組織歷史比較研究報告有兩種基本模式：用主題或依時序。多數會將兩者混合。舉例而言，資訊會在某主題之下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或是在某段時間內以主題來整理。有時候也會運用其他組織形式——用地方、用個人、或用主要事件。如果報告真的是比較性質，作者有時候會有其他意見，像是依主題來作比較。（表16.7）的範例就是某些歷史比較研究者用來組織證據和分析的技術。

一些歷史比較研究者模仿量化研究報告並運用量化研究技術。他們擴充量化研究而不僅採取純粹的歷史比較研究方法。他們的報告依循量化研究報告的模式。反之，許多歷史比較研究者應用敘事歷史的模式，這和質化社會研究的邏輯較為一致。Stone(1987: 74)描述敘事歷史如下：

敘事是採取依時間順序來組織資料的手段，內容焦點在單一連貫的故事，那怕是一些次要情節。敘事歷史和結構歷史兩大區別在於前者的安排是描述性而非分析的，而其中心焦點在人而不在環境。因此處理的是特定對象的特殊性，而不是集體和統計資訊。

表 16.7 撰寫歷史比較研究十大考慮面向

1. 順序。歷史比較研究者對事件的時間順序是很敏感的，並將事件按照順序放置以描述出過程。譬如研究者研究法案的通過或社會規範的變遷，就要回到一系列步驟的順序中來檢視。
2. 比較。比較相似性、相異性是歷史比較研究的中心。精確地比較並確認彼此間的相似性和相異處。舉例來說，研究者比較兩個歷史時期或國家中的家庭，會從列出在兩個情境下共通和不同之處開始。
3. 事件。研究者常常會發現事件、動作或情境和其他息息相關。指出事件間的關連性是很重要的。舉例而言，研究者解釋地方報紙的興起是因為識字率上升。
4. 起源和結果。歷史比較研究者回溯事件、行動、組織、或社會關係的起源，或是追蹤到某段時期的後續結果。比方說，研究者檢視農奴制度的結束，會回溯過去 50 年間的許多運動、演講、法律和行動。
5. 對矛盾的意義有敏感度。意義會隨時間和文化改變。歷史比較研究者會問自己某個字或某種社會類別在過去和現在意義是否相同，某文化中的某個字在另一個文化中是否可直接翻譯？譬如大學程度在歷史年代中就有不同意義，過去念大學是極度昂貴，18 到 22 歲間的人口群只有少於 1% 的人可獲得大學文憑，而 20 世紀晚期，進大學則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
6. 有限的概化。過度概化在歷史比較研究中一直是個潛在的問題。少數研究者會在歷史比較的解釋中尋求僵化的、固定的規則。他們限制陳述或避免絕對的決定性。舉例而言，關於歐洲白人生存區域中所建構的本土文化的毀滅，其總括性陳述，是先進科技文化下不可避免的結果，研究者可以合併列出特定因素來解釋特殊社會歷史情境的衰亡。
7. 連結。連結的概念用在所有形式的社會研究。正如其他領域，歷史比較研究者確認同時同地出現的因素。譬如研究者檢視某城市 19 世紀的犯罪率，會問該年移民入該城市人口多時，和犯罪率升高有無關連性，而被逮捕者是否多是新進的移民人口等。
8. 部分和整體。將事件放在脈絡中是很重要的。歷史比較研究者會描述過程、組織或事件的一部分，以及發現這些訊息的整體脈絡。比方說，研究 18 世紀特殊政治儀式的場景，會描述該儀式怎樣符合 18 世紀的政治體系。
9. 類比。類比是很有用的，但過度類比或運用不恰當的類比也很危險。舉例來說，研究者檢視在 X 國對離婚的感覺，描述為像是在 Y 國「好像死了一樣」的感覺。這樣的類比就需要描述在 Y 國「好像死了一樣」的感覺是什麼。
10. 綜合。歷史比較研究者經常綜合許多特殊事件和細節而形成整體。從許多小的概化和詮釋交織在一起形成綜合的結果，並形成主要主題。舉例來說，研究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者綜合了社會結構、國際壓力、農業斷層、信仰的轉移以及政府的財政問題這些特殊的概化，而形成紮實的、連貫的解釋。研究者運用敘事形式將論點摘要成導論或結論。這是由描述所堆疊起來的主題。因此，理論概化和證據交纏在一起，表現出從詳細的證據中導引出結論。

研究計畫書

何謂研究計畫書

所謂研究「計畫書」(proposal)是一份文件，將研究計畫呈現給評估者閱讀。這可能是教育過程中指導教授所指導的計畫（例如碩士或博士論文），也可能是呈現給贊助研究單位的計畫書。其目的是說服評估者，你，作為研究者，是有能力進行這項研究計畫的。如果研究計畫書寫得很好，組織得很好，並且經過詳細計畫該如何呈現，則評估者會比較有信心，認為此計畫得以完成。

研究計畫書和研究報告有些類似，但是這是在研究開始之前所撰寫。研究計畫書中描述了研究問題和重要性，並詳細說明所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為何選定此法。

量化研究的計畫書包含研究報告的大部分：標題、摘要、問題陳述、文獻檢閱、方法或設計、以及參考書目。缺少的是結果、討論和結論等章節。研究計畫中有資料蒐集與分析（如統計方式）的計畫。通常包含了將採取的步驟進度以及每個步驟預期所需的時間。

質化研究的計畫書就比較難寫，因為研究過程本身是比較非結構而無法事先計畫的。研究者準備了問題陳述、文獻檢閱以及參考書目。他／她用兩種方式顯現其有能力完成一個質化的研究。首先，研究計畫書要寫得很好，有清楚的文獻討論、問題的重要性以及資料來源。這可以讓評估者熟悉質化研究，以及研究此問題採用這種方法的適當性。其次，研究計畫描述質化的前置研究，這把動機、對研究技術的熟知、以及有能力完成非結構式的研究報告展現出來。

以計畫書申請經費

研究贊助的目的是提供所需的資源，幫助完成這項有價值的計

畫。如果研究者的基本目標是運用資金達到個人利益或聲望、免去其他活動、或是建立個人「帝國」，這是比較不成功的。撰寫研究計畫書的策略以及獲得資金已經變成一種事業，稱之為「獲得贊助的本領」(grantsmanship)。

研究計畫的資金有很多來源。大學、私人基金會、政府機關都有些獎助研究者的方案。贊助可以用來購買設備、支付薪水、補充研究所需、或到處蒐集資料所需、也可能贊助研究結果的出版。贊助的程度因著資源而有很大的差異，有些可以贊助3到4個研究計畫，有的則資助不到二十分之一。

社會研究也有許多資金來源，但可能沒有資金願意贊助單一特定計畫。研究者需要針對資金來源作些調查：哪一種類型的計畫最廣為接受——應用或基礎研究、特定主題、或特定研究技術？申請截止日期為何時？需要哪種研究計畫書（例如長度、詳細度等）？最多可獲得多少贊助？哪些部分（如：設備費、人事費、差旅費）最被或最不被贊助？在尋求贊助時有很多資訊要蒐集。在大學負責研究贊助的圖書館員或職員是很好的諮詢對象。比方說，私人基金會會在一本年度出版品「基金會字典，社會科學之聯邦基金導覽」(The Foundation Directory. The Guide to Federal Fund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詳列美國政府的資源。在美國，有很多贊助資源的刊物，以及兩大全國性的電腦資料庫（SPIN和IRIS），訂閱者可以透過此系統查詢贊助資源。有些機構會定期出版「尋求研究計畫訊息」(requests for proposals, RFPs)，會尋求特定議題的研究計畫予以贊助。研究者要學習瞭解贊助資源，因為把研究計畫書送到適當的機構申請是成功的重要關鍵。

研究者要在研究計畫書中顯示過去成功的紀錄，尤其是身為研究負責人時。負責研究計畫的人稱之為「首席研究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或研究主持人。研究計畫書通常包含其學術背景、其他研究者的支持信、及過去研究的紀錄。評估者要把錢投注在一個由過去有研究經驗的人領軍的研究，會比贊助新手感覺來得

安全。因此在研究計畫中要加入過去研究記錄，或由有經驗的研究者擔任計畫主持人來申請經費贊助。

評估者評斷研究計畫是基於該計畫是否符合贊助資源的目標。大多數贊助資金都有一套準則說明他們贊助哪一類計畫。舉例而言，贊助基礎研究的方案是以先進的知識為目標；贊助應用研究的資金則常以改善服務輸送為目的。還有一些說明像是計畫書長度、份數、申請截止日期等等。確實遵守這些規則。評估者為何要將好幾千美元投資在一個甚至連研究計畫的長度都控制不好的研究者身上，而期待他／她能進行一個複雜的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書要簡潔而專業。申請規則通常要求有詳細的所運用時間、服務和人事編制。這要清楚地說明而且很實在。過高或過低的預估、不必要的擴充、或限制其重要性只會減低評估者對研究計畫的評價。擬出研究計畫的經費預算是很複雜的，通常需要技術性的支援。比方說，薪資比、福利比等這些要付出的部分可能並不容易計算。最好向贊助單位的工作人員或有經驗的計畫撰寫者諮詢。此外，清楚申請規則或簽署同意書是有必要的（見第六章的IRB同意書）。計畫書也要包含研究結果的發表計畫（如出版、在專業團體中的發表），以及評估研究是否達成目標的方式。

研究計畫是研究者和贊助單位間要完成研究計畫的契約。贊助單位通常要求有一份最後的報告，包括資金運用狀況的明細、研究發現、以及研究計畫是否達成目的的評估。不當運用資金、未完成研究計畫、或提不出最後的報告，則可能使研究者以後無法再取得贊助，甚至面對法律行動。嚴重濫用資金可能會導致同一機構的其他研究者未來也得不到贊助。

申請贊助後機構的審核可能會花上幾個禮拜到一年的時間，視贊助單位而定。大多數的評估者會將眾多研究計畫書分等級，只有評價比較高的研究計畫會獲得贊助。研究計畫通常要經過不記名的同儕檢閱，他們可以從計畫書中的個人簡歷知道研究者，但研究者並不知道評估者是誰。有時候研究計畫也會交由非專家或非研究者

來評估。申請規則中會說明此研究計畫是交由該領域的專家或一般大眾來評斷。研究計畫也可能由幾群不同人來評估，一般來說，申請大量經費的研究計畫通常會被更仔細地評估。

如果研究計畫獲得贊助了，去慶祝一下吧，但不要慶祝太久。如果計畫被拒絕了，這是很常有的，也無須太絕望。大多數研究計畫在提出的第1或第2次都會被拒絕。許多贊助機構會提供對研究計畫的書面評估意見，如果沒有提供的話也可以向機構提出要求。有時候，在電話中有禮貌地請教贊助單位的工作人員也可以發現被拒絕的原因。以評估者的評論去加強研究計畫，之後再遞送。大多數贊助機構會接受這種修正過再提出的計畫，而加以修正的計畫也會較具競爭力。

如果研究計畫向適當機構提出申請，也都按照規定，則符合以下條件者比較容易入選：

1. 研究想瞭解的是重要的研究問題。甚至是在基礎研究之前建立一些知識和呈現基本的優勢。記錄下主要的社會問題，並對應用研究提出找出解答的允諾。
2. 依循所有規則，寫得很好、容易閱讀、目標陳述清楚。
3. 完全描述研究程序，包括了高標準的研究方法論，且適度應用研究技術來解答研究問題。
4. 包括研究結果的發表計畫，以及計畫是否符合目標的評估。
5. 研究計畫設計良好並顯示出認真的規劃。預算和進度規劃確實。
6. 研究者有必要的經驗或背景，得以成功完成此研究。

結論

本章有兩個主題：社會研究過程的表達是重要的，以及社會研究是一種集體的活動，建立在許多人的努力之上。這些主題在第一章中已呈現，但至此應該更加清楚了。社會研究者生產的知識只有

透過許多個人的努力才得以前進。這就是文獻檢閱之所以這麼重要，以及重視那些充滿學術期刊文章以及搜尋工具的圖書館的原因。網際網路給研究工作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但並未改變研究的基礎。

研究和閱讀他人研究報告的另一面是撰寫個人所進行的研究。本章包括了許多對撰寫報告的建議——有些和其他領域的報告撰寫原有略有差異。最重要的建議而可以應用在研究本身的是，關於練習的重要性。成為優秀研究者的最佳途徑以及學習寫出品質良好的研究報告方法是一樣的，就是直接參與研究過程、撰寫、以及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過程。新手研究者第一個步驟是採取科學的態度、負起倫理責任、以及閱讀他人如何進行研究的種種細節。第二個步驟是研究計畫的設計和進行，並以研究報告傳達研究的內容。關於這一點，研究者跨越從某一邊的觀察者，跨越了一條看不到的界線，而成為社會研究此一持續進行中產業的參與者。

重要名詞

摘要	引用	脈絡回顧
隔離的錯誤	執行摘要	自由寫作
歷史回顧	整合回顧	關鍵字
後設分析	方法論的回顧	改寫
首席研究者	尋求研究計畫	重寫
搜尋引擎	自我研究的回顧	理論回顧
寫作者的障礙		

問題回顧

1. 文獻檢閱的4個主要目標為何？
2. 哪些文獻的出處是比較容易找到，而哪些是很難找到的？

3. 你會怎樣去找一篇博士論文？
4. 有系統地進行文獻檢閱的第1個步驟為何？
5. 文獻檢閱優劣如何區分？
6. 社會研究中運用網際網路的優缺點何在？
7. 如果你遇到寫作者的障礙時，你該怎麼作？
8. 量化研究中研究方法的章節擺在何處？實地研究和歷史比較研究這部分又該放在哪裡？
9. 為何質化研究報告的篇幅通常比量化研究報告長？
10. 何謂RFP？其目的為何？

附錄 A

美國社會學會倫理守則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導言

美國社會學會的倫理守則為社會學家的專業責任與行為設定原則與倫理標準。這些原則與標準應該做為檢視平時專業行為的準則。它們為社會學家設定規範陳述，針對社會學家在專業活動中可能碰到的議題，提供引導。

美國社會學會的倫理守則包括導言、前文、五項一般原則，以及詳細的倫理標準。本守則也搭配美國社會學會專業倫理委員會（ASA Committee on Professional Ethics）的規則與程序（Rules and Procedures），這些規則與程序描述有關違反倫理行為的申訴、調查與解決的程序。

本守則的導言與一般原則提出期許的目標，引導社會學家達成社會學最高的標準。雖然導言與一般原則不是可以執行的規則，但社會學家考慮行動方式是否符合倫理時，應該考量到它們。負責倫理的組織詮釋倫理標準（Ethical Standards）之時，也可以考量它們。

倫理標準為社會學家的行為制定可以執行的規則。多數倫理標準的寓意廣泛，以便適用於扮演各種角色的社會學家，任何一種倫理標準的適用都要視情況而定。倫理標準不是無所不包的。本倫理守則未能特別提及的任何行為，不一定是合乎倫理的，也不一定是

美國社會學會要求會員遵守美國社會學會的倫理守則，以及專業倫理委員會的原則與程序。會員在入會時，已獲知此一責任。違反本守則，可能遭到制裁，包括終止會員身分。只有會員的活動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或者影響到他們的工作，又或者活動在本質上是社會學活動的時候，受到本守則約束的會員才會受到這些倫理標準的審查。個人活動若與社會學家專業角色的表現無關，或者沒有影響，不受本倫理守則的約束。

前文

本倫理守則說明社會學家從事專業與科學工作所依據的共同價值。本守則意在提供一般原則與規則，以涵蓋社會學家面對的專業情境。它的主要目的是保護那些與社會學家一起工作的個人及團體的福祉。研究、教學、執業、服務的行為盡可能符合最高的標準，是每位社會學家個人的責任。

社會學家工作相關行為的動態倫理標準的發展，需要個人終身謹守符合倫理的行動；需要鼓勵學生、監督者、被監督者、雇主、受雇者、同僚做出符合倫理的行為；更必須針對有關倫理的問題，和其他人討論。每位社會學家宜應依據個人的價值觀、文化與經驗，補充倫理守則所規定的價值與規則，但不可違反規則。

一般原則

下列一般原則多為期許的原則，用以引導社會學家因地制宜，判斷什麼行為是符合倫理的。它們說明專業行為的最高標準。

A 原則：專業能力

社會學家在他們工作時致力於維持最高的專業能力；他們瞭解自己專業能力的限制；他們只做自己的教育、訓練或經驗容許他們

所做的工作。他們知道需要持續的教育，以便維持專業的能力；他們利用適當的及需要的科學、專業、技術與行政資源，確保他們的專業活動所需的能力。為了學生、研究夥伴與對象的福祉，他們在必要的時候，與其他專業人士討論。

B 原則：剛正不阿

社會學家要誠實、公正，尊重他人的專業活動——研究、教學、執業與服務。社會學家絕不在知情的狀況下，危及他們自己與他人的專業福祉。社會學家從事其工作的方式是要鼓勵信任與信心；他們絕不在知情的狀況下，提出錯誤的、誤導的或欺騙的陳述。

C 原則：專業責任與科學責任

社會學家遵守最高的科學與專業標準，承擔他們工作的責任。社會學家瞭解他們形成一個社群，並尊重其他社會學家，即使他們對專業活動在理論上、方法論上或個人研究途徑有不同的意見。社會學家珍視大眾對社會學的信任，關切他們自己及其他社會學家可能危害這種信任的倫理行為。社會學家總會與同儕相處來往，但社會學家絕不會讓相處來往遮蔽他們遵守倫理的共同責任。他們適時與同僚討論，預防或避免不合倫理的行為。

D 原則：尊重人的權利、尊嚴與多樣性

社會學家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尊嚴與價值。他們在專業活動中致力於消除偏見，他們不能容忍任何以年齡、性別、種族、族裔、民族、宗教、性取向、殘障、健康狀況，或婚姻、家庭、父母地位等狀況為基礎的歧視。他們為具有明顯特質的團體服務，以及教導、研究這些團體之時，注意到文化、個人、角色的差異。在所有跟他們的工作有關的活動中，社會學家認可他人所持價值、態度、意見與他們自己的價值、態度、意見迥然不同的權利。

E 原則：社會責任

社會學家瞭解他們對自己生活、工作的社區與社會應有的專業與科學責任。他們應用他們的知識，並公告周知，以便對公益有所獻替。他們在做研究時，致力於推展社會學這門科學，為公益服務。

倫理原則

1. 專業與科學標準

社會學家從事他們的研究、教學、執業與服務活動時，盡可能遵守最高的、合理的、負責的技術標準。他們倚賴科學與專業方式獲得的知識；行為舉止都要誠實正直；從事與工作有關的職能或活動時，避免不實的、欺騙的，或沒有文獻佐證的陳述。

2. 能力

- (a) 社會學家只依據他們的教育、訓練、他人監督下所得的經驗或適當的專業經驗，在他們的能力界限內做研究、教學、執業及提供服務。
- (b) 社會學家只有在他們採取合理的步驟，確保他們的工作能在新領域完成之時，才在新領域之內研究、教學、執業及提供服務，或是使用新技術。
- (c) 從事研究、教學、執業及服務的社會學家，隨時注意其活動領域內現有的科學與專業資訊，不斷努力維繫他們使用其技能的專業能力。
- (d) 若社會學家的個人狀況可能干擾他們的專業工作，或是傷害到他們在科學、教學、諮詢或其他專業上必須負責的學生、監督對象、研究對象、委託人、同事，絕不採取行動。

3. 表述與專業知識的誤用

- (a) 在社會學家研究、教學、服務或其他需要專業判斷，或運用其專業知識之時，要正確地、公正地展現他們的領域與專業知識。
- (b) 獎助、合約或指派的工作違反本倫理守則標準之時，不論贊助者是個人，還是組織，社會學家都不接受。社會學家發現其活動有違守則，無法改正之時，斷然退出。
- (c) 由於社會學家的科學與專業判斷、行動可能影響他人的生活，他們應注意防範各種個人、社會、組織或政治因素導致其知識、專業技能或影響力的誤用。
- (d) 如果社會學家察覺他們的著作遭到誤用與扭曲，他們要採取負責的步驟，糾正或盡量減少誤用或扭曲。

4. 授權與監督

- (a) 社會學家要提供合宜的訓練給他們的學生、監督對象或受雇者，予以合宜的監督，並採取負責的步驟，確保這些人員以負責、盡能、合乎倫理的方式，從事服務。
- (b) 社會學家賦予他們的學生、監督對象或受雇者的責任，只有他們的教育、訓練或經驗讓他們可以合理地、獨立完成或在一定監督之下盡的責任。

5. 不歧視

社會學家在他們的工作中避免年齡、性別、種族、族裔、民族、宗教、性取向、殘障、健康狀況、婚姻地位、家庭地位或個人地位的歧視，或是任何法律認定的歧視。

6. 不剝削

- (a) 不論是個人的、經濟的，或是專業上的利益，社會學家絕不利

用他們直接或間接監督、評鑑或有權控制的人，包括學生、監督對象、受雇者或參與研究的人員。

- (b) 社會學家不直接監督任何與他們有性關係的人，或是運用評鑑的權威，包括學生、監督對象、受雇者或參與研究的人員。

7. 騷擾

社會學家不騷擾任何人，包括學生、監督對象、受雇者或參與研究的人員。騷擾包括專一的、密集的、嚴重的行為，或是多重的、長久的或各種低下的、濫用權力的、冒犯的行為，或是造成一種不懷好意的專業環境或工作環境。性騷擾包括性挑逗、肢體接觸或口語與非口語的、帶有性暗示的行為。種族騷擾包括因個人種族或族裔而做的不必要的、誇張的，或是不受歡迎的注意或攻擊。不論是口語的，還是非口語的，都是種族騷擾。

8. 雇用的決定

社會學家參與和雇用有關的決定時，尋求雇用機會時，或是計畫辭職時，有責任遵守最高的倫理標準。

8.01 公平雇用的行為

- (a) 參與和雇用有關的決定時，社會學家盡力確保所有全職與兼職受雇者有平等的機會與公平的待遇。對於和雇用、升遷、薪資、待遇或任何有關就業或事業發展的事項，他們避免年齡、性別、種族、族裔、民族、宗教、性取向、殘障、健康狀況、婚姻狀況、家庭狀況或父母狀況的歧視，或其他法律定義的歧視。
- (b) 參與和雇用有關的決定時，社會學家說明雇用、升遷、任期及終止的要件，並將這些要件充分傳達給受雇者與未來的受雇者。
- (c) 參與和雇用有關的決定時，社會學家有責任瞭解公平雇用的規

定，將這項資訊傳達給受雇者，並協助為全職與兼職的受雇者創造一種維護公平雇用的環境。

- (d) 參與和雇用有關的決定時，社會學家要告知未來的全職與兼職受雇者任何與研究、出版有關的限制，並針對任何可能限制研究與學術活動的情況，達成明確的協定。

8.02 受雇者的責任

- (a) 尋找受雇機會時，社會學家將有關專業資格與經驗等正確的、完整的資訊提供給未來的雇主。
- (b) 離職的時候，不論是暫時離職，還是永久離職，社會學家適時通知其雇主，並採取負責的步驟，將離職的負面效應減到最小。

9. 利益衝突

社會學家在他們的專業工作中不偏不倚，避免利益衝突與衝突的出現。社會學家的個人或財務利益使他們無法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從事其專業工作的時候，就是利益衝突。在研究、教學、執業、服務的時候，社會學家提高警覺，注意可能造成利益衝突的情況，並採取適當的行動，防止衝突，或向適合的人士揭露。

9.01 遵守專業標準

不論是他們的個人或財務利益，還是雇主與委託人的個人或財務利益，社會學家認知、執行(1)資料搜集、分析與詮釋；(2)研究報告發表；(3)教學、專業報告或社會學知識公開散播，以及(4)適當的簽約、諮詢或服務活動之時，遵守專業與科學標準。

9.02 揭露

若看起來有利益衝突，或是可能有利益衝突的時候，社會學家向雇主或委託人、專業工作的贊助者，或在公開的演講與著作中，

公開財務支援的相關資料，以及相關的個人或專業關係。

9.03 個人利益的迴避

- (a) 在任何情況之中，社會學家都不使用秘密取得的材料（例如，審核手稿所得的知識，或是擔任提案評審時），或從中謀取利益，除非他們取得授權，或是資訊已可公開取得。
- (b) 在任何情況之中，社會學家未獲雇主或委託人許可，不利用雇用與委託人的關係，謀取利益。

9.04 工作場所的決定

在他們的工作場所中，社會學家採取適當的步驟，避免利益衝突或衝突的出現，並提防可能產生的偏向連繫或關係。在研究、教學、執業或服務時，這種可能產生的偏向連繫或關係包括的狀況牽涉到家庭、事業或親密個人關係，或是曾與社會學家有強烈衝突或歧見的人，也不限於這些狀況。

9.05 工作場所之外的決定

在社會學家工作場所之外的專業活動之中，如果他們與某些個人或組織有偏向的連繫或關係，他們在所有時地都不討論、不決定如何分配或保留這些個人或組織的福祉或報酬。這些偏向的連繫或關係是指：1)目前的受雇者，或是在組織或體制任職的人可以解釋為因此一決定而得利；2)一個組織或體制的主事者或委員可以解釋為因此一決定而獲利；3)目前在職的人，或是同一組織或體制雇用的個人可因此一決策而得利；4)配偶、家人或是已知為親戚的個人可能因此一決定而得利；或是5)可能因此一決定而獲利的個人，如事業或專業的夥伴、合作研究的人員、受雇者、監督對象或學生。

10. 公開傳播

不論是他們自己傳播給別人的，還是別人傳播給他們的，社會

學家對於專業服務、文憑與專業知識、著作產品或出版品的公開傳播，遵守最高的專業標準。

10.01 公開傳播

- (a) 社會學家採取步驟，以確保所有公開傳播的正確性。這種公開傳播包括，但不限於這些傳播：目錄引列、個人履歷或簡歷、廣告、手冊或印刷品、訪問或對媒介做的評述、法定程序的陳詞、授課與公開口頭報告，或是其他出版的材料。
- (b) 對於他們的研究、執業或其他活動，或是與他們有關係的個人或組織，社會學家都不會因為陳述、傳達、暗示，或是省略，而做錯誤的、欺騙的、誤導的、詐騙的公開陳述。
- (c) 社會學家透過公開授課、示威運動、廣播或電視節目、預錄的錄音帶、印製的文章、郵寄文件或其他媒介，提供專業建議或評論時，他們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以確保(1)陳述是依據合宜的研究、文獻與行為；(2)陳述在其他方面符合本倫理守則。

10.02 他人的陳述

- (a) 社會學家聘請或雇用他人，製作或提出公開陳述，推廣他們的著作、專業服務，或其他活動之時，仍要為這種陳述負責。
- (b) 社會學家要做合理的努力，防止他們並未直接聘請、雇用或監督的人（如雇主、出版商、贊助者、委託的組織、媒介人員）對他們的專業研究、教學或執業活動，做欺騙的陳述。
- (c) 與新聞界、廣播、電視或其他傳播媒介，或在媒介廣告中，社會學家要提防潛在的利益衝突或這類衝突的出現（例如，他們不提供報酬給傳播媒介的人員），他們遵守專業誠信的最高原則（例如，他們承認付費做廣告）。

11. 秘密

社會學家有責任確定秘密資訊得到保護。他們這樣做，是要確

保研究的完整，與參加研究的人員坦誠溝通，保護研究、教學、執業、服務時所得的敏感資訊。搜集秘密資訊的時候，社會學家應該考慮到這種資訊的長期使用，包括它可能放在公開的檔案裡面，或是其他研究者或執業者檢視這種資訊。

11.01 保密

- (a) 社會學家採取合理的預防措施，保護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的秘密。
- (b) 對於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提供的秘密資訊，即使沒有法律保護，社會學家也應該視為秘密，保障其權益。社會學家有責任保護秘密的資訊，使用別人交託的資訊，不可危害到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
- (c) 即使提供資訊的人死亡，秘密協議所提供的資訊也應保密。
- (d) 社會學家保持審查、活動或角色的秘密，包括適用的專業委員會、審查小組或諮詢小組的審查、活動與角色的秘密。
- (e) 社會學家盡可能在學術指導、監督或諮詢中，保護學生的記錄、成績資料、個人資訊的秘密，不論是口頭的，還是文書的資料。
- (f) 維護秘密的責任涵蓋研究或訓練團隊的成員，以及一起合作，可以取得這些資訊的組織。為確保資訊的取得受到限制，研究者、行政人員與主要研究者有責任指導部屬採取必要的保密步驟。
- (g) 使用他人或其他單位搜集的個人隱私資訊時，社會學家要保守可以辨識個人的資訊。隱私資訊是指個人可以合理期望資訊的公開不會讓個人被指認出來（如醫療或就業記錄）。

11.02 秘密的限制

- (a) 社會學家熟知所有可能限制或改變秘密保證的法令。他們判斷

自己保證絕對秘密的能力，自始即適當地告知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這種保證的限制，這些限制要符合第11條第2項b款的規定。

- (b) 社會學家可能遭遇意料之外的狀況，此時他們得知的資訊顯然危害到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的健康或生命。在這些個案中，社會學家衡量保密、本倫理守則、行為標準、適用法令的重要性。
- (c) 在公共空間的觀察、公開進行的活動，或是其他法律或習慣尚未訂定的隱私規則，不需要保密。同樣地，公開記錄可以取得的資訊，也不需要保密。

11.03 討論秘密及其限制

- (a) 社會學家與別人確立科學或專業的關係時，他們討論(1)秘密的相關限制，以及(2)他們的專業工作產生的資訊可預見的使用狀況。
- (b) 除非不可行，或是徒勞無功，有關秘密的討論在關係剛開始建立時就要進行，此後若有新的狀況，也要討論。

11.04 預期資訊的可能使用方式

- (a) 若研究需要在資料庫或記錄中保留個人身分特徵，則社會學家在資訊公開之前，即將之刪除。
- (b) 研究參與者、學生、委託人或其他接受服務者的秘密資訊輸入資料庫或檔案系統，這些資料庫與檔案系統可以不經相關人員事先同意而取得的時候，社會學家避免把個人身分特徵包括在內，以維持其匿名性，方法是運用其他掩飾或控制個人身分特徵揭露的技術。
- (c) 若個人身分特徵的刪除不可行，社會學家採取合理的步驟，確定在他們把這類資料傳遞給他人，或審閱他人搜集的這類資料之前，已取得身分特徵可以辨認的個人適當的同意。

11.05 秘密資訊的電子傳輸

社會學家利用公共電腦網路，傳遞或輸送任何資料、資訊或信息的時候，特別謹慎小心。社會學家使用最新科技產品的時候，可能讓未經授權的人接觸到他們的專業與科學信息，如公共電腦網路，此時社會學家注意維護秘密的問題與敏感資料、素材的控管。

11.06 資訊來源的匿名性

- (a) 社會學家在工作中取得的研究參與者、學生、個人或團體委託人，或其他服務接受者的秘密的、可以辨識個人的資訊，不在他們的著作、授課，或其他公共媒介中予以揭露，除非已經取得個人或他們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 (b) 在科學或專業報告中使用秘密資訊的時候，社會學家隱藏研究參與者、學生、個人或團體委託人，或是其他服務接受者的身分。

11.07 儘量減少對隱私的侵犯

- (a) 為儘量減少對隱私的侵犯，社會學家只將跟溝通目的有關的資訊納入書面與口頭報告、諮詢與公共傳播。
- (b) 社會學家討論有關研究參與者、學生、監督對象、受雇者與個人或團體委託人的秘密資訊，或評估資料，只是為了合宜的科學或專業目的，只跟明顯與這些事項有關的人討論。

11.08 秘密資訊的保存

- (a) 社會學家採取合理的步驟，確保記錄、資料或資訊以秘密的方式保存，並符合本守則的條件，瞭解記錄、資料或資訊的所有權可能受到法律或制度規章的管轄。
- (b) 社會學家計畫周詳，以期即使社會學家死亡、殘疾或離職退出，記錄、資料或資訊的秘密性也能得到保護。

- (c) 社會學家傳遞秘密記錄、資料或資訊給他人或其他組織的時候，他們確信記錄、資料或資訊的接收人會採取措施，保護秘密，至少與原先的保證一樣。

12. 知悉同意 (informed consent)

知悉同意是對人群做科學研究的基本倫理教則。除非本守則另有規定，否則沒有得到研究對象的知悉同意，或研究對象法定授權代表的知悉同意，社會學家不把個人當做研究對象。社會學家知道研究者的專業知識或權威對研究對象有不當影響或曲折壓力的可能性，設計知悉同意的程序時，將此納入考慮。

12.01 知悉同意的範疇

- (a) 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向研究對象或他們的法定授權代理人取得同意的時候，是(1)透過任何傳播、互動或介入的形態，向研究參與者搜集資料，或是(2)研究參與者的行為在私底下發生，個人可以合理預期沒有人會在觀察或報告。
- (b) 儘管取得同意重要至極，社會學家可以尋求此種標準的免除，其時機為(1)研究對研究參與者沒有危險；(2)沒有知悉同意，研究即無法進行。社會學家知道，免除同意權需要學會審查委員會的同意，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也需要另一個對研究倫理有專業知識的權威性組織的同意。在這種狀況之中，任何可以辨識個人特質資訊的秘密性必須維護，除非是第11條第2項b款規定的狀況。
- (c) 社會學家可以在公共場所，或使用有關個人可以公開取得的資訊（例如，在公共場所的自然觀察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s*、公共記錄的分析或檔案研究），不必取得同意。在這種狀況中，如果社會學家不太確定需不需要知悉同意，他們在研究進行之前，可與學會的審查委員會討論。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可與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組織討論。

- (d) 研究容易受害的人時（例如，年輕人、新近移民、精神病患），社會學家特別注意確定研究對象已瞭解研究係出於自願，其同意不是強迫取得的。至於其他層面，社會學家遵守第12條第1項a款到c款的原則。
- (e) 社會學家熟悉並遵守適用的各州與聯邦法令。如果可能，也要熟悉並遵守學會審查委員會有關研究取得知悉同意的條件。

12.02 知悉同意的程序

- (a) 需要知悉同意的時候，社會學家在研究進行之前，與研究參與者或他們的法定代理人協議，釐清研究的性質與研究者的責任。
- (b) 需要知悉同意的時候，社會學家使用的語言要讓研究參與者或他們的法定代理人瞭解，用語要尊重。
- (c) 需要知悉同意的時候，社會學家讓研究參與者或他們的法定代理人有機會在研究中，或參與研究之後，提出任何有關研究的任何問題。
- (d) 需要知悉同意的時候，社會學家向研究參與者或他們的法定代理人報告研究的性質；社會學家向研究參與者說明他們的參與及持續參與由他們自己決定；他們向研究參與者說明可能影響其參與意願的重要因素（例如，他們參與研究可能的風險與利益）；他們解釋研究的其他層面，回答研究參與者的問題。再者，如果有關，社會學家要說明，拒絕參與或中途退出研究沒有懲罰，他們也說明拒絕或退出的任何可能結果。社會學家坦白討論秘密性，如果可行，也要說明秘密性受到第11條第2項b款的限制。
- (e) 需要知悉同意的時候，社會學家保留有關聲明同意的記錄。他們知道同意的過程需要口頭與 / 或書面的同意。
- (f) 社會學家履行所有他們對研究參與者知悉同意所做的承諾，除非有第11條第2項b款註明的意外情況。

12.03 學生與部屬的知悉同意

社會學家在自己的體制或組織，對研究參與者做研究，這些參與者也是他們的學生或部屬時，社會學家特別小心地保護未來的研究對象，免於拒絕或退出研究的不利後果。

12.04 兒童的知悉同意

- (a) 對兒童做研究的時候，社會學家取得兒童參與的同意，只要他們能夠表達同意，除非有第12條第1項b款的狀況。
- (b) 對兒童做研究的時候，社會學家取得父母或法定授權監護人的同意。社會學家可以尋求免除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的時候是(1)研究對研究參與者毫無風險；(2)沒有同意即無法做研究；(3)父母或監護人的同意不是保護兒童的合理要件（例如，遭到忽視或虐待的兒童）。
- (c) 社會學家知道兒童或父母或監護人同意的免除需要學會審查委員會的同意。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也需要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委員會的同意。此時任何可以辨識個人資訊的秘密性必須維持，除非有第11條第2項b款的狀況。

12.05 在研究中運用欺騙

- (a) 社會學家不用欺騙的技巧，(1)除非他們已確定欺騙不會傷害到研究參與者，研究的科學、教育或應用的價值支持用欺騙，以及不用欺騙的替代性、效果相同的方案不可行；(2)除非他們已取得學會審查委員會的同意，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也需要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委員會的同意。
- (b) 對於可能影響到研究參與者參與意願的重要研究層面，如人身的風險、不舒服或不愉快的情緒經驗，社會學家絕不欺騙。
- (c) 欺騙是研究設計與進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社會學家設法在研究結束之前，澄清研究參與者可能有的誤解。

- (d) 在極罕見的時刻，若讓人知道他們是研究者，研究即無法進行，社會學家可能需要隱藏他們的身分，以便進行研究。此時如果對研究參與者沒有風險，如果他們已得到學會審查委員會的同意，可以如此進行，或是得到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委員會的同意。在這種狀況之中，秘密性必須維持，除非有第11條第2項b款規定的狀況。

12.06 攝錄技術的使用

社會學家在錄影、拍攝、或錄音之前，以任何形態取得研究參與者、學生、受雇者、委託人或其他人的同意，除非這些活動只是在公共場所做單純的自然觀察，並且預期攝錄的使用方式不會導致個人身分特質暴露或受到傷害。

13. 研究規劃、執行與散佈

社會學家有責任促成研究不偏不倚，確定他們在研究的規劃、執行與散佈上遵守科學的倫理要則。他們依此而行，以期增進知識，將結果誤導人心的可能性減到最小，並保護研究參與者的權利。

13.01 規劃與執行

- (a) 規劃、執行研究的時候，社會學家將結果誤導人心的可能性減到最小。
- (b) 社會學家採取步驟，為研究參與者及其他受到研究影響者的權利與福祉執行保護措施。
- (c) 在他們的研究中，社會學家不鼓勵危害研究參與者及他人健康與生命的活動，他們自己也不從事這樣的行為。
- (d) 規劃與執行研究的時候，社會學家諮詢熟知研究對象或其他可能受到影響的人士。
- (e) 規劃與執行研究的時候，社會學家考慮倫理上是否符合本倫理

守則的規定。如果最佳的倫理行為並不確定，社會學家諮詢學會審查委員會。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即諮詢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委員會。

- (f) 社會學家要為其研究行為的倫理負責，或為他們監督、授權研究的倫理行為負責。

13.02 預期之外的研究機會

如果在教學、執業、服務或非專業活動的過程中，社會學家決定要進行先前沒有預期到的研究，他們表明其意圖，並採取步驟，確定研究的進行符合倫理原則，尤其是與秘密性、知悉同意有關的研究。在這種情況之中，社會學家尋求學會審查委員會的同意。如果沒有這類委員會，即尋求其他具備研究倫理專業知識的權威性委員會的同意。

13.03 向研究參與者提供誘因

為取得研究參與者的同意，社會學家不提供過度或不適當的金錢或其他誘因，特別是可能有強迫參與的時候。社會學家可以提供誘因，只要有適當的資源可用。

13.04 研究報告

- (a) 社會學家散佈他們的研究發現，除非有預期之外的狀況（如研究者的健康），或是與雇主、簽約人、委託人有專屬的協定。
- (b) 社會學家不編造資料，不在他們的出版品或報告中做假。
- (c) 社會學家發表他們的著作時，充分報告他們的發現，不省略相關的資料。不論它們支持，還是否定預期的結果，他們都要提報結果。
- (d) 社會學家特別謹慎地陳述所有與他們的研究發現與詮釋有關的但書。社會學家也公開可能和他們著作的發現與詮釋相關的基本假定、理論、方法、測量方式與研究設計。

- (e) 為符合方法與分析充分公開的精神，一旦發現已公開散佈，社會學家容許它們由其他負責的研究者公開評估驗證，並盡可能輔以適當的安全措施，保護研究參與者的匿名性。
- (f) 如果社會學家發現他們的出版品或資料的發表有重大的錯誤，他們採取合理的步驟，透過更正、回收、勘誤表或其他適當的公共論壇，改正錯誤。
- (g) 社會學家在他們的書面報告中提報資金贊助的來源，註明與任何贊助者的任何特殊關係。在特別的情況之中，如果社會學家對贊助的性質與贊助者的利益提供適當的、充分的描述，他們可以保留某些贊助者的姓名。
- (h) 社會學家在出版品中及教學、執業、服務等場合中列舉其他學者的成果時，特別謹慎地、正確地用正確的資訊與引述，報告其他學者的成果。

13.05 資料分享

- (a) 社會學家分享資料與相關文件，乃習以為常之事。社會學家的計畫或主要出版完成之後，即將其資料公諸於世，除非與雇主、簽約人或委託人有專屬協議，排除這種接近使用，或者為了保護資料的秘密，或保護研究參與者的匿名性，不可能分享資料（如田野手稿或俗民方法論訪問所得的詳細資料）。
- (b) 社會學家預期資料分享是研究計畫的一部分，只要資料分享是可行的。
- (c) 社會學家分享資料的方式符合研究參與者的利益，保護資訊被賦予的秘密性。他們維持資料的秘密性，不論法律規定與否；分享資料之前，移除個人身分特徵；如果有需要，使用其他避免揭露的技巧。
- (d) 社會學家若不將資料置於公共檔案之中，也要開放資料，並在出版或散佈結果之後一段合理的時間之內，保留與研究有關的文件。

- (e) 如果有需要，社會學家可要求那些請求進一步分析資料的人士負擔相關的附加成本。
- (f) 用他人資料做進一步分析的社會學家，公開承認原初研究者的貢獻。

14. 抄襲

- (a) 社會學家的出版品、發表、教學、執業與服務採用他人書面著作的資料，或逐字抄錄之時，不論是已出版的、未出版的，還是從電子資料取得的，他們都清楚地指明作者，歸功於作者，並列出參考來源。
- (b) 社會學家的出版品、發表、教學、執業與服務承認參考他人的著作，並列明來源，即使他們的著作不是逐字抄錄或只是略述。他們不把他人的著作列為自己的著作，不論別人的著作是已出版的、未出版的或是從電子資料取得的。

15. 作者功勞

- (a) 社會學家只為他們真正撰述的著作，或他們有所貢獻的著作負責、居功。
- (b) 社會學家確定主要的作者與其他出版的功勞是根據相關個人的科學或專業貢獻，不論其地位為何。宣示或決定作者排名的時候，社會學家試圖正確地思考研究與撰述過程中主要參與者的貢獻。
- (c) 在任何多人著作的出版品中，若大幅引述某一學生的博士論文或碩士論文，通常要列出該學生的姓名。

16. 出版過程

在社會學家參與的出版或審核過程中，若他們是作者或編者，社會學家遵守最高的倫理標準。

16.01 稿件提交出版者

- (a) 在多人著作的個案中，社會學家將著作提交出版者之前，與其他作者討論，並針對提交，建立相互可以接受的協議。
- (b) 將稿件交給專業期刊、書系或編輯的書籍時，社會學家認可第一位出版者的出版權，除非有明顯的原則允許提交多位出版者。社會學家不將稿件交給第二位出版者，除非已經得知第一位出版者正式的決定，或者稿件已經撤回。社會學家將稿件交給期刊、書系或編輯的書籍，可在決定正式接受之前，撤回稿件。
- (c) 社會學家可將書稿交給多位出版者。然而，一旦社會學家與出版者簽訂契約，他們不能撤回書稿，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16.02 資料的複製出版

社會學家將他們先前出版的資料或研究發現再度出版時，他們明白宣示這些作品以前出版過。

16.03

- (a)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應用標準要公平從事，避免個人或意識型態的好惡。身為編者，社會學家注意任何可能的利益衝突。
- (b)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確定審查過程的秘密性，並監督編輯同仁，包括學生在內，遵守維持秘密的作業方式。
- (c)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必須刊出所有接受刊登的稿件，除非在接受之後發現重大的錯誤或違反倫理的事件（如抄襲或科學行為不當）。
- (d)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確保審查人的匿名性，除非他們得到審查人公開其身分的許可。編輯要確保他們的工作人員遵守此種作業方式。

- (e)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確定作者的匿名性，除非已接受稿件並予以刊登，或者期刊習以為常的作業方式已廣為人知。
- (f) 擔任期刊或書系編輯之時，社會學家採取步驟，為所有稿件提供適時的評論，並及時回應有關審查狀況的問題。

17. 審查人的責任

- (a) 審查提交出版、申請補助或其他評審的材料時，社會學家尊重過程的秘密性，以及提交資料人士所有資訊的專屬權利。
- (b) 利益有所衝突的時候，社會學家揭露利益衝突，或婉拒審查他人著作。
- (c) 社會學家認為審查過程可能偏差，或質疑過程的完整性時，婉拒審查他人作品的要求。
- (d) 如果受邀審查他們先前審查過的稿件、書籍或提案，社會學家向要求的人說明（如編輯、計畫主持人），除非他們顯然是受邀提供再次審查。

18. 教育、教學與訓練

身為教師、監督人、訓練者，社會學家遵循最高的倫理標準，以確定社會學教育的品質與師生關係的完整性。

18.01 教育課程的行政管理

- (a) 負責教育與訓練課程的社會學家設法確定課程經過完整的設計，提供合宜的經驗，達成所有課程設定的目標。
- (b) 負責教育與訓練課程的社會學家設法確定課程內容、訓練目的與目標、圓滿完成課程必須符合的條件，都有正確的描述。
- (c) 負責教育與訓練課程的社會學家採取步驟，確定研究助理與臨時講師具備授課所需的實質知識，以及需要促進學生學習的教學技能。

- (d) 負責教育與訓練課程的社會學家有責任確定在教授他們的研究生時，倫理為其專業養成的一部分。

18.02 教學與訓練

- (a) 社會學家本於良心，善盡他們的教學責任。他們具備適當的技巧與知識，或是受過適當的訓練。
- (b) 社會學家自上課伊始即提供正確的資訊，尤其是有關上課主題、評鑑標準與課程的性質。
- (c) 社會學家決定有關教科書、課程內容、修課條件與成績評定，完全依據教育標準，不考慮金錢或其他誘因。
- (d) 社會學家提供適當的教學訓練給他們的教學助理與其他實習教師，並採取合理的步驟，確定這些人員以負責的、稱職的、合乎倫理的方式，履行其教學責任。
- (e) 社會學家不容個人與同僚之間的對立或學識差異阻絕學生或監督對象與同僚接近，或干預學生、監督對象的學習、學業進展或專業的發展。

19. 合約與諮詢服務

- (a) 社會學家只在他們對計畫要用的內容、方法、技術，或者籌畫整合的適當專業知識之時，才接受補助、合約或諮詢。
- (b) 接受補助、合約或諮詢之時，社會學家的專業工作成果是根據適當的資訊與技術。
- (c) 研究計劃依補助、合約或諮詢而接受財務支援時，社會學家做合理的努力，按時完成提案的工作。
- (d) 接受補助、合約或諮詢之時，社會學家正確地記錄，並適當地保存他們的專業與科學作品。
- (e) 為研究、諮詢或其他服務設定合約協議之時，只要可行，社會學家自始即釐清與個人、組織或制度性委託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適當的釐清包括履行服務的性質，提供服務可能的用途，社

會學家未來將這類作品用於學術或出版的可能性，遞交這些服務的時間表，以及報酬與支付協議。

20. 遵守倫理守則

社會學家有責任依據本倫理守則，面對、處理、設法解決倫理議題。

20.01 熟悉本倫理守則

社會學家有責任熟悉本倫理守則，其他可應用的倫理守則，以及它們在社會學家工作上的應用。不瞭解或誤解倫理標準本身，不能為不合倫理的行為辯護。

20.02 面對倫理議題

- (a) 社會學家不確定某種狀況或行動是否違反本倫理守則之時，他們與其他嫻熟倫理議題的社會學家、美國社會學協會專業倫理委員會或其他組織實體，如學會審查委員會，共同商議討論。
- (b) 社會學家採取行動，或是面對本倫理守則明定的倫理標準與法令規定互相衝突而須選擇之時，他們公開他們對本倫理守則的承諾，並採取步驟，與同僚、專業組織或美國社會學會專業倫理委員會研商，以負責的方式解決衝突。

20.03 在倫理爭議中公平對待各方

- (a) 社會學家不因他或她提出倫理申訴案而予以歧視。
- (b) 社會學家不因他或她是倫理申訴案的當事人而予以歧視。這並不排除因倫理申訴的結果而採取的行動。

20.04 舉報他人違反倫理

社會學家有實質的理由，認定其他社會學家可能侵犯倫理時，如果非正式的解決方法合宜或有可能，那麼他們提請當事人注意，

設法解決問題。假定這類活動並未違反任何秘密權利，他們也可以尋求建議，討論是否或如何依此一觀念處理。這類行動可能包括轉介到美國社會學會專業倫理委員會。

20.05 與倫理委員會合作

社會學家配合美國社會學會的倫理調查案、會議與調查結果的要求。他們循此做合理的努力，解決任何秘密性的議題。疏於合作，可能違反倫理。

20.06 不當的申訴

除了保護學科與大眾的完整性之外，社會學家不提出，也不鼓勵微不足道的，或企圖傷害疑似違反者的倫理申訴案。

註：美國社會學會倫理守則的修正版係依據美國心理學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1989與1992年版的心理學家倫理原則與行為守則（Ethical Principles of Psychologists and Code of Conduct）。

附錄 B

五位數隨機亂數表

10819	85717	64540	95692	44985	88504	50298	20830	67124	20557
28459	13687	50699	62110	49307	84465	66518	08290	96957	45050
19105	52686	51336	53101	81842	20323	71091	78598	60969	74898
35376	72734	13951	27528	36140	42195	25942	70835	45825	49277
93818	84972	66048	83361	56465	65449	87748	95405	98712	97183
35859	82675	87301	71211	78007	99316	25591	63995	40577	78894
66241	89679	04843	96407	01970	06913	19259	72929	82868	50457
44222	37633	85262	65308	03252	36770	51640	18333	33971	49352
54966	75662	80544	48943	87983	62759	55698	41068	35558	60870
43351	15285	38157	45261	50114	35934	05950	11735	51769	07389
11208	80818	78325	14807	19325	41500	01263	09211	56005	44250
71379	53517	15553	04774	63452	50294	06332	69926	20592	06305
63162	41154	78345	23645	74235	72054	84152	27889	76881	58652
17457	68490	19878	04981	83667	00053	12003	84614	14842	29462
28042	42748	55801	94527	21926	07901	89855	21070	80320	91153
32240	24201	24202	45025	07664	11503	97375	83178	26731	45568
87288	22996	67529	38344	29757	74161	16834	40238	48789	99995
39052	23696	42858	85695	50783	51790	80882	97015	81331	76819
71528	74553	32294	86652	15224	07119	45327	69072	64572	07658
76921	04502	78240	89519	02621	40829	88841	66178	01266	10906
45889	22839	77794	94068	85709	96902	19646	40614	03169	45434
10486	79308	75231	33615	42194	49397	91324	79553	66976	83861
42051	14719	80056	74811	58453	04526	90724	36151	09168	04291
47919	11314	80282	09297	02824	59530	31237	26311	62168	46591
19634	40589	28985	40577	33213	52852	17556	85342	66881	18944
10265	45549	38771	38740	48104	63990	73234	19398	33740	97345
74975	33526	36190	25201	19239	06254	02198	99109	01005	20983
37677	76778	15736	57675	81153	59651	69262	89250	75156	59164
18774	15979	26466	80236	65400	24272	02088	09307	33426	11230
93728	14965	85141	27821	53791	38728	66369	29415	55330	99228
34212	15590	41336	23614	26153	19466	44176	80885	00015	40077
81984	54478	45226	97338	14064	45768	13538	49093	05691	69720
72755	15743	00552	89374	85400	37392	26598	71917	64275	16125
13162	57044	75982	15819	23385	40860	51585	44542	39656	91139
64686	62224	34124	79171	73909	26196	54057	63264	72089	06658
00157	64594	03178	75774	32315	34443	37224	85593	55251	42666
84194	83591	82152	24311	22414	43244	81542	31491	42075	17275
05776	60399	65218	89299	20273	30071	53077	18853	56652	63896
33365	18314	81074	49433	10884	75467	56085	14731	98085	60895
67928	38976	38480	59980	23156	72335	33489	59420	67819	51874

64394	45154	81851	54228	73095	97217	16908	90242	92869	17311
73000	20948	57065	70195	87563	41590	85047	71743	94916	50534
63555	03388	96638	16591	13641	73342	59131	63144	63587	62084
84005	02035	08182	16395	44928	08897	44750	71378	67522	20180
42593	35102	14577	38102	60403	04540	53992	27069	69574	76682
49519	49517	88147	83375	87045	57466	91259	06680	45586	36257
42149	01579	83056	19423	28165	25620	68035	17919	09120	59078
66192	98427	10152	96970	89990	34604	49632	46533	63362	43151
16124	88620	87074	37851	77131	73855	03740	10306	63858	04349
35492	47334	57189	26465	70078	14477	00881	00929	86907	73764
54503	40155	94734	20689	32475	62851	13216	21419	95502	36783
88063	53451	15642	67345	06935	70644	68570	79176	31975	83082
83689	14426	40357	34906	56282	96104	83796	57663	88627	17521
40393	72810	00681	15351	28858	72086	99090	39741	17914	27385
76648	61322	06817	64674	50317	52373	78223	84222	14021	43432
42091	27088	37686	88033	68007	71009	24018	49568	64351	94130
78925	41509	14319	92389	85492	40880	01487	85509	48316	62618
61915	98081	87996	53798	51485	38912	85858	43392	64678	44458
29504	66960	42645	54547	20615	77035	79942	33972	46112	78290
90170	97643	46284	34591	42692	72933	66166	98389	37460	14545
96439	06806	76714	80084	57685	37447	44901	64699	89142	64657
98365	28725	84376	50634	79289	31106	71351	10533	57545	27399
74794	91013	89791	54236	02369	35317	31103	82481	52256	94510
37499	85907	16293	17673	13373	06599	50138	19860	46716	36928
77530	25960	33671	54383	25144	82627	99266	75134	96539	47242
67990	35106	05214	82928	39824	11128	31390	76293	52809	54881
07355	29187	09357	94498	69697	92515	89812	90794	44738	46806
40716	05787	68975	38937	44033	50064	25582	09428	10220	42455
97748	64395	13937	60406	99182	92720	80805	26242	81943	40341
83682	18775	60095	78600	03994	30313	21418	58563	47258	75582
73506	30672	18213	37887	26698	87700	75784	86878	74004	88636
36274	02333	43132	93725	87912	90341	74601	77001	30717	60002
73508	00852	94044	98474	12621	91655	55258	85551	76122	68052
06488	12362	60020	66902	90734	73689	22382	40896	09028	72925
20201	31560	98885	32275	46818	76114	07959	65639	33267	98595
49947	13114	06773	06454	95070	26564	08974	11640	76202	86105
79928	50600	06586	72129	37233	02564	83265	32579	21234	83535
76360	86412	36240	20210	17692	80482	67007	15474	23198	74250
54601	84643	66759	57661	16434	61708	93185	75957	61056	90678
23441	63863	95238	59665	55789	26180	12566	58645	15125	76707
47093	90509	48767	09874	23363	84954	09789	30178	28804	93294
93603	11580	94163	85561	71328	88735	69859	84563	25579	52858
68812	15299	99296	45906	37303	49507	70680	74412	96425	38134
69023	84343	36736	52659	90751	20115	89920	44995	17109	96613
76913	03158	83461	27842	03903	34683	89761	80564	45806	88009
99426	99643	00749	79376	44910	27490	59668	93907	73112	46365
59429	08121	06954	28120	17606	22482	91924	00401	16459	15570
38121	05358	01205	00662	73934	97834	56917	64058	05148	87599
97781	32170	99914	75565	79802	38905	17167	08196	46043	72094
79068	21760	78832	93795	67798	54968	87328	46494	74338	89805
46601	04015	00484	39366	56233	22622	90706	02327	60807	39009

64821	72859	83471	60448	49159	38242	84473	05512	20200	91109
49216	15978	76313	82040	79322	53190	99705	86694	39000	59173
85909	77399	56836	38084	24480	16180	58023	20122	78348	36906
72284	62418	84313	85377	00039	90894	72976	19553	22917	58585
20210	90083	06608	43380	76224	87362	81200	91427	34115	36488
63659	42186	61396	94269	58196	42997	96272	02004	63365	75665
60022	62412	97267	13525	36794	68402	10902	87223	95682	18000
32399	18357	80684	50976	28717	95782	31227	99800	62642	33563
88488	73641	06447	51771	17572	68734	75964	54434	21852	80662
87642	39726	67296	75473	82899	06689	09402	18953	07418	89659
89586	59644	02486	95252	57771	97979	44761	10361	99589	57982
72544	38997	64243	04873	97006	55074	63062	06692	69940	94364
50807	84525	33191	49539	51414	87457	36296	68915	78902	60245
59490	00996	40795	05159	14215	72282	99887	93436	73440	57270
38626	50552	71131	69450	00534	26851	63155	61856	31104	52773
51982	59414	61762	30549	38914	30613	48661	47104	84319	71299
37747	69944	81040	53066	72265	63828	33559	21167	44864	91959
35752	01162	55189	98224	83276	35108	65759	47387	78381	53662
39473	21252	53693	49359	00691	82273	87378	90967	06356	77705
55572	52235	46693	87891	13626	50676	16806	23052	49743	44683
86396	26942	31794	03215	14813	07506	40853	79461	69114	32357
33555	56824	39948	35309	27279	78587	02790	98720	57920	30931
23433	11441	30625	68538	85671	78168	60754	37067	99579	76294
08339	60862	33225	85288	47812	89681	04184	87755	59664	46025
12952	73728	73346	54435	12067	18137	24559	99949	29504	82736
31065	41220	40348	71545	27046	95290	38752	13456	16147	20025
38062	29620	11459	24800	99422	31514	42673	62254	50236	52802
22365	00954	49547	16844	04006	09907	87626	60601	21891	14980
86779	89664	29030	91894	73718	73392	65469	79340	90014	00229
43233	48154	74284	65921	63641	00481	08578	22188	38029	68894
74503	33076	28357	23271	05919	12247	65814	51837	17689	67065
80697	09861	44996	94438	79742	44904	43997	30676	47959	91749
66890	59837	08731	62577	45661	40331	20461	40292	58324	50957
65029	71853	28424	48445	86207	05328	12631	18104	56863	84071
03322	46034	72527	42011	69919	00090	04986	06121	81888	04985
37951	98690	60776	79282	17148	79300	67391	53561	46702	99623
36747	35157	67719	81282	86592	21054	10617	10464	79204	16241
49340	44927	10914	17275	58227	91974	75268	28733	43893	17837
92271	64437	96956	18631	88405	96753	81024	21948	63478	73161
92299	36704	68944	92681	77662	54685	48356	21081	76717	47337
48344	93928	34136	47466	72646	18566	96759	31149	74706	37745
61726	51613	52816	33027	24383	07647	95883	28605	62283	18197
54433	70788	83880	31335	21145	16946	98191	37417	11780	41066
58541	72719	59340	60681	11593	06237	94809	58680	87392	55946
61516	65817	41065	83854	15993	83786	78324	06439	17050	62552
29215	08513	25460	52439	15219	69991	59623	35029	02632	33829
50164	57477	50446	22847	43803	56626	88506	88224	84080	29224
46923	73217	29155	22288	27172	09824	49339	80134	53208	89901
39385	54156	74135	82779	58336	79663	26502	78853	95172	24059
75334	79987	15894	18571	81773	50842	49946	04147	92224	41201

41285	32053	40984	90635	22067	11948	11443	99064	14675	16826
27423	31830	04828	05954	38820	94218	32586	04261	80975	47008
35906	67533	20585	21162	75252	73296	37607	92368	10867	69657
08554	70414	77644	99739	27390	80574	80240	19485	45190	36046
70966	52860	29353	41888	80187	97313	32440	08527	47081	17205
34154	79907	00949	54009	49291	48157	17375	13343	44727	36956
86436	46594	80734	80081	02314	42041	67591	78793	15440	21127
06339	10486	48944	44373	78872	90269	36662	40163	95780	06374
17715	18488	29772	86669	12401	86000	78660	00923	77884	44633
39611	02846	95861	49731	95395	26893	13314	07928	77911	53123
87271	46990	77790	79885	68909	54505	83646	78409	72846	28686
11996	29733	05629	93964	14193	83846	99389	50959	31927	79226
46940	09460	89582	17701	60658	71768	45426	93490	35636	70854
03412	41860	78660	76735	61981	37962	16512	87707	27622	17311
25077	14423	76933	16748	00741	62390	43843	80842	10219	54622
36495	82476	90894	71327	38924	07373	84495	31424	21285	08333
58500	55613	12395	00199	57097	24914	01779	02403	93251	44807
75248	35900	97246	15383	43870	60826	54130	63156	50504	52135
92175	62718	99616	61643	26886	14107	90719	47074	91737	97462
32463	69375	39095	36324	78594	57722	23596	36217	96947	44887
03693	77597	35029	70206	04705	91187	18602	86022	87337	23965
06721	33386	12162	55884	10420	30100	28445	77620	05067	10724
98591	40854	94023	57651	02409	76108	19790	48544	26777	42597
82535	71772	85767	76266	29140	47778	73492	53870	45014	08608
20105	25926	56710	14862	44589	57022	17734	38841	92896	40737
01749	78458	35863	82790	02427	87027	40106	94542	70051	68439
66826	49905	97602	26543	32418	22873	58878	34287	98272	00311
19242	91018	31082	73167	82661	20369	22976	86145	11196	51282
07788	16036	93946	83038	33324	79508	15514	84539	76833	02366
10238	51425	12133	60556	66023	78920	45286	79512	93581	56294
70278	45813	02647	70584	58543	31479	69235	12031	72235	67157
68633	59965	98891	65043	20653	78122	38989	65198	18659	79978
45164	32766	09525	49788	28780	54551	09208	91609	28711	97751
44701	18094	65320	24871	03285	61221	76401	81827	52742	90754
51254	38946	10820	30486	43737	91703	54377	04192	24354	21605
84819	68816	08575	93437	41898	71419	69327	00712	64283	82111
18122	52721	39067	33039	57890	71647	29730	09964	42192	59661
74518	17688	24087	59431	94219	31903	31093	95252	78310	29618
29507	76366	37600	35446	66362	17595	37560	14716	94629	39897
17615	22514	51864	04371	67231	61647	94074	24199	35525	69556
10735	07934	13585	35967	14790	78730	59122	01989	95596	05732
27515	94008	93354	12854	19839	02870	09161	52671	74303	58650
87240	67750	02552	56223	09496	21435	43859	17700	55974	93075
30474	21865	41837	44887	38330	51929	92959	72672	65078	33986
81033	89276	51464	63498	12766	55494	86208	16462	55022	56727
03550	49560	71142	85413	90974	88062	52135	84299	37041	88678
91516	90902	16387	47167	06377	86048	97771	53715	57709	61076
60915	35579	76264	72403	02744	52525	70804	28840	15504	80628
20281	63058	68322	36364	88444	68667	48877	28781	98458	05481

辭彙解釋

Analysis of variance (變異數分析)

一種資料分析的形式，受自變項不同個體的影響，以致依變項發生差異的統計分析。

Area probability sampling (區域機率抽樣)

多階層類聚抽樣的一種形式，是以地理區域做為抽樣單位。如：第一階層為街道，第二階層為戶…等。

Attributes (屬性)

個人或事物的特質。請參閱變項 (variable)。

Available records (可用的記錄)

研究的資料來源，相關的訊息在研究前已經被其他人收集好了，例如，一個預防逃學的評估方案，可以用學校已經記錄的逃學比率。

Bias (偏誤)

測量品質中，常有不具代表性的情形。例如「你不同意總統正在做一件很好的事？」這即是偏誤，具有暗示的作用。

Binomial variable (二項式變項)

一個變項只包含兩個屬性稱為二項式變項或二次變項，例如：性別只包含男性和女性二個屬性。

Bivariate analysis (雙變項分析)

同時分析二個變項，以了解他們間的關係，可以是簡易百分比表格的方式或相關係數的比較。

Census (普查)

了解人口特質的一覽表，普查也是一種調查，但是普查是以全部成員為受訪樣本，一般調查大都以部份成員為樣本。

Cluster sampling (類聚抽樣)

是一種多階層的抽樣方式，被選出的每一階層都是次樣本團體，例如，你以美國大學及學院為樣本，從選出的學校中，再選出部份學生做為樣本。

Codebook (編碼簿)

此項文件是用在資料處理過程和分析時，告訴我們不同資料，位於不同位置，代表不同的意義。

Coding (編碼)

原始資料轉換成可以被機器閱讀和分析的標準化格式的過程。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決定係數)

依變項受自變項影響的變異比例。

Cohort study (世代研究)

檢查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特殊團體的研究，資料可能是由一個個被觀察團體的不同成員組合而成的。例如，想了解1990年獲社會工作碩士的人數，或每隔五年

做一次，即為世代研究。

Conceptualization (概念化)

由一個較為抽象、模糊的觀念，到一個較為清楚具體的過程，譬如，你想研究偏見，偏見的意思為何？有那些型態…等。

Confidence interval (信賴區間)

估計母數值所在的區域，例如，A候選人的得票數約40%，我們就可以計算，得票數的信賴區間為35～45%，比較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

Confidence level (信賴水準)

估計母數在信賴區間內的可能性，稱之為信賴水準，例如我們說，A候選人得票數在35～45%信賴區間的信賴水準為95%。

Conflict paradigm (衝突典範)

一種社會生活的觀點，它將焦點放在個人或團體企圖支配他人或避免被支配。馬克斯主義者的社會學就是衝突典範的一個例子。

Construct validity (建構效度)

變項能否測出理論關係的程度。

Content validity (內容效度)

能測出概念涵蓋意義的程度。

Contingency question (列聯式問題)

只有相關的受訪者才需要回答的問題型態，不相關的受訪者可以不必回答，例如，「你去過夏威夷嗎？」回答是的人，才需要繼續回答「去過幾次？」。

Contingency table (列聯表)

表示變項關係的形式，有百分比或相關統計值。

Control group (控制組)

在實驗法中，沒有給予實驗刺激的那一組，並與有實驗刺激的實驗組比較，以了解實驗刺激的效果。

Control variable (控制變項)

控制一個不變的變項，以了解其他兩個變項間的關係。例如，想了解教育和偏見的關係，

與控制性別變項，看看男性當中，教育和偏見的關係，再看看女性當中，教育和偏見的關係，性別就是控制變項。

Cost-benefit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

由成本輸入看全部輸出效率的情形，例如由成本方案了解財政效益。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成本效能分析)

只考量方案本身的成本，方案的金錢效益並不考量，成本效能分析只看每一輸出單位的成本而沒有輸出。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效標關聯效度)

以外在效度為基礎，了解測量的相關程度。

Critical region (臨界區)

在理論抽樣分配中，統計顯著度區域價值。

Cross-sectional study (橫斷法)

研究某一特定時間內的事

物。請比較從縱貫法 (longitudinal study)。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曲線相關)

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及改變情形，例如，社會工作實務經驗的多寡和實務功效的關係，當實務經驗居中時，效果最好；缺乏經驗時沒有效果；而經驗過多又容易產生倦怠。

Deduction (演繹法)

是一種邏輯模式，由一般原則開始，應用理論推論到特別的個案，請比較歸納法 (induction)。

Dependent variable (依變項)

此變項是依賴其他變項的改變而改變，例如你認為收入是受教育影響，收入就是依變項。請比較自變項 (independent variab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敘述性統計學)

描述樣本的特質或變項的關係，敘述性統計學只是很摘要的說明觀察樣本的情形，如果是推

論統計學，則由樣本特質推論到大母群體。請比較推論統計學 (inferential statistics)。

Deviant case sampling (偏差個案抽樣法)

是一個非隨機抽樣法，檢視與一般常模不同的個案，例如，了解比較多或比較少的事項。

Dichotomous variable (二元變項)

一個變項只有二個特質。請同時參閱二項式變項 (binomial variable)。

Dimension (層面)

一個概念的特殊面或領域。

Direct behavioral observation (直接行為觀察法)

一個資料的來源或資料收集的型態，研究人員直接觀看著人們的行為，而不是去聽他們自己說什麼或者是別人述說關於他們的事。

Dispersion (離勢)

平均數是了解數值集中的分配情形，相反的，全距就是一種

離勢的簡單例子。例如，平均年齡是37.9歲，而全距就是12歲～89歲。

Ecological fallacy (區位謬誤)

在觀察團體中對個體做錯誤的結論。

Effect size (效果量)

變項之間連結性的強度，效果量的統計，是二組團體平均數的差異，除以控制組的標準差。

Equal probability of selection method, EPSEM (抽樣方法的公平機率)

指每一個樣本都有相同被選出的機率。

Experimental design (實驗設計)

研究方法中，有一個控制的自變項，稱為「刺激」，為了測試假設，承認刺激的衝擊。以接近的認同團體的建立來完成，刺激就是應用在實驗團體，相對於控制團體。

External invalidity (外在無效度)

由實驗結果不能代表真實世

界一般性的可能性。請比較內在無效度 (internal invalidity)。

Extraneous variable (外在無關的變項)

請比較控制變項 (control variable)。

External validity (外在效度)

由一個實驗設計所得的結果可適用其他情境。

Face validity (表面效度)

能合理測量出一些變項指標的品質。例如，由上教堂次數指出宗教信仰的程度。

Frequency distribution (次數分配)

變項屬性的次數分佈情形，如報告中指出53%是男性，47%是女性，就是次數分配。又如，少於1萬人的城市有十五個，而二十三個城市人口是介於1萬人和2萬5千人之間。

Generalizability (概化)

是研究發現的品質，比特殊觀察更具有判斷的代表性。譬如，你發現為什麼會發生竊盜，

就可以概化來發現其他類型的犯罪。

Generalization of effects (類化效果)

當干預運用在行為或影響行為時，多元基線設計的解釋。

Generalize (推論)

代表因果關係過程的特殊研究發現。

Hawthorne effect (霍桑效應)

執行一系列生產研究是Illinois州、Chicago市、Western Electric公司、Hawthorne工廠。研究人員發現他們在現場，影響被研究者(員工)的行為，導致對研究有衝擊。

Hypothesis (假設)

由理論形成的期望，但必須放到真實世界中觀察，驗證是否正確。

Hypothesis testing (假設檢定)

在真實世界中驗證，假設是或否存在的決策過程。

Idiographic (個別化取向)

解釋的取向，在此，你企圖去解釋一個完整的單一個案，若需要的話會運用很多特殊的解釋因素。你可能會解釋，為什麼你的叔叔是如此頑固的人，在夏天海灘，他以前大學同學這樣描述他等等，這種仁慈的解釋不會幫助你去了解一般的頑固，但能幫助你真正了解你的叔叔。相反詞是整體化取向(nomothetic)。

Independent variable (自變項)

在分析過程中，變項的價值是不會產生問題的，但經常以很簡單的方式呈現，自變項會引起依變項改變，如果我們發現性別影響宗教信仰，也就是說，女性比男性較有宗教信仰，性別就是自變項，宗教信仰就是依變項。自變項、依變項都是分析的一部份，若要了解不同宗教言仰，是否有不同的犯罪情形，這時，宗教信仰則為自變項。請比較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Index (指數)

測量的組成型態，將很多特殊的觀察做成摘要，代表更多一

般的層面。

Induction (歸納法)

由特殊的觀察發展成一般原則的邏輯模式。例如，猶太教和天主教比較會投票給民主黨，我們就說，美國少數宗教信仰比較傾向支持民主黨，並解釋原因，這就是歸納法。請比較演繹法 (deduction)。

Inferential statistics (推論統計學)

由觀察樣本的發現推論到母群體的特質。請比較敘述性統計學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formant (消息提供者)

在研究過程中，誰願意告訴你，他所想的或知道的事。如果你計畫採用參與觀察來了解人們的宗教信仰，你可以先和他們做朋友，他們就會慢慢告訴你一些相關訊息，不要和受訪者 (respondent) 混淆了。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內部一致性信度)

將測量題目均等分為二組，分別測試其相關值，再計算內部

一致性的係數值。

Internal invalidity (內在無效度)

由實驗效果不能反應實驗本身的正確性。請比較外在無效度 (external invalidity)。

Interobserver reliability (觀察者間信度)

由專業人員、半專業人員或志工，經訓練計畫以後，在角色扮演上的相同程度。施測者間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Interpretation (解釋)

一個技術性的名詞，用在連結精心完成的模式。它代表研究結果，在此控制變項是被發現做為中介因素，而自變項導致依變項的影響。

Interpretivism (解釋論)

社會研究取向的焦點是得到一個同理的了解，了解人們內在的感覺，解釋個人每天的經驗，深入的意義，和感覺和行為特殊的原因。

Interrater reliability (評判間信度)

不同觀察者的判斷是連續性的，反應在同意的百分比率，或相關程度。

Interrupted time-series with a nonequivalent control group time-series design (間斷時序與不對等控制組時序設計)

這是複時序設計最普遍的一種形式，是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多元時序點的測量，包括控制組在干預之前與干預之後的介紹。

Intersubjectivity (互為主體性)

科學研究的本質，由二個研究人員，研究相同問題，得到相同結論，是實務的標準，稱為客觀。

Interval measure (等距測量)

測量的層次是在描述變項的屬性有等級，鄰近屬性有相同距離。像華氏17度到18度的距離和89度到90度的距離是一樣的，但是熱的程度是不同的。請比較類別、次序、比率測量 (nominal, ordinal and ratio measures)。

Interview (訪問)

是資料收集的方式，一個人(訪員)對另一個人(受訪者)問一些問題，訪問可以是面對面或打電話。

Inverse relationship (負相關)

與negative relationship相同。

Judgmental sampling (判斷抽樣)

非隨機抽樣法的一種，完全由研究員自己判斷選擇觀察的單位。另一個名稱是立意抽樣 (purposive sample)。

Latent content (隱性內容)

用在內容分析，代表裡面的內容，和顯性內容 (manifest content) 是不一樣的。

Level of significance (顯著水準)

是統計顯著度的考驗，由觀察到的經驗關係說明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我們習慣將顯著水準定在0.05，亦即允許錯誤的機率必定小於5%。

Likert scale (李克特量表)

是一種量表建構的型態，由

Likert 創立，設計問卷，用標準化反應類型改進社會研究的測量水準。Likert項目都是用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的方式呈現。

Longitudinal study (縱貫研究法)

研究設計是從事一段長時間的觀察或資料收集。請比較橫斷法 (cross-sectional study)。

Manifest content (顯性內容)

指內容分析的表面內容，請比較隱性內容 (latent content)。

Matching (配對)

實驗法中，將一個或數個具有相同特質的變項配對，一組做為實驗組，另一組做為控制組。請比較控制組 (control group)。

Mean (均數)

是平均數的一種，由全部觀察對象中計算總和，再除以觀察數得到的值。例如，1、3、7、9、10，5個數，總和為30，30除以5等於6，均數即為6。

Median (中位數)

平均數的另一種方式，將資料排列整齊後，取居於中間位置的值，即為中數，如16、17、20、54、88，20為中數。

Meta-analysis (後設分析)

在變項之間，經由以前特殊領域的完整研究，計算連結強度平均數的過程。

Mode (眾數)

平均數的另一種方式，在觀察資料中，出現次數最多的數值，即為眾數，例如，基督教有1,000人，天主教有257人，猶太教有33人，基督教的人數即為眾數。

Multiple time-series designs (多重時序式設計)

時間系列分析的一種形式，包含有實驗組和不對等的控制組，干預前和干預後的複合時間方式。

Multivariate analysis (多變項分析)

同時分析兩個以上變項的關係，對兩個以上變項關係有更多

的了解。例如，由年齡、性別、社會階層了解宗教信仰有否不同。

Needs assessment (需求評估)

為方案設計目的而做系統化的研究評斷問題。例如，調查社區居民的目的是為了了解兒童照顧服務的需求。

Negative relationship (負相關)

二個變項間的互動關係，一個變項增加，另一個變項卻隨著減少。例如，年齡愈大，黑頭髮愈少。

Nominal measure (類別測量)

變項的屬性只具有周延性和互斥性，例如性別。

Nomothetic (整體化取向)

是一種解釋的取向，你企圖發現一些因素是可以得到一般性，雖然不是非常完美的解釋一些現象。例如：我們注意教育可以降低偏見，既然我們承認受教育的人是有偏見的，沒有受教育的人則沒有，因此我們學習到，引起偏見的原因或一般性。相反

詞為個別化取向 (idiographic)。

Nonequivalent control design (不對等的控制組設計)

類實驗設計的一種，研究人員發現二個類似的團體，比較干預前和干預後的改變。

Nonparametric tests (無母數檢定)

是一種統計顯著度考驗，對母數群體不做嚴格假定，卡方檢定是最常使用的。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非機率抽樣法)

樣本選擇沒有符合機率原則，比較是採用研究者的意見，例如，判斷或立意抽樣法、配額抽樣法、滾雪球抽樣法。

Nonsampling error (非抽樣誤差)

資料誤差的來源不是抽樣誤差引起的，而是其他原因，如受訪者對問題的誤解、訪員的錯誤、記錄的錯誤、過濾的錯誤或鍵入資料時發生錯誤等。

Null hypothesis (虛無假設)

此項假設和研究變項沒有關

係，是經由棄卻虛無假設後，二個變項才關係。

One-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單組前後測設計)

一種前實驗設計，內在效度較低，刺激前後能估計依變項，但是無法解釋任何改變。

One-shot case study (單次個案研究)

一種前實驗設計，內在效度較低，在刺激後的同時，簡單的測量一組依變項。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操作性定義)

具體而特殊的定義，例如「課程得A」的操作性定義即「期末考試至少有90%都是非常正確的回答」。

Operationalization (操作化)

概念化後面的步驟，操作化是發展操作性定義的過程。

Ordinal measure (次序測量)

變項的屬性具有階段性、次序性。例如社會經濟階層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包含

的屬性為高階層、中階層、低階層。

Panel study (固定樣本多次研究)

是縱貫研究法的一種，在不同時段，以相同樣本做為研究對象。

Paradigm (典範)

一個模式或參考架構，形成我們的觀察和了解，例如：功能論引導我們去檢驗社會構成的部份。互動論引導我們注意人們和別人互動、面對面分享事物的意義。

Parallel-forms reliability (同方向性信度)

兩份均衡測量工具的一致性。

Parametric tests (母數檢定)

是一種統計顯著度考驗，假設至少有一個變項是區間測量尺度或比率測量尺度，這些變項相關母數的樣本分配是正常的，不同團體的比較是隨機取得的，經常採用的統計方法是t檢定、變異數分析、Pearson積差相關等。

Placebo control group design (安慰劑控制組設計)

這種實驗設計是將案主隨機分配到一個實驗組和兩個不同的控制組，其中一個控制組不接受實驗刺激，另一個接受安慰劑，它的成員會受到特別的照顧，但不是受試的刺激或干預。

Placebo effects (安慰劑效應)

是指變化不是因某一干預特定因素造成，而是因任何干擾或研究過程的不特定因素所造成，案主覺得受到了特殊待遇而有的改變。

Positive relationship (正相關)

二個變項間的互動關係，一個變項增加，另一個變項也跟著增；一個變項減少，另一個變項也跟著減少，例如，失業率高，街頭遊民比率也高。

Positivism (實証主義)

August Comte 介紹的典範，社會行為能用合理的、科學的方式被研究和了解，相對於宗教和迷信。有時候，這個觀點是擴大到，假設人類每日生活的行動是

合理的。然而實証主義另一個觀點是支配大多數的社會科學歷史，目前面臨很多挑戰。

Postmodernism (後現代主義)

解釋論極端的型式，拒絕客觀社會事實的觀念。

Postpositivism (後實証主義)

觀察和測量的觀點不能做為純粹客觀性。

Posttestonly control group design (單一組後測控制團體設計)

傳統的實驗設計型態，沒有前測，只在刺激後才有測試，亦採隨機過程，實驗組和控制組在刺激後，依變項的改變情形。

Posttest-only design with nonequivalent groups (不對等團體單一組後測設計)

前實驗設計牽涉二組不能比較的團體，依變項必須在自變項之後才能評估。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前後測控制團體設計)

是傳統實驗設計，隨機指定一實驗團體，接受刺激，而控制

團體無刺激，實驗團體接受刺激前後，依變項改變情形。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隨機比率抽樣)

是一種多階層類聚抽樣法，不是公平機率（請參閱EPSEM）是隨機比率，以次樣本為單位。

Probability Sampling (機率抽樣)

樣本選擇是採用機率理論，型態有：區域隨機抽樣、EPSEM、PPS、簡單隨機抽樣、系統抽樣等。

Probe (調查)

訪問並完整回答問題的技術，也可以用表情或問題，以鼓勵受訪者完整的回答，例如「還有什麼呢？」「應該如何？」。

Purposive sampling (立意抽樣法)

不是隨機抽樣法，依研究人員的意見來抽取樣本，如judgmental sampling (判斷抽樣法)。

Qualitative analysis (質化分析)

不是量化的檢測和解釋變項

關係意義的型態，典型的方式有田野研究和歷史研究。

Qualitative methods (質化研究法)

研究方法強調深度了解人類經驗的意義，常使用方法為：參與觀察、直接觀察、無結構訪談、密集訪談等。

Quantitative analysis (量化分析)

採用量化的代表性，描述及解釋觀察反映的現象。

Quantitative methods (量化研究法)

研究方法強調清楚的、客觀的和一般性的發現。

Questionnaire (問卷)

包含有問題型式的文件，獲得訊息後，方便分析。基本上，問卷經常使用在調查研究法、實驗法、實地研究法等。

Quota sampling (限額抽樣)

非隨機抽樣法的一種，依特殊屬性選擇樣本。

Random error (隨機誤差)

沒有效果的一致性模式的測

量誤差，會降低測量的信度，例如，問問題時，受訪者不了解而屈就於回答答案。

Randomization (隨機化)

實驗法時，完成實驗組和控制組比較的優良技巧。

Range (全距)

變項最高及最低的差異情形，例如年齡由17歲~37歲。

Ratio measure (比率測量)

測量的層次，變項的屬性具有類別、次序、等距測量的特質，並且有絕對的零點，年齡就是比率測量尺度。

Reactivity (反動)

在研究過程，自變項被引導而改變的過程。

Recursive (反覆)

回覆再回覆的品質，因此「過程的結果」影響「引起的過程」。例如，什麼因素引起特殊的社會問題，也可能引起一個新的社會政策，來改變我們了解的社會問題。

Reductionism (化約論)

研究人員的一種錯誤，用一種因果關係解釋所有的人類行為。

Reification (物化)

由不真實中確認真實事物的過程。

Reliability (信度)

測量方法的品質，對相同的現象重覆觀察，能否有相同的結果。例如「上週，你有上教堂嗎？」比「一生當中你上教堂幾次？」有較高信度，不要和validity (效度)混淆了。

Replication (複製法)

一般而言，實驗的複製法可以減少誤差。

Representativeness (代表性)

樣本集結的特性和母群體集結的特性相當接近，即為代表性，代表性可以透過隨機抽樣、一般化和推論統計來提高。

Respondent (受訪者)

為調查問卷表提供資料、以

利分析者。

Response rate (回覆率)

人們參與問卷調查的比率，一般都用百分比呈現，也稱為完成率，或回收率（問卷寄出，回答後再寄回的比率）。

Sampling frame (抽樣架構)

抽樣單位的集合體，樣本愈能代表母群體，表示抽樣架構愈接近於母群體的所有成員。

Sampling interval (抽樣區間)

母群體元素除以樣本元素的標準距離。

sampling ratio (抽樣比例)

樣本元素除以母群體元素的比例。

Scale (量表)

測量的組合型態包含有很多項目，都具有邏輯和經驗的結構，包含有Bogardus社會距離量表、Likert、Thurstone等。

Secondary analysis (二次分析)

分析別人已經調查整理好的

資料，可以由博物館或圖書館取得資料，加以分析。

Self-report scales (自填量表)

資料的來源都是由受訪者自己填寫的，例如，婚姻滿意度的自填量表，包括：和配偶多久吵架一次？會不會以配偶感到光榮？會不會取悅配偶…等。

Simple interrupted time-series design (簡單時序式設計)

類實驗設計的一種，沒有應用比較團體，因果關係的發展是基於干預前後，多元測量趨勢的比較。

Simple random sampling (簡單隨機抽樣)

隨機抽樣的一種類型，由隨機數字組成的，是隨機抽樣中最符合邏輯，且最具基礎性的技術。

Snowball sampling (滾雪球抽樣)

非隨機抽樣法的一種，經常使用在田野研究，訪問某些人以後，再請這些人介紹他們認識的人，繼續訪問下去。

Solomon four-group design (所羅門四組設計)

一種實驗設計，將對象隨機分配到四組，兩個控制組和兩個實驗組。其中一個控制組和實驗組，施以前測和後測；另一個實驗組和控制組只有後測，經由兩個實驗組和控制組的結果相互比較，可以分辨是否在前測中有受到任何因素的影響。

Specification (標明)

一般而論，這是一種讓概念更為明確的過程。標明是運用於詳析模式的一種術語，代表一種詳析的結果，最初觀察到的變項關係，可在控制變項中的次團體被複證。在此情況下，闡明原來關係的存在條件，例如，在男性而不是女性之間。

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是敘述性統計分析，說明數值的分散情形，是變異數的平方根，標準差適用於描述等距和等比資料。

Static-group comparison design (靜態組比較設計)

有實驗組和控制組的設計，但沒有前測，兩組樣本未隨機分派，無法確定兩組樣本改變的情形。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統計力分析)

避免型二過誤機率的評估。

Stratification (分層)

抽樣前，將同質的樣本、集結成一組一組的團體，再由此抽出樣本，可以和簡單隨機抽樣法、系統抽樣法、叢集抽樣法，合併使用，以改進樣本代表性問題。

Substantive significance (實質的顯著性)

從實際的觀點來看一種結果的重要性及意義性。

Systematic error (系統誤差)

收集回來的資料與原先預定測量的事物有不同，即產生系統誤差，例如，當兒童福利社工師詢問施虐父母，他們是否虐待小

孩，他們的回答是一致的不確實，誰會承認自己虐待小孩，此即為系統誤差，與隨機誤差不同。

Systematic sampling (系統抽樣法)

由抽樣架構中每隔k個元素抽取一個樣本，亦是隨機抽樣法的一種方式，例如，在大學每隔25個生即抽出1個學生為樣本，基本上亦屬於簡單隨機抽樣，而且常被使用。

T-test (t 檢定)

統計顯著度考驗的一種、檢驗二組團體的平均數。

Test-retest reliability (重測信度)

在二種不同情況下，針對同一個人分別測試其一致性、穩定性。

Test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統計顯著性檢定)

是運用理論的抽樣分配，表示資料隨機分配的比例。

Theoretical sampling distribution (理論的抽樣分配)

理論上的抽樣分配可以用來檢定統計的顯著性，確定其概率值。

Time-series designs (時序設計)

一組類實驗的設計，透過對依變項的多重觀察，以描述干預前及後的狀況。

Trend studies (趨向研究)

是縱貫研究法的一種，是研究過去一段時間的變化情形，例如想了解社會工作學校的年度檢討，可以用直接服務的專業化、行政、計畫等來了解。

Triangulation (三角檢定法)

運用很多種不同方法收集相同資料，來減少誤差。例如，請案主自我評估，或檢查個案記錄等方式，了解案主對服務的滿意度。

Type I error (第一類型錯誤)

棄卻一個真實的虛無假設，所犯的可能性錯誤。

Type II error (第二類型錯誤)

接受一個錯誤的虛無假設，所犯的可能性錯誤。

位是採不均衡機率選出的，依其情形指定權數，形成樣本代表性。

Units of analysis (分析單位)

研究的對象，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常研究的單位是個體。

Univariate analysis (單變項分析)

一次只對某一個變項進行分析，如次數分配、平均數、離中量數等。請比較雙變項分析 (bivariate analysis) 和多元變項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Validity (效度)

是否能真實反應出欲測量的概念，例如，IQ是測量智商的有效工具。效度有表面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內容效度、建構效度、內在效度和外在效度等，不能和信度 (reliability) 混淆。

Variable (變項)

是屬性的集合體，例如變項為性別，其屬性為男性及女性。

Weighting (權數)

和樣本連結的程序，因此單

參考書目

- Abbott, Andrew. (1988).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bbott, Andrew. (1992). From causes to events: Notes on narrative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428-455.
- Abelson, Robert P., Elizabeth F. Loftus, and Anthony G. Greenwald. (1992). Attempt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elf-reports of voting.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138-15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Abrams, Philip. (1982).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Abt, Charles. (1979). Government constraints on evaluation quality. In *Improving evaluation*, edited by L. Datta and R. Perloff.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chen, Christopher H. (1982). *Interpreting and using regress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dams, Gerald R., and Jay D. Schvanveldt. (1985). *Understanding research methods*. New York: Longman.
- Adler, Patricia A. (1985). *Wheeling and deal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Adler, Patricia A., and Peter Adler. (1983). Shifts and oscillations in deviant careers: The case of upper-level drug dealers and smugglers. *Social Problems*, 31:195-207.
- Adler, Patricia A., and Peter Adler. (1987). *Membership roles in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dler, Patricia A., and Peter Adler. (1993). Ethical issues in self-censorship: Ethnographic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249-26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dler, Patricia A., and Peter Adler. (1994).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377-39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dorno, Theodor W. (1976a).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edited by T. Adorno et al.,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pp. 68-86.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dorno, Theodor W. (1976b).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edited by T. Adorno et al., trans. Glyn Adey and David Frisby, pp. 87-10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gar, Michael. (1980). Getting better quality stuff: Methodological competition in an interdisciplinary niche. *Urban Life*, 9:34-50.
- Agar, Michael. (1986). *Speaking of ethnograph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gger, Ben. (1991). Critical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postmodernism: Their sociological releva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105-131.
- Agnew, Neil McK., and Sandra W. Pyke. (1991). *The science game: An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Albrecht, Gary L. (1985). Videotape safaris: Entering the field with a camera. *Qualitative Sociology*, 8:325-344.
- Aldenderfer, Mark S., and Roger K. Blashfield. (1984). *Cluster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lford, Robert R. (1998). *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 evid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en, Michael Patrick. (1974). Construction of composite measures by the canonical-factor-regression method.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3-74*, edited by H. L. Costner, pp. 51-7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Almgren, Gunnar, Avery Guest, George Imerwahr, and Michael Spittel. (1998). Joblessness, family disruption, and violent death in Chicago, 1970-1990. *Social Forces*, 76:1465-1494.
-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theide, David L. (1976). *Creating reali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ltheide, David L. (1980). Leaving the newsroom.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301-31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Alwin, Duane F. (1977). Making errors in survey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6:131-150.
- Alwin, Duane F. (1988).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A national data resourc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1:90-94.
- Alwin, Duane F., and David J. Jackson. (1980). Measurement models for response errors in surveys: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0*, edited by S. Leinhard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Alwin, Duane F., and Jon A. Krosnick. (1985). The measurement of values in surveys: A comparison of ratings and ranking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9:535-552.
-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1997).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tyle guide, 2nd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Aminzade, Ronald. (1984). 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patterns of industrial protest: A comparative urban study of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437-453.
- Anderson, Andy B., Alexander Basilevsky, and Derek P. J. Hum. (1983). Measurement: Theory and techniques.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D.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231-287.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Anderson, Barbara A., Brian D. Silver, and Paul R. Abramson. (1988). The effects of the race of interviewer on race-related attitudes of black respondents in SRC/CPS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289-324.
- Anderson, Elijah. (1989). Jelly's place. In *In the field*, edited by C. Smith and W. Kornblum, pp. 9-20. New York: Praeger.
- Anderson, N. (1923). *The hob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erson, Perry. (1974a). *Link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nderson, Perry. (1974b). *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nderson, R. Bruce W. (1973). On the comparability of meaningful stimuli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 Warwick and S. Osherson, pp. 149-186.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Andren, Gunnar. (1981). Reliability and content analysis. In *Advances in content analysis*, edited by K. Rosengren, pp. 43-67.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ndrews, Frank M., Laura Klem, Terrence Davidson, Patrick O'Malley, and Willard Rodgers. (1981). *A guide for selecting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social science data*. Ann Arbo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Annamdale, Ellen C. (1988). How midwives accomplish natural birth: Managing risk and balancing expectations. *Social Problems*, 35:95-110.
- Applebaum, Richard. (1978a). Marxist metho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 social praxis. *American Sociologist*, 13:73-81.
- Applebaum, Richard. (1978b). Marx's theory of 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67-80.
- Aquilino, William S. (1993). Effects of spouse presence during the interview on survey response concerning marria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358-376.
- Aquilino, William S., and Leonard Loscuito. (1990). Effects of interview mode on self-reported drug u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4:362-395.
- Archibald, Randall C. (May 25, 1998). Knowledge scare on cost of college study finds. *The New York Times*.
- Ardener, Shirley. (1984). Gender orientations in fieldwork.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118-129.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Ariès, E. (1977). Male-female interpersonal styles in all male, all female, and mixed groups. In *Beyond sex roles*, edited by A. Sargent, pp. 292-299. Boulder, CO: West.
- Armer, Michael. (1973).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D. Grimshaw, pp. 49-79. New York: Wiley.
- Armstrong, J. Scott, and Edward J. Lusk. (1987). Return postage in mail surveys: A meta-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233-248.
- Aronson, Elliot, and J. Merrill Carlsmith. (1968). Experimentation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1-78.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Atkinson, Robert. (1998). *The life story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uriat, Nadia. (1993). My wife knows best: A comparison of event dating accuracy between the wife, the husband, the couple, and the Belgium population registe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165-190.
- Auster, Carol J. (1985). Manual for socialization: Examples from Girl Scout handbooks, 1913-1984. *Qualitative Sociology*, 8:359-367.
- Ayella, Marybeth. (1993). "They must be crazy:"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in researching cults.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108-12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bbie, Earl. (1989).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5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Babbie, Earl. (1990).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Babbie, Earl. (1998).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Backstrom, Charles H., and Gerald Hursh-Cesar. (1981). *Survey research*, 2nd ed. New York: Wiley.
- Bailar, Barbara A., and C. Michael Lanphier. (1978). *Development of survey methods to access survey practices*.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 Bailey, Kenneth D. (1975). Cluster analysi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5*, edited by D. Heise, pp. 59-12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ailey, Kenneth D. (1983). Soc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and cluster analysis. *Quality and Quantity*, 17:251-268.
- Bailey, Kenneth D. (1984). A three-level measurement model. *Quality and Quantity*, 18:225-245.
- Bailey, Kenneth D. (1986).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sociological measurement: Notes on the three-level model. *Quality and Quantity*, 20:327-337.
- Bailey, Kenneth D. (1987).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Bailey, Kenneth D. (1988). Ethical dilemmas in social problems research: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Sociologist*, 19:121-137.
- Bailey, Kenneth D. (1992). Typologie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188-2194. New York: Macmillan.
- Bakanic, Von, Clark McPhail, and Rita Simon. (1987). The manuscript review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631-642.
- Bakanic, Von, Clark McPhail, and Rita Simon. (1989). Mixed messages: Referees' comments on the manuscripts they review.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0:639-654.
- Ball, Donald. (1967). An abortion clinic ethnography. *Social Problems*, 14:293-301.
- Ball, Michael, and Gregory W. H. Smith. (1992). *Analyzing visual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ll, Richard A., and G. David Curry. (1995). The logic of definition in criminology: Purposes and methods for defining "gangs." *Criminology*, 33:225-245.
- Banaka, William H. (1971). *Training in depth interview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 Bankston, William B., and Carol Y. Thompson. (1989). Carrying firearms for protec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59:75-87.
- Bannister, Robert C. (1987). *Sociology and scientism: The American quest for objectivity, 1880-194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Barber, Jennifer S., and William G. Axinn. (1998). Gender attitudes and marriage among young wome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11-31.
- Bardack, Nadia R., and Francis T. McAndrew. (1985).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and manner of dress on success in a simulated personnel decis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777-778.
- Barkey, Karen. (1991). Rebellious alliances: The state and peasant unrest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699-715.
- Barlow, Melissa Hickman, David E. Barlow, and Theodore G. Chiricos. (1995).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ideologies of crime in the media: A content analysis of crime news. *Crime and Delinquency*, 41:3-19.
- Barnes, Barry. (1974).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arnes, J. A. (1970). 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235-251. Chicago: Markham.
- Barnes, J. A. (1979). *Who should know what? Social science, privacy and eth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ry, Brian. (1975). On analogy. *Political Studies*, 23:208-224.
- Bart, Pauline. (1987). Seizing the means of reproduction: An illegal feminist abortion collective—How and why it worked.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339-357.
- Bart, Pauline, and Linda Frankel. (1986). *The student sociologist's handbook*, 4th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 Bartz, Loren. (1960). *Servants of power: A history of the us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industry*.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Barton, Allen H. (1995). Asking why about social problems: Ideology and causal models in the public m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299-327.
- Barzun, Jacques, and Henry F. Graff. (1970). *The modern researcher*, rev.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Basirico, Laurence A. (1986). The art and craft fair: An institution in an old art world. *Qualitative Sociology*, 9:339-353.
- Bateson, Nicholas. (1984). *Data construction in social surveys*.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auer, David G. (1988). *The "how to" grants manual*,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 Bauer, Raymond, ed. (1966). *Social indicato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ausell, R. Barker. (1994). *Conducting meaningful experiments: Forty steps to becoming a scientis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yless, David L. (1981). Twenty-two years of survey research at the Research Triangle: 1959-1980. In *Current topics in survey sampling*, edited by D. Krewski, R. Platek, and J. N. K. Rao, pp. 87-103.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easley, David. (1988). *How to use a research libra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 Bernard. (1970). Cooking welfare stew. In *Pathways to data*, edited by R. W. Habenstein, pp. 7–29. Chicago: Aldine.
- Beck, E. M., and Stewart E. Tolnay. (1990). The killing fields of the Deep South: The market for cotton and the lynching of blacks, 1882–193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526–539.
- Becker, Howard. (1967). Whose side are we on? *Social Problems*, 14:239–247.
- Becker, Howard S. (1969). Problems in the publication of field studies.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260–27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ecker, Howard S. (1970a). Practitioners of vice and crime. In *Pathways to data*, edited by R. W. Habenstein, pp. 30–49. Chicago: Aldine.
- Becker, Howard S. (1970b). Problems of inference and proof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Firsthand involvement with the social world*,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189–201. Chicago: Markham.
- Becker, Howard S. (1970c). Whose side are we on?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15–26. Chicago: Markham.
- Becker, Howard S. (1986). *Writ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How to start and finish your thesis, book or arti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oward S. (1993). How I learned what a crock w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28–35.
- Becker, Howard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oward S., and Blanche Geer. (197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ing: A comparison.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133–142. Chicago: Markham.
- Becker, Howard S., and Blanche Geer. (1982).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field data. In *Field research: A sourcebook and field manual*,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239–250.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ecker, Howard S., Blanche Geer, Everett C. Hughes, and Anselm Strauss. (1961). *Boys in white: Student culture in medical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ecker, Howard S., Michal M. McCall, and Lori V. Morris. (1989). Theatres and communities: Three scenes. *Social Problems*, 36:93–116.
- Beecher, H. K. (1970). *Research and the individual: Human studies*. Boston: Little, Brown.
- Beisel, Nicola. (1990). Class, culture, and campaigns against vice in three American cities, 1872–1892.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44–62.
- Belenky, Mary Field, Blythe McVicker Clinchy, Nancy Rule Goldberger, and Jill Mattuck Tarule. (1986). *Women's ways of kn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lf, voice and mind*. New York: Basic Books.
- Bellah, Robert N. (1957). *Tokugawa religion*. Glencoe, IL: Free Press.
- Ben-David, Joseph. (1971). *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en-Yehuda, Nachman. (1983). History, selection and randomness—Towards an analysis of social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Quality and Quantity*, 17:347–367.
- Bendix, Reinhard. (1956). *Work and authority in industry*. New York: Wiley.
- Bendix, Reinhard. (1963). Concepts and generalization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ical stud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8:91–116.
- Bendix, Reinhard. (1978). *Kings or people: Power and the mandate to ru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enton, Ted. (1977).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three sociologie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erelson, B. (1952). *Content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 Berg, Bruce L. (1989).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Berger, Peter. (1963). *An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Garden City, NY: Anchor.
- Berger, Peter, and Thomas Luckma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arden City, NY: Anchor.
- Berk, Richard A. (1983). An introduction to sample selection bias in sociological dat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386–397.
- Bermant, Gordon. (1982). Justify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terms of social benefit.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125–14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ernard, H. Russell. (1988).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Bernard, H. Russell, Peter Killworth, David Kronenfeld, and Lee Sailer. (1984).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ccuracy: The validity of retrospective data.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3:495–517.
- Bhaskar, Roy. (1975). *A realist theory of scienc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 Biersack, Aletta. (1989). Local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Geertz and be-
- yond.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 Hunt, pp. 72–9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igus, Odis. (1972). The milkman and his customer: A cultivated relationship. *Urban Life and Culture*, 1:131–165.
- Billiet, Jacques, and Geert Loosveldt. (1988).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responses to faculty survey questions by interviewer train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190–211.
- Binson, Diane, and Joseph Catania. (1998). Respon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s in sexual behavior ques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190–208.
- Bishop, George F. (1987). Experiments with the middle response alternative in survey ques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220–232.
- Bishop, George F., Robert W. Oldendick, and Alfred J. Tuchfarber. (1983). Effects of filter questions in public opinion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528–546.
- Bishop, George F., Robert W. Oldendick, and Alfred J. Tuchfarber. (1984). What must my interest in politics be if I just told you "I don't know?"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510–519.
- Bishop, George F., Robert W. Oldendick, and Alfred J. Tuchfarber. (1985). The importance of replicating a failure to replicate: Order effects on abortion item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9:105–114.
- Bishop, George F., Alfred J. Tuchfarber, and Robert W. Oldendick. (1986). Opinions on fictitious issues: The pressure to answer survey ques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240–251.
- Blaikie, Norman. (1993). *Approaches to social enquiry*. Cambridge, MA: Polity.
- Blalock, Hubert M., Jr. (1968). The measurement problem: A gap between the languag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In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H. Blalock and A. Blalock, pp. 5–27. New York: McGraw-Hill.
- Blalock, Hubert M., Jr. (1969). *Theory construction: From verbal to mathematical formul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lalock, Hubert M., Jr. (1979a). Measurement and conceptualization problems: The major obstacle to integrating theory and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881–894.
- Blalock, Hubert M., Jr. (1979b). *Social statistics*,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Blalock, Hubert M., Jr. (1982).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lalock, Hubert M., Jr., and Ann B. Blalock, eds. (1968).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Blankenship, Albert B. (1977). *Professional telephone surveys*. New York: McGraw-Hill.

- Blau, Judith R. (1978). Sociometric structure of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s and Art*, 1:191-206.
- Blee, Kathleen M. (1991). *Women of the Klan: Racism and gender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lee, Kathleen M., and Dwight B. Billings. (1986). Reconstructing daily life in the past: An hermeneutical approach to ethnographic dat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443-462.
- Bleicher, Josef. (1980).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Bloch, Marc. (1953).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 Peter Putnam. New York: Vintage.
- Block, Fred. (1977). Beyond corporate liberalism. *Social Problems*, 24:353-361.
- Block, Fred, and Gene A. Burns. (1986). Productivity as a social problem: The uses and misuses of social indicator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767-780.
- Bloor, Michael J. (1983). Notes on member validation.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M. Emerson, pp. 156-171. Boston: Little, Brown.
- Blum, Debra E. (1989). A dean is charged with plagiarizing a dissertation for his book on Muzak.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35:A17.
- Blume, Stuart S. (1974). *Toward a political sociology of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
- Blumer, M. (1984). *The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lumer, Martin. (1991a). W. E. B. DuBois as a social investigator: The Philadelphia Negro 1889.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170-18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umer, Martin. (1991b). 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 survey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mpirical sociology.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271-31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umer, Martin. (1992). The growth of applied sociology after 1945: The prewar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twar infrastructure.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s: The forms and fates of 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edited by T. C. Halliday and M. Janowitz, pp. 317-34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Blumer, Martin, K. Bales, and K. Sklar. (1991).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1-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umstein, Alfred. (1974). Seriousness weights in an index of cri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854-864.
- Bogardus, Emory S. (1959). *Social distance*. Yellow Springs, OH: Antioch Press.
- Bogdan, Robert, and Steven J. Taylor. (1975).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 phenomen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Wiley.
- Bohm, Robert M. (1990). Death penalty opinions: A classroom experience and public commit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60:285-297.
- Bohrnstedt, George. (1992a). Reliability.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626-1632. New York: Macmillan.
- Bohrnstedt, George. (1992b). Validity.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217-2222. New York: Macmillan.
- Bohrnstedt, George W., and Edgar F. Borgatta, eds. (1981). *Social measurement: Current iss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ohrnstedt, George, and David Knoke. (1994). *Statistics for social data analysis*, 3rd ed. Itasca, IL: Peacock.
- Bollen, Kenneth A., Barbara Entwisle, and Arthur S. Alderson. (1993). Macro-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321-351.
- Bolton, Ruth N., and Tina Bronkhorst. (1996). Questionnaire pretesting: Computer-assisting coding of concurrent protocol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edited by N. Schwarz and S. Sudman, pp. 37-6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ond, Charles F., Jr., and Evan L. Anderson. (1987). The reluctance to transmit bad news: Private discomfort or public displa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3:176-187.
- Bonnell, Victoria E. (1980). The uses of theory, concepts and comparis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156-173.
- Borgatta, Edgar F., and George W. Bohrnstedt. (1980). Level of measurement: Once over again.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9:147-160.
- Boruch, Robert F. (1982). Methods for revolving privacy problems in social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292-31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ottomore, Thomas. (1984). *The Frankfurt School*. New York: Travistock.
- Bouchard, Thomas J., Jr. (1976). Unobtrusive measures: An inventory of us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4:267-300.
- Boyatzis, Richard E. (1998).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Thematic analysis and code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radburn, Norman M. (1983). Response effects.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289-328. Orlando, FL: Academic.
- Bradburn, Norman M., and Carrie Miles. (1979). Vague qualifier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92-101.
- Bradburn, Norman M., and Seymour Sudman. (1980). *Improving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radburn, Norman M., and Seymour Sudman. (1988). *Polls and surveys: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tell u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radshaw, York W., and Michael Wallace. (1996). *Global inequalities*.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Brannigan, Augustine. (1992). Postmodernism.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522-1525. New York: Macmillan.
- Braudel, Fernand. (1980). *On history*, trans. Sarah Matth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edo, Eric, and Walter Feinberg, eds. (1982). *Knowledge and values in social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Brehm, John. (1994). Stubbing our toes for a foot in the door? Prior contact, incentives and survey respon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6:45-63.
- Brenner, Michael. (1985). Survey interviewing.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edited by M. Brenner, J. Brown, and D. Canter, pp. 9-3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renner, Michael, Jennifer Brown, and David Canter, eds. (1985).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Briggs, Charles L. (1986). *Learning how to ask: A sociolinguist 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interview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inberg, David, and Joseph E. McGrath. (1982). A network of validity concepts. In *Forms of validity in research*, edited by D. Brinberg and L. Kidder, pp. 5-2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rint, Steven. (1994). *In an Age of Experts: 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inton, Mary C., Yean-Ju Lee, and William L. Parish. (1995).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in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societies: Examples from East A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009-1130.
- Britton, Dana M. (1990). Homophobia and homosociality: An analysis of

- boundary maintena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1:423-440.
- Broad, W. J., and N. Wade. (1982). *Betrayers of the truth*.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Broadbent, Jeffrey. (1989a).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Japan: An integrated structural analysis. *Sociological Forum*, 4:179-202.
- Broadbent, Jeffrey. (1989b). Strategies and structural contractions: Growth coalition politics in Japa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707-721.
- Broadhead, Robert, and Ray Rist. (1976). Gatekeepers and the social control of social research. *Social Problems*, 23:325-336.
- Brodsky, Stanley L., and H. O'Neal Smitherman. (1983). *Handbook of scales for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New York: Plenum.
- Brody, Charles J. (1986). Things are rarely black or white: Admitting gray into the converse model of attitude stabi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57-677.
- Bromley, David G., and Anson D. Shupe, Jr. (1979). *Moonies in America: Culture, church and crusad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rown, Jennifer, and David Canter. (1985). The uses of explanation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edited by M. Brenner, J. Brown, and D. Canter, pp. 217-24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rown, M. Craig, and Barbara Warner. (1992). Immigrants, urban politics, and policing in 190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293-305.
- Brown, Richard Harvey. (1978). Symbolic realism and sociological thought. In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edited by R. H. Brown and S. M. Lyman, pp. 14-3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Richard Harvey. (1989). *Social science as civic discourse: Essays on the invention, legitimation and uses of social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own, Steven R. (1980). *Political subjectivity: Applications of Q methodolog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Steven R. (1986). Q technique and method: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 *New tools for social scientists: Advances and applications in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W. D. Berry and M. Lewis-Beck, pp. 57-7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ryan, James H. (1965). Apprenticeships in prostitution. *Social Problems*, 12:287-297.
- Brym, Robert J. (1980).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urawoy, Michael. (1977). Social structure, homogeniz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status attai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031-1042.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85). Karl Marx and the satanic mills: Factory politics under early capitalism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247-282.
- Burawoy, Michael. (1989). Two methods in search of science: Skocpol versus Trotsky. *Theory and Society*, 18:759-806.
- Burawoy, Michael. (1990). Marxism as science: Historical challeng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775-793.
- Burawoy, Michael. (1991).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In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edited by M. Burawoy et al., pp. 271-28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4-33.
- Burawoy, Michael, and Janos Lukacs. (1985). Mythologies of work: A comparison of firms in state socialism and advanced capit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723-737.
- Burgess, Robert G. (1982a). Approaches to field research.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1-11.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urgess, Robert G. (1982b). Keeping field notes.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191-194.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urgess, Robert G. (1982c). The unstructured interview as a conversation.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107-110.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urke, Peter. (1980). *Sociology and history*.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Burke, Peter. (1992). *History and social theo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Burnstein, Leigh, Howard E. Freeman, and Peter H. Rossi, eds. (1985). *Collecting evaluation data: Problems and solutio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Burrage, Michael C., and David Corry. (1981). At sixes and sevens: Occupational status in the city of London from the 14th to the 17th centu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6:375-392.
- Burton, Michael L., and Douglas R. White. (1987). Cross-cultural surveys toda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6:143-160.
- Byrne, Noel. (1978). Sociotemporal considerations of everyday life suggested by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bar milieu. *Urban Life*, 6:417-438.
- Calhoun, Craig. (1996). 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he Historical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edited by T. J. McDonald, pp. 305-337.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arnic, Charles. (1980).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role of scientist: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ancient Greece.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3:271-285.
- Carnic, Charles, and Yu Xie. (1994). The statistical turn i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Columbia University, 1890-191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773-805.
- Campbell, Donald T., and D. W. Fiske. (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nt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6:81-105.
- Campbell, Donald T., and Julian C. Stanley. (1963). *Experimental and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s for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 Campbell, John P., Richard L. Daft, and Charles L. Hulin. (1982). *What to study: Generating and developing research questio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ancian, Francesca M., and Cathleen Armstead. (1992). Participatory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427-1432. New York: Macmillan.
- Cannell, Charles F., and Robert L. Kahn. (1968). Interviewing.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Vol. 2,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526-59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Cannell, Charles F., Peter V. Miller, and Lois Oksenberg. (1981). Research on interviewing technique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1*, edited by S. Leinhardt, pp. 389-43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anter, David, Jennifer Brown, and Linda Goat. (1985). Multiple sorting procedure for studying conceptual systems.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edited by M. Brenner, J. Brown, and D. Canter, pp. 79-11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antor, Norman F., and Richard I. Schneider. (1967). *How to study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 Caplan, Arthur L. (1982). On privacy and confidentiality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315-32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ppell, Charles L., and Thomas M. Guterbock. (1992). Visible colleges: The social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of sociology special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266-273.

- Capron, Alexander Morgan. (1982). Is consent always necessary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215–23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arl, Jim. (1994). Parental choice as national policy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8:294–322.
- Carley, Michael. (1981). *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 Issues of policy and theory*.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Carmines, E., and R. Zeller. (1979).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ssessment*.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arney, Thomas F. (1972). *Content analysis: A technique for systematic inference from communications*. 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 Carr, Edward Hallett. (1961).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 Carr-Hill, Roy A. (1984a). The political choice of social indicators. *Quality and Quantity*, 18:173–191.
- Carr-Hill, Roy A. (1984b). Radicalising survey methodology. *Quantity and Quality*, 18:275–292.
- Catania, Joseph, D. Dinson, J. Canahola, L. Pollack, W. Hauck, and T. Coates. (1996). Effects of interviewer gender, interviewer choice and item wording on responses to questions concerning sexual behavi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345–375.
- Caute, David. (1978). *The great fear*. New York: Touchstone.
- Cavan, Sherri. (1974). Seeing social structure in a rural setting. *Urban Life*, 3:329–361.
- Cerulo, Karen A. (1989). Sociopolitical control and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 symbol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anthems. *Social Forces*, 68:76–99.
- Chadwick, Bruce A., Howard M. Bahr, and Stan L. Albrecht. (198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hafetz, Janet Saltzman. (1978). *A primer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testing of theories in sociology*. Itasca, IL: Peacock.
- Chambers, Marcia. (October 22, 1986). Jesuit priest standing by the survey that Vatican attempted to suppress. *The New York Times*.
- Channels, Noreen L. (1993). Anticipating media coverage: Methodological decisions regarding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267–28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ase-Dunn, Christopher. (1989). *Global formation: Struc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Chebat, Jean-Charles, and Jacques Picard. (1988). Receivers' self-accept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wo-sided messag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353–362.
-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for authors, editors and copywriters, 13th ed., revised and expanded. (198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urch, Allan H. (1993).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incentives on mail survey response rates: A meta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62–80.
- Churchill, Gilbert A., Jr. (1983). *Marketing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foundations*, 3rd ed. New York: Dryden.
- Cicourel, Aaron. (1964). *Method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Glencoe, IL: Free Press.
- Cicourel, Aaron. (1973). *Cognitive sociology*. London: Macmillan.
- Cicourel, Aaron. (1982). Interviews, surveys, and the problem of ecological validity. *American Sociologist*, 17:11–20.
- Clammer, John. (1984). Approaches to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63–85.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Clark, Herbert H., and Michael F. Schober. (1992). Asking questions and influencing answer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15–48.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larke, Michael. (1975). Survival in the field: Implications of personal experience in field 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95–123.
- Clemens, Elizabeth, and Walter Powell. (1995). Careers in print: Books, journals, and scholarly reput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433–497.
- Clogg, Clifford C., and D. O. Sawyer. (1981).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odels for analyzing the scalability of response pattern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1*, edited by S. Leinhardt, pp. 240–280.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lubb, Jerome M., E. Austin, C. Geda, and M. Traugott. (1985). Sharing research data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Sharing research data*, edited by S. Fineberg, M. Martin, and M. Straf, pp. 39–88.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Cogan, Johan, Judith Torney-Purta, and Douglas Anderson. (1988).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 global issues: Studen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2:283–297.
- Cohen, Patricia Cline. (1982). *A calculating people: The spread of numeracy in early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hen, Stephen R. (1991). The Pittsburg survey and the social survey movement: A sociological road not taken.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245–26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 Jonathan R., and Stephen Cole. (1973).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e, Stephen. (1978). Scientific reward system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Research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cience and Art*, 1:167–190.
- Cole, Stephen. (1983). The hierarchy of the sci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111–139.
- Cole, Stephen. (1994). Why sociology doesn't make progress like the natur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Forum*, 9:133–154.
- Cole, Stephen, Jonathan Cole, and Gary A. Simon. (1981). Chance and consensus in peer review. *Science*, 214:881–885.
- Coleman, James, and Thomas Hoffer. (1987).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 The impact of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Collins, H. M. (1983).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9:265–285.
- Collins, Randall. (1984). Statistics versus words. *Sociological Theory*, 2:329–362.
- Collins, Randall. (1986). Is 1980s sociology in the doldru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1336–1355.
- Collins, Randall. (1988). *Theore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Collins, Randall. (1989). Sociology: Pro-science or anti-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24–139.
- Collins, Randall. (1994). Why the social sciences won't become high-consensus, rapid-discovery science. *Sociological Forum*, 9:155–177.
- Collins, Randall, and Sal Restivo. (1983). Development, diversity and conflict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4:185–200.
- Comaroff, John, and Jean Comaroff. (1992).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Boulder, CO: Westview.
- Committees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Sociology. (1986). *The treatment of gender in research*. Washington, DC: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Connell, R. W. (1990). Notes on American sociolo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Sociology in America*, edited by H. Gans, pp. 265–27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onrad, Peter, and Shulamit Reinharz. (1984). Computers and qualitative data: Editors' introductory essay. *Qualitative Sociology*, 7:3–15.
- Converse, Jean M. (1984). Strong arguments and weak evidence: The open/closed questioning controversy of the 1940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267–282.
- Converse, Jean M. (1987).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Roots and emer-*

- gence, 1890–19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verse, Jean M., and Stanley Presser. (1986). *Survey questions: Handcrafting the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onverse, Jean M., and Howard Schuman. (1974). *Conversations at random: Survey research as interviewers see it*. New York: Wiley.
- Cook, Judith A., and Mary Margaret Fonow. (1990). Knowledge and women's interests: Issues of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feminist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J. McCarl Nielsen, pp. 69–93. Boulder, CO: Westview.
- Cook, Thomas D., and Donald T. Campbell. (1979). *Quasi-experimentation: 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ettings*.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ombs, R. H., and L. J. Goldman. (1973). Maintenance and discontinuity of coping mechanisms in an intensive care unit. *Social Problems*, 20:342–355.
- Cooper, Harris M. (1984). *The integrative research review: A systematic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Cordes, Colleen. (June 19, 1998). The academic pork barrel begins to fill up again.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A30–32.
- Cordes, Colleen. (Dec. 14, 1988). Legacy of “Golden Fleece” awards to survive Proxmire's retiremen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 Corsaro, William A. (1988). Routines in the peer culture of American and Italian nursery school childre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1:1–14.
- Corsaro, William A. (1992).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1,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390–395. New York: Macmillan.
- Corsaro, William A., and David Heise. (1990). Event structure models from ethnographic data.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20:1–57.
- Corsino, Louis. (1987). Fieldworkers blues: Emotional stress and research underinvolvement in fieldwork setting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4:275–285.
- Coser, Lewis. (1981). The uses of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future of the sociological classics*, edited by Buford Rhea, pp. 170–182.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Costner, Herbert L. (1969). Theory, deduction and rules of correspond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245–263.
- Costner, Herbert L. (1985). Theory, deduction and rules of correspondence. In *Causal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edited by H. M. Blalock, Jr., pp. 229–250. New York: Aldine.
- Cotter, Patrick R., Jeffrey Cohen, and Philip B. Coulter. (1982). Race of interview effects in telephone interview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6:278–286.
- Couper, Mick. (1997). Survey introductions and data qual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317–338.
- Couper, Mick, and Benjamin Rowe. (1996). Evaluation of a computer assisted self-interview component in a 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89–105.
- Couch, Carl J. (1987). Objectivity: A crutch and club for bureaucrats/subjectivity: A haven for lost soul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8:105–118.
- Cox, Stephen, and William Davidson. (1995). A meta-analysis of altern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Crime and Delinquency*, 41:219–230.
- Cozby, Paul C. (1984). *Using computer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alo Alto, CA: Mayfield.
- Craib, Ian. (1984). *Modern social theory: From Parsons to Haberma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rane, Diana. (1967). The gatekeepers of science: Som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election of articles for scientific journals. *American Sociologist*, 2:195–201.
- Crane, Diana. (1972). *Invisible colle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ess, Daniel M., and David A. Snow. (1996). Mobilization at the margins: Resources, benefactors, and the viability of homeless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089–1109.
- Creswell, John W. (1994).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royle, Robert T., and Elizabeth Loftus. (1992). Improving episodic memory performance of survey respondent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95–10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Crozat, Matthew. (1998). Are the times a-changin'? Assessing the acceptance of protest in Western democracies. In *The Movement Society*, edited by D. Meyer and S. Tarrow, pp. 59–81. Totowa, NJ: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Cullen, Francis T., Bruce Link, and Craig Polanzi. (1982). The seriousness of crime revisited: Have attitudes toward white collar crime changed? *Criminology*, 20:83–102.
- Cummings, Scott. (198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unding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ociological Inquiry*, 54:154–170.
- Curran, Daniel J., and Sandra Cook. (1993). Doing research in post-Tiananmen China.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71–8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zaja, Ronald, Johnny Blair, and Jutta P. Sebestik. (1982). Respondent selection in a telephone survey: A comparison of three techniqu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381–385.
- Dabbs, James M., Jr. (1982). Making things visible. In *Variet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J. Van Maanen, J. Dabbs, Jr., and R. R. Faulkner, pp. 31–64.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ale, Angela, S. Arber, and Michael Procter. (1988). *Doing secondary analysis*. Boston: Unwin Hyman.
- Dannefer, Dale. (1981). Neither socialization nor recruitment: The avocational careers of old car enthusiasts. *Social Forces*, 60:395–413.
- D'Antonio, William V. (Aug. 1989). Executive office report: Sociology on the move. *ASA Footnotes*, 17, p. 2.
- D'Antonio, William V. (1992). Recruiting sociologists in a time of changing opportunities. In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s: The forms and fates of 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edited by T. Halliday and M. Janowitz, pp. 99–13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nziger, Kurt. (1988).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Who participated in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35–5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nziger, Sandra K. (1979). On doctor watching: Fieldwork in medical settings. *Urban Life*, 7:513–532.
- Darnton, Robert. (1978).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In *Structure, consciousness and history*, edited by R. H. Brown and S. M. Lyman, pp. 106–13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Fred. (1959). The cabdriver and his fare: Facets of a fleeting relation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5:158–165.
- Davis, Fred. (1973). The Martian and the convert: Ontological polarities in social research. *Urban Life*, 2:333–343.
- Davis, James A. (1985). *The logic of causal ord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avis, James A., and Tom W. Smith. (1986). *General social surveys 1972–1986 cumulative codebook*. Chicago: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 Davis, James A., and Tom W. Smith. (1992). *The NORC General Social Survey: A user's guide*. Newbury Park, CA: Sage.
- Dawes, R. M., and T. W. Smith. (1985). Attitude and opinion measurement.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Vol. 1,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509–566. New York: Random House.
- Dean, John P., Robert L. Eichhorn, and Lois R. Dean. (1969). Fruitful informants for intensive interviewing.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142–144.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Dean, John P., and William Foote Whyte. (1969). How do you know if the informant is telling the truth?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105–11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Deegan, Mary Jo. (1988). *Jane Adams and the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1918*.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 DeLamater, John, and Pat MacCorquodale. (1975). The effects of interview schedule variations on reported sexual behavior.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4:215–236.
- DeMaio, Theresa J. (1980). Refusals: Who, where and wh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4:223–233.
- DeMaio, Theresa J. (1984). Social desirability and survey measurement: A review.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257–28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Denzin, Norman K. (1970).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ethnomethodology. In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edited by J. Douglas, pp. 261–286. Chicago: Aldine.
- Denzin, Norman K. (1989). *The research act: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methods*, 3r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Denzin, Norman K., and Kai Erikson. (1982). On the ethics of disguised observation: An exchange. In *Social research ethics*, edited by M. Blume. New York: Macmillan.
- Denzin, Norman K., and Yvonna S. Lincoln, eds. (1994). Introduction: Entering the fiel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1–18.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rksen, Linda, and John Gartrell. (1992). Scientific explan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711–1720. New York: Macmillan.
- Desan, Susanne. (1989). Crowds, community and ritual in the work of E. P. Thompson and Natalie Davi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 Hunt, pp. 24–4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vault, Marjorie L. (1990). Talking and listening from women's standpoint: Feminist strategies for interviewing and analysis. *Social Problems*, 37:96–116.
- deVaus, D. A. (1986). *Surveys in social research*.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Dexter, Lewis A. (1970). *Elite and specialized interviewing*.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Sigmund. (1988). Informed consent and survey research: The FBI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 *Surveying social life: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H. Hyman*, edited by H. O'Gorman, pp. 72–99.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Dibble, Vernon K. (1963). Four types of inference from documents to events. *History and Theory*, 3:203–221.
- Dickson, David. (1984). *The new politics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ener, Edward, and Rick Crandall. (1978). *Ethics in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jkstra, Wil, and Johannes van der Zouwen, eds. (1982). *Response behavior in the survey interview*.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illman, Don A. (1978). *Mail and telephone surveys: The total design method*. New York: Wiley.
- Dillman, Don A. (1983). Mail and other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359–377.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Dillman, Don A. (1991). The design and administration of mail survey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225–249.
- Dillman, Don A., Eleanor Singer, Jon Clark, and James Treat. (1996). Effects of benefits, appeals, mandatory appeals and variations in statements of confidentiality on completion rates for census questionnair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376–389.
- Domhoff, G. William. (1974). *The Bohemian Grove and other retrea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Donald, Robert B. et al. (1983). *Writing clear paragraphs*, 2nd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Dooley, David. (1984).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Douglas, Jack D. (1976).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ouglas, Jack D. (1985). *Creative interview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ouglas, Jack D., and Paul K. Rasmussen. (1977). *The nude be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Downey, Gary L. (1986). Ideology and the Clamshell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dilemmas in the anti-nuclear power movement. *Social Problems*, 33:357–373.
- Drass, Kriss. (1980).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A computer program. *Urban Life*, 9:332–353.
- Dressler, William H. (1991). *Stress and adapt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e: Depression in a southern black communit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DuBois, W. E. Burghardt. (1899). *The Philadelphia Negro*. New York: Benjamin Bloom.
- Dunaway, David K., and Willa K. Baum, eds. (1984). *Oral history*. Nashville, TN: Association for State and Local History.
- Duncan, Otis Dudley. (1975).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Duncan, Otis Dudley. (1984). *Notes on social measurement: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Duncan, Otis Dudley, and Magnus Stenbeck. (1988). No opinion or not s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513–525.
- Durkheim, Emile. (1938). *Rules of the sociological method*, trans. Sarah Solovay and John Mueller, edited by G. Catl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ynes, Russell R. (1984).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SSA. *Sociological Inquiry*, 54:211–229.
- Easterday, Lois, Diana Papademas, Laura Schorr, and Catherine Valentine. (1982). The making of a female researcher: Role problems in fieldwork.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62–67.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Eastrope, Gary. (1974). *Histo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London: Longman.
- Eckberg, Douglas Lee, and Lester Hill, Jr. (1979). The paradigm concept and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937–947.
- Eder, Donna. (1981). Ability grouping as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A micro-analysis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4:151–162.
- Eder, Donna. (1985). The cycle of popular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mong female adolesc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58:154–165.
- Edward, G. Franklin. (1974). E. Franklin Frazier. In *Black sociologists: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ited by J. Blackwell and M. Janowitz, pp. 85–1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dwards, Allen L. (1957). *Techniques of attitude scale constructio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Edwards, Rosalind. (1993). An education in interviewing: Placing the researcher and research.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181–19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ichler, Margrit. (1988). *Nonsexist research methods: A practical guide*.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Elder, Glen H., Jr., Eliza Pavalko, and Elizabeth Clipp. (1993). *Working with archival data: Studying liv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lder, Joseph W. (1973). Problems of crosscultural methodology: Instrumentation and interviewing in India.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D. Grimshaw, pp. 119–144. New York: Wiley.
- Eliasoph, Nina. (199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 everyday lif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len, R. F., ed. (1984a).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Ellen, R. F. (1984b). Some other interactionist method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273–293.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Emerson, Robert M. (1981). Observational field work.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7:351–378.
- Emerson, Robert M. (1983). Int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M. Emerson, pp. 1–16. Boston: Little, Brown.
- Emigh, Rebecca Jean. (1997). The power of negative thinking: The use of negative case methodolo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26:649–684.
- Ennis, James G. (1992).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Modeling the intersection of specialt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259–265.
- Erikson, Kai T. (1970). A comment on disguised observation in sociology.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252–260. Chicago: Markham.
- Erikson, Kai T. (1978). *Everything in its path*. New York: Touchstone.
- Evans, Peter, and John D. Stephens. (1989). Studying development since the sixties: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and Society*, 17:713–746.
- Evans, William A., Michael Krippendorf, Jae Yoon, Paulette Posluszny, and Sari Thomas. (1990). Science in the prestige and national tabloid pres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1:105–117.
- Fantasia, Rick. (1988). *Cultures of solidarity: Consciousness, action 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work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aris, R. E. L. (1967). *Chicago sociology, 1920–1932*. San Francisco: Chandler.
- Faupel, Charles E., and Carl B. Klockars. (1987). Drugs-crime connections: Elaborations from the life history of hard-core heroin addicts. *Social Problems*, 34:54–68.
- Fay, Brian. (1975). *Soci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Fay, Brian. (1987).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Liberation and its limi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ichard C. Rockwell. (1992).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942–1945. New York: Macmillan.
- Ferriss, Abbott L. (1988). The uses of social indicators. *Social Forces*, 66:601–617.
- Fetterman, David M. (1989). *Ethnography: Step by step*. Newbury Park, CA: Sage.
- Fichter, Joseph H., and William L. Kolb. (1970). Ethical limitations on sociological reporting.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261–270. Chicago: Markham.
- Fielding, Nigel G., and Raymond M. Lee, eds. (1991).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Fine, Gary Alan. (1979). Small groups and culture creation: The idioculture of Little League baseball tea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 733–745.
- Fine, Gary Alan. (1987). *With the boys: Little League baseball and preadolescent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ne, Gary Alan. (1988). The ten commandments of writing.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152–157.
- Fine, Gary Alan. (1990). Organizational time: The temporal experience of restaurant kitchens. *Social Forces*, 69:95–114.
- Fine, Gary Alan. (1992). The culture of production: Aesthetic choices and constraints in culinary work.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1268–1294.
- Fine, Gary Alan, and Barry Glassner. (1979).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with children: Promise and problems. *Urban Life*, 8:153–174.
- Finkel, Steven E., Thomas M. Guterbock, and Marian J. Borg. (1991). Race-of-interviewer effects in a preelection poll: Virigina 198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313–330.
- Finley, M. I. (Summer 1977). Progress in historiography. *Daedalus*, pp. 125–142.
- Finsterbusch, Kurt, and Annabelle Bender Motz. (1980). *Social research for policy decisions*. Belmont, CA: Wadsworth.
- Finsterbusch, Kurt, and C. P. Wolf. (1981). *Methodology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Stroudsburg, PA: Hutchinson Ross.
- Firebaugh, Glenn. (1980). Cross-national versus historical regression model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3: 333–344.
- Firebaugh, Glenn, and Kevin Chen. (1995). Vote turnout of nineteenth amendment women: The enduring effect of disenfranchis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972–996.
- Fischer, Claude S. (1992).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ischer, Claude S. et al. (1996). *Inequality by Design: Cracking the Bell Curve My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scher, David H. (1970).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s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 Fischer, Frank. (1985). Critical evaluation of public policy: A methodological case study. In *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life*, edited by J. Forester, pp. 231–25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Fiske, Donald W. (1982). Convergent-discriminant validation in measurements and research strategies. In *Forms of validation in research*, edited by D. Brinberg and L. H. Kidder, pp. 72–92.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Fiske, Edward B. (July 12, 1989). The misleading concept of “average” on reading tests changes, and more students fall below it. *New York Times*.
- Fitchen, Janet M. (1991). *Endangered spaces, enduring places: Change, identity and survival in rural America*. Boulder, CO: Westview.
- Fletcher, Colin. (1974). *Beneath the surface: An account of three style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Flick, Uwe. (1998).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lora, Cornelia Butler. (1979). Changes in women's status in women's magazine fiction: Differences by social class. *Social Problems*, 26:558–569.
- Foddy, William. (1993). *Constructing questions for 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oddy, William. (1995). Probing: A dangerous practice in social surveys? *Quality and Quantity*, 29:73–86.
- Fontana, Andrea, and James H. Frey. (1994).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science.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361–37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Forest, Kay B., Phyllis Moen, and Donna Dempster-McClain. (1995). Cohort differences in the transition to motherhood: The variable effects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before marriag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15–336.
- Form, William H. (1973). Field problem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D. Grimshaw, pp. 83–117. New York: Wiley.
- Foster, Gary S., Richard L. Hummel, and Donald J. Adamchak. (1998). Patterns of conception, natality and mortality from midwestern cemeteries: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473–490.
- Fowler, Edward. (1996). *San'ya blues: Laboring life in contemporary Tokyo*.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Fowler, Floyd J., Jr. (1984).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owler, Floyd J., Jr. (1992). How unclear terms can affect survey dat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218–231.

- Fowler, Floyd Jackson, and Charles Cannell. (1996). Using behavioral coding to identify cognitive problems with survey question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edited by N. Schwarz and S. Sudman, pp. 15–3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Fox, James Alan, and Paul E. Tracy. (1986). *Randomized response: A method for sensitive survey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ox, John. (1992). Statistical graphic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054–2073. New York: Macmillan.
- Fox, Richard, Melvin R. Crask, and Jonghoon Kim. (1988). Mail survey response rate: A meta-analysis of selected techniques for inducing respon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467–491.
- Franke, Charles O. (1983). Ethnography.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M. Emerson, pp. 60–67. Boston: Little, Brown.
- Franke, Richard H., and James D. Kaul. (1978). 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 First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623–643.
- Frankel, Martin. (1983). Sampling theory.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21–67.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Frazier, E. Franklin. (1957). *The black bourgeoisie*. Glencoe, IL: Free Press.
- Fréchette-Schrader, Kristin. (1994). *Ethic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Lanham, MD: Rowland and Littlefield.
- Fredrickson, George. (1981). *White supre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Howard. (1983). *Applied soci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Freeman, Howard. (1992). Evaluation research.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2,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594–598. New York: Macmillan.
- Freeman, Howard, and Peter H. Rossi. (1984). Furthering the applied side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571–580.
- Freeman, Howard, and Merrill J. Shanks, eds. (1983). The emergence of computer assisted survey research.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3:115–230.
- Freidson, Eliot. (1986). *Professional powers: A study of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mal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idson, Eliot. (1994). *Professionalism reborn: Theory, prophecy and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reire, Paulo. (1970).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trans. Myra Bergman Ramos. New York: Seabury.
- Frey, Frederick W. (1970). Cross-cultural survey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R. Holt and J. Turner, pp. 173–294. New York: Free Press.
- Frey, James H. (1983). *Survey research by telephone*. Beverly Hills, CA: Sage.
- Friedrichs, Robert W. (1970). *A sociology of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Frost, Peter, and Ralph Stablein, eds. (1992). *Doing exemplary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Fuchs, Stephan, and Jonathan H. Turner. (1986). What makes a science “mature”?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control in scientific produ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4:143–150.
- Fuller, Linda. (1988). Fieldwork in forbidden terrain: The U.S. state and the case of Cuba. *American Sociologist*, 19:99–120.
- Gadamer, Hans-Georg. (1979).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pp. 103–1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laskiewicz, Joseph. (1985). Professional network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 single mind se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639–658.
- Galaskiewicz, Joseph. (1987). The study of a business elite and corporate philanthropy in a United States metropolitan area. In *Research methods for elite studies*, edited by G. Moyser and M. Wagstaffe, pp. 147–165.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Galaskiewicz, Joseph, and Stanley Wasserman. (1993).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cepts, methodology and directions for the 1990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2:3–22.
- Gallie, W. B. (1963).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History and Theory*, 3:149–202.
- Gallihier, John F., and James L. McCartney. (1973). The influence of funding agencies on juvenile delinquency research. *Social Problems*, 21:77–90.
- Gamson, William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erbert J. (1982). The participant observer as a human be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ersonal aspects of fieldwork.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53–61.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Garfinkel, Harold.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Garfinkel, Harold. (1974a). The origins of the term “ethnomethodology.” In *Ethnomethodology*, edited by R. Turner, pp. 15–18. Middlesex: Penguin.
- Garfinkel, Harold. (1974b). The rational properties of scientific and common sense activities. In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A. Giddens, pp. 53–74. London: Heinemann.
- Gartell, C. David, and John W. Gartell. (1996). Positivism in sociological practice, 1967–1990.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3:143–159.
- Gaston, Jerry. (1978). *The reward system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cience*. New York: Wiley.
- Geer, John G. (1988). What do open-ended questions meas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365–371.
-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lifford. (1979).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pp. 225–2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iger, Roger L. (1986). *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s, Robert A., and Michael O. Jones. (1980). *People studying peop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phart, Robert P., Jr. (1988). *Ethnostatistics: Qualitative foundations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Gibbs, Jack. (1989). Conceptualization of terror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329–340.
- Giddens, Anthony. (1976).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Positivist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78). 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 In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edited by T. Bottomore and R. Nisbet.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nthony. (1994). Elites and power.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Class, race & gender i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 Grusky, pp. 170–174. Boulder, CO: Westview.
- Gieryn, Thomas F. (1978). Problem retention and problem change in sci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edited by J. Gast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ilbert, Margaret. (1992). *On social fac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lespie, Richard. (1988). 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114–13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illespie, Richard. (1991). *Manufacturing knowledge: A history of the Hawthorne experimen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illjam, Mikael, and David Granberg. (1993). Should we take Don’t Know for an answe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348–357.
- Glaser, Barney, and Anselm Strauss. (1967).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 Glaser, Barney, and Anselm Strauss. (1968). *A time for dying*. Chicago: Aldine.
- Glasser, Gerald J., and Gale O. Metzger. (1972). Random digit dialing as a

- method of telephone sampling.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9:59-64.
- Glock, Charles Y. (1987). Reflections on doing survey research. In *Surveying social life: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H. Hyman*, edited by H. O'Gorman, pp. 31-59.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Glucksmann, Miriam. (1974). *Structuralist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ought: A comparison of the theories of Claude Levi-Strauss and Louis Althusser*.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Gold, Raymond L. (1969). Roles in sociological field observation.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J.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30-38.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Golden, Tim. (December 9, 1996). Universities find donors sometimes impose a price. *The New York Times*.
- Goldstein, Robert Justin. (1978).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Schenckman.
- Goldthorpe, John. (1977). The relevance of history to sociology.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M. Bulmer, pp. 178-191. London: Macmillan.
- Goldthorpe, John. (1991). The uses of history in sociology: Reflections on some recent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2:211-230.
- Gonor, George. (1977). "Situation" versus "frame": The "interactionist" and the "structuralist" analysis of everyday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854-867.
- Goodsell, Charles B. (1983). Welfare waiting rooms. *Urban Life*, 12:464-477.
- Gorden, Raymond. (1980). *Interviewing: Strategy, techniques and tactics*, 3rd ed.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 Gorden, Raymond. (1992). *Basic interviewing skills*. Itasca, IL: Peacock.
- Gordon, David F. (1987). Getting close by staying distant: Fieldwork with proselytizing group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267-287.
- Gordon, Randall A., T. A. Bindrim, M. L. McNicholas, and T. L. Walden. (1988). Perceptions of blue-collar and white-collar crime: The effect of defendant race on simulated juror decision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191-197.
- Gorelick, Sherry. (1991). Contradictions of feminist methodology. *Gender and Society*, 5:459-477.
- Gotham, Kevin Fox, and William G. Staples. (1996). Narrative analysis and the new historic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481-502.
- Gould, Roger V. (1991). Multiple networks and mobilization i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716-729.
- Gouldner, Alvin. (1970). *The coming crisis of Western soci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uldner, Alvin W. (1976). The dark side of the dialectic: Toward a new objectivity. *Sociological Inquiry*, 46:3-16.
- Goward, Nicola. (1984a). Publications on fieldwork experience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88-100.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Goward, Nicola. (1984b). 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adjustmen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100-118.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Goyder, John C. (1982). Factors affecting response rates to mailed questionnair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550-554.
- Graham, Sandra. (1992). Most of the subjects were white and middle class: Trends in published research on African Americans in selected APA journals, 1970-1989. *American Psychologist*, 47:629-639.
- Granovetter, Mark. (1976). Network sampling: Some first ste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1287-1303.
- Grant, Linda, Kathryn B. Ward, and Xue Lan Rong. (1987). Is there an association between gender and method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856-862.
- Gray, Bradford H. (1982). The regulatory context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329-35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Gray, Paul S. (1980). Exchange and access in field work. *Urban Life*, 9:309-331.
- Greenberg, Daniel S. (1967). *The politics of pure scienc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 Greenwald, Howard P. (1992). Ethics in social research.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2.,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584-588. New York: Macmillan.
- Griffin, Larry J. (1992).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1,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63-271. New York: Macmillan.
- Griffin, Larry J. (1993). Narrative, event structure analysis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094-1133.
- Griffin, Larry J., and Charles Ragin. (1994). Some observations on formal methods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3:4-22.
- Griffin, Larry J., Michael E. Wallace, and Beth A. Rubin. (1986). Capitalist resistance to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r before the New Deal: Why? How? Suc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147-167.
- Grimshaw, Allen D. (1973). Comparative sociology.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Grimshaw, pp. 3-48. New York: Wiley.
- Grinnell, Frederick. (1987).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Boulder, CO: Westview.
- Griswold, Wendy. (1983). The devil's techniques: Cultural legiti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68-680.
- Griswold, Wendy. (1987). A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7*, edited by C. Clogg, pp. 1-3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riswold, Wendy. (1994).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Grosf, Miriam Schapiro, and Hyman Sardy. (1985). *A research primer for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Gross, Daniel R. (1984). Time allocation: A tool for the study of cultural behavior.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3:519-558.
- Gross, Edward. (1986). Waiting at Mayo. *Urban Life*, 15:139-164.
- Groves, Robert M. (1996). How do we know what we think they think is really what they think? In *Answering Questions*, edited by N. Schwarz and S. Sudman, pp. 389-402.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roves, Robert M., Nancy H. Fultz, and Elizabeth Martin. (1992). Direct questioning about comprehension in a survey setting.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49-6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Groves, Robert M., and Robert L. Kahn. (1979). *Surveys by telephone: A national comparison with personal interview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oves, Robert M., and Nancy Mathiowetz. (1984). 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Effects on interviewers and respond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356-369.
- Guba, Egon G., and Yvonna S. Lincoln. (1994). Competing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105-11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Gubrium, Jaber F., and James A. Holstein. (1992). Qualitative method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577-1582. New York: Macmillan.
- Gurevitch, Z. D. (1988).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alogue: On making the other strange and the experience of other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179-1199.
- Gurney, Joan Neff. (1985). Not one of the guys: The female researcher in a male-dominated setting. *Qualitative Sociology*, 8:42-62.
- Gusfield, Joseph. (1976). The literary rhetoric of science: Comedy and

- paths in drinking driver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16–34.
- Gustavsen, Bjørn. (1986). Social research as participatory dialogue. In *The use and abuse of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F. Heller, pp. 143–15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Gustin, Bernard H. (1973). Charisma, recognit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scient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1119–1134.
- Gutterbock, Thomas M. (1997). Review: Why Money magazine's "Best Places" keep chang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339–355.
- Guttman, Louis. (1950). The basis for scalogram analysis. In *Measurement and prediction*, edited by S. A. Stouffer, L. Buttmann, E. A. Suchman, P. F. Lazarsfeld, S. A. Star, and J. A. Clausen, pp. 60–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uttman, Louis. (1970). A basis for scaling qualitative data.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edited by G. Summers, pp. 174–186. Chicago: Rand McNally.
- Guy, Rebecca F., Charles E. Edgley, Ibtihaj Arafat, and Donald E. Allan. (1987).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Puzzles and solutions*.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Haberman, Shelby J. (1978).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Habermas, Jurgen. (1971).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urgen. (1973). *Theory and practice*.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urgen.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urgen. (1979).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 Habermas, Jurgen. (1988).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Oxford: Polity.
- Hagan, John. (1990). The gender stratifica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among lawyers. *Social Forces*, 63:835–855.
- Hage, Jerald. (1972). *Techniques and problems of theory construction in sociology*. New York: Wiley.
- Hagstrom, Warren. (1965).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kim, Catherine. (1987). *Research design: Strategies and choices in the design of social research*.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Halfpenny, Peter. (1979). The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data. *Sociological Review*, 27:799–823.
- Halfpenny, Peter. (1982).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xplaining social lif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Hallin, Daniel C. (1985). The American news media: A critical theory perspective. In *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life*, edited by J. Forester, pp. 121–14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allowell, Lyle. (1985). *Ethical and legal problems of research: Professional workshop*. Presentation at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August 26.
- Hammersley, Martyn. (1992). *What's wrong with ethnography?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Hammersley, Martyn. (1995). Theory and evid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29:55–66.
- Hammersley, Martyn, and Paul Atkinson. (1983).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London: Tavistock.
- Hannan, Michael T. (1985). Problems of aggregation. In *Causal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edited by H. Blalock, Jr., pp. 403–439. Chicago: Aldine.
- Harari, Herbert, Oren Harari, and Robert V. White. (1985). The reaction to rape by American bystander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653–658.
- Harding, Sandra. (1986).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argens, Lowell L. (1991). Impressions and misimpressions about sociology journal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0:343–349.
- Hargens, Lowell L. (1988). Scholarly consensus and journal rejection r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139–151.
- Harkens, Shirley, and Carol Warren. (1993).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intensive interviewing: Constellations of strangeness and scienc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1:317–339.
- Harper, Douglas. (1982). *Good compan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per, Douglas. (1987). *Working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rper, Douglas. (1994).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image: Visual methods at the crossroads.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403–41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arré, Rom. (1972).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rré, R., and P. F. Secord. (1979).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Totowa, NJ: Littlefield, Adams.
- Harris, Benjamin. (1988). Key words: A history of debriefing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188–21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Lee. (1990). *Critical social research*. London: Urwin Hyman.
- Hastings, Philip K., and Dean R. Hodge. (1986). Religious and moral attitude trend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1948–84. *Social Forces*, 65:370–377.
- Hauck, Matthew, and Michael Cox. (1974). Locating a sample by random digit dialing: Some hypotheses and a random sampl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8:253–260.
- Hayano, David M. (1982). *Poker faces: The life and work of professional card play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azelrigg, Lawrence E. (1973). Aspects of the measurement of class consciousness.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D. Grimshaw, pp. 219–246. New York: Wiley.
- Hearn, H. L., and P. Stoll. (1976). The continuance of commitment in low status occupations: The cocktail waitres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6:105–114.
- Hearnshaw, L. S. (1979). *Cyril Burt: Psychologist*. London: Holder and Stoughten.
- Heberlein, Thomas A., and Robert Baumgartner. (1978). Factors affecting response rates to mailed questionnair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literatur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447–462.
- Heberlein, Thomas A., and Robert Baumgartner. (1981). Is a questionnaire necessary in a second mail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102–107.
- Heckathorn, Douglas D. (1997).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44:174–199.
- Hecto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gtvædt, Karen A. (1992). Replic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661–1663. New York: Macmillan.
- Heise, David. (1965). Semantic differential profiles for 1,000 most frequent English words.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No. 8.
- Heise, David. (1970). The semantic differential and attitude research.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edited by G. Summers, pp. 235–253. Chicago: Rand McNally.
- Heise, David. (1974). Some issues in sociological measurement.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3–74*, edited by H. L. Costner, pp. 1–16.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Heise, David, ed. (1981). *Microcomputers in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eise, David. (1991). Event structure analysis. In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Fielding and R. Lee, pp. 136–163. Newbury Park, CA: Sage.
- Held, David. (1980).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 Horkheimer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eller, Nelson B., and J. Thomas McEwen. (1973). Applications of crime seriousness information in police departments.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1:241–253.
- Henry, Joy. (1987). *Understanding Japanese society*. New York: Croom Helm.

- Henry, Gary T. (1990). *Practical sampl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 Henry, Gary T. (1995). *Graphing data: Techniques for display and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rrnstein, Richard, and Charles Murray. (1994).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Herting, Jerald R. (1985). Multiple indicator models using LISREL. In *Causal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edited by H. Blalock, Jr., pp. 263–320. New York: Aldine.
- Herting, Jerald R., and Herbert L. Costner. (1985). Re-specification in multiple indicator models. In *Causal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edited by H. Blalock, Jr., pp. 321–394. Chicago: Aldine.
- Hertz, Rosanna, and Jonathan B. Imber. (1993). Fieldwork in elite setting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3–6.
- Hertzberger, Sharon D. (1993). The cyclical pattern of child abuse: A study of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33–51.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erzog, A. Regula, and Jerald G. Bachman. (1981). Effects of questionnaire length on response qual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549–559.
- Hesse, Mary B. (1970).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 Notre Dame, IN: Notre Dame Press.
- Hicks, David. (1984). Getting into the field and establishing routine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192–199.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Hill, Michael R. (1993). *Archival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iller, Harry H. (1979). Universality of sci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ociologies. *American Sociologist*, 14:124–135.
- Hilts, Philip J. (Jan. 11, 1995). Majority backs cigarette rules, poll by tobacco industry finds. *New York Times*.
- Himmelstein, Jerome L., and Mayer Zald. (1984).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government fund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arts. *Sociological Inquiry*, 54:171–187.
- Hindess, Barry. (1973). *The use of official statistics in sociology: A critique of positivism and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Hippler, Hans J., and Norbert Schwartz. (1986). Not forbidding isn't allowing: The cognitive basis of the forbid-allow asymmetr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87–96.
- Hirschman, Albert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1978). *The unexpected community: Portrait of an old age sub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1983). *The managed he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Jennifer L. (1981). *What's fair? American beliefs about distributive just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Joan Eakin. (1980). Problems of acces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elites and boards of directors.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45–5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offman-Lange, Ursula. (1987). Surveying national elit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n *Research methods for elite studies*, edited by G. Moyser and M. Wagstaffe, pp. 27–47.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Hollander, Myles, and Frank Proschan. (1984). *The statistical exorcist: Dispelling statistics anxiety*. New York: Marcel Decker.
- Hollis, Martin. (1977). *Models of man: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n social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lmes, Steven A. (Sept. 18, 1998). Worst census undercount found in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 Holstein, James A., and Jaber F. Gubrium. (1994). Phenomenology, ethno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ative practice.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262–27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olsti, Ole R. (1968). Content analysis. In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Vol. 2,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596–692.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Holsti, Ole R. (1968). *Content ana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Holt, Robert T., and John E. Turner. (1970).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R. Holt and J. Turner, pp. 1–20. New York: Free Press.
- Holub, Robert C. (1991). *Jürgen Habermas: Critic in the public sphere*. New York: Routledge.
- Holy, Ladislav. (1984). Theory, methodology and the research proces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13–34.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Homan, Roger. (1980). The ethics of covert method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46–57.
- Honan, William H. (Jan. 22, 1997). Scholars attack public school TV program. *New York Times*.
- Honigmann, John J. (1982). Sampling i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79–90.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Horan, Patrick. (1987). Theoretical models in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1:379–400.
- Horn, Robert V. (1993). *Statistical indicators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nstein, Gail A. (1988). Quantifying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Debates, dilemmas and implications.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1–3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orowitz, Irving Louis. (1965). The life and death of Project Camelot. *Transaction*, 3:3–7, 44–47.
- House, Ernest R. (1980). *Evaluating with validit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y, David Couzens. (1994).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Hoynes, William. (May/June 1997). News for a captive audience extra. <<http://www.fair.org/extra/9705/ch1-hoynes.html>> November 2, 1998.
- Hubbard, Raymond, and Eldon Little. (1988). Promised contributions to charity and mail survey responses: Replication with exten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223–230.
- Huck, Schuyler W., and Howard M. Sandler. (1979). *Rival hypotheses: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data based conclus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 Humphreys, Laud. (1975). *Tearoom trade: Impersonal sex in public places*, enlarged ed. Chicago: Aldine.
- Hunt, Jennifer. (1984). The development of rapport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of gender in field work among police. *Human Organization*, 45:283–296.
- Hunt, Lynn. (1989). Introduction.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 Hunt, pp. 1–2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nter, Albert. (1993). Local knowledge and local power: Notes on the ethnography of local community eli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36–58.
- Hunter, James Davidson. (1991).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 Hunter, John E., Frank L. Schmidt, and Gregg B. Jackson. (1982). *Meta-analysis: Cumulating research findings across stud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yman, Herbert H. (1975).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yman, Herbert H. (1991). *Taking society's measure: A personal history of survey research*. New York: Russell Sage.
- Hymes, Dell. (1970). Linguistic aspects of comparative political research. In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 edited by R. Holt and J. Turner, pp. 295–341. New York: Free Press.
- Hymes, Dell. (1983).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ers.
- Inverarity, James M. (1976). Populism and lynching in Louisiana, 1889–1896: A test of Erikson's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 crisis and repressive justi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262–280.
- Isaac, Larry W., and Larry J. Griffin. (1989). A historicism in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process: Critique, redirection, and illustrations from U.S. labor hist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873–890.
- Isaac, Larry W., Debra A. Street, and Stan J. Knapp. (1994). Analyzing historical contingency with formal methods: The case of the 'relief explosion' and 1968.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3:114–141.
- Jackson, Bruce. (1978). Killing time: Life in the Arkansas penitentiary. *Qualitative Sociology*, 1:21–32.
- Jackson, Bruce. (1987). *Fieldwork*.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Jackson, David J., and Edgar F. Borgatta, eds. (1981). *Factor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ic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Jacob, Herbert. (1984). *Using published data: Errors and remed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Jacobs, Jerry. (1974). *Fun City: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a retirement commun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Jaeger, Richard M. (1983). *Statistics as a spectator sport*. Beverly Hills, CA: Sage.
- Johnson, Bruce. (1982). Missionaries, tourists and traders. *Studies in Symbolic Interaction*, 4:115–150.
- Johnson, David Richard, and James C. Creech. (1983). Ordinal measures in multiple indicator models: A simulation study of categorization err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398–407.
- Johnson, David W., and Roger T. Johnson. (1985). Relationship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students in intergroup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421–428.
- Johnson, John M. (1975). *Doing field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Johnson, P. Timonty, James G. Hougland, Jr., and Richard R. Clayton. (1989). Obtaining reports of sensitive behavior: A comparison of substance-use reports from telephone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0:173–183.
- Johnson, Stephen D. (1985). Religion as a defense in a mock-jury tri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213–220.
- Jones, Gareth Stedman. (1976). From historical sociology to theoretical histor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27:295–305.
- Jones, Gareth Stedman.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J. H. (1981). *Bad blood: The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New York: Free Press.
- Jones, Wesley H. (1979). Generalizing mail survey inducement methods: Populations' interactions with anonymity and sponsorship.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102–111.
- Jordan, Lawrence A., Alfred C. Marcus, and Leo G. Reeder. (1980). Response styles in telephone and household interviewing: A field experi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4:210–222.
- Jorgensen, Danny L., and Lin Jorgensen. (1982). Social meanings of the occul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3:373–389.
- Josephson, Paul R. (Nov. 1, 1988). The FBI menaces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Times*.
- Junker, Buford H. (1960). *Fiel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uster, F. Thomas, and Kenneth C. Land, eds. (1981). *Social accounting systems: Essays on the state of the ar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Kalberg, Stephen. (1994). *Max Weber's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almijn, Matthijs. (1991). Shifting boundaries: Trends in religious and educational homoga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786–801.
- Kalton, Graham. (1983). *Introduction to survey sampl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andel, Denise B. (1980). Drug and drinking behavior among yout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6:235–265.
- Kane, Emily W., and Laura J. MacAulay. (1993). Interview gender and gender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1–28.
- Kaplan, Abraham. (1964).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Karp, David A. (1973). Hiding in pornographic bookstore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ature of urban anonymity. *Urban Life*, 1:427–452.
- Karp, David A. (1980). Observing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82–97.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arweit, Nancy, and Edmund D. Meyers, Jr. (1983). Computers in survey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379–414.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Katovich, Michael A., and Ron L. Diamond. (1986). Selling time: Situated transactions in a noninstitutional setting.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7:253–271.
- Katz, Jay. (1972). *Experimentation with human being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atzer, Jeffrey, Kenneth H. Cook, and Wayne W. Crouch. (1982). *Evaluating information: A guide for user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nd ed.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Katzer, Jeffrey, Kenneth H. Cook, and Wayne W. Crouch. (1991). *Evaluating information: A guide for user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Keat, Russell. (1981). *The politics of social theory: Habermas, Freud and the critique of positiv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eat, Russell, and John Urry. (1975). *Social theory as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Keeter, Scott. (1995). Estimating telephone noncoverage bias with a telephone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196–217.
- Keith, Verna M., and Cedric Herring. (1991). Skin tone and stratification in the black com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7:760–778.
- Keller, Bill. (May 27, 1988). Ups and downs of conducting the poll. *New York Times*.
- Keller, Bill. (Jan. 19, 1989). Prying where it counts: Into census. *New York Times*.
- Keller, Evelyn Fox. (1983). *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 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 New York: W. H. Freeman.
- Keller, Evelyn Fox. (1985).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ller, Evelyn Fox. (1990). Gender and science. 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J. McCarl Nielsen, pp. 41–57. Boulder, CO: Westview.
- Kelman, Herbert. (1982). Ethical issues in different social science methods.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40–99.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Kemp, Jeremy, and R. F. Ellen. (1984). Informant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224–236. Orlando: Academic Press.
- Kenen, Regina. (1982). Soapsuds, space and sociability: A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of a laundromat. *Urban Life*, 11:163–184.
- Kent, Stephen A. (1992).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2,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837–843. New York: Macmillan.
- Kercher, Kyle. (1992).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595–1613. New York: Macmillan.

- Kerlinger, Fred N. (1979). *Behavioral research: A conceptual approach*.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idder, Louise H. (1982). Face validit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Forms of validity in research*, edited by D. Brinberg and L. Kidder, pp. 41–57.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idder, Louise H., and Charles M. Judd. (1986).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relations*, 5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Kiecolt, K. Jill, and Laura E. Nathan. (1985). *Secondary analysis of survey data*.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im, Jae-On, and Charles W. Mueller. (1978). *Introduction to factor analysis: 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immel, Allan J. (1988). *Ethics and values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Kincheloe, Joe L., and Peter L. McLaren. (1994). Rethinking critical theory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138–15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ing, Desmond. (1998).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esearch: Institutionalizing public funding regi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8:415–444.
-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rk, Jerome, and Marc L. Miller. (1986).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ish, L. (1965). *Survey sampling*. New York: Wiley.
- Kleinman, Sherry. (1980). Learning the ropes as fieldwork analysis.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171–1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leinman, Sherry, and Martha A. Copp. (1993). *Emotions and field wor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Knapp, Peter. (1990). The revival of macrosociology: Methodological issues of discontinuit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5:545–567.
- Knoke, David. (1993). Networks of elite structure and decision-making.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2:23–45.
- Kohn, Melvin L. (1987). Cross-national research as an analytic strate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713–731.
- Kohn, Melvin L., ed. (1989).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Koretz, Daniel. (Summer 1988). Arriving in Lake Wobegon: Are standardized tests exaggerating achievement and distorting instruction? *American Educator*, 12:8–15.
- Kornblum, William. (1974). *Blue collar commu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raemer, Helena Chmura, and Sue Thiemann. (1987). *How many subjects?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in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 Krathwohl, D. R. (1965). *How to prepare a research proposal*.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Bookstore.
- Krippendorff, Klaus. (1980). *Content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to its methodology*.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rosnick, Jon A., and Robert P. Abelson. (1992). The case for measuring attitude strength in survey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177–20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Krosnick, Jon A., and Duane F. Alwin. (1988). A test of the form-resistant correlation hypothesis: Ratings, ranking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valu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526–538.
- Krueger, Richard A. (1988). *Focus groups: 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uhn, Thomas S.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uhn, Thomas S. (1979).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n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urz, Demie. (1987). Emergency department responses to battered women: Resistance to medicalization. *Social Problems*, 34:69–81.
- Kusserow, Richard P. (March 1989). *Misconduc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Report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 Kviz, Frederick J. (1984). Bias in a directory sample for mail survey of rural household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801–806.
- Labaw, Patricia J. (1980). *Advanced questionnaire design*. Cambridge, MA: Abt Books.
- Lachmann, Richard. (1988). Graffiti as career and ide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251–272.
- Lachmann, Richard. (1989). Elite conflict and state formation in 16th and 17th century England and Fra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141–162.
- Lagemann, Ellen Condliffe. (1989).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philanthropy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Land, Kenneth. (1992). Social indicator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844–1850. New York: Macmillan.
- Lane, Michael. (1970). *Structuralism*. London: Jonathan Cape.
- Lang, Eric. (1992). Hawthorne effect.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2,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793–794. New York: Macmillan.
- Laslett, Barbara. (1980). Beyond method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214–228.
- Laslett, Barbara. (1992). Gender in/and social histo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6:177–196.
- Laxer, Gordon. (1989). *Open for business: The roots of foreign ownership in Canad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yder, Derek. (1993). *New strategies in social research*. Cambridge, MA: Polity.
- Lazarsfeld, Paul F., and Jeffrey G. Reitz. (1975).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sociology*. Amsterdam: Elsevier.
- Lazere, Donald, ed. (1987). *American media and mass culture: Left perspec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derman, Douglas. (Aug. 7, 1998). House votes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the NSF and to eliminate AmeriCorp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31.
- Lee, Alfred McClung. (1978). *Sociology for who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e, Harper. (1960). *To kill a mockingbird*. New York: Warner Books.
- Legge, Jerome S., and Joonghoon Park. (1994). Policies to reduce alcohol-impaired driving: Evaluating elements of deterrenc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5:594–606.
- Leggett, Glenn, C. David Mean, and William Charvat. (1965). *Prentice-Hall handbook for writers*, 4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eiter, Kenneth. (1980). *A primer on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Masters, E. E. (1975). *Blue collar aristocrat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Lemert, Charles. (1979). Science, religion and secularizat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445–461.
- Lemert, Charles, ed. (1981). *French sociology: Rupture and renewal since 196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enski, Gerhard E.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New York: McGraw-Hill.
- Lenzer, Gertrud, ed. (1975). *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 Essential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 Row.
- Lesieur, Henry R., and Joseph F. Sheley. (1987). Illegal appended enterprises: Selling the lines. *Social Problems*, 34:249–260.
- Lessler, Judith T. (1984). Measurement error in surveys.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405–440.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ester, Marilyn, and Stuart C. Hadden. (1980). Ethnomethodology and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An integration of perspective and method. *Urban Life*, 9:3-33.
- Lever, Janet. (1978). Sex differences in the complexity of children's play and ga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471-483.
- Lever, Janet. (1981). Multiple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A note on divergence. *Urban Life*, 10:199-213.
- Levine, Joel H. (1993). *Exceptions are the rule: An inquiry into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oulder, CO: Westview.
- Lewis, George H., and Jonathan F. Lewis. (1980).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 Negative evidence in social research.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 544-558.
- Liebertson, Stanley. (1985). *Making it count: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research and the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ebertson, Stanley. (1991). Small N's and big conclusion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asoning of comparative studies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cases. *Social Forces*, 70:307-320.
- Liebetrau, Albert M. (1983). *Measures of associ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iebman, Robert, John R. Sutton, and Robert Wuthnow. (1988). Exploring social sources of denominationalism: Schisms in American Protestant denominations, 1890-198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343-352.
- Liebow, Elliot. (1967). *Talley's corner*. Boston: Little, Brown.
- Lifton, Robert J. (1986). *Nazi docto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ght, Ivan, and Edna Bonacich. (1988).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Koreans in Los Angeles, 1965-198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ight, Richard J., and David B. Pillemer. (1984). *Summing up: The science of reviewing researc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kert, Rensis. (1970). A techniq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edited by G. Summers, pp. 149-158. Chicago: Rand McNally.
- Lindblom, Charles E., and David K. Cohen. (1979). *Usable knowledge: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roblem solving*.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ndzey, Gardner, and Donn Byrne. (1968). Measurement of social choice and interpersonal attractiveness.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452-52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8). History and soci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Sociology and history: Methods*, edited by S. M. Lipset and R. Hofstadter, pp. 20-58.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ttle, Daniel. (1991). *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Boulder, CO: Westview.
- Lloyd, Christopher. (1986). *Explanation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Locke, Lawrence F., Warren Wyrick Spirduso, and Stephen J. Silverman. (1987). *Proposals that work: A guide for planning 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 2n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Loewenstein, Gaither. (1985). The new underclass: A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dilemma.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35-48.
- Lofland, John. (1966). *Doomsday cul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ofland, John. (1974). Styles of reporting qualitative field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st*, 9:101-111.
- Lofland, John. (1976). *Doing social life: The qualitativ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natural settings*. New York: Wiley.
- Lofland, John, and Lyn H. Lofland. (1984).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2n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fland, John, and Lyn H. Lofland. (1995). *Analyzing social settings*, 3rd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 Lofland, Lyn H. (1972). Self management in public settings: Parts I and II. *Urban Life*, 1:93-108, 217-231.
- Loftus, Elizabeth, Mark Klinger, Kyle Smith, and Judith Fiedler. (1990). A tale of two questions: Benefit of asking more than one ques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4:330-345.
- Loftus, Elizabeth, Kyle D. Smith, Mark R. Klinger, and Judith Fiedler. (1992). Memory and mismemory of health event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102-13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Long, J. Scott. (1976). Estimation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linear models containing measurement error: A review of Joreskog's model for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5:157-206.
- Long, J. Scott. (1978). Productivity and academic positions in a scientific care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889-908.
- Longino, Helen E. (1990).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 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orr, Maurice. (1983). *Cluster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and simplifying complex blocks of data*.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ovdal, Lynn T. (1989). Sex role messages i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n update. *Sex Roles*, 20:715-724.
- Lovin-Smith, Lynn, and Charles Brody. (1989). Interruptions in group discussions: The effects of gender and group compo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424-435.
- Lowenthal, David. (198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ebke, Barbara F. (1989). Out of focus: Images of men and women in newspaper photographs. *Sex Roles*, 20:121-133.
- Lynd, Robert S. (1964). *Knowledge for what? The place of social science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Grov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9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acFarlane, Alan. (1977). *R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communit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cIver, A. M. (1968). Levels of explanation in history. In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M. Brodbeck, pp. 304-316. New York: Macmillan.
- MacKeun, Michael B. (1984). Reality, the press and citizens' political agendas.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443-473.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aier, Mark H. (1991). *The data game: Controversies in social science statistics*. Armonk, NY: M. E. Sharpe.
- Maines, David R., William Shaffir, and Allan Turowetz. (1980). Leaving the field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261-28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aloney, Dennis M. (1984). *Protection of human research subjects: A practical guide to federal laws and regulations*. New York: Plenum.
- Mann, Floyd C. (1970). Human relations skills in social research.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Chicago: Markham.
- Mannheim, Karl.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Mariampolski, Hyman, and Dana C. Hughes. (1978).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3:104-113.
- Markoff, John, Gilbert Shapiro, and Sasha R. Weitman. (1974). 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content analysis and general methodology.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4*, edited by D. Heise, pp. 1-5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Marradi, Alberto. (1981). Factor analysis as an aid in the formation and refinement of empirically useful concepts. In *Factor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in social research: 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D. Jackson and E. Borgatta, pp. 11-50.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arsh, Catherine. (1982). *The survey method: The contribution of surveys to*

-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Marsh, Catherine. (1984). Do polls affect what people think?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565–59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Marshall, Catherine. (1985). Appropriate criteria of trustworthiness and goodnes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Quality and Quantity*, 19:353–373.
- Marshall, Catherine, and Gretchen B. Rossman. (1989). *Desig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arshall, Susan E. (1986). In defense of separate spheres: Class and politics in the antisuffrage movement. *Social Forces*, 65:327–351.
- Marshall, Victor W. (1975). Socialization for impending death in a retirement villa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0:1124–1144.
- Martin, Elizabeth. (1985). Surveys as social indicators: Problems of monitoring trends.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677–743. Orlando, FL: Academic.
- Martin, Jay. (1973).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Martin, John L., and Laura Dean. (1993). Developing a community sample of gay men for an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AIDS.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82–10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arvell, Thomas R., and Carlisle E. Moody. (1995). The impact of enhanced prison terms for felonies committed with guns. *Criminology*, 33:247–281.
-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1947).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s I & III*,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R. Pascal.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Masterman, Margaret. (1970). The nature of a paradigm. 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edited by I. Lakatos and A. Musgrove, pp. 59–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Charles S., and Cindy Piper. (1982). A note on the importance of layout in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390–391.
- Mayhew, Bruce H. (1980). Structuralism versus individualism, Part I: Shadowboxing in the dark. *Social Forces*, 59:335–375.
- Mayhew, Bruce H. (1981). Structuralism versus individualism, Part II: Ideological and other obfuscations. *Social Forces*, 59:627–648.
- Maynard, Douglas W. (1985). On the functions of conflict among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207–223.
- McCabe, Donald L. (1992). The influence of situational ethics on cheat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Sociological Inquiry*, 62:365–374.
- McCall, George. (1969). Quality control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128–141.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McCall, George. (1984). Systematic field observ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263–282.
- McCall, Michal. (1980). Who and where are the artists? In *The fieldwork experience: Qualitative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William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145–158.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McCarthy, Thomas.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urgen Haberma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McCartney, James L. (1984). Setting priorities for research: New poli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5:437–455.
- McConaghy, Maureen. (1975). Maximum possible error in Guttman scal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9:343–357.
- McCracken, Grant. (1988). *The long interview*.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cDaniel, Timothy. (1978). Meaning and comparative concepts. *Theory and Society*, 6:93–118.
- McDiarmid, Garnet. (1971). *Teaching prejudice: A content analysis of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uthorized for use in Ontario*. Ontario: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 McFarland, Sam G. (1981). Effects of question order on survey respons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208–215.
- McGrath, Joseph, Joanne Martin, and Richard A. Kulka. (1982). *Judgment calls in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cIver, John P., and Edward G. Carmines. (1981). *Unidimensional scaling*. Beverly Hills, CA: Sage.
- McKee, J. McClendon, and David J. O'Brien. (1988). Question order effect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subjective well be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351–364.
- McKelvie, Stuart J., and Linda A. Schamer. (1988). Effects of night, passengers and sex on driver behavior at stop sign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8:658–690.
- McKeown, Bruce. (1988). *Q method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cLennan, Gregor. (1981). *Marxism and the methodologies of history*. London: Verso.
- McMurtry, John. (1978).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 view*.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cNall, Scott G. (1988). *The road to rebell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Quaire, Donald. (1978). Marx and the method of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431–435.
- McQuaire, Donald. (1979). Reply to Wardell.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431–435.
- Meadows, A. J. (1974). *Communication in science*. Toronto: Butterworths.
- Mehan, Hugh. (1973). Assessing children's language using abilities (with discussion).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Grimshaw, pp. 309–345. New York: Wiley.
- Mehan, Hugh, and Houston Wood. (1975). *The reality of ethnomethodology*. New York: Wiley.
- Melbin, Murray. (1978). Night as fronti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3–22.
- Mendelberg, Tali. (1997). Executing Hortons: Racial crime and the 1988 presidential campaig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134–157.
- Mendenhall, William, Lyman Ott, and Richard L. Scheaffer. (1971). *Elementary survey sampling*. Belmont, CA: Duxbury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67). *On theoretical sociology: Five essays, old and new*. New York: Free Press.
- Merton, Robert K. (1970).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 Merton, Robert K. (1973).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kkelsen, Britha. (1995). *Methods for development work and research: A guide for practition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es, Matthew B., and A. Michael Huberman.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lgram, Stanley. (1963).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71–378.
- Milgram, Stanley. (1965). Some conditions of obedience and disobedience to authority. *Human Relations*, 18:57–76.
- Milgram, Stanley. (1974).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 Miller, Delbert C. (1991). *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 5th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Miller, Gale. (1983). Holding clients accountable: The micro-politics of trouble in a work incentive program. *Social Problems*, 31:139–151.
- Miller, Gale. (1992). Case studie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1, edited by Edgar and Marie Borgatta, pp. 167–172. New York: Macmillan.
- Miller, Mark Crispin. (May/June 1997). How to be stupid. *Extra*. <<http://www.fair.org/extra/9705/ch1-miller.html>> November 2, 1998.

- Miller, Richard. (1987). *Fact and method: Explanation, confirmation and reality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William L. (1983). *The survey method i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Achievements, failures and prospects*. London: Frances Pinter.
- Milligan, John D. (1979). The treatment of historical source. *History and Theory*, 18:177-196.
-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lliot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Alison. (May 17, 1997). Survivors of Tuskegee study get apology from Clinton. *New York Times*.
- Mitchell, J. Clyde. (1984). Case studies.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A guide to general conduct*, edited by R. F. Ellen, pp. 237-241.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Mitchell, Mark, and Janina Jolley. (1988). *Research design explain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Mitchell, Richard G., Jr. (1993). *Secrecy and fieldwor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itroff, Ian. (1974). Norms and counter-norms in a select group of the Apollo moon scientists: A case study of ambivalence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39:579-595.
- Monaghan, Peter. (Apr. 7, 1993a). Facing jail, a sociologist raises question about a scholar's right to protect sourc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10.
- Monaghan, Peter. (May 26, 1993b). Sociologist is jailed for refusing to testify about research subjec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 A10.
- Monaghan, Peter. (Sept. 1, 1993c). Sociologist jailed because he "wouldn't snitch" ponders the way research ought to be don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A8-A9.
- Mooney, Linda, and Robert B. Gramling. (1991). Asking threatening questions and situational framing: The effects of decomposing survey item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2:277-288.
- Moore, Barrington, Jr. (1966). *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 Moore, Joan. (1973). Social constraints on sociological knowledge: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ncerning minorities. *Social Problems*, 21:65-77.
- Moore, Joan, Diego Vigil, and Robert Garcia. (1983). Residence and territoriality in Chicago gangs. *Social Problems*, 31:182-194.
- Morgan, Laurie A. (1998). Glass-ceiling effect or cohort effect?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he gender gap earnings for engineers, 1982-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479-483.
- Morrow, Raymond Allan. (1994). *Critic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orse, Janice M. (1994). Designing funded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220-23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Moser, C. A., and G. Kalton. (1972). *Survey methods in social investig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 Mostyn, Barbara. (1985).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data: A dynamic approach.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edited by M. Brenner, J. Brown, and D. Canter, pp. 115-14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ulford, Matthew, John Orbell, Catherine Shatto, and Jean Stockard. (1998).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opportunity and success in everyday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1565-1592.
- Mulkay, Michael. (1979).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Mullins, Carolyn J. (1977). *A guide to writing and publishing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Wiley.
- Mullins, Nicholas C. (1971). *The art of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use*. New York: Harper & Row.
- Mullins, Nicholas C. (1973). *Theory and theory groups in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 Murdock, George P. (1967). Ethnographic atlas. *Ethnology*, 6:109-236.
- Murdock, George P. (1971). *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 4th ed. New Haven, CT: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 Murphey, Murray G. (1973).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ical past*.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Murray, Shoon. (1992). Turning an elite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to a panel study while protecting anonymity.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6:586-595.
- Myerhoff, Barbara. (1989). So what do you want from us here? In *In the field*, edited by C. Smith and W. Kornblum, pp. 83-90. New York: Praeger.
- Myers, Gloria, and A. V. Margavio. (1983). The black bourgeoisie and reference group change: A content analysis of *Ebony*. *Qualitative Sociology*, 6:291-307.
- Myrdal, Gunnar. (1973). The beam in our eye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 Warwick and S. Oserson, pp. 89-99.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Nadeau, Richard, Richard Miemi, and Jeffrey Levine. (1993). Innumeracy about minority popul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7:332-347.
- Nafziger, E. Wayne. (1988). *Inequality in Africa: Political elites, proletariat, peasants and the po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agin, Daniel S., David P. Farrington, and Terrie E. Moffitt. (1995). Life course trajector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offenders. *Criminology*, 33:111-139.
- Namenwirth, J. Z. (1970). Prestige newspapers and assessment of elite opinions. *Journalism Quarterly*, 47:318-323.
- Narayan, Sowmya, and John A. Krosnick. (1996). Education moderates some response effects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58-88.
- Naroll, Raoul. (1968). Some thoughts on comparative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H. Blalock and A. Blalock, pp. 236-277. New York: McGraw-Hill.
- Nash, Jeffrey E., and David W. McCurdy. (1989). Cultural knowledge and systems of knowing. *Sociological Inquiry*, 59:117-126.
- Neapolitan, Jerry. (1988).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on performance. *Sociological Focus*, 21:223-232.
- Nederhof, Anton J. (1986). Effects of research experiences of respondents. *Quality and Quantity*, 20:277-284.
- Nelkin, Dorothy. (1982a). Forbidden research: Limits on inqui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om L.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163-17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Nelkin, Dorothy. (May 1982b).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 control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Science*, 216: 704-708.
- Neuberg, Leland Gerson. (1988). Distorted transmission: A case study in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research. *Theory and Society*, 17:487-526.
- Neuman, W. Lawrence. (1992). Gender, race and age differences in student definitions of sexual harassment. *Wisconsin Sociologist*, 29:63-75.
- Neuman, W. Russell, Marion R. Just, and Ann N. Crigler. (1992). *Common knowledge: New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mean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elle-Neumann, Elisabeth. (1974). Spiral of silence: A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43-51.
- Noelle-Neumann, Elisabeth. (1984). *The spiral of silence: Public opinion our social sk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Norris, M. (1981).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soft data and some suggested solutions. *Sociology*, 15:337-351.
- Norusis, Marija J. (1986). *The SPSS-X guide to data analysis*. Chicago: SPSS, Inc.
- Novick, Peter. (1988).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wak, Stefan. (1989).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y. In *Cross-national*

- research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 Kohn, pp. 34–56. Newbury Park, CA: Sage.
- Nowotny, Helga, and Hilary Rose, eds. (1979). *Counter-movements in the sciences*. Boston: D. Reidel.
- Nunnally, Jum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 Oakley, Ann. (1981). Interviewing women: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Doing feminist research*, edited by H. Roberts, pp. 30–61. London: Routledge.
- O'Brien, Robert M. (1992). Levels of analysi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107–1112. New York: Macmillan.
- O'Donnell, John M. (1985). *The origins of behaviorism: American psychology, 1870–1920*.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Offe, Claus. (1981). The social sciences: Contract research or social movements?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Social Theory*, 2:31–37.
- Oksenberg, Lois, Lerita Coleman, and Charles F. Cannell. (1986). Interviewers' voices and refusal rates in telephone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97–111.
- Oliker, Stacey J. (1994). Does workfare work? Evaluation research and workfare policy. *Social Problems*, 41:195–211.
- Olsen, Marvin E., and Michael Micklin, eds. (1981). *Handbook of applied sociology*. New York: Praeger.
- Olsen, Virginia. (1994). Feminism and model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158–17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Orbuch, Terri, and Sandra L. Eyster. (1997).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black couples and white couples. *Social Forces*, 76:301–332.
- Orloff, Ann Shola. (1993). *The politics of pens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rita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4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Osgood, C. E., G. Suci, and H. Tannenbaum. (1957). *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Ostrander, Susan. (1984). *Women of the upper cla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Ostrander, Susan. (1993). "Surely you're not in this just to be helpful": Access, rapport and interview in three studies of elit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7–27.
- Ostrom, Thomas M., and Katherine M. Gannon. (1996). Exemplar generation: Assessing how respondents give meaning to rating scale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edited by N. Schwarz and S. Sudman, pp. 293–318.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O'Sullivan, Katherine. (1986). *First world nationalism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Øyen, Else. (1990). The imperfection of comparisons. In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E. Øyen, pp. 1–18. Newbury Park, CA: Sage.
- Paige, Jeffrey M. (1975). *Agrarian revolu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Palmer, C. Eddie. (1978). Dog catchers: A descriptive study. *Qualitative Sociology*, 1:19–104.
- Parcel, Toby L. (1992).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and data archives.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4,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720–1728. New York: Macmillan.
- Peacock, Walter Gillis, Greg A. Hoover, and Charles D. Killian. (1988).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3:838–852.
- Pearsall, Marion. (1970).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as role and method in behavioral research.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340–352. Chicago: Markham.
- Pearson, Michael Ross, and Robyn M. Dawes. (1992). Personal recall and the limits of retrospective questions in survey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65–9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Pepinsky, Harold E. (1980). A sociologist on police control.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223–23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Peterson, Robert A. (1984). Asking the age question: A research no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379–383.
- Pfohl, Stephen. (1990). Welcome to the parasite cafe: Postmodernity as a social problem. *Social Problems*, 37: 421–442.
- Phillips, Bernard. (1985). *Soci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n introduction*. Homewood, IL: Dorsey.
- Phillips, D. C. (1987). *Philosophy, science and social inquiry: Contemporary methodological controversies in social science and related applied fields of research*. New York: Pergamon.
- Phillips, Derek. (1971). *Knowledge from what?* Chicago: Rand McNally.
- Piliavin, Irving M., J. Rodin, and Jane A. Piliavin. (1969). Good samaritanism: An underground phenomen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289–299.
- Plath, David W. (1990). Field notes, filed notes and the conferring of note. In *Field 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 Sanjek, pp. 371–38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Platt, Jennifer. (1981). Evidence and proof in documentary research. *Sociological Review*, 29:31–66.
- Poe, Gail S., et al. (1988). "Don't know" boxes in factual questions in a mail questionnaire: Effects on level and quality of respon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212–222.
- Pollner, Melvin, and Richard Adams. (1997). The effect of spouse presence on appraisals of emotional support and household strai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615–626.
- Polsky, Ned. (1967). *Hustlers, beats and others*. Chicago: Aldine.
- Popper, Karl. (1959/1934).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Porter, Theodore M. (1995). *Trust in numbers: The pursuit of objectivity in science and the public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ottick, Kathleen, and Paul Lerman. (1991). Maximizing survey response rates for hard-to-reach inner-city population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2:172–180.
- Prechel, Harland. (1990). Steel and the state: Industry politics and business policy formation, 1940–1989.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648–668.
- Presser, Stanley. (1984). Is inaccuracy on factual survey items item-specific or respondent-specific?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344–355.
- Presser, Stanley. (1990). Measurement issu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Social Forces*, 68:856–868.
- Presser, Stanley, Johnny Blair, and Timothy Triplett. (1992). Survey sponsorship, response rates and response effect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3: 699–702.
- Prewitt, Kenneth. (1983). Management of survey organizations. In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123–143.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Price, Vincent. (1989).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Effects of communicating group conflic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3: 197–224.
- Prucha, Francis Paul. (1987). *Handbook for research in American history: A guide to bibliographies and other reference works*.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Prus, Robert C., and Steve Vassilakopoulos. (1979). Desk clerks and hookers. *Urban Life*, 8:52–71.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0).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inquiry*. New York: Wiley.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73). Equivalence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 Warwick and S. Osherson, pp. 119–137.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Punch, Maurice. (1986).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fieldwork*.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usey, Michael. (1987). *Jügen Habermas*. New York: Tavistock.

- Pyke, Sandra W., and Neil McK. Agnew. (1991). *The science game*,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Quadagno, Jill S. (1984). Welfare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632-648.
- Quadagno, Jill S. (1988).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age secur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Quarles, Susan D., ed. (1986). *Guide to federal fund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Rabinow, Paul, and William M. Sullivan. (1979). The interpretative turn: Emergence of an approach.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pp. 1-2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agin, Charles. (1989).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ross-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 Kohn, pp. 57-76. Newbury Park, CA: Sage.
- Ragin, Charles C. (1992a). Introduction: Cases of "what is a case?"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 Ragin and H. Becker, pp. 1-1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92b). Casing and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quiry.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 Ragin and H. Becker, pp. 217-226.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94). *Constructing social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Ragin, Charles C., and David Zaret. (1983). Theory and method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Social Forces*, 61:731-754.
- Rathje, W. L., and W. W. Hughes. (1976). The garbage project as nonreactive approach: Garbage in-garbage out. In *Perspective on attitude assessment: Surveys and their alternatives*, edited by H. W. Sinaiko and L. A. Broeding. Champaign, IL: Pendleton Publications.
- Rathje, William, and Cullen Murphy. (1992). *Rubbish: The archaeology of garbage*. New York: Vintage.
- Ravo, Nick. (Oct. 14, 1996). Index of Social Well-Being is at the lowest in 25 years. *New York Times*.
- Reason, Peter. (1994). Three approaches to participative inquiry.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324-339.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eese, Stephen, W. Danielson, P. Shoemaker, T. Chang, and H. Hsu. (1986). Ethnicity of interview effects among Mexican Americans and Anglo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0:563-572.
- Reingold, Beth, and Richard Wike. (1998). Confederate symbols, southern identity, and racial attitudes: The case of the Georgia state flag.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9:568-580.
- Reinharz, Shulamit. (1979). *On becoming a social scientist*.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einharz, Shulamit.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iss, Albert J., Jr. (1992). Training incapacities of sociologists. In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s: The forms and fates of disciplinary organization*, edited by T. Halliday and M. Janowitz, pp. 297-31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eskin, Barbara. (1977).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and the reward structure of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2:491-504.
- Reynolds, Paul Davidson.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Reynolds, Paul Davidson. (1979). *Ethical dilemma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eynolds, Paul Davidson. (1982). *Ethic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ichards, Thomas J., and Lyn Richards. (1994). Using computer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445-46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Ricoeur, Paul. (1970). The model of the text: Meaningful action considered as a text.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pp. 73-10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tzer, George. (1975). *Sociology: A multi-paradigm sci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Roadburg, Alan. (1980). Breaking relationships with field subjects: Some problems and suggestions.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iq,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281-29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berts, Carl W. (1989). Other than counting words: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Social Forces*, 68:147-177.
- Robertson, John A. (1982). The social scientist's right to research and the IRB system.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L.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356-372.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John P., Jerrold G. Rusk, and Kendra B. Head. (1972). *Measures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nn Arbor: Center for Political Studies,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Robinson, John P., and Philip R. Shaver. (1969). *Measures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Ann Arbor: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Roderick, Rick. (1986). *Habermas and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oethlisberger, F. J., and W. J. Dickenson. (1939).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ose, Gerry. (1982). *Deciphering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sen, Lawrence. (1995). The creation of the Uniform Crime Report: The role of soci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9:215-238.
- Rosenau, Pauline Marie.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enberg, Morris. (1968). *The logic of survey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senthal, Robert. (1984). *Meta-analytic procedures for social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snow, Ralph L. (1981). *Paradigms in transitio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s, Dorothy. (1991).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i, Peter H., ed. (1982).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ossi, Peter H., and Howard E. Freeman. (1985). *Evaluation: A systematic approach*, 3rd ed. Beverly Hills, CA: Sage.
- Rossi, Peter H., James D. Wright, and Andy Anderson. (1983). Sample surveys: History, curren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1-20.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Rossi, Peter H., James D. Wright, and Eleanor Weber-Burdin. (1982). *Natural hazards and public choic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Rossi, Robert J., and Kevin J. Gilmartin. (1980). *The handbook of social indicators: Sources,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is*. New York: Garland STPM Press.
- Roth, Guenther,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1979). *Max Weber's vision of history: Ethics and metho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y, Donald. (1970). The study of southern labor union organizing campaigns. In *Pathways to data*, edited by R. W. Habenstein, pp. 216-244. Chicago: Aldine.
- Roy, William G. (1983). The unfolding of the interlocking directorate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48-257.
- Roy, William G. (1984). Class conflict and social chang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0:483-506.

- Rubin, Herbert J. (1983).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Columbus, OH: Charles E. Merrill.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ule, James. (1978a). *Insight and social betterment: A preface to applied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ule, James. (1978b). Models of relevance: The social effects of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78-98.
- Runciman, W. G. (1980). Comparative sociology or narrative histor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1:162-178.
- Runyon, Richard P., and Audry Haber. (1980). *Fundamentals of behavioral statis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yan, Mary. (1989). The American parade.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 Hunt, pp. 131-15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yder, Norman B. (1992). Cohort analysi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1,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27-231. New York: Macmillan.
- Sabia, Daniel R., Jr., and Jerald T. Wallulis. (1983). *Changing social science: Changing theory and other critical perspectiv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 Sagarin, Edward. (1973). The research setting and the right not to be researched. *Social Problems*, 21:52-64.
- Sanchez, Maria Elena. (1992). Effects of questionnaire design on the quality of survey dat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6:206-217.
- Sanday, Peggy Reeves. (1983). The ethnographic paradigm(s).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J. Van Maanen, pp. 19-36.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anjek, Roger. (1978). A network method and its uses in urban anthropology. *Human Organization*, 37:257-268.
- Sanjek, Roger. (1990). On ethnographic validity. In *Field notes: The makings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R. Sanjek, pp. 385-41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axe, Leonard, and Michelle Fine. (1981). *Social experiments: Methods for design and evalu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ayer, Andrew. (1992).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A realist approach*, 2nd ed. New York: Routledge.
- Schaefer, David, and Don A. Dillman. (1998).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 e-mail methodolog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378-397.
- Schaffer, Nora Cate. (1980). Evaluating race-of-interviewer effects in a national survey.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8:400-419.
- Schatzman, Leonard, and Anselm L. Strauss. (1973). *Field research: Strategies for a natural soci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cheibe, Karl E. (1988). Metamorphosis in the psychologist's advantage.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53-71.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cheuch, Erwin K. (1990).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Towards causal explanations. In *Compar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E. Øyen, pp. 19-37. Newbury Park, CA: Sage.
- Schiffman, Josepha. (1991). Fight the power: Two groups mobilize for peace. In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edited by M. Burawoy et al., pp. 58-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meling, Sharon L., and Mike Miller. (Aug. 11, 1988). Whistleblower wins suit against UW. *Capital Times* (Madison, Wisconsin).
- Schmitt, Eric. (June 27, 1997). Army criticized on survey on harassment. *The New York Times*.
- Schneider, Mark A. (1987). Culture-as-text in the work of Clifford Geertz. *Theory and Society*, 16:809-883.
- Schober, Michael, and Frederick G. Conrad. (1997). Does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ing reduce survey measurement erro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1:576-602.
- Schrager, Laura, and James Short. (1980). How serious a crim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and common crimes. In *White collar crime*, edited by G. Geis and E. Stotland, pp. 14-31.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chrecker, Ellen. (1986). *No ivory tower: McCarthysm and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essler, Karl. (1982). *Measuring social life feeling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chuman, Howard, and Lawrence Bobo. (1988). Survey-based experiments on white racial attitudes towards racial integr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273-299.
- Schuman, Howard, and Jean M. Converse. (1971). Effects of black and white interviewers on black response in 1968.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5:44-68.
- Schuman, Howard,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74). Questions about attitude survey question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73-1974*, edited by H. Costner, pp. 232-25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chuman, Howard, and Jacob Ludwig. (1983). The norm of even-handedness in surveys as in lif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112-120.
- Schuman, Howard, and Stanley Presser. (1977). Question wording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in survey analysi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6:151-170.
- Schuman, Howard, and Stanley Presser. (1979). The open and closed ques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4:692-712.
- Schuman, Howard, and Stanley Presser. (198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attitude surveys: Experiments on question form, wording and content*.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wandt, Thomas A. (1994).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118-13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wandt, Thomas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wartz, David.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wartz, Dona. (1986). Camera clubs and fine art photograph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n elite code. *Urban Life*, 15:165-196.
- Schwartz, Howard, and Jerry Jacobs. (1979). *Qualitative sociology: A method to the madness*.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wartz, Morris, and Charlotte Green Schwartz. (1969). Problems in field observation. In *Issues in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edited by G. J. McCall and J. L. Simmons, pp. 89-10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Schwartz, Norbert, and Hans-J. Hippler. (1995). Subsequent questions may influence answers to preceding questions in mail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93-97.
- Schwarz, Norbert, Bäurzel Knäuper, Hans-J. Hippler, Elizabeth Noelle-Neumann, and Leslie Clark. (1991). Rating scales: Numeric values may change the meaning of scale label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570-582.
- Schwendinger, H., and J. Schwendinger. (1974). *Sociologists of the chair*.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ott, William A. (1968). Attitude measurement.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204-273.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Seeman, Melvin, and Carolyn S. Anderson. (1983). Alienation and alcohol: The role of work, mastery and community in drinking behavio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0-77.
- Seider, Maynard S. (1974). American big business ideology: A content analysis of executive speech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802-815.
- Sellin, Thorsten, and Marvin E. Wolfgang. (1964). *The measurement of delinquency*. New York: Wiley.
- Selvin, Hanan C., and Everett K. Wilson. (1984). On sharpening sociologists'

- pros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5:205–223.
- Sepstrup, P. (1981).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s in content analysis. In *Advances in content analysis*, edited by K. Rosengren, pp. 133–15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ewell, William H., Jr. (1980). *Work and revolution in Fr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ewell, William H., Jr. (1987). Theory of action, dialectic, and history: Comment on Cole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166–171.
- Seybold, Peter. (1987).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America*, edited by M. Schwartz, pp. 185–198.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 Shafer, Robert Jones. (1980). *A guide to historical method*, 3rd ed. Homewood, IL: Dorsey.
- Shaffir, William B., Robert A. Stebbins, and Allan Turowetz. (1980). Introduction.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3–2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haron, Batia. (1979). Artist-run galleries: A contemporar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visual art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3–28.
- Shattuck, John, and Muriel Morisey Spence. (1988). *Government information controls: Implications for scholarshi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hington, DC: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 Shavit, Yossi. (1990). Segregation, tracking, and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inorities: Arabs and oriental Jews in Isra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115–126.
- Shaw, C. (1930). *The jack roll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heatsley, Paul B. (1983). Questionnaire construction and item writing. In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195–230.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Shihadeh, Edward S., and Graham Ousey. (1998).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violence: The link between entry-level jobs, economic deprivation, and black and white homicide. *Social Forces*, 77:185–206.
- Shively, JoEllen. (1992). Cowboys and Indians: Perceptions of western films among American Indians and Anglo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725–734.
- Shupe, Anston D., Jr., and David G. Bromley. (1980). Walking a tightrope: Dilemmas of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 of groups in conflict. *Qualitative Sociology*, 2:3–21.
- Sieber, Joan, ed. (1982). *The ethics of social research: Fieldwork, regulation, and publica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Sieber, Joan E. (1992). *Planning ethically responsible research: A guide for students and internal review boar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ieber, Joan E. (1993).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sensitive research. In *Research on sensitive topics*, edited by C. Renzetti and R. Lee, pp. 14–26.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ieber, Sam D. (1973). The integration of fieldwork and survey method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35–1359.
- Sigelman, Lee. (1982). The uncooperative interviewee. *Quality and Quantity*, 16:345–353.
- Silva, Edward T., and Sheila Slaughter. (1980). Prometheus bound: Limits of social science professionaliz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9:781–819.
- Silverman, David. (1972). Some neglected questions about social reality. In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P. Filmer et 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ilverman, David. (1993). *Interpreting qualitative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inger, Benjamin D. (1989). The criterial crisis of the academic world. *Sociological Inquiry*, 59:127–143.
- Singer, Eleanor. (1978). Informed consent: Consequences for response rate and response quality in social surve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144–162.
- Singer, Eleanor. (1988). Surveys in the mass media. In *Surveying social life: Papers in honor of Herbert H. Hyman*, edited by H. O'Gorman, pp. 413–436.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Singer, Eleanor, and Martin R. Frankel. (1982).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s in telephone interview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416–426.
- Singer, Eleanor, and Luane Kohnke-Aguirre. (1979). Interviewer expectation effects: A replication and extens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245–260.
- Singer, Eleanor, John Van Hoewyk, and Mary Maher. (1998). Does the payment of incentives create expectation effec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152–164.
- Singer, Eleanor, Dawn R. Von Thurn, and Ester R. Miller. (1995). Confidentiality assurances and response: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66–77.
- Singleton, Royce, Jr., B. Straits, Margaret Straits, and Ronald McAllister. (1988). *Approaches to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nha, Anita. (1979). Control in craft work: The case of production pott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2:3–25.
- Sitton, Thad, G. Mehaffy, and O. L. Davis, Jr. (1983). *Oral histo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Siu, Paul C. P. (1987).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edited by 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Skidmore, William. (1979). *Theoretical thinking in sociology*, 2nd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lar, Kathryn Kish. (1991). Hull House maps and papers: Social science as women's work in the 1890s.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111–14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4). Emerging agendas and recurrent strategie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edited by T. Skocpol, pp. 356–39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88). The “uppity generation”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macroscopic sociology: Reflections at mid-career of a woman from the sixties. *Theory and Society*, 17:627–644.
- Skocpol, Theda, and Margaret Somers. (1980).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2:174–197.
- Slater, Phil. (1977).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mart, Barry. (1976). *Soc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Marxian analysis: A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science of society*.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melser, Neil J. (1959). *Social change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melser, Neil J. (1976). *Comparative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mith, Christopher. (1995). Asian New York: The geography and politics of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9:59–84.
- Smith, Dennis. (1991). *The ris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George W., and Dorothy E. Smith. (1998). The ideology of “fag”: The high school experience of gay student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289–308.
- Smith, James Allen. (1991).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Free Press.
- Smith, Louis M. (1994). Biographical method.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286–30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mith, Mary Lee, and Gene V. Glass. (1987).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mith, Robert B. (1987). Link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Part I: Understanding and explanation. *Quantity and Quality*, 21:291-311.
- Smith, Robert B. (1988). Link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Part II: Surveys as formalizations. *Quantity and Quality*, 22:3-30.
- Smith, Tom W. (1984). The subjectivity of ethnicity.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117-128.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mith, Tom W. (1987). That which we call welfar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sweeter: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question wording on response patter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75-83.
- Smith, Tom W. (1989). Random probes of GSS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305-325.
- Smith, Tom W. (1995). Trends in non-response r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7:156-171.
- Sniderman, Paul M., and Michael Gray Hagen. (1985). *Race and inequality: A study in American values*.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 Snow, David A., Susan G. Baker, Leon Anderson, and Michael Martin. (1986b). The myth of pervasive mental illness among the homeless. *Social Problems*, 33:407-423.
- Snow, David A., E. Burke Bochford, Jr., Steven K. Worden,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6a).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64-481.
- Sobal, Jeffery. (1984). The content of survey introductions and the provision of informed cons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8:788-793.
- Sociology Writing Group, UCLA. (1991). *A guide to writing sociology papers*, 2n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Sohn-Rethel, Alfred. (1978).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Sonquist, J. A., and C. Dunkelberg. (1977). *Survey and opinion research: Procedures for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South, Scott, and Kim Lloyd. (1995). Spousal alternative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126-140.
- Spector, Paul E. (1981). *Research design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pector, Paul E. (1992). *Summated rating scale construc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 Spencer, Gary. (1982).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study of bureaucratic elites: A case study of West Point.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23-30.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Spillers, Cindy S. (1982). An investigation of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s physically disabled peers. *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7:55-69.
- Spradley, James P. (1970). *You owe yourself a drunk*. Boston: Little, Brown.
- Spradley, James P. (1979a). *The ethnographic interview*.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pradley, James P. (1979b).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pradley, James P., and B. J. Mann. (1975). *The cocktail waitress*. New York: Wiley.
- Sprague, Joey, and Mary K. Zimmerman. (1989). Quality and quantity: Reconstructing feminist method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20:71-86.
- Stack, Carol. (1989). Doing research in the flats. In *In the field*, edited by C. Smith and W. Kornblum, pp. 21-26. New York: Praeger.
- Stack, Steven. (1987). Celebrities and suicide: A taxonomy and analysis, 1948-1983.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401-412.
- Staggenborg, Susan. (1988). "Hired hand research" revised. *American Sociologist*, 19:260-269.
- Stake, Robert E. (1994). Case studies.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236-247.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aples, William G. (1987). Technology, control, and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work at a British hardware firm, 1791-1891.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62-88.
- Starr, Paul. (1982).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New York: Basic Books.
- Starr, Paul. (1987). The sociology of official statistics. In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edited by W. Alonso and P. Starr, pp. 7-58.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tarr, Paul, and Ross Corson. (1987). Who will have the numbers? The rise of the statistical services industry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 data. In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edited by W. Alonso and P. Starr, pp. 415-44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tech, Charlotte G. (1981). Trends in non-response rates, 1952-1979.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40-57.
- Stempel, G., III. (1971). Visibility of blacks in news and news-picture magazines. *Journalism Quarterly*, 48:337-339.
- Stephens, John. (1989).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breakdow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39: A test of the Moore the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1019-1077.
- Stephens, Mary Ann Parris, N. S. Cooper, and J. M. Kinney. (1985). The effects of effort on helping the physically disabled.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5:495-503.
- Stephenson, Richard M. (1978). The CIA and the professor: A personal account. *American Sociologist*, 13:128-133.
- Stern, Paul C. (1979). *Evaluat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tevens, Carla, and Dial, Micah (Eds.). (1994). Preventing the misuse of evaluation. *New Directions for Program Evaluation*, 6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tevenson, Richard W. (Oct. 16, 1996). U.S. to revise its estimate of layoffs. *New York Times*.
- Stewart, David W. (1984). *Secondary research: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method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tewart, Donald E. (1983). *The television family*. Melbourne: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 Stimson, Gerry B. (1986). Place and space in sociological fieldwork.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34:641-656.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68).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73). Theoretical domains and measurement, Part I. *Acta Sociologica*, 16:3-12.
- Stinchcombe, Arthur L. (1978). *Theoretical methods in social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toeker, Randy. (1993). The federated frontstage structure and localized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eder-Riverside neighborhood movemen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4:169-184.
- Stoianovich, Traian. (1976).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John. (1985). *Ra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one, Lawrence. (1987). *The past and present revisited*.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Stone, Philip, et al. (1966). *The general inquirer: A computer approach to content analysi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Stone, Philip J., and Robert P. Weber. (1992). Content analysi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1,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290-295. New York: Macmillan.
- Stoner, Norman W. (1966). *The social system of scien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trauss, Anselm. (1987). *Qualitative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1990).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Grounded theory procedures and techniques*. Newbury Park, CA: Sage.

- Strauss, Anselm, and Juliet Corbin. (1994). Grounding theory methodology: An overview.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273–28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uchman, Luch, and Brigitte Jordan. (1992). Validity and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face-to-face surveys. In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edited by J. Turner, pp. 241–267.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Sudholm, Charles A. (1973). The pornographic arcade: Ethnographic notes on moral men in immoral places. *Urban Life*, 2:85–104.
- Sudman, Seymour. (1976a). *Applied sampling*.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udman, Seymour. (1976b). Sample survey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107–120.
- Sudman, Seymour. (1983). Applied sampling. In *Handbook of survey research*, edited by P. Rossi, J. Wright, and A. Anderson, pp. 145–194.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 Sudman, Seymour, and Norman M. Bradburn. (1983). *Asking ques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udman, Seymour, and Norman M. Bradburn. (1987). The organizational growth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S67–S78.
- Sudman, Seymour, Norman M. Bradburn, and Norbert Schwarz. (1996). *Thinking about answers: The application of cognitive processes to survey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udnow, David. (1978). *Ways of the hand: The organization of improvised condu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ullivan, John L., and Stanley Feldman. (1979). *Multiple indicators: An introduc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 Suls, Jerry M., and Ralph L. Rosnow. (1988). Concerns about artifacts in psychology experiments. In *The rise of experimentation in American psychology*, edited by J. Morawski, pp. 153–18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umner, Colin. (1979). *Reading ideolog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uppe, Frederick, ed. (1977).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rvey Research Center,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1976). *Interviewer's manual*, rev. e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Sutton, John R. (199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dness: The expansion of the asylum in progressive Americ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665–678.
- Swafford, Michael. (Nov. 1987). Soviet, U.S. sociologists work togeth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Footnotes*, 15:9.
- Swanborn, Peter G. (1996). A common base for quality control criteria i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y and Quantity*, 30:19–35.
- Swanson, Guy E. (1971). Framework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I. Vallier, pp. 141–2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286.
- Tagg, Stephen K. (1985). Life story interview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In *The research interview: Uses and approaches*, edited by M. Brenner, J. Brown, and D. Canter, pp. 163–19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anur, Judith H., ed. (1992).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s: Inquiries into the cognitive bases of survey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Tanur, Judith M. (1983). Methods for large scale surveys and experiments. In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1983–1984*, edited by S. Leinhardt, pp. 1–71.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Tashakkori, Abbas, and Charles Teddlie. (1998). *Mixed methodology: Combin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aylor, Charles. (1979).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In *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 A reader*, edited by P. Rabinow and W. Sullivan, pp. 25–7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aylor, Charles Lewis, ed. (1980). *Indicator systems fo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nalysis*. Cambridge, MA: Oelgeschlager, Gunn and Hain.
- Taylor, Charles L., and David Jodice. (1983).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3rd 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Charles R., and Barbara B. Stern. (1997). Asian Americans: Television advertising and the “model minority” stereotype.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6:47–62.
- Taylor, Steven. (1987). Observing abuse: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personal morality in field research.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288–302.
- Terkel, Studs. (1970). *Hard times*. New York: Pantheon.
- Thomas, Robert J. (1993). Interviewing important people in big compan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80–96.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 38:56–97.
- Thompson, E. P. (1978). *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Thompson, Paul. (1978).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orne, Barrie, and Zella Luria. (1986). Sexuality and gender in children's daily world. *Social Problems*, 33:176–190.
- Thrasher, F. M. (1927). *The ga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hurstone, L. L. (1970). Attitudes can be measured. In *Attitude measurement*, edited by G. Summers, pp. 127–141. Chicago: Rand McNally.
- Tickamyer, Ann R. (1981). Wealth and power: A comparison of men and women in the property elite. *Social Forces*, 60:463–481.
- Tilly, Charles. (1964). *The vende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81). *As sociology meets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Tilly, Charles, Louise Tilly, and Richard Tilly. (1975). *The rebellious century, 1830–193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olnay, Stewart E., and E. M. Beck. (1992). Racial violence and black migration in the American South, 1910–193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103–117.
- Topolski, Jerzy. (1976). *Methodology of history*, trans. Olgierd Wojtasiewicz. Boston: D. Reidel.
- Toulmin, Stephen. (1953).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Tourangeau, Roger, and Tom Smith. (1996). Asking sensitive questions: The impact of data collection mode, question format and question contex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275–304.
- Traugott, Michael W. (1987). The importance of persistence in respondent selection for preselection survey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1:48–57.
- Treiman, Michael. (1977). Towards methods for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sociology: A reply to Burawo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1042–1056.
- Trice, H. M. (1970). The “outsider's” role in field study.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W. J. Filstead, pp. 77–82. Chicago: Markham.
- Tropp, Richard A. (1982). A regulatory perspective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391–41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Trovato, Frank. (1998). The Stanley cup of hockey and suicide in Quebec, 1951–1992. *Social Forces*, 77:105–126.
- Tuchman, Gaye. (1994).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es, methods and meanings.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N. Denzin and Y. Lincoln, pp. 306–32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Tucker, Clyde. (1983). Interviewer effects in telephone interview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84–95.

- Tufte, Edward. (1983).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Cheshire, CT: Graphics Press.
- Tufte, Edward. (1991). *Envisioning information*, rev. ed. Cheshire, CT: Graphics Press.
- Tuma, Nancy B., and Andrew Grimes. (1981). A comparison of models of role orientations of professionals in a research oriented univers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1:187-206.
- Turner, Charles. (1984). Why do surveys disagree? Some preliminary hypotheses and some disagreeable examples. In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2, edited by C. Turner and E. Martin, pp. 157-214.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Turner, Charles, and Elizabeth Martin, eds. (1984). *Surveying subjective phenomena*, Vol. 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Turner, Jonathan H. (1985). In defense of positivism. *Sociological Theory*, 3:24-30.
- Turner, Jonathan H. (1992). Positivism. In *Encyclopedia of sociology*, Vol. 3, edited by E. and M. Borgatta, pp. 1509-1512. New York: Macmillan.
- Turner, Roy. (1974). *Ethnomethodology*. Middlesex: Penguin.
- Turner, Stephen P. (1980).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as transl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Stephen P. (1991). The world of academic quantifiers: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family and its connections.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269-2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rner, Stephen Park, and Jonathan H. Turner. (1991). *The impossible science: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 Newbury Park, CA: Sage.
- Umberson, Debra, and Meichu D. Chen. (1994). Effects of a parent's death on adult children: Relationship salience and reaction to lo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152-168.
- Useem, Michael. (1976a). Governme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Sociological Quarterly*, 17:146-161.
- Useem, Michael. (1976b). State production of social knowledge: Patterns of government financing of academic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1:613-629.
- Useem, Michael. (1984). *The inner circle: Large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business political activity in the U.S. and the U. 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lentine-French, Suzanne, and H. Lorraine Radtke. (1989). Attributions of responsibility for an incident of sexual harassment in a university setting. *Sex Roles*, 21:545-555.
- Vallier, Ivan, ed. (1971a).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ssays on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llier, Ivan. (1971b). Empirical comparisons of social structure.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I. Vallier, pp. 203-26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den Berg, Harry, and Cees Van der Veer. (1985). Measuring ideological frames of references. *Quality and Quantity*, 19:105-118.
- Van den Berge, Pierre L. (1967). Research in South Africa: The story of my experiences with tyranny. In *Ethics, politics and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G. Sjøberg. New York: Schenckman.
- Van Maanen, John. (1973). Observations on the making of policemen. *Human Organization*, 32:407-418.
- Van Maanen, John. (1982). Fieldwork on the beat. In *Varieti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edited by J. Van Maanen, J. Dabbs, Jr., and R. Faulkner, pp. 103-151. Beverly Hills, CA: Sage.
- Van Maanen, John. (1983a). Epilogue: Qualitative methods reclaimed. In *Qualitative methodology*, edited by J. Van Maanen, pp. 247-26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Van Maanen, John. (1983b). The moral fix: On the ethics of fieldwork. In *Contemporary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M. Emerson, pp. 269-287. Boston: Little, Brown.
- Van Maanen, John. (1988). *Tales of the field: On writing ethn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aughan, Diane. (1992). Theory elaboration: The heuristics of case analysis.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 Ragin and H. Becker, pp. 173-2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ughan, Ted R. (1967).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social research: Politic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e Wichita jury recordings. In *Ethics, politics and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G. Sjøberg. New York: Schenckman.
- Veltmeyer, Henry. (1978). Marx's two methods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Sociological Inquiry*, 48:101-112.
- Verba, Sidney. (1971). Cross-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I. Vallier, pp. 309-35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erba, Sidney, and Gary R. Orren. (1985). *Equality in America: The view from the top*.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Vidich, Arthur Joseph, and Joseph Bensman. (1968). *Small town in mass society*, rev. e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de, Nicholas. (1976). IQ and heredity: Suspicion of fraud beclouds classic experiment. *Science*, 194: 916-919.
- Waegel, William B. (1984). How police justify the use of deadly force. *Social Problems*, 32:133-143.
- Waksberg, J. (1978). Sampling methods for random digit dial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73:40-46.
- Wallace, Walter. (1971). *The logic of science in sociology*. Chicago: Aldine.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lsh, David. (1972). Varieties of positivism. In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P. Filmer et 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alster, Elaine. (1965). The effect of self-esteem on romantic lik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194-197.
- Walters, Ronald G. (1980). Signs of the times. *Social Research*, 47:537-556.
- Walton, John. (1973). Standardized case comparison. In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edited by M. Armer and A. Grimshaw, pp. 173-191. New York: Wiley.
- Walton, John. (1992a). *Western times and water wars: State, culture and rebellion in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lton, John. (1992b). Making the theoretical case. In *What is a case? Explo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inquiry*, edited by C. Ragin and H. Becker, pp. 121-13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rd, Benjamin. (1972). *What's wrong with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rd, Kathryn B., and Linda Grant. (1985). The feminist critique and a decade of published research in sociology journal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6:139-158.
- Wardell, Mark L. (1979). Marx and his method: A commentar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425-436.
- Warner, R. Stephen. (1971). The methodology of Marx'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des of production. In *Comparative method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I. Vallier, pp. 49-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arren, Carol A. B., and Paul K. Rasmussen. (1977). Sex and gender in field research. *Urban Life*, 6:349-369.
- Warwick, Donald P. (1982). Types of harm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edited by T. Beauchamp, R. Faden, R. J. Wallace, and L. Walters, pp. 101-123.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Warwick, Donald P., and Charles A. Lininger. (1975). *The sample surve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McGraw-Hill.
- Warwick, Donald P., and Samuel Oshererson. (1973).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omparative re-*

- 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D. Warwick and S. Osherson, pp. 3–11.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atters, John K., and Patrick Biernacki. (1989). Targeted sampling: Options for the study of hidden popu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6:416–430.
- Wax, Rosalie H. (1971). *Doing fieldwork: Warnings and adv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ax, Rosalie H. (1979). Gender and age in fieldwork and fieldwork education: No good thing is done by any man alone. *Social Problems*, 26:509–522.
- Webb, Eugene J., Donald T. Campbell, Richard D. Schwartz, Lee Sechrest, and Janet Belew Grove. (1981). *Nonreactive measur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Weber, Max.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ans. and edited by E. Shils and H. Finch. New York: Free Press.
- Weber, Max. (1974). Subjectivity and determinism. In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dited by A. Giddens, pp. 23–32. London: Heinemann.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1, edited by G. Roth and C.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ber, Max. (1981). Some categories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2:151–180.
- Weber, Robert P. (1983). Measurement models for content analysis. *Quality and Quantity*, 17:127–149.
- Weber, Robert P. (1984). Computer assisted content analysis: A short primer. *Qualitative Sociology*, 7:126–149.
- Weber, Robert P. (1985). *Basic content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Weeks, M. F., and R. P. Moore. (1981). Ethnicity of interviewer effects on ethnic respond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5:245–249.
- Weil, Frederick D. (1985). The variabl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liberal attitud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458–474.
- Weinstein, Deena. (1979). Fraud in scienc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9:639–652.
- Weiss, Carol H. (1972). *Evaluation research: Methods of assessing program effectivenes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Weiss, Janet A., and Judith E. Gruber. (1987). The managed irrelevance of educational statistics. In *The politics of numbers*, edited by W. Alonso and P. Starr, pp. 363–391.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Weiss, Robert S. (1994). *Learning from strangers: The arts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Weitz, Rose, and Deborah A. Sullivan. (1986). The politics of childbirth: The re-emergence of midwifery in Arizona. *Social Problems*, 33:163–175.
- Weitzman, Eben, and Matthew Miles. (1995). *Comput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eitzman, Lenore, D. Eifler, E. Hokada, and C. Ross. (1972). Sex role socialization in picture books for pre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7:1125–1150.
- Welch, Michael, and Melissa Fenwick. (1997). Primary definitions of crime and moral panic: A content analysis of expert's quotes in feature stori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rime and Delinquency*, 34:474–495.
- Wenger, G. Clare, ed. (1987). *The research relationship: Practice and politics i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Boston: Allen and Unwin.
- Wentworth, Ellen J. (1993). *Survey responses: An evaluation of their validit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erner, Oswald, and G. Mark Schoepfle. (1987a). *Systematic fieldwork, Vol. 1: Foundations of ethnography and interviewing*. Beverly Hills: Sage.
- Werner, Oswald, and G. Mark Schoepfle. (1987b). *Systematic fieldwork, Vol. 2: Ethnographic analysis and data management*. Beverly Hills: Sage.
- West, W. Gordon. (1980). Access to adolescent deviants and deviance. In *Fieldwork experience*, edited by W. B. Shaffir, R. A. Stebbins, and A. Turowetz, pp. 31–4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Whalley, Peter. (1984). Deskillng engineers? The labor process, labor markets, and labor segmentation. *Social Problems*, 32:117–132.
- Wharton, Carol S. (1987). Establishing shelters for battered women. *Qualitative Sociology*, 10:146–163.
- Whiting, John W. M. (1968). Methods and problems i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edited by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pp. 693–728.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Whyte, William Foote. (1955). *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hyte, William Foote. (1982). Interviewing in field research. In *Field research*, edited by R. G. Burgess, pp. 111–122. Bost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 Whyte, William Foote. (1984). *Learning from the field: A guide from experience*. Beverly Hills: Sage.
- Whyte, William Foote. (1986). On the use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555–563.
- Whyte, William F. (1989). Advanc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through participatory action research. *Sociological Forum*, 4:367–385.
- Wieder, D. Lawrence. (1977). Ethnomethodology and ethnosociology. *Mid-American Review of Sociology*, 2:1–18.
- Wigginton, Eliot, ed. (1972). *Foxfire book*. New York: Doubleday.
- Wilcox, Clyde, Lee Sigelman, and Elizabeth Cook. (1989). Some like it ho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group feeling thermometer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3:246–257.
- Wilhelm, Brenda. (1998). Changes in cohabitation across cohort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activism. *Social Forces*, 77:289–310.
- Williams, Bill. (1978). *A sampler on sampling*. New York: Wiley.
- Williams, Carol I., and Gary K. Wolfe. (1979). *Elements of research: A guide for writers*. Palo Alto, CA: Mayfield.
- Williamson, John B., David Karp, John Dalphin, and Paul Gray. (1982). *The research craft: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Boston: Little, Brown.
- Willimack, Diane K., Howard Schuman, Beth-Ellen Pennell, and James M. Lepkowski. (1995). Effects of prepaid non-monetary incentives on response rates and response quality in face-to-face surve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9:78–92.
- Willis, Paul.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ohn. (1982). Realist philosophy as a foundation for Marx's social theory.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Theory*, 3:243–263.
- Wilson, Julius W. (1978).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ilson, Thomas P. (1970). Normative and interpretative paradigms in sociology. In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To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edited by J. Douglas, pp. 57–79. New York: Aldine.
- Wilson, Timothy, Suzzane J. LaFleur, and D. Eric Anderson. (1996). The validity and consequence of verbal reports about attitudes. In *Answering questions*, edited by N. Schwarz and S. Sudman, pp. 91–114.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Wimberly, Dale W. (1990). Investment dependence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third world mortality: A cross-nationa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5:75–91.
- Winkler, Karen J. (Jan. 11, 1989). Dispute over validity of historical approaches pits traditionalists against advocates of new method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pp. A4ff.
- Winston, Chester. (1974). *Theory and measurement in sociology*. New York: Wiley.
- Wolcott, Harry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Wolf, Eric R.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odrum, Eric. (1984). "Mainstreaming" content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ical advantages, obstacles, and solu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3:1-19.
- Wright, Debra L., William S. Aquilino, and Andrew J. Supple. (1998). A comparison of computer-assisted and paper-and-pencil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 in a survey on smoking, alcohol and drug us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2:311-353.
- Wright, Erik O. (1978). *Class, crisis and stat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Wright, Erik O., and Donmoon Cho. (1992). The relative permeability of class boundaries to cross-class friendship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Sweden and Norwa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7:85-102.
- Wright, James D., and Peter H. Rossi, eds. (1981).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hazards*. Cambridge, MA: Abt Books.
- Wuthnow, Robert. (1979).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cience and world system theory. *Theory and Society*, 8:215-243.
- Wuthnow, Robert. (1987). *Meaning and moral order: Explorations in cultur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ysong, Earl, Richard Aniskiewicz, and David Right. (1994). Truth and DARE: Tracking drug education from graduation and symbolic politics. *Social Problems*, 41:448-468.
- Yammarino, Francis, Steven Skinner, and Terry Childers. (1991). Understanding mail survey respons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613-640.
- Yancey, William L., and Lee Rainwater. (1970). Problems in the ethnography of the urban underclasses. In *Pathways to data*, edited by R. W. Habenstein, pp. 245-269. Chicago: Aldine.
- Yeo, Eileen James. (1991). The social survey in social perspective, 1830-1930. In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1940*, edited by M. Blumer, K. Bales, and K. Sklar, pp. 49-6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in, Robert K. (1988). *Case study research*, rev. ed. Newbury Park, CA: Sage.
- Young, T. R. (1980). Comment on the McQuaire-Wardell debat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1:459-462.
- Yow, Valerie Raleigh. (1994).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Yu, J., and H. Cooper. (1983). A quantitative review of research design effects on response rates to questionnaire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0:36-44.
- Zaller, John, and Stanley Feldman. (1992). A simple theory of survey responses: Answering questions versus revealing pre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579-616.
- Zane, Anne, and Euthemia Matsoukas. (1979). Different settings, different results? A comparison of school and home respons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3:550-557.
- Zaret, David. (1978).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3:114-121.
- Zeisel, Hans. (1985). *Say it with figures*, 6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 Zelizer, Viviana A. (1985).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Zeller, Richard, and Edward G. Carmines (1980).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dat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man, John. (1968). *Public knowledge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man, John. (1976). *The force of knowledge: The scientific dimension of socie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mbardo, Philip G. (1972). Pathology of imprisonment. *Society*, 9:4-6.
- Zimbardo, Philip G. (1973). On the ethic of intervention in huma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gnition*, 2:243-256.
- Zimbardo, Philip G., et al. (Apr. 8, 1973). The mind is a formidable jailer: A pirandellian priso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22:38-60.
- Zimbardo, Philip G., et al. (1974).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Privation, power and pathology. In *Doing unto others*, edited by Z. Rubi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Zuckerman, Harriet. (1972). Interviewing an ultra-elit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159-175.
- Zuckerman, Harriet. (1978). Theor choice and problem choice in science. In *Sociology of science*, edited by J. Gaston, pp. 65-95.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Zuiches, James J. (1984). The organization and funding of social science in the NSF. *Sociological Inquiry*, 54:188-210.
- Zurcher, Louis A. (1979). The airline passenger: Protection of self in an encapsulated group. *Qualitative Sociology*, 1:77-99.

漢英索引

■一劃■

- 一致法 method of agreement
725
一致型 uniform 86
一種賦權感 a sense of
empowerment 487
一種關係立場 a relational
position 217

■二劃■

- 二手報告 secondary account
140
人之機械模式 mechanical model
for man 127
三角檢核法 Triangulation 225

■三劃■

- 大學品質指數 college quality
index 317
女性主義 feminist 155
女性職業升遷障礙 glass ceiling
60
工具取向 instrumental
orientation 125

- 工具法則 law of the instrument
289
工具影響 Instrumentation 414
工業革命 Industrial Revolution
12

■四劃■

- 中央極限定理 central limit
theorem 360
中位數 median 544
中距理論 middle-range theory
111
互為主體性 intersubjectivity
130, 155
互動效應 interaction effects
408
內在一致性 internal consistency
630
內在效度 internal validity 307
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 65
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301
內在鑑定 internal criticism 682
公正無私 disinterestedness 17
分析比較 analytic comparison
725

- 分析備忘錄 analytic memos
626
- 分析範疇 analytic domain 730
- 分歧效度 divergent validity
304
- 分層抽樣 Stratified Sampling
365
- 分類 classification 83
- 分類學 taxonomy 84
- 化約論 reductionism 245
- 匹茲堡調查 Pittsburgh Survey
430
- 反毒教育 Drug Abuse Resistance
Education, D.A.R.E. 52
- 反面個案方法 negative case
method 741
- 反對參政權運動
countermovements 512
- 反應心向偏誤 response set bias
457
- 孔德 Auguste Comte 120
- 少年犯罪矯治營 boot camps 2
- 巴黎公社 Paris Commune 108
- 引用 citation 762
- 心理虐待 Psychological Abuse
171
- 文化脈絡研究 culture-context
research 686
- 文書裁減行動 Paperwork
Reduction Act 198
- 月暈效應 halo effect 10
- 比率的 ratio 310
- 比較判斷法則 law of
comparative judgement 330
- 父權主義 patriarchy 671
- 五劃■
- 世代研究 cohort study 58
- 主動成員關係 active
membership 611
- 主場優勢 home court advantage
255
- 主軸式編碼 axial coding 717
- 代主義 modernism 158
- 代表性信度 Representative
Reliability 296
- 出局者 Freeze Outs 608
- 加法量表 additive scales 325
- 加權 Weighting 319
- 包氏社會距離量表 Bogardus
Social Distance Scale 332
-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437
- 卡內基美倫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6

卡密勒特計畫 Project Camelot
 200
 去除焦點 defocusing 597
 可信的 dependable 227
 可信度的階層 hierarchy of
 credibility 645
 可信賴性 trustworthiness 227
 可被接受的無能 acceptable
 incompetent 615
 可靠的 credible 227
 古典實驗設計 Classical
 Experimental Design 403
 囚犯兩難 prisoner's dilemma
 27
 外在一致性 external consistency
 630
 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308
 外在鑑定 external criticism
 682
 外圍成員關係 peripheral
 membership 611
 外集團 out-group 332
 失去自尊 Loss of Self-esteem
 171
 尼采 Nietzsche 158
 平均數 mean 544
 本末倒置 inverted 696
 母數 parameter 356
 民族誌 ethnography 586

民粹論 Populism 770
 生理傷害 Physical Harm 171
 生態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
 632
 生態謬誤 Ecological Fallacy
 244
 目的論 Teleology 243
 目標母體 target population 354
 目標抽樣 target sampling 378
 立意或判斷抽樣 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349

■六劃■

交叉設計 crossover designs
 182
 交互作用效果 Interaction effect
 238
 全國意見研究中心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16
 全國調查 National Enquirer
 514
 全距 range 363, 546
 共同變異 concomitant variation
 101
 共有主義 communalism 17
 共產黨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429
 列聯式問題 contingency
 question 451

- 同時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
301
- 同理心 empathy 608
- 同義字 equivalence 685
- 同樣本多次研究 panel study
58
- 同謀 confederates 400
- 名目的 nominal 310
- 因果律 causal laws 127
- 因果解釋 Causal Explanation
98
- 回答風格 response style 327
- 回答偏頗 response bias 327
- 回答傾向 response set 327
- 多因子設計 Factorial Designs
408
- 多重指標 multiple indicators
296
- 多國研究 transnational research
687
- 多變項 multivariate 542
- 安娜學派 Annales School 667
- 安慰劑效應 placebo effect 419
- 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53
- 成員 members 587
- 成員效力 member validation
632
- 有意義的社會行動 meaningful
social action 134
- 次母體 subpopulations 365
- 次母體分析 subpopulation
analysis 296
- 次序的 ordinal 310
- 次級資料 secondary sources
673
- 次級資料分析 secondary
analysis research 67
- 次級調查資料 Secondary Survey
Data 522
- 次數分配 Frequency
Distributions 542
- 次數分配多邊圖 Frequency
Polygon 542
- 死亡率 Mortality 414
- 米爾葛蘭 S. Miligram 172
- 自由寫作 freewriting 792
- 自尊指數 Self-Esteem Index
326
- 自然主義 naturalism 594
- 自然態度 natural attitude 138
- 自然歷史 natural history 632
- 自願同意原則 principle of
voluntary consent 177
- 色情書刊 Pornography 770
- 行為主義 behaviorism 393
- 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46

行話 argot 620

■七劃■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43
 佛洛姆 Erich Fromm 143
 告密者 Whistle-Blower 190
 完全成員關係 complete membership 611
 完全作答率 total response rate 465
 完全參與者 complete participant 610
 完全設計方法 Total Design Method 467, 469
 完成 accomplish 593
 完成率 completion rate 464
 完形 Gestalt 642
 局外人 outsider 587
 形成性 formative 53
 形成個案 casing 712
 形成問題 Question Formulation 508
 抄襲 plagiarism 168, 789
 技術體制 technocratic 220
 找出 seek out 9
 批判社會科學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CSS 123, 143
 折半法 split-half method 296
 改寫 paraphrasing 789

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325

沙特 Sartre 158

決定論 determinism 149

系統性抽樣 Systematic

Sampling 363

系統性質疑 organized

skepticism 17

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 16

■八劃■

乖乖計畫 pet projects 200

典型 typification 139

典範 paradigm 111

制定型 established 86

受訪者驅動抽樣 respondent-driven sampling 380

受試者 subjects 398

命題 proposition 88

往返翻譯 back translation 699

性別歧視 sex discrimination 772

性侵害 sexual assault 772

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772

所羅門四組設計 Solomon Four-Group Design 407

拉丁方塊設計 Latin Square Designs 407

拒絕率 refusal rate 464

抽象型 abstract 86

- 抽樣元素 sampling element
354
- 抽樣分配 sampling distribution
360
- 抽樣比 sampling ratio 354
- 抽樣架構 sampling frame 356
- 抽樣間距 sampling interval
363
- 抽樣誤差 sampling error 358
- 明識 informed 391
- 法律傷害 Legal Harm 175
- 爭權 empowerment 47
- 物化 reification 148
- 直接觀察的筆記 direct
observation notes 625
- 知識的相關 epistemic
correlation. 300
- 社會力 Social Forces 26
- 社會指標運動 social indicators
movement 517
- 社會研究正常化 normalize
social research 614
- 社會科學季刊 th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
- 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
Consortium of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SSA 205
- 社會問題 Social Problems 21
- 社會期許偏誤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446
- 社會階級 social class 285
- 社會福祉索引 Index of Social
Well-Being 518
- 社會影響評估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49
- 社會調查 social survey 430
- 社會學季刊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
- 社會學想像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35
- 肯定行動方案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2
- 初級資料 primary sources 673
- 表面上的興趣 appearance of
interest 616
- 表面事實 outcropping 747
- 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 301
- 表意的 ideographic 139
- 金賽性學研究 Kinsey sex study
184
- 阿多諾 Theodor Adorno 143
- 非反應式的 nonreactive 498
- 非同步轉移模式 asynchronous
transfer modes 204
- 非科學 nonscientific 12
- 非循環關係 nonrecursive 101

非虛假關係 no spuriousness
102

■九劃■

信度 reliability 294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s
363
侵蝕性測量 erosion measures
499
保守主義 conservatism 25
保密性 confidentiality 184
保密證書 a certificate of
confidentiality 185
促使 leads to 233
俗民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
592
前科學 prescientific 12
前導測試 pilot study 297
威懾理論 theory of deterrence
52
客觀性 universalism 17
封閉式問題 close-ended
question 451
建構第三變項之表格
Constructing Trivariate Tables
568
後現代 postmodern 155
後現代研究 postmodern research
158

後設分析 meta-analysis 467
後測 posttest 398
按序抽樣 Sequential Sampling
353
持續進行之紀錄 running records
673
指數與量表 Indexes and Scales
313
括弧法 bracketing 141
既存的統計資料 existing
statistics 67
相關係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101
研究造假 research fraud 168
科學的不當行為 Scientific
Misconduct 168
科學界 scientific community
13
美國大學教授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 AAUP 214
美國民意調查協會 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348
美國社會學評論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21
美國社會學學會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
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1

美國經濟學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1
要求特質 demand characteristics
419
計畫書 proposal 805
計算表 tally sheet 512
負所得稅 negative income tax
46
重新蒐集的資料 recollections
673
限額抽樣 Quota Sampling 348
陌生的態度 attitude of
strangeness 606
韋伯 Max Web 120
風格 style 786
首席研究者 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 806

■十劃■

個案化 casing 292
個案研究 case study 57
個案研究的比較研究 case-study
comparative research 686
修改 revising 794
倫理信條 code of ethics 188
倫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6
原生質 protoplasm 11
套套邏輯 Tautology 242

家戶內抽樣 Within-Household
Sampling 372
家長制度 paternalism 671
差異法 method of difference
725
效度 validity 294
效標效度 Criterion Validity
301
時間序列研究 time series
research 58
格式與設計 Format and Layout
468
格特曼量表 Guttman Scaling
337
海蒂報告書 Hite Report 14
海德格 Heidegger 158
烏比岡湖效應 Lake Wobegon
effect 192
破壞 breaching 593
紐倫堡規章 Nuremberg code
188
缺點 Disadvantages 471
脈絡回顧 context review 755
脈絡的同義字 contextual
equivalence 700
脈絡效應 context effect 460
記錄表 recording sheet 512
配對 Matching 397
馬克斯 Karl Marx 120

馬庫色 Herbert Marcuse 143
 高品質的資料 high-quality data
 629
 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120,
 346, 498

■十一劃■

偽科學 Pseudoscience 13
 假定 assumption 83
 假設與因果關係 The
 Hypotheses and Causality 232
 匿名 anonymity 183
 匿名審查 blind review 20
 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304
 區間的 interval 310
 參與觀察研究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esearch 586
 唯後測非同等群組設計 posttest-
 only nonequivalent group design
 404
 唯意志論 voluntarism 149
 唯實主義 realism 144
 基礎研究 basic research 43
 執行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796
 夠格的圈內人表現 competent
 insider performance 632

婦女平等機會指數 Index of
 Equal Opportunity for Women
 326
 常態分配 normal distribution
 330
 探索性研究 exploratory research
 39
 接觸率 contact rate 464
 掩護 fronts 631
 推論 Drawing Inferences 383
 推論 infer 708
 推論統計 inferential statistics
 383
 啟蒙時代 Enlightenment period
 12
 敘事歷史 narrative history 679
 晚近效應 recency effect 457
 晦暗的 tarnished 236
 混合範疇 mixed domain 730
 涵蓋律則模式 the covering law
 model 124
 理想型 ideal-type 84
 理論抽樣 Theoretical Sampling
 354, 633
 異例抽樣 Deviant Case
 Sampling 353
 眾數 mode 544
 統計回歸 Statistical Regression
 414

- 統計值 statistic 357
- 統計效度 statistical validity
308
- 紮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 94,
354
- 累積量表 cumulative scaling
337
- 處遇 treatment 63, 398
- 處遇擴散或污染 Diffusion of
Treatment or Contamination
415
- 規範化 norming 320
- 設身處地 walk in their shoes
625
- 設計記號 Design Notation 402
- 軟性科學 soft sciences 11
- 軟性資料 soft data 220
- 通俗的範疇 folk domain 730
- 連帶文化 cultures of solidarity
293
- 連續的近似值 successive
approximation 724
- 連續與間斷變項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Variables 309
- 部分開放式問題 partially open
questions 452
- 都市腐敗 urban decay 82
- 陶斯克基梅毒研究 Tuskegee
Syphiles Study 170
- 雪球抽樣 Snowball Sampling
351
- 十二劃■
- 單一性別 single-sex 2
- 單向度性 unidimensionality
314
- 單次個案研究設計 One-Shot
Case Study Design 404
- 單組唯後測設計 one-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 404
- 單組預試—後測設計 One-
Group Pretest-Posttest Design
404
- 單變項 univariate 542
- 場地實驗 field experiment 419
- 尋獲率 location rate 463
- 描述性 descriptive 38
- 描述性問題 descriptive question
640
- 普遍性 universe 299
- 智力及性向測驗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SAT 303
- 替代性侵略行為 displaced
aggression 81
- 殘缺的 soiled 236
- 測量水平 Levels of
Measurement 309

測試與再測試法 test-retest
 method 295
 測謊題 sleeper question 450
 焦點團體 focus group 474
 猶疑者 floaters 457
 硬性資料 hard data 220
 等值信度 Equivalence
 Reliability 296
 等距區間 equal-appearing
 intervals 330
 筆調 tone 786
 結構式的觀察 structured
 observation 505
 結構式問題 structural question
 640
 結構性解釋 structural
 explanation 108
 虛假性 spurious 573
 虛假關係 Spuriousness 250
 評估研究 evaluation research
 51
 費城調查報 Philadelphia
 Inquirer 514
 超文件 Hypertext 744
 超驗的 transcendent 221
 量化的 quantitative 13
 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studies
 24
 量表 scaling 322

量度的 scalable 339
 量度圖分析 scalogram analysis
 339
 開放式問題 open-ended question
 451
 開放式編碼 open coding 715
 間斷性時間數列 Interrupted
 Time Series 406
 順序效應 order effects 460

■ 十三劃 ■

亂數表 random-number table
 359
 傳播媒體的迷思 Media Myths
 6
 奧瑞岡大學 University of
 Oregon 26
 愚民化 dumbing down 251
 感同身受 climb into their skin
 625
 搜尋者 The Searchers 405
 新異效應 novel effect 419
 極端個案抽樣 extreme case
 sampling 353
 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 285
 概念同義字 conceptual
 equivalence 701
 概念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
 285

概念假設 conceptual hypothesis
291

概念領域中抽樣 sampling from
the conceptual domain 299

概念叢 concept clusters 82

準實驗與特別設計 Quasi-
Experimental and Special
Designs 406

罪惡的知識 guilty knowledge
645

群集 clusters 16

補償行為 Compensatory
Behavior 415

解釋性的類型 interpretation
pattern 571

詳實的描述 thick description
592, 661

詮釋 interpretation 267

詮釋性解釋 interpretive
explanation 110

詮釋社會科學 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 123

詮釋學 hermeneutics 133

資料 data 13

資訊自由法案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201

跨國研究 cross-national research
686

過度概化 overgeneralization 9

遁詞 evasions 631

隔離的錯誤 error of segregation
800

預測及解釋 Prediction and
Explanation 97

預測效度 Predictive Validity
303

預試 pretest 398

■ 十四劃 ■

團結型 solidarity 86

實地研究 field research 68,
593

實地場域 field site 598

實徵 empirical 13

實徵假設 empirical hypothesis
291

實踐 Praxis 151

實證主義 positivism 123, 770

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 positivism
social science 124

實證哲學的課題 The 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 124

實驗者期望 Experimenter
Expectancy 416

實驗前設計 Preexperimental
Designs 404

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
402

實驗寫實 experimental realism
418
對照性問題 contrast question
641
對應規則 rules of
correspondence 290
構念 construct 284
構念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
303
演繹 deductive 93
算術平均數 averages 544
網絡分析 Network Analysis
735
網絡理論 network theory 108
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158
蓋頓的問題 Galton's problem
689
製卷順序 funnel sequence 460
語意差別 Semantic Differential
335
語意學分析 semantic analysis
506
赫爾辛基宣言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189
輔助理論 auxiliary theory 290
銀河 galaxy 12
障礙 breakdowns 617
需求評估 needs assessment 53

■十五劃■

價值中立 value neutrality 216
增生性測量 accretion measures
499
寫作者的障礙 writer's block
792
憤怒的駕駛 Road Rage 8
數量比率機率 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PPS 372
標明的類型 specification pattern
571
標記 marker 637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546
範疇分析 domain analysis 728
編年法 chronology 801
編碼系統 coding system 504
編碼者間的信度 intercoder
reliability 297, 507
編碼表 coding form 512
編輯 editing 794
複證的類型 replication pattern
571
質化的 qualitative 13
質化社會學 Qualitative
Sociology 587
質化研究 qualitative studies 24
適當性 adequacy 708

適當性假定 the postulate of
adequacy 140

■ 十六劃 ■

學術自由 academic freedom
213

導致 causes 233

操作化 operationalization 288

操作性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on
288

操弄式的調查 pseudosurvey
491

橫斷性研究 cross-sectional
research 57

機構審查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179

激烈的爭吵 hassles 610

獨立推論 separation of inference
626

積極填答率 active response rate
465

螢幕或跳躍式問題 screen or
skip questions 451

輻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304

辨明性的類型 explanation
pattern 573

選擇性編碼 selective coding
718

選擇偏誤 Selection Bias 411

遺失資料 Missing Data 320

錯誤的資訊 misinformation
631

錯誤意識 false consciousness
149

隨手筆記 jotted notes 622

隨機分派 Random Assignment
394

隨機反應技術 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 RRT 449

隨機數碼撥號 Random-Digit
Dialing, RDD 374

霍桑效應 Hawthorne effect
418

優點 Advantage 471

■ 十七劃 ■

彌爾 John Stuart Mill 120

應用研究 applied research 38

戴面具 masking 380

檢核 checks 228

總合評分 summated-rating 325

總結性 summative 53

縱貫性研究 longitudinal
research 57

舉例法 illustrative method 724

賽斯通量表法 Thurstone Scaling
330

隱私 Privacy 182
 隱性的知識 tacit knowledge
 592
 隱性的編碼 latent coding 506
 隱藏性母體 Hidden Population
 378

■十八劃■

歸納 inductive 93
 歸納的 inductive 139
 禮貌上的偏誤 courtesy bias
 693
 簡單隨機 Simple Random 358
 簡報 debrief 394
 轉型的知識份子 transformative
 intellectual 154
 轉換 translate 663
 雙手萬能者 bricoleurs 264
 雙重保密實驗 double-blind
 experiment 416
 雙重報酬系統 dual reward
 system 380
 雙組唯後測設計 Two-Group
 Posttest-Only Design 406
 雙載假設 double-barreled
 hypothesis 238
 雙變項 bivariate 542

■十九劃■

壞血事件 Bad Blood 170
 穩定信度 Stability Reliability
 295, 414
 簽約研究 contract research 192
 證實 proved 232
 關係 correlation 101
 關聯 association 101
 關聯模式 models of relevance
 209
 類型學 typology 84
 類聚抽樣 Cluster Sampling
 368

■二十劃■

嚴重錯表 misrepresent 347
 警方犯罪報告 Uniform Crime
 Report 316

■二十一劃■

屬性 attributes 229
 譴責 censure 214
 辯證 dialectic 146

■二十二劃■

權變評估 contingency evaluation
 55

■二十三劃■

- 變異與變項 Variation and
variables 229
- 邏輯系統 A System of Logic
124
- 邏輯實徵 logical empiricism
124
- 顯性的編碼 manifest coding
506
- 顯性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
591
- 顯著水準 level of significance
577
- 體悟 Verstehen 133

■二十五劃■

- 觀察者一如參與者 observer as
participant 610

本書作者 W. Lawrence Neuman 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鑽研方法論多年，本書是他的代表作，在學術界享譽甚隆。

全書分為五大部分，包括基礎認定、籌劃與準備、量化資料搜集與分析、質化資料搜集與分析、社會研究與報告撰寫。從頭到尾，一氣呵成。

作者用平易的語句與社會生活中的實例，論述基本概念，語調輕鬆活潑。

本書每介紹一項方法原則或概念，隨即有範例、圖示緊密搭配，讓讀者活學活用。是一本值得讀者參考的好書。



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58號6樓
電話：(02)2362-0918 傳真：(02)2362-2701

ISBN 986-80015-5-2



9 789868 001558